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状元卷.2,大明状元卷/杨寄林主编.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1

ISBN 7-5440-2222-6

Ⅰ.中… Ⅱ.杨… Ⅲ.科举考试-试卷-中国-明代 Ⅳ.D69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1352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2号楼)

山西太原今天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375

字数:808千字 印数:1-2000册

定价:47.00元

中华状元卷编译委员会

学术总顾问　王树民　王炳照

主　　编　杨寄林　宋大川　金　山

副 主 编　陶黎明　祁振良　刘锡昂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文明元　刘锡昂　祁振良

孙继民　杨倩描　杨寄林

李岩松　李绍平　宋大川

金　山　侯真平　姜慧颖

陶黎明　董文武　蔺瑞生

读书中文网

目 录

◉ 大明状元卷 ◉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1)
会试试题 ……(1)
殿试策问 ……(2)
吴伯宗 会试卷四道 ……(5)
殿试对策 ……(23)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 ……(31)
会试试题 ……(31)
殿试策问 ……(31)
练子宁 殿试对策 ……(32)

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 ……(40)
会试试题 ……(40)
殿试策问 ……(40)
胡 靖 殿试对策 ……(42)
王 艮 殿试对策 ……(46)
李 贯 殿试对策 ……(51)

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壬辰科 ……(56)
会试试题 ……(56)
殿试策问 ……(56)
马 铎 殿试对策 ……(58)

林　薰　殿试对策……(66)
王　钰　殿试对策……(76)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庚戌科……(84)
会试试题……(84)
殿试策问……(84)
林　文　殿试对策……(85)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乙丑科……(91)
会试试题……(91)
殿试策问……(91)
商　辂　殿试对策……(93)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101)
会试试题……(101)
殿试策问……(101)
彭　时　殿试对策……(103)

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甲戌科……(113)
会试试题……(113)
殿试策问……(113)
徐　溥　殿试对策……(115)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丁丑科……(122)
会试试题……(122)
殿试策问……(122)
黎　淳　殿试对策……(124)
徐　琼　殿试对策……(133)
陈秉中　殿试对策……(141)

《1》微信专享免费转存 1000g 珍稀古籍古图、家谱大全、全国地理方志、现代易学、道学、佛学、玄学、中医、历史等资源（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网盘的管控，资源可能会变动）。

《2》朋友圈持续免费分享各类珍稀绝版资源中。

《3》中医古籍、易学（术数）古籍、道文化古籍、天文地理学古籍、先进技艺类古籍、军事兵法古籍、古今中华武术大全、佛文化古籍；各类历史文献与绝版实用资源代找。

《4》两个微信都是我的号，只需添加一个号即可（两个号所发内容是一样的），资源不定期变动更新，你如果已经有我的微信，可以多看我朋友圈置顶评论同步更新进行了解转存。



或



古籍的内容往往会颠覆现有历史，非常珍贵值得研究。（举个例子：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就是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获得的灵感。）古籍的内容也会更纯粹，更接近老祖宗的思维与智慧。

微信：laijy2222　　微信：laijy3333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庚辰科 …… (148)
会试试题 …… (148)
殿试策问 …… (148)
谢一夔 殿试对策 …… (149)

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 …… (160)
会试试题 …… (160)
殿试策问 …… (160)
罗 伦 殿试对策 …… (162)
程敏政 殿试对策 …… (188)

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己丑科 …… (202)
会试试题 …… (202)
殿试策问 …… (202)
张 升 殿试对策 …… (203)
丁 澎 殿试对策 …… (214)
董 越 殿试对策 …… (228)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 …… (239)
会试试题 …… (239)
殿试策问 …… (239)
吴 宽 殿试对策 …… (241)
刘 麟 殿试对策 …… (253)
李仁杰 殿试对策 …… (267)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 …… (277)
会试试题 …… (277)
殿试策问 …… (277)

谢　迁　殿试对策 …… (279)
刘　戬　殿试对策 …… (289)
王　鏊　殿试对策 …… (304)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 …… (317)
会试试题 …… (317)
殿试策问 …… (317)
费　宏　殿试对策 …… (319)

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 …… (335)
会试试题 …… (335)
殿试策问 …… (335)
钱　福　殿试对策 …… (337)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 …… (347)
会试试题 …… (347)
殿试策问 …… (347)
朱希周　殿试对策 …… (349)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 …… (362)
会试试题 …… (362)
殿试策问 …… (362)
康　海　殿试对策 …… (364)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 …… (375)
会试试题 …… (375)
殿试策问 …… (375)
顾鼎臣　殿试对策 …… (377)
董　玘　殿试对策 …… (387)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 …… (402)
会试试题 …… (402)
殿试策问 …… (402)
杨 慎 殿试对策 …… (404)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 …… (417)
会试试题 …… (417)
殿试策问 …… (417)
舒 芬 殿试对策 …… (419)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 …… (436)
会试试题 …… (436)
殿试策问 …… (436)
杨维聪 殿试对策 …… (440)
陆 针 殿试对策 …… (453)
费懋中 殿试对策 …… (472)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 …… (481)
会试试题 …… (481)
殿试策问 …… (481)
林大钦 殿试对策 …… (483)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 …… (501)
会试试题 …… (501)
殿试策问 …… (501)
茅 瓒 殿试对策 …… (502)
罗 珵 殿试对策 …… (511)
袁 炜 殿试对策 …… (520)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531)
会试试题 ……(531)
殿试策问 ……(531)
李春芳 殿试对策 ……(533)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548)
会试试题 ……(548)
殿试策问 ……(552)
申时行 殿试对策 ……(561)
王锡爵 会试卷三道 ……(572)
殿试对策 ……(588)
余有丁 会试卷一道 ……(603)
殿试对策 ……(605)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620)
会试试题 ……(620)
殿试策问 ……(620)
罗万化 殿试对策 ……(622)
黄凤翔 殿试对策 ……(637)
赵志皋 殿试对策 ……(652)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666)
会试试题 ……(666)
殿试策问 ……(666)
孙继皋 殿试对策 ……(669)

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680)
会试试题 ……(680)

殿试策问 …… (680)
张懋修 殿试对策 …… (683)
萧良有 殿试对策 …… (693)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 …… (705)
会试试题 …… (705)
殿试策问 …… (705)
焦 竑 殿试对策 …… (708)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 …… (719)
会试试题 …… (719)
殿试策问 …… (719)
赵秉忠 殿试对策 …… (722)
顾起元 殿试对策 …… (731)

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 …… (743)
会试试题 …… (743)
孙承宗 殿试对策 …… (743)

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 …… (753)
会试试题 …… (753)
殿试策问 …… (753)
钱谦益 会试卷七道 …… (756)
殿试对策 …… (784)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 …… (794)
会试试题 …… (794)
殿试策问 …… (794)
陈仁锡 殿试对策 …… (798)

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 …… (813)
会试试题 …… (813)
吴伟业 殿试对策 …… (813)
明思宗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 …… (821)
会试试题 …… (821)
殿试策问 …… (821)
刘理顺 殿试对策 …… (823)
明代进士科殿试策题辑存 …… (831)

◉ 大明状元卷 ◉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辛亥科

会试试题

礼记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

四书疑 《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夫禹、皋陶、汤于尧舜之道,其所以见知、闻知者,可得而论欤?《孟子》又言:伊尹乐尧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尧舜。夫伊尹之乐,仲尼之祖述,其与见知、闻知者,抑有同异欤?请究其说。

经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于五辰,庶绩其凝。

论 射礼

策 问:古昔帝王继天出治,立经陈纪,为天下后世虑,至深且远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法典,其来尚矣。自是以下,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立礼仪,而论者谓汉大纲正。唐魏徵定新礼,祖孝孙奏雅乐,房玄龄修律令,李卫公明兵法,而论者谓唐万目举。其果有合于先王之道乎?圣上奉天承运,混一天下,干戈载戢,纪纲既正,然犹日与二三大臣,讲求政理,诏兴科第,博采群言,诚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闱较艺,请以立经定纪之事,相与讲明之。夫礼乐,治之本也。其创制可得而闻乎?政令,

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论乎?学校，所以正俗也。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何以臻其效乎?农桑，所以养民也。限田均田，口分世业，何以定其制乎?设官，所以莅政也。任法之与任人，孰为经国之远谋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选举之于资格，孰为铨曹之要法乎?盐铁，国之大利也。何以除奸而去弊乎?漕运，国之大计也。何以足国而裕民乎?国家唯求实效，不尚虚文。幸稽诸往古，验之当今，使言之必可见于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其悉心以对，毋有所隐。

殿试策问

[洪武四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盖闻古先帝王之观人，莫不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汉之贤良，宋之制举，得人为盛。朕自临御以来，屡诏有司，搜罗贤俊，然而杰特犹若罕见，故又详延子大夫于廷而亲策之，以庶几于古先帝王之盛节焉。历代之亲策，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其孰为可法欤?所谓敬天者，果惟于圜丘郊祀之际，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抑它有其道欤?所谓勤民者，宜莫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为耶?岂勤于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观，宜莫急于明伦厚俗。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而下，惟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差少疵议。果何道而致然欤?盖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略。

会试试题译文

礼记 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说起来才能够听得准，看得清，非常明智，足以居高临下；宽弘温和，足以包容一切；涌生意念，坚强刚毅，足以作出决断；庄重正直，足以显示出礼节的恭敬来；对文采的条理详密地予以察辨，足以作出区分来。

四书疑 《孟子》中说过：从唐尧、虞舜到商汤，经历了五百多年。

像大禹、皋陶，属于亲身看到而了解尧、舜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的人。像商汤，就属于只听说才了解尧、舜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的人。大禹、皋陶和商汤对于尧、舜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他们通过亲身看到而得以了解、通过听说而得以了解的原由，能够做一番论列吗？《孟子》中又说：伊尹喜好尧、舜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中庸》上讲孔子效法尧和舜。伊尹的这种喜好，孔子的那般效法，恐怕和通过亲身看到而得以了解、通过听说而得以了解的那些人，存在着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吧？请把这里面的疑问彻底谈清楚。

经 每天都能宣明九种德行中的三种德行来，从早到晚想这三德，谨慎勤勉地照此行事，那就可以做卿大夫了。每天都能严格约束自己，恭敬地践行九种德行中的六种德行，确实会处理好政事，那就可以当诸侯了。天子聚合三德、六德一并加以任用，施布政教，使这些按九德行事的人都担任职务，优异的人才也就全在朝廷上了。百官相互学习，各自尽职尽责。顺从星象的变化，教导民众，各项政事就都取得成效了。

论 射礼

策 提问：古代帝王跟随天命的后面拿出治理国家的措施，确立制度法规，为国家后代做考虑，极其深远周密。唐虞时代的六府三事，成周的法度典制，由来已经很久了。从此之后，汉代的萧何制定法律，韩信申明军法，张苍定立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叔孙通确立礼仪规范，因而议论政事的人都说，汉朝的朝政大纲很端正。到了唐朝，魏徵制定出新的礼法，祖孝孙奏上《大唐雅乐》，房玄龄修定成完备的法律，李卫公李靖宣明独特的兵法，因而讨论政事的人都说唐朝各种具体措施得到施行。其中真与上古先王的治国之道有相同之处吗？当今皇上奉受天命，承接时运，统一天下，兵器收起不用，朝廷纲纪已经端正，但还天天同大臣们研究政治，恢复科举考试，广泛采纳众人的建议，这实在是上古尧舜和夏禹等三王那样的盛大用心啊！现在朝廷举行中央考试，比试谁的道艺高，请把确立国家制度法规这方面的事情，一起讲清楚。礼仪乐舞是治国的根本，有关创作制定的事宜能让人听上一听吗？政事法令是治国的工具，能对立法讲论一番吗？学

校是用来使社会风气变纯正的，无论是地方学堂，还是国家学府，如何才能实现既定的效用呢?农业是用来养育天下百姓的，历来实行的限田制度、均田制度和口分田、世业田，如何才能酌定成适合当今的制度呢?设立官位，是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依靠行政法规和依靠人才发挥作用，究竟哪一项是治国的长久之计呢?科举取士，是为了任用官员，按才干选拔录用对于按年资升迁来说，哪一项是考核官员部门的最重要的方法呢?盐铁官营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如何才能除去奸诈，去掉弊端呢?通过水道往京师运送粮食和物资，是国家的大计，如何才能做到国家富足而百姓宽裕呢?国家只求实效，不喜欢夸夸其谈的文辞。希望考生能以古代为借鉴，结合当代实际，务必使自己的答案能在当今行得通，而且一行用，又可以让全天下以及后代照着去做。你们要竭尽心力来对答，不要有什么隐瞒。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大致曾听说，古代帝王考察人才，都是通过用言词全面汇报和逐项验核实际政绩来进行。汉代荐举贤良，宋朝由皇帝主持专门考试，录用的合适人选最多。皇帝我自从统领天下以来，多次下诏给主管部门，叫他们去搜罗贤才英杰。然而英杰奇士依然很少看到，所以又把你们士大夫全部延揽到殿廷来，亲自进行策问，以便同古代帝王的隆盛做法相接近。历代皇帝亲自进行策问，往往把敬奉皇天、替民众操劳作为主要问题。那么古代帝王敬奉皇天，替民众操劳，究竟在哪些方面到今天还可以效法呢?所谓敬奉皇天，果真就是在举行祭天大礼的时候，特向皇天表达自己怎样精粹纯一，也就够得上敬奉皇天了吗?或者还有其他方面呢?所谓替民众操劳，理应每天从早晨到傍晚忙于政务，连吃饭也顾不上的了。但这样顾不上吃饭，究竟该忙些什么呢?难道就是把一般政务都揽在自家身上吗?从历代来看，最要紧的是宣明伦理道德，使社会风尚淳厚。那么，伦理道德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够宣明，社会风尚又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淳厚呢?从夏商周三代以后，只有东汉的读

书人的风气，赵宋时期的伦理道德，很少有能让人加以非议的地方。这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才达到这种程度的呢？其中一定有能讲论一番的东西，应当写在答卷上，不要泛泛而谈，也不要过于简略。

吴伯宗　会试卷四道

吴伯宗（生卒年不详）　名祐，以字行，金溪（今属江西）人。洪武四年（1371）状元，得明太祖亲赐冠带袍笏，授官礼部员外郎，预修《大明日历》。后上书论时政，指斥丞相胡惟庸专恣不法。旋奉命出使安南（今越南），以名德为当地所重。返朝后进讲东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其为人温厚，但内刚，不苟阿附，故仕途坎坷。著有《吴伯宗全集》和《荣进录》。

四书疑

尝谓尧舜之道，中而已矣。见而知之者，此道也；闻而知之者，亦此道也。乐之者，此道也，而述之者，亦此道也。道岂二乎哉？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者。同时而同道也。若汤，则闻而知之者。时不同而道同也。盖当时尧授舜，舜授禹，三圣人相授而守一道。观其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妙，禹固受之；而皋陶之陈谟，若允迪厥德、身修思永之类，异辞同旨。则皋陶之见知者，可得而论矣。成汤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而建中于民。又与精一执中之语吻合无间，则汤之闻知者，又可得而论矣。见知者本于同时，而闻知者出于异代，此闻与见之所以分，而道则一中也。

又言伊尹乐尧舜之道者，本心之有德，而穷达同一致也。《中庸》言祖述尧舜者，道统之有在，而先后同一符也。夫伊尹处于畎亩之中，而心乐尧舜之道，诵其诗，读其书，实其理，嚣嚣自得，而卒能辅成商家之治，以尧舜其君民。则谓之乐尧舜之道，信乎其乐之矣。夫子有德无位，而不得行道于当时，乃垂教后世，删《诗》定《书》，正《礼》、《乐》，序《周易》，修《春秋》，为百世不易之大法。则谓之祖述尧舜，信

乎其祖述之矣。观夫伊尹之告君，一则曰主善为师，一则曰协于克一；夫子之教门弟子，一则曰克己复礼，一则曰依乎中庸。其与尧舜之精一执中者，宁有异乎？然则伊尹、孔子之于尧舜，迹虽不同，而道无不同；时虽有异，而道无有异。又安有二哉？

合而观之，皋陶之为臣，固不可与禹汤并称，而伊尹之任，亦不可与孔子之集大成者例论。然其初不异也，故曰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

我曾认为尧舜所奉行的大道，不偏不倚而已。亲眼看见而了解的人，是这种大道；亲耳听说而了解的人，也是这种大道。喜好的人是这种大道，传述的人也是这种大道。这种大道哪里会有两种呢？孟子说：由古代的尧舜直到商汤，有五百多年，像夏禹、皋陶，就是亲眼看见而了解的人。这正属于与尧舜时代相同，大道也相同。像商汤，就是亲耳听说而了解的人。这正属于与尧舜时代不同，但大道都相同。因为那时尧传授给舜，舜传授给禹，三位圣人递相传授，而守持同一个大道。观察那精心一意，确实把握住不偏不倚最高准则的奥妙，夏禹固然承受了它。而皋陶的陈述谋略，例如确实遵循先王的道德，修养心身，考虑长远这类话，说法不同，但主旨一样。所以皋陶属于亲眼看见而了解的人，就能够论定了。商汤按照适宜的标准来裁制政事，用礼法裁制内心，而向百姓确立起不偏不倚的最高准则，又与精心一意，把握住不偏不倚最高准则这两句话相吻合而不存在出入，所以商汤属于亲耳听说而了解的人，也能够论定了。亲眼看见而了解的人，来源于同一时代；亲耳听说而了解的人，出自后代，这就是听说和亲见区分开来的原因，而大道都是同一个不偏不倚啊！

孟子又说商朝初年的大臣伊尹是喜好尧舜大道的人。这正源于内心本来就有德，而困顿和显达，目的是一样的。《中庸》所说的孔子是效法尧舜的人。这正基于大道统系具有所在，而在先在后，符合的对象是相同的。伊尹处在田野之中，而心里喜好尧舜的大道，吟诵那诗歌，研读那篇籍，充实那道理，悠闲地自有所得，最后能辅佐成就商朝的大治，来使君民成为尧舜时代那样的君民。说他是喜好尧舜的大道，那他真算得上最喜好了。孔子有德而不当权，不能在当时推行

自己所崇奉的大道，于是向后代垂示教化，删选《诗经》，编定《尚书》，订正《礼经》和《乐经》，序明《周易》，修成《春秋》，成为历代不可改变的根本大法。说他效法尧舜，那他真算得上是效法了。考察伊尹告诫商王，一来说：以善为主，作为效法的对象；一来说：能够符合纯一之德。孔子教育弟子，一来说：克制自己，回到礼仪上。一来说：依凭中庸之道。他们与尧舜的精心一意，把握住不偏不倚的最高准则，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吗？既然如此，那么伊尹、孔子对于尧舜来说，事迹尽管不同，但大道却没有什么不同；时代虽有先后，但大道却没有什么差别，这又哪里存在着两种大道呢？

综合起来考察，皋陶作为大臣，固然不能与夏禹、商汤相提并论，而伊尹给自己所定的责任，也不能与孔子集前代之大成同等看待，但他们的初衷，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不管什么时候圣人再出世，也不会改变那治国大道的理论。

经

贤者勉于进德，而有以著治效于邦家；人君广于用贤，斯有以成治效于天下。盖家国天下，有大小之不同；而贤者之德，亦有多寡之异。人君之欲致治，安得不广用贤之道乎！昔者皋陶，陈知人之谟于舜，谓乎九德之中有其三而能日宣之者，则使之为大夫，而夙夜浚明其有家之事。九德之中有其六而又能日严而祇敬之者，则使之为诸侯，而亮采其有邦之政。随其德之高下，而称其职之大小。如此，人君惟能翕合而受之，敷布而用之，则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百僚皆相师法，百工皆及时以趋事，莫不顺于为治，而治功无不成矣。然则量能而任官，度德而定位，此所以下无遗才而上无废事也欤云云，以此。其所谓九德者，非宽容而庄栗，柔顺而植立，谨愿而恭恪，有治才而畏敬者乎！又非驯扰而果毅，劲直而温和，简易而廉隅，刚健而笃实，强勇而好义者乎！皆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济此之谓也。

夫九德在人，岂能皆备哉？有三德者焉，有六德者焉，特在君用之

何如尔。苟或贤而必求其备，则下无全才；不究其实，则上多废事。如是而欲求治功之成，其可得乎？是故九德之有其三，可以为贤矣，然未止此也。又能日日宣明而充广之，使其德之益以著，然后使之为大夫，则必能夙夜匪懈，而一家之事其有不粲然而昭明者乎？九德之有其六，又可为贤矣，然未止此也。又能日日严畏而祗敬之，使其德之日以勉，如是而使之为诸侯，则必能修政立事，而一国之治其有不秩然而修举者乎？德有多寡，而进修之实同；治有大小，而明、亮之效一。谓之贤者勉于进德，而著治之效于家邦者如此。

夫进德者，群贤之事；而用贤者，人君之道。用贤之道何如？必也翕合而受之，敷布而用之。有一德之可称者，则受其一德焉；有三德、六德者，则受其三德、六德焉。位必称其才，爵必称其德，固未尝责其全备，而亦未尝任乎匪人。如是，则贤者之德虽未必皆九德之全，而翕受敷施，自有以备九德之用。将见不独宽而栗者有其人，柔而立者亦有其人矣；不独直而温者称其任，强而义者亦皆称其任矣。以天下之贤，任天下之治，下岂有遗才而上岂有废事乎？是故才德之出乎千人者，谓之俊；才德之出乎百人者，谓之乂。今也明明在朝，穆穆布列矣，百僚百工，皆谓百官。今也同寅协恭，而蔼然德义之相师；趋事赴功，而翕然事功之毕举矣。

贤才用于上，治效成于下，斯必然之理也。是故时之春也，则布德施恩，所以顺木之辰，而春之绩成矣。时之夏也，则劳民劝农，所以顺火之辰，而夏之绩成矣。时之秋冬，则禁暴、诛暴、诛慢，谨盖藏，敛积聚，所以顺金水之辰，而秋冬之绩有不成者乎？木火金水，旺于四时，而土寄旺于四季。木火金水既治，则土在其中矣。谓之人君广于用贤，而成治效于天下者如此。然则合三德、六德以成九德之名，合一家、一邦以成天下之治，此贤者有益于天下国家，而人君之为治所以必广于用贤也欤？

由今观之，皋陶陈《谟》，以"知人安民"为一篇之纲领，"亦行有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安民之事也。知人者，安民之本；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然九德者，观人之法；而"翕受敷施"一语，实用人之要也。皋陶之陈谟，何其深切而详尽也哉！考之

当时,命九官,咨十二牧,莫不得人以为官使,用贤之道可谓广矣。野无遗贤,万邦咸宁,治效之成可谓盛矣。然则皋陶之所陈,皆帝舜之所已行,而犹丁宁若此者,圣贤不自满足之心也。治化在唐虞为盛,其有以夫!

贤良的人在提高德行上不断努力,从而有理由显现出治绩,给所在邦国和封地亮出效验来。帝王在任用贤才上扩大范围,这就有理由形成大治,给天下亮出效验来。封地、邦国、天下,存在着大小的不同,而贤人的德行,也有多和少的区别。帝王想要实现大治,怎能不扩大任用贤人的途径呢?古代皋陶向舜讲述知人善任的谋略,说是九德之中有其中的三德,而能每天都表现出来的人,便可以让他当大夫,他就会昼夜恭敬,努力地办好自己封邑的事情。九德中有其中的六德,而又能每天庄重恭敬地按六德要求自己的人,就可以让他当诸侯,他就会协助天子处理好自己邦国的政务。依据本人德行的高下,授给大小不同的职务。这样做,帝王只要能够综合起来任命他们,施布政教使用他们,就会使九德之人各得其所,做好他们该做的事情。大至千里挑一的英杰,小至百里挑一的贤人,都在政府中任职,使公卿大夫都相互效法,百官都按时节办好自己份内的事务,没有谁不顺从治理,而治理的功业也就没有不建成的了。既然如此,那么,衡量才能而任命官职,考虑德行而确定爵位,这是天下没有漏掉的人才,而朝廷没有荒废的政事的原因吧?这套说法被皋陶加以阐发,就出自这个缘故。其所强调的九德,难道还不是宽宏大量而又严肃恭谨,柔顺而又有主见,小心谨慎而又庄重,具有治理的才能而又有所畏敬吗?难道又不是能够接受意见而又果断,刚直而又温和,简易而又廉洁,刚健而又忠诚,勇敢而又喜好正义吗?这些都是自然培养而成的德行,并不是说用那方面来补济这方面啊!

九德体现在人的身上,哪里会全都具备它们呢?有的人具有三德,有的人具有六德,只是在于帝王如何使用他们罢了。如果有人是贤才,可一定要他各方面都很好,那就下面没有全才了;不验核一个人的实际情况,那就上面会有很多荒废的政事了。像这样却要谋求

治理功业的实现，能办得到吗？因此，九德中能有三德，便可以算是贤人了。然而并非到此为止。他又能够天天宣明三德而充实推广它，使自己的德行更加显著。然后让他当大夫，那么，他就一定能够夜以继日地操劳，他那封地的事务，能不突出而昭著吗？九德中具备六德，也可以算是贤人了。然而并非到此为止。他又能够天天庄重恭敬地按六德要求自己，使自己的德行越发得到激扬，这样再让他当诸侯，他就一定能将政事处理得很好，而一国之治，怎能不井然有序并且全面振作起来呢？德行有多有少，但不断提高、不断修明的实质是相同的；治理的范围有大有小，而在敬勉和辅佐上形成的效验是一致的。说是要贤人在提高德行上不断努力，显现出治绩，给所在封地或邦国亮出效验来，就像这个样子。

在提高德行上不断努力，这是众多贤人的事情。而任用贤人，就属于帝王的统治术了。任用贤人的统治术到底怎样呢？这就一定要综合起来任命他们，施布政教使用他们。自身具有一德而可称述的人，就用他那一德；具有三德、六德的人，就用他那三德、六德。职位一定要同他们的才能相称，官爵必须同他们的德行一致。这原本上并未曾要求他们各方面都很好，也未曾任用了不合适的人。像这样，贤人尽管不一定全都具备九德，可综合起来使用他们，普遍施布政教，自然就有理由派上九德的用场。不单单将会看到在宽宏大量又严肃恭谨方面，具有最合适的人选；在柔顺又有主见方面，也具有最合适的人选了；不单单刚直又温和的人能够承担起他的职责，勇敢又正义的人也能够承担起他的职责了。凭借天下的贤人来治理天下，下面哪里还会有漏掉的人才，上面又哪里还会有荒废的政事呢？因此才能德行千里挑一，被称为俊杰；才能德行百里挑一，被称为贤能。如今经过考查的俊杰贤能都置身在朝廷，四方迎来的宾客都站立在官员的班列当中了。各个部门的供职人员，统称为文武百官。如今上下彼此尊重，同心同德，而在道德仁义上都彬彬有礼地相互学习；忙着去履行好自身的职责，争取大功告成，而政事与功业就完全都振兴起来了。

贤才在上面得到任用，治理的功效就在下面告成，这是必然的

道理啊!所以在四季中的春季，就施布恩德，用来顺应木星的运行，而春季的功绩就告成了。到四季中的夏季，就让民众多辛苦，鼓励农业生产，用来顺应火星的运行，而夏季的功绩就告成了。到四季中的秋季和冬季，就严禁凶暴的行径，惩罚凶暴的罪犯，惩罚不服从的人，把仓库的储藏工作做得特周密，该积聚的物资都集中好，用来顺应金星和火星的运行，而秋季和冬季的功绩，还有不告成的吗?五行中的木行、火行、金行、水行，依次在春、夏、秋、冬占据主导地位，而土行在四季中每季的后十八天占据主导地位。木行、火行、金行、水行已经得到治理，土行也就包括在里面了。讲论起君主在任用贤才上特广泛，而在整个天下所形成的治理功效就像这个样子。既然如此，那么，聚合具有三种德行或六种德行的人，构成具有九种德行的声势；汇合起一个个封地、一个个邦国的治绩，构成整个天下的治绩。这正是贤才对天下国家很有补益，而君主施行治理就必定在任用贤才上范围特广泛的原因吧?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皋陶向虞舜陈奏《皋陶谟》，是把“知人安民”作为全篇的纲领的。而篇中从“亦行有九德”这五个字以下的内容，是讲知人善任这方面的事体的；从“天叙有典”这四个字以下的内容，是讲安定民众这方面的事体的。知人善任，其实构成了安定民众的根基。做不到知人善任却能够安定民众，这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情啊!然而九种德行，属于考察人才的具体方法，而“翕受敷施”也就是三德、六德聚合并用而且普遍推行到政教上这一句话，实际上却是任用人才的关键所在啊!皋陶向虞舜陈奏谋略，又是多么地深切而又详尽呀!考察当时的情况，任命九种朝廷要职，向十二州的长官咨询政事，没有一项不是以获取到合适的人选，让他们为朝廷出力来考虑的。任用贤人的途径与方法，真可以称得上是太广泛了。民间没有被漏掉的贤才，各个邦国全都一片安宁，治理效果的形成也可以称得上是太隆盛了。然而皋陶所陈奏的谋略，都是帝舜已经施行了的东西，可仍然像那样来叮咛嘱咐，这正是圣贤不自我满足的那种心念的显现啊!历史上治理与教化在唐尧虞舜时代属于最隆盛了，这也是确有理由的呀!

论　射礼

盖尝考于古人之射礼矣，可以明尊卑之分焉，可以辨贵贱之等焉，可以通上下之情焉，可以识贤否之辨焉，可以观德行之备焉，可以观威仪之节焉，可以观揖逊之容焉，可以见巧力之尽焉，可以见法制之详焉，可以审武备之修焉。有此十义者，此射礼之至也。

天子供虎侯、熊侯、豹侯，诸侯供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士布侯：此之谓尊卑之分。天子之乐以《驺虞》为节，诸侯以《狸首》为节，卿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此之谓贵贱之等。天子诸侯射，则先行燕礼；卿大夫士射，则先行乡饮酒礼：此之谓上下之情。容体比于礼，节奏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容体不比于礼，节奏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有赏，数不与于祭而有罚：此之谓贤否之辨。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之谓德行之备。

既张我弓，既挟我矢，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耦进拾发，雍容不迫：此之谓威仪之节。三揖而至阼，三让而后升，射毕揖降，众耦皆降，胜者揖而不骄，不胜者取觯立饮而不怨：此之谓揖让之容。矢之发也，剡剡焉而去，曰剡注；前后相续，三矢叠中，曰参连；射之贯革，镞见于外，曰白矢；四矢俱发，状如“井”字，曰井仪；臣与君射，退立一尺，曰襄尺：此之谓巧力之尽。画布曰正，栖皮曰鹄。凡侯之制，广与崇方，三分其广，而鹄居一焉。凡弓矢之制，强弱必均，设乏设中，靡不具备，司射司马，各有其人：此之谓法制之详。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习射，敬戒之志，常存于中，宴安之情，不留于念：此之谓武备之修。

嗟夫！射居六艺之一，其为礼也备矣，其取义也宏矣。圣人制礼，岂故为是之繁文哉？其要在观人之德行而已。是故古之人始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所以示男子之所有事也。八岁入小学，教之以六艺之文；十有五岁入大学，又教之以六艺之理，皆由此其选也。经曰侯以明之，传曰射以观德，其此之谓欤！

我曾经对古人举行射箭比赛的礼节进行过考察了。这套礼节可以昭明尊卑的区分，可以辨明贵贱的等级，可以沟通上下之间的感情，可以识别出贤能与顽劣的差异，可以观察出参赛者的德行是否完美，可以看出动作仪节的规范，可以看出互相谦让的风采，可以见到技巧的全部奥妙，可以见到法度规制的详备，可以审视武备的修明。具有这十种深义在里面，这就构成了射箭比赛礼节的最高境界了。

对天子要设置好专用虎皮做装饰的箭靶子，专用熊皮做装饰的箭靶子，专用豹皮做装饰的箭靶子。对诸侯要设置好专用熊皮做装饰的箭靶子，专用豹皮做装饰的箭靶子。对卿大夫要设置好专用鹿皮做装饰的箭靶子。对士人要设置好全用白麻布做成的箭靶子。这种安排就叫做尊卑的区分啊！天子射箭时，特用《驺虞》作为音乐来伴奏；诸侯射箭时，特用《貍首》作为音乐来伴奏；卿大夫射箭时，特用《采苹》作为音乐来伴奏；士人射箭时，特用《采蘩》作为音乐来伴奏。这种场面，这叫做贵贱的等级体现啊！天子和诸侯在射箭开始前，先举行宴饮礼；卿大夫和士人在射箭开始前，先举行乡饮酒礼。这种程序，就叫做沟通上下之间的感情啊！容仪体态符合礼的规定，动作节拍和音乐相协调，射中次数多的人，有资格参加祭祀礼。容仪体态违反礼的规定，动作节拍和音乐不一致，射中次数少的人，没资格参加祭祀礼。屡屡取得资格参加祭祀礼，就有封赏；屡屡没资格参加祭祀礼，就有处罚。这种规定，就叫做贤能与玩劣的辨别啊！内心的意念直接对准靶心，外观上的形体挺得笔直，然后手持弓和箭，瞄准瞄得稳稳的，这样做以后，才可以称得上会射中。这种临场表现，就叫做德行的完美啊！

已经张开我那硬弓，已经搭上我那利箭。逆向而行就符合圆的要求，掉转方向而行就符合方的要求。与对方并排前进，戴好套袖射出去，雍容大方，从容不迫。这种临场表现，就叫做动作仪节的规范。参赛者双方经过三次行用抱拳礼，共同来到观礼台的台阶下，又经过三次推让，然后才各就各位。射完以后，互相行礼退下来，每一对参赛者都这样退下来。取胜的一方行礼而不骄傲，没取胜的另一方取

过酒杯立刻就喝下杯中的罚酒而不怨恨。这种临场表现，就叫做互相谦让的风采。箭一发射，就疾速地飞向前去，这被特称为“剡注”射技。前后一支接一支，三支箭箭头射中箭尾，连成一串，这被特称为“参连”射技。箭头射穿箭靶子的皮革，露在外面，这被特称为“白矢”射技。四支箭连续发射，射在箭靶上形成“井”字的形状，这被特称为“井仪”射技。臣子和国君同时射箭，后退一尺站立，这被特称为“襄尺”射技。这五种射技，就叫做技巧的全部奥妙啊！在箭靶子上设计一块彩色布，这称为“正”，也就是箭靶子的中心部位。在“正”的外面再用兽皮制成装饰物，这称为“鹄”，也就是基本的靶心。箭靶子的制作规格，宽度与高度对等，按宽度的三分之一的比例做分配，而鹄正占其中的一份。弓和箭的制作规格，强弱度必定要保证均衡。既设置盛放计数筹码的器具，又设置报告射中结果的人员用来防箭的护身物，没有一样是缺少的。司射和司马这类专职官员，分别都有妥善的配备。所有这些方面，就叫做法度规制的完备啊！从天子一直到普通老百姓，没有谁不练习射箭，警惕戒备的思想，时常留存在心里，安乐享受的欲望不闪现在脑海中。这种状态，就叫做武备的修明啊！

哎呀呀！射箭技艺属于六种教育科目之一，它构成比赛的礼节简直太完备了，它取用的意义简直太宽泛了。圣人制定礼法，哪里是故意要形成这样纷繁的规定呢？关键在于观察人们的德行而已。因此古代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就用桑木作为弓，用蓬草作为箭，射向天地四方，用来表示这是男子应当致力的事情。长到八岁，就进入初级学校学习，教给他们六种教育科目的基本知识。十五岁时升入大学，又教给他们六种教育科目的高深道理。全都是经过此类教育，才把他们选拔出来呀！《尚书·益稷》上讲，举行射箭比赛礼，用来宣明善恶。解释经书的《礼记》上说，通过射箭来观察参赛者的德行，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策

尝谓有致治之道，有为治之法。道者历万世而无弊，法者与道而

两宜。道固不外乎法之中,而法亦未尝不囿于道之内。洪惟皇朝,创业之艰,盛心图治,惟求实效,不尚虚文。执事发策春闱,下询承学,讲求立经陈纪之事,甚盛举也。夫既以实效求,岂能以虚文应?谨稽诸往古、揆之当今以对。

窃惟执事之问,为纲者一,为目者八。何谓纲?曰道是也。何谓目?曰礼乐、政令、学校、农桑、设官、取士、盐铁、漕运是也。纲举目张,道全德备,而治天下之术,无逾此也。何者?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圣人修之,以为法于天下。若礼乐刑政,纲纪法度,无往而非道之所在也。所谓敛之不盈方寸,散之弥满六合;所谓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帝王之继天出治,所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何莫由斯道哉!故尝考之:六府三事载之《虞书》,六典八法具于《周礼》,此唐虞成周之所以立经陈纪也。然有都俞吁咈之气象,而后有修和赓歌之成功;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岂非尧舜、文武之道乎?六君之道一也,知尧舜之道,则知汤武之道矣。

汉高祖之有天下也,时则有若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之徒,定其律令,定其军法,定其章程,制其礼仪,而汉之所以为治者,靡不具矣。唐太宗之有天下也,则有魏徵定新礼,祖孝孙奏雅乐,房玄龄修律令,李卫公明兵法,而唐之所以为治者,靡遗矣。是虽未必合乎先王之道,亦未尝不本于先王之道矣。先儒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者,盖以汉之规模宏远,而唐之法令详密尔。然汉承秦后而杂采秦仪,唐承隋后而多仍隋制,则其道岂能如先王之纯,其法岂能如先王之备哉?

钦惟圣上,奉天承运,混一区宇,纲纪法度之施,礼乐刑政之具,固已并乎其有条,秩乎其有序矣,犹日与二三大臣励精图治,讲求政理,而又诏兴科第,博采群言。二帝三王之盛无以加此,岂汉唐之可拟伦也哉!

夫天下之事,有古有今,立纲陈纪,不在它求,在参酌乎古今而已。古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三千三百之仪,五声八音之节,一皆本

之人心，合乎人声，是故可以事神人，可以通上下，诚出治之本也。后世礼经残缺，乐书不存，而古之礼乐难以尽考矣。今欲制礼作乐，则必稽之《三礼》之文，考之《二雅》之音，参酌而行之，依仿而用之，使合于古而宜于今，用于今而不悖于古。而又本之以敬，协之以律，严尊卑上下之分，审黄钟声气之元，则礼虽非先王之有，可以义起，而今之乐，岂不犹古之乐乎？

古者政简而不烦，令严而不猛，所以防民欲而齐民心，诚出治之具也。比者有元之季，法度为弛，纲纪不振，固宜济之以严矣。今欲立为经久之法，则欲思乎《洪范》八政之孰先，文武弛张之何在，因时制宜，合乎中道，则政令其有不修举者乎？

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人生八岁，则自天子之胄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有五岁入大学，则教之以格物致知之功，穷理正心之道。此学校之所以兴，而风俗之所以正也。今欲臻其效，必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崇礼让之文，行激劝之法，使民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则学校其有不兴乎？

古者制民之产，百亩之田，一夫耕之，足以无饥；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足以无寒。至汉唐犹有均田限田、口分世业之制，是以民无甚富、甚贫之患。此农桑之所以有成，而民之所以得其养也。今田不可复井矣，口分世业亦不必行矣，莫若行限田之制以止兼并，重末作之令以禁游惰，优畎亩之民以劝务本，则民皆得自食其力，而不至甚富甚贫，不均田之均田矣，其制岂不可定乎？

古者设官分职，不惟其官惟其人，官有一定之法，而任人之意为多，所以为经国之远谋也。后世任法而不任人，所谓凝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简书，简书愈明而官方愈乱矣。今欲人法并任，莫若择贤明之正官，省闲慢之簿书。夫官得其人，则法无不举；非其人，则法废矣。此必然之理也。簿书烦，则吏得以售其奸；簿书省，则官得以展其用。是则人法兼任，岂不可以为经国之远谋乎？

古者量能任官，度德定位，爵无不称其德，才无不称其位，故小才虽累月不害为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相，所以为铨曹之要法也。

后世循资之格，不问贤愚，不辨才否，一以岁月为断，则贤者淹于下位，而下才者得以幸进矣。今朝廷清明，一扫前弊，往往不次铨擢，可谓得铨曹之要法矣。若夫选举之际，先德行而后文艺，明黜陟而让廖举，则何患取士之不得其人乎？

至若盐铁之制，虽起于汉，然国之大利，不可废也。今铸山煮海，官自发卖，固无奸弊之可言，然欲久而无弊，必定其额以为经久之常规，平其直以通商贾之懋迁，则奸弊何由而生乎？漕运之法，虽盛于唐，然国之大计，不可不讲也。今夏秋两税，民自输纳，可谓利于国而便于民矣，然奇零小户，远运为难，莫若立为定制，俾粮多者运赴京城，而粮少者就各府输纳，则上下便矣，国岂有不足而民其有不裕者乎？

钦惟圣天子以二帝三王之心为心，以二帝三王之道为道，立经陈纪，为天下后世虑至悉，至是命大臣策是数者为问，愚敢不悉心以对？第愚于往古之事不能周知，当今之务不能尽达，谨略陈其梗概，以复明问之万一而已。执事于篇终又策之曰：使言之必可见于行，而行之可为天下后世法。是盖深体圣上之意而为是言也。然愚之所陈者，非特可见于行，而亦当今之所已行者也。其间行之未竟，守之未一，则在圣君贤相举而行之尔。

虽然，为治必有其要。为治不知其要，不可以为治。所谓要者，执事之所谓实效是也。实者何？信而已矣。孔子曰：主忠信。又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曰诚也。皆甚言为治之不可不实也。然则欲行先王之道，立纲陈纪，以为天下后世法，其不在于实乎！抑愚又有说焉。立纲陈纪，故不外是数者，而正人心，厚风俗，尤为平日所当先务者也。夫人心不正，风俗不厚，终不可以言治。人心诚正，风俗诚厚，则廉让之节兴，礼逊之俗行，人人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而天下自平矣。将见二帝三王之治复在于今日，而汉唐有不足言矣。愚也何幸！身亲见之。

我曾认为，既有实现治理的大道，又有进行治理的制度。大道经历千秋万代也没有弊病，制度则与大道而两方面互相适应。大道固

然就不脱离于制度之内，制度也未尝不限定在大道之中。只有我们伟大的大明皇朝，创业相当艰辛，用心盛大，谋求大治，只是求取实际的效果，不崇尚虚浮的满纸议论。你们主考官在春季举行的会试中颁发下策问，往下询问我们这些学习和继承老师学问的人，讲论研求确立治国的总原则、张布朝廷纲纪的事体，这属于非常盛大的举措啊！既然专用实际效果来求取，哪里敢用虚浮的满纸议论去应对呢？恭谨地考察古代的情况，并揣测当今的事务，特作对答。

我私下想来，你们主考官的策问，属于纲领性的问题有一条，属于细目性的问题有八条。什么问题可以称得上是纲领呢？这就是所说的大道啊！什么问题可以称得上是细目呢？这就是所说的乐舞礼仪、政事法令、学校、农耕蚕桑、设置官职、选取士子、盐铁官营、水路运粮啊！纲举目张，大道完整又仁德齐全，而治理天下的方式与方法，没有超出以上的范围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大道的本原来自皇天，而圣人修明它，在天下形成制度。像礼仪、乐舞、刑法、政令，朝廷的纲纪法度，没有任何一处不是大道所寄寓的地方。这正是人们所说的：集中起来还不满方寸，可散发开去却充满天地四方，属于天地永不改变的总原则，古今通行的大道理。唐尧拿它传授给虞舜，虞舜拿它传授给夏禹，夏禹拿它传授给商汤，商汤拿它传授给周文王及周武王。帝王跟随在天命的后面，亮出治理的措施，用来为天地定立起心愿，为生存的民众撑立起性命，为千秋万代开辟出太平景象，又有哪一点不是经由这大道呢？因而我曾经做过考察：水、火、金、木、土和谷物这聚积起财物的六府，以及端正自身德行、物尽其利，使民众生活富裕这三事，记载在《尚书》的《虞书·大禹谟》中。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这六种治国的大典，以及官属、官职、官联、官常、官治、官成、官法、官刑、官计这八种管理百官的大法，详备载列在《周礼·天官·太宰》中。这正是唐尧虞舜和西周用来确立治国总原则、张布朝廷纲纪的东西啊！然而拥有君臣彼呼此应的气象，而后才会有那致力和协、君臣接连歌咏的重大功绩。具备《诗经》中《关雎》和《麟之趾》两首诗所表达的深意，而后才可行用《周礼》制定的法度。这难道不正是唐尧虞舜、周文王和周武王奉行的大道吗？古代这六位帝王的大道，完

全一样。了解了唐尧虞舜的大道,也就了解商汤和周武王的大道了。

汉高祖夺取天下,当时就有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这批人,分别定立起汉朝的法律,定立起汉朝的军法,定立起汉朝的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定立起汉朝的礼仪规范,而汉朝用来施行治理的东西,就没有不具备的了。唐太宗夺取天下,就有魏徵制定出新的礼法,祖孝孙奏上《大唐雅乐》,房玄龄修订成完备的法律,李靖宣明独特的兵法,而唐朝用来施行治理的东西,就没有遗漏掉的了。汉唐的这些举措,尽管不一定就符合古代圣帝明王的大道,但也未尝不依据古代圣帝明王的大道啊!从前的儒士认为汉朝属于大纲端正了,唐朝属于各个细目张开了,这大致上是因为汉朝的总体谋划宏大又长远,而唐朝的法令却详尽周密罢了。然而汉朝承接在秦朝的后面,仍然杂采秦朝的规则;唐朝承接在隋朝的后面,仍然大多沿用隋朝的制度。这样一来,它们奉行的大道又怎么能够像古代圣帝明王那样地纯正呢?它们制定的法度又怎么能够像古代圣帝明王那样地完备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当今圣上奉受天命,承接时运,统一整个天下,朝廷纲纪法度的设立,礼仪乐舞和刑法政令的列具,本来就已经并驾齐驱很有条理了;先后排列,很在顺序了。但仍每日里和三两位辅政大臣励精图治,讲论研求政务处置,又下诏兴行科举,广泛采纳众人的言论。这连二帝三王的盛况也没有什么能够再超过我朝的了,又哪里是汉朝、唐朝可以比拟的呢?

天下的事体,有古有今。确立治国的总原则,张布朝廷纲纪,不在于到其他地方去搜求,只在于参考古今、加以酌定而已。古代大功告成了,才创制乐舞;治理稳定巩固了,才制定礼仪。三千三百条大小礼仪,宫商等五声和金石丝竹等八种乐器的旋律,完全都是以人心为依据并且是符合人的语音规律的,因此可以用在神灵与世人的沟通上,可以打通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联系,确实属于亮出治国措施的根基所在呀!到后世,有关礼仪方面的经书已经残缺不全了,有关乐舞方面的经书更失传了,于是古代的礼仪和乐舞就难以完全考察清楚了。如今打算制定礼仪,创制乐舞,就必定要稽核《仪礼》、《周礼》和《礼记》的载述,考察《诗经》中《大雅》和《小雅》这两类诗的音韵,加以

参取酌定，付诸实行；予以凭借摹仿，具体施用，使它们既符合于古代，又适合于当今；既在当今能施用，又和古代不违背。同时把虔敬作为主导性的东西，把音律作为和协有致的因素，严格地显示出上下尊卑的等级区分，精审地对待黄钟基调和声音与节气相对应的原理。这样一来，礼仪尽管不是包纳了古代圣帝明王的原有规定，但是可以依据道义来重新兴起，而当今的乐舞，又哪里比不上古代的乐舞呢？

古代政务简要而不烦琐，命令严肃而不威猛，用来遏制老百姓的欲望，使民心整齐划一，这确实是亮出治国措施的具体方面啊！近来就在元朝的末期，法度荒废松弛，朝廷纲纪不振作，固然要用严厉来弥补它的害处了。如今打算定立起常久不变的法度，就应当考虑《尚书·洪范》所讲的八项政事，哪一项该放在前面；还要考虑周文王与周武王时而宽缓、时而严厉的策略，究竟该怎样巧妙地运用，根据时势制定出合适的措施，符合不偏不倚的原则。这样一来，政令哪里还会有得不到修明推行的呢？

在古代，由二十五家组成的最低一级的基层单位里，设有名为“塾”的学堂；由五百家组成的称作“党”的地方行政单位里，设有名为“庠”的学校；由一万二千五百家组成的称作“遂”的地方行政单位里，设有名为“序”的学校；在诸侯国都和天子京师设有国立最高学府。人长到八岁时，从天子的长子一直到公卿大夫和元士这些大小官员的嫡长子，以及普通老百姓中的优秀子弟，全都进入初级学校学习，教给他们洒扫门庭、应对尊长的规范性的行为，以及礼仪、乐舞、射箭技术、驾车技巧、语文和算术的基本知识。到了十五岁，升入国立最高学府，教给他们究明事物道理和充实自身知识该下的功夫，特别是穷尽天理和端正心性的原则与方法。这正是学校兴起、社会风气纯正的原因啊！如今打算取得这样的效果，就一定要看重教官的选用，严格地让太守县令真正负起责任来，推崇彬彬有礼、互相谦让的行为规范，实行激扬勉励的各种措施，让老百姓懂得孝顺友爱、忠诚信实和礼义廉耻。这样一来，学校难道还有振兴不起来的吗？

古代规定好百姓的家产，一百亩的土地由一户人家的户主从事耕作，足以使每户人家都不挨饿。五亩大小的宅院，种上桑树，足以使

每户人家都不受冻。到了汉朝和唐朝，仍然定有合理分配土地、限制占田数额以及口分田、世业田的制度，因此老百姓就不存在这户人家特别富、那户人家非常穷的忧患。这正是农耕蚕桑取得成效、民众得到养育的原因啊！如今土地是不能够再推行古代的井田制了，口分田和世业田也没必要再去施行了，最好的办法是实行限制占田数额的制度，用来遏制住土地兼并的现象；强化从事工商业活动的法令，用来禁阻住游逛懒惰的现象；优待从事农业生产的良民，用来激励人们致力于本业。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全都得以自食其力，而不至于发展到这户人家特别富、那户人家非常穷了。这正属于并非合理分配土地，但却真正合理分配土地了。这种制度难道还不可以确定下来吗？

古代设立官位，划分职务，不单单是官职齐备，更依靠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每种官职定有具体的法度，而对如何听凭人才发挥作用的考虑占据着更大的比重。到了后世，却只听凭法度而不听凭人才如何发挥作用。这正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对自己内心的决定产生疑虑，就去听信身边人的话语；对身边人的话语又产生疑虑，就干脆去听信报呈上来的公文。而报呈上来的公文禀报得越是详明，可身为官员应当遵循的施政方法却更加紊乱了。如今打算人才和法度同时听凭，那就最好是择用贤明的长官，减省无关痛痒的簿册文书。官职确实获取到了合适的人选，法度就没有贯彻不了的；如果获取不到合适的人选，法度也就废弛了。这是必然的道理呀！簿册文书多得很，官吏就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奸谋；簿册文书减省了，官吏就有时间和精力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就做到了人才与法度同时听凭，难道不可以成为治理国家的长远谋略吗？

古代衡量一个人的才能，再任命他担任何种官职；考虑一个人的德行，再授给他何种爵位。爵位的封授，没有和他的德行不相称的；才能的使用，没有和他的官位不相称的。所以才能低的人，尽管成年累月地干，也不妨还是让他当小官。才能高的人，尽管从政的时间并不长，也不妨让他担任辅臣宰相，这正是官员考查机关所循用的切要准则啊！到了后世，依照论资排辈的规定，根本就不考察谁贤良、谁愚昧，也不辨别谁能干、谁无能，完全按照担任官职的时间长短作出提

升与否的决定。这样一来，贤能的人就被困在低级职位上，而低劣无能的人却有机会侥幸升官了。如今朝廷清明，把以前的弊端彻底扫除掉，常常进行破格任用和破格提拔，真可以称得上是抓住了官员考查机关所循用的切要准则了。至于在选用推举的时候，把德行放在首要地位，把会写文章放在次要地位。昭明升降的标准，处罚胡乱荐举的人，那还用担心选取士子获取不到合适的人选吗？

至于盐铁由官方经营的制度，尽管在汉朝开始创立，然而这的确属于国家的一项大收入，不能够废弃呀！如今在山里采矿炼铁，在海滩煮晒食盐，由官方自行发运出售，原本上就没有化公为私之类的弊端可以指出来。然而要想长时间内也不存在弊端，就必须要确定下各地的生产数额，作为长期遵守的法规；稳定住价格，致使商人的贸易活动畅通起来。这样一来，化公为私之类的弊端还会从哪里冒出来呢？水路运粮的制度，尽管在唐朝特兴盛，然而这的确也是国家的大计，不能够不讲求啊！如今分夏秋两季征收的赋税，由老百姓自己前来交纳，这真可以称得上既对国家有利，又让百姓们感到便利了。然而零散地居住在偏僻地区的小户人家，对到很远的地方去交纳税粮税绢，感到很困难。这就最好定立起固定不变的制度，让交纳税粮数量多的人家，运送到京城；让交纳税粮数量少的人家，到所在的府城去交纳。这样一来，国家哪里还会出现不够用的情况呢？老百姓又哪里还有不富裕的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我朝圣明的天子把古代二帝三王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把古代二帝三王奉行的大道作为自己奉行的大道，确立起治国的总原则，张布开朝廷的纲纪，为整个天下和后代做考虑，已经是极其详密了。到了今天，又命令大臣用这几个问题进行策问，我哪敢不用尽心思来做对答呢？只是我对古代的事体做不到样样都清楚，对当今的事务也做不到件件都通晓，只好恭谨地大略陈述一下那梗概，用来答复详明策问的万分之一罢了。你们主考官在篇末又策问说：要使自己的答案务必能在当今行得通，而且一行用，又可以让整个天下以及后代照着去做。这恐怕是深深领会了我朝圣上的意旨，才讲出了这样的话语呀！然而我所陈述的东西，不单单能够被行用，而

且也是当今已经行用的了。其中行用还没达到极限的地方，守持还没达到专一的地方，那就全在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相全面彻底地实行它们罢了。

尽管是这样，施行治理必定要有那关键所在。施行治理却不知道那关键所在，就不能够施行治理。所谓关键所在，也就是你们主考官所强调的实际效果呀！“实”是指什么说的呢？不过是说信实罢了。孔子讲过：要以忠诚信实为主。还讲过：自古以来谁都会最终死去，而老百姓对国家失去了信任，这个国家也就站立不起来了。《中庸》里说：治理天下国家的根本办法一共有九种，用来实行它的，只是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说诚实啊！这些话都是在突出地强调施行治理不能不诚实啊！既然如此，那么，打算奉行古代圣帝明王的大道，确立起治国的总原则，张布开朝廷纲纪，让整个天下以及后代照着去做，难道还不正在于那个诚实吗？不过我还有一点主张要谈上一谈。确立起治国的总原则，张布开朝廷纲纪，固然不会超出以上所讲的几个问题的范围以外去，但端正人心，使社会风气淳厚，更是平常所该放在首位来加以解决的事情。人心不端正，社会风气不淳厚，到头来还是没资格宣称我已经实现大治了。人心确实端正了，社会风气确实淳厚了，廉洁谦让的行为规范也就兴行了，讲究礼节和谦逊的风气也就形成了。人人各自亲近各自的亲人，各自把各自的尊长当成尊长，强壮的人不欺负弱小的人，数量多的人不凌辱数量少的人，天下也就自行太平了。这就眼看着古代二帝三王的大治景象重新在今日出现了，而汉朝和唐朝就更不值一提了。我是多么地幸运啊！亲身会看到这种大治的景象哩！

殿试对策

臣谨对：臣闻古先帝王之治之下，莫不以敬天勤民为务，以明伦厚俗为急，故汲汲于求贤者，凡以为此也。钦惟陛下，进臣等于廷，策臣以古先帝王之务。臣愚昧，何所通晓？然叨奉大对，敢不竭心尽知，上答圣问之万一乎！谨俯伏以对。

臣伏读制策曰：盖闻古先帝王之观人，莫不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汉之贤良，宋之制举，得人为盛。朕自临御以来，屡诏有司，搜罗贤俊，然而杰特犹若罕见，故又详延子大夫于廷而亲策之，以庶几于古先帝王之盛节焉。而臣有以见陛下求贤之切也。臣闻言者，心之声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即其言之得失，而心之邪正可见。然言之匪难，而行之惟难，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矣。是以古先帝王之观人，必敷奏以言而观其蕴，明试以功而考其成，然后有以得夫贤才之实焉。三代而后，若汉若宋，其取人之法，有贤良、制举，是有得于奏言试功之遗意。故在汉之时，若董仲舒《人天三策》，蔚为醇儒；而宋之诸儒，仿佛三代，尤为得人之盛，良以此也。钦惟陛下，以神武定区宇，以文德绥太平，屡降德音，广求贤俊，而又设科目为取士之方，详延草茅之士，亲策于廷。陛下求贤之心，可谓切矣。将见必有杰特之士出，而为邦家之用，而臣则不足以及此也。

伏读制策曰：历代之亲策，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敬天勤民者，其孰为可法欤？所谓敬天者，果惟于圜丘郊祀之际，致其精一者为敬天欤？抑它有其道欤？所谓勤民者，宜必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为耶？岂勤于庶事之任耶？臣有以见陛下深知为君之道，而后有此言也。臣闻帝者莫盛于尧舜，王者莫盛于禹汤、文武。稽之于经，若尧之钦明文思，舜之温恭允塞，兢兢业业而戒饬于时几，同寅协恭而懋勉于政事，此唐尧虞舜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尧舜，则陛下即尧舜矣。敬德以先天下，祇肃以顾天，是天之明命，克勤克俭而尽力乎沟洫，昧爽丕显而子惠乎困穷，此夏禹、商汤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禹汤，则陛下即禹汤矣。小心翼翼而视民如伤，敬事上帝而作民父母，此文、武之敬天勤民者也。陛下能法文、武，则陛下即文、武矣。夫古先帝王之可为法者，孰有过于尧舜、禹汤、文武者乎！

臣闻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而牧之，君所以代天理民者也。古之帝王审知乎此，故位曰天位，职曰天职，禄曰天禄，民曰天民，无一事不本于天，亦无一事不存乎敬。惇典庸礼，君之所以为教也，而必推之天叙天秩焉。是敬天之心，见于施教者然也。命德讨罪，君之所以为政

也,而必归之于天命天讨焉,是敬天之心,形于施政者然也。一动一静,常若有天在前;一语一默,常若有天在中。以至天工之不敢废,天职之不敢旷,何往而非敬天之事哉!若夫圜丘郊祀之际,以致其精一,是特敬天之一事,固不专在于是也。制策谓抑它有其道,可谓深达敬天之道矣。非陛下敬天之至,何以及此!

臣闻民本有饥食渴饮之欲,不能以自治,必赖君有以养之;有秉彝好德之性,不能以自遂,必赖君有以教之。君人者,兼君、师之任者也。是以古之帝王审知乎此,既为之制其田里,教之树畜,使民有以安其生,而设为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民有以遂其性。如文王之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者,凡以此而已。故曰即康功田功。康功者,安民之功;而田功者,养民之功也。又曰怀保小民,曰惠鲜鳏寡,盖欲使天下之民无一不得其安,无一不得其养而后已也。圣人之道一也,观文王不遑暇食如此,则尧舜、禹汤、周武之心,从可知矣。

臣闻人主能以一心总天下之万机,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众职。古先帝王之勤民者,非事事而亲之,要在责成臣下而已。故曰劳于求才,逸于任贤,此之谓也。钦惟陛下,奉天承运,抚临亿兆。严恭寅畏,无顷刻不在于天;宵衣旰食,无顷刻不在于民。孜孜勉勉、励精图治之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而制策以古先帝王之孰为可法为问,臣有以知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臣愿陛下常存此心而不已焉,则唐虞三代之盛,岂能及哉?

臣伏读制策曰:自昔而观,宜莫急于明伦厚俗。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耶?三代而下,惟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差少疵议。果何道致然欤?盖必有可言者矣。宜著于篇,毋泛毋略。臣闻自昔帝王之为治,莫急于明人伦,厚风俗,而人伦之所明,风俗之所厚者,皆由于崇学校,以兴教化而已。盖教化行而人心正,则伦理明而风俗厚,此必然之理也。唐虞三代,无以议为矣。若东汉之士俗,赵宋之伦理,卓然于三代之后,岂无其道而致然哉?臣闻汉光武初定天下,首则访求山林遗逸之士。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宗戚子弟无不受学。是以养成一代人心风俗,皆知崇尚节义,耻于奔竞。此汉之士俗所以为美者,以有其教化也。臣闻宋太祖即位之后,偃息兵革,崇尚文治,虽疆宇之广

不及汉唐，而教化之美几于三代。当时人君无不学，而所用无非儒，是以天下翕然以道学为事。又有濂洛诸儒出，而接夫道统之传，以为学者之宗。斯宋之伦理所以为美者，亦以其有教化也。

方今上自皇都，下逮府州若县，亦既莫不有学，而陛下又躬行于上，日召儒臣讲求治道，固已论之精而行之当矣。制策以伦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为问，臣以谓明伦厚俗，惟在于崇学校，以兴教化也。臣愿陛下益重教官之选，严守令之责，使居学校者果能如胡安定之教于苏湖，居府县者果能为文翁之化于蜀郡，则人伦不患其不明，士俗不患其不厚，而唐虞三代之治，无以异矣，又岂汉宋之可拟伦也哉！臣愚，不足以奉大对，谨竭其一得之愚，惟陛下裁择。臣谨对。

臣下我恭谨地对答：臣下我听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都是把敬奉皇天、替民众操劳作为根本，把宣明伦理道德、使社会风尚淳厚作为头等大事，所以十分渴望求取到贤才，都是出于这种目的啊！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古代帝王施政的要务来策问臣下我，可臣下我愚昧无知，懂得个什么呢？但既然有幸对答殿廷策问，哪里敢不竭尽心思和所了解的东西，向圣上的策问做出万分之一的对答来呢？下面就恭谨地跪拜对答。

臣下我跪拜敬读制策中说：闻听古代帝王考察人才，都是通过用言辞汇报和逐项验核实际政绩来进行。汉代荐举贤良，宋朝由皇帝主持专门考试，录用的合适人选特别多。皇帝我自从统领天下以来，多次下诏给主管部门，叫他们去搜罗贤才英杰。然而英杰奇士依然很少看到，所以又把你们这些士大夫全部延揽到殿廷来，亲自进行策问，以便同古代帝王的隆盛做法相接近。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求取贤才的迫切愿望啊！臣下我听说，言为心声，人心藏在腹内，很难测度衡量，但只要根据他言论的优劣，就能看出他内心的好坏。然而讲论起来并不难，实际施行起来却很难做到，因此固然就存在着讲得头头是道而自己做起来却有很大差距的人了。所以古代帝王考察人才，一定要通用言词做全面汇报来观察他的内心积累，通过实际政绩的逐项验定来考核他的功劳大小。这样做以后，就确有依据地获取

到真正的贤才了。到夏商周三代以后，如汉朝，如宋朝，选取人才的办法有贤良的荐举，有皇帝亲自主持的专门考试，这仍带有古代奏上言词、验核功绩的那么一点儿选才的意思。所以在汉代，像董仲舒对答的《人天三策》，显示出他真是一位纯正的大儒。而宋朝的众多儒士，同夏商周三代的情况相近似，更属于获取到了众多的贤才。这实在是出自上述的原因啊！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凭借神明勇武平定了整个天下，依靠道德教化营造了太平局面，多次颁发诏令，广泛求取贤才英杰，而又再度设置科举，作为选取士子的办法，尽行延揽民间的读书人，在殿廷亲自进行策问。陛下求取贤才的心愿，可以称得上是急切了。这就眼看着会有英杰奇士涌现出来，为国家效力，但臣下我却不足以置身在这个行列当中啊！

跪拜敬读制策中说：历代帝王亲自进行策问，往往把敬奉皇天、替民众操劳作为主要问题。那么，古代帝王敬奉皇天、替民众操劳究竟在哪些方面到今天还可以效法呢？所谓敬奉皇天，果真就是在举行祭天大礼的时候，特向皇天表达自己怎样精粹纯一，也就够得上敬奉皇天了吗？或者还有其他方面呢？所谓替民众操劳，理应每天从早晨到傍晚忙于政务，连吃饭也顾不上的了。但这样顾不上吃饭，究竟应该忙些什么呢？难道就是把一般政务都揽在自家身上吗？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深深懂得做君主的法则，然后才会说出这番话来呀！臣下我听说古代称得上是“帝”的，谁也超不过唐尧和虞舜去；称得上是“王”的，谁也超不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去。从经书上可以考察出：像唐尧的执政严肃，照临四方，经纬天地，思虑灵敏；虞舜的温和恭敬，充满天地之间，兢兢业业，告诫时时事事要小心谨慎，上下互相尊重，同心同德而努力处理好政事。这就是唐尧虞舜敬奉上天、替民众操劳的做法啊！陛下能按照唐尧虞舜的做法去做，陛下也就成为唐尧虞舜了。恭敬而有仁德，给天下做出表率，庄重严肃，时刻想到皇天的明确意旨，克勤克俭，竭尽全力治理洪水，黎明便起身而使声名显赫，像对待儿子那样给贫困百姓带来恩惠。这就是夏禹和商汤敬奉皇天、替民众操劳的做法啊！陛下能按照夏禹商汤的做法去做，陛下也就成为夏禹商汤了。小心翼翼，把民众看成受伤一样，敬

奉天帝而把自己当成民众的父母。这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敬奉皇天、替民众操劳的做法啊！陛下能按照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做法去做，陛下也就成为周文王和周武王了。古代帝王中那些可以效法的人，有谁能超过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呢？

臣下我听说，上天生下众百姓而为他们设立起君主，让君主统治他们，君主是代替上天来统治众百姓的人物。古代的帝王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帝位就称作“天位”，职责就称作“天职”，爵禄就称作“天禄”，民众就称作“天民”。没有一宗事不依凭皇天，也没有一宗事不体现在诚敬里面。要让伦理纲常淳厚，行用尊卑分明的礼法，这属于君主用来进行教化的东西。但一定要溯源到皇天所定的次序、皇天所定的品级上。这是敬奉皇天的心念在施布教化方面显现出来才形成的这种情况。表彰贤德的人，惩罚有罪的人，这属于君主用来进行治理的事项，但一定要溯源到皇天的命令、皇天的责罚上。这是敬奉皇天的心念在施行治理方面显现出来才形成的这种情况。一动一静，总是像有皇天就在眼前；一言一行，总是像有皇天就在心中。以至于皇天命令的事情决不敢荒废，皇天规定的职责决不敢落空，有什么地方不属于敬奉皇天的大事呢？至于在举行祭天大礼的时候，特地表达自己是怎样精粹纯一的，这仅仅是敬奉皇天的一个方面，决不是敬奉皇天的唯一内容。制策中说敬奉皇天或者还有其他方面，这真称得上是深深懂得敬奉皇天的做法了。如果不是陛下敬奉皇天达到了极点，哪里会步入这种境界呢？

臣下我听说，民众原本就有饿要吃饭、渴要喝水的本能欲望，但他们做不到自己养育自己，一定要依赖君主有办法养育他们。民众还有接受伦理纲常、喜好仁德的本性，但他们做不到自行就发挥出来，一定要仰仗君主有办法教化他们。统领民众的人，正是既要负起君主的责任、又要负起师长责任的人。因此古代帝王深深明白这个道理，既给百姓规划好田地住宅，并引导他们在住宅周围种植桑树，饲养家畜，使他们有办法安居乐业。又设立学校，进行教育，向他们讲清楚孝敬友爱的道理，使他们有办法充分发挥出自己的善良本性。像周文王从早晨到傍晚忙于政务，顾不上吃饭，都是出于这个目的罢了。所以

《尚书》上说:完成房屋建造,搞好农业生产。完成房屋建造也就是安定民众的功效,搞好农业生产也就是养育民众的功效。《尚书》上还说:要关心爱护百姓,对无依无靠的人施布恩惠。这全是想让整个天下的民众没有一个人不获身安,没有一个人不获养育,然后才算作罢啊!圣人的治理原则是一样的,考察周文王竟然忙到顾不上吃饭的地步,也就从中可以看出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武王的心念了。

臣下我听说,帝王能够凭借那一颗心总揽起天下的纷繁事务,但却无法依仗一个人同时承担起天下的所有职责。古代帝王替民众操劳,并非事事都由自己亲身来处置,关键是交付给臣下去办好。所以古人说:帝王在求取贤才上费力气,而在任用贤才后就安逸了。也正讲的是这种意思啊!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奉受天命,承接时运,安抚驾驭亿万百姓。严肃恭敬,战战兢兢,无时无刻不把心念投注在皇天上;早早起身,很晚吃饭,无时无刻不把心念投注在民众上。这种孜孜不倦、勤勤勉勉、励精图治的心念;也就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心念啊!而制策中特用古代帝王究竟在哪些方面可以效法进行询问,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了解到了陛下那种不自我满足的心意啊!臣下我祝愿陛下永远保持这种心意而不作罢,那么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又哪能比得上我们大明皇朝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制策中说:从历代来看,最要紧的是宣明伦理道德,使社会风尚淳厚。那么,伦理道德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够宣明,社会风尚又采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淳厚呢?夏商周三代以后,只有东汉的读书人的风气,赵宋时期的伦理道德,很少有能让人加以非议的地方。这究竟是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才达到这种程度的呢?其中一定有能讲论一番的东西,应当写在答卷上,不要泛泛而谈,也不要过于简略。臣下我听说,自古以来帝王施行治理,没有比宣明伦理道德、使社会风尚淳厚更占首位的了。而伦理道德得到宣明,社会风尚达到淳厚,原因就在于重视创办学校,兴起教化而已。教化推行开,人心就纯正;人心纯正了,伦理道德就得到宣明,社会风尚就变得淳厚了。这是必然的道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代,美好得自然没有什么可以再讨论的了。但像东汉读书人的风气,赵宋时期的伦理道德,在三代以后十

分突出，哪里会没有它们的一套办法才达到了那种状态的呢？臣下我听说，东汉光武帝刚刚平定天下，首先就去搜访在山林隐居的读书人。到了明帝，更尊重儒家师长，亲自驾临国家最高学府，敬拜德高望重的老人，而皇室和外戚的子弟没有不接受教育的。由此养成了整个东汉时代的人心与社会风尚，全都懂得崇尚气节和道义，对钻营捞官的行径感到羞耻。这正是东汉读书人风气美好的原由所在，恰恰出自它有它的一套教化方法啊！臣下我还听说，宋太祖登上帝位以后，停止动用武力，推崇文治，尽管疆域不如汉唐那样广阔，但教化的美好程度却和夏商周三代差不多。那时的君主，没有谁不致力于学习，而所任用的官员，也没有谁不是儒士，因而全天下不约而同地把道学作为下大气力研求的事情。又有周敦颐，程颢、程颐等名儒涌现出来，承接起儒家道学统系的传续，成为求学者的宗主。这正是宋朝伦理道德非常美好的原由所在，也恰恰出自它有它的一套教化方法啊！

如今上自京师，下至府州和各县，也已经全都设有学校了，而陛下又在上面做出表率，每天召请儒臣讲论研求治国之道。这原本上就已经讲论得十分精辟又推行得非常恰当了，可制策中仍然询问伦理道德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够宣明，社会风尚又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淳厚。臣下我认为，要使伦理道德得到宣明，社会风尚达到淳厚，只在于重视办好学校，兴起教化啊！臣下我希望陛下进一步加强教学人员的选用，严格地责成太守县令切实负起责任来。假如在校的教学人员真能像北宋的胡瑗在湖州州学那样办学执教，太守县令真能像西汉的文翁在蜀郡那样兴行教化，那么，伦理道德也就不用担心得不到宣明，读书人的风气也不用担心达不到淳厚了。而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同我大明皇朝相比，也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又哪里是汉朝及宋朝可以比拟的呢？臣下我很愚昧，不足以承奉殿廷的对答，只是恭谨地竭尽那仅有一得的浅见，只请陛下裁断择取。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太祖洪武十八年(1385)乙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

殿试策问

[洪武十八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趋事以历知，涉难以立志，日运不息，岁运不已，虽在寝食，未尝忘其所以。由是大辅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为此也。朕自代元，统一华夷，官遵古制，律仿旧章，孜孜求贤，数用弗当。其有能者委以腹心，多面从而志异。纯德君子授以禄位，但能敷古，于事束手。中才下士廉耻无知，身命弗顾，造罪渊深，永不克己，彰君之恶。若非真贤至圣，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无已，奈何为治?尔诸文士，虽在进学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条陈可否，则知利钝。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始举，必如朕意。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天下政治清明，礼法乐舞和军事行动都由天子作出决定。

看到那个国家的礼法，就可以了解到它的政治；听到那个国家的音乐，就可以了解到它的仁德。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考察古代名高一世的人,只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畏惧大人和神灵,主动操办事务来积累经验,碰到艰难来坚定自己的志向,天天运作不停止,年年运作不罢休,即便在睡觉吃饭时,也从未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由此非常得力地辅佐君主,给老百姓带来福分。之所以名高一世,就是出自这个缘故。皇帝我自从推翻元朝,统一华夏,官位沿袭古代制度,法规仿照旧的章程,孜孜求取贤才,好多次用人都不恰当。那些具有能力的人虽被引为心腹,委以重任,但大多表面服从而心怀异志。那些道德君子虽被授以官职,却只能空讲古代如何,不能处理具体的政事。至于一般人和更下等的人,不知廉耻,不顾身家性命,犯下的罪过特别深,永远都不能克制自己,由此反而张扬君主的过错。如果不是真正贤能、特别圣明的人,也没有谁不被他们所迷惑。长此以往,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虽然正处在学问长进的时候,还不广泛了解各项政典,但只要写明如何办,就能看出优劣来。既然承奉皇帝我的命令来考试,就要竭尽你们的心力,把志向定在成为一代名臣上,在答卷这时候就开始做起,一定要符合皇帝我的心意。

练子宁　殿试对策

练子宁(?~1402)　名安,以字行。新淦(今江西新干县)人。洪武十八年(1385)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工部侍郎、吏部左侍郎、御史大夫。性英迈,有风节。对建文帝多所建白。明成祖即位,被磔死。有《金川玉屑集》传世。

臣对:伏见陛下发德音,下明诏,以得人之难,下询草茅之陋,其谋之不可谓不广,其求之不可谓不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能有以听之欤?抑将少布衣疏贱之臣不足以与天下之大计,姑有以试之

欤?虽然，君以名求，臣以实应之。陛下举是名以问也，臣敢不举实以为对也。若夫好言以招祸，触讳以亡身，则非臣之所敢恤也。

伏读圣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趋事以历知，涉难以立志，日运不息，岁运不已，虽在寝食，未尝忘其所以。由是大辅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为此也。嗟夫！“敬事而畏人神”一语，此乃唐虞三代圣人命官之一本也。陛下能以是求诸古昔命世之臣，则必以是而择夫今日命世之臣矣。彼区区管、商之谋，申、韩之习，乌足为陛下道哉！陛下既有意于唐虞三代之臣，臣不敢复引汉唐之臣以为对，请以唐虞三代之臣终焉。

昔者舜之命九官十二牧也，曰：钦哉，惟时亮天功。武王之称有夏之臣曰：惟御事厥棐有恭。伊尹之戒太甲曰：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周公之戒成王曰：小人怨女詈女，惟皇自敬德。夫能以是而告夫君，则能以是而任诸己，可见矣。曰钦、曰恭、曰克诚、曰敬德，又岂有出于陛下敬畏之外者哉！趋事以历知，涉难以立志，日运不息，岁运不已，虽在寝食未尝忘者，亦孰非敬畏之发见也！是故语其大辅人君，则上而唐虞乃有放勋重华之极治；语其福臻黎庶，则下而三代乃有刑措不用之丕绩。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率是道也。

伏读圣策曰：朕自代元，统一华夷，官遵古制，律仿旧章，孜孜求贤，数用弗当。臣以为陛下以天锡之资，居表正之位，即位以来，十有八载。孜孜求贤为生民计，日夜念此至熟也。至于数用弗当，虽臣亦疑之，然而未敢遽为陛下道也。夫人君之道，在于知人；人臣之职，在于任事。君有知人之明，则臣有任事之实矣。昔者皋陶陈谟曰：在知人。文王之任宅俊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大抵人各有心，不可测度，知人之难，从古病之。然古之圣人，未尝畏其难而不以是为先务也。故唐虞之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后明试以功；必明试以功，而后车服以庸，未尝轻易而授之也。文王之于三宅也，既得其人，以居常伯、常任、准人之任矣。又储其才，以备常伯、常任、准人之选焉，未尝造次而任之也。今陛下孜孜求贤而数用弗当者，无他焉，亦察之不详，而用之太骤之

过也。

伏睹陛下自顷岁以来，诛戮奸回，作新政治，于是纷然擢用天下之士，以共成厥功。或以聪明正直为名，或以孝弟力田为选，或以贤良方正为科。陛下责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专也。然而报国之效，茫如抟风，岂是数者之果不足以为治哉?亦徇其名而不求其实之故也。是故古之用人者，日夜思之，必其人之足以当是任也，然后以是任畀之而不疑。今也不然，以小善而遽进之，以小过而遽戮之。陛下求贤之急虽孜孜，而贤才不足以副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为难，成之为尤难。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难矣，又岂忍以区区之小故，而即付于刀锯斧钺之地哉?昔汉武帝以英武之资，而所用之人或朝奏暮召，小不如意，则诛戮随之耳。故汲黯有言曰：以有限之才，纵无穷之诛。武帝曰：不然。天下之才无穷，特患人君不能用之。臣以为武帝非不能用之，患在不能知耳。苟诚知之也，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量其才而任之以官，因其能而任之以职。果奸邪也，则诛之戮之；果庸劣也，则黜之退之。又何忍于杀戮而后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使武帝之计为是，是尧舜三代之道为不足法矣。

伏读圣策曰：其有能者委以腹心，多面从而志异。纯德君子授以禄位，但能敷古，于事束手。中才下士廉耻无知，身命弗顾，造罪渊深，永不克已，彰君之恶。若非真贤至圣，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无已，奈何为治?臣闻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才德俱全谓之圣人，才德俱亡谓之愚人。才德俱全，固世之所罕矣。臣窃观自汉作以来，窃人主之柄以成天下之祸者，举皆才胜德之小人也，又岂特面从而志异哉?若夫纯德君子，但能敷古、于事束手者，无他，亦历涉之不详，练习之不敷故耳。故三代之教，八岁入小学，而教之以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而后世有皓首不能周知其名数者。十五入大学，而教之以修己治人之道，而后世有没齿而不躬行其万一者。此古之君子皆卓然有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

臣伏睹陛下升御以来，兴天下之学校，育天下之贤才，亦云至矣。然而教之之术尚有未尽，故士之成就者，亦尚有所未至也。臣

愿陛下求胡瑗之法，立经义、治事斋。经义斋者，各治一经。治事斋者，各治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数之类。内自京邑，外达府州县，各妙选其术之尤者，以为学校之师，而岁考其成绩，则成德之君子，不患其束手无措矣。至于下士之徒，无耻之辈，则臣所谓才德俱亡之谓也，是固宜在摈弃之列矣。陛下能详于其始，则可略于其终；能劳于其先，则可逸于其后。知人之道苟无其缺，则施之职任，各得其当，又焉有奈何为治之叹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于其末，复命之曰：尔诸文士，虽在进学之秋，未博乎庶典，但能条陈可否，则知利钝。此陛下怜臣之愚，而欲臣尽其说也。又曰：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始举，必如朕意。此陛下导臣之进，而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之所谓可否者，前既已陈之矣。至于利钝，则非臣所较计也。陛下之欲臣以名世自期者，臣则请服膺于“敬事而畏人神”之一语矣。至于阿曲以求恩，逢迎以徼宠，不以责难陈善之道进乎陛下，曰必如陛下之意焉，则非臣之所学也。臣等荷陛下生成之恩，受陛下教育之德，倘不以刍荛之贱而弃臣，则所谓欲得夫名世之臣者，在陛下教之之有其方，知之之尽其道尔。愚陋之言，无足采者，惟陛下悯其拳拳之忠，而有以教之，不胜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跑拜看到陛下发出仁德的声音,下达明确的诏令,用获得贤才非常难,来询问我们浅陋的民间考生。其筹谋不能说不深远,其寻求不能说不迫切。臣下我不知陛下是否真能听得进去呢?还是看不起我们这些没有地位的粗疏考生,不足以参与国家大事,姑且试试我们呢?尽管这样,君主拿名义上的东西来询求,臣子必须老实作对答。陛下亮出这个问题来策问,臣下我敢不列举实际来对答吗?至于美好的言论却招来灾祸,触及到忌讳而被杀头,臣下我也在所不惜。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说:皇帝我考察古代名高一世的人,只是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畏惧大人和神灵,主动操办事务来积累经验,碰到艰难来坚定自己的志向,天天运作不停止,年年运作不罢休,

即使在睡觉吃饭时，也从未忘记自己是干什么的。由此非常得力地辅助君主，给老百姓带来福分。之所以名高一世，就是出自这个缘故。哎呀太对了啊！圣上策问中“敬事而畏人神”这句话，正是唐虞尧舜和夏商周时代的帝王任用官吏的根本所在。陛下能用这个标准去探求古代世上闻名的大臣，那就必定也用这个标准来择用当今世上闻名的大臣了。像那小小的管仲、商鞅的谋略，申不害、韩非的普通做法，哪里值得为陛下再讲一讲呢？陛下既然对尧舜和三代的大臣很在意，臣下我就不敢再援引汉唐的大臣来对答了，请求用尧舜和三代的大臣作个总结。

以前舜任命九种朝廷要职和十二州的长官说：要谨慎对待啊！只管做好上天赋予的大事！周武王称道夏朝的大臣说：处理政事恭敬尽职。商朝伊尹告诫国王太甲说：鬼神没有永久会接受的祭祀人，只对虔诚的人才接受。周公告诫成王说：百姓们怨你骂你，你自身就要更加敬重德教。能用这样的话告诫君王，可以看出他自己也能用这些话来严格要求自己。说要谨慎，说要恭敬，说要虔诚，说要敬德，这又哪里有超出陛下所说的敬畏范围以外的呢？主动操办事务来积累经验，碰到艰难来坚定自己的志向，天天运作不停止，年年运作不罢休，即便睡觉吃饭也未曾忘记，这又哪一点不是对敬畏的发现呢？所以讲论起他们非常得力地辅佐君主，往上数就是唐尧虞舜时代形成了效仿上世大功、文德再度重合的那般治理到极限的大治景象；讲论起给百姓们带来福分，往下数就是夏商周竟有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突出政绩。皋陶、伊尹、傅说、周公、召公作为大臣，都是遵循这种辅君辅政的原则啊！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说：皇帝我推翻了元朝，统一了中国，官位沿用古代制度，法规效仿旧有章程，孜孜求取贤人，但好多次都是用人不恰当。臣下我认为陛下凭借天赐的秉赋，占据正统的位置，登上帝位至今已有十八年了。孜孜求取贤才是为百姓作打算，日夜思虑这个问题已经成熟到极点了。至于多次用人不恰当，臣下我虽然也对此感到疑惑，但不敢猛然就启奏给陛下。从来帝王治国的方法，在于知人；群臣的职责，在于各司其职。帝王有知人之明，臣下才

有各司其职的实效。从前皋陶陈述谋略说:帝王关键在知人。周文王在任用左右大臣和贤才时说:能够了解政务官、治民官、执法官的心地,透彻地看出这三方面所用贤才的心地。大抵人各有心,不可具体衡量;知人之难,从古到今都让人感到头疼,但古代的圣贤,从不畏惧这种困难而不把它作为首要事务来对待。所以唐尧虞舜用人,必定要全面述职,然后严明地考察政绩;必定要严明地考察政绩,然后用车马服饰奖赏他的功劳,从来不轻易授给人官职。周文王对于政务官、治民官和执法官,一方面获取到合适的人选,让他们担任负责治民的常伯、负责政务的常任、负责刑法的准人的官职,一方面又储备起人才,来等待起用那些胜任常伯、常任、准人的合适人选,不曾轻易地任命谁。现在陛下孜孜求取贤才却常常用人不恰当,没有别的原因,而是犯了考察不仔细、任用他们太急促的错误。

臣下我跪拜看到陛下自近年以来,杀了不少奸臣,刷新政治,于是多方面提拔任用天下的士人,来共成大业。所任用的人中,有的用"聪明正直"作为名目,有的通过"孝弟力田"进行选拔,有的用"贤良方正"作为科目。陛下的期望是很深切的,委任的心意也是很专一的。然而这些人报国的效果,却如一阵风,什么都让人抓不到。这难道是以上那些选用人才的方式不足以构成治理吗?也不过是空立那些名目却不讲求实效的缘故啊!所以古代用人,日夜思考,一定是确信这个人足以称职,然后任用他担任这项职务而不猜疑。现在却不是这样,常常因有一些小优点就猛然升高官,因有一点儿小过失就猛然被杀头。陛下求贤之心虽然很迫切,但贤才还是不能符合陛下的心愿,原因恐怕就在这里。况且天下的人才,出现很不容易,培养就更困难了。陛下既然知道人才出现、培养不容易,怎能忍心由于小小的失误,就轻易将他们处死呢?过去汉武帝天赋英明勇武,但对所用的人才有时也是早晨刚呈奏上来,到傍晚就召用,稍不称心,便把他杀头。所以当时的大臣汲黯忠言直谏说:这是拿有限的人才,随便来供无限的杀戮。汉武帝却说:你讲的不对。天下人才无穷无尽,只是担心君主不能使用他们罢了。臣下我认为汉武帝不是不能使用人才,毛病就出在不能了解他们罢了。如果真能了解他们,就会大才大用,小才小用,各自

发挥出效能，分别衡量并依据每个人的才干与能力来任官授职。如果真是奸邪之徒，就惩罚他、处死他；如果真是平庸恶劣的人，就罢免他、斥退他。又怎能忍心在杀头以后还说：我能任用天下人才呢！假使认为汉武帝的做法是对的，那就表明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用人之道根本不值得效仿了。

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中说：那些具有才能的人虽被视为心腹，委以重任，却大多当面服从而心怀异志。那些道德君子虽被授给官职，却只能空讲古代如何，不能处理具体的政事。一般人和更下等的人，不知廉耻，不顾身家性命，犯下的罪过特别深，永远都不能克制自己，由此反而张扬君主的过错。如果不是真正贤能、特别圣明的人，也没有谁不被他们所迷惑。长此以往，如何能治理好国家呢？臣下我听说：道德超过才能的，称为君子；才能超过道德的，叫做小人；才德兼备的，称为圣人；才德都不具备的，叫做愚才。才德兼备的人，压根就是世上所罕见的。臣下我私下观察，从汉朝建立以来，凡是从帝王那里窃取到实权、酿成天下大祸的人，都是才能超过道德的小人，又哪里仅仅是表面顺从而心怀异志呢？至于道德君子，只会空讲古代如何，不能处理具体的政事，没有别的原因，也只是由于经历和磨练不深切，不曾在实践中多方锻炼而已。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教育，从八岁入小学，教给他们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但后世却有一辈子都说不全六艺包括哪几项的人。到十五岁升入大学，教给他们修身养性、治理民众的原则与方法。但后世却有到死都不能践行其万一的人。这就是从前的君子都能有所作为，而现在的君子却望尘莫及的原因。

臣下我跪拜看到陛下自从登基以来，振兴天下的学校，培育天下的贤才，也称得上尽心尽力了。然而教育的方法还有不完备的地方，所以造就出的学生还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臣下我愿陛下采用北宋胡瑗的教育方法，设立经义斋、治事斋这类专门学习班。所谓经义斋，是让学生各自专修一部儒家经典。所谓治事斋，是让学生各自专修某一方面的政事，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数之类。如今要是上自京城，下至府州县，各自精选在某一方面最有造诣的人才，作为学校的

教师,每年考核他们的教学效果,这样一来,德行成就的君子,便不用担心他们对处理政事没有办法了。至于不学无术的家伙,没有廉耻的败类,则是臣下我所说的才德全无的蠢才,本来就应该归入摒退、抛弃掉的行列。陛下能在起始阶段考虑得特周详,以后就简单多了;把功夫下在前边,到后面就省事多了。如果知人善任的做法不存在明显的毛病,就会在职位安排上各得其所,这哪里还会有如何能治理好国家的叹息呢?

陛下用来策问臣下我的问题,略如上述。但在试卷最后还命令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虽然正处在学问长进的时候,还不广泛了解各项政典,但只要写明如何办,就能看出优劣来。这是陛下怜悯我们的浅薄,而希望我们毫无保留地发表看法。在试卷末尾还说:既然承奉皇帝我的命令来考试,一定要竭尽全力,把志向定在成为一代名臣上,在答卷这个时候就开始做起,一定要符合皇帝我的心意。这是陛下开导我们进取,而期望我们要自觉成为古代贤杰那样的人。臣下我所讲论的应当怎么做,在前面已经都陈述出来了。至于是优是劣,就不是臣下我内心还去计较的了。陛下期望我们要自觉成为一代名臣,臣下我就只管请求:为此该去服膺策问中"敬事而畏人神"这句话了。至于阿谀而求取恩用,逢迎而博得宠爱,不把批评错误、陈奏高明的谋略进奏给陛下,却要一定说什么符合陛下的心意,就不是臣下我所学习的了。臣下我等人仰仗陛下生养的大恩,蒙受陛下教育的德惠,倘若不因山野村夫的低贱而遗弃臣下我,那么所谓想要获取到一代名臣,还都在于陛下教育有方,了解人才的方法非常正确而已。愚昧浅陋的回答,没有什么可以采用的,只希望陛下怜悯臣下我的拳拳忠心,而有理由教导臣下我,那就荣幸到极点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惠帝建文二年(1400)庚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殿试策问

[建文二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诸生盖闻致治之主,论治道之盛,必以唐虞三代为准。尧舜、禹汤、文武此数圣人者,其德厚矣。然所以本诸身,发于政事,施泽于民者,其先后始终,亦可得而言欤?夫由亲以及疏,笃近而举远,百王之所同也。尧舜之时,黎民於变时雍矣。以亲则有象之傲,臣则有共、鲧之凶。将圣人之化,有所弗及欤?抑为恶之人,有不得而化者欤?

朕绍承大统,每思古先圣帝明王之治,何修何为,而可使家给人足,比屋有可封之俗?行何善政,而可使囹圄空虚,刑措不用欤?图治莫切于用贤,而患贤才之难致;化民莫先于教学,而患礼乐之难兴。果何由而可使野无遗贤,而民皆乐于为善欤?兹欲使海内皞皞熙熙如唐虞三代时,致之必有其道,施为必有其序。诸生习于圣贤之说久矣,其具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侍奉君主,应当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把俸禄放在后面。

可以把孔子称作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和奏乐先敲铜钟，最后用玉磬来收住一样。

孔子评论郑国的大夫子产，说他有四种做法符合君子之道：他自我修养严肃认真，他侍奉国君恭敬谨慎，他教养民众施用恩惠，他役使民众合乎道义。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你们众考生大概听说过，实现大治的帝王，讲论起治国之道的隆盛，必定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标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以及周文王、周武王这几位圣人，他们的仁德真是深厚极了。然而从自身做起，表现在政事上，对百姓施布恩泽，其先后始终的程序，能够具体地论述一番吗?由血缘关系近的人推及到血缘关系远的人，优遇身边的人而举用远方的人，这是历代帝王的共同之处。唐尧虞舜之时，百姓随教化改变而良善和协，但说起亲属，却有虞舜的弟弟——象的傲慢，大臣中有共工、鲧的凶残。这是由于圣人的教化还有没施行到的地方，还是因为作恶之人原本就顽固不化呢?

皇帝我继承太祖的帝业，常常思考古代圣帝明王的治绩，究竟修明些什么，施行些什么，才能够使家家充裕，人人富足，户户都有可以挂匾树碑加以表彰的风尚呢?实行什么良好的朝政，能使监狱里没有在押的罪犯，刑罚搁置起来而不用呢?谋求大治首先要任用贤才，但却忧虑贤才很难招请来；化导百姓首先要教诲学习，但却忧虑礼乐很难兴盛。有什么办法能使民间的贤才都被任用，而百姓又都乐于积德行善呢?现在要让全国都和睦欢乐得像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时期那个样，其中一定会有好办法，做起来一定会有先后次序。你们众考生对圣贤的说法已经长时间就很熟悉了，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胡靖　殿试对策

胡靖(1370～1418)　即胡广。靖为明惠帝所赐之名。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靖迎降,复名广。字光大,号晃庵,吉水(今属江西)人。建文二年(1400)状元。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左春坊大学士,曾两次随从成祖北征,奉诏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重修《明太祖实录》等。善书法。每以恭谨得信用。著有《胡文穆集》。

臣对:臣闻孔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大哉,仁义之道乎!尧舜用之而成化,禹汤、文武用之而致治也。有志之君,愿治之主,莫不于是而取法焉。稽之于古,三代有天下,率数百年之久。其所以致隆盛者,莫不以仁义之道也。及其后世之衰,亦莫不以不行仁义之故,而遂至于不有天下。至于论致治之隆,民俗之美,致贤才之众,兴礼乐之盛,何莫不由于斯!今陛下以隆古之道,致治之由,下策微臣,此盖陛下之所已行而不待臣之言也。虽然,天生一代之圣君,必生一代之贤才。所以能致非常之治,而开非常之太平者,由其能旁求博询,取诸人以为善者也。臣敢不献切时之正论,而徒角无用之虚文也哉?

夫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夔、稷契、周召之为臣,都俞吁咈者,无非仁义之言;赓歌戒饬者,无非仁义之语。所以扬言乎庙堂之上,而化行乎海隅之中,无一民之不被,无一夫之不化,而成黎民於变时雍之美。然而亲则有象之傲,臣则有共、鲧之凶,亦非圣人仁义之化有所不及,而为恶之人将圣人有不能化之者。故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盖自暴自弃者,虽圣人与居,不能化之也,岂可以此而病尧舜之治哉?夫天之生物,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未尝不同;而发荣滋长,凋瘁销落,有倍蓰而不齐者,亦岂天之不能成物也哉?圣人之治,亦由是也。

陛下思古先帝王之治,而欲垂宪于万世,非仁义则不能有所为也。夫仁义者,治天下之大经,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自陛下

嗣位以来,宽租负之征,下养老之诏,省刑罚之繁,四海之民莫不欣戴。近以陆梁远近骚动,而天下之民心不摇者,此陛下躬行仁义之效固结于人心者,又非一日也。此臣所谓陛下已行之验者。臣愿陛下终始而行之,持之以久,积之以岁月,而不求其近功,则何修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况夫陛下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柄,岂宜薄此而不为哉!

夫图圄非仁义不空,刑罚非仁义不措,贤才非仁义不兴,礼乐非仁义不作。故孔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事得其序,物得其和,则礼乐见而仁义著矣。故仁义之道,行之于一身,推之于一家,又推而达之国与天下,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今陛下举仁义于上,则公卿大臣躬行仁义于下,远近百执事倡导仁义以相渐摩,而民亦以仁义相教习。将见礼乐可兴,而致凤凰来仪之美;贤才毕出,而致国家咸宁之休。图圄何患其不虚,刑罚何患其不措哉?将见唐虞三代之盛,熙熙皞皞之俗,复见于今日矣。

臣固以圣贤仁义之道,为陛下始终而敷之。伏愿陛下不以臣言为迂,而加意笃行,则其效将有不止于今日矣。抑臣闻之,汉武帝策贤良,董仲舒以教化对。惜乎武帝不能行也,惟好尚功名而喜于方士,以至末年乃有轮台之悔。今陛下策臣,臣以仁义为对者,欲陛下力行之以致太平,使天下后世知陛下之策臣者求实言,而臣之应陛下者以实对。臣虽不敢自侪于仲舒,又岂敢以武帝望陛下为三代之君?臣既不敢过谀,亦不敢激。愿陛下少垂睿览,非惟臣之幸甚,天下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孔子说过:天地的大恩德叫做生长万物,圣人最贵重的宝物叫做帝位,依靠什么守住帝位叫做仁德,依靠什么聚集起民众叫做财富,管理好财富,宣布好法令条文,禁止民众干坏事叫做义。真伟大呀,仁义之道!唐尧虞舜用仁义之道而成就教化,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用仁义之道而实现天下大治。有志向的帝王,愿意大治的君主,无不在二帝三王的做法上加以效仿。从古代看,夏商周三代享有天下,都长达数百年之久。它们实现了隆盛的大

治景象，原因都是实行了仁义之道。到后世出现衰落，也都是由于不实行仁义之道的缘故，直至失去天下。至于讲论起形成治理的昌盛景象，风俗的淳美，招来贤才的众多，兴行礼乐的隆盛，哪一宗不是因为实行了仁义之道呢！陛下用古代昌盛的做法，实现大治的原因，来询问臣下我这样渺小的人，其实这是陛下已经实行而不用臣下我再多说的事情。尽管如此，上天降生一代明君，必定降生一代贤才。能够达到天下大治，开创太平盛世，原因在于君主能广泛征求，多方询问，择取人们的意见而构成正确的东西。臣下我怎敢不献上切合实际的纯正议论，偏偏要去争作那无用的空洞文章呢？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作为君主，皋陶、夔、后稷、契、周公和召公作为大臣，相互之间所讨论的，没有一项不是仁义之言；君臣接连吟唱诗歌相互告诫的，也没有一项不是仁义之语。君臣在朝廷上用来讨论问答，而教化就施行到海角天涯。无一百姓不受感染，无一平民不被教化，形成了百姓随同教化变良善而和睦亲近的美好局面。然而在亲属中却有舜的弟弟——象的傲慢，大臣中有共工、鲧的凶残，这也不是圣人的仁义教化存在着施行不到的地方，而是作恶之人顺从圣人还会有顽固不化的。所以孔子说过：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的愚人是不会改变的。那些自暴自弃的人，即使同圣人生活在一起，但也不能教化好他们。怎么能够凭借这一点就说唐尧虞舜的治理存在弊病呢？上天创生万物，用雷霆震动他们，用风雨滋润他们，全都用的同一方式。可万物发育生长，凋落枯萎，却有非常明显的区别，这难道是上天不能够生成万物吗？圣人治国，也同这种情况一样。

陛下仰慕古代圣帝明王的大治景象，打算给后世留下榜样，只有实行仁义之道，才能达到目的。仁义是治理天下的大法则，全面实行仁义，则有大成效；有限实行仁义，则有小成效。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放宽田赋和欠税的征收，颁布养护老年人的诏书，减省繁苛的刑罚，全国百姓无不从内心拥护。近来由于北方藩王跳出来捣乱，远近一片骚动，但天下的民心不曾动摇，这属于陛下实行仁义的效验在人们心中牢牢扎下了根，决非一日之功。这就是臣下我所说的陛下已经实行仁义的验证。臣下我希望陛下始终施行它，坚持长久，用时间作积累

而不追求眼前的功效。这样就无论修明什么，也都能有成效，无论干什么，也都能办得到。何况陛下身居最尊贵的地位，掌握着可以达到的权力，怎能轻视仁义而不去做好它呢？

只有实行仁义，监牢中才不会再有罪犯；只有实行仁义，刑罚才可以不再动用；只有实行仁义，贤才才会涌现；只有实行仁义，礼乐才能振兴。因此孔子说过：礼仪呀礼仪呀！难道仅仅是指玉帛这类物品而言吗？音乐呀音乐呀！难道仅仅是指钟鼓这类乐器而言吗？作为人，却不仁，还会怎样对待那礼仪？作为人，却不仁，还会怎样对待那音乐？事情获得到进展的顺序，万物获得到固有的和谐状态，就会礼乐兴行而仁义盛明。所以仁义之道在自身施用，再扩及到一个家族，又延伸到国家乃至全天下，也就自身修养好了，家族得到整顿了，国家实现大治了，天下变得太平了，这是没想达到那样可却偏偏就达到那样的了。现在陛下在上面标举仁义之道，公卿大臣就在下面身体力行仁义之道。远近百官倡导仁义来相互磨砺，而天下百姓也就用仁义来相互教诲学习。这样就眼见礼乐可以大兴，带来凤凰成对飞到的吉祥景象；贤才全都涌现出来，实现国家安宁的美好局面。还忧虑什么监牢不会空荡，刑罚能不动用呢！眼见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太平盛世，和睦欢乐的社会风气，重新又在今天出现了。

臣下我坚持拿圣贤的仁义之道，为陛下从头至尾作了一番陈述。敬请陛下不要认为臣下我的看法很迂腐，相反却更用心去推行，那就会成效必将比现在更大了。不过臣下我又听说：汉武帝在对贤良科应试者进行策问时，董仲舒曾用搞好天下教化来做回答。可惜汉武帝不能实行，却只崇尚武功，又喜欢方士长生不老那一套，以至到了晚年，对在轮台驻兵屯田感到后悔。如今陛下对臣下我进行策问，臣下我用仁义来对答，是希望陛下大力实行它，达到天下太平，使天下后世清楚陛下策问臣下我是为了求取务实有用的言论，而臣下我回答陛下也拿务实有用的事体做献呈。臣下我既不敢同董仲舒相提并论，又哪敢将陛下与汉武帝相比却又希望陛下成为夏商周那样的帝王呢？臣下我既不敢过分逢迎，也不敢偏激。只愿陛下略微看一下答卷，这就不单是臣下我的大幸了，也是天下的大幸。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王艮　殿试对策

王艮(?~1402)　字敬止,吉水(今属江西)人。建文二年(1400)榜眼,授翰林院编修。预修《明太祖实录》、《类要》、《时政记》等书。一时大著作,均予综理。又多次上书,议论时务。在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攻下南京前一夜,饮鸩尽节。著有《翰林集》。

臣对:臣闻天下以一人为主,人君以一心为本。人主之心有定向,则力行以副之。天下虽大,岂有难成之事哉?钦惟陛下,嗣极以来,励精图治,又进臣等于廷,问以唐虞三代之治,及方今致治之道,施为之序。臣有以见陛下立心之高矣。臣知陛下可以为尧舜,可以为禹汤,可以为文武。若夫圣策所问及于此,实天下生民无疆之福也,臣宁敢隐忍而不言乎?谨俯伏以对。

臣闻隆古之君,莫盛于尧舜,莫过于禹汤、文武。故论尧之德,则有钦明文思、允恭克让之备。论舜之德,则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之纯。不矜不伐,克宽克仁,禹汤之德也。明德慎罚,聪明齐圣,文武之德也。是数圣人之德,信不可谓不厚矣。然求其本诸身者,莫先于格物穷理。其发于政事,施泽于民者,则以教化为先为始,刑罚为后为终也。是以唐虞三代盛时,人君恭己无为,百官和于朝,民物和于野。熙熙皞皞,比屋可封,人有士君子之行。其雍熙泰和之治,卓乎千万世之上,不可及也。然原其所以致此,其莫非圣人一心之所感也。彼象之傲,共、鲧之凶,区区之梗化者,乃唐虞盛时之适然,未可以此疑圣人之化有弗及,亦不可以此尽疑为恶之人不可得而化者也。

我朝龙兴,上承唐虞三代之治。太祖皇帝以神武一海内,三十余年。陛下以聪明睿智,绍述大业,此天以启唐虞三代之治者,启今日矣。陛下既以尧舜、禹汤、文武为心,则尧舜、禹汤、文武之治不难致矣。然人主一心,万化之原,必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是故生民之富,刑罚之措,贤才之所以致,礼乐之所以兴,何者不自陛下一心之所用也。陛下诚用心于富民,则家给人足矣。诚用心于措刑,则刑措矣。诚用心于求贤才,兴礼乐,则贤才无难致,

礼乐无难兴矣。陛下以大有为之资,居可致之位,操可致之权,何足以此为患哉!然心在于兴治,则必思去所以蠹其治者。兴致之利,在治之害,在陛下一心转移之间耳。此臣所以拳拳以本诸心而见于事者,为陛下言之。

古者田皆井授,无不受田之家,力本者众,浮惰者少,是宜家给人足矣。自秦开阡陌,井田之制一废,遂使豪强得以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因循至今,未能革其弊也。今者井田之制,势不可复。陛下诚能取限田之法,期以岁月行之,则豪强无兼并,穷弱有所养,庸有一家之不给、一人之不足哉?此臣愿陛下用心以富民者,此也。

古者承流宣化,最责守令。守得其人,则一郡之民安;令得其人,则一邑之民安。守令之所系,不为轻矣。陛下即位以来,铨选不可谓不慎,采察不可谓不勤矣。然天下郡邑未尽得其人,此刑所以不能尽措也。今也郡邑,必得贤者,则赋役无不均,盗贼无不息,冤者得以自伸,枉者得以自直,疲癃残疾各遂其生,鳏寡孤独各得其所,庸有囹圄之不空者哉?此臣愿陛下用心以措其刑者,此也。

古者用人,必先德行,后文艺,量才而授职,度德而定位,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贤之所以尽其用也。今也或科目之选,或荐辟之贡,求贤之路,固非一端。然往往未尽得其实,未足以副陛下图治之意者,亦以遴选之未甚严,任使之未甚当耳。陛下诚能举行考绩黜陟之法,果贤良也,果正直也,则进之用之;果奸回也,果谀佞也,则斥之退之。宜赏则与举主俱受其赏,宜罚则与举主俱受其罚。如是则不贤不肖者,不得幸进,而贤才无难致矣。此臣愿陛下用心以致贤才者,此也。

古者人生八岁,则入小学,教以爱亲敬长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入大学,教以穷理尽性、修己治人之方。俟其有成,然后登用。今也学校之士,专事文墨,而于古人修德之功,瞢然不之省,是以未足以副陛下化民之意也。陛下诚能诏天下郡县,自令选择居乡有孝悌或资性淳厚者,入学教养。仿胡瑗之法,设经义、治事之斋。经义者各治一经,治事者各治一事,各有成效,然后充贡,则庶几古者养士之法,而礼乐无难兴者矣。臣愿陛下用心以兴礼乐者,此也。

夫均利以足民,择守令以措刑,慎选举以致贤才,兴学校以隆礼乐,当今致治之道,宁不在此乎?施为之序,宁不以此乎?陛下立心如

此，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诚能力行以副之，则今日之俗，即唐虞三代比屋可封之俗；今日之风，即唐虞三代刑措不用之风矣。野无遗贤，民乐于为善者，又岂异于唐虞三代之时乎！陛下终始是心，则国家之幸，天下之大幸也。顾臣智诚浅陋，不足以奉明诏，祗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天下只能把帝王一个人作为主宰，帝王只能把专一的心念作为治国的根本。帝王的心念具有了明确的方向，就全力以赴去实现。天下虽然广大，却哪里存在着做不成的事情呢！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自从继承帝位以来，励精图治，又宣召臣下我等人到殿廷，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以及如今天下达到大治的方法，施行的顺序来进行策问。臣下我由此就确有理由看出陛下定立心念更高远了。臣下我也知道陛下可以成为唐尧虞舜，可以成为夏禹商汤，可以成为周文王、周武王了。至于圣上的制策询问到这些问题，实在是天下臣民无限的福气。臣下我哪敢隐瞒而不谈呢？跪拜而恭敬地对答如下。

臣下我听说隆盛古代的君主，没有谁能比唐尧虞舜更盛明，没有谁能够超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了。所以讲论起唐尧的德业，就完备地具有执政严肃，照临四方，经纬天地，思虑敏捷，诚实恭谨，推贤让能。讲论起舜的德业，就纯正地具有深谋大智，经纬天地，照临四方，态度温和，充满宇宙之间。而不矜持，不自夸，宽厚仁爱，这是夏禹、商汤的德业。显示仁德，慎重地对待刑罚，明辨是非，庄重神圣，这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德业。这几位圣人的德业，真称得上是特深广了。然而探求他们从自身做起的举动，没有比弄清事物、穷尽道理更占第一位的了。他们进而发布在政事上、给百姓施布恩泽上的举措，则把教化放在前面，作为起始，把刑罚放在后面，作为末尾。所以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隆盛时期，君主只是管好自身，无所作为，百官在朝廷上十分和睦，民众和万物在原野上也非常和谐。温和欢乐，悠闲自得，家家都可以进行表彰，人人具有士人君子的德行。那种太平和美的大治景象，闪耀在千秋万世之上，无法赶得上。然而推究达到这种地步的原因，没有一宗不是圣人用他们那专一的心念进行

感化的结果。至于虞舜的弟弟——象的傲慢，大臣共工、鲧的凶残，这些微不足道的对抗教化的家伙，正是唐尧虞舜兴盛时期的个别现象，不能借此就怀疑圣人的教化存在着施行不到的地方，也不能借此就一律怀疑干坏事的人，根本没办法教化好他们。

我们大明皇朝创立，就往上承接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局面。太祖皇帝凭借神明英武统一海内，至今已三十余年。而陛下凭借聪明智慧，继承太祖的大业，这是上天在用当年启示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来启示今世啊！陛下既然把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而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太平盛世，也就不难再实现了。君主的心念，是各种教化的本源。一定要端正这一心念；用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用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用来端正天下的百姓。所以百姓富足，刑罚不动用，贤才都网罗来，礼乐兴用起来，哪一宗不来自陛下这心念的运用呢？陛下真能用心于如何富民，就家给人足了。真能用心于刑罚不动用，就刑罚不动用了。真能用心于网罗贤才，兴用礼乐，就贤才不难网罗，礼乐不难兴用了。陛下凭借大有作为的天赋，居于可以实现大治的尊位，掌握可以实现大治的权力，哪里还用对此担心呢？但是心念既然用在了治理好国家上，就必须考虑破坏国家大治的那些因素。要兴起大治的福利，就要除去大治的祸害。这全在陛下那一心念的如何转换之间罢了。这是臣下我恳切地用依据心念而体现在事情上这个重要原则来为陛下作陈述的原因。

古代实行井田制，没有不分到一份田地的人家，务农的人多，闲游懒惰的人少，因而能家给人足。自从秦朝鼓励开垦私田、井田制被彻底废除，致使地方豪强得以兼并土地，富者田地一片连一片，而穷人没有立锥之地，一直延续到如今，未能革除掉兼并的弊端。现在井田制势难恢复，陛下果真能采取限定土地数额的对策，推行多年以后，地方豪强就不能再有兼并，穷人也具有了生存的条件，这哪里还有某户人家仍不富裕，某个人仍不充足呢这是臣下我希望陛下用心，来使百姓富足的原因。

古代承奉朝廷恩泽，宣明教化，全靠太守县令。太守选好了人，一郡的百姓就安居乐业；县令选好了人，一县的百姓就安居乐业。所以太守县令对国家的作用可不是轻微的了。陛下即位以来，选用官员不

可谓不慎重，考核不可谓不勤勉。但天下的郡县，还有一些长官不得其人，这就是刑罚还不能搁置起来的原因。如今各郡各县，选取到贤明的长官，税收就无不公平，盗贼就无不平息，被冤枉而判罪的人得以自己做申辩，证明自己无罪，病患者和残疾人能各自求得生存，鳏寡孤独各得其所，监牢中哪里还会有犯人呢？这是臣下我希望陛下用心，来使刑罚不动用的原因。

古代用人，先考虑道德，后考虑文才；衡量才能授给官职，揣度德行确定爵位。大德大才，让他们做大官，小才小德，让他们当小官，这是贤才各尽其用的原因。现在或通过科举考试选取人才，或通过推荐录用人才，求得贤才的途径，原本就不是一条。但往往流于形式，没能完全符合陛下谋求大治的心意。这也是由于选择不特别严格，任用不十分恰当造成的。陛下确实能够全面施行考核政绩、决定升降的制度，果真属于贤良的官员，果真属于正直的官员，就提升重用他们；确实是奸邪的小人，确实是献媚的家伙，就斥退罢免他们。应该奖赏的，就让荐举他的人与他一起受奖赏；应该处罚的，就让荐举他的人与他一起受处罚。这样做，就会使不贤良、不成器的人没办法侥幸得到进用，而贤才也就不难网罗了。这是臣下我希望陛下用心，来网罗贤才的原因。

古代人长到八岁，进入初级学校，学习爱护亲人、尊敬长辈的规则和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写、算术六门课程。到了十五岁，便进入国家最高学府，学习穷尽天理、搞清人性、修身治国的方法。等到学有所成，然后进用。现在学校的学生，专门用力学习写文章，对于古人修身养性的功夫，根本不懂得，所以不能够符合陛下化导百姓的心意。陛下真能下诏给天下各郡县，让他们自行选择乡村中有忠孝友爱的德行或天性老实厚道的人，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培养。在学校中仿照宋朝胡瑗的办法，设立经义斋、治事斋这类专门学习班。在经义斋的，各自研究一部儒家经典。在治事斋的，各自研究一项政事，分别学有成效后，再选拔推荐到京师国子监学习。这就接近古代培养人才的方法，而礼乐也不难兴起了。这是臣下我希望陛下用心，来兴起礼乐的原因。

使利益均衡来让百姓富足，选择太守县令来使刑罚不动用，慎重对待选举来网罗贤才，兴办学校来使礼乐隆盛，当今要实现大治的方法，难道不就在这些方面吗？具体施行的顺序，难道不照这样走吗？陛下把心念定在这里，就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心

念。果真能大力去做,落到实处,那么今天的社会风俗,也就成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家家可以进行表彰的社会风俗了。今天的习尚,也就成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刑罚搁起来不动用的习尚了。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百姓乐于积德行善,又哪里会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时期不相同呢?陛下从始至终保持这一心念,就是国家的大幸,天下的大幸了。但臣下我愚昧浅陋,没资格承奉圣明的诏令,恰恰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李贯　殿试对策

李贯(生卒年不详)　吉水(今属江西)人。建文二年(1400)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明成祖发动靖难之役,随从胡广迎附。后迁官中允,坐累,死狱中。死前悔叹:"吾愧王敬止矣"。

臣对:臣闻古今之时虽异,帝王之治则同。何则?人主一心,万化之本原。有二帝三王之心,即有二帝三王之治。故人主治天下而欲法乎前圣,必先端此心以为出治之本。其心同则其治同,帝王盛治岂以古今而有间欤?钦惟皇帝陛下,肇嗣大宝之初,诞布惟新之政,诏臣等于廷,问以唐虞三代之治,而欲远追帝王熙皞之盛。顾臣愚昧,何足以知之?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圣天子之休命!

夫二帝三王之治,古今天下之所共称,而英君谊辟之所共法。欲法其道,必求其心,故心同则道同,道同则治无异矣。帝尧以克明峻德,亲睦九族,平章百姓,推而致黎民於变之风。舜以重华协帝而命九官,咨岳牧,而致庶绩咸熙之效。禹以克勤克俭,而历数以归。成汤克宽克仁,而彰信兆民。文王徽柔懿恭,日昃不遑,而小民咸和。武王淳信明义,崇德报功,而万姓悦服。是数圣人者,莫不以修身为本,明德为先,故能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而天下。其惠泽施于民者,固自有先后始终之不同也。且夫由亲逮疏,笃近举远,岂惟尧舜为然?千万世之后,百王之所同然也。然而以尧舜之圣,则亲有象之傲,臣则有共、鲧之凶,岂圣人之化有所弗及者耶?圣人德化之被四表,格上下,虽海隅之远,莫不昭灼;而彼凶傲之终不能归于善者,殆孔子所谓下愚不移,

孟轲所谓自暴自弃，故虽圣人与居，不能化而入也。

今陛下膺文明之运，迓天平之历，天命人心之所归，讴歌朝觐之所属，宗戚愿戴之深，先帝付托之重。而陛下深念祖宗创业之难，今日持盈守成之不易，孜孜求贤，励精图治。臣有以知陛下之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

臣又闻古之天下，即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帝王不易民而化，力行如何耳。若欲如隆古之家给人足，比屋可封，囹圄空虚，刑措不用，当思六府三事何从而修和，天命天讨何由而民信。使掌民食者如后稷，掌教民者如契，为司徒、位冢宰者如伊傅、周召，掌刑如皋陶之淑问，苏公之式敬文王，虞、芮之质成，则帝力何有之歌，九功惟叙之戒，可使长存也。《关雎》、《麟趾》之化，《由庚》、《鱼丽》之什，可使不废也。唐虞三代之盛，夫岂不可致哉？

若欲如隆古之用人而野无遗贤，兴学而民皆乐于为善，当思何为而九德咸事，何为而宅俊登用，庠序何以明人伦，礼乐何以陶人心。诚能如尧舜之困穷不废，成汤之立贤无方，则八元、八恺可立于朝，蔼蔼王多吉士，可复《卷阿》之盛也。诚能如此，上自王宫国都，下至闾巷，莫不有学，制礼以明其序，作乐以尊其和，则人人可有士君子之行，而治隆于上，俗美于下矣。唐虞三代之盛，又岂不可致哉！

臣尝观汉唐以来，人主之治天下，未尝不欲追配前古，俪美帝王，而不能者，盖有图治之名，而无图治之实。所谓实者，无非心乎？帝王之心而已。稽之典册所载：人心道心，精一执中，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于民，惟皇作极，汤武相传之心法也。尧舜、禹汤、文武之治，率皆此心之所推焉。今陛下能心乎帝王之心，真不世出、可谓大有为之君矣。臣奚以多言为！

臣愿陛下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明理欲之几，审志之所向，何者为人心道心，何者为建中建极。兢业于万机，图难于其易。必薄于自奉，然后四海无穷民；必勤以率人，然后百官无旷职。某贤未用，吾何以用之，既用，又何以察之。其政未修，吾思所以理之。至如公卿守令之进退，中国蛮夷之安否，礼乐典章之或缺，纪纲法令之或弛，咸究之于心，揆之于理，时省而速行之，则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而一视同仁，迩可及远，何患海内之皞皞熙熙不能如唐虞三代？欲如唐虞三代，

又何患致之无其道,施为无其序哉?将见上行下效,风移俗易,咸三登五之治,在乎今日,唐虞三代之盛,岂得专美于前?臣不胜拳拳,惟陛下裁择焉,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古今尽管时代不同,但帝王的治国之道却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君主的心念,是各种化导的根本。有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心念,也就有这二帝三王的太平盛世。所以君主治理天下,打算效法前代的圣人,必定先要端正这种心念,作为亮出治国措施的根基。心念相同,治理也就相同。帝王把天下治理好,哪里会因古今时代不同而产生差距呢?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刚刚继承帝位,就要施布国运焕然一新的朝政,下诏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进行策问,而想追比古代帝王那样的太平盛世。但臣下我愚昧无知,哪里足以了解这其中的奥妙?敢不满心一片纯洁,来对答称扬天子的美好命令吗?

古代二帝三王的治绩,从古到今被天下人一齐称道,而英明君主也都去效法。要效法他们的治国之道,必定先要探求他们的心念。心念相同,治国之道也就相同。治国之道相同,治绩也就没什么差别了。帝尧通过宣明盛德,团结同族,辨明百官族姓,推广开来,致使民众随教化而改变,形成良善和协的风气。舜以文德重合,协助尧帝,任命九种朝廷重要官员,询问四方首领和十二州的地方长官,收到了各种事务全都振兴的效果。大禹凭借克勤克俭,继承了舜的帝位。成汤宽厚仁慈,取信于亿万民众。周文王善良慈爱,和蔼恭敬,终日忙碌,使平民和睦。周武王真诚讲信用,显示道义,崇尚仁德,酬劳有功,使万国心悦诚服。这些贤明圣主,都是把修养好自身作为根本,把显扬仁德放在第一位,因而能从修养好自身扩展到整顿好家族,又从整顿好家族扩展到治理好国家,直至使整个天下太平。他们对百姓施布恩泽,原本就存在着先后始终的不同。况且从血缘关系近的人推及到血缘关系远的人,优遇身边的人,举用远方的人,哪里仅仅唐尧虞舜是这样呢?即便到千秋万代以后,任何君主也是如此。然而凭借唐尧虞舜的贤德圣明,还在亲属中出现了舜的弟弟——象的傲慢,大臣中出现了共工、鲧的凶残,这哪里是圣人的教化还有没达到的地方呢?圣人

的仁德教化，遍及四方边际，到达天地上下，即使远至天涯海角，也无不鲜明照耀。而象、共工、鲧那样的人，到最后也不能归向良善，这恐怕正是孔子所说的低下的愚人不会改变，孟子所说的自暴自弃呀！所以他们尽管同圣人生活在一起，但也不能接受教化改变过来。

现在陛下承当起当初尧把帝位禅让给舜的时运，迎受了地平天成的气数，天命与人心全都归向，歌颂朝拜全都目标一致；皇族拥戴特别深，先帝嘱托特别重。而陛下深深体念祖宗创业的艰难，如今保持鼎盛状态和持守大业的不容易，求贤若渴，励精图治。臣下我由此也就确有理由知道陛下的心念也就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心念了。

臣下我又听说，古代的天下四方，也就是现在的天下四方；而现在的天下四方，也就是古代的天下四方。帝王都不改变所统治的百姓而进行教化，只是看如何大力去做罢了。倘若要像隆盛古代那样家给人足，户户都可以旌表，监牢空虚，刑罚不动用，就要考虑水、火、金、木、土、谷物这六府和端正德行、物尽其用、使人民生活充裕这三事，究竟通过什么来得到修明与协和。上天命令表彰有德行的人，上天要惩罚有罪的人，对此应该通过什么能使百姓信服。要让负责农业的官员像唐尧虞舜手下的后稷那样，要让主管教化的官员像唐尧虞舜手下的契那样。当司徒、做宰相的，应当像商朝的伊尹和傅说，周朝的周公与召公；掌刑罚的，应当像皋陶那样善于断案，像苏公那样效法文王，像解决虞、芮两国土地争端那样达成协议。这样一来，诸如帝王还用费什么力量的颂歌，六府三事这九功都安排好的诚语，便可万世长存。像《关雎》诗和《麟之趾》诗上所说的普及教化，《由庚》诗和《鱼丽》诗所歌颂的万物出生和繁盛状态，可以不被废弃。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盛况，难道还不能够达到吗？

如果打算要像隆盛古代那样去用人，民间没有遗漏掉的贤才；兴办学校，老百姓全都乐意积德行善，就应当考虑怎样做而使属于皋陶所讲的九种德行中的人都担任起职务，怎样做而使政务官、治民官、执法官和贤人都得到进用，各级学校应该通过什么来讲明人伦纲常，礼仪乐舞应通过什么来陶冶人心。确实能像唐尧虞舜那样不抛弃地位低贱的人，像商汤那样任用贤士不拘一格，那就会如同八元、八恺这兄弟各八人一样的贤能人物，全都站立在朝廷上，国王众贤士济济

一堂,就能恢复《卷阿》诗所歌颂的那番兴盛景象。确实做到这样,上自皇宫京师,下至居民点,没有一处不设立学校,制定礼仪来宣明等级秩序,创作乐舞来尊崇那协和的关系,人人就都会具有士人君子的德行,治绩在上面就非常地隆盛,风俗在下面就非常地淳美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盛况,难道还不能够达到吗?

臣下我曾经观察汉朝和唐代以来,君主治理天下,未曾不打算追比远古时代,和二帝三王相媲美,但却往往做不到,原因在于光有谋求大治的名义,而无谋求大治的实务。所谓实,不也就是那个心念吗?亦即称得上"帝"、够得上"王"的心念罢了。考查古代经典上的记载,人心危险,道心微妙,精心一意,确实把握住最为适中的尺度,这是唐尧、虞舜、夏禹递相传授的心治大法。给百姓树立中正的标准,只有天子给天下确立起最高准则,这是商汤和周武王递相传授的心治大法。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大治,都是由这一心念扩展开来的。如今陛下能把二帝三王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真是罕见的大有作为的圣明君主,臣下我哪里还用再说来说去呢?

臣下我希望陛下尊崇所闻知的东西,身体力行所了解的事项,辨明天理和人欲的隐微撞击点,仔细审查心志的趋向,弄清楚什么才是人心道心,什么才是树立标尺,建立准则。对各项政事兢兢业业,在容易的时候谋求难办的问题。必须克制自己的生活享受,然后才能天下没有穷困的百姓;必须勤恳作表率,然后百官才不荒废本职工作。有个贤人尚未任用,就琢磨我该怎样任用他;既已任用,又想应该如何考核他。有些朝政还没整顿好,我就要考虑解决的办法。至于公卿、太守、县官的进退,中原和四邻地区是否安宁,礼乐典章的缺失,纪纲法令的松弛,都在内心详加究寻,对照道理,经常省察而迅速实行,就会自身修养好了,家族得到整顿了,国家实现大治了,天下变得太平了。一视同仁,由近及远,还担心全国不能像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祥和兴盛吗?要达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又何愁没有达到的办法,施行起来没有先后的次序呢?眼看上行下效,移风易俗,超过三王、同于五帝的大治景象就在当今重现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隆盛,怎能就在前面独领风骚呢?臣下我恳切到极点,只请陛下裁决选择。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成祖永乐十年(1412)壬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

殿试策问

[永乐十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奉承宗社,统御海宇,夙夜祗畏,弗遑底宁,以图至治,于兹十年,未臻其效。虑化未洽,谨之以庠序之教;虑养未充,先之以足食之政;虑刑未清,详之以五覆之奏。求才备荐举之科,考课严黜陟之令。然厉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寝。若是而欲跻世泰和,果何行而可?

六经著帝王为治之迹。《易》以道阴阳,专名数者或流而为灾异,尚理致者或沦而为清谈。《书》以道政事,语知行则何以示其端,论经世则何以尽其要?《诗》以道志也,何以陈之于劝惩黜陟之典?《春秋》以道名分也,何以用之于闭阳纵阴之说?礼以道行而乐以道和也,何以道同六经而用独为急?

夫道本一原而治有全体。推明六艺,讲议异同,行则美矣,何以一归于杂?雅歌击磬,执经问难,志则勤矣,何以未复乎古?讨论文籍,改定五经,可谓劳矣,未足以致大治;更日侍读,质问疑义,可谓伟矣,仅足以成小康。迨夫五纬集奎,文运斯振,儒道光阐,圣经复明,较之往迹,何胜何负?

盖为治之道,宽猛相济,各适其宜。太宗宽厚长者,务崇德化,政足尚矣,而言者谓不若中宗之严明。显宗法令分明,幽枉必达,严足

尚矣，而言者谓不若肃宗之长者。论治若此，其将孰从？夫博闻经学之士，有以应变。子诸生蕴之有素，其于为治之要，时措之宜，悉心以陈，毋徒泛泛。朕将亲览。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诗经》上说：天子辖区方圆千里，都是民众居住的地方。《诗经》上还说：小小的黄鸟，落在丘陵的一角。孔子说：在落脚处的选择上，小鸟知道所应落脚的地方。做为人，却可以不如小鸟吗？

天下所共同遵循的准则有五种，而用来实行的东西有三样。叫做君臣之间具有道义，父子之间具有亲情，夫妇之间具有区别，兄弟之间具有排列的次序，朋友之间的交往具有信用。这五项，是天下所共同遵循的准则。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奉受天命，继承祖宗大业，统辖驾驭整个天下，从早到晚，恭敬畏惧，根本顾不上片刻的享乐安宁，用来谋求最为完美的治理状态，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但却还没达到预期的效果。忧虑教化尚未普及，而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非常重视；忧虑养护众百姓尚未充裕，就把搞好农业生产的国政放在首位；忧虑刑罚尚未清正，便通过五次复审来慎作判决。求取贤才，就完善荐举的科目；考核官员，就强化升降的法规。然而激励社会风尚而社会风尚却越来越不厚道，革除弊端而弊端却未消失。像这样而要把全社会带入太平盛世，究竟施行什么才能做到呢？

儒家六部经典显示帝王进行治理的足迹。其中《周易》是用来讲述阴阳变化的，但专门鼓吹卦象和数理的人，有的把它演变成上天显示吉凶祸福的学说；专门大讲义理的人，有的把它沦落成空谈名理。《尚书》是用来讲述政事的，谈说起需要了解和施行的问题，就用什么

来开启那首要的第一步呢?论述治理国家的事情,就用什么来穷尽那纲要呢?《诗经》是用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的,为什么又把它列入劝勉惩戒、贬降提升的政典里面?《春秋》是用来讲述等级名分的,为什么又拿它来提出阳气闭塞、阴气放开的说法呢?礼仪用来引导人们的行为,乐舞用来引导人们和睦,为什么礼乐之道和六经相同而偏偏施用它们却占首位呢?

大道具有同一个本原,治理具有全部准则。有的朝代推究阐明六经,讲论经义的异同。这种举措固然很好了,但为什么又全都归结到驳杂上去呢?有的朝代吹奏乐器演唱《雅》诗和《颂》诗,手执经典当面请教,这种志意也真勤勉了,但为什么没能恢复古代的盛况呢?有的朝代讨论经书,考定五经正文,可以称得上是很用力了,但却未曾足够用来实现大治。每天轮流让人侍读,质正询问存有怀疑处的经义,可以称得上是宏伟了,但却仅仅足以形成稍好一些的治理状况。到了有的朝代五大行星聚集在奎宿天区,文运在这时振作起来,儒家的大道阐发得特别清晰,圣人的经典又一次变明朗。这同从前的情形比较起来,有什么优劣之处呢?

进行治理的策略,宽大和严厉相互补充,各适其宜。西汉太宗是宽厚长者,务必要崇尚仁德教化,他那国政可以让人效仿了,但评论的人却认为他不如西汉中宗的严明。东汉显宗法令分明,疑案冤案必定要审断清楚,他那严厉可以让人推崇了,但评论的人却认为他不如东汉肃宗的宽大。论证治理像这个样子,应该依从哪一方呢?对经学了解特别广的读书人,有办法来应付变化。你们这些考生平常积累很深厚,对于施布政事的纲要,措置当前事务的合适做法,仔细用心来陈述,不要光是泛泛而论。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马铎　殿试对策

马铎(1366~1423)　字彦声,长乐(今属福建)人。永乐十年(141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博通经史,质朴真率。每逢翰林学士、国子祭酒职位空缺,则受命代行其事。永乐二十一年(1423)卒于官。

臣对：臣闻治本于道，道载诸经。圣人出而三代之治为可复，真儒出而六经之道为大明。经以载道，固必待人而后明；道以出治，尤必待人而后行也。洪惟皇帝陛下，尊履大宝，绍承鸿基，明照八表，知周万务，心存乎帝王之心，治绍乎帝王之治，尚虑缺漏，下询刍荛，此好问而好察迩言之意，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然化已浃矣，选任师儒，严督课业，简绌以惩庸，励进以劝善，而庠序之教唯谨。养已充矣，省其征徭，薄其税敛，禁一民之不得妄差，禁一毫之不得妄取，而足食之政尤先。慎罚而致三覆五覆之详，尚思夫罚罪之非当。用贤而惇荐举考课之典，尚思夫任职之未宜。是盖陛下明经术之正，识帝王之大，不安小成，必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盛也。

夫厉俗未底乎时雍，不害为俗之益偷；革弊未至乎於变，不害为弊之不寝。臣愚，有以知陛下泰和之世可跻，唐虞三代之治可致。其厉俗革弊，有不在政令之末耳。何则？陛下任奉承之重，统御宇之大，夙夜祗惧，而存心于不已。道本于一原，治具乎全体。若稽经籍而垂至治于无穷，六经之道固已蕴诸圣心矣。其视诸经传授之是非，历代为治之得失，昭昭而白黑分矣。奚以臣言？虽然，圣问所及，敢不罄竭臣愚，条悉以对！

夫自六经删述于孔氏，帝王之道由是而大明。自六经附会于汉儒，帝王之治由是而难复。《易》以道阴阳，伏羲、神农、黄帝之道无所不赅。自田何传至于焦、房，专尚名数，流而为灾异；自费直传至于辅嗣，专尚理致，沦而为清谈。于是理、数分而《易》道微矣。《书》以道政事，而典、谟、训、诰、誓、命之辞无不具焉。语知行则惟精惟一，所以示其端；论经世则《洪范》皇极，所以尽其要。自大小夏侯之说殊，而《书》之义踳矣。《诗》所以道志也，先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美之而民知所劝；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刺之则民知所惩。以是巡行诸候之境土，而黜陟行焉。自齐、鲁、毛、韩之异尚，而《诗》之义隐矣。《春秋》所以道名分也，董仲舒大一统之论，正谊明道、贵王贱伯之义，其得于《春秋》也大矣。而乃用于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有闭阳纵阴之说，而《春秋》之义乖矣。

《周礼》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此礼以道行也；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此乐以道和也。礼有三千三百之仪，而一主乎敬；乐有五声十二律，而一本于和。制度品节之详而有所持循，情文节奏之备而有所感发。致礼以治躬，则齐庄中正，非僻之心无自而入。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鄙诈之念无自而生。用之于邦国而邦国治，达之于天下而天下平。此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而《易》、《书》、《诗》、《春秋》之蕴，必于礼乐以著其用焉。然欧阳修所谓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则《班志》所谓礼乐之用为急，亦未见于实用也。

然六经之道，未极一原，尚何三代全体之治为可复乎？此汉之武帝推明六艺，罢黜百家，孝宣、章帝之石渠白虎，讲议异同，行则美矣，而卒莫能循乎王道之正，而终归于霸道之杂。由乎六经之道，昧于一原，宜其治有所未纯矣。光武亲幸太学，诸生雅歌击磬；明帝临雍拜老，诸儒执经问难。其志虽曰勤矣，而未克以复乎古，不能四三王而六五帝，盖徒尚夫仪文之末，而未究夫圣道之本也。若唐太宗讨论文籍，至于夜分，诏颜师古考定五经，求治之心可谓劳矣。然而仅能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之效，而未足以为大治。玄宗更日侍读，质问疑义，怀素、无量常侍更直，好治之心亦可谓伟矣。而开元之治，庶几贞观之风。惜其后不克终，以致祸乱。是皆亦由乎六经之道，昧于一原，宜其治有所未至焉。迨夫五星聚奎，宋德隆盛，文运斯振。周、张、二程光阐儒道于前，杨、罗、李、朱复明圣经于后，较之往迹，大有径庭矣。儒道既阐，圣经复明，则治道胜负，较之于前，不待论说而明矣。

夫天下之大经，仁义中正而已。仁以育万民，义以正万民，二者并行而不相悖。宽而不流于姑息，有猛者存；猛而不偏于苛察，有宽者在。严而泰，和而节，此理之自然，治道之全体也。汉文帝恭俭玄默，赐不朝以几杖，遗受赂以金钱，造露台惜十家之产，可谓宽厚长者，务崇德化，政足尚矣。然与匈奴疏绝，毅然讲武，盖未尝不猛焉。宣帝综核名实，励精图治，流而至于苛刻，汉室忠厚之风几乎荡尽。明帝法度分明，幽枉必达，严足尚矣，而过于察察。章帝宽厚长者，而流于姑息。东京之政，由是而衰矣。亦其学术不明，不能损过就中，而

归于圣贤《大学》之道也。向若汉之文帝,从贾谊而兴礼乐,武帝从董仲舒而明教化,则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万民正而远近莫不一于正,则道之一原可知,治之全体可识,其治岂止于汉而已。迨夫宋之诸君能用诸儒,则经术之明,见于治效,岂独载诸传注而止哉!虽然,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承大一统文明之运,表章六经圣人之道,比隆于唐虞三代,正有待于今日圣天子居天位,行天道,而著治效于无穷也。

臣愚生浅学,叨奉大问于廷,获闻道本一原,治有全体,不胜踊跃,庆唐虞三代之治复见于今日,宁不顿首为天下贺!非但为天下贺,当为万世贺。抑臣闻之:为治之要,《大学》一书,治天下之格律也。时措之宜,《中庸》一书,圣学传心之要法也。此皆陛下身体而力行之者也,故能致笃恭而天下平之效。臣愚,学不能以博古,才不足以应变。伏愿陛下始终此心,始终此治,可以四三王,六五帝,岂但跨越汉唐宋而已哉!臣不揆浅陋,以此上尘圣览,干冒天威,岂胜战栗?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治理国家依据大道,而大道载述在儒家经典中。圣人出世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可以重新出现,真正的儒士出世而六部儒家经典所载述的大道就会非常明朗。儒家经典用来载述大道,原本就必定等待有合适的人物,然后才能明朗;大道用来拿出治理措施,更一定要等待有合适的人物,然后才能实行啊!只有伟大的皇帝陛下您,高居帝位,继承洪大的基业,光明照耀八方的边际,智慧覆盖住所有的事务,心地保存着圣帝明王的心地,治理继承着圣帝明王的治理,但仍忧虑有缺陷漏洞,往下面询问山野的村夫,这是圣贤喜好询问又喜好浅近言论的用意,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心地啊!然而教化已经普及了,仍然选择任用学校教官,严格督察功课学业,查出拙劣的生员、惩戒平庸的生员,奖励进取的人,劝勉向善的人,而学校的教育只会更严肃。养护百姓已经很充裕了,仍然免除他们的徭役,减轻他们的赋税,禁止对民众中哪怕一个人也不许随便让他服劳役,禁止哪怕一毫一厘也不许随便去征收,而搞好农业生产的国政更放在首位。谨慎对待刑罚,做到了

三次复审、五次复审，还考虑定罪判刑可能不准确。任用贤才，慎重对待荐举、考核的制度，还考虑授付官职可能不合适。这是陛下明了经术的纯正，深知帝王功业的宏大，对一般的治绩并不满足，一定要把当今社会带入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极盛境地啊！

激励社会风尚但却尚未达到良善和睦的地步，而社会风尚越来越不厚道，对此却构不成妨害；革除弊端但却尚未达到随教化而改变的程度，而弊端还没消除，对此也构不成妨害。臣下我很愚昧，但却有根据知道陛下所追求的太平盛世可以步入，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能够达到。激励社会风尚，革除弊端，确实不在政令之下。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陛下担负着奉应上天、承接时运的重任，统辖整个天下，从早到晚恭敬畏惧，而保存圣帝明王的用心，决不罢休。大道出自一个本原，治理具备在各项准则中。考察经典而把治理的最佳状态永远显示给后人，六经所阐述的大道固然已经蕴藏在圣上的心里了。比照起各部经典传授的正确与错误，历代治国的得与失，非常鲜明地区分开黑白来了。哪里还需要臣下我再啰嗦？尽管这样，怎敢不竭尽臣下我的愚昧无知，逐条来详尽地做对答呢！

自从六部儒家经典由孔老夫子删定传述，帝王的大道由此而非常清楚。自从六部儒家经典被汉代儒者穿凿附会，帝王的大治景象由此而难再现。《周易》是用来讲述阴阳变化的，伏羲、神农、黄帝的大道没有不包括在里面的。这部经典从汉初田何传授到焦赣、京房，这两人专门鼓吹卦象和数理，流衍而成为上天显示吉凶祸福的学说。这部经典从汉朝费直传授到三国曹魏的王弼，专门大讲义理，沦落而成为空谈名理。于是义理、象数划分开而《周易》的大道就不明朗了。《尚书》是用来讲述政事的，而典、谟、训、诰、誓、命这六种体裁的文辞全都具备。谈说需要明白和行用的，就有“惟精惟一”亦即精粹专一的格言来开示那起点；论述治理天下，就有《洪范》中的最高准则来穷尽那要领。自从西汉夏侯胜、夏侯建的解说不一致，而《尚书》的义旨就驳杂了。《诗经》是用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的，古代帝王命令乐官太师陈奏各地的诗歌来观察民间的风气。反映风气好的可以感动激发起人们的善心，歌颂它而百姓会知道所应劝勉的东西；反

映风气坏的可以惩戒人们的放纵思想，讽刺它而百姓会知道所应惩戒的东西。因此天子视察诸侯的辖区，对诸侯进行降职或提升。自从西汉齐人辕固生、鲁人申培公、毛亨、燕人韩婴解说《诗经》的宗旨各不相同，而《诗经》的本义就隐没了。《春秋》是用来讲述等级名分的，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理论，使仁义纯正、大道彰明和重视仁政、轻视暴力的主张，对《春秋》探讨所得到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但却竟又运用到天象谴告的变化上，推究阴阳顺序颠倒的原因，所以产生阳气闭塞、阴气放开的说法，而《春秋》的本义也就给弄错了。

《周礼》大司徒负责用吉礼等五礼防止民众诈伪，教导他们行为要符合规范。这正说明礼仪是用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的。还负责用古代的六种乐舞防止民众的情欲，教导他们要协和。这正说明乐舞是用来引导协和的。礼仪具有三千三百条大小规定，但却用恭敬做主导；乐舞具有五声、十二律，但却完全建立在协和的基础上。礼仪各项规定的详明而有所执持遵循，乐舞内容和形式的完备而有所感染激发。明悉礼仪来修养自身，就严整庄重，平和端正，邪恶的想法就没有缝隙钻进来。明悉乐舞来修养心性，就平易、正直、仁爱、诚实，卑鄙奸诈的念头就没缝隙生出来。把礼乐运用到各个封国上，各个封国就得到治理；把礼乐推广到全天下，全天下就会太平。这是六经所阐述的大道，旨归都一样而礼乐的运用却占据首位。《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的义蕴，必定要通过礼乐来显示出它们的作用。但北宋欧阳修却说夏商周以后，治理出自仁政和暴力两个方面，礼乐仅仅是徒有虚名罢了。这样看来，班固《汉书·礼乐志》所讲的礼乐运用占据首位，也并没有在实际推行上显现出来。

话说回来，六经所阐述的大道，还没在同一本原上归于一致，还有什么夏商周三代各项准则都贯彻的大治景象能够再现呢？这正是汉武帝推究阐明六经，废止百家学说，汉宣帝和东汉章帝在石渠阁·白虎观讲论六经的经义异同，尽管举措很好，但最后也没能遵循仁政的正路，结果归入暴力也掺杂进来。这是由于对六经所阐述的大道，搞不清它们出自同一本原，也就难怪他们的治理还存在着不纯粹的地方了。东汉光武帝亲自驾临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太学学生吹奏乐

器演唱《诗经》中的《雅》诗和《颂》诗。明帝参加辟雍的建成典礼，敬拜德高望重的老人，众位儒士手执经典，当面向明帝请教问题。他们的志意说起来尽管也很勤勉了，但未能恢复古代的盛况，不能够成为与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这三王并列的第四个王，不能够成为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并列的第六个帝，原因在于只是崇尚礼仪的细枝末节，未曾探究到圣人之道的根本。像唐太宗讨论经典，一直延续到深夜，下诏让颜师古考定五经，谋求大治的心意也可以称得上是很殷切了。然而仅仅能够收到一斗米三枚铜钱、百姓夜间不用关上大门的效果，还没有资格够得上天下大治。唐玄宗让侍读官每天轮流入宫，质正询问不清楚的经典大义，马怀素与谢无量两人不离左右，交替当班，这种喜好治理的心思也可以称得上宏伟了，而开元年间的治绩，接近太宗贞观年间的气象。只可惜没能够坚持到底，招来了安史叛乱的大灾难。这也都是因为对六经所阐述的大道，搞不清楚它们出自同一本原，也就难怪他们的治理还存在着达不到顶点的地方。待至五大行星聚集到奎宿天区，宋朝的德业隆盛，文运在这时振兴起来。周敦颐、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在前面阐发儒家的大道，杨时、罗从彦、李侗和朱熹又在后面阐明圣人的经典，这同以前的情况比较起来，就大不一样了。儒家的大道已经得到阐发，圣人的经典又重新被阐明，那么治国之道的优劣，同前代比较起来，无须再讲论评价也就很显然了。

天下不可改变的重大原则，是仁德道义、适中公正罢了。仁德用来化育万民，道义用来端正万民，二者并行而不相互违背。宽大但不演变成姑息，里面仍然有严厉存在；严厉但不倒向苛察，里面仍然有宽大存在。严厉而又宽缓，协和又有规则，这是自然的道理，也是治国之道的整个主体。汉文帝恭谨节俭，实行无为而治。对不按规定前来朝拜的诸侯王反而赐给床桌手杖，对接受贿赂的官员反而拿金钱送给他，营造露台痛惜要耗费掉十户中等人家的全年收入而作罢，可以称得上是宽厚长者，务必要崇尚仁德教化，国政足以让人效仿了。然而与匈奴疏远断绝，毅然讲求武力，也未曾就不讲严厉啊！汉宣帝全面验核名位与应尽到的职责，励精图治，但却走向极端，发展到苛刻，

致使西汉忠厚的风尚几乎自此一扫而光了。东汉明帝法度分明，疑案冤案必定要审断清楚，他那严厉足以让人推崇了，但却太丝毫不放过了。东汉章帝是宽厚长者的作派，但却演变成姑息。东汉的政治由此就衰落下去了。这也是他们学术不明，不能够减少太过分的因素，进入恰到好处的境地，归结到圣贤《大学》所讲论的大道啊！假设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兴用礼乐，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劝导，宣明教化，那么，董仲舒所讲的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端正帝王的心志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万民端正了，远近就没有任何地方不全端正了。由此就可以了解到大道的同一本原，明白治理的整个实体，而治理又哪里仅仅局限在他那汉朝的状态就算完了呢？等到到了宋朝的各个皇帝，能够任用众位儒士，于是经术大明，真在治理效果上体现出来，又哪里仅仅是解释经典具有成绩就算到头了呢？尽管这样，天运循环，周而复始。承接大一统而文德照耀天地的时运，表彰六经圣人的大道，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同样隆盛，正等待当今圣明的天子高居皇位，奉行天道，显现出治理的效果而没有止境啊！

臣下我是一个愚昧的书生和学问肤浅的人，有幸在殿廷承奉圣上的策问，从中听说了大道出自一个本原，治理具有各项准则，极其欢欣鼓舞，庆幸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在今天重新出现，难道不跪拜为天下人祝贺？不单单为天下人祝贺，应当为千万代祝贺。不过臣下我又听说，进行治理的纲要，集中在《大学》一书，它是治理天下的金科玉律。措置当今事务的合适做法，集中在《中庸》一书，它是圣人学问传授用心的紧要大法。这都是陛下身体力行的东西，所以能够达到诚实恭敬而天下太平的效果。臣下我很愚昧，学问不能博通古代，才能不足以应付变化，跪地祝愿陛下把这种用心坚持始终，把这种大法坚持始终，就可以成为与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这三王并列的第四个王，成为与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并列的第六个帝，哪里只是超越汉朝、唐朝、宋朝就算作罢了呢？臣下我不考虑自己浅陋，用这篇答卷来给圣上的阅览添了一层灰尘，冒犯了皇帝的威严，哪里经受得住那万分的恐惧？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林誌　殿试对策

林誌(1378～1427)　字尚默,号蒜斋,闽县(今属福建)人。永乐十年(1412)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右春坊右谕德兼侍读。于学无所不究,淡泊名利,常以诗文自娱。著有《蒜斋集》。

臣对:臣闻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其体用本于心。心也者,所以具是道之全体,而妙是道之大用者也。经天纬地,而有《易》、《书》、《诗》、《春秋》、《礼》、《乐》之文;弥纶恭赞,而为修齐治平之业。同此心则同此道也,同此道则同此治也。三皇以此而皇,五帝以此而帝,三王以此而王,孰有出于此心、此道之外哉?繇汉而唐,繇唐而宋,道固无异于先王之道,而心固无异于先王之心也。惟夫谈经者,不知斯道之本于心,故未免于支离而或滞。惟夫为治者,不知斯治之本于道,故未免于偏驳而未纯。然道之大原所以出于天,而其体用所以妙于心者,则万古犹一日也。举而行之,诚有待于圣人焉。

钦惟皇上,圣神文武,生禀自天,奉承宗社之隆,统御海宇之广,治定制礼,功成作乐。其讦谟远猷,固已妙斯道于一心矣。至于经有专门名家之学,士无党同伐异之评,庠序设而科目兴,考核精而黜陟当,既庶且富以阜其生,慎刑弼教以期于治,孰非此心之所著者乎?然化已浃矣,而庠序之教弥谨;养已充矣,而足食之政必先。五覆详谳,而犹虑夫刑之未尽清;立贤无方,而犹虑夫俗之未尽劝;三考黜陟,而犹虑夫弊之未尽革。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而首以夙夜祗畏、弗遑底宁为言。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造化於穆不已之诚也,即二帝三王纯亦不已之德也。臣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而其体用本于心者,即此也。

昔汉儒董仲舒有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何哉?盖三辰行天以为经,惟其常运也,故能久照而不已。五土分地而为义,惟其常生也,故能遍育而无穷。五性在人而为德,惟其常存也,故能兼治而不遗。此尧之所以兢兢日行其道,舜之所以业业日致其孝,

禹之所以惟日孜孜，汤之所以圣敬日跻，文王、武王之所以缉熙执竞者也。而陛下祗畏弗遑，图治及此，臣拜手稽首而为天下贺。

臣伏读制策曰：道本一原而治有全体。盖以六经之治本于道，六经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也？夫《易》以道阴阳，即此心之太极也。论其明于天之道则精，既有以通乎神明之德；论其察于民之故则粗，又有以类乎事物之情。自夫京房传焦赣之学，而分卦逐爻，配以灾异，于是专名数者，不过以淫巫瞽史而视《易》耳。自夫王弼宗老庄之学，而得意忘象，释以清谈，于是尚理致者，不过以虚玄浮华而语《易》耳。而我朝之为教也，一以朱熹《本义》为主，则崇卜筮者，既不流于胶固之陋；兼用程颐之《传》，则尚理致者，率得乎中正之归。而《易》之所载者，固此道也。《书》以道政事，即此心之皇极也。语夫知行之端，则有危微精一之数言；语夫经世之要，则有《洪范》九畴之大法。自夫沉酣章句者，"曰若稽古"殆三万言，于是呻其佔毕者，不过记诵词章之末而止耳。自夫讨论经制者，郊禘六宗牵合傅会，于是损益为治者，不过因仍苟且而止耳。而我朝之为教也，本于蔡沈《集传》，既得乎折衷之当；一以《会选》为正，又兼乎诸说之长。而《书》之所载者，亦此道也。

若夫《诗》之讽咏，所以道其志也，而实原于此心好恶之正。故先王采之于省方观民之时，于以施其劝惩黜陟之典。而我朝之为教也，惟朱熹《集传》是宗，则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参之列国以尽其变，正之于《雅》以大其规，和之于《颂》以要其旨。而其所以备观省、垂劝戒者，皆此道焉。《春秋》之笔削，所以道名分也，而实本于此心是非之公。然汉儒乃惑于灾异之说，创为阴阳纵阴之论。而我朝之为教也，惟程颐、胡安国《传》义是取，则大义数十，昭如日星。而惟时措之义为难知，惇典庸礼，命德讨罪，尤莫严于尊中夏，攘夷狄，而其所以假鲁史、寓王法者，无非此道焉。

至于大礼与天地同序，形而为礼经之三百，散而为威仪之三千，而其原于此心之敬者，则至约也。大乐与天地同和，播而为五声、十二律、八十四调之节奏，著而为《云英》、《咸》、《韶》、《夏》、《濩》、《大武》之声容，而其本于此心之和者，则至简也。故夫《易》以道乎礼乐

之原,《书》以道乎礼乐之实,《诗》以道乎礼乐之志,《春秋》以道乎礼乐之分。班固所谓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者,其以此欤?而我朝之制礼也,原于庄敬之心,而将之以玉帛登降之数,则以之而辨上下、定民志者,是即子思所谓有德有位而议礼、制度、考文者焉。我朝之作乐也,本于和乐之心,而文之以钟鼓缀兆之仪,则以之而荐上帝、配祖考者,是即倪宽所谓惟天子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金声而玉振之者焉。然则礼也乐也,岂非同此道乎!然此皆原于陛下一心精微之所萃,一念祗畏之所存。心和则气和,气和则形和。八风从律,沴气不作。泰和之浹,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彼汉武之推明六艺,罢黜百家,孝宣之石渠,孝章之白虎,讲议异同,行虽美矣,而不免于杂伯之讥。光武之投戈讲艺,雅歌击磬,明帝之临雍拜老,执经问难,志虽勤矣,而徒见于多仪备物之详。臣以谓此无他,徒泥于六艺之文,而不求乎六艺之道故也。彼唐太宗之讨论文义,考定五经,可谓劳矣,而贞观之治,大纲未正。明皇之更日侍读,质问疑义,可谓伟矣,而开元初政,鲜克有终。臣以谓此无他,徒知求治于经,而不知求治于道故也。迨夫宋有天下,五纬聚奎。仁义之所洽者,上焉而有四圣百年之治平;元气之所培者,下焉而有濂洛诸儒之道学。圣经由是而明,儒道由是而阐。此固足以四三王而六五帝矣。惜也其大纲虽正,而万目亦有未尽举焉。臣以谓六经之道虽明于时,而六经之治犹愧于古也。

夫为治之道,离合之数,虽出于天,而变通之宜,则由于人。臣谨按邵雍《皇极经世书》,蔀元会运世而推生消升降之运,以皇、帝、王、霸而赅《易》、《诗》、《书》、《春秋》之用,有以知夫道有升降,而操纵之宜不易,政由俗革,而宽猛之中为难也。观于汉文,承疮痍甫瘳之时,宽厚长者以德化民,而海内富庶,几致刑措,可谓盛矣,然于礼乐有所未遑。宋儒唐俭谓其大醇小疵,是其宽,固未为得也。若夫孝宣严明为治,信赏必罚,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固宜中兴,比迹殷宗、周宣矣。然法制过详而道德不足,高文忠厚之意斫丧无余,其所谓猛,亦岂为得乎?观于明帝,席光复护物之业,法令分明,幽枉必达,而远近肃服,海内滋殖,可谓至矣。然未免过于察察,史臣范晔谓其

弘人之度，有所未优，则其猛，固失之过也。若夫章帝，事从宽厚，号称长者，除惨刻之科，著胎养之令，诚若优于前人矣。然厌为苛切而宽纵或过，外戚浸横而汉业终于不振。而其所谓宽，岂非失之过乎？臣以谓操纵之宜不易，而宽猛之中为难者，此也。

先王之治也，修五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本于《易》以为出治之源，参于《书》以尽为治之实。《诗》以道其志，而家无殊俗；《春秋》以道其分，而国无异政。履之为礼，而中正之教达焉；播之为乐，而和乐之情通焉。故合六经以为教，同天下以为风，而其所以原于天而妙于心者，亘万古而不变也。然此皆陛下之所以真积力行者，道已至矣，而心犹恐未至；皆陛下之所以祖述宪章者，治已洽矣，而心犹虑未洽。臣愚以谓六经之治本于道，六经之道本于心者，为治全体，端在此矣。彼区区宽猛得失之论，讵可为盛世陈哉？

凡陛下所以策臣者，臣既略陈其概矣。然臣窃闻之：六经之治本于道，而道之所在，不越乎中；六经之道本于心，而心之所存，不越乎敬。故敬之一字，圣学之所以成始而成终者也。是即制策所谓夙夜祗畏、弗遑底宁之盛心焉。故以是心而谨庠序之教，即《诗》所谓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是也，奚有于化之未尽洽乎？以是心而先足食之政，即《书》所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者是也，奚有于养之未尽充乎？以是心而详五覆之奏，即《易》所谓明慎用刑是也，奚有于刑之未尽清乎？至于求贤而荐举，必备乎此心之制，即《礼》所谓论定而后官之，任官而后爵之者也。名器益重，而国无不励之俗矣。考课而黜陟，必本于此心之严，即《春秋》善善之褒荣于衮冕，恶恶之贬威如斧钺者是也。殿最既明，而官无或旷之弊矣。惟陛下始终此心，则以之而四三皇，以之而六五帝，以陋汉唐宋于下左，以跻海宇于泰和之治，安宗社于磐石之固者，尽在此矣，天下不胜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而它那准则和实施运用又依据心地。心地是具备这种大道的所有准则和使这种大道全面施用得非常神妙的那个东西。措置天地，而有《周易》、《尚书》、

《诗经》、《春秋》、《礼经》、《乐经》的文字表述；弥补牵引，恭敬辅助，形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业。这种心地相同，那就会这种大道也相同；这种大道相同，那就会这种治绩也相同。伏羲、神农、燧人这三皇依靠这一点而建立起称得上“皇”的德业，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凭借这一点而建立起称得上“帝”的德业，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这三王仰仗这一点而建立起称得上“王”的德业，他们中有谁超出这种心地和这种大道以外了呢？由汉朝到唐朝，由唐朝到宋朝，大道压根就与古代圣帝明王的大道没什么两样，心地也压根就与古代圣帝明王的心地没什么两样。只是谈说儒家经典的人，不明白这种大道依据心地，所以不免支离破碎而有的还墨守成说。只是治理国家的人，不清楚这种治理依据大道，所以不免驳杂而未能纯正。但是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它那准则和实施运用特神妙全在心地的缘由，千秋万代也犹如同一日啊！全面贯彻推行它，确实要等待圣人来出世。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上圣明神奇，有文有武，生下来就从上天承受了这些禀赋，奉应神灵和继承祖宗的大业，统辖驾驭整个天下，政治安定以后制定礼仪，功业建成以后创作乐舞。那些重大的筹划和长远的谋略，原本就已经在纯一的心地中神妙运用这种大道了。至于儒家经典具有各治一经、成为著名专家的学术格局，读书人不存在维护同一派别、攻击其他派别的评议。各级学校都建立起来，科举考试等选才方式也很兴盛。对官员考核精确，升降处置也很恰当。人口众多又财物富足，来使平民的生活更宽裕。慎重对待刑罚，辅助教化，来期待达到大治。这一切，哪项不是这纯一心地所推及而显扬出来的呢？然而教化已经普及了，对各级学校的教育更加重视；养护百姓已经很充裕了，而搞好农业生产的国政必定优先考虑。通过五次复审仔细判案，却仍忧虑刑罚还没完全清正；树立贤德没有固定的方式，却仍忧虑社会习尚还没完全激励起来。九年对官吏考核三次，决定罢免或提升，但仍忧虑弊病还没完全革除。于是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颁赐下清晰详明的询问，一开篇就说从早到晚恭敬畏惧，顾不上片刻安宁。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这纯一心地，也就是天地那种创

造化育深远无穷的诚意啊!也就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纯正没有止境的德行啊!臣下我所讲的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它那准则和实施运用依据心地,也就指的这一点哪!

从前西汉儒者董仲舒有句话说: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天不改变,大道也不改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日月星在天运行构成定律,只因它们永远运行,所以能够长久照耀而无穷无尽。五种颜色的土壤在大地分布构成适宜的土质,只因它们永远生长出东西来,所以能够普遍化育万物而没有上境。仁义礼智信在人身上构成德性,只因它们长久存在,所以能够同时修养而不遗漏。这就是唐尧谨慎地每天都推行他那大道的原因,虞舜畏惧地每天都献上他那孝顺的原因,也是大禹每天都勤勉不怠、商汤圣明恭谨每天都增进、周文王与武王学问大放光明和自强不息的原因。而陛下恭敬畏惧,顾不上安宁,谋求治理触及到这一点,臣下我行礼又叩头来为天下做庆贺。

臣下我跪拜敬读制策中说:大道出自一个本原,而治理具有完整的准则。这是因为六经的治理措施依据大道,六经的大道依据心地。找准了那心地,大道与治理就可以提上日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周易》是用来讲述阴阳变化的,这部经典就是这心地的原始本原啊!讲论它明了天道,就特精微,确有理由通达神明的盛德;讲论它洞察民众缘故,就很粗略,又有理由区分开事项和万物的情状。自从西汉京房承传焦赣的学说,而区分六十四卦,每一爻都配合上奇异天象所显示的吉凶祸福,于是专门鼓吹卦象和数理的人,不过用淫滥的巫师、瞎眼的史官那一套来看待《周易》罢了。自从三国曹魏的王弼崇奉老子、庄子的学说,获取到《周易》的义旨,却忘掉了卦象,用空谈名理来做解释,于是崇尚义理的人,不过拿玄虚浮华那一套来讲说《周易》罢了,而我朝进行教导,完全用朱熹的《周易本义》作主导,这样一来,推重占卜算卦的人,不陷入不做变通的浅陋状态。同时采用程颐的《易传》,这样一来,崇尚义理的人,全都获取到适中纯正的旨归。其实《周易》所载述的,原本就是这大道啊!《尚书》是用来讲述政事的,这部经典就是这心地的最高准则啊!谈说起需要了解和施行的问题的起点,就有人心危险、道心微妙、必须精粹专一、执守住适中尺度这样

的四句话;讲论起治理国家的要领,就有《洪范》所开列的九种根本大法。自从沉迷在经书解释中的人,对《尚书》中"曰若稽古"四个字就做了将近三万字的解释,于是照着书看只知念个不停的人,不过是从事背诵文章这类最低劣的学问就算到头了。自从讨论典章制度的人,对《尚书》中祭祀天地和六宗的大礼做牵强附会的解说,于是加以增减来施行治理的人,不过沿袭一通、糊弄局儿就算罢休而已。而我朝进行教导,依据南宋蔡沈的《尚书集传》,获取到无所偏执的恰当之处;全部用太祖命人编修的《书传会选》作标尺,又把各家的长处包括进来。其实《尚书》所载述的,也正是这大道啊!

至于《诗经》的讽诵吟咏,目的是表达思想感情,但实际上又来自这心地喜好什么、憎恶什么的正确标准。所以古代的圣帝明王在视察各地、考察民风的时候采集诗歌,用来施行激励惩罚、免职升官的制度。而我朝进行教导,只是崇奉朱熹的《诗集传》,依据《周南》、《召南》来探求教化的起始状态,参考其他封国的民歌来穷尽那变化的情形,取正《雅》诗来扩大那规制,应和《颂》诗来究明那主旨。而《诗经》用来考察民俗作参考,给人留下劝勉和鉴诫的东西,也都是这大道啊!《春秋》经过孔子的修订,是用来讲述等级名分的,但实际上又来自这心地是对是错的公正尺度。但汉朝儒士被上天有谴责就天象异常的说法所迷惑,首次提出阳气闭塞、阴气放开的论断。而我朝进行教导,只是取用宋朝程颐《春秋传》、胡安国《春秋传》的解说,于是数十条重要义旨都像太阳和星辰那样明显,而唯独措置当今事务的合适做法是难搞清楚的,对此就标揭出其中的要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伦理关系淳厚,推行天子、诸侯、大夫、士、平民这五种人的礼法,表彰贤德,惩罚罪人,更强调没有什么能比尊奉华夏、排斥异族更严切的了,而《春秋》借助鲁国国史寄寓天子大法的意图,也没有一项不是这大道啊!

至于重大的礼制与天地的次序一个样,集中起来构成礼法三百条,分散开来构成礼仪细节三千条,但它们出自这心地虔敬的东西,就显得最为精确了。盛大的乐舞与天地的协和一个样,播布开来构成五声、十二律、八十四调的节奏,显现出来构成黄帝乐舞《云英》、尧的

乐舞《咸池》、舜的乐舞《大韶》、夏禹乐舞《大夏》、商汤乐舞《大濩》、周武王乐舞《大武》的场面。但他们出自这心地协和的东西，就显得最为简要。所以《周易》引导出礼仪乐舞的本原，《尚书》引导出礼仪乐舞的实体，《诗经》引导出礼仪乐舞的感情，《春秋》引导出礼仪乐舞的等级。东汉班固所说的六经大道目标一致，而礼仪乐舞的运用占据首位，恐怕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吧？而我朝制定礼仪，出自庄重诚敬的心地，依从玉器币帛进献和撤下的数目，用来区分上下、稳定民众思想的做法，也就是孔子的贤孙子思所讲的：具有仁德并拥有最高统治权力，才能议定礼仪，制定品级，考定文字。我朝创作乐舞，出自和协欢乐的心地，用钟鼓和乐队排列的仪式来做点缀，用它来献呈给上帝、配合祖宗的做法，也就是西汉倪宽所讲的：只有天子建立适中与协和的最高准则，会合统揽，条理贯穿，先撞钟表示开始，后击磬宣告结束。既然如此，那么礼仪乐舞，难道不与这大道是同一个吗？但这些都出自陛下纯一心地的荟萃和敬畏之念的长存。心地平和，气流就平和；气流平和，形体就平和。全年八方之风按节气吹来，阴阳失调的不祥之气不兴起，太平和乐的融洽景象，就有不期待那样而就那样的了。

汉武帝推究阐明六经，废弃诸子百家学说。汉宣帝在石渠阁、东汉章帝在白虎观讲论经义异同，这些举措固然很好了，但却没免掉夹杂暴力的讥刺。东汉光武帝放下武器，讲求经术，太学学生为他吹奏乐器演唱《诗经》中的《雅》诗和《颂》诗。东汉明帝到辟雍主持落成典礼，尊奉德高望重的老人，众儒士手执经书向他当面求教。他们的志意尽管很勤勉了，但却仅仅表现在仪式繁多、器物完备的细节上。臣下我认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死死抱住六经的文字表述，却不探求六艺所阐述的大道的缘故啊！唐太宗讨论经文的义旨，考定五经正文，可以称得上是很辛劳了，但贞观年间的治理局面，大纲却没端正。唐玄宗让人每天轮流侍读，质正询问经典的疑义，可以称得上是宏伟了，可开元初年的贤明政治，却没有保持到最后。臣下我认为这没有别的原因，而是仅仅知道从经典中去寻求治理，却不清楚从大道去寻求治理的缘故啊！等到宋朝拥有天下，五大行星会聚在奎宿天区。仁

义所融汇的地方，在上面出现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时期长达百年的太平治理；元气所培育的东西，在下面产生了周敦颐、程颢和程颐等儒士的道学。圣人的经典由此而明晰，儒家的大道由此而得到阐发。这固然就足够用来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这三王并列而成为第四个王，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并列而成为第六个帝了。只可惜宋朝大纲尽管端正，而朝政万目还没有全部张布开来。臣下我认为六经的大道虽然在当时得到阐明，但像六经所讲的治理状况在宋代仍然比不上古代。

进行治理的大道，离散聚合的定律，虽然出自上天，但变通的合适对策，却由人来决定。臣下我恭谨地考察，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从天地一元十二会、一会三十运，一运十二世、一世三十年来推论生长、消亡、上升、下降的周期过程，用皇道、帝道、王道、霸道来统括《周易》、《诗经》、《尚书》、《春秋》的应用，从而有根据地明了大道存在着升降，而操纵的适宜方法并不容易；国政经由习俗得到改变，而宽大与严厉的适中尺度掌握起来很困难。考察那汉文帝，承接在各种社会创伤刚刚得到医治的时期的后面，以宽厚长者的姿态，用仁德化导百姓，而全国富庶，几乎达到刑罚搁起来不动用的地步，可以称得上兴盛了，但对礼乐制度，还没顾得上。宋朝儒士唐俭，认为汉文帝总体上挺好，可还有点儿小毛病。这说明他的宽大政纲，原本上还没做到恰如其分。至于汉宣帝，用严明进行治理，该奖赏的确实奖赏，应惩罚的必定惩罚，政事、文章、司法方面的官员，都对各自的事务很精通，固然应使汉朝由衰落走向振兴，追比殷高宗、周宣王了。但法制过于详明而道德不足，汉高祖和文帝忠厚的心意，伤耗得一点儿也没剩。他所讲论的严厉，哪里够得上恰到好处呢？观察东汉明帝，铺设下恢复原有统治、护守朝仪文物的大业，法令分明，疑案冤案必定审断清楚，而远近整肃畏服，天下人口增长，物资增多，可以称得上最好了。但不免过于丝毫都不放过了，史臣范晔说他宽待人的器度，还存在不太好的地方。这样看来，他的严厉，毛病固然出在太过火上了。至于东汉章帝，处理事情都按宽厚办，号称长者。废除掉残酷苛刻的朝廷规定，宣布赐给孕妇粮食的诏令，确实超过前人了。但厌恶苛刻严

切而宽大纵容却有的地方做得太过分,致使后妃家族的人逐渐骄横而东汉的帝业终于衰败。而他所讲论的宽大,难道毛病不是出在太过头了吗?臣下我认为操纵的适宜办法并不容易,而宽大与严厉的适中尺度掌握起来很困难,就指的是这类情况。

古代圣帝明王治理天下,修明婚、丧等五种礼仪来节制百姓的性情,宣明父子、君臣等七种人伦关系来兴起百姓的德行,统一制定饮食、衣服等八种日常生活规则来防止奢侈,使道德一致、社会习俗都相同。依据《周易》作为拿出治理措施的本源,参照《尚书》完全达到进行治理的实效。《诗经》用来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而家家没有不同的习尚;《春秋》用来讲述等级名分,而诸侯各国没有不同的朝政。按规范去做成为礼仪,而适中平正的教化就普及了;播扬开来成为乐舞,而平和欢乐的感情就疏通了。所以会合六经构成教化,使天下都一致形成风气,而那出自上天又在内心神妙运用的东西,历经千秋万代也不会改变。然而这都是陛下用来真诚积聚、大力实行的,大道已经达到顶点,可内心还害怕尚未达到顶点;这都是陛下用来仿效取法的,治理已经很协调了,可内心还忧虑尚未协调。臣下我很愚昧,认为六经所载述的治理来自大道,六经所包含的大道来自心地。进行治理的所有准则,的确就在这一点上了。那些微不足道的宽大与严厉互有得失的论调,怎么可以为太平盛世再做陈述呢?

陛下用来策问臣下我的全部问题,臣下我已经大略陈述那梗概了。不过臣下我私下还听说:六经所载述的治理来自大道,而大道所在,不超出恰到好处这一原则;六经所包含的大道依据心地,而心地留存,不超出恭敬的范围以外。所以"敬"这一个字,是圣人学问中开始能形成又最终能成功的来由。这也就是制策中陛下所讲的从早到晚恭敬畏惧、顾不上安宁的盛大用心。所以凭借这种用心来更重视各级学校的教化,也就是《诗经》上所说的:成年人有道德,年轻人有造就。这哪里还存在教化仍未全部普及的现象呢?凭借这种用心而把农业生产的国政放在首位,也就是《尚书》上所说的:仁德只体现上美好的朝政上,而美好的朝政在于养护民众。这哪里还存在养护仍未完全充裕的现象呢?凭借这种用心而仔细审断五次复审的结果,也就是

《周易》上所说的：严明谨慎地动用刑罚。这哪里还存在刑罚仍未完全清正的问题呢？至于求取贤才，施行荐举，一定要完善起这种用心起支配作用的制度，也就是《礼记》上所说的：你得出考查结论后再让他担任官职，担任官职以后再赐给他爵位。官爵名位越贵重，而全国就没有不劝勉的风气了。考核官员政绩进行升降处置，一定要根据这种用心的严明，也就是《春秋》的那种作用：对认为是好的人和事加以赞扬，而这种赞扬超过官服官帽加身；对认为是坏的人和事加以贬斥，而这种贬斥超过刑具加身。谁属上等谁属下等已经分明，而官员就不会存在有的荒废政事的弊病了。陛下只有把这种用心贯彻始终，凭这一点而与伏羲、燧人、神农这三皇并列而成为第四个皇，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并列而成为第六个帝，使汉朝、唐朝、宋朝在下面左方大为逊色呆着去，把整个天下带入太平和美的大治状态，使宗庙社稷像磐石一样稳定牢固，全都在于把那用心贯彻始终了，而天下也简直幸运到极点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王钰　殿试对策

王钰（生卒年不详）　字孟坚，诸暨（今属浙江）人。永乐十年(1412)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后因病退休。英宗正统年间，起为按察签事，提督学政。为人践履笃实，长于文学，所到之处深被士子学人所敬服。

臣对：臣尝论天下之至治，当用天下之真儒。得真儒以用世，则俗日以厚，弊日以革，六经之道大阐，为治之道得宜，又何患乎世不跻于雍熙泰和也哉！钦惟皇帝陛下，嗣大历服，宵旰求贤，以图治道，是以四海宁谧，万方乂安。而犹不自满假，进臣等于廷，策臣以为治之要，时措之宜，而且道之以夙夜祗畏、弗遑底宁之语。臣是以知陛下图治之心，即尧舜兢兢业业之心也，汤文昧爽丕显、望道未见之心也。臣虽愚昧，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圣天子之休命乎！

臣尝闻之，为治在不多言，顾力行何如耳。陛下自临御以来，致

治之道,一遵成宪。虑教化未洽,则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虑民食未足,则授之以东作西成之候,示之以厚本抑末之道。刑至五覆,罪过三讯,公荐举而严考课,其力行可谓至矣。蔼蔼吉士,布列庶位,儒道可谓亨矣。然厉俗而俗益偷,革弊而弊不寝之言,尚廑陛下之问,臣谨以用真儒为陛下劝焉。且真儒之用世,犹元气之在四时。以之掌教,则教化明;以之养民,则民食足;以之掌刑,则刑罚清。然而欲得真儒之用,在乎崇学校、选师儒以教之,使如安定之在湖学,人各精其所能。及令有官君子,各举所知之人。仍严举主之令,举能其官者褒之,称非其人者罚之,考其殿最,以行黜陟。如是则人怀劝功励行之心,而以举贤荐善为务。将见真儒辈出而为朝阳之凤,世底雍熙而有唐虞之风。又何患乎俗不淳,弊不革,六经之道不明于天下乎?

夫六经者,皆所以著帝王为治之迹也。《易》以道阴阳,明吉凶消长之理。炎汉诸儒,不能契圣经之旨,或专于名数,或尚夫理致。如京房、王弼之徒,往往流于灾异,沦于清谈而不悟也。《书》所以道政事,载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语知行,则精一之旨有以示其端;论经世,则《洪范》一篇足以尽其要。至于《诗》,所以言志也,陈之可以观民风,听之可以察治忽。故《诗》三百,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因其诗之美刺,知其俗之美恶,故可以陈之于劝惩黜陟之典。《春秋》之褒贬义例,断自吾夫子之一心,无非所以明君臣上下之伦,正冠履倒置之势。闭阳纵阴之说,未免沦于巧谬,责备贤者,不能无憾于仲舒焉。然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盖礼者,天地之序,圣人之所履;乐者,天地之和,圣人之所乐。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者,此也;所以荐宗庙而和民声者,此也。人之一身,不可斯须去者,非其急乎?

且六经之道本一原,圣人之治有全体,奈何一煨烬于秦火,再穿凿于汉儒?六经之道晦,而政治亦由是而衰矣。是以如汉武之雄才大略,表章六经,善董子之对,而罢申韩之学。孝宣之时,广集诸儒,讲五经异同于石渠阁。章帝仿石渠故事,诏博士诸儒,会议五经于白虎观。其行可谓美矣,惜不得真儒是讲明,是推行,故终归于杂而已耳。

光武中兴，好尚儒术，使桓荣授太子经，会博士论难于前，诏诸生雅歌击磬。明帝尊师重傅，临雍拜老，诸儒执经而问难，缙绅圜桥门而观听。其用心非不勤也，然谶纬大行，躬行无法，此东都之治，所以卒不古若也。下逮李唐，太宗以不世出之资，慨然以学古为务。《周礼》一书，拳拳于乙夜之读；礼乐之作，孜孜惟房、杜是问。开弘文馆，日引杜如晦等讨论文籍，令颜师古等考定五经。玄宗开元之初，励精政治，选文学之士为散骑常侍，更日侍读，质问疑义。若二君者，其心可谓劳矣，其事可谓伟矣。然以许敬宗之奸邪，而厕登瀛之列；李林甫之邪佞，而负鼎鼐之重。治至小康，亦云幸矣。有宋隆兴，五星聚奎，文风大振，关洛诸儒，后先相继，六经之道昭乎如离明丽空，焕然若云霞散彩，皦皦乎不可尚已，岂汉唐诸儒所可拟伦哉？惜其真儒不见用，所用非真儒。独一司马温公，以道学君子，用辅佐之功，然不终相业。此宋之所以止于宋，而不能肩于唐虞者，职此之故也。

且为治之道，在乎宽猛得宜。若汉之文帝，承吕氏扰乱之余，而能与民休息，专务以德化民。吴王不朝，赐以几杖；张武受赂，金钱愧心。其宽厚之政，诚可谓得济猛之道矣。言者谓其不若孝宣之严明者，正以其宽厚过甚，如养薄昭之恶，以陷杀身之罪者是也。中宗继孝昭之后，而以严明为治，责许、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用恭、显而启元帝之信宦官。杨、韩之戮，赵、盖之诛，而启哀帝之杀大臣。开三大衅，终以亡国，此则严明之过也。东汉明帝，法令严明，幽枉必达。永平之间，吏事深刻，以人主之尊而有撞郎之怒，则其严之过，可知矣。章帝厌明帝苛切，每事务崇宽厚，然宠任窦宪，东汉外戚之祸，实基于此，则其宽之过，又可知矣。两汉之君所以宽过于宽、猛过于猛者，以不得真儒为之辅也。使其得真儒以为用，则宽所以济猛之过，严所以济宽之不及，岂若是之倚于一偏也哉？

《书》曰克宽克仁，《诗》曰不刚不柔。为治之道，盍鉴于兹可也。然治道之要，非博通经史、识达时务者，乌足以应变？顾臣微陋，不自揣量，妄意始终以用真儒上渎天听者，诚以汉唐不得真儒，故六经之道晦；宋得真儒，故六经之道显。真儒之用舍，实理学显晦之所关，而政之宽猛，亦因斯而可论矣。臣愚，不能知为治之要，不能适时措之

宜,惟愿陛下日延真儒,讲论治道,如宋仁宗之日开天章阁,给臣僚之纸笔,使疏太平之策,使通下民之情,将见皋夔、稷契、尹傅、周召比肩于朝,治效之盛,超汉唐宋而比隆虞周矣。臣不胜拳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曾经论证天下大治要达到极点,就应当任用天下的真正儒士。获得到真正的儒士去治理天下,就会社会习俗一天比一天淳厚,弊病一天比一天得到革除,六部儒家经典所包含的大道非常明晰地被阐发出来,进行治理的原则与方法恰到好处,还担心什么当今社会不进入和美欢乐、太平协调的状态呢?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继承帝位,早起晚睡求取贤才,谋求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因而天下宁静,各地安定。但仍不自我满足,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进行治理的纲要、处理当前事务的合适做法策问臣下我,并且讲出从早到晚恭敬畏惧,根本顾不上安逸的话语。臣下我由此知道陛下谋求大治的用心,也就是唐尧、虞舜兢兢业业的用心,商汤和周文王黎明即起、致力声名显赫、盼望大道却好像仍未看见的用心啊!臣下我尽管愚昧,怎敢不满心一片纯洁,来对答称扬圣明天子的美好命令呢!

臣下我曾经听说,进行治理在于不多讲论,只管去大力施行得怎么样罢了。陛下自从统治天下以来,实现大治的办法,完全是遵用已有的成功范例和法规。担心教化没有普及,就更重视各级学校的教育,申明孝敬父母、兄弟友爱的义理。担心民众的衣食还不充足,就向他们颁布春耕秋收的历法,宣布重视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活动的政策。定罪判刑做到了五次复审,予以惩罚慎重得超过了三番审讯。公正地实行荐举,严明地进行考核,在大力施行上可以称得上是做到家了。济济一堂的读书人,分布在各个职位上,儒家的大道可以称得上是亨通了。然而激励社会风尚可社会风尚却越来越不厚道、革除弊病可弊病却不消失这类话,还烦劳陛下发问,臣下我恭谨地拿任用真正的儒士来为陛下做劝勉。况且真正的儒士被世上所任用,就像元气凝结在春夏秋冬四季中。让他们掌管教化,教化就大明;让他们去养护百姓;百姓就衣食充足;让他们掌管法律,刑罚就清正。然而

要想获得到真正儒士的任用，在于重视学校，选择教官去教诲他们，让他们就像北宋胡瑗在湖州州学那样，人人都对各自的本行特精通。以及贵成身任官职的君子，分别荐举所了解的人。同时严格施行荐举人的有关法令，所荐举的人能够胜任的，就奖赏荐举人；不能胜任的，就处罚荐举人。考核谁属上等，谁属下等，来进行职位升降。这样做，就会人人怀有争立功劳、勉励自身言行要端正的心思，把荐举贤人、推选好人作为该做的事情。这就眼看着真正的儒士成批涌现，成为朝阳晨鸣的凤凰，当今社会差不多就进入和美欢乐的状态而有唐尧虞舜时代的风气了。这还担心什么习俗不淳厚，弊病不革除，六经的大道不在全天下特明晰呢？

儒家的六部经典，都是用来显示帝王进行治理的轨迹的。《周易》用来讲述阴阳变化，宣明吉凶消长的原理。汉朝的各个儒者，不能心领神会圣人经典的主旨，有的一门心思鼓吹卦象和数理，有的只推崇义理旨趣。如西汉的京房、三国曹魏的王弼这些人，解说《周易》往往陷入天象显示祸福，或者沦落成空谈名理却不醒悟。《尚书》用来讲述政事，记载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治理天下的重要原则与基本措施。谈说需要了解和施行的问题，精粹专一这种宗旨就确有理由开示那第一步；讲论治理国家，《洪范》整篇文字就足以包括那全部纲要。至于《诗经》，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演唱它可以观察民间的风尚，聆听它可以觉察出治乱的情况。所以《诗经》三百篇，其中反映风尚良好的可以感动激发起人们的善心，反映风尚恶劣的可以惩戒人们的放纵思想。根据诗歌所颂扬、所讽刺的对象，就能了解当地风尚的好坏，因而可以把它列入对官员劝勉惩戒、进行升降的法典中。《春秋》关于褒奖贬斥的用意和笔法，由我们孔老夫子的圣心所裁断，都是用来宣明君臣上下的固有次序，扭转头脚倒放的态势。而阳气闭塞、阴气放开的说法，不免陷入巧辩荒谬。据此责备贤人，不能对西汉董仲舒不感到遗憾。然而六经的大道目标一致，礼仪乐舞的运用却占首位。因为礼仪代表的是天地的次序，属于圣人所实行的东西。乐舞代表的是天地的协和，属于圣人所感到欢乐的东西。用来区分上下等级、稳定住百姓思想，靠的是这个。用来祭

祀宗庙、使百姓音声协和，靠的是这个。在人身上片刻地离不掉它们，不正是它们要占首位吗？

况且六经的大道出自一个本原，圣人的治理具有整个原则，但无奈六经先被秦朝焚烧化成灰烬，又被汉朝儒士穿凿附会了。于是六经的大道变得昏暗不明，而政治也因此就衰落了。所以像汉武帝那样雄才大略，表彰六经，认为董仲舒的对策很正确，罢斥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汉宣帝时期，广泛召集各派儒士在石渠阁讨论五经经义的异同；东汉章帝仿照石渠阁的先例，下达诏令，让担任博士官的各派儒士，在白虎观集体讨论五经。他们的这些举措可以称得上是很美好了，只可惜没得到真正的儒士就此而讲论明白，就此而推广施行，所以到最后归入夹杂暴力就算完事罢了。光武帝使汉朝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喜好并推崇儒家的治国理论，让桓荣向太子讲授经典，集合博士官当面相互辩论，命令太学的学生吹奏乐器演唱《诗经》中的《雅》诗和《颂》诗。东汉明帝尊敬和推重师长，亲自到辟雍主持落成典礼，敬拜德高望重的老人，各个儒士手执经书向他请教，士大夫环绕辟雍桥门站得满满的来观看聆听。他们的用心不是不勤勉，然而，编造预言和用神灵怪异解说经典的那套玩艺十分盛行，他们身为皇帝也亲自提倡，没有准则，这是东汉治绩最终也比不上古代的原因啊！后来到了唐朝，唐太宗凭借隔过许多年代才会出现的卓异天资，慨然把学习古代作为下大力量去做的事情。《周礼》这部经典，在夜晚阅读一直不放松；有关礼仪和乐舞的创制，孜孜不倦地只是一个劲儿地询问房玄龄和杜如晦这两位宰相。开设弘文馆，每天召请杜如晦等人讨论典籍，命令颜师古等人考定五经正文。唐玄宗在开元初年，对政治十分用心，选择学问渊博的人担任散骑常侍，每天轮流让他们侍读，质正询问闹不清楚的经义。像这两位皇帝，他们的用心可以称得上是很辛劳了，他们的事迹可以称得上是很宏伟了。然而就就凭许敬宗那种奸邪，却让他进入了弘文馆十八学士的行列。就凭李林甫那种邪恶逢迎，却让他当上了宰相，贞观和开元年间的治理达到了一般地步，也可以说是很幸运了，宋朝隆盛兴起，五大行星会合在奎宿天区，文风大振，张载和程颢、程颐等各位儒士，先后递相涌

现出来。六经所包含的大道，鲜明得就像太阳悬挂在天空正中，明亮得就像云霞散布开光彩，浩大广远，简直无法赶得上，哪里是汉朝和唐朝各个儒士能够比拟的呢？只可惜当时的真正儒士不被任用，被任用的人又不是真正的儒士。只有一个司马光凭仗他真是道学君子，被授予辅佐皇帝的重任，可是却没完成宰相的事业。宋朝之所以只是做到它宋朝那个样，却不能和唐尧虞舜时代相提并论，就因为这个缘故啊！

况且进行治理的策略，在于宽大和严厉结合得特别好。像汉文帝承接吕后家族要篡位夺权之后，但能让百姓休养生息，专门致力于依靠仁德教化百姓。吴王刘濞不按规定到朝廷拜见，却赐给他床几手杖；官吏张武接受贿赂，却送给他金钱，让他内心感到惭愧。汉文帝的宽厚国政，确实可以称得上是获取到用宽厚来补充严厉的准则了。但评论的人认为他比不上汉宣帝的严明，正因他宽厚得太过分，像纵容舅父、车骑将军薄昭干坏事，致使他陷入死刑的罪名，就是一例。汉宣帝在汉昭帝之后继位，而把严明看成是真能进行治理。但命令许延寿、史高辅政，就给汉成帝重用后妃家族的人开了先例；任用弘恭、石显处理中书政务，就给汉元帝信任宦官开了先例；光禄勋杨恽和左冯翊韩延寿的被斩杀，京兆尹赵广汉和司隶校尉盖宽饶的被处死，就给汉哀帝诛杀朝廷大臣开了先例。既然开了这三大恶劣的先例，最后导致国家灭亡。这都属于严明太过分啊！东汉明帝，法令严明，疑案冤案一定要审断明白。永平年间，对官员办事要求特苛刻，凭借君主的尊贵身分竟然出现明帝亲自杖打尚书郎药崧的暴怒举动，明帝严厉得太过分，也就由此可知了。东汉章帝厌恶明帝的苛刻严切，每件事情一定都按宽厚来处理。但他宠信重用窦宪，东汉后妃家族的人专权的惨祸，实际上在这件事上就埋下了祸根。章帝宽大得太过分，又可以知晓了。两汉的君主在宽大上过于宽大，在严厉上过于严厉，原因就在于没能获得到真正的儒士作为他们的辅佐。假使他们获得到真正的儒士来被自己所任用，就会用宽大来弥补严厉太过分，用严厉来弥补宽大不到家，哪里能像这样只陷入一个极端呢？

《尚书》上说：要能宽厚，要能仁慈。《诗经》上说：不刚强也不柔

弱。进行治理的原则，何不借鉴这两句话也就可以了呢！但治国之道的纲要，不是博通经书史籍又明了当今事务的人，怎么能足够用来应付变化呢？但臣下我低贱浅陋，不琢磨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始终任凭自己的想法拿任用真正的儒士来亵渎皇上的听闻，实在是因为汉朝和唐朝没有获取到真正的儒士，所以六经的大道就隐没了；宋朝获取到真正的儒士，所以六经的大道就彰明了。真正儒士的取用与舍弃，实际上是同理学彰明与隐没联系在一起的。而政事的宽大与严厉，也根据这一点就可以论定了。臣下我很愚昧，不能了解施行治理的纲要，不能很好地提出措置当今事务的恰切办法，只希望陛下每天召请真正的儒士，讲论治国之道，像宋仁宗那样每天专开天章阁，赐给臣僚纸张笔墨，让他们陈奏太平的计策，让他们把民情反映上来。这就眼看着皋陶、夔、后稷、契、伊尹、傅说、周公、召公那样的贤臣在朝廷上一个接一个站立，治绩隆盛，超越汉朝、唐朝和宋朝，比得上虞舜时代和周朝了。臣下我恳切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庚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殿试策问

[宣德五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奉天命,嗣祖宗大位,期与天下咸跻雍熙。惟帝王之政,必有其要。舜绍尧治,申命稷契;夏商周迭兴,授田建学,稽古可见矣。我太祖高皇帝肇造鸿业,太宗文皇帝中兴邦家,仁宗昭皇帝恭己守成。孜孜爱人,一圣一心。重农事,崇学校,其法精备。朕恪谨继述,于兹有年。然犹田里未皆给足,风俗未底刑措。谓爱民若保赤子也,未尝不致其诚;德化本于躬行也,未尝不慎诸予;为政存乎用人也,牧守之吏,师表之职,未尝不择。何其效之未臻欤?抑别有其道欤?朕励精图理,诸生体用之学讲明有素,其有可以行者,举要以对,务归中正,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在本乡本土的范围内,总是特别恭顺、好像不能讲话的样子。

真广大充沛啊!生发化育万物,高大得和天连成一片。真宽广博大啊!纲领性的礼法三百条,具体细致的威仪三千条。全都等待那合

适的人，然后才能施行。所以说，如果不是道德最高的圣人，最完备的大道也不会凝聚告成。

站立的时候，就好像看见“忠诚老实、忠厚恭敬”这几个字在面前；在车箱里，也好像看见这几个字就镌刻在车前的横木上。达到这种地步以后，才能到处行得通。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奉受天命，继承祖宗的帝位，期待与天下人全都进入协和欢乐的境地。想来帝王施布的朝政，一定具有它那要领。虞舜继承唐尧的治理，特地申戒命令后稷与契担任主管农业和教化的官员。夏朝、商朝、周朝递相兴起，授给百姓田地，建立学校。考察古代史迹就可以看到这些情况了。我太祖高皇帝创建宏大的基业，太宗文皇帝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强盛，仁宗昭皇帝谨慎对待自己，持守已有的成就。而坚持不懈地爱护人民，三位圣明的先帝都是这种用心。重视农业生产，崇尚学校教化，他们设置的方法精详完备。皇帝我忠实谨慎地全面加以继承，到现在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可如今民间还没有全都富裕充足，风尚习俗还没有达到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程度。说起爱护百姓要像保护自己的婴儿，也未曾不做到特真诚；说起仁德教化要从帝王带头践行做起，也未曾不对自己很谨慎；进行治理要寄托在用好人才上，而地方官员和学校教官，也未曾不加以选择。但为什么效果还没有达到呢？是否还另有一套办法呢？皇帝我励精图治，你们这些考生对基本原则和实施运用的学问讲论阐明，很有功底，其中可以行用的东西，列举要点来对答，务必归结到适中平正上。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林文　殿试对策

林文(1390～1476)　字恒简，号澹轩，莆田(今属福建)人。宣德五年(1430)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太常少卿，兼侍读学士。诗文

以温淳独成一家。87岁去世。著有《澹轩稿》。

臣对:臣闻为治之道,莫先于教养;教养之政,莫先于得贤。盖民非养则无以厚其生,非教则无以复其性。苟不得贤,以行教养之政,又安能尽为治之道哉?自古帝王,体天致治,任君师之寄者,未尝不以教养为先,得贤为要也。

钦惟皇上,禀聪明睿智之资,具圣神文武之德,膺天命之隆眷,嗣祖宗之洪业。孜孜焉以养民为心,切切焉以教民为念。际天所履,极地所载,无一夫而不遂其耕食凿饮之乐。日月所照,霜露所坠,无一人而不遂其父慈子孝之天。治已洽矣,而犹虑其未洽;民已安矣,而犹虑其未安。复进臣等于廷,而以唐虞三代教养为问。臣知皇上是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欲使斯民为唐虞三代之民也。臣敢不精白一心,对扬圣天子之休命乎!

粤稽有虞之君,绍陶唐之治,虑百姓之阻饥也,则命稷为田正,播时百谷,使斯民得其养。虑百姓之弗亲也,则命契典司徒,敬敷五教,使斯民复其性。当是时也,黎民於变,万邦咸宁。迄三代迭兴,以言其田制,井地之设皆仿《河图》。《河图》体圆而用方,故里径一而围三,合三而成九,而井之体成。夏一夫授田五十亩,取《河图》中宫之五也,时则计亩以入贡。商授田七十亩,取《河图》少阳之七也,时以六百三十亩画为九区,取七十亩,中公而外私,但借力以助耕,而不复税其入,故谓之助。周何以百亩?取《河图》之五十有五,《洛书》之四十有五,合之而成。乡遂用贡,都鄙用助。其田制虽不同,而所以厚民生则一也。

以言其学校,夏曰东序西序,殷曰左学右学。至周而法制加详:一曰东胶,夏制也,以养国老,冬读书则在焉。二曰虞庠,虞学也,以养庶老,春夏干戈,秋冬羽籥,大司成论说则在焉。三曰瞽宗,殷学也,以祭乐祖,春诵夏弦秋学礼则在焉。四曰天子辟雍,诸侯泮宫,周学也,在邦以释奠,出征受脤,反告献馘则在焉。五曰成均,四代之所共也。其学之名虽不同,而所以明人伦则一也。当斯时也,兆民允殖,比屋可封,此唐虞三代皆以教养为先,而致治效之隆也。

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统一六合，扫胡元之弊政，兴昭代之文明。参酌古典，因时定制。虽不法井而民皆有田，轻徭薄赋，敦本尚实，其养之也厚矣。首务建学而民皆有造，躬行帅属，建中立极，其教之也至矣。歌仪凤之治者，咸囿于春风化雨之中；乐鸢鱼之化者，悉游于景星庆云之下。其治效之隆，与唐虞三代同一揆也。太宗文皇帝中兴邦家，仁宗昭皇帝恭已守成。农事之重，心乎太祖之心；学政之崇，法乎太祖之法。三圣相承，同一揆也。

皇上嗣兴，恪谨继述，心体三圣之心，治法三圣之治。田制一遵乎成宪也，然劝课之政益勤，蠲租之诏屡下。学校一率乎旧章也，然劝督之法必严，教养之方益精。衣则思民之寒，食则思民之饥，其爱民同乎保赤矣。先民以孝弟，道民以礼乐，其德化本乎躬行矣。牧守者，生民休戚所系，必择龚、黄、卓、鲁之才以居之。师表者，风化盛衰所存，必择胡瑗、程颐之学以任之。是皆皇上已行之政，已验之效，犹且曰田里未皆给足，风俗未底刑措，欲臣举要以对。臣又知皇上谦退不足之心，即大舜好问好察、大禹不自满假之心也。

臣惟为政，固在乎用人之当，得人尤在乎考核之公。何则？铨曹乃人物之铨衡，风宪为百司之表率。使居是任者，诚能秉至公之心，择适用之才，精鉴博采，既已得而任之，而又循名责实，以行劝惩黜陟之典。皇上持不已之诚，屡省而严敕之，则任教养之职者，举得其人。田野由是益辟，何患民之未足？风俗由是益厚，何患刑之未措哉？臣学不足以明体适用，才不足以博古综今，谨以是为献。伏惟皇上万几之暇，少垂睿览。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进行治理的原则与方法，没有什么能比教化养护更重要的了；教化养护的政务，没有什么能比获得到贤才更重要的了。因为老百姓不通过养护就没办法使他们的生活充裕，不通过教化就没办法恢复他们的善良天性。如果获取不到贤才来施行教化养护的政务，又怎么能够把进行治理的原则与方法贯彻到底呢？自古以来，帝王体察上天，实现大治，承担君主和师长双重重任的人，未曾不把教化养护放在首位，把获取到贤才作为关键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上禀受耳聪目明、通达机智的天赋，具备圣明神奇、有文有武的德性，奉受天命的深厚眷顾，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勤勉不懈地把养护民众作为心愿，十分紧切地把教化百姓作为意念。远到天边和大地的尽头，没有一家不实现它那耕田吃饭、凿井饮水的欢乐。太阳月亮所照耀到和霜露所降落到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不实现他那父亲慈爱、儿子孝敬的天性。治理已经很协调了，但仍然忧虑还没有协调；百姓已经很安定了，但仍忧虑还没有安定。又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教化养护进行询问。臣下我知道皇上的这种心念，也就是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心念，想让当今的百姓都成为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时期那样的百姓。臣下我怎敢不满心一片纯洁，来对答称扬圣明天子的美好命令呢？

考察虞舜作为天子，继承唐尧的治理局面，担心百姓被饥饿所困扰，就任命后稷担任主管农业的田正，播种各种粮食作物，使这群百姓获得到养护。还担心百姓之间不亲近，就任命契担任司徒一职，谨慎地施布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五种伦理纲常的教化，使这群百姓恢复他们的天性。在这个时期，百姓随教化而大变，各个地区都特别安宁。延续到夏商周递相兴起，拿它们井田制度的设立来说，都仿照《河图》。《河图》本体圆满而施用方正，所以中心部位是一个长宽相等的正方形而又组成三个正方形，三个正方形乘上三个正方形就变成九个正方形，而井田的规制就形成了。夏朝一户人家授给田地五十亩，是取法《河图》中官数是五，当时按照亩数来交纳贡品。商朝每户授给田地七十亩，是取法《河图》少阳数是七，当时把六百三十亩划分成九个部分，拔出七十亩。里面是公田，外面是私田，只是借助民力来帮助耕种公田，不再对收成征税，所以叫做“助”。周朝为什么把每块田地定为一百亩呢？这是取法《河图》数为五十五，《洛书》数为四十五，两者相加而成。离国都近的乡和遂，采用“贡”的税赋方式；离国都远的都和鄙，采用“助”的税赋方式。它们的土地制度尽管不同，但使人民生活充裕的目的却是一样的。

拿夏商周的学校来说，夏朝叫做东序、西序，商朝称为左学、右

学。到周朝,制度进一步详密。第一叫做东胶,这是沿用夏朝的制度,用来奉养退休的公卿大夫等官员,但学生们冬季读书也包括在里面了。第二叫虞庠,这是沿用舜的学校制度,用来奉养平民中的老人,但学生们在春季夏季学习武舞,在秋季冬季学习文舞,大司成进行考试评定也包括在里面了。第三叫做瞽宗,这是沿用商朝的学校制度,用来祭祀音乐的祖师,春季吟诵诗篇,夏季演唱乐章,秋季学习礼仪也包括在里面了。第四叫做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这是周朝的学校制度。人们在国内举行祭奠先师的礼仪,出征接受宗庙祭肉,取胜回来告捷,献上斩获的敌军左耳,也包括在里面了。第五叫做成均,这是舜和夏商周都一样的。它们所设学校的名称尽管不同,但都用来宣明人伦纲常,却是一致的。在那个时期,天下百姓确实安居乐业,家家都可以受到特殊的表彰。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把教化养护放在首位,从而取得巨大的治理效果啊!

我朝太祖高皇帝在淮西地区崛起,统一上下四方,扫除元朝的弊政,振兴起清明时代的辉煌事业。参照斟酌古代的法典,根据当今的形势定立制度。虽然不效法井田制度,但老百姓全都有土地,减省徭役,少量征收赋税,促进农业生产,崇尚实效,养护百姓也很深厚了。首先在建立学校上花气力,百姓们都有造就,亲自带头去做,给下属树立起榜样,建立起最为适中的尺度,定立起最高的行动准则,教化百姓也到了极点了。于是歌咏凤凰成对飞来的大治盛况的人,全都沐浴在春风化雨的氛围中;为鱼跃鸢飞的教化而欢乐的人,全都遨游在景星出现、庆云降临的吉祥景象之下。治理效果的隆盛,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是同一个标准啊!太宗文皇帝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强盛,仁宗昭皇帝谨慎对待自身,持守已有的成就。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是把太祖的心念作为自家的心念;对学校事务的崇尚,是把太祖的法度作为自家的法度。这三位圣明先帝递相承接,也是同一个标准啊!

皇上接着兴起,对继承前代事业非常小心谨慎,在心念上体察三位圣明先帝的心念,在治理上效法三位圣明先帝的治理。土地制度完全遵用原定的制度,可鼓励督察的政务却更加勤勉,免除租税的诏

令多次下达。学校完全执行旧有的规定，可鼓励督促的法令却必定严格，教化培育的方法更加精详。穿衣时就想到民众的寒冷，吃饭时就想到百姓的饥饿，爱护民众也如同保护自己的婴儿了。用孝敬友爱给百姓做出榜样，用礼仪乐舞来引导百姓，仁德教化也建立在自身实行的基础之上了。地方各级官员，关系到百姓的欢乐与忧愁，必定要选择西汉龚遂、黄霸和东汉卓茂、鲁恭那样的人物来让他们出任。为人师表的教官，决定着教化的兴盛与衰败，必定要选择北宋胡瑗、程颐那样的有学问的人来任用。这都属于皇上已经施行了的政事，已经得到证明了的治绩，但仍然还说民间尚未全都富裕充足，风尚习俗还没达到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程度，希望臣下我列举纲要来对答。臣下我由此又知道皇上这种谦逊而深感不足的心念，也就是大舜喜好询问、喜好体察浅近言论的心念，大禹不自我满足的心念啊！

臣下我想来，推行政务固然在于用人恰当，但获得人才更在于考核公正。为什么这样说呢？吏部是对人物进行考核衡量的机构，都察院是朝廷各部门的表率。让担当这两大机构职务的人，确实能够秉持最公正的心地，择取适合使用的人才，明晰地予以衡量，广泛征求意见，已经择取到并任命具体官员，而又按照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要求他们做出与职务相符合的业绩，进而施用劝勉惩戒、决定升降的法典。皇上持守不罢休的诚意，多加省察又严格戒敕吏部与都察院官员，那就会使担任教化养护百姓职务的人，全面获取到合适的人选。田地由此而进一步得到开垦，还担心什么百姓尚未富足呢？风尚习俗由此而进一步变得淳厚，还担心什么刑罚尚未搁置起来不动用呢？臣下我的学问，不足以明了本体，适合运用，才能不足以博通古代，综括当今，恭谨地用这一点作为进献。跪拜敬请皇上在日理万机的闲暇时间，稍微看上一眼。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祁振良译〕

明英宗正统十年(1445)乙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

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

殿试策问

[正统十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自昔二帝三王致理之道，必选任贤才以敷政化，安中国而抚四夷。其见诸载籍，靡不足为后世法也。下迨汉唐宋，贤明之君亦皆锐意于斯。而其人才治效，有可以比隆于古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明命，统一华夷，德威所被，罔不臣服。太宗文皇帝嗣登大宝，制治保邦，光前裕后。列圣相承，咸隆继述。是以群贤汇进，教化旁洽，海内乂宁，夷狄宾服。功德之盛，吻合古昔而无间。朕缵承鸿业，仰惟祖宗之彝宪是训是行，屡诏中外，简拔贤才，亦得人为用矣。诚欲九德咸事，野无遗贤，举错之法尚有可行者乎？申敕诸司，修明治理，亦既建立事功矣。诚欲百工惟时，庶绩咸熙，督劝之典尚有可举者乎？内而中国生齿之繁，因其性而教养之矣。诚欲使皆阜厚化成，同归于至治，尚何所加乎？外而蛮貊近悦远来，因其俗而怀抚之矣。诚欲使皆讲信修睦，相安于永久，尚何所施乎？夫治道有本而推行有序，不法诸古无以施于今，泥于古而不通于今，亦不足以为治。诸生明于道艺，必讲之有素。悉著于篇，朕将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文采繁盛的君子，到最后也让人忘不掉，是因为他仁道盛大，德行达到了最完美的境地，老百姓想忘掉也忘不掉啊！

在德业上成为圣人，在地位尊贵上成为天子，拥有四海以内的万物，宗庙里要祭享他，后代子孙保守他。因此德业盛大的人必定会获取到他的高位，必定会获取到他的俸禄，必定会获取到他的美名，必定会获取到他的长寿。

殷末周初的伯夷是圣人中清高的人，夏末殷初的伊尹是圣人中负责任的人，春秋鲁国的柳下惠是圣人中随和的人，而孔子则是圣人中识时务的人。可以把孔子称作集大成者。集大成的意思，和奏乐先敲铜钟，最后用玉磬来收住一样。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从前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实现大治的办法，必定要选择并任用贤才来施布政治教化，安定中原地区，慰抚四方少数部族。这在典籍上凡是可以看到的，无不足以成为后代的准绳。延续到汉朝、唐朝和宋朝，贤明的君主也全都对此非常用心用力。然而它们那时的人才和治理的效果，有能和古代隆盛状况相比的吗？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奉受上天的明确托付，统一全国，恩德和威力所延及的地方，无不归服。太宗文皇帝接着登上皇位，制定治理措施，保有国家，弘扬前代的功绩，给后世留下很多用不完的东西。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接，全都光大祖宗的功业。所以群贤按类别接连进用，教化广泛又深入人心，天下安宁，四周少数部族都归服。这种功德的隆盛，同古代吻合而没有一点儿间隔了。皇帝我继承宏大的基业，只是一心对祖宗的常规成法遵从施行，多次向朝廷内外颁发诏令，选拔贤才，这也已经得到合适的人选并发挥出作用

了。确实打算具有九种德行的人全都让他们各任其职,民间不存在遗漏的贤才,有关选拔安排的方法,还有可以再行用的吗?申诫命令各个机构,修明各自所承担的职责,这也已经建立事功了。确实打算让百官都往良善方面想,各种事务全做好,有关督察激励的法典,还有可以再施用的吗?在内部,中原地区人口繁多,已经依照他们的天性教化养护他们了。确实打算让他们全都物质充足,教化形成,一起归入到最完美的治理状态,还有什么应再施布的呢?在外部,少数部族离得近的,都很欢悦,离得远的,都来归服,已经随顺他们的习俗怀柔慰抚他们了。确实打算让他们全都讲求信义,建立和睦关系,互相安宁到永久,还有什么可以再施加的呢?治理的大道具有根本,而推行起来又有次序。不效法古代,就没有办法在当今来施行;被古代局限住,对当今却不做变通,也不会形成治理。你们这些考生明了大道和适宜的做法,一定讲论得很有功底了,全都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阅览。

商辂　殿试对策

商辂(1414～1486)　字弘载,号素庵,淳安(今属浙江)人。正统十年(1445)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升侍读学士。景泰朝官任兵部尚书。英宗复辟,被诬下狱,斥为民。宪宗时官至谨身殿大学士。为人宽厚持重。每临大事,决大议,则毅然不为屈。著有《商文毅公全集》、《蔗山笔麈》、《续宋元资治通鉴纲目》等。

臣对:臣闻图治莫急于用贤,用贤莫先于修身。非修身,固无以为取人之本;非用贤,又无以为图治之要。故《中庸》之书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人君诚能修身以为用贤之本,用贤以为图治之要,则知致、意诚、心正、身修,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以之亮天工而熙庶绩,安中国而抚四夷,何往而不得其效哉!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睿智,文武神圣,存二帝三王之心,绍祖宗列圣之统,日御经筵,讲求至道,早晚视朝,裁决万几。好贤之诚,无间

于话言;图治之切,常存于宵旰。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拳拳欲闻古今用贤致理之方。所谓智周万务而不弃于一得之愚,明照四方而必察于刍荛之贱是也。陛下是心,与古帝王兢兢业业、不自满假、用人惟己、望道未见之心,何以异哉?臣虽愚昧,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明命之万一乎!

臣惟致治有要,用贤是也;用贤有本,修身是也。若昔唐虞三代之世,百姓昭明,万邦协和,而黎民有於变之风;百工惟时,庶绩咸熙,而万邦有咸宁之效。二帝致治之隆如此者,实本于其登庸元恺、不废困穷之功也。府事修和,文命四敷,在商邑用协于厥邑,在四方用丕式见德,以至万民咸和,丕单称德。三王致治之盛如此者,亦本于其吁俊尊帝、克知克用之力也。当是之时,若皋、夔,若稷、契,若伊、周,各以圣贤之资,居辅弼之任。或陈九德而谐八音,或播百谷而敷五教,一德足以致天心之格,成绩足以笃烈考之光。多士济济,布列庶位,又岂无所自而然哉?盖由尧舜、禹汤、文武之君,或克明俊德而重华协帝,或祗台德先而圣敬日跻,或缉熙敬止而无竞惟烈,一皆本诸行者无不诚,见诸行者有其实。所谓为政取人之方著于载籍,足以垂法于后世者,何莫不自圣人修身中来耶?

继此而称善治者,莫汉唐宋若也。其间贤明之君,未始不以用人为致治之本。观其孝廉之有选,贤良之有科,或以明经进,或以进士举。若汉贾谊之劝兴礼乐,董仲舒之明于王道,当时海内富庶,戎狄宾服,其治效固有可称者矣。唐韩愈之排斥佛老,陆贽之论谏仁义,当时中国久安,四夷宾贡,其治效亦有可观者焉。以至宋之韩、范、富、欧,有以辅盛治于前;周、程、张、朱,足以继绝学于后。中国致文明之盛,夷狄怀景仰之心。其人才治效,虽不能比迹唐虞三代,亦非汉唐所可及也。虽然,汉唐之君,其用贤图治之意,固云美矣,而取人以身之道,则概乎未有闻焉。或《诗》、《书》之安事,或礼乐之未遑,或闺门失德而治杂于夷,或任用不专而小人迭进。外有尊贤之名,内无用贤之实。此汉唐宋所以止于汉唐宋,而不能俪美于唐虞三代者,亦以修身之道,有未至也。

洪惟圣朝太祖太宗,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德泽敷施,

声教远被，薄海内外，莫不尊亲，际天极地，靡不臣服。列圣相承，光启文治，隆继述之道，尽任用之方。是以群贤向用，君子满朝，礼乐兴而风俗美，教化洽而治道隆。斯民阜厚而化成，夷狄倾心而内附。圣德神功，盖吻合乎二帝三王之盛，而汉唐宋之君，风斯下矣。

肆惟皇上，缵承鸿业，远稽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孜孜以图治为心，拳拳以求贤为念。其得人致治之盛，固已超轶乎古矣。而犹虑举错之法未尽行，督劝之典未尽举，内而教养未备，外而抚绥未至，欲探其本，而推行之以序。臣愚以为是数者，皆陛下之所已行，行之而既效者也。然犹欲求其本，岂有外于陛下之修身乎？

陛下屡诏中外，简拔贤才，其举错之法至矣，而犹欲求可行之法。臣愿陛下谨修身以为举错之本，贤者必进，不肖者必退，如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则九德咸事、野无遗贤之效，不难至矣。陛下申敕诸司，修明治理，其督劝之典备矣，而犹欲求可举之典。臣愿陛下谨修身以为督劝之原，劝者必赏，而怠惰者必罚，如《虞书》所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则百工惟时、庶绩咸熙之效，有可必矣。陛下既谨修身以为取人之本，将见人才之出，彬彬乎盛。所以阜厚化成乎天下者，此也；所以讲信修睦于夷狄者，亦此也。

陛下尝轻徭薄赋以立民命，建学立师以复民性矣。使凡任教养之责者，咸以利用、厚生、教训、正俗为心，则人得以仰事俯育，而有尊君亲上之心。生齿虽繁，有不同归于至治乎？陛下尝柔远能迩，以怀弗庭，厚往薄来，以抚宾服矣。使凡典戎狄之职者，咸能论之以祸福，示之以恩信，去者不追，至者不拒，训兵练士，保境安民，则人畏威怀德，修贡称藩，四夷虽远，有不相安于永久乎？

夫为治之本，在于用人；用人之本，又在修身。必先其本，而后其末。故《论语》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大学》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中庸》曰：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国家，皆此意也。虽然，修身固为用人之本，而欲用人致治，尤不可以不法诸古。盖古者，前代之法，圣帝明王精神心术之所存，仁义道德之所寓也。傅说告高宗曰：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使泥于古而或不通于今，则为徒法不能以自行矣。又必益之损

之，与时宜之，《中庸》所谓时措之宜是也。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略陈之矣。而于篇终，窃有献焉。臣惟始勤终怠者，众人之常情；慎终如始者，圣人之要道。是故天地有常运而后岁功成，帝王有常德而后治功著。陛下德配天地，明同日月，诚又加夫不息之诚，有常之念，终始惟一，宵旰无间，则以之修身任贤，以之安民致治，远足以追配二帝三王之道，近足以光昭祖宗四圣之业。上而致天地位，下而致万物育，而绵历数于无疆者，夫岂有越于此哉？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谋求大治没有什么能比任用贤才更重要的了，任用贤才没有什么能比君主修养好自身更占首位的了。君主不修养好自身，压根就没条件作为选取人才的根本；不任用贤才，又没办法作为谋求大治的关键。所以《中庸》这部典籍上说：进行统治在人才，选取人才靠君主自身。君主确实能够修养好自身，把这作为任用贤才的根本；确实能够任用人才，把这作为谋求治理的关键，就会知识充实，意念真诚，心地端正，本身修养得好，贤良的人身居官位，能干的人担当职务。凭这来帮助完成上天的功业，做好各种事情，安定中原地区，慰抚四周少数部族，指向哪里而不能取得那效果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耳聪目明，通达机智，有文有武，神奇圣明，保持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心念，继承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统系，每天驾临经史讲席，讲论探求至高无上的大道，早晚临朝听政，裁决各种事务。喜好贤能的诚意，对任何言论都能听进去；谋求大治的迫切心情，常常保持在整日之间。于是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提出清晰而详明的询问，恳切地想听一听古今任用贤才、实现大治的方法。这正是人们所说的：智虑能把各种事务都包容进来但却不遗弃愚笨人的一点看法，明敏能察照四方但却必定要看一看山野村夫怎么讲。陛下的这种心念，与古代帝王兢兢业业、不自我满足、任用人才全在自身、盼望大道总好像还没见到的心念，哪里有什么两样呢？臣下我尽管很愚昧，

怎敢不满心一片纯洁，来对答称扬那明晰命令的万分之一呢？

臣下我想来，实现大治具有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任用贤才；任用贤才具有根本的条件，那就是君主修养好自身。像从前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期，各个氏族明显得到区分，各个地区和睦团结，而黎民百姓具有随教化而大变的风尚。百官只是往好处努力，各种政事全都振作起来，而各个地区产生全都安宁的效果。唐尧虞舜实现大治的隆盛景象达到这种地步，原因实际上是出自他们起用八元、八恺这兄弟十六人，不抛弃困顿贤人而花费的功夫啊！水、火、金、木、土和谷物这六府得到整治，端正德行、物尽其用、使民众生活充裕这三事协调发展，礼乐文教传布到整个天下，在商邑能使这个都邑协和，在全国各地能根据大法显现圣德，以至万民全都和睦，天下大规模地尽力实行仁德。夏商周实现大治的兴盛局面达到这种地步，原因也是出自他们召请英才，尊崇天帝，能够了解又能够任用而投入的力量啊！在这个时期，像皋陶、夔，像后稷、契，像伊尹、周公，各自凭借圣贤的天资，担当辅政重臣的职务。有的陈奏进用九种德行的人，或使八种乐器的音律和谐；有的教导民众播种各类粮食作物，或施布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伦理纲常的教化。专一的仁德足以导致上天心意的归向，形成的业绩足以加重祖先的光彩。各种人才济济一堂，分布列居在各个职位上。难道这是没有什么来由就形成这样的吗？由于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这些帝王，有的能表彰德才兼备的人，或文德光辉重合成两道来协助前代天子；有的把敬重德行放在首位，或圣明恭敬天天都在提高；有的自我高度警戒而学问大放光明，或功业没谁能比他更强，这一切，都是出自本人要施行的事情没有不虔诚的，在真施行的时候又都有实际行动。所谓进行统治、选取人才的方法在典籍上写得明明白白，足以给后世提供准则的东西，哪一样不是从圣人修养好自身这里而得来的呢？

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以后称得上大治的朝代，没有比得上汉朝、唐朝和宋朝的。其间贤明的君主，未尝不把任用人才作为实现大治的根本。考察他们对孝廉定立选送的制度，对贤良设有专门的

科目，有人通过明经科的考试得到进用，有人通过进士科的考试得到提拔。像西汉贾谊劝导振兴礼乐，董钟舒对用仁德治国非常了解，当时天下富庶，少数部族归服，治理的效果固然具有值得称述的地方了。唐朝韩愈排斥佛教和道教，陆贽讲论和劝谏实行仁义，当时中原地区长久安定，少数部族归服纳贡，治理的效果也有很可观的地方了。以至于宋朝的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确有依凭地在前面辅佐隆盛的治绩；周敦颐、程颢与程颐、张载和朱熹，足以在后面承接起断绝的圣人学说。中原地区达到文教昌明的盛况，少数部族怀有景仰的心情。人才和治理的效果，虽然不能追比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代，但也不是汉朝和唐朝所能赶得上的。尽管这样，汉朝和唐朝的君主，他们任用贤才、谋求大治的用意，固然称得上是很美好了，但凭借君主自身来选取人才的准则，却一律都没听说过。有的声称致力哪门子《诗经》、《尚书》？有的礼乐都没顾得上，有的后宫出现乱伦现象，治理措施夹杂着少数部族的做法，有的任用贤才不专一，小人递相得到重用。外表上享有尊重贤才的名声，骨子里却没有任用贤才的实际。这是汉朝、唐朝、宋朝也就只能停留在汉朝、唐朝、宋朝那个状态上，不能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代相媲美，原因也出在君主修养好自身的原则，还存在着差距啊！

只有我们神圣大明皇朝的太祖和太宗，依靠武功平定天下，凭借文德实现太平。仁德恩惠普遍施布，声名文教远远延及，四海内外，无不尊敬亲近，天边地角，无不归服。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接，发扬光大文治，弘扬继承前代的准则，穷尽任用贤才的方法，所以群贤都前来争取被任用，君子布满朝廷，礼乐振兴而风气良好，教化普及而治国之道隆盛。当今百姓物质丰富，教化形成，少数部族倾心前来归附。圣明的德业和神奇的功绩，大致同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文王时的盛况相吻合，而汉朝、唐朝、宋朝的君主，风光就在下等了。

想来皇上您继承宏大的基业，往远处考察帝王的大道，在近处执守祖宗的大法，勤勉不懈地把谋求大治作为心愿，恳切地把求取贤才作为意念。获得到人才和实现大治的兴盛景象，原本已经超过古代

了。但仍忧虑选拔安排的方法还没全部都行用，督察激励的法典还没全部都贯彻，在内部教化养护还没完善起来，在外部慰抚还没达到极限，由此打算探究那根本，依照次序来推行。臣下我愚昧地认为这几项政事，都是陛下已经实行，实行中已经取得效果的了。但仍要探求那根本，哪里会有超出陛下修养自身之外的呢？

陛下多次命令朝廷内外，选拔贤才，有关举用安排的方法已经很全面了，但仍要寻求可以再行用的方法。臣下我希望陛下谨慎地修养好自身，作为举用安排的根本，对贤能的人必定加以进用，对不成器的人必定予以贬斥，就像孔老夫子所说的那样：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安排在邪僻人的上面。这样做，在九种德行范围以内的人就各得其职，民间不存在遗漏下的人才，这种效果也就不难达到了。陛下申戒命令各个机构，修明本部门所承担的职责，有关督察激励的法典已经很完备了，但仍要寻求可以再施用的条规。臣下我希望陛下谨慎地修养好自身，作为督察激励的本原，对勤奋上进的人必定予以奖赏，对懒惰懈怠的人必定给予处罚，像《尚书·虞书》中所说的那样：用美好的施政情况来告诫百官，用威权来督促百官。这样做，百官就只往好处努力，各种事情都振作起来，这种效果也就可以预期了。陛下既然谨慎地修养好自身，作为选取人才的根本，就会眼看着人才涌现出来，非常众多了。用来使全天下物质丰富、教化形成的东西，就是这个；用来讲求信义，同少数部族建立和睦关系的东西，也是这个。

陛下曾经减省徭役，少量征收赋税，来使百姓的生存确有保证，兴建学校，择立师长，来恢复百姓的善良天性。假使所有承担教化养护职责的人，都把物尽其用、使人民生活充裕、教化训导、端正风俗作为心愿，那就人人得以对上奉事，对下抚育，而有尊敬君主、亲近上司的心思了。人口虽然众多，有谁不一起归向最完美的治理状态呢？陛下曾经怀柔远方，亲善近处，来感化不归附的地区，厚礼前往，薄礼让对方回拜，用来安抚归服的少数部族了。假使所有负责民族事务的人，都能向对方讲明祸福关系，向对方显示恩惠信义，离去的不追击，前来的不拒绝，训练兵士，保卫边

境，安定百姓，那就人人畏惧威势，感念仁德，称臣纳贡了。四周少数部族尽管离得遥远，有不和睦相处到永远的吗？

进行治理的根本，在于选用人才；选用人才的根本，又在于君主修养好自身。一定要把根本放在前面，再把末节放在后面。所以《论语》上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起来了，具体做法就随之产生了。《大学》上说：自身修养好以后，家族就得到整顿；家族得到整顿以后，国家就得到治理；国家得到治理以后，天下就变得太平了。《中庸》上说：知道怎样修养好自身，就知道怎样治理民众。治理天下国家，都是这个意旨啊！尽管如此，修养好自身固然是任用人才的根本，但要任用人才，实现大治，更不能不取法古代的东西。因为古代的东西是前代的法则，是圣帝明王精神心术所投注的地方，是仁义道德所寄寓的实体。商朝重臣傅说告诫殷高宗说：事情不效法古代，想让政权能永远相传下去，这可不是傅说我所曾听说过的。假设被古代局限住，在当今却不做变通，那就光是个法则而已，不能够自动就施行了。因而又必须加以损益，与当前相适应。这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措置当前事务的合适做法啊！

陛下策问臣下我的问题，臣下我已经大略做陈述了。但在答卷末尾，私下还有献呈的东西。臣下我想来，开始很勤勉，到最后却松懈下来，这是一般人的常情；一直保持到最后就和刚开始时一个样，这是圣人的切要做法。所以天地有永不停息的运行，然后每年生长万物的事情才做得完；帝王有长久不变的仁德，然后治理的功绩才显著。陛下大德配得上天地，光明如同日月，果真再加上永不停止的诚意和固定不变的意念，始终只是一个心愿，从早到晚都不隔断，靠这来修养好自身，任用贤才，靠这来安定百姓，实现大治，往远处足以追比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大道，往近处足以发扬光大祖宗即四位圣明先帝的基业，朝上致使天地定住位，朝下致使万物得到化育，延长国运到永无尽头，哪里又有超越出以上所说的这一点的呢？臣下我触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祁振良译〕

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黿鼉、鲛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殿试策问

[正统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自昔君天下之道，莫要于内治之政修，外攘之功举。斯二者，圣人所以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域也。夫修内治之政，必先于爵赏刑罚；而举外攘之功，必本于选将练兵。且爵所以待有功，必待有功而后爵，则天下有遗善。刑所以待有罪，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有遗恶。古先圣王无遗善，无遗恶，必有不待有功而爵、有罪而刑者矣。其事安在？兹欲人皆迁于善，不待爵赏而自劝；皆远于罪，不待刑罚而自惩。其道何由？

凡兵之所统者将，将之所用者卒，卒之所仰者食，而战则资于马。曰将、曰卒、曰食、曰马四者，外攘所不可缺一也。昔之君子以谓，将其卒则选其卒之良，戍其地则用其地之人，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守其国则乘其国之马，庶几可以百战无殆。不然，则一郡用兵而取给百郡，非善策也。夫众至千万，必有一杰，然智愚混淆，同类忌蔽，何以能知其杰而拔置军旅之上欤？一方之人，有戍有农，然戍非土著，农不知武，何以能作其勇而驱列御卫之间欤？

田有肥瘠，岁有丰歉，何以能致其粒而积贮仓廪欤？土地气候，产牧各殊，何以能致其息而充溢边鄙欤？朕祗承祖宗大统，惓惓以经国子民为心，而于安内攘外尤加意焉。子诸生学古通今而来，必深于其道矣。其具以对，无骋浮夸，务陈切实。朕将采而用之。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人才难得，不是这样吗？唐尧和虞舜先后称帝天下的时候，在这方面属于最兴盛了。

现今的皇天，某一处发出光明来，是这样的繁多，但到它那无边无际的地方，日月星辰都附缀在上面，万物全都覆盖住。现今的大地，一撮土是这样的繁多，但到它那广阔深厚处，托载起华山却不沉重，收拢振扬起河海却不漏泄，万物全都托载起。现今的山，像拳头那样大的石块，是这样的繁多，但到它那宽广高大处，草木都让它们生长出来，禽兽都让它们栖息下来，宝藏也聚积起来。现今的水，一小勺水是这样的繁多，但到它那深不可测处，癞头鼋、猪婆龙、蛟龙、鱼鳖全都生长出来，货物财物也繁盛起来。

种田，挨饿就在那里面了；学习，俸禄就在那里面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自古统治天下的大道，没有比内部治理的政事得到修明、外部驱除敌寇的功业建立起来更为重要的了。这两项是圣人把当今社会带入太平欢乐境地的缘由。修明内部治理的政事，一定要把爵位封赏和刑罚放在第一位。建立起外部驱逐敌寇的功业，一定要把选任将帅、训练士兵作为根本。况且爵位用来等待有功劳的人，一定要等人有了功劳，然后再封给爵位，天下就会出现被遗漏的好人。刑罚用来等待有罪过的人，一定要等人有了罪过，然后再施用刑罚，天下就会出现被遗漏的坏人。古代圣明的帝王施

行治理时，没有被遗漏的好人，也没有被遗漏的坏人，一定握有不等人有了功劳可就封给爵位、不等人有了罪过但却施用刑罚的巧妙做法了。这类事情具体表现在哪里呢?如今想让人人都转向良善，不等爵位封赏就自己劝勉；人人都远离罪过，不等刑罚就自己惩戒，这种做法通过什么来实现呢?

凡是部队归他统领的人，是将帅；将帅所使用的人，是兵卒；兵卒所仰赖的东西是军粮，而交战就借助马匹。称为将帅、称为兵卒、称为军粮、称为马匹的这四种要素，是对外驱逐敌寇所不能缺少一项的。古代的君子认为，统率自己手下的兵卒就要选择那些兵卒中战斗力强的人，戍守一个地方就要选用当地的人，在某个原野作战就要食用那个原野的粮食，守卫一个国家就要骑用那个国家的马匹，这样差不多就可以百战而不出危险。否则的话，一个郡在用兵却从各个郡去调集，这不是好计策。众人多至成千上万，其中必定会有一个英杰，但智勇和愚笨的人混杂在一起，同类又忌妒而不替别人做宣传，通过什么就能知道那个英杰而把他选拔出来，安排在部队的指挥岗位上呢?一个区域的人们，有进行戍守的，有从事农耕的，但戍守的不是当地人，农耕的不懂得军事，通过什么就能振作起他们的勇气而部署到作战的行列中来呢?田地存在着肥沃和瘠薄的区分，年景有丰收和歉收的差别，通过什么就能实现既有粮食吃而仓库又有储藏呢?水土气候，致使繁殖放牧各不相同，通过什么就能做到马匹繁殖而布满边境一带呢?皇帝我恭敬地继承祖宗的帝位统系，恳切地把治理国家、养育百姓作为心念，而对安定内部、驱逐外敌更格外留意。你们这些考生学古通今，前来应试，一定对这些措施很有研究了。请详尽地做对答，不要卖弄浮夸那一套，务必陈述切实的东西。皇帝我准备采用它们。

彭时　殿试对策

彭时(1416～1475)　字纯道，安福(今属江西)人。正统十三年(1448)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天顺中被选入内阁，多有匡助。宪宗时

官至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立朝二十余年，持守正道，务存大体。著有《可斋杂记》、《彭文宪集》。

臣对：臣闻天下以一人为主，人君以一心为主。盖心者万化之原，万事之本也。大哉，人君之一心乎！本诸心以安内，则内治之政修；本诸心以攘外，则外攘之功举。尚何患乎赏善罚恶之不得其当，选将练兵之不协其宜，而斯世之不跻于雍熙泰和之域也哉！《大学》以是心为家国天下之本，董仲舒以是心为朝廷四方之则，其以此欤？

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备圣神文武之德，诞膺骏命，嗣守鸿图。临御以来，拳拳以经国子民为心，先之以励精，加之以恭俭。其于安内攘外之道，已无不尽，而见诸治效者，亦已盛矣。而犹不自满假，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举爵赏刑罚，次及选将练兵之事，而责臣以切实之言。臣愚，有以知陛下真大有为之君也，可以为尧舜，可以为禹汤文武，可以隆太平之业于万亿年而愈盛矣。顾臣浅陋，何足以奉大对？然罄一得之愚，亦臣区区之素愿也，敢不俯竭刍荛，以少裨于万一！

臣窃惟天生圣人，而付以君道之重；圣人奉天，而主宰天下之大。内而中国仰之以治，外而四裔赖之以安。则夫修内治之政，举外攘之功，夫岂可以一日而或废哉？然求其要，不越乎爵赏、刑罚、选将、练兵之四者耳。夫爵固所以待有功，功者善之著于事也。若必待有功而后爵，则天下之善未著于事者，必至于见弃，何以使之皆知所劝而建功乎？刑固所以待有罪，罪者恶之形于行也。若必待有罪而后刑，则天下之恶未形于行者，必至于苟免，何以使之皆知所惩而远罪乎？斯二者，诚如圣问之所谕也，臣复奚言？

臣尝窃观唐虞三代之时，其赏善也，有三德而日宣者为大夫，有六德而日严者为诸侯。或俊乂之旁招，或宅俊之克用，与夫贤能之宾兴，俊造之升进，凡此皆不待有功而后爵者也。其罚恶也，象刑以弼五教，制刑以教祇德。或畔宫离次之必诛，或羞刑暴德之必罚，与夫左道乱政者戮之而不赦，悖礼疑众者杀之而不宥。凡此皆不待有罪而后刑者也。然亦岂徒事乎爵赏刑罚，而无其本哉？盖一本诸心而已

矣。观夫尧之兢兢，舜之业业，而懋敬于命德讨罪之政者，其心为何如？禹之孳孳，汤之栗栗，文王之翼翼小心，武王之无作好恶，而克谨于彰善瘅恶之事者，其心为何若？肆赏罚之有道，劝惩之有本，而下无遗善遗恶者，以此也。

兹欲人皆迁于善，不待爵赏而自劝。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赏善之心，使赏不徒赏，赏一人而千万人知劝，则我朝赏善之典，与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赏善者，同一揆矣，何忧乎天下人之不皆迁于善哉？兹欲人皆远于罪，不待刑罚而自惩。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罚恶之心，使罚不徒罚，罚一人而千万人知惩，则我朝罚恶之政，与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罚恶者，同一辙矣，何忧乎天下人之不皆远于罪哉？如是则善者列爵而登庸，恶者率德而改行，礼义廉耻之行兴，诡诈偷薄之风息。百官有济济之容，黎民有皞皞之俗，而雍熙泰和之治而跻矣。

若夫兵之所统者将，将非其人，则国无所倚以为安。将之所驭者卒，卒有不练，则将无所恃以取胜。而况卒之强弱由于食，战之胜负系乎马。是则曰将、曰卒、曰食、曰马四者，皆外攘急务，而不可有一之或缺焉者。而陛下讦谟远猷，已断自宸衷矣，臣奚以多言为？昔之善用兵者以为，将其卒则选其卒之良，盖卒不良，则有不闲弓马之患。戍其地则用其地之人，盖非其地，则有不习水土之虞。战其野则食其野之粟，庶可以省转输之劳。守其国则乘其国之马，庶可以免调发之扰。如是则虽百战而无殆矣。不然，则一郡用兵而取给百郡，不惟无以卫民之生，而且有以疲民之力，诚非策之善者。

唐虞三代之时，其选将也，舜惟谆谆于敷文德之伯禹，文王惟汲汲于著鹰扬之吕望。经营四方有若召虎，克壮其猷有若方叔者焉。其练卒也，成周之制，春夏有振旅芟舍之教，秋冬有治兵大阅之习。井田之中，卒伍以具；耒耜之暇，干戈以举。其兵食，则登三余一之有其备。其马政，则天闲廷厩之有其制。要其本，何莫非帝王一心之运用哉！

夫众至千万，必有一杰，良将之才，未尝无也。必欲知其杰而用之，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选将之心，而又精神以感召之，气类以招徕之。投之胶辖繁剧之地，以观其智；置之艰难险阻之中，以观其才。则

虽伯禹、吕望、方叔、召虎之流世不易得，而凡才智出众之士，必皆拔置于军旅之上矣。何忧乎智愚之混淆，同类之忌蔽哉？一方之人，有兵有农，是盖兵农歧而二也。必欲作其勇而用之，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练卒之心，而又择将帅以统之，宽杂征以恤之，使三时务农以备衣食，一时讲武以闲步伍。尤于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之时，益严夫简阅练习之事，则可驱列于御卫之间矣。何忧乎戍非土著而农不知武哉？

至若田有肥瘠之不同，岁有丰歉之或异，而兵食始有不足之虞。臣愿陛下体唐虞三代之心，以足食为念，而又择人以督耕屯，使绳其兼并，课其勤惰，则可致其粒而积贮于仓廪者，陈陈相因矣。虽古之万亿及秭，与夫贮积于豳、粮峙于申者，何以加焉？土地气候之不齐，监牧畜养之不力，而马政始有不蕃之弊。臣愿陛下法唐虞三代之心，以息马为重，而又择人以掌监牧，使之时其刍秣，慎其孕字，则可致其息而克溢于边鄙者，翩翩成群矣。虽古之天闲十二，与夫思马斯藏、骕牝三千者，何以过焉？

诚如是，则将皆智勇而无不良，卒皆果敢而无不精，食皆克裕而无不给，马皆孳息而无不蕃。由是而举外攘之功，有不战，战必胜矣；有不攻，攻必克矣；有不守，守必固矣。将拭目乎四裔畏慕，稽首称藩，边徼无烟尘之警，人民有耕凿之安，而雍熙泰和之治，於铄哉！于今为烈矣。此修内治之政而举外攘之功，所为不可一日而或废者，此也。

洪惟我国家圣圣相承，丕图治理。太祖高皇帝奉天命而肇造邦家，太宗文皇帝顺人心而肃清海宇。其内治外攘之道，垂裕后圣而无穷。仁宗昭皇帝溥惠泽以福苍生，宣宗章皇帝奋德威以安裔夏。其内治外攘之道，仰绍前烈而有光。陛下缵承大统，丕阐洪猷，而于内治外攘之要，盖已知之审而行之至矣。今又以策臣等，而必以尤加意为言。臣愚，又有以知陛下留心于此，此即大禹不自满假、文王望道未见之盛心也。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已略陈之，而于终篇，窃有献焉。夫人主一心，与天地同其量，与日月同其明。天地惟不息，故覆载而无外；日月惟不息，故照临而不已。臣愿陛下体天地日月之不息，宏覆载照临之

大德。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则宗社民生之福,必由此而愈盛;冠带春秋之伦,必由此而咸服。三光六气,必由此而顺行;五岳四读,必由此而奠位。动植之物,风雨霜露之所沾被者,必由此而蕃庶;麟凤龟龙,膏露醴泉与凡休征嘉瑞者,必由此而毕至。将见四方万国,莫不遵道遵路,来享来王,以为尧舜之圣复见于今日,禹汤、文武不得专美于前古。陛下亿万年之洪福,与天地相为悠久矣。臣学不足以知古,才不足以通今,刍荛之言,上渎天听。伏惟陛下俯垂睿览,则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天下把一个人作为主宰,君主把专一的心念作为主宰。因为心念是各种化导的本原,是各种事务的根基啊!君主的专一心念简直太盛大了呀!依据心念来安定内部,内部治理的政事就得到修明;依据心念来驱逐外部敌寇,在外部驱逐敌寇的功业就建立起来。这还忧虑什么奖赏好人、惩罚坏人没得到恰当处理,选任将帅、训练军队还与那适宜的做法不协调,而当今社会还没进入太平欢乐的境地呢?《大学》把这种心念看成是家族、国家、全天下的根本,西汉董仲舒把这种心念看成是朝廷和天下各地的准则,恐怕就因为这个缘故吧?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禀受耳聪目明、通达机智的天资,具备圣明神奇、有文有武的德性,承当上天的大命,继承守护宏大的帝业。自以登基以来,恳切地把治理国家、爱护百姓作为心念,首先励精图治,再加上恭敬节俭。对于安定内部、驱逐外部敌寇的举措,已经没有不都采取的了,而在治理效果上显现出来的东西,也已经很隆盛了。但仍不自我满足,于是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提出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首先举出爵位封赏和刑罚的问题,其次谈到选任将帅、训练军队的事情,又要求臣下我献上切实的意见。臣下我很愚昧,由此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真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啊!可以成为唐尧虞舜,可以成为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可以把太平功业推进到亿万年而更加兴盛了。但臣下我很浅陋,哪里足够用来承奉皇帝要求做出的对答呢?然而竭尽仅有一点儿心得的愚昧,也是臣下我一向

怀有的心愿，敢不跪拜竭尽那山野村夫的浅见，来对陛下稍微能有万分之一的帮助吗？

臣下我私自考虑，上天降生下圣人，而把为君之道的重任交付给他；圣人承奉上天，而主宰整个广大的天下。从内部说来，中原地区仰仗他得到治理；从外部说来，四周少数部族依赖他获得安宁。这样一来，修明内部治理的政事，建立外部驱逐敌寇的功业，哪里能够有一天而不去实施呢？然而探求那关键因素，不超出爵位封赏、刑罚、选任将帅、训练军队这四项罢了。爵位原本用来等待有功劳的人，有功劳是指良善能够在事情上显现出来。如果一定要等待立有功劳之后再封给爵位，那么天下范围内良善还没在事情上显现出来的那些人，必定会落到被遗弃的境地，这还凭借什么能使世人全都清楚所该劝勉的地方而去建立功劳呢？刑罚原本用来等待犯有罪过的人，有罪过是指邪恶真在行为上表现出来。如果一定要等待犯下罪过之后再处罚惩办，那么天下范围内邪恶还没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那些人，必定会进入暂且躲过去的状态。这还凭借什么能使世人全都清楚所应惩戒的地方而去远离罪过呢？这两点，确实就像圣上策问中所晓谕的那样，臣下我还讲论个什么？

臣下我曾经私下观察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期，那时封赏良善的人，具有宽厚而又严肃等三种德行并每天都表现出来的人，就让他当大夫；具有擅长治理而又办事认真等六种德行并每天都恭敬实行的人，就让他当诸侯。有的对英才广泛延揽，有的对政务官、治民官、司法官的合适人选能够任用，以及贤能被礼遇选送，俊士、造士这些优秀人才得到逐级提拔。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等待有功劳之后再封给爵位啊！那时惩罚邪恶的人，给罪犯穿上特异的服饰象征他所犯下的罪过和所受到的刑罚，用来辅助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种教化。法官依靠用刑得当辖制臣民，教导臣民敬重德行。有的违犯官员职责、背离自身官位就一定予以惩办，有的羞辱法律、凌辱具有仁德的人就一定予以处罚，以及用歪门邪道搅乱朝政的人就处死他们而不赦免，违背礼制而用奇异手段迷惑大众的人就杀死他们决不宽恕。所有这一切，都不是等待犯有罪过之后再予以制裁啊！然而又哪

里只是在封赏刑罚上乱忙一气却没有根基呢？完全依据那心念罢了。观察唐尧的警惕模样和虞舜的戒惧情态，对上天要表彰贤德和惩罚罪人的国政勤勉又虔敬地推行开，他们的心念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观察大禹勤勉不懈怠的模样，商汤恐惧的情态，周文王的小心翼翼，周武王的不要产生个人的好恶，对表彰良善、震慑邪恶的事体十分严肃认真，他们的心念又是怎样的一种境界呢？封赏与刑罚具有准则，劝勉与惩戒具有根基，下面没有遗漏掉的好人和遗漏掉的坏人，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啊！

如今想让每个人都转向良善，不等爵位封赏就自我勉励，臣下我为此就希望陛下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封赏良善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使封赏不是白白的封赏，封赏一个人而千万人都知道自勉。这样一来，我朝封赏良善的规则，就同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封赏良善的做法，是同一个标准了。还担心什么天下人不都转向良善呢？如今想让每个人都远离罪过，不等刑罚就自我惩戒，臣下我为此就希望陛下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处罚坏人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使处罚不是白白的处罚，处罚一个人而千万人都知道自戒。这样一来，我朝处罚坏人的政令，就同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惩罚奸恶的做法，是同一个印迹了。还担心什么天下人不都远离罪过呢？像这样去做，良善的人就获得爵位而得到进用了，邪恶的人就崇尚德行而改邪归正了。看重礼义廉耻的行为四处兴起，奸诈浇薄的风习止息下来。百官具有济济一堂的阵势，百姓具有悠闲自得的风气，而太平欢乐的大治景象就到来了。

至于军队归他统领的人是将帅，将帅不是合适的人选，国家就没有倚仗的对象来保持安定。将帅所指挥的人是兵卒，兵卒出现不训练的情况，将帅就没有依凭的力量去获取胜利。况且兵卒的强弱取决于军粮，交战的胜负同马匹关系很大。这样一来，称为将帅、称为兵卒、称为军粮、称为马匹的这四种要素，都是在外部驱逐敌寇的紧要事务，不能缺少其中的任何一项。陛下宏大的筹划和长远的谋略，已经在内心做出决断了，臣下我还要再絮叨个什么呢？从前善于用兵的人认为，统率自己手下的兵卒就要挑选那些兵卒中战斗力强的人，

因为兵卒战斗力不强，就有对骑马射箭不熟悉的忧虑。戍守一个地方就要选用当地的人，因为不是当地人，就有水土不服的忧虑。在某个原野作战就要食用那个原野的粮食，这样差不多就能省去辗转运输的劳苦。守卫一个国家就要骑用那个国家的马匹，这样差不多就能免掉征集的搅扰。像这样去做，即使历经百战也没有危险了。否则的话，一个郡在用兵却从各个郡去调集，不单单没办法卫护百姓的生计，而且有可能削耗民众的力量，确实不是好计策。

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期，那时选任将帅，虞舜只对施布文教恩德的大禹充满希望，周文王只对显扬威风的姜子牙寄予厚望。对四周方国采取军事行动，就有像周宣王所任用的召虎；筹划出更勇猛的作战大谋略，就有像周宣王所委派的方叔。那时训练士兵，西周制度规定，春季和夏季有回师入国、野战宿营的训练活动，秋季和冬季有军队出动、进行大检阅的演习活动。在九百亩成井字形的土地划分的单位中，五人为一伍、百人为一卒的军队编制单位都存在。在农业生产的空闲时间里，军事训练活动也展开。那时的军粮，三年留有一年余粮，具有准备。那时的养马事务，天子的养马场所和国家的养马地点，各有定制。探究那时所有举措的根基，哪一样不是出自帝王的专一心念的运用呢？

众人多至成千上万，其中必定会有一个英杰。能够担任优秀将帅的人才，不是从来就不存在。一定想要了解谁是英杰而任用他们，臣下我希望陛下就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选用将帅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再用精神感召他们，用气类招徕他们。把他们派往纷纭繁杂事特难办的地方，来考察他们的智谋；把他们安排在艰难险阻之中，来考察他们的才能。这样做，尽管像大禹、姜子牙、方叔、召虎那类人，很长时间也不容易获取到，但才能智谋都出众的国士，一定全都会选拔出来并安排在部队的指挥岗位上了。还担心什么聪明人和愚笨人混杂在一起，同类人又忌妒而不宣传别人呢？一个区域的人们，有的是兵士，有的是农民，这是由于士兵和农民到后来分离开才成为两码事的。一定想要鼓起他们的勇气使用他们，臣下我希望陛下就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训练士兵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又

选择将帅统领他们,减少各种赋役体恤他们,使他们在春夏秋三季致力农业生产,衣食不缺,在冬季讲求武备,熟悉阵列。更注意在春夏秋冬举行大规模打猎活动的时候,强化检阅演习的事情。这样就可以部署到作战的行列中去了。还担心什么守军不是当地人,农民不懂得军事呢?

至于田地存在着肥沃和瘠薄的区分,年景有丰收和歉收的差别,军粮开始让人产生不充足的忧虑。臣下我希望陛下体察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用心,把粮食充足挂在心上,又选择合适的人去督察耕作与屯田,让他们制止土地兼并,检查勤劳与懒惰,就可以实现既有粮食吃而仓库又有储藏,储藏又特别丰富了。即使是古代那种粮仓上万成亿座直至亿亿座也数不完的景象,以及在豳地储粮、粮食高高堆积在申伯封地的情形,又凭什么还在当今之上呢?水土气候不一样,养马场所饲养不得力,而养马事务才开始出现繁殖很少的弊病。臣下我希望陛下效仿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用心,把繁殖马匹当作大事,又选择合适的人去掌管养马场所,让他们定期喂好饲料,慎重对待怀驹产驹,就可以实现马匹繁殖而布满边境一带,一匹接一匹地成群结队了。即便是古代王子专用的养马地点十二处,以及马匹雄壮、高马母马养到三千的盛况,又凭什么超过当今去呢?

确实像以上那样做,就会将帅都智勇双全而没有不优秀的,士兵都果断勇敢而没有不精锐的,军粮都充裕而没有不够用的,马匹都繁殖而没有不众多的。由此建立外部驱逐敌寇的功业,不交战就算作罢,只要交战就必定胜利了;不进攻就算作罢,只要进攻就必定夺取目标了;不守卫就算作罢,只要守卫就必定稳固了。将会看到四周少数部族畏惧仰幕,跪拜自称臣属,边境没有战事发生的警报,人民享有耕田凿井的安乐,而太平和美的大治景象,光辉闪耀,在当今属于最兴盛了。这是修明内部治理的政务,建立外部驱逐敌寇的功业,不能有一天荒废的道理,恰恰出自在这里。

只有我们伟大的国家一代又一代圣明的皇帝在递相承接,大力谋求治理。太祖高皇帝奉受天命,创建国家。太宗文皇帝顺应人心,肃清天下。他们内部治理、外部驱逐敌寇的措施,给后代继位的皇帝留

下范例而没有止境。仁宗章皇帝普遍施布恩泽来造福苍生，宣宗章皇帝奋扬仁德与威势来安定四周和华夏地区。他们内部治理、外部驱逐敌寇的措施，继承前代功业又发扬光大。陛下继承帝位统系，大力阐扬远大的谋略，对于内部治理、外部驱逐敌寇的要领，已经了解得很明悉并实行得特周到了。如今又拿这个问题来策问臣下我等人，却一定要用更格外留意作提醒。臣下我很愚昧，又由此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在这一点上特留心，也就正是大禹不自我满足、周文王盼望大道总像尚未看见的盛大用心啊！

陛下策问臣下我的问题，臣下我已经大略作出陈述了，但在答卷末尾，私下还有献呈的东西。君主那专一的心念，与天地的容量同样大，与日月的明亮没差别。天地只因永不止息地运行，所以能覆盖托载一切。日月只因永不止息地升落，所以能照耀不停止。臣下我希望陛下体察天地日月的永不止息，扩展覆盖托载和照耀一切的大德。执持这样的国政，坚固得象金石；施行这样的政令，诚信得如同四季交替。这样一来，国家和民众的吉福，一定会由此更加隆盛。接受华夏文明影响的周边地区，一定会由此全都归服。日月星和天地四时之气，一定会由此按顺序运行流转。泰山等五岳和长江、黄河、淮水、济水等河流，一定会由此固定住本位。动物与植物，只要是风雨霜露所滋润到的东西，一定会由此繁衍众多。麒麟、凤凰、灵龟、神龙和甘露甘泉以及所有显示吉兆祥瑞的东西，一定会由此全部到来。眼看着四方万国，没有哪一处不遵循王者大道和王者大路，前来朝拜归服，以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圣明君主又在今天出现了，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不能在前代独享美名了。陛下亿万年的洪大吉福，与天地一起悠远长久了。臣下我的学识不足以了解古代，才智不足以通晓当今，割草打柴人的言论，亵渎了皇上的视听。跪拜只请陛下从高处看上一眼，那就国家幸运到极点，天下幸运到极点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祁振良译〕

明代宗景泰五年(1454)甲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

殿试策问

[景泰五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以眇躬,祇膺天命,缵承祖宗大业,临御兆民。顾惟负荷之艰,莫究弛张之善。肆虚心于宵旰,冀资弼于忠良。固圣贤乐受尽言,在尧舜惟急先务。何则天下之本,莫有外于家国兵民?朕欲闻其至计何先,切望何最?君心之发,莫有著于礼乐教化。朕欲闻其损益何宜,隆替何系?制治贵于未乱,其方术何良?保邦贵于未危,其谋谟何远?以至为政之宽猛何尚,备边之筹策何长,人才之贤否何由,刑赏之缓急何可,与凡灾祥感召之机何速,夷狄向背之故何在?皆朕之所欲闻者也。夫事贵乎师古,不稽诸古,固无足以为法于今;而施贵乎合宜,不宜于今,又奚可以徒泥诸古?子大夫明先圣之道,来应宾兴贤能之诏,皆得于古而将以施于今者也。其悉参酌,详著于篇,以俟朕之亲览。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在河边慨叹道:流逝的时光就像这河水啊!日夜不停。

建议在郊野实行九分抽一的助法，国都采用十分抽一的贡法。公卿以下的官员一定要有专供祭祀的圭田，圭田每家五十亩。如果他家还有剩余的壮劳力，再每人分给二十五亩。埋葬或搬迁，都不离开本乡范围。本乡田地里属于同一井田的人家，平时出入，彼此友爱，防备盗贼，相互协助，发生疾病，相互照顾，这样，百姓就会亲近和睦起来了。

忠实和宽恕，距离大道就不远了。放在自己身上而自己不高兴的事情，也不要放在别人的身上。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凭借渺小的自身，恭敬地奉受天命，继承祖宗的大业，统治天下百姓。但想到身负重任的艰难，不能彻底闹明白放松与加紧的合适做法。在早晚之间一直虚心等待，希望从忠良那里得到帮助。圣贤原本就喜欢接受毫无隐藏的言论，在唐尧虞舜那里只管去解决头等大事。为什么天下的根本，没有超出家族、国家、军队和百姓之外的呢？皇帝我想听一听这方面最好的谋划哪一项占据首位，殷切的希望哪一种数第一？君主心地的显露，没有什么能比礼乐教化更显著的了。皇帝我想听一听那减损和增益怎样做才合适，兴盛与衰落又同什么相联系？制定好治理措施，可贵处在于还没发生动乱时就已经就绪。那方法要数什么才有效呢？保有国家，可贵处在于还没出现危险时就已经保有，那谋略要数什么才长远呢？以至于进行治理中宽大与严厉的策略应当重视哪一种，防守边境的计策究竟哪一条真高明，人才贤良与低能应通过什么来区分，刑罚与奖赏的先用后用怎样才会行得通，以及灾异祥瑞感应的契机哪一种最迅速，少数部族归服与背离的原因究竟在哪里？这些都是皇帝我想听一听的东西。事情应重视效法古代，不考察古代，固然不足以给今天提供准则，但施行要重视合乎时宜，对当今不适合，又怎么可以只是局限在古代呢？你们这些读书人明了古代圣人的大道，前来应奉礼遇贤能的诏令，都是对古代很有研究并准备施用到当今的人物。请悉心参

取酌定,详明地写在答卷上,来等待皇帝我亲自阅览。

徐溥　殿试对策

徐溥(1428～1499)　字时用,号谦斋,宜兴(今属江苏)人。景泰五年(1454)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居内阁十二年。凝重有器度,每每从容辅导,爱护人才,遇大狱则曲加调合。72岁去世。著有《谦斋文集》。

臣对:臣闻圣人之治本于道,圣人之道本于心。盖心者,万化之原,万事之本也。尧舜以是心而帝天下,三王以是心而王天下。惟其道本于心,故圣人之道备;惟其治本于道,故圣人之治隆。故凡欲求圣人之治者,不可不求其道;欲求圣人之道者,不可不求其心。董仲舒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即此意也。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睿智,足以有临,圣神文武,自强不息,绍祖德而诞膺天命,应人心而中兴邦家。勤励以亲万几,惇慎以弘万化。纯孝之德,播闻于天地之间;仁厚之泽,渐被于覆帱之下。然犹虑负荷之艰,而欲究弛张之善,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臣有以知陛下是心,即尧舜于众好察迩言之心,汤文用人惟己望道未见之盛心也。其复隆古之至治,而开万世之太平,端在于此。顾臣愚昧,何足以奉大对?然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陛下之明命乎!请因圣问所及而条陈之。

窃以家者,一国之所视效;国者,天下之所取法;而兵民,又所卫民生而固邦本者也。陛下于齐家治国之道,练兵安民之方,皆已行之有其效矣。兹犹欲闻至计何先,切望何最,臣愿陛下正心,以为家国兵民之本,而绍述于唐虞三代之迹。正伦理,笃恩义,如尧之亲睦九族;道以德,齐以礼,如尧之平章百姓。则九族既睦,百姓昭明,而家可齐、国可治矣。修车马,备器械,而时其简教,如成周之治兵大阅有定制;制田里,薄赋敛,以给其衣食,如成周之分田制赋有常法。则兵农相资,守养相益,而可利用厚生矣。

若夫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而教化又所以复民性而正民德者也。陛下于制礼作乐之方，敷教弘化之道，皆已行之有其验矣。兹犹欲闻损益所宜，隆替所系，臣愿陛下正心，以为礼乐教化之原，而宪章于唐虞三代之制。典礼者，如伯夷之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典乐者，如后夔之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则损益适中，而礼备乐和矣。惇典庸礼，敬敷五教，如唐虞之教民者以教其民；弘敷五典，式和民则，如成周之化民者以化其民。则教化兴行，而有隆无替矣。

治者，乱所倚也。虽当治定功成之日，苟或顷刻敬畏之不存，则乱亡由是而至。必如《书》之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然后未乱之治可制。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制治之心，兢兢焉戒敕天命，而无时少怠，无微少忽，则皇图可保，如磐石之固矣。安者，危所伏也。虽当民康物阜之时，苟或毫发几微之不察，则危殆由此而生。必如周之文王，民已安矣而视之犹若有伤，然后未危之邦可保。臣愿陛下心唐虞三代保邦之心，业业焉儆戒无虞，而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则宗社可保，如泰山之安矣。

《书》曰：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爱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诗》曰：不刚不柔，敷政优优。圣人抚世酬物、因地制宜之良法也。陛下诚如《诗》、《书》所称，宽猛相制，刚柔相济，则阳以舒之，阴以敛之，执其两端而能用其中于民矣。《书》曰：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诗》曰：薄伐猃狁，城彼朔方。圣人安夏攘夷、慎固封疆之要道也。陛下诚如《诗》、《书》所载，内修文德，外严武备，使顿兵以守，务耕以食，高城坚垒，而能却其侮于外矣。

君子用，则进其国于昌明；小人用，则降其国于幽暗。人才贤否之由，诚不可不知也。陛下屡诏中外，省进贤退否矣。兹犹欲闻贤否之由，臣愿陛下正心，以为举错之公。贤者必进，而不肖者必退，如孔子所谓举直错诸枉，则奔竞之途塞，九德咸事，野无遗贤矣。赏必施于君子而后民劝，刑必加于小人而后民威。刑赏缓急之宜，诚不可不审也。陛下申敕诸司，严酌赏刑罚矣。兹犹欲闻缓急之宜，臣愿陛下正心，以为劝惩之本。有罪者必刑，有德者必赏，如《虞书》所谓黜幽

而陟明,则侥幸之心沮,百工惟时,庶绩咸熙矣。

人事有得失,而灾祥不能无徵应也。陛下诚省身修德,敬天勤民于上;群臣咸尽忠竭力,奉法修职于下。则雨旸顺而百谷登,祸乱销而千灾殄矣。时政有治忽,夷狄不能无窥伺也。陛下诚贱货贵德,爱民好士为之本;诸侯咸摅诚宣威,练兵鼓勇为之用。则信义立而强梗化,夷狄宾而蛮戎服矣。

凡此数者,何莫而非本于陛下一心之运用乎!夫心固为致治之本,而古又为致治之法。傅说所谓事不师古,以克永世,匪说攸闻。孟子所谓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必因先王之道是也。若使徒稽诸古而不以施于事,则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泥诸古而有不宜于今,则为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必益之损之,与时宜之,如《中庸》所谓时措之宜,乃可也。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略陈之矣。臣于终篇,窃有献焉。臣惟天地之所以能成岁功者,以其常运之不已也;帝王之所以能成治功者,以其常德之不衰也。陛下德配天地,明同日月,诚又存持久之心,秉有常之德,则何所往而不宜哉!《书》曰:常厥德,保厥位。将见四三王而六五帝,参天地而赞化育,历数衍亿万斯年之久,声名施中国蛮貊之遥,皆在于此。尚何负荷之艰之足虑哉!臣荷蒙教育之恩,来应宾兴之诏,学不足以传古,识不足以通今,误辱九重之清问,献以一得之愚思。干冒天聪,不胜怖惧。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人的治理依据大道,圣人的大道依据心念。因为心念是各种化导的来源,是各种事情的根本。唐尧虞舜凭借这一心念而称帝天下,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凭借这一心念而称王天下。只因那大道依据心念,所以圣人的大道相当完备;只因那治理依据大道,所以圣人的治理非常隆盛。因而凡是要谋求圣人大道的人,不能不探求他那心念。西汉董仲舒所说的:端正君主的心念来端正朝延,端正朝延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来端正四方,也就是这个意思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耳聪目明,通达机智,足以驾驭天下,

又圣明神奇，有文有武，自强不息，继承祖宗的德业又奉受天命，顺应人心又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勤奋激切来亲自处理各种政事，勤勉谨慎来扩展各种化导。十分孝顺的德行，播扬在天地之间；仁慈宽厚的恩泽，延及到苍天覆盖的所有地方。但仍然忧虑身负重任的艰难，想要探究放松与加紧的合适做法，于是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提出清晰而详明的询问。臣下我由此就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的这种心念，也就是唐尧虞舜对众人喜好体察浅近言论的心念，是商汤和周文王用人全在自身、盼望大道却好像尚未见到的盛大心念啊！恢复隆盛古代的最美好的治理状态，开创千秋万代的太平局面，确实就在这上面。但臣下我很愚昧，哪里足以承受对朝廷的回答？然而敢不满心一片纯洁，来对答称扬陛下的明确命令吗？请求按照圣上策问所提到的问题，逐条做陈述。

臣下我私下认为，家族是一国所观望效仿的对象，一国是天下所取法的对象。而军队和百姓，又是卫护民众生计和巩固国家根本的因素啊！陛下对整顿好家族、治理好国家的准则，训练军队、安定百姓的方法，都已经付诸实施又有效果了。如今仍然想听一听最好的谋划究竟哪一项确占首位，殷切的希望又是哪一种确属第一。臣下我希望陛下端正自己的心念，作为家族、国家、军队和百姓的根本，对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轨迹加以继承发扬。端正人伦纲常，加厚恩德仁义，像唐尧那样使自己的宗族亲近和睦起来。用道德来引导，用礼制来统一人们的行为，像唐尧那样辨明各个氏族。这样就同族人和睦，各个族姓明显区别开而又亲密无间，家族就能够得到整顿，国家就能够治理好了。修整车辆马匹，完善武器装备，又按固定时间进行检查训练，，像西周那样整治部队、进行大检阅具有固定的制度。搞好土地分配，减轻赋税徭役，来使百姓衣食充裕，像西周那样分配土地、规定赋税具有不变的制度。这样就士兵和农民彼此补充，守卫和养护相互促进，而能物尽其利，使民众生活宽裕了。

至于安定上面，治理民众，没有能比礼仪更有效的了；移风易俗，没有能比乐舞更有效的了。而教化又是恢复人们天性、端正人们品德的手段。陛下对制定礼仪、创作乐舞的办法，普及教育、扩展化导的准

则，都已经付诸实施并有效验了。如今仍然想听一听减损和增益究竟怎样做才合适，兴盛与衰落又同什么相联系。臣下我希望陛下端正自己的心念，作为礼乐教化的本原，对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制度加以效法。负责礼仪的官员，都像舜时的伯夷那样，早晚都很恭敬，祭祀陈词正直又清明；负责乐舞的官员，都像舜时的后夔那样，八类乐器的音律非常和谐，相互次序不颠倒。这样就损益恰到好处，而礼仪完备、乐舞和协了。用淳厚的态度去推行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种伦理纲常，去行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平民的礼仪，恭敬地施布五种教化，像唐尧虞舜教化百姓这样去教化百姓；广泛地施布五种伦理纲常的教化，使民众和协，具有行为的准则，像西周化导民众这样去化导百姓。这样就教化兴起盛行，只有隆盛而无衰败了。

大治也是大乱所依存的客体。即使在大治实现、大功告成的时候，如果顷刻间恭敬畏惧的心念不保持了，大乱灭亡就会由此到来。一定要像《尚书》中所讲的那样：我统治亿万百姓，害怕得就像用朽烂的缰绳驾驭六匹马所拉的车辆。这样做之后，在乱亡发生以前，治理就能够预先部署妥当。臣下我希望陛下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制定治理措施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十分警惕地对上天的命令保持戒惧，没有片刻的稍微懈怠，没有细微的稍略疏忽，就会保有帝业，像磐石那样稳固了。安宁也是危险所隐伏的客体。即使在百姓安康、物质丰富的时候，如果对事物的苗头没进行特细致的体察，危险就会由此产生。一定要像周文王那样，民众已经安定了，但仍像他们受到伤害似地对待他们。这样做之后，在危险出现以前，国家就会事先保住。臣下我希望陛下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保有国家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十分恐惧地对不应发生的意外情况保持警戒，不沉溺在安乐享受中，不过度寻欢作乐，就会保住天下，像泰山那样安稳了。

《尚书》中说：国家太平安定，就要倡导正直；社会上强硬而不顺从，就要采用镇压的手段；社会上平和顺服，就要采用宽柔的方式。臣僚应持守刚强来规正君主，君主也要执持柔弱来接纳臣僚。《诗经》上说，既不刚强也不柔弱，施起政来悠闲自得。这都是圣人安抚社会、应对事物、因地制宜的好办法。陛下确实能像《诗经》、《尚书》中所讲的

那样，宽大与严厉相互结合，刚强与柔和彼此补充，就会阳气似地舒展万物，阴气似地收藏万物，把握住太过分和跟不上的界限，能对百姓施用那最为适中的尺度了。《尚书》中讲：距天子京师一千里以外的那五百里属于绥服地区，其中三百里设置主管文教的官员推行教化，二百里奋扬武力来保卫天子的直辖地区。这是用文教来治理内部，用武力来治理外部。《诗经》中说：讨伐猃狁部落，在北方修筑城池。这都是圣人安定华夏、驱逐异族、慎重巩固多事边境的紧要对策。陛下确实能像《诗经》、《尚书》所载述的那样，在内部修明礼乐教化，在外部加强武备，命令驻扎好军队来守卫，从事农耕来解决军粮问题，把城池修得高高的，把堡垒修得很坚固，就能在外部击退进犯者了。

君子得到进用，就会把国家推进到昌明的境地；小人得到进用，就会使国家陷落到幽暗的状态。人才贤能与低劣的区分途径，确实不能够不了解啊！陛下多次命令朝廷内外，已经注意进用贤能，斥退庸才了。如今仍然要听一听贤能与低劣究竟通过什么来辨别，臣下我希望陛下端正心念作为选拔安排的公正标准，贤能的人一定加以进用，不成器的人一定予以贬斥，像孔老夫子所说的那样：把正直的人提拔出来，安排在邪僻人的上面。这样就会钻营的门路被堵塞住，在九种德行范围以内的人全都各任其职，民间没有被遗漏的贤才了。奖赏一定要赐予给君子，然后百姓才会劝勉；刑罚一定要施加给小人，然后百姓才会心中畏惧。刑罚与奖赏先用后用的适当办法，确实不能够不明悉啊！陛下命令告诫各个机构，已经强化封赏与刑罚了。如今仍然要听一听先用后用的适当办法，臣下我希望陛下端正心念作为鼓励和惩戒的根本，犯有罪过的人必定予以惩处，具有道德的人必定予以奖赏，像《尚书·虞书》中所说的那样：罢免昏庸的人，提升贤明的人。这样就会使侥幸的心思受到抑制，百官只往好处去努力，各种事情都振作起来了。

人事存在着得失，灾异祥瑞就不能不出现与之相应的征兆。陛下确实省察自身，修明道德，在上面敬奉上天，为百姓操劳。群臣全都献出忠心，竭尽力量，在下面遵守法纪，履行职责，就会风调雨顺而粮食大丰收，祸乱消除而各种灾害都消失了。当代的国政存在着混乱的现

象，异族就不能不寻找机会骚扰。陛下确实去轻视珍奇物品，看重仁德，把爱惜民众、喜好士人作为根本。宗室藩王都抒发忠诚，播扬威力，把训练士兵、激励斗志作为用场。这样就会信义确立，拒不服从统治的人被感化，四周各少数部族都前来归服了。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哪一方面不是出自陛下专一心念的运用呢？心念固然是实现大治的根本，而古代的东西又是实现大治的效法对象。正像商朝重臣傅说所讲的：事情不取法古代，想让政权能永远传下去，这可不是我傅说所曾听说过的。孟子所讲的：登临高处，一定要经由丘陵；到达低处，一定要随顺河流湖泽；进行统治，一定要沿用古代圣帝明王的大道。假设只是考察古代却不拿来施用在具体事情上，那就光是个妥善，不能足够用来进行治理。只是被古代局限住，却与当今不适应，那就光是个法则；却不能自动来实行。所以一定要增益它，减损它，与当今相适应。像《中庸》所说的措置当今事务的合适做法，这才能够行得通。

陛下策问臣下我的事体，臣下我已经大略做陈述了。臣下我在答卷末尾，私下还有献呈的东西。臣下我想来，天地能够做成每年使万物生长的事情，原因在于天地永远运行而不停止；帝王能够成就治理的功业，原因在于帝王长久保持的仁德不衰败。陛下大德配得上天地，光明犹如日月，确实又留存住持久的心念，秉持不变的仁德，那就指向哪里却还不适宜呢？《尚书》中说：永不改变那仁德，保有那王位。这就眼看着同夏禹、商汤、周文王及周武王这三王并列而成为第四个王，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并列而成为第六个帝，与天地并立为三又辅助化生养育，国运绵延亿万年之久，声名播扬到全华夏和所有少数部族居住的区域，全都取决于这一点。还有什么身负重任如此艰难真让人忧虑呢？臣下我蒙受陛下教养化育的恩德，前来承奉按贵宾礼节荐举贤才的诏令，学问不足以传接古代，见识不足以通达当今，辱没皇帝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献上一星半点的愚昧想法。冒犯圣上的听闻，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祁振良译〕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丁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殿试策问

[天顺元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帝王之治天下,必以求贤安民为首务,盖古今之所同也。然古之士进以礼,退以义,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今何其立功之志弱而利禄之心胜,奔竞之风未息而廉介之节少著,其失何由?古之民有恒产,有恒心,家给人足,比屋可封。今何其务本者少而逐末者多,偷薄之习浸长而礼让之俗未兴,其弊安在?朕自复位以来,图惟治理,夙夜靡宁,求贤必欲得真才,安民必欲获实效,将使士正其习,民淳其风,庶几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子大夫其援经据史,酌古准今,明以条陈,毋曲所学,毋卑所志,务求切至之论。朕将择而行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博学可以从政的学问,在于宣明美好的德行,在于亲近百姓,在于达到良善的最高境地。知道最高境地,然后才能方向确定;方

向确定，然后才能宁静；宁静，然后才能安定；安定，然后才能思虑；思虑，然后才能有所收获。

一旦能克制自己的私欲而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礼仪，天下人都会称你为仁人。奉行仁德在于自己，哪里在于别人呢?颜渊说：请问仁德的具体内容。孔子回答说：不合乎礼仪的东西不看，不合乎礼仪的东西不听，不合乎礼仪的话不说，不合乎礼仪的事不做。

仁义礼智，不是别人从外部给我的，是我原本固有的资质，不过不曾探索罢了。所以说，一经寻求就会得到，一旦放弃就会失掉。有的人相差一倍五倍甚至无数倍，就是不能充分发挥自己才性的缘故。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帝王治理天下，必然把寻求贤明之士、安抚百姓作为首要大事，这是古今相同的。然而，古代的士人按礼法求得仕进，依道义寻求退隐之路，在上面就为德业尽力，在下面就为老百姓着想。现今为什么士人建立功业的志向减弱而追求利禄的心思强烈，投机钻营之风没有停息而廉洁耿介的气节不明显了，这其中的失误在哪里呢?古代的平民有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因而有坚定不移的心念。家家丰足，人人安乐，户户可以受到特殊的表彰。现今为什么从事农业的人减少而致力于商业活动的人增多，不厚道的习气渐渐增长而礼让的风气没有盛行开，这其中的弊病在何处?皇帝我自从恢复皇位以来，图谋治理，从早到晚不敢安宁。寻求贤才，一心想得到有真才实学的人，安抚平民，一定要获得实效，使士人矫正习俗，百姓风气淳朴起来，差不多达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兴盛状态，必定有一套办法。众位士子可以援引经典，依据史书，斟酌古代，衡量当今，逐条明白地叙述出来，不要扭曲自己所学的东西，不要降低自己的志向，务必求得切当到极点的论断。皇帝我准备采择实行。

黎淳　殿试对策

黎淳（1423～1492）　字太朴，华容（今属湖南）人。天顺元年（145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以狷介著称。撰有《龙峰集》。

臣对：臣闻帝王之治天下，在乎求贤安民而已；求贤安民，在乎智仁兼尽而已。盖求贤者，智之事；安民者，仁之事。非智不足以求贤，非仁不足以安民。智以求贤，则迪知忱恂，而真才无不得；仁以安民，则博施济众，而实效无不臻。真才既得，士习由是而正；实效既臻，民风由是而淳。尧舜所以帝天下而陶民熙皞者，此也。禹汤文武所以王天下而措世隆平者，亦此也。故《书》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其是之谓欤？

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全刚健中正之德，曩者嗣大历服，已历十有五年。日御经筵，讲求治理，声色货利无所通殖，宫室苑囿无所增广，惠泽覃被于八荒，声教洋溢于四海者，久矣。兹乃应天顺人，复登宝位，诞膺新命，光复旧物，言动不违乎祖训，举措允合乎天心，所谓多难兴邦而殷忧启圣者也。是以伦纪粲乎其肇修，风俗蔼乎其丕变。而功业文章巍然焕然，已驯致乎唐虞三代之隆矣。然犹体道谦冲，不自满足，特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以求贤安民为务，期在士正其习，民淳其风，且拳拳欲求切至之论。臣愚，有以知陛下此心，即舜之好问好察、禹之闻善则拜、文王望道如未见之心也。其所以复大一统文明之治，绵千万载太平之业，端在此矣。顾臣愚陋，无所知识，然明命下临，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于万一乎！

臣惟天生斯民，不能自治，而必作之君；君抚斯民，不能独理，而必资乎臣。故人君之为治，不必务乎至高难知，惟在求贤而已；不必务乎至远难行，惟在安民而已。昔者唐虞三代之求贤也，若时若采之登庸，三德六德之咸事，股肱耳目皆有所托，贤德忠良举无所蔽，或三宅三俊之克即，或义德容德之继用。其得贤之盛如此，岂无自而然

哉?盖由智之极其明耳。若尧之畴咨明扬,本于钦明;舜之龠受敷施,本于浚哲。禹则明明于万邦,汤则经德而秉哲,文武则聪明齐圣,克知灼见。谓非智之极其明乎?夫惟智之极其明,如鉴之空,而妍媸自辨;如衡之平,而轻重自分,贤否不得以混淆矣。然上之人既明于知人,而贤者乃得行其志。是故其进也以礼,不枉道以干禄,不炫玉而求售。盖主乎辞逊,而不轻于进也。其退也以义,或见几而必作,或不合而即去。盖主乎断制,而不难于退也。所以士之用于当世者,必为上为德,而使君为尧舜之君;为下为民,而使民为尧舜之民。又岂不行其道而尸位素餐哉?所谓求贤而得真才者,以此。

至若唐虞三代之安民也,黎民有於变之休,万国有咸宁之效,平治水土而烝民乃粒,辑宁邦家而兆民允殖,有夏为之修和,四海为之永清。其安民之功如此,又岂无自而然哉?盖由仁之极其爱耳。若尧之协和万邦,本于其仁如天;舜之四方风动,本于其德好生。禹则德惟善政,汤则克宽克仁,文武则怀保小民,宠绥四方。谓非仁之极其爱乎?万物一体,而惠泽为之溥施;天下一家,而教化为之大行,远近咸归其极矣。然上之人既笃于爱民,而下民乃得遂其生。是故民有恒产,必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而游手游食者无有也。民有恒心,必孝弟忠信之是修,放辟邪侈之不作,而败礼乱常者无有也。所以民之生于其时者,家给人足,而欢然于仰事俯育之余;此屋可封,而蔚然于礼乐教化之内。又岂衣食是忧而五品之不逊哉?所谓安民而获实效者,以此。

夫二帝三王智以求贤,仁以安民,而得其真才实效于是之极盛矣。自时厥后,若汉唐宋之英君,虽或知以求贤安民为务,而于智仁不能兼尽,是以真才未必得,实效未必臻。回视唐虞三代之治,迢遥其不可及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命以创鸿业;太宗文皇帝,顺人心而靖邦家。其求贤安民之道,远绍帝王而有光。仁宗昭皇帝,敷大惠以宁四海;宣宗章皇帝,明峻德以绥万方。其求贤安民之道,近述祖宗而无间。夫何承平日久,趋向渐乖;士习或流于贪纵,民风或至于浇漓。朝廷虽急于求贤,然为士者立功之志弱,而利禄之心胜;奔竞之风未息,而廉介之节少著。岂所谓求贤者徒徇虚名,而未得真

才之故欤?使得真才而用之,尚何有是失哉!朝廷虽急于安民,然斯民务本者少,而逐末者多;偷薄之习浸长,而礼让之俗未兴。岂所谓安民者徒事虚文,而未臻实效之故欤?使臻实效而验之,尚奚有是弊哉!仰惟陛下复位以来,图惟治理。夙兴夜寐,汲汲于求贤;宵衣旰食,切切于安民。然求贤必欲得真才,而安民必欲获实效,将使士正其习,民淳其风,庶几唐虞三代之盛,必有其道者。臣愚以为,在陛下智仁兼尽而已。

臣伏睹陛下,详经制以网罗天下之贤,或由科目举,或由胄监选,或以贤良方正荐,或以怀材抱德征。此陛下求贤如渴之心也。奈何人藏其心,不可测度,直者似讦而刚者似傲,佞者似忠而诈者似信,所谓珉中玉表而凤鸣鸷翰者也。况秉铨衡者,未尽其公;司考课者,或乖乎正。回邪谄媚之徒,得跻于显融;而刚方廉洁之士,或困于诋毁。真才何由而得乎?陛下求贤,果欲得真才,必本乎此心之智,洞察其贤否,灼见其虚实,励精选举之方,申严考课之法。登崇俊良,简任忠直,置之庙堂之上,布之藩臬之中,言行足以表率乎群僚,政事足以抚绥乎黎庶。譬之木焉,本端而末自直;譬之水焉,源澄而流自清。将见今之士,进必以礼,而不蹈希世取宠之非;退必以义,而咸知固位贪权之耻。急于行道济时,而奋立功之志;力于输忠效劳,而忘利禄之心。以恬静为尚,而奔竞之风自息;以贪墨为戒,而廉介之节自著。即《书》所谓允迪厥德,谟明弼谐;《诗》所谓济济多士,秉文之德者也。尚何士习之不正哉!

臣伏睹陛下,颁明诏以轸念元元之苦,或蠲租税以宽之,或发帑藏以济之,或申节俭之制,或开减省之条。此陛下视民如伤之心也。奈何民生多欲,因物有迁,夏暑雨而阻食,冬祁寒而阻衣,孤独鳏寡颠连而无告,饥馑流移濒死而难存,宜乎礼义不兴而奸宄未止也。况司民牧者,乏抚字之勤;职风化者,乖明伦之教。词讼日繁,而刑清之颂不作;田野就荒,而击壤之歌未闻。实效何由而获乎?陛下安民,果欲获实效,必本乎此心之仁,如疾痛之切于一体,如气脉之贯于四肢,儆戒其劳来之职,严督其劝课之责。所欲与聚,所恶勿施,置之于衽席之安,措之于富寿之域。比闾族党,有义以相保;亲疏尊卑,有礼以相

接。譬之网焉，纲举而目自张；譬之衣焉，领挈而裘自顺。将见今之民，产必有恒，不游情而弃业；心必有恒，不妄作而陷刑。知农事不可缓也，咸耕凿以务其本；知商贩为可贱也，不市利以逐其末。乡间有塾，则考德问业，而偷薄之习自止；里社有约，则好善恶恶，而礼让之俗自兴。即《诗》所谓群黎百姓，遍为尔德；《易》所谓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者也。尚何民风之不淳哉！夫如是，则陛下之治天下，端不异于唐虞三代之盛矣。此臣愚见，断以为智之明足以求贤，仁之爱足以安民，是以其效自有不期然而然者也。

然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略陈之矣。而于终篇，窃有献焉。夫求贤安民，固本于陛下之智仁；而智仁之尽，尤在乎陛下之一心。盖心者，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本根，所以统五官而令百体者也，所以恭天地而赞化育者也。陛下必欲常存是心，又必以敬为之主焉。静而主敬，以全其心之体；动而主敬，以达其心之用。以之求贤，则智极其明；以之安民，则仁极其爱。然而是敬，奚翅为智为仁，以尽求贤安民之道而已乎！至于视听言动，一循乎天理；好恶用舍，必合乎时中。殆见四方万国，必由此而咸和；九夷八蛮，必由此而宾服；五岳四渎，必由此而效宁；四时五行，必由此而顺序。旷世之祥，于是乎并见；诸福之物，于是乎骈臻。宋儒程子所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者也。如是，则陛下之治，卓冠百王而垂亿万年之休，与天地相为无穷者，自兹始矣。

臣学识肤浅，不能援经据史，酌古准今，谨直述以对。若夫曲所学以阿世，卑所志以徇时，则臣不敢以自处也。伏惟陛下少垂睿览，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在于寻求贤明之士和安抚百姓而已。求得贤明之士和安抚百姓，在于完全发挥自己的智慧仁德。寻求贤明之士，属于发挥智慧的事情；安抚百姓，属于仁德方面的事情。无智慧，不足以求得贤良；非仁德，不足以安抚百姓。以智慧求贤良，那就确知他们具有古人所讲的九种德行，而凡属真才实学的人没有得不到的。以仁德安抚百姓，广泛施予恩惠，帮助百姓

渡过难关，而实际效果没有达不到的。真有才学的人访求到了，士人的习尚因此得以匡正；实际效果达到了，民众的风俗因此而变得淳朴。尧舜之所以能称帝天下，而使百姓悠闲安乐，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禹、汤、周文王与周武王之所以能称王天下，使社会安宁昌盛，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尚书》上说：在于了解人，在于安抚百姓。又说：了解人就圣哲，就能任用官员。安抚百姓就仁惠，黎民就怀念他。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具备聪明睿智的资质，全面拥有刚健正直的德行，从前继承祖宗帝位，已有十五年了。每日亲临经史讲席，寻求治国之道，不贪图声乐美色和财货私利，宫室苑囿不增加，恩泽广施于八方极远之地，声名教化传扬四海各地，已经是很长时间的了。这时又承应上天，顺从民心，重登皇位，再度承受天命，光复大业，言行不违背祖先训示，举措合乎上天心意，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多经磨难会使邦国兴盛，忧患深切会启迪圣人啊！因此人伦纲纪开始得到整顿，十分光彩；社会风尚发生重大变化，更加协和，而功业和光明既盛大又卓著，已经逐渐达到唐虞三代的兴盛了。然而陛下还体察道义，虚心不满足，特地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提出清晰而又详尽的策问。首先把求取贤良、安抚百姓作为要务，期望在于士人能纠正不良习尚，百姓的风气变得淳朴，又殷切希望得到切当至极的论述。臣下我很愚昧，由此也确有理由地知晓陛下这一心念，也就是舜喜好询问，喜好体察浅近言论的心念，大禹听到善言就下拜的心念，周文王希求治国之道犹如未看到的心念。陛下能恢复大一统文明昌盛的局面，延续千万年太平基业，原因恰恰就在这里。但臣下我愚昧鄙陋，无所知晓，然而陛下明诏下达，敢不满心一片纯洁来对答万分之一吗？

臣下我想来，上天降生下万民，他们不能自己管理自己，必须立一个君主统治他们；君主安抚百姓，一个人不能治理，必须依靠臣子。因此君主统治国家，不必寻求极高难了解的事去做，只要访求贤良之士就可以了，不必去寻求极远难施行的事去做，只要安抚百姓就可以了。过去唐尧虞舜、三代帝王求访贤才时，能精通历法，能处理

好政务，就进用；具有三种德行或六种德行就都委任职务。如同自己的耳目、股肱的大臣都有托付，贤德忠良之士推举出来没有遗漏，有的让政务官、治民官、司法官都适得其人，各称其职；有的继承前王的选才准则，依从前王的宽容大德。那时求得贤良之士的盛况如此，难道是没有原因就达到这个样子的吗？这是由于君主的智慧发挥到极点而已。如尧访求任用人才，靠的是恭敬与明察，舜并用三德和六德之人，施布政教，靠的是深谋大智。禹向天下各地显示君臣英明，商汤奉行道德，保持明哲敬畏。周文王、武王则聪明神圣，洞察所任官员的心地。这能说不是智慧达到极点吗？只因智慧发挥到极点，像空明的镜子，美丑自然可以分辨出来，如公平的衡器，轻重自然会区别出来，贤良与低劣就不会混淆了。作为君主知人善任，那么贤良之士才能够施展其抱负。因此按礼法寻求仕进，不通过歪曲大道来寻求俸禄，不靠炫耀卖弄来求得任用。把退让谦逊作为根本，不轻易仕进。按道义隐退，有的发现隐微即实施，或不合己意而离开。把自己的决断作为依据，不会为隐退而恋恋不舍。因此，士人在当世被任用，一定在上面就为德业尽力，使国君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在下面就为普通百姓着想，使百姓成为尧舜那时的百姓。他们又怎么会不实施大道，而白白占着官位吃闲饭呢？所谓求取贤良人才而能得到真正的人选，就是因为以上的道理。

至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安抚百姓，百姓有随教化而遂变的美德，天下各地有安定的实效。平治水土而百姓有饭吃，安抚各地而百姓繁盛，华夏因而国政修明协和，天下因此太平清明。安定百姓的功业如此，又难道没有原因就自然达到这个样子的吗？这是由于仁德慈爱达到极点罢了。像尧使天下和睦共处，源于他仁德如天，舜使四方响应，源于他有好生的仁德。禹是仁德体现在美好的国政上，汤是宽厚仁爱，周文王与武王是关怀百姓，安抚四方。这能说不是仁爱达到极点了吗？天下万物为一整体，而恩泽向他们普遍施布；整个天下为一家，而教化向百姓大规模实施，远近民众都归向那最高的仁德了。作国君的，既然深厚爱民，于是百姓就得以顺利生活了。因此百姓有房屋土地等不动产，必定建造五亩的宅院，周围种上桑树；有百

亩土地，官府不耽误他们的耕种时间，游手好闲白吃饭的人也就绝迹了。百姓具有不迁往别处去的心愿，一定会养成孝悌忠信的好风气，不会去干邪恶奸诈的事情，而败坏礼教违反纲常的人也就不会存在了。因此百姓生活在那个时代，家家丰足，人人富裕，在侍奉老人、养育后代之余非常欢乐；家家都有德行，人人可以旌表，在礼乐教化的范围内十分兴盛，又哪里还会忧虑衣食，出现伦常不顺从的事情？所说的安抚百姓而获得实效，就是因为以上的道理。

尧舜二帝，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用智慧访求贤良，靠仁德安抚百姓，得到真正人才，治国有实际效能，达到极盛了。自此以后，像汉、唐、宋的英明君主，虽然有的也清楚把访求贤良安抚百姓作为天下要务，但对于智慧、仁德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因此真正的才学之士未必全都能得到，治国实效未必能达到。回过头来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相比，是相差遥远无法赶上的。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顺应天命，天创大明基业；太宗文皇帝，顺应人心而安定国家。他们访求贤良、安定百姓的做法，远继上古帝王又发扬光大。仁宗昭皇帝，广施恩泽安定天下；宣宗章皇帝，宣明盛大的仁德来安抚各地。他们访求贤良、安抚百姓的做法，承继祖宗的事业没有丝毫差错。为什么国家长久太平，趋向渐渐背离正道，士人习气有的流于贪婪放纵，民间风气竟发展到浮薄？朝廷虽然急迫地访求贤良之士，然而作为士人建功立业的志向却在减退，而追逐利禄的心思却在炽热；投机钻营的风气没有停息，而廉洁耿直的气节不明显，难道不是因为访求贤良的人只求虚名，而没有得到真正的才学之士吗？假使真正的才学之士被任用，哪里还有这样的过失？朝廷虽然急切安抚百姓，然而平民从事农业的很少，而追逐工商末业的人多，不厚道的习气渐渐增长，而礼让的风俗没有兴盛起来。这难道不是由于安抚百姓的人只作表面文章而未达到实际效果吗？假使达到实际效果而得以验证，还会有这样的流弊吗？仰望敬思陛下恢复皇位以来，只求治理天下，不论早晚，用心寻求贤良，勤于政务，急切安抚百姓。然而访求贤良一定想得到真正有才学的士人，安定百姓一定想获得实际效果，使士人矫正不良风气，百姓民风淳朴，差不多达到唐尧虞舜和夏

商周三代的兴盛局面,必然会有达到的方法。臣下我愚昧地认为,就在于陛下的智慧仁德完全发挥出来而已。

臣下我伏首观望陛下,健全国家制度来网罗天下贤良,有的由科举选用,有的由国子监选拔,有的以贤良方正的名目而举荐,有的以怀材抱德的名目被征召。这是陛下求贤若渴的心意。怎奈人们隐藏其心迹,不能测度,正直的人好像是揭露别人隐私不留情面,而刚正的人又似乎是傲慢瞧不起他人。奸佞之徒好像很忠厚,而奸诈的人好像是守信义。这就是所说的外表好像玉石其实是石头,鸣叫似凤凰而实际是鹔鸟。况且执掌铨选的人,没做到完全公正;掌握考核的人,有的违背正道。奸邪谄媚之徒,得以进身显达行列;而刚正廉洁之士,有的被诋毁不得任用。真正有才之士会从哪里得到呢?陛下访求贤良,果真想得到真才实学之士,一定从自己内心的明智出发,洞察他们是贤良还是卑劣的人,明察他们是真是假,完善选拔士人的措施,申明考核官吏的办法,任用英杰贤良之士,选拔忠实正直之人,把他们安排在朝廷上,委派到地方上。他们的言行足以成为群僚的表率,他们处理政务足以安抚百姓,好像一棵树,根正,树稍自然端正,又譬如水,源头明净,水流自然清澈。那就将会见到当今的士人,仕进一定依礼而行,而不会再陷入希世取宠的邪路,必定依照道义隐退,都知道保住官位贪图权力的耻辱。把施行道义匡时救世作为急务,因而奋扬起建立功业的志向;致力于献纳忠心,为国效劳,而忘掉追逐利禄的念头。把恬然安静作为崇尚的目标,而投机钻营的风气自然停息;把贪财好贿作为鉴戒,而廉洁耿直的气节自然卓著。这也就是《尚书》所说的:切实遵循帝王的德行,决策英明,大臣和顺。又像《诗经》所说的:众多的士人济济一堂,全都保持美好的德行。这样还哪里会有士人的习尚不能匡正的!

臣下我伏首观望陛下,颁布诏令,深切记挂黎民的疾苦,有时免除租税宽舒百姓,有时发放帑银救济百姓,有时申明节俭的规定,有时开列减省的条款。这是陛下体恤民众疾苦的用心。怎奈百姓有众多欲望,随顺物品而心有变迁,夏天酷热多雨难于有饭吃,冬天寒冷难于有衣穿,孤独鳏寡流离失所而无处诉求,饥荒流亡临近死亡而难

于存活，礼法道义不兴盛，奸邪犯罪不止息，也是正常的。况且主管百姓的地方官员，缺乏安抚养育的勤勉用心，从事教化的地方官员背离了修明人伦的教化，打官司的人日益繁多，没有歌颂刑政清明的颂歌产生，田野趋于荒芜，听不到古代敲击土块来歌颂的那种歌声。治国的实际效果从何获得呢？陛下安抚百姓，果真想获得实效，一定以内心的仁德为根本，视天下百姓疾痛如自身的疾痛，如同气脉贯通于自己的四肢，让地方官吏警戒好劝勉的职责，严厉督促地方官员负起劝课农桑的责任。百姓想要的，给予他们，百姓不喜欢的，不强加给他们，把百姓措置到安稳的衽席之上那样的状态，带入富足长寿的境地。各个基层组织内的人们，具有道义，彼此保全，使血缘关系和地位不同的人们，具有礼义，相互交往。把这比成一副网，绳一牵引，网上纽结也就自然张开了。把这比成衣服，衣领扯起来，腋袖自然随顺了。那就将会见到当今的百姓，一定有稳定的家业，不再游逛偷懒放弃农耕，一定有留恋故土的心念，不会轻举妄动被判罪。知道农事不能延缓，都极力耕耘，从事本业；知道商贩很低贱，不从事赚钱勾当，去追逐末业。乡间设立学堂，考查德行，讲习学业，而苟且浅薄的风气自然没有了。里社定有公约，喜好善事，厌恨恶行，礼让的风气自然出现。这就是《诗经》上所说的：天下百姓，都被您的美德所感化。《周易》中所讲的：长期推行那大道，天下教化自然形成。这还会有什么民风不淳厚的呢！如果像这样，陛下治理天下，真真和唐虞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兴盛局面没有两样了。这是臣下我的浅薄见解，绝对认为心智足以求贤，仁爱足以安抚百姓，因此治理效果不想那样却自然而然达到那样了。

陛下策问臣下我的问题，臣下我已简要做陈述了。在答卷最后，私下还有献呈的东西。访求贤良，安抚百姓，固然出自陛下的心智仁德，而心智仁德的完全发挥，更在于陛下的本心。因为本心是全身的主宰，万事的根本源泉，是用来统管五脏、指使身体各个部位的，是用来敬奉天地赞助生长化育的。陛下一定要经常保存这本心，又一定以敬作主宰。宁静不动，把敬作为主宰，用来保全“心”的实体；行动起来，把敬作为主宰，来达到“心”的效用。凭借它来求取贤良，那么

智慧会使那圣明达到极点;凭借它养护百姓,那么仁德会使爱心达到极点。然而这恭敬,怎么仅仅只是表现在明智和仁爱上,把访求贤良,安抚百姓的做法都运用起来就算到头了呢?至于视听言行,完全按照天理,好恶取舍,必须合乎尺度。那样将会看到天下各地必定因此和顺,所有的少数部族必定由此全来归服;天下名山大川,必定因此而安宁;春夏秋冬四季和木火土金水五行,必定因此而按次序交替流转。前所未有的祥瑞,在这时一齐出现;各种吉福的象征物,在这时全都降临。宋代大儒程颐所说的:上下都统一在恭敬之下,天地的位置自然就摆正,万物自然就生长,大气和顺,而麟、凤、龟、龙四种灵物都要降临。这样,陛下的治国成就,超越百代帝王而留传下亿万年的美名,与天地一样无穷无尽,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臣下我学识肤浅,不能够援引经典,依据史籍,斟酌古事,衡量当今,在此仅恭谨地迳直陈述来做对答。至于扭曲自己所学习的东西来讨好世人,降低自己的志向来随和时代,是臣下我不敢采取的。伏首希望陛下稍稍用心浏览,那么天下会十分幸运,万世也十分幸运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孙文阁译〕

徐琼　殿试对策

徐琼(1425~1505)　字时庸,号东谷,一号明农翁,金溪(今属江西)人。天顺元年(1457)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时年33岁。历任侍读学士、礼部尚书。以器识度量赢得美称。81岁去世。

臣对:臣闻天下至大,而以一人为主;人君至尊,而以一心为主。盖心也者,万化之原,万事之本也。古之圣人所以参天地、赞化育而经纶大至者,不过运以此心而已。况求贤安民,为治之首务,而不本于一心之运用,可乎?故本诸心以来贤,则必得夫真才;本诸心以安民,则必获夫实效。是以君天下而欲求贤安民者,信非此心莫能尽也。《大学》所谓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董子所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官,正百官以正万

民。此之谓欤?

恭惟皇帝陛下,聪明先物,睿智有临,心二帝三王之心,绍祖宗列圣之统,先之以励精,加之以恭俭,诚所谓得圣人之时,居圣人之位,必欲致帝王之治者也。佐理已得真才矣,而犹欲真才之求;图治已获实效矣,而犹欲实效之臻。乃进臣等于廷,特以治道首务为问。所谓知周万物而不弃一得之愚,明照四方而尚询刍荛之贱者也。臣虽愚昧,敢不精白一心,以对扬明命之万一乎?

臣窃惟贤者,国家之利器也。天事以之而共理,天民以之而共安。是贤不可以不求,而求贤必务得真才也。民者,国家之赤子也。饥焉而欲其食,寒焉而欲其衣。是民不可以不安,而安民必务获实效也。斯二者,诚治天下之首务也。粤稽诸古,尧舜之帝天下也,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莫非真才矣。而尧也方且咨之于岳而举舜,舜也方且选之于众而举皋陶。或三德而日宣、六德而日严者之翕受,或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者之在官。由是平章百姓,协和万邦,而黎民有於变之风;播时百谷,敬敷五教,而万国有咸宁之效。非尧舜之求贤安民者乎?禹汤、文武之王天下也,建官稽古,倍于唐虞,莫非真才矣。而禹汤方且吁俊尊帝,聿求元圣。文武方且克知三宅,灼见三俊之是用;襄我二人,惟兹四人之是相。由是德惟善政,子惠困穷,而兆民有允殖之休;四方嘉靖,庶民归极,而万姓有咸悦之效。非禹汤、文武之求贤安民者乎?

惟求贤而得其才也,故当时之士,岂肯枉道以徇人,尸位而素餐哉?进不轻进,必以礼焉,苟非其礼,虽万钟之禄弗就也;退不难退,必以义焉,苟非其义,虽千驷之富弗恋也。一进一退,不失其正。是以上而为君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以成乎君德;下而为民也,霈其膏泽,施其善政,以全乎民生。所以得真才之盛如此,岂无其本哉?盖由尧舜、禹汤、文武兢兢业业、栗栗翼翼之心所致也。

惟安民而获实效也,故当时之民,举无习俗之恶,而皆存本然之善。生产之业,必有恒焉,求无恒产而流移游荡者无有也;心之所存,必有恒焉,求无恒心而放僻邪侈者无有也。恒产恒心,咸顺其则,是以饱食暖衣,家给人足,而遂仰事俯育之愿;乐善循理,敬老慈幼,而

有比屋可封之俗。所以获实效之盛如此，岂无其本哉？盖由尧舜、禹汤、文武念兹在兹、不遑暇食之心所致也。

仰惟太祖高皇帝，膺天命以定区夏；太宗文皇帝，顺人心以靖家邦。其求贤安民之效，垂裕于后昆。仁宗昭皇帝，溥声教于四海；宣宗章皇帝，敷仁政于天下。其求贤安民之道，继之于前烈。盖能心乎唐虞三代之心，诚无愧于唐虞三代之治矣。今陛下得贤之用，亦莫不奋庸而熙载，敬事而后食，何慊于心哉！然犹虑夫今之士立功之志弱，而利禄之心胜，奔竞之风未息，而廉介之节少著。此虽奉行者徒徇虚名而不求其实之过，实足以见陛下求贤如渴之盛心，虽然，欲得真才而无此失，必以唐虞三代为法。先之小学，以为养士之本；次之大学，以收养士之功。教之以修齐治平之具，用之以乡举里选之法。由是为士者以没世不称为耻，而皆有志于功名；以正谊明道为事，而自无心于利禄。正路是由而奔竞之风以息，非义不取而廉介之节以著。士习之正，孰有加于此乎？所以然者，由陛下以唐虞三代求贤之心为心之所致也。

陛下欲民之安，亦既发仓赈济，务得其所，奚愧于前哉！然又虑夫今之民力本者少，逐末者多，偷薄之习浸长，而礼让之俗未兴。此虽承流者徒应故事而不宣其化之咎，尤足以见陛下视民如伤之盛心。虽然，欲获实效而无此弊，亦必以唐虞三代为法。制田里以遂其生业，薄赋敛以足其衣食。典牧申劝课之令，庶邦遵惟正之供。由是为民者皆知务本，而化薄以归厚；率弃逐末，而去危以就安。旧染之污除而习尚不偷，乖争之意消而乡俗自善。民风之淳，孰有过于是哉？所以然者，由陛下以唐虞三代安民之心为心之所致也。

然臣于陛下之策，既陈梗概于前矣。而区区犬马之心，尚不能已。复于篇终，而有献焉。臣惟始勤终怠者，众人之常情；慎终如始者，圣人之能事。天地惟有常，故覆载于无疆；日月惟有常，故照临而不已。臣愿陛下弘天地之量而同其覆载，并日月之明而同其照临，始终此心，始终此治。由是而法帝王之道，恒久而不失；由是而继祖宗之绪，悠远而益光。于以求贤，则真才辈出而无替；于以安民，则实效长在而不泯。至治之隆，于是乎不可尚矣。

且臣所以对陛下者，皆经史之所纪载，古今之所通行，岂敢泛然而虚文以应之乎？若曲学以阿世，卑志以徇时，亦非臣愚之志也。今陛下既以是戒臣，臣岂敢不以是为戒，以副陛下之盛意乎？臣学不足以博古，识不足以通今，谨献草茅之言，上尘天聪，伏惟陛下俯垂睿览。臣不胜悚惧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天下最为广大，而把君主一个人作为主宰；君主最为尊贵，而把他那整个的心念作为主宰。因为心念这个东西，是各种变化的源头，是各种事物的根本。古代的圣人与天、地并立为三，辅助天地化生和养育万物，各种筹划部署非常宏大周密，原因不过是对这一心念加以运用罢了。况且求取贤才，安定百姓，属于治国的头等大事，但却不从这整个心念的运用去出发，能行吗？所以从这一心念出发去招徕贤才，就必定会获得到真正的人才。从这一心念出发去安定百姓，就必定会获得到实际的效果。因此统治天下而想求取贤才、安定百姓的君主，确实是离开这一心念就不能解决得特别好。《礼记·大学》所讲的：心念端正以后才会把自身修养好，把自身修养好以后才会把家庭整顿好，把家庭整顿好以后才会把国家治理好，把国家治理好以后才会使天下太平；西汉大儒董仲舒所讲的：君主用端正自己的心念去端正朝廷，用端正朝廷去端正文武百官，用端正文武百官去端正天下百姓。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吧？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耳聪目明，事先就能洞察一切；通达机智，足以驾驭一切。把尧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继承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一脉相传的帝位统系，把励精图治放在首位，把恭敬和节俭再添加进来，这确实称得上是获取到圣人的时运，占居圣人的宝座，一定要实现古代二帝三王那样的大治景象的君主啊！在辅助国家治理方面已经获得到真正的人才了，但仍只想对真正人才的求取；谋求大治已经获得到实际效果了，但仍只想实际效果的达到。竟然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特地用治国之道面临的头等大事来做询问。这正是人们所讲

的：智慧能把一切事物都考虑得当，但却不遗弃仅有一点儿心得的愚蠢见解；圣明能够察照四方，但还询问割草打柴的卑贱人啊！臣下我尽管很愚昧，哪敢不满心一片纯洁地对答称扬圣明命令的万分之一呢？

臣下我私下想来，贤才是国家的税利器具。上天交付给君主的事务，依靠他们来共同办好；上天让君主管辖的民众，依靠他们来一起获得安定。这表明，贤才不能够不去求取，而求取贤才务必要获得到真正的人才。民众是国家要保护的婴儿。饿了就想得到要吃的东西，冷了就想得到要穿的衣服。这表明，民众不能够不让他们获得安定，而安定民众务必要获得到实际的效果啊！这两项，确实是治理天下的头等大事啊！考察古代，尧、舜称帝天下，在朝廷上有负责各种事务的官员和四方诸侯之长，在地方上有统辖各州的长官和各处的首领，没有哪个不是真正的贤才了。可是尧却正在向四方诸侯之长来询问而举用舜，舜也正在从众人中做选拔而举用皋陶。或者是对每天能表现出宽弘又严肃等三种德行的人、每天能按有才干又认真谨慎等六种德行来约束自己的人，一并加以任用，或者是让大而千里挑一的人、小而百里挑一的人都担当职务。由此辨别清各个族姓，协和起各地邦国，而普通民众具有随教化而递变的风习。又教会民众播植各种粮食作物，恭谨地对他们施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种教化，而各个邦国具有处处安宁的效果。这不是尧、舜求取贤才、安定民众的做法吗？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称王天下，设立官职参考古代，员额是尧、舜时期的两倍，没有哪个不是真正的贤才了。可是夏禹、商汤却正在延揽杰出的人才，按照上帝的启示行事，访求大圣人。周文王与武王正在任用所了解的政务官、民事官、执法官和考察得非常清楚的具备这三个方面的才干的人，正把辅相让辅佐我周室的周公、召公这二人和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四人来担当。由此仁德只体现在美好的国政上，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给贫穷困苦的人施布恩惠，而亿万民众具有生息繁衍的福分。四方和美安宁，众百姓都归向行为的最高准则，而各个部族具有全都心悦诚服的效果。这不是夏禹、

商汤、周文王与武王求取贤才，安定百姓的做法吗？

只因求取贤才又获得了真正的人才，所以当时的士人，哪里肯违背原则去随顺他人，占居官位无所作为而白白领取俸禄呢？入朝做官并不轻率地就入朝做官，必定要依据礼法。如果不符合礼法，即使是粮米万钟的厚禄也不去获取。辞官不做并不对此感到很难办，必定要依据道义。如果不符合道义，即使是良马四千匹的富贵也不留恋。无论入朝做官还是辞官不做，都不丧失掉原则。所以对上面就只为君主做考虑，上朝去就思索竭尽忠诚，退下朝来就思索弥补过失，来成就君主的盛大德业。对下面就只为民众做考虑，充分地施布恩泽，推行美好的政治，来保全民众的生计。获得到真正人才的盛况达到这般地步，哪里是没有那本原呢？这是由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的兢兢业业、格外戒惧谨慎的心念所造成的。

只因安定民众又获得了实际的效果，所以当时的民众，一律没有习尚风气的坏表现，全都保存了天赋本性的善良。从事农耕的本钱，必定拥有固定的份额，寻求那种没有固定田产而四处流动转移、游逛飘荡的人，是不存在的。内心的寄托，必定怀有长久不变的意念，寻找那种没有固定意念而放肆邪僻、奸恶奢侈的人，也是不存在的。具有固定的田产和固定的意念，全都依从那行为的准则。所以吃得饱，穿得暖，家家富裕，人人充足，实现了对上侍奉老人、对下抚育儿女的心愿。喜好良善，遵从道理，尊敬老人，爱护小孩，具有家家都可以进行特殊表彰的风尚。获取到实际效果的盛况达到这般地步，哪里是没有那本原呢？这是由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的想到这一条就去做这一条、连吃饭都顾不上的心念所造成的。

恭敬地想来，我朝太祖高皇帝，承奉天命，平定华夏；太宗文皇帝顺应人心，安稳住国家。他们求取贤才、安定民众的功效，给后代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仁宗昭皇帝把声名教化推广到四海辖区，宣宗章皇帝把仁爱的国政施布到整个天下。他们求取贤才、安定民众的措施，对前代的功业加以接续。这是因为能够把唐尧、虞

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确实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绩面前没有惭愧的地方了。如今陛下获得到贤才的任用，也没有谁不是奋勉地工作，振兴起政务，谨慎地事奉君主，然后才享用俸禄；您心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然而仍然忧虑当今的读书人，建立功勋的志向还脆弱，可追求功名利禄的心思却很强烈；投机钻营的风气还没止息，可廉洁正直的节操却很少显现出来。这种情形尽管是奉命实行的人只随顺虚名却不谋求实际所造成的过失，但确实足以看出陛下求贤若渴的深长用心。尽管如此，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而不出现上面所讲的过失，必定要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效法的榜样。首先通过初级学校的教育，把它作为培养读书人的根基；接下来通过高级学校的教育，来收到培养读书人的功效。用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基本功教导他们，通过由基层地方组织选拔推荐的方法任用他们。由此而身为读书人的那些人，就会把到死还没获得到名声看成是耻辱，从而全都对功业名声立下志向；把坚持正义、宣明大道看成是该做的事情，从而就自然对私利禄位没什么追求了。只遵从正路，投机钻营的习气随之止息；不符合正义就不去谋取，廉洁正直的节操随之显现出来。读书人风气的端正，还有哪一种能够在此之上呢?之所以如此，是由陛下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用心作为自己的用心所造成的。

陛下打算让民众安定，也已经打开国库，进行救济，务必使人们都得到妥善的安置，还有什么在前代面前感到惭愧的地方呢?然而又忧虑当今的民众，致力农业生产的人显得少，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显得多，不厚道的习气逐渐在蔓延滋长，可礼义谦让的风尚还没兴行起来。这虽然是承奉朝廷旨意的人只是按惯例走走过场却不宣明教化的罪责，可更足以看出陛下对待民众就像他们受到伤害一样的深厚用心。尽管如此，要想获得到实际的效果而不出现上面所讲的弊端，也必定要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效法的榜样。规定好田地和居住区，来使人们的生计和职业得到保障，减轻赋税征收，来使人们够穿又够吃。对地方官员要发布鼓励督察当地农业

生产的命令，各地只按法定贡赋向朝廷来交纳。由此而身为百姓的人，就都知道致力本业，把浇薄改变过来，归向厚道；全都放弃工商业活动，躲离开危险，进入到安宁。从前沾染的坏习气消除掉，习尚就不再不厚道；违抗和争斗的念头打消掉，民间的风俗自然就变好了。民风的淳厚，还有哪一种能够在此之上呢?之所以如此，是由陛下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安定民众的用心作为自己的用心所造成的。

然而臣下我对于陛下的策问，已经在上面陈述一个梗概了。但那微不足道的为皇上拼死效力的心念,还不能够止息下来,又在答卷的末尾,还有献呈的意见。臣下我想来,开始阶段特勤勉,到最后却懈怠了,这是普通人的常情。谨慎对待最后阶段,就和开始时一样,这是圣人的本事。天地只因具有常规，所以能够永远覆盖和托载万物；日月只因具有常规，所以能够不停地照耀人间。臣下我祝愿陛下,与天地的度量同样地宏大,就像它们覆盖和托载万物一个样;与日月的光明同样地光明，就像它们照耀人间一个样。由始至终都保持住这一心念，由始至终都施行这一治理。由此而效法古代帝王的治国之道,永久而不失去;由此而继承我朝列祖列宗的统绪,悠久长远而进一步发扬光大。用来求取贤才，就会真正的人才一批又一批涌现而不会消失。用来定安民众，就会实际的效果长久存在而不会泯灭。最高治理的隆盛景象,在这时就谁也不能赶得上了。

况且臣下我用来对答陛下的东西，都属于经书史籍所记载、古往今来所共同行用的东西。哪里敢空泛地用不切实际的文词来应付呢?如果歪曲自己所研习的学说来迎合世俗的喜好，降低自己的心志来随顺社会的潮流，也不是愚昧的臣下我的志向。如今陛下既用这一点来告诫臣下我，臣下我哪里敢不把这一点作为警戒，去符合陛下的深厚用意呢?臣下我学问不足以周知古代，见识不足以通晓当今，谨慎地献呈上民间卑贱人的言论，往上给皇帝的寨断添上了障碍，跪拜只请陛下赐给明智的一阅。臣下我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陈秉中　殿试对策

陈秉中(生卒年不详)　天顺元年(1457)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其字号籍贯和事迹俱佚考。

臣对：臣闻帝王之为治，有其道；帝王之行道，有其要。夫治道之要，求贤安民是也。求贤而得真才，安民而获实效，则治道之隆有不期然而然矣，尚何虑夫士习之不正，民风之未淳哉?唐虞三代，既以求贤安民为务，以成至治于天下，而后世之有天下者，欲尽求贤安民为治道，可不以唐虞三代为法乎?《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此求贤安民为治道首务，信乎古今之所同也!

仰惟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创业垂统，既以求贤安民为本；太宗文皇帝奄奠两京，继志述事，又以求贤安民为先。列圣嗣位，持盈守成，所以致重熙累洽之治者，岂有出于求贤安民之外哉?恭惟陛下，绍述鸿图，光复宝位，黜奸邪而进忠良，惠鳏寡而抚黎庶，法度为之一新，纲纪为之大振。天下之人莫不延颈以望，以为唐虞三代之治，复见于今日。然圣心谦冲，不自满假，治已至而犹以为未至，道已臻而犹以为未臻，乃于万几之暇，复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以求贤安民为言。此正陛下为治之道，行道之要，最急而不可缓者。然犹拳拳下询，责臣以切至之论。于以见陛下之心，即好问好察、望道未见之心，足以四三王，足以六五帝，足以继祖宗之绪，足以垂无疆之休者矣。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对扬圣天子之明命乎?

稽之于古，若尧之明扬侧陋，舜之咨命官牧，禹之吁俊尊帝，汤之敷求哲人，文武之克知三宅，灼见三俊，是皆以求贤为首务也。尧之协和万邦，舜之不虐无告，禹之善政养民，汤之子惠困穷，文武之怀保小民，宠绥四方，是皆以安民为首务也。二帝三王务于求贤安民如此，故当时俊乂在官，治隆俗美。凡为士者，其进

也以礼，而进之之难，未尝枉道以求合；其退也以义，而退之之易，未尝忘义以徇禄。惟其进退之不苟，是以当时用之，则能为上为德而责难陈善，务引其君以当道；为下为民而布德施惠，必措其世于阜殷。非求贤而得真才欤？凡为民者，皆有恒产而出作入息，衣食有所资；皆有恒心而人孝出弟，邪妄无所肆。惟其恒产恒心之兼有，是以当世之民，家给人足，欢然于安居乐业之中；比屋可封，怡然于仰事俯育之内。勤于务本，而逐末者无有也；笃于礼让，而偷薄者无有也。非安民而获实效者欤？至于汉唐宋，或举孝弟力田，或擢明经秀才，或聘贤良方正。非不欲求贤也，然徒徇虚名而教之无素。或下减田租之诏，或定租庸调之法，或立常平、义仓之规。非不欲安民也，然徒事虚文而养之无实。较之唐虞三代治道之隆，则瞠乎其后而不可及矣。

今陛下励精图治，而拳拳以求贤安民为心。然士之见用者，立功之志弱而利禄之心胜，奔竞之风未息而廉介之节少著，何也？盖知人自古为难，岂用之未尽贤，贤之未尽用欤？况职师儒者，徒务记诵词章之末，而不知以道德为本也。其失得无由于此乎？陛下必欲得真才，正士习，必以唐虞三代为法。八岁以上，教之于小学；十五以上，教之于大学。自洒扫应对而至于舞蹈弦诵，自格致诚正而至于修齐治平，于以收心而存性，于以成德而达才。培养于未用之先，慎选于将用之际。如是则士皆奋立功之志，而忘利禄之心，奔竞之风自息，而廉介之节自著。所谓真才得而士习于是乎正矣。

至若民之在下也，务本者少，逐末者多，偷薄之习浸长，而礼让之俗未兴，何也？盖安民在乎仁惠，岂善政之举未周，而德化之行未洽欤？况任守令者，徒事簿书期会之间，而不知以岂弟为政也。其弊得无由于此乎？陛下如欲获实效，淳民风，必以唐虞三代为法。六府之惟修，三事之惟和。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不废其业。取不过什一，而不伤其财；役不过三日，而不困其力。比闾族党，使相保爱；鳏寡孤独，不至无告。如是则人皆勤于务本，而不逐市利之末，偷薄之习自除，而礼让之俗自兴。所谓实效得而民风于是乎淳矣。可以比美唐虞三代之盛者，其道岂不在于兹乎？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略陈于前矣。而于终篇，复献其一得之愚

焉。夫求贤安民而得其效者,固在乎取法唐虞三代;所以能尽取法之道,则在陛下之一心。夫心者,一身之主,家国天下之本也。陛下以此心而求贤,则取人有则,谄邪莫能惑,而真才无不得矣。陛下以此心而安民,则笃近举远,百姓无不足,而实效自然获矣。由是陛下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即为大明中兴之令主矣。虽然,是心也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难。必克敬克念而至诚无息,法天道之常运,象日月之常明,坚如金石而不移,信如四时而不失。始终此心,则始终此道;始终此道,则始终此治。而雍熙太和之盛,必悠久而不替矣。臣草茅疏贱,学不能援经据史,识不能酌古准今,直述所闻,上事睿鉴,惟陛下察其愚衷而采择焉。臣不胜恐惧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古代帝王进行治理,具有根本原则;古代帝王推行根本原则,具有要领。治国之道的要领,就是求取贤才,安定民众啊!求取贤才而获得到真正的人才,安定民众而获得到实际的效果,治国之道的隆盛局面就会有不期望它那样而偏偏就那样的了。这还忧虑什么读书人的风气不端正,民间的习尚还不淳厚呢?尧舜和夏商周时期,既把求取贤才、安定民众作为大事来解决,在全天下形成了最美好的治理状态,后世拥有天下的人,打算把求取贤才、安定民众做到特周全的地步,构成治国之道,能够不把尧舜和夏商周作为效法的榜样吗?《尚书》中说:与治理国家所采用的原则及方法相同,就没有不振兴的。《诗经》上说:不违背,不遗忘,一切都遵守原来的规章。这表明求取贤才、安定民众属于治国之道中的头等大事,的确是古今都相同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我朝太祖高皇帝在淮河地区崛起称帝,创建基业,垂示统系,已经把求取贤才、安定民众作为根本了;太宗文皇帝稳定住北京和南京两处国都,继承太祖的志向和事业,又把求取贤才、安定民众放在了首位。各位圣明的先帝继登皇位,保持鼎盛状态,守护已有的功业,实现一代又一代太平兴盛的大治局面,原因又哪里有超出求取贤才、安定百姓这个范围之外的呢?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承接祖宗的远大谋划,重新恢复了帝位,斥退奸

邪，进用忠良，优待孤寡老弱，安抚普通百姓，法令制度由此焕然一新，朝廷纲纪由此大为振作。天下人没有谁不伸长脖颈在盼望，认为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又在今日重新出现了。然而圣上的内心特谦逊，不自我满足，治理已经达到极限却仍然认为还没达到极限，大道已经步入却仍然认为还没步入，竟然在处理众多政务的空隙里，又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赐予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一上来就把求取贤良、安定民众作为话题。这其实正是陛下进行治理的根本原则和推行根本原则的要领所在而最为急迫、不可往后放的东西。但仍十分恳切地往下面询问，并用提出恰切周密的论断来要求臣下我等人。由此就看出陛下的心意，也就是虞舜喜好询问、喜好察辨浅近言论和周文王盼望大道好像还未见到的那种心意啊！这就足以同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武王这三王并列而成为第四个称王天下的人，就足以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五帝并列而成为第六个称帝天下的人，就足以继承我朝列祖列宗的事业，就足以给后世留下永无尽头的福分了。臣下我敢不竭尽那仅有一点儿心得的愚昧见解，来对答称扬圣明天子的圣明命令吗？

考察古代，像唐尧明察贤能，提拔被埋没的人；虞舜咨询任命二十二位朝廷重臣和十二州的长官；夏禹延揽杰出人才，按照上帝的启示来行事；商汤广泛访求像伊尹那样的哲人；周文王与武王能够深刻了解政务官、民事官和执法官，洞察具备这三个方面的才干的人。这都是把求取贤才作为头等大事啊！像唐尧使天下各个邦国和睦融洽，虞舜不虐待求告无门的人们，夏禹施行美好的朝政来养护民众，商汤像对待自己的儿子那样来对贫穷困苦的人施布恩惠，周文王与武王关心并保护普通的百姓，安抚天下各地。这都是把安定民众作为头等大事啊！古代的二帝三王在求取贤才、安定民众方面做到了这等地步，所以当时杰出的人才都担任官职，治绩隆盛，社会风气美好。凡是身为读书人的那些人，他们按照礼法去入朝做官，入朝做官很难让他们就赴任，他们未曾违背原则而去谋求迎合谁的需要。他们又按照道义来辞官不做，辞官不做让他们感到太容易了，他们未曾忘掉道义而去随顺那丰厚的俸禄。只因他们入朝做

官和辞官不做，都不随意乱来，所以当时任用他们，他们就能在朝廷上供职，从德业上做考虑，对不符合仁德的事情向君主提出责难，陈述美好的对策，务必用符合正道来引导自己的君主。在地方上负责，从为民众做考虑，施布仁德恩惠，必定要把当今社会带入到富足殷实的境地。这不是当时求取贤才而获得到真正的人才吗？凡是身为百姓的人，都拥有固定的田产，太阳出来就去耕作，太阳落山就回家休息，吃穿都有依靠。又都有留恋家园、长久不变的意念，在家中就孝顺长辈，离开家就兄弟友爱，邪恶狂妄没有放开来的时候。只因他们固定的田产和不变的意念两方面都具备，所以那个时代的民众，家家富裕，人人充足，在安居乐业中高高兴兴地生活；家家都可以对它们进行特殊的表彰，在事奉双亲、抚育儿女中欢欢喜喜地度日。在致力农业生产上很勤勉，而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就根本没有；在礼义谦让上很纯厚，而不厚道的人就根本没有。这不是当时安定民众的实际效果吗？到了汉朝、唐朝和宋朝，有的用孝悌力田的名义让地方上荐举这一类人，有的用明经秀才的名义选拔这一类人，有的用贤良方正的名义征聘这一类人。这并不是不想求取贤才，然而只是随顺虚名，教育培养他们却没有平素该下的那些功夫。有的颁布减少土地赋税的诏令，有的制定租庸调的赋役制度，有的定立常平仓或义仓的规制。这并不是不想安定民众，然而只是在一纸空文上花气力，养护他们却没有实际的东西。同尧舜和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的隆盛景象相比较，就远远落在后面而无法赶得上了。

如今陛下励精图治，十分勤勉地把求取贤才、安定民众作为心念。然而读书人中被任用的人，建立功业的志向还脆弱，可追求功名利禄的心思却很强烈；投机钻营的风气还没止息，可廉洁正直的节操却很少显现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了解人自古以来就很困难，恐怕是任用的人还不全是贤才，而贤才还没全都任用吧？况且身负师长、儒士职责的人，只是致力记忆背诵文章这类属于细枝末节的学问，却不清楚把道德修养作为根本。上述失误是不是就由此造成的呢？陛下一定要想获得到真正的人才，端正读书人的风气，

就必须要把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效法的榜样。对贵族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自八岁以上，在初级学校中教育他们；到十五岁以上，在高级学校中教育他们。从洒扫门庭、回应对答一直到熟悉乐舞和诵读演唱《诗经》等典籍，从穷尽事理、充实知识、使意念真诚、心地端正一直到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庭、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用来让他们收敛起心念，保存住本性，用来使他们形成道德，具备才能。在还没任用他们之前就进行培养，在准备任用的时候慎重加以选择。这样去做了，读书人就全都会奋扬起建立功业的志向，忘掉追逐私利禄位的心思，投机钻营的习气自然也就止息了，廉洁正直的节操自然也就显现出来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真正的人才获取到，而读书人的风气在这时就端正了。

至于民众处在下面，致力农业生产的人显得少，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显得多，不厚道的习气逐渐蔓延滋长，可礼义谦让的风尚还没兴行起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定民众在于仁德恩惠，恐怕是美好政务的施用还不周全、道德教化的推行还没深入人心吧?况且担任太守和县令的人，只是在公文簿册和按期交差上花气力，却不清楚凭借和乐平易去施政。上述弊病是不是就由此造成的呢?陛下如果想获得到实际的效果，使民间风尚淳厚，就必须要把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效法的榜样。水、火、金、木、土和谷物这六府只管处理好。端正自己德行、物尽其利、使民众生活充裕这三事只管解决好。分配下去的每户一百亩耕田，不要耽误了他们的耕作时节，由好几口人组成的家庭，不要让他们荒废掉自己的本业。征收赋税，不超过总产量的十分之一，从而不使他们的财力受到损伤；征发徭役，一年不超过三天，从而不使他们的人力感到困乏。各级地方基层组织，让它们管辖内的居民相互保护和爱护；无妻的男子、无夫的妇女和幼年无父、老年无子的人，不至于求告无门。像这样去做了，人人就会都在致力农业生产上很勤勉，而不去追逐做买卖获利的那些活动，不厚道的习气就自然会消除，而礼义谦让的风尚就自然会兴行起来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实际效果获取到，而民间的风尚在这时就淳厚了。能够同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隆盛景象相

比美，具体做法难道不就在这里吗？

陛下策问臣下我的东西，臣下我已经在上面大致做了陈述了。但在答卷的末尾，再献上仅有一点儿心得的愚昧见解。求取贤才、安定民众并获得到实际效果的途径，固然在于效法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但能够把效法的途径做得一点儿也不差的决定因素，就全在陛下的整个心念了。心念是整个身体的主宰，是家庭、国家和天下的根本。陛下用这一心念去求取贤才，就会取人具有标准，献媚讨好和奸邪的人就不能迷惑住陛下，而真正的人才就一个不剩地都获取到了。陛下用这一心念去安定民众，就会对近处恩情深厚，扩展到远方，百姓没有一家不富足，而实际的效果就自然获得到了。由此陛下的功绩给我朝列祖列宗增添了光彩，帝业垂示给后代继位的君主，也就成为我大明皇朝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杰出皇帝了。尽管如此，这种心念获取到和丧失掉都很容易，而保持和执守住却很困难。必须能够恭敬，能够念念不忘，极为虔诚，没有止息的时候，效法天道的永远运行，模仿日月的永放光辉，坚固得像金石而不改变，信实得像四季交替而不丧失掉。由始至终都保持住这一心念，就能由始至终都坚持这一原则和方法；由此至终都坚持这一原则和方法，就能由始至终都施行这一治理。而太平和美的盛况，必定会悠远长久而不衰落了。臣下我是民间的一个疏远又卑贱的人，学问做不到引证经书和史籍，识见不能够斟酌古代，衡量当今。直接陈述所听来的东西，往上供皇帝鉴察，只请陛下体察那份愚昧的用心，来做选择。臣下我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杨寄林译〕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庚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殿试策问

[天顺四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治天下,亦多术矣。举而行之,必有其要。《传》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然则其要,固不出此四者,而行之亦有先后缓急之序欤?唐虞三代,所以措天下于雍熙泰和之盛者,率用此道。可历指其实而详言之欤?后之有天下者,莫若汉唐宋。其间英君谊辟,亦有用此道者,而治效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其故何欤?朕嗣承祖宗鸿业,孜孜图治,夙夜不遑。于礼乐刑政,亦既备举而并行之矣,而治效犹未极于盛,何欤?兹欲究礼乐之原,求刑政之本,行之以序而达之不悖,用臻唐虞三代之盛,其道何由?子大夫潜心经史有年矣,其详著于篇。朕将采而用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君子对于天下来说,没有什么不适宜的,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与义相一致就可以了。

有的人运用脑力,有的人运用体力。运用脑力的人统治别人,运

用体力的人被人管辖。

知道风所吹来的地方,懂得由微小会达到显著的状态,也就可以进入美德的境界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治理天下,手段也很多了。特予采取而全面加以实行,一定具有纲要。《礼记》中说,礼、乐、刑、政,全面实施而不相互背逆,那么王道就完备了。既然如此,那么,治国纲要固然不外乎这四个方面,而贯彻实行起来,也有先后缓急的顺序吧?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能把天下治理得繁荣昌盛、祥和太平,原因都是运用这些治国之道。可以历数其事实而详细论述吗?后来拥有天下的,谁都比不上汉、唐、宋,在这一过程中,英明的君主也有使用这些治国之道的。然而治理的效果不能同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相比,这是什么缘故呢?皇帝我继承祖宗的宏大基业,孜孜不倦地谋求国家大治,早晚不停。对于礼、乐、刑、政,也已经全都特予采取而一起实行了。但国家的治理成效还未达到最昌盛的局面,为什么呢?如今想推究礼乐的本源,探求刑政的根基,按照顺序实施而不相互背逆,以求达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昌盛局面,具体途径该从哪里做起呢?你们这些士子们潜心研究经典史籍已有很多年了,详细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采纳实行。

谢一夔　殿试对策

谢一夔(1425~1487)　字大韶,号约斋,新建(今属江西)人。自其祖父为避仇而改冒王姓,至本人登第后始复本姓。天顺四年(1460)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预修《英宗实录》,在成化七年(1471)奏陈五事,请正宫闱,亲大臣,开言路,慎刑狱,戒妄赍,语极剀挚。官至工部尚书。著有《谢文庄集》。

臣对：臣闻帝王之治本于道，帝王之道本于诚。盖诚为道之实，而道即礼乐刑政之理也。礼乐而非诚，无以立其体；刑政而非诚，无以达其用。惟其诚也，由是而制礼作乐，则礼备而乐和；由是而明刑修政，则刑清而政举。故善为治者，未有不本于道；善行道者，未有不本于诚。二帝之所以帝天下而世跻雍熙者，此诚也；三王之所以王天下而偕臻康乂者，亦此诚也。下逮汉唐宋之英君谊辟，所以不能比隆于二帝三王而治不古若者，庸非此心之诚有或间欤？大哉诚乎！其为万物之本原，万事之枢纽，人君为治之大本乎！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先物，睿智有临，法二帝三王之要道，绍祖宗列圣之宏规。曩者嗣大历服，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凡耳目之娱，珍异之兽，悉诚心罢去，与民休息。是以十五年间，朝廷清明，民物熙皞，四时调玉烛之和，万汇赞祯祥之应。属者顺天应人，复登宝位，乾坤为之再造，人纪为之肇修，礼乐明备，刑政修举。普天之下，莫不讴歌乎凰仪兽舞之治；率土之滨，莫不甄陶于鸢飞鱼跃之天。治效之盛，振古而无以加矣。是皆本于皇上至诚行道之所臻也。兹犹不自满假，乃涣纶音，下明诏，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之以礼乐刑政施为缓急之序，继之以唐虞三代、汉唐宋治化隆替之由，终之以所以用礼乐刑政而克臻帝王治效之道。至哉问也！顾臣愚陋，曷足以上揆渊衷？虽然，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陛下既诚心发策以下问矣，臣敢不悉心披诚以上对乎！

窃惟帝王治天下之术，非一端也。然所行之要，不越乎礼乐刑政而已。盖礼有三千三百之仪，所以节民之心，使其所行无过不及焉。乐有五音六律之作，所以和民之声，使其所言无所乖戾焉。故曰安上治民，莫大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礼乐所以教民而为出治之本。陛下所谓先与急者，在是也。若夫政者，法制禁令也，所以一民之行而率其倦怠焉。刑者，墨劓刖宫大辟也，所以防民之奸而惩其恣肆焉。故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是刑政所以弼教而为辅治之具。陛下所谓后与缓者，在是也。虽然，礼乐刑政固有先后缓急之序，要之亦不可以偏废也。使有礼乐而无刑政，则徒善不足以为治；使有刑政而无礼乐，则徒法不能以自行。故《传》谓礼乐刑政，四

达而不悖,则王道备。诚哉是言也!

稽之于古:唐虞之时,以言其礼,则五礼修而三礼明;以言其乐,则六律合而八音谐。礼乐于是乎大备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而六府三事之允治;明于五刑,刑期无刑,而五服三就之克允。刑政于是乎大彰焉。是以当时万邦协和,而黎民有於变之休;庶绩咸熙,而四夷有来王之效。岂非唐虞能用礼乐刑政,而臻雍熙泰和之盛乎?然推其所由,则又本于尧之允恭克让,舜之温恭允塞之所致也。

夏商之世,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乐正崇四术以教士习。立典则以贻子孙,而有关石和钧之设焉;制官刑以儆有位,而有三风十愆之训焉。成周之世,宗伯掌五礼以亲万民,司乐掌六乐以谐万民。司马掌邦政,以九法正邦国;司寇掌邦刑,以三典诘四方。情文备而制度详。是以当时养教四讫而兆民允殖,丕冒海隅而万姓悦服。岂非三代能用礼乐刑政,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乎?然原其所自,则亦本于禹之允迪厥德,汤之咸有一德,文武之纯亦不已、丕则敏德之所致也。

夫唐虞三代,以诚心行道而致治效之盛如此。后之有天下者,莫如汉唐宋君。高祖之豁达大度,文帝之恭俭玄默,武帝之雄才大略,宣帝之综核名实,以至光武之沉议先物,明帝之下身遵道,章帝之左右艺文,此汉之英君谊辟也。观其用绵蕞所习之仪,奏《昭德》、《五行》之舞,制屯田而定租税,作《九章》而除肉刑,其用礼乐刑政也如此。然或不事《诗》、《书》,或谦让未遑,或内多宠欲,或择术不审;又有吏事深刻、察察为明、优柔不断者。求之当时,虽有海内富庶、几致刑措之风,百姓宽息、人赖其庆之美,方之唐虞三代雍熙之化,不啻武夫之于美玉矣。此无他,由其徒用礼乐刑政,而行之不能本乎诚故也。

若夫太宗之英迈绝伦,玄宗之励精图治,宪宗之刚明果断,此唐之英君谊辟也。观其采古制而定章服,分二部以习音乐,立府兵、租庸调之法,除断趾而增笞奏,其用礼乐刑政也如此。然而一则假仁喜功,一则惑于女色,一则不终其业。考之当时,虽有斗米三钱、绝域来庭之盛,民皆乐业、威令几振之美,揆之唐虞三代泰和之治,不啻鱼目之厕美珠矣。此无他,由其徒用礼乐刑政,而行之不能本乎诚故也。

迨夫有宋之兴，太祖之仁义，太宗之沉谋，有以开创于前；真宗之英悟，仁宗之仁恕，有以守成于后。真所谓英君谊辟矣。观其定朝仪而详服制，正音律而定名数，严科禁以弭奢僭，采敕条以为卷编，固皆用礼乐刑政以图至治矣。然或好微行，或伤恩义，或假符瑞而封禅，或以邪正而互用。虽曰治效有过于汉唐，而亦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也。详其所以，又岂非设诚于内者有或替欤？

夫汉唐宋诸君，不能诚心行道而治效不古若者如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太宗文皇帝肃清邦家，而隆古之风以振；仁宗昭皇帝继其统，宣宗章皇帝纂其功，而隆古之治益彰。所以然者，固不外乎礼乐刑政之用。原其所以，用礼乐刑政又岂不本于列圣至诚之心也哉！陛下应天人之笃心，嗣祖宗之洪业，复位以来，孜孜图治，夙兴夜寐，不遑宁处。虑民性之未中也，则用礼以节之；虑民声之未和也，则用乐以和之。而礼也乐也，固并举而无遗矣。虑民行之不一也，则修政以一之；虑民奸之未息也，则明刑以防之。而政也刑也，亦并行而不偏矣。是以治效之盛，旷古莫及。而圣心犹有治效未极于盛之虑，臣有以知陛下真大有为之君，真不世出之主，真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视汉唐宋诸君，风斯下矣。

陛下欲究礼乐之原，臣则以为礼乐之原，固不外乎一诚。陛下欲求刑政之本，臣则以为刑政之本，亦不外乎一诚。盖真实无妄、纯粹不杂者，诚也。一有所杂，则伪而不诚矣。悠久不息，始终无间者，诚也。一有所间，则息而不诚矣。陛下运此心之诚以兴礼乐，则大礼与天地同节，大乐与天地同和，而礼不失于昵，乐不流于淫矣。陛下运此心之诚以用刑政，则一政之出，人皆信之如蓍龟；一刑之施，人皆畏之如铁钺。而政不失于乖，刑不流于惨矣。

礼乐刑政虽备举而并行，然礼乐在所当先，刑政在所当后。析而言之，又必先礼而后乐，先政而后刑。此四者施行之次序也。行之既有其序，则礼乐昭宣，刑政修举，极天蟠地，周流四达。凡天下之民，莫不是遵是守，而无违悖者矣。然所以行而达之之要，实在于陛下一念之诚焉。陛下能于礼乐刑政之用，一本于诚，则治化之盛，又何患乎不与唐虞三代同驱而并驾哉！将见今之黎民，与唐虞之黎民同一於

变时雍矣；今之百姓，与三代之百姓同一遍为尔德矣。何则？世有古今而道无古今，人有先后而心无先后，惟在陛下至诚以感化之耳，所谓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是也。

然陛下之策臣者既如此，而篇终又启之曰：子大夫潜心经史有年矣，其详著于篇，朕将采而用焉。臣受陛下生成之恩，沐陛下教养之德。平昔之所涵养者，忠君报国之心；师友之所讲明者，致君泽民之事。虽援经据史之对，有未及详；而责难陈善之志，实所抱负。既领春官之荐，叨奉大廷之对，正愚臣叫阍闔、呈琅玕之日，谨拜手稽首而献言曰：

诚之为道，其大矣乎！具于太极之浑沦，而极于天地之变化；始终夫妇之隐微，而著于鸢鱼之飞跃。亘古亘今，莫非此诚之所为；彻上彻下，莫非此诚之所寓。故修身而不以诚，则欲得以间理；用人而不以诚，则邪得以间正。况礼乐刑政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而行之不本于诚，可乎？《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诚也，诚之为道，信乎其大矣。臣愿陛下存此心之诚，不贰以二，不参以三，不以始终而有殊，不以先后而有间。大廷如是，深宫亦如是；大政大事如是，微言细行亦如是。存养于端庄静一之中，省察于应事接物之际。出一言也，无非实理之所发；行一事也，无非实理之所著。由是而法帝王，必能合时措之宜，而不泥于古矣。由是而法祖宗，必能尽崇述之美，而有光于前矣。殆见德之所及，广大如天，极覆载之间，凡有血气者莫不尊荣。信乎唐尧虞舜，复见于今日；禹汤文武，不得擅美于前世矣。

臣之愚见，始以诚为陛下勉，终以诚为陛下献，良以同民心、出治道而极其盛者，实由于此。伏惟万几之暇，少垂睿览，则国家幸甚，生民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恐惧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治理国家，依靠大道；帝王的大道，出自虔诚。因为虔诚是帝王大道的内核，而大道就是礼、乐、刑、政的推行。礼、乐如果没有虔诚作保证，就无法确立其根本；刑、政如果没有虔诚作保证，就无法实际运用。只因虔诚，在这基础上制定礼、乐，

才能礼制完备，声乐协和。在这基础上修明刑罚，整顿国政，才能刑罚清明，国政振作。所以善于治国的国君，没有不依据这大道的，善于行用这大道的，也没有不从虔诚出发的。唐尧、虞舜之所以称帝天下，而使天下达到繁荣安定，就是凭这虔诚。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之所以称王天下，而使天下达到安康稳定，也是凭借这虔诚。到了汉唐宋的英明君主，之所以不能和尧、舜二帝，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相比，治绩不如上古，哪一个不是因为这内心的虔诚还有差距呢？虔诚太重要了！它是万物的本源，万事的枢纽，君主治国的根本。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聪明超越万物，睿智可以驾驭一切，效法尧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治国之道，继承祖宗和各位先帝宏大的治国规划。从前继承帝位，不近声色，不积聚私财，凡是影响视听的娱乐活动，珍奇的异兽，全诚心罢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因此十五年中朝政清明，民众和自然万物都和美繁盛，四季风调雨顺，万物显示出祥瑞的吉兆。近来又顺天应人，重登皇位。使天下乾坤再造，人伦重修，礼乐完备，刑政修明，普天之下没有不讴歌这一凤凰成双来到、百兽起舞的大治局面的，天下各地没有不欢欣鼓舞的。这种隆盛的治理效果，是自古以来没有过的。这都源于皇上最虔诚地实行帝王之道的缘故。而陛下如今还不满足，于是发出命令，下达明诏，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提出清晰而又详尽的策问。首先问礼、乐、刑、政实施的缓急顺序，而后问到唐虞三代、汉唐宋治理教化兴盛衰落的缘由，最后又问到实施礼、乐、刑、政达到帝王治理功效的要道。真是什么都问到了啊！臣下我愚昧浅陋，不足于上合陛下的心思。虽然如此，天道往下施布恩惠而光明，地道卑下而往上运行，陛下以诚心发出策问垂询了，臣下我敢不竭尽全力、一片赤诚来做对答吗？

臣下我私下想来，帝王治理天下的手段，不是一种。然而所实行的要道，不会超出礼、乐、刑、政。礼有三千三百条的大小仪式，用来节制平民的心念，使他们的行为不超过规范要求，也不能达不到规范要求。乐有五音、六律的制作，用来协和平民的心声，使他们的言论

不要有什么乖戾。所以说，安定天下治理百姓，没有比礼更重要的，移风易俗，没有比乐更好的。这是礼乐用来教化平民，拿出治国措施的根本。陛下所说的首要的和急切的东西，就在于此。至于说国政，是国家的法制禁令，是用来统一平民的行为，禁止他们偷懒的。刑，指的是墨、劓、刖、宫、大辟这五刑，是防止平民奸邪而惩处那些任意妄为的人的。因此圣人这样说：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肃百姓，百姓只是暂时躲过祸患而无羞耻之心。这表明刑政是辅助教化、辅助统治的工具。陛下所讲的次要的和暂缓实施的东西，就在于此。虽然这样，礼、乐、刑、政固然存在着先后缓急的顺序。总之不能废弃其中的任何一项。假使只有礼乐而无刑政，那就光是好看，不足以治理国家，假使只有刑政而无礼乐，那就光是法制，也不能单方面实行。所以《礼记》上讲，礼、乐、刑、政，全面实行而不相互背逆，那么王道就完备了。这番话真是太对了啊!

探究上古：唐尧虞舜时期，从礼这方面讲，有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和平民的礼仪得到整顿，而祭祀天、地、宗庙的礼仪得到宣明，从乐这方面讲，六律吻合而八音谐和。礼乐在这时十分完备。帝王仁德在于实行善政，善政在于养护百姓，而水、火、金、木、土、谷这六府和端正德行、物尽其用、使人民生活充裕这三事就处理好了。对五种刑罚严明施用，刑罚就可望无刑可施，执行五刑的方式和三处刑场就处理得恰到好处。刑政在这时十分彰明。所以当时天下各地很协和，百姓有随教化而递变的美德；各种政事全都振作起来，周边各族有前来归服的功效。这难道不是唐尧虞舜能实施礼、乐、刑、政，达到太平和美的局面吗？然而推究其原由，那又是因尧的诚实恭谨能谦让，舜的温和恭敬充塞上天而造成的!

夏商时代，司徒修明冠、婚等六礼，来节制平民的性情，乐正重视《诗》、《书》、礼、乐来引导士子的风尚。定立法则留给子孙，因而设有度量衡制度，以便物品流通。制定惩治官吏的条例，来警戒百官，因而有三种歪风、十种过失的训示。在周代，春官宗伯掌管吉、凶、宾、军、嘉五礼，来使万民亲近。司乐主管六种宫廷乐舞，来使百姓和协。司马主管建立诸侯国的政务，用划定封区等九种措施匡正各国。司

寇主管刑罚，用轻典、中典、重典这三种刑典，究治四方各国。内容与形式都很完备，制度也详明。因而当时的养护与教化达到各地，百姓繁盛和睦，光照天涯海角，各族心悦诚服。这难道不是三代能实行礼乐刑政而达到太平和美的局面吗？然而推究其原因，也是由于夏禹确实遵循帝王仁德，商汤使君臣全都具有纯一的仁德，周文王和周武王至诚不息、勤修美德所造成的。

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时期，凭借至诚的心性推行大道，治理效果达到如此隆盛的地步。以后统治天下的君主，没有能和汉、唐、宋的君主相比的。汉高祖豁达大度，汉文帝恭谨节俭，沉默安静，汉武帝雄才大略，汉宣帝验核事物的名称和实际。东汉光武帝深沉谋议，掌握主动，汉明帝不摆身分，遵用大道，汉章帝订正文化典籍，这都是汉代英明的君主。看他们采用儒生在野外所演示的朝仪，演奏名为《昭德》、《五行》的乐舞，制定屯田之法，设立租税制度，制定九章律令，废除肉刑，他们实行礼、乐、刑、政如此。然而他们有的不学《诗》、《书》，有的顾不上推行礼教，有的内心欲望很多，有的选择政术不审慎，还有对百官履行职责要求苛刻，把什么都不放过当成精明，或优柔寡断的。验核汉朝，虽然有海内富庶、刑罚几乎放置不用的风气，百姓休养生息，依赖有个好皇帝给他们带来的福分，但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和睦繁荣的状态相比，就无异于似玉的石头对美玉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他们光能用礼、乐、刑、政，施行中不能出自虔诚的缘故啊。

至于唐太宗英迈绝伦，唐玄宗励精图治，唐宪宗刚明果断，这是唐代的英明君主。考察他们采用古代制度定立服饰制度，划分坐部伎和立部伎来练习音乐，设立府兵制、租庸调制，废除断趾的刑罚，增设案件复审程序，实行礼、乐、刑、政如此。然而唐代的这三位君主，一则假借仁义好大喜功，一则沉迷于女色，一则不能完成其功业。考察当时的情况，虽然有一斗米价值三钱，遥远的国家都来朝拜的盛况，老百姓安居乐业，威势政令几乎震动远方的美名，但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安泰祥和的局面相比，无异于把鱼目放置在美珠旁边了。这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他们光能用礼、乐、刑、政，施行中不能出

自虔诚的缘故啊!

等到大宋兴起,宋太祖的仁义之德,宋太宗的深沉谋略,确有理由在前面开创大业。宋真宗的英明聪慧,宋仁宗的仁爱宽恕,确有理由在后面保有大业。他们真是所说的英明君主了。考察他们制定朝廷礼仪而又有详细的服饰制度,更正音律定立了各种名称品级,强化科条禁令来制止奢侈僭越的行为,采择皇帝对法律的指示编辑成书,本来都是实行礼、乐、刑、政来谋求天下大治。然而宋代君主有的喜欢微服私访,有的损害恩义亲情,有的假借符瑞实行封禅大礼,有的对小人君子交互任用。虽说治国的效果超过了汉唐,但也不能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相比。仔细探求其中的原因,又怎么不是内心的至诚专一有时松懈了呢?

汉、唐、宋各代君主,不能至诚专一实行大道,治国效果比不上古代,就像这个样子。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缔造华夏,太宗文皇帝肃清国家,因而振作起要同上古一样隆盛的风尚;仁宗昭皇帝继承大统,宣宗章皇帝弘扬功业,因而使同上古一样隆盛的治绩更加显赫。之所以能如此,固然不外乎实施礼、乐、刑、政,但探求能达到这种局面的原因,实行礼、乐、刑、政又哪里不是出自我朝各位圣君的至诚之心呢!陛下应和上天众人之心,继承祖宗的伟业,恢复帝位以来,励精图治,早晚不息,没有一时的安歇。思虑到百姓的性情不合标准,就用礼仪来节制;考虑到百姓的音声不和顺,就用音乐来使他们和顺。这样一来,礼制乐制原本就实施无遗了。考虑到百姓的行为不一致,就修明政令,使他们一致;考虑到百姓中奸邪行径没有止息,就宣明刑法来防止。这样一来,政务刑法,并行没有偏废。因此治国效果隆盛,自古莫及。而圣上之心还有治国效能没有达到极盛的思虑,臣下我因此知道陛下真正是大有作为的君主,真是世上少有的君主,真是可以和三王五帝相并列的君主。汉唐宋各个君主和陛下相比,真是处于下风了。

陛下要探究礼乐的根本,臣下我以为礼乐的本原,固然是不外乎一个虔诚。陛下要探求刑法政务的本原,臣下我以为刑法政务的本原,也不外乎一个虔诚。因为真实而不虚妄,纯粹而不混杂,正是指

的这个虔诚而言。一旦有混杂,那就虚伪不虔诚了。长久不息,始终不间断,也正是指的这个虔诚而言,一旦有间断,那就停息不虔诚了。陛下运用这心的虔诚来振兴礼乐,那么大礼可以和天地同一步伐,大乐可以和天地同一节拍,而礼仪不会失于狎昵,音乐不会流于淫僻了。陛下运用这心的虔诚来施行刑法政令,那么一项政令出现,人们都像占卜算卦那样信奉,施行一项刑法,人们都像斧钺加身那样畏惧。而政令不会失于错乱,刑法不会流于惨烈了。

礼、乐、刑、政,虽然都全面实施,然而礼乐在首要位置,政刑在其次。分开来讲,又必须先实施礼再实施乐,先施行政令再施行刑法。这是这四项的实施顺序。实施既然有了次序,那么礼乐制度就昭然宣示,刑法政令就修明了,上至天际,下遍各地,畅行无阻,无所不至。天下的百姓没有不遵守的,也没有违反背逆的了。然而能够实行并通达的关键,其实在于陛下心性的至诚。陛下能够在行用礼、乐、刑、政上完全依据这至诚,那么达到这昌盛的治理教化局面还会忧虑什么不能和唐虞三代并驾齐驱呢?将会看到现在的黎民和唐尧虞舜时期的黎民一样递变而和谐了;当今的百姓,与夏商周三代的百姓一样都具有美德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时代有古今区别而大道没有古今的区别,人有前代、后代的区别而心性没有前代、后代的区别,只在于陛下用至诚来感化他们而已,这正是经典上所说的:只有天下至诚,才能教化。

然而陛下策问臣下我的问题是这些,而在篇末又启发说:你们这些士子们潜心于经典史籍已有许多年了,要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选择采用。臣下我蒙受陛下养育之恩,沐浴陛下教化训导之德。平常所修习的是忠君报国的心愿,师友所讲明的是报效国君造福百姓的事情。虽然臣下我引用经书、依据史籍所作的对答,有不详尽之处;而向皇帝提出问题、陈述善策的志向,实际是臣下我平时的抱负。既然受到礼部的举荐,承奉殿廷的对答,正是愚臣我在天宫叩拜、呈献美言的机会,谨叩头行礼向陛下进言:

虔诚做为准则,是很宏大的了!在太极浑沌天地未分之时就具备了,而随着天地的变化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在夫妇之间最隐蔽细微

之处始终存在,而随着人才辈出表现得最显著。自古至今,没有什么不是这虔诚所做到的;上至天际,下至地下,没有这虔诚不存在的地方。因此修身不依据虔诚,那么欲望就会侵害天理,任用人而不凭借虔诚,那么奸邪就会干扰正气。况且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大法,实行却不依据这虔诚,可以吗?《中庸》上说:大凡天下国家的治理有九种方法,用来实施的只是那个专一。这专一就是虔诚,虔诚作为准则,真是太宏大了。臣下我希望陛下保有这心性的虔诚,不怀二心,不夹杂念,不因开始和终结有所不同,不因先后有所间断。在朝廷上是这样,在内官中也是这样,对国家大政大事是这样,对细微的言语行为也是这样。存养在端庄玄静守一之中,在应事接物之际深思体察。讲一句话,没有不是从天理出发的;做一件事,没有不是显现天理的。从这里效法帝王,必定能符合处置当前事务的好做法,不被古代局限住。从这里效法祖宗,必定能完全继承先祖的美德,把前人的事业发扬光大。将会看到陛下德行施布,广大如天,在整个天地之间,凡有血气的东西没有不尊崇荣耀的了。唐尧虞舜时代,确实在今天又出现了;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也不能在前代专擅美名了。

臣下的愚昧见解,开始就用虔诚为陛下作勉励,最后又用虔诚向陛下进言,确实因为与民心一致,拿出治理国家的措施,达到最昌盛的局面,就由此而来。臣下我伏首希望陛下在处理政务之余,稍微用圣心阅览一下这篇答卷,那就国家幸运到极点,百姓幸运到极点了。臣下我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孙文阁译〕

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丙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蹉，如琢如磨。

禹恶旨酒而好善言。汤执中，立贤无方。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武王不泄迩，不忘远。

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殿试策问

[成化二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古昔帝王之为治也，其道亦多端矣。然而有纲焉，有目焉，必大纲正而万目举可也。若唐虞之治，大纲固无不正矣。不知万目亦尽举欤？三代之隆，其法浸备，宜乎大纲正而万目举也。可历指其实而言欤？说者谓汉大纲正，唐万目举；宋大纲亦正，万目未尽举。不知未正者何纲，未举者何目，与已正、已举之纲目，可得而悉言欤？我祖宗之为治也，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固无异于古昔帝王之治矣。亦可得而详言欤？朕嗣承大统，夙夜惓惓，惟欲正大纲而举万目，使人伦明于上，风俗厚于下，百姓富庶而无失所之忧，四夷宾服而无梗化之患，薄海内外，熙然泰和，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果何行而可，必有其要。诸士子学以待用，其于古今治道，

讲之熟矣。请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诗经》上说:天子辖区方圆千里,是人民聚居的地方。《诗经》上还说:咕咕叫的黄鸟,栖息在山角。孔子说:黄鸟知道它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那鸟吗?《诗经》上又说:端庄肃穆的周文王,持续光明,恭敬才是目标。做国君的,要把目标集中在仁爱上;当臣子的,要把目标集中在恭敬上;做儿子的,要把目标集中在孝顺上;做父亲的,要把目标集中在慈爱上;与国人交游,要把目标集中在讲信义上。《诗经》上还说:看那淇水岸边,绿竹葱郁。那有文采的君子,就像角牙修整过,就像玉石加工过。

夏禹讨厌美酒,却喜欢有益的言论。商汤坚持不偏不倚的准则,任用贤能不拘一格。周文王看待老百姓,就像他们受了伤一样,追求大道理,接触到了还好像没找到一样。周武王不轻慢身边的近臣,不忘记远地的臣僚。

做起来不容易,说话能不谨慎迟疑吗?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上古帝王治理国家,方法也是有许多方面了。然而其中有纲领,也有具体措施,一定要大纲得当而众多的具体措施落实才行。像唐尧虞舜时代的政治,大纲固然没有不得当的了,不知具体措施是否也得到了全面落实呢?夏商周三代政治隆盛,治国之道逐渐完善,难怪当时大纲得当,具体措施也都得以落实了。可以依次列举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述说一下吗?评论的人说汉代大纲得当,唐代具体措施得到落实;宋代大纲也得当,具体措施却未能完全落实。不知不得当的大纲是什么,没落实的具体措施又是什么,连同那得当的大纲,已经落实的具体措施,能够全部论述一番

吗？我大明列祖列宗治理国家，大纲没有不得当的，众多的具体措施也没有得不到落实的。本来和上古帝王的清明政治没有什么两样了。也能详尽论说一番吗？皇帝我继承皇位，朝夕勤勉求治，只想着端正治国的大纲，落实众多的具体措施，使人伦在上面得到宣明，风俗在下面变得淳厚，民众生活富庶，不会忧虑流离失所，四方部族归附，没有违背教化的祸患，普天之下，繁荣祥和，可以给祖宗增光彩，可以和古代圣明帝王相媲美。究竟怎样做才适当，必然有关键之处。各位学子们学习是等着来运用的，对于古今治国之道，讲习得也很精熟了。请明确写在答卷上，不要宽泛，不要粗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

罗伦　殿试对策

罗伦（1431～1478）　字应魁，改字彝正，号一峰。永丰（今属江西）人。家贫好学，成化二年（1466）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名震京师。二年后即辞官归乡，筑室金牛山，著书讲学。其为人刚正，严于律己，淡泊富贵名利。有《一峰诗文集》传世。

臣对：臣闻居天下之大位，必致天下之大治；致天下之大治，必正天下之大本；正天下之大本，必务天下之大学。尧舜、禹汤、文武之位，天下之大位也；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天下之大治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心，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武之学，天下之大学也。有其学然后能正其心，有其心然后能致其治，有其治然后能保其位。治也者，帝王保位之良图；心也者，帝王出治之大本；学也者，帝王正心之要道也。

古先圣王知其然，是以尧学于君疇，舜学于务成昭，禹学于西王国，汤学于成伯子，文王学于时子思，武王学于郭叔。其所以精一此学，维持此心者，无不至也。故德泽加于当时，声名垂于后世，功高天下，明并日月，而不可及也。

自汉而唐而宋，其间英君谊辟，非不欲致治如唐虞三代；志士仁

人,非不欲致君如二帝三王。然寥寥千载,未有一二庶几乎此者。或君有可学之资,有欲学之志,而不遇其臣。如汉高之于萧、曹,太宗之于房、杜,神宗之于安石,是非其君之罪也。或臣有匡国之才,有格君之学,而不遇其君。如贾、董之于汉,陆贽之于唐,二程夫子之于宋,是非其臣之罪也。此君臣相遇,自古为难,而有志之士,所以扼腕愤叹而不能自已也。此汉之所以止于汉,唐之所以止于唐,宋之所以止于宋,而不能唐虞三代者也。

臣每观前史,见君有向道慕学之心,而臣不能成之,则悲其臣。臣有匡国致君之学,而君不能用之,则悲其君。陛下继祖宗列圣之位,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位也;天纵聪明之资,即尧舜、禹汤、文武之资也。治已至矣,犹以为未至;德已盛矣,犹以为未盛。乃于万几之暇,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询唐虞三代,下逮汉唐宋诸君,拳拳欲正大纲,举万目,以明人伦,以厚风俗,以富庶百姓,以宾服夷狄,以增光祖宗,以匹休帝王。臣有以知陛下此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也。陛下之有此心,非特臣之幸也,天下之幸也。臣敢不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学,为陛下勉哉!

昔范祖禹上《帝学》八卷,以为自古治日常少,乱日常多,推原其故,由人主未学也。朱熹将入对,或曰正心诚意之说,上所厌闻。曰:某平生所学者,在此。若有所回护,是欺君也。陛下有志于唐虞三代之志,而无汉唐宋诸君之失,固无不学之心,亦非厌闻正心诚意之说者。臣敢不以平生所学者告陛下,而自陷于欺君之罪哉?使愚臣于此,犬马之诚未尽,刍荛之见或隐,上负朝廷,下负所学,臣恐后之悲今者,亦无异于今之悲昔也。臣请因圣问而毕言之,陛下试垂听焉。

臣闻道之大原,出于天。是道也,极于至大而无外,入于至小而无内。语其大也,则为父子,为君臣,为夫妇,为朋友,为长幼之伦。若网之有纲,所以根柢乎人心,纪纲乎世道,乃天地之常经,所谓为治之大纲也。语其小也,则为礼乐,为刑政,为制度,为之具,所以扶持乎三纲,经纬乎国体,乃古今之通谊,所谓为治之万目也。是道之纲,非吾心主宰之,则无自而正;是道之目,非吾心维持之,则无自而举。此心也者,所以主宰乎吾身,而为正大纲、举万目之根本也。心虽主宰

是纲，非学则有所惑，纲何从而正？心虽维持此目，非学则有所蔽，目何从而举？此学也者，又所以正其心，而为正大纲、举万目之要务也。大纲不正，固不可以言治；万目不举，亦非尽善之道也。故古者帝王之治，其道虽多端，然必大纲既正而万目兼举。若尧之肇唐，舜之起虞，禹之创夏，汤之建商，文武之造周，皆不能外乎此也。

在尧之时，亲睦九族，以广爱敬之恩；厘降二女，以正闺门之礼；馆甥二室，以厚朋友之伦。尧之大纲无不正也。在舜之时，底豫瞽叟，而父子之位定；克谐傲象，而兄弟之化成；刑于二女，而闺门之仪肃。舜之大纲无不正也。钦若昊天，历象授时，命羲仲以秩东作，命羲叔以秩南讹，命和仲以平西成，命和叔以在朔易，命鲧以治洪水，命四岳以明扬侧陋，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万目之举，于尧何如也！察璿玑以齐七政，举祀礼而观诸侯，命四岳以明四目，达四聪，命十二牧以修内治，服远人，命禹以宅百揆，命契以敷五教，命皋陶以明五刑，命伯夷、后夔以作礼乐，命龙以作纳言，四方风动，庶政惟和。万目之举，于舜何如也！

唐虞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如此，岂徒然哉？本于尧舜之心，惟务大学，以正其大本也。不贪淫欲，不嗜玩好，而允执其中，尧之学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而允迪厥德，舜之学也。使唐虞之君不事乎此，则学有未正，而大本未立矣。纲何自而正，目何自而举乎？

其在禹也，典章之率由，彝伦之攸叙。其在汤也，旧服之既缵，人纪之肇修。其在文、武也，《麟趾》以厚公族，《棠棣》以燕兄弟，《鹿鸣》以燕群臣，《樛木》、《思齐》以严阃教。故其子孙，或敬承继禹之道，或布德陟禹之迹；或率乃祖攸行，或监先王成宪；或笃故正父，或对扬光命；或率德以盖前人之愆，或脱簪以辅中兴之盛。此三代之所以正大纲也。其养也，夏以贡，商以助，周以彻焉。其教民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焉。其制刑也，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祥刑焉。其建官也，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人《六典》，卓成兆民焉。其作乐也，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作《大武》焉。其正朔也，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焉。其习尚也，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焉。万目之举，于三代何如也！

三代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如此，岂徒然哉？本于禹汤、文武之心，惟务大学，以正其大本也。祇台德先，不自满假，懋昭大德，不殖货利，禹汤之学也。不盘游畋，缉熙敬止，不作无益，克慎明德，文武之学也。使禹汤、文武不事乎此，则学有未至，而大本不立矣。纲何自而正，目何自而举乎？

此尧舜、禹汤、文武惟务天下之大学，以正天下之大本，所以能致天下之大治。三代而下，汉唐宋诸君虽有天下之位，而不能务天下之大学，所以天下之大治卒不能致也。

汉就高祖言之，如发义帝之丧，戮丁公之叛，庶乎明君臣之义；高四皓之名，割肌肤之爱，庶乎全父子之恩；立白马之盟，定同姓之封，庶乎广昆弟之爱。故继世之君，子不敢叛其父，弟不敢戕其兄，嫂不敢驾其夫，臣不敢专其君，岂不由高祖之作则乎？此其大纲，可谓正矣。然其养民也，阡陌之坏未久，而井田之制不复；郡县之废未久，而封建之制不复。其教民也，焚坑之祸未久，而学校之制不复；五礼六乐之废未久，而礼乐之制不复。此其万目，未尽举也。然兄弟之不容，昉于戾羹之锡封；夫人之同席，作于戚姬之见宠；大将之见杀，兆于韩、彭之菹醢。先儒谓汉之大纲正，以臣观之，汉之大纲亦未尽正如唐虞三代也。汉非惟万目未尽举，而大纲亦未甚正者，以其或不事《诗》、《书》，或溺于黄老，或杂于刑名，或荒于神仙，而圣学也杂。圣学之既杂，则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纲之未尽正，万目之未尽举哉！

唐就太宗言之，胁父臣虏，逼夺神器，父子之亲何在？推刃同气，喋血禁门，兄弟之义何在？纳巢剌妃，媚武才人，闺门之礼何在？故继世之君，子叛其父，嫂驾其夫，弟戕其兄，臣专其君，岂不由太宗之作俑乎？此其大纲，可谓不正矣。然设府卫兵之法，仿佛古人寓兵于农之意；设租庸调之法，仿佛古人用一缓二之意。设殿最以考绩，仿佛古人黜陟之意；设覆奏以审刑，仿佛古人钦恤之意。此其万目，可谓举矣。然法令之行，比之先王未纯也；田畴之制，比之先王未备也；学校之教，比之先王未盛也；礼乐之具，比之先王未修也。先儒谓唐万目举，以臣观之，唐之万目亦未尽举如唐虞三代也。唐非惟大纲未尽正，而万目亦未尽举者，以其或蔽于异端，或荒于游畋，或锢于女色，

或甘于小人，而圣学也怠。圣学之既怠，则大本不立，何怪其大纲之不能正，万目之未尽举哉!

宋就太祖言之，其厚兄弟也，金匮之书，千古不磨，神器之重，一朝脱屣。其厚勋旧也，杯酒解柄，终全勋名，雪夜再幸，不改殊恩。其待臣下也，鞭扑不行于殿陛，骂辱不及于公卿。其严阃范也，内言不出于外，私恩不害于公。故继世之君，持盈守成。家庭之间，虽不能匹休乎《麟趾》之盛也，而干戈之事则未闻；闺门之内，虽不能齐美乎《关雎》之化也，而聚麀之耻则未有。此其大纲，亦云正矣。然制度颇因五代之旧，不能复先王之制。劝课农桑，美则美矣，视三代养民之制何如?修广学校，盛则盛矣，视三代教民之制何如?礼乐分诸儒之喙，视三代制礼乐之遗意何如? 兵财由朝廷之制，视三代制兵财之遗法何如? 以至赃吏之戒不严，败军之法不立，设官之制太冗，任子之恩太滥。此其万目之未尽举也。先儒谓宋大纲正，万目未尽举。以臣观之，黄袍加身，未免来人之公议；烛影避席，未免起人之疑心。德昭之死，未免不厌夫众心；郭后之废，未免有疵于盛德。则宋之万目，固未尽举矣，而其大纲，亦岂甚正乎?宋之诸君，见于行事如此，虽日夜分观书，未免徒侈乎虚名；虽日炎暑谈经，未免不关于实践。圣学既有不实，则大本不立矣。其大纲之未甚正，万目之未甚举，又何怪其然!故汉唐宋所以不能致唐虞三代之治，皆由大学之不讲，大本之不立故也。

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混一区宇。心尧舜、禹汤、文武之心，而大本以立；学尧舜、禹汤、文武之学，而大学以明。故以其大纲之正言之，观其祭毕便殿，泣下不止，遣祭皇陵，哀感不胜，则我太祖之圣孝，亦虞舜之大孝、武周之达孝也。观其剖符锡壤，封建诸王，上制国家，下安生民，则我太祖之亲睦，亦虞舜之敦睦九族、周武之时庸展亲也。观其申明五常之说，则与唐虞之敦典庸礼、商周之建中建极，同一揆也。观其君臣同游之言，则与唐虞之都俞吁咈、商周之左右笃棐，同一意也。大纲之正，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 以其万目之举言之，则法井给民之言，户知丁业之戒，与古人重农之意相出入也。学校教民之政，乡饮励俗之礼，与古人立教之意相表里也。内设六卿以

总制天下，外设布政司以为四方之耳目，则其治官之意，庶几古人之六卿九牧相唱和也。兵部帅府，相维于内，而将帅无偏重之势；布按都司，相制于外，而藩镇无专恣之患，则其制兵之意，庶几古人之司马司徒相统属也。命牛谅以制礼，则斟酌先王之典，以还中国之旧；命陶凯以制乐，则务宣和平之意，而屏亵慢之习。万目之举，有一不如唐虞三代者乎！

列圣相承，心太祖之心，学太祖之学。圣德日新，而无不正之纲；圣化日广，而无不举之目。然法久则弊自生，世久则俗自降，故人伦有不明，风俗有不厚，而我祖宗之纲目，渐以乖张。百姓有不富庶，夷狄有不宾服，而我祖宗之纲目，渐以沦敩。陛下嗣承大统，于兹三年，夙夜拳拳，惟此之虑。陛下此心，即尧之兢兢、舜之业业、禹之孜孜、汤之栗栗、文之翼翼，武之无贰之心也。然自即位以来，躬行大孝，以先天下，已有意于明人伦，而人伦至今有未明。斥去邪佞，禁制奢侈，已有意于厚风俗，而风俗至今有未厚。躬耕藉田，蠲免租税，已有意于富庶百姓，而百姓至今有未富庶。简练将帅，严饬边备，已有意于宾服夷狄，而夷狄至今有未宾服。陛下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心，而不能致尧舜、禹汤、文武之治者，意者陛下于尧舜、禹汤、文武之学有未至乎？何其心之拳拳，而效之邈邈也？臣请为陛下熟言之。

以陛下望道之切，求治之笃，必愤发于中，忧形于色，而拳拳之诚，盖有所不能止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行于上而行于朝廷者也，未有不行于朝廷而行于天下者也。以人伦言之，今公卿大臣，虽轩墀之内，有霄壤之隔。是非不及于面谕，则腹心无所托，而下情不得以上达；可否惟出于内批，则耳目有所蔽，而上心不得以下究。何有乎君臣相亲之义也？陛下诚能体手足腹心之义，略崇高贵重之势，召见不时，咨访非一，使愿输忠悃者得以献其诚，伪为蔽欺者无以施其诈，则君臣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厚者矣。

闾阎小子，忍心害理，生则私妻厚子，别籍异财，曾夷狄之不如；死则食稻衣锦，火葬水瘗，曾禽兽之不若。何有乎父子相爱之恩也？陛下诚能望陵兴哀慕之悲，致养勤定省之诚，公卿守终制之典，士夫严匿丧之禁，则父子之化行天下，而无有不亲者矣。

隔形体而分胡越，弟或戕其兄；同门户而设藩篱，幼多贼其长。何有乎兄弟之恩也?陛下诚能厚同气之恩，广友于之爱，严犯上之律，敦敬长之风，则兄弟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爱者矣。

妾媵无数，庶人僭公侯之分；婚姻论财，中华行夷虏之风。何有乎夫妇之道也?陛下诚能则《关雎》之化，正闺阃之礼，申明婚姻之式，定著妾媵之数，则夫妇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正者矣。

所贪者利禄，谁同心而相求；所附者权势，谁同道而相益。落水下石者纷如，贻书谏诤者寂若。何有乎朋友之道也?陛下诚能近君子之朋，远小人之党，黜排陷之奸，奖协恭之正，则朋友之化行于下，而无有不善者矣。人伦之明于上，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明人伦之道，则人伦庶乎可明，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以风俗言之，朱扉一开，燕雀骈集，谀佞诡随者名之曰变通，缄默自便者目之曰忠厚，直言正色者非之曰矫激，操心持节者刺之曰干名。此士夫之风丧也。陛下诚能塞奔竞之门，杜谄谀之口，奖名节之士，张正直之气，则士夫之风振矣。

庶人帝服，倡优后饰。雕梁画栋，惟恐其不华；珍馐绮食，惟恐其不丰；锦绣金玉，惟恐其不多；侏色俪音，惟恐其不足。此奢侈之风盛也。陛下诚能躬节俭之实，抑浮靡之费，重僭逾之罪，定上下之等，则奢侈之风降矣。

典学校之教者，尸虚位而无实行；由科贡之途者，饰虚名而乏实才。此学校之风衰也。陛下诚能重师儒之任，使无实行者不得以滥叨；严科贡之选，使无实才者不得以幸进，则学校之风兴矣。

珠宫梵宇，照耀云汉，秃首黄冠，充塞道路。此道、佛之风盛也。陛下诚能鉴梁武、宋宗之失，斥祸福报应之论，推崇乎正道，不惑于邪说，则道、佛之风熄矣。

苞苴一人，贱可使贵；贿赂一通，滞可使达。黩货载归，闾里称庆；琴鹤相随，妻子怨谤。此贪黩之风炽也。陛下诚能综核名实，督行劝惩，廉介者必彰而不隐，贪墨者必诛而不赦，则贪黩之风止矣。风俗之厚于上，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

以厚风俗之道，则风俗庶乎可厚，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以言夫百姓之失所，则征求极其锱铢，而尾闾于异端之奉；苛敛至于毫发，而漏卮于宠幸之费。此吾民之困于赋敛者可恤也。征舸贡舰，动连千夫；工匠兴抬，延及数户。此吾民之困于征役者可恤也。田连阡陌，利累羊羔；家鸡犬豕，惟其所啖。此吾民之困于豪家巨室者可恤也。囊帛赢金，饫鳞醉酪；市虎门妖，恣其所欲。此吾民之困于贪官黠吏者可恤也。劫掠践蹂，鸡犬一空；胁持抑逼，肝脑涂地。此吾民之困于兵戈盗贼者可恤也。父食其子，夫鬻其妻，壮者散于四方，老弱转于沟壑。此吾民之困于饥馑流离者可恤也。

百姓之失所，固可恤矣，然恤之有其道焉。大要在于重守令，急务在于节财赋。守令者，民之父母。守令不重，则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豪猾由此而横，盗贼由此而起。财赋者，民之命脉。财赋不节，则以一而科百，因十而敛千，赋敛由此而苛，征役由此而滥。

欲重守令，在于慎选科贡，疏理监胄，严励风纪，精立选法。欲节财赋，在于简阅军士，沙汰冗官，杜抑私爱，斥绝异端。科贡既慎，则专图侥幸者不得以幸进；监胄既理，则苟延岁月者不得以幸选；风纪既严，则贪淫无状者不得以幸存；选法既精，则政绩不闻者不得以幸迁，而守令自重矣。军士既阅，则老弱无能者不得以幸食；冗官既汰，则备员充位者不得以幸禄；私爱既杜，则贵戚近习之属不得以幸赐；异端既斥，则佛老怪诞之徒不得以幸干，而财赋自节矣。何患百姓之不富庶哉！百姓之富庶，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富庶百姓之道，则百姓庶乎可富庶，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以言夫夷狄之梗化，则虏骄于北，羌黠于西，变诈之不测，侵掠之无常，驱之则不足于兵，守之则不足于食，此西北之夷寇可虑也。阻山川以为固，结流民以为援，神出鬼没，蜂屯蚁聚，此荆襄之夷寇可虑也。丹崖千仞，青壁万重，攻之则虑险，守之则废财，此两广之夷寇可虑也。围聚山岩，浮游乡邑，我进则彼去，我退则彼来，此川蜀之夷寇可虑也。

夷狄之梗化，固可虑矣，然服之有其道焉。大要在于修内治，布

恩信；急务在于选将帅，足兵食。内治不修，则根本不固；恩信不布，则人心不服。将帅不选，则敌人不畏，士卒不附；兵食不足，则士气不振，众心不守。

欲修内治，在于戒逸乐，足民用，任君子，退小人。欲布恩信，在于宥胁从，绥降款。欲得将帅，在于收人望，专委任，戒欺罔。欲足兵食，在于广屯田，增土兵。逸乐既戒，则主心日正；民用既足，则邦本日固；君子既任，则君策日陈；小人既退，则奸弊日消；胁从既宥，则叛乱日怀；降款既绥，则归附日众。人望既收，则将材日至；委任既专，则将士日奋；欺罔既戒，则赏罚日明；屯田既广，则储蓄日富；土兵既增，则兵力日振。何患夷狄之不宾服哉？夷狄之宾服，非务学不能知。臣愿陛下拳拳圣学，以正大本，急求所以宾服夷狄之道，则夷狄庶乎可宾服，无异于唐虞三代也。

嗟乎！陛下拳拳于唐虞三代之治，而臣拳拳勉陛下以唐虞三代之学者，诚以纲之未正，臣不忧也；万目之未举，臣不忧也；人伦之未明，臣不忧也；风俗之未厚，臣不忧也；百姓之未富庶，臣不忧也；夷狄之未宾服，臣不忧也。臣之所忧者：陛下大本虽已至矣，或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之光明；陛下大学虽已讲矣，或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之精一。

陛下由臣之言，持拳拳图治之心，致拳拳为学之力，如尧舜，如禹汤，如文武，则天理日明，人欲日消。妖艳之色，淫哇之声，不足以荡此心；便辟之言，侧媚之态，不足以尽此心。沉湎荒淫盘游之事，不足以荒此心；华丽珍怪奇异之物，不足以侈此心；神仙佛老异端之说，不足以惑此心；土木刑名征伐之类，不足以盅此心，而大本立矣。

大本既立，由是大纲可正，万目可举。人伦由是而可明，风俗由是而可厚，百姓由是而可富庶，夷狄由是而可宾服，薄海内外由是而可熙和，宗庙社稷由是而可保安，神器由是而可康宁，圣寿由是而可永延，列圣由是而可增光，帝王由是而可匹休，而汉唐宋诸君不足以望陛下之下风矣。若大本不立，则虽疲精惫神，以正夫大纲，以举夫万目，以遂数者之效而快陛下之心，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无可为者矣。此臣所以拳拳欲陛下从事于学也。

然臣之所谓学者，非稽同合异以为博也，非钩深致远以为奇也，非缛章绘句以为美也。臣之所谓学者，即《大学》之道也。是学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学也。其目有八，而各有其要。平天下之要，在于治国；治国之要，在于齐家；齐家之要，在于修身；修身之要，在于正心；正心之要，在于诚意；诚意之要，在于致知格物。宋儒演绎其义，以进告其君曰，齐家之要有四：曰重匹配，严内治，定国本，教戚属。修身之要有二：曰谨言行，正威仪。诚心正意之要有二：曰崇敬畏，戒逸欲。致知格物之要有四：曰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人情。是书也，乃千圣之心法，万古之成规，致治之良图，保邦之大道。

陛下必拳拳于此，昼而诵之，夜而思之，亲近儒臣，问质疑义。毋徒事虚文，毋徒应故事，毋徒闻于耳而不识之于心，毋徒德于人而不践之于己，毋徒勤之于始而或怠之于终，毋徒讲之于百辟云集之时而即弃之于宫闱深严之地，毋以朝夕而有间，毋以寒暑而有辍。或摘其要语而列之于屏障，或参以祖训而铭之于座右，考之于经，证之于史。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治，以之而安，以之而盛，以之而寿，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行，有合于此者乎？如某事也，古人以之而乱，以之而危，以之而衰，以之而夭，即惕然以省之曰：吾今日之所为，有类于此者乎？念念在此，念念之外无他念也；事事在此，事事之外无他事也。如此然后可谓之拳拳矣。如此然后所存必正心，所出必正言，所行必正道，所亲必正人。如此然后身无不修，家无不齐，国无不治，天下无不平也。

嗟夫！人主之心，未尝不好治而恶乱也，好安而恶危也，好盛而恶衰也，好寿而恶夭也。然治常少，乱常多；安常少，危常多；盛常少，衰常多；寿常少，夭常多。往往违其所好，而蹈其所恶。夫岂其本心哉？以其不能拳拳于学，而陷于不知故也。如人之疗病，未尝不爱其生，而卒至于死，亦岂其本心哉？以方书不熟，而用药不精故也。

方今天下大势，如人受重病，非不栝然，且大形犹人也，然内自腹心五脏，外达四肢百骸，无一毫一发不受病。有识者以为寒心，而庸医委之曰安。病者不悟其非，和之曰吾无病也。昔扁鹊见齐桓侯曰，君有疾，不治将深。桓疾曰，寡人无疾。如是者三，扁鹊望见齐桓侯而

走。后五日，桓侯疾作，召扁鹊，鹊已逃去。臣愿陛下以本心为元气，以贤良为明医，以古圣贤经史、祖宗宝训之言为古方，为药石，惧病之将深而豫治之。信任明医，熟察古方，深究脉理，精择药石，节嗜欲，慎防护，日调其元气，急寻其病根之所在而划除之，则元气日固于内，邪气不攻于外，而百病自消，天年自固。何忧不如尧舜，不如禹汤，不如文武者乎？及今犹可为也。失今不为，臣恐扁鹊望之而走矣，虽噬脐无及也。

唐虞三代与我祖宗列圣之大纲无不正，万目无不举。元气本固，客邪难入，病无自而生也。汉唐宋诸君，或大纲正而万目不举，或万目举而大纲不正。元气未固，客邪易奸，随病而施药者也。自唐虞而三代，自三代而汉唐宋，用是道则治，不用是道则乱；用是道则安，不用是道则危；用是道则盛，不用是道则衰；用是道则寿，不用是道则夭；用是道则延长，不用是道则短促。然则是道也，乃世道治乱之所系也，社稷安危之所关也，风俗盛衰之所由也，人主寿夭之所本也，国祚短长之所在也。陛下可不大警于心乎？

《易》曰：正其心，万事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董仲舒告武帝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臣愿陛下加意于臣之言，毋如武帝不加意于仲舒之言也。苏轼对神宗曰：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如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如丘山。今天下不可谓无事矣，臣愿陛下不视臣言如鸿毛，而视臣言如丘山，则天下幸甚，生民幸甚。臣俯拾刍荛，上尘天听，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占据天下最尊贵的位置，一定要使天下政治清明得到实现；要使天下政治清明得到实现，一定要端正天下最重要的根基；要端正天下最重要的根基，一定要致力于天下最大的学问。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所占据的帝位与王位，就是天下最尊贵的位置；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政治，就是天下的清明政治；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所具有的心性，就是天下最重要的根基；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学问，就是天下

最大的学问。具有那样的大学问然后能端正心性，具有那样的心性然后才能实现那样清明的政治，具有那样清明的政治然后才能保有帝位和王位。清明的政治，是帝王保有君位的良谋；心性，是帝王拿出治国措施的根本；学问，是帝王端正心性的主要途径。

上古圣帝明王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尧向君畴学习，舜向务成昭学习，夏禹向西王国学习，商汤同成伯子学习，周文王向时子思学习，周武王向郭叔学习。他们用来精通大学问，维持圣贤君主心性的东西，无所不至。因而给当时人以极大的恩泽，美名流传到后世，功业在天下最高，英明与日月相同，后世人无法赶得上。

从汉代到唐代到宋代，其间的英明君主，不是不想使天下政治像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清明；仁人志士，不是不想使自己的君主像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帝王那样圣明。然而一千多年来，没有一两个差不多能达到这样的。有的君主具有可以学习的资质，也有愿意学习的志向，但遇不到合适的臣子。如汉高祖与当时的萧何、曹参，唐太宗与当时的房玄龄、杜如晦，宋神宗与当时的王安石，这都不是君主的罪责。有的是大臣具有匡扶国家的才干，也具有规正君主的学问，但遇不到合适的君主。如贾谊、董仲舒在汉朝，陆贽在唐朝，程颢与程颐在宋朝，这都不是臣子的罪责。这表明君臣相遇，自古以来就是难事，而有志之士因此扼腕叹息不止。这是汉代只能是汉代那个样子，唐代只能是唐代那个样子，宋代只能是宋代那个样子，而不能达到唐虞三代盛况的原因。

臣下我经常观览前代的史书，看到国君有向往圣道、仰慕大学问的心意，而臣子不能助成他，就悲叹那些臣子。看到做臣子的有匡扶国家、引导君主的学问，而国君不能任用他，就悲叹那些国君。陛下继承我大明祖宗的宝位，也就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帝王之位；陛下天生的聪明资质，也就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那样的天资。政治已经清明了，还认为没有达到特清明；德行已经盛大了，还认为没有达到特盛大。于是在日理万机之余，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提出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首先询问唐虞三代直至汉唐宋各君主的治国之道，恳切地想端正治国大纲，实施众

多的具体措施，来申明人伦，使风俗淳厚，使百姓富裕，使周边各族归服，来给祖宗增光，来与圣明帝王媲美。臣下我由此知道陛下的这种心念，就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心念。陛下有这样的心念，不只是臣下我的幸运，也是天下的幸运。臣下我敢不用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学问，为陛下做劝勉吗？

过去范祖禹在北宋时进呈《帝学》八卷，认为自古政治清明的日子很少，政治混乱的日子很多，推究其原因，是因为君主不学习。南宋的朱熹将要上殿回答君主询问，有人对他说，端正心性、精诚意念的学问，是国君所不喜欢听的。可他说，我平生所研习的学问，就在于此。如果有所回避，这是欺君。陛下您有使国家达到唐虞、夏商周三代那样隆盛的志向，而没有汉唐宋各个皇帝那样的过失，固然没有不学习的心愿，也不是讨厌听那端正心性、精诚意念的学问的君主。臣下我敢不把我平生所学的东西禀告给陛下，而使自己陷于欺君的罪过中吗？假使臣下我这样做，不尽臣子的至诚，隐藏一己之见，上负朝廷，下负自己所学，臣下我恐怕后人悲叹今天的人，和我们当今的人悲叹过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臣下我请求依照圣上所问，一一作答，陛下请降恩听一听。

臣下我听说大道的本原，出自上天。这大道，大到没有止境，小到无所不包。说它大，就构成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夫妇之间，朋友之间，长幼之间的纲常。好像网上有纲绳，用来巩固住人的心性，统领社会的一切，这是天地间的根本大法，也就是进行治理的大纲。说它小，就构成礼仪音乐、刑法政令、国家典章的具体举措，用来扶持君臣之纲、父子之纲、夫妇之纲，管理好国家，这是古今通行的大义，也就是进行治理的细目。这种治国之道的大纲，不由自己的心性来主宰，就没有依据会端正；这种治国之道的细目，不由自己的心性来维持，就没有依据会实施。这心性，用来主宰自身，是端正治国大纲、实施细目的根本。心性虽然主宰这大纲，但是不学习就会有产生迷惑的地方，大纲还从哪里能端正呢？心性虽然维持这细目，但是不学习就会出现受蒙蔽的情况，细目还从哪里能落实呢？这学问，又用来端正心性，属于端正大纲、落实细目的要务。大纲不端正，固然不能谈什

么天下大治;众多细目没有落实,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办法。所以古代帝王治国,方法虽是多方面的,然而必须是治国大纲端正了,而众多细目又落实了。如尧从唐邑崛起,舜从虞地兴盛,大禹缔造夏,成汤建立商,周文王与武王创建周,都不能出此之外。

唐尧时期,亲善和睦九族,来扩展爱护百姓、崇敬上天的恩德;把两个女儿嫁给舜,来匡正闺门的礼仪;把前来拜见他的女婿舜安顿在另一居室,来加重朋友交往的常规。尧时治国的大纲都端正了。虞舜时期,舜让父亲瞽叟变得高兴,而使原不正常的父子之间的关系也确定下来;舜与弟弟象和睦相处,而使原不正常的兄弟关系经化导也正常了;舜给两位夫人树立起榜样,而使闺门礼节得到肃正。舜时的治国大纲没有不端正的。唐尧敬顺上天,依据天象颁布历法。命令羲仲指导春耕生产,命令羲叔指导夏季的工作,命令和仲指导秋收活动,命令和叔观察太阳向北运行的情况,命令鲧治理洪水,命令四方诸侯的长官推举贤明和被埋没的人才,规定百官的职责,众多事务都振兴起来。各种治国细目的实施,对于尧来说,那是怎么样呀!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情况,安排七项政事,举行祭祀大礼考察诸侯,命令四方诸侯长官明察四方政务,听取天下的议论,命令十二州的长官处理好自身的政务,使远方的人前来归服,命令大禹统领百官,总揽国政,命令契施布父义、母慈等五种教化,命令皋陶彰明刺面、杀头等五种刑罚,命令伯夷、后夔制作礼乐,命令龙担任纳言官。四方各地闻风响应,所有政务都和顺。各种治国细目的实施,对于舜来说,那又是怎么样呀!

尧舜时期治国的大纲都端正,治国的细目都实施开来,难道是自然形成的吗?这是源于尧舜的圣明之心,只从事大学问,来端正那根本。不贪求过度的欲望,不嗜好珍宝玩物,确实把握住最为适中的尺度,这是尧的学行。不沉溺在安逸中,不过度享乐,确实遵循帝王的道德,这是舜的学行。假使尧舜这样的君主不在这方面用力,学行就会不端正,而根本也不会确立了。治国的大纲又从哪里会端正,治国的细目又从哪里能实施呢?

夏禹时期完全遵循尧舜的典章制度,使天下百姓和睦相处的常

理大法得到施行。商汤时期，继承夏禹的统治区域，开始修明人伦纲常。在周文王和武王时期，像《诗经·麟趾》篇那样优待公族，像《棠棣》篇那样对待兄弟，像《鹿鸣》篇那样对待群臣，像《棫木》篇和《思齐》篇那样强化闺门教化。因此他们的后代子孙，有的继承大禹的王道，有的广施恩德达到大禹治水所到过的地方，有的效法祖宗的做法，有的借鉴先王的成规，有的厚待同姓诸侯和卿大夫，有的发扬光大祖先的功业，有的端正德行改正前人的过失，有的痛加自责来重新振兴衰落的王朝。这是三代用来端正大纲的东西。它们养育百姓，夏朝采用贡税，商朝采用助役，周朝采用彻法。它们教化百姓，夏代把学校叫做“校”，殷商把学校叫做“序”，周朝把学校叫做“庠”。它们制定刑法，夏代有禹刑，商代有汤刑，周代有祥刑。它们设置官员，夏商比尧舜时期多一倍，共二百个，也都任用贤才；周人订立《周礼》，设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来使百姓生活幸福。它们创作乐舞，夏禹有《大夏》，商汤有《大濩》，周武王有《大武》。它们制定历法，夏代把正月作为岁首，商代把十二月作为岁首，周代把十一月作为岁首。它们的风俗习尚，夏代推崇忠正，商代推崇质朴，周代推崇文采。治国细目的实施，对夏商周三代来说，那可又是怎么样呀！

夏商周三代的治国大纲都端正，治国细目都实施，难道是自然形成的吗？这源于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圣明之心，只从事大学问，来匡正那根本。把敬重德行放在首位，不自我满足，激励显扬盛大的德行，不聚集财利，这是夏禹、商汤的学行。不沉溺在出游打猎中，持续光明，把恭敬列为目标，不作无益的事情，谨慎对待政务，努力推行德教，这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学行。假使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不在这方面用力，学行就会达不到标准，而根本也不能确立了。治国大纲又从哪里会端正，治国细目又从哪里能实施呢？

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致力天下的大学问，来端正天下的根本，所以能实现天下大治。夏、商、周三代以后，汉唐宋各代君主虽然据有帝位，但是不能从事天下的大学问，所以天下大治的局面最终也不能形成。

汉代以高祖而言，像为义帝发丧，杀掉背叛的丁公，差不多明察

君臣之间的大义了；推重商山四皓的高名，割爱不废掉太子，差不多保全了父子之间的恩情；杀白马订立盟约，确立同姓封王的制度，差不多扩大了兄弟之间的友爱。因此后来继位的君主，作儿子的不敢背叛父亲，作弟弟的不敢残害兄长，作嫂子的不敢欺凌她的丈夫，作臣子的不敢操纵国君，这难道不是由于高祖定立起准则才这样的吗？当时的治国大纲，可以说是端正了，然而汉代养护百姓，井田制度遭到破坏还时间不长，却不恢复；郡县制度的废弛还时间不长，但分封诸侯的制度却不恢复。在教化百姓方面，焚书坑儒的惨祸发生不久，但学校的制度却不恢复；古代五种礼法和六种宫廷乐舞废弃不久，但礼乐制度却不恢复。这是治国的细目，还没能完全实施。然而兄弟之间不相容，这开始于高祖封其兄长的儿子为羹颉侯；夫人同席而坐，开始于戚姬被宠爱；大将被杀害，开始于韩信、彭越遭受剁成肉酱的酷刑。前代儒生说汉朝的大纲端正，以臣下我看，汉朝大纲也没完全像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那样端正。汉朝不只是治国细目没有完全实施，大纲也有不十分端正的，原因是那时有的君主不学习《诗经》、《尚书》，有的君主沉溺于黄老之学，有的君主夹杂着刑名之学，有的君主醉心于神仙方术，导致圣贤之学混杂。圣贤之学既已混杂，帝王根本就不能确立，哪里还去责怪什么汉朝大纲没有完全端正，众多细目没有完全实施呢？

唐代以唐太宗而言，胁迫他的父亲，向外族屈服，夺取帝位，父子之间的亲情在哪里？与骨肉兄弟刀兵相交，宫门喋血，兄弟之间的情义又在哪里？收纳亲弟弟的妃子，宠爱武才人，闺门之礼又在哪里？所以唐代后世的君主，儿子背叛他的父亲，嫂子管辖他的丈夫，弟弟残害兄长，臣子操纵君主，这难道不是由太宗开始的吗？唐代的大纲，可以说不端正了。然而设立府卫军事制度，接近古人寓兵于农的用意；设立租庸调的赋役制度，接近古人征发赋役实施一项暂缓其它两项的用意。设立按等级考核官吏的制度来考核官员的政绩，接近古人对官吏决定升降的用意；设立覆奏制度来审理案件，接近古人慎重用刑、体恤百姓的用意。唐代的治国细目，可以说实施了。然而法令的实施，和先王相比并不纯正；土地制度，和先王相比还不完备；学校的

教化，和先王相比还不兴盛；礼乐制度，和先王相比还没有修明。前代儒生说唐代治国细目都实施了，以臣下我看，唐代治国细目也没有完全像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那样实施。唐代不只是治国大纲不全端正，治国细目也没有完全实施。原因是当时有的君主被异端之学所蒙蔽，有的君主一味从事游猎活动，有的君主沉迷女色，有的君主被小人引诱，而荒废了圣贤之学。圣贤之学已经荒废，帝王的根本就不能确立，还去责怪什么唐代的治国大纲不能端正，治国细目没有全部实施呢？

宋代就宋太祖而言，他厚待兄弟，在金匮藏有传帝位给弟弟的盟书，永远不会磨灭，把显赫的帝位，看成是一个早晨脱去鞋子那样。厚待勋臣旧部，杯酒解除兵权，保全了他们的功名，风雪之夜两次访问赵普，不改过去对他的优待。对待臣下，在宫殿台阶下不鞭打臣子，辱骂轮不到公卿。强化阉门的规范，宫内的言论传不到宫外，对后妃的恩赐不损害朝政。因此宋朝继位的君主，能保有已有的功业。家庭之间，虽不能和《诗经·麟趾》篇所称颂的和美盛况相比，但动起刀兵的事从未发生过；官庭内部，虽不能和《诗经·关雎》篇所称颂的教化大行比美，但乱伦的丑事从未发生过。宋朝治国的大纲，也可以说端正了。然而典章制度大多沿用五代旧制，不能恢复古代帝王的制度。鼓励农业生产，好是好了，但和三代养护百姓的制度无法相比。整顿扩建学校，盛大是盛大了，但和三代教化百姓的制度无法相比。礼乐制度按众儒的不同主张去设置，和三代制定礼乐的用意无法相比。兵制财赋由朝廷临时制定，和三代兵制财赋的法度无法相比。以至于对贪污的官吏戒饬不严格，处置败军将帅的法规不确立，设置官员的制度太冗杂，让功臣子弟做官的恩惠太过分。这是宋代治国的细目没能完全很好地实施。前代儒生认为宋代大纲端正，细目没能完全实施。以臣下我看，太祖黄袍加身，夺取帝位，免不了招来后人的议论；除夕之夜太宗在烛影中闪来晃去，免不了使人疑心。赵德昭被迫自杀身亡，未免不能使人心服口服；郭皇后被废，未免有损圣德。宋代的治国细目，固然还没有完全得到实施，而治国大纲又怎能特别端正呢？宋代各个君主的行事就像这样。虽然说半夜仍在

读书，未免有只图虚名的意思；虽然说炎暑仍在谈论经书，也不免和实际行为脱节。圣贤之学既然存在着不实在的地方，帝王的根本就确立不起来了。治国大纲不十分端正，治国细目也没完全实施，还责怪什么宋朝竟是这个样子呢？因此汉唐宋不能达到尧舜、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天下大治，都是由于不讲大学问，不确立帝王根本的缘故。

我朝太祖高皇帝在淮河崛起，统一天下。把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的圣心作为自己的圣心，最重大的根基由此确立；把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的学问作为自己的学问，最重要的学问由此宣明。因而从大纲端正这方面讲，看他祭祀完毕到了便殿，还泣涕不止，派人去祭祀皇陵，不胜哀痛，我朝太祖的孝心，也就是舜那样的大孝，周武王和周公那样天下都认同的孝心。看他剖符赐给国土，分封各王，在上面治理国家，在下面安定百姓，我朝太祖让宗室亲睦，也就是当年舜使九族和睦，周武王用诚信来使同姓诸侯相互亲近啊！看他申明仁义礼智信的学说，这与尧舜用淳厚的态度施行五典，使用五等礼仪，商朝、周朝建立不偏不倚的准绳和行为的最高原则，是同一种考虑。观察太祖与臣僚一起交游的言论，这与尧舜时代君臣相互讨论，商朝、周朝的左右大臣合力辅助天子，是同一个意思。国家大纲的端正，没有一项不像尧舜、夏商周三代那样的！从细目实施这方面讲，太祖关于效法井田使百姓富裕的言论，家家都要知道壮劳力该干什么的诫语，这与古代重视农业的用意相类似。建立学校、教化百姓的政务，举行乡饮酒礼激励风俗的礼制，与古人推行教化的意图相表里。在朝廷设立六部尚书来总揽天下政务，地方设立布政使司做为管辖四方的耳目，这种官制设置的意图，差不多与古人六卿九牧内外应和相接近。兵部、五军都督府设立在朝廷内，相互牵制，而没有将帅兵权过重的势态；布政使司、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在地方上相互制约，而无藩镇对抗朝廷的祸患，这种部署军队的意图与古人司马、司徒相互统属很接近。命令牛谅制定礼仪，就斟酌先王的法典，恢复中国的旧制；命令陶凯创作音乐，就力求宣扬谐和平正的主旨，而摒弃猥亵轻浮的习气。治国细目的实施，有一项不如尧舜、夏商周三代的吗？

我朝各位圣君递相承接,把太祖的本心作为自己的本心,把太祖的学问作为自己的学问。圣明的德行一天比一天提高,而没有不端正的大纲。圣明的教化日益扩大,而没有不实施的细目。然而法度历时长久,弊病自然就会产生;年代长久,风俗自然就会下降,因此人伦纲常有不明之处,风俗有不敦厚之处,而我朝祖宗的大纲细目,逐渐偏离正常轨道。百姓有不富庶的,四方异族有不归服的,而我朝祖宗的大纲细目逐渐沉沦败坏。陛下继承帝位,到现在三年了,日夜勤勤恳恳,只忧虑这些事情。陛下的这一心念,也就是尧保持警惕的心念,舜时刻戒惧的心念,夏禹孜孜不倦的心念,商汤十分畏惧的心念,周文王小心翼翼和周武王专一不变的心念。但从登上皇位以来,带头实行大孝,为天下人做出表率,已经有心宣明人伦纲常,而人伦纲常至今仍有没宣明的地方。斥去奸邪,禁止奢侈,已经有意使风俗淳厚,但风俗至今仍有不淳厚的地方。亲自实行藉田之礼,免除租税,已经有意使百姓富庶,而百姓至今还有不富庶的。选拔将帅,整顿边防军备,已经有心使异族归服,而异族至今仍有不归服的。陛下怀有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的圣心,而不能使天下达到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那样的大治局面,想来原因在于,陛下对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的学问还有未学到手的吧?为什么用心那样恳切,而实效却差得很远呢?臣下我请求为陛下详尽言说。

凭借陛下盼求大道的急切,谋求天下大治的笃诚,必定是从内心发愤又在脸上显出忧愁来,而那恳切的诚心,恐怕不会止息的。但天下的政事,从没有皇上不实施而朝廷却实施的,从没有朝廷不实施而天下却实施的。以人伦而言,现今公卿大臣,即使在官殿上,与陛下也有天地般的分隔。事情的是非不能得到陛下的当面指示,心腹大臣就无所托付,而下面的情况也没办法让陛下能知晓;事情可行不可行只出自宫廷的批示,耳目就会被蒙蔽,而圣上的心意不能够向下面贯彻。这样哪里还有君臣相亲近的大义呢?陛下果真能体察君臣之间的手足腹心的关系,降低重视位高权重大臣的态势,随时召见臣僚访求天下大事,不只是一个人,使愿意向陛下献纳忠诚的人都能够献纳他的忠诚,使作假蒙蔽欺骗的人没办法施展他的奸诈,那么君臣的

教化就会在天下实行,而没有不忠厚的了。

乡间的小民,心地残忍、伤天害理,活着时偏爱妻子,厚待儿女与父母分家,私蓄财产,连夷狄之人也不如;死后还要举行隆重的丧礼,进行火葬水葬,连禽兽也不如。怎么会有父子相亲相爱的恩义呢?陛下果真能拜望陵墓,产生哀痛思慕先人之情,怀有奉养双亲特殷勤,早晨晚上都问候的至诚之心。公卿大臣遵守三年守孝的规定,士大夫严格执行不许隐瞒家有丧事的禁令,父子关系的教化就会在天下实行,而没有不亲善和睦的了。

兄弟分离疏远,如同北胡与南越,弟弟有的杀害兄长;同在一个家庭中却设立篱笆,年纪小的大多残害年纪大的。哪里还有兄弟之间的情谊呢?陛下果真能够加厚对骨肉同胞的恩惠,扩展友爱,强化以下犯上的律条,促进敬爱长辈的风气,兄弟关系的教化就会在天下实施,没有不友爱的了。

姬妾无数,小民僭越公侯的名分;凭财物来定婚姻,中原实行异族的风俗。哪里还有什么夫妇之道呢?陛下果真能效法《关雎》诗所讲的教化,来肃正闺门的礼仪,申明婚姻的准则,确定拥有姬妾的数目,夫妇关系的教化就会在天下实行,没有不端正的了。

当今世人贪图利禄,没有人心愿相同而彼此谋求;依附权势,没有人同守正道而彼此促进。落水下石的人多得很,上书谏诤的人少得可怜。哪里还有朋友之间的道义呢?陛下果真能够接近君子的群体,疏远小人的团伙,罢黜那些排斥忠良、陷害无辜的奸人,奖励和睦相处、恭敬礼让的正人君子,朋友关系的教化就会在天下实行,没有不善良的了。作帝王的要明察人伦,不致力学问就不能知晓。臣下我愿陛下对圣人学问特别用心,来端正根本,急切寻求宣明人伦的途径,人伦差不多可以宣明,和尧舜、夏商周时期没有什么两样了。

以风俗而言,权贵家的大门一开,小人就群集而来。阿谀奸佞随大流的人被称做变通,沉默不语自图方便的人被称为忠厚,而直言正色的人被指责为故作姿态,有节操的人被讽刺成追求功名。这是士大夫的风气沦丧了。陛下果真能堵塞投机钻营的门路,堵上阿谀谄媚者的嘴巴,奖励名节之士,伸张正气,那么士大夫的良好风气就会

振作起来了。

平民百姓穿着帝王才能穿的服装，卖唱女子用着皇后才能用的装饰。住宅雕梁画栋，还恐怕不豪华；饮食非常精美，还恐怕不丰厚；拥有锦绣金玉，还恐怕不多；拥有美女舞妓，还恐怕不够用。这是奢侈之风盛行。陛下果真能亲身励行节俭，抑制浮靡的费用，加重僭越逾制的罪罚，制定上下的等级，奢侈之风就会减弱下来。

掌管学校教育的，只占着空位而没有实际的德行；从科举途径入仕的人，只有虚名而缺乏实际才干。这是学校的风气衰落了。陛下果真能够重视师长的选任，使没有实际德行的人不能滥竽充数；加强科举制度，使没有实际才干的人不能侥幸入仕，学校的风气就会振作起来了。

道观寺院，照耀天河；和尚道士，充斥道路。这是信仰道教佛教的风气兴盛。陛下果真能借鉴梁武帝、宋徽宗的过失，斥责祸福报应的谬论，只推崇儒学正道，不被邪说所迷惑，信仰道教佛教的风气就会熄灭了。

礼物一送上去，下贱的官吏可以尊贵起来了；贿赂一打通，长期升不了官的人可以马上就升官。贪污财物满载归乡，乡里的人都来庆贺；琴鹤带在身边回到家中，妻子儿女都来怨恨。这是贪污之风炽烈。陛下果真能验核职位与所应处理好的职务，劝善惩恶，对廉洁正直的人一定加以表彰而不埋没，对贪污腐化的人一定予以惩办而不赦免，贪污腐化之风就会中止。做帝王的要使社会风俗变淳厚，不致力学问就不能知晓。臣下我希望陛下对圣人学问特别用心，来端正根本，急切寻求使社会风俗淳厚的途径，那么社会风俗差不多就会变淳厚，和尧舜、夏商周时期没有什么两样了。

从百姓流离失所这方面而言，官府征敛钱财不放过一丝一毫，最后却归入对信道拜佛的特殊供奉而耗费掉；苛细收税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最后却从朝廷的特殊赏赐中流失掉。这是我朝百姓被赋敛困扰而应该加以体恤的。征调船只，动辄牵动上千个壮丁；工匠去服役，会牵连好几户。这是我朝百姓被征役所困扰而应该加以体恤的。富豪田连阡陌，高利贷钱特别多，家中的鸡犬猪，可以任凭他们吃

用。这是我朝百姓被豪强大族所困扰而应该加以体恤的。官吏们中饱私囊，吃山珍，饮美酒，如闹市的恶虐和门外的妖孽，任随自己胡来。这是我朝百姓被贪官污吏所困扰而应该加以体恤的。民众被劫掠践踏，鸡犬一空，被胁迫追逼，肝脑涂地。这是我朝百姓被兵灾盗匪所困扰而应该加以体恤的。作父亲的吃掉了儿子，作丈夫的卖掉了妻子，强壮的人逃往四方，老弱的人死于沟壑之中，这是我朝百姓被饥荒流亡所困扰而应该加以体恤的。

百姓失去生存的处所，固然应该加以体恤，然而对百姓抚恤应有措施。最重要的在于重视太守县令的人选，当务之急在于节制财赋。太守县令，是百姓的父母。不重视太守县令的人选，他们就会喜好百姓所厌恶的，厌恶百姓所喜好的。豪强奸猾由此横行，盗贼因此而兴起。财赋是百姓的命脉，不节制财赋，就会利用一项而征收十项，借口十项而征收千项；赋敛由此而苛细，徭役由此而众多。

要重视太守县令的人选，在于慎重选择科举人士，整顿国子监，严肃政纪，精立选官的办法。要想节制财赋，在于挑选军士，淘汰冗官，杜绝个人的爱好，根本不信道信佛。科举选士慎重了，那么一心图谋侥幸仕进的人不能侥幸而当官；国子监整顿好了，那么混日子的人不能侥幸被选中；政纪严肃了，那么贪得无厌的人不能凭侥幸而存在。选官办法精当了，那么政绩不显著的人不能侥幸升迁，而太守县令就会自重了。军士挑选出来了，老弱无能的人不能侥幸再吃军饷；冗官被裁掉了，那么只占位子充数的人不能侥幸再得到俸禄；个人的偏爱杜绝了，那么贵戚和皇帝身边的人不能侥幸得到赏赐；异端邪教排斥了，那么和尚道士这类怪诞的人不能侥幸当上僧道官，而财赋自然就节制了。这样还忧患什么百姓不富裕呢？百姓的富裕，不致力学问就不能知晓。臣下我希望陛下对圣人学问特别用心，来端正根本，急切寻求使百姓富裕起来的办法，那么百姓就会富裕，和尧舜、夏商周时期没有什么两样了。

从周边部族不顺从教化这方面讲，鞑靼在北方骄横，羌人在西方要滑招，变诈很难预测，侵扰也不固定，驱逐他们却兵力不足，防守他们又缺乏军粮，这是西北的部族值得忧虑的。占据山川作为堡垒，联

合流民作为援助，神出鬼没，如蚂蜂屯集，如蚂蚁聚集，这是荆襄一带的部族值得忧虑的。在千仞高崖之上，在万重群山之中，进攻他们要考虑到险阻，防守他们又耗费钱财，这是两广的部族值得忧虑的。围聚在山中，游荡于乡间，朝廷进攻，他们就退去，朝廷退兵，他们就回来，这是川蜀的部族值得忧虑的。

四方部族不服从教化，固然值得忧虑，然而让他们归服要有合适的办法。最重要的在于修明内政，广布恩义；当务之急在于选拔将帅，有足够的军粮。内政不修明，国家根基就不会稳固；恩义不广布，人心就不会信服。将帅选不出来，敌人就不会畏惧，士卒也不依附；军粮不足，士气就不会振奋，兵众就不会同心守卫。

要想修明内政，在于戒除安逸享乐，使百姓生活充足，任用君子，斥退小人。要广布恩义，在于饶恕被胁从的人，安抚前来投降的人。要选拔出将帅，在于收取有声望的人，予以信任，严戒欺骗。要使军粮充足，在于大力屯田，增加当地的士兵。安逸享乐戒除了，君主的圣心就会日益端正；百姓丰足了，国家的根本就会日益稳固；君子被任用了，怎样当好君主的策略就会日益献纳上来；小人被斥退了，奸邪之事就会日益减少；胁从者被赦免了，叛乱的人就会日益归附朝廷；投降的人得到安抚了，归附的人就会日益增加。有名望的人收取到了，将才就会日益来到；屯田扩大了，军粮就会日益富足；当地的士兵增多了，兵力就会日益振作。这样还担心什么四方部族不归服呢？四方部族的归服，不致力学问就不能知晓。臣下我希望陛下对圣人学问特别用心，来端正根本，急切寻求使四方部族归服的办法，四方部族差不多就能够归服，和尧舜、夏商周三代没有什么两样了。

唉！陛下一心谋求国家实现尧舜、夏商周时期那样的大治局面，而臣下我一再用尧舜、夏商周三代的学问劝勉陛下，实在是因为治国大纲尚未端正，臣下我还不忧虑这一点；治国的细目尚未完全实施，臣下我也不忧虑这一点；人伦纲常还不明达，臣下我并不忧虑这一点；风俗还不纯厚，臣下我也不忧虑这一点；百姓还不富庶，臣下我并不忧虑这一点；四方部族还没有归服，臣下我也不忧虑这一点。臣下我所忧虑的是：陛下的本心虽然已经步入圣贤的境界了，有时候恐怕

还不能像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那样保持光明;陛下虽然已讲求圣贤的学问了,有时候恐怕还不能像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那样精纯专一。

陛下从臣下我的进言中受到启示,保有勤勉求治的心念,痛下勤勉求学的功夫,像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那样去做,天理就会日益明晰,个人的欲望就会日益消退。妖艳的女色,淫荡的歌声,不足以动摇这圣心;邪僻逢迎的言论,献媚的种种表现,不足以占据这圣心。沉溺荒淫、迷恋游猎这类事情,不足以使这圣心慌乱;华丽、珍奇、怪异的东西,不足以使这圣心变得奢侈;神仙方术、佛教道教这些异端学说,不足以迷惑这圣心;土木工程、刑罚、征伐这类举措,不足以蛊惑这圣心,而最重要的根基就确立了。

最重要的根基已经确立了,因此治国的大纲可以端正,治国的细目可以实施。人伦纲常由此可以明晰,社会风俗由此可以变淳厚,百姓由此可以富起来,四方部族由此会归服,整个天下由此会太平和美,宗庙社稷由此可以保全,皇位由此可以巩固,圣上的寿命由此可以延长,列祖列宗由此可以为他们增光采,古代帝王由此可以与他们相媲美,而汉唐宋各代君主连追望陛下的下风都没资格了。如果最重要的根基不确立,即使整天弄得精神疲惫,要去端正大纲,实施众多的细目,以求达到上述各个方面的功效而使陛下内心感到快慰,也只会成为一纸空文,天下政事也将不能有什么作为了。这是臣下我衷心希望陛下从事圣贤学问的缘故。

然而臣下我所说的学问,并不是考察相同的看法,融合不同的解说,把这当成是渊博;也不是钩稽出幽深的地方,推究深远的义旨,把这当成是奇异;更不是编织段落,雕琢字句,把这当成是华美。臣下我所讲的学问,就是《大学》中的道理。这种学问,就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的学问。主体内容有八项而各有要领。平治天下的要领,在于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的要领,在于整顿好家族;整顿好家族的要领,在于修养好自身;修养好自身的要领,在于端正心性;端正心性的要领,在于意念虔诚;意念虔诚的要领,在于充实知识、穷究事物的道理。宋代的儒者推衍这些义旨,向他们的君主进献告诫说,

整顿家族的要领有四项:重视婚配,整饬宫内事务,确立太子的地位,教化好后妃的亲属。修身的要领有两个方面:谨慎对待言行,端正威仪。使心性端正、意念虔诚的要领有两个方面:重视对上天的敬畏,警惕享乐的欲望。充实知识、穷究事物道理的要领有四个方面:明晓圣人的大道,辨识人才,详知治国的大体,体察人情。《大学》这部书,是历代圣贤的心治大法,万古不变的常规,实现大治的好策略,保全国家的大准则。

陛下一定要在这部书上特别用心,白天诵读,夜晚思索,亲近儒臣,询问疑义。不要光是看看就完事,不要光是摆摆样子给人瞧,不要光是耳朵听听而不放在心上,不要光是让别人实行而自己不实行,不要光是开头很勤奋最后却不了了之,不要光在大庭广众之下讲习而到了宫内没人的地方就舍弃了,不要因早晚而出现间断,不能因寒冷或酷暑而作罢。有的重要语句要摘录下来陈列在屏障上,有的要参照祖先训示做为座右铭,从经典中作考虑,从史书中求得证明。比如有某件事情,古代人因为这样做了,使国家得到了治理,得到了安宁,得到了昌盛,君主得到了长寿,陛下马上就警戒而省悟说,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有与这事相吻合的吗?又如有某件事情,古代人因为这样做了,使国家变得混乱,变得危险,变得衰败,君主变得过早死亡,马上就警惕而省悟说:我今天所做的事,有和这事相类似的吗?每个想法都集中在这上面,集中在这上面以外没有其它想法。每件事情都集中在这上面,集中在这上面以外没有别的事情。做到这样以后,才可以称得上是恳切了。做到这样以后,所留存的一定会是纯正的心念,所讲论的一定会是纯正的话语,所施行的一定会是纯正的原则与方法,所亲近的一定会是正直的人。做到这样以后,自身没有不会修养好的,家族没有不会整顿好的,国家没有不会治理好的,天下没有不太平的。

唉!君主的心念,从来都喜好天下大治而厌恶国家丧乱,喜好国家安宁而厌恶危险,喜欢强盛而厌恶衰败,喜欢长寿而厌恶早亡。然而大治的情况往往很少,祸乱却往往很多;安定的局面往往很少,危险却往往很多;昌盛的景象往往很少,衰败却往往很多;长寿的情况

往往很少,早亡却往往很多。经常是违背君主所喜好的,陷入他所厌恶的。这难道是他的本意吗?因为他不能一心扑在圣人的学问上,陷入不了解的境地才造成的。这就如同人治病,没有不喜欢活着的,可到最后却死去了。这难道也是他的本意吗?因为不熟悉医书,用药不精当才造成的。

当今天下的大势,正像一个人得了重病,身体已空虚,只是外表还像是一个人的样子,然而从肚子里五脏六腑到外部的四肢关节,没有一处没有病。有见识的人为此而寒心,可平庸的医师却说安好。有病的人不省悟这种诊断不对头,反而应和道:我没有病。过去扁鹊见到齐桓侯说,国君您有疾病,不治疗恐怕会加重。桓侯马上说,我没有病。这样说了三次,扁鹊后来从远处望见齐桓侯就躲开了。五天后,齐桓侯疾病发作,去召唤扁鹊,扁鹊已经逃走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把自己的本心作为元气,把贤良之士视作明医,把古代圣贤的经书史籍、祖宗的训示作为药方和药物,害怕疾病将要加重而预先治疗。信任明医,熟习药方,究明脉理,精选药物。节制嗜欲,谨慎防护,每天调理那元气,马上找到病根而去除它,那么元气就会在体内日益稳固,邪气从外面进不来,而各种疾病会自然消亡,天年会自然保住,怎么还会忧虑不如尧舜,不如夏禹商汤,不如周文王和武王呢?到如今还可以有所作为。失去当今机会而无所作为,臣下我恐怕就会出现扁鹊望见齐桓公就躲开的那种情形了,即使后悔也晚了。

尧舜、夏商周三代与我朝祖宗及各位圣君的治国大纲没有不端正的,细目也没有不实施的。这就好像元气本来坚固,外部邪气难以侵入,病也自然就无从生出。汉唐宋各代君主,有的大纲端正而细目没有实施,有的细目实施而大纲没有端正。这就好像元气不坚固,外部邪气容易干扰,依据病情而下药治疗。从尧舜、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汉唐宋,采用圣人的治国之道就天下大治,不采用就国家混乱;采用就国家安宁,不采用就危险;采用就昌盛,不采用就衰败;采用就长寿,不采用就早亡;采用就国运绵长,不采用就国运短促。既然如此,那么圣人的治国大道,恰恰是社会治乱的决定因素,国家安危的主宰成份,风俗盛衰的来源,君主长寿短命的依据,国运短长的关键所

在。陛下能不从内心大大引起警戒吗?

《周易》上说:端正心念,万事就会得到梳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董仲舒告诫汉武帝说:推崇自己所闻知的圣道就会高远明达,按自己所了解的道理去做就会德行远大了。这高明远大,不在于别的方面,只在于用心注意而已。臣下我希望陛下对臣下我的言论能留心,不要像汉武帝那样对董仲舒的话不经心。苏轼回答宋神宗时说过,天下平安无事,公卿大臣的话就轻如鸿毛;天下一旦有重大事变发生,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话也会重如丘山。现今天下不能说没有事变,臣下我希望陛下不要把臣下我的话视如鸿毛,而要把臣下我的话视如丘山,那么天下就十分幸运,百姓也十分幸运了。臣下我捡取山野村夫的一些话语,使皇上的听闻受到玷污,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孙文阁译〕

程敏政　殿试对策

程敏政(1445~?)　字克勤,休宁(今属安徽)人。兵部尚书程信之子。十岁即以神童荐入朝廷,诏命读书翰林院。成化二年(1466)榜眼,时年22岁。历任左谕德、少詹事等官,官终礼部右侍郎。学问赅博,一时称为第一。撰有《新安文献志》、《明文衡》、《真西心经附注》、《宋纪受终考》、《篁墩集》、《咏史集》等。

臣对:臣闻《中庸》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盖一者,诚也。以之修身,则可以正天下之大纲;以之为治,则可以举天下之万目。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者,纯乎此而已。大哉,诚乎!原于天,性于人,亘万古而不息,放四海而皆准。人伦舍是,则无自而明;风俗舍是,则无自而厚;养民舍是,则无所恃而臻于富庶;御夷舍是,则无所恃而致其咸宾。盖天下之理虽众,求其操之约,制之广,莫有过于诚之一言者。其可视为迂阔不急之谈,而别求新奇可喜之论哉?

伏惟皇帝陛下,嗣大历服以来,岁一周矣。贱货贵德,思存此诚

而不杂；制治保邦，思守此诚而不渝。内焉圣母太后日夕化导之切，外焉执政大臣左右辅弼之勤，所以登三迈五、光前裕后者，殆甚于此矣。然犹体道谦冲，不自满假，念太祖创业之艰难，列圣守成之不易，首进臣等于廷，询以治道，欲以匹休往圣，增光祖宗。其图治之心，可为健矣。然切思之，开茂科，策多士，祖宗以来相承既久，未知今日陛下之意，姑以遵累朝之旧典，备他日之故事而已邪？抑真欲周询众论，博尽群情，以冀万分之助也？臣诚愚昧，不知所出。然幼学壮行之志，得于圣经师傅之间者，敢不精白一心，倾尽底蕴，以称渊衷，塞明诏？

臣闻治天下有本焉，大纲是也；有末焉，万目是也。大纲不正，则治道有未纯；万目不举，则治法有未备。然大纲之或正或否、万目之或举或遗，则系于人君此心之诚何如耳。臣尝观于唐虞之际，钦明同一诚也。故惇叙九族，蔼然公族之亲；厘降二女，肃然闺门之礼。内承顽父，秉夔夔之诚；外抚傲弟，尽烝烝之人。其大纲之正，如泰山磐石之根固，其势尊安而不可摇也。于是乎近有百揆四岳，承弼于内；远有州牧侯伯，承宣于外。命羲、和以典历象，而敬一勤民之政举；命夷、夔以典礼乐，而化民成俗之道明。庶政咸熙，府事允洽，则万目亦无有不举者焉。

臣尝观于三代之时，惟日孜孜，大德是懋，小心翼翼，细行亦矜，禹汤、文武同一诚也。故彝伦攸叙，文命敷于四海；人纪肇修，帝命式于九围。后妃有《关雎》窈窕之德，公族有《麟趾》信厚之风。其大纲之正，如长河大川之源深，其流演迤而不可穷也。于是乎有典则以贻子孙，而钧石之度无不具；制官刑以警有位，而风愆之戒为甚严。六典八法之制，无一不备。五礼六乐之法，无一不周。则万目亦无有不举者焉。盖二帝三王之德纯乎诚，故能正大纲，举万目，致雍熙泰和之治，卓乎非后世之所能及矣。

汉之高帝，吊义帝则君臣之义明，尊太公则父子之伦正。封同姓以连城，非私也，所以惇周亲。祀孔子以太牢，非过也，所以崇圣道。其大纲之正，亦可美也。然制礼颇袭于秦，而用之朝廷者，乃绵蕞之仪；作乐不稽于古，而奏之郊庙者，乃赵代之讴。定律令，而八刑纠民之法隳；申军法，而九伐正邦之意泯。建官无制，太尉御史，位乃参于

三公；养民无法，阎右强宗，田或连夫阡陌。是以世代相承，德化不纯，而万目未举也。其所以未举者，未究夫诚之用，而杂于霸者。

唐之太宗，定府兵之制，而农无养兵之费；立世业之法，而下无兼并之患。以租庸任民，则农有定业；以职事任官，则官无虚名。其万目之举，亦可嘉也。然胁父以起兵，则君臣之义睽；迫父以传位，则父子之道缺。蹀血宫门，则兄弟之情薄；麀聚后庭，则夫妇之伦乱。以王姬之贵，下嫁夷虏之酋，是伉俪非偶也；以天子之尊，下袭可汗之号，是华夷无别也。是以子孙相继，惭德为多，而大纲未正也。其所以未正者，未悉夫诚之本，而杂于夷耳。

宋祖开基，仁义立国。遵慈训而不违金匮之盟，可见其孝；爱晋王而卒授神器之重，可见其友。家法之正，而宫闱之丑未闻也；传授最明，而迫夺之祸无有也。洞开诸门，悟君心之当正，盖有契乎正心之学；偶读《二典》，叹法网之太密，盖有得乎 侧刑之旨。然宋之大纲，若无愧于三代，而法制反有歉于汉唐。以诗赋记诵取士，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位，无官司督课之方。选宿卫，则不能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教宣室，则无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国用病于空虚，兵威患于不振。其万目未尽兴者，岂非以其徒事弥文，而未得夫诚之说乎？

虽然，汉宋大纲虽云正矣，然因宠而启人彘之祸，因争而有废后之失，亦乌能深究夫诚之本，而大纲岂尽正邪？唐之万目虽云举矣，然礼乐议而不能兴，封建讲而不能行，亦乌能真悉夫诚之用，而万目岂尽举邪？是则汉之杂王以霸，唐之居夏用夷，宋之文浮于实，其君德仅止于小成，治效不逮于隆古者，岂有他哉？诚与伪之间耳。

惟我太祖高皇帝，勇智之资克配成汤，宽仁之度远过高祖，取土宇于群盗攘攻之际，复人纪于胡元昏操之余。追帝先世，则武王尊亲之孝也；封建诸王，则帝尧睦族之仁也。立学校以明人伦，正祀典以绝诬妄。后妃不得与政，戚畹不得秉权。其大纲正矣！置屯设守，则内外相承；列爵建官，则体统不紊。律令有定修，而人易于遵守；田赋有定制，而民便于转输。朝觐会同之礼，粲粲乎成周之大典；黜陟考课之法，凿凿乎隆古之弘规。其万目举矣！然考夫圣德之所臻，治效之

所极，真有合乎二帝三王立诚达本之旨，故能正大纲而举万目，若是其盛且久也！继是以来，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之茂衍鸿图，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之丕承骏烈，所以超汉唐，轶有宋，而追踪于唐虞三代者，一皆守我太祖高皇帝之家法，而莫敢违焉。

仰惟陛下，即位之初，隆大孝于两宫，笃至仁于九族。御经筵以辑熙圣学，亲政务以延揽英才。诚有志于大纲正，万目举矣。且儒道所以明人伦也，陛下幸太学以重儒道，则人伦宜无不明。教化所以厚风俗也，陛下建皇极以敦教化，则风俗宜无不厚。亲耕藉田，而下宽租之令；频发内帑，而多赈贷之恩。宜乎百姓富庶，无失所之忧也。讲武练卒，屡有戒严之诏；出师命将，务收奏凯之功。宜乎四夷宾服，无梗化之患也。然而人伦尚未尽明，风俗尚未尽厚，生民犹有啼饥号寒之苦，四夷犹有乘机犯顺之虞者，岂陛下之诚有未尽欤？臣请为陛下言之。

人伦之不明，由学校之废弛也。今虽有董学之官，而食廪糜禄，坐待他迁。虽有司教之职，而幸进苟就，无复自振。以致为士者，视合污为常情，诋好修为要誉，天下茫然不知儒道之可遵。陛下诚能使方行端言之士任兴学之责，遴选国学之生以清其本，严考郡县之贡以塞其流。大扫夙昔之因仍，明示天下之趋向。则人将知耻好义，而人伦岂有不明者哉？

风俗之不厚，由士习之不正也。且苞苴往来者，进用而无不能；书抵政府者，或至于摈斥。左右先容者登庸，而同巷不求见者或至于罢归。以致士大夫之间，正色持危者见疏，谀言取悦者得志，天下靡然不知名节之可重。陛下诚能使正直刚明之人首铨曹之任，精拣候铨之庸人，勿持姑息；严察外任之不职，勿事模棱。杜侥幸之门，重奔竞之罚。则人将敛华就实，而风俗焉有不厚者哉？

民不可以不安，而安之则系之守令也。今之守令，非国学因仍之徒，即铨曹陆沉之士。迹其平时不遂之心，而肆其今日可为之势，以巧取民财为良图，以期会簿书为能事。如是而求百姓无失所之忧，未之有也。臣愿陛下复十科荐士之法，勿专其柄于铨曹；举八柄驭臣之制，勿限其职于资格。著循良之绩者特褒，犯贪污之罪者连坐。将见

守令皆贤才，而百姓不难于富庶矣。

夷不可以不攘，而攘之则系于将帅也。今之将帅，非勋戚之家，即荫袭之子。以科敛侵牟为职业，以蒐阅训练为忌讳。闲居则膏缘以进，事败则世禄犹存。如是而望四夷无梗化之虞，未之有也。臣愿陛下，儒生可将，即授之兵柄，而勿以儒生拘；行伍可用，即任以钤寄，而勿以行伍限。有功即赏，不以疏远而或遗；有罪则黜，不以亲贵而幸免。将见将臣皆良士，而四夷不难于宾服矣。

然此数者，惟视陛下此心之诚何如耳。然欲求之心之诚，非力于帝王之学不可。夫格物致和，所以明此诚也；诚意正心，所以体此诚也。淫声美色，足以荡此诚，臣愿陛下斥声色而不迩；环宫瑶台，足以移此诚，臣愿陛下罢土木而不营。驰骋弋猎，迷此诚之鸩毒也，臣愿陛下戒游田；珍禽奇兽，害此诚之稂莠也，臣愿陛下谨好尚。忠鲠之言，陛下勿以逆心而拒之，所以保此诚也；谄谀之说，陛下勿以顺志而从之，恐其间此诚也。熟之于讲授之间，严之于对越之顷，养之于虚静之中，存之于纷扰之际。以是而修身，以是而为治，大纲奚患其不正？万目奚患其不举？由是增光祖宗，匹休前圣，海宇内外，春风泰和，而重华之德，丕承之功，不在舜、武而在陛下矣。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条陈于上，然臣于终篇，复有献焉。欲陛下正心以立天下之大本，使此诚坚于内；独断以收天下之大拳，使此诚著于外。两者兼尽，内外交修，而大纲之正，万目之举，皆不能外陛下意向之所如矣。古之人君，其于此心或不自正，则必有异端之徒进其前而诱之者。故《大学》谓：正心然后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而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则四方远近莫敢不一于正。臣愿陛下敬以直内，念此心之不可放而操之，使由学问思辨而笃于行，则视听言动莫非天理，而外欲不能夺矣。古之人君，其于拳或不自收，则必有近习之臣睨其旁而窃之者。故《洪范》谓：惟辟作福作威。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臣愿陛下乂以方外，念此拳之不可移而收之，使由形色动变而底于化，则庆赏刑罚一出至公，而邪气不能干矣。夫如是，则大纲自正，万目自举，圣德之体全，圣智之用周。彼端居玄默以求所谓正心，侵官自用以求所谓独断者，其何足以与于斯？

是则诚一字,固圣德之终始;而正心、独断二者,尤圣治之切要。盖敬义夹持方直,上达天德,自此而天德则诚矣。此臣所以繁其辞而不杀,为陛下极言之。虽然,孟子谓不诚未有能动者,而程子谓一有不诚,则九有皆虚文。则夫欲求天下之治,以正大纲而举万目者,舍是将何所致其力哉?臣学不足以稽古,才不足以应变,然所言必本于道,不敢肆为浅近之说;所陈必切于事,不敢过为矫激之谈。惟陛下留听而采纳焉,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礼记·中庸》上说:治理天下和国家,总共有九条根本性的措施,用来施行它们的东西,只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虔诚啊!靠虔诚来修养好自身,就可以端正起天下的总纲领;靠虔诚来实行治理,就可以张布开天下的各种政务。尧舜之所以成为帝,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之所以成为王,原因就是在虔诚上特纯粹罢了。真盛大啊!这个虔诚!它来自上天,成为人的本性,跨越任何朝代都不会泯灭,放置到任何地方都千真万确。人们之间的关系准则舍弃了它,就没有依据而会得到宣明;社会风气舍弃了它,就没有依据而变得淳厚;养护民众舍弃了它,就没有什么依仗而达到富庶;控制少数部族舍弃了它,就没有什么依仗而使它们全都前来归服。因为天下的道理尽管很多,但寻求其中掌握起来最简要、统领起来最广泛的那条道理,没有哪一条能够再超过虔诚这个词的了。怎么能把它看成是不切实际、也不紧迫的讲法,却去另外寻求新颖奇异、让人听后感到惊喜的那类言论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自从继登帝位以来,已经历时整整一年了。轻视那些财物,看重仁德,思考存留住这个虔诚而不掺杂进别的玩艺。运用治国措施,保有国家,思考执守住这个虔诚而不改变。在宫内,圣母太后从早到晚进行诱导启发特深切,在朝廷上,执政大臣左右进行辅助特勤勉。用来超过古代的三王五帝、给前代增光、为后世留下回旋余地的举措,差不多在这上面特用力了。然而仍然体察治国大道,谦虚自抑,不自我满足,顾念我朝太祖创立基业的艰难,各位圣明先帝守护已有成果的不容易,首先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

廷，用治国大道来做询问，打算借此来和古代的圣帝明王相媲美，给祖宗增添光彩。那种谋求大治的心念，可真算得上是刚健了。然而臣下我深切地思索这件事：开设进士科，策问众多的读书人，从我朝祖宗以来，就已经沿用很长时间了。不知今天陛下的用意，是姑且遵用历朝的旧有典制，留作日后说起来曾按惯例实行过就算完事了呢？还是真想全面询求众人的言论，广泛地让大家的想法全都反映上来，以便求得到万分之一的帮助呢？臣下我实在太愚昧，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才好。然而幼年时学习、到成年时去行用的志向，从圣人的经典和师长那里得来的东西，怎敢不满心一片纯洁地把胸中蕴藏的学问全都掏出来，来符合圣上的深沉心意，回答好圣明的诏令呢？

臣下我听说，治理天下具有根本的东西，这就是总纲领；具有细节的东西，这就是各种政务。总纲领不端正，治国大道就会存在不精纯的地方；各种政务不张布开，治国的法度就会存在不完备的地方。然而总纲领或端正或相反，各种政务或张布开或有遗漏，就全都决定于君主这心念的虔诚到底怎么样罢了。臣下我曾经观察，在唐尧虞舜禅让帝位的前后，恭敬和圣明，两人在这一点上都是出自同样的一个虔诚。所以使九辈宗族淳厚而又上下井然不乱，和蔼地显示出帝室族人的亲和关系。尧决定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肃正地确立起闺房内部的礼法。舜在里面要侍奉心术不正的父亲，他仍持守戒惧敬慎的一片诚心；舜在外面要慰抚傲慢的弟弟，他仍尽到忠厚和美的仁爱。尧舜治理天下的总纲领的端正，就像泰山和磐石的根基那样牢固，他们的势位也尊贵安稳而无法动摇啊！于是在身边有负责各种政务的官员和四方诸侯之长，在朝廷上奉命行事并做辅助；在远处有十二州的长官和各处的首领，在地方上承奉命令并加以宣导。命令羲氏与和氏掌管天文历法，而尊崇圣帝一人、为民众勤劳操作的政务推行开来；命令伯夷和后夔掌管礼教和乐舞，而化导民众、形成良好风气的准则得到宣明。各种政事全都振兴起来，水、火、金、木、土和谷物这六府以及端正自己德行、物尽其利、使民众生活充裕这三事确实处理得特别协调。这样一来，各种政务也没有不张布开来的了。

臣下我曾经对夏商周三代做过观察。每天只是勤勉不怠，激励

自己的重大德行,又处处小心翼翼,微小的行为也予以注意。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在这一点上也都是出自同样的一个虔诚。所以夏禹时常规大法得到妥善的安排,文德教化施布到整个天下。商汤时人伦纲常开始得到修明,天帝命令他成为九州效仿的楷模。周文王和武王时,后妃具有《诗经·关雎》篇所歌咏的端庄闲雅的美德,王室同族具有《麟之趾》篇所称颂的诚信仁厚的风采。三代治理天下的总纲领的端正,就像长河大川的源头那样深远,它们的支流弯弯曲曲地扩展开来,没有尽头啊!于是夏朝有典章和法则留给后代子孙,而有关度量衡的标准没有不完备的。商朝制定出惩罚官吏的刑罚来警告那些做官的人,而有关巫风、淫风、乱风以及由这三种恶劣风气所滋生出来的狂舞酣歌等十种罪过的告诫,更十分严厉。周朝关于建立邦国的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和官属等八种管理百官的规定,没有一项不完备;有关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和黄帝乐舞《云门》、唐尧乐舞《咸池》、虞舜乐舞《大韶》、夏禹乐舞《大夏》、商汤乐舞《大濩》、周武王乐舞《大武》的法式,没有一项不周全。这表明,当时的各种政务也没有不张布开的。因为二帝三王的德业都在虔诚上特纯粹,所以能够端正总纲领,张布开各项政务,实现了太平和美的大治局面,十分突出地不是后代能够赶得上的。

汉朝的高帝,为被项羽杀害的义帝举行葬礼,君臣关系的准则得到了宣明;尊奉生身父亲太公为太上皇,父子关系的伦常得到了端正。用大片的国土封立同姓诸侯王,并不是为自家考虑,目的是使至亲和睦。用牛、羊、猪三牲具备的礼仪祭祀孔老夫子,并不是过了头,目的是尊崇圣人的大道。汉高祖治理天下的总纲领的端正,也值得赞美了。然而制定礼仪,在很多地方都沿袭秦朝,在朝廷上正式行用的,竟然是在野外拉绳子、树草把做演习的朝仪。创作音乐不考察古代,在祭祀上天和宗庙中演奏的,竟然是赵地、代地的民间小调。定立法律,而《周礼》在乡间施用的有关不孝等八种纠察居民行为的刑法却毁掉了。申明军法,而《周礼》对九种犯罪作乱的人进行诛罚来肃正邦国的用意却消失了。设立官职没有定制,掌管军事的太尉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位列竟然混杂到三公中去。养护民众没有强

有力的措施，地方豪强有的土地连成一片又一片。所以代代递相承接，道德教化不纯正，而各项政务未能张布开来啊！未能张布开来的原因，是未能穷尽虔诚的施用，而在仁政中夹杂着霸道。

唐朝的太宗，制定以折冲府为基本单位的府兵制度，而农民不再有供养军队的费用。定立二十亩田地归农民终身私有、世代相传的法令，而民间不再有土地兼并的祸患。通过租庸调的赋役制度支配民众，农民就拥有了稳定的职业。按照数额固定的职位和职责配备官员，官员就没有多余的了。唐太宗治理天下的各项政务张布开来，也值得赞许了。然而威胁父亲起兵反隋，君臣关系的准则就违背了。逼迫父亲把帝位传给自己，父子关系的原则就亏缺了。在皇宫门前刀兵相见，兄弟之间的情义就淡薄了。在后宫里乱伦，夫妇之间的纲常就混乱了。凭借皇室公主的高贵身分，却降低身分嫁给落后部族的首领，这纯属婚姻不相配。凭借天子的至尊地位，却降低地位承用可汗的称号，这纯属华夏和落后部族没有区别。所以子孙递相承接，让人感到羞惭的德行占多数，而治理天下的总纲领还没端正啊！还没端正的原因，是未能彻底搞清虔诚的根本，而夹杂着落后部族的东西。

宋太祖开创基业，按仁义支撑起国家。遵照母亲的遗训，而不违背把帝位传给胞弟赵匡义的誓言，可以看出他的孝顺。爱护爵封晋王的胞弟赵匡义，最后把最贵重的帝位授予给他，可以看出他的友爱。自家礼法端正，而后宫乱伦的丑事外面从来未听说过。帝位的传授最明确，而威逼篡夺的惨祸从未发生过。把宫殿的大门全都打开，体悟到君主的心念应当纯正，差不多和端正心念的儒家学说相契合。偶然观阅《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慨叹法网太严密，差不多获取到刑法一成而不可变的义旨。然而宋朝治理天下的总纲领，似乎在夏商周三代面前没有让人感到惭愧的地方。但法令制度反而比不上汉朝和唐朝。通过诗歌律赋和记忆背诵经文的学问来选取人才，没有学校培育造就的方法。按照科举出身和资历来安排官员的位次品级，没有各政府部门督察考核的办法。选择中央禁卫军，不能够改变五代时期无原则容忍和笼络的习气。在宫殿中向大臣请教政事，没有恰切的方式能符合古代圣帝明王关系分亲疏、礼仪有不同的合适做法。国家财政

被空虚所困扰,军队威力被不振扬所愁困。宋朝各项政务未能全都振兴起来,难道不是因为它只是在越来越多的花架子上用气力,而没获取到虔诚的说法吗?

尽管这样,汉朝和宋朝的总纲领虽然说得上端正了,然而因为宠爱偏妃却开启了吕后把戚夫人折磨得不成人样像口猪的惨祸;由于争宠而出现了宋仁宗把郭皇后废掉的过失。又怎么能深深究明虔诚的根本,而总纲领又哪里会完全端正呢?唐朝的各种政务虽然说得上张布开了,然而礼仪乐舞议论了半天却不能够兴行,分封诸王讲论了一通却不能够实行,又怎么能确实明了虔诚的功用,而各种政务又哪里会完全张布开呢?这就表明,汉朝把霸道夹杂在王道中,唐朝占据华夏却采用落后部族的东西,宋朝摆花架子超过了务实,它们君主的德业仅仅局限在略有成就上,治理效果赶不上隆盛的古代,哪里还有其他的原因呢?只在虔诚与虚假之间罢了。

只有我朝太祖高皇帝,勇武明智的天资能够配得上商汤,宽厚仁慈的器度远远超过汉高祖,在各地盗贼掠夺的时候取得天下,在元朝昏乱统治之后恢复人伦纲常。对自己的祖先追谥帝号,这属于周武王当年尊奉亲人的孝敬行为。分封各个藩王,这属于尧帝当年使宗族和睦的仁爱举动。兴办学校来宣明人伦纲常,订正祭祀的法典来使没资格进入被祭祀行列的人断绝念头。后妃不许参预朝政,后妃的亲属不许执掌大权。太祖治理天下的总纲领已经端正了!部署屯驻部队,设置地方守军,京师和外地就协调行动。规定爵位,设立官职,组织制度就不紊乱。法律具有固定的明文,而人们容易遵守。土地税具有固定的制度,而民众方便交纳。朝拜述职和临时进见、集体进见的礼制,鲜明地同周朝的大典一模一样,对官吏决定升降、进行考核督察的办法,严实得同隆盛古代的宏大规制一点儿不差。太祖的各项政务全都张布开了!然而考察圣明德业所达到的程度,治理效果所达到的最佳状态,确实具有符合古代二帝三王确立虔诚、通达本源的义旨,所以能够端正总纲领,张布开各种政务,像这样地隆盛而又长久啊!承接这种情状以来,太宗文皇帝和仁宗昭皇帝勉力扩展太祖的长远谋划,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大力继承太祖的宏伟功业,用来超越汉朝和

唐朝，凌驾宋朝之上，追比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东西，完全是执守我朝太祖高皇帝的自家法度，而不敢违背。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登上帝位一起始，就对两位皇太后加重非同一般的孝顺，就对九辈亲族增厚达到极点的仁恩。驾临经史讲席来使圣人的学问大放光明，亲自听断政务来延揽优秀的人才。确实对总纲领端正、各项政务张布开立有志向了。况且儒家的道德规范是用来宣明人伦纲常的，陛下亲自视察国家最高学府来推重儒家的道德规范，人伦纲常就理所当然地没有不宣明的了。教育化导是用来使社会风尚变淳厚的，陛下定立起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来敦促教育化导，社会习尚就理所当然地没有不淳厚的了。亲自在天子为鼓励农耕的特设田地上耕作，又颁布减轻租税的命令。接连拨出皇室储藏的财物，施布很多救济借贷的恩惠。理所当然地百姓富庶，没有失去家园的忧愁啊！讲求武备，训练军队，多次颁有加强戒备的诏令。出动部队，任命将帅，务必要收到高奏凯歌的功效。理所当然地四周部族前来归服，没有不接受教化的忧虑啊！然而人伦纲常还没有完全宣明，社会习尚还没有彻底变淳厚，老百姓还存在着啼饥号寒的痛苦，四周部族还存在着乘机侵犯而不顺从的忧患，原因恐怕是陛下的虔诚还有不到家的地方吧？臣下我请求为陛下谈一谈这方面的问题。

人伦纲常不明确，这是由于学校的荒废松弛啊！如今虽然设有掌管学校的官员，可他们却白白享用俸禄，什么事也不做只等着去做其他官。虽然设有负责教学的职位，可他们却侥幸捞到这种职位，胡乱凑合着当，不再自我振作。以至于造成身为国士的人，把同流合污看成是小事一桩，把喜好修养好自身诋毁成骗取荣誉，全天下傻乎乎地不知道儒家的道德规范应当遵守。陛下确实能够让品行和言论都很端正的士人担负起大兴教育的职责，挑选好国家最高学府的学生来澄清本源，严格考察郡县荐举的人员来堵塞住支流。大力扫除从前的相沿成习的老一套行事标准，鲜明地向天下标示出归向。这样一来，人人就将会知道廉洁，喜好道义，而人伦纲常哪里还有不明确的呢？

社会习尚不淳厚，这是由于读书人的习气不端正啊！况且用馈赠礼物相互往来的人，升官晋职没有一个做不到的；把提出的建议传递

到政府的人,有的甚至于被排除斥退。经左右人事先为他打通关节的人,得到提拔重用;而同住一条里巷但不去拜见求请的人,有的甚至于被罢官归乡。以至于造成士大夫之间,言行正直的人受到疏远,献媚讨好的人实现了个人的私欲,全天下昏沉沉不知道名誉和气节的应当看重。陛下确实能够让正直刚强又明智的人担任吏部的最高长官,精详地筛选出那些等候提拔的平庸的人,不抱持无原则容忍的态度。严格察辨出地方官中不称职的人,不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杜绝住侥幸往上爬的门路,加重对投机钻营的惩罚。这样一来,人人将会收敛起浮华,进入到朴实,而社会习尚哪里还有不淳厚的呢?

民众不能够不让他们安定下来,但让他们安定下来,就决定于太守县令啊!如今的太守县令,不是一些在国家最高学府按老一套行事标准行事的家伙,就是一些在吏部长时间得不到委任的人们,按照他们平时没得志的心思,大肆借用如今可以说了算的势头,把用鬼点子榨取百姓的钱财做为最好的打算,把按时向上边交差,编制文书簿册作为本事。像这样还去谋求百姓没有丧失家园的忧愁,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臣下我希望陛下恢复按聪明正直等十种名目荐举人才的方法,不要把权力全都掌握在吏部那里。施用爵禄赏罚等八种驾驭群臣的规制,不要限定某个人的官职属于什么品级该按资格升迁。建立起地方官突出政绩的人,要对他们予以特殊褒奖;犯下贪污罪的人,要对本人和荐举他的人一并治罪。这就眼看着太守县令都是贤能的人才,而百姓富庶也就对此不感到困难了。

四周部族不能够不驱逐,但驱逐他们,就决定于将帅啊!可如今的将帅,不是地位显赫的皇亲国戚,就是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而入仕的子弟。这些人把搜刮钱财、克扣士兵军饷作为自己的职业,把检阅训练部队作为忌讳的事情。没有战事时就拉拢关系来升官,发生战事就战败而世代享有的俸禄却依旧保存。像这样还指望对四周部族没有不顺从教化的忧虑,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臣下我希望陛下,儒生有条件被任命为将帅,就把兵权授予给他,不要因为对方是儒生就自己把自己拘束住。当兵出身的人可以任用,就把领兵的重任交付给他,不要因为对方是当兵出身就自己把自己局限住。立有功劳就进行

奖赏，不因为生疏或关系远，有的就给遗漏掉。犯有罪过，就予以罢免，不因为关系亲近或地位显赫就能侥幸躲过去。这就眼看着将帅和边臣都是贤良的人士，而四周部族前来归顺也就对此不感到困难了。

然而以上这几个方面的问题，只看陛下这一心念的虔诚到底怎么样罢了。然而打算求得心念的虔诚，必须在帝王的学问上下气力。穷尽事理，充实知识，目的是闹明白这个虔诚。使意念真诚，使心地端正，目的是体悟这个虔诚。淫荡的音乐和漂亮的女子，足够用来动摇这个虔诚，臣下我希望陛下排斥声色而不接近它。华丽的宫殿台阁，足够用来转移开这个虔诚，臣下我希望陛下停止土木工程而不去筹划它。跑马打猎，是迷乱这个虔诚的毒酒，臣下我希望陛下对醉心打猎引起警戒。珍禽奇兽，是损害这个虔诚的杂草，臣下我希望陛下谨慎对待自己喜好的东西。忠诚鲠直的谏言，陛下不要因为它违背了自己的心意就拒不采纳，用它来保持住这个虔诚。阿谀奉承的说法，陛下不要因为它随顺了自己的想法就听从，唯恐它给这个虔诚造成隔离。在讲论传授经典之间熟悉这个虔诚，在答谢颂扬上天的刹那间严密这个虔诚，在虚寂宁静中培养这个虔诚，在纷繁杂乱的时候保存这个虔诚。凭借这样去修养好自身，凭借这样去进行治理，总纲领还忧虑什么它不端正呢？各种政务还忧虑什么它不张布开呢？由此给祖宗增添光彩，同古代的圣帝明王相媲美，整个天下一片春风，十分祥和，而历代所颂扬的像光辉重合似地辅佐唐尧的那种德业，大规模继承发扬周文王事业的那种功绩，不只是在虞舜、周武王身上，而在陛下身上了。

陛下策问臣下我的事情，臣下我已经在上面逐项做了陈述。然而臣下我在答卷的末尾，还有献呈的东西。希望陛下端正心念来确立起天下的根本，使这个虔诚在内心里特别坚实；独自做决断来收拢起天下的大权，使这个虔诚在外表上充分显示出来。两方面同时都做得特别好，内心和外表交相修明，但总纲领的端正，各种政务的张布，都不能超出陛下意向所要指往的地方。古代的君主，他在这一心念上有的不能够自身端正，那就必定有要弄歪门邪道的家伙来到他面前引诱他。所以《礼记·大学》强调说：端正了心念，然后自身才会修养好，家

族才会整顿好,国家才会治理好,天下才会太平。而西汉董仲舒也说:君主端正自己的心念去端正朝廷,四方远近就没有一处敢不全都端正。臣下我希望陛下用恭敬来使内心正直,牢记这一心念不可放纵开而把它操持住,让它经由学习、询问、思索、辨别而在践行上特别地执着,这就会观看、闻听、讲话、行动没有一样不是天理,而由外面引发的欲望就无法来夺占了。古代的君主,他对大权有的不能收拢在自己手中,那就必定有自己宠信亲近的人在他旁边斜眼盯着来窃取它了。所以《尚书·洪范》中强调说:只有君主才有权进行赏赐,施加刑罚。而孔老夫子也说:天下政治清明,礼仪乐舞和发兵讨伐由天子做决定。臣下我希望陛下靠正义来使外部端正,牢记这大权不能转移到别处去而收拢起它,使它经由形体、神色、举动、变化而一直达到化导,这就封赏刑罚完全出自最公正,而邪气就无法来侵入了。做到这样,总纲领自然会端正,各项政务自然会张布开,圣明德行的本体都具备,圣明智慧的运用特周密。而稳坐朝廷、默不作声去寻求所谓端正心念的那类君主,侵夺各部门职权、自行其是去寻求所谓独自做决断的那类君主,哪里足以置身到这个行列里来呢?

这表明,虔诚这个词,原本上就是圣明德行始终要保持的东西。而端正心念、独自做决断这两条,更是圣明治理的紧切重要的东西。因为恭敬与正义夹持着方正与正直,往上就达到上天那样的仁德了,由此而上天那样的仁德也就虔诚了。这是臣下我用许多言辞而不减少字句专为陛下说到头的原因。尽管如此,孟子讲过:不虔诚,就没有能去行动的。北宋程颐也讲过:一旦出现不虔诚,全天下就都是一纸空文。这说明,打算谋求天下大治,使总纲领端正又各项政务张布开的东西,除去虔诚,将会到哪里去使用力量呢?臣下我学识不足以考察清古代,才干不足以应对各种变化。然而所讲的东西必定要依据大道,不敢放肆地鼓吹浅显近便的说法;所陈述的东西必定要切合政事,不敢过分地编造奇异偏激的言论。只请陛下留心听上一听,加以采纳,这就太幸运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己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者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殿试策问

[成化五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绍承大宝,图底丕平,虽宵旰勤励,然绩效罕著。略举其端,谕尔多士。择材于文以理民,拔功于武以驭兵也。今铨衡途壅,卫所员溢,奚以疏通之?昔人所谓名利相均,虚实相济,可推广而施欤?岁无常稔者,天之道;土有常怀者,人之情也。今歉则籴贵,贫则民徙,奚以绥辑之?前代所行,常平有法,均田有制,可稽仿而为欤?夫兼资文武,以周一世之用;裁成天地,以遂万姓之安,固济时切务也。若乃致治大道,必有至言。古之臣献言于君,或得圣道之经而流于迂,或得圣道之权而流于诈,或辩矣而术不密,或智矣而文不及。今尔多士,陈四者之务,必宜于时;矫四臣之偏,必合于道。朕将览而资治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使老人能够安逸,使朋友能够信任我,使年轻人能够怀念我。

仁的实质,就是侍奉双亲;义的实质,就是顺从兄长;智的实

质，就是知道上述二者的重要性而不丢弃；礼仪的实质，就是实行这二者的时候加以适当的调节与修饰；乐舞的实质，就是能喜欢这二者，快乐就会从中产生出来。产生以后怎能抑制住呢?抑制不住，就会不知不觉手舞足蹈起来。

圣人能像这样，就不用表现即可彰显，不用行动即可变化，不用作为即可成功。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继承皇位，谋求实现天下太平的局面，虽然从早到晚，十分忙碌，却仍然成效甚微。这里简要列举几条，向你们读书人咨询。从文章中挑选人才来治理民众，从军事活动中提拔有功者来指挥兵马，可是现今评定考核官员的途径受到阻塞，卫所的军官大大超员，如何才能疏通呢？前人所讲的名和利应当相互平衡，虚和实应当相互协调，可不可以推广施行呢？年景不会总是丰收，这是自然规律；家园总是舍不得离开，这是人之常情。现今一歉收，粮价就暴涨；一穷困，百姓就搬家。如何才能安抚聚集起他们呢？前代所施行的常平法、均田制，可不可以查考模仿而采用呢？同时依靠文官武将，来满足治理全国的需用；裁制助成天地的化育，来实现所有百姓的安宁，这本是救助社会的最重要的事务。至于实现大治的基本原则，大家一定会有最高明的建议。然而古代的臣子向君主进献建议，要么掌握了圣人治国之道的准则却流于迂腐，要么是掌握了圣人治国之道的策略却流于诡诈，要么是讲得头头是道却方法疏阔，要么是机智灵活却道德水平不高。如今你们这些读书人，陈述以上四个方面的事务，一定要适合当前的形势；矫正上述四种臣子的偏颇，一定要符合正确的原则。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而有助治国。

张升　殿试对策

张升(1442～1517)　字启昭，号柏崖，南城(今属江西)人。成化

五年(1469)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每遇灾变,辄上疏直言。官至礼部尚书。后因宦官专权,辞职归乡。著有《柏崖诗文集》。

臣对:臣闻治本于道,道本于诚。非道不足以善治,非诚不足以立道。盖道为治之本,诚又道之本也。有其道,然后能致其治;有其诚,然后能尽其道。是诚也者,万善之原,万事之本,推之无不准,动之无不化。以之择材于文,则真材无不得;拔功于武,则武将无不善。以之因天时以利民,而民生无不遂;以之因地利以厚民,而民居无不安。文武于焉而兼资,而用无不周;天地于焉而财成,而功无不著。人君为治之道,岂越乎此哉?故曾子传《大学》有曰:意诚而后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子思作《中庸》亦曰: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即诚也。大哉诚乎!其治道之本乎!

钦惟皇帝陛下,圣神文武,刚健中正,上承天命,下得人心。即位以来,五年于兹。民物阜安,风俗醇美,四夷咸宾,万方乐业。凡所以致治保邦、持盈守成之道,至矣尽矣。然犹体道谦冲,游心高远,锐于图治,切于求言。万几之暇,特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询以兼资文武之要,财成天地之道。顾臣一介庸儒,识见谫陋,曷足以上揆渊衷,仰裨治道?然窃思之,臣荷朝廷作养之恩,沐陛下化导之德,有爱君忧国之心,无由以自献;有忠君报国之志,无路以自达。今幸见录于有司,得立玉陛方寸地,正叫阊阖、呈琅玕之日也。敢不俯竭愚衷,以对扬于万一乎!

臣闻民者所以固邦本,而理民之任,则在乎择材于文;兵者所以卫民生,而驭兵之寄,则在乎拔功于武。故禽受敷施,九德咸事,而致庶绩之其凝;武夫洸洸,经营四方,而致王心之载宁。文臣武将,自古为重,诚不可不审也。我国家崇儒重道,取士之制虽非一途,要之首科贡而次荐举,未尝不重文臣之选;崇德报功,选将之道亦非一端,要之先才能而后荫叙,未尝不重武将之职。铨衡之途,奚至于壅?卫所之员,奚至于溢乎?仰惟陛下有迪知忱恂之明,有庶政惟和之效,然犹图底丕平,以文臣武将为兵民之所赖,故欲有以疏通之。此尤见圣智之高明也,臣请得为陛下言之。

盖自迩年以来，文臣则或因开贡之条，而混升国学；或缘纳粟之例，而滥登仕籍。况夫拘于资格之先后，牵于历任之久近，以有限之职，待杂进之流。铨衡之途，由之壅矣。武将则勋旧是属，而秉节钺者或韬略之未闻；弊习相承，而统师旅者或勤能之罕著。况夫功多出于贿求，赏每加于幸得，未经锋镝之劳，已登录用之典。卫所之员，由之溢矣。铨衡之途既壅，何敢望其展素蕴以理民？卫所之员既溢，何敢望其奋武勇以驭兵哉？此不能无劳于圣虑也。

为今之计，莫若严考察黜陟之法。治行卓异者，则增秩以奖异之；年力衰迈者，则以礼而退遣之。杜塞奔竞侥幸之门，摈斥庸陋贪污之辈。则用人之道，必如唐臣陆贽所谓名利相均，而不至于壅矣。重爵赏劝惩之典。功勋既著者，则计其劳以加赏；材略有闻者，则随其能以授任。不以其无功，而施泛滥之恩；不以其有罪，而行姑息之政。则选将之要，必如唐臣陆贽所谓虚实相济，而不至于溢矣。盖诱人之方，惟名与利。名近虚，而于教为重；利近实，而于德为轻。锡货财，赋秩廪，所以彰其实；差品列，殊章服，所以饰其虚。虚实交相养，故人不渎赏；轻重互相制，故国不废权。疏通之术，岂越于此乎！然求其本，则在于陛下此心之诚而已。诚心以行之，而必期其功，则司理民之责者，皆有守有为之人；当驭兵之寄者，咸有严有翼之士。尚何虑其有不疏通者哉！

雨露适时则年丰，旱涝相仍则年歉，此岁无常稔者，乃天之道。久居其地则难弃，久享其利则重迁，此土有常怀者，乃人之情。然尧虽有洪水滔天，而黎民之於变者自若，由其有以备天道之无常。汤虽有大旱积久，而商邑之用协者自如，由其有以遂人情之常怀。天时地利，在人裁制，不可不知也。我国家救荒有法，储蓄有备，而所以因天时者，得其道矣。田有等则，赋无过取，而所以因地利者，得其道矣。籴之价奚至于贵，民之居奚至于徙乎？仰惟陛下有怀保小民之心，有万邦咸宁之效，然犹深求至治，以天时地利为生民之所资，故欲有以财成之。此尤见圣心之刚健也，臣请得为陛下陈之。

盖自迩年以来，年一歉则谷粟缺乏，无以给民食；囊橐空虚，无以遂民生。而啼饥号寒者，深可矜也。民一贫则弃久依之桑梓，即新刈

之蓬藋。而流离播越者，深可悯也。米之价既踊，则民食且不足，尚何望其出赋税以充国用？民之居既徙，则自救且不赡，尚何望其效勤诚以固邦本哉？兹不能无廑于圣虑也。

为今之计，莫若选监临之官，行便宜之政，知岁无常稔而有可常之道，必思患预防，敛散以时，若前代常平之法，斯可行也。择守令之贤，行子惠之政，知民有常怀而遂其有常之情，必量地分田，因民制产，若前代均田之制，庶可为也。盖常平之法，兆于齐魏而成于耿寿昌；均田之制，行于后魏而出于李安世。丰则增价籴之以利农，凶则减价粜之以利民，是之谓常平。男子四十亩，妇女二十亩，户绝者以为公田；刺史十五顷，县令以上六顷，其田则更代相付，是之谓均田。斟酌其宜使合于人情，庶丰歉之相济；损益其制使宜于土俗，庶贫富之适均。绥缉之道，岂要于此乎？然究其本，则在于陛下是心之诚而已。诚心以为之，而必期其效，则天下莫不席于饱食暖衣之域，民生莫不囿于安居乐业之中，尚何虑其有失所者哉！

夫内资文治，外资武功，文臣武将之并用，威势德化之并行，乃久安长治之计也。上因天时，下因地利，安老怀少，皆有所资，养生丧死，举无所憾，实参赞燮理之功也。若乃致治大道，必有至言。古之臣献言于君，虽有可采而不能无弊。若董仲舒道明三代，学贯天人，议论渊源，理义酝藉，其言得圣道之经也。晁错上言兵事，思应周密，尊君抑臣，辞气激烈，其论得圣道之权也。仲舒虽得圣道之经，然阴阳灾异之言，未免流于迂而不切。晁错虽得圣道之权，然刑名术数之论，未免流于诈而不正。故宋儒苏洵因论贾谊而言二子，盖得其当矣。贾谊以年少之资，而被孝文之召，观其《治安》一策，有忠爱之至诚；劝兴礼乐，知教化之先务。其辞辩矣。张良以豪杰之才，而辅高帝之兴，运筹决策，而定天下之大乱；因事纳忠，而关天下之大计。其智周矣。贾谊之论虽辩，然草具仪礼，三表五饵，而其术则不密焉。张良之计虽智，然术本权谋，学宗黄老，而其文则不及焉。故宋儒苏轼因论陆贽而及二臣，盖近乎是矣。

文德也，武功也，救荒也，安民也，此四者之务，固所当讲。仲舒也，晁错也，贾谊也，张良也，此四臣之偏，亦所当知。大抵文武之选，

不必拘也，在乎可以行于今；安养之道，不必泥也，在乎有以利于民。使得人以司文武之选，而能随势以变通；得人以主安养之道，而能度时以举行，则品节适中而宜于时矣。仲舒、贾谊之失，由乎学术之未精；晁错、张良之失，由乎学术之不正。使其溯义理之渊源，而不安于小成；务圣贤之正学，而不亲于他歧，则损过就中而合于道矣。

然宜于时，合于道，皆其用之见于外焉尔。苟不本诸诚，则内之体不立，施之必有所不当，行之必至于易倦。故臣终始以诚为陛下献者，良以诚之为道，真实无妄，纯粹无伪，彻上彻下，皆实理之所为。一有所杂，则妄矣；悠久不息，周流不已，亘古亘今，皆实心之所为。一有所间，则息矣。臣伏望陛下，存此诚于雷声渊默之时，体此诚于酬酢应变之际。凡一念之动则曰：吾之念虑，得无有所杂乎？明以察之，使无一念之或妄。一事之行则曰：吾之施为，得无有所间乎？刚以制之，使无一事之不实。则治道之本立矣。

然而一心之微，攻之者众。或以声色，或以货利，或以游田，或以逸豫。数者一或不审，则欲动于中，而此诚变矣。臣愿陛下远声色而不迩，厌货利而不殖，谨游田而不恣，戒逸豫而不肆，勿贰以二，勿参以三，然后本源澄澈，终始惟一，而此诚岂有间断哉！或于沉湎，或于奢侈，或于异端，或于谄谀，数者一或不察，则心逐于外，而此诚泯矣。臣愿陛下禁沉湎而弗行，斥异端而弗尚，拒谄谀而弗亲，不东以西，不南以北，然后方寸明白，久暂有常，而此诚岂有止息哉！由是可以措民物于熙皞，绵宗社于隆长，重华之德，丕承之功，岂独专美于舜、武哉？

陛下之策臣者，臣既已概陈之。而其要归，在乎一诚矣。然于终篇，复有所献焉者，盖爱君之心，不能自已也。夫诚固为治道之本，而所以行是诚者，又在乎陛下之明与刚。明则有以识其诚之正，刚则有以决其诚之几。明非烦苛伺察之谓，乃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之谓也。刚非强亢暴戾之谓，乃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之谓也。陛下诚廓日月之明，无微不察，无幽不烛，如《书》所谓宪天聪明；奋乾纲之断，见义必为，闻善即行，如《书》所谓惟克果断。夫如是，则表里此诚，终始此诚，如《中庸》所谓至诚无息，不息则

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治天下之道，无余蕴矣。臣之此言，迂疏浅陋，固若无可采者，然实出于拳拳一念之忠也。伏望陛下俯垂睿览，岂惟愚臣幸甚，实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治国依据原则，原则来自诚意。没有原则就不足以治理好国家，没有诚意就不足以确立起原则。因为原则是治国的根本，诚意又是原则的根本。有了原则，然后就能实现大治；有了诚意，然后就能贯彻好全部原则。这个诚意，正是各种良好效果的本原、各种事务的根基，推广它没有不适应的，动用它没有不化育的。用它来从文章中挑选人才，真正的人才就无不获得到；用它来从军事活动中提拔有功者，军队将领就无不称职。用它来顺应天时，便利人民，人民的生计就无不称心如意；用它来顺应地利，使人民富裕，人民的居处就无不安宁。文官武将根据它来同时依靠，治国的需用就无不满足；天地的化育根据它来裁制助成，功效就无不显著。君主治理国家的原则，哪有超出这一点的呢？所以曾子传述《大学》就说过：意念诚实之后，才能心地端正、自身品德修养得好、家庭得到整顿、国家得到治理、天下获得太平。子思写作《中庸》时也说：治理国家，基本原则共有九种，但在行动的时候却不过只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诚意。诚意实在太伟大了！它真是治国原则的根本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圣明神奇，有文有武，果断进取，中和平正，自上应承天命，自下深得民心。即位以来到现在，已有五年了。百姓安康，物产丰富，风俗醇厚完美，四方部族都来归服，全国各地安居乐业。只要是用来实现大治、保有国家、保持盛况、守护功业的的措施，无不尽善尽美了。然而陛下却仍然体察大道，谦虚自抑，把志向定得非常高远，锐意谋求大治，急切征求建议。在日理万机的闲暇，特地把臣下我等人召集到朝廷，降赐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询问同时依靠文官武将的要诀、裁制助成天地化育的原则。但臣下我不过是一个平庸的书生，见识浅陋，何足以向上揣测陛下深远的用意，对治国有所帮助呢？然而臣下我又私下考虑，自己蒙受朝廷培养的恩情，沐浴陛下教导的德惠，一直怀有爱君忧国的心意，却无法来奉献；

怀有忠君报国的志向,却无路来传达。今天有幸而被礼部录取,得以立身在殿廷中一小块地方上,这正是臣下我扣击天宫、进献建议的时候呀!怎敢不俯首掏尽全部拙劣的想法,来回答那么一两点呢!

臣下我听说人民是用以巩固国家根本的因素,而治理人民的官员,则在于从文章中挑选人才来充任;军队是用以保卫人民生计的因素,而指挥军队的重任,在于从军事活动中提拔有功者来担当。所以要综合任用,施布教化,使具有宽宏而坚毅等九项品德的人都担任职务,促使各项政事都成功;军人威风凛凛,保卫四方边疆,促使君王安心。文臣武将,自古都特别重要,实在不可不仔细对待。我们国家尊崇儒生,重视大道,挑选人才的制度虽不只一种,但概括起来是以科举为主而以推荐为次,未尝不重视文臣的挑选;尊崇品德,奖赏功劳,挑选武将的办法也不只是一条,但概括起来是以才能为先而以恩荫为后,未尝不重视武将的职责。评选考核的途径,怎能说是堵塞了呢?卫所的军官,怎能说是超员了呢?臣下我仰思上意,估计是陛下虽然有按照上天的启迪,慎重审查九种德行的洞察力,有政治和顺的功效,但仍想求得太平安康,鉴于文武官员是军民的依赖,所以想再采取措施加以疏通。这更能看出陛下神圣智慧的高明呀,臣下我请求能够为陛下谈上几句。

近几年来,文臣中有的借着推荐生员的制度,而蒙混升入国子监;有的根据纳粟得爵的规定,而胡乱登列仕籍。更何况拘泥于资格的先后,局限于历次任职的长久与远近,以有限的职位,来让杂乱进升的人去填补。评选考核官员的途径,由此便堵塞了。武将中只任用勋旧,而将帅中有的竟然从来没听说过作战韬略;积弊恶习一直延续,而将帅中竟然很少有人显出勤恳和才干来。更何况功劳大多出自行贿求得,奖赏常常落到侥幸人的头上,没有经受过战争的艰难,却已登列录用文书上。卫所的军官,由此便超员了。评选考核的途径既已堵塞,又怎能指望他们施展才华来治理民众呢?卫所的军官既已超员,又怎能指望他们奋勇向前来指挥军队呢?这自然不能不让圣上费心忧虑了。

为眼下考虑,不如严格考察升降的办法,政绩卓著的,就提升官

职来奖励表扬他;年老体衰的,就根据礼节遣退他。堵住钻营侥幸的门路,不要庸陋贪污的分子。这样一来,用人的方法,就一定会像唐朝大臣陆贽所说的那样:名和利相互平衡,而不至于堵塞了。重视爵赏勉励和惩处的典章,功勋已经卓著的,就衡量他的功劳施行奖赏;才能闻名的,则按照他的才能来安排职务。不对无功者滥施恩典,不对有罪者姑息纵容。这样一来,选拔将领的要诀,就一定会像唐朝大臣陆贽所说的那样:虚和实相互协调,而不至于冗滥了。因为能够诱导人的东西,只在名和利。名接近虚,而对教化却很重要;利接近实,而对道德却很轻微。赐给财货,给予俸禄,是用来彰显实利的;分别品级,区别官服,是用来修饰虚名的。虚实互相支持,因而人们就不轻视奖赏;轻重互相制约,因而国家不失掉权力。疏通的办法,哪有超出这些的呢!不过再探求它的根本,就在于陛下心念的真诚了。诚心来推行,并且一定要看到官员的功绩,那么担负治民责任的人,都将是有准则有作为的人;担当领兵使命的人,都将是既威严又谨慎的人。这样还担心什么没得到疏通的呢!

降水适合农时就年景丰收,旱涝灾害接连不断就年景歉收,这种年景不总是丰收的情况,正是自然的规律。长久地居住在一地,就会难以割舍,长久地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就不会轻易迁徙,这种家园总是舍不得离开的情况,正是人之常情。然而唐尧时虽有滔天的洪水灾害,而百姓却能够像往常那样随教化而递相变化,因为他有积储来防备大自然的灾害。商汤时虽有连年的大旱灾害,而商邑却能够依然人心安定和洽,因为他有措施来顺应安土重迁的人情。天时地利的获得,全在人怎么来安排,对此不能不有所了解。我们国家对救灾已有规定,在储积方面也有准备,所以用来顺应天时的工作已获得诀窍了。田制方面已有统一规章,赋税方面也不过分征收,所以用来顺应地利的工作也获得诀窍了。粮价哪能说暴涨了呢?百姓居处哪能说迁移了呢?臣下我仰思上意,估计是陛下尽管已有了关怀保护百姓的想法,也有了全国各地都安康的成效,但仍然进一步想达到最完美的治理局面,鉴于天时地利是百姓生活的依赖,所以再想办法来裁制助成天地的化育,这更能看出圣上心意的积极进取,臣下我请求能

为陛下谈几句。

近年以来,年成一歉收就缺乏粮米,没办法使百姓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米袋空空,没办法使民众的生活称心如意。那些啼哭着饿、叫喊着冷的人,实在可怜啊。百姓一穷困就会抛弃长期依赖的故乡,迁到陌生荒凉的他乡居住。那些辗转流亡的人,也实在可怜啊。米价暴涨之后,百姓吃饭尚且不够,还哪能指望他们交纳赋税来供应国家用度呢?百姓迁徙之后,自救尚且不够,还哪能指望他们为国出力来巩固国家的根本呢?这自然不能不让圣上多费心思了。

为眼下考虑,不如选派专门负责的官员,施行因时制宜的政务,懂得年景不会总是丰收但却有能够保持生活稳定的措施,总是想着预防灾荒,根据季节储存或分发粮食,就像前代的常平法,这是可以行用的。选拔贤良的太守和县令,施行爱民便民的政务,知道百姓有怀恋故乡的感情而顺应这种求安的心态,一定要把田地丈量好后分下去,按户口划定财产,就像前代的均田制,是大体可行的。常平法,开始于齐魏而完成于耿寿昌;均田制,推行于北魏而出自李安世。丰收年就提价收购粮米来便利人民,灾荒年就降价售卖粮米来便利人民,这就是常平法。男子受田四十亩,女子受田二十亩,绝户人家的田地收回作为公田;刺史受田十五顷,县令以上受田六顷,这些田地在后任接替前任时,由前任转交给后任。这就是均田法。考虑是否适宜使之合乎人情,那么丰收与灾荒就可望互相补充;对均田制做变通使之适应当地的习俗,那么贫困和富裕就可望大体平衡。安抚聚集的措施,还有比这更切要的吗?不过再探究那根本,就在于陛下心念的真诚了。诚心来推行,并且一定要看到实际的效果,那就全国人民无不处于衣食饱暖的境地,百姓生活无不沉浸在安居乐业的幸福之中,这样还担心什么有人会流离失所呢!

对内依靠文治,对外仰仗武功,文臣和武将同时使用,威势和德化同时施行,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往上顺应天时,往下顺应地利,安慰老人,关怀儿童,全都有所依靠,养活存者,安葬死者,一举一动都无差错,这实际上是赞助天地、协和阴阳二气的功德。至于实现大治的基本准则和方法,一定会有最精当的建议。然而古代的

臣子向君主进献建议，虽有值得采纳的地方不能做到无懈可击。例如西汉董仲舒，他的治国主张洞察夏商周三代，学问贯通天人，议论旁征博引，义理深远悠长，他的理论应该说掌握了圣人大道的宗旨了。晁错上书议论军事，思维反应周到严密，尊崇君主，压抑臣僚，言辞气势激昂慷慨，他的论述应该说掌握了圣人大道的权变了。董仲舒虽然掌握了圣人大道的宗旨，却夹杂了许多阴阳灾异的观点，未免流于迂腐而不切合实际。晁错虽然掌握了圣人大道的权变，但其中有关刑名术数的论断，未免流于狡诈而不光明磊落。所以宋儒苏洵在评论贾谊的时候顺便讲到了这两个人，讲得是很合理的。贾谊凭着少年英发的天资，受到了汉孝文帝的召见，看他献呈的《治安策》，里面有忠君爱国的至诚之心；劝导振兴礼乐，懂得教化百姓应该首先做的工作。他的言词可说是十分雄辩了。张良凭着卓越杰出的才干，辅佐汉高帝建立了汉朝，出谋划策，平定连年的混战；因事进献忠言，都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他的智谋可说是相当全面了。然而贾谊的言论虽然很雄辩，却只是简略地拟定礼仪，像对付匈奴的“三表、五饵”之说，更显出他方法的疏阔。张良的计策虽然明智，却是方法来自战国的权谋，学问宗奉黄老一派，道德水平就不高了。所以宋儒苏轼在评论陆贽的时候顺便讲到了这两位大臣，讲得是比较正确的。

像文德、武功、救荒、安民，这四个方面的事务，自然是应该讲求的。但像董钟舒、晁错、贾谊、张良，这四位臣子的偏颇之处，也应当有所了解。大体说来，文武官员的选拔，不必拘泥什么，只在于能够在当代行得通；安定和养护百姓的政策，也不必拘泥什么，只在于能够对人民有利。假如能找到合适人选来负责文武官员的选拔，并能根据形势来不断加以变通；能找到合适人选来主管安定和养护百姓的措施，并能审度时势全面推行，那就各项举措无不得当又适应当代了。董仲舒、贾谊的缺点，出自学术还不够精深；晁错、张良的缺点，出自学术还不够端正。假如他们能够追溯义理的渊源，而不满足学有小成；致力圣贤的纯正学问，而不走上其他邪路，那么他们就可以纠正过分的地方，做到不偏不倚而合乎正道了。

然而所谓适应当代、合乎正道，都是具体实施而表现在外面的东

西。如果不把诚意作为根本，内在的主导精神就确立不起来，实施时一定会出现不得当的情况，推行时一定会容易倦怠。所以臣下我自始至终拿诚意来向陛下进献，实在是因为诚意作为根本原则，真实而不虚妄，纯粹而不掺假，从上到下非常彻底，都是实在道理的体现。一有掺杂，就会虚妄了；诚意又长久不息，周转不停，从古到今贯彻始终，都是实在心念的体现。一有间断，就会止息了。臣下我跪拜期待陛下，把这个诚意留存在深沉筹谋的过程中，在处理政务，应付事变时体察这个诚意。凡有一个想法产生就说：我的想法中，该不会有所掺杂吧？严明地审察它，使这些想法没有一个可能是虚妄的。凡有一件事情要做就说：我的行动中，该不会有所间断吧？坚决地控制住它，使这些事没有一件可能是不实的。如此治国大道的根本就确立了。

然而微妙的纯一心念，能进攻它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有人用声色，有人用财货，有人用田猎，有人用安逸，对这几样稍有一样不防备，就会导致心中产生欲望，结果改变了诚意。臣下我希望陛下能够远离声色而不亲近，厌弃财货而不聚敛，克制田猎而不放纵，戒除安逸而不放纵，不三心二意。这样做以后就本源清澈，始终如一，而这个诚意怎么会有间断呢？有人在沉湎上来引诱，有人在奢侈上来引诱，有人在异端学说上来进攻，有人在谄媚上来进攻，对这几样稍有一样不防备，就会导致心往别处想，结果泯灭了诚意。臣下我希望陛下能够禁绝沉缅而不听从，排斥异端学说而不崇尚，拒绝谄谀而不亲近，不左摇右摆。这样做以后，就心中明白，坚持不变，而这个诚意怎么会有停息呢？由此就可以引导人民进入太平，延续社稷直至长远，像舜光华重合那样协助尧的大德，像武王那样发扬光大文王事业的功绩，怎能让虞舜和周武王独享美名呢？

陛下策试臣下我的问题，臣下我已经大概做了回答。要领与宗旨，就在于一个诚意。不过临到结尾，还有些话想献给皇上，因为爱君之心实在不能控制。诚意固然是治国大道的根本，而借以推行这个诚意的，又在于陛下的明察与刚强。明察可以认识诚意的正确与否，刚强可以决断诚意的隐微。明察不是说的吹毛求疵抓把柄，而是说的懂得道义、识别安危、区分贤愚、辨别是非。刚强不是说的凶狠

暴戾，而是说的只要是符合治国大道的，就毫不迟疑做出决断，任何奸佞都不能迷惑住和改变它。陛下真能发挥如同日月般的光明，没有丝毫之处不能明察，没有任何隐幽不能照亮，就如《尚书》所说的那样："效法上天的耳聪目明"。奋扬君主的果断坚决，见到适宜的事情一定去做，听到善言一定施行，就如《尚书》所说的那样："能够果敢坚决"。如此就会从里到外、从头到尾都是这个诚意，如同《中庸》所说的那样："最纯粹的诚意没有间断，没有间断就可以永存心中，永存心中就可以处处体现，处处体现就可以悠远长久，悠远长久就可以博大深厚，博大深厚就可以高远光明。"治理天下的原则，除此以外就没有其它内容了。臣下我这番话，迂腐疏阔，浅薄粗陋，压根就没有什么值得参考采纳的，但它确实出自一片赤胆忠心。伏身期待陛下从高处读上一读，这不仅是愚臣的大幸，也是天下的大幸，万世的大幸。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温玉春译〕

丁溥　殿试对策

丁溥（生卒年不详）　字原敬，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西）人。成化五年（1469）榜眼，官任翰林院编修，直至去世。他事俟考。

臣对：臣闻帝王图治之道，本于心；帝王存心之道，本于敬。夫敬以存心，则心体光明而正大，自有以洞察天下之事机；心以图治，则治道平康而正直，自有以克成天下之事业。故有志于帝王之图治者，不可不存其心；有志于帝王之存心者，不可不尽其敬。以此心之敬，理当世之务，则疏通文武之选典，绥辑天下之民生，无往而不宜于时。以此心之敬，察昔人之偏，则经权迂诈之得失，辩智文术之是非，无一而不合于道。尚何患乎文臣武士之壅遏，天时地利之凶歉，而治道不陋汉儒之言，以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哉？

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知之资，备刚健中正之德，即位以来，图惟治理。声色货利无所迩殖，宫室苑囿无所增广。布公道以肃纪纲，凛乎雷霆之发赫；奖直言以盛气节，浩乎江海之纳川。是以伦纪粲乎

其修明,风俗蔼乎其丕变。功业文章,巍然焕然,而大哉帝尧,君哉帝舜,不得专美于前矣。然犹体道谦冲,不自满假,廷集多士,咨访治道,拳拳以治功弗张为言,孜孜以政绩罕著为虑。臣有以知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难,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志在康乂兆民,保安社稷,夙夜靡宁,真尧舜之用心也。顾臣浅陋,曷克以仰承圣诏,茂明大对,以裨治道之万一耶?

伏观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顺天人之心,以建不拔之业。其治世求言之道,垂裕后昆而无间。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英宗睿皇帝,协天人之心,以绵无穷之祚。其治世求言之道,仰绍前烈而有光。皇明诞启,历数无疆。陛下今日所受之天命,即祖宗列圣之所昭受者。臣愿陛下以天心为心,常存敬天之实,则宠承六龙以御天,尊居九重以凝命,福禄与陛下万年而安享。此非臣之谀言也。周公告成王尝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宁无故哉?陛下今日所孚之人心,即祖宗列圣之所素孚者。臣愿陛下以民心为心,恒切勤民之念,则车书会同于四海,玉帛来王于万国,邦家赖陛下万年而巩固。此非臣之迂谈也。召公告成王尝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宁无自哉?

伊欲尽天人之责,其要在于简文臣而精武选。盖文有科第胄监之差,有贤良才德之别。择其材之深于文者,或识达治体,或通晓世故,所以理民事也。武有亲贵勋劳之异,有行伍卒隶之殊。拔其功之优于武者,或智略精锐,或弓马熟闲,所以驭兵戎也。我国家内资乎文,外资乎武,文武内外,维持一德,与武王保有厥士,克定厥家,同符而合辙矣。奈何典铨选者,惟知体陛下宽厚之仁,不务严黜陟之法?故窃名文学者,或坏科目以进身,或肆贪墨以苟禄,则铨衡之途,乌得而不壅?昧暗韬略者,或循资荫以承袭,或冒功次以超越,则卫所之员,乌得而不溢?是诚有以勤圣志之所虑矣。

试深省之:薰莸无别,泾渭不分,恶在其能疏通也哉?臣愿陛下,揽乾刚于独断,揭日月于中天,戒令大臣恪遵成宪,严加考核。滥举有禁,犯者不能缓其刑;幸进有罚,来者不容踵其迹。有上粮马而人监听选者,杜侥幸于将来;有拥貔貅而坐食妨政者,汰浮冗于既往。庸愚不得以叨爵禄,老弱不得以占名器。曾不闻昔人名利虚实之说

乎?职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贤德,施实利而寓之虚名;勋爵散号,以驭崇贵,以甄功劳,假虚名而佐其实利。疏通之道,端不出此矣。

伊欲契天人之心,其要在于足民食而奠民居。盖阴阳愆伏,水旱流行而为灾为虐,此岁无常稔者,天之道也。乡间同井,出入守望而相友相助,此土有常怀者,人之情也。我国家上安乎天,下安乎人,天人上下,感通一理,与文王燕及皇天,克昌厥后,同条而共贯矣。奈何职司牧者,罔念行陛下宽恤之政,惟欲峻掊克之私?故旱干水溢之靡常,而年谷不登,何免贵粜以充馁?仰事俯育之无赖,而贫乏不堪,何免离散以苟全?是真有以劳圣心之所忧矣。

请详究之:敛散无方,田制不定,恶在其能绥辑也哉?臣愿陛下,总机务于自裁,敷雨露于已有,申饬大臣按行有司,频加督劝。遇岁丰歉,仓廪皆有实储;临民出纳,主典不敢侵夺。有守田庐而贫馁者,赈而安之;有就耕食而流亡者,招而抚之。豪强不得以恣渔猎,贪酷不得以肆征科。独不观前代常平、均田事乎?谷贱则增价而粜以利农,谷贵则减价而粜以利民。虽不遽乎《周官》荒政之良,而耿寿昌权时之计犹可举。男子妇人,四十亩、二十亩皆有等;县令刺史,六顷、十五顷皆有则。虽不侔乎分田制禄之善,而李安世济时之策尚可行。绥辑之道,亦不外此矣。

夫天下之臣工,孰不总核于文武?诚使疏通之道,名利相须,虚实相济,庶乎兼资文武,有其人矣。由是文以附众,足以裕邦计而内治修;武以威敌,足以捍边陲而外夷攘。岂不周一世之用乎!天下之民生,孰不根本于天地?诚使绥辑之道,常平有法,均田有制,庶乎财成天地,尽其道矣。由是水土奠而民居安,天时有以应于上;五谷熟而人民育,人事有以协于下。岂不遂万姓之安乎!

虽然,求大道以图治,必切于时宜;资治道于至言,当稽诸往古。董生《天人三策》,度越诸子,仿佛乎圣道之经,宜适用也。其纵阴闭阳之说,如迂何?晁错边事一疏,玺书褒奖,依稀乎圣道之权,似济时也。其刑名术数之学,如诈何?观宋儒苏洵之论,其得失胥可知矣。文帝、武帝以直言策士,而所言未必皆直,较之言合稷契、谓之忠者为何如?《治安》一书,通达国体,辩莫辩于贾谊矣,而五饵三表以系单于之

属，术果密于陆贽乎？运筹决胜，蹑足附耳，智莫智于张良矣，而学宗黄老以从赤松之游，文果及于陆贽乎？观宋儒苏轼之论，其是非互可见矣。高帝、文帝以正议求士，而所议未必皆正，揆之谟合皋陶、谓之嘉者为何若？噫！此汉之君臣所以不唐虞三代之君臣，而汉之治功所以不唐虞三代之治功，以自汨没于杂霸，深可为之太息者。抑通论之，岂惟汉哉？前乎汉也，纵横于战国，弃灭于嬴秦，唐虞三代之礼乐教化，何寥寥乎！后乎汉也，夷风杂于唐，道不纯于宋，唐虞三代之声名文物，何落落乎！

天运循环，无往不复。洪惟天朝，列圣继作，谣康衢于春台玉烛之中，歌明良于景星庆云之下。肆惟皇上，适际隆兴，以不世出之才，当大有为之日。远宗唐虞三代之道，近守祖宗列圣之法。咨臣以当世四者之务，陈之必宜于时；谕臣以前代四臣之偏，矫之必合于道。臣又有以见陛下知周万物，而不弃于一得之愚；明照四方，而必询于刍荛之贱。意者欲与忠贞之士，商论治道，权衡人物，以寿亿万年太平之象也。臣复为陛下寻绎其义，以推广其说。

夫时者，当其可之谓。不当其可，则非时矣。四者之务，谓之非时，不可也。臣以圣贤救时之心论之，曰铨衡途壅，曰卫所员溢，务明黜陟之法则可；否则，贤否混淆而不可。曰歉则籴贵，曰贫则民徙，务禁掊克之私则可；否则，天人胥愤而不可。陈四者之务，必宜于时如此，陛下奚待他求哉？古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能法禹稷之心，急于救时，于以建官位事，发政施仁，措斯世于唐虞三代之雍熙，何难耶？若使任官惟贤，有乖于《周官》之制；捍灾御患，前愧于《云汉》之章。则非庶务不宜于时，所以理之，失其时矣。臣故举此以为缓于救时者之警也。

道者，所当行之谓。所不当行，则非道矣。四臣之言，谓之非道，不可也。臣以圣贤行道之心论之，曰经曰权，有时可行；而或迂或诈之亏于治体，则不可行。曰辩曰智，有时可行；而不术不文之远于事情，则不可行。矫四臣之偏，必合于道如此，陛下亦将焉用哉？古之舜闻一善言，若决江河；禹闻一昌言，下车以拜。能法舜禹之心，急于行道，于以都俞戒饬，臣邻赞襄，跻斯世于唐虞三代之泰和，奚有耶！若

使中郎补阙者，出绾淮南之绶；博士对策者，往持江都之麾。则非言议不合于道，所以听之，失其道耳。臣故举此以为沮于行道者之戒也。

臣生长于凤仪兽舞之世，乐育于鸢飞鱼跃之天，愿为帝臣，怀忠欲吐，谨述平昔圣恩之所造就、师友之所讲明者，已略陈其忠悃一二于前矣。陛下策之篇终，其虑臣等虚骋浮词，不切于世道，且责之朕将亲览而资治焉。臣捧诵再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再拜而言曰：大哉皇言乎！一哉皇心乎！其所以广开言路，旁通下情，必欲见诸行事，以嘉惠臣民之意，至矣尽矣。臣亦以为，陛下所以策臣，徒究世变之污隆，不亲睿览以资治焉，虽勤勤问之，夫何益？臣等所以入对，泛论世道之兴衰，不获天听以佐治焉，虽谆谆诵之，夫何功？今陛下之所问者，切于时以访于道矣。愚臣之所答者，因其时以明其道矣。

伏愿陛下心领神会，探其要领，以端出治之本，不专事于口耳文字之间，实体验于身心践履之际。譬之形影然，欲影之正，必先立其形之端，未有形不端而影正者也。譬之源流然，欲流之清，必先浚其源之洁，未有源不洁而流清者也。故论天下之治道，必本于陛下之身心；论陛下之身心，必本于始终之一敬。盖心者，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本根。心之存不存，顾敬与不敬何如耳。敬者德之舆，千圣传心之法，即所谓钦也。唐虞君臣相传相戒，固惟在于此也。仲虺告汤亦曰：钦崇天道。尚父告武王亦曰：敬胜怠者吉。是创业垂统者，在此敬也。周公告王亦曰：文王缉熙敬止。召公告王亦曰：曷其奈何弗敬。是持盈守成者，在此敬也。

陛下抚盈成之运，绍熙洽之治，宗社生灵之所附属，人才国计之所关系，天地鬼神之所鉴察，华夷上下之所观瞻。以一人之身，系天下之重。一时不敬，则一时于帝王之道有亏；一事不敬，则一事于帝王之道有愧。其思所以敬之哉！其思所以敬之哉！敬之之道，将若之何？昕临大廷之敬，必不怠于暗室屋漏之中；日御经筵之敬，必不替于便僻侍从之所。一念虑，无非敬，而全体以立；一动作，无非敬，而大用以行。则君子大居敬，而体元居正之事备矣。殆见燮理之功至，而玉烛均调；圣统之典成，而阴霾呈霁。弓矢积武库之尘，老稚锄桑麻之影。九夷八蛮，宾服于皇风清穆之余；五岳四渎，效灵于治教休明

之日。诸福之物,难致之祥,昔所未闻,于今则见。即宋儒程子所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而四灵毕至矣。于此可以四三王,六五帝,而唐虞三代太平之治,亘万古而仅两见于今日。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臣一介草茅,才不足以出膺世用,学不足以对扬王休,唯忠爱一念,与生俱生,故敢于圣问于外,竭其狂瞽,始终以敬之功化证效,为陛下劝。陛下试采览焉,亦庶几圣德圣学之一助哉!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古代帝王谋求大治的原则与方法,依据心念;古代帝王留存住心念的原则与方法,依据恭敬。用恭敬来留存住心念,心念的本体就光明而又正大,自然有依凭洞察出天下事务的契机。用心念去谋求大治,治国之道就既平坦康庄又端正笔直,自然有依凭成就天下的事业。所以对像古代帝王那样谋求大治怀有志向的君主,不能不留存住他那心念;对像古代帝王那样留存住心念的君主,不能不竭尽他那恭敬。依仗这心念的恭敬,去处理当今的事务,疏导沟通文官武将的选任制度,安抚聚合起天下百姓的生计,不管到哪里都没有不和时势相适宜的。依仗这心念的恭敬,去察辨前人的偏颇,无论在坚持根本原则与灵活采取措施或迂腐或诡诈的得失上,还是在能言善辩却方法不周密、机智却文德跟不上的是非上,就没有一宗而不符合大道。还忧虑什么文臣武将选拔不上来?天时地利还有荒年歉年?治国之道径把汉代儒士的主张看得一钱不值而要直接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的盛况比试兴隆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禀受耳聪目明、通达明智的天资,具备刚强矫健、中和平正的美德,自从登上帝位以来,谋求的只是治理。音乐舞蹈和美女、财货和私利没有什么去接近和聚集的;宫殿密室和皇家园林,也没有什么增加与扩大的。申张公正的准则来肃正朝廷的纲纪,威严得就像空中的响雷掀去覆盖物。褒奖正直的言论来使气节盛壮起来,浩荡得就像江海接纳各条河流。所以常规和准绳鲜亮地得到修明,社会风尚盛大地得到巨变。功业和文采光华,宏

伟又灿烂，而历来传颂的伟大的帝尧，占首位的帝舜，不能在前面独享美誉了。然而依旧体察大道，谦虚自抑，不自我满足，在殿廷上会集起众多的读书人，咨询访求治国之道，十分恳切地把治理的功业还没张布开作为话题，勤勉不懈地把施政成绩还很少显现出来作为忧虑。臣下我由此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感念祖宗创建基业的艰难，思索今日守护已有成就的不容易，志向在于使亿万民众安康，保有并安稳住江山社稷，从早到晚不休息，真是尧舜的那种用心啊！但臣下我很浅陋，哪里能仰头承奉圣上的诏令，勉力阐明在朝廷这种场合上的对答，来对治国之道做出万分之一的补益呢？

跪拜观察我朝太祖高皇帝和太宗文皇帝，顺应上天和世人的心愿，创建起不可动摇的基业。他们治理社会、求取建议的方法，给后代子孙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而无懈可击。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和英宗睿皇帝，符合上天和世人的心愿，延续没有尽头的国运。他们治理社会、求取建议的方法，恭敬地继承前代的功业而又发扬光大。我大明皇朝创立，享有的统治年数永无止境。陛下如今所承受的天命，也就是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的先帝所明显承受的。臣下我希望陛下把上天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常久保存敬畏上天的实际，那就显赫地驾着六条龙拉的车子来在天上运行，尊贵地居住在深邃的皇宫中来使命令严肃地贯彻下去，福分和爵禄就与陛下永远平安地享用。这并不是臣下我的奉承话。周公告诫周武王曾经说过：永远配合着天命，自己就会求得多种福佑。这种诚语难道没有缘故吗？陛下如今所符合的人心，也就是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的先帝所一向符合的。臣下我希望陛下把民众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时常加重为百姓操劳的念头，那就全天下车辆宽度都一样，所用文字全统一，各地的方国都携带珍贵的礼物前来朝拜归服，我大明皇朝仰赖陛下而永远巩固。这并不是臣下我的奉承话。召公告诫周成王曾经说过：和乐平易的君子，真是百姓的父母。这种诚语难道没有来由吗？

像那打算尽到上天和世人交付给自己的责任，关键在于择用文臣又对武将的选拔特别精。因为文臣存在着科举考取和学校出身的差异，存在着贤能与良善、才干与品德的区别。择用那些才质对文德

教化有特长的人，有的明白熟悉治理的纲要，有的通晓人情世故，要用他们来掌理民事。武将存在着皇亲国戚和建有功勋劳绩的区分，存在着行伍出身和兵卒身分的不同。选拔那些功效在武备上有优势的人，有的智谋精明厉害，有的骑马射箭技艺娴熟，要用他们来统领军事。我们国家在内部依靠文臣，在外部依靠武将，文臣武将和内部外部，维护并保持着同心同德。这与周武王保有他的事业，安定住他的国家，是丝毫都不差的。为什么负责考核选任官员的部门，只知道体会陛下宽大厚道的仁德，不在强化升降职务和罢官的制度上花大气力呢?所以盗取文章学问名声的人，有的破坏科举考试来使自己步入仕途，有的大肆进行贪污来苟且保住俸禄。这样一来，考核衡量的途径，怎么能不堵塞住呢?对计策谋略一无所知的人，有的按照朝廷对其父兄的特殊恩典来承袭职位，有的超越军功等级来破格得到提拔。这样一来，各个卫、所的人员，怎么能不超编?这实在是确有原因地要让陛下心中多做考虑了。

对此试加深入思索：香草和臭草没有区别，浑浊的泾水和清澈的渭水不加以划分，对文臣武将的选用途径却能疏导沟通，这可会表现在哪里呢?臣下我希望陛下，用独自做决断把朝廷大权收揽在自己手中，在天空的正中显示太阳和月亮的光芒，告诫命令大臣忠实地遵守已有的规章和事例，严格进行考核。对胡乱荐举具有禁令，违犯的人不能拖延对他的惩办。对侥幸捞取到官职的人具有处罚，使后来的人没办法再加以效仿。出现通过献纳粮米和马匹而到国子监听候选用的人，在日后应注意杜绝他们侥幸当上官的情况。出现掌有兵权却什么正事也不做并妨害军政的人，在过去后要淘汰这类多余的官员。平庸愚笨的人决不能捞取到爵位俸禄，年老病弱的人决不能占据朝廷官位。竟然没听说过前人关于名位和实利、虚号和实利的主张吗?负责实际政务的官职，用来安排具有才能的人，用来委任贤良和德行高尚的人，对他们给予实际俸禄又寄寓在名誉称号之中。功勋爵号和各种不负责实际政务的官号，用来驾驭地位高贵的人，用来区定建有功劳的人，借助名誉称号又配合着实际俸禄。在疏导沟通的办法上，确实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之外了。

像那打算符合上天和世人的心愿，关键在于使百姓吃穿充足，有固定的住处。因为阴气和阳气失调潜伏，大水和干旱四处出现，形成灾害，造成危害，这属于年景没有总是丰收年的情况，是自然的规律。住在乡间同一片土地上，出来进去看守了望，相互友爱，彼此帮助，这属于故土常常舍不得离开的情状，是世人的常情。我们国家往上使老天安定，往下使世人安定，老天和世人，上空和下方，全都在感通同一个道理。这与周文王由安定住世人而进一步安定住上天，能使他的子孙繁盛兴旺，是相提并论的了。为什么身为地方官的人，不考虑推行陛下宽厚体恤民众的国政，只打那加紧搜刮民财的个人算盘呢？所以干旱和发大水不固定，而当年的粮食作物不丰收，哪里能避免掉高价买进粮食来充饥的现象呢？对上事奉父母、对下养育儿女没有依靠，而贫穷困乏得经受不住，哪里能避免掉妻离子散来暂且活命的现象呢？这真真是确有原因地要让圣上心中多加忧愁了。

对此请求详加探究：购进和发放粮食没有恰当的办法，土地占有制度不固定，对民众的生计却能安抚聚合起来，这可会表现在哪里呢？臣下我希望陛下，用独自裁断来总领起重大的政事，径由自家施布恩泽。指示训诫大臣视察主管部门，频繁地加以督察劝勉。遇到年景丰收或歉收，仓库中有充实的储备。赶上百姓交粮领粮，办事人员不敢侵吞夺占。出现了不离开家园却贫困挨饿的人，进行救济并安定住他们。出现了到能耕作吃上饭的地方去而流亡的人，进行招集并安抚住他们。地方豪强决不许任意侵占掠夺土地，贪婪残酷的地方官员决不许肆意征收赋税。偏偏看不到前代常平仓和均田制这些事情吗？粮食价格低就提价由官府收购进来，以便对农民有利；粮食价格高就减价由官府抛售出去，以便对百姓有利。这种常平仓尽管还比不上《周礼》关于救荒政务的良好措施，但汉朝耿寿昌所创立的这种暂且应付住社会需要的对策仍然可以采用。男子和妇女，每人由官府授给专门种值粮食的田地各四十亩、二十亩，全都具有等级；县令和刺史，分别授给用作俸禄的公田六顷、十五顷，全都具有标准。这种均田制度虽然还赶不上古代划分田地、制定官员俸禄的完善做法，但北魏李安世所提出的这种救助社会的计策还可以行用。

在安抚和聚合起百姓生计的办法上,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之外了。

天下的官吏,有哪一个不总括在文臣武将之中?果真使疏导沟通的办法做到名位和实际俸禄相互连结,名誉称号和实际俸禄彼此补充,差不多就会文武两方面都去依靠而有合适的人选了。由此文臣用来使百姓归附,足以使国家财政充裕,内部治理取得成绩了。武将用来威慑敌人,足以捍卫边疆地区,落后部族被驱逐了。难道还不能满足整个国家的需用吗?天下的百姓,有哪一个不是在天地的覆盖托载下生存?果真使安抚聚合的办法做到常平仓具有有效措施,按定额分配田地具有定制,差不多裁制助成天地,就尽到那准则了。由此河水和土地都按常规稳定下来,百姓居住安宁下来,天时就有理由在上面做出回应了。各种粮食都丰收,人民得到养育,人事就有理由做出配合了。难道还不会实现各地人们的安宁吗?

尽管这样,求取大道来谋求治理,必须要切合时势的需要。用最高明的主张来有助治国之道,应该要考察古代。西汉董仲舒的《天人三策》,超过了各位思想家,很接近圣人大道的不可改变的大法,理所当然是适用的。但他有关阴气被放开、阳气被封闭的说法,对迂腐来讲又怎么样呢?西汉晁错讲论边境用兵事宜的一道奏疏,得到汉文帝加盖天子印章的这等诏书的特殊赞许和奖励,很接近圣人大道的灵活处理的策略,似乎真能救助社会了。但他那刑名法术的学说,对诡诈来讲又怎么样呢?观看宋代儒士苏洵的论断,董仲舒和晁错的得失就会全都清楚了。汉文帝、汉武帝通过直言极谏来策问读书人,但读书人所讲的不一定全都正直,这与言论同尧舜时期的重臣稷、契一模一样而被称为忠直的人来做比较,又属于什么情况呢?《治安策》这篇上书,通晓并熟悉国家的纲要,能言善辩谁也善辩不过西汉的贾谊了,可他提出用五种腐蚀手段和仁、义、信用三种准则去控制住匈奴单于这类人,方法果真比唐朝的陆贽还细密吗?在营帐中运筹谋划,在千里之外取得胜利,跟在汉高祖身后,贴着他的耳朵献计,讲机智谁也机智不过西汉的张良了,可他在学术上尊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去效仿仙人赤松子的成仙行径,文德果真赶得上唐朝的陆贽吗?观看宋代儒士苏轼的论断,贾谊和张良的是非就可以彼此让人看出

来了。汉高帝、汉文帝通过纯正的议论来求取读书人，可读书人所议论的不一定全都纯正，这与谋略同尧舜时期的重臣皋陶没有出入而被称为高妙的人来做衡量，又属于什么情况呢？哎呀呀！这正是汉代君臣成不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君臣，汉代的治理功绩成不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的治理功绩，因为他们自行沉沦在仁政夹杂着暴力之中，深深要为他们长长叹息的东西。但通盘来做评论，又哪里只是一个汉朝呢？在汉朝以前，战国盛行合纵连衡的斗争策略，到秦朝全部抛弃毁灭掉图书典籍。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礼乐教化，那是多么地少得可怜啊！在汉朝以后，唐朝夹杂着落后部族的风习，到宋朝圣人的大道又不纯正。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声教文明和典章制度，那是多么地零落啊！

天道的运行循环往复，没有去了而不返回来的。只有我们伟大的大明皇朝，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出世，致使民众在春天登台、风调雨顺之中，像古代有个老人那样在大路上敲击着土块唱歌谣；君臣在景星、庆云这类极难出现的祥瑞下面，像虞舜时那样相互吟唱君主英明、大臣贤良的诗歌。唯独皇上您，恰恰赶上国运隆兴，凭借非常罕见的雄才大略，正值大有作为的时候。往远处尊奉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道，在近处执守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法度，用当今四项政务的解决办法来询问臣下我，并要求陈述它们必须要适合时势需要，又用前代四位大臣的偏失来告谕臣下我，并要求纠正它们必须符合大道。臣下我由此又确有根据地看出陛下智慧本来能考虑清楚万事万物，但又对仅有一点心得的愚昧看法也不遗弃；圣明本来能察照四方，但又必定要对割草打柴的卑贱人进行询问。想来这是陛下打算与忠诚正直的读书人商讨治国之道，评论衡量历史人物，来延续那亿万年太平的兆象啊！臣下我再为陛下探寻梳理那义旨，来推衍扩展那说法。

时势，讲的是正当它们能够行得通。不恰逢它们能够行得通，那就不是所说的时势了。四项政事要下力量解决，说它还不能行得通，这是站不住脚的。臣下我依据圣人贤人救助社会的心念来做议论：说是考核选任官员的途径被堵塞住，说是各地卫、所人员超编，对此

务必要宣明升降职位和罢官的制度才行得通；否则贤能与庸劣混淆在一起就行不通。说是歉收就购买粮食价格高，说是贫困就百姓流亡迁徙，对此务必要禁绝搜刮民财的个人算盘才行得通，否则上天和世人都感到愤恨就行不通。陈述四项政事的解决办法，必定要切合时势的需要也就像这个样子，陛下还等待往其他方面去寻求个什么呢？古代的大禹，想到天下有落水的人，这完全是由自己使他落水的。后稷想到天下有挨饿的人，这完全是由自己使他挨饿的。能够效仿大禹和后稷的这种心思，在救助社会上很急切，用来设立官职，安排职责，发布政令，施行仁德，把当今社会带入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太平和美的境地，还有什么困难呢？如果任命官员只看贤能却同《周礼》规定的制度相违背，防备灾害和抵御异族入侵却在《诗经·云汉》这首诗所颂扬的情状面前还有让人感到惭愧的地方，那就不属于各项政务不与时势相适应，而是用来治理的措施，错过了时势的要求了。臣下我因而列举这一点，把它作为对救助社会不着急的人的警告。

大道，讲的是应当行用的东西。不应当行用的东西，就不属于大道了。汉朝四位大臣的主张，说它们不能行用，这是站不住脚的。臣下我依据圣人贤人行用大道的心念来做议论：说他们是坚持基本原则，说他们是灵活采取措施，这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行用的；但有的迂腐，有的诡诈，对治国纲要带来亏缺，就不能够行用。说他们是善辩，说他们是机智，这在特定条件下是可以行用的，但够不上学术，够不上文德，对事情起不到作用，就不能够行用。纠正汉代四位大臣的偏失，必定要符合大道像这个样子，陛下还打算再去行用个什么呢？古代的虞舜，听到一种有益的建议，就像江河冲破了堤岸。大禹听到一种美好的意见，就走下车来向他行礼。能够效法虞舜和大禹的用心，在行用大道上非常急切，用来发号施令，告诫训导，臣僚们相互辅佐协助，把当今社会带入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太平和美的境地，又有什么做不到的呢？如果让西汉爰盎那样身为郎中而对朝政缺失予以指出的人，出京去担任淮南王国的国相；叫董仲舒那样身为博士对答策问的人，前去担任江都王国的

国相。那就不属于言论不符合大道，而是用来听取言论的态度，丧失掉应有的原则了。臣下我因此列举这一点，把它作为对败坏行用大道的人的告诫。

臣下我生长在凤凰成对来到、百兽起舞的吉祥年代，在鸢鸟飞翔、鱼儿跳跃的环境中受到国家的培育，愿意成为称帝天下的人的臣子，心怀忠诚，盼望披露，恭谨地陈述了平素由圣上恩德造就的、经师长学友讲论阐明的东西，已经在前面稍略披露了一两点忠诚了。陛下在策问的末尾，担心臣下我等人空泛地逞用浮华的文辞，同世道不相切合，而且用本皇帝准备亲自观阅、有助治国来要求我们。臣下我手捧制策，诵读了好多遍，深深惶恐不安，敬行叩拜大礼说：真盛大呀，皇上的话语！真专一啊，皇上的用心！那种广泛开辟进言的途径，普遍沟通下面的想法，必定要在行事上显现出来，来对臣民赐予恩惠的心意，简直登峰造极了！简直毫无保留了！臣下我也认为，陛下策问臣下我，如果光是探究时代变化的升降，不亲自阅览来有助治国，即使特殷勤地进行询问，又有什么益处呢？臣下我等人入朝对答，如果光是泛泛地议论世道的兴衰，没有获得到皇上的听取而辅助治国，即使喧闹地讲来讲去，又有什么功效呢？如今陛下所询问的事情，切合时势需要又访求大道了；愚昧的臣下我所对答的东西，也依据时势需要来宣明那大道了。

跪拜祝愿陛下心领神会，探究它那要领，端正拿出治理措施的根本，不专门在口述耳闻、书面议论之间花气力，确实在自身和内心实际施行的过程中来体验。打个比方说，就像身形和身影，要想使身影端正，必定要首先确立起端正的身形，世上从来没有过身形不端正而身影却端正的事情。再打个比方说，就像河水的源头与支流，要想使支流清澈，必定要首先开掘出洁净的源头，世上从来没有过源头不洁净而支流却清澈的现象。所以讲论天下的治理之道，必定要出自陛下的自身和内心；讲论陛下的自身和内心，必定要出自由始至终都不变的那个恭敬。因为心念是全身的主宰，是各种事情的本原。心念保持住还是保持不住，只看恭敬与不恭敬到底怎么样罢了。恭敬是德行的承载物，历代圣帝明王传授心治的大法，也

就是所说的恭敬。尧舜君臣相互传授，相互告诫，压根就集中在这一点上啊！仲虺告诫商汤也强调说：恭敬地崇奉天道。姜子牙告诫周武王也强调说：恭敬胜过懈怠，就万事顺利。这表明，创立基业、垂示帝王统系的人，就在于这个恭敬啊！周公告诫周成王也强调说：文王持续光明，达到了恭敬的最高境界。召公告诫周成王也强调说：为什么又怎么能不恭敬呢？这表明，保持鼎盛状态、守护已有功业的人，也在于这个恭敬啊！

陛下正顺应着保持鼎盛状态、守护已有功业的时运，继承数代太平兴盛的治理局面，是江山社稷和一切生灵所归属的主宰，是人才和国家财政的决定者，是天地鬼神鉴别察看的对象，是华夏和各个部族上上下下都在注目观望的人。凭借一个人的身躯，拴系着整个天下的重任。有一时间的不恭敬，就一时间对帝王的大道造成亏缺；有一件事情不恭敬，就在一件事情上对帝王的大道产生有愧的地方。要思考恭敬的做法呀！要思考恭敬的做法呀！恭敬的做法，该去怎样做呢？像太阳初升那样临朝听政时所做到的恭敬，一定要在暗室墙角中就只有自己一个人时仍不懈怠。每天驾临经史讲席时所做到的恭敬，一定要在自己所宠爱的人围在身边的处境中仍不消失。每个念头和思虑，没有不是恭敬的，而整个主体得以确立。每个举动和作为，没有不是恭敬的，而重大的功用得以发挥出。这样一来，君子重视坚持恭敬，而体察元气、坚持正道的事体就完备了。眼看着协调阴阳的功效就到来，而四季就风调雨顺了；神圣统系的典则形成，而昏暗的天气立刻就放晴了。弓箭在武库中搁置不用积满了灰尘，老少在植桑种麻中闪动着身影。天下各地的部族，在皇恩浩荡的春风清爽和煦地吹过以后，全都前来归服。全国境内的名山大川，在治理教化美好清明的日子里献上灵异。各种象征福佑的神奇事物，很难招来的祥瑞，在从前都没听说过，在当今却显现出来了。这就是宋代儒士程颐所讲的：上下全都统一在恭敬之下，天地就自行排列好位序，万物就自行化育生长，气流没有不协和的，而麒麟、凤凰、神龙、寿龟也都来到了。在这时就可以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相并列而成为第四个称王天下的人，与黄

帝、颛顼、帝喾、尧、舜相并列而成为第六个称帝天下的人。而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太平大治景象，跨越万古就仅仅在当今总共出现过两次。天下由此就幸运极了，万代子孙也幸运极了。

臣下我只是一个民间的书生，才干不足以站出来承担起世上的任用，学识不足以对答称扬天子的美好诏令，只有忠君爱君这一个心念，与自身降生到人间就一起产生出来。所以敢在圣上策问的事情之外，竭尽那狂妄和昏昧，由始至终拿恭敬所会带来的功业与教化、证验和效用，为陛下做劝勉。陛下试加采择观览，也差不多够上对圣人品德、圣人学问的一点儿帮助了吧！臣下我触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董越　殿试对策

董越(1431～1502)　字尚矩，宁都(今属江西)人。成化五年(1469)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时年39岁。后迁右庶子，奉命出使朝鲜，多所撰述。累官至南京工部尚书。著有《圭峰文集》、《使东日录》等。

臣对：臣闻惟辟奉天，惟皇作极，而操致治之柄在于君；包括治体，启沃君心，而言致治之要在于臣。盖天下以一人为主，而引君以当道为先。人君能操致治之柄而不下移，则以用人才，而文武足以周一世之用；以赞化育，而和气足以遂万姓之安。此人君之尊，所以与天同体，而有财成辅相之功也。人臣能尽引君之道而不敢惑以他歧，则上而格君，而君心无不格；下而言治，而治效无不成。此人臣之职，所以与君相资，而称股肱耳目之任也。君尽君道，以致治而不违；臣尽臣道，以言治而必切。则何事之不可济，而何弊之不可救？何时之不可宜，而何道之不可合哉？唐虞三代君臣，之所以都俞吁咈于一堂，而共成雍熙泰和之治者，用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文武之资，备刚健中正之德，绍承大统，五载于兹。宵旰拳拳，图惟至理。治已臻于皇极，而犹怀望道未见之心；

世已底于平康，而方切视民如伤之念。乃于万几之暇，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谘臣以当世之务，责臣以尽言之诚。臣有以知陛下是心，即古昔帝王兢兢业业，不自满假，祖宗列圣用贤图治，孜孜汲汲之盛心矣。顾臣愚陋，曷足以奉大对？然而罄竭一得之迂愚，以稍裨治道之万一，亦臣区区之素志也。

臣窃惟天下之事，操得其要，则执简可以御烦；酌之有方，则由今可以冠古。自古人君亮天之道，莫要于用贤理民。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定鼎之初，已著为令。内而京畿则设胄监，以储天下之英材；外而郡县则设学校，以育民间之俊秀。三年大比，既拔其贤者能者以任用之；以时充贡，复储其俊者秀者以预备之。列圣相承，率由是道。是即唐虞三代之家塾、党庠、术序、国学，三物宾兴，克知克用之遗意矣。铨选之途，何尝壅乎？

比年以来，或由边储未充，而开纳马纳粟之例；或由大臣建议，而立限年拔擢之法。是虽国家因时制宜之常，古昔立贤无方之意，而非臣愚之所及知者。然以今有限之位，而待此无穷之才，其酌之之宜，处之之要，亦所当讲也。伏望陛下操黜陟之柄于上，严考察之令于下。申命大臣按行方岳，不职者虽非久任而必去，贪墨者虽有才美而不留。而又限以学校之员，一如祖宗旧制，杜其杂进之路，以塞徼幸之门。凡在选部之未仕而愿乞闲者，虚其爵号以荣之；既仕而乐引去者，异其恩数以旌之。则自然名利相均，而不至于壅滞矣。

自古人君经国之道，莫要于选将驭兵。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垂统以来，已有定制。内设五府以总其纲，外设卫、所以理其纪。握将机者，非勋阀而不授；掌戎伍者，非军功则不迁。百年于兹，循用是道。是即唐虞三代之诘尔戎兵，张皇六师，德懋懋官，功懋懋赏之遗意矣。卫所之员，何尝滥乎？

近年以来，承袭者不闻有所简选，而肉食者每充斥于要津；论功者未闻有所顾惜，而冒进者多混淆乎名器。是虽国家功疑惟重、赏延于世之大恩，而非臣愚所敢轻议者。然以十人营屯之资，而不足一人坐食之费，其裁省之要，斟酌之方，亦所当讲也。伏望陛下操予夺之柄于上，蚤澄汰之令于下。廷选大臣按行藩阃，老不胜任者，限之以更

替;勇敢有为者,进之以超迁。而又斟酌重轻,权衡虚实,凡赏赍之可以代升者,不以其实费而不与;旌别之可以劝功者,不以其饰虚而不加。则自然虚实相济,而不至有溢员矣。

岁无常稔者,天之道;土有常怀者,人之情。故阴阳有愆伏,灾沴之流行,虽以帝尧之仁,而不免于九年之水;虽以成汤之圣,而不免于七年之旱。以盘庚之迁殷,而安土重迁且不能已于大家世族。而况于近年以来,或加以水旱之相仍,或病于守令之屠剥,则贵粜以免馁,转徙以求生,何能免哉?

伏蒙陛下垂天地之至仁,不忍赤子之困阨,谘臣以绥辑之术,拯救之方。臣愚不能自裁,敢窃诵圣策所谓常平有法,诚可仿而为之也;均田有制,诚可稽而行之也。夫常平之法,肇于李悝,至汉耿寿昌因之。其以谷贱,则增价而粜以利农;谷贵则减价而粜以利民。虽尽非《周官》荒政十二之法,要亦可以免夫歉则粜贵、贫则民徙之忧矣。均田之制,出于李安世,而后魏因之。其制则男子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户绝者为公田,丁多者则增给,以至县令刺史,皆有等差。虽非古人分田制禄之常,要亦可以免夫富连阡陌、贫无卓锥之叹矣。

陛下诚能操是数者之柄于上,而责是数者之任于臣,将见文武兼资,德威并用,大而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者有其人,次而六卿分职、典司政教者有其人。外之则藩阃之重,足以为干城;守令之贤,足以宣德化。疆埸不患乎无韩、范之儒,禁中不患乎无颜、牧之辈。礼乐以之而修明,纪纲以之而振举,苍生以之而富庶,夷狄以之而宾服。上而天地之道,赖之以财成;下而万姓之繁,资之以生遂。真可以四三王而六五帝,陋汉唐宋于不居矣。尚何虑夫才不足以周一世之用,而治不足以致万姓之安哉?

乃致此之道,必有至言,陛下固已断自渊衷,试诸事为矣。而犹举以策臣者,是即大舜好察迩言之意,昔人询于刍荛之义也。臣闻之《大学》有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然自三代以后,献言者能合此而不违,体此而不失者,

百无一二。

汉之董仲舒大廷三对，黄钟大吕，似则似矣。然而屑屑于纵阴闭阳，其视《中庸》致中、致和之说，为何若？拘拘于灾祥符应，其视《大学》新民、新命之意，为何如？晁错之洋洋大对，与董齐声，美则美矣。然而刑名其学，果圣贤修齐治平之学乎？术数其归，果圣贤大中至正之归乎？故宋儒苏洵尝谓，董生得圣人之经，其失也流而为迂；晁错得圣人之权，其失也流而为诈。由是言之，则其道术之未底于纯，献言之未合于道，亦可见矣。贾谊政事一书，通达国体，非不辩矣。然而词伤激切，致帝之谦让未遑，岂非不密之过乎？张良之为帝者师，功成身退，非不智矣。然而学宗黄老，致帝之治杂伯功，岂非不文之弊乎？故宋儒苏轼尝谓，陆贽之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即此观之，则其学术之有偏，引君之无术，又可知矣。

虽然，陛下之策臣者，臣既略陈其由矣。而于终篇，犹欲责臣以陈四者之务，必宜于时；矫四臣之偏，必合于道，且宠之以将览以资治之词。臣愚，诚不知所自出，然尝闻之，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盖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而臣可无献言之诚乎？

臣窃惟天下之事，无不系于人君之一身，尤无不系于人君之一心。陛下以不世出之资，当大有为之日。自嗣登大宝以来，凡择材以理民，拔功以驭兵，与凡敬天之道，勤民之要，法古之宜，听言之实，一惟总之以一身，断之以一心。惟古昔之圣帝明王与祖宗列圣之信章成宪，是守是若。真足以措斯世于平康，纳斯民于皇极，以隆我国家亿万载太平之福矣。而臣愚，犹欲以操大柄之一言，本诸心之一语，为陛下献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子爱上之诚，每拳拳然有加而无已。亦向阳之葵藿，委涧之畎浍也。

伏惟陛下，留神于用人亮天之间，洞察于进言纳忠之际。慎名器而不轻畀，使爵位皆足以待功德之人；召和气以富苍生，使凶荒不足以劳宵旰之虑。有言逆于心，必求之于道；有言逊于志，必求诸非道。迂荒者于道或有合，而不必遗；辩智者于道有未合，而不必与。将见贤

能效职，而感召和气之有人；忠谠日闻，而赞襄治化之有赖。事虽有如四者之当务，不必虑无以处之；言虽有如四臣之有偏，不必虑无以察之矣。臣学术浅疏，叨尘赐对。于前四者之务，陈之未宜于时；于后四臣之偏，矫之未合乎道。爱君一念之诚，发于天性。惟陛下恕其狂妄，少垂仁而采纳焉，则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只有帝王才能承奉上天，只有天子才能给民众确立起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掌握实现大治的权力，完全在于君主。包纳总括起治国的纲要，启发开导君主的心念，而讲论实现大治的关键措施，完全在于臣僚。因为天下把君主一个人作为主宰，而引导君主又把明了治道的大臣放在首位。君主能够掌握住实现大治的权力，而不转移到下面去，靠它来任用人才，文臣武将就足够用来满足整个国家的需要；靠它来辅助天地化生养育万物，协和的气流就足够用来实现天下各地人们的安宁。这是君主尊贵，与上天连为一体，建有裁制和辅助天地的大功的原因。臣僚能够把引导君主的原则与方法做得特别好，不敢用其他的错误做法去迷惑君主，就会往上纠正君主，而君主的心念没有不被纠正的。往下讲论治理，而治理的效果没有达不到的。这是臣僚的职责与君主相互依赖，被称为君主的大腿和胳膊、眼睛和耳朵这种重任的原因。君主把为君之道做得特别好，用来实现大治而不违背；臣僚把为臣之道做得特别好，用来讲论治理措施而必定切合实际需要。这样一来，有什么政事不能够完成，又有什么弊端不能够补救呢？有什么时势需要不能够适合，又有什么准则不能够符合呢？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期的君臣，之所以在朝廷上相互商讨，一起成就太平和美的大治局面，原因就是运用了这种方法。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凭借圣明神奇、有文有武的天资，具备刚强矫健、中和平正的品德，继承帝位一脉相传的统系，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从早到晚，只是十分恳切地谋求最完美的治理状态。治理已经达到了天子给民众确立起行为最高准则的地步，但仍怀有周文王那种已经获取到大道却还盼望大道好像尚未看见的心思；社会已

经进入了安康平稳的状态,但还正在加重周文王那种把民众看成是受到伤害而痛惜的念头。竟然在处理繁忙政务的空隙里,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赐给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用当代需要下气力解决的事情来咨询臣下我,用言无不尽的忠诚态度来要求臣下我。臣下我由此就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的这种用心,就是古代帝王兢兢业业、不自我满足和我朝祖宗及各位圣明先帝任用贤才、谋求大治、勤勉不怠、十分急切的深厚用心了。然而臣下我愚昧浅陋,哪里足够用来承奉在朝廷这种场合上的对答?不过竭尽那仅有一点儿心得的迂腐愚笨,来稍微对治国之道有万分之一的补益,也是臣下我一向的小小志愿。

臣下我私下想来,天下的事情,掌握起来获得到那个关键所在,就可以执持简要的东西去驾驭那纷繁的东西;斟酌起来具有合适的办法,就可以由当今而超过古代。自古以来,君主辅佐上天、成就功业的途径,没有什么能比任用贤才、治理民众更为关键的了。我们国家从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的当初,就已经明文做出了规定。在中央京师设立国家最高学府,用来储备全天下杰出的人才;在地方各郡县设立学校,用来培养民间的优秀子弟。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选拔其中贤能的人来任用他们。按固定时间由各地保送生员,又储备起优秀人才来预先备用。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接,全都按照这个规定去办。这就是尧舜和夏商周时期在居民点设立教室,在地方行政组织逐级设立学校,在国都设立最高学府,按六德、六行、六艺的标准,采用贵宾礼仪向朝廷荐举人才,既能了解又能任用的遗意了。考核选任官员的途径,什么时候曾经被堵塞过呢?

近年以来,有的因为边境军事储备还不充足,首次做出了献纳马匹或粮食就可以到国子监听候选用的规定;有的经由大臣建议,又定立了按年限提拔任用的制度。这尽管是国家因时制宜的例行做法,是古代任用贤才没有固定框框的用意,并非是臣下我这样愚昧的人所能够闹明白的。然而依据当今有定额限制的官位,来对待这些永无尽头的人才,有关对此做斟酌的合适对策,对此做解决的关键措施,也是应当加以讲求的。跪拜希望陛下在上面掌握对官员决定升降或罢免的大权,在下面强化考核督察的命令。反复责成大臣巡视勘察各地

的官员，不称职的人即使上任时间不长，也必定要把他罢免；贪污的人即使具有突出的才干也不留住他。同时又限定学校的生员人数，完全像祖宗原来所规定的那样。杜绝住通过各种方式当上官的途径，去堵塞住侥幸成功的门路。凡是在吏部还没被委任而自己又愿意请求不做官的人，赠给他们爵位称号来显耀他们。已经任职而自己又乐意辞职离去的人，赐给他们特殊的待遇来表彰他们。这样自然就会名位和实际俸禄相互调配好，而不至于有人被阻塞和困住了。

自古以来，君主治理国家的办法，没有什么能比选用将帅、管辖部队更为重要的了。我们国家从太祖高皇帝传下帝位承袭的统系以来，已经具有固定的制度。在中央设立前、后、中、左、右五军都督府，来总揽军政；在地方设立卫、所，来负责防务。指挥调度的将帅，不是功勋卓著的人决不授付给这种职务；领兵打仗的人，不是立有军功决不提升。历经一百年到现在，全都遵守使用这个办法。这就是尧舜和夏商周时期整顿好你的军队，壮大王室直辖的部队，努力修养好品德的人就用官职去勉励他，努力建立功劳的人就用封赏去勉励他的遗意了。各地卫、所的兵员，什么时候曾经有过多余的呢？

近年以来，靠朝廷对其父兄的恩典承袭军职的人，没听说对他们有过什么筛选，而干不了正事的人却往往在重要职位上成群成片。按功劳受赏的人，没听说对国家的官位俸禄有过什么顾念和珍惜，而破例得到高官的人大多与既定的爵位官职名实不符。这尽管属于国家对功劳不能确定就按重赏处理，封赏延及到世世代代的大恩，并非是臣下我这样愚昧的人就胆敢轻率地加以议论的。然而拿十个士兵设营驻守的费用，却还不够一个人白领俸禄的支出。有关裁撤减员的关键措施，斟酌解决的方法，也是应当加以讲求的。跪拜希望陛下在上面掌握住赐予和剥夺的大权，在下面宣明澄清和淘汰的命令。在朝廷中选派大臣去巡视勘察坐镇一方的统兵大员，年老已不能胜任的人，限令他们更换替代。勇敢有作为的人，用破格提升的办法进用他们。同时又考虑轻重，权衡名誉称号和实际利禄，凡是通过赏赐可以代替升职的，不因为这样办要实际支出费用而不给予；通过特殊表彰可以鼓励立功的，不因为这样办只是表面装饰而不封赐。这样去做了，自

然就名誉称号与实际利禄相互补充,不至于再有多余的人员了。

年景没有每年都丰收的,这是自然的规律;对故土舍不得离开的,这是世人的常情。所以阴气和阳气存在着失调和隐伏的现象,灾害与逆气流布盛行,即使凭仗帝尧的仁慈,也不会避免掉长达九年的水灾;即使凭仗商汤的圣明,也不会避免掉为时七年的旱灾。凭仗盘庚这样的国王,他要把都城迁到殷地去,但在颇有势力的贵族当中,留恋已有居地,不愿意迁徙,也是制止不住。何况近年以来,再加上有的地方水灾旱灾接连发生,有的地方被太守县令的残酷搜刮搅得成了祸患。这样一来,高价买入粮食来免却挨饿,四处流亡来求得活命,又怎么能够避免掉呢?

跪拜承蒙陛下降下天地般的最高仁爱,不忍自己的子民困顿受阻,用安抚聚合的办法和拯救的措施来询问臣下我。臣下我太愚昧,无法自己做出裁断,私下敢诵读圣上策问所讲到的:常平仓具有规则,由此感到确实可以仿效,加以施行;均田具有定制,由此感到确实可以考查,加以行用。常平仓这种做法,由战国李悝首先创立,到汉朝耿寿昌又加以沿用。它是鉴于粮食价格低,就增价由官府购入,借此来有利农民;粮食价格高,就减价由官府出售,借此来有利百姓。虽然并不全是《周礼》那样的有关救灾救荒的十二条根本措施,总之还可以免除掉歉收就买米特贵、贫困就百姓逃亡的忧虑了。均田制度,由北魏李安世提出,而北魏照着去做。这种制度规定,男子每人授给种植粮食的田地四十亩,妇女每人授给二十亩,家中没有继承人了,就交回来变成国家支配的土地。壮劳力多的人家,就增加授给的亩数。以至于县令和刺史,也都有当做俸禄的授田标准。这尽管并不是古人划分土地、制定俸禄的法度,总之还可以免除掉富人田地连成片、穷人连插根锥子的地方都没有的感叹了。

陛下果真能在上面掌握住以上几个方面的决定大权,而把这几个方面的任务交给臣僚去必须完成,那就眼看着文臣和武将同时依靠,恩德和威势交相运用。往大处讲,讨论大道和筹划治国、协调好阴气和阳气的辅政重臣就有合适的人选了;其次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尚书各负其责,掌管政治和教化的要员也有合适的人

选了。在地方上,各个身负重任的统兵大员,足以成为国家的捍卫者;而贤良的太守县令,足以宣明仁德教化。边疆地区不担心没有北宋韩琦、范仲淹那样的儒帅,朝廷上不担心没有战国时廉颇、李牧那样的武将。礼仪乐舞依靠这一点而得到修明,朝廷纲纪依靠这一点而振作起来,百姓依靠这一点而变得富庶,四周部族依靠这一点而前来归服。往上而天地之道仰赖这一点得以裁制助成,往下而繁多的各个族姓凭借这一点得以生计实现。真可以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相并列而成为第四个称王天下的人,同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相并列而成为第六个称帝天下的人,把汉朝、唐朝、宋朝鄙视得根本不值一提了。还忧虑什么人才不够用来满足整个国家的需用,治理不够用来实现各个族性的安宁呢?

但达到这种状态的途径,必定要有最恰切的建议。陛下原本就已经从深沉的内心做出决断,并在政事和举措上尝试了,但仍然提出来策问臣下我,这就是大舜喜好察辨浅近言论的心意和古人向割草打柴人做询问的义旨。臣下我听说《礼记·大学》中有段话说:古代打算向天下显示圣明德行的君主,首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打算治理好他的国家,首先要整顿好他的家族;打算整顿好他的家族,首先要修养好自己本身;打算修养好自己本身,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心地;打算端正自己的心地,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打算使自己的意念真诚,首先要充实自己的知识;而充实自己的知识,在于穷尽事物的道理。《礼记·中庸》也说:达到喜怒哀乐不显现,显现就恰到好处,天地就自然各得其所,万物就自然化育生长。然而从夏商周以后,进献建议的人能够符合这种要求而不违背,体悟这种要求而不出现偏差,一百个人中,也没有一两个。

西汉董仲舒在朝廷上三次对答汉武帝的策问,庄严高妙,看起来像是很有理了。然而在阴气被放开、阳气被封闭上特别在意,这比照起《中庸》达到喜怒哀乐不显现,一显现就恰到好处的主张来,又究竟怎么样呢?他在奇异天象做出反应上反复推究,这比照起《大学》使民众改变精神面貌,使国运气象更新的义旨来,又究竟怎么样呢?西汉晁错气势恢宏地对汉文帝策问所做的对答,与董仲舒相提并论,看起

来是很理想了。然而循名责实、严厉处罚构成了他的学术，这果真是圣人贤人有关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的理论吗？有关君主控制臣僚的手段是他的旨归，这果真是圣人贤人所主张的应极其公允、最为纯正的旨归吗？所以北宋儒士苏洵曾经指出：董仲舒获取到圣人的基本原则，但他的偏失发展下去成为迂腐；晁错获取到圣人的灵活策略，但他的偏失发展下去成为诡诈。按照苏洵的观点来做评议，他们的学说还没有达到纯正，献呈的建议还不符合大道，也就可以看出来了。西汉贾谊关于政事的上书，通晓熟悉国家的纲要，不是不雄辩了，然而言词太过于激烈迫切，致使汉文帝没顾得上修明礼仪，这难道不是他欠周密的过失吗？西汉张良身为帝王的老师，大功告成，自动引退，不是不机智了。然而他在学术上尊奉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致使汉高祖的治理，在仁政中夹杂着暴力措施，这难道不是他不讲文德的毛病吗？所以北宋儒者苏轼曾经指出：唐朝的陆贽，机智很像张良，但文德却超过他；雄辩很像贾谊，但治国方法也不粗疏。按照苏轼的说法来做观察，他们的学术存在着偏失，引导君主又没有恰切的治国方法，又是可以清楚的了。

尽管这样，陛下策问臣下我的问题，臣下我已经概括地陈述那些原由了。但在策问的末尾，陛下还用陈述四项政务的解决办法必须要适合时势需要，纠正汉代四位大臣的偏失必须要符合大道来要求臣下我，并且用准备亲自观览来有助治国这样的言词来鼓励臣下我。臣下我太愚昧，确实不清楚自己该从哪里谈起。但曾听说，君主开辟求取言论的道路，必定会有听取言论的实际行动；人臣遇到能够发表言论的年月，不能不怀有献上言论的忠心。因为君主求取言论的道路不时常开辟，而人臣能够发表言论的年月也不容易遇到。如今陛下开辟求取言论的道路，而臣下我遇到了能够发表言论的年月；陛下具有听取言论的实际行动，而臣下我能够不怀有献上言论的忠心吗？

臣下我私下想来，天下的事务，没有一项不由君主一个人来决定，更没有一项不由君主的那个心念来决定。陛下凭借十分罕见的天资，正当大有作为的时候。自从继位，登上皇帝宝座以来，凡属择用贤才来治理百姓，提拔立有功劳的将士来管辖部队，以及敬奉上天的方法，为民众操劳的要领，效仿古代的合适举措，听取言论的实际行动，

全部都由自己一个人统揽起来，凭借那个心念做出决断。只是执守并依从古代圣帝明王和我朝祖宗及各位圣明先帝的已有规章和法度，真真足够用来把当今社会引领到安康状态，把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百姓纳入到天子为他们所确立的最高行为准则之下，用来扩展我们国家亿万年太平的福气了。但臣下我太愚昧，仍然想拿独揽大权这句话、依据心念这句话，来为陛下做献呈，原因是因为陛下的仁德尽管已经没有谁能再超过了，但臣子热爱君主的诚心，常常十分恳切，只有加深而没有停止的时候。这也就像是随着太阳转的葵花，流向山洞的渠水啊！

跪拜只请陛下，在任用人才、辅助上天成就功业之间特别留神，在献呈言论、采纳忠言的过程中明察秋毫。看重国家的爵位官职而不轻易就授予，使爵位官职都足以留给具有功劳和道德的人来施用。招来协和的天气致使百姓富裕，让灾祸饥荒不足以造成从早到晚的忧虑。碰到某种言论同自己的心意相违背，一定要用大道来做衡量；遇上某种言论同自己的想法很适合，一定要用不属于大道来做判断。迂腐而不切实际的看法，有的地方符合大道，不一定就抛到一旁；雄辩机智的见解，有的地方不符合大道，不一定就欣赏赞同。这就眼看着贤良能干的人恪尽职守，而感通并招来协和的天气就有人物了。忠诚正直的言论天天听得到，而辅助治理教化就有依靠了。政事尽管有像圣上策问中所讲的那四种应该解决的，但不必忧虑没有办法解决它们；言论尽管有像汉代四位大臣那样存在偏失的，但不必担心没办法察辨出来了。臣下我学术肤浅粗疏，本来同圣上赐给策问让对答很不相配。在前面四种政务的解决问题上，陈述起来还不切合时势的需要；在后面汉朝四位大臣的偏失问题上，纠正起来还不符合大道。但热爱君主这个念头的至诚劲儿，是从上天赋予的本性中涌发出来的。只请陛下宽恕对答中的狂妄，稍微赐给仁恩加以采纳，像臣下我这样愚昧的人就太幸运了，天下也太幸运了。臣下我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壬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

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

殿试策问

[成化八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自古帝王继体守文,克弘先业,致盛治者多矣。而史臣独以成康、文景并称,何欤?其致治本末,可指言欤?朕光绍祖宗丕图,政令之行,悉遵成宪,期臻至治,比隆前古。然夙夜祗勤,于兹八载,而治效犹未彰著,何欤?岂世有古今,故效有深浅欤?今天下田野辟矣,而贡赋供于上者,每至匮乏;学校兴矣,而风俗成于下者,益至浮靡。兵屯以制外者谨矣,未能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刑法以肃内者严矣,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凡若此者,其弊安在?如谓政在用人,则方今百司庶府,文武具足,而科目之选拔,军功之序迁者,又济济其众,何官有余而政不举欤?无乃承平日久,习安逸而事因循者多欤?兹欲严以督之,则人情有不堪;宽以待之,则治理有难成。何处而得其中欤?夫治必上下给足,风俗淳美,外夷服而中国安,底于雍熙泰和之盛,斯朕志也。何施何为而可以臻此,殆必有要道焉。子大夫讲习经济之学久矣,其参酌古今,明著于篇。朕将采而用之。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工匠们在作坊里来完成他们的工作，君子通过学习来掌握那个大道理。

周文王动用民力来建造台苑，挖掘池沼，而百姓却很高兴，把台苑称为灵台，把池沼称为灵沼，还喜欢其中有麋鹿、鱼鳖。古人能够与人民一同欢乐，所以他们才会得到欢乐。

所谓孝道，就是能够完全继承先人的遗志，能够完满延续前人的事业。在春、秋两季，修缮祖庙，陈列前代所收藏的重要器皿，摆设好先祖的遗服，献纳四季的祭品。祭祀宗庙的礼仪，是用来排定辈分的；按爵位高低来排列，是用来区别贵贱等级的；按神职人员的职责来操持，是用来区别才能大小的；晚辈向长辈敬酒，是用来表示恭敬的；祭毕宴饮，按人们头发的颜色来入座，是用来区分年龄大小的。登上先王的祭位，行用先王的礼仪，演奏先王的乐舞，尊敬先王所尊敬的人，敬爱先王所亲近的人。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自古以来，帝王继承君位，守护前代法度，能够弘扬祖业，实现天下大治的人有很多。然而史臣却唯独联名称赞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实现大治的来龙去脉，可不可以具体谈一谈呢？皇帝我继承和光大祖宗宏大的筹谋，推行的政令，全部遵循过去的惯例，期望能够达到鼎盛局面，和前代盛世相比美。然而自己日夜勤劳，到现在已有八年，而治理效果仍不显著，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时代有古今之分，成效也就有深浅之别了吗？现在全国的土地都得到了垦辟，然而向上交纳的贡赋却常常短缺；学校获得了发展，然而下面形成的风俗却越发浮华。用于抵御外患的国防措施够严密了，却不能让四方部族感到害怕而不敢入侵；用

于肃清国内的刑法够严厉了，却不能让坏人受到儆戒而不敢触犯。诸如此类，弊病到底在哪里呢？如果说朝政的关键在于用人，而现今政府各部门的文武官员都已配备，并且通过科举得到选拔的，通过军功得到逐级升迁的，人数又有很多，可为什么官员很充裕而朝政反而振作不起来呢？该不会是太平日久，习惯于安逸生活而只愿因循守旧的人太多的缘故吧？现在打算严格督促他们吧，人们在感情上又难以承受；打算宽厚对待他们吧，国家治理又难以形成。怎样才能做得恰当呢？所谓治世一定要上下的用度都充足，人民的风俗很淳厚，四方部族归服并且国内安定，达到那种太平和美的强盛局面，这也是皇帝我的奋斗目标。怎么办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恐怕一定有什么要诀吧？你们这些读书人讲论研习经邦济民的学问已经很久了，请参照古今的情况，把自己的看法明白地写下来。皇帝我准备采纳施行。

吴宽　殿试对策

吴宽(1435～1504)　字原博，号匏庵，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成化八年(147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侍讲东宫。后预修《宪宗实录》，典司诰敕，官至礼部尚书。其行履高洁，自守以正，于书无所不读，诗文有典则，兼擅书法。著有《匏翁家藏集》。

臣对：臣闻古之君天下者，莫不有治法，亦莫不有治人。盖天下之事，非法不能以自举；天下之法，非人不能以自行。故法所以举其事，而人所以行其法者也。然人亦岂能自用哉？又在人君之一心耳。昔傅说之告高宗曰：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而必继之以惟厥攸居。此可见人君之图治，其心当先安于所止也。心既安于所止，故以是心而求天下之贤，则无一人之不用；以是人而付天下之法，则无一事之不举。而所谓足贡赋、厚风俗、攘夷狄、革奸顽之四者，皆不足以劳吾心矣。

钦惟皇帝陛下，抚盈成之运，当鼎盛之年，有聪明睿知之资，有孝友温恭之德，有宽仁博爱之度，有神武不杀之威。临御以来，八年于

兹,图治之心,惟日不足。故不以臣之不肖,拔之草茅之中,置之廷陛之上,拳拳焉下询乎治天下之要道。臣虽至愚,能不感激而思效其愚直之一二乎!

盖陛下每三年一策士于廷者,非欲为虚文也,盖将用其言也。臣之幼而学于家者,非欲为空言也,盖将用于世也。臣常怀用世之心,适陛下开用言之路,是机之不可失也。然而陛下之策臣者,其大要欲于治法、治人加之意耳。而臣以为尤所当先治者,心也。心既治,而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臣故先以心之说为献,然后于圣策之所及者,次第而条陈之焉。

盖闻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又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言治化非一朝一夕所能成也。臣观三代之时治之盛者,莫盛于周;而周之治,亦莫盛于成康之世。盖有文、武创业于前,而成、康善于守成耳。自周而下治之盛者,莫盛于汉;而汉之治,亦莫盛于文景之世。盖有高祖创业于前,而文、景善于守成耳。四君之所以善于守成者,岂有他术哉?必至其持守而施为者,有本末也。《周书》之称成王曰,祇勤于德而训迪厥官,作周恭先而自时中乂。至于康王之敬忌天威,张皇六师,此其实也。汉史之称文帝曰,身衣弋绨而示朴为先,除田租税而厚于利民。以至景帝加以恭俭,与民休息,亦不失文帝之家法者也。

成康、文景之致治本末,所可知者如此;而其所以并称于后世者,有不在此欤?夫成康、文景之为君,虽不可作,而其治法犹有可得而行者。苟能行之,所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移风易俗、黎民醇厚之效,当复见于后世。岂以世有古今,而效有浅深之殊哉?仰惟陛下传二帝三王之道,绍一祖四宗之统,政令之行,悉遵成宪,视成康、文景之治固优为之矣。而复以为治效犹未彰著者,此陛下不自满足之心也。臣虽至愚,敢不钦承而将顺之乎?

伏读圣策有曰:今天下田野辟矣,而贡赋供于上者,每至匮乏。臣有以见陛下欲修举治法,足食以充国用也。夫欲足食以充国用,莫若省浮费。《大学》曰: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今之世,生之为之者,果得为众且疾乎?食之

用之者，果得为寡且舒乎？借使众且疾矣，然民赋有常数，而国用无常数，以有常数之贡赋，而供无常数之用度，此田野虽辟而贡赋所以不得不至匮乏也。臣故曰省浮费者，以此。

圣策有曰：学校兴矣，而风俗成于下者，益至浮靡。臣有以见陛下欲修举治法，化民以厚风俗也。夫欲化民以厚风俗，莫若求实行。盖古者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其宾兴之制，以德行居先，文艺居后者，欲使人重本而轻末也。今之取士，惟较其文艺，而不考其德行，士安得不惟末是趋乎？况所谓文艺，又非古之所谓文艺者乎！此学校虽兴，而风俗所以不得不至浮靡也。臣故曰求实行者，以此。

有曰兵屯以制外者谨矣，未能使夷狄畏却而不敢侵。圣策及此，臣又见陛下欲举治法攘夷狄，而非穷兵黩武之所为也。夫夷狄之性，轻而寡信，贪而无亲。王者以禽兽畜之，来则有备，去则不追。《诗》曰“王命南仲，城彼朔方”，又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是也。是故求速效者，急于战斗而未必残其类；怀永图者，加以岁月而卒能收其功。窃以为今日之计，亦惟先于守而已。其必练士卒，积刍粮，严斥堠，谨烽燧，而据要害之地，以为持久之计可也。然欲为持久之计，必用持久之兵。盖古者兵出于农，故戍其地则用其地之民。今之边兵，安于水土，习于金革，犹夫其地之民也。诚用之以守，庶免调发之扰而得制御之道。至于守之既固，而彼犹为吾患也，于是因地乘势，以议攻之之策。则边境既安，兵威自壮，以战则克，以攻则取，而夷狄岂有不畏却者哉？

有曰刑法以肃内者严矣，未能使奸顽惩艾而不敢犯。圣策及此，臣又见陛下欲举治法革奸顽，而非刻法深文之所为也。盖刑所以为小人而设，小人而不加之以刑，则纵恶长乱，无所不至，是刑法诚不可不严也。然听狱之际，一或不尽其心，则刑有不得其当者。是故刑得其当，虽岁罪一人，而天下有咸服之心；刑失其当，虽日罪千人，而人心无可服之理。今律之所载者，轻重舒惨，至精至备，可谓无遗憾矣。但有一定之法，无一定之情。其情之所在，则惟典狱者参错讯鞫以求

之耳。昔郑子产铸《刑书》,晋叔向讥之曰: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旨哉斯言!实万世典狱者之所当知也。然参以人,固足以得其情;徇乎人,亦不足以当其罪。成王之告君陈曰: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穆王之告诸侯曰:尔尚敬逆天命,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其知狱之不可徇乎人者也。夫典狱者,下既得乎人之情,上不徇乎君之意,则刑之所加皆得其当,而奸顽岂有不惩艾者哉?

以是而知:浮费不省则贡赋不足,实行不求则风俗不厚。不用边兵以守其地,则夷狄未可以攘;不任有司以求其情,则奸顽未可以革。此臣所以妄论四者之弊,在于此也。抑四者虽各为一事,其实有相通之道焉。何也?贡赋不至匮乏,则国用既足,而兵屯可以仰给矣;风俗不至浮靡,则民心既正,而刑法可以舍置矣。刑法舍置,则中国安矣;中国安,则夷狄无衅可乘,不待攘之而自然畏却矣。有天下者之治法,信无先于斯四者。虽然,法之立也本无弊,法之用也始有弊。法不自用,待人而后用。人有正邪,才有长短,而法不能不为之异焉。此其过之不在于法,而在于人也,审矣。然则今日治天下之要道,孰谓不在于用得其人乎?

然而圣策又曰:如谓政在用人,则方今百司庶府,文武具足,而科目之选拔,军功之叙迁者,又济济其众,何官有余而政不举欤?无乃承平日久,习安逸而事因循者多欤?兹欲严以督之,则人情有不堪;宽以待之,则治理有难成。何处而得其中欤?夫治必上下给足,风俗淳美,外夷服而中国安,底于雍熙泰和之盛,斯朕志也。何施何为而可以臻此,殆必有要道焉。陛下之言至此,图治之心可谓益切矣。

臣愚以为,要道莫先于用人。人才皆可用,特在人君用之何如耳。用得其人,官虽不足而政无不举;用非其人,官虽有余而政不能举。非惟不能举,而且有害于政焉。如欲省浮费也,使奉承者非其人,则一意陛下之足国用,而更为厚敛之计矣。欲求实行也,使奉承者非其人,则一意陛下之厚风俗,而更为诡行之举矣。主兵而非其人,则兵无纪律,而赏功罚罪,惟其私意之轻重,所谓用边兵以守其地者,未必得其力也。典狱而非其人,则狱多冤抑,而刑故宥过,惟其私意之

出人,所谓任有司以求其情者,未必得其实也。

诚欲用得其人,又在乎陛下之一心焉。盖心安于所止则诚,诚则明,明则于天下之人,自能知其何者为正,何者为邪,于焉用其正而黜其邪;于一人自能知其何者为长,何者为短,于焉取其长而弃其短。不啻若辨白黑,若数一二,无一能之才逃于洞察之下者。取其人于科目,则皆俊乂之才;取其人于军功,则皆知勇之士。而凡列职于百司庶府者,其文真足以经邦,而文教无不修;其武真足以戡乱,而武功无不成。盖莫不奋迅踊跃,以趋其事,固无有乐因循而事安逸者矣。若然,亦何必严以督之哉?即欲严以督之,则为大舜之德威,非若唐德宗之苛察也。亦何必宽以待之哉?即欲宽以待之,则为成汤之克宽,非若汉元帝之优游也。

当此之时,臣见陛下全大有为之资,居大有为之位,操大有为之具,乘大有为之势。有所下施,施之而无不当;有所不为,为之而无不成。盖纵横上下,无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岂特足贡赋、厚风俗、攘夷狄、革奸顽之四者而已哉!如是则可以垂拱南面,而臻雍熙泰和之盛治矣。然则欲事之举也,在乎法。有治法,而天下无不举之事。欲法之行也,在乎人。有治人,而天下无不行之法。欲人之用也,在乎心。有治心,而天下无不用之人。心之功用,至于如此。臣请得为陛下复一言之。

夫人之心,特方寸耳。所以灵于万物者在是,所以参为三才者在是,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在是。人皆有是心,而能治其心者寡;人皆治是心,而能安于所止者尤寡。始如是而终不如是,非安也;表如是而里不如是,非安也。安之云者,心与义理为一,而未始相违者也。夫欲心与义理为一,此岂可以袭取之哉?要必无时无处而不用其力也。陛下居禁密之地,尝诚思之曰:吾心得无少放乎?得无异于坐朝之时乎?有放焉则求之,是能治其心也。处细微之事,亦尝思之曰:吾心得无少放乎?得无异于临政之际乎?有放焉则求之,是能治其心也。无一时而不用其力,久则无一处而不安所止。由是以此心而事天,以此心而治民,以此心而法祖宗,无乎不善者。又岂特善于用人之一事而已哉!

臣故恳恳焉以是说为献者，此探本之论也，此责难之义也，此区区爱君之忠也。虽然，世之持是说以告陛下者亦多矣。臣不能舍是而为新奇可喜之论者，以治道之大原止乎此也。惟陛下不以其言之可厌，而少加睿览，天下之幸，孰大于此！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栗殒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古代统治天下的帝王，无不具有治理的措施，也无不拥有治理的人才。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治理措施是不能自动解决的；治理的措施，没有人才是不能自动推行的。所以措施是用来解决事情的，人才是用来推行措施的。但人才又怎能自己使用自己呢？又在于君王的纯一心念的运作了。从前傅说告诫殷高宗说：治和乱在于百官。官职不可授给自己所喜欢的人，应当授给能人；爵位不可赐给坏人，应当赐给贤才。而且接着还一定要加上言行一致这句话。由此可见人君要谋求大治，他的心念应当首先定立在道德的最高目标上。心念已经定立在道德的最高目标上，再凭借这种心念去求取天下的贤才，就会没有一个人得不到使用；依靠这些人才再去推行治国的措施，就会没有一件事得不到解决。这样一来，像所谓要使贡赋充足、使风俗淳淳、驱逐异族、消除奸凶这四种事务，就不足以再让君王我费心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顺从执守已有功业的国运，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有聪明睿智的天资，有孝顺友爱、温和恭敬的品德，有宽厚仁慈、博爱众生的度量，有神圣英武而不杀戮的威严。自从登基以来，到现在已有八年了，谋求大治的心意，没有一天感到满足。因而不介意臣下我等人不成器，从民间选拔出来，安排到殿廷之上，诚恳地垂询治理国家的要诀。臣下我虽然极其愚昧，能不感激皇恩而不奉献一两点愚蠢和直率的看法吗？

陛下每三年在朝廷策问一次读书人，不是想做点表面文章，而是想听取他们的意见。臣下我自幼在家所学习的东西，不是想讲些空洞的理论，而是想被当世所用。臣下我一直怀有被当世所用的想法，正遇陛下广开听取建议的道路，这个机会真不能错过啊。然而陛下

策试臣下我的问题,主要是想听听关于治国措施、治国人才的看法。而臣下我却认为尤其应当首先整治的,是心念。心念已经整治,然后国家政务就可随之获得料理。所以臣下我首先把关于心念的理论来献呈,然后再就陛下策问中所涉及的问题,按顺序逐条进行回答。

曾听孔子说过:善人治国一百年,就能克服凶暴,去除虐杀了。又说:如果有人称王天下,一定要经过三十年才会使仁德普及。这些话都是强调治理教化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臣下我观察夏商周三代,治理最昌盛的,没有超过周朝的;而周朝的治绩,又没有比成王康王时代更昌盛的。这是因为文王、武王在前面开创了基业,而成王、康王又善于守护功业的缘故。从周期以下治国最昌盛的,没有超过汉朝的;而汉朝的治绩,又没有比文帝、景帝时期更昌盛的。这是因为高祖在前面开创了基业,而文帝、景帝善于守护功业的缘故。四位君主之所以善于守护功业,哪有其他什么招数呢?必定是做到既能保持功业又能有所作为,具有来龙去脉。《尚书·周书》上称赞成王,说他恭敬地勤于德政而且训导百官,充当周法的先导而且以洛邑为中心治理天下。到了康王,敬畏上天的威严,振作起中央部队。这正是成王和康王大治的实际。《汉书》上称赞文帝,说他身穿粗衣,把提倡俭朴放在首位,免除田税而侧重有利人民。到了景帝,又加上恭敬节俭、让民众得到休养生息,也没有丧失掉文帝的治国原则。

成王与康王、文帝与景帝实现大治的来龙去脉,所能知道的就是这些。而他们被后人联名称赞的原因,还有不在这一范围中的吗?成王与康王、文帝与景帝作为君主,虽然不能复生了,但他们的治国方法都仍有值得施行的。真能施行的话,所谓大道与政治密切结合在一起、恩泽滋润民众、移风易俗、百姓醇厚的功效,就会在后世重新出现,怎会因为时代有古今之分,功效就会有深浅之别呢?抬头敬思陛下承接尧舜、禹汤、周文王与武王的大道,延续太祖、太宗、仁宗、宣宗、英宗的统系,推行的政令全都遵循已有惯例,比照成王与康王、文帝与景帝的大治局面,固然是高出一筹的。然而又认为治国成效还不辉煌,这正显示出陛下永不自满的心念啊。臣下我虽然极其愚钝,敢不恭敬遵命而顺从吗?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其中说：现在全国的土地都得到了垦辟，然而向上交纳的贡赋却常常短缺。臣下我由此知道陛下是想完善治国措施，促使粮食充足来满足国用。要想粮食充足来满足国用，没有比节省不必要的开支更有效的了。《大学》上说：增殖财富是有基本原则的。创造财富的人多，而消费它的人少；创造财富时很迅速，而使用它时很缓慢，那财富就永远都会充足了。当今时代，生产和创造财富的果真是又多又快吗？消费和使用财富的果真是又少又慢吗？假使是又多又快，然而百姓贡赋是有固定数目的，而国用却没有固定数目，用有固定数目的贡赋来供应没有固定数目的国用，这就是土地尽管都得到垦辟而贡赋也不能不走向短缺的原因啊！臣下我提出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就是以此为根据的。

圣上的策问中又说：学校获得了发展，然而下面形成的风俗却越发浮华。臣下我由此知道陛下是想完善治国措施，教化百姓使风俗变得醇厚。而要想教化百姓使风俗变得醇厚，没有比注重实际品行更重要的了。古代在乡里用三种事情来教化百姓，并优待、举荐贤能人才。第一个是六种品德：明智、仁爱、预见、决断、忠诚、和气；第二个是六种行为：孝敬父母、兄弟友爱、和睦同族、亲近远房亲戚、与朋友讲信用、体恤救济贫苦人；第三个是六种技艺：礼仪、乐舞、射箭、驾车、书写、计算。优待、举荐贤才的办法，是以德行为主、文章技艺为次的，目的就是想让人们重视根本而轻视末节。然而当今选取人才，只比试他们的文章技艺，而不考察他们的德行，读书人哪能不只去追求末节呢？更何况今天所说的文章技艺，又不是古代所说的文章技艺呢？这就是学校虽然得到了发展，而风俗却不能不流于浮华的原因。臣下我之所以说应注重实际品行，就是以此为根据的。

策问中还说用于抵御外患的国防措施够严密了，却不能让落后部族感到害怕而不敢入侵。圣上的策问涉及到这个问题，臣下我由此又知道陛下是想完善治国措施，驱逐落后部族，而不是想要做出穷兵黩武的举动。落后部族的品性是轻诺寡信，贪婪无情。做帝王的人把他们当做禽兽来对待，来了就防备着，跑了也不追赶。《诗经》上说："国王命令南仲，在北方筑城"，又说"讨伐那猃狁，一直追到太

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那些要求迅速见效的，就加紧进攻却不乱杀无辜；那些心怀长远打算的，就延缓时间而最终也能够收到效果。臣下我私自认为现在的对策，不过把防守放在首位而已。一定要多练士兵，多积粮草，加强侦察，严密警戒，占据住咽喉要地，做长期防守的打算就行了。但要想做长期防守的打算，就一定要使用长期不懈的军队。古时候军人由农民兼任，所以防守当地都使用当地的农民。而今天的边防军人，习惯当地的水土，熟悉手中的兵器，和当地农民是一样的。果真使用他们来防守，基本上就可以免除调遣的麻烦而掌握控制局面的办法。至于防守已经巩固以后，对方仍然成为我们的忧患，这时就要根据地理条件，来确定攻击他们的策略。这样一来，边境已经安宁，兵威就自然雄壮，交战就能获胜，攻击就能夺取，而落后部族怎会有不畏惧退走的呢？

策问中还说用于肃清国内的刑法够严厉了，却不能让坏人受到儆戒而不敢触犯。圣上的策问涉及到这个问题，臣下我由此又知道陛下是想完善治国措施，革除奸凶，而不是想要做出严刑峻法的举动。刑法都是为坏人设置的，对坏人不用刑法加以惩处，就会纵容罪恶，助长祸乱，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所以刑法实在不能不严厉啊。然而在审判案件的时候，一旦有人没有竭尽全力，刑法就有不能获得正确执行的。所以刑法能够获得正确执行，即使每年只判处一个人，而天下人也都会有心悦诚服的想法；刑法不能得到正确的执行，即使每天判处一千人，人们心中也不会有应该信服的理由。现今法律所载明的条款，有轻有重，有宽有严，极为缜密完备，可说是没有遗憾了。但是法律虽能确定，案情却不固定。凡是案情所在的地方，就只能依靠司法人员综合审讯结果来求得真相了。从前郑国子产铸造《刑书》，晋国叔向便讽刺他说：先王是衡量事情的轻重来判罪的，并不制定刑法。这句话意义太深远了，实在是后世每个司法人员所应该知道的。然而通过人来作综合分析，固然足以获取到情由；但若曲从某个人的主观判断，就又不能够正确判处犯人的罪过了。周成王曾告诫君陈说：殷民受到了惩处。但我说惩处，你不一定非去惩处；我说宽恕，你不一定非去宽恕。只求恰当吧。周穆王曾告诫诸侯说：

你们要敬畏天命，遵从我一人。虽然遇到害怕的事也不要害怕，虽然可以松懈也不要松懈。周朝国王也清楚断案真不能曲从某个人啊。司法人员既能在下面获取到人们的常情，又能在上面不曲从君主的旨意，那所判处的刑罚就都会恰当，坏人怎会有不儆戒的呢？

由此可知：不必要的开支不节省，贡赋就会不充足；不注重实际品行，风俗就会不醇厚；不使用边境战士守卫当地，四方部族就不能够驱逐；不任凭司法部门求得人情，奸凶就不能够革除。这是臣下我胡乱地评说四方面的弊病，原因正在于这里。不过这四方面虽然各是一事，实际上又有互相联系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贡赋能不短缺，国用就会充足，国防自然也能得到物资供应了；风俗能不浮华，民心就会端正，刑法自然也就可以搁置起来了。刑法搁置起来了，国内也就安宁了；国内安宁了，四方部族没有空子可钻，不等驱逐他们自然就畏惧退走了。君主治国的策略，实在没有比这四方面更重要的了。虽然如此，定立法度时原本没有弊病，施用法度时才产生了弊病。法度自身不能执行，必须要有人来执行。人有正邪之分，才能有长短之别，所以法度到人手中就不能不产生差异了。这种过错不在于法度自身，而在于执行法度的人，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了。所以今天治理天下的关键，谁能说不在于获得合适人才来任用呢？

然而圣上的策问中又说：如果说朝政的关键在于用人，而现今政府各部门的文武官员都已齐备，通过科举得到选拔的，通过军功得到逐级升迁的，人数有很多，可为什么官员很充裕而朝政反而振作不起来呢？该不会是太平日久，习惯于安逸生活而只愿因循守旧的人太多的缘故吧？现在打算严格督促他们吧，人们在感情上又难以承受；打算宽厚对待他们吧，国家治理又难以形成。怎样才能做得恰当呢？所谓治世一定要上下用度都充足，人民的风俗很醇厚，四周部族归服而且国内安定，达到那种太平和美的强盛局面，这也是皇帝我的奋斗目标。怎么办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恐怕一定有什么要诀吧？陛下的话说到这个程度，谋求大治的心愿可以说是越发急切了。

臣下我愚昧地认为，要诀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人才都可任用，关键看君主怎样任用罢了。任用获得合适人选，官员即使不齐备，政务也没有不能开展的；任用没获得合适人选，官员即使有多余，政务也不能得到推动。不但得不到推动，而且还对政务会造成危害。如果打算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假使执行者不是合适人选，就会完全顺着陛下想使国用充足的心意反过来制定加重搜刮的办法。打算注重实际品行，假使执行者不是适合人选，就会完全顺着陛下想使风俗醇厚的心意，反过来大搞形式主义的活动。领兵者不是合适人选，就会军纪涣散，赏功罚罪只按他自己的好恶决定，所谓使用边境的战士来守卫当地，就未必能够收到成效了。司法者不是合适人选，就会出现大量冤假错案，惩处赦免只按他们自己的意愿来决定，所谓任凭司法部门求得人情，也就未必能够落到实处了。

真想要获得合适人选来任用，又在于陛下的纯一心念。因为心念定立在最高的道德目标上就会真诚，真诚就能明察，明察了就自然能对天下人了解到谁是端正的，谁是奸邪的，并据此用正去邪；对于一个人也自然能了解出他的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并据此取长去短。这就无异于分辨黑白、数清一二，没有一位有才能的人可以逃得出明察之下。用科举来选取人才，就会都是英杰能手；依据军功来提升将领，就会都是智勇双全的人。凡是在政府各机构中供职的人员，他们的文才真足以经营国家，而礼乐等教化就没有不会修明的；他们的武艺真足以平定祸乱，而军功业绩就没有不能形成的。因为他们无不积极踊跃地去干工作，自然没有人因循守旧而贪享安逸舒适了。如能这样，又何必严厉地督促他们呢?即使要严厉地督促他们，也该像大舜那样恩威并施，而不像唐德宗那样吹毛求疵。如能这样，又何必宽厚地对待他们呢?即使要宽厚地对待他们，也该像成汤那样宽仁，而不像汉元帝那样纵容。

能够做到这些的时候，臣下我就可以看到陛下拥有大有作为的资质，处于大有作为的位置，掌握大有作为的权力，乘借大有作为的形势。有的可以不执行，但凡是执行的就无不恰当；有的可以不去做，但凡是去做的就无不成功。这样纵横上下，没有不能随心所

欲的，哪里仅仅是使贡赋充足、使风俗醇厚、驱逐落后部族、革除奸凶这四个方面而已呢?如此就可以不费气力地稳坐朝廷，而达到太平和美的盛世局面了。既然如此，要想使政事振作起来，在于法度。有了治国法度，天下就没有不能振作起来的政事。要想施行法度，在于人才。有了人才，天下就没有不能施行的法度。要想使用人才，在于心念。有了治国的心念，天下就没有不能使用的人才。心念的功用，如此之大。臣下我请求能为陛下再进一言。

人心大小，不过方寸。但人之所以号称为万物之灵的原因就在这里，之所以与天、地并存称为三才的原因也在这里，之所以能够掌握各种道理来应付各种事变的原因也在这里。人人都有这样的一颗心，但能修明它的人却很少；人人都能修明这样的一颗心，但能把它定立在最高道德目标上的人更少。开始还行结果却不行，算不上定立住；表面还行而实际却不行，也算不上定立住。所谓定立住，是说这个心念和义理融为一体，从来不相互违背。要想心念与义理融为一体，怎能靠突然间把它拿过来呢?总之，要无时无处不下气力。陛下身居后宫时，经常要诚恳地检讨自己说：我的心念该不会有些放纵了吧?该不会和上朝时不一样吧?若有放纵就追回它，这是能够修明心念的表现。面对小事的时候，也要诚恳地检讨自己说：我的心念该不会有些松懈了吧?该不会和听政时不一样吧?若有松懈就追回它，这是能够修明心念的表现。没有一刻不竭尽全力，时间长了就没有一处不定立在道德的最高目标上。由此出发，用这种心念侍奉上天，用这种心念治理百姓，用这种心念效法祖宗，就没有不完美的。又岂止善于用人一件事情而已呢?

臣下我恳切地拿这个见解向陛下进献，原因在于它是探究根本的言论，是向君主指出问题的义旨，是一片爱君的忠心。虽然如此，世上向陛下进献这个见解的人已有很多，臣下我不能放弃它而另外提出新奇好听的言论，原因恰恰在于治国大道的本原就在这一点上。只望陛下不要因为这些话听起来令人讨厌，却能稍加观览，天下之幸哪里有比这一恩赐还大的呢?臣下我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温玉春译〕

刘震　殿试对策

刘震(1434～1501)　字道亨,号励斋,安福(今属江西)人。成化八年(1472)榜眼,时年39岁。后进侍讲,官终南京国子祭酒。性格刚毅,耻于诡随。为文敏捷雄健,不蹈袭陈言。撰有《双溪集》等。

臣对:臣闻人君欲致天下之治,必在于用贤;欲得天下之贤,必在于修身。盖修身者,用贤之本;而用贤者,致治之要。不得其要,则政令虽具,不足以成治功;不正其本,则用舍虽切,不足以得贤臣。故有志于帝王之盛治,不可不求其要;有志于帝王之要道,不可不探其本。人君诚能以修身为本,而得天下之贤以为用,则用之以足国,而田野日辟,贡赋无不足之患。用之以育才,而学校日兴,风俗有丕变之休。用之以振兵旅,而四夷宾服。用之以正刑罚,而万民远罪。由是而致雍熙泰和之治,以继唐虞三代之盛,不难矣。唐虞三代贤圣之君,所以创业垂统而昭光于后世者,此也。所以继体守文而无愧于前烈者,亦此也。岂有舍修身用贤而能成天下之治者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龙飞淮甸,肇造区夏,建官立政,垂裕无穷。列圣相承,用贤致治,深仁厚泽,洋溢四海。天下之击壤讴歌,鼓舞神化,盖百年矣。陛下以聪明睿智之资,嗣祖宗列圣之统,一德格天,群才效用,励精图治,夙夜靡遑。比者星象少警,辄自咎责,日引大臣,面商治体。臣于是知陛下真大有为之君,真不世出之主,可以继唐虞而超三代,可以昭前烈而裕后昆,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亿万年开太平无疆之休矣。而犹不自满假,复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之以成康、文景继体守文之治,而虑今日之未及;继之以田赋学校、屯兵刑法之事,而疑任官之罔效;终之以必有要道之一言。是欲求其要,探其本,以成雍熙泰和之治。臣又知陛下是心,即尧舜询于刍荛、稽于有众之盛心也。臣虽至愚,敢不拜手稽首,以对扬圣天子之休命乎?

窃惟天生斯民,不能以自治,故必作之君;君主斯民,不能以独

治，故必资之臣。使君天下而不得贤臣，则无以为辅治之具。欲用贤而不修身，又何以为取人之则乎？故自古帝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开唐虞三代之宏规，为万世君人之大法，未始不由修身用贤以致然也。若夫继体守文之君，如启能敬承禹道，尚资伯益之辅相。太甲祇承烈祖，允赖阿衡之匡救。其克弘先业、臻盛治者，孰谓不本于修身，不急于用贤也哉？然启之业，旋废于太康，而不能善其后。太甲之贤，不类于成汤，而不能善其始。其政化之洽，皆未若成康之久也。盖成王绍文、武之烈，而康王踵成王之休。成王则祇勤于德，夙夜不逮；康王则敬忌天威，毋敢昏逾。其修身之谨，同一律也。三公三孤，论道而弘化；六卿九牧，分职而咸和。其得人之盛，同一辙也。是以教养备具，而兆民允康；兵刑不用，而六服承德。史臣独称成康，信有征矣。

厥后炎汉肇兴，文景继世，务以德化，与民休息。如露台惜费，金钱愧心，文帝之恭俭尚德类若此，而景帝亦能恭俭而不改焉。前席求言，拊髀思将，文帝之用人图治类若此，而景帝亦能用人而不渝焉。是以数十年间，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几致刑措。史臣谓其治比成康，盖有由矣。然成康备德任贤，如彼其至，而文帝则黄老之是高，礼乐之未遑。避外戚之嫌，而不相广国；听武夫之间，而不任贾谊。其视成康之备德任贤，已有间矣。至如景帝以刻薄之资，任术数之智。宠梁王，废太子，而家庭之恩，厚薄不伦。戮晁错，杀亚夫，而君臣之道，乖缺已甚。其视文帝之宽厚谦谨，已不侔矣，又岂可与成康概论哉？

钦惟陛下，抚盈成之运，尽继述之诚，政令之行，悉遵成宪。良以祖宗列圣之成宪，即尧舜、禹汤、文武之所已行，成康之所嗣守，与文景之所仅得其善者也。率而行之，宜乎教养有方，安攘有道，而至治之美，与前古而并隆矣。然犹自谓治效未甚彰著，而疑时有古今之异，故效有浅深之殊。是又成汤检身若不及、文王望道如未见之意也。臣愚以为，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时有古今，心无古今。陛下诚能存二帝三王之心，由祖宗列圣大道，简拔真才，信任不疑，受直言以广耳目，去谗邪以定心志，则治效之著，将超轶乎成康，而文景不足言矣。奚古今深浅之足虑哉！

夫欲致天下之治，比隆前古，其大端有四：田赋也，学校也，兵屯

也,刑法也。四者不修而欲为治,是犹舍楫而渡江河,释耒而理菑畬,断断乎其不能矣。是宜圣问之及此也!盖田赋者,所以养民而足国。上下给足,斯可以言治,此先王之所以重田赋也。三代之田,有贡有助有彻。其养民足国之法,犹可考焉。我国家因时制宜,度田定赋。田因民之所有,而荒芜者任其垦辟;赋量田之所入,而官屯者许其佃耕。田不得以侵渔,赋不得以增减。征输责之府县,漕运委之卫所。田赋之制,不为不详矣。而陛下即位之初,亲耕藉田,以为农先,屡敕有司,以恤农事。故虽深山穷谷之中,无尺土寸地之旷,田野可谓辟矣。然贡赋之供于上者,或未免于匮乏,何也?臣愚以为此无他,天下之财赋有限,而妄费者多、冗食者众故也。夫生财之道,必食者寡而用者舒。奈何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百日作之,一日糜而费之。如之何其不匮乏也?

为今之计,若能停不急之务,杜无功之赏;禁淫巧之作,省缁黄之费;汰冗滥之员,罪游惰之卒。必量人以为出,不侈用以伤财。则天下惟正之供,未有不足于用也。然陛下以此数者,明谕有司数矣,而卒未效者,岂非奉行者未得其人邪?臣愿陛下择人以牧民,必如龚、黄之为郡,卓、鲁之为县,使民皆家给人足;而又择人以掌国计,俾用于官者有常度,食于官者有常员。则何患夫财用之匮乏哉!

学校者,所以教民而正俗。风俗淳美,斯可以言治,此先王之所以重学校也。三代之学,曰庠曰序曰学,其教民善俗之意,犹可概见焉。我国家稽古定制,建学立师。内有国子监,以成天下之英才;外有府州县学,以育一方之俊彦。丰廪饩以养其体,蠲徭役以厚其家。以训诲责之师儒,以提督委之风宪。学校之制,不为不备矣。而陛下即位之初,亲幸太学,释奠先师,屡敕风宪,敦厉士习。故《诗》、《书》弦诵之声,无壤地遐僻之间,学校可谓兴矣。然风俗之成于下者,乃益至于浮靡,何也?臣愚以为此无他,天下之性习不同,而务外者多、重内者少故也。夫士志于道,内重则外轻。奈何徒借《诗》、《书》为进取之媒,反视道义为功利之贼!如之何其不浮靡也?

为今之计,若能严劝惩之方,明黜陟之典;厉廉耻之节,塞奔竞之途;公科贡之选,杜粟马之输。使其务礼义以相先,靡功利之是尚,则

天下习俗之成，鲜有不趋于正也。然陛下以此数者，风厉学校久矣，而尚未效者，岂非教督者未得其人邪？臣愿陛下择人以典教，必如胡瑗之教苏湖，程颐之判武学，使士皆成德达方；而又择人以司人物，俾浮薄之徒不得以幸进，敦实之士每至于显庸。则何患夫风俗之浮靡哉！

若夫兵，所以威天下者也。兵之不设，则叛乱何所畏乎？此先王所以不得不制兵也。我国家定制，在京则宿卫之士更番以至，而听总戎之训练；在边则关塞之卒结垒以守，而受边将之调度。剽掠者必追无纵，俘获者必杀无赦。其所以防外，不为不谨矣。然夷狄未尽于畏却，非为将之罪欤？窃观今之将臣，或出于膏粱纨绮，而手不习兵；或得于趋走奉承，而目不知书。或冒功而进，不足以服士心；或临事而避，不足以振士气。坐拥貔貅，虚费粮糗，甚至出入锋镝者或薄其赏，而安居豢养者每窃其功。是以兵虽多，而威不振也。昔舜之征有苗，必以命伯禹；宣王之伐猃狁，必以命尹吉甫，良有以哉！臣愿陛下慎选智仁信勇之士，以统兵旅。纵未能得如禹、如吉甫之徒，亦必得人如汉之赵充国，唐之郭子仪，而先零坐困，回纥罗拜矣。夷狄乌有不畏却乎？

刑，所以禁天下者也。刑之不用，则奸宄何所惩乎？此先王所以不得不制刑也。我国家定制，在内则有三法司，以谳天下之狱，而重者必以奏闻。在外则有按察司，以提一方之刑，而枉者听其申理。故犯者律有明条，故纵者国有显罚。其所以肃内，不为不严矣。然奸顽未尽于惩艾，非司刑者之过欤？窃观今日之法吏，或狃于公案，而不察乎情；或蔽于私贿，而不守乎法。或阿循曲从以为容，而不顾清议；或深文密比以为能，而不恤幽枉。坐加锻炼，肆为出入，甚至元恶怀奸者或以幸免，而轻罪涉疑者反不获宥。是以刑愈繁，而人愈犯也。昔虞廷以明刑命皋陶，周公以敬狱戒苏公，良有由哉！臣愿陛下遴选仁恕明决之士，以司刑狱，纵未能得如皋陶、如苏公之辈，亦必得人如汉之于定国，唐之徐有功，而守法持平，民以不冤矣。奸顽乌有不惩艾乎？

凡是数者，皆在得人。有其人，斯有其政矣。今自国都以至郡县，

百司庶府，文武具足。科目之选拔者，三年而一举；军功之序迁者，一级而必录。故济济之众，官有余员，然政之不举，犹劳圣虑。臣尝考之《书》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庶政惟和。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视夏商，不啻数倍，而用乂之效，未始加隆。迹其弊由，岂非承平日久，人情舒缓，饱暖于凤仪兽舞之下者，徒习安逸而事因循，有如陛下之明谕乎？兹欲严以督之，则嫌于峻刻，而人情有难堪。将宽以待之，则流于姑息，而治理有难成。酌古今之宜，以求宽猛之中，而为今日措置之善，惟在圣心一转移之间，有余裕矣。而乃下询愚臣，顾臣浅陋，曷足以上揆渊衷，而敢妄言乎？

虽然，上有求言之君，而臣有所欲言而不言者，是负陛下也。臣窃以为，陛下一身，实四方万姓之表率，百司群僚之权度也。修身之道，苟有未备，则用舍举措之间，将不胜其眩瞀矣。盖正邪忠佞，杂进于前，非至明不能察也；远近疏戚，纷列其中，非至公不能辨也。至公至明，不自陛下修身中来邪？故臣愿陛下，修身以正天下之本，必明足以周万物，而公足以溥四海，则其取人也，不啻如权之称物，而轻重不失于锱铢；不啻如度之度物，而长短不失于尺寸。于是而举夫忠良端实、有为有守者而器使之，则所谓任官惟贤、位事惟能者有矣。于是而辨夫奸邪谗佞、寡廉鲜耻者而罪斥之，则所谓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者有矣。用舍之间，宽严以具。何也？任贤勿贰，疑若宽而宽，足以为天下劝；去邪勿疑，似乎严而严，足以为天下惩。宽严焉有不得其中，百官焉有不得其人？俊乂在官，庶政惟和，而雍熙泰和之治，焉有不隆于今日也哉！

陛下策臣以致治之道，臣既以用贤为要，修身为本，陈之于前矣。然又窃谓陛下之修身，亦有本焉，有要焉。修身之本，在乎正心，而其要不外乎居敬穷理。盖心者身之主，四体之所禀令，万事之所由出者也。心一放焉，则昏昧杂扰，而不能检其身。故居敬者，所以收敛此心之放也。心不尽焉，则偏狭固滞，而不知检其身。故穷理者，所以极尽此心之全也。收敛此心于端庄静一之中，以为穷理之基；穷究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以致尽心之功。巨细相涵，动静交养，然后心之所在，纯乎义理之正，而一毫之私，不得以杂其至公至明之天。由是

而见诸四体者，无不中乎节；由是而施诸万事者，无不得其宜。修身之道，端在于此。

伏望陛下万几之暇，数引儒臣，讲明圣学，察天地万物之理，求古今治乱之迹，而兢兢业业，夙夜祗勤，如制策之所云谕者，终始无间，则清明在躬，志气如神，而心无不正，身无不修矣。何患乎贤才之不为用哉？又何患乎上下之不给足，风俗之不淳美，四夷之不宾服，中国之不乂安也哉？臣草茅微质，学不足以传古，智不足以通今，惟因圣问所及，谨竭愚陋以献。干冒天威，不胜战惧之至，伏惟陛下少垂采纳焉。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君主打算实现天下大治，必定要在于任用贤才；打算获取到天下的贤才，必定要在于修养好自身。因为修养好自身，是任用贤才的根本；而任用贤才，又是实现大治的关键。获取不到这个关键，就会政令虽然完备，但不足以形成治理的功绩；端正不了这个根本，就会任用和舍弃官员尽管很殷切，但不足以获取到贤能的臣僚。所以对古代圣帝明王的隆盛治绩怀有志向，就不能不求取到那个关键；对古代圣帝明王的关键做法怀有志向，就不能不探求到那个根本。君主确实能够把修养好自身作为根本，获取到天下的贤才来使用他们，使用他们就能够使国家富足，而田野一天比一天得到开垦，贡品和赋税就没有不充足的忧虑。使用他们来培育人才，而学校一天比一天兴盛，社会风气能有大变的美好局面。使用他们来振扬军队，而四周部族就前来归服。使用他们来端正刑罚，而所有百姓就远离犯罪。由此而实现兴盛和美的大治景象，接续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况，就不困难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贤能圣明的君主创建基业、传下帝位一脉相承的统系，靠的就是这个；而继承帝位、守护文德教化而在前人功业面前没有惭愧之处的君主，靠的也是这个。哪里会有舍弃掉修养自身而去任用贤才，却能形成天下大治的事情呢？

只有我朝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在淮河地区崛起，缔造了华夏，设置官员，定立起国政，留传给后代永无尽头。我朝各位圣明的先帝递

相承接,任用贤才,实现大治,深厚的仁德和恩泽,传播扬布到四海以内。天下敲击土块在大路上讴歌太平,敲鼓跳舞庆祝神妙的教化,到现在已经一百年了。陛下凭借耳聪目明、通达机智的天资,继承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正统地位,纯一的德行感通上天,各类贤才效力供使用,励精图治,从早到晚都顾不上休息。前些时候天象稍微有些奇异,显示警告,立即就自我承担罪责,每天召引大臣,当面商讨治国的纲要。臣下我由此知道陛下真是大有作为的君主,真是好多年代才会出世的君主。可以承接唐尧虞舜而超过夏商周三代,可以发扬光大前代的功业而给后世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可以为天地确立起心愿,为百姓支撑起性命,为亿万年开辟出太平永无尽头的美好局面了。但仍然不自我满足,又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赐给明晰而又详尽的询问。首先用周成王和周康王、汉文帝和汉景帝继承帝位、守护文德教化的治绩作询问,又忧虑现今还没赶上他们;接下来又用土地税、学校、屯驻军队、刑法这几件大事来询问,又疑虑任用官员还没收到成效;最后用我们这些考生一定会有关键办法的一句话来寄予希望。这是打算求取那要领,探寻那根本,来形成兴盛和美的大治局面。臣下我由此又知道陛下的这种心愿,就是尧舜向割草打柴的人做询问、向众人做考察的深厚用心啊!臣下我虽然愚昧到极点,敢不敬行叩拜大礼,来对答称扬圣明天子的美好诏令吗?

私下想来,上天降生下人间这些百姓,但不能靠自身去治理,所以一定要为他们设立君主;君主掌管世上这些百姓,但不能靠自己一个人去治理,所以必定要仰仗臣僚。假如统治天下却获取不到贤臣,就没依凭构成辅佐治理的工具。打算任用贤才却不修养好自身,又凭什么构成择取人选的标准呢?所以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像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开创陶唐氏、有虞氏和夏商周三代的宏大规制,制定出千秋万代统治世人的重大法则,未尝不通过修养好自身来任用贤臣才达到这样的啊!至于继承帝位、守护文德教化的君主,像夏启能够恭敬地承用大禹的做法,但还要依靠伯益的辅佐与协助。商朝太甲恭敬地继承了建立大业的祖父成汤的德行,的确仰赖阿衡伊尹的匡正挽救。他们能够弘扬祖先的功业,达到盛明治理的

原因，谁说不是出自修养好自身，不是把任用贤才放在首位呢？但是夏启的事业，不久就被太康废弃掉了，不能够妥善处理好身后的事情。太甲的贤明，不像成汤，不能够妥善解决好起始阶段的事情。他们政治和教化的深入人心，都比不上周成王和周康王的长久，因为周成王继承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功业，而周康王又接上了周成王的美好政局。周成王在德行上特别敬慎和勤勉，从早到晚都像赶不上的样子。周康王敬畏忌讳上天的威严，不敢胡乱超越。他们修养好自身的谨慎态度和做法，是同一种常规。太师、太保、太傅和少师、少保、少傅，讲论治国大道又弘扬教化；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和九州的最高地方长官，划分职责又全部协和。他们获得到人才的盛况，是同一条途径。所以教化和养护全都具备，而亿万民众确实安定；武力和刑罚不动用，而距离京畿地区三千里以内按每隔五百里划分的诸侯邦国全都承奉德教。撰写正史的官员唯独称述周成王和周康王，确实是有根据的了。

自此以后，汉朝开始兴起。汉文帝和汉景帝父子前后登上帝位，务必用仁德来进行教化，让民众休养生息。像要在宫内修建露台而痛惜费用就停建，官员接受贿赂反而再给他送去钱物让他内心感到羞愧，汉文帝恭敬节俭和崇尚仁德大都像这类情况。而汉景帝也能够恭敬节俭，不予改变。像把坐席往前挪动来听取贾谊的建议，拍大腿想得到战国李牧那样的良将，汉文帝任用人才、谋求治理大都像这类情况。而汉景帝也能够任用人才，不加以改变。所以数十年间，四海之内富庶，百姓们纯朴厚道，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的地步。撰写正史的官员认为他们的治绩同周成王、周康王差不多，也是具有缘由的。然而周成王与周康王德行完备，任用贤才，像那样地达到极限，而汉文帝却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礼仪乐舞都没顾得上制定。回避对后妃家族中的人的忌讳，不让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当辅政的大臣；听从武夫周勃等人的挑拨离间，不重用年轻有为的贾谊。他比照起周成王、周康王的德行完备，任用贤才，已经产生差距了。至于汉景帝凭借苛刻又不讲恩义的资质，耍弄控制和驾驭臣僚的小聪明。优待并纵容骄奢淫逸的胞弟梁孝王刘武，废掉太子刘荣，

在家庭内部的恩义上已经是厚薄不符合常规。又腰斩御史大夫晁错,杀害太尉周亚夫,在君臣关系的准则上已经是背离亏缺得很厉害了。他比照汉文帝的宽厚谦恭,已经差一等了,又哪里能够同周成王、周康王相提并论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顺应保持鼎盛状态、守护已有成就的国运,竭尽继承先人功业的诚意,政令的施行,完全遵用原有的法规和事例。这实在是因为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原有法规与事例,也就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已经行用而周成王、周康王加以继承守持,以及汉文帝、汉景帝仅仅获取到其中有效部分的那些东西啊!既已完全遵照施行,就理所当然地教化和养护百姓具有办法,安定内部和驱逐外敌具有对策,而最高治理的美好局面,与古代同样地隆盛了。但是陛下仍然自己认为治理的效果还不特别显著,从而疑虑时代存在着古今的区别,所以效果也有深广和肤浅的差异。这又是商汤检查自己总像是做晚了、周文王已经获取到大道仍旧盼求大道却像还没看见的那种心意啊!臣下我愚昧地认为,当今的天下也就是古代的天下,时代具有古今,心念却没有古今。陛下果真能保存住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那样的心念,按照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做法,选拔真正的人才,信任而不怀疑他们,采纳正直的言论来扩展视听范围,斥退谗毁奸邪的小人来固定住心志,那就会治理效果特显著,眼看着超过周成王和周康王,而汉文帝与汉景帝根本就不值得一提了。还有什么古今功效的深广与肤浅真让人值得忧虑呢?

打算实现天下大治,同古代一样隆盛,重要的方面有四个,也就是土地税征收、学校、军队驻防和刑法。这四个方面不整治好却想实现大治,就如同舍去船桨要渡过江河,放下农具去耕种土地,绝对是无法做到的。这就难怪圣上的策问提到这些方面的问题。其中土地税的征收,目的是养护百姓而使国家富足。朝廷和民间都充裕富足,这才有资格讲论治理。这正是古代圣帝明王重视土地税征收的原因。夏商周三代的土地税,具有贡纳实物的方式,具有助耕公家土地的方式,具有交纳总产量十分之一的方式。那时养护百姓,使国家富

足的做法，仍然可以考索出来。我们国家因时制宜，丈量土地，确定赋税。田地依据民户已经占有的数量，而荒芜的土地任凭各户去开垦；赋税计量田地的收入，而由官府组织开垦的荒地，允许农民租借耕种。田地不允许随便侵占，赋税不允许增加或减少。征收和交纳责成各个府、县办理，由水路运往京师交给各地卫、所负责。土地税的征收制度，不是不详明了。而陛下在登上帝位的当初，就亲自在天子专用的田地里耕作，来给农业生产做出表率，多次告诫主管部门，要体恤农业生产方面的事情。所以即使在深山远谷之中，也没有一尺半寸土地被荒废，田野称得上是垦辟了。然而贡品和赋税向朝廷提供上来的，有时却避免不了缺乏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臣下我愚昧地认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天下财富和赋税具有限度，而胡乱花费太严重、白领俸禄的人太多的缘故。增加财富的办法，一定要享用的人少，使用的地方缓慢。无奈一个人耕作，却十个人聚到一块儿享用它；一百天才创造出来，却一天就把它全都浪费消耗光了。这怎么能不缺乏呢？

替当今做考虑，如果能够停止并不重要的事情，杜绝没有功劳的赏赐，禁止奇巧器物的制造，节省佛寺道观的费用，淘汰多余的官员，惩办游荡懈怠的士兵。一定要根据收入决定支出，不过度花费来损伤财富。那么天下的法定上缴的赋税，就没有不够使用的了。然而陛下拿这几方面的事情明确训示政府主管部门已有好多次了，但最终却没见到效果，这难道不是因为奉命执行的人没有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吗？臣下我希望陛下择用人才去管理民众，一定要像西汉的龚遂、黄霸那样当好太守，像东汉的卓茂、鲁恭那样当好县令，使众百姓都家家充裕，人人富足。同时又择用人才去掌管国家财政，使政府的支出具有固定的标准，领取国家俸禄的官员具有固定的人数。这样还忧虑什么财政用度缺乏呢？

学校的设立，目的是教化百姓，端正社会风气。社会风气淳朴美好，这才有资格讲论治理。这正是古代圣帝明王重视学校的原因。夏商周三代的学校，递相称为庠，称为序，称为学。那时教化百姓，使社会风气变美好的用意，仍然可以大致看得出来。我们国家考察古代，

定立制度，兴建学校，选立师长。在京师设有国子监，来造就天下的杰出人才；在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来培育一方的优秀人才。提供优厚的学费补贴来供养他们个人，免除徭役来优待他们的家庭。把训导教诲的任务责成师长和儒士来完成，把管理监督的责任交给监察御史来承担。学校方面的制度，不是不完备了。而陛下在登上帝位的当初，亲自视察国家最高学府，举行用酒和蔬果拜祭孔老夫子等先师的礼仪，多次命令监察御史们劝勉激励读书人的风气。所以咏唱吟诵《诗经》、《尚书》的声音，不存在遥远偏僻地区听不到的情况，学校可以称得上是兴盛了。然而在下面形成的社会风气，却越来越滑向浮华奢靡。这是为什么呢？臣下我愚昧地认为，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天下各地性情习惯原本不同，而在表面上花气力的人太多、重视内心修养的人太少的缘故。读书人对道德抱有追求，就重视内心修养，轻视表面那一套。无奈只是利用《诗经》、《尚书》这些经典做为升官发财的媒介，反而把道德正义看成是功名利禄的大祸害。这怎么能不浮华奢靡呢？

替当今做考虑，如果能够强化劝勉和惩戒的措施，宣明官职升降或罢免的法典，激励廉正又有羞耻心的节操，堵塞住投机钻营的门路。使科举和保送的人员选定特公正，取消向朝廷献纳马匹或粮食就可以到国子监听候选用的规定。使读书人在礼法道义上下气力来相互争个高低，不崇尚功名利禄。那么天下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很少再有不归向纯正的了。然而陛下拿这几个方面的事情督促学校已经时间很长了，但还没有见到成效，这难道不是因为教导和督察的官员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吗？臣下我希望陛下择用人才来主持学校教育，一定要像北宋胡瑗在苏州和湖州州学执教那样，像北宗程颐在武学负责教务那样，使读书人都形成品德，练就才干。同时又择用人才来负责对人物优劣的衡量鉴定，使浮华轻薄的家伙没办法侥幸当上官，使厚重诚实的人士常常得到重用。这样还忧虑什么社会风气浮华奢靡呢？

至于军队，是用来威震天下的。军队不设置，叛逆和作乱还有什么会感到害怕的呢？这是古代圣帝明王不得不掌握管理军队的原

因。我们国家定有军事制度。在京师，负责保卫皇宫和都城的士兵轮流按固定日期成批来到，听从都督府所布置的训练；在边境，屯驻在关隘和要害的士兵，连结成堡垒来守卫，接受边区将领的指挥。对前来劫掠人口和财物的敌军必须要追击，绝不准放跑他们；对俘虏擒获的敌军必须要斩杀，决不许饶过他们。用来防御外部侵扰的办法，也不是不谨慎了。然而落后部族还没全都畏惧后退，这还不是我朝担任将领的人的罪过吗？私下观察当今的将领和督臣，有的出自富贵人家的子弟，手上根本就不会使用兵器；有的得自门路钻营和讨好献媚，连最简单的几个字都不认识。有的虚报战功得到提升，不足以让士兵心里感到服气；有的面临战事却躲藏逃避，不足以振作起士兵的勇气。白白坐在那里掌管兵权，白白耗费掉军费兵饷，甚至在刀枪弓箭中出生入死的人，却降低对他们的奖赏，而安居保养自身的人常常窃取他们的功劳。因此部队人数虽然很多，但威力却振扬不起来啊！从前虞舜讨伐三苗，必定要任命大禹做统帅；周宣王讨伐猃狁，必定要任命尹吉甫做统帅，这确实是有理由的呀！臣下我希望陛下慎重选拔明智、仁爱、诚实、勇猛的将士，来统领部队。纵使不能够获得到像大禹、尹吉甫那样的人物，也必定要获取到像西汉赵充国、唐朝郭子仪那样的将帅，从而就像当年先零人被围困而毫无办法挣脱，回纥人环绕四周来下拜了。这样落后部族哪里还有不畏惧后退的呢？

刑法是用来禁断天下的。刑法不使用，内外为非做歹的人还有什么会恐惧的呢？这是古代圣帝明王不得不制定和施用刑法的原因。我们国家定有司法制度。在朝廷设有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来会同审理天下的案件，而重大的案件必须奏报给皇上决定。在地方上，设有按察司，来负责一方的刑法执用，而冤枉的人允许他们申辩明白。多次犯法而不悔改的人，对他们在刑律上定有明确的惩办条款；故意放过罪犯的官员，对他们国家定有明确的处罚办法。用来肃正内部的措施，也不是不严密了。然而奸恶和顽固不化的分子，还没有全都感到戒惧，这还不是负责刑法的人的过失吗？私下观察当今的法官和办事人员，有的对常规性的案件习以为然，却不去察断具体案件的情由和情节；有的被私下的贿赂所买通而故意瞎判，不遵守法律条

文。有的循私讨好，曲意顺从，把这当成是宽恕仁厚，根本不考虑社会上的公正议论。有的寻找各种理由硬往法律条文上套，把这当成是本事，根本不体念蒙受冤枉的人。凭空就找出一条律文判定谁有罪，肆意决定罪重与罪轻或有罪与无罪。甚至属于罪魁祸首而要推翻朝廷的人，有的却侥幸获得释放，而所犯罪行很轻微或被列入怀疑对象的人，反而得不到宽恕。所以刑法越繁琐细密，而人们就越触犯。从前虞舜当天子时用宣明刑罚来命令大法官皋陶，周公用慎重对待审案判刑来告诫苏公，这确实是具有理由的啊！臣下我希望陛下选拔仁慈、忠恕、明智、果断的人士，来掌管刑法和审案。纵使不能够获得到像皋陶、苏公那样的人物，也一定要获取到像汉朝于定国、唐朝徐有功那样的官员，从而遵守法律，执持公平，老百姓由此而就不蒙受冤枉了。这样奸恶和顽固不化的分子哪里还有不戒惧的呢？

总共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政事，全都在于获得到合适的人选。有了合适的人选，这才会有相应的国政了。如今从京师一直到各个郡县，所有政府机构和官署的文臣武将一个也不缺。通过科举考试而选拔的人，每隔三年就进行一次举用；按军功逐级提升的人，每一级都必定登录晋升。所以济济一堂，官员具有多余的人员，但政务却振作不起来，还要烦劳圣上多做思虑。臣下我曾经考察《尚书》，其中说道：尧舜验核古代，设立官职只有一百个，各项政务都很协调。夏朝和商朝设立官职是尧舜时期的一倍，也能够任用优秀的人才。如今比照夏朝和商朝，不止是好几倍了，但任用优秀人才的效果，却未曾扩大。追寻这种弊端产生的原因，难道不是太平的时间一长久，世人的心思就放松迟钝，在凤凰成对来到、百兽起舞的局面下吃得饱、穿得暖的人们，只是对安逸习以为常，事情都按老套子办，就像陛下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吗？如今想要严厉督促，就会在严峻苛刻上产生嫌疑，而世人的思想承受不了。打算宽缓来对待，就会陷入无原则的容忍中，而治理形成不了。斟酌古代和当今的合适做法，去谋求宽大和严厉的恰切尺度，作为现在处理解决的妥善办法，只在圣上心念的一转变之间，就有很大的余地了。可竟然往下询问愚昧的臣下我，但臣下我很浅陋，哪里足以往上揣测圣上的深沉用心，竟敢胡乱言说呢？

尽管如此，上面有求取言论的君主，而作为臣子怀有要讲的话语却不讲，这是辜负陛下啊！臣下我私自认为，陛下一个人，实际上是各地百姓的表率，是各个部门全体臣僚的标竿啊！修养好自己的办法，如果存在着还不完备的地方，就会在选取和舍弃谁、怎样提拔和安置之间，出现一个接一个的昏乱了。因为正直的人和邪恶的人，忠诚的人和献媚的人，夹杂在一起来到面前，不是最为圣明就无法察辨出来。关系远的人和关系近的人，生疏的人和熟悉的人，杂乱地分布在里面，不是极其公正就无法辨别出来啊！极其公正，最为圣明，又不是从陛下修养好自身中得来的吗？所以臣下我希望陛下，修养好自身来端正天下的根本，必定要圣明足以了解一切事物，而公正足以遍布到四海以内。这样一来，选用人才就无异于用秤盘来称量物品，而轻重不差一丝一毫；无异于用尺码来比量物品，而长短不差半寸半分。于是选拔出忠诚贤良、端庄朴实、既有作为又遵守天子所确立的行为最高准则的人，并且重用他们，那么古代所讲的任用官员只看贤德，安排职位只看才能，就占得上了。于是察辨出奸诈邪恶、谗毁讨好、一点儿廉耻心都没有的人，并且惩治和斥退他们，那么古代所讲的官职不授给自己所亲昵的人，爵位不封给德行恶劣的人，也就占得上了。在任用和舍弃之间把宽大和严厉都兼顾到，指的是什么呢？任用贤才不再改变主意，看起来像是该宽大而真就宽大了，由此足以成为对天下的勉励；斥退邪恶小人不再觉得不对头，看起来像是该严厉而真就严厉了，由此足以成为对天下的惩戒。这样宽大和该严厉哪里还有获取不到最恰切的尺度的呢？百官哪里还有获取不到合适的人选的呢？优秀人才都在朝廷和地方上任职，各种政务都十分协调，而兴盛和美的大治景象，又哪里不在今天更隆盛呢？

陛下用实现大治的原则与方法来策问臣下我，臣下我已经拿任用贤才是关键，修养好自身是根本，在前面做了陈述了。然而又私下认为陛下修养好自身，也有根本，也有关键存在着。修养好自身的根本，在于端正心念，而那关键超不出保持恭敬和穷尽事理之外去。因为心念是全身的主宰，是四肢接受命令的地方，是各种事情要去做的根源。心念一旦放纵开来，就昏昧烦杂乱糟糟，而不能够检查自身。

所以保持恭敬，是用来收拢住这个心念的放纵。心念不充分地扩张开来，就会偏向一边、狭窄和顽固不化，而不知道检查自身。所以穷尽事理，是用来极尽这个心念的整体。在端庄、宁静、专一中来收拢住这个心念，作为穷尽事理的根基；在学习、询问、思索、辩析的过程中来穷究那个事理，来实现充分扩张开心念的功效。大事和小事相互包涵，行动和静止交相养护；然后心念所到达的地方，纯粹都是纯正的义理，而一丝一毫的私意根本就没办法夹杂在极其公正、最为圣明的天然状态里。由此而在四肢上表现出来的动作，没有一样不符合规范；由此而在各种事情上施布的东西，没有一样不合适。修养好自身的原则与方法，恰恰就在这里。

跪拜希望陛下在处理繁忙政务的空隙里，多次召请儒臣，讲论阐明圣人的学问，察辨天地和万物的道理，探求古今大治和动乱的演变过程，小心翼翼，戒惧谨慎，从早到晚恭敬勤勉，就像圣上策问中所指示的那样，由始至终不出现间断，就会清明集中在自己身上，志气如同神灵，而心念无不端正，自身无不修明了。这还忧虑什么贤才不被使用呢？又忧虑什么朝廷和民间财物还不充裕富足，社会风气还不淳厚美好，四方部族还没有全部归服，中原地区还不安定呢？臣下我是一个民间微不足道的读书人，学问不够用来传接古代，智慧不够用来通晓当今，只根据圣上策问所涉及到的事情，恭敬地竭尽那愚昧浅陋来做献呈。触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跪拜只请陛下稍微赐恩，多少采纳它。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李仁杰　殿试对策

李仁杰(1432～1483)　字唐英，改字士英，莆田(今属福建)人。成化八年(1472)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时年41岁。后卒于官。

臣对：臣闻之《易》曰：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人君则天之经，虽万乘之尊求言于天下，不为屈。人臣法地之义，虽匹夫之贱陈言于上，不为僭。然上之求言，所以资乎治也；下之陈言，可不切

于治乎？夫治莫切于田赋、学校与兵、刑之政，四者兼举，则治道之大端以备。故有虞氏之君天下，即命弃为田正之官，契任司徒之职，伯禹征有苗，皋陶为士师，其意盖在是也。

恭惟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备圣神文武之德，茂膺骏命，嗣大历服。临御以来，励精图治，孜孜乎继体守成之道。其于治道之大，已无不尽，而见诸治效者，亦已隆矣。而犹不自满假，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举成康、文景之治，次及教养兵刑之政，而欲求其要道。此固陛下则天之经、求言资治之意也。顾臣庸愚，虽不足以奉大对，然法地之义，陈言辅治，亦臣区区素分之所当然。敢不俯竭愚衷，以少裨于万一乎？

臣惟上天以天下而付于一人，人君治天下而运以一心。心者，万化之原，致治之本。古昔帝王之所以致盛治，弘先烈，孰不本于此乎？《大学》以正心为家国天下之本，董子以正心为朝廷四方之则，正以是耳。自今言之，舜承尧执中之传，而跻斯世于雍熙；禹绍舜传心之统，而措天下于康乂，固卓乎其不可及矣。若启能敬承大禹之道，太甲嗣守成汤之业，太戊之敬天勤民，高宗之嘉靖殷邦，以至盘庚之绍复大业，底绥四方，是皆本诸心以弘先烈者也。而史臣独以成康、文景并称，何欤？盖成康当殷民甫定之初，而能致兆民阜厚，天下化成，四方无虞，刑措不用，其治可谓盛矣。推其本，则一以图政恤殷为心也。文景承高帝开基之后，而能致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匈奴远塞，几致刑措，其治亦足称矣。推其原，则一以恭俭爱民为心也。由是观之，则其致治之本末，固可见矣。然成康之治，纯乎纯者也；文景之治，杂而未纯者也。以文景而视成康，犹武夫之于美玉，虽不可以概论，而一时治安之效，有足尚者。此其所以并称欤？

洪惟我朝，一祖四宗，圣圣相承，以武功定天下，以文德致太平。均田给民，所以足民食也；建学立师，所以复民性也。制外有兵屯之广，所以卫民生也；肃内有律令之详，所以防民伪也。百年以来，上下足而风俗美，外夷服而中国安。其治效之隆，盖将超三代而并唐虞矣。揆厥所元，讵非本于圣心一念中来乎？陛下绍列圣之休，膺民社之重。一政之施，惟成宪是遵；一令之布，惟旧章是由。夙夜祗勤，丕

图治理，将来治效之盛，可与尧舜比隆，而区区成康、文景之四君，风斯下矣。未可以世有古今，效有深浅，致疑于其间也。

惟陛下既有志于帝王之治，则当求乎帝王之心。得其心，则治固有是矣。夫所谓治，不外乎贡赋足、风俗美、外夷服、中国安之四者而已。是故田野不辟，贡赋无所出；学校不兴，风俗无由美。是田野者，贡赋之原；学校者，风俗之本也。方今幅员之内，阡陌相连，而藉田有劝率之规；郡邑之内，学制漫备，而辟雍有临幸之举。其所以辟田野、光学校之意，亦云至矣。兵屯不谨，无以制乎外；刑法不严，无以肃乎内。是兵屯者，制外之要；刑法者，肃内之具也。方今选将练兵，以威远夷，而防御边患之有术；制刑立法，以教祗德，而防范人心之有具。其所以制夷狄、肃奸顽之道，亦云备矣。宜乎治无不成，效无不彰也。然而上下未免于匮乏者，财赋之出有限而用无穷也；风俗益至于浮靡者，学校之教有名而实不足也。外而夷狄未能使之畏却而不敢侵，非典兵者委靡之过欤？内而奸顽未能使之惩艾而不敢犯，非司刑者姑息之过欤？虽曰官不缺人，人才日盛，然承平岁久，逸欲易生，而因循之余，怠缓必至，岂能免四者之弊哉？

陛下诚欲恢弘治理，比隆前古，惟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循名以责实，因事以考成。轻则加之赏罚，于以作其勤而起其怠；重则严以黜陟，于以惩其过而旌其能。去因循之弊，行维新之政。使辟田野者，皆如有虞之任土作贡，因田制赋，则万邦有惟正之供矣，何匮乏之足虑？职学校者，皆如有虞之敬以敷教，宽以待民，则百姓有亲睦之美矣，何浮靡之足恤？《书》曰咸则三壤，成赋中邦，又曰弘敷五典，乃罔不正。此之谓也。使任边务者，皆如有虞之柔远能迩，诞敷文德，则蛮夷自尔其率服矣，何侵凌而不畏却？司刑法者，皆如有虞之明刑弼教，期于予治，则四方自尔其风动矣，何干犯而不惩艾？《书》曰明王慎德，四夷咸宾，又曰刑期无刑，民协于中。此之谓也。夫惟正之供，贡赋足矣；百姓亲睦，风俗成矣；蛮夷率服，远人化矣；四方风动，中国安矣。唐虞三代之治，端不外此。尚何复有所施为，而后能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域也哉！

是知为治固在于用人，取人则在于君身；其所以修身用人之本，

又在于一心。《传》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即心之谓也。陛下心乎用人,则选拔有道,而在位无非贤;心乎图治,则设施合宜,而其效无弗著。人不待于督责而职自举,政不待于更张而治自成。雍熙泰和之盛,由此而可跻矣。苟不此之务,徒欲严以督之,则法愈严而害愈甚;宽以待之,则恩愈宽而弊愈滋。虽欲言治,皆苟而已。

臣学不足以考古,识不足以通今,姑摭所闻,而略陈之如此。然臣子拳拳爱君之心,尤有不能已者,故于篇终复有陈焉。窃惟天道不已,圣人法天道而行,亦贵乎不已。何也?夫为数起于一二,其不已也,虽万物之多,可以计焉。为度起于分寸,其不已也,虽八表之广,可以揆焉。今陛下则天之经以求言,固足以致盛治,弘功业;使此心或已,则治亦止于是矣。

臣愿陛下,体至诚无息之心,运纯亦不已之妙,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上下虽足而犹若未足,风俗虽美而犹若未美,外夷虽服而犹若未服,中国虽安而犹若未安,必求如古昔帝王雍熙泰和之盛而后已。夫如是,则陛下之心,即祖宗列圣之心,即尧舜汤武之心。其妙用精微,可以绍述前闻而无间。陛下之治,即祖宗列圣之治,即尧舜汤武之治。其成功烜赫,可以追配往哲而无愧矣。况天下之治,不进则退。必常加奋庸不已之功,乃有日进无疆之效。陛下春秋鼎盛,志气如神,其可不知所以自励哉!若曰吾治已足,少自满假,则非圣人法天图治之诚矣。

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臣学孔孟者也,谨以心之一言,为陛下献。若夫骋夸词以希宠,张浮言而无用,固非愚臣之志,亦非陛下策士求言之盛心也。干渎天威,不胜惴栗。伏愿垂仁采纳,则愚臣幸甚,天下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周易》中讲过:上天的自然定律是往下生成万物而大放光明,大地的自然定律是位置卑下而往上与上天相配合养育万物。君主效法上天的定律,即使是尊贵得拥有万辆兵

车，但往下面求取言论，也不属于降低了身份。臣子效法大地的义旨，即使是卑贱得就是一名普通男子，但向上面陈奏意见，也不属于超越了等级规定。然而上面求取言论，目的在于对治理国家具有补益。下面陈奏意见，却能够不与治理国家相切合吗?治理国家，没有比土地税征收、学校、军队、刑法等政务更为紧切的了。这四项同时施行开，治国大道的主要方面也就齐全了。所以虞舜统治天下，马上就任命弃担当主管农业生产的长官，让契担任司徒这一主管民政的职务，让大禹统率军队去讨伐三苗，让皋陶担任大法官。他的意图就在这里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禀承耳聪目明、通达机智的天资，具备圣明神奇、有文有武的品德，勉力承当上天的命令，继承帝位。自从登基以来，励精图治，对继承帝位、守护已有功业的原则与方法勤勉不倦。在治国之道的重大方面上，已经没有做得不特别好的了，而在治理效果上显现出来的东西，也已经十分隆盛了。但仍然不自我满足，竟然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赐给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首先列举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治绩，其次谈到教化和养护民众、军队和刑法等方面的政务，由此而打算求取那关键的做法。这压根就是陛下效法上天的定律来求取言论、对治国能有补益的用意啊!然而臣下我太平庸愚昧，尽管不足以承奉在朝廷这种场合上的对答，可是效法大地的义旨，陈奏意见，辅助治理，也是臣下我按小小本分应该去做的。敢不竭尽那愚昧的心里话，以便稍微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吗?

臣下我想来，上天把天下交付给君主一个人，君主治理天下，就来运用那整个的心念。心念是各种教化的本原，是实现大治的根基。古代圣帝明王达到盛明的治理状态，弘扬前代的功业，其原因有哪一个不是依据这一点呢?《礼记·大学》把端正心念作为家族、国家和整个天下的根本，西汉董仲舒把端正心念作为朝廷和天下各地的准绳，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罢了。从今天讲论起来，虞舜承受唐尧关于执持住不偏不倚的那个尺度的心法传授，而把当时的社会带入到兴盛和乐的境地；大禹继承虞舜传授心法的统系，而把

天下推进到安康的状态，固然是十分突出而无法赶上他们了。至于夏启能够恭敬地继承大禹的治国之道，商朝太甲能够接着守护成汤的功业；太戊敬奉上天，为民众操劳；高宗使商朝美善安定，以至于盘庚继承和恢复大业，达到安定四方。这都是依据心念来弘扬前代的功业啊！但编写正史的官员唯独把周成王与周康王同汉文帝与汉景帝并称，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周成王和周康王正当殷朝遗民刚刚服从统治的初期，但却能够实现亿万民众财物富足，天下教化形成，各地没有突发的事件，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他们的治理可以称得上是隆盛了。推究他们的根本，就是完全把谋划政事、谨慎处置商朝遗民作为心念啊！汉文帝和汉景帝承接在汉高祖创建基业的后面，而能够实现四海之内富庶，众百姓纯朴厚道，匈奴远远离开汉朝边塞，几乎做到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他们的治理也足以值得称述了。推究他们的本原，就是完全把恭敬节俭、爱护百姓作为心念啊！由此来看，这四位帝王实现大治的来龙去脉，固然是可以看出来了。然而周成王与周康王的治理，属于纯正又纯正的情况；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治理，就属于仁政中夹杂着暴力而不纯正了。拿汉文帝和汉景帝来比照周成王与周康王，就如同似玉的石头面对着美玉，尽管不能够相提并论，但一时间治理安定的成效，存在着足以让人推崇的地方。这是他们并称的原因吧？

只有我们伟大的明朝，从太祖到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各个圣明的君主递相承接，凭借武功平定天下，依靠文德实现太平。分配田地，使民众宽裕，目的是让百姓的吃穿很充足；兴建学校，择立师长，目的是恢复百姓的善良天性。控制住外部，布置下范围广泛的屯驻部队，目的是保卫民众的生计；肃正内部，定立有详明的法律条文，目的是防止百姓的奸诈行为。一百年以来，朝廷和民间都富足，社会风气也美好，四周部族全归服，中原地区又安宁。这种治理效果的隆盛，差不多就要超过夏商周三代而和唐尧、虞舜时期并列了。追寻根源，难道不是从圣明心地、专一念头中得来的吗？陛下继承各位圣明先帝的美好功绩，承担起天下百姓和江山社稷的重托。每一项政事的施行，只是遵守原定的法则和事例；每一

道命令的颁布，只是按照旧有的规章来办理。从早到晚恭敬勤勉，极力谋求治理，眼看着就实现治理效果的隆盛，可以同尧舜比试一番，而小小的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这四位君主，就全都退居下风了。决不能够依据时代有古今，效果有深广和浅陋，就在这上面产生疑问啊!

只因陛下对古代圣帝明王的大治景象已经怀有赶上的志向，那就应当求取到古代圣帝明王的心念。获得到那种心念，治绩原本上也就会形成那个样了。人们所说的治绩，不超出贡品和赋税充足、社会风气美好、四周部族归服、中原地区安宁这四个方面罢了。所以田野得不到开垦，贡品和赋税就没有来源；学校不兴盛，社会风气就没办法变得美好。这表明，田野是贡品和赋税的来源，学校是社会风气的根基。如今整个辖区以内，田地一片连着一片，而天子专用田地又有亲自耕作来带头鼓励农业生产的良规。各个郡县里边，学校制度逐渐完备，而国家最高学府又有天子亲自驾临的行动。用来开垦良田、扩展学校的用意，也可以说是达到极点了。军队屯驻不慎重，就没办法控制住外部；刑法不严明，就没办法肃正内部。这表明，军队屯驻是控制住外部的关键，刑法是肃正内部的有效措施。如今选用将帅，训练部队，来威慑远方的部族，而防备抵御边境祸患具有方法了。制定刑罚，确立法律，来教育全社会敬重德行，而防范人们的邪恶思想具有措施了。用来控制四周部族，肃清奸恶和顽固分子的对策，也可以说是相当完善了。这就难怪治理无不成功，效果无不显著啊!然而朝廷和民间还避免不了财物缺乏，原因是财物和赋税的创造具有限度而使用却没有节制啊!社会风气越来越滑向浮华奢侈，原因是学校教育光有虚名而实际却做得很不够啊!在外部，四周部族还未能让他们畏惧后退而不敢侵扰，这不属于统领军队的人萎靡不振的过失吗?在内部，奸恶和顽固分子还未能使他们戒惧而不敢犯法，这不属于掌管刑法的人无原则地容忍和迁就的过失吗?尽管说官职并不缺乏胜任的人选，人才一天比一天兴盛，然而太平的年月一长久，安逸和各种欲望容易产生，而在一切照老样子办事的后面，懈怠和拖拉必定会来到，哪里能够

避免掉上述四个方面的弊病呢?

陛下果真打算好好来一番治理，同古代比试隆盛，只有端正起自己的心念去端正朝廷，端正起朝廷去端正百官，按照名分，去查验本该完成的工作，根据事迹，来考核实际的政绩。对政绩一般或失职轻微的，就加以赏赐或处罚，用来激励他们的勤勉，改变他们的懈怠。对政绩突出或失职严重的，就进行升降或罢免，用来惩罚他们的过失，表彰他们的贤能。去除掉一切按老样子办事的弊病，推行使国运气象一新的朝政。使开垦田野的人，都像虞舜时那样依据土地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他们应交贡品的种类与数量，依据田地的等级制定赋税，这样就天下各地具有法定的献纳了，还有什么财物缺乏真让人值得忧虑的呢?让在学校负责的官员，都像虞舜时那样拿恭敬去施布教化，用宽厚去对待民众，这样就百姓具有亲近和睦的美好风尚了，还有什么浮华奢靡真让人值得考虑的呢?《尚书》中说：一律依照上、中、下三个等级的土地划分，在九州以内形成赋税交纳的标准。又说：广泛地施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道德教化，就没有哪个人不转向端正。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让负责边境防务的将帅，都像虞舜时那样安抚远方，优待近处，施布仁德和礼乐教化，四周部族就会自动顺从归服了，还有什么侵扰凌辱却不畏惧后退的呢?让掌管刑法的官员，都像虞舜时那样宣明刑罚，辅助教化，符合治理的纲要，天下各地就会自动闻风响应了，还有什么违反触犯而不戒惧的呢?《尚书》中说：圣明的国王慎重对待德行，四周的部族就全都前来归服。还说：设立刑罚是希望达到没有刑罚，老百姓都符合那恰到好处的最高行为准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只有法定的献纳，而贡品和赋税就充足了；百姓亲近和睦，而社会风气就形成了；四周部族全都顺从归服，而远方的人们就被教化了；天下各地闻风响应，而中原地区就安宁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恰恰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去。还需要再有什么筹划部署，然后才能够把这个社会带入到兴盛和美的境地中去呢?

由此可知，进行治理固然在于任用人才，但选取人才却在于君

主自身；君主用来修养好自身再去任用人才的根本，又在于那整个心念。解释经书的书籍中说：施行国政在于人才，选取人才依仗君主自身；君主凭借大道来修养好自身，又用仁德来修明大道。仁德也就是说的那个心念啊!陛下把心念集中在任用人才上，就会选拔具有准则，而担任职务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贤才。把心念集中在谋求大治上，就会筹划部署切合时势的需要，而具体效果没有一样不显著。官员们不等待督察验核就自动会做好本职工作，政务不等待变更改动就自动会治绩形成。兴盛和美的隆盛景象，由此就可以步入了。如果不在这心念上花气力，光想严厉地去督察他们，就会法令越严厉而危害越严重；光想宽厚地去对待他们，就会恩泽越宽厚而弊病越蔓延。即使打算讲论治理，也都是糊弄局儿而已。

臣下我学问不足以考察清古代，见识不足以通晓当今，姑且拾取所听到的东西，大致陈述成这个样子。然而臣下我热爱君主的那种十分恳切的忠心，更有无法停息下来的时候，所以在答卷末尾还有陈述。私下想来，天道运行永无止息，圣人效法天道来行事，可贵之处也在于永无止息。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计算数目从一、二开始，由此一直计算下去，尽管万物繁多，也是能够计算出来的。进行测量从一分、一寸开始，由此一直测量下去，尽管八方边际非常广阔，也是可以估计出来的。如今陛下效法上天的定律来求取言论，压根就足以实现盛明的治理，弘扬伟大的功业了。但假设这个心念有时止息下来，那么治理也就仅仅局限在这个地步了。

臣下我希望陛下，体察那一极为虔诚、永无止息的心念，运作起仁德纯正也永无止境的精妙之处。执掌这样的朝政，坚定得如同金石；施行这样的命令，诚信得如同交替到来的四个季节。朝廷和民间即使财物充足了但仍像还没充足，社会风气即使美好了但仍像还没美好，四周部族即使归服了但仍像还没归服，中原地区即使安宁了但仍像还没安宁，一定要力求和古代圣帝明王兴盛和美的大治局面完全一样，然后才算作罢。能做到这样，陛下的心念也就是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心念了，也就是尧舜和商汤、周武王的心念了。那种对精明隐微的道心的神妙运用，就可以继承前代帝王的

心治大法而没有阻隔了。陛下的治绩，也就是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治绩了，也就是尧舜和商汤、周武王的治绩了。那种功业的显赫，就可以追比并配得上古代的贤哲而没有愧色了。况且天下的治理，不前进就会往后退，必定要常常使出奋勉地弘扬前代功业而永不止息的力量，才会产生每天都有提高以至无穷无尽的效果。陛下正年富力强，志气如同神灵，哪里能够不懂得自我勉励的道理呢?如果上来却说：我那治理已经足够了。似此稍微地自我有所满足，那就不属于圣人效法上天、谋求大治的诚意了。

孔老夫子说过：臣僚用忠诚来事奉君主。孟子也说过：君子事奉君主，务必要用符合大道来引导自己的君主，把志向集中在仁德上罢了。臣下我是学习孔老夫子和孟子学说的读书人，恭敬地用心念这个词语来向陛下献呈。至于卖弄夸诞的文词来捞取到君主的欢心，宣扬浮泛的言论却没有实际用处，这压根就不是愚昧的臣下我的志向，也不是陛下策问读书人来求取言论的深厚用心。触犯亵渎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跪拜敬请陛下赐给仁恩，多少采纳一点儿，愚昧的臣下我就万分幸运，全天下也万分幸运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宪宗成化十一年(1475)乙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殿试策问

[成化十一年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人君，奉天子民。治道所当先者，养与教也。养民莫重于制田里、广树畜，教民莫大于崇学校、明礼义。今兹二者，行之既久，而实效未臻于极。何欤?岂任用未尽得人，而督劝作兴之道有未至欤?唐虞三代，田分井牧之授，学谨庠序之训，当时民有恒产，士有恒心，所以养之教之者备矣。其良法美意，皆后世所当讲者。可历举而言之欤?若汉唐宋愿治之君，未尝不留意于斯，而治效之成，卒不逮古。岂分田制产、兴学崇儒之意，视帝王为有间欤?朕承祖宗大统，抚临亿兆，于兹有年。夙夜兢惕，弗遑宁处，期于家给人足，教行刑措，礼乐兴而风俗美，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盛。果何道以致之欤?子诸生积学待用，必有至当之说，明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自己什么也不做而能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做了什么呢?他只是庄重端正地临朝听政罢了。

周公常想兼学夏商周三代的国王，来施行大禹、成汤、周文王与武王的政事。如果有的地方行不通了，就仰头考虑它，从白天一直想到晚上；如果幸运地想明白了，就高兴地一直从晚上坐到天明，准备马上施行。

要想做到亲近自己的亲属，不可以不了解贤人；要想了解贤人，不可以不懂得天道。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君主要敬奉上天，爱民如子，治国之道应该放在第一位的东西，是养民与教民。养民没有比划定田宅、扩大种树和饲养家畜更重要的；教民没有比重视学校、阐明礼义更重要的。如今这两个方面已经实行很长时间了，实际效果却没有达到最理想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任用官员没有完全获得适当人选，而督促、振兴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吗?尧舜和夏商周时代，田地按平坦、低洼来划分的井牧制度授给，学校加强各级教育，当时百姓有稳定的财产，士子有稳定的观念，用来养民教民的举措已很详备了。那些有效的措施和美好的意图，都是后世应该讲求的。可不可以列举出来谈一下呢?至于汉朝、唐朝、宋朝希望国家得到治理的君主，无不对此很留心，但治国成效，最终也比不上古代。难道是分授田地划定财产、兴办学校尊重儒士的用心，比起古代帝王还有差距吗?皇帝我继承祖宗的帝位，统治天下百姓，到现在已有年头了。日夜警惕，不敢安逸享乐，期望家家户户生活富足，教化推行而刑罚不用，礼乐振兴而风俗醇美，把当今社会带入到太平和美的大治境地。究竟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目标呢?你们这些学子积累学问，等待被国家使用，一定怀有最为恰当的见解，请明确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

谢迁　殿试对策

谢迁(1449～1531)　字于乔,号木斋,余姚(今属浙江)人。成化十一年(1475)状元。后入内阁,参预机务,官至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秉持风节,见事尤敏,天下称其为贤相。曾两度辞官归乡。83岁去世。著有《归田稿》。

臣对:臣闻为治之道,固贵乎有仁民之政,尤贵乎有仁民之心。盖仁心存于中,而后仁政达于外。使有其心而无其政,是谓徒善,徒善不足以为政。有其政而无其心,是谓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先儒程子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又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之谓也。仁政本之仁心,则内外兼举,本末不遗,而为治之道得矣。尚何虑教养未备,任用非人,而治效未臻其极耶?唐虞三代所以治隆俗美者,此心此政也。汉唐宋所以治不古若者,岂非徒有其政而无其心欤?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文武之资,绍祖宗列圣之统,恭己守成,虚心图治。虽深居九重之中,而念周四表之外。虑民生之或未厚,必欲皆安于饱食暖衣之天;虑民德之或未淳,必欲皆归于渐仁摩义之域。是以临御之初,他务未遑,首耕藉田,以示重农而务本;继幸太学,以示尊道而崇儒。丕绪恢张,仁闻四达,所谓宠绥四方而克相上帝者,亦已至矣。兹犹以实效未臻其极,而虑任用未尽得人,乃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讲求至理,必欲追复唐虞三代之盛。此不自满假、稽于有众之盛心也。夫内不自满,而外稽于众,则何所为而不至其极哉!陛下真大有为之君,可以为尧舜,可以为禹汤文武,可以唐虞三代斯世也。斯世斯民,何其幸欤!臣虽庸陋,敢不效一得之愚,以对扬明命之万一乎!

窃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君所以治之,师所以教之。《书》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又曰:克绥厥猷,惟后。信乎人君奉天子民,其为治之道,莫大乎养与教也。教养未尽,不足以言治。故孔子之

告冉有，必曰富之教之。孟子之论王道，教养之外，亦无余说。诚以仁政不外乎此耳。然养莫重于制田里而广树畜。田里不均，树畜不广，欲民生之遂，得乎？教莫先于崇学校而明礼义。学校不修，礼义不明，欲民性之复，得乎？夫是二者，固必由任用得其人，而后实效臻其极，然循其本而论之，惟在人君之心耳。孟子曰：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人君苟无是心，而徒区区于法制品节之末，则所施非其政，所任非其人。虽欲言治，皆苟而已。臣请征诸古，为陛下陈之。

唐虞之时，水土未平，烝民未粒，圣人有忧之。使弃为后稷，而播时百谷，百谷熟，而民人育矣。饱暖无教，近于禽兽，圣人又忧之。于是使契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敷，而百姓亲矣。三代之时，其养民也，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教民也，夏之学曰校，殷之学曰序，周之学曰庠。自其制度之极备者而言之，田野之授，井牧异其制；学校之设，大小异其教。如衍沃之地，百亩为夫，而九夫为一井；隰皋之地，九夫为牧，而二牧当一井。井牧之制所以养民者，其备如此。八岁入小学，而教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十五入大学，而教以穷理尽心之术，修己治人之道。学校之制所以教民者，其备如此。

当是时也，出而使长，入而使治，皆刚简直宽之德，俊造秀乂之士。是以民有恒产，而无啼饥号寒者矣；士有恒性，而无放僻邪侈者矣。然则其政立于上，而治效成于下，又孰谓不本于得人，又孰谓不本于君心之仁乎？质之经、订之传而观之，则尧之兢兢，舜之业业，固一忧民之心也。禹之孜孜，汤之栗栗，亦一忧民之心也。至于文王之纯亦不已，武王之永言配命，又何尝一念不在于民乎？此其良法美意，固卓乎不可尚已。

古道既远，圣王不作。阡陌之端开，而井田之制废，养民已无政矣。坑焚之祸作，而《诗》、《书》之习泯，教民已无政矣。又安有所谓仁民之心乎？后世愿治之君，若汉之文帝、唐之太宗、宋之太祖，亦尝留意于教养。或躬耕藉田，而减租以劝农；或口分世业，而节费以裕民；或遣官度田，而课民以种植。养民之政有矣，然不过法制之虚文。或

尊师重傅，而临雍拜老；或大召名儒，而增广生员；或增葺国学之祠宇，而亲制孔、颜之赞词。教民之政有矣，然不过太平之粉饰。究其存心，果有发尧舜、禹汤、文武之切于忧民者乎？上既有尧舜、禹汤、文武之君，则奉承宣布者，亦未必皆稷契、伊周之臣。是以治效之著，虽或至于海内富庶，路不拾遗，户口繁益，求如古之耕田凿井，出作入息，而不知帝力何有，则未也。虽或至于黎民醇厚，死囚来归，道学可称，求如古之仁人君子，比屋可封，而但知顺帝之则，则未也。此汉唐宋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欤？

仰惟我朝，列圣相承，心尧舜、禹汤、文武之心，行尧舜、禹汤、文武之政，必求复唐虞三代之治。是以百纪修明，庶务振举，而于教养二事，尤致重焉。田虽无井牧之异制，然兼并有禁，荒芜有罚。既有守令以司之矣，又兼命藩臣以董之。养民何以加焉！学虽有庠序之异制，然廪饩有常，废坠有戒。既有师儒以职之矣，又专命宪臣以莅之。教民何以加焉！良法美意，昭昭乎日月之照临；深仁厚泽，荡荡乎天地之涵育。此我朝之治，所以度越前古也。陛下远宗帝王之道，近守祖宗之法，教养之政重加之意，盖无一念不在是也。伏读圣制有曰：朕承祖宗大统，抚临亿兆，于兹有年。夙夜兢惕，弗遑宁处，期于家给人足，教行刑措，礼乐兴而风俗美，跻斯世于雍熙泰和之盛。果何道以致之欤？即此一念，臣已知陛下仁民无穷之心，盖不以目前之治而自已也。

陛下抚盈成之运，当鼎盛之年，有可为之时，有可为之势，又有能为之资，诚欲复隆古之治，不过始终此心焉耳。始终此心，则始终此治。《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是知为治之道，固未可见小而欲速也。且天下之大，兆民之广，必人人皆遂饱暖之愿，而后可以为养之至。使有一民不遂其生，犹未也。必人人皆归礼义之化，而后可以为教之至。使有一民不协于中，犹未也。

方今天下之民，安于田里而生生自庸者，固多矣。然而水旱相仍，则展转沟壑而无告者，不惟见于穷檐蔀屋之下。而通都大郡亦有之。如此而谓之生养遂，未可也。司民牧者，方且急于催科，而视农桑为末务，漫不知所以抚字赈救之方，此犹未免勤圣心之虑也。陛下养

民之仁，诚能久而不替，田里未均必思所以均之，树畜未广必思所以广之。禁游手游食之蠹，惩横敛苛征之虐。慎选循良恺悌之人，以充守令之职。纵未必尽得如稷之贤，独不可得出入阡陌、劝课农桑如召信臣者乎？既得其人，又假以岁月而考其功，因其功而进退之，则人孰不思所以自勉，而尽养民之职哉！如此而家不给，人不足，无是理也。

天下之民，习于行艺而熙熙相安者，固已多矣。然而饥馑荐臻，则犬鼠偷窃而无藉者，不惟见于遐陬僻壤之所，而名乡广市亦有之。如此而谓之教化洽，未可也。司风教者，方且溺于宴安，而视教化为繁文，恬不知所以振励转移之术，此犹未免贻宸衷之忧也。陛下教民之仁，诚能久而不怠，学校必修，不使有倾颓之患；礼义必明，不使有坏乱之习。禁惑世诬民之言，革骄盈侈费之俗。慎择端方谨厚之士，以充师儒之任。纵未必尽得如契之贤，独不可得学兼体用、封植人才如胡安定者乎？既得其人，又重厥责任而考其绩，因其绩而黜陟之，则人孰不思所以自效，而尽教民之责哉！如此而教不行，刑不措，无是理也。

治既至家给人足，教行刑措，则礼乐以兴，风俗以厚，四夷于是而咸宾，万邦于是而宁谧。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集，而雍熙泰和之隆，复见于今日矣。唐虞三代，岂得专美于前哉？夫治效之所以隆，固皆本乎陛下之一心，然易逸难制者，莫人心若也。况人君之心，攻之者众。若货利，若声色，若游畋、方技、土木之类，皆足以蛊惑摇荡之者也。苟非识见之明，而持守之坚者，未必不为所移。此心少移，则人欲日炽，天理日消，而无所不至矣。是故动一侈心，则取民不以制，而养民之政以废；动一躁心，则接下不以礼，而教民之政以坏。陛下天资高迈，志意坚定，谅必能持守此心，而慎终如始矣。

然以成汤之圣，每致警于《盘铭》之辞；武王之圣，恒究心于《丹书》之戒。学问之功，其可以少缓乎？先儒范氏有言：人君之心，惟在所养。陛下欲致帝王之治，乌可不求帝王养心之术？国朝经筵之设，最为近古。左经右史，朝讲暮读，闻于耳，接于目，而优游浸渍于心，则所以防非窒欲而长善者，莫要于此。臣愿陛下日御经筵，进讲不辍，毋视之为虚文，毋应之以故事，俾贤士大夫常侍列于前后左右，从

容燕闲,演绎陈说,所闻者必善言,所见者必善行。于以涵养此心,以不失其本然之天;充广此心,以不亏其固有之量。则养民教民之政,亦将始终无间,而治效愈久愈盛矣。天下治忽之几,端在乎此。臣学术疏浅,荷朝廷教养有年,其于古昔圣贤格心之学,亦尝闻其大概矣。故敢陈此,以上酬陛下求言之盛心也。伏愿留神省览,则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治国之道,固然把具有仁慈对待百姓的国政看得很重,同时也把具有仁慈对待百姓的心念看得更重。因为仁慈的心念存在于心中,而后仁政才会在外面表现出来。假如只有那心念而没有那国政,这就叫做光是好,光是好却不足以进行治理。只有那国政而没有那心念,这就叫做光是个法度,光是个法度却不能自动推行开。前代大儒程颐说过:进行治理一定要有纲领和制度。又说:一定要先有《诗经》中《关雎》篇、《麟趾》篇所表达的那种意愿,而后才能推行《周礼》所制定的法度。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仁政出自仁心,就能内外并举,前后没有遗漏,而治国之道也就掌握住了,还忧虑什么教养不完备,任用不适当,治国成效还没达到理想状态呢?唐虞和夏商周时代之所以能够治绩显著,风俗醇美,就因为具有这种心念和这种国政啊!而汉唐宋之所以治绩不如古代,难道不是因为只有那国政却没有那心念吗?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凭借圣明神奇、有文有武的天资,继承祖宗和各位先帝的统系,严格要求自己,保守功业,虚心谋求大治。虽然深居皇宫之中,思虑却遍及全天下。担心人民生活还有不富足的,一定要让他们都能稳定在吃饱穿暖的状态;担心人民品德还有不纯正的,一定要让他们都能归入磨砺仁德道义的范围。所以在登基之始,别的先不做而先去耕种天子的藉田,来表示重视农耕和致力本业;继而又亲临太学,来表示尊重圣道和崇尚儒士。祖先盛大的帝业得到发扬光大,仁德的美誉传遍四方,古代所讲的安定天下、辅助上帝,已经达到极限了。如今陛下却仍然认为实际效果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而担心任用官员没能完全获得合适的人选,于是把臣下我

等人宣召到殿廷，降赐明晰而又详尽的询问，讲求最完美的国家治理，一定要恢复唐虞和夏商周三代的昌盛局面。这是不自我满足、向大众征询意见的进取之心啊。能够内心不自我满足，向外面征询大众的意见，还会有什么做起来不能实现理想状态的呢！陛下真是大有作为的君主啊，可以成为尧舜，可以成为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可以把当代变成唐虞和夏商周三代呀。当代和当代的人民，是多么的幸运啊！臣下我虽然平庸鄙陋，怎敢不进献千虑一得的愚见，来对答称扬圣上命令的万分之一呢？

私下想来，上天降生万民，为他们设立君主，为他们设立师长。君主用来治理他们，师长用来教化他们。《尚书》中说：万民没有君主，就不能互相帮助来维持生存。又说：能够确立起教导民众的大谋略的人，只有君主。君主敬奉上天，爱民如子，进行治理的方法没有比养民与教民更重要的，的确是如此。教民和养民不彻底，是不足以谈论大治的。所以孔子告诫冉有时，总是说要让百姓富裕，对百姓进行教化。孟子讲论称王天下的道理时，在教民和养民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说法。实在是因为所谓仁政不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然而养民没有比划定田产和扩大种树、饲养家畜更重要的了。田产不平均，种树和饲养家畜不扩大，却想让人民生活称心如意，这能做得到吗？教民没有比重视学校和阐明礼义更重要的了。学校不整顿，礼义不阐明，却想让人民恢复善良的本性，这能做得到吗？这两项举措固然必须要通过任用官员获得适当人选，而后实际效果才能达到理想状态，然而从探本角度来讲论，只在于君主的心念而已。孟子说：先王具有怜悯他人的心念，而后才有怜爱百姓的国政。凭借怜悯他人的心念，来推行怜爱百姓的国政，治理天下就可以像在手掌里拨弄一样容易了。君主如果没有这种心念，而只是斤斤计较于法制、规章等末端，那执政就不会正确，任人也不会恰当。即使想讲求大治，也都是糊弄一气而已。臣下我请求征引古代的情况，为陛下陈述几点。

尧舜时期，洪水尚未平息，百姓还没有粮食吃，圣人对此很是忧虑。便让弃担任后稷，播种各种粮食作物，各种粮食作物获得了丰收，百姓便得到了养育。吃饱穿暖之后没有教化，人们和禽兽没有多

大的差别，圣人对此又很忧虑。于是便让契担任司徒，恭敬地施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教化，五种教化施布后，百姓便相亲相爱了。夏商周三代时期，养民的办法是，夏后氏分田五十亩而纳贡，殷民分田七十亩而助耕，周民分田百亩而纳十分之一的田税。教民的处所是，夏朝的学校称为校，殷朝的学校称为序，周朝的学校称为庠。就其制度最为完备的方面而言，田地的分授，井与牧的制度是不同的；学校的设立，大学和小学的教育是不同的。如果是平原沃野，就规定百亩为一夫，九夫为一井；如果是水岸低洼地，就规定九夫为一牧，二牧为一井。井牧制度用来养民，详备到这种程度。八岁进入小学，教给他洒扫、应对、举止方面的规范和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写、计算方面的技能。十五岁进入大学，教给他穷尽天理、心性的方法和修养好自身、治理民众的道理。学校制度用来教民，详备到这种地步。

在那时候，派出去让他号令一方，召回来让他参与朝政，都是刚正简朴、忠直宽厚的有德贤人，都是逐级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因而百姓都有稳定的财产，没有为饥饿寒冷而啼哭叫喊的人了；士子都有稳定的心性，没有放荡乖僻、邪恶奢侈的人了。既然如此，那么国政在上面定立起来，效果在下面显现出来，谁又能说不是出自用人恰当呢？谁又能说不是出自君心仁厚呢？对照经典和解释经典的书籍来看，尧舜兢兢业业，自然是有一颗忧民之心的表现。夏禹商汤勤恳谨慎，也是有一颗忧民之心的表现。至于周文王的纯一不杂、从不中断，武王的永远与天命相配，又何尝有一个念头不在百姓身上呢？这就是那时的有效措施和美好意图，当然是卓绝而无法超过的了。

古制已经遥远，圣王也不再出现。土地私有制度的头一开，井田制度便逐渐废弃，养民方面已经没有国政了。焚书坑儒的灾难一发生，诵读《诗经》、《尚书》的风气便随之泯灭，教民方面已经没有国政了。哪里还有仁慈对待百姓的心念呢？后世愿意求治的君主，诸如汉朝的文帝、唐朝的太宗、宋朝的太祖，也曾留心于教民、养民。有的在天子藉田里亲自耕种，减免租税来鼓励农业生产；有的按人口分配永业田，节省开支来使人民宽裕；有的派遣官员丈量田地，督促农民来

种植。养民的国政看上去是有了，然而不过是在制度上所做的表面文章。有的尊师重教，并亲临国家最高学府拜望国老；有的广召著名儒者，并扩大生员的数量；有的重修国学的祭祀场所，并亲自撰写对孔子、颜渊的赞词。教民的国政看上去是有了，然而不过是粉饰一下太平。探究他们的内心，果真有源于像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那样迫切忧民的想法的吗？上面即使有了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那样的君主，而下面奉命执行者也未必都是稷、契、伊尹、周公那样的良臣，因此治国的显著成效，虽然有的达到了海内富庶，路不拾遗，户口繁盛，但探求像古代百姓耕田凿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帝王有何贡献的盛况，却没达到。虽然有的达到了民风醇厚，判死罪的囚犯放他出去还自动回来，道学值得称述，但探求像古代的仁人君子，家家都有资格受到特殊表彰，只晓得顺从上帝规则的盛况，却没达到。这恐怕就是汉唐宋成不了唐尧夏商周的原因吧？

想来我朝，各位圣君递相承接，把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武王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推行尧舜、夏禹商汤、文王与武王那样的国政，务必谋求唐虞三代的大治景象重新出现。因而各项制度完备明确，各种政务完满开展，对于教民、养民这两件大事，尤其给予重视。田地虽然没有井、牧的不同规定，却对肆意兼并有所限制，对荒废农耕有所处罚。既有地方长官来负责，又同时命令封疆大臣来管理。对于养民一事还有什么可做的呢！学校虽然存在级别不同的规定，却使生员的物质补助确有保证，对荒废学业有惩戒。既有专职教官来负责，又专门命令监察官来督导。对于教民一事还有什么可做的呢！这些有效的措施和美好的意图，明亮得就像日月照临一样；这种深厚恩泽，广大得就像天地涵养万物一样，这正是我朝的政治超过前代的原因所在。陛下往远处宗奉古代帝王的大道，在近处持守列祖列宗的法度，对教养之政又加倍用心，没有一个想法不集中在这上面。跪拜敬读圣上的制策中有这样的话：皇帝我继承祖宗的帝位，统治天下百姓，到现在已有年头了。日夜警惕，不敢安逸享乐，期望家家户户生活富足，教化推行而刑罚不用，礼乐振兴而风俗醇美，把当今社会带入到太平和美的大治境地。究竟有什么办法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只

从这个想法看，臣下我就已经知道陛下仁慈对待百姓永无止境的心念了，因为不凭眼前的治绩而自我止息啊！

陛下顺应保有前代功业的国运，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具有可以作番事业的时机，具有可以作番事业的形势，又有能够作番事业的天资，真要想恢复远古的盛治，不过始终保持住这心念就行了。始终保持住这心念，就能始终保持住这种盛治。《易经》上说：圣人长久地坚持他的治国大道，对天下的教化就能形成。由此可知，进行治理的原则，本来就不能嫌短期成绩小就想去速成的。况且天下这么大，百姓这么多，一定要人人都能实现饱暖的愿望，而后才算是养民达到了顶峰。假如有一个人还不能满足生活需要，就还有差距。一定要人人都能归向礼义的教化，而后才算是教民达到了顶峰。假如有一个人还不能符合天子规定的最高行为准则，就还有差距。

当今天下百姓，安居田里而生财致富的，当然是多数。然而水旱灾害接连不断，眼看死而无处求救的人，不仅在荒野茅屋下面可以看到，在城市都邑里也存在。像这样还声称养民养得个个称心如意，是不行的。负责管理人民的官员，正忙于遍交赋税，而把劝课农桑视为枝节事务，一点儿也不懂安抚养育、赈济救助的办法，这就免不掉要劳烦陛下再费心了。陛下养民的仁心，真能坚持不变，田地不平均就一定想办法使它平均，种树和饲养家畜不广泛就一定想办法让它广泛。禁止游手好闲的坏人，惩罚横征苛敛的暴行。慎重挑选奉职守法、和乐简易的好官员，来担当太守县令。纵然他们不一定都能像后稷那样贤明，还不能像召信臣那样深入田间、劝课农桑吗？已经得到合适人选，再放宽时间考察他们的政绩，根据政绩或升或降，这样一来，人们有谁还不想法来自我勉励，恪尽养民的职守呢！如此而不能家家户户生活富足，世上是没这个道理的。

天下百姓，熟习道德技艺而安居乐业的，当然是多数。然而饥饿接连来到，像犬鼠一样偷窃而生活无依靠的人，不只在穷乡僻壤可以看到，在城镇集市也存在。像这样还声称教化普及，是不行的。负责风俗教化的官员，正沉溺于安逸享乐，而把教化百姓视为多余形式，死皮赖脸不懂得振作民心、移风易俗的办法，这就不免给陛下心里带

来忧虑了。陛下教民的仁心，真能长期坚持而不松懈，学校一定要整顿，不让有学校走下坡路的危险；一定要阐明礼义，不让有礼义坏乱的恶习。禁止煽惑世人、欺骗百姓的言论，革除骄横放纵、奢华浪费的风气。慎重挑选正派直率、严谨厚道的人士，来担任教官的职务。纵然他们不一定都能像契那样贤明，还不能像北宋胡瑗那样学问兼顾原则与运用、细心培养人才吗？已经得到合适人选，再强调他们的责任并考察他们的成绩，根据成绩或升或降，这样一来，人们有谁还不想法来奉献自己的力量，恪尽教民的责任呢！如此而不能教化施行、刑罚不用，世上是没这个道理的。

治理局面已经达到家家户户生活富足，教化施行和刑罚不用，就会礼乐振兴，风俗醇厚，四方部族在这时都来归服，天下各地在这时全都安定。各种象征吉福的事物，可以引来的祥瑞，无不汇集，而太平和美的昌盛局面，就在今天又重现了。唐虞、夏商周三代又怎能在前面独享美誉呢？治国成效之所以显著，固然都源于陛下的纯一心念，然而容易放纵、难以克制的东西，又没有比得上人心的了。更何况君主的心念，能进攻它的玩艺太多了。像财利，像声色，像田猎、方术、土木工程之类，都是足以迷惑动荡君心的玩艺。如果不是认识清醒、持守坚决的人，未必不会被那些玩艺所动摇。君心一有动摇，就会欲望一天比一天强烈，天理一天比一天消失，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所以一动奢侈之心，就会不按规定榨取人民，养民之政也就因此废弃了；一动浮躁之心，就会不按礼仪对待臣民，教民之政也就因此破坏了。陛下天资超常，意志坚定，想必一定能持守此心，而谨慎到底如同开始时一样了。

然而凭借成汤那么圣明，还常用《盘铭》的辞句来自警；凭借武王那么圣明，还总对《丹书》的诫语多留心。学习、请教的功夫，哪能稍微松懈呢？先儒范祖禹有句话道：人君之心，只在于怎么涵养。陛下想要实现尧舜、夏禹成汤、周文王与武王那样的盛治，怎能不探究这些帝王涵养内心的方法呢？我朝设置的经筵制度，最为接近古代。左为经学，右为史学，早晨讲解，晚上诵读，耳濡日染，渐渐深入，铭刻在内心，用以防范错误、抑制贪欲、扩大善行的方法，没有比这更重要的

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每天驾临经史讲席，让儒臣讲解而不停废，不把它看作空洞形式，不把它看作惯例摆个样子给人瞧，使贤良的士大夫经常侍列在身边，从容安闲地发表观点，使自己听到的一定是良言，见到的一定是善行。以此来涵养内心，使它不失去本来的天性；充实内心，使它不减少原有的度量，养民教民之政就会始终不断，而治国成效也就越久越显著了。国家治乱的微妙之处，恰恰就在这里。臣下我学识疏陋浅薄，仰仗朝廷多年培养教育，对于古代圣贤端正心性的学说，也曾听到一些大概。所以才敢陈述这些见解，来报答陛下求取言论的恳切用心。跪拜期望陛下能留心观览一下，天下就幸运得很了。臣下我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温玉春译〕

刘戬　殿试对策

刘戬(1435～1492)　字景元，安成(今江西安福县)人。成化十一年(1475)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时年41岁。后进侍讲，迁右春坊右谕德。曾预修《宪宗实录》，并奉命出使越南，凡当地馈赠，一无所受。有《晋轩集》行世。

臣对：臣闻圣人有安天下之至仁，有用天下之大智。盖天下之民，固圣人之所当安，而天下之大，有非一身之所能独安也。圣人任其所当安者于己，必付其所不能独安者于人。任其所当安者于己，则所以教养天下者有善政。付其所不能独安者于人，则所以教养天下者有成功。然则不自用而用天下，实所以安天下也欤?圣人有安天下之仁，而未尝区区自用以安之，此其仁之所以为至，智之所以为大，而仁智二者，之所以相为用也。昔禹、皋之陈谟，不徒曰在安民，而必曰在知人。岂非以安民为仁之事，知人为智之事，而仁与智不可偏废乎?荀卿子曰：仁而不智，不可也；智而不仁，不可也。使仁焉而有智以济之，则教养之效如炊而必熟，如种而必生，如乘骐骥骋康庄，而不患其不达于其所欲往矣。夫岂有不臻其极者哉?尧舜之所以帝，禹汤

文武之所以王，用此仁也，用此智也。我祖宗列圣之所以并驾唐虞，齐驱三代，亦此仁也，亦此智也。曰汉曰唐曰宋，所以治不古若者，庸非此仁此智有所未尽，或得其一而不能兼举之弊欤？

恭惟皇帝陛下，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宽裕温柔，渊博乎天地，不足以为大；文理密察，昭乎日月，不足以为明矣。然而处既圣之地，无自圣之心，惟恐一善之或遗，不以迩言为可忽，乃进臣等于廷，咨之以当时之事。首言教养之效未臻其极，而拳拳焉以任用未尽得人为疑；中举历代之教养，而欲考其得失；末复欲闻至当之说，以教养天下。臣伏而读之，有以知陛下之至仁，惟欲以安天下；而陛下之大智，知所以用天下也。夫至仁惟欲以安天下，而大智知所以用天下，则陛下素所蓄积者，皆教养天下之具也。举而措之，固已沛然有余矣。尚奚假于臣言哉？虽然，谋及庶人，询于刍荛，古之圣人盖如此。而布衣言天下事，亦有志经世者所以验可而进，以行其所学也。臣又安敢自弃于疏贱，而不有以对扬圣天子之休命乎？昔宋儒苏轼进说于其君，以为言之于无事之先，常患于不见听。臣窃以为，此独未遭圣明之君故耳。使其遭圣明之君，则虽有苞桑之固，而常存覆隍之戒，凛凛然惟恐一言之不闻也。今天下虽无事，臣言虽鄙陋，然幸遭际陛下之圣明，则所谓不见听者，非所患矣。谨拜手稽首，因圣策所及而条陈之。

臣闻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之惠民，必择人以寄教养之事，则君之奉天，又可不得人以任教养之责哉？盖民衣食不足，则不暇治礼义。此圣人所以有养民之仁也。而养民之仁，不过如圣策所谓制田里、教树畜而已。饱暖无教，则又近于禽兽。此圣人所以有教民之仁也。而教民之仁，不过如圣策所谓崇学校、明礼义而已。然徒知教养，而不择人以任之，则小人在位，无由下达。虽曰养之，而民不蒙其泽；虽曰教之，而民不被其化。此所以任用未尽得人，不能不劳圣虑也。臣请以祖宗之教养，为陛下言之。

我祖宗之养民也，田虽听其自占，而课农有诏，如春雨之涵濡；衣虽未尝家赐，而栽桑有令，如春阳之煦妪。臣窃观祖宗谕侍臣有曰：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又曰：朕思足食在于禁末

作,足衣在于革华靡。又曰:人之常情,安于所忽。饱即忘饥,暖即忘寒。朕深知民难,百计以劝督之。呜呼!养民之仁根于中而形于言者,一至此乎!以是仁而安天下,则民生之厚,果孰能御之哉?

我祖宗之教民也,内设国子监,以造就天下之英才;外设府州县学,以储养民间之俊秀。臣窃观祖宗谕侍臣有曰: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又曰:教化行,虽闾阎可以为君子;教化不行,虽中材或坠于小人。又曰: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呜呼!教民之仁根于中而形于言者,一至此乎!以是仁而安天下,则民德之正,又孰能御之哉?

然我祖宗,固未尝如秦皇之衡石自程,隋文之传餐后食,区区焉弊精神,以教养天下也。亦曰任贤图治,而善于用天下焉耳。故我祖宗之言曰:鸿鹄之能远举者,为其有羽翼也;蛟龙之能腾跃者,为其有鳞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为其有贤人也。然则祖宗安天下之仁,固极其至,而亦何莫非由用天下之大智,有以济之乎?

陛下心祖宗列圣之心,行祖宗列圣之政,而又无间乎祖宗列圣之仁智,其所以教养天下者,不可以有加矣。然而犹虑实效未臻其极,臣又有以知陛下是心,即望道未见之心;惟日不足之心也。臣虽愚昧,然尝端居而念天下之事,惟仁可以安天下,惟智可以用天下。又窃观祖宗之所以臻天下之大治者,亦不外乎此。自顾舍此,皆无足以为陛下告者,故敢辄申其说焉。

盖陛下以祖宗之所以养民者养民,又尝亲耕藉田以倡率之,可谓笃于养民矣。然而民生犹有未厚者,无他。昔人有言: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无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又曰:郎官出宰百里,上应列宿。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夫二千石,即今之守也;百里宰,即今之令也。守令之职,最为亲民。臣尝譬之:民之待养犹赤子之待哺也,守令其哺赤子之傅母乎?苟为傅母者,不知乳哺之道,又从而颠越之,欲赤子之得所,难矣。臣观今日之守令,以承奉敏捷为能,而不劳心于抚字;以期会簿书为急,而不留意于阡陌。甚者怠惰而尸位素餐,贪酷而厉民自养。则民生之不厚,有以也哉!臣愿陛下择人以任守令之职,使布列于州县者,皆龚黄、卓鲁之

俦，而又严黜陟之典，以劝惩之。则为守令者，皆能推陛下养民之仁，以安天下。殆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而养民之效，自臻其极矣。

陛下以祖宗之所以教民者教民，又尝亲幸太学以劝勉之，可谓笃于教民矣。然而民德有未正者，无他。昔人有言：择师不可以不慎，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又曰：士有纯明朴茂之美，而无敦学养成之法，此士之所以弊也。夫今日之所以使民敬学者，师儒也；而其所以使士无弊者，亦师儒也。师儒之职，贤士所关。臣尝譬之：民之待教犹金之待范也，师儒其范金之宗工乎？苟为宗工者，不知模范之道，又从而毁弃之，欲金之成器，难矣。臣观今日之师儒，以记诵词章为务，而不知有道艺；以学究课业为工，而不知有德行。甚者嗟老羞卑，自为身谋，伪言冥行，反贻士耻。则民德之不正，有以也哉！臣愿陛下择人以任师儒之职，使分布于学校者，皆胡瑗、孙復之俦，而又严殿最之法，以劝惩之。则为师儒者，皆能推陛下教民之仁，以安天下。殆见户比可封，人皆君子，而教民之效，自臻其极矣。

虽然，所谓守令师儒者，岂必欲陛下人人而择之，人人而劝惩之乎？亦曰择其所以择守令师儒者，与其所以劝惩守令师儒者而已。择守令师儒者，铨衡揆路之责也；劝惩守令师儒者，耳目纪纲之司也。二者皆得其人，则守令师儒皆得其人。而陛下之用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天下之民，岂有一夫不被陛下之仁者哉！如是，则陛下之至仁，亦有大智以济之，而雍熙泰和之治，不患不如唐虞三代矣。盖唐虞三代之所以教养天下，有非后世之所能及者，亦不过合仁与智，两尽其道耳。

观其制井以处衍沃之田，制牧以分隰皋之地，定九等之赋，修六府之政。夏后氏五十而贡，商人七十而助，至周而加详焉。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此唐虞三代之养民也。有下庠以为小学，有上庠以为大学，养国老于上庠，养庶老于下庠。夏以教民为义而曰校，商以习射为义而曰序，至周而加详焉。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八岁则入小学，十五则入大学。此唐虞三代之教民也。唐虞三代之教养天下，可谓仁矣。然教民稼穑，则稷为之；敬敷五教，则契为之。以至夏之吁俊尊

帝，商之敷求哲人，周之克俊有德，亦莫不择人以任教养之事焉。则唐虞三代安天下之至仁，非有用天下之大智以济之乎？

若夫汉、唐、宋之英君谊辟，非不有意于养民也，而非唐虞三代之养民矣；非不有意于教民也，而非唐虞三代之教民矣。以养民言之，汉惩秦之暴，轻民之租，或十五而税一，或三十而税一。文帝因贾谊之请，而耕藉田；武帝因赵过之请，而立代田。唐制有口分、世业之田，有租庸调之法。而宋则均田之法行于建隆，经界之法行于绍兴。可谓美矣。然仲舒请立名田，而武帝牵于多欲；师丹请立限田，而哀帝沮于贵幸。口分世业之田坏，而为兼并；租庸调之法坏，而为两税。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则汉、唐、宋养民之仁可知矣。况汉守令之循者十八人，唐守令之循者十人，而宋之守令其循者，亦不过二十人耳。夫郡县满天下，而惟此数十人，且又间见于千有余年之久，则守令之不循者，何多也！守令之不循者多，则汉、唐、宋用天下之智，不足以济其养民之仁矣。何怪其不如唐虞三代之养民也哉！

以教民言之，汉光武起学东京，明帝临雍拜老。内而贵戚公侯人学，外而匈奴遣子入学。唐制有弘文馆、太学之类，以处皇属贵胄；有广文馆、书学之类，以处臣民俊秀。而宋则有太学、宗学、武学，以分其流；有外舍、内舍、上舍，以升其等。可谓善矣。然学舍鞠为蔬圃，学生多陷党籍。朝潦夕宿、徙置屋壁者，学舍也；啼饥号寒、乘城拒敌者，师生也。则汉、唐、宋教民之仁可知矣。况汉之师儒，寂然无闻，而兴学校者，独文翁辈耳。唐之师儒可称者，不过韩愈、阳城数人。而宋之尤彰彰者，孙復、胡瑗之外，亦不多见焉。夫学校满天下，而惟此数人，且又间出于千有余年之久，则师儒之失职者，何多也！师儒之失职者多，则汉、唐、宋用天下之智，不足以济其教民之仁矣。何怪其不如唐虞三代之教民也哉！

夫唐虞三代之教养天下者既如彼，而汉、唐、宋之所以不及者复如此。是宜圣策以良法美意归之唐虞三代，而谓汉、唐、宋视之为有间也欤？夫以良法美意归之唐虞三代者，欲法唐虞三代也。谓汉、唐、宋视之为有间者，陋汉、唐、宋于不居也。臣愚以为，欲法唐虞三代而

陋汉、唐、宋于不居，亦岂必胶柱鼓瑟，泥于古而不通于今哉？亦曰法祖宗安天下之仁，与其用天下之智，以致天下之大治，如此而已矣。《书》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衍。《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臣之愚意，实出于此。伏惟陛下不以其易为而忽之，不以其常谈而厌之，则家无不给，人无不足，教无不行，刑无不措，礼乐由是而兴，风俗由是而美，可以功光祖宗，可以业垂万世矣。

虽然，究而言之，其本又不外乎陛下之一心焉。盖仁也者，心之全德也；智也者，心之神明也。心之全德，一为私意所蔽，则己欲立而不以立人，己欲达而不以达人。其视天下之安与不安，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漠然无所动于其中矣。臣愿陛下，去其有我之私，而大其无我之公，以身视家，以家视国，以国视天下；而推而达之，复不失其先后之序，轻重之伦 。则所谓一视同仁、笃近举远者，特在圣心一转移之间尔。如是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

心之神明，一为私欲所累，则好而不知其恶，恶而不见其美。其于天下之贤不肖，如扣槃扪烛，以为日之形声，而不自知其非矣。臣愿陛下，居敬以立静虚之体，穷理以为顺应之用。不作好恶，不徇玩狎，不遗遐远；而举而用之，复不责效于旦暮，不疑间于谗佞。则所谓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者，特在圣心一运动之间尔。如是而天下不为吾用者，未之有也。《易》曰：正其心，万事理。而孟子亦曰：心既正，然后天下之事可从而理也。其是之谓欤！

臣愚，学不足以待问，才不足以通今。至当之论，不知所归。然罄一得之愚，实出于芹曝之诚，而非敢谬为大言，以负陛下也。伏惟少垂睿览，则天下幸甚。臣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人具有安定天下的最高仁德，也具有使天下都出力效命的巨大智慧。因为天下的民众，原本就是圣人应当让他们获得到安宁的，但天下这样地广大，又存在着不是一个人就能够独自让他们安定下来的情况。因而圣人把那应当让他们获得到安定的责任由自己承担起来，就一定把那不是一个人就独自能够让他们安定下来的情况交付给别人去处理。把那应当让他们获得到安

定的责任由自己承担起来，那就教化养育天下具有美好的朝政。把那不是一个人就独自能够让他们安定下来的情况交付给别人去处理，那就教化养育天下具有成效和功绩。既然如此，那么不刚愎自用而是使天下都出力效命，实际上也正是安定天下的办法吧？圣人具有安定天下的仁德，但却未曾出现过凭借不值一提的刚愎自用去安定天下，这是他们的仁德属于最高境界、智慧属于特别巨大、而仁德和智慧这两方面又交互为用的原因。过去大禹和陶皋向虞舜进献重大的谋略，不光是强调在于安定民众，又一定要强调在于知人善任。这难道不是把安定民众作为仁德方面的大事，把知人善任作为智慧方面的大事，而仁德与智慧又不能废弃掉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吗？战国荀况也说过：光有仁德却没有智慧，是行不通的；光有智慧却不仁德，也是行不通的。假使很仁德又有智慧去补充它，教化和养育的效果就如同烧火做饭必定会变熟，就如同种庄稼必定会生长出来，就如同骑着骏马在大路上奔跑，而不用担心不会到达所要到达的地方了。这哪里还有达不到那最高境地的呢？尧舜称帝天下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称王天下的原因，就是运用这仁德，运用这智慧啊！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的先帝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并驾齐驱的原因，也是依靠这仁德，依靠这智慧啊！那些称为汉朝、称为唐朝、称为宋朝的朝代，治绩不如古代，原因难道不也正是这仁德，这智慧还存在着没做到极限，或者是仅仅获取到一个方面却不能并举的弊端吗？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凭借圣人的品德，占居圣人的大位。宽宏大量，温厚柔和，静深有本和周遍广阔就像天地，但仍然不足以概括那博大；对文采的条理详察明辨，鲜亮得如同日月，但仍然不足以概括那圣明。然而处在已经是大圣人的地位上了，却没有自以为是大圣人的念头，唯恐有一条良好的建议被遗漏掉，不认为浅近的言论不妨忽略过去，竟然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当今的重大政事来询问我们。首先讲教化和养护民众的效果还没达到极点，而又十分恳切地把任用官员还没全都获得到合适的人选作为疑虑；中间又列举各个朝代教化和养护民众的措施，打算考察它们的得失；最后又想听到最为恰当的对策，以便教化和养护天下。臣下我跪拜阅读它

们，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的最高仁德，只想拿它去安定天下；而陛下的巨大智慧，又特别清楚让天下都来出力效命。既然最高的仁德只想拿它去安定天下，而陛下的巨大的智慧，又特别清楚让天下都来出力效命，这就表明陛下平素所蕴藏积累的东西，都是教化养护天下的重大措施啊！加以安排部署，原本上就已经充沛盛大，绰绰有余了，还要借助什么臣僚们的意见呢？尽管这样，谋划要征求普通百姓的想法，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询问，古代的圣人差不多都这样做。而民间读书人谈论天下的大事，也对治理天下的人能验核本人提出的见解并表示采纳、加以进用怀有志向，以便来实行他所研习的学说。臣下我由此又哪敢在疏远卑贱的行列中就自暴自弃，却不真有理由地来对答称扬圣明天子的美好诏令呢？从前北宋儒士苏轼向自己的君主进献主张，认为在没发生事变之前指出有关的问题，经常会担心不被采纳。臣下我私下认为，这只是没有遇上圣明君主的缘故罢了。假使他遇上了圣明的君主，圣明的君主即使具有物品拴系在桑树根上那样牢固的国势，但仍时刻保持着城墙倒塌在干涸的城壕里的这种警戒，十分戒惧地唯恐有一句言论还没听到。如今天下虽然太平无事，臣下我的言论尽管鄙陋，但万分幸运地遇上了陛下的圣明，那么苏轼所说的不被采纳的情况，也就不是值得忧虑的了。恭谨地敬行叩拜大礼，依据圣上策问所谈到的问题，逐项陈述它们。

臣下我听说，只有上天对人间百姓施布恩惠，只有君主承奉上天。上天对人间百姓施布恩惠，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君主来把教化和养护百姓的事情交付给他。既然如此，君主承奉上天，又能不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来让他们承当起教化和养护百姓的责任吗？由于百姓吃不饱，穿不暖，就根本顾不上讲求礼法道义。这是圣人具有养护民众的仁德的原则啊！而养护民众的仁德，又不过像圣上策问中所说的那样：规定出土地和住处，让他们种桑树、饲养家畜罢了。吃得饱又穿得暖却无教化，那又和飞禽走兽差不多。这是圣人具有教化民众的仁德的原因。而教化民众的仁德，又不过像圣上策问中所说的那样：重视学校，宣明礼法道义罢了。然而光知道教化和养护，却不择取人才让他们承当起责任来，就会小人占据职位，没办法贯彻到下面去。

尽管说是要养护民众,但民众蒙受不到皇上的恩泽;尽管说是要教化民众,但民众蒙受不到朝廷的教化。这是任用还没完全都获得到人选,不能不烦劳圣上还得多做考虑的原因。臣下我请求用我朝祖宗教化和养护民众的做法,来为陛下谈一谈。

我朝祖宗养护民众,土地虽然允许他们自行占有,但督促农业生产常下诏令,就像春天的雨水那样来滋润。衣物虽然从来没有家家赐给过,但栽植桑树却有命令,就像春天的太阳那样来照拂。臣下我私下观察我朝祖宗告谕身边的大臣说:穿上帛制的衣服应当想到纺织妇女的辛勤,吃上谷米应当体念耕田农夫的劳苦。还说:皇帝我考虑要使粮食充足,在于禁止工商业活动;要使穿用充足,在于革除奢华淫靡。还说:世人的常情,往往对所习惯的东西不以为然。吃得饱了,就忘记了挨饿的时候;穿得暖了,就忘记了受冻的日子。皇帝我深深了解百姓的艰难,想方设法来劝导督促他们。哎呀呀!扎根在心中而又在言语上表现出来的养护民众的仁德,竟然达到了这等地步!凭借这种仁德去安定天下,那么百姓生活的宽裕富足,果真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住呢?

我朝祖宗教化民众,在京师设立了国子监,来造就天下杰出的人才;在地方上设立府学、州学、县学,来储备和培养民间的优秀子弟。臣下我私下观察我朝祖宗告谕身边的大臣说:治国的要领,教化占居第一位;而教化的途径,学校是根本。还说:教化推行开了,即使是普通居民也可以成为君子;教化推行不开,即使是中等才质的人有的也会堕落成小人。还说:君子知道学习,就会道德兴盛;一般百姓知道学习,就会社会风尚美好。哎呀呀!扎根在内心又在言语上表现出来的教化民众的仁德,竟然达到了这等地步!凭借这种仁德去安定天下,那么百姓德行的端正,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住呢?

然而我朝祖宗,压根就从来没像秦始皇那样每天给自己规定必须批阅完一百二十石重的文书;也没像隋文帝那样命令送上饭来还在处理政务最后才用餐,整日匆忙地耗费精神去教化和养护天下。只不过是每天都任用贤才谋求大治,善于让天下都出力效命罢了。所以我朝祖宗有句话说过:鸿鹄能够飞到遥远的天上,是因为它有羽

毛和翅膀；蛟龙能够腾跃到空中，是因为它有龙鳞和龙须；君主能够实现大治，是因为他有贤能的人才。既然如此，那么我朝祖宗安定天下的仁德，固然达到了最高境界，同时又有哪一点不是通过让天下都出力效命的巨大智慧，确有根据地来补充它呢？

陛下把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推行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大政，同时又与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仁德与智慧没有任何差距，那些教化和养护天下的做法，不可以再有能在它们之上的了。然而仍然忧虑实际效果还没达到极点，臣下我由此又确有理由地知道陛下的这种心念，也就是当年周文王已经获取到大道却还盼求大道好像还没看见的心念，也就是古代吉人天天行善却每天仍然感到还有不足的心念啊！臣下我尽管愚昧，但也曾在平常居处时，考虑过天下的大事，这就是只有仁德才会安定天下，只有智慧才会使天下都出力效命。又私下观察我朝祖宗达到天下大治的原因，也不超出这个范围之外。自己左思右想，觉得除去这一点都不足以为陛下做禀告，所以敢擅自申明这种说法。

大致上说来，陛下用我朝祖宗养护民众的办法来养护民众，又曾在天子专用田地里亲自耕作来加以倡导，作出表率，可以称得上是对养护民众特深厚了。然则百姓的生活还存在着不富裕的现象，这其中的原因并没有别的。前人有句话说过：民众在自己的田地和居住区里安稳不动，同时又没有愁苦怨恨的情绪，原因就在于官府施政平和，打官司得到了公正的审理。与我共同造成这种局面的人，恐怕只是那贤良的郡守吧？还说过：郎中这类官员派出去掌管方圆百里的地方，恰恰同天上的郎位星相对应。如果不是称职的人，老百姓就会受到他的祸害。从前的郡守，也就是现今的知府、太守；从前的百里宰，也就是现今的县令。太守和县令的职务，同百姓的关系最为直接。臣下我曾经打过比方：民众等待着养护就好像婴儿在等待着喂奶，太守和县令恐怕就是给婴儿喂奶的保姆吧？如果作为保姆的人，不懂得喂奶的方法，又接着把他掉在地上，这样还想让婴儿得到适当的安置，也就太难了。臣下我观察当今的太守和县令，把接受和执行上面的命令很敏捷当成本事，却对安抚养育百姓不动心思；把按时交差和呈

交簿册当成头等大事，却对农业生产不留意。严重的，就懈怠懒惰，占着职位什么事也不做，光是白领俸禄；贪婪残酷，狠狠敲榨百姓来自我发财。既然如此，百姓生活还不富裕，也就确有原因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择取合适的人选让他们去担任太守县令的职务，使分布在各个州县的人，都是西汉龚遂、黄霸、东汉卓茂、鲁恭那样的人物。同时又强化升降或罢免的制度，来鼓励或惩戒他们。这样一来，身为太守县令的人，就都能推广陛下养护民众的仁德，来安定天下。眼看着农夫拥有多余的粮米，农妇拥有多余的布匹，而养护民众的效果，自然就达到极点了。

陛下用我朝祖宗教化民众的办法来教化民众，又曾经亲自驾临国家最高学府加以劝勉，可以称得上是对教化民众特深厚了。然而百姓的德行还存在着尚未端正的情况，这其中的原因并没有别的。前人有句话说过：择立师长不能够不慎重。师长严正，然后道德规范才有威力；道德规范具有威力，然后百姓才懂得恭敬地学习。还说过：读书人具有纯正、光明、朴实、勤勉的美德，但没有教导和学习、培养、造就的方法，这是读书人出现毛病的原因啊！如今能使民众恭敬地学习的关键因素，是师长和儒士；能使读书人不存在毛病的关键因素，也是师长和儒士。师长和儒士的职务，是关系到贤士的重要职务。臣下我曾经打过比方：民众等待着去教化就好像铜铁在等待着用模子去铸造，师长和儒士恐怕就是用模子铸造铜铁器物的技艺高超的工匠。如果作为技艺高超的工匠的人，不懂得用模子铸造的方法，接下来又毁坏丢弃了模子，这样还想让铜铁成为器具，也就太难了。臣下我观察当今的师长和儒士，把记忆背诵文章诗句当成下气力的东西，却不知道还有道德和学业；把弄熟一部经书和功课作业当成特长所在，却不知道还有德行。严重的，就感叹自己已经老了，对教书这份差事地位低而感到羞愧，自己替自己谋划，说谎话，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反而给读书人留下耻辱的话柄。既然如此，百姓的德行还不端正，也就确有原因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择取合适的人选让他们担任师长和儒士的职务，使分布在各级学校的人，都是北宋胡瑗、孙復那样的人物。同时又强化谁是第一，谁是最末的考核方法，

来劝勉或惩戒他们。这样一来，身为师长和儒士的人，就都能推广陛下教化民众的仁德，来安定天下。眼看着民户中具有可以进行特殊表彰的人家，人人都成为君子，而教化民众的效果，自然就会达到极点了。

尽管这样，所讲的太守与县令，师长与儒士，又哪里是一定要陛下个个择用他们，个个劝勉或惩戒他们呢？也只是说要择用那些用来再去择用太守与县令、师长与儒士的人，以及用来再去劝勉或惩戒太守与县令、师长与儒士的人罢了。择用太守县令和师长儒士，这是掌管官员考核工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劝勉或惩戒太守县令与师长儒士，这是掌管官员监察工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这两个部门都获取到了合适的人选，太守县令和师长儒士也就都获取到了合适的人选。而陛下使天下都出力效命，就如同身体去指挥手臂，手臂去指挥五指了。天下的民众，哪里还有一个人蒙受不到陛下的仁德呢？像这样，陛下的最高仁德又有巨大的智慧来补充它，而兴盛和美的大治局面，就不用担心不如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期了。因为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教化和养护天下具有后世赶不上的地方，绝窍也不过是仁德与智慧相结合，两个方面都做得特别好罢了。

观察那个时期制定以九百亩为一单位的井田，来处置平坦的土地；制定以一千八百亩为一单位的牧田，来划分水岸低湿的土地。确定九个等级的赋税征收标准，修明水、火、金、木、土和谷物等六类物资储藏的政务。夏朝采用每户人家按五十亩地若干年收获量的平均数交纳实物的税制，商朝采用每户人家按七十亩地来助耕公田的劳役型税制，到周朝就进一步细致化了。在离都城百里以内的“乡”，二百里以内的“遂”这两个行政区划里，采用贡法，每千亩土地上又凿有宽深各四尺的十条田间水道。在离都城三百里至五百里以内的公卿大夫和王室子弟的封地里，采用助法，而八家农户同属一井。进行耕耘就通力协作，收获时就按照亩数各归各家。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时期养护民众的办法。建立有名为“下庠”的学校，作为初级学校；建立有名为“上庠”的学校，作为高等学校。在“上庠”这种高等学校里举行尊崇退职老人的礼仪，在“下庠”这种初级学校里举行敬重普

通老人的礼仪。夏朝把教化民众作为主要内容和目的而称学校为“学”,商朝把熟悉射箭等技艺作为主要内容和目的而称学校为“序”,到周朝就进一步细致化了。在居民点设有教室,在由五百家居民组成的“党”这一级行政单位里设有名为“庠”的学校,在由七万五千家居民组成的“遂”这一级行政单位里设有名为“序”的学校,在国都设有国家最高学府。贵族和民间子弟从八岁开始进入初级学校学习,到十五岁升入高等学校学习。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教化民众的办法。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教化并养护天下,可以称得上是特仁德了。但教导民众种植庄稼,委派后稷来负责;恭敬地施布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种道德教化,委派契来负责。以至于夏朝延揽杰出人才,尊奉上帝的启示来行事;商朝广泛求取最懂得天下道理的人物;周朝能够任用贤才和品德修养特高尚的人,也没有一项不是择取合适人选来把教化和养护民众的事情交付给他们办理好。这表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安定天下的最高仁德,又不是通过使天下都出力效命的巨大智慧去补充它吗?

至于汉朝、唐朝、宋朝的英明君主和杰出帝王,并不是不想养护百姓,但已经不属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那类性质的养护百姓了;也不是不想教化民众,但已经不属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那类性质的教化民众了。拿养护百姓来说,汉朝鉴于秦朝的暴政,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有时征收每年总收获量的十五分之一,有时征收每年总收获量的三十分之一。汉文帝依据贾谊的奏请,亲自在天子专用的田地里进行耕作。汉武帝依据赵过的奏请,确立了每年调换垄背与垄沟位置的耕作方法。唐朝土地和赋役制度定立有按人口分配的专门种植粮食作物的田地和授给男子壮劳力终身私有、世代相传的作为宅基、园圃和栽种桑榆果树的田地,定立有田租、户税和纳绢代替劳役的办法。而宋朝在宋太祖建隆年间也施行过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在宋高宗绍兴年间又实行过丈量田地、重新规定赋税定额的措施。这些可以称得上是很理想了。然而西汉董仲舒奏请定立限制土地占有数量的规定,但汉武帝却被众多的欲望所牵制而不予采纳。师丹到后来也奏请定立限制土地占有数量的规定,但汉哀帝却

因遭到外戚和受宠爱的人的阻挠而未实行。口分田和永业田遭到破坏，发展成土地兼并；租庸调制度遭到破坏，演变成按夏季、秋季征收的税制。在各地调剂物资的这种朝政，自身就同商人的活动一个样。要求民户自报壮劳力和田产实际情况的这条法令所带来的祸害，殃及到各家的鸡鸭小猪。由此就可以看出汉朝、唐朝、宋朝养护百姓的仁德究竟怎么样了。况且汉朝太守和县令称得上遵守法度、依从事理施政的人，在史书上数得出的总共才有十八个；唐朝才有十个，宋朝也不过二十个罢了。郡县布满天下，却只有这几十个人，而且又是在一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中隔段时间才涌现出来的。这就从反面表明，太守和县令不遵守法度、不依从事理施政的人，又是多么地多啊！这样的太守和县令数量多，就证明汉朝、唐朝、宋朝使天下都出力效命的智慧，不足以补充它们那养护百姓的仁德了。这还责怪什么它们比不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养护百姓呢？

拿教化民众来说，东汉光武帝在京师洛阳兴建国家最高学府，明帝又亲自驾临国家最高学府，举行尊崇德高望重的老人的礼仪。在辖区内部，皇亲国戚和大臣公卿的子弟都入学学习，在辖区外部，匈奴部族也派遣他们的子弟前来入学学习。唐朝教育制度设有弘文馆、太学这类学府，来招收皇亲国戚和贵族子弟；设有广文馆、书学这类学校，来招收臣僚和民间百姓的优秀子弟。宋朝又设有太学、宗学、武学等，来划分学生的类别；定立没有名额限制的刚入学的外舍，经过考试升入的定额为二百名的内舍，再升入的定额为一百名的上舍。以此来递次提升学生的等级。这些可以称得上是很完善了。然而学校校园全都荒废成了菜园子，学生大多都被列入了朋党的名单上。早晨下雨漏，晚上还在里面住，只剩下四周墙壁的，就是当时的校舍。肚子饿得直哭，身上冷得直叫，登上城墙去抗拒敌军的，就是当时的老师和学生。由此可以知道汉朝、唐朝、宋朝教化民众的仁德究竟怎么样了。况且汉朝的师长和儒士，著名的少得可怜，兴办地方学校的，也只有蜀郡郡守文翁这类人罢了。唐朝的师长和儒士，值得让人称述的，不过就是韩愈、阳城等几个人。而宋朝十分突出的师长和儒士，除去孙復、胡瑗以外，也不多见。学校布满天下，却只有这么

几个人，而且又是在一千多年的漫长过程中隔段时间才涌现出来的。这就从反面表明，师长和儒士丧失掉职责的人，又是多么地多啊!这样的师长和儒士数量多,就证明汉朝、唐朝、宋朝使天下都出力效命的智慧，不足以补充它们那教化民众的仁德了。这还责怪什么它们比不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教化民众呢?

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教化和养护天下既然是那等模样，而汉朝、唐朝、宋朝赶不上又是这般情形。这就难怪圣上的策问把良好的方法、美善的意图归奉给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而又认为汉朝、唐朝、宋朝比照起它们来就属于存有差距了吧?把良好的方法、美善的意图归奉给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目的是要效法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啊!认为汉朝、唐朝、宋朝比照起它们来就属于存有差距了,目的是把汉朝、唐朝、宋朝鄙视到提不起来的地方去。臣下我愚昧地认为,打算效法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把汉朝、唐朝、宋朝鄙视到提不起来的地方去,又哪里一定要不知变通,被古代拘束住却不通晓当今呢?其实说来,也只是效法我朝祖宗安定天下的仁德和使天下都出力效命的智慧,去实现天下大治,就像这个样子罢了。《尚书》中讲:把先王的已有法则和事例当成镜子,就永远不会出差错。《诗经》上也说:不出错,不遗忘,一切都按旧有的规章去行事。臣下我的愚昧看法，实际上就是由经书中这几句话得出来的。跪拜希望陛下不因为它容易去做就忽视了它，不因为它是老生常谈就厌恶它。这样就会家家没有不充裕的,人人没有不富足的,教化没有不推行开的,刑罚没有不搁置起来不动用的,礼仪乐舞由此而兴盛,社会风气由此而美好,可以功德给祖宗增添光彩,可以业绩给万世子孙留传下了。

尽管如此,探究到底来讲论,根本又不超出陛下的整个心念去。因为仁德是那心念的完美德业，智慧是那心念的神灵般的圣明。心念的完美德业一旦被个人的打算所遮蔽，就会自己想站得住却不去让别人也站得住，自己想事事行得通却不去让别人也事事行得通。他看待天下安定还是不安定，就如同南方的越国人看待北方的秦国人是肥胖还是瘦弱,毫不在意,而内心也没有任何反应了。臣下我希望陛下,去除掉夹杂着个人在内的私意,使没有个人在内的公心胜过

一切，像对待自身那样来对待家族，像对待自己的家族那样来对待国家，像对待自己的国家那样来对待天下。同时又推广并实现它们，不搅乱那先后的顺序和轻重的位置。这样一来，世上所说的一视同仁，厚待关系亲近的人，提拔关系疏远的人，就只在圣上心念的一转动之间罢了。像这样去做了，天下却还不安定，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心念像神灵般的圣明，一旦被个人的欲望所拖累，就会喜好什么却不清楚它的坏处，憎恶什么却看不到它的好处。对于天下的贤才和不成器的人，就会像瞎子扣击铜盘，触摸蜡烛，以为这就是太阳的形状和光线，可自己还始终不知道这纯属不对。臣下我希望陛下，保持恭敬来确立起宁静虚明的主体，穷尽事理来作为顺从和应对的施用。不产生个人的喜好和厌恶，不随顺那些狎昵的小人，不遗漏那些离自己远的人。同时又提拔任用他们但不在短暂的时间里就要求做出成绩来，不被进谗言和献媚讨好的人所挑拨而对他们产生怀疑与隔阂。这样一来，世上所讲的尊重贤才，任用能人，杰出人才都担任官职，就只在圣上心念的一运转之间罢了。像这样去做了，天下却还不替我出力效命，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易经》上说：端正那心念，各种事务都得到治理。孟子也说过：心念已经端正了，然后天下的事务就会紧跟着得到治理了。这些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

臣下我很愚昧，学识不足以等待朝廷询问，才能不足以通晓当今。对最为恰切的论述，不清楚到底表现在哪些地方。然而竭尽那仅有一点心得的愚昧看法，实在是出自献上微不足道的一点东西的忠诚，并不敢荒谬地编造夸诞的言词来辜负陛下啊！跪拜只请稍微赐给一两眼圣明的观览，天下就万分幸运了。臣下我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王鏊　殿试对策

王鏊（1450～1524）　字济之，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成化十一年（1475）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时年26岁。后进侍讲，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对宦官屡有抵制和抗争。且博学有识鉴，文章典

雅淳厚，议论明畅。撰有《姑苏志》、《震泽集》、《震泽长语》、《震泽纪闻》等。

臣对：臣闻帝王之御天下，有致治之法，有保治之法。致治之法存乎具，保治之法存乎心。存乎具者，非一也，然无大乎教养。养周矣，教洽矣，而一心懈焉，则治之所逸者，弊必因之以生；弊之所生者，法必随之而弛。欲以保治，臣愚知其不可。是故治未立，而有为者所以致之也；既立，而无逸者所以保之也。今天下承平百余年，海宇宁谧，黎民向化，凡所以固邦本、善民俗、统理万事之具，纤悉具备，治盖不劳乎致也。然道久而不渝，法久而或弛。法久矣，不思所以保之乎？圣如大舜，益之戒犹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治如成王，周公之戒犹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易》言法天，而在于自强不息；《书》言慎德，而归于罔或不勤。自古有国家者，未有不以勤而兴，以逸而废。故臣敢谓保治在乎勤，勤则德可久，业可大，法可保而无弊也。

伏惟皇帝陛下，聪明神武，有圣人之德；宽仁恭俭，有君人之度。凡古帝王所不能有者，皆兼而有之矣。犹谓求贤，盛典也。乃躬策臣等于廷，而咨以当世之务。始之曰：奉天子民，莫先于教养。此致治之要也。终之曰：夙夜兢惕，不遑宁处。则保治之要在是矣，臣复何言？惟陛下有是言也，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必有是行，则生民之福也。臣敢拜手稽首，对扬休命。

窃惟天之所以寄于君者，曰养曰教。人君之所以奉天者，曰勤。夫贵为天子，宜可少逸矣。而古之圣人，兢兢业业。计其一岁之间，无日之不勤；一日之间，无时之不勤者，岂独好乎是哉？必其灼见天之所以付乎己者甚大，则其所以责乎己者甚重。一息而少逸焉，则天职尽废矣。故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勤盖无时不存也，而治安之时，尤所慎焉；亦无事不存也，而教养之事，尤所急焉。勤至而教养备，教养备而王道成。

国朝法制，超越前古。汉唐宋以来，取民多过其则。我太祖始定为十一之中制，申明天下，使四方各守其业，而游食末作，莫不

有禁。学校之弊，至元极矣。我太祖即位之明年，诏郡县立学，士必通经而后得举。规模宏矣，文章焕然。列圣相仍，未尝改也。然行之既久，而实效之臻犹未有以满圣心者，独何欤?臣愚以为，弊在于人，不在于法。法非不美也，而行之既久，则人情渐玩，民伪渐滋，而法亦随之以弛矣。请言其弊。

自民之偏聚也，或地旷而患无可耕之人，或人稠而患无可耕之地。自吏之慢法也，或腴田而赋反轻，或下田而赋反重。为士者，以离章摘句为通经，通经果若是乎?为师者，以月书季考为正学，正学果止是乎?夫今之法，祖宗之法也；今之天下，祖宗之天下也。岂昔用之而有功，今用之而无效哉?故曰弊在于人，不在于法。诚有如圣谕所谓任用之不得其人，而劝督作兴之道有未至也。然实效不臻者，固劝督作兴之未尽其道也。劝督作兴之未尽其道者，固任用之不得其人也。而任用之不得其人者，岂其有未勤欤?岂勤而未得其要欤?古者天子勤政于上，则百职奔走于下。群才并用，百度具举，可覆视也。今人才布列中外，未当乏人，然陛下有劝农之诏矣，而劝农者谁欤?有兴学之诏矣，而兴学者谁欤?前此之弊，漫不加省，此臣所以妄论庶政之有未勤，或勤而未得其要也。夫图治莫若勤政，勤政莫若任人。陛下万机之繁，固不得事事而亲之也，要在于求贤。勤以求贤，则任用皆得其人；任用皆得其人，则劝督作兴各得其道；劝督作兴各得其道，而患实效不臻于极哉?

伏读制策，见陛下慨想唐虞三代之盛，而不满乎汉唐宋之为，且不以今之治自足，必求至于唐虞三代而后已也。夫井田之制，黄帝始之，历代广之，而有曰贡、曰助、曰彻之名焉。成均之学，五帝有之，历代因之，而有曰庠、曰校、曰序之名焉。然莫有盛于周者。观夫小司徒井牧其田野，衍沃之地则百亩为夫，九夫而为一井；隰皋之地则九夫为牧，二牧而当一井。计口受田，故富不至于侈，贫不至于歉。岁代其处，故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民年二十而受田，六十而归田，盖无不耕之人，亦无不耕之地也。小学则教以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大学则教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养国老于东胶，养庶老于虞庠，明其等也。春秋

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顺其时也。人生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盖无一人之不学，亦无一地而无学也。其立之有本，故其及于民者速；其行之有渐，故其入于人者深。德义涵濡，久而不息。此唐虞三代之所以殷于民也。下至汉唐宋，既不足以拟此，然一代之制，亦足以维持一代之治。

汉初，山川、园池、市租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人为私奉。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及文帝感贾谊之言而开藉田，武帝用赵过之议而行代田，则有志于养者也。光武起太学而稽式古典，明帝临辟雍而尊事三老，则有志于教者也。唐制田有口分，有世业，而以租庸调取之，其法密矣。学有四馆，有七院，至诸酋长皆遣子入学，其化广矣。宋兴，定民籍为五等，分太学为三舍。建隆之行均田，绍兴之正经界，不为不详；庆历之诏立学校，绍兴之遴选学官，不为不至。而治效之成，卒不如古者，得非分田制产，兴学崇儒，终非古之制乎？即使分田制产，尽如古井牧之法；兴学崇儒，尽如古庠序之教。而治效之成，臣知其终有愧于古也。盖其所务者，法而已。唐虞三代之所以殷于民者，固莫之知也。一代之君，或勤于前而怠于后；一君之身，或勤于始而怠于终。其立法既无其本，而行之又无其实，何怪治之不如古哉！

猗欤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兵革不试，刑罚罕用，天下涵煦于德泽，百年之深。《易》所谓久于其道，天下化成，《书》所谓既历三纪，世变风移之时也。而教、养二事，犹有廑宵旰之忧，至于夙夜兢惕，不遑宁处。圣心忧勤，乃至于是！是心也，可以保治于亿万年之久矣。夫陛下即位之初，躬耕藉田，亲幸太学，于时民财为之渐丰，士气为之一变。此亦忧勤于道之明验也。临御以来，十有一年于兹矣。早朝晏罢，此心未尝少衰。而臣犹有所献者，前代之君，当未治之先则忧，忧则勤，勤则治。既治之后则骄，骄则怠，怠则危。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故臣愿陛下恒存此心而勿失也。苟恒存之而勿失，则所以跻斯世于雍熙泰和者，固有待于他求乎？孟子有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况陛下欲养民，则制田里，广树畜，有成宪矣；欲教民，则崇学校，明礼义，有定法矣。譬如居室，太祖创造此室者也，四宗经营此室者

也，陛下则端拱而有之，固不必大有作为而更张之也，然不可一无所为而废弛之也，在以时修葺之而已，以时丹臒之而已。是故保之在乎勤。臣前所谓勤以任人者，岂徒然哉?

惟陛下所其无逸，确乎不移，推是心也，养民则责之守令，教民则责之师儒。而申敕藩臬、提督之任，虽不必尽如古井牧之法，亦必抑豪右，禁贪残，斥游惰。仲舒限田之议，苏轼均税之说，可一举而试之乎?然此非重守令之任不可。臣愚以为，政有异绩者，当增秩以励其心，而勿骤夺其政。则官知任之久，得以行其志；民知官之久，得以从其化矣。如是，而可责其养民之实效。虽不能尽如古庠序之教，亦当抑奔竞，重行检，明经学。朱熹贡举之议，胡瑗体用之学，可一举而行之乎?然此非重师儒之任不可。臣愚以为，学行修明者，当待以不次之任，而勿视为不急。则人之待之也重，彼之自待也亦重矣。如是，而可责其教民之实效。

数者之事，既委于下，而陛下总揽乾纲，时以训迪于上。曰：吾用某人治某郡，某郡果治矣乎?用某人化某邑，某邑果化矣乎?如前代故事，或召对便殿，或记句屏风。其考最者赏之陟之，殿者黜之罚之。则人臣皆奋迅，以自见于事功，而无委靡之患矣。臣前所陈之弊，又何患于不去哉?非直去弊而已，所谓家给人足，教行刑措，礼乐兴而风俗美者，未必不由此以致之也。

陛下试观典籍所载，孰勤而不兴，孰情而不危乎?虽然，自昔人君，皆欲勤于治矣。然一有所溺，则虽欲勤而不可得。盖心既溺于此，事必怠于彼，理之固然者也。故声色货利而溺焉，欲勤而不可得也；游田土木而溺焉，欲勤而不可得也；异端学说而溺焉，欲勤而不可得也。惟一则勤，唯勤则治。陛下于此数者，一皆屏去而勿迩，则此心虚明专静。圣学可由是而明，圣德可由是而崇，可以祈天命，可以诚小民，可以绳祖武，可以裕后昆，独教养乎哉?

抑尝闻之，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臣之私心，窃以自誓久矣。及被顾问，而一旦迁就其说，则所谓修于家而坏于廷者，臣窃耻之。是以愚衷所怀，承问辄发，不以浅深自愧，不以喜怒上虞，亦区区不能自已之忠也。惟陛下万机之暇，为社稷生民一

留意焉，不胜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统治天下，具有实现大治的法则，具有保持大治的法则。实现大治的法则寄寓在施政的措施中，保持大治的法则寄寓在君主的心念中。寄寓在施政措施中的东西，并不是一种，然而没有能比教化和养护民众更重要的了。养护周全了，教化普及了，但那君主的整个心念一松懈，在治理上就贪图安逸了，而弊病一定会依据这一点就产生出来；弊病产生出来了，法度就一定会紧跟着废弛下去。这样还想保持住大治，臣下我尽管很愚昧，但也很清楚是办不到的。因此大治还没确立起来，而大有作为是实现它的必由之路；已经确立起来，而不贪图安逸是保持住它的根本保证。如今天下太平递相延续已经一百多年了，整个辖区安宁无事，众百姓归向教化，凡是用来巩固国家根本、使民间习尚变美好、统领处置各种政事的措施，连最细微的地方都一样不缺，大治恐怕不用再怎么操劳就会实现了。然而大道无论时间有多长也不会改变，但法度时间一长有的就会废弛。法度已经时间很长了，不考虑保持住它的对策吗?像大舜是那样地圣明，而伯益告诫他的话语仍然说：不要沉溺在安逸中，不要过度地享乐。像周成王是那样地治绩显著，而周公告诫他的话语仍然说：不要在观赏、安逸、游玩、打猎等方面任意放纵。《易经》上强调效法上天在于自强不息，《尚书》中强调慎重对待德行而归结到没有一件事情不勤勉。自古以来拥有国家的君主，从来没有过不因勤勉而振兴，不因安逸而灭亡的。所以臣下我敢说保持大治在于勤勉，勤勉就仁德能长久，功业能盛大，法度能保持住而不出现弊病。

跪拜想来，皇帝陛下耳聪目明，神奇勇武，具有圣人的美德；宽厚仁慈，恭敬节俭，具有统治世人的器度。凡属古代圣帝明王所无法具备的东西，全都同时具备了。但仍然认为求取贤才是盛明的典则，竟然在殿廷上亲自策问臣下我等人，用当今需要解决的大事进行询问。一开始就说：敬奉上天，向对待儿子那样对待百姓，没有比教化和养护更占首位的了。这正是实现大治的关键啊！最后

说：每天从早到晚戒惧谨慎，保持警惕，根本顾不上安宁地歇一会儿。而保持大治的关键也就在这一点上了。臣下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只因陛下具有这样的话语，就必定具有这样的心念；具有这样的心念，就必定具有这样的行动。而这正是人间百姓的福分啊!臣下我敢敬行叩拜大礼，对答称扬陛下的美好诏令。

私下想来，上天托付给君主的责任，叫做养护百姓，叫做教化民众。君主奉事上天的东西，叫做勤勉。尊贵得身为天子，理所当然地可以稍微安逸一下了。然而古代的圣人，却兢兢业业。统计他们在一年之内，没有一天不勤勉；在每天之内，没有一时不勤勉。原因哪里是偏偏就喜欢好这个样呢?必定是他们鲜明地看出上天托付给自己的责任非常大，从而自己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也特别高。有片刻稍微地安逸了，上天交给自己的职责就全都荒废了。所以《尚书·皋陶谟》强调切勿荒废百官的职守，上天的事情由人代替它做好。勤勉大致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着，而当治理安定的时候，更应该格外注意；也在任何事情上都要保持着，而对教化养护百姓的大事，更需要放在首位来解决。勤勉到极点，教化和养护百姓就齐备；教化和养护百姓齐备，仁政就形成。

我们大明皇朝的法令制度，超过以往任何朝代。从汉朝、唐朝、宋朝以来，向百姓征收赋税大多都超过标准。我朝太祖首先制定成收取每年总产量十分之一的最为适中的制度，向天下公布宣明，使全国各地分别守执自己的职业，而到处游逛混饭吃和从事工商业活动，没有哪项不具有禁令的。学校的弊病，到元朝已经发展到极限了。我朝太祖在登上帝位的第二年，就下诏给各郡县，命令建立学校，读书人必须通晓儒家经典，然后才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这种长远筹划太宏大了，文采十分鲜亮。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沿用，从来没做过变动。但是行用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可达到实际效果仍然存在着未能使圣上的心中确实有理由感到满意的地方，这又偏偏是什么原因呢?臣下我愚昧地认为，弊病出现的原因在于人本身，不在于法度。法度不是不完美，但行用的时间既然很长了，人们的思想就会逐渐不再当回事，百姓的奸诈邪恶也逐渐滋生蔓延

开来，法度也紧跟着废弛了。臣下我请求谈一谈具体的弊病。

自从民众选择好地方聚居，有的地方土地很多却发愁没有去耕种的人，有的地方人口稠密却发愁没有能耕种的田地。自从官吏胡乱对待国家法度，有的明明是土质肥沃的田地，赋税反而收得少；有的明明是土质瘠薄的田地，赋税反而收得多。做为读书人，把划分经文段落、摘录词句看成是通晓经书，通晓经书果真是像这个样子吗?作为师长的人，把每月一默写、每季一考试看成是正统的学业，正统的学业果真就局限在这方面吗?如今的法度，依旧是我朝祖宗的法度；如今的天下，仍然是我朝祖宗的天下。难道真是过去施用它却成就功业，而现今行用它却无法取得效果吗?所以说弊病出现的原因在于人本身，不在于法度。确实像圣上训示所指出的那样：任用官员还没获取到合适的人选，而劝勉督察、振作兴用的办法还存在着不完备的地方。然而实际效果没达到，固然由于劝勉督察、振作兴用还没把方法完备化；然而劝勉督察、振作兴用还没把方法完备化，固然由于任用官员还没获取到合适的人选；然而任用官员还没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恐怕是因为圣上还存在着不够勤勉的地方吧?恐怕是圣上勤勉还没获取到其中的要领吧?古代的天子在上面为政事操劳，百官就在下面奔忙。各种人才一起使用，所有政务全部振兴。这是可以查照验核的。如今人才在朝廷内外到处分布罗列，不应当缺乏合适的人选。然而陛下颁布鼓励农业生产的诏书了，可真正去鼓励农业生产的人，又是哪一个呢?下达兴办学校的诏书了，可真正去兴办学校的人，又是哪一个呢?对以前的这些弊病，一点儿也不予以注意，这是臣下我胡乱议论各种政务还存在着不够勤勉的地方，或者勤勉还没获取到其中要领的原由。谋求大治，没有比勤于政事更紧要的了；勤于政事，没有比任用人才更紧要的了。陛下每天处理繁重的政事，压根就不可能做到事事都亲自裁断，关键在于求取到贤才。依仗勤勉去求取到贤才，就会在任用上都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在任用上都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就会劝勉督察、振作兴用各自寻找到恰切的办法；劝勉督察、振作兴用各自寻找到恰切的办法，却还忧虑实际效果不达到极点吗?

跪拜敬读制策，看得出陛下慨然追想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况，对汉朝、唐朝、宋朝的作为感到有差距，而且不因当今的治绩自我满足，必定要谋求达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以后才算作罢啊！井田这种土地制度，黄帝开始创立，后来各个朝代加以推广，产生了贡、助、彻这些税制名称。成均这种国家最高学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期都曾设立，后来各个朝代加以沿袭，产生了庠、校、序这些学校名称。然而哪个朝代也没有能比周朝更兴盛的了。观察地官小司徒把国有土地划分成井田和牧田两种基本单位，平坦的田地就以一百亩作为一户人家的占有定额，九户人家也就是九百亩构成一块井田。水岸的低湿田地就以九户人家占有的定额构成一块牧田，二牧即一千八百亩相当于一块井田。按照人口授给田地，所以富裕的人家不至于太奢侈，贫困的人家也不至于吃穿不够；每年轮换所耕种的田地，所以分到土质肥沃的田地的人家不能够单独享用那好处，分到土质瘠薄的田地的人家也不会单独承受那苦处。百姓年满二十岁就授给田地，到六十岁再把田地归还给国家。由于没有不从事耕作的人，也就不存在不被耕垦的土地啊！在初级学校就用礼仪、乐舞、射箭、驾车、写字、算术的课程教育他们。到高等学校就用穷尽事理、端正心念、修养自身、管理他人的原则与方法教育他们。在位于国都王宫东面的名为东胶的高等学校里举行尊崇退休老人的礼仪，在位于国都西部郊区的名为虞庠的初级学校里举行尊崇普通老人的礼仪，这是宣明等级区别啊！春季和秋季用礼仪乐舞教导他们，冬季和夏季用《诗经》、《尚书》教导他们，这是随顺天时啊！人到八岁就进入初级学校，十五岁就进入高等学校。由于没有一个人不接受教育，也就没有一个地方不建有学校啊！那时所定立的国政具有根本，所以推行到百姓那里的就迅速；那时施行的措施具有步骤，所以灌输到人们脑子里的就深刻。仁德道义的滋润薰陶，长久坚持而不止息。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对百姓殷切的做法。往下延续到汉朝、唐朝和宋朝，已经不足以同它相比拟，但一个朝代的制度，也足以维持住一个朝代的治理。

汉朝初期，山川、园池和商业税的收入，从天子一直到公主和封给侯爵的贵族的私邑赋税，都由自己征收上来作为朝廷给他们的俸禄。至于考察古代、制定礼乐制度这类事情，还大多是空白。直到汉文帝对贾谊的建议有所感触，便开辟天子用来亲自耕作、鼓励农业生产的专用田地；汉武帝采纳赵过的意见，就推行每年调换垄背与垄沟位置的耕作方法。这表明是对养护百姓怀有志向了。东汉光武帝兴建太学这一国家最高学府，而考察并效法古代的典制；明帝亲自驾临辟雍这一国家最高学府，而尊敬地对待德高望重的老人。这表明是对教化民众怀有志向了。唐朝的制度规定，田地有按人口分配的专门种值粮食作物的口分田，有授给男子壮劳力终身私有、世代相传的作为宅基、园圃和栽种桑榆果树的永业田，并通过田租、户税和纳绢代替徭役的制度来征收财物。当时的法度也够细密了。学校设有弘文馆、崇文馆、广文馆、崇玄学，还设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和集贤殿书院，直至各处少数部族的首领都派遣自己的子弟入校学习。当时的教化也够广泛了。宋朝建立，把居部的户籍定立成五等，把太学划分成外舍、内舍、上舍三种级别。宋太祖建隆年间施行过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制度，宋高宗绍兴年间又丈量土地，重新规定赋税定额，不是不详明。宋仁宗庆历年间下诏让各地兴办学校，宋高宗绍兴年间挑选负责学校工作的官员，不是不周全。但治理效果的形成最终比不上古代，原因恐怕是分配土地和规定田产，兴办学校和推崇儒学，到头来毕竟不是古代的制度吧?即使分配土地和规定田产同古代井田、牧田的做法一模一样，兴办学校和推崇儒学同古代庠序的教育丝毫不差，但治理效果的形成，臣下我也知道他们到最后在古代面前也有惭愧之处。因为他们下大气力的地方，只是个法度罢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对民众殷切的办法，他们压根就不了解呀!一个朝代的君主，有的在前一阶段很勤勉，但到后一阶段就懈怠了。同一位君主，有的在开始时很勤勉，但到最后就懈怠了。他们定立法度已经就没有根基，推行起来又没有实际，这还责怪什么治理比不上古代呢?

真盛明呀!我们的大明皇朝，树立楷模能够一直保持到现今的美好局面!武器不再演试，刑罚很少动用，天下被仁德的恩泽滋润养育，深厚到一百年。这是《易经》上所讲的：在那治国大道的行用上坚持长久，天下的教化就形成了。也是《尚书》中所讲的周朝经过三十六年的教化，使商朝遗民彻底转变的那样的时代啊!然而教化民众、养护百姓这两桩大事，仍然存在着皇上为此而终日忙碌的忧虑，直至从早到晚戒惧警惕，根本顾不上安宁地歇一会儿。圣上心中忧虑勤勉，竟然达到了这等地步!有这样的心念，真可以保持大治到亿万年之久了。陛下在登上帝位的当初，就在天子专用田地里举行亲身耕作的大礼，又亲自驾临太学，在当时百姓的财富为此而逐渐丰厚，读书人的风气为此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这也是在治国大道上忧虑勤勉的明显的效验啊!从统领天下以来，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每天早早就临朝听政，很晚才退朝。这种心念从来没有稍微地减弱过。然而臣下我仍然有所献呈的原因，是因为以往朝代的君主，正值大治还没实现的时候，往往就忧虑，忧虑就勤勉，勤勉就实现大治。但到实现大治以后，往往就骄傲，骄傲就懈怠，懈怠就出现危险。在起始阶段做得特别好的君主确实很多，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君主恐怕很少。所以臣下我希望陛下，经常保持住这种心念，切莫丧失掉。如果真地经常保持住而不丧失掉，用来把这个社会带入到兴盛和美的境地中的途径，原本上还需要再向其他方面去寻求吗?孟子有句话说过：运用这仁德的心念，施加到其他方面上去就可以了。况且陛下打算养护百姓，规定田地和住处，多种桑榆果树和多养家畜，已经具有祖宗的法规和事例摆在那里了。打算教化民众，重视学校，宣明礼法道义，已经具有固定的规章制度设置在那里了。这就好像住进居室，我朝太祖是首先建造这座居室的人，太宗、仁宗、宣宗、英宗这四位先帝是整修这座居室的人，而陛下什么也不用去做就享有它了。这压根就没必要再去大有作为改变它，但也不能一无所为让它废弛下去，只在于按时修缮一下罢了，按时涂上一些色彩罢了。所以保持住大治在于勤勉。臣下我在前面所说的依仗勤勉去任用官员，哪里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呢?

只请陛下在位执政，不要贪图安逸享受，对此坚定不移。推广这种心念，养护百姓就交付给太守县令办理好，教化百姓就交付给师长儒士办理好。同时又命令布政使、按察使、提督这些官员，虽然不一定要完全照古代井田和牧田制度那样去做，但也必须抑制地方豪强，禁止贪婪残暴的行为，惩办四处游逛和好吃懒作的人。西汉董仲舒关于限定土地占有数量的建议，北宋苏轼关于均衡赋税负担的主张，可以一举试行吧?然而这必须重视太守和县令的职务。臣下我愚昧地认为，施政具有突出成绩的，应当提高他的品级和俸禄，来鼓励他的志向，但不要一下子就把他调走。这样一来，官员知道担任这个职务会很长，得以施展他的抱负；而百姓也知道这个官员会长久留任，得以听从他的教化了。像这样去做了，就可以要求他拿出养护百姓的实际成效来。虽然不一定要完全照古代学校的教育那样去做，但也应当抑制投机钻营，重视节操品行，宣明儒家经典的学问。南宋朱熹关于推荐士子的建议，北宋胡瑗既有本体又有施用的培养内容与方式，可以一举行用吧?然而这必须重视师长和儒士的职务。臣下我愚昧地认为，学业和品行都做得很突出的人，应当用破格提升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不要把这看成是次要的事情。这样一来，人们看待他们就很尊重，而他们自己看待自己也就很尊重了。像这样去做了，就可以要求他们拿出教化民众的实际成效来。

以上这几方面的事情，已经交付给下面去办好，而陛下在上面总揽朝廷大权，经常进行训导启发。要反问一下说：我任用某人去治理某郡，某郡果真得到治理了吗?我任用某人去教化某邑，某邑果真得到教化了吗?依照前代的已有惯例，或者在便殿把他们宣召上来作对答，或者在屏风上书写施政的名言警句。对考核中被评定为第一等的官员，要赏赐他，要提升他；对被评为最末一等的官员，要罢免他，惩罚他。这样一来，臣僚们就全都奋勉快速地在事功上自觉显示出来，而无萎靡不振的害处了。臣下我在前面所陈述的弊病，还忧虑什么去除不掉呢?不光是去除掉弊病就算完事了，世上所讲的家家充裕，人人富足，教化大行，刑罚搁置起来不动

用，礼仪乐舞兴盛，社会风气美好，不一定就不由此而实现了呀!

陛下试加观阅典籍所记载的东西，有谁勤勉却不兴起，有谁懈怠却不危亡呢?尽管如此，自古以来君主都想在治理上要勤勉了，然而一旦有所沉溺，即使想勤勉也不可能做得到。因为心念已经沉溺在这个方面上了，事情就必定在那个方面上懈怠下来。这是本来如此的道理。所以沉溺在歌舞美色、财物私利上面了，想勤勉也不可能做得到；沉溺在游玩打猎、兴建宫殿上面了，想勤勉也不可能做得到；沉溺在道教佛教上面了，想勤勉也不可能做得到。只有对仁德专一才会勤勉，只有勤勉才会天下大治。陛下对于上面的几种烂玩艺，完全都摒弃掉而不接近，这个心念就虚寂明净，专注宁静。圣人的学问就可以由此而明了，圣人的美德就可以由此而崇高，能够祈求到天命，能够使普通百姓和谐，能够对祖先的事业慎重守护，能够给后代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哪里仅仅是教化和养护百姓呢?

然而又曾听说过，君子事奉自己的君主，务必要用符合正道来做引导。臣下我的个人想法，私下用这一条给自己立下誓言已经很长时间了。等到蒙受陛下询问，却一下子顺着询问的话题来讲说，这就纯粹是人们所讲的：在家中修习却在朝廷上来败坏了。臣下我对此私下认为是耻辱。所以愚昧内心所怀有的见解，承奉询问就抒发出来，不因肤浅或深透而自己感到惭愧，不把上面听后高兴还是恼怒当成忧虑，这也只是无法自我作罢的一点点儿忠诚啊!只请陛下在处理繁重政务的空隙里，为了江山社稷和天下百姓稍微留点儿意，也就幸运到极点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丁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

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

殿试策问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自昔帝王，创造丕图，必有贻谋，以为长治久安之计。夏商周之迹见于经，汉唐宋之事具于史。朕欲闻其纪纲、统体、制度得失之详。迨其嗣世之君，欲保盈成，以跻至治，一惟旧典是遵是用。其或久也，不能无偏而不举之处，则亦兴其滞，补其弊，期使斯民得被先王之泽，如夏启、商宗、周宣王是已。而汉唐宋之君，亦有能庶几者乎?朕欲究其奋励有为、功业可称之实。夫事不稽古，固无以证今；然徒泛论古之人，而不求今时之急务，亦非纳言之善也。昔朕太祖高皇帝奄一寰宇，建制垂宪，万世攸崇。太宗文皇帝定鼎两京，洪谟远略，光前裕后。列圣相承，益隆继述，斯民乐育于熙皞之治，已百二十年矣。然治极而弛，理势自然。祖宗良法美意，岂能悉祗承而无弊乎?肆朕惓惓以法祖为念，欲俾内外百司，群工庶职，咸思奋庸熙载，恪守典训而慎行之，毋滋偏失不举、名存实爽之议，用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中国尊而四夷服，风雨时而嘉祥至，谅必有道矣。尔诸生皆学古通经，有志于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对，毋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给下属做出榜样，宽恕别人的小过错，举拔优秀的人才。

对比夏商周三代明王而没有差错，树立在天地之间而没有违背，向鬼神质正而没有疑问，多少代以后即使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加以改变。向鬼神质正而没有疑问，这是懂得了天道啊！多少代以后即使再有圣人出现也不会加以改变，这是了解了世人啊！

喜欢天命的人能保有天下，敬畏天命的人能保有本国。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自古以来，历朝帝王开国创业，都一定有治国方略留给子孙后代，作为长治久安的大计。夏商周的踪迹在经书上看得到，汉唐宋的事迹在史书上写得很详尽完整。皇帝我希望了解一下他们在纲纪、体统、制度方面成功与失败的详细情况。到了继位的君主那里，打算保持已有的功业并达到鼎盛状态，所以就完全遵循、执行旧制。但时间一长，有的就不能不出现偏差失效的地方，于是又把停滞不前的东西振作起来，补救弊病，打算让自己的民众能够享受到先王的恩泽，像夏后启、商高宗、周宣王就是这样。那么汉唐宋的君主，也有能基本够得上这样的吗？皇帝我希望探究一下他们积极奋进、有所作为，功业值得称颂的实际表现。凡事不考察古代，当然就无法验证当今；但只是泛泛讲论古人，却不研究眼前火燎眉毛的事务，也算不上听取言论真不错。从前我那太祖高皇帝统一天下，建立起各项制度，留下法规，让子孙万代来奉行。太宗文皇帝在南京、北京稳定住江山，宏图远略，光耀祖宗又遗泽后世。各位圣君递相承接，进一步发扬光大祖宗的帝业，百姓欢乐地生活在太平盛世之中，已有一百二十年了。然而治理达到顶峰，就会松弛，这是势所必至的。祖宗的有效措施和美好意图，怎么会完全继承下来而不产生弊

端呢？皇帝我也赤诚地把效法先祖作为心念，想让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大小官员，全都想到奋发努力，弘扬帝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的法典和训条，谨慎地执行，不让舆论产生偏差失效、名存实亡的批评，以便达到官员称职，百姓乐业，华夏尊贵而四周部族归服，风调雨顺而吉兆降临，想必一定是有好办法了。你们这些学子都是研究古代、通晓经典、有志被世上所用的人，请各自直抒己见，回答问题，不要有什么隐瞒。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

费宏　殿试对策

费宏(1468～1535)　字子充，号鹅湖，铅山(今属江西)人。成化二十三年(1487)状元。后任户部尚书，入阁辅政为首辅。为人持重识大体，明习国家制度。著有《费文宪公集》、《宸章集录》。

臣对：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道，有保治之道。致治之道存乎法，保治之道存乎勤。非法无以维天下之势，非勤无以守天下之法。故创造丕图者，必立法以贻孙谋；嗣守鸿图者，必忧勤以绳祖武。曰纪纲、曰统体，曰制度，皆法之具也。而兴滞补弊，则勤之实耳。创之者以法，则国势尊严，而有以成长治之业；守之者以勤，则法度修举，而有以跻至治之休。帝王御天下之道，夫岂有外于此乎？夏商周之治所以卓冠千古，以其创之者其法善，而守之者其志勤也。汉唐宋之治不古若，庸非创之者其法有未善，守之者其勤有未至欤？

恭惟皇帝陛下，年当鼎盛，运抚盈成。昧爽临朝，惟祖宗之法是遵；甲夜视事，惟祖宗之法是监。临御以来，于兹二纪，贤才皆已举用，四海皆已无虞。保治之道，盖已默得于圣心之妙矣，犹不自足，乃于万几之暇，廷集多士，咨诹治道。首举三代、汉唐宋之创业者，而欲闻其纪纲、统体、制度得失之详；中举三代、汉唐宋之守成者，而欲究夫奋励有为、功业可称之实；末复以祖宗列圣之所以创守为言，而虑夫成法之弊，拳拳以法祖为念，期于吏称民安，中国尊而四夷服，风雨时而嘉祥至。臣伏而读之，有以见陛下知创业之惟艰，念守成之不

易，而欲保熙嶲之治于无穷也。臣请稽之经，订之史，按之当今之务，为陛下陈之。陛下幸垂听焉。

臣闻天下，重器也。创之至艰，守之至艰。创之而不知所以创之之道，则无以垂治于百王；守之而不知所以守之之道，则无以保治于万世。创之之道无他焉，臣前所谓法是已。守之之道无他焉，臣前所谓勤是已。盖法者，维持天下之具。故帝王创业，必建立纪纲，经画统体，条陈制度，以尽天下之法，以贻子孙之谋，以为长治久安之计。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彼此相维，内外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者，纪纲之谓也。或尚宽大，或尚严明，以此而始，以此而终，不朝文而暮质以自溃乱者，统体之谓也。治教礼乐，田赋兵刑之类，所以经纬天地、黼黻民物者，制度之谓也。然先王之法，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守成者欲保盈成，以跻至治，又必勤励不息，兴其滞以补其弊，然后天下之法可以施诸罔极，先王之泽可以被及斯民，而世为有道之国矣。

臣请以创之之法言之。禹之造夏，有典则以贻子孙。观其文命四敷，声教四讫，则有以立乎纲纪。政尚忠朴，治先勤俭，则有以定乎统体。至于建官二百，内辟三千，设六师以讨罪，辨三壤以成赋，天秩有礼，《大夏》有乐，教民以序，正朔以寅，其制度又无不备。禹之立法贻谋，其善如此，夏之治安于此乎致矣。

汤之造商，昭大德以裕后昆。观其肇修人纪，而九有有截，则纪纲以立。代虐以宽，而兆民允怀，则统体以定。至于建二相以总百官，制官刑以儆有位，公田藉而不税，大辂质而得中，国老养于右学，庶老养于左学，其制度亦无不备。汤之立法贻谋，其善如此，商之治安于此乎致矣。

若夫周之文、武，启佑后人，咸正罔缺。风化基于《关雎》，内廷属于冢宰，枢机周密，有以为四方之纲。明德而不敢忽，慎罚而不敢滥，仁爱忠厚，有以为一代之体。其建官也，六卿分职；其制刑也，三典诘奸。田赋有乡遂都鄙之殊，军赋有乡遂丘甸之异。语礼乐则五礼以节民性，六乐以和民声；语教化则三物以兴贤能，四术以造俊秀。制度之备，又何如也！周之治安，何莫而不本于立法贻谋之善乎？

下逮汉唐宋创业之君,非不欲致治如三代也,但其法有未善耳。汉之高祖,大封同姓,委任大臣,以规模为纪纲。约法顺民,扫除烦苛,以宽仁为统体。命萧何次律令,命叔孙通制礼仪;章程定于张苍,军法申于韩信。所以贻谋者,又有制度矣。然大纲虽正,而终不能无杂伯之非;大体虽宽,而卒不能除参夷之令。庶事草创而井田不复,学校不兴;礼文多阙而正朔不改,官名不定。则其法不能以皆善也。

唐之太宗,除乱致治,四夷宾服,庶乎知立国之纪纲。屈己从谏,仁心爱人,庶乎知为政之统体。以职事任官,以尊本任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礼制于房玄龄,乐作于祖孝孙,六学有领,五刑有覆。所以贻谋者,又有制度矣。然内多惭德,有夷狄之风;渐不克终,来诤臣之疏。法度之行,礼乐之具,拟之先王未备;田畴之制,庠序之教,拟之先王未详。则其法不能以皆善也。

至若宋之太祖,以忠孝廉耻为纪纲,而五事之美,千古所无。以偃兵息民为统体,而五季之弊,一朝顿解。两府台谏,官之总察有方;三衙四厢,兵之简阅有道。幸学有训,均田有令,而教养之法可观;温叟制礼,和峴制乐,而礼乐之文可取。又有制度以贻谋矣。然宗室则无选举教训之实,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官司之课试不严,学校之作成无要,兵士每杂于疲老,农民常苦于征徭。其法又岂能尽善哉?由是观之,则圣策所谓纪纲、统体、制度得失之详,可得而知矣。

臣请以守之之勤言之。夏当有扈违命之时,三正怠弃,五行威侮,禹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也。启则敬承继禹之道,而奋励有为,兴滞补弊,召六卿以行天讨,申赏罚以肃人心,卒使民被先王之泽而讴歌有归。有夏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商自盘庚既没之后,赏刑僭滥,荆楚叛背,汤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也。高宗则监于先王成宪,而奋励有为,兴滞补弊,求良弼以代王言,袁荆旅以昭殷武,卒使民被先王之泽而小大无怨。有商盈成之治,以勤而保矣。至若周自厉王之烈,《小雅》尽废而四夷交侵,上帝板荡而下民卒瘅,文、武之法不能无偏而不起之处矣。宣王由是奋励有为,兴衰拨乱。《车攻》复古,明文武之功业;《六月》出师,复文武之境土,卒使王化大行,流离还定。周之盈成,何莫而不保于兴滞补弊之勤乎?

下逮汉唐宋守成之君，非不欲保治如三代也，但其勤有未至耳。汉之宣帝、光武，庶几法祖之君也。或承武、昭虚耗之弊而综核名实，信赏必罚，伸威北狄，功光祖宗。或鉴西京不竟之祸而明慎政体，总揽权纲，身致太平，恢复前烈。其兴滞补弊之功业，有可称者。惜夫神爵之后，颇尚荒唐；建武之中，竟行封禅，则其勤有未至焉。唐之玄宗、宪宗，庶几法祖之君也。或革前朝权戚之弊而励精政事，开元之际，几致太平。或征德宗姑息之祸而纪律必张，元和之初，威令复振。其兴滞补弊之功业，有可称者。惜夫天宝之末，嗜欲滋生；平蔡之后，侈心遽动，则其勤有未至焉。至若宋仁宗承宫闱专政之后，裁抑侥幸，锐意太平；神宗当累朝委靡之余，勤俭有为，励精求治，亦可谓善法祖宗，而兴滞补弊之功业，有足称者。惜夫一则仁柔有余，而刚断不足；一则听言太广，而进人太锐，其勤又岂能至哉？由是观之，则圣策所谓奋励有为、功业可称之实，可得而知矣。

大抵三代之法，尽善尽美，故其子孙有所据依，而为治也易，至于政弊然后变其小节，而其大体卒不可易。汉唐宋之法，不过因陋就简，以苟一时之近功。其善者常寡，而不善者常多；其善者常小，而其不善者常大。立之未几，而弊已随之。后世之君区区攸补，百孔千疮，随乱随失。虽欲言治，皆苟而已。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区宇，建制垂宪，而法之贻于后者，至精而至备。太宗文皇帝定鼎两京，讲谟定命，而法之光于前者，愈盛而愈彰。请举其大者言之：宫闱雍肃，而无出阃之言；左右忠勤，而谨戴盆之戒。任府部为股肱，而事权不紊；倚台谏为耳目，而国论有归。宗子分封，以广维城之助；三司并置，以革藩镇之专。申明典常，而有以正天下之大谊；诛逐胡虏，而有以严天下之大防。则纪纲之善，无异乎三代矣。治本人情，而广孝悌之化；仁同一视，而无南北之殊。施猛政以济宽，用重典以平乱。惠鲜鳏寡，贪墨之加者必惩；怀保小民，豪强之凌暴者不贷。则统体之善，无异乎三代矣。至若审官立铨选考课之方，育才设学校科目之典。财以足国，而赋税漕运有其经；兵以卫民，而番上分屯有其备。礼仪有式，宴享有章，而和敬之风以著；令教于先，律齐于后，而钦恤之意攸存。则制度之善，又无异乎三代矣。

祖宗之所以创业者,其法既善。自是而后,若仁宗昭皇帝之励志图治,推诚任人;宣宗章皇帝之偃武修文,五伦攸叙;英宗睿皇帝之乾纲独断,克复旧物,莫不以勤而继守之。传至陛下,又能绍列圣之忧勤,守祖宗之成法。斯民乐育于熙皞之治者,盖已百二十年。虽三代治安之长久,不是过矣。圣策乃谓治极而弛,理势自然。祖宗之良法美意,岂能悉祗承而无弊?臣知此固圣人忧勤不已之心,臣敢不俯陈狂直,以副圣心之万一乎?

臣惟法之立也,本无不宜;法之行也,始有其弊。因其弊而救之,则存乎其人。古人有言曰:救弊者,莫如修德。又曰:救弊者,莫如责实。臣愚窃谓今日救时之急务,亦惟修德责实,益致其勤而已。盖德者,法之本也。德之修,万一有不慎,则其之流之弊,必至于纵欲以败度。譬之人伤其气,而寒暑易侵;木伤其根,而风雨易折。法虽具也,亦徒法而已矣。实者,名之主也。实之责,万一有不核,则其之流之弊,必至于欺谩以成风。譬之抟土为舟,不足以利涉;画地为饼,不足以充饥。名虽美也,亦虚名而已矣。故以舜之重华协帝,而伯益犹以罔失法度为言;以舜之庶绩咸熙,而皋陶犹以屡省乃成为戒。正以无虞之世,其修德责实之功不可少怠耳。

今陛下防非窒欲,恪守旧章,任贤使能,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德而责其实者,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无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拳拳以勤为献也。况我祖宗之法,莫不以勤而创之。臣尝观祖宗之谕近臣有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枕。又曰:人君理万几,怠心一生,则庶务壅滞,其患不可胜言。又曰:天下之大,庶务之殷,岂所须臾怠惰?一怠惰,则百度弛矣。凡皆勤之准的也。陛下既知拳拳以法祖为念,又可不法祖宗之勤乎?

臣请以勤为说,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夫君者,天也。天惟聪明刚健,动而不息。是以其光为日月,其文为星辰,其威为雷霆,其泽为雨露,而万物之生于动者,各得其职。天之行也,一息有不继,则运动无常,而不能以宰万物矣。人君之御天下,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而拳拳焉勤励不息也。一或怠焉,则德有不修,实有不责,先王之法委靡废放,日趋于弊而已。又安能保天下之治哉?

臣愿陛下所其无逸，罔或不勤，宪天之聪明以为聪明，体天之刚健以为刚健。一念之萌，必谨而察之曰：此于吾法，得无有所害乎？一令之出，必反而思之曰：此于吾法，得无有所豪乎？无所害也，无所豪也，然后从之，不然不敢从也。如是，则人欲净尽，天理昭融，圣德益修，而所以救弊者，有其本矣。由是条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几；表天下之人，其可用者有几。鸡鸣而起曰：吾今日为某事用某人。他日又曰：吾所为某事，其事果济矣乎？所用某人，其人果才矣乎？事果济也，人果才也，然后已之，不然不敢已也。如是，则为之而成，革之而服，名实相须，而所以救弊者，有其要矣。陛下于是二者，果能拳拳焉不违于心，则勤之实以尽。内外百司，群工庶职，孰敢不仰体陛下法祖之心，奋励熙载，恪守典训而慎行之乎？

以是守祖宗之纲纪，必能开众正之门，杜群枉之路。威福得以专，而无侵挠之患；政事得以修，而无阿私之失。以是守祖宗之统体，必能存仁厚之风，行宽大之政，垂旒黈纩而黜其聪察，藏疾纳污而务于包涵。以是守祖宗之制度，必能惜名器，公用舍，以精吏治；必能重师儒，慎科贡，以正士风。理财也，必能罢无名之征，停不急之务；理兵也，必能稽私役之卒，征贿求之将。礼乐则必能革奢僭之习，放淫哇之声；刑政则必能除惨刻之科，重威福之罚。将见滞无不兴，弊无不补，今日之急务无不治，良法美意可以祗承，而无偏失不举、名存实爽之议。由是而吏称其职，由是而民安其业，由是中国尊而四夷服，由是风雨时而嘉祥至。凡陛下所期无不如志，可以保盈成于万世之久，可以跻至治于三代之上矣。区区汉唐宋之功业，乌足言哉？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略如此。而于其终，复策之曰：诸生学古通经，有志于用世者，其各直述以对，无有所隐，且宠之以朕将亲览之一言。臣荷陛下生成之德，沐陛下教养之恩，学虽不足以通经，而志于用世也久矣。今幸一登文石之陛，陟赤墀之途，承问而对，臣之职也，直言无隐，臣之忠也，况陛下导臣而使之言哉！

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惟欲陛下，终始以勤而已。昔周公之于成王，有无逸之戒；宋璟之于玄宗，亦有无逸之图。二臣之言，初非有异；二君之治，乃有不同。盖成王听周公之言而无间，故卒至《鬼

警》之休；玄宗用宋璟之言而不终，故卒成天宝之祸。是则人君之治，莫不兴于勤而废于逸；人君之勤，鲜克善其始而慎其终。此前代彰灼著明之效，有国者不可以不慎也。伏愿陛下以成王为法，以玄宗为戒，以臣之言为不欺，慎终如始，不敢逸豫，则祖宗之法有不难守，天下之治有不难保矣。惟陛下留神省览，果如圣谕，则臣之幸也，宗社之福也，天下万世无疆之休也。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统治天下，既有实现大治的办法，也有保持大治的办法。实现大治的办法在于法度，保持大治的办法在于勤奋。除去法度就没办法控制天下的局势，除去勤奋就无办法守护天下的法度。所以开国创业的君主，一定要定立法度，给子孙留下治国方略；继承保守大业的君主，一定要忧劳勤奋，按照祖宗的脚印走。所谓纲纪、体统、制度，都是法度的具体方面。把停滞不前的地方振作起来，补救弊病，则是勤奋的实际表现。创业的人依靠法度，国势就会威严，而成就那长久大治的事业就有根据了；守业的人依靠勤奋，法度就会修明振作，而达到最完美的大治状态就有根据了。帝王统治天下的办法，难道会有在这范围之外的吗?夏商周的治理之所以在历代王朝中最为卓著，是因为它们创业者的法度完善，而守业者的心志勤奋。汉唐宋的治理之所以不如古代，难道不是因为它们创业者的法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而守业者的勤奋还有差距吗?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顺应持守祖先大业的国运，拂晓就临朝，完全遵守祖宗的法度；初更时分还办公，完全借鉴祖宗的法度。登基以来到现在，已有二十年了。贤才都已选用，四海都已无忧。保持大治的办法，已经在圣心高妙中暗暗掌握住了。但仍然不自我满足，又在日理万机的闲暇时刻，在殿廷召集各位学子，询问治国之道。首先提到夏商周和汉唐宋的创业君主，想要了解他们在纲纪、体统、制度方面成功与失败的详细情况；其次提到夏商周和汉唐宋的守业君主，想要探究他们积极奋

进、有所作为、功业值得称颂的实际表现；最后又把祖宗和各位圣君创业、守业的做法当作话题，思索过去法度的弊病，赤诚地把效法先祖作为心念，希望达到官吏称职，人民乐业，中国尊贵而四方部族归服，风调雨顺而吉兆降临。臣下我跪拜敬读，从中看出陛下深知创业的艰难，牢记守持功业的不易，而想永远保持住太平盛世。臣下我请求参引经史，针对当前的急务，为陛下陈述一番。万望陛下听上一听。

臣下我听说，国家是最重要的东西。开创它极其艰难，守护它也极其艰难。开创它却不懂怎样开创它的办法，就无法给后世留下大治的榜样；守护它却不懂怎样守护它的办法，就无法保持大治到永远。创业的办法也没啥，臣下我前面所讲的法度即是。守业的办法也没啥，臣下我前面所讲的勤奋即是。因为法度是维持天下秩序的工具，所以帝王创业，一定要建立纲纪，规划体统，逐项定立制度，来完善国家的法度，来给子孙留下治国的方略，来作为长治久安的大计。从家庭到国家，从国家到天下，彼此相互维持，内外相互制约，如同身体指挥手臂，手臂指挥十指，就叫做纲纪。或者崇尚宽大，或者崇尚严明，以此开始，又以此终结，不是早晨讲文采晚上又讲质朴而自行溃乱，就叫做体统。像行政、教育、礼仪、音乐、土地、赋税、军队、刑罚之类，用来安排上下秩序，修饰民物，就叫做制度。但是先王的法度，一定会出现偏差失效的地方，所以国政有些就不能实行开。守成的君主要想保持已有的功业，并达到鼎盛的局面，就一定要勤勉不息，把停滞不前的东西振作起来，补救弊病，然后国家法度才可以施行到永远，先王的恩泽才可以施布给当今百姓，而国家才可以世世代代成为政治清明的国家。

臣下我请就创业的法度谈一谈。大禹建立夏朝，就有成文的法典留给子孙。观看他礼义教化普遍施布，声名教化到达四周边远地区，就有根据地建立了纲纪。朝政崇尚忠诚朴素，治国把勤劳节俭置于首位，就有根据地确定了体统。至于建立官职二百个，收纳各地诸侯三千个，设立六师来征讨罪乱，区别上中下三种土壤来制定赋税，基于上天排定人伦关系的礼仪，创有名为《大夏》的乐舞，

通过称为“序”的学校来教育民众，将正月定为岁首，他那制度也无不完备。大禹定立法度，留下方略，完善到这种地步，夏朝的太平安宁也就由此实现了。

成汤建立商朝，显扬最伟大的德行来遗泽后代。观看他创设人伦纲常，九州齐心来归顺，纲纪就建立了。用宽厚来代替残暴，而万民无不信从感恩，体统就确定了。至于设置左右二位宰辅来统领百官，制定对官吏失职的处罚条例来惩戒当权者，助耕公田而不收税，天子专车装饰恰当，退休的卿大夫在名为右学的学校中赡养，普通老年人在名为左学的学校中赡养。他那制度也无不完备。成汤定立法度，留下方略，完善到这种地步，商朝的太平安宁也就由此实现了。

至于周朝的文王、武王，开导和保佑后人，全都正确而没有缺陷。教化以《关雎》诗的旨意为基础，后宫交给冢宰负责，国家最高政务周密，就有根据地建立起统辖全国的纲纪了。显扬仁德而不敢疏忽，谨慎对待刑罚而不敢滥用，既仁爱又忠厚，就有根据地建立一个朝代的体统了。在设置官职方面，有六位重臣各负其责；在设置刑罚方面，有轻、中、重三种刑典惩治奸恶。田赋有乡、遂、都、鄙的区别，军赋有乡、遂、丘、甸的差异。说到礼乐则有吉、凶、宾、军、嘉五礼来节制百姓的情性，有《云门》等六部乐舞来协和百姓的心声；说到教化则有六德、六行、六艺这三项标准来举荐贤能，有《诗》、《书》、礼、乐这四种教育来培养人才。制度的完备，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情形!周朝的太平安宁，有哪一点不是来自定立法度，留下方略特别完善呢?

往下延续到汉唐宋创业的君主，他们并非不想达到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大治局面，但他们的法度却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汉朝的高祖，大量分封同姓诸侯，政事委任给诸位大臣，把构建治国框架作为纲纪。约法三章，顺从民意，废除烦杂苛暴的刑罚，把宽厚仁义作为体统。命令萧何制定法律，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历法和度量衡等制度由张苍制定，军法由韩信申明。用以留给后世的治国方略，由此又有各项制度了。然而纲纪虽然端正，却终究没能清除掺

杂霸术的失误。体统虽然宽仁，却到底没能废除诛灭三族的律条。各项政务虽已初步创立，然而井田没有恢复，学校没有振兴，礼仪典章大多缺失，而用哪个月份做岁首也不更改，官名也没重定，这么说来，他那法度也就不能都是完善的了。

唐朝的太宗，排除祸乱，实现大治，四方部族都来归服，差不多算是懂得立国的纲纪。降低自己的身份，听从劝谏，怀有仁心爱护百姓，差不多算是懂得执政的体统。根据各项工作的需要来确定官员，根据尊本抑末的方针来管理民众，用租庸调赋役制度驱使百姓，用府兵制度统领军队；礼仪由房玄龄制定，乐舞由祖孝孙创作；六种国家学府都有规章，五种刑罚都有复审。用以留给后世的治国方略，由此又有各项制度了。然而他却私人生活不检点，带有异族的习气；逐渐不能保持晚节，招来了直臣的规谏奏疏。推行的法度，创制的礼乐，与先王相比不算完备；土地制度，学校教育，与先王相比不够详尽，这么说来，他那法度也就不能都是完善的了。

至于宋朝的太祖，把忠孝廉耻作为纲纪，貌、言、视、听、思这五个方面的醇美，古来没有。把停用武力、安定百姓作为体统，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的弊病一下子迅速解决。设立了中书省、枢密院两府和御史台、谏院，使对官员的统管监督有了办法；设置了殿前司等三司和名为捧日之类的四军，使对军队的检选指挥有了办法。驾临太学时有训示，对平均土地有诏令，而教民养民的方法很可观；由温叟制定礼仪，由和峴制定乐舞，礼仪乐舞的文采很可取。这就又有制度给后代留下治国方略了。然而对宗室没有选用、训导的实际行动，在宿卫部队中聚集了军队里的无赖之徒。对官员的考察不够严格，对学校培养人才没有要领，军队里经常夹杂老弱病残，农民总是苦于徭役征发。他那法度又怎能十分完善呢？综上来看，圣上策问中所说的纲纪、体统、制度成功与失败的详细情况，就可以了解到了。

臣下我请求就守业的勤奋谈一谈。夏朝在有扈氏违抗王命的时候，正德、利用、厚生三种大政都被废弃，水、木、金、火、土五

行受到践踏，大禹的法度不能说没有偏差失效的地方。夏启于是恭敬地继承大禹的治国之道，并且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把停滞不前的地方振作起来，补救弊病，召集六位重臣来对有扈氏施行上天的处罚，申明赏罚来整肃人心，终于使人民享受到先王的恩泽而讴歌归向夏朝。夏朝守成的治理局面，依靠勤奋而得以保持住了。商朝从盘庚去世以后，赏罚又失当，荆楚背叛，成汤的法度不能说没有偏差失效的地方了。高宗于是借鉴先王的法度，又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把停滞不前的地方振作起来，补救弊病，访求傅说那样的辅臣来代替国王发号施令，打击荆楚的军队来显示殷朝的武力，终于使人民享受到先王恩泽而人人都无怨言。商朝守成的治理局面，依靠勤奋而得以保持住了。至于周朝从厉王的暴虐开始，《小雅》诗所描述的情景全部遭到废弃，四方部族交相入侵，上帝动怒而百姓遭殃，文王、武王的法度不能说没有偏差失效的地方了。宣王因此积极进取，有所作为，振兴衰微，拨乱反正。《车攻》一诗歌颂他恢复古道，宣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六月》一诗歌颂他派出军队，恢复文王、武王的国土，终于使仁德教化大规模地得到推行，流离失所的人们回乡安定下来。周朝守成的功业，哪一点不是由于振作起停滞不前的地方，补救弊病特别勤奋才保持住的呢?

往下延续到汉唐宋守成的君主，他们并非不想保持像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大治，但其勤奋却有差距。汉朝的宣帝、光武帝，差不多算是效法先祖的君主了。一个在武帝、昭帝国力虚耗之后验核名实，该赏必赏，该罚必罚，把威力伸张到匈奴，使功业光照祖宗。另一个鉴于西汉中途灭亡的灾祸，对政体加以宣明，慎重处理，总揽大权，亲身致力于太平，恢复了从前的帝业。他们把停滞不前的东西振作起来、补救弊病的功业，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的。可惜宣帝在神爵年间以后，很喜好荒唐的举动；光武帝在建武年间，竟然举行封禅大礼，可见他们的勤奋是有差距的。唐朝的玄宗、宪宗，差不多算是效法祖先的君主了。一个革除前代权贵外戚专权的弊端，对政事很勤奋，开元年间的时候，几乎实现了天下太平。另一个把德宗姑息政策引发的祸乱作为鉴戒，使纪律一定申明，元和初

年，朝廷的威严和政令又重新产生效力。他们把停滞不前的东西振作起来、补救弊病的功业，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的。可惜玄宗在天宝末年，嗜好与欲望不断增添；宪宗平定蔡州以后，奢侈之心马上萌生，可见他们的勤奋是有差距的。至于宋朝仁宗在接替皇太后临朝之后，裁抑侥幸得到进用的臣僚，锐意实现太平；神宗在数代朝政萎靡之后，勤恳节约，勇于作为，励精图治，也可以说是善于效法祖宗了。他们把停滞不前的东西振作起来、补救弊病的功业，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的。可惜一个是仁厚宽柔得太过分，刚断却有些不足；一个是听取意见太泛杂，任用人太迅速，他们的勤奋又怎能到达极点呢?综上来看，圣上策问中所说的积极奋进、有所作为、功业值得称颂的实际表现，就可以了解到了。

大体说来，三代的法度是极其完善的，所以他们的子孙都有所依凭，治理国家也就容易了。不过是在政事出现弊病之后，再在细节上加以变通，而基本原则始终无法动摇。汉唐宋的法度，却不过是因陋就简，用来暂且收到一时间看得到的功效。他们显得完善的东西总是少，不完善的东西总是多；显得完善的东西总是细节，不完善的东西总是大体。确立还没几天，弊端就跟着来到。继位君主所做的那一点点补救，缺陷极多，一出现错乱马上就消失掉。这样即使想谋求大治，也都不过是糊弄局儿而已。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统一了全国，建立起制度，垂示规则，而留给子孙的法度，十分精当又十分完备。太宗文皇帝在南京、北京稳住了江山，用长远的谋划巩固了政权，而弘扬前代的法度，更加丰富又更加明晰。请列举主要的方面谈一下：宫闱庄重严肃，没有传到外面去的话语；大臣忠诚勤勉，谨慎对待手段与目的不合的戒令。把五军都督府和六部作为股肱，而职责丝毫不乱；把都察院、通政司作为耳目，而社会舆论得到搜集反映。分封宗室子弟，来扩大保卫中央的力量；在地方上同时设置布政使司等三司，来革除藩镇专断。申明伦理纲常，有办法来端正天下的道德；消灭驱逐元朝的残余势力，有办法加强国家的防卫。这样纲纪的完备，和三代就没有差别了。治理依据人们的情性，推广开忠孝友爱的教

化；对臣民一视同仁，而没有南方、北方的区别对待。施行严猛之政来辅助宽厚之政，使用严厉的刑罚来镇压祸乱。爱护并亲善鳏寡孤独，有贪污行为的人必受严惩；关怀保护普通民众，豪强对平民进行欺凌的决不宽容。这样体统的完善，和三代就没有差别了。至于在审察官吏方面，建立铨选考课的规章；在培养人材方面，设置学校和科举制度。财富是用来满足国用的，而赋税、漕运各有条例；军队是用来保卫人民的，而轮流戍守、分地驻扎都有防备。礼仪有程式，宴享有章法，而协和恭敬的风气得以弘扬；先用政令教育，后用刑罚整治，而慎用刑罚、体恤百姓的用意就寄寓在里面。这样制度的完善，又和三代没有差别了。

祖宗用以创业的法度是够完善的了。从此以后，像仁宗昭皇帝的励精图治，推心置腹任用人材；宣宗章皇帝的弃武修文，五种伦常全都理顺；英宗睿皇帝的大权总揽，恢复帝位，无不依靠勤奋来继承和守护国家。君位传到陛下，又能继承各位圣君的忧劳勤奋，坚持祖宗的原有法度。百姓快乐地生活在太平盛世之中，总共已有一百二十年了。即使是三代长治久安的局面，也超不过当今了。可是圣上策问中还说盛极而衰，势所必然。祖宗的优良法度和美好意图，怎会完全继承下来而不产生弊端呢?臣下我由此知道这是圣人忧劳勤奋而不停歇的心愿，臣下我怎敢不俯首陈述一两点狂妄直率的看法，来符合陛下心意的万分之一呢?

臣下我认为，法度在定立的时候，原本没有什么不合适的；法度在执行的时候，才开始产生了弊病。针对弊病而进行补救工作，依靠的是人。古人有句话说：补救弊病的办法，没有比修养品德更重要的。又说：补救弊病的办法，没有比查验实际更重要的。臣下我私自愚昧地认为，现今补救时弊最急迫的工作，也只是修养品德和查验实际，更加致力于勤奋而已。因为品德是法度的根本，品德的修养，万一有所不慎，它那流弊就一定会导致放纵欲望，败坏法度。好比人损耗了自己的元气，寒热就容易侵入；树木毁伤了根部，风雨就容易折断它。法度即使具备了，也不过光是个法度而已。实际是名义的内核，对实际加以查验，万一有所不符，它那流

弊一定会达到欺上瞒下形成风气。好比用泥土捏造舟船，是不能用于航行的；在地上画饼，是不能用于充饥的。名义即使很美好了，也不过是虚假的名义而已。所以凭借舜像光华重合那样来协助尧，伯益还用不要违背法度作为谏言；凭借舜各项事务均获圆满完成，皋陶还用要经常省察自己的成就来进行劝戒。这正是因为太平无忧的时候，修养品德，查验实际的功夫不能稍有松懈罢了。

现在陛下防范过错，克制欲望，恪守祖宗规章，任用贤能人才，申明赏罚升降的制度，用来修养品德、查验实际的举措，本已做得无以复加了。但是臣子们的心意，总是用不断进步来期待陛下，这就是臣下我赤胆忠心地拿勤奋来献言的原因。何况我朝祖宗的法度，无不是依靠勤奋创立的。臣下我曾经阅读祖宗对身边官员的训谕，其中说：皇帝我想到创业的艰难，就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又说：君主管理天下事务，怠惰的心念一产生，就会百事积压，害处多得说不过来。又说：天下这么大，事务这么多，怎能有片刻懈怠偷懒呢?一有懈怠偷懒，百事都会荒废了。这些话都是应该勤奋的依据。陛下既然知道时刻把效法祖宗作为心念，又怎能不效法祖宗的勤奋呢?

臣下我请求把勤奋作为建议，为陛下另外再强调谈一下。君主就好比上天，上天的品性是聪明刚健，运行而不止息。所以它的光芒是日月，它的文采是星辰，它的威严是雷霆，它的恩泽是雨露，而依靠天的运行而生长的万物，各自获得自己的去处，天的运行有片刻跟不上，运行就会丧失规律，而不能主宰万物了。君主能够统治天下，是因为他能学习上天的聪明，体察上天的刚健，时刻牢记勤奋不已。一有松懈，就会品德不能修养好，实际出现不查验，先王法度萎靡荒废，一天比一天滑向弊病丛生才算完。又怎能保守住天下的大治局面呢?

臣下我希望陛下身在帝位不贪图安逸享受，没有任何事情不勤奋，学习上天的聪明作为自己的聪明，体察上天的刚健作为自己的刚健。一个想法要萌生，必定谨慎地审察它说：它对于我朝的法度，该不会有什么损害吧?一条政令要颁布，一定回过头考虑它

说：它对于我朝的法度，该不会造成什么紊乱吧?没有损害，不会紊乱，然后再施行，否则就不敢施行。做到这样，就会人欲得到清除，天理得到显扬与融和，圣德进一步得到修明，而用来补救弊病的做法也就获得根据了。由此出发，梳理天下的事务，看看重大的会有几项；选用天下的人才，想想可以使用的能有几个。鸡一叫就起床说：我要做某件事，该使用哪个人。过几天又说：我所布置的某件事，果真完成了吗?所使用的某个人，果真很能干吗?事务确实完成了，人员果然很能干，这才作罢，否则不敢作罢。做到这样，就想做什么都能成功，想革除什么都能顺从，名义和实际相互依赖，而且用来补救弊病的措施也就有了要领。陛下对此二者，果真能在内心时刻都不违背，勤勉的实际行动就能坚持到底。内外各级部门，大小官员，谁敢不仰首体察陛下效法祖宗的心意，奋发努力，弘扬帝王的事业，恪守祖宗的法典与训条而谨慎执行呢?

凭这来遵守祖宗的纲纪，一定能打开众多正直人士的门户，堵塞住众多奸佞小人的道路。赏罚大权可以独揽，不会有受到威胁的担心；政事能够修明，不会有偏爱自己所喜欢的人的失误。凭这来遵守祖宗的体统，一定能保持仁爱厚道的风范，推行宽缓大度的国政，不看邪恶的人，不听无益的话，把所痛恨的事情和恶劣的现象收藏包纳起来，去除掉苛察，务必讲求宽容。凭这来遵守祖宗的制度，一定能爱惜官职爵位，公正用人，来使吏治精明；一定能重视学校师长，慎重对待科举，来使士风端正。在理财方面，一定能废除没有名目的征敛，停止不是急需的徭役；在治军方面，一定能查出被私自役使的士兵，查出用贿赂买取职务的将领。在礼乐方面，一定能革除奢侈僭越的风气，废弃淫荡放纵的音乐；在刑政方面，一定能革除残酷苛刻的刑罚，加重体现天子威恩的惩处。这样就会看到停滞不前的地方被振作起来，弊病无不补救，眼前的急务无不解决，优良法度和美好意图可以继承，而不会遭到偏差失效、名存实亡的舆论批评。因此而官吏称职，因此而百姓乐业，因此而华夏尊贵，四方部族归服，因此而风调雨顺，吉兆降临。凡是陛下所期望的无不如愿，可以永远保持守成的大业，可以超过夏商周三代达

到鼎盛局面。小小汉唐宋的功业，又哪里值得一提呢？

陛下用来策试臣下我的问题，大体就是这些。在试卷的末尾，陛下又说：你们诸位学子研究古代，通晓经典，有志被世上所用，请各自直抒己见，回答问题，不要有什么隐瞒，并且还用皇帝我准备亲自观览这样的话来表示恩宠。臣下我蒙受陛下生育养成的大德，沐浴陛下教育培养的大恩，学问虽然不足以通晓经典，而有志被世上所用，却时间很久了。如今有幸来到壮丽庄严的朝廷，承奉陛下的提问做出回答，这是做臣子的本分；直说而不隐瞒，也是做臣子应尽的忠诚，何况陛下还引导臣下等人让我们说话呢？

臣下我还有一言来向陛下进献，就是希望陛下始终用勤奋来治国。从前周公对成王曾有不要贪图安逸的劝戒，宋璟对唐玄宗也有不要贪图安逸的期望。这两位大臣的话，原本就没有什么差别；但这两位国君的治绩，却有所不同。因为成王听从周公的话而无间断，所以终于达到了《大雅·鸢鬻》诗所说的福禄双降的美好局面；而玄宗采纳宋璟的话却不坚持，所以终于酿成天宝年间的灾难。这表明，君主治国，无不因勤奋而振兴，因享乐而荒废；君主的勤奋，很少能好好地开始而谨慎地结束。这是前代明白浅显的事例，拥有天下的人，不可不慎重地借鉴啊。臣下我伏身期望陛下把成王当作榜样、把玄宗当作鉴戒，认为臣下我的话是实话，谨慎地坚持到底就同开始时一样，不敢放纵安逸。这样一来，祖宗的法度就不难持守，天下的大治就不难保持了。只请陛下留心观览，果真如圣上所讲的那样，就是臣下我的幸运，国家的吉福，天下万世永无止境的美事了。臣下我冒犯天子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温玉春译〕

明孝宗弘治三年(1490)庚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

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

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

殿试策问

[弘治三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天子,父天母地而为之子。凡天下之民,皆同胞一气,靡所不统,故曰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宗子继承父母君主天下,其责甚大。必养之有道,必教之有方,举天下之民无一不得其所,责斯尽焉。古之君天下者,莫盛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皆克尽宗子之责,号称至治。其后若汉、若唐、若宋,英君谊辟,宗子之责或尽或否,而治亦有称。其迹具载经史,可考而论之欤?夫自唐虞而下,诸君宗子之责无不同;当时制度之立、政令之行又无不同。而要其治效之所至,乃有不能同者。此固世道之渐降,然夷考其实,亦尚有可言欤?前贤论儒者之道,每以位天地、育万物、参天地、赞化育为极至。于是宗子之责,有相关欤?朕膺天命,嗣守祖宗鸿基,宵旰孳孳,思尽宗子之责,比隆古之圣帝明王。其行之之序,自何而始欤?子诸生饱经饫史以待问,必有灼然之见。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爱好仁德的人，没有什么再能超过他的了。憎恶不仁德行为的人，他施行起仁德来，只是不让那不仁德的行为在自己身上也出现。

常规定律端正了，老百姓就会振兴起来；老百姓振兴起来了，这也就没有邪僻奸恶了。

内心真诚就能在外部自然表现出来，在外部自然表现出来就能更加明显，更加明显就能进一步焕发出光辉，焕发出光辉就能进一步耸动万物，耸动万物就能进一步使万物跟着发生变化，使万物跟着发生变化就能进一步达到莫明其妙的极致状态。这表明：只有那天下根本无法理解的圣人德性的至诚，才能使万物变化达到那莫明其妙的极致状态。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天子把天做为父亲，把地做为母亲，成为它们的儿子。凡属天下的臣民，全都由天地所生，蒙受同一元气，天子没有不加以统领的。所以又有这样的说法：君主是我们天父地母的嫡长子。嫡长子继承天父地母来统治天下，责任特别重大。一定要养育臣民具有准则，教化臣民具有方法，把全天下的臣民全都包括在内，没有一个人不获得到他那合适的位置，这才算是尽到了责任。古代统治天下的帝王，没有比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更兴盛的了。他们都能尽到作为天地的嫡长子的责任，号称最完美的治理。后来像汉朝，像唐朝，像宋朝，这些朝代中的英明君主，作为天地的嫡长子的责任，有的尽到了，有的没尽到，而治理也赢得过称颂。他们的事迹详细记载在经典和史书上，能够做一番考察和评论吗？从唐尧、虞舜以下，各个君主作为天地嫡长子的责任没有不一样的；当时典章制度的定立，政令的推行，也没有不一样的。但总而言之，他们的治理效果所达到的程度，毕竟存在着不能完全相同的地方。这固然由于世道逐渐往下坡路走，可是考察各自的实际情况，也

还有可以讲论的吧?前贤讲论儒家的治国总原则,常常把天地的位置被摆得很正、养育万物、与天地并立为三、辅助天地化育万物作为最完美的状态。在这方面,君主作为天地嫡长子的责任,也大有关系吧?皇帝我承受上天的大命,继承守护祖宗的宏大基业,早起身,晚吃饭,孜孜不倦,一心想尽到自己作为天地嫡长子的责任,和古代的圣帝明王追比隆盛的治理状态。有关这方面施行的顺序,从哪里开始呢?你们这些读书人对经典和史书掌握得非常熟悉,来等待朝廷的询问,一定有鲜明深刻的见解。把它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钱福　殿试对策

钱福(1461～1504)　字与谦,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因家近鹤滩,遂以鹤滩为号。少而颖悟。弘治三年(1490)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此后名声显赫,远近请求题署者每天不断。诗文藻丽敏妙,著有《鹤滩集》。

臣对:臣闻人君尽代天之责,以成配天之治者,皆一心之用也。盖心者,天之所以与我者也;天下者,天之所以责我者也。天不能自养乎民,而责我以养;天不能自教乎民,而责我以教。所以与我者,与人同;而所以责乎我者,独备。故凡所以教养乎天下者,必反而求之乎心。天下虽大,一心运之而有余矣。苟不求之天之所以与我之心,而徒务乎责我者之事,则为之而不得其本,施之而不得其序。养民虽勤,而终非仁心实惠之寓;教思虽悉,而终非躬行心得之推。欲天下民物之各得其所,亦难矣。天下之有一不得其所,则天下所以责我者不能尽。是天地自天地,民物自民物,而吾身自吾身,尚得为天地之宗子乎哉!天如此其高,地如此其厚,而吾之治如此其小,尚得为配天之治乎哉!《书》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易》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皆言人君受天与之全,任天责之重,必当尽是责以成是治也。然要其所以为之者,岂出于一心

之外哉?即是而观,则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之底于盛治,汉唐宋之仅为小康,与今日之欲比隆前古者,盖必有说矣。

洪惟皇帝陛下,钟天地之粹气,禀天地之全德,以抚有普天率土之人民。临御以来,励精图治,凡可以当天心、慰人望者,无所不用其极,诚可谓大有为之君,可谓善继述之宗子矣。然乃不自满足,首进臣等于廷,询之以父母宗子之责。且谓儒者之道,以位天地、育万物、参天地、赞化育为极至,而求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臣有以见陛下之心,真知儒道之至重,深图君责之惟难,直欲无一念之愧乎天,无一事之愧乎古,无一制度、无一政令之不得其宜,无一民一物之不被其泽而后已。顾臣愚昧,何足以知之?然于乾坤之间,得与胞与之列,厕名为儒,久荷教育,窃有志乎圣贤之学。其于参赞之功,家相之事,虽不敢与闻,而所得于天、以生之理为心之所固有者,固不容诿于不知矣。敢不援经摘史,为陛下陈之!

臣惟"天子,父天母地而为之子"云者,此汉儒班固之言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者,此宋儒张载之言也。盖天下之理,未尝不一;而天下之分,未尝不殊。故自天地而言,则君为天之子;对民物而言,则君又为天地之宗子。独不观诸家乎?一家之中,凡继其祖者,均得称为宗;凡继其宗者,均得称为子。惟宗子则上承宗祧,下合宗族,而独得谓之宗子。故冠婚必告之而莫敢专,祭祀必主之而莫敢僭,富贵必保之而莫敢加。岂故以是而尊宗子哉?诚以父母所遗之体,赖宗子以养;父母所遗之业,赖宗子以教。宗子之所在,即父母之所在,自不得不以父母尊之也。天下之众,凡禀气于天者,均得父称乎天;凡赋形于地者,均得母称乎地。惟大君则继承天地,统理民物,而独得为天地之宗子。故谓其所居之位曰天位,谓其所享之禄曰天禄,谓其所都之邑曰天邑。亦岂故以是而尊大君哉?诚以天地所与之形,赖大君以养;天地所与之性,赖大君以教。大君之所在,即天地之所在,自不得不以天地尊之也。向使为家之宗子者不能教养乎家,而家之人有不得其所,则一家得以望之,而宗子何以逃其责于父母哉!为天地之宗子者,不能教养乎天下,而天下之人有不得其所,则天下得以望之,而天子亦何以辞其责于天地哉!

试以唐虞三代之君天下者言之。其养民则敬授人时，播植百谷，六府孔修，辑宁邦家，大赉四海也。其教民则协和万邦，慎徽五典，文命四敷，克绥厥猷，重民五教也。其为治效，则或赞其如天，或美其风动，或称其天迪，或以为格于皇天，或以为配天其泽也。其于代天之功，皆能大有作为，而宗子之责无不尽也。以汉唐宋之君天下者言之。其养民则有藉田、代田之诏，有口分、世业之法，民籍以定，经界以均。其教民则石渠、白虎之讲说，弘文、广文之招延，博学宏辞之有试，看详学制之有议。其为治效则或杂伯，或杂夷，或偏安不振。不尽民力者，不能免向隅之泣；与民休息者，不能免徭役之劳；宽厚待民者，不能免闾里之怨叹。尊师重傅，而徒事乎章句训诂之文；大召名儒，而无以变风云月露之态；崇尚理学，而无以革词赋浮靡之习。其于代天之功，虽或有所为，而宗子之责则不能以皆尽也。

夫其为宗子之责本同，为治之制度、政令亦略同；而治效所至，乃若是悬绝者。岂世道之降，端使然哉？臣尝求其故矣。曰钦明文思，曰浚哲文明，曰克勤克俭，曰克宽克仁，曰执竞维烈。此其心纯乎天，天地民物皆其度内。所以立制度，行政令，而教养乎天下者，皆心之所为用也。或恭俭是尚而学宗黄老，或经术是尚而性多褊察。欲行仁义者，大伦或已亏；仁厚有余者，刚断或不足。则其心为私欲所亏，而不知民胞物与之义。虽有制度之立，不过虚文美观，以为教养之具，恶能尽其心之用哉？

若夫"位天地、育万物、参天地、赞化育"云者，此则子思之言，而亦张载之意也。盖人之一身，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分。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而理气之贯通者未尝不同。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而天地位；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而万物育。吾能位天地，育万物，则化育之大，吾得而赞之；天地之高厚，吾得而参之。儒者之道必极于此，而后可以为人；尤必极于此，而后可以为君，可以为宗子也。唐虞三代能尽宗子之责者，此也；汉唐宋有宗子之责而未尽者，则未极于此也。然此岂可以矫伪为？亦岂可以旦夕致哉？必自戒慎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有以致吾心之中，而天地之所由以位也。自慎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际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有以

致吾心之和，而万物之所由以育也。张载亦曰“存心养性为匪懈，即戒惧之事也”；曰“不愧屋漏为无忝，即慎独之事也”。此欲尽宗子之责者所当知，而今日行之之序，所自始焉者也。

臣草茅疏贱，未尝入侍帷幄，亲奉旒扆，以仰窥所谓戒惧、慎独之功。然读悯灾儆变之谕，知陛下有畏天命之心；观守成、由旧之政，知陛下有畏祖宗之心；至于人材之进退，奏疏之可否，又有以知陛下有畏公议之心。畏之一言，戒惧、慎独之明念也。而臣行谆谆言之不置者，诚以矜持于天下耳目所共及者，易为力；于一己耳目所不及者，难为功。伏愿陛下于万几方暇之际、一念未萌之时，虽不必明堂听政也，而正衣冠，尊瞻视，俨乎如百官之临；虽不必宣室致斋也，而定思虑，绝嗜欲，凛乎如上帝之对。使本源澄澈如明镜止水，照之而无不见；使方寸轩豁如空谷虚室，纳之而无不容。及夫卒然之顷、一念之萌，又必察其果出于天理之公，而天下民物所同欲乎？则毅然行之，惟恐其不力；果出于人欲之私，而天下民物所同恶乎？则断然去之，惟恐其不速。爱憎之动，则察其所爱而欲近之、与所憎而欲远之者何人；喜惧之发，则察其所喜而乐为、与所惧而不敢为者何事。毋曰九重之邃，一念之差，人不得而知也，天下之视听于是乎在焉！毋曰五位之尊，一事之失，人不得而非也，神明之昭鉴于是乎存焉！斯可谓之戒惧、慎独，而天之所以与我者为无愧矣。

由是推之以立制度，则制度之立，此心也；推之以行政令，则政令之行，此心也。推是心以养民，自有以著保惠赒恤之实；推是心以教民，自有以为转移感动之机。至于一法之废兴，则曰吾为天守法，非吾所得而轻变也；一钱之出纳，则曰吾为天惜财，非吾所得而妄费也。一官之命，则曰此天之所以命有德者，吾不得而专也；一刑之用，则曰此天之所以讨有罪者，吾不得而私也。凡吾祖宗之所贻谋者，期之于必行；凡古帝王之所垂法者，期之于必可行。斯可谓之善教、善养，而天之所以责我者为无负矣。如是而称为天地之宗子，真所谓践形惟肖者矣，真所谓圣其合德者矣。代天之功乌有不尽，配天之治乌有不成，儒者之道焉有不极其至哉？

然臣又闻之，召公告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

言始之不可不谨也。伊尹之告太甲曰:终始惟一,时乃日新。言终之不可不谨也,凡臣之所以为陛下谋始者,皆陛下之所当自贻者也。日新之功,独不当加之意乎!夫难操而易舍者,心也;难成而易弛者,治也。陛下于今日之所言,试以质诸他日之所言者,果有异乎?今日之所为,试以质诸他日之所为者,果有异乎?保守于盈成之间,而儆戒于宴安之后;持循于奋迅之余,而驯致乎久大之盛。则所以代乎天者,有自强不息之功;所以配乎天者,有纯一不已之妙。天下之所戴以为大君、所赖以为宗子者,真足以比隆唐虞三代而不愧矣。臣请以是为终篇献。臣不胜恳切忠爱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君主尽到了代天行事的职责,从而形成和上天匹配的太平治世,这些都取决于对心的运用。心是上天赋予我的,治理天下是上天责成我的。上天不能亲自养育人民,而是责成我来养育;上天不能亲自教化人民,而是责成我来教化。上天赋予我的心,和其他人相同;而上天责成我治理天下,只有我具备。所以,凡是用来教化、养育天下百姓的措施,一定要反过来求助于心;天下虽然广大,专注于运用心就绰绰有余了。如果不求助于上天赋予我的心,却只重视上天责成我的事,那么,进行养育和教化就没有根本,施行中就没有次序。养育人民虽然很努力,但最终没有寄托在仁爱之心的真正恩惠中;教化的思路虽然详备,但最终不是推广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心得。要想天下人、天下事各得其所,也是困难啊。天下的人和事有一样不得其所,那么上天责成我的职责就没有尽到。这样,天地是各自的天地,人事是各自的人事,而自己还是自己,那还能成为天地的嫡传长子吗?天是如此的高远,地是如此的深厚,而我的治理是如此的微不足道,那还能形成和上天匹配的太平治世吗?《尚书》记载道:上天佑助天下百姓,为他们立君主,立师长,希望君主、师长能辅助上天,安抚天下。《易经》记载道:君王裁制成就天地相交安泰的法则,辅助天地的一切事宜,去治理百姓。两书的记载都说明君主承受了上天的整个赋予,承担着上天责成的重任,必然应当尽到所担负的职责,以便形成与天匹配的太平治世。那么,探求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哪有

超出专注于心之外的呢!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武王实现了盛世,汉朝、唐朝、宋朝只达到了小康,以及当今希望和上古帝王同样兴盛的君主,必然有值得论说的地方。

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聚集天地的精气,禀承天地的全部仁德,从而拥有天下的土地和人民。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凡是能用来承当上天之心、抚慰人民愿望的事,一切都设法去做,到了顶点。确实称得上是大有作为的君主,称得上是善于继承天道和祖业的嫡传长子了。然而却不自我满足,首先让臣下我等进入朝廷参加殿试,考问君主作为天地父母的嫡传长子的责任。并且说,儒家的大道,是把天地正位,万物生长、配合天地,辅助教化养育作为最高的目标,进而寻求施行天地之道的顺序该从哪里开始。臣下我因此看到陛下的心中,真正懂得儒家之道至关重要,深深地在思考君王职责的艰难;只希望没有一个念头愧对上天,没有一件事愧对古代圣君,没有一项制度、一道政令不合乎时宜,没有一民一物不蒙受恩泽,才算作罢。然而臣下我很愚昧,怎能懂得这一切呢?然则生活在天地之间,能够进入天下人、天下物同生同长的行列,被安置以儒生之名,长时间接受教育,私下立有从事圣贤之学的志向。对于配合天地赞助教化的事功,任用重臣宰相的大事,虽然不敢多打听,然而从上天那里得到的生下来就属人心所固有的东西,绝对不容许用不知道来作推诿。哪敢不援引经典,摘录史实,为陛下陈述呢!

臣下我想来,"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从而成为天地之子",这是西汉儒生班固的话;"天子是我天父地母的嫡传长子",这是北宋儒生张载的话。天下的道理,未曾有过不一致;而天下的名分,也未曾不相同。所以,对天地而言,君主是上天之子;对人民、万物而言,君王又是天地的嫡传长子。难道不能够从家庭中来观察吗?一家之中,凡是继承祖先的后代,都能称为宗;凡是继承本宗的后代,都能称为子。只有嫡传长子才往上承袭宗庙祭祀、往下聚合宗族,因而得以专称为宗子。所以加冠礼、婚礼必须由宗子告知而没有人敢专断,祭神祭祖必须由宗子主持而没有人敢僭越,富贵必须由宗子保有而没有人敢超过。难道故意用这些来尊敬嫡传长子吗?确实是因为父母遗传下的血脉,依靠嫡传长子养护;父母遗传下的业绩,依靠嫡传长子教导。嫡传

长子在哪里，父母就在哪里，自然要像尊敬父母那样尊敬嫡传长子。天下的民众，凡是禀承上天之气的，都可以称天为父；凡是形体由大地赋予的，都可以称地为母。只有君主能够继承天地，治理人民万物，因而得以独自成为天地的嫡传长子。所以称君主所拥有的地位叫天位，称君主所享有的福禄叫天禄，称君主的都城叫天邑。难道也是故意用这些来尊敬君主吗？确实是因为天地所赋予的形体，靠君主去养育；天地所赋予的心性，靠君主去教化。君主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地所在的地方，自然要像尊敬天地那样尊敬君主。假如作为一家的嫡传长子，却不能教养家庭，而家中有人不能得其所，因而一家人有权要求他该做什么，而嫡传长子靠什么来向父母逃避责任呢！作为天地的嫡传长子，不能教化、养育天下万民，而天下有百姓不得其所，因而天下万民有权要求他该做什么，而天子又用什么来向天地推辞职责呢！

试用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君王来论说。他们养育人民的措施是：严肃地教导人民按时令节气从事生产活动，播种百谷，贮藏财物的六府治理得非常好，安定国家，和睦家庭，大量地赏赐天下。他们教化人民的措施是：使所有的小国协调融洽，庄重地赞誉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五种伦理道德，文德教令向天下公布，确立大道教化的准则，重视五种伦理纲常的教育。他们治国措施获得的功效是：或被赞叹为像天一样，或被赞美如风吹动、天下响应，或被称颂为上天诱导，或被认为感通上天，或被认为恩泽匹配上天。他们对被赋予的代天之事，都能够大有作为，而嫡传长子的职责全部尽到了。就汉朝、唐朝、宋朝的君王而言，他们养育人民的措施有：汉朝施布鼓励农业生产的天子亲耕的礼仪，实施精耕细作的代田法，唐朝推行有口分田、永业田的均田令，使国家的民户稳定，土地分配公平。他们教化人民的措施有：汉朝在石渠阁、白虎观会集群儒，讲论儒家经典，唐朝设弘文馆、广文馆招揽培育人才，宋朝科举考试设博学宏词科，大臣议政讨论学校制度的审定。他们治国措施的功效是：汉朝杂用霸术，唐朝融进落后部族的做法，宋朝偏安不能振作。不要耗尽民力的君主，却免不了百姓还有人哀痛贫苦；让百姓休养生息的君主，却免不掉百姓还要服徭役的劳苦；宽厚对待人民的君主，却免不了百姓还怨恨叹息。有的尊重讲授经学的老师，却只致力于经文的分章断句和字义解

释;有的广召著名儒生,却不能改变华丽骈体文的形态;有的崇尚理学,却不能革除词赋虚浮不实的风气。他们被赋予的代天之事,虽然有一些作为,但嫡传长子的职责还不能全部尽到。

这些帝王作为天地嫡传长子的职责完全相同,治理国家的制度、政令也大致相同;但所达到治国效果,竟然如此地悬殊。难道是因世道往下滑,正好导致这种状况吗?臣下我曾经探求其中的原因在于:唐尧严谨明察,道德纯善完备;虞舜深谋大智,光明照临天下;夏禹勤劳于国,勤俭于家;商汤宽厚仁德;周武王刚强功高。这是他们的心和天一样纯正,天地间的人和万物,都在他们的胸怀以内。用来建立制度、推行政令、以及教化养育天下人民的各种措施,都是他们对心的运用。后世帝王有的崇尚恭敬节俭,但学术以黄老思想为正宗;有的崇尚儒家经学,但气量狭小,性情苛察。希望施行仁义,但大的伦常道德已有欠缺;仁慈宽厚有余,但刚强决断却有不足。这样看来,他们的心被私欲损害,因而不懂得泛爱一切人与物的道理。虽然建立制度,不过是一纸空文、徒有外表;以此作为教化养育的手段,哪里完全发挥了心的作用呢!

至于"天地正位,万物生长,配合天地,辅助教化养育",这是子思的话,并且也是张载的意思。作为人,并立于天地之中形成三个层次,虽然有高低之分,大小不同,但其中贯通的理气却未曾不同。我的心正,那么天地之心也正,因而天地得其位;我的气顺,那么天地的气也顺,因而万物生长。我能正天地、养万物,那么教化养育这样的大事,我能够赞助;天地如此地高远深厚,我能够配合。儒家的大道必须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然后才可以做人;特别是必须达到这种最高境界,然后才可以成为君主,成为天地的嫡传长子。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君王能尽宗子职责的原因,正在于此。汉朝、唐朝、宋朝的君王有宗子职责却不能尽到的原因,则是没有极尽于此。然而这一点难道可以假冒伪作吗?或者可以在旦夕之间就获得吗?必须自我戒备严谨,并以此约束,以至于在最孤寂的时候也没有稍微的偏差,一直守持住,那就能导致我的心正,而天地也因此得以位正。必须自我谨慎独处,特别精详,以至于在处理事物的时候,没有任何差错,没有适应不了的地方,那就能导致我的心平和,而万物也因此得以养育。张载也

说“存心养性不能松懈，就是讲戒备严谨的事”；说“不因独自在墙角而羞愧，才是无愧，就是讲谨慎独处的事”。这些是希望尽到嫡传长子职责的人所应当懂得的，而当今施行天地之道的次序，也应当从这里开始。

臣下我是平民百姓，地位疏远、低下，未尝进入朝廷，侍奉皇帝，瞻仰到所说的戒备严谨、谨慎独处的功德。然而读到为灾害忧愁、警惕天变的圣谕，知道陛下有敬畏天命的心；观察到守护祖业，沿用已有制度的朝政，知道陛下有敬畏祖宗的心，至于从对人材的提拔贬降、对奏章内容的认可否定，又从中知道陛下有敬畏公众议论的心。敬畏这一说法，就是戒备严谨、谨慎独处的明确念头。而臣下我不倦地讲论这不容废弃的说法，确实是因为对天下人都能看到听到的事抓住不放，容易做得好；对于自己所看不到听不到的事，难于做出成绩。恭敬地祝愿陛下能在日理万机、有一丝闲暇之际，在一个念头没有萌发之时，虽然不一定是在朝廷上听断政事，但也要衣冠整齐，目不邪视，俨然如面临百官。虽然不一定是在斋戒场所清整身心，但也要思想稳定，断绝嗜好与欲望，凛然如面对天帝。如果本源清澈，平静得如同明镜和不流动的水面，什么东西就都能照见；如果心胸开阔得犹如深谷空屋，什么事都能容纳。推及到事情突发、一个念头萌生之际，又一定要考察：这念头果真出自公正的天理，都是天下民众万物所愿意的吗？是这样就毅然推行，惟恐推行不力；这念头果真出自个人私欲，都是天下万物所憎恶的吗？是这样就坚决除去，惟恐清除得不迅速。爱憎的念头出现，就要考察所喜爱并想亲近的，所厌恶并希望疏远的是什么人；欢喜恐惧的念头出现，就要考察喜欢并乐意做的，惧怕而不敢做的是什么事。不要认为宫廷是那样高深，有一念之差，人们不可能知道，要明白天下人关注的正在这里呢！不要认为自己像上天五方之帝那样的尊贵，一事有过失，人们不可能非议，要明白神灵的鲜明警告正在这里呢！这才称得上是戒备严谨、谨慎独处，因而对于上天所赐予我的东西，就感到没有遗憾了。

由此推衍到建立制度，那么制度的建立靠的是心；推衍到施行政令，那么政令的施行靠的是心。推心去养育人民，自然会显现出保护、仁爱、救济、抚恤人民的实际；推心去教化人民，自然会产生人民转

变、深受感动的契机。至于废兴一条法令，则是我替天守护法令，不是根据我的意愿来轻易改变；收入支出一枚铜钱，则是我替天爱惜钱财，不是按照我的需要来妄自耗费。一个官职的任命，则是体现上天要任命有德之人，我是不能专断的；一种刑法的施用，则是体现上天要讨伐有罪的人，我是不能有私心的。凡是祖宗遗留给我的计谋，想着要坚决施行；凡是古代帝王传下来的法度，想着要必须能够执行。这就可以称得上善于教化，善于养育，因而对上天赋予我的责任就毫无辜负了。像这样做而被称为天地的嫡传长子，真正称得上惟妙惟肖地体现了上天所赋予的品质，真正称得上是与天地合德的圣人了。代天行事的职责哪会尽不到！和天相配的治世哪会形不成！儒家的道德又哪会达不到顶点呢！

但是臣下我又听说，召公告诫成王道：你刚执政，这就如同新出生的孩子，成功失败都在这个时候，自己必须要选择明智的道路走下去。这几句话是说开始时一定要谨慎。伊尹告诫太甲道：始终如一，这样道德才能天天更新。这是说终了一定要谨慎。凡是臣下我为陛下谋划的起始之事，都是陛下应当自我延续下去的；天天更新道德这事，难道不应当加以特别注意吗？难操持而容易舍弃的是心，难实现而容易废弛的是治国。陛下试用今天的言论，去和其它时候的言论比较，果真有不同之处吗？试用今天的作为，去和其它时候的作为比较，果真有不同之处吗？保护守卫于已有功业之间，警惕戒备于安逸之前，在行动昂奋迅速之后要坚持施行，从而逐渐达到长久宏大的太平盛世。这样一来，代天行事，具有自强不息的功德，治理匹配上天，具有纯正不杂、至诚无息的妙用。天下所拥戴的君主、所依赖的天地嫡传长子，完全能够和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追比隆盛而无愧了。臣下我请求以此作为全篇答卷的结尾来献上。臣下我恳切忠爱到了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文明元译〕

明孝宗弘治九年(1496)丙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诗》曰"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

责难于君谓之恭。

殿试策问

[弘治九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君人者,必有功、德以被天下,阙其一不可以言治。顾于斯二者何先?夫非学无以成德,非政无以著功。论者或谓帝王之学不在文艺,或谓天子之俭乃其末节,或谓人主不亲细事,或谓圣王不勤远略。是有大于此矣。然则其所当务者何居?二帝三王之德,所事者何事?二帝三王之政,所见者何功?汉唐宋,代有令君,而功、德鲜备。躬行德化者,经制或不定;民安吏称者,德教或不纯。或四夷服从,而大纲不正;或仁厚立国,而武略不竞。是学与政,容有可议者。其得失何如?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神功圣德,冠绝古今。列圣相承,继志述事,各臻其盛。所以致此者何由?朕嗣承大统,图底治平。兹欲守宋臣所进之五规,去唐相所陈之九蔽,行汉儒所对之三策,以上追古帝王,庶无愧于我祖宗功、德之大。其所以为根柢者何在?子诸生学道抱艺而来,皆志于世用,宜有以佐朕者,试悉陈之。朕将体而行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老百姓的生活用度很充裕，国君您怎么会不充裕？老百姓的生活用度不充裕，国君您怎么会充裕？

《诗经》上说："麻纱外衣罩在锦服上"，这是讨厌那文采太鲜亮啊！所以君子修养身心的途经，由暗淡而一天比一天明亮；小人修养身心的途径，由开始就故意显露出来而一天比一天熄灭。君子修养身心的途径，暗淡却不满足，简朴却又具有光采，温和却又具有条理，明了远处是由近处才形成的，明了风是从哪里吹来的，明了事物是从萌芽状态才发展到明朗状态的，这样就能够进入圣人的道德境界了。

用仁政对国君提出存在的问题，这才叫做恭谨。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统治民众的人，一定要有功绩、仁德来延及到全天下。缺少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没有资格来讲论大治。但对这两个方面，哪个应放在首位呢？不通过学习，就没有办法形成仁德；不通过政务，就没有途径显现出功绩。讨论政治的人，有的认为帝王的学问不在于文章和技艺，有的认为天子节俭只是次要的东西，有的认为君主不该亲自处理细小的事务，有的认为圣明的帝王对用兵远方的谋略不必太用力。这样看来，应当有比这些方面更重要的东西了。既然如此，那么，应该致力的东西究竟在哪个方面呢？尧舜和大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仁德，所要下功夫的是哪些事项？尧舜和大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政务，所显现出来的是哪些功绩？汉朝、唐朝和宋朝，每个朝代都有英明的君主，可功绩、仁德却很少都具备。亲自推行道德教化的，可典章制度却有的没定立起来；使百姓安乐、官吏称职的，可仁德教化却有的还不纯粹。有的周边部族或方国自动前来归服顺从，但根本性的纲常却不端正；有的靠仁慈宽厚立国，但军事方略却不强劲。这表明，学习和政务，难免存在着可以讨

论的地方。他们的得失究竟怎么样?我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神异的功绩、圣明的仁德,在古今数第一。继位的各个明君递相承接,继承太祖和太宗的志向,延续他们的事业,各自达到了本人在位的盛况。实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皇帝我承接帝位,谋求达到国家治理、天下太平。现今打算执守宋朝大臣所曾奏禀的五种规则,去除掉唐朝宰相所曾陈奏的九种弊端,行用汉代大儒所曾回答的三道对策,用来往上追比古代的圣帝明王,希望对我朝祖宗盛大的功绩、仁德不感到惭愧。这样做起来,最根本的东西究竟在哪里?你们这些读书人研习怀抱道艺前来应试,都志在被当世所用,应当具有用来辅佐皇帝我的东西。尝试着详尽地陈述它们。皇帝我准备加以体察并采用你们的意见。

朱希周　殿试对策

朱希周(1463～1546)　字懋忠,号玉峰。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后迁吴县(今属江苏)。弘治九年(1496)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进侍讲,充经筵讲官。后进侍读学士。历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礼部右侍郎,南京吏部尚书。性恭谨,不妄取予。遭桂萼弹劾后称疾辞官,虽朝廷内外三十余次荐召,终不再入仕。郊居凡三十年,享年84岁,赠太子少保。

臣对:臣闻帝王之为治,有体有用,功与德之谓也。德以学成,而为治之体;功以政著,而为治之用。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盖帝王未尝有无功之德,亦未尝有无德之功。德而无功,有体而无用者也;功而无德,有用而无体者也。体不立,用不备,皆不可以言天下之治。然于此又有说焉。德之浅深由乎学之精粗,功之大小系乎政之纯驳。帝王之德,天下之大德也;帝王之功,天下之大功也。然则帝王之学与政,亦独非天下之大而可以小视乎哉!故有志于功德者,必以学、政为务;而从事于学与政者,亦必有所当务。苟不知务其大而专事其小,则其学也支离偏曲,而不足以成大德;其政也琐屑细碎,而不足

以著大功。尚何天下之治之足云乎哉!由是论之,则二帝三王之所以功德兼隆,汉唐宋之所以功德鲜备,及我圣祖神宗之所以上追帝王而下轧汉唐宋者,概可得而知矣。

钦惟皇帝陛下,有生知安行之资,有持盈守成之道,深仁厚泽浃洽于人心,盛烈丰功覆冒于天下。而犹体道谦冲,惟日不足,乃于万几之暇,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讲求至理,必欲追唐虞三代之盛治,绍祖宗列圣之洪猷,而合汉唐宋于不为甚之盛心也。臣荷国家作育之恩,预有司荐拔之列,敢不勉竭愚衷,以对扬休命之万一乎!

臣惟天降下民而作之君,人君以一身为天下民作之主,其势亦尊矣,其责亦重矣。其所以治天下者,岂苟然哉?盖必有帅天下之德,以立治之体;必有安天下之功,以达治之用。有其功无其德,则教化不成,风俗不厚,虽使勘定祸乱,臣服四夷,国本无自而正也。有其德无其功,则纪纲不立,威令不行,虽使仁心洋溢,仁闻宣昭,国势无自而振也。二者或缺一,可耶?欲言治,皆苟而已。然究其缓急之序,度其重轻之宜,德成而功著者有矣,德不成而欲其功之著,不可得也;体立而用行者有矣,体不立而欲其用之行,不可得也。故善为治者,必由体以达用;善言治者,必先德而后功。至于推本而言,则德不能以徒成,其成也在乎学,学则在讲习讨论之事,克治之功,所以培养乎其德者也。功不能以苟著,其著也在乎政,政则有纲纪文章之事,法度品式之施,所以充积乎其功者也。

顾帝王之学与苇布之士不同,帝王之政与有司之职亦异。试以古人之言论之。好文,盛事也,而程颐则谓帝王之学不在文义。盖经世大法,备载方册,务得其要,措之事业,斯其为大者耳。寻章摘句,何足尚耶?崇俭,美德也,而柳公权则谓天子之俭乃其末节。盖亲贤人,远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斯其为大者耳。片长寸善,何足多耶?躬亲庶政者,人皆以为勤,而杜黄裳乃有人主不亲细事之说。盖其大者,慎选贤才,以分其任而已。若庶务之烦,则钱谷责内史,狱讼责廷尉,何必事事而亲之哉!威灵及远者,人皆以为武,而胡寅乃有圣王不勤远略之议。盖其大者,专务治内,以固其本而已。若戎狄之性,则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何必人人而服之哉!夫知其大者之所当务,则其小

者有不足务矣。

试以古人之事论之。功德兼隆者，莫若二帝三王。其见于《书》，则尧之钦明文思，舜之温恭允塞，禹之彝伦攸叙，汤之人纪肇修，文、武之纯亦不已，建其有极：德莫有大焉者矣。原其所以为学，则虽不必学知利行，而执中之传，精一之训，善言之乐闻，明命之顾諟，以至"敬止"之诗、《丹书》之戒，一皆身心性命之理，而非学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非德之所自耶？尧之敬天勤民，舜之设官分职，禹之修和府事，汤之子惠困穷，文、武之咸和万民，大赍四海：政莫有大焉者矣。要其所以为功，则虽不必家赐人益，而黎民之於变，四方之风动，万世之永赖，兆民之允怀，以至万邦之作孚，万姓之悦服，一皆弥纶参赞之业，而非功之小者也。凡若此者，何莫而非政之所致耶？

三代而下称盛治者，以汉唐宋为首。其间创业之英君，守成之令主，代不乏人。然而有德者或缺于功，有功者或缺于德。汉之文帝，化民以躬，率下以德，庶乎德之纯矣。而礼乐未兴，正朔未改。亦其所为，多失之因循，而不能革嬴秦之陋。宣帝吏称其职，民安其业，庶乎功之美矣。而专事刑名，杂用王霸。考其所存，一出于苛察，而卒以基元、成之乱。单于稽颡，绝域奉贡，唐太宗之四夷服从，功可嘉也。惜乎人伦之间，内多惭德，陷父不义而父子之道乖，推刃同气而兄弟之恩薄，大纲已不正矣。事周后如母，爱少帝如子，宋太祖仁厚立国，德可尚也。惜乎兵权既收，缓急无备，其始虽足以戢奸雄之变，其后渐无以御外敌之骄，武略已微不竞矣。是知文帝、太祖，德优于功；宣帝、太宗，功优于德。求其功德兼隆者，未之闻焉。所以然者，盖以言乎学，不过从事虚文，而无修身之大要。故功虽小著而不足以成其德，用虽行而体则缺矣。以言乎政，不过补塞罅漏，而无经世之远图。故德虽小成而不足以著其功，体虽立而用则缺矣。其不能企及唐虞三代之治，安足怪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恭天成命，肇造洪业。用夏变夷，复纲常于沦敩之后；除残去暴，拯生灵于涂炭之余。太宗文皇帝定制两京，光前裕后。振兵威于四裔，而圣武之广布；昭理学于万方，而王化之覃被。其德之大也，无异于二帝三王之德；其功之大也，实倍于二帝三

王之功。自是以来，圣圣相承。仁宗昭皇帝励志图治，推诚任人；宣宗章皇帝惇典绥猷，立法垂训；英宗睿皇帝刚明独断，奋发有为；宪宗纯皇帝圣孝昭彰，至仁不愆。皆善继祖宗之志而奉承之无间，皆善述祖宗之事而遵守之无遗。所以致此者，固非言语之所能形容，要亦不出乎学与政而已。其为学，一帝王之大道而非章句文义之间；其为政，一帝王之大法而非制度文为之末。

臣请举圣学之一二言之。跋《尚书·洪范》于座右，书《大学衍义》于庑间。表彰六经，以发圣贤之蕴奥；采摭群言，以明性理之渊彻。此祖宗之学也。列圣继之，数御经筵，躬亲著述，备人极于《五伦》之书，详君道于《文华》之训，何莫而非学之大者哉！臣请举圣政之一二言之。礼正百官，乐成九奏。用人有道，而谗说为之不行；驭戎有法，而强虏为之远遁。此祖宗之政也。列圣继之，或询民隐而急农事，或减税敛而轻刑罚，或创课种备荒之制，或加宣圣乐舞之仪，何莫而非政之大者哉！功德之大，继述之隆，有由然也。今陛下当累世熙洽之时，慕隆古文明之治；方有慊于近代之君而不为，顾有服于近代之臣而不弃。岂不以言近指远，登高自卑，胪举其必可行之端，以示其大有为之志乎！

昔宋司马光之于仁宗尝进五规：一曰保业，二曰惜时，三曰远谋，四曰谨敬，五曰务实。诚不可以不守也。唐陆贽之于德宗尝陈九弊，谓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刚愎，六者君之弊；谄谀、顾望、畏懦，三者臣之弊。诚不可以不去也。汉董仲舒之于武帝尝对三策：其一则欲正君心以正四方，立教化以防万民；其二则欲置明师以养士，责大臣以求贤；其三则欲定法制以革奢靡，持一统以息邪说。诚不可以不行也。此三言者，皆赅学政之两端，合体用于一致，天下之治，实不外是。苟徒慕其言而不究其根柢之所在，则守之者无法，去之者无术，行之者无具。亦何以远追帝王，近法祖宗，而大其功德于天下耶？是故祖宗之德大矣，而其所由成者在乎学；今日欲期于祖宗之德者，可不自学始乎！祖宗之功大矣，而其所由著者在乎政；今日欲期于祖宗之功者，可不自政始乎！

陛下之所以为学，亦惟即三臣之言而推之。戒谨不睹，恐惧不闻。儆畏于独知之地，不以暗昧而或欺；省察于方动之几，不以细微而或忽。则五规之所自守者，在是矣。善与人同，改过不吝。不知有余在己，不足在人；不必得为在己，失为在人。则九弊之所自去者，在是矣。体天心以为心，法天道以立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究治乱兴衰之源，谨动静云为之际。则三策之所自行者，在是矣。如是而德不大者，未之有也。

陛下之所以为政，亦惟举三臣之言而措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务勤劳，戒骄情，畏天命而悲人穷。拔本塞源，以防祸患之萌；循名责实，以立政治之本。则得乎五规遗意矣。远邪佞之人，近端直之士。温辞色以尽下情，赏谏诤以开言路。言之善者，采之而不弃；言之未善者，容之而不责。则得乎九弊之深戒矣。大纲正而万目张，一法行而百度举。因革损益各适其宜，先后缓急各循其序。不牵滞于后世驳杂之政，不迂改于流俗因循之论。则得乎三策之大要矣。如是而功不大者，未之有也。

夫学之与政固不可偏废，然不先之以学，则无以宪圣贤之成法，惬事理之当然。凡天下之事，不知何者为是，何者为非，而是非或至于混淆；凡天下之人，不知何者为正，何者为邪，而邪正或至于错杂。亦何以为政于天下哉?此古之善为政者，所以不徒恃乎政，而必有学以为之本也。若夫为学之事，臣前已论之矣。而所以为其事者，亦有道焉。孟子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诚心而已。盖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义理者在是，所以应万事者在是。故诚心不求，则外有讲学之名，而内无自得之实。虽曰从事于学，而亦安能有所发明耶?臣愿陛下坚持此心，不为外诱之所移；善养此心，不为物欲之所蔽。主之以敬，守之以勤，亡者摽之而使存，出者约之而使人。勿贰以二，勿参以三，勿一暴而十寒，勿朝作而暮辍。则志气清明，义理昭著，会之于心而默识心通，体之于身而躬行实践。为学之功，尽善全美而无罅隙之可议矣。学既至，则政无不备；体既立，则用无不行。由是功德之大，远可以追帝王，近可以配祖宗。而凡近代之君，小康之治，有不足言矣。

臣道不足以明体，言不足以适用。然今日之所陈者，一皆圣贤之明训，儒先之格言，而非敢以私见臆说进也。惟陛下采纳而施行之，则天下幸甚，万世幸甚。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治理国家拥有治国的本体和治国的措施，就是所说的事功和道德。道德靠学习形成，因而是治国的本体；事功靠政务显示，因而是治国的效用。二者只能互相依赖而不能互相分离。因为帝王不曾有过不建功业的道德，也不曾有过不具道德的功业。重道德而不重事功，属于有治国的本体而无治国的效用；重事功而不重道德，属于有治国的效用而无治国的本体。本体不确立，效用不完备，都不可能去谈论天下大治。然而对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的说法。道德的深浅来自学业的精粹或粗疏，功业的大小取决于政务的纯正或杂乱。帝王的道德是天下最宏大的道德，帝王的事功是天下最重大的功业。既然这样，那么帝王的学业与政务，难道不也是天下最大的事情，能随便轻视吗?所以有志建立功业与道德的人，必定把学业和政务作为首要的大事；而从事于学业与政务的人，也必须确立应当放在首位去做的大事。如果不懂得重视大事而专门注意小事，那么学业就会支离破碎和不纯正，因而不可能成就伟大的道德；政务也会繁琐细碎，因而不可能以大功业著称。哪里还有什么天下大治值得称道呢?由此而论，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在功业与道德方面很隆盛，汉朝、唐朝、宋朝的君王功业与道德很少能同时具备，再加上我朝神圣的太祖太宗往上能赶上远古帝王，往下能压倒汉朝、唐朝和宋朝的君王，这其中的原因就大略可以知道了。

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有生而知之、安于德行的资质，有保守成业、保持成就的办法，深厚的仁爱和恩惠遍布人心，宏伟的事业和功绩覆盖天下。然而仍然体察大道，谦虚自抑，整天惟恐还有不足，于是在日理万机的闲暇之际，专门招集臣下我等人到朝廷，赐给我们清楚详细的询问。论说和探求最好的治理，一定要追比唐

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太平盛世，继承祖宗和各位先帝的大智大谋，显现出把汉唐宋加起来也算不上过分的宏大心愿。臣下我蒙受国家培养教育的恩惠，进入了主管部门推荐选拔的行列，怎敢不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地对答称扬陛下美好的诏令，哪怕只是微小的一点点呢？

臣下我想来，上天降生了普通人，因而为他们确立君主，君主靠自己一个人成为天下人的主宰，他的地位也太尊贵了，他的责任也太重大了。君主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哪里是能够随随便便的呢！必须有统率天下的道德，以便确立治国的本体；必须有安定天下的事功，以便形成治国的效用。有事功而没有道德则教化不能成功，风俗不会淳厚，即使能够平定祸乱，使周边民族称臣服从，立国之本是没有依据而变得纯正的。有道德而没有事功则制度不能建立，法令无法推行，即使充满仁爱之心，仁爱的名声昭著传扬，国家的形势是没有依据而振作起来的。道德与事功缺一样行吗？这样去论说治国，也都是糊弄局儿而已。但是探究二者之间先后缓急的顺序，估量二者之间应该谁重谁轻，那么道德成就而功业卓著的情况是有的，而道德不成就却希望功业卓著，则是不可能的；治国本体确立而治国效用施行开的情况是有的，但治国本体不立却希望治国效用施行开则是不可能的。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君王，一定是通过确立本体去实现效用；善于论说太平盛世的君主，一定是先成就道德然后成就事功。至于就本体而言，道德不能凭空而成就，成就在于学业，学业则在于讲习讨论什么样的事和能实现什么样的事功，这是用来培养道德的基础。功业不可能随便地就卓著了，要卓著在于政务，政务则要去确立礼乐大纲，实施规章制度，这是用来充实积累功业的基础。

不过帝王的学业与不做官的读书人不同，帝王的政务与有关部门的履行职责也不一样。试用古人的话来论述这一点。喜好文章，这是大好事，但程颐却认为帝王的学业不在于文章的涵义。因为治理天下的大法完全记载在儒家经典中，务必学到其中的关键，施用到事业之中去，这才是最重要的学问。搜寻摘录文章的片断词句，

哪里值得推崇呢!崇尚节俭，这是美德，但柳公权却认为君王节俭只是小节。因为亲近贤人，疏远不贤之人，采纳规谏意见，赏罚分明，这些才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只在小节方面有长处，哪里值得称颂呢!亲自处理各种政事的君王，大家都认为尽心尽力，但杜黄裳却提出君王不必亲自过问小事的主张。因为帝王的大事，就在于慎重地选拔贤才来承担各自的责任而已。至于各种具体细小的政事，钱粮就询问内史，刑罚就询问廷尉，何必事事都亲自过问呢!威势声望达到远方的君王，大家都认为勇猛，但胡寅却提出圣明的君王不对经营远方之事费心的议论。因为帝王的大事，就是专心致力于治理国内，从根本上巩固政权而已。至于周边的其它部族，根据他们的本性，来归顺的不拒绝，要离去的不追击，何必要让人人都归服呢!懂得君王应该做的大事，那么其它小事就值不得花气力了。

试用古人的事迹来论证这一点。功业与道德两方面都盛大的帝王，没有谁能比得上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了。他们的事迹从《尚书》中可以看到的是：尧帝严谨明察，道德纯正完美，舜帝温和谦虚，美德确实充塞天地，夏禹靠天帝把治国的常理作了规定，商汤开始修定人伦关系的规则，文王道德纯正得像天一样没有止境，武王给天下人民确立起中正的准则。这表明，没有比他们更高尚的道德了。推究他们学业的根本，虽然不一定是学习知识，有利行动，但是，传授办事恰到好处的准则，教诲要心念精诚专一，喜闻美好的言论，重视神圣的天命，以及吟咏《诗经》中要敬天勉己的诗篇，牢记《丹书》的戒语，这些都是事关身心性命的重要道理，而不是细小具体的学问。凡是这一类重大道理，哪一点不是美德的源头呢?尧帝敬奉上天，勤劳为民，舜帝设立官位，划分职责，夏禹妥善处理了六府三事，商汤像爱抚子弟一样爱抚贫穷困苦的人，文王、武王使天下所有人和睦，大量奖赏天下人。这表明，政务没有比这些更重大了。探求他们创建功业的关键，虽然不一定是家家由帝王亲身给送去恩赐，人人得到好处，但是，民众随帝王的教化而改变，帝王的政令四方响应，子孙万代永远受益，亿万人民真切怀念，以及各小国信任服从中央王朝，各个

部落心悦诚服，这些都是配合上天、辅助教化的伟大功业，而不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凡是这一类伟大的功业，哪一件不是政务的结晶呢！

夏商周之后被称赞为盛世的朝代，以汉朝、唐朝、宋朝为第一流。在此过程中创建功业的英明帝王、守护祖业的杰出君主每代都有。但是在他们之中，道德卓越的或许在功业方面有所欠缺，功业卓著的或许在道德方面又有不足。汉文帝以身作则地教化人民，凭借恩惠统治天下，差不多是道德纯美了；然而礼乐制度没有建立，新的历法没有制定。考察汉文帝的作为，过失在于太因循守旧，而不能革除秦朝的坏规矩。汉宣帝时官吏称职，人民安居乐业，差不多是功业完美了；然而一味使用刑法，混杂运用文德和武力。考察汉宣帝所留存的政绩，完全都出自苛刻明察，而最终形成了元帝、成帝时的祸乱。突厥国王前来请罪，极远的地方前来进贡朝拜，唐太宗使周边各部族服从，功绩是值得嘉奖了。可惜在伦理方面有很多丑行，使父亲陷入不义而导致父子关系违背道德，同胞兄弟展开厮杀而导致兄弟之间毫无恩义，大纲已经不端正了。事奉后周符太后如同事奉母亲，爱护年幼的周恭帝如同爱护儿子，宋太祖以仁德厚道建国，道德是值得崇尚了。可惜将兵权收归中央，对突发事变却没有防备，虽然开始能够制止奸雄发动叛乱，但日后逐渐不能够抵御骄悍的外敌入侵，军事力量已经衰弱不强了。由此可以知道：汉文帝、宋太祖是道德比功业优长，汉宣帝、唐太宗是功业比道德卓著，从他们当中找出一个功业和道德两方面都隆盛的君主，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学业而论，不过是追求虚浮的文辞，而没有修身养性的要领。所以功业虽然略显卓著，但不能够成就自身的美德；治国效用虽然得以施行开，但治国的本体则欠缺了。就政务而论，不过是随时修补漏洞，而没有治国的长远谋略。所以道德虽然小有成就，但不能够用来使功业卓著；治国的本体虽然建立了，但治国的效用则欠缺了。他们不可能有望达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的盛世，哪里还值得奇怪呢！

只有我朝伟大的太祖高皇帝恭顺地执行上天所定下的旨意，开

创出伟大的功业，用华夏文明取代了异族统治，使君臣、父子、夫妻三纲和仁、义、礼、智、信五常在沦落之后得以恢复，扫除残暴的势力，把灾难困苦中余存的人民拯救出来。太宗文皇帝在北京、南京建制，光大前朝，拓展后期；向周边部族用兵显威，而圣明英武遍布远方；在天下宣扬昭示理学，而王道教化覆盖四方。他们的道德是如此宏大，和尧帝、舜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道德没有差异；他们的功业是如此伟大，确实超过了尧帝、舜帝、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的功绩。从太祖、成祖皇帝以来，圣明的君王递相承接。仁宗昭皇帝激励心志，谋划政治，以诚相待地任用人才；宣宗章皇帝重视人伦纲常，坚持教化百姓，建立法制，留下训诫；英宗睿皇帝刚强英明，独作决断，奋发有为；宪宗纯皇帝昭示显扬圣明的孝道，仁德达到顶点，没有任何过失。这都是善于继承祖宗的遗志代代不忘，没有间断。也都是善于继承祖宗的事业并毫无遗漏地得以遵守。之所以形成这种局势，本来不能用语言来形容表达，总之也没有超出学业与政务罢了。他们把学业搞好，在于专注帝王治国的大道理而不陷入划分经典章节、解释字句词义之中；他们把政务搞好，在于专注帝王治国的大原则而不只是满足于制定次要的法令条文。

臣下我请求列举圣王学业的一二个例子进行论说。在座右题写《尚书·洪范》，在走廊间书写《大学衍义》；宣传儒家经典，来发掘圣人贤人的深奥思想；采集众家言论，来明确性命义理的精深透彻。这些就是我朝祖宗的学业。每一位后代皇帝都在继承发扬，经常亲临经史讲席，亲自撰写著作；在宣宗御撰《五伦书》中包括了做人的最高准则，在宪宗御撰的《文华大训》中讲透了做君主的道理。哪一样不是重大的学问啊！臣下我请求列举圣王政务的一二个例子论说。礼制使百官端正行为，乐舞像舜时奏乐九曲那样完备；任用人才具有原则，谗言邪说行不通。指挥军队具有法度，使强敌逃向远方。这些是我朝祖宗的政务，每一位后代皇帝都在继承发扬。或是关心民众疾苦而把农业生产放在首位，或是减少税收并减轻刑罚，或是创立督促耕种、防备荒年的制度，或是增加祭祀孔

老夫子的乐舞仪式。哪一样不是重要的政务啊!功业道德这样大，守业如此兴盛，确实是有原因的。如今陛下处在历代太平、和睦相承的时刻，思慕古代文德圣明的大治景象；正对汉唐以来的君主有所遗憾而不去效仿，但对汉唐以来的臣僚却有所赞许而不丢弃。这难道不是因为语言虽浅近可意义却深远，登到高处必定从低处起步，依次列出必定可行的开端来，表明大有作为的志向吗?

从前，宋朝司马光曾向宋仁宗献上五条规则：一是保守成业，二是珍惜时间，三是长远谋划，四是谨慎恭敬，五是务求实际。五条规则确实不能不遵守。唐朝陆贽曾向唐德宗陈述九种弊病，认为喜好超过他人，听到过失感到耻辱，一味显示能言善辩，眩耀聪明，专事威严，恣意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王的弊病；阿谀奉承，左右观望，胆小怯懦，这三种是臣子的弊病。九种弊病确实不能不除掉。汉朝董仲舒曾对答汉武帝的三道策问：第一道对策是希望君王心正而使天下正，依靠教化去防范百姓；第二道对策是希望设置光明正大的教师培养士人，责成大臣去寻求贤人；第三道对策是希望定立法制，革除奢侈浪费，坚持统一思想，止息住邪恶的学说。三道对策确实不能不推行。以上三朝臣子所论说的内容，都包纳了学业和政务两个方面，把治国的本体和效用合为了一体；实现天下大治，实在是不能超出这一范围了。如果仅只仰慕他们的言论而不深究其言论的根本是什么，就没有办法遵守规则，没有措施除掉弊病，没有手段推行对策。又怎么能赶上远古帝王，效法近世祖宗，并且在天下发扬光大他们的功业道德呢?所以，祖宗的道德盛大，而道德形成的原因在于学业；当今希望具备祖宗那样的道德，能不从学业开始吗?祖宗的功业宏大，而功业卓著的原因在于政务；当今希望建立祖宗那样的功业，能不从政务开始吗!

陛下加强学业的途径，也就是根据司马光、陆贽、董仲舒的言论加以推衍。对别人无所闻见的事情予以高度警觉和戒惧。在只有自己才知晓的时候，保持恭敬畏惧，不因为真伪不明而被欺骗；在刚刚萌动的微妙状态，加以深思明察，不因为细微而被忽略。这样，五条规则自然得到遵守的办法就在于此。善于与人平等相处，

改正过错不放过小地方；不认为自己很有本事，别人却不足；不把做得好，全都归功自己，做得不好，全都把过失推给别人。这样，九种弊病自然得以清除的办法就在于此。体察天心，作为自己的心念，效法天道，建立自家的大道，穷尽道理以获得知识，反过身来自己去亲自履行。探究治乱兴衰的根源，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保持谨慎。这样，三道对策自然得以施行的办法就在于此。像这样去做了，而道德不博大的情况，是从未有过的。

陛下施行政务的途径，也可以按照司马光、陆贽、董仲舒的言论去部署。在动乱没发生时就制定措施，在危险没出现时就保护国家；把勤劳于国事放在首位而戒备骄傲懒情，敬畏天命而怜悯人民困苦；清除堵塞动乱的本源以防备灾难萌发，就其名而求其实以建立政治的基础。这样就得到五条规则的古意了。疏远邪恶不正、巧言谄媚之人，亲近言行端庄的正直之士；语言神态温和，以便尽量了解下面的情况和意见，奖励直言规谏和争论，以便广开向朝廷提建议的途径；采纳有益的言论而不置之不理，宽容不妥当的言论而不责罚。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防备九种弊病了。大纲端正，那所有的细目就自然张开，统一的法令施行，那各种制度都能执行；继承与创新、减损与增益都能恰到好处，先后缓急的秩序加以遵循；不因为后世王道夹杂霸道的国政而拘泥不前，不因为流行习俗和因袭相承的议论而随意更改。这样就获得三道对策的要领了。像这样去做了，而功业不宏大的情况，是从未有过的。

学业与政务固然不可以偏废，然而不把学业放在首位，则不能效仿圣人贤人定下的法度，符合事物的必然道理。凡是天下的事，不懂得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那就可能导致是非混淆；凡是天下之人，不懂得什么是纯正、什么是邪恶，那就可能导致正邪混杂。这样的话，又依靠什么去治理天下呢?这就是古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不只凭借政务，而必须把学业作为根本的原因。至于学业方面的事，臣下我在上面已经论说了。而把学业搞好，也有原则在其中。孟子说过：学问的原则没有别的，就是寻找那真诚的心罢了。因为心是人的灵魂，是用来储备道理的地方，是应付各种事物

的依托。所以不追求真诚的心，则外表有讲习学业的名声，而内心没有实际的收获。虽然宣称从事学业，那又怎能有所发挥呢?臣下我希望陛下牢固地持有真诚之心，不因为外部的诱惑而转移；妥善地培养真诚之心，不对物质欲望有所羡慕。用恭敬来主宰，用勤勉来守护；失掉的东西就要剔出来让它必须存在，散去的东西就要约束住使它返回。不要因为再加入另外的一个东西而不专一，不要因为再加入其他的东西而参杂不一，不要如晒一天、冻十天那样没有恒心，不要早上去做而傍晚停止。这样就能使志向气量清楚明朗，道理明白突出。学问汇聚在心里而去暗暗领会，思想通畅，体悟在自家身上而去亲自实践。搞好学业的功用，尽善尽美而没有值得非议的漏洞了。学业既然达到了极限，政务就没有不施行开的；治国的本体既然确立了，治国的效用就没有不表现出来的。因此功业道德的伟大，远可以赶上古代帝王，近可以配得上自己的祖宗。至于汉唐宋的君主，这几个朝代的小康政治，就值不得论说了。

臣下我在治国大道上不能阐明根本，在发表议论上不能够适合效用。但今天所陈述的，都是圣人贤人的明确教导和儒学前辈的格言，不敢用自己的意见、想当然的言论来进献。希望陛下采纳并付诸实行，这样天下就太幸运了，后世也太幸运了。臣下我冒犯了天子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文明元译〕

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殿试策问

[弘治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膺天命,承祖宗列圣之统,以临天下,于兹十有五年。夙夜兢兢,思弘化理,非法诸古而不可。然尝考之前代继统之君,守成称贤,莫盛于夏之启,商之中宗、高宗,周之成、康。之数君者,治绩之美,具在方策。果何道以致之?近世儒者之论,谓圣王以求任辅相为先;又谓君之圣者,以辨君子与小人。数君之致治也,其亦有藉于是耶?且辅相之贤否,君子小人之情状,未易知也。兹欲简贤为辅,用君子,不惑于小人,将安所据耶?天下之务,固非一端。以今日之所急者言之,若礼乐教化,若选才课绩,征赋之法,兵刑之令,皆斟酌于古。然行之既久,不能无弊焉。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举,如祖宗创制之初,比隆前代,何施何为而得其道邪?诸生绩学明经,通于古今之宜,其具实以对。毋隐言,毋泛论。朕将采而行之。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在齐国听到《韶》的乐章,三个月里品尝不出肉味来,于是

说:想不到欣赏音乐竟达到了这种境界。

只要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变得尊重他又亲近他的,所以说他那德业广大如天。

每一方里的土地构成一个井田,每个井田为九百亩,当中的一百亩属于公家田。八户人家全都各有一百亩私田,共同来耕种公家田。先把公家田耕种完,然后才敢料理私人的活计,这是用来区别开农民与官方的差异啊!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承受上天的大命,继承祖宗和各位先帝的皇统,统治天下,到现在已经十五年了。从早到晚,兢兢业业,思索弘扬教化的道理,不效法古代就行不通。但也曾考察前代继承王位的君主,守持住已有的基业称得上贤明的,没有比夏代的启、商代的中宗和高宗、周代的成王和康王这几位国王更隆盛的了。治绩的盛美,详尽地载录在典籍上。他们到底是通过什么办法来达到的呢?近代儒者的议论,认为圣明的帝王把访求任用辅政的宰相放在第一位。又认为君主中圣明的人,要分辨清君子与小人。三代那几位国王实现大治,他们也对这两点有所依赖吗?况且辅政宰相的贤良与低劣,君子和小人的情状,不容易闹清楚。如今打算挑选贤能的人作为辅臣,任用君子,不被小人所迷惑,将要依据什么呢?天下的事务,本来就不是一个方面。拿当今所要优先解决的来说,像礼法音乐,像教育感化,像选用人才,征收钱粮布帛的方法,军事和刑罚的命令,全都斟酌古代的做法。但行用它们既然已经时间很长,就不能没有弊病。去除那些弊病来做补救,打算教化推行开,政务都振扬起来,如同祖宗创设制度的初始状态,和前代追比隆盛,究竟怎样施设、怎样去做就获取到那合适的原则与方法了呢?你们这些读书人积累了很多的学问,通晓经典,对古今的合适做法搞得很清楚,要一五一十地来对答。不要隐隐约约地讲,不要空泛地发议论。皇帝我准备采纳并行用你们的意见。

康海　殿试对策

康海(1475～1540)　字德涵,号对山,武功(今属陕西)人。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被刘瑾所招而不往,后因营救李梦阳去谒拜刘瑾,使李得以出狱。刘瑾败,其被视为刘瑾一党而论罪免职。遂与遭遇相同的王九思等人常相聚在雩(今户县)、杜陵间,挟歌伎酣饮,自比俳优,以排解愤懑。尤擅长弹瑟琶,后人转相仿效。著有《对山集》、《沜东乐府》。

臣对:臣闻天下有不可易之道,而常获于人主有不敢易之心。盖天下之事,未有舍道而能集者,而道固不可易也。心之所向,道之弘否所关。一有所易,则所以修乎身者,必不能实用其力。而道之在我,知之不明,守之不固,甫迁于此,或转于彼,虽欲勤励以求治,而弛张予夺,一无所拟。窥伺媒孽之辈,共起而乘之,虽有贤人君子立于其朝,漫不相信,甚者或斥谴罢去,不为之所。天下之治,将焉所赖而成乎?惟有以真知道之不可易,其心常忧勤惕励,而不敢以一毫苟且轻率之意杂之于中。择之必精,执之必固,使用人取善,各有定则,贤否莫吾乱,而君子小人不相尤。既得其人而任之以事,则政无不举而法无不善。天下之治,宜无有不成者矣。古之人君,未有不达于是而能致其治者也,亦未有徒达于是、其心终有易焉而能以无弊者也。

洪惟皇帝陛下,以至圣之德,抚盈成之运。十五年来,民安物阜,虽尧舜、禹汤、文武之业,亦不过此。而策士之诏,乃犹拳拳焉以化不洽为念。陛下岂诚有未达于是,而犹待于问哉?臣有以仰窥圣心之于道,固有不自易焉者也。臣尝谓古今豪杰之士不得所遇,如子思、孟轲之流,亦且徒尔。而臣之庸昧,乃际遇若此,臣敢有所讳而不言哉?

臣惟天下之深患,在于久安极治,而机括所不见者,莫为之虞。陛下夙夜兢兢,思弘化理,此固宜也。然用于己不若资于人,求诸今莫若法乎古。古之君之心纯乎道,未尝敢以为易。故其用人行政,有非后世之所能及。如启当禅授之后,继禹之业,守之以敬,而伯益之

用,始终无间。故道之得于禹者,无废坠不举者矣。中宗、高宗,一切信任陟扈、傅说之属,而又本以严恭寅畏、恭默思道之心。成商之治,夫岂无所据邪!殷之顽民杂于管蔡、武庚之手,武王之泽未洽也。使非悔悟于周公,笃信于君奭,借有成、康继序不忘之思,旌别淑慝之意,而礼乐之化,岂能如《诗》、《书》所道哉!

程颐曰:圣王以求任辅相为先。欧阳修曰:君之圣者,以辨君子与小人。盖政以人而举,人既存,则政自无偏弊不举之患,而治之在天下者,可成也。陛下欲求数君致治之绩,独可舍此而他务邪?亦惟有不敢易之心而已。天下之政,孰有出于人主之心者?况用人之际,又其本原所自之地哉!圣制所谓简贤为辅,用君子,不惑于小人,诚灼见其必然,而忧勤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盖大君为天地之宗子,必有大臣以为宗子之家相。相之职,所以辅养君德而赞成政化,天子不可以一日无者。岂惟夏商周为然!皋、夔、稷、契之流,虽尧舜之世,亦不可无也。若其贤与否,则必辨之于先,而后可任之于后。苟辨之不明,用之不当,则天下之祸,反有不可言者矣。何者?以匹夫之贱,而上与天子共事,其所为操纵予夺者,无一不为天下之所禀受。使心术或不正,而学识或不醇,则其所坏,非如有司之一节一端而已。故必先有不敢易之心,然后修之身者无往不实;修之身者既实,则出乎我者无乎不正,而人之邪正自无所匿。于是择其贤者而用之,则辅相得矣。

臣于今日,岂以不得为忧哉?特恐所以待之者不至尔。臣在草野间,闻朝廷用大臣必极耸动,以为谘谋亲信,将必有出于恒品之外。今上于京师,乃或有未然者。臣愿陛下为之礼下,务得其心,而使尽其职。凡远猷大略,不为群议所诎;一政一令,必与之深言极论而后布。则小人虽欲肆其无所忌惮之私,以惑吾听,而其情已先觉矣。盖小人之情,不过趋利避害,去其所恶而求其所喜者而已。然亦必掩之而不甚露,故利之来或逊且谢之,害之至或以为所分且蹈之。夫辞之不力,则得之不固;受之不力,则去之不决。及利害至于必不可已,则亟去与取之恐后也。方其有所勉而为之也,其卒不可掩者,已跃然于甘言悦色之间。即此试之,小人之情可复遁乎?既得其情则宜亟去之,去之不亟则或为他巧所中,而犹未免于有惑。随有即觉,随觉即

去，如是而已。如是则君子小人不相尤，君子小人不相尤则动无所妨，而天下之务，自无凝滞不举之患矣。

臣请以圣制所及数者言之。礼乐不可以一日无，此万古不易之论。然其兴也，虽专重其实，而亦未尝遂弃其文。臣窃见近之所为礼者，疏简纵逸，虽所谓仪文之末，亦未之有；所为乐者残缺废坏，虽所谓声容之细，亦不备。盖不得其本，而安于苟且将就之习，固如是也。苟学校之教有以振作而兴起之，则人心自无不止之欲，而其情自无不和之发。凡见之宗庙、朝廷、乡党之际，自有以去其疏简纵逸之习，而补其残缺废坏之弊，将不俟于进退升降而节，钟鼓羽籥而和矣。礼乐有不兴者乎！

至夫教化之所在，其机系于人主之心，而其应属之天下之广。萃英俊之士，使之郡游于学，读书穷理，且或莫为之变，而欲驱天下之愚民，使悉归于礼让和乐之域，固已难矣。莫若先以恭俭忠厚躬行于上，不为声色、土木、货利、玩好之所移易，而后徐以示于天下。天下方以前日之侈纵相安，而一旦之所闻见乃如此，其心亦必悚然以思，泠然以省。苟大家巨族顿悟而倡改之，则人之乐从者众矣。

选课之法，则臣于此有所深惜。祖宗之于士，养之以道义，而信之以赏罚。其用也，不为之拘；而其课之也，幽明殿最，各为之等。故人皆勉于其官而优于其事。比者稍有兵荒，而纳粟贾官之人已满吏部之簿矣。虽有才德，滞于所用之期，用未及而颠毛已号种种，能以壮节自励者，曾几人哉？又况黜陟之施，一惟流品是视。苟不本于科甲之选，高官重秩未肯轻予，则彼无所慕于中者，又安有所忌于外哉？臣愿严其侥幸觊觎之禁，使冗懦不识之徒一一谢去。选惟其才而不尽拘流品，视之以官而课之以实。如苏洵所谓：其人廉吏也，有其事以知其廉；其人能吏也，有其事以知其能。然后因其职否，以加赏罚。天下之人，望以其才见者，亦将知所变矣。

征赋之病，大抵冗耗过多，而司会莫为之省。非司会之不省，势不得也。自京师言之，食之仰于江南，岁数百万。而权势所蓄无籍之辈，不为国家分寸之益者，乃至百千，借其空名，以耗实费。至有水旱饥馑之变，则又加倍以取于江南之民。臣闻土日掘则陷继之。江南之

民贫甚，则江北可晏然以不顾乎？况今边境之扰，未甚妥贴。前日榆林、大同之役，马死食匮，所费不知几千万。而无用之兵，又坐食于是。山陕之民，丁运之法无不备举，老幼妇子流离移析。外患未除而内地已困，宁不为可惧邪？臣欲去冗耗无用之费，而革权门招集之弊。息江南之民，以固根本。边境之扰但以付之良将，不用统制之属，带挟侥幸之徒，以耗军食。而又复屯田之实，省丁运之苦，用固无不足者也。

兵则于生养安息之间为之深计，使不受役于私门，而得给其俯仰。奋迅激烈之气，又必常振励之，使之无所沮丧。今有一级之劳，而大家右族诃谴夺去，不敢仰视，将何所养以自奋乎？况夫新旧逃流之兵，方以官法逼之复伍。釜爨之用，俱无可充。又其居无亲戚往来之接，其心之欲去已甚矣。卫所之官又以严刑深计，钩取其有。彼方有欲去之心，而此又逐之使去。逐矣而不去，岂人情哉？欲兵之强，而二者特不之详，臣所以深虑也。

用刑之际，洞照物情而不为所诳，明者皆足为之。而法之轻重，则有一定之制。既得其情，必为之继，使贵贱无异施，豪右寡弱无异决。则令之所出，即无不从，天下之奸，当必随禁而革。盖天下皆天子之民，则刑期于必戮，赏期于必得，不待命而后知者也。豪右之徒有所倚仗，得以自脱，而寡弱之人，骈首就死。人之情孰不畏死，而不求所以自脱哉？此尤陛下之所宜置念者也。

夫数者之务，酌之于古而行之于今，宜有不可易者，而其弊犹若此。圣制所谓祛其弊而救之，欲化行政举，如祖宗创业之初，比隆前代者，岂有他哉？亦取诸人而已。孔子曰：为政在人。启以下数君，不过中才之主，一得其人，且足以为治，而况陛下神圣天纵，出于寻常万万者哉！

然臣于此窃有说焉。盖政虽举于有人，而身则所以取人之本。故孔子又曰：取人以身。欲得人而不先修乎身，是其心之所存轻忽率易，不能不累于爱憎之私，而用所不当用、舍所不当舍者，有矣。愿陛下急于修身，以端取人之则。然所以修身者，又非勉强矫拂之所能致。必自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间，以至于动静语默、一事一为之

际，常加儆畏，内省于中。果当于理而不悖乎？果非其当然之则而狃于外诱乎？使天理纯明，私欲净尽，则身无有不修，而道无有不尽。酬酢斟酌，自不谬于天下之是非。苟用乎人，其用必当；苟发于政，其发必精。治功之隆，必能追配祖宗，卓越古昔，而有《诗》、《书》之所不及载者矣。彼汉唐宋区区小补之治，又恶足论哉？然臣又闻，治不患于始之不得，而难于终之有继。伏惟陛下常存不敢易之心，以守此不可易之道，则国家天下之幸，非独臣之幸也。臣无任拳拳忠爱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天下有不能变的道，它永远由君主具有不敢随意变动的心念才会获取到。因为天下的事情，没有离开道却能取得成功的，道就确实不能变。心向往什么，关系着道的弘扬与否；一旦心有所变动，那么修养身心的大事，必定不能实实在在地花气力。而道原本在我来掌握，对此认识不清楚，守护得不稳固，刚刚变到这方面、又转向那方面；虽然勤勉地追求治理好国家，但施政宽严和赏罚，就完全没有比照的标准。伺机窥探、图谋诬陷的那些人，一哄而上，乘隙而入；即便朝廷中有贤德的君子，大都不会被信任。甚至有的还遭到斥责罢免，不做合适的安排。要治理好天下，还打算依靠什么去实现呢？只有真正懂得道不能改变，心中常常想着勤劳治国，警惕不努力，不敢将一丝一毫随便轻率的念头掺杂在其中。选择必须精确，执持必须坚决，做到任用人、采纳好建议都有固定的准则，贤与不贤的区分不会使我混乱，而君子与小人不能互相指责。得到贤人后才委任职务，那么朝政就没有不施行的，法令就没有不妥善的，天下太平理应一定能够实现了。古代的君主，没有做不到这些而实现了太平盛世的，也没有只做到这些、最终心又有所变动而不出现弊政的。

想来只有伟大的皇帝陛下，凭借最高的道德，顺应着守护祖业的时运。即位十五年来，人民安定，物产丰富，即使唐尧、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业绩，也超不过这种局面。但策问我们的诏书，却仍然十分恳切地把教化还不普遍作为重要问题来考虑，这难道是陛下

真对道、心的关系还不了解，因而还有待于询问我们吗？臣下我又因此仰视到陛下圣明之心对于道，确实是不会随意改变的。臣下我曾经认为，古今的豪杰之士得不到君王信任的机遇，像子思、孟轲这样的贤人，也只是空有本事而已。而臣下我这样平庸愚昧的人，却适逢得到如此信任的机遇，臣下我怎敢有所隐讳而不回答呢？

臣下我想来，天下最值得担忧的，是国家长期安定、治理得非常好以后，却对施政关键所没有显现的事情，不做任何防备。陛下日夜兢兢业业，思考光大教化和治理，这本是应该做的。然而靠自己不如借助别人，求助现实不如效法古代。古代君王一心扑在道上，未曾敢有变动。所以他们的用人和施政，就不是后代君主能够达到的。例如夏启处在禅让传位制度之后，继承大禹的事业，恭敬地守成，因而对伯益的任用从始至终没有猜疑。所以大禹施行的大道，没有被废弃和得不到施行的。商中宗、商宗完全信任伊陟、臣扈、傅说等大臣，而且又不改变严肃庄重、小心谨慎、恭敬地默思治国大道的本心。商朝的太平盛世，哪里是毫无依据的呢！商亡国后不服周朝的人混杂在管叔、蔡叔、武庚手下叛乱，说明武王的恩惠没能遍及天下。假如不是对周公追悔醒悟，对召公十分信任，即使成王、康王具有不忘继承守护先业的想法、识别善恶的意念，那么礼乐的教化怎能如同《诗经》、《尚书》中所称道的那样呢？

程颐说过：圣明的君主把寻求、任用宰相当作首要任务。欧阳修也说过：君王的圣明，在于辨别君子与小人。因为朝政依靠人来推行，已经有了人，那么朝政自然没有偏差弊病、不能施行的忧虑了，因而治理天下就能够成功。陛下希望找出这几位君王实现天下大治的原因，难道可以舍弃这一点而从其他方面去寻求吗？只不过是有不敢随意变动的心念罢了。天下的治理，有哪一方面能够越出君主心念之外的呢？况且用人的时候，心又是用人根源所开始的地方呢！陛下策问中所说的：选拔贤人作为辅佐大臣，任用君子而不被小人迷惑，确实明白透彻地看到事情必须这样做，而且忧愁勤劳之心已经无法自我控制了。君王是天地的嫡传长子，必须有大臣作为嫡传长子的家中辅佐。辅相的职责，就是辅助培养君王的道德，从而辅佐成就政

治教化。君王不可以一日没有辅相。哪里只有夏、商、周才这样做呢？皋陶、夔、后稷、契等大臣，即使在唐尧、虞舜时代，也不能没有。至于辅相的贤与不贤，则必须先进行辨别，然后才能任用。如果辨别不清楚，任用不适当，那么对治理天下带来的祸害，反而又难以用语言来说清了。为什么呢？作为一个地位低下的普通人，能上升到与君王共事的地位，他所能掌握和处理、给予和剥夺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被天下人所接受。假如他的心术要是不正，他的学识要是不纯，那他所毁坏的事情，就不像有关部门一个支节、一件具体事了。所以必须先有不敢随意变动之心，然后修养身心之事没有一处不落在实处；修养身心落在实处了，那么出于君主我的决断没有一样不纯正，因而他人的奸邪与正直自然无法隐瞒。于是选择那些贤人加以任用，辅相就得到合适人选了。

臣下我对于当今哪里能把得不到辅相作为值得担忧的事情呢？只是担忧对待辅相的办法不周全罢了。臣下我作为普通百姓，闻知朝廷任用大臣时，必定抱有特别高的期望值，认为向自己亲近信任的大臣访求谋略，必定会有超出常人之外的地方。如今来到京城，却可能存在着不是这样的情况。臣下我希望陛下要礼贤下士，一定要赢得他们的忠心，使他们能尽其职。凡是长远、重大的谋略，不因为众人议论而屈服；一项政事、一道命令，必定要和大臣深入讨论，然后宣布。这样，小人即使想肆逞他们无所忌惮的私欲来迷惑我的听断，但他们的用意已被事先察觉了。因为小人的性情，不过就是趋利避害，除掉他们所厌恶的并追求他们所喜爱的一切罢了。然而小人也必定要进行掩饰以便不完全暴露，所以当好处出现时或许会谦逊并且推辞，害处出现时或许会认为是命中注定，并要顶上去。因为不尽力推辞就不能牢固地得到；不尽力承担，就不能绝对地避开。等到利、害达到必然止不住的程度，就迅速地逃避危害与迅速地夺取利益，惟恐落在后边。在他有所努力并做这些事时，最终不能掩饰的用意，已经活跃地出现在甜言蜜语和形喜于色之间了。用这种方法进行检验，小人的实情能再躲藏吗！既然了解了小人的实情，就应当赶快把他清除；清除不及时，就可能被其他的花招所击中，因而仍然免不了出现

迷惑。随时出现，则随时发觉；随时发觉，则随时清除，不过如此罢了。像这样做了，则君子与小人不能相互指责；君子小人不能相互指则，则措施举动不会受到阻碍；因而天下的大事，自然没有停滞不前和施行不了的危害了。

臣下我请求根据陛下策问所涉及的几个方面进行论说。礼乐一天都不能没有，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结论。然而礼乐的兴起，虽然应专注并重视礼乐的实际内容，但也未曾因此放弃礼乐的表现形式。臣下我私下看到，近代所制定的礼仪，粗疏简单，恣纵放荡，即使是所说的礼仪细节，也不具备。所制定的乐舞，残缺不全，废坏不齐，即使所说的演奏细节，也不具备。由于不懂得礼乐的根本，从而满足于随便将就的习气，所以只能如此了。如果学校教育能够振作并兴盛，那么人心自然不会有无休止的欲望，因而他们的性情自然没有不协调的发泄。凡是在宗庙、朝廷、乡里使用礼乐时，自然就能够清除那些粗疏简单、恣纵放荡的习气，弥补那些残缺不全、废坏不齐的弊病，将不必等待礼仪的进退升降就符合规范，不必靠钟鼓、竹管等乐器就能协和了。礼乐制度哪有不兴盛的呢！

至于教化的关键所在，在于契机掌握在君主的心中，响应归结在整个的天下。汇聚杰出的人才，使他们在地方学校学习，读书穷尽道理，而且还没有什么能使他们改变，却想要驱使天下的愚蠢百姓，使他们全部归入礼仪谦让、协调和睦的范围，本来已经很困难了。不如将恭敬、勤俭、忠诚、淳厚等美德首先从君主开始身体力行，不被音乐美女、土木工程、财物私利、珍奇物品所转移改变，然后逐渐用这些美德给天下做出示范。天下的人正习惯于从前的奢侈放纵，但一旦他们见到听到的都是恭敬、勤俭、忠诚、淳厚，他们的心必然会惶恐地思考，冷静地反省。如果大户人家、巨室豪族突然觉悟并倡导改正，那么乐意跟随的人也就多了。

选拔考察官吏的制度，臣下我对此怀有深感痛惜的地方。祖宗对待读书人，是用道义培养他们，用赏罚使他们诚信。在任用时，可以不拘一格；在考察时，贤与不贤、最好与最坏都有各自的等级。所以人人努力尽职，办好份内的事情。近来稍有一点战争和自然灾害，

而交纳粮食买官的人已经写满了吏部的登记册。读书人尽管具有才德，但被任用的期限所拖延，还没赶上得到重用，就已经衰老了。能够用烈士暮年、壮怀不已的节操自我激励的人，曾有几人呢？更何况降职提升的实施，一概只看级别高低。现在如果不是进士出身的人，高官厚禄就不轻授予，那么在心中没有什么追求的那些进士，又怎么能在行为上有所忌怕呢！臣下我希望严禁侥幸、非份之想，使庸劣、怯懦、没有识断的人一一辞去；选用人只看他的才能而不完全局限于级别，根据官职来考察实绩。正如苏洵所说：某人是廉洁的官吏，有具体事迹得以知道他廉洁；某人是能干的官吏，有具体事迹得以知道他能干。然后根据他称职或不称职进行赏罚。天下人看到能够凭借才干显贵，也一定就知道该如何作改变了。

征收赋税的弊病，大抵是额外的消耗太多，而主管财政的官员不加以节省。不是他们不节省，是形势决定了不可能。从京城来说，依赖江南供应的粮食，每年多达几百万石。而有权有势之家蓄养的不上户籍、对国家没有任何一点益处的人，却多达成百上千，凭借虚报户口而实际消耗着国家的费用。到发生水灾旱灾和饥荒时，又加倍地再去榨取江南的百姓。臣下我闻知：天天挖土则随之而来的是塌陷。江南的百姓贫穷过度，江北却可以安然而不理会吗！何况如今边境受到侵扰，并不十分安定。前段时间在榆林卫、大同镇发生的战斗，马匹死亡，粮食匮乏，耗费的钱财不知有几千万。而不能使用的士兵，仍然在其中白吃饭。山西、陕西的百姓，由于全面执行丁男运输之法，老人、孩子、妇女流离失所，迁徙离散。外患还没消除而内地已经贫困，难道这不值得惧怕吗！臣下我希望清除额外消耗、白白用去的费用，并革除权势之家招集流亡人口的危害，让江南百姓喘口气，以便使根本巩固。边境受到的侵扰只管托付给良将，不再任命统制之类的官员而让他裹带侥幸之人去耗费军粮。并且还要恢复屯田，取得实效，省却男丁运输的困苦，费用肯定就会充足了。

对士兵要在生养安息之间替他们做深远考虑，使他们不被私家豪门所役使，能够有条件侍奉自家的老人和抚育儿女。还有行动迅速、激昂壮烈的士气，必须经常加以鼓舞激励，使他们不致灰心丧

气。如今士兵立下斩杀敌军一人的功劳，却被大户豪族在喝斥、谴责中夺掉，连抬头看一下都不敢，将如何用自我振作来培养士兵呢！况且过去和新近逃亡流浪的士兵，刚刚因官府法令被迫返回军队。锅灶之类的器具完全不够使用，居住地又没有亲戚往来接济，想脱离军队的心情已经很强烈了。卫所官员还用严厉的刑法、狡猾的计谋骗取他们拥有的东西，他们正怀着打算离去的心情，这些官员又驱赶、促使他们离去。受驱赶而不离开，哪里是人之常情呢？打算军队强盛，对这两种情况却不格外予以注意，这是臣下我深深忧虑的原因。

使用刑法的时候，明察案件的情由而不被迷惑，明智的人都能做到。但使用刑法的轻重，则有一定的制度。一旦得到真实情况，执法必定要紧跟上来，使贵贱之间没有不同的处罚，豪强寡弱之间没有不同的判决。那么法令一公布，就没有人不服从；天下奸邪不正的行为，必定会随着法令的施行而被清除。因为天下人都是君主的子民，那么，犯死罪的就必须杀头，该奖励的就必须兑现，不必再等待命令然后才执行。一等待命令，豪强一类的人有靠山，犯了法自然能够逃脱，而寡少强小的人犯了法只有一个接一个地去受死。人之常情谁不怕死，而不去寻求能自然逃脱的途径呢！这一点是陛下应当特别加以考虑的。

以上几方面的事情，参考古代，在现代施行，应当有不可改变的东西，但其中的弊病还如此之多。陛下策问中所说的除掉其中的弊病并且进行补救，希望教化施行，治理成功，和祖宗创业之初一样，比前代兴隆。要实现这些，哪有其它途径呢？也只能靠得到贤人罢了。孔子说：治理国家关键在人。夏启以后的好几位君主不过是一般的君主，但一旦得到人才就能治理好国家，更何况陛下得到上天赋予的圣明，超出一般君主亿万倍呢！

然而臣下我对此还有自己的看法。政治措施的施行虽然依靠人才，但君主的自身修养水平是选用人才的根本。所以孔子还说：选取人才，凭借君主的自身修养。希望得到人才而不首先修养自身，这是心中存有不慎重、随时会改变的做法，不能不被个人爱憎所拖累，因而任用不该用的人、舍弃不该舍弃的人，这种情况就产生了。希望陛

下把修养身心作为最急迫的事，以便使选用人才的准则端正。然而修养身心之事，又不是勉强纠正一下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之间的关系，一直到一举一动、一言一语、一件事、一个措施，经常加以警惕、畏惧，在心中进行自我省察。果真符合道理，而没有违背之处吗？果真不是正确的准则，而是因外部诱惑而习以为常吗？如果对天理的认识纯正光明，私欲全部清除干净，那么身心一定会修养好，大道一定会贯彻到各个方面。应酬对答，反复衡量，对天下的是非自然不会判断错误。如果是用人，那任用的人一定称职；如果是发布政令，那发布的政令必定精确。治理天下功绩的兴隆，必定能追随并配得上祖宗，在古今历史上占有卓越的地位，从而创出《诗经》、《尚书》中没有记载过的功德。汉朝、唐朝、宋朝那微不足道的治国业绩，又哪里值得论说呢！然而臣下我又闻知，治理国家要担心的不是开始，而是难在坚持不断。恭敬地希望陛下永远存有不敢随意变动的心念，坚持守护那不能改变的大道，国家和天下人民就太幸运了，而不仅仅就臣下我一个人幸运了。臣下我恳切、忠诚、敬爱到了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文明元译〕

明孝宗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

殿试策问

[弘治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自古帝王之致治，其端固多，而其大，不过曰道、曰法而已。是二端者，名义之攸在，其有别乎？行之之序，亦有相须而不可偏废者乎？夫帝之圣，莫过于尧舜；王之圣，莫过于禹汤、文武。致治之盛，万世如见。其为道、为法之迹，具载诸经。可考而证之乎？自是而降，若汉、若唐、若宋，贤明之君所以创业于前而守成于后，是道是法，亦未尝有外焉。何治效之终不能古若乎？我圣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建极垂宪，列圣相承，益隆继述。为道为法，盖与古帝王之圣，先后一揆矣。朕自莅祚以来，夙夜兢兢，图光先烈，于兹有年。然而治效未臻其极，岂于是道有未行、是法有未守乎？抑虽行之守之，而尚未尽若古乎？子诸生明经积学，究心当世之务，必有定见。其直述以对，毋徒骋浮辞而不切实用。朕将采而行之。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广博地学习，牢固持守住自己的志向，抓住要害来发问，多就当前的问题做思考，仁德也就包含在这里面了。

所以打算大有作为的君主，必定要有不直接宣召的大臣。想起有事需要谋划，就亲自到大臣那里去。君主尊崇道德，喜好仁政，如果不像这样办，就不足以和他大有作为。所以商汤对于伊尹，先向他学习，然后让他当辅政大臣，所以自己不辛劳却统治了天下。

仁德，也就是作为人所具有的善良本性啊！所以亲近自己的亲属占第一位。道义，也就是区分事理，全都适宜。所以尊崇贤能的人占第一位。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实现大治，具体途径固然很多，但最重要的，不过叫做大道，叫做法度而已。这两个方面，名称和意义之所在，存在着区别吗？行用它们的次序，存在着彼此相互依赖而不能偏废的吗？称号为“帝”的最圣明的人，没有比唐尧、虞舜还领先的；称号为“王”的最圣明的人，没有比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还领先的，当时实现大治的盛况，万世还好像看得见。他们施布大道、制定法度的足迹，详尽地记载在经典上。能够对此做一番考察和论证吗？从此以下，像汉朝，像唐朝，像宋朝，这些朝代中的贤明君主，在前面开创国家基业，在后面守执住已有的基业，所运用的这种大道，这种法度，也未尝出现过超出本范围以外的。但为什么治理的效果到头来却不能像古代那样呢？我朝圣祖高皇帝，在平定天下的初始阶段，建立起最高准则，垂示给后世成规，各位先帝递相承接，进一步使那继承、延续的事业隆盛起来。施布大道，行用法度，大概同古代帝王中圣明的人，先后是同一个道理了。皇帝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从早到晚，兢兢业业，谋求发扬光大祖先的功业，到现在已有年头了。然而治理的效果还没有达到极点，恐怕是对这种大道还有未行

用、对这种法度还有未恪守的地方吧?或许是尽管行用、恪守它们了,但还没有完全像古代那样吧?你们这些读书人通晓经典,积累起很多学问,究心当世的要务,一定有成熟的看法。迳直陈述它,来做对答。不要光是空泛地卖弄虚浮的词句却不切合实际的用场。皇帝我准备采纳并行用你们的意见。

顾鼎臣　殿试对策

顾鼎臣(1473~1540)　字九和,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弘治十八年(1505)状元,授翰林院修撰,累迁礼部侍郎。以文词为明世宗所知,开明代词臣以青词结主知之风。屡陈东南赋役不均之弊。后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但无所建树。曾提议修昆山城,使昆山在倭冠杀掠中得保全。死后谥文康,有《未斋集》。

臣对:臣闻帝王有治天下之大体,有治天下之大用。体者何?道是也。用者何?法是也。道根于心,法之所由立也;法施于政,道之所由行也。法而非道,则所以主张之者无其本;道而非法,则所以经纶之者无其具。皆非所以治天下也。然有是道,则其法可立,未有善立是法而不本于道者也;有是法,则其道可行,未有能行其道而不知守乎法者也。道行而无弊,法立而能守,则推之无不准,动之无不化,外无不攘,内无不安,远无不至,迩无不服。端拱于九重之上,而操纵翕张,所向如意;运用于四海之间,而浑融贯彻,所在归极。尚何治之不古若哉!帝之所以帝,王之所以王,我皇祖之所以创造,列圣之所以继述,皆不外此。彼汉唐宋者,道非其道,法非其法,又何怪乎治效之不能比隆于唐虞三代也哉?

钦惟皇帝陛下,天启圣神,日新德学,大化神明,洽于远迩,至治馨香,彻于上下。所谓学于古训而有获、监于成宪而无愆者,盖卓卓乎足以光前而裕后矣。兹者开贤科,擢多士,御大廷,降明诏,犹谓治效未臻其极,而拳拳以行道守法为问。臣虽至陋,宁不鼓舞感动,思罄愚衷以对扬休命乎?

窃惟天生万物，不能自理，而命之圣人。故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夫以一人之身，加于兆民之上，而付之以君、师治教之责，亦大且难矣。求尽是责，以无负乎天之所命，舍道与法二者，其奚以哉？是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治之道也。道者，治之体也。建立纪纲，分正百职，顺天揆事，创制立度，以尽天下之务，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尝考朱熹之训曰：道犹路也，法犹度也。董仲舒亦曰：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谓之路，则可见其为人之所共由；谓之度，则可见其为人之所当守。是二者，理与事有精粗之异，而本与末亦若二致焉。岂可以无别乎？圣策所谓名义之攸在者，盖如此。然孟子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颢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胡宏又曰：道德者，法制之隐；法制者，道德之显。有道德以结民而无法制者，为无用，无用者亡；有法制以絷民而无道德者，为无体，无体者灭。是其本末虽有先后之殊，而显微则无彼此之间也。岂可以偏废乎？圣策所谓序之相须者，盖如此。

古者圣人迭兴，皆天所命。帝莫过于尧舜，王莫过于禹汤、文武。其道与法垂之古今，如日中天而昭示无极，如水行地而泽润不穷。功化之美，又孰有加于是乎？圣策首询乎此，臣有以知陛下嘉尧舜、禹汤、文武之治，而能自得师矣。臣请稽诸经传而陈其大，可乎？

尧之明峻德，以至于和万邦，舜之徽五典，以至于叙百揆。禹之敷命率常，汤之绥猷修纪，文、武之迪彝伦，建皇极。至若精一执中之授受，典礼损益之因革，此帝王之道也。是道也，大公而至正，尽善而尽美。不狃于功利之好，不牵于诈力之私。小自于一身，而冒于六合之大；近自于日用，而放乎四海之远。造端于愚夫妇所能，而极于天地化育之所不能。尽实行之，万世而无弊者也。

尧之历象授时，垂衣制品；舜之封山浚川，颁瑞考绩。禹之慎财赋，诒典则；汤之懋功赏，制官刑。文、武之奠丽陈教，列爵分土，至置封建、井田之制，学校、征伐之典。此帝王之法也。是法也，详为之虑，曲为之防。本诸身，徵诸庶民。法乎天时，因乎地利，合于人情，宜于土俗。当百世守之而勿失者也。

道以立其体而法以善其用，致治之盛万世如见，有由然矣。自是以降，若汉唐宋贤明之君，创业于前，守成于后，其道与法，固皆出于帝王。然徒窃夫秕糠之似而无其实，得夫糟粕之浅而失其真。虽有事功，不过小补。其孰能与于古哉？圣策继及乎此，臣有以知陛下陋汉唐宋于下风，而有所不为矣。臣请摭诸史册而陈其概，可乎？

汉高祖之豁达大度，孝文之清净玄默，唐太宗之聪明英武，玄宗之好贤乐善，宋艺祖之严重孝友，仁宗之温恭节俭，于道似有得矣。然而杂霸术，尚黄老；大纲不正，闺门惭德；仁厚有余，刚明不足：非帝王之所谓道也。汉之著律令，定税赋；唐之租庸调，府卫兵；宋之序资格，严科禁，其法似亦善矣。然而不事《诗》、《书》，礼文多阙；矜骋大之心，极奢侈之欲；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非帝王之所谓法也。盖斯道既微，法亦随变，治效之成，终不古若，何足疑乎？

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诞膺天命，扫除胡元，立帝王自立之中国，传帝王相传之正统，建极垂宪，诒谋万世。臣沐浴膏泽，尝窃窥一二，敢拜手稽首，为陛下陈之。敬天勤民，防非窒欲，身之修也。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家之齐也。君臣同游之盛，朝野画一之政，国之治也。武功以戡祸乱，文德以兴太平，天下之平也。我祖宗之道，非即帝王之道乎！六卿分治，庶僚承服，百职举矣。台谏以纠正于内，宪司以廉察于外，纪纲肃矣。车旗服物之有章，宫室器用之有等，制度一矣。学校选举之有修，兵刑财赋之有制，庶事康矣。我祖宗之法，非即帝王之法乎！自是以来，圣子神孙善继善述，不愆不忘，治化之成盖远过汉唐宋矣。而圣策复以治效未臻其极，夙夜兢兢，图光先烈为言者，此陛下圣不自圣，务欲福跻皇极，化协泰和，超千古而特出，跨百王而独盛也。臣愚，何足以知之？

臣窃以为，欲师帝王，先师祖宗。能行祖宗之道，则帝王之道在是矣；能守祖宗之法，则帝王之法在是矣。陛下大孝格天，至仁育物，谦恭逮下，明智烛微。日御经筵讲求治理，数召大臣咨询时政，所以行祖宗之道而守祖宗之法，盖无可訾议者。但近岁以来，灾异迭见，水旱相仍，而时雍风动之休未洽；黎民阻饥，赤子弄兵，而鼓腹击壤之谣未闻。夷虏跳梁，而军政未可谓修；府库告竭，而蓄积未可谓富。内

外臣工，率多因循苟且，取办簿书，廉靖之节日隳，华丽之风日长，而文武未可谓尽得其人。则圣策所谓行道守法，未尽古若者，臣不敢谓其不然也。

臣愚以为，陛下之德如是，学如是，虚怀望治之诚如是，以陛下而虑此，宜无足为者，但恐不加之意耳。夫道虽不一，其要在于修身；身有不修而妄意于蹴等之为，谓之能行道，不可也。法虽至繁，其要在于纪纲；纪纲有不振而疲神于不急之务，谓之能守法，不可也。然修身不外于威仪言动，而纪纲不外于举措刑赏。陛下诚能左之右之，周旋乎规矩准绳之中；一言一动，从容乎仁义礼乐之蕴，则道成于上而身修矣。身既修则家可齐，国可治，而天下可平，尚何祖宗之道有不行乎？举直措枉，必协乎天下之公论；赏善刑恶，不徇乎亵近之私情。法行自近，纪纲振矣。纪纲既振，则百职可举，制度可一，天下之事可兴，尚何祖宗之法有不守乎？如是，则俊良登崇而谗邪远，出入有度而财用足，武备修而蛮夷慑服，刑罚威而奸宄销亡。灾异息，灵瑞臻，而百姓安堵，民物顺达。治效之隆，岂不足并美于唐虞三代也哉！

虽然，此就陛下所以策臣者而言之尔，犹未要其极而举其全也。臣请究极本原，探索精微，以为终篇献焉。盖心之主宰一身，无事不体；而天之主宰万物，亦无往不在。天者，理之所从以出者。天之心与吾心之天，一也。是以帝王之道虽要于修身，而欲修其身必先于正心；帝王之法虽要于纪纲，而欲振纪纲惟在于顺天。不正其心，不顺乎天，则虽宵旰忧勤，思以行道守法，亦苟焉而已尔。

何谓正心？致知以明此心，诚意以实此心。声色货利之欲，此心之鸩毒，则远之；车马宫室之乐，此心之斧斤，则禁之。谄谀邪佞足以移此心，则斥之；便嬖近幸足以挠此心，则绝之。凡吾威仪言动之发，莫非自然，必使吾心泰而百体从令也，吾心大而万物咸备也。是之谓正心。何谓顺天？无贰无虞，曰上帝临女也；有严有翼，曰鬼神在旁也。匹夫匹妇勿谓可下，曰此天民也；一命一秩勿谓可忽，曰此天职也。创制立度，恐其悖天；撰事成务，恐其违天。凡吾举措刑赏之施，不敢自专，曰天命有德也，天讨有罪也。是之谓顺天。能顺天，则天与吾心为一，而吾心自无不正；能正心，则吾心与天无间，而于天自无不

顺。以是行祖宗之道，则道焉无弊而足以主张乎法；以是守祖宗之法，则法焉无失而足以经纶乎道。体无不立，用无不行，所谓光先烈而臻郅治者，惟陛下所欲而致之无难矣。如是，则君治教之责以尽，上天宠绥之命以凝，而磐石之宗，苞桑之业，岂不可以永保于亿万年而无虞也哉！

臣窃伏海滨，荷生成作养之德有年矣。平居所学，固不出乎道法之间。每念异日幸望清光，奉大对，期有所论列敷启，以尽责难之恭。而今也实其时也。顾臣草茅迂疏，不知忌讳，敢直述所见闻者如此。伏愿陛下留神澄省，果切于万分有一之用，俯赐采行，不胜幸甚。臣干冒天威，无任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有治理天下的重要本体，有治理天下的重要效用。本体是什么？本体就是大道。效用是什么？效用就是法度。大道植根在心中，这里法度得以确立的途径；法度施行到政务，这是大道得以行用的途径。确立法度而不符合大道，那么法度支撑的东西则没有本体；具有大道而不确立法度，那么治国的筹划就没有具体措施。二者都不能用来治理天下。然而有这大道，则法度能够确立，没有善于确立这种法度而不依据大道的情况；有这种法度，则大道能够行用，没有能行用大道却不明白守护法度的情况。大道行用并且没有弊端，法度确立并且能够守护，就推行不会不正确，付诸行动不会没有效果，对外没有击不退的敌人，对内没有不安定的民众，远方的人无不前来、近处的人无不顺服。端身拱手坐在朝廷上，掌握运用有张有弛，所指向的地方都称心如意；运用于全国上下，统一融洽，贯通透彻，所有地方都符合准则。国家的政治怎么还会比不上古代呢！帝之所以能称为圣帝，王之所以能称为圣王，我朝太祖皇帝之所以能开国创业，各位先帝之所以能继承祖先大业，其原因，都不会在运用大道与法度之外。汉朝、唐朝、宋朝的那些君王，依据的不是真正的大道，建立的不是真正的法度，他们治理国家的功效不能比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兴盛，又哪里值得奇怪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有上天在启迪您的圣明，道德学问每

天都有进展，盛大的教化神妙得很，远近协和，政治达到顶峰，神灵享受祭品，上下通彻。所谓学习古人的教导而有收获，借鉴已有的法则而不犯错误，在这方面十分卓绝，足以光大前朝，造福后人。这次开设科举，选拔人才，亲临朝廷，下达圣明的策问，其中还说治国成效没有达到极限，而诚恳地询问如何行用大道，守护法度。臣下我虽然十分浅薄，但怎能不受鼓舞感动，渴望竭尽全力，忠心耿耿地回答、宣扬陛下的美好诏令呢！

我个人在想，上天生育万物而不能亲自管理，因而任命圣人代理。所以《尚书》说：上天佑助天下百姓，为他们立君主、立师长。只有君主、师长能辅助上天，安抚天下。上天将一个人立于万民之上，并且将君主、师长治理、教化的责任托付给他，真是既伟大又艰难啊！要尽到这个责任，以便不辜负上天的任命，离开了大道与法度还能凭借什么呢？因此修养身心，整顿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就是治国大道。大道是治国的本体。建立纲纪国法，分设确定百官的职责，顺应上天统筹事物，创立制度，做好天下的一切事务，就是治国法度。法度是大道的实施运用。臣下我曾考证朱熹的教导，说是大道如同途径，法度如同准绳。董仲舒也说：大道所必须按照去做的，恰恰是适合治国的途径。把道称为途径，则可以看出大道是人人应当经过的地方；把法度称为准绳，则可以看出法度是人人应当遵守的东西。这二者，在事理与事情上有精确与粗糙的差异，在根本与末节上也似乎有不一致的地方。怎么能够不作区别呢！陛下策问所说的名义所在，应当是这样的。然而孟子说过：光是个好心，不能够治理天下；光是个法度，不能够自动推行开。程颢说：必须具有《关雎》、《麟之趾》诗中所吟咏的教化大行的心意，然后才能够行用《周礼》中所记载的法度。胡宏又说：道德是法律制度的内在精神，法律制度是道德的外在表现。有道德团结人民却没有法律制度，属于没有效用，没有效用就会灭亡；有法律制度管理人民却没有道德，属于没有本体，没有本体就会灭亡。这样看来，根本与末节虽然有先后的不同，但形式与内容却不能彼此分开。怎么能够有所偏废呢！陛下策问中所说的施行秩序互相依赖，应当是这样的。

古代的圣人轮流地出现，都是上天的任命。在天下称帝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唐尧、虞舜，在天下称王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武王，他们治国的大道与法度从古代流传到今天，如同太阳当空，光芒四射而没有终极，如同江河纵横，滋润大地而不会穷尽。这样美好的功德又有什么还能超过的呢?陛下策问首先便询问这方面，臣下我因此知道陛下赞美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武王的治绩，并已从效法他们当中自有所得了。臣下我请求查证各部儒家经典并陈述其中的重要方面，可以吧?

帝尧宣明自己高到天边的仁德，以至于使天下和睦；帝舜完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理道德，以至于使所有的政事井井有条；夏禹传播文德教化，遵循伦理纲常；商汤稳妥定立教化方法，修明人伦准则；周文王、武王启用天地人的常理，建立君主的法则。至于精诚专一、执守中正之道的承接传授，典章礼仪制度增减变化的承袭和创新：这些都是帝王之道。这种帝王之道，大公无私并极尽纯正，尽善尽美；不被追求功利的嗜好所束缚，不被武力讹诈的私欲所牵累。细小到帝王自身一个人，却能覆盖到整个天下。近切到日常应用，却能传播到遥远的四海辖区。从普通夫妇所能做到的为起点，以天地教化养育有所不能做到的为终点。一切都实行了帝王之道，千秋万代不会有弊政。

帝尧推算天象变化的规律，告诉人民天时节令，无为而治，创造器具；帝舜在名山筑坛祭天，疏通河流，向诸侯颁发玉圭信符，考察政绩；夏禹慎重地规定财物赋税的多少，给后代留传下典章法则；商汤大力封赏有功人员，制定惩戒官吏的刑法；周文王、武王制定法律，发布教令，设列爵位，划分辖区，一直到设置分封诸侯制度和井田制度，以及学校、征战讨伐的规章。这些都是帝王的法度。这种帝王的法度考虑得特详尽，防范得特周到；以自身为本，验核到人民；效法天时，顺应地利；符合人之常情，适应各地风俗。应当世世代代都遵守而不能丢掉。

依靠大道作为本体而将法度妥善运用，实现天下大治的盛况，万代都能看见，这确实是原因的。从此以后，像汉朝、唐朝、宋朝的贤明

君主，有的创业在前，有的守成于后，他们的治国大道与法度原本都出自古代圣王。但只是偷学到外表相似而没有学到实质，获得了肤浅的糟粕而丢掉了真正的精华。虽然创建了事功，却不过是小小的补益，他们有谁能与古代圣帝明王相提并论呢？陛下策问接下来就涉及到这个问题，臣下我因此知道陛下鄙视汉唐宋，把它们列为下等，不愿意仅像它们那样去做。臣下我请求摘录史书中的记载并陈述它们的大概情况，可以吧？

汉高祖心胸开阔，度量大，汉文帝清静无为，唐太宗聪明又英迈威武，唐玄宗喜爱贤能和良善，宋太祖严肃庄重，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宋仁宗温和、恭敬、节俭。他们在大道上面似乎都得到了什么。然而汉朝杂用霸术，崇尚黄老思想；唐朝大纲不端正，后宫道德亏欠；宋朝忠厚仁爱有余，强硬明断不足。这都不是帝王所讲论的大道。汉代编著法律条文，确定赋税数额，唐代实行租庸调制和府兵制，宋代制定官员的资格秩序，强化法律条令。这些法度似乎也都是挺好的了。然而汉朝不重视《诗经》、《尚书》，礼仪制度大多欠缺；唐朝抱住好大喜功的思想，极尽奢侈享乐的欲望；宋朝礼仪盛大而武力衰弱，议论的事多而取得的成功少。这都不是帝王所说的法度。原因在于治国大道已经衰微，治国法度也随着改变，治国成效最终比不上古代圣王，哪里还值得怀疑呢？

恭敬地想来，我朝太祖高皇帝接受上天之命，扫除元朝，重建帝王自古创立的中国，承传帝王自古相传的正统；建立最高准则，留下法度，谋略传给万代。臣下我沐浴在朝廷恩惠下，曾私下观察，略知一二，敢跪拜为陛下陈述。敬顺上天，勤劳为民，防备过失，堵塞私欲，就是修养好身心了；后宫中没有自己所偏爱的嫔妃，身边左右没有得到特殊恩赏的下人，就是整治好家庭了；君臣之间共同交流学习的盛况，朝廷内外统一施行的政务，就是治理好国家了；用军事力量平定祸乱，用文德教化兴建太平，就是天下取得太平了。我朝祖宗的治国大道，不就是古代帝王的治国大道吗！六部尚书分别管理各自的事务，众多的官僚顺从执行，百官的职责就都履行了；都察院和谏官在朝廷内纠正过失，监察御史在朝廷外调查考核，纲纪法制就严肃

了;车、旗、衣服、物品的使用有标志,宫室器具的使用有等级,礼仪制度就统一了;学校和选举有规章,用兵、执刑、理财、征税有制度,各种政事都安康了。我朝祖宗的治国法度,不就是古代帝王的治国法度吗?从此以后,圣明的继位子孙完好继承,妥善遵循,没有差错,没有遗漏,政治教化的成功远远超过了汉朝、唐朝、宋朝。但陛下策问中还在说:治国成效没能达到顶峰,从早到晚小心谨慎,思考光大祖先的业绩。这是陛下圣明却不自以为圣明,一定要使福禄登上最高准则所要求的境地,教化协调,太平和乐,超越千古而特别突出,跨越百王而独显伟大。臣下我愚笨,哪里能够懂得这一切呢!

臣下我私自认为,要效法古代圣王,先效法祖宗。能够施行祖宗的治国大道,则古代圣王的治国大道就在其中了;能够遵守祖宗的治国法度,则古代圣王的治国法度也在其中了。陛下的孝德感通上天,用最仁爱的心养育万物,谦虚恭敬以至于扩及下方,英明智慧能洞察隐微。按时亲临研读经史的讲席讲论寻求治国的道理,常常召集大臣咨询现行的政务,施行祖宗大道和遵守祖宗法度,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近年来,上天显示的异常现象接连出现,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因而时世安定太平、天下四方响应的美好景象还不普遍;百姓困苦饥饿,民众武装起义,因而"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歌谣听不到。边区部族强横,军事事务不能称为修明好;国库报告财物用尽,储备积累不能称为丰富。朝廷内外的群臣百官大多因循守旧,得过且过,按文件办理官署事务,廉洁恭敬的节操日益毁坏,追求华丽的风气日益增长,而文武官员不能说全部得到了合适的人选。这样看来,陛下策问中说到的情况:施行治国大道与遵守治国法度,还不能完全和古代一样,臣下我不敢说不是这样的。

臣下我愚笨地认为,陛下有如此的道德,如此的学问,敞开心怀,渴望天下大治,又是如此的真诚;凭借陛下的这些条件而去思考这一问题,应当是完全能办到的,只恐怕不多加注意罢了。治国大道虽然不只一方面,但关键在于修养身心;不修养好身心而妄想超越修、齐、治、平的固有顺序而有所作为,说是能施行治国大道,这是不可能

的。治国法度虽然繁多,但关键在于建立朝廷纲纪;不能振作起朝廷纲纪而伤精费神于次要的事务,认为说是能遵守治国法度,这是不可能的。然而修养身心不会超出威严、仪表、言论、行动之外,朝廷纲纪不会超出人事安排、刑罚奖赏之外。陛下确实能够把握住它们,按照原则准绳运用,一言一行从容不迫,凝聚着仁义礼乐,那就治国大道在上面形成而身心得到修养了。身心得到修养,则家庭能够整治,国家能够治理,而天下能够太平。祖宗大道哪里还会得不到施行呢?提拔正直的人,把他们安排在邪僻人的上面,一定与天下公论协和。奖励美善,惩罚奸恶,不能顺从亲近的私情。治国法度从身边开始执行,朝廷纲纪就会振作了。朝廷纲纪振作了,百官职责就可以履行,制度可以统一,天下的政事可以兴盛。祖宗法度哪里还有得不到遵守的呢!像这样,那么俊杰忠良受到提拔尊崇而谗言邪僻受到疏远,收入支出有标准而财富费用充足,军备加强而周边部族惧怕顺服,惩罚严厉而奸邪不正、犯法作乱之徒减少消亡,天上异常现象熄灭,福兆祥瑞频繁出现,百姓安居乐业,人民万物通畅。治国成效的兴隆,怎么不能和唐尧、虞舜、夏商周一样美好呢!

虽然这样,但这只是按陛下所策问臣下我的问题来论说罢了,还没能探求出根本,列举出全貌。臣下我请求穷尽来源,探索精妙,作为全文的结尾来献上。心主宰整个身体,没有事情不体悟;上天主宰天下万物,无时无处不存在。天是理产生的源头,天之心与我心中的天相一致。因此,帝王大道虽然关键在修养身心,但修养身心必须首先使心正;帝王法度虽然关键在朝廷纲纪,但振作起朝廷纲纪只在于顺应天。不能使心正,不去顺应天,那么即使从早到晚忧虑勤劳,想着要施行帝王大道,要遵守帝王法度,也只能是随便应付罢了。

什么叫做正心?靠获取知识使心明白,靠诚意使心充实。音乐女色、财物利益之类的欲望,是危害这颗心的毒酒,则应疏远;乘车骑马、兴建宫室之类的享乐,是伤害这颗心的斧头,则应禁止;谄言阿谀、邪恶奸巧的人足以动摇这颗心,则应排斥;靠阿谀奉承获取宠信的人足以扰乱这颗心,则应断绝。凡是我所表现出来的容貌举止、言论行动没有任何一处不自然,必然能够让我的心通畅安宁,而身体各

个部位都顺从命令，我的心宏大而万事万物都能具备。这就叫做正心。什么叫做顺天？不会三心二意，不会畏缩恐惧，要说上帝在天上监督着你；既威严又整齐，要说鬼神在身边伴着你；不要认为普通百姓卑贱，要说他们是上天的子民；不要认为可以忽略一道任命、一个级别，要说这是上天交给的职位。创立制度，恐怕背离天意；考虑事情办成事务，恐怕违反天意。凡是由我决定的人事安排和刑罚奖励，都不敢自我专断，要说这是上天任命有德之人，上天声讨有罪之人。这些就叫做顺天。能顺应天，天就与我的心合为一体，而我的心自然没有不端正的；能正心，我的心就与上天没有隔阂，而对天自然没有不顺应的。依靠心正、顺天去施行祖宗的治国大道，治国大道就没有弊端并能够支撑起治国法度；依靠心正、顺天去遵守祖宗治国法度，治国法度就没有失误并能够筹划如何运用治国大道。本体全都确立，效用全都施行，所讲的光大祖宗功业和实现天下大治，只管陛下随心所欲而不难达到。像这样，那么君主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职责可以尽到，上天交给的爱抚安定天下的使命可以完成，而国家坚如磐石，事业根基稳固，怎么不能够永远保有到亿万年并且没有忧患呢！

臣下我个人隐居在海边，承蒙朝廷生养、抚育的恩德已有多年了。平时所学习的东西，原本就不越出治国大道与治国法度之外去，常常希望有一天能有幸看到陛下的风采，恭敬地接受最重要的策问，盼望能有所议论评定和陈述，以便尽到孟子所说的用难事勉励君主的那种恭敬。而现在确实正是这种时机，只是臣下我是平民百姓，迂腐疏阔，不懂忌讳，敢如此冒昧地直接陈述自己的见闻，恭敬地希望陛下费心纠正检查。果真有万分之一能适用，屈尊下令采纳施行，就无限荣幸了。臣下我冒犯天子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文明元译〕

董玘　殿试对策

董玘(1483～1546)　字文玉，号中峰，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弘治十八年(1505)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时年23岁。后官至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学士。曾预修《武宗实录》，对其中变乱是非不可信之处，特奏请改定，获得士林好评。进讲经史，亦持正论。有《中峰文选》行世。

臣对：臣闻圣人之御天下也，有致治之本，有辅治之具。盖道者，治之本也，而辅之必有其具。法者，治之具也，而出之必有其本。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无者也。创业者必兼得之，而后可以裕后昆；守成者必克全之，而后可以光前业。然是二端，又皆原于心焉。心存则自身而推者皆为道，因事而制者皆为法，而二者兼尽矣。心不存则道有未纯，法有未备，而二者胥失矣。道法兼尽，此唐虞三代之盛治所以不可及也。得其一而有未纯未备焉，此汉唐宋之治所以不古若也。然则今日欲治效之臻其极，固不出乎道、法二者之间，又可不先存其心以为之主哉！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人之德，居圣人之位，仁育义正而道成于上，纲举目张而法布于下。治化之盛，固已不愧于古矣。兹复廷集多士，以道与法为问。顾臣愚陋，何足以仰副渊衷？虽然，陛下之设此举，盖将采而行之，非虚循故事而已也。苏轼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矧今陛下以实求之，臣敢无辞以对乎！

臣惟古昔帝王，膺天命之重，御天下之广，以成己成物之责，萃于一身，而不可虚居也。故必尽道，以端天下之表，以立斯人之极。道既成矣，犹虑事无定则，人无定守，而斯道之行无以遍天下、及后世也，故又立法，以尽天下之事，以防天下之情。人君为治之大端，惟此二者而已。

何谓道？治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皆是也。何谓法？建立纪纲，分正百职，顺天揆事，至于创制立度，尽天下之务，皆是也。道者法之体，所谓致治之本也；法者道之用，所谓辅治之具也。其名义之攸在，固有别矣。而行之之序，则有相须而不可偏废者。盖道必先定，然后法有所措而可立；法必大备，则其道有所辅而可久。苟惟致详于法，而无道以为之本，则其具徒张，而无益于天下之治。然或徒恃其道，而无法以为之具，则其本虽立，亦何以成极治之功哉？孟轲曰：尧

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言道之不可无法也。程颢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言法之不可无道也。臣请证古人之迹。

夫帝之圣者，莫过于尧舜。王之圣者，莫过于禹汤文武。其为道为法，各极其至。以其道言之，如克明峻德，慎徽五典，肇修人纪，建其有极，道之行于身也。惇叙九族，克谐以孝，时庸展亲，刑于寡妻，道之施于家也。平章百姓，庶明励翼，德降国人，化行江汉，道之行于国也。协和万邦，孝讫四海，克绥厥猷，丕单称德，道之极于天下也。

以其法言之，如历象授时，璿玑齐政，颁朔授民，顺时行令，此顺天之法也。百揆四岳，统理于内，州牧侯伯，分列于外，此命官之法也。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乡遂用贡，都鄙用助，此养民之法也。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此教民之法也。

当是之时，黎民敏德，万国咸宁，人人有君子之行，比屋有可封之俗。五刑措而不用，兵革橐而不试。山川鬼神莫不宁，鸟兽鱼鳖罔不若。其治效之隆如此，岂无自哉？盖其所以为治者，皆本于心。观夫《诗》、《书》之所称，曰钦明，曰精一，曰祗德，曰懋敬，曰敬止，曰执竞。是其心之所存，纯乎天理而绝乎人伪，故道由此行，法由此立，二者兼尽而治化自隆也。

自是而降，享国久长者，莫如汉唐宋。然其为治也，皆不能兼乎道、法之全。以汉言之，创业如高、光，守成如文景、明章，皆贤君也。观其发义帝之丧，戮丁公之叛，尊礼太公，孝养薄后，大封同姓，痛泣同气，其大纲之正，亦庶乎治之道矣。然庶事草创，礼文多失，语井田则未复，语官名则未定，而于先王为治之法，皆阙乎其未之讲，况其所谓道者，又多出于驳杂，其能如王道之纯乎？

以唐言之，创业如太宗，守成如玄宗、宪宗，皆贤君也。观其以尊本任众，以职事任官，以府卫任兵，以租庸调任民。考课有四善二十七最之详，致刑有三覆五覆之奏。其万目之举，亦庶乎治之法矣。然胁父起兵，戕兄攘位，麾聚渎伦，牝晨司祸，而于先王为治之道，则概乎其未之闻。况其所谓法者，又多益以己意，其能如王制之备乎？

以宋言之，如太祖、太宗之创业，真宗、仁宗之守成，皆贤君也。

观其分灸艾之痛，守金匮之盟。忠厚以立国，而刑不加于士夫；严肃以治内，而事不委于戚畹。其为道亦有可称者，然制度之立，颇因五代之旧。官名屡易，而违六官分治之典；审官有院，而无三考黜陟之严。兵虽有三衙四厢之制，而失寓兵于农之意；刑虽有折杖覆讯之法，而失宥过刑故之规。其能如先王经制之善乎？

故其致治之效，止于海内殷富，黎民醇厚，而礼文则未兴；仅致斗米三钱，外户不闭，而风俗则未美。虽有声名文物之盛，而国势常削弱不振。是岂先王之治，卒不可复哉？盖自汉以来，心学失传，或不事《诗》、《书》，或学尚黄老，或性多褊察。欲行仁义者，或渐不克终；仁厚有余者，或刚断不足。是皆任其资以为治，随其世以就功，而于先王之道、法，或得其一而遗其二，或得其似而失其真。治化不能复古，无足怪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之初，正己以建极，稽古以垂宪，致治之道，辅治之法，真可谓一洗汉唐宋之陋，而上继乎唐虞三代之盛矣。臣请举一二为陛下陈之。《御制大诰》，申明五常之义；《资世通训》，弘敷礼义之教。《祖训》所载，无非修身齐家之方；孝慈有《录》，一皆天理人伦之正。我圣祖之道，即帝王之道也。《大明日历》，具载一代之法程；《洪武政记》，动契千古之典则。诸司有《职掌》，得虞廷任官之意；礼仪有《定式》，同《周礼》防僭之严。我圣祖之法，即帝王之法也。列圣相承，践修厥猷，而圣祖之道行之不息，克笃前烈，而圣祖之法守之无弊。

陛下莅阼以来，昧爽丕显，惟道是由，甲夜视事，惟法是践。经筵所讲，谆谆乎仁义之言；《会典》之修，凿凿乎典章之实。是以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朝廷清明，四方无虞。治平之效，诚有非汉唐宋之所能及者。陛下犹谓治效未臻其极，而疑道有未行，法有未守，抑行之守之，而未尽若古。此固陛下惟日不足之心也。虽然，臣尝窃伏草茅，念天下之事，有慨于心久矣。今幸承明诏，言及之而不言，是负所学，是负吾君也。臣请言未行未守之端，而后及行之守之之说。

夫京师，诸夏之本，密迩道化，是宜遵道遵路而有时雍之休也。今臣应试而来，窃见风俗偷薄，习尚浮靡，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德色

谇语,尚形于父母;剭帘剽金,每肆于白昼。或有如贾谊之所虞者。京师且然,况四方之远乎?我祖宗却异味,服浣衣,允迪厥德,以先天下。当此之时,五典克从,百姓相亲,俗尚纯朴,无敢自蹈于非彝者。校之今日,大有不同。然则祖宗之道未能尽行者,亦容或有之矣。内外职司,大小之事,具有成法。以臣观之,其名固如旧也,而其实则或已亡矣。如征敛有则,定差有等,此赋役之法也。今或脱丁以逃役,诡籍以避征。军必服伍,将必择才,此兵卫之法也。今或离行伍而受役于私门,窃首级而列职于边阃。铨选之法,不拘流品,惟功与贤。今亦有无功而进,非贤而授者矣。断狱之法,必罪与律协。今亦有无辜而戮,有罪而贷者矣。然则祖宗之法,臣亦未敢谓其能尽守也。即此推之,则治效之未臻其极,有由然矣。

陛下欲天下之极治,亦岂必他务哉?惟行祖宗之道,守祖宗之法而已。然世之进言于陛下者,不过曰道之未行,教训之未至也,亦申严之而已矣。法之或弊,有司之不能守也,亦戒饬之而已矣。臣窃以为,此皆其末也。欲行祖宗之道,守祖宗之法,惟在陛下之身焉。盖道成于己,而后及乎人。教训虽严而身无以率之,则所令反其好,而民不从矣。故董仲舒推《春秋》谓一为元之意,以为视太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臣愿陛下章志以示民,贞教以率下。言行,道之发也,必谨之而不苟;威仪,道之显也,必正之而不忒。宫壶,道之所自始也,必敦刑家之化;朝廷,道之所自出也,必谨守正之规。由是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举而措之,无弗顺者。夫何患道之有未行乎?

法行于上,而后遵于下。若徒戒饬所司,而身之所行,乃或有自挠其法者,则臣下将师师无度矣。故傅说之告高宗曰: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惟说式克钦承。臣愿陛下毋忘敬忌之念,益弘笃叙之图。出一大号也,则曰:于旧法得无少变乎?行一细事也,则曰:于旧法得无有戾乎?喜有赏,怒有刑,苟违于法,则遏之而不行。言有逆耳,事有忤旨,苟当于法,则从之而不挠。由是内而百司,外而庶府,罔不翕然承德,而无或敢乱其法者。又何患法之有未守乎?

夫能行祖宗之道,则不必别求古帝王之道,而所以为致治之本者

立矣。能守祖宗之法，则不必远慕古帝王之法，而所以为守治之具者备矣。而何一不由于陛下之身邪？且心也者，一身之主宰，万事之本根也。陛下欲行道而守法，则古帝王与祖宗之心学，其可以不之讲乎？盖道者，心之蕴也；法者，心之著也。存心之功一有所间，则虽欲行道，而私或得以胜理；虽欲守法，而欲或至于败度。其何以成天下之治哉？臣尝窃闻我圣祖之谕侍臣有曰：人之一心，检持甚难。朕觉此心如两敌然，时时防斗，尚未能也。则平日存心之功，无一息之间，盖可见矣。至如亲注《周书》之《洪范》，类编心学之《心法》，皆所以求正心之方。画君臣行事于壁间，书《大学衍义》于两庑，亦所以为存心之助。盖帝王相传之心学，至我祖宗而复续，诚圣子神孙之所当取则也。

陛下深处法宫，所以用力于心学者，臣固不得而知。然窃见行道守法之间尚有可议者，意或于理欲危微之辨尚有未精，操舍出入之间尚有未定，而忠佞顺逆之言尚不能无惑欤？臣愿陛下于退朝无事之时，不以为可忽而居之必敬；念虑方萌之际，不以为莫觇而察之必严；纷华波动之顷，不为其所引而操之必定。古训圣谟可以沃此心，必讲明而力行之；正人端士可以养此心，必亲近而薰灸之；便僻之流、怪诞之术足以惑此心，必深恶而屏斥之。内外交致其力，显微不间其功，使此心本然之体无时而不存，应用之机无发而不当。则运用于一身者，无非不道，而有以为致治之本。经纬于万几者，无非不法，而有以为辅治之具。将见百姓大和，四海永清，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功可以光祖宗，业可以垂后裔，治可以配古帝王之盛矣。伏惟陛下采而行之，天下幸甚。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人统治天下，存在着实现大治的根本，存在着辅助治理的措施。大道就是治理的根本，但辅助它一定要有相应的措施；法度就是治理的措施，但拿出来一定要有主宰它的根本。这两个方面，是应当相互具备而不能彼此缺少的。创立国家基业的君主必须把这两方面都获取到，然后才能给后代留下很大的回旋余地；守护已有成就的君主必须把这两方面都保全住，然后才能发扬

光大前辈的功业。然而这两个方面，又都来自君主的心念。心念留存，从本身加以推演的东西，就都属于大道；根本政事而制定的东西，就都构成法度，于是这两个方面就都做到家了。心念不留存，大道就会出现不纯正的情况，法度就会产生不完备的地方，而这两个方面就都丧失掉了。大道和法度都做到家，这是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盛大治绩无法赶得上的原因。仅仅获取到一个方面而存在着不纯正、不完备的地方，这是汉朝、唐朝、宋朝治绩比不上古代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如今想让治理的效果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压根就不能超出大道和法度这两个方面之间去，又能不首先留存住心念，把它作为主宰吗？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凭借圣人的德行，占据圣人的大位，用仁德来化育，用正义来纠正，而大道在上面形成；纲领牵挽起来，细目张布开，而法度在下面施布。治理和教化的隆盛，原本上就已经在古代面前没有让人感到惭愧的地方了。如今又在殿廷上会集起众多的读书人，用大道和法度进行询问。但臣下我很愚昧，很浅陋，哪里足以往上符合圣上的深沉用心呢？尽管如此，陛下采取这一举动，是准备采择并行用它们，并不是表面上按照惯例走走形式就算完事了。北宋苏轼有句话说过：君主用名义来求取，臣像拿实际来回应。何况如今陛下是用实际来求取，臣下我胆敢没有话语来对答吗？

臣下我想来，古代的帝王承当上天把统治权交付给自己的重任，驾驭广大的天下，由于成就自身、成就万物的责任都集中在本人头上，不能白白占据君位，所以必定要彻底行用大道，来给天下做出行为表率，来确立世人的行为最高准则。大道已经形成了，还担心政事没有固定的规矩，世人没有固定的守则，而这种大道的行用没办法遍布天下，延及后世，所以又定立法度，来做好天下的一切事情，来防范天下的私欲。君主进行治理的主要方面，只有这两个方面罢了。

什么叫做大道？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一直到治理好国家，使天下太平，都属于大道。什么叫做法度？建立起朝廷的纲纪，划分并明确百官的职责，顺应上天来考虑政事，一直到创立各项具体制度，把整个天下的问题一个又一个解决好，全都属于法度。大道是法度

的本质主体，也就是所说的实现大治的根本。法度是大道的实施运用，也就是所说的辅助治理的措施。它们的名称和涵义的所在，原本上是具有区别的了。但行用的顺序，还存在着相互依赖而不能废弃掉其中一个方面的情况。因为大道必须首先确定下来，然后法度才有所措置，能够定立起来；法度必须非常完备，大道才会有所辅助，能够长期坚持住。如果只是在法度上使它特详密，而没有大道作为它的根本，那就会各种措施白白施展开，对天下的治理并没有什么益处。然而有的只是依仗那大道，却没有法度作为它的施用措施，那就会根本虽然确立起来了，但通过什么去成就最佳治理的功业呢？孟子说过：尧舜的大道，不通过仁政，就不能平定和治理天下。这是强调大道不能离开法度啊！北宋程颢也说过：必须具有《诗经·关雎》篇和《麟之趾》篇所歌颂的教化大行、王族忠厚的意向，然后才能够行用《周礼》所制定的法度。这是强调法度不能离开大道啊！臣下我请求验证古人的行迹做番陈述。

称帝天下而最圣明的人，没有谁还能超过尧和舜的了。称王天下而最圣明的人，没有谁还能超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了。他们行用大道，定立法度，各自都达到了最高的境地。拿他们行用的大道来说，能够宣明到达天际的德行，谨慎地使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种道德规范变得更美好，开始修明人伦纲常，建立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大道在他们自己身上来行用的表现。使九辈亲属变得淳厚而有上下次序，凭借孝敬来使原来势不两立的父子、母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变得和谐，用诚信来表示重视亲族的情义，给妻室做出效仿的榜样。这是大道在他们家族中来行用的表现。辨别清楚各个族姓，众多的贤明人勉力来辅助，仁德施布到京师居民的心中，教化推广到汉水地区。这是大道在本国行用的表现。使各个邦国和睦相处，声名教化延及到四海以内，能够实现安定民众的谋略，把德业显扬得广大全面。这是大道在天下行用到极点了啊！

拿他们的法度来说，观察天象的运行情况，向民众颁布历法，观测北斗七星的变化规律，来协调好四季和天、地、人的政务。宣布每月初一是哪天，让民众都清楚，随顺季节，按时令从事生产等各种活

动。这是顺应上天的做法。负责各项政事的百官和四方诸侯之长,在朝廷上统领处置;十二州的长官和各处的首领,在地方上分布设列。这是任命官员的做法。水、火、土、金、水和谷物的储存,都大力得到整治,各处的土地都勘定出土质的好坏,距离都城较近的乡、遂采用向王室贡纳实物的赋税制度,距离都城较远的采邑封区实行助耕公田的赋税制度。这是养护民众的做法。在基层居民点设有教室,在由五百家组成的"党"一级单位内设有名为"庠"的学校,在由一万二千五百家组成的"遂"一级单位内设有名为"序"的学校,在国都设有国家最高学府。这是教化民众的做法。

正当这个时期,众百姓勉励自己的德行长进,各个邦国全都安宁,人人具有君子的行为,家家具有可以受到特殊表彰的习尚。刺面、割鼻、砍脚、破坏生殖器官和杀头的刑罚搁置起来不动用,各种武器都收藏起来不再练习,山川和鬼神没有不安宁的,鸟兽和鱼鳖没有不正常生存的。他们治理效果的隆盛达到了这种地步,哪里是没有来由的呢?因为他们进行治理,全都是依据心念。观看《尚书》和《诗经》所称述的,叫做恭敬圣明,叫做精心一意,叫做在德行上敬慎勤勉,叫做奋勉恭敬,叫做敬慎居止,叫做执守自强不息。这表明,他们心念所寄存的东西,纯粹都是天理,断绝了人的虚假情性。所以大道由此而行用,法度由此而定立,两方面同时达到了极点,治理和教化自然就隆盛了。

从此往后,享有国运最长的朝代,没有哪个再能比得上汉朝、唐朝、宋朝的了。然而它们进行治理,都不能兼具大道和法度的统一整体。拿汉朝来说,创建基业像汉高祖、光武帝,守护已有成就像汉文帝、汉景帝、东汉明帝和章帝,都是贤明的君主。观看他们为被项羽杀害的义帝举行葬礼,斩杀在彭城大战中私自放走汉高祖而项羽灭后又来拜见汉高祖的楚将丁固,尊奉生父太公为太上皇,孝敬地奉养薄氏皇太后,大规模分封同姓诸侯王,为因犯法而被处死的王侯骨肉兄弟痛惜哭泣。这表明汉朝总纲领端正,也差不多接近治国的大道了。然而各种政事粗疏简略,礼乐文教大多缺失。讲起井田制,却还没有恢复;说起职官名称,却还没有确定。对于古代圣帝明王进行治

理的法度，都丢在一旁还没去讲求。何况他们所说的大道，又有许多地方出自仁政夹杂着暴力，怎么能够像称王天下的大道那样纯正呢？

拿唐朝来说，创建基业像唐太宗，守护已有成就像唐玄宗、唐宪宗，都是贤明的君主。观看他们用崇尚农业生产来支配民众，用固定的职位和职责来支配官员，用各地折冲府和京师十六卫来支配军队，用租庸调赋役制度来支配百姓。对官员进行考核，具有德义传扬等四善和二十七类政绩第一级的详明标准，决定判处死刑具有三次复审、五次复审的奏报制度。这表明，唐朝各项政务张布开，也差不多接近治国的法度了。但胁迫父亲起兵反隋，杀死兄长夺得帝位，后宫乱伦亵渎纲常，后妃参政造成祸乱。对于古代圣帝明王进行治理的大道，一概还从来没让人听说过。何况他们所说的法度，又大多掺杂进自己的用意，怎么能够像称王天下的法度那样完备呢？

拿宋朝来说，像宋太祖、宋太宗创建基业，宋真宗、宋仁宗守护已有成就，都是贤明的君主。观看宋太祖为患重病的胞弟赵匡义亲自烧灼艾草，胞弟喊痛又把艾草取过来往自家身上烧灼，遵守按母亲遗嘱把帝位传给胞弟赵匡义的誓言。用忠诚仁厚支撑起国家，刑罚不对读书人使用。靠庄严肃正来管理后宫，政事不交给后妃家族的人负责。他们行用大道也有值得称颂的地方。但各项制度的定立，大多沿袭五代时期的老样子。官名屡次加以改换，违背了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分管事务的政典。审核官员设有审官院，但没有三年一考核决定升降或罢免的严格规定。军队虽然具有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和前后厢、左右厢的编制系统，但失掉了古代把士兵寄寓在农民中的用意。刑罚虽然具有把流放、徒刑改为配役并脊杖，把杖刑、笞刑改为臀杖并刑后释放，以及复审的方法，但失掉了古代宽恕过失犯罪、加重对惯犯惩罚的良规。这样一来，宋朝怎么能像古代圣帝明王那样法度完善呢？

所以汉唐宋实现治理的效果，也就局限在四海之内殷实富足，百姓淳朴厚道，但礼乐文教还没兴盛起来；只是做到了一斗米价格为三枚铜钱，大门在夜间不用锁上，但社会风气还不美好。尽管出现了声威和典章制度的盛况，但国势却常常处于削弱不振作的状态。这哪

里是古代圣帝明王的治绩到头来也无法恢复呢？这是因为从汉朝以来，心治大法的学问失去传承，有的君主根本就不理《诗经》、《尚书》那一套，有的君主在学术上崇尚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有的君主心性狭窄又苛察。打算推行仁德道义的君主，有的逐渐不能坚持到底。而仁慈宽厚又有余的君主，有的却刚强果断不足。这些都属于任从自己的天资来进行治理，随顺他那时世来取得成功，但对古代圣帝明王的大道和法度，却有的只是获取到了一个方面而漏掉了另一个方面，有的只是获取到了表面相像的东西而丧失掉了真实的东西。治理和教化不能够恢复到古代那样，就不值得责怪了。

只有我朝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在平定天下的初期，端正自己来建立起行为的最高准则，考察古代来给后世留下规章，有关实现大治的大道，辅助治理的法度，真真称得上是完全洗刷掉汉朝、唐朝、宋朝的浅陋，往上承接到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况了。臣下我请求列举一两点为陛下做个陈述。《御制大诰》，申明仁、义、礼、智、信的宗旨；《资世通训》，广泛扬布礼仪的教化。《祖训录》所载述的内容，没有一项不是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的方法；孝敬慈爱，编有《孝慈录》，全都是天理和人伦纲常的准绳。我朝圣明太祖的大道，也就是古代帝王的大道啊！《大明日历》，详尽记载整个一代的程式；《洪武圣政记》，每一举措都契合千古不变的规则。各个政府机构，编有《诸司职掌》，获得到虞舜执政时任命官员的本意。礼仪编有《礼仪定式》，与《周礼》防止逾越等级同样地严格。我朝圣明太祖的法度，也就是古代帝王的法度啊！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继承，实行并修明那个远大谋略，而使圣明太祖的大道行用起来不止息；能够志向扑在前代的功业上，而使圣明太祖的法度执守起来没有弊病。

陛下登上皇帝宝座以来，凌晨就起身，十分显赫，只是遵从大道；初更时分还在处理政务，只是践行法度。经史讲席所讲论的内容，对仁德道义的学说十分精熟；《大明会典》的修撰，对典章的实务十分确凿。因此在上面具有准则，在下面具有法度，朝廷清明，四方没有让人忧虑的事情。治国平天下的效果，确实存在着汉朝、唐朝、宋朝所不能赶上的地方。但陛下仍然认为治理效果还没达到极点，由此怀

疑大道存在着还没行用的情况，法度存在着还没执守的问题，或者是已经行用、已经执守了，但还没有全像古代那个样。这固然是陛下每天只知道不足的心思啊！尽管如此，臣下我曾经身在民间，私下考虑天下的事务，在内心产生感慨已有很长时间了。如今幸运地承奉圣明的诏令，能够言说这方面的东西却不言说，这是辜负了自己所研习的学说，也是辜负了自己的君主啊！臣下我请求言说还没行用、还没执守的几种情况，接下来再谈谈行用和执守的主张。

京师是整个华夏的根本，离道德教化最近，这就理应遵守王道、遵守王路而具有万分协和的美好景象。如今臣下我应试来到京师，私下看到社会风气苟且浇薄，习尚浮华奢靡。居民粗鲁奸诈，抗拒触犯特别强悍。自以为对人施有恩德的神色和谩骂的话语，尚且对父母还表现出来。割下门帘窗帘抢劫财物，常常在大白天放肆地进行。有的真像西汉贾谊所忧虑的那种情况。京师尚且还是这个样子，何况那遥远的各地呢？我朝祖宗不吃山珍海味，穿用洗过的衣服，确实遵循帝王的德行，给天下做出表率。正当这个时期，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种道德规范都能够顺从，百姓相互亲近，社会风气崇尚纯朴，没有敢自行陷入不符合常规的人。同当今做比较，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既然如此，那么，祖宗的大道没能完全行用的情况，也难免存在了。中央和地方机构的职责，大大小小的政事，本来都定有详尽完备的法度。依臣下我看来，名义固然还和从前一样，但实务有的已经不存在了。比如征收赋税具有固定的种类和数额，派定徭役具有标准，这是当初的赋役制度。如今有的设法逃脱掉丁夫身份来躲避徭役，把田产暗中转移到别人名下来逃避纳税。军士必须在编制单位里服役，将帅必须择用有才能的人担任，这是当初的军事制度。如今有的军士离开所在的编制单位去供有权势的人役使，有的斩杀平民冒充为敌军的首级而在边地将帅的位置上供职了。对官吏进行考核选用的制度，本来不限定类属和品级，只根据功绩和贤能。可如今也有没立功劳却得到提升、不属于贤能却授给官职的了。审判案件的制度，必须要罪行和法律相一致。可如今也有没罪却判处死刑、有罪却予以释放的了。既然如此，那么祖宗的法度，臣下我也

不敢就说能完全执守了。根据这种情况来做推断，治理的效果还没达到极点，也是有原因的了。

陛下打算天下达到最完美的治理状态，又哪里一定要到其他方面去下力量呢?只是行用祖宗的大道，执守祖宗的法度罢了!然而世上向陛下进献建议的人，不过是说些什么大道还没行用，这是因为教育训导还做得不够，只管申明和强化也就行了；法度有的地方出现弊病，这是由于各个政府机构不能够遵守，只管告诫命令他们也就行了。臣下我私下认为，这些建议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其实打算行用祖宗的大道，执守祖宗的法度，只在陛下自身哪!因为大道先在自己那里形成，然后才会传布给别人。教育训导虽然严切，可自身没办法做出榜样来，就会导致所要让人去做的东西同人们的喜欢对象形成对立，而民众就不顺从了。所以西汉董仲舒推究《春秋》，强调宇宙的元始状态就是经文中“元”字的涵义所在，认为应比照天地开辟、万物开始形成的时代去端正根本。《春秋》深入探求那根本，强调反过来应从尊贵的人首先做起。臣下我希望陛下彰明自己的志向来给百姓看，端正教化来给下面树立榜样。言语行为，这是大道的开端，必定要谨慎对待而不随意表现；举止威仪，这是大道的显现，必定要端正而不出现差错。后宫，这是大道所由起始的地方，必定要把给家族做出表率的教化进行得特淳正。朝廷，这是大道所由发出的地方，必定要谨慎对待执守中正的规则。由此端正百官去端正民众，端正民众去端正四方，无论措置到哪里，没有不顺从的。这还忧虑什么大道还有没行用的呢?

法度在上面实行开，然后下面才会遵守。如果光是告诫命令各部门，而自身实行竟然存在着自己扰乱法度的现象，臣僚们就会效仿榜样而没有标准了。因而当年傅说告诫殷高宗说：把先王的已有法度做为镜子，就永远不会出现过失，所以傅说我也能恭敬地承顺国王的意旨。臣下我希望陛下不要遗忘敬畏和忌讳上天的心念，进一步扩展那加厚和端正祖宗法度的筹划。发布一项重大的政令，就反问自己说：对旧有法度是不是稍微做了改变呢?施行一桩细小的事务，就反问自己说：对旧有法度是不是有违背呢?为某人某事感

到高兴要封赏，为某人某事感到恼怒要处罚，如果和法度相违背，就遏止住而不施行。言论碰到不中听的，事情遇到违反旨意的，如果同法度相符合，就听从而不阻止。由此朝廷上各个机构，地方上各个官府，全都不约而同地承奉圣上的德教，没有敢扰乱法度的人了。这还担心什么法度还存在着没执守的呢？

能够行用祖宗的大道，就不一定还要另外去寻求古代帝王的大道，用来构成实现大治的根本也就确立起来了。能够执守祖宗的法度，就不一定还要往远处去羡慕古代帝王的法度，用来构成保守治绩的措施也就完备了。但这哪一种不是来自陛下自身呢？况且心念是全身的主宰，是各种事情的本根。陛下打算行用大道，执守法度，那么古代帝王和我朝祖宗的关于心治大法的学问，哪里可以不讲求它呢？因为大道是心念的蕴积，法度是心念的显现。保存住心念的功夫一旦产生中断，那就即使打算行用大道，而私欲有的就得以胜过天理；即使打算执守法度，而欲望有的就会发展到败坏法度。这样还凭什么能形成天下大治的局面呢？臣下我曾经私下听说我朝圣明的太祖告诫身边的大臣说过这样的话：人的那个心念，约束保持住特别难。皇帝我觉得这心念就如同势均力敌的交战双方，时时防备和争斗，还不能决出个胜负来。这段话就表明，平常保存住心念的功夫，不能有片刻的中断，由此就可以大致看出来了。至于太祖亲自注解《尚书·周书》中的《洪范》篇，成祖按门类编辑有关心治大法的学问的《圣学心法》，都是用来求取那端正心念的方法。在墙壁上绘制君臣之间的往事，在东西走廊上书写南宋真德秀撰写的《大学衍义》，也是用来作为保存住心念的佐助。因为古代帝王递相传承的心治大法的学问，到我朝祖宗才重新接续上。这是圣明神异的子孙应当效法的啊！

陛下深处皇宫的正殿，在心治大法的学问上用气力的办法，臣下我压根就一点儿也不清楚。然而私下看到在行用大道、执守法度中还有可以议论的地方，想来或许是在天理与人欲、人心危险和道心隐微的察辨上，还有不太精详的地方；在操持住和舍弃掉、出来与进去之间，还有不固定的地方，而对忠直与邪佞、顺从与违逆的

言论还不能没有闹不清楚的吧?臣下我希望陛下在退朝无事的时候，不要认为可以忽视了，相反却居止一定要恭敬。在念头和想法刚萌生的时候，不要认为谁也看不见，相反却察辨一定要严切。在歌舞美女出现的一刹那,不要被她们所吸引,相反操持住本心一定要牢固。古代的训条和圣明的谋略可以滋润这心念，一定要讲论明白并大力实行。纯正的君子和端庄的读书人可以养护这心念，一定要亲近他们并借他们薰陶自己。讨好献媚的家伙和怪异荒诞的玩艺，足够用来迷乱这心念，一定要深深憎恶并排斥掉他们。内里和外部交相使用力量,明显处和隐微处不中断那功夫,使这心念的原本主体没有任何时候而不保存住，适应运用的机括没有发出去而不恰当的。这样一来，在自身所运筹施用的东西，就没有一样不是大道了，而确有依据地构成实现大治的根本;在各种政务上所做的部署安排，就没有一项不是法度了，而确有依据地构成辅助治理的措施。将会眼看着百姓特别地协和，天下永远地清平，各种象征福佑的事物，可以招致来的祥瑞，没有一样不全都来到，而功绩可以给祖宗增添光彩,帝业可以留传给后代,治绩可以匹配上古代帝王的隆盛景象了。跪拜只请陛下采择并施行它，天下就幸运极了。臣下我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辛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殿试策问

[正德六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创业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说也。然兵农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异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时,兵农之制起于何代?尝质诸古矣,《书》称尧曰乃武乃文,于舜称文明,禹称文命而不及武,于汤称圣武而不及文,周之谟烈各专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与焉。何也?汉、唐、宋之英君令主,或创业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备亦足以善治。论者又谓天下安,注意相。又谓天下虽安,忘战则危。是治兵之道,果与治民者同邪?异邪?

我太祖高皇帝,以圣神文武统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列圣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实由于此。然承平既久,玩惕乘之。学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业;蠲贷之诏屡下,而人多告饥。流徙之余,化为寇贼,以遗朕宵旰之忧。今赋税馈运,民力竭矣,而军食或尚未给;调发战御,兵之力亦劳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选举之制,黜陟之典,赏罚之令,亦未始不加之意也。兹欲尽修攘之实,谨恬嬉之戒,文治举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卫相养于无事之天,以保我国家久安长治之业。宜如何而可?子大夫志于世用,方策士之日,不暇以微辞隐义为问,姑举其切于时者,其为朕陈之。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好像牛骨象牙经过了加工,这句诗是说研讨学问啊!好像美玉宝石经过了制作,这句诗是说自我修养啊!

这种浩然之气是积聚正义所产生的,不是偶然做一件事符合正义就突击式地获取到的。行为出现自己心里感到不欢快的地方,这种气就没有力量了。

孔子学生德行美好的要数: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口才出众的要数:宰我、子贡。会处理政事的要数:冉有、季路。熟悉古代文献的要数:子游、子夏。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创建国家基业靠武力,保持已有的基业靠礼乐文教,前人有过这样的说法。然而兵士和农民在既定目标上相同,礼乐文教和武力道理一样。它们的用处果真存在着差异吗?礼乐文教和武力的区分最早出现在什么时候,兵士和农民的划定最早产生在什么朝代?曾经对古代的情况进行过验核了,结果《尚书》讲到唐尧,说他又能武、又能文;对于虞舜,说他文德辉耀;讲到大禹,说他有文德教命却没涉及到武力;对于商汤,说他圣明英武却没涉及到文德;周朝文王和武王的谋略与伟业,各自独占文、武中的一项。况且夏商周三代递相确立不同的崇尚目标,但都不说武力;周朝排列士、农、工、商这四民,而兵不在里面。这是为什么呢?汉朝、唐朝、宋朝的英明君主,有的用武力创建国家基业却兼顾到礼乐文教,有的用礼乐文教保持已有的基业却兼顾到武力,有的存在着礼乐文教和武力不全具备的情况,但也足以把国家治理得很好。讨论政事的人又说天下安定,要把精力投注到宰相的任用上。还说天下尽管安定,忘记战备就会很危险。这样讲来,治理军队的原则与方法,到底和治理民众的那套措施

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

我太祖高皇帝,凭借圣明与神妙、能文与能武,统一天下,设立职官,划分户口簿籍,各有固定的制度。依次继承帝位的我朝圣主递相沿袭,全都遵循这套原则与方法。一百五十年以来,统治确立起来,大功告成,实际上都由于这个缘故。但太平的时间既已长久,贪图安逸、荒废岁月的现象就冒出来了。学校的成规明明摆在那里,可读书人有的却丧失掉本业。免除赋税和赊贷钱粮的诏书多次下达,可人们还大多数说挨饿受冻。逃亡迁移的后面,就变成强盗,给皇帝我留下终日处理朝政还处理不完的忧虑。现今赋税和军粮转运,民力已经耗尽了,可军粮还没有供应充足。调遣征发,作战防御,军队的力量也很疲惫了,可百姓的祸患还没有消除。这也许是官员们不是那合适的人选吧?但选拔任用的制度,降职罢官和提升的典则,赏赐和惩罚的法令,也未始不对这些方面格外注意啊!如今准备完全彻底地做好修明内政、驱逐外敌的实事,严肃对待文官武将习于安逸享乐的戒饬,文治大见成效而武功告成,全天下的军队和百姓在太平无事的环境中相互保卫,相互养护,来保持住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基业。应当怎么办才行呢?你们这些士大夫一向有志被世上所起用,正当策试你们的时刻,朝廷没功夫拿精微的词句、隐含的义理作提问,姑且列举那些切中当今时世的重要事项,请你们替皇帝我陈述它们。

杨慎　殿试对策

杨慎(1488～1559)　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正德六年(1511)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明世宗嗣位,起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召为翰林学士。因议礼忤世宗,两受廷杖,谪戍云南永昌卫(今保山)。于书无所不览,好学穷理,老而弥笃。记诵之博,著作之富,为明代第一。有《升庵集》、《外集》、《遗集》及杂著多种。天启中追谥文宪。

臣对: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出治之全德,有保治之全功。文

武并用，出治之全德也；兵农相资，保治之全功也。于并用而见其同方，则天下之政出于一，而德为全德。如日月之在天，凡所以照临者，胥天之德也。于相资而见其一致，则天下之治出于一，而功为全功。如手足之在人，凡所以持行者，皆人之功也。由是联属天下，以成其身；纲维其道，以适于治。体统相承，而无偏坠不举之患；本末具备，而无罅隙可议之疵。放之四海而皆准，传之万世而无弊。帝王为治之要，孰有加于此哉！臣自少读帝王之书，讲帝王之道，窃有志于当世之事。然学焉而不敢言，言焉而不达。今幸近咫尺之威，立方寸之地，制策所及者，皆是道与是事也。臣敢不罄一得之愚，以为万分之助乎？

伏睹圣问首曰创业以武，守成以文，而又曰文武同方，兵农一致，果有异乎？臣惟三代以上，同一道也，戡乱则曰武，守成则曰文；同一民也，无事则为农，有事则为兵。初未始异也。在《易》明两作《离》，文明之象也；上九王用出征，有嘉。释之者曰：刚明及远，威振而刑不滥。斯不亦可见文武之同方乎！地中有水，《师》，师旅之象也。而释之者曰：伏至险于大顺，藏不测于至静。盖寓兵于农之意，斯不亦可见兵农之一致乎！是故一张一弛，号为善道；刚克柔克，协于皇极。

周公冢宰，实兼东征；毕公为公，亦总司马。武夫堪腹心之寄，吉甫有文武之称。以《天保》治内而未尝无武，以《采薇》治外而未尝无文。文武固未分也。自秦不师古，专以武勇立国，语《诗》、《书》者有刑，斩首级者进爵。民勇于战，皆忘生好利之人；士贱以拘，废干戈羽籥之习。至汉袭秦制，立丞相、将军，而将相之职异。唐宋以来，置中书、元帅、枢密，而军国之权偏。此文武之分，出于三代之后也。

成周之制，以田赋出兵。万井之田，出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一封之田，出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畿方千里，畿封方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自五人为伍，积而为两为卒；自五卒为旅，积而为师为军。天子之六卿六军，诸侯之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而降杀有等焉。一方有事，则命将出师。迨功成献俘，将归于朝，即守职之吏；兵散于野，即缘亩之农。兵农固未判也。至管仲相齐，欲速图霸业，乃坏周兵于内政。分国中以四乡，使国中之民为兵，鄙野之民为农，兵不服耒耜之勤，民不识干戈之具。以至句吴之君子，秦昭之锐

士,成周之制变易尽矣。此兵农之判于三代之衰也。

载质之《诗》、《书》所称,古之帝王,未有不兼文武之德,均兵农之功者。称帝尧者曰乃武乃文,四表之被即所谓文,丹水之战则所谓武也。舜之诛四凶,禹之格有苗,固可以武功名,而亦文明、文命之余事也。布昭圣武,见于《伊训》,然圣谟嘉言,谓非文武之全欤?文谟武烈,称于《君陈》,然整旅伐崇,下车访道,二者正未始偏废也。三代迭尚,曰忠、曰质、曰文,而不及武者,盖言忠、质、文,则武固在其中。必以武言,则是秦之所尚,而非三代之治矣。周列四民,曰士、农、工、商,而兵不与者,即臣前所陈寓兵于农之说。专以兵言,是为后世之制,而非成周之旧矣。

汉唐宋之君,如光武之投戈讲艺,太宗之身兼将相,庶几创业而兼乎文。其未备者,如汉高之不事《诗》、《书》,而规模宏远。盖其宽仁大度,暗合乎道,况能善陆贾文武并用之言乎!孝武之封狼居胥,宪宗之平淮西、西蜀,庶几守成而兼乎武。其未备者,如仁宗之时西夏猖獗,而致四十二年之太平。盖其深仁厚泽,培植国本,况能用韩、范儒者之将乎!陆贾之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则在承平时不可不修文德,故曰人君以论相为职,又曰将特大有司耳,非比也。《司马法》曰: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则在承平时不可不饰武备,故曰君子以涂戎器戒不虞,又曰圣人贵未然之防。是知兵以卫民,民以给兵,治兵乃所以镇兵,讲武即所以偃武。治兵之与治民,亦异而同也。

汉之军制,以南北分。南军主环卫王宫,北军主巡绰京城。有骑士,有材官,与夫南北之车骑,东南之楼船,临淄之弩手,荆楚之剑客,皆仰给于县官,而不缩于齐民。识者惜其去古未远而不能复。此汉之治民与治兵异也。唐府兵之立,其制最善。兵散于府,将归于朝,所以弭祸乱之原。二十为兵,六十而免,而民无久役之劳;三时耕稼,一时讲武,而兵无常聚之患。器甲出于民,衣粮出于民,而国无养兵之费。治民与治兵同,而论者许其为近古,良有以也。宋之制,有三衙四厢,诸总管、钤辖、诸将。然终宋世,国威不振者,殆兵权失之轻,而兵民分之过也。由是言之,文武者,其名也;兵农者,其实也。三代而上,兵出于农,而文武不得不合;三代而下,兵判于农,而文武不得不分。夫

苟知文武之所以同,则所以治民与治兵者,不容以异矣。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独禀全智,首出庶民,扫开辟所未有之污,复帝王所自立之地。武功之盛,无以加矣。整人伦于用夏变夷之余,兴文教于拨乱反正之始。文德之盛,又何如哉!当时之建官也,科目则有文举、武举,官联则有文班、武班,部属则有文选、武选;当时之定籍也,常产则有屯田、民田,户籍则有军籍、民籍,官署则有州县、卫所。然乾纲独断,无威柄下移之失;犬牙相制,无尾大不振之患。有事则共与机密之谋,无事则各掌兵民之寄。在京有司马,以提督军营;在外有宪臣,以总制边务。臬司有兵备之权,县吏专巡捕之职。名若分而实则相属,职若判而任则相维。保治之法,盖与三代而同符也。至若太宗表章经史,而外清朔漠之尘;宣宗崇重儒臣,而出平汉邸之变。列圣相继,益懋益敦。百五十年来,固皆以文致治,而庙算不遗,神武不杀,伟烈宏功,照耀简册。寿国脉于箕翼,安国势于磐石。斯世斯民,盖有由之而不知者。

恭惟皇帝陛下,保富有之业,思日新之图,阅历熟而见理明,涵养深而持志定。垂衣拱手,而天下向风;动颜变色,而海内震恐。疆埸之虞,扑之于方炽;萧墙之梗,消之于未形。君子洗心以承休德,小人延颈以望太平。而皇心谦冲,谓承平既久,玩惕随之。臣伏读至此,有以知陛下出治之全德,保治之全功,可因此一念而举矣。臣窃以为,陛下求治之心甚至,而奉行者或有所未至焉。

夫学校者,风俗之首也。程颢谓: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使主学校者皆得其人,教之之法悉如阳城之在国学,胡瑗之在湖学。一道德以明礼义,尊经术以定习尚,不荒于嬉而毁于随,则淳厚之风可臻,而士之失业者非所忧矣。

民者,国本所系。邵雍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所以宽之者在朝廷,而近民者莫切于守令。使为守令者皆得其人,养之之法悉如黄霸之在颍川,张咏之在益州。遵奉诏条,宣布德意,不以简丝先保障,不以抚字后催科,则因革之俗可期,而民之告饥者非所忧矣。

流徙之余,聚为盗贼,亦由教之无法,养之无素故也。以人情言之,盗贼亦人耳。人莫不爱其筋力肌肤也,莫不爱其父母妻子也,莫

不爱其田庐货产也。在上者不以无益之工役，苦其筋力；不以不中之刑罚，残其肌肤。不以流离，病其父母妻子；不以诛求，损其田庐货产。则彼岂不自爱，以蹈必死之地哉？今潢池弄兵、绿林称号者，在在有之。

赋税之过，春支秋粮；馈运之弊，十室九空。农事在所当重也。迩者出内帑银二十万两，以济西蜀之军储，爱民可谓深矣。臣愚以为，本土之蓄积，宜自足用。昔人有言：兵务精，不务多。今为将者，兵每务多，而财馈每患其寡。兵既多，则财馈不得不多；财馈既多，则民力不容以不屈。是民以养兵，而亦不可反为兵困也。

调发之伍，动以千百；战御之功，十无二三。兵政尤所当急也。迩者发京营兵三千骑，以平山东之反侧，御患可谓切矣。臣愚以为，本土之壮士，宜自可用。昔汉击匈奴，用六郡良家子，盖其熟知险易，力卫桑梓。比方他方，所谓发一可当百。况京兵一出，既有行迹居饷之劳，亦有居重驭轻之戒。固可权其宜于一时，而非可继于旬月。是兵以卫民，而亦不可过为也。

圣问又谓：或者官非其人。臣愚以为，一代之才，自足以周一代之用，特患用之不得其道耳。用之诚得其道，则贪可使也，诈可使也，况蕴德行而志功名者乎！选举之制公矣，宁无腐儒而当事局，历济而投散者乎？黜陟之典当矣，宁无冗食备员之辈，隐贤遗才之叹乎？赏罚之令明矣，宁无滥竽而受赏，戴盆而免罚者乎？诚使官各尽其人，才各尽其用，人人有忘私之公，事事有爱国之诚。彻桑土于未阴之时，徙积薪于未火之日。一郡有警，则傍郡切震邻之忧；一时有警，则先时思嗌脐之悔。敌至不惧，敌去不悔，不因人成事而老吾之师，不旷日持久而匮吾之财。内修外攘之实，必尽于条教之外；文恬武嬉之弊，必作起于玩习之余。则文德之敷，云行雨施；武节之建，雷厉风行。远可以复帝王之善治，上可以光祖宗之谟烈。国家亿万年之历，可以配天地于无穷矣。

臣愿陛下，益崇此德，益保此功，存无怠无荒之心，为可久可大之道。惟万几之暇，少加意焉，则凡所以策臣者，可次第而举矣。何暇于多言为哉？臣干冒天威，诚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驾驭天下,具有拿出治理措施的完整德业,具有保持治理状态的完整功效。文教与武力一起使用,这属于拿出治理措施的完整德业。士兵和农民相互补充,这属于保持治理状态的完整功效。在文教与武力一起使用方面,让人看出它们道理一样,全天下的政令就出自同一个准则,而德业够得上完整的德业。这如同日、月在天上,凡属照临的东西,都是上天的德业啊!在士兵和农民相互补充方面,让人看出它们在既定目标上相同,全天下的治理就出自同一个准则,而功效够得上完整的功效。这如同手、脚在人身上,凡属执持、移动的动作,都是人的功效啊!由此联结天下,来构成一个整体;统领道法,来适合治理。体统一脉相承,而不存在偏斜下滑的忧虑。本源和末梢全都包括在内,而不存在漏洞还要被指摘的毛病。放在任何地方都适应,传到什么时候都没有弊端。帝王进行治理的要领,还有什么能超过这两点的吗?臣下我从年龄很小时就阅读有关做帝王的书籍,讲求做帝王的原则与方法,私下要对当代的政事进行参预,但学过却不敢讲出来,讲出来又到不了朝廷。如今荣幸地赶上和皇帝的威势靠得特别近,站立在殿前进行对策的地方,而制策所涉及到的问题,都是这种道法和这类政事。臣下我敢不竭尽仅有一点儿心得的那种愚昧,来作为万分之一的佐助吗?

跪拜看到圣上的提问首先说:创建国家基业靠武力,保持已有的基业靠文教,但有人又说文教和武力道理一样,士兵和农民在既定目标上相同。可二者究竟有没有差异呢?臣下我想来,在夏商周三代以前,本属同一种道法,平定叛乱就称为武,保守基业就叫做文。本属同一个百姓,没有变故就成为农民,发生变故就充当士兵。最初未必就两样。在《易经》上,日月的光明两次升起,就构成了《离卦》。这是文彩的象征。《离卦》最上阳爻的爻辞说:王因出兵征伐,会有战胜的喜事。对此做解释的人说:刚健光明到达远方,威力振服而刑罚不乱用。从这不也能看出文教和武力道理一样吗?《易经》上地中有水,就构成了《师卦》。这是军队的象征。而对此做解释的人说:把最危险的情况隐伏在特顺利中,把千变万化藏纳在最平静中。恐怕把兵士寄

寓在农民中的用意，从这不也能看出兵士和农民在既定目标上相同吗？所以有时要烦劳百姓，有时要宽解民众，就被称作良好的治国原则。用刚强手段取进，用柔和办法制服，就同最高的准则相适合。

周公姬旦身为冢宰这一最高辅政官，实际上兼管东征平叛。毕公姬高担任三公职位，也统领司马事务。武将能承当起最重要的委托，周宣王时的尹吉甫也享有能文能武的赞誉。用《诗经·天保》所说的那类情形治理内部却未尝就没有武力，用《诗经·采薇》所说的那类情形治理外部却未尝就没有文教，文教和武力，原本上就没分离。自从秦国不效法古代，专靠武力勇猛确立国家统治，谈论《诗经》、《尚书》的人就受到刑罚，斩获敌人首级的人就提升爵位。老百姓在争战上很勇敢，都变成忘记生命、贪图利益的人。读书人把受典章拘束看得很低贱，废弃掉演练武舞、文舞的风气。到汉朝袭用秦朝的制度，设立丞相、将军，而将军、丞相的职责就区分开来了。唐朝和宋朝以来，设置中书令、元帅、枢密使，而军政、国政的权力就各向一边倾斜了。这是文、武的分离，在夏商周三代以后出现的情况。

西周的制度，依照土地和军赋各出兵力。一万个井田内，负责出战马四百匹，兵车一百辆。十万个井田内，负责出战马四千匹，兵车一千辆。天子的直接辖区方圆千里，辖区内共一百万个井田，负责出战马四万匹，兵车一万辆。由五个人编成一伍，递增而为二十五人组成的两、一百人组成的卒。由五百人编成一旅，递增而为二千五百人组成的师、一万二千五百人组成的军。天子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这六卿分别当将帅的六个军，诸侯中大国有三个军，中等国有两个军，小国有一个军，逐级减少而分出等级来。某个地方发生事变，就任命将帅，出动军队，等到大功告成，向宗庙献上战俘，将帅回到朝廷，就又成为奉守原来职位的官员。士兵分散到居住地，就又成为从事耕作的农民。士兵和农民原本上就没分离。到管仲在齐国任国相，打算迅速实现当霸主的事业，就在齐国国内实行的制度中破坏了周代的军事制度，把国都辖区划分成四个乡，让国都辖区以内的民众都成为兵士，国都辖区以外的民众都成为农民，兵士不习惯耕作的辛劳、农民不熟悉盾牌戈矛这类武器。直到越国、吴国的名为

"私卒君子"的效忠亲军,秦昭王的名为"锐士"的敢死部队相继出现,西周的兵制就被变动改换得不存在了。这是兵士与农民在夏商周三代末期分离的情况。

验核《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史事,古代的帝王,没有不兼备文教与武力的德业,使兵士和农民的功效对等发挥出来的。称述帝尧的地方,说他又是武力,又是文教。天下四方边际都延及到,这就是所说的文教,而丹水之战,就是所说的武力了。虞舜严惩共工、欢兜、三苗、鲧这四凶,大禹打击三苗,固然能凭借武功著称,但也只是经纬天地和照临四方、向外扬布文德教命的从属事情。播布彰显圣明的武德,这在《尚书·伊训》中看得到。然而同时讲到的圣明的谋略、美好的言论,说的还不是文教和武力的整体吗?文王的谋略,武王的战功,在《尚书·君陈》中有述说,然而文王整顿军队讨伐崇国,武王刚刚灭商就访求治国的大道,二者正未必从一开始就偏重这方面而丢掉那方面啊!夏商周三代递相有所崇尚,叫做忠实,叫做质朴,叫做文采,却没涉及到武力,原因大概是讲到忠实、质朴、文采,武力原本也就包括在内了。一定要拿武力来宣扬,那就是秦国所崇尚的东西,而不是夏商周三代的治理了。周朝排列四种民众,叫做有知识的人、农民、工匠、商人,但兵士却不列进去,原因也就是臣下我在前边所陈述的把兵士寄寓在农民中的说法。专门要拿兵士来宣扬,这属于后世的制度,而不是西周的原样了。

汉代、唐代、宋代的君主,像东汉光武帝放下武器,讲求儒学,唐太宗一身兼具将相,差不多是创建国家基业而把文教也包括在内了。他们中不完备的人,像汉高祖不理会《诗经》、《尚书》,但做出的筹划却宏大长远。这大概因为他宽厚仁义,度量大,无形中合乎道法,况且对陆贾关于文武并用的建议还感到很好呢!汉武帝在匈奴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大礼,唐宪宗平定淮西、西蜀割据的藩镇,差不多是保持住已有的基业而把武力也包括在内了。他们中不完备的人,像宋仁宗时尽管西夏猖獗,却也达到在位四十二年的太平岁月。这大概因为他仁德深切,恩泽厚重,培值国家的根基,况且还能任用韩琦、范仲淹这些本为儒者的将帅呢!西汉陆贾的主张说:天下安定,要把

精力投注到丞相的任用上。这就表明在太平时期不能不修明文教措施，所以说君主要把选定丞相作为天职，又说将帅只是一个大衙门罢了，不能和丞相相提并论。《司马法》这部兵书说：天下尽管安定，忘记战备就会很危险。这就表明在太平时期不能不整治武备，所以说君子通过擦亮兵器来警惕意外事变的发生，又说圣人看重事变尚未发生时所做的防备。这就可以了解兵士是用来保卫民众的，民众是用来供养兵士的。治理军队也就是用来镇慑住乱军四起，讲求武备也就是用来止息武备。治理军队和治理百姓，也是看上去不同而实质却相同的。

汉朝的军事制度，按南、北军划分。南军负责环卫皇宫，北军负责巡察京城。还有骑士，有材官，以及南、北的车骑，东南的楼船，临淄的矰手，荆楚的剑客，这些不同番号的中央和地方部队，全都依赖朝廷供养，而不从平民百姓那里收取费用。有见识的人痛惜这种做法距离古代很近却不能全盘恢复。这是汉代治理民众和治理军队所存在的区别。唐朝建立以折冲府为基层单位的府兵，这种制度最完善。打完仗后兵士分散到所在的折冲府，将帅回到朝廷任原职，用来消除祸乱的根源。男子从二十岁有义务当兵，到六十岁不再征发，而百姓没有长久服役的痛苦。一年中春夏秋三季从事农业生产，冬季一季讲求武备，而士兵没有经常聚集的忧虑。武器盔甲由百姓自己出，衣服粮食由百姓自己出，而国家没有供养军队的财政支出。治理民众和治理军队一个样，而议论政事的人推崇这种做法接近古代，确实是有理由啊！宋朝的军事制度，设有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这三衙和左右四厢都指挥使，各路总管、兵马钤辖、诸将官。然而到宋朝灭亡，国威一直不振扬，原因恐怕是兵权在国家中有些轻，而兵士和农民的区分也太厉害了。由此说来，文教和武力，是名义；兵士和农民，才是实际。夏商周三代以上，兵士从农民中产生，而文教和武力不得不合为一体。夏商周三代以下，兵士从农民中分离出来，而文教和武力不得不分成两码事。如果了解文教和武力原本相同的原因，那么，治理民众和治理军队的措施，就不容许不同了。

只有我朝伟大的太祖高皇帝，独自秉受所有的智慧，让普通百姓第一个获得新生，扫除掉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污秽，恢复正统帝王所本应昂立的地位，武功的盛大，没有再能添补的了。在用华夏取代异族的统治以后，整顿道德纲常；在拨乱反正的起始阶段，振兴礼乐教化。文德的隆盛，又该是怎样啊！当时建立职官制度，通过科举取士，设有文举、武举。官员相互协助联合处理政事，设有文班、武班。各部门人员配置，设有文选、武选。当时定立国家人口登记制度，不动产定有屯田类，民田类，户口簿籍定有军籍、民籍，官署设有管理民政的州、县和统领地方驻军的卫、所。然而中央大权独自运用，不存在权力转移到下面去的闪失。各地像犬牙交错那样相互制约，不存在拒不服从中央的祸患。朝廷有事，就共同参预机密谋划，朝廷无事，就各自掌管军队或民政的重责。在京师设有兵部尚书，来提督军营；在外地设有监察官，来总领边防事务。提刑按察司拥有进行军事防备的权力，县吏专门承担巡察搜捕的职责。在名义上好像各有分工，但实际上却相互连属，在职务上好像各有划分，但责任上却相互维系。保持治理状态的方法，大致和夏商周三代一模一样。至于太宗文皇帝，标揭彰显经典和史册，对外扫清了北方沙漠的元朝残余势力。宣宗章皇帝尊崇推重儒臣，率军亲征，平定汉王高熙的叛乱。各位圣明的皇帝一代接一代，越来越勤勉，越来越促进。至今一百五十年以来，固然都靠文教达到大治，而在朝廷上的军事谋划也不遗弃，神明的勇武也不减少。宏伟的功业，照耀史册。使国家延续的命脉长久得像寿星，把国家局势安稳得像磐石。这个时代的这个百姓，大概有跟着走却不知道其中缘由的人。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您保守富有的大业，考虑每天都有道德新变化的计划，经历多又看出道理很透彻，修养深又持守心志很坚定。无为而治，天下就群起响应；一有举动，海内就非常恐惧。边境地区的变故，在它刚兴起的时候就扑灭它；内部潜在的叛乱阴谋，在它还没露头的时候就消除它。君子清除头脑中的污浊来承顺美好的德业，小人伸长脖颈来盼望太平。可皇上的内心却很谦虚，在制策中说太平的时间既已长久，贪图安逸、荒废岁月的现象就冒出来了。臣下

我跪拜敬读到这里，确有理由知道陛下您拿出治理措施的完整德业，保持治理状态的完整功效，可以由这一个念头而全面推行开了。臣下我私下认为，陛下谋求大治的心愿达到了极点，可奉命执行的人还有未能做到的地方。

学校是有关社会风气的首要事体。北宋程颢强调：治理天下要把端正社会风气、获得到贤才作为根本。假使主管学校的人都获得到合适的人选，教育生员的方法全都像唐朝阳城在国子监、北宋胡瑗在湖州州学那样，使道德归于一致来宣明礼法道义，尊崇经学来确立起习气风尚，不由嬉戏而荒废学业，不由因循而败坏德行，这样淳朴厚道的风气就能够形成，而读书人丧失掉本身专业的情况就不再是令人忧虑的了。

民众是国家根本所系结的因素。北宋邵雍认为：宽缓一分，百姓就蒙受到一分的恩赐。宽缓的决定权在朝廷，而接近百姓的人，没有什么官员能比太守县令更紧要的了。假使出任太守县令的官员全都获得到合适的人选，养育百姓的方法全都像西汉黄霸在颍川郡、北宋张咏在益州那样，遵奉朝廷对太守制定的考察标准，宣明播布朝廷对百姓的恩德意旨，不把选征贡品放在保障地方安全的前面，不把安抚养育百姓放在催交赋税的后面。这样既有沿袭又有变革的风俗就能够形成，而民众呼叫挨饿受冻的情况就不再是令人忧虑的了。

百姓在逃亡迁移的后面，就聚集到一起，成为盗贼，这也是由于教化他们没有方法、养育他们没有基础的缘故啊！按照人的常情说来，盗贼也是人。是人就没有谁不爱惜自己的体力和身躯，就没有谁不爱惜自己的父母、妻室和儿女，就没有谁不爱惜自己的田地、住宅和财产的。管辖他们的人，不用没有任何好处的劳役，使他们体力受折磨；不用不公正的刑罚，摧残他们的身躯；不用四处飘荡讨活路，给他们的父母、妻室和儿女带来伤害；不用过分的征敛，损害他们的田地、住宅和财产。那么，他们哪会自己不爱惜自己，去陷入必死的去处呢？现今并非有意作乱或成心造反的现象，到处都存在。

赋税提前征收，紧迫到春季就已支付秋季的粮食。往边区运送军需的弊病，严重到十室九空的地步。农业生产，按理是应当重视的

呀！近来拨出皇室的库银二十万两，来接济西蜀的军用储备，爱惜百姓可以称得上很深切了。臣下我愚昧地认为，本地的钱粮积蓄，应当能自行满足所需的费用。从前的人说过：兵士要务求精良，不贪人多。如今担任将帅的人，常常务求兵士人多，而军饷供应常常忧虑数目太少。兵士既然人数很多，军饷供应就势必数目庞大；军饷供应数目庞大，百姓的财力就势必受到损伤。这表明，百姓用来供养军队，也不能反过来被供养军队弄得很艰难。

调遣征发的部队，一有行动就成千上百名。而交战防御的功效，十项当中没有两三项。这表明军政特别要赶快加以解决啊！近来调发京营骑兵三千名，去平定山东的叛乱，防止祸患可以称得上紧切了。臣下我愚昧地认为：本地的壮士，自然应当能够使用。从前汉朝抗击匈奴，使用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这六郡出身清白的子弟，因为他们熟悉地形，要全力保卫自己的故乡。同其他地方的人相比，就是人们所说的调遣一个人，可以顶得上一百个人。何况京营兵一出动，既有所到之处停驻并供应军需的劳苦，又有对屯驻京师用来控制外地所应引起的战略上的警惕。固然在一时间可以灵活做出安排，但不能够延续到十多个月那样长。这表明，军队用来保卫民众，也不能做得太过份。

圣上的提问又指出：或许是官员们不都属于合适的人选吧？臣下我愚昧地认为，一个时代的人才，自然足以全面适应那个时代的用途，只是毛病出在使用人才没有获取到恰当的方法罢了。使用人才果真获取到恰当的方法，那么贪婪的人也可以使用好他们，奸诈的人也可以使用好他们，何况蕴积着德行又对功业名声抱有强烈的实现愿望的人呢！选拔任用的制度已经很公正了，难道就没有迂腐的儒者却执掌大权，阅历丰富又政绩突出的人却被打发到闲职里去的吗？降职罢官和提升的规则已经很得当了，难道就没有白吃官饭、充个员额的一帮家伙吗？从而让人对贤良遭埋设、人才被遗弃而叹惜的吗？赏赐和惩罚的法令已经很明确了，难道就没有冒充却受到赏赐、手段和目的相反却免遭惩罚的人吗？果真使官职各自都由合适的人选来担任，使贤才各自都发挥他们的用途，人人具有忘记个人的公心，事事

具有热爱国家的诚意，在天气还没阴雨的时候就剥取那桑根皮，在还没起火的时候就搬开那柴草垛。一个郡发生了军情，旁边的郡就对可能引起四邻震动的忧虑十分关切。一时间发生了军情，就事先考虑到届时后悔也来不及了。敌军杀到不害怕，敌军离去不轻视，不依靠别人的力量取得战果而使我方的军队疲惫，不空废时日、拖延很长时间而使我方的财力匮乏。内政修明和外逐敌军的实效，必定要把力量使到各项规定的范围以外。文官武将对安逸享乐形成习惯的弊病，必定要在荒废岁月不以为然的后面纠正并振作起来。这样，文教措施的普及，就像云行雨施那样广泛施布了。军事号令的坚确发布，就雷厉风行了。往远处说可以恢复古代帝王的完美治理状态，往上说可以发扬光大列祖列宗的宏图大业。国家亿万年的运历，可以同天地相配而永无止境了。

臣下我祝愿陛下，更加增进这种德业，进一步保持这种功效。存有不懈怠不荒废的心念，施行可以长久、可以壮大的道法。只是在处理繁忙政务闲暇的时候，稍微留点儿心，这样凡是用来策问臣下我的政事，就可以按次序而全面推行开了，哪里还需要费功夫说个没完呢？臣下我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实在是恐惧到了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蒿文玲译〕

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丁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殿试策问

[正德十二年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羲农以下之事，见于经；秦汉以来之事，见于史。见于经者，皆圣贤为治之迹。见于史者，亦当时君臣相与随时而成治者也。然儒先君子之论则曰：帝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岂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后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欤?自今观之，如画野分州，设官分职，明礼乐，兴学校，正律历，秩祭祀，均田赋，通泉货，公选举，严考课，立兵制，慎刑罚，则帝王之治天下，固未尝不以法也。天性明达，宽仁长者；躬修玄默，以德化民；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事从宽厚，文以礼乐；畏义好贤，力于为善；聪明果决，得于天性；宽仁多恕，心无私曲；恭俭仁恕，忠厚恻怛。则后世贤君之治天下，亦未尝不各有其道也。然则儒先之论，殆亦有不足尽信者欤?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治定功成。圣子神孙，万代如见其治道之高明，治法之弘远，直可以等帝王而上之矣。然而帝王庙祀立于京师，自昔忠良多与配享。虽以胜国之世祖，而亦获秩祀焉。岂非以后世之英君谊辟，其政治亦犹有可取者欤?朕膺天眷

命，嗣守鸿业，临政愿治，盖十有三年于兹矣。然远师帝王之道，而望道犹有所未见；近守祖宗之法，而行法犹有所未逮。其故安在?子大夫积学待问久矣，其为朕据经史，兼本末，详著于篇。朕将采而用之，而以资于治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仁道这宗事，自身打算站得住，同时也让人家站得住；自身打算什么都行得通，同时也让人家什么都行得通。能够从眼前选择事例去做，可以称得上是践行仁道的方法了。

老年人都穿丝帛衣服吃上肉，普通百姓不挨饿，不受冻，这样却仍旧不能使天下归服的，那可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

敬重大臣就会临事不迷惑；接纳群臣就会士子感恩，在患难时以死相报；把民众当成儿子来对待就会百姓相互劝勉，要为国君出死力；招徕各种工匠就会财物用度充足；感化边远地区的人就会四方都来归顺；安抚诸候各国就会天下都感到畏惧。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伏羲氏、神农氏以下的事迹，在经典中有记载。秦朝汉代以来的事迹，在史书中有记载。在经典中有记载的事迹，都是圣王贤臣治理天下的足迹。在史书中有记载的事迹，也属于当时君臣共同努力、顺应时势而实现天下大治的东西。可是儒家先贤的评论却说：帝王凭借大道治理天下，后世仅仅依仗法度控制维持住局面而已。这种论断果真确切的话，难道是帝王治理天下完全靠大道而不靠法度，后世治理天下完全靠法度而不靠大道了吗?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观察古代，像划分疆域州界，设置区分官职，宣明礼法乐舞，兴办学校，确定音律历法，安排祭祀的次序，均平田地赋税，流通起货币，公正地进行官吏的选拔任用，

严格地对官吏加以考核，定立起军事制度，慎重地对待刑罚，这都表明帝王治理天下，原本上也未尝不靠法度啊！后世有的君主天性就贤明豁达，宽厚仁慈，具有长者的气度。有的修养好自己的德性，清静无为，用仁德去教化百姓。有的宽宏大量，和汉高祖一模一样。有的处理政事都按宽厚的原则办，用礼法乐舞来加强文教。有的敬畏道义，喜爱忠良，在办好政事上花大力气。有的听得清，看得明，果断勇决，出自天性。有的宽厚仁慈，对人对事常加体谅，内心没有个人偏狭的想法。有的恭谨节俭，仁慈宽恕，赤诚厚道，体恤百姓。这都表明后世的贤明君主治理天下，也未曾不是没有各自的大道啊！既然如此，那么儒家先贤的论断，恐怕也存在着不足以完全让人信服的地方吧？

只有我们最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创建国家基业，把基业传给后代，统治确立起来，大功告成。继承帝位的神圣子孙，永久就好像看见他那治国大道的高明，治国法度的宏大深远，直接可以同古代帝王相提并论而又凌驾他们之上了。可是帝王的庙宇祭祀都建立在京师内，自古以来忠臣良将大多在附祭之列。即便是被我朝取代的元朝世祖，也获得了按次序祭祀的资格。这恐怕是因为后世的英明君主，他们在政治上也仍有可取的地方吧？皇帝我承受上天的眷念和委托，接替守持宏大的基业，处断朝政，希望实现大治，到现在已经将近十三年了。然而朝远处效法古代帝王的治国大道，可眼望那治国大道却仍然还有没看见的地方；向近处恪守本朝祖宗的治国法度，可行用那治国法度却仍然还有没达到的地方。其中的缘故在哪里呢？你们这些士大夫积累学问，等待询问，已经时间很长了。有关的问题替皇帝我引据经典史书，本原和末梢都包括在内，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采择施用，来对治国有所补益。

舒芬　殿试对策

舒芬(1484～1527)　字国裳，进贤(今属江西)人。年十二因献《驯雁赋》而知名。正德十二年(1517)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因上疏极

谏武宗出巡事，被罚跪阙下五日，杖三十，贬为福建市舶副提举。世宗即位，召复原官，又因谏大礼下狱廷杖。不久奔母丧，卒于家。世称忠孝状元，学者称梓溪先生。著有《易问笺》、《东观录》、《太极绎义》、《成仁遗稿》。万历中追谥文节。

臣对：臣闻天下无法外之治，帝王无道外之法。盖道者，出治之本，法之体也；法者，为治之具，道之用也。使道有未纯，则所以立法者，义必不精，利必不尽，虽能行于一时，而不可垂于万世。法有未善，则所以为治者，化必不洽、泽必不周，虽或致夫小康，而终不足以望雍熙泰和之盛。故论治而谓不以法，非知治者也；论法而谓不以道，非知法者也。古之帝王全于躬行心得者，既有以建天下之极，见于典章制度者，又有以尽天下之情。故功业之盛，上下与天地同流，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秦汉以来，非不有法也，类皆小补罅漏，而不知先王立法之原；亦非不有道也，乃其天资偶合，而不闻先王大道之要。尚何望其治效如古昔之隆也哉！然则治之不能外法，法之不能外道，盖有确乎其不可易者矣。

恭惟皇帝陛下，笃于求道，审于行法，勤于致治。践祚以来，尝三亲策多士矣。始之以法天法祖，盖笃于求道之心也；继之以文武兵农，盖审于行法之心也；又继之以《大学衍义》之问，盖勤于致治之心也。兹于万几之暇，复进臣等于廷，兼是三者之心，俯赐策问，拳拳焉若有所不足，而欲益臻其极者。臣虽愚陋，敢不对扬休命于万一乎？

臣闻羲农，治之极也；尧舜，道之至也；三代，法之备也。言治极，则法之善可知；言法备，则道之纯可知。故孔子系《易》，始于伏羲，则十三卦之制器利用，以法而存乎道也。序《书》断自唐虞，则《二典》之所载时雍风动，以治而形乎法也。删《诗》而备于文武，则《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是又以道而显，设之于法也。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释之曰：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岂尧舜不足于法，而文武犹病于道邪？盖举道则法以著，举法则道以存。故朱熹又曰：皆兼内外、赅本末而言也。由是言之，道与法非判然二物也，明矣。

圣制以为，儒先君子之论则曰：帝王以道治天下，后世只以法把持之而已。信斯言也，岂帝王之治一以道而不以法，后世之治一以法而不以道欤？圣虑深远，臣愚，何足以知之？然窃惟帝王之与后世，其为道不同，而其为法亦异。帝王道足以创法、法足以善治，故专谓之道，盖道即法之所从出也。后世之于道，或偏而未全，或驳而未纯，则其所恃以为治者，独法而已，故专谓之法，盖法始有不本于道者矣。请因圣制所及，以凡经史所载道与法者，敬详陈之。

圣人理天下，使物各得其所，为极至。故其尽制曲防，莫非美意存焉。今举其大者，若黄帝之画野分州，舜肇十有二州；禹弼成五服，咸则三壤；商人肇域四海，以建诸侯；周人以九州之地，建三等之国。而分田以定赋者，或五十而贡，或七十而助，或百亩而彻，皆以十一为中正。则封建井田之法，于是乎立矣。伏羲以龙纪官，神农以火纪官，黄帝有天地四方之官。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其数，周官三百六十，统于六卿。而敷奏明试，三考黜陟，与夫六计、八职、八柄之政，亦行乎其间。则建官考课之法，于是乎详矣。亲疏贵贱之有体，郊社禘尝之有仪，《咸》、《英》、《韶》、《濩》之有制，璇玑玉衡之有具，塾庠序学、秀选俊造之有等，则礼乐、律历、学校、选举之法，无一不备也。九赋以为敛，九式以为节，五刑以为计，八刑以为纠，弧矢以示威，伍、两、卒、旅、师、军以蕃众，则货财、兵戎、刑罚之法，无一之或缺也。

所以然者，羲农、黄帝，皆以神圣之德，继天而王。尧舜、禹汤、文武数圣人者，或克明峻德，或温恭允塞，或肇修人纪，或缉熙敬止，或重民五教，道无不纯而法于是焉出。不然，亦安能心代天意，身代天事，妙化导之机，而极制作之善若是哉！故曰帝王以道治天下。而臣所谓道即法之所从出者，于是可见矣。

后世贤君，若汉高之天性明达，宽仁长者，以创汉家之业；文帝之躬修玄默，以德化民，而致后元之治。光武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成中兴之功；章帝之事从宽厚，文以礼乐，济永平之政。唐太宗之畏义好忠，力于为善，速致太平；宪宗之聪明果决，得于天性，卒平祸乱。宋艺祖之宽仁多恕，心无邪曲，而有以易五季干戈之乱；仁宗之恭俭仁恕，忠厚恻怛，而有以开元祐、炎兴之运。诚如圣制所谓：亦未尝不

各有其道也。但此之谓道，不过天资之近似耳。就而论之，则恶闻《诗》、《书》，崇尚黄老，溺图谶以蹈封禅之非，乏刚断以启戚门之衅，以至天伦惭德，异术荒心，任智谋以成功，听谗幸以废后。帝王纯粹之道，果如是乎？

道既未纯，则法之所立，宜乎其不能尽善也。故汉初三章之约，律令之次，章程之定，与夫侯国之封，所谓磐石之宗、犬牙相制者，规模亦宏远矣。然不革秦习，不任周政，所以治杂于霸，其后祸难屡起，亦非法之所能防也。唐以六典建官，以租庸调取民，增置学舍生员以养士，与夫以府卫治兵，所谓居重驭轻、五大不在边者，节目亦详尽矣。然大纲不正，昏风相袭，所以治杂于夷，其后变故最多，法亦屡坏而不可支也。宋人重儒术，爱民力，以文知州，以朝官知县，以京朝官监临财赋，与夫通判、县尉之置，要皆以收方镇之权，所谓混一天下，亦长虑而却顾矣。然武备颇衰，成功亦小，国势日以积弱，莫能善其后也。故曰后世以法把持天下，而臣谓法之不本于道者，夫岂不然耶？以是观之，则道有纯否而法随之，法有善否而治因之。孰谓为治可以无法，而立法可以不本于道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用夏变夷，一代经制之备，真足以匹休帝王，而开圣子神孙万世之太平矣。观夫京畿诸道之建置，宗藩列爵之世封，内则罢丞相而设府部，外则罢行省而设三司，有大明《官制》以定其员，有《诸司职掌》以定其守。命官议礼，则吉、凶、军、宾、嘉之礼，有其等矣，而又有《礼仪定式》诸书，以示其品节制度焉。命官作乐，则郊社、宗庙、朝廷之乐，有其章矣，而又有太常祠乐诸署，以习其器数声容焉。内设国子监，以教天下之英才；外设府、州、县学，以育民间之俊秀。经义之制定，而士无诡异之谈；科贡之制行，而士有汇征之望。

以言乎律历，则造历有官，而闰余、岁差之有算；司天有台，而休征、灾异之并占　且谓至元辛巳之历，渐违天度，遂以洪武甲子之岁，肇起历元。律历之正，何如哉！以言乎秩祀，则大而郊庙仪物，典于太常；小而厉享品节，详于祠部。正岳镇海渎之神号，革前世不经之淫名。帝王陵墓，三岁一降香祀之；先代贤臣，惟以当时官爵称之。祀典

之正,何如哉!

谓田赋不均,非所以遂民生也。国初丈量田亩,以抑兼并,清理田粮,以防奸伪,且视土地之肥塉,以为税科之轻重。是虽非井田也,不几于什一之中正乎!谓泉货不通,非所以资国用也。国初因桑穰之饶,而钞法甚严;置宝源之局,而钱法再变。茶马盐课之利,则以助军需;商税鱼课之办,则以助国费。是虽非帑余也,不几于九府之圜法乎!

礼部以科举之式选士,必严贡举非人之律;吏部以铨选之法选官,复有推升保举之例。其选举之公,仿佛乎虞周明扬宾兴之盛也。给由虽有常期,而所以为黜陟者,复稽其旌异之典、纪录之册焉。考核虽有通例,而所以校才能者,复稽其历任之久暂、地方之繁简焉。其考课之严,颉颃乎虞周三考、六计之详也。

以兵制言之,既有亲军诸卫,以卫宫禁;复有隶府诸卫,以卫京城。既有都司、留守司,以卫一方;复有各卫守御所,以卫郡邑。且府、卫之所职掌,虽各有司存,而军政之枢机,实由于兵部。盖统重驭轻之中,寓防微杜渐之意。此我圣祖亲历戎行,灼知古今利病,而为是良法。昔人谓其军政有统,真知言哉!

以刑罚言之,《大明律》之纲有六,而其目止于四百六十。《大明令》之纲亦有六,而其目止于百四十有五焉。是虽因唐制而定五刑,其间别比类异,简而易遵,明而易晓。盖我圣祖断自宸衷,务在直言其事,庶几使人易知而难犯。昔人谓其有象刑钦恤之仁,真知言哉!

夫一代经制之备如此,岂偶然而致之哉?盖有本于其间矣。臣尝庄诵圣祖之言,有曰:朕求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在允执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道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而欲施于政者有尧舜之治,不可得也。大哉王言!非真有得于帝王之道,能如是乎!宜其创制立法,尽善尽美,于以致雍熙泰和之盛,直等帝王而上之矣。

圣制又谓:帝王庙祀,立于京师。自昔忠良,多与配享。虽以胜国之世祖,而亦或秩祀焉。岂非以后世之英君谊辟,其政治亦有可取者欤?盖自洪武六年,定历代帝王之祀,自伏羲以至元世祖,凡十有六

君。皆以其开基创业，大有功德于民耳。若周文王虽基周命，终守事商之节；唐高祖虽君天下，皆赖太宗之功；故不祀焉。伊尹之告其君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圣祖秩祀帝王之意，不在兹乎！二十一年，定名臣从祀，自风后以至赤老温，凡三十有七臣。皆以其始终全节，与有功德于民耳。谓宋赵普，虽曾有微劳，然实深负于艺祖；元安童，虽信有勋德，然难并列于先臣。故不祀焉。盘庚之告其臣曰：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圣祖秩祀名臣之意，不在兹乎！故程颐之论治，独归于帝王，而常不足于后世者，天下之公言也。圣祖之秩祀，并隆于帝王，而亦不遗于胡元者，王者之弘度也。且以前世功德，固有当崇；而后人监戒，亦有攸视。圣意亦何深远哉！

圣制之终有曰：远师帝王之道，而望道犹有所未见；近守祖宗之法，而行法犹有所未逮。其故安在？且欲臣等详著于篇，将采而用之，以资于治。臣虽愚陋，敢无一言以对，而徒进谀词曰：道则至矣尽矣，治则已臻皇极，法则无可议者矣，独不有以来曲学之诮，而上负圣明待士求言之意哉！

臣窃观今日之天下：州野如旧，而民生之憔悴日甚；官职如旧，而事功之废弛日甚。礼乐如旧，而奢僭渐形，和气未洽也；学校如旧，而道术渐乖，士习未端也。律历正矣，而能以灾异当畏、为陛下陈之者，谁欤？祀典正矣，而能以异端当戒、为陛下避之者，谁欤？田赋之均，如旧也，而额外之征求无已；泉货之通，如旧也，而关市之税课日增。选举之法具存，而贤才之疏远者未伸；考课之法具存，而庸劣之在位者未去。兵制虽不改乎旧也，然强壮役于私门，恩赏夺于有力，其能弭怨谤之丛积乎？刑罚虽不改乎旧也，然怙终之罪不加，罗织之风未已，安能止物议之沸腾乎？夫以天下之事，每每如此，则是圣祖之法虽善，而今之所存者，盖文具耳。

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意者陛下之望道，诚有所未见欤？臣愿终其所欲言，以副陛下之所闻，而无复有所隐也。窃惟帝王之道大矣，臣愚不能究极。今陛下以程颐之言为问，臣亦敬以程颐之言为献。其言曰：为政须要有纲纪文章。此即臣所谓无法外之治是也。又曰：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此即臣所谓无道外

之法也。陛下诚能重人伦之始，审王教之端，如文王之雍雍在宫，无射亦保，则《关雎》之化，其庶几矣。图国祚之绵洪，计宗祧之嗣托，如文王之振振公子，以永姬篆，则《麟趾》之化，其庶几矣。《关雎》、《麟趾》化成，则至于兄弟，御于家邦，而道无不纯，有以匹休帝王，而增光祖宗帝王之盛治，又何难哉！是则陛下之所宜加意者，诚不在于多方也。

伏愿少垂天听，克广德心，不以臣所陈之言为谬，而听之惟聪；不以臣所言之事为易，而行之惟力。矜持敬畏，不少间断。清燕之优游，无异于大廷之临莅；便嬖之使令，不忘乎儒绅之奏对。则道可纯，法可善，治可久，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草野之人不识避讳，冒干天威，无任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天下没有在法度以外而施行的治理，帝王没有在大道以外所定立的法度。这大致因为大道是亮出治理的根本，是法度的内在本体；而法度是进行治理的具体形式，是大道的外在施用。假使大道存在着还不纯正的地方，那么，定立法度的结果，义旨必定不精粹，利益必定不能全收到。尽管能够在短期内行用，却不能垂示到万世。假使法度存在着还不完善的地方，那么，进行治理的结果，教化必定不深入人心，恩泽必定不普遍。尽管有的会达到政教修明的状态，但终竟不足以实现万分和美的盛况。所以讲论治国却认为不依靠法度，这是不懂得治国的人。讲论法度却认为不依靠大道，这是不懂得法度的人。古代帝王在亲自践行、确有心得上做得很周全，既有依据建立起全天下的最高准则；而在典章制度上让它显现出来，又有依据完全表达出天下的常情。所以功业隆盛，上下和天地一起流布，不是后世所能赶得上的。秦朝和汉朝以来，并不是没有法度，但大都稍略弥补一下漏洞，却不了解古代帝王定立法度的本原。也不是没有大道，只是他们的天资凑巧同大道碰上，却没听说过古代帝王所执大道的要领。这还期望什么治理的效果能像古代那样隆盛呢？既然如此，那么，治理不能游离在法度之外，法度不能超脱在大道之外，恐怕就存在着坚确得无法改变的东西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对求索大道非常专一，对行用法度十

分仔细，对实现大治特别勤勉。登上帝位以来，曾经三次亲自策问众多的读书人了。第一次用效法皇天、效法祖宗来作试题，这是对求索大道非常专一的心愿啊！第二次用文德武力和军队农民来作试题，这是对行用法度十分仔细的心愿啊！第三次用《大学衍义》这部书的有关问题来作试题，这是对实现大治特别勤勉的心愿啊！现今又在朝政万分繁忙的间隙里，特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融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心愿，居高临下，降赐策问，恳切得好像仍然有做得不够的地方，直管想进一步提高，达到极点。臣下我尽管愚昧浅陋，敢不对答称扬君主的美好命令于万分之一吗？

臣下我听说：伏羲和神农，属于治理的最高峰；唐尧和虞舜，属于大道的极点；夏商周三代，属于法度最完善的代表。讲论治理的最高峰，而法度的完善就可以从中了解到；讲论法度的完善，而大道的纯正就可以从中了解到。所以孔子为《易经》作《系辞》，从伏羲氏开始，由《离》、《益》、《噬嗑》到《大壮》、《大过》、《夬》这十三卦的创制器具和好处用途，这是把法度寄存在大道上啊！整理编排《尚书》，从唐尧、虞舜开始讲起，《尧典》和《舜典》所载述的民风万分协和、群起响应，这是把治理显现在法度上啊！删订《诗经》，在周文王和周武王时期特别完整，从《天保》以上各篇诗歌属于治理内部，从《采薇》以下各篇诗歌属于治理外部，这又是表明凭借大道而显赫、同时也该设布在法度中啊！孔子的学生子思说：仲尼效法唐尧和虞舜那套模式，把周文王和周武王奉为典范。朱熹对此加以解释说："祖述"这个词，意思是说往远处宗奉他们的大道。"宪章"这个词，意思是说在近处恪守他们的法度。这难道是讲唐尧、虞舜在法度上还有不足，周文王、周武王在大道方面还存在缺陷吗？实际是列举大道，法度就凭借大道而突出出来；列举法度，大道就凭借法度寄存在里面。所以朱熹又说：这全是兼具内部与外部，包括本原与末梢来讲的啊！由此说来，大道与法度并不是分得特别清楚的两样东西，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了。

圣上的制策中认为：儒家先贤的评论却说，帝王凭借大道治理天下，后世仅仅依靠法度控制维持住局面而已。这种论断果真确切的话，难道是帝王治理天下完全靠大道而不靠法度，后世治理天下完全

靠法度而不靠大道了吗?圣上提出的这种疑虑深切广远,臣下我非常愚昧,哪里足以阐明白这个问题?不过私下想来,古代帝王和后世君主,他们执守大道不同,他们施布法度也有差异。古代帝王,大道足够用来创立法度,而法度又足够用来治理得十分完美,所以单纯地称之为"道",这是因为大道也就是法度所产生的根源。后世对于大道,有的偏向一侧而不完整,有的驳杂而不纯正,这样一来,他们所依仗的施行治理的东西,也就只是法度而已,所以单纯地称之为"法",这是因为法度开始出现了不源于大道的情况。恳请按照圣上的制策所涉及的问题,依据经典、史册所载述的有关大道与法度的全部内容,恭敬而详尽地陈述它们。

圣人治理天下,使万物各得其所,才属于最完美的状态。所以他们建立起各种制度,多方面予以防范,没有一样不是把美好的意愿寄存在里面了。如今列举那些最重大的,像黄帝划定疆域,分出州界,虞舜开始设置十二州,大禹辅助形成那天子直辖区域外各为五百里的甸服、侯服、绥服、要服和荒服,全都按照土壤的上中下三个等次贡纳物品。商朝人开辟疆域占有天下四海,来册封诸侯。周朝人用九州的领土,分封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的三个等级的侯国。而夏商周划分田地来规定赋税制度,有的是按每家五十亩田地施行"贡"法,也就是对若干年的收成做比较得出一个固定数;有的是按每家七十亩田地施行"助"法,也就是借助劳力;有的是按每家一百亩田地施行"彻"法,也就是通行的税法。但都把征收收成量的十分之一作为适度、公平的标准。这样一来,封邦建国和井田方面的制度,在这时就确立起来了。伏羲氏用龙设立官名,神农氏用火设立官名,黄帝设有天地四方的官名。唐尧虞舜设置官职,只有一百个。夏朝和商朝的官职,数目超过尧舜时的一倍。周朝的官职是三百六十个,分别归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六卿统领。而四方诸侯向天子陈奏政绩,天子按照陈奏进行明确的验证,经过九年内的三次考核实行罢免或提升,以及以廉洁为根本的六项考核内容,上下级各自应尽到的八种职责、管理群臣的爵禄赏罚等八种形式,也在设置官职的过程中行用。这样一来,建立职官和考核的制度,

到这时就详备了。血缘亲疏和地位贵贱具有体统，祭祀天地、祭祀土地神和谷神、祭祀宗庙具有礼仪，黄帝乐舞《咸池》和帝喾乐舞《五英》、虞舜乐舞《箫韶》和商汤乐舞《大濩》各有规制，观测天象的玉制仪器具有模型，地方上的教读场所塾、庠、序和国立学府以及地方向中央选送优秀人才、政府选拔突出人才各有等级。这样一来，有关礼仪乐舞、声律历法、学校和选举方面的制度，没有一样不完备啊！按田地及关卡、市场等九种赋税来进行征收，按祭祀、酬宾等九项财物支出的规定来加以节制。按刺面、割鼻、断足、破坏生殖器官、杀头这五种刑罚进行量刑，按不孝、不和睦等八种在乡中行用的刑罚对万民进行纠察。拿弓箭等兵器来显示威力，通过五个人为一伍、二十五人为一两、一百人为一卒、五百人为一旅、二千五百人为一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的编制来积蓄兵众。这样一来，有关经济、军事、刑法方面的制度，没有一样还缺少啊！

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伏羲、神农、黄帝都凭借神妙圣明的德行，继承上天而统治天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几位属于圣人的人物，有的能够任用表彰才德兼备的人，有的温和恭谨、确能充实上下，有的开始订立做人的准则，有的光明而又敬慎，有的重视对民众进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种教化，大道无不纯正而法度就从中产生出来了。否则的话，又怎么能够用本心来代替上天的意旨，用自身来代替上天的行事，使教化诱导的机缘变得很神妙，把创建制度完善到极点呢？所以说帝王依靠大道治理天下，而臣下我所讲的大道就是法度产生的根源，在这上面也就可以看出来了。

后世的贤明君主，像汉高祖天性就精明豁达，宽厚仁慈，具有长者的风度，创建起汉室的基业。汉文帝修养好自己的德性，清静无为，用仁德去教化百姓，实现了后元时期的大治。东汉光武帝宽宏大量，和汉高祖一模一样，成就了中兴的功业。东汉章帝处理政事都按宽厚的原则办，用礼法音乐来加强文教，超过了明帝永平年间的善政。唐太宗敬畏道义，喜爱忠良，在办好政事上花大力气，迅速地造成了太平盛世。唐宪宗听得清，看得明，果断勇决，出自天性，最终平定了藩镇的祸乱。宋太祖宽厚仁慈，对人对事常加体谅，内心没有不正当的

想法，而有理由改变了五代战争频繁的混乱局面。宋仁宗恭谨节俭，仁慈宽恕，赤诚厚道，体恤百姓，而有理由开启了元祐、建炎、绍兴的国运。这确实像圣上的制策中所讲的：也未尝不是没有各自的大道啊！但把这称之为"道"，不过是他们的天资同大道近似罢了。仅就这几位贤明的君主来评论他们，那么，汉高祖讨厌听《诗经》、《尚书》那一套，汉文帝崇尚黄帝老聃无为而治的学说；东汉光武帝迷信神秘的预言，去重蹈泰山祭天祭地的错误举动；东汉章帝缺乏坚决的裁断，引发皇亲国戚的叛乱；以至唐太宗乱天伦，有愧道德，唐宪宗信奉金丹秘术，使内心荒乱；宋太祖专用智谋来获取成功，宋仁宗听信小人的谗言废掉皇后。古代帝王的纯粹大道，果真就像这样吗？

大道既然不纯粹，法度的定立就难怪他们不能尽善尽美了。所以汉朝刚建立时"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三条法律的约定，九章律令的编列，历法和度量衡制度的定立，以及诸侯王国的册封，所谓使国家像磐石一样稳固的皇室宗亲，像犬牙交错那样相互牵制，这些筹划也很宏大深远了。但却不改变秦朝的习尚，不专门承用周代的施政措施，所以治国掺杂进暴力，到后来祸乱多次发生，也不是法度所能够防止的了。唐朝按照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这六典设立职官，用租庸调这种赋役制度向百姓收取财物，增设学校馆舍生员来培养人才，以及通过折冲府、十六卫管理军队，所谓占据重要地区驾驭次要地区，太子等五种大人物不在边境督临，具体做法也很详尽了。然而起主宰作用的朝纲不端正，昏乱的风气递相沿袭，所以治国掺杂进异族的成份，到后来变故最多，法度也多次败坏而不能抵挡住了。宋朝人重视儒家的学说，爱惜民力，用文人充任州一级的长官，用在朝廷做官定期上朝的人充任县一级的长官，用在朝廷做官定期上朝和不上朝的人监督掌管地方上的财政赋税，以及对知州起牵制作用的通判、维持本县治安的县尉这类地方官的设置，总之都是用来收回藩镇的权力。所谓统一天下，也做出长远考虑而免除后顾之忧了。可是武备很衰弱，所建成的功业也不大，国势一天比一天长久衰弱，不能够把后来的演变处理得很妥善。所以说后世君主主要是依靠法度控制维持住天下，而臣下我所讲的法度不源于大道的情况，哪里不

正确呢?据此来观看,大道存在着纯粹与不纯粹,而法度就随着走;法度存在着完善与不完善,而治理就跟着转。谁能说进行治理可以不要法度,定立法度可以不源于大道呢?

只有我朝伟大的太祖高皇帝,承当上天的眷顾和委托,用华夏取代异族统治,一个朝代典章制度的完备,真真足以同古代帝王相媲美,而开启继承帝位的神圣子孙的永久太平了。观察京师周围地区和天下各道的行政建置,皇室同宗藩国和大臣们爵位的世代袭封,在朝廷内罢废丞相一职而设立宗人府和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在朝廷外罢废元朝的行省而设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这分掌民政、刑法、军政的三司,编有大明《官制大全》来确定各自的员额,编有《诸司职掌》来确定各自的职责。责成官员们议定礼仪,吉、凶、军、宾、嘉这五礼,就具有它们的等次了。而又有《礼仪定式》各种典籍,来显示它们的品级、名目和具体的规定。责成官员们创制音乐舞蹈,祭祀天地、土地神、谷神,祭祀宗庙、举行朝廷典礼的音乐舞蹈,就具有各自的套数了。而又设有太常寺领属的各个祠祭署,来熟习具体的器乐、套数、音调和舞蹈动作。京师里设置最高学府国子监,来教导全国的英才;地方上设置府学、州学、县学,来培育民间的优秀人才。儒家经典义旨所用的统一解说固定下来,而读书人不存在稀奇古怪的说法;科举和推荐的制度施行开来,而读书人具有了连类而及、同被进用的指望。

拿音律历法来说,制订历法设有专职的官员,而农历每年同四季相比所差的时日,太阳绕黄道向西退行每隔多少年相差一度,都有精密的推算。观测天象设有观象台、灵台,而祥瑞凶兆一起占测。并且认为元朝至元十八年辛巳颁行的《授时历》,逐渐和天度不符合,于是用洪武十七年甲子这一年,开始作为历法的起算点。音律历法的精确,又该是怎么样啊!拿依次祭祀来说,大型祭祀像祭祀天地、祭祀宗庙,礼仪和用品都由太常寺掌管;小型祭祀像祭祀鬼神,品级和名目都由礼部下属的祠部做出详细的规定。厘正名山河海的神灵称号,革除前代不正规的冗滥神名。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王这类帝王的陵墓,每隔三年降一次香,祭祀他们。前代的贤臣,只用当时的官爵称呼他们。祭

祀典则的雅正,又该是怎么样啊!

认为田地赋税不均匀,这不是使民众的生计得到满足的办法。建国初期,就丈量土地,来抑制兼并;清理田亩和粮食数量,来防止奸诈虚伪的行径。并且根据土地肥沃和瘠薄的程度,决定征收赋税的轻重比例。这尽管不是古代的井田制度,不也同征收收获量的十分之一才适中公平很接近了吗?认为货币不流通起来,这不是补充国家用度的办法。建国初期,鉴于印制纸币的桑树穰这种原料到处都有,而纸币印行就特别严格;设置宝源局,而钱币铸造发行又发生变化。用茶叶换取马匹和征收盐税获得的收入,用来补助军需;商业税和渔业税的操办聚集,用来补助国家的支出费用。这尽管不是国库的剩余,不也同周朝财帛流通的九府圜法很接近了吗?

礼部按照科举的各项规定选取士子,必定要严格执行选送应试者不符合条件的处罚律条。吏部依据量才授官的各项规定选任官吏,还有众臣推举予以晋升和官员担保荐举的做法。这种选举的公正,同虞舜明察贤能、选拔举用被埋没的人,同周朝由民间选送优秀人才、予以特殊优待的盛况相仿佛。发给任职的凭证尽管有固定的日期,但决定降职罢官或提升,还要考察给予特殊表彰的典则和政绩的记录簿册。考核尽管有通常的惯例,但验核才能,还要考察在任时间的长短和所在任所政务的繁简。这种考核的严格,同虞舜九年进行三次考核、周朝以廉洁为根本的六项考核标准不相上下。

拿兵制来说,既有天子亲军上十二卫,用来保卫皇城皇宫,又有归都督府领辖的各卫,用来保卫京城。既有都指挥使司、留守司,用来守卫一方,又有所属各卫、千户守御所,用来保卫府州。况且都督府、亲军上十二卫的职掌,虽然各归各机构行使,但军政的枢机,实际上掌握在兵部。这在统领住中央主要部分、用来驾驭住地方次要部分当中,寄寓着防微杜渐的深意。这是因为我朝圣明的太祖亲身在部队中有过长期的经历,灼然了解古今的利弊,而制定出这种完善的军事制度。前人认为我朝太祖军政具有系统,这真是很有见地的论断啊!

拿刑罚来说,《大明律》的大纲有六条,而具体条款到四百六

十条为止。《大明令》的大纲也有六条，而具体条款到一百四十五条为止。这两部法典虽然沿袭唐朝法律制度而定立笞、杖、徒、流、死这五刑，但其中对存在区别的罪行加以比照、类推，简单而容易遵守，明了而容易知晓。这是因为我朝圣明的太祖按自己的想法作出裁断，务在直截了当地讲明那些事项，差不多使人容易了解而千万不触犯。前人认为我朝太祖具有古代把五刑的形状刻画在器物上、使人有所儆戒、小心慎重地动用刑罚的仁德，这真是很有见地的论断啊!

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像这样地完备，哪里是偶然达到的呢?大概在其中存在着本源了。臣下我曾经庄严地诵读过我朝圣明太祖的话语。其中说过：皇帝我探求帝王的治绩，没有比唐尧虞舜还隆盛的了。然而观察他们之间的授付和承受，正在于恰切地执持住那个最适中的尺度。还说过：君主的纯粹本心，是治国大道的根本。存于内心的东西没有唐尧虞舜那样的本心，而想施布在国政方面的东西能有唐尧虞舜那样的治绩，是无法实现得了的。真伟大呀，做君王的这番话语!不是真对古代帝王的治国大道有所获取，能像这样吗?这就难怪我朝太祖创建制度，定立法度尽善尽美，用来达到万分和美的隆盛状态，迳直和古代帝王对等并在他们之上了。

圣上的制策中又强调：古代帝王的庙宇祭祀都建立在京师内，自古以来忠臣良将大多在附祭的行列。即便是被我朝取代的元朝世祖，也获得了按次序祭祀的资格。这恐怕是因为后世的英明君主，他们在政治上也仍有可取的地方吧?关于这个问题，我朝大致从洪武六年，确定下历代帝王的祭祀序列。从伏羲氏直到元世祖，一共十六位君王。都因为他们开创国家的基业，对百姓大有功德罢了。至于像周文王，虽然为周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但到最后仍持守事奉商朝的做诸侯的节操。唐高祖虽然君临天下，但都仰赖唐太宗的功劳，所以对他们不祭祀。商朝辅臣伊尹告诫他的君主说：从太祖以下七代祖先的庙宇，可以观看出仁德来。我朝圣明的太祖按次序祭祀古代帝王的本意，不在这里吗?洪武二十一年，确定下历代名臣的陪从祭祀序列，从黄帝的辅臣风后直到元朝的赤老温，总共三

十七位名臣。都因为他们从始至终保全做臣子的节操，以及对百姓有功德罢了。并认为北宋的赵普，尽管曾有一些功劳，但实际上对宋太祖深有辜负的地方；元朝的安童，尽管确实有功勋仁德，但难和最早的功臣排列在一起，所以对他们不附祭。商代国王盘庚告诫他的臣僚说：现在我要对先王进行盛大的祭祀，你们的祖先也会一同跟着受祭。我朝圣明的太祖按次序附祭名臣的本意，不在这里吗?所以北宋程颐讲论大治，应把一切完全归功于帝王，但在后世看来，却常常显出不足来。这种说法，属于天下的公论。我朝圣明的太祖按次序祭祀，对古代的帝王一并隆重对待，同时也不把元朝遗弃在外，这是出自做帝王的宽宏大量啊!而且因为前代的功德，原本上就有应当推崇的地方，而后人引为鉴诫，也有所比照。圣明的用意，又是多么深远啊!

圣上的制策在最后有这样的话：朝远处效法古代帝王的治国大道，可眼望那治国大道却仍然还有没看见的地方；向近处恪守本朝祖宗的治国法度，可行用那治国法度却仍然还有没达到的地方。其中的缘故在哪里呢?并且希望臣下我等详明地写在答卷上，准备采择施用，来对治国有所补益。臣下我尽管愚昧浅陋，哪敢没有一句真切的话来对答，却只是进献奉承的词句说：大道已经到极点并穷尽了，治理已经是众百姓步入最高的行为准则了，法度没有再能议论的了。这偏偏不就正有理由招来背离自己所学的讥诮，而对上事负了圣明天子等待读书人、访求建议的本意了吗?

臣下我私自观察现今的天下，疆域还和过去一样，可民众生计的凋敝一天比一天厉害。官职还和过去一样，可办事效率的荒废松弛一天比一天严重。礼法音乐还和过去一样，可奢靡超越限度逐渐显露出来，协和的气象还不普遍。学校还和过去一样，可讲求道统的学问逐渐偏离，读书人的习气还不端正。音律历法精确了，可能够把各种凶兆看成是应当畏惧的现象，特向陛下陈奏的人又有谁呢?祭祀的礼典纯正了，可能够把歪门邪道看成是应当警戒的东西，特为陛下避开的人又有谁呢?田地赋税的均平还和过去一样，可法定数额之外的征收敛取没有停止的时候。货币的流通还和过去

一样，可关卡、市场收税一天比一天增多。选举的各项规章制度明摆在那里，可贤才被冷落排斥的人，尚未得到任用。考核的各项规章制度明摆在那里，可平庸拙劣却仍占据职位的人，尚未被罢免。兵制虽然没从原状予以改变，但强壮的士兵被将帅私人所役使，恩赐奖赏被有权的人所剥夺，哪里能够止除怨恨责怪的堆积呢?刑罚虽然没从原状予以改变，但一贯奸恶、死不改悔的大罪不加惩办，虚构罪名、陷害无辜的歪风尚未停息，怎么能够止息众人议论的沸沸扬扬呢?由于天下的事体每每像这样，那就属于我朝圣明太祖的法度尽管完善，但现今所留下来的东西，大概是一纸空文罢了。

孟子说:光有好法度,它也不会自动就运作起来。臣下我私下作猜测,陛下盼望治国大道,确实仍旧还有没看见的地方吧?臣下我愿意把想说的话都说完，来符合陛下所要闻知的东西，不再有什么隐讳。私下想来,帝王的治国大道太广大了,臣下我很愚昧,不能够探究到尽头。如今陛下特地拿北宋程颐的论断作为提问的内容，臣下我也恭敬地用程颐的论断作为献纳的意见。程颐的论断说：治理国家应该具有起主导作用的措施和各项制度。这也就是臣下我所讲的没有在法度以外而施行的治理。程颐还说：一定要有《诗经》中《关雎》、《麟之趾》所表达的义旨,然后可以行用《周礼》那套制度。这也就是臣下我所讲的没有在大道以外所定立的法度。陛下确实能够重视人伦纲常的起始状况,仔细对待帝王教化的开端部分,像周文王那样和和气气地在学官,即使射箭不精通的人也让他们居位再培养,这样,《关雎》所咏赞的思得贤才的那种教化,差不多也就达到了。谋求国家命运的长久延续,考虑宗庙祭祀的承接托付,像周文王倡导的那样,公子诚实又厚道,来永远保持上天对姬姓的保佑,这样,《麟之趾》所咏赞的全都遵守礼法的那种教化,差不多也就达到了。像《关雎》、《麟之趾》那样的教化已经形成,就扩展到兄弟之间,进而在贵族之家和全国起支配作用,而大道没有不纯正的,从而有理由和古代帝王相媲美,发扬光大祖宗开创的古代帝王般的隆盛治理状态,又有什么困难呢?这是陛下所应格外关注的问题,的确不在于再搞什么其他方面的对策。

臣下我跪拜希望陛下稍微垂示一下听取的目光，能够扩展仁德的心意，不认为臣下我所陈述的意见纯属谬论，而听取起来只是特分明。不认为臣下我所讲论的事体很好办，而施行起来只是下大气力。庄重恭敬畏惧的态度，不略微中断。日常的休息娱乐，和在正殿听断朝政没什么不同；对阿谀逢迎的近臣指派任用时，不要忘记正直朝臣的奏请意见。这样，大道就会纯正，法度就会完善，大治就会长久，国家便幸运到极点，天下百姓也幸运到极点。臣下我作为民间的凡夫俗子，不懂得避开忌讳，冒犯抵触了皇帝的威严，简直罪该万死。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王彦霞译〕

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辛巳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殿试策问

[正德十六年五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自古人君,临御天下,必慎厥初。而为其臣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盖国家之治忽,君子小人之进退,世道之否泰,其机皆系于此,诚不可以不慎也。然观之《诗》、《书》所载,则亦不能无疑焉。舜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首察玑衡,以齐七政,而类、禋、望、遍之并举,观天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异时协正元日,格于文祖。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惟恐或后,且进十二牧而历咨之。岂听言、用人又在所急欤?太甲元祀,祗见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是天下之政,无大于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傅说告之,尤惓惓逊志时敏之务。典学亦岂容缓欤?成王即政,周公作《无逸》,举三宗以劝之,惟以畏天爱民为主。《访落》一诗,乃又以尽下情、守家法为说。《立政》一书,又以三宅三俊为不可忽,终之无误庶狱为重。意固各有在欤?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于神宗,不旋踵会群后,誓师征苗。康王率循大下,大臣进戒,首以张皇六师为言。他务未遑,顾以兵事先之,何欤?若乃禹祇承于帝,有精一执中之传;汤黜夏命,有克绥厥猷之任。武王胜殷,访《洪范》于箕子;践阼,授《丹书》于尚父,且退而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有铭。则又万世道学渊源所自,未可以寻常政事目之也。然则人

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于是欤?

汉、唐、宋以来,其君臣之间,盖无足与于斯者。然一代之治功论议,亦不可泯。观夫求端于天之策,治审所尚之疏,尚德缓刑之书,荡涤烦苛之奏,与夫先天要说之十事,奉天罪己之一诏,元祐修德为治之十要,淳熙谨始自新之十目,皆于初政深致意焉。其与十渐之虑,五始之义,三卿序进授策之戒,指归所在,其果无大相远欤?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终始。王道之施设,固有先后。端本所以治末,谨始所以图终,施之宜先,则不可以少后。皆治体所关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众说不能以皆一欤?

朕奉天明命,嗣承祖宗大统,临御以来,厘革弊政,委任旧臣。凡夫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诸事,惟日孜孜,次第举行。取《无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语,建号纪元。方将体元居正,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特进尔多士于廷,咨以慎初之道。尔多士其尚酌古准今,稽经订史,明本末之要,审先后之序,悉意敷陈,用辅朕维新之治。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凌辱我,我也希望不凌辱别人。孔子说:赐呀!这可不是你能做得到的。

观看水有诀窍,一定要观看水的波澜怎么样。太阳和月亮都有光辉,一点儿缝隙都必定照得到。

凡是治理天下国家,存在着九条不可改变的法则,但行用它们的根源,就是一个至诚啊!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君主统治天下,必定要慎重对待刚开始这一阶段。而充任君主臣僚的人,也未尝不用慎重对待刚

开始这一阶段的有关说法来告诫君主。这大致因为国家的治与乱，君子和小人的进用与退避，世道的阻塞与顺畅，机缘全都拴系在这上面，确实不可以不慎重地对待啊！可是观阅《诗经》、《尚书》的记载，也不能就没什么疑问在里头。虞舜在正月初一这天，在唐尧的祖庙接受帝位的禅让。首先观察北斗七星的运转定律，来统一制定四季和天、地、人这七项政务。而祭祀天帝的类祭，祭祀天地四时的禋祭，祭祀高山大川的望祭，祭祀群神的遍祭，全都举行。观察天象，交接神灵，这是日常政务本来就应放在第一位来进行的。到尧去世以后，又在守完三年国丧的正月初一，来到唐尧的祖庙。向四方诸侯首领询问国家大事，开辟东西南北四门，扩大视听，唯恐在有的方面做得不及时，并且把十二州的君长召来，逐项与他们谋划。想必是听取建议，任用合适的人选又属于优先解决的事情吧？商朝的太甲，在即位元年，主持商汤的丧礼。辅政大臣伊尹明确地讲述商汤成就开国大业的美德，来向新王进行训导。这表明，统领全天下的大政，没有比效法祖宗更重要的了。殷高宗恭谨沉默，思索大道。辅政大臣傅说来作训告，特别强调要顺从求善的本心，对这一点要非常敏感迅速。由此看来，始终常念学习，又哪里容许往后放呢？周成王亲自执掌朝政，周公作《天逸》，列举殷中宗、殷高宗和祖甲这三个在位时间都很长的国王来勉励周成王，只把敬畏上天、爱惜百姓作为最根本的东西。《访落》这首诗，却又拿下面的想法全都反映上来、恪守祖宗传下的法度进行说教。《立政》这篇经文，又认为按照政务、治民、执法三个方面的标准任用贤才担当职务决不能够忽视，最后强调要把不错判案件看得很重要。它们的义旨原本上就各自具有落脚点吧？不过还有可疑的地方：大禹在虞舜的祖庙接受帝位的禅让，紧接着把天下诸侯召集到一起，誓师讨伐三苗。周康王即位，按成王的遗嘱，要完全遵循国家的大法，而大臣进献应当警戒的问题，却首先用壮大王室军队来作建议。其他政务都来不及顾上，却把用兵整军的事情放在第一位，这是为什么呢？至于大禹对尧舜二帝恭敬地予以承顺，有精心一意执守那最适合的尺度的传授。商汤废除了夏朝统治天下的权力，列有能够安稳住大道教化的国王职责。周武王灭掉了商朝，向商朝

遗臣箕子访求《洪范》;登上王位,从尚父吕望那里接受《丹书》,而且回到王宫后在几案上、坐席上、酒杯上、食器上、刀上剑上、门扇上、窗户上,无不写有箴铭。这就又是万世道统学问的本源所产生的地方,不能够用一般的政事来看待它。既然如此,那么,君主慎重对待刚开始这一阶段的原则与方法,果真有什么在这范围以外的吗?

汉朝、唐朝、宋朝以来,在这些朝代的君臣之间,恐怕没有足以能够进入古代那种圣明行列的。可是作为一个朝代的治理功绩和讨论治国的意见,也不能够泯灭掉。观看向皇天求取端由的对策,治国要审慎对待所崇尚目标的章疏,崇尚仁德把刑法往后放的上书,扫清琐细苛刻的奏章,以及先天年间君臣有约在先这才陈述的十项政事,在奉天城发布的罪责自己的一道诏书,元祐年间关于修明仁德施行治理的十项要务,淳熙年间关于谨慎对待初始阶段、自我更新的十个事目,全都对刚登帝位的政务深切予以关注。它们和君主产生十种演变情况的忧虑,五种初始笔法的经典含义,三卿按顺序进见新王授付给新王受命文书的诫语,主旨意向所在,彼此间果真没有相差很远的地方吗?人间事体有本原和末梢,事物道理有起始和结局。帝王治国之道的施布安排,本来就有先后。端正本原是用来治理末梢,谨慎对待起始是用来图谋结局。施布应当有放在前面的,那就不可以缺少后面的。这都是和治国体统关系特重大、不能够随便对待的问题。为什么众多的说法却不能完全一个样呢?

皇帝我奉受上天的显赫嘱托,继承祖宗统治天下的统绪,登上帝位以来,整顿革除弊政,委任原来的大臣。凡属敬奉上天,效法祖宗,修明仁德,致力朝政,访求贤才,采纳谏言,讲求儒学,穷尽义理,节约财用,爱惜民众等项大事,每天都十分努力,按次序全面施行。特意选取《无逸》中"嘉靖殷邦"这句话,建立年号,作为纪年的起算点。正准备体察初始状态,遵循正道,来谋求同《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帝王兴盛光明的大治盛况相媲美。特地把你们这些众多的读书人宣召到殿廷,用慎重对待初始阶段的做法进行询问。你们这些众多的读书人还要斟酌古代,衡量当今,考察经典,订正史籍,明了原本和末梢的要点,审核先后的次序,完整详尽地叙说陈述,来辅助皇帝我那国

运一派新气象的治理。

杨维聪　殿试对策

杨维聪(1500～?)　字达甫，号方城，顺天固安(今属河北)人。正德十六年(1512)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后迁太子中允，历任山西、山东布政使，官至太仆寺卿。嘉靖十九年(1540)退休。

臣对：臣闻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酌其因革，制其缓急，足以周天下之务，立天下之纲，是谓治法。根于躬行，原于心得，使其出之而有本，运之而不穷，是谓心法。治法不善，则施为注措之间乖谬舛错，必无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或未端焉，则科条虽具，品式虽详，亦弥文粉饰，而未必征之实事。勉强一时，而不能持于悠久，虽欲言治，皆苟而已。故心法存于内，以为之本；治法施于外，以为之用。本端而末治，体立而用行，斯为治不易之常道也。况人君临御之初，天命眷顾方新，人心向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机，胥此系焉。所以慎其初而图其终者，可不加之意邪？是故得心法而举治法，三代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纯，而治法亦有所未备，三代以下之所以治不古若也。然则今日慎初之道，奚有外于是二法哉！

钦惟皇帝陛下，睿哲天挺，仁孝夙成，昔潜藩邸之时，已系元元之望。一旦龙飞虎变，御极当天，宵旰孜孜，厉精图治，任耆旧之臣，厘积习之弊。天下之人，莫不延颈举踵，观政听风，思见德化之成。臣以草茅，首蒙赐对，虽至愚陋，不足仰承休德，而喜庆之深，敢不掇拾旧闻，对扬清问之万一？

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机焉。识治势者，乘其机以为之，则力不劳而功成。所谓机者，初是也。盖临御之初，好恶未著，虽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唯左右观望，一有隙焉，即投以所好。人君唯好之徇也，于是溺其所可乐，忘其所可惧，而后彼得以肆，天下之事将遂愤焉，以至于不可为。诚自其初谨之，不堕于小人之计，小人亦洗心涤虑，唯正之趋矣。是故识其机者，慎其初；不慎其初，不识其机也。

识其机，则国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进，世道由之而泰。不识其机，则治者忽，进者退，泰者否矣。其关系岂小小哉！太甲初嗣位，伊尹告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成王初营洛，召公告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自古人君临御天下，率以慎初为事。臣之贤者，亦未尝不以慎初之说告之也。臣请稽经订史，因圣制所及者条陈之。

舜初摄位，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而观天之道尽；类上帝，禋六宗，望山川，遍群神，而交神之礼举。及其即位，询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务进贤以决壅蔽之患。且进十二牧，而历以五事咨之，务用人以赖辅理之益。伊尹作《伊训》，明言列祖之成德，以训太甲。盖逆知其欲败度，纵败礼，颠覆汤之典刑，故以法祖为说。高宗以交修命傅说，说告之曰：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则以君德既修，然后大臣可举其职也。周公作《无逸》，以训成王，举殷中宗、高宗、祖甲畏天爱民之事，欲其知小人之依，以为祈天永命之本。成王朝庙听政，思先人顾托之重，乃作《访落》一诗，延群臣以尽下情，率昭考以守家法。《立政》一书，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贤才之道，始以宅俊为不可忽，而终之以无误庶狱为重。使王尤知刑狱之可畏，必专有司牧夫之任，而不以己误之也。

若夫禹受命神宗，不旋踵会群后，誓师征苗。康王率循大下，召公进戒，首以张皇六师为言，似若忽内而重外者。然圣人之治，固不因外以废内，亦不因内以遗外。有苗弗率，民弃不保，禹承舜命，安得不征之！然班师振旅，诞敷文德，卒格于干羽两阶之化。周至康王，三叶矣。承平既久，玩惕随之。老臣爱君，得不以张皇六师为戒？且张皇云者，亦有国之常政。军伍藏于井甸，陈法讲于蒐狝。巡边四征，寓于巡狩，会同儆军，实阅器械，严纪律而已。非若后世守文者以兵为讳，喜功者则又穷兵黩武之为也。

夫三代以上之君，临御之初，莫不急所先务，其治法可谓举矣。至其心法之所存，则尤致意焉。是故“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禹之祗承于帝也。“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汤之自任于己也。武王之始克商也，访《洪范》于箕子。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

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其始践阼也，又访《丹书》于太公，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乂胜欲者从，欲胜乂者凶”；退而几席、觞豆、刀剑、户牖，莫不有铭。夫武王之皇极敬乂，即成汤之绥猷；成汤之绥猷，即禹之执中。心法之相传，精神之相契，有以开万世道学之渊源。立政非此，无以为立之之本；宰事非此，无以为宰之之要。慎初之道，莫有先于此者，可以寻常政事目之哉！

自是而后，若汉、若唐、若宋，不足与于斯矣。安马上之习者，不事《诗》、《书》；修玄默之德者，崇尚黄老。投戈讲艺，息马论道矣，溺心图谶之说；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矣，专为章句之习。以至锐情经术，而阉门惭德；延礼文儒，而声色荒心。曰心无邪曲，顾任智谋以成功；曰重道崇儒，至指道学以为党。心法之传，寥寥乎未有得也。故其为治法也，或驳焉而不纯，或行焉而有所不尽。然当时群臣之所论议，深有可取者。董仲舒对策于武帝之初，曰王者求端于天，欲人君任德不任刑。匡衡上疏于元帝之初，曰治天下者审所尚，欲朝廷崇礼而教让。宣帝刑名绳下，路温舒以尚德缓刑劝之。章帝承永平后，陈宠以荡涤烦苛劝之。汉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无能以行之也。

玄宗开元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说，曰政先仁恕，曰不幸边功，曰法行自近，曰宦竖不与政，曰罢赋外之征，曰戚属不任台省，曰大臣接之以礼，曰群臣得犯忌讳，曰绝营造，曰推鉴戒。德宗奉天之难，陆贽劝下罪己之诏，曰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痛心腼面，罪实在予。使狂将悍卒闻之，无不感激挥涕。唐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行之而不尽也。

吕公著当哲宗之初，尝上十事于朝，则畏天也，爱民也，修身也，讲学也，任贤也，纳谏也，薄敛也，省刑也，去奢也，无逸也。朱熹当光宗之初，拟上十目于朝，则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纲纪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宋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元祐行之而不终，淳熙拟之而未上。故当时之治，卒莫能底于善也。

由诸臣之建白观之，虽言人人殊，其视十渐、五始、三卿序进授策之戒，指归所在，亦无大相远者。盖魏徵十渐之虑，以太宗初寡欲而今市骏马，初护民而今用人力，初役己而今纵欲，初亲贤而今近奸，初贱异物而今进难得，初求士而今任好恶，初绝田猎而今事驰骋，初达群情而今多间隔，初求治而今恃势，初抚宁而今劳弊，所以虑不克终也。五始之义则《春秋》之法，必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元者气之始，春者四时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国之始。荀况所谓三卿序进授策，则天子即位，上卿进除患为福之戒，而授一策；中卿进先事虑患之戒，而授二策；下卿进敬戒无怠之戒，而授三策。所以欲人君慎于始也。盖与诸臣之所建谨始图终者，一矣。

夷考上下数千年间君臣图治之说，既有所谓心法，又有所谓治法。而其为治法之说，又或天或祖，或君或民，或内或外，或彼或此，棼然其不能齐，何也？天下之理固有大分，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故以心法对治法言之，心法，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又于治法之中，以事之大且急者对事之小且缓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谨始以图终，其施设之序，心法固所当先；而治法之大且急者，亦奚容以或后？圣君贤臣唯有见于此，执中绥猷，《洪范》、《丹书》，与夫典学之说，修身讲学之说，正心齐家之说，直指乎心法之源。而其他政事之说，亦就治法之中，因其时之所宜，据其势之所至，顺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又奚必其词之同哉？

臣窃伏观陛下践阼之初，责成辅臣，奖纳台谏。凡弊政之所当革者，革之无不尽；凡旧章之所当遵者，遵之无不笃。其于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诸事，固次第举行之矣。励精之实，发于即位之一诏；中兴之志，著于嘉靖之纪元。凡在覆载之间稍有血气之属，莫不以殷宗、周宣为望。乃犹不自满假，于圣制之终曰：方将体元居正，以求俪美《诗》、《书》所称帝王熙明之治。欲臣等悉意敷陈，以辅维新之化。即此观之，臣有以知陛下必为殷宗、周宣无疑矣。臣之所以为献者，亦惟愿不失此机而已。何则？数年以来法度废弛，天下之事已极于弊。陛下一起而新之，百官承德者日奋，人心望

治者方切，此祈天永命之时，可以有为之会也。乘此机以为之，矢去川决，殆无难者，在陛下加之意而已。

近世人君，孰无愿治之心？然或卒不逮焉，岂皆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慎也。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则心法、治法，乌可不加意哉！是故精察一守以执中，肇修人纪以绥猷，逊志时敏以典学，建皇极以叙九畴，戒怠欲之胜敬义，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齐家，则心法得之矣。克谨天戒以畏天，鉴于成宪以法祖，亲贤远奸以致治，早朝晏罢以勤政，明明扬侧以求贤，虚怀受言以纳谏，节财以制国用，爱民以固邦本，慎刑宪以恤人命，诘戎兵以防边患，则治法得之矣。有心法以为治法之本，有治法以为心法之用，本末不差，先后有序，而谓美不俪于《诗》《书》，治不隆于熙洽，岂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虽然，非初之难，而终之难也。陛下以慎初为问，臣既陈之矣。至于图终之说，臣敢复为陛下言之。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未有一时之息，健故也。唯其健也，故四时万物，皆得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强之健，于天少不似焉，则几成而复坏，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谓健者，非血气之谓，又以心为之本。陛下诚求之心，日御经筵，讲求至理，以学养此心；整齐严肃，主一无适，以敬存此心；延见公辅，亲近儒臣，随侍便殿，时备顾问，以君子维持此心。则圣心湛然义理为之主，而物欲不能夺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终之足患哉！伏惟陛下深留圣意，以无失今日之机，以无负今日之望，以无忝今日改元之意，则生民幸甚，宗社幸甚。臣干冒天威，无任战栗殒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统治天下，既有治国大法，又有治心大法。斟酌那些应该沿袭和变革的地方，裁制那些次要和紧要的东西，足够用来全面处理好天下的事务，确立起天下的总纲，这叫做治国大法。从亲自践行上做起，源于自己的内心所得，让它显现出来而有根基，运作起来没有止境，这叫做治心大法。治国大法不完善，在施行措置之间就荒谬背理，错乱偏离，必定无法形成大治。如果治

国大法很完善了，治心大法有的还没有端正，法令条规尽管都建立起来，等级标准尽管详尽，但也只是进一步繁杂摆样子，却不一定就在实事上得到验证。勉强维持一时，但不能持续到长久。即便打算讲论大治，也都属于糊弄局儿而已。所以治心大法存留在心里，作为根本；治国大法施布在外面，作为表现形式。根本端正了，末梢就得到治理了；本体确立起来了，施用就推行开来了。这是进行治理的不可改变的大道啊！况且君主登上帝位的起始时刻，天命的眷顾正和从前不一样，人心的向往期待正殷切，大治和败乱、阻塞和顺畅的机缘，都在这上面拴系着呢！慎重对待刚开始的这个阶段，谋划将来的结局，其中的关键能够不予以高度注意吗？所以获得到治心大法而全面推行起治国的大法，这是夏商周三代以上治理天下特完美的原因。治心大法不纯正，而治国大法也存在着欠缺的地方，这是夏商周三代以下治理天下不如古代的原因。既然如此，那么，现今慎重地对待初始这个阶段的具体途径，哪里还有在这二法以外的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聪颖明智，天生就很突出，仁厚孝敬，很早就已形成。过去在藩国官邸潜身的时候，已经系结住黎民百姓的期望。一旦像龙飞上天空，像虎变得发威，登上帝位，万分辛勤地料理朝政，孜孜不倦，励精图治。任用资历最深的大臣，革除积久成习的弊病。全天下的人，没有谁不伸长脖颈，抬起脚跟，观看国政，探听消息，特别想看到仁德教化的成功。臣下我凭借民间普通百姓的身分，第一次蒙受恩赐让对答策问。尽管愚昧浅陋到极点，不足以仰承皇上的美好德惠，可喜庆非常深，哪里敢不拾取从前的说法，对答称扬圣上虚心询问的万分之一呢？

臣下我想起来，君主治理天下，存在着机缘。明察治理形势的人，乘这机缘来进行治理，就会力量下得不大而功业可以成就。所谓机缘，就是刚开始的这个阶段。这大致因为，帝王即位初始，喜好和厌恶什么还没有显露出来。尽管有邪僻谄媚的臣僚，一下子也不敢兜售他们那套奸恶的玩意儿，只是左右观望，一有可钻的空子，就把君王所喜好的东西投合上去。君主只是对自己所喜好的东西一味顺从，于是沉溺在那些能欢乐的事情中，忘记了那些应畏惧的问题，然

后那帮家伙得以肆无忌惮，天下的事体，眼看就败坏下去，以至于不可收拾。果真从起始阶段就谨慎对待，不陷入小人的诡计之中，小人也清除掉邪恶的心念，只往正道上奔了。所以洞察那机缘的人，慎重地对待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不慎重地对待刚开始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洞察不出那机缘啊！洞察那机缘，国家就由此得到治理，君子就由此得到进用，世道就由此变得顺畅。洞察不出那机缘，就治理变成败乱，进用变成隐退，顺畅变成阻塞。它所关系到的问题，哪里是非常细小呢？商朝太甲刚继位，辅臣伊尹就告诫说：如今国王您继承先王的德业，没有什么不在这初始阶段的。周成王开始营建洛邑，召公告诫说：你刚执政，这就如同新出生的孩子，成功失败都在这个时候，自己必须选择明智的道路走下去。自古君主统治天下，都把慎重对待起始阶段看得非常重要。臣像中贤能的人，也未尝不用慎重对待起始阶段的说法告诫君主。臣下我请求考察经典，订正史籍，按照圣上的制策中所涉及的问题，逐项陈述它们。

虞舜刚代行天子的职权，就观察北斗七星的运转规律，来统一制定四季和天、地、人这七项政务，而执政要观测天象的常规做到了极限。祭祀上帝，祭祀天地四时，祭祀高山大川，祭祀群神，而执政要与神灵沟通的礼仪全面举行。等到他正式登上帝位，向四方诸侯的首领询问国家大事，开辟东西南北四门，明察四方的情况，听取四方的呼声，务必要进用贤能来冲掉阻隔蒙蔽的危害。并且把十二州的君长召来，逐项用衣食、安民、行德、斥退小人，远方归服这五事同他们谋划，务必要任用合适的人选，依赖他们取得辅助治理的益处。商朝伊尹制作《伊训》，明确地讲述先祖商汤成就开国大业的美德，来训导新继位的太甲。这是因为已经推测到太甲将会纵欲毁败法度，放纵毁败礼法，把商汤的典制倒过来，所以用效法祖宗进行说教。殷高宗拿怎样多方面修养好自己来让辅臣傅说作训导，傅说告诫说：必须要学会顺从那求善的本心，对此非常敏感迅速，自身的道德修养就会自然到来。这番告诫显然认为君主的道德已经修养好，然后大臣才可以履行好他的职责啊！周公制作《无逸》，来训导周成王，列举殷中宗、殷高宗、祖甲敬畏上天、爱护民众的事例，目的是让周成王了解百姓

所依赖的东西，作为祈求上天永远赐予统治权的根基。周成王朝拜宗庙，开始亲自执政，思虑先王遗嘱托付的重大责任，于是创作《访落》这首诗，召见群臣来使下面的想法全都反映上来，遵循英明父王的成规来恪守自家的大法。《立政》这篇经文，周公拿任用贤才的原则与方法来告诫周成王，首先强调按照政务、治民、执法这三个方面的标准任用贤才决不能忽视，最后强调要把不错判案件看得很重要，使成王特别了解到刑狱可畏，必须让主管机构和牧夫官有职有权，而不因为自己却做出错误的判决来。

至于大禹在虞舜的祖庙接受帝位的禅让，紧接着把天下诸侯召集到一起，誓师讨伐三苗。周康王按照成王的遗嘱，完全遵循国家的大法，而召公进献应当警戒的问题，首先用壮大王室军队来作建议。这乍看起来好像是忽视内政而重视外务。然而圣人治理天下，原本就不因外务来荒废内政，也不因内政来遗弃外务。三苗不顺服，百姓们抛弃它，上天不保佑它，大禹承受虞舜的命令，哪里能不征讨它?但班师整顿军队，广泛施布文德，最后达到了在宾主堂阶之间演出文舞予以感召的那种教化。周朝传到康王，经历三代了。太平的时间既已长久，贪图安逸、荒废岁月的现象就冒出来了。像召公那样的老臣爱护新君，能不用壮大王室军队作为告诫吗?况且壮大军队这类话，也属于拥有国家的人都要处理的政事。在周朝，军队寄寓在按井田划分的政区居民中，阵法在春蒐、秋狝这类打猎活动中演练。巡视边境和四种征讨，寄寓在天子视察天下的活动中。诸侯朝见天子，儆戒部队，查检兵器装备，这都是使纪律严明罢了。并不像后世用文教保持已有基业的君主把军事作为隐讳的东西，也不像好大喜功的君主又穷兵黩武之类的举动。

夏商周三代以上的君主，在登上帝位的起始阶段，没有谁不把应当先解决的政事放在第一位来处理。他们的治国大法可以称得上是全面施行了。至于他们治心大法的存寄，就更加予以关注了。所以“人心只是危险，道心只是微妙难明，精意专一，恰切地执持住那最为适中的尺度”，这是大禹从虞舜那里恭敬地承受下来的箴言。“只有那皇天上帝，对人间的百姓降下人人都具有的善良本性。顺从这种

本性，能够确立起大道的教化，这才是做帝王的方法”。这是商汤对自己确定的本身所该承担的职责。周武王刚刚灭掉商朝，就向商朝遗民箕子访求《洪范》。第一条叫做水、火、木、金、土这五行，第二条叫做恭敬地处理好举止、言语、观看、听闻、思索这五事，第三条叫做努力处理好农业生产、货币流通、祭祀、工程、民政、刑法、酬宾、军队这八项政务，第四条叫做协调地使用年、月、日、星辰、历法这五种纪时方法，第五条叫做建立起至高无上的准则，第六条叫做运用好使人正直、硬性制服、柔和战胜这三种治理方法，第七条叫做明辨是非而使用好解决疑难的占卜及商讨的具体办法，第八条叫做用心考察各种吉兆和凶兆，第九条叫做用长寿、富足、平安、好德、善终这五福来劝人为善，用早亡、生病、多忧、贫困、丑恶、虚弱这六极来戒人作恶。周武王登上王位，又向太公吕望访询《丹书》。《丹书》上讲：“恭敬能制服懈怠的人，就吉利；懈怠能制服恭敬的人，就灭亡。道义能制服私欲的人，就求吉得吉；私欲能制服道义的人，就凶咎”。回到宫中，武王在几案和坐席上，酒杯和食器上，刀上和剑上，门扇和窗户上，没有一处不写下箴铭。周武王的最高准则、恭敬和道义，也就是商汤的确立起大道的教化；商汤的确立起大道的教化，也就是大禹的那个最为适中的尺度。治心大法递相传授，精神实质彼此符合，有理由开启了万世道统学问的本源。定立起国政除去它，就没有什么能成为定立国政的根本；主持政事除去它，就没有什么能成为主持政事的关键。慎重对待起始阶段的原则与方法，没有比这更占首位的了，能够把它当成一般的政事来看待吗？

从此以后，像汉朝，像唐朝，像宋朝，不足以进入到这个境地里了。对骑马征战感到很习惯的汉高祖，却不过问《诗经》、《尚书》。修养好沉静德性的汉文帝，却崇尚黄帝老聃无为而治的学说。东汉光武帝放下武器，讲习儒术，止住战马，讨论大道，但却把心思沉溺在神秘预言这类说法中。东汉章帝像对待父亲、对待兄长那样事奉德高望重的老学者了，但却专门形成了用分章析句来解说经典意义的习气。以至于唐太宗锐意经学，却在家庭内部的两性关系上有愧道德。唐玄宗延揽礼遇文雅的儒士，却迷恋歌舞女色。宋太祖说起来心中

没有不正当的念头，但却专用智谋来获取成功。宋宁宗说起来重视大道，推崇儒学，竟至指斥道统学问为伪学逆党。治心大法的传授，少得可怜，没有什么心得。所以这些君主施行起治国大法来，有的驳杂而不纯正，有的行用却有不彻底的地方。但当时群臣的议论，却深深具有可取的。董仲舒在汉武帝执政初期对答策问，倡言做帝王的要向皇天求取端由，这是想让君主专用仁德而不专用刑罚。匡衡在汉元帝执政初期献上奏章，倡言治理天下的人要审慎对待所崇尚的目标，这是想让朝廷崇尚礼法而促进仁让。汉宣帝用循名责实来控制臣下，路温舒用崇尚仁德、把刑法往后放来劝谏他。东汉章帝承续明帝永平之后，陈宠用扫清烦细苛刻来劝谏他。汉代的臣僚对新政用心到这种地步，可惜他们的君主没有能付诸实施的。

唐玄宗开元初年，姚崇拿十项政事同玄宗约好后才做陈述。第一项叫做：施政把仁厚宽恕放在首位；第二项叫做：不侥幸边境取得武功；第三项叫做：法令先从近臣执行；第四项叫做：宦官不参预朝政；第五项叫做：罢免法定赋税以外的征敛；第六项叫做：皇帝国戚不出任中央最高机构的长官；第七项叫做：对大臣以礼相接；第八项叫做：群臣可以触犯忌讳；第九项叫做：停止营建佛寺道观等处所；第十项叫做：特地把汉代外戚专权作为鉴戒。唐德宗被藩镇叛军赶出京师，在奉天城受围攻，陆贽劝说下达罪责自己的诏书，说是皇天在上面谴责，可我却不醒悟；世人在下面怨恨，可我却不清楚。既痛心，又羞惭，罪过实际都在皇帝我身上。致使狂妄骄悍的将领和士兵听后，无不感动挥泪。唐代的臣僚对新政用心到这种地步，可惜他们的君主付诸实施却不实施到底。

吕公著在北宋哲宗执政初期，曾向朝廷奏上十宗事体，也就是敬畏上天，爱惜百姓，修养好自己，讲求儒学，任用贤能，采纳劝谏，少收赋税，减省刑罚，去除奢侈，不贪图安逸。朱熹在南宋光宗执政初期，准备向朝廷奏上十个事目，这就是讲求儒学来端正心志，修养好自身来整治好家庭，疏远逢迎谄媚的小人来接近忠诚正直的臣僚，抑制私恩来振扬公道，究明义理来杜绝神灵之说的干扰，选择师傅来辅佐皇位继承人，精审地对待选拔任用事宜来宣明国家的体统，振扬纲纪来

激励社会的风尚，节约财物用度来巩固国家的根基，修明政事来驱逐异族。宋代的臣僚对新政用心到这种地步，可惜元祐年间付诸施行却中途而废，朱熹在淳熙年间拟列出来却未奏呈，所以当时的治理状态，到最终也没能达到完善。

从各位名臣的建议来看，尽管提建议的人，每个人的建议都不一样，但比照起十种演变情况、五种初始笔法、三卿按顺序进见新王授付给新王受命文书的诫语，主旨意向所在，也没有相差太远的地方。大概魏征所指出的十种演变情况的忧虑，是因为唐太宗起初欲望很少，可如今却求购骏马；起初爱惜百姓，可如今却动用人力；起初克制自己，可如今却放纵情欲；起初亲近贤良，可如今却亲近奸邪；起初轻视奇异的物品，可如今却搜罗难得的东西；起初访求贤士，可如今却任从自己的喜好和厌恶乱来；起初戒绝围猎，可如今却致力围猎；起初让各方面的意见都反映上来，可如今却大多阻隔；起初谋求治理，可如今却凭仗威势；起初抚育安定百姓，可如今却役使消耗民力。出发点都是担心不能够保持到最后啊！五种初始的义旨属于《春秋经》的著述法则。必定在鲁国十二公的开篇处写上“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这样的字眼，是因为“元”字，代表元气的起始；“春”字，代表四季的起始；“王”字，代表接受天命的起始，“正月”二字，代表政治教化的起始；“即位”二字，代表一个国家的起始。荀况所讲的三卿按顺序进见新王授付给新王受命文书，是指上卿进呈消除祸患就是福分的诫语，授付给新王第一道受命文书；中卿进呈在事前就考虑祸患的诫语，授付给新王第二道受命文书；下卿进呈恭敬戒惧、不要懈怠的诫语，授付给新王第三道受命文书。目的都是想让君主对初始阶段慎重对待啊！这大致上和历代各位臣僚所建议的谨慎对待初始阶段，谋求保持到最后，是同一个意思了。

考察上下数千年之间君臣谋求大治的主张，既有所谓治心大法，又有所谓治国大法。而那些施用治国大法的主张，又有的强调敬奉上天，有的强调效法祖宗；有的强调君主要修养好自身，有的强调要爱护百姓；有的强调治理好内部，有的强调处理好外务；有的强调在那方面努力，有的强调在这方面用劲儿，杂乱而不能够统一。这是为

什么呢?天下的道理原本就存在着最主要的方面,但在其中,又各自存在着区别。必定要划分开而有根据地把那些精粹之处梳理得一样不缺又不杂乱,然后合起来而有根据地把那些重要方面全都包括在内又无遗漏。所以拿治心大法相对于治国大法来说,治心大法属于人间事体的根本,事物道理的起始。在治国大法里面,拿重大并且要先办的事务相对于细小并且可以后办的事务来说,重大并且要先办的事务,属于人间事体的根本,事物道理的起始。统治百姓的人,打算端正根本来治理末梢,谨慎对待初始阶段来谋求保持到最后,有关安排解决的次序,治心大法理应占居第一位,但治国大法中属于重大并且要先办的事务,又怎么能容许暂且往后放,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臣僚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而执持那最为适中的尺度,确立起大道的教化,《洪范》、《丹书》,以及始终不忘学习的说法,修养好自身和讲求儒学的说法,端正心志和整治好家庭的说法,迳直指向治心大法的本原。而其他有关政事的说法,是依凭当时所应那样做,根据形势所达到的火候,随顺道理的所在,特指重大并且要先办的事务来讲的,又为什么必定要各自的言词都相同呢?

臣下我私自跪拜来观察,陛下在登上帝位的初始阶段,就命令辅政大臣处理好朝政,奖励采纳谏官的意见。凡属弊政应当改变的,改变起来无不十分彻底。凡属原有制度应当遵行的,遵行起来无不特别恳切。对于敬奉上天,效法祖宗,修明仁德,致力朝政,访求贤才,采纳劝谏,讲求儒学,穷尽义理,节约财用,爱惜民众等项大事,固然已经按次序全面施行了。振奋精神的实际行动,在即位的那道诏书中焕发出来;使国家再度强盛的志向,在用"嘉靖"作年号上显现出来。凡是生存在天地之间稍微有点儿血气的人,没有谁不把陛下当作殷高宗、周宣王来期盼的。可陛下仍然不自满自大,在圣上的制策末尾说:正准备体察初始状态,遵循正道,来谋求同《诗经》、《尚书》所称述的帝王兴盛光明的大治盛况相媲美。由此希望臣下等人完整详尽地叙述,来辅助国运一派新气象的教化。就此来观看,臣下我有理由知道陛下必定会成为殷高宗、周宣王而毫无可疑了。臣下我进呈对策的目的,也只是期望不失掉这机缘而已。为什么呢?数年以来,

法度荒废松弛，天下的事体已经败坏到极限。陛下一下子振兴而使它焕然一新，百官承顺德业的人一天比一天昂奋，内心盼望大治的人正特别殷切。这是祈求上天永远赐予统治权的绝好时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际运风会。乘此机会来施展，像利箭射出去一样，像大河冲开堵塞物一样，恐怕没有什么难实现的地方，全在陛下预以格外关注罢了。

近代的君主，谁不怀有大治的心愿？然而有的却到最后实现不了，这哪里是力量不足呢？也只因初始阶段没慎重对待啊！陛下准备谋求慎重对待初始阶段的原则与方法，那么，治心大法和治国大法，怎么能不格外预以关注呢？因而察照精意、恪守纯一来执持住最为适中的尺度，制订做人的准则来确立起大道的教化，顺从人的善良本性并对此敏感快捷来始终不忘学习，建立起最高原则来铺展开九条大法，警惕怠懈、私欲制服住恭敬、道义，端正心志来修养好自身，修养好自身来整治好家庭，这样一来，治心大法就获得到了。能够恭谨地对待上天的谴告来警畏上天，从已有的功业和法度中汲取经验来效法祖宗，亲近贤良、疏远奸邪来达到治理，提前上朝、很晚退朝来致力朝政，识别贤明的人并把他们从被埋没的地方提拔到显要位置来求取贤才，虚心接受意见来采纳劝谏，节约财物来料理好国家的用度，爱惜百姓来巩固国家的根基，慎重使用刑罚来体恤人的性命，整治好军队来防备边境的祸患，这样一来，治国大法就获取到了。有治心大法作为治国大法的根本，有治国大法作为治心大法的运用，本末不偏离，先后有次序，却认为美政不能同《诗经》、《尚书》所称述的情况相提并论，治理不会隆盛到和谐光明的地步，哪里还成道理呢？慎重对待初始阶段的原则与方法，就像这样罢了。尽管如此，并不是开始做起来难，能够保持到最后才真难呢！陛下用慎重对待初始阶段来进行策问，臣下我已经做陈述了。至于谋求保持到最后的说法，臣下我敢再为陛下讲论它们。

《周易》上说：天体运行刚健，君子加以效法，自强不息。天体的运行，今天转一圈，而明日还转一圈，没有一刻的止息，这是因为刚健的缘故。只因它刚健，所以四季和万物，都能够沿着它的顺序，实现

各自的生存状态。假使君子自强方面的刚健劲儿，和天稍微有点不相像，那就会眼看成功却又毁坏，还没持久却已经止息，还靠什么来实现那大治呢？然而这里所说的刚健，并不是指血气而言，又把心志作为根本。陛下确实从心志上求索，每天都驾临御前经史讲席，讲论研求最深的道理，用学习养护这心志；端整齐楚、庄重肃正，紧紧操持住专一，不往别处想，用恭敬存留这心志。以礼召见辅政重臣，亲近儒臣，让他们跟从陪侍在便殿，随时供顾视问讯，依靠君子维持这心志，就会圣心深沉地把义理作为主宰，而物质欲望不能够夺走那刚健，也就像天一样了。又有什么不能保持到最后的忧虑呢？跪拜只恳请陛下深深倾注圣明的心愿，不丧失掉当前的机缘，不辜负当前的众望，不愧对现今改年号纪元的本意，这样百姓就幸运到极点，国家幸运到极点了。臣下我抵触冒犯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陆钺　殿试对策

陆钺(1494～?)　字举之，号少石子，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正德十六年(1521)榜眼，授翰林院编修，时年28岁。锐志问学，磨砺名节。曾预修《武宗实录》，与胞兄陆铨一起议争大礼。历任湖广按察佥事、山东按察副使。所到之处倡行人伦纲常，区分义利，使士人风气为之大变。撰有《贤识录》、《病逸漫记》、《少石集》等。

臣对：臣闻帝王之为治也，固当谨天下之大几，尤当图天下之先务。夫人君临御之初，理乱安危之所关，天下之大几也。大几不谨，则无以致维新之治而弭未形之患，其流弊将有不可胜言者。苟徒知大几之谨，而于施为措置之间，或失其轻重缓急之宜，错然而举，冥然而行，则天下之先务，日就于废弛。而吾方役于其所不急者，虽弊精神，劳智力，亦何裨于治哉？夫大几，天下之难察而易忽者也；先务，天下之难操而易失者也。故善图治者在知微，善谨始者在知要。知微则必能明理乱之原，识安危之故，察其大几而谨之。知要则必能审轻重之

权，酌缓急之势，操其先务而图之。夫如是而后，天下之事无不理，天下之治无难为矣。自古圣帝明王所以致熙明之盛，及我国家所以久安长治、匹休隆古而非汉唐宋之可及者，端岂外是哉？

钦惟皇帝陛下，以元圣之德，膺历数之归，龙飞潜邸，嗣登宝位。天下臣民孰不翘首而望，拭目而观，以冀沾被新化乎！而陛下奋励精明，更张振饬，举十数年之遗奸积弊，一旦而荡刷焉。中外人心，翕然归之，太平之治，可立致矣。而犹不自满假，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谆谆以慎初之道为言。臣伏而读之，有以知陛下求治之心之切矣。臣虽至愚，敢不敷陈一二以对扬休命乎？

臣闻人君犹天也。天有四德，元为之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天道之运行也，元气一息，则四时忒而万物不得其生矣。人君之治也，不正其始，则庶政隳而万民不得其所矣。《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谓天之正始也。又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谓君之正始也。正始之说，非臣所谓谨几之说乎！盖事有萌朕，物有肇端。治不生于治，必有所以为治之先；乱不生于乱，必有所以为乱之原。其来也甚微而易忽，而其发也恒至于不可御，此几之谓也。况人君即位之初，天命之去留未定，人心之向背无常，君子小人之进退，方属于观望兴止之间。慎之则足以开治，不慎则足以致乱。此其几之所系尤有大焉者，顾可以少忽哉？唐虞三代之君无不致谨于是，而当时为之辅佐者，亦莫不以慎初之说进，盖曰几不可忽而已。试举《诗》、《书》所载者陈之。

舜当摄位之日，首察玑衡而七政以之齐，类禋遍望而群祀无不饬。盖观天交神，事至重者，固不可废也。至于即位之后，询岳辟门，明目达聪，以来天下之贤；进十二牧，博咨治理，以纳天下之善。盖听言用人，政之急者，亦不容后也。太甲祗见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为训，岂非以纵欲之念潜萌，而颠覆之行将作，法祖所当先乎？高宗恭默思道，傅说以逊志时敏之务以为劝，岂非以荒野之遁方旋，而甘盘之学几废，典学不容缓乎？成王嗣位，周公辅之。《无逸》一书，述三宗享国之道，惟以畏天命、勤民事为主；《访落》一诗，致延访群臣之意，乃以尽下情、守家法为说。而《立政》一篇，则又始之三宅三俊，

以明贤才之当用;终之庶狱庶慎,以明民命之当恤。无非以幼冲之主易溺于怠荒,故忧勤之训时切于警戒耳。

乃若禹受命于神宗,而誓征有苗;康王率循大卞,而召公劝以张皇六师。说者以正位凝命之始,不为平易安静之谋,而乃急急于干戈之逞。殊不知苗民悖逆,天怒人怨,势不容以不征。而康王继承平玩弛之后,固宜先之威武,以肃其颓惰不振之风。岂若后世务穷黩以疲其民者哉?夫以古之帝王,同一致治之法,同一求治之心,其于慎初之道,宜无不同者,顾事势所遭,不能无轻重缓急之殊,故见诸施为,亦因有先后彼此之异。要之皆所以急天下之先务,所以谨天下之大几也。异时风动之休,永赖之泽,允德之克终,殷邦之嘉靖,文武之业绵长而不坠,谓非其明效欤?

臣又闻之,帝王之治,其施之固有序,而其出之必有本。先后缓急之得其宜者,序也;躬行心得之根于内者,本也。序之说显而易知,本之说微而难究。昔者禹陟元后,舜之所以授之者,不过精一执中之数言。汤黜夏命,诞告万方,首以克绥厥猷为己任。武王访《洪范》于箕子,而皇极大中之道明,则在于下车之初;授《丹书》于尚父,而敬怠义欲之辨严,则在于践阼之日;且退而铭其几席觞豆、刀剑户牖之属,以为规戒警训之具。昔人所谓闻铭盘之风而兴起者也。夫数圣人以心法相授受,以道义相讲明,言之若迂而不切,而实为圣学之渊源;守之若约而易穷,而实为治化之根本。是诚不可以寻常政事目之也。

自是而降,言治者必曰汉唐宋。惜乎当时之君,德性近似者,或歉于学力之不足;学力可观者,或病于德性之未纯。其于帝王之所以讲明而传授者,概乎未之有得。是以驳杂之政治,徒狃于一时;浅鄙之事功,相望于后世。其不能追踪唐虞三代之盛,何怪哉!若其君臣之间一时议论,或有关于治道之要,而可以为慎初之助者,不容少焉。

以汉言之,求端于天之策,推天道之阴阳,以明德刑之先后,董仲舒为武帝陈之矣。而卒无救于酷吏之风,穷兵之害,岂多欲为累者不能用其言耶?治审所尚之疏,示朝廷之趋向,以端风化之本原,匡衡为元帝言之矣。而卒无补于威令之衰,国政之紊,岂优柔不断者不能果于行耶?宣帝综核太严,而刑法之尚有余,于是路温舒有尚德缓刑之

书。其所谓省法制而宽刑罚，真救时之急论也。明帝苛察太甚，而含弘之度不足，于是陈宠有荡涤烦苛之奏。其所谓广至德而奉天心，真忧国之昌言也。

以唐言之，玄宗初政，姚崇以十事要说，曰政先仁恕，曰不幸边功，曰法行自近，曰请罢贡献，曰戚属不任台省，曰近习不预政，曰接下以礼，曰批鳞犯讳，曰绝道佛营造，曰以前代为鉴。卒至治成开元，刑罚几措，盖有以致之也。使帝能终用其言而不忘，则天宝之乱何从起耶？奉天解围，德宗下诏以罪己，曰生于深宫而暗于国务，曰上累祖宗而下负烝庶，曰天谴不悟而人怨不知。卒使强兵悍将闻之涕泣，盖有以感之也。使帝能长存是心而不失，则建中之治宁止是耶？

以宋言之，元祐初吕公著被召入对，首陈为治之十要，则所谓畏天也，爱民也，修身也，讲学也，任贤也，纳谏也，薄敛也，省刑也，去奢也，无逸也。异时扫除新法而光复至治，老成持重之论，其有裨于时政亦多矣。淳熙间朱熹为崇政说书，草奏自新之十事，则所谓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纪纲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异时党锢方禁而正学见黜，道德义理之言其不容于时好，可知矣。夫自汉历唐，以至于宋，上下数千余年，其君臣议论之称者仅止于是，况又有言之而未用，或用之而未尽者，岂不深可慨哉？

又尝观魏徵十渐之疏，则以太宗仁义之志渐不克终，若所谓访求珍怪，侈用民力，纵欲以劳人，远正以近邪，贵异物而作无益，疏守道而容谗佞，以驰骋为乐事，以细过诘群臣，穷兵远裔而不恤，役民劳敝而不知，皆不克终之渐也。何休五始之义，盖本诸《春秋》之旨。所谓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四时之始也；王者，受命之始也；正月者，政教之始也；即位者，一国之始也。荀况三卿序进之说，则谓上卿进除害以为福，中卿进先事以虑患，下卿进儆戒以防祸，皆于天子即位之始而授之策也。合三子之言而观之，十渐一疏，拳拳以图终为虑；五始三策，皆若专于谨始者。要之谨始正为图终之地，而图终实由谨始之功。其与汉唐宋君臣之议论，立言虽殊，指归何尝不同哉！

陛下稽往牒，总众说，以策多士，固知非徒试以记问之学也，第欲臣等细绎而折衷之，采其可行者以为新政之助耳。臣愚以为，人君一身，百责攸萃，天下之事，岂能悉举？要在择其所当先者图之而已。况家承大坏极弊之后，害之当除者，不知其几也；利之当兴者，不知其几也。于此不审其权之轻重，酌其势之缓急，徒按古人之成迹概施焉，将见政方举于上，而谤已生于下，利未兴于前，而弊已随于后。窥间伺隙者，得以乘机而入；观德望风者，皆将束手而退矣。岂臣之所望于陛下者哉？臣尝究之《诗》、《书》之所载，参之历代之议论，酌之当今之时宜，以求所谓先务者，诚不出乎圣制所及敬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数者而已。夫是数者，陛下盖已行之无余矣。臣请复条陈之。

窃惟人君其尊无敌，故无所畏。其所畏者，惟天。彼肆意怠荒者曰：是不足畏耳。臣愿陛下钦崇其道而不忽，祗承其命而不违，察灾祥以励修省之诚，慎政令以时奉顺之道，出人起居无非天则，动静语默无非天理，则所以敬乎天者尽矣。祖宗者创基业以遗后人，万世子孙当视以为法则。彼逞志纷更者曰：是不足法耳。臣愿陛下念不忘不忘之训，躬善继善述之孝，一令之布必遵成宪，一政之施必由旧章，不恃其聪明而轻为变易，不逞其意见而妄为更张，则所以法乎祖者尽矣。

德者，致治之本。德隆则治从而隆，德污则治从而污，盖自古不易者。臣愿陛下存省之功，交修于动静；充养之力，不间于显微。端人正士为吾德之资者，亲之惟恐或后；便佞憸壬为吾德之害者，斥之惟恐不严。如是而德有不休者，未之有也。勤者，为政之要。一日而理万几，一身而总万化，诚不容自逸者。臣愿陛下未明而求衣，不狃于晏安之逸；日晏而退朝，不惮于烦难之苦。日修天下之事，而计其所当举者有几，所当废者有几；日稽天下之人，而审其所当用者为某，所当去者为某。如是而政有不理者，未之有也。

贤才者，国家之利器。然必上有好贤之诚，而后下有效用之忠。臣愿陛下重爵赏以致其来，委心腹以重其托。每于科目常选之外，使天下郡县皆得各举其所知。而又咨询博访，必期于荐举之公；拔擢推

用，不限于流品之拘。则天下之贤才，无不群汇而集，乐于见用矣。谏官者，朝廷之耳目。然必上有受谏之明，而后下有敢谏之勇。臣愿陛下绝壅蔽以开其路，容狂直以表其忠。又于台谏章奏之外，许天下臣民皆得自陈无隐。言之可用者，既用之以诱其乐言之心；其不可用者，亦恕之以作其敢言之气。则天下之忠直，无不闻风而起，敢于进谏矣。

人主不务讲学，则无以知致治之道，而其所谓讲学，亦非徒以涉猎记诵为高者。臣愿陛下游神于帝王之术，笃意于圣贤之学。载籍之所讨论者，必关心法之渊微；儒者之所启沃者，必求道德之奥妙。用心于内而不眩于外，求得乎己而不徇乎人，庶乎其有裨焉。人主不务穷理，则无以明天下之故，而其所谓穷理，亦非徒以荒唐幽怪为尚者。臣愿陛下聪明不施于无用，格致惟谨其大端。人伦庶物之宜，察之必极其精；土俗民情之变，推之必欲其悉。舍其华而必摭其实，探其本而不遗其末，庶乎其有得焉。

财者，国之命脉也。而用之恒苦旋不足，是未有以节之耳。臣愿陛下敦朴素之行，革华靡之风。豪右之横求无厌，必裁之以禁其贪；冗员之尸素日盛，必汰之以防其滥。而又量出入以为节制之度，严勾考以清费出之经。则财日以丰，而国之命脉不亏矣。民者，邦之根本也。而抚之恒不能得其心，亦未有以爱之耳。臣愿陛下轸念于黎元，推恩于海隅。西北之民疲于力役，则轻徭以息之；东南之民困于征求，则薄敛以苏之。而又慎循良之选，以布其泽；黜贪酷之吏，以除其害。则民得其所，而邦之根本日固矣。由是天下先务无不举，而天下之大几无不谨。所以凝天命，收人心，转移世道而成维新之化者，不在是乎？

虽然，陛下以慎初之道下询，臣亦以慎初之说复之，然臣复有深虑者焉。盖天下之事，善始则易，克终恒难。《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书》曰：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故更张可喜之治，识者方以为忧；而终始惟一之训，忠臣先事进戒。谓克终之难也，凡终之所以不克者，其端有二：曰志之不决、力之不充是也。志不决则疑心生，力不充则怠心生。疑心生则沮，沮则为而无成；怠心生则弛，弛则成而易

败。故甘露之谋不就，而肃清之志遂衰；符离之役一溃，而恢复之意已荒。此所谓疑心沮之也。焚裘示俭者，志侈于平吴之后；连屏列箴者，功隳于克蔡之余。此所谓怠心弛之也。夫数君亦英辟，其初非不慨然有志于治，而其终之弊一至于此！疑怠之为害，不亦甚可畏哉？

陛下践阼以来，推心旧臣，厘革弊政。迩者诏令颁布，裁冗官，清近习，罢无名之征，弛不急之务，利无不兴，害无不除。非陛下志之决，力之充，亦安能断然行之无所顾虑哉！然戒敕之歌，尝作于无虞之世；《卷阿》之咏，恒陈于有道之主。自古君臣交相儆戒，其道固如是耳。况陛下既圣而不自圣，已治而求进于治，此臣所以窃敢过为之虑。志已决而恐其疑之或生，力已充而惧其怠之或作，拳拳以数君为戒，岂亦忧治世、危明主之意耶？

臣尝反复思之，而得其故矣。人主所以御天下者，惟一心而已。使其心之所存，能纯乎天理之正，而无所谓私欲者参之，则疑怠何从而生？惟其心之汩于欲，而未能纯乎理也，是以宴安之私，不免胶固于其中，谗佞之言，得以摇惑于其外。虽有英明果断之资者，亦不自知其疑怠之萌，以至沦没于荒淫骄惰之中而不可救。此其势则然也。今陛下诚欲绝疑怠之心，以全始终之德，以垂久大之规，亦于正心之道加之意焉耳。

正心之道无他，即圣制所谓体元居正，所谓数圣人道学渊源而已。盖体元则能以仁存心，而私意无所萌于内；居正则能端养此心，而邪僻无以乘其外。而又懋精一之训，以察此心之危微；体缉猷之意，以全此心之降衷。皇极之道求之《洪范》，使不流于偏倚；敬义之说由之《丹书》，使不溺于放肆。自大廷以至深宫，而临便致察；自广众以至独处，而随时加谨。务使中外莹彻，纯乎天理之正；表里洞达，绝无人欲之私。则道明于内，而志之所向者决，疑心为之释矣；气完于外，而力之所施者充，怠心为之消矣。疑心释者，行之所以益果也；怠心消者，业之所以不衰也。由是利之兴，必足以垂无穷之泽；害之除，必足以防未然之患。无朝令而夕改，无进锐而退速。功成治定之后，不变其励精图始之规。夫是谓之全始终，夫是谓之垂久大。夫然后可以祈天命于无穷，固民心于有永，闻太平于万世。嘉靖之休，真

有光于纪元之意；熙明之治，将无忝于《诗》、《书》之称。而区区汉唐宋，俱陋下风矣。

臣学非博古，知不通今，仰承圣问，聊述愚衷。首以谨大几、急先务为说，而复以正心之论终之，诚若迂远而不切者。然帝王出治之大本，终亦不外乎是。而臣愚，平生之所得力者，亦不能舍之不言，以负吾君，负所学也。伏惟陛下留神，少垂采纳焉。臣干冒天威，不胜殒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进行治理，原本就应该谨慎地对待天下的重大转机，更应该谋划天下的首先要解决的大事。君主登上帝位的起始阶段，关系到治乱安危，这属于天下的重大转机。重大转机不谨慎对待，就没办法实现国运气象一新的治理，消除掉处在萌芽状态的祸患，它那相沿而成的弊病将会出现说不过来的情况。如果光知道重大转机要谨慎对待，而在筹划裁制和安排部署之间，有的地方失去了轻重缓急的合理次序，杂乱地加以施布，暗昧地加以推行，天下首先要解决的大事也就会一天比一天陷入荒废和松弛。而我们正在那些并不紧切的事务上忙得团团转，即使耗费精神，付出很多的心思和气力，又对治理能产生什么益处呢？重大的转机是天下难以觉察出而又容易忽略过去的东西，首先要解决的大事是天下难以掌握住而又容易丧失掉的东西。所以善于谋求大治的人，在于了解隐微之处；善于谨慎对待起始阶段的人，在于了解要领所在。了解到隐微之处，就一定能够明了治乱的本原，看出安危的缘由，洞察出重大的转机来谨慎对待它。了解到要领所在，就一定能够审辨轻重的灵活处断，斟酌缓急的态势，掌握住首先要解决的大事来谋划它。像这样去做以后，天下的政事就没有不得到整治的，天下大治也没有难于做到的了。自古以来圣帝明王实现和美清明的隆盛局面，以及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同隆盛的古代相媲美，决非汉朝、唐朝、宋朝所能够赶得上，原因又哪里恰恰是在这个范围之外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凭仗大圣人的品德，承当起帝位承接次序的归属，在真龙潜藏的藩王府第飞升到天空正中，继承并登上了

皇帝的宝座。全天下的臣僚和百姓,谁不仰起头来瞻望,擦亮眼睛观看,希望蒙受到道德焕然一新,每天都提高的教化呢?而陛下奋扬精诚和聪明,改变老套子,振作并整顿,把十多年遗留下的坏事和积弊都包括进来,一下子予以荡涤和洗刷。朝廷和各地的人心,不约而同地归服,天下太平的大治景象,可以马上实现了。但陛下仍然不自我满足,特意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从高处赐给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十分殷切地把谨慎对待起始阶段的做法作为话题。臣下我跪拜敬读它,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谋求大治的心愿的迫切了。臣下我尽管愚昧到顶了,敢不陈述一两条来对答称扬美好的圣命吗?

臣下我听说,君主就如同上天。上天具有"元、亨、利、贞"亦即起始和亨通、有利、正直这四种德性,而"元"构成它们的首位。登上皇帝宝座,这是君主的起始阶段。天道运行,如果元气一旦止息,四季就会颠倒错乱而万物获取不到它们的生存了。君主治理天下,如果不端正起始阶段,各项政务就会毁败而百姓们获取不到他们的适当安置了。《易经》上说:真盛大啊!上天的元气!万物靠它才得以化生,于是它就统领上天。这是讲上天要端正它的起始阶段啊!《易经》上还说:太阳每天都升起落下,上下四方的方位于是形成,依据时机驾着六条龙拉的车子去驾驭天道。这是讲君主要端正他的起始阶段啊!端正起始阶段的说法,不是臣下我所讲的谨慎地对待转机的说法吗?因为事情都有萌发的迹象,万物都有个开端。治绩不是从治绩中产生出来的,必定存在着用来进行治理的先兆;祸乱不是从祸乱中产生出来的,必定存在着用来制造祸乱的本原。它们的来由特别隐微,最容易忽略过去;但它们爆发开来,常常发展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这就是所说的转机啊!何况君主刚刚登上帝位,上天的意向是抛弃他还是交付给他,还没有确定下来;世人的心愿是归向他还是背离他,还没有固定下来;君子和小人为他效力还是不为他效力,正处在观望起居之间。谨慎对待它就足够用来开启治绩,否则就足够用来造成祸乱。这是转机所关系到的更为重大的问题,反而能够稍微忽略它吗?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无不在这上面多加谨慎小心,而当时作为他们的辅佐的大臣,也没有谁不用慎重对待初始阶段的说法来进

献。这大致上是强调转机决不能忽略罢了。尝试着列举《诗经》、《尚书》所载录的东西来为陛下做个陈述。

虞舜正值代行天子职权的时候，首先观测北斗七星的变化定律，而四季和天、地、人的政务依靠它而协调好。临时祭天报告大事，祭祀天地四时，遥望拜祭名山大川，按尊卑次序祭祀各处神灵，而各类祭祀的礼节无不得到修明。这是因为观察天象、沟通神灵是最重要的事情，压根就不能够废止啊！直到登上帝位以后，咨询四方诸侯的长官，开辟明堂四门，明察四方情况，听取四方意见，来招纳天下的贤才。把十二州的长官召请到朝廷，广泛询问治理天下的道理，来采纳天下的好建议。这是因为听取言论、任用贤才是最紧迫的政务，也不容许往后拖啊！商朝第二代国王太甲恭敬地拜祭他的祖父成汤，辅政大臣伊尹明确向他称述功业盛大的成汤成就功业的德行，作为训导，难道不是因为太甲放纵情欲的念头暗中萌发，而毁败国家的行为眼看要表现出来，因此应把效法祖父放在首位吗？殷高宗恭敬沉默，思索大道，辅政大臣傅说用顺从学习古训而求善的心志，务必时时勤勉来做劝导，难道不是因为殷高宗刚从民间体验百姓疾苦回到朝廷之上，而向贤臣甘盘所学的学问几乎荒废，致力于学问不容许往后拖吗？周成王继承王位，周公辅佐他。而《尚书·无逸》这篇文书，叙述商朝中宗、高宗、祖甲在位长久的办法，只是把敬畏天命、勤于民事作为主导方面。《诗经》中《访落》这首诗，表达延请并向群臣求教的义旨，终竟把全面了解下面的想法，执守自家的法度作为主张。而《尚书·立政》这篇文章，又开始讲执政官、民事官、司法官和具备这三个方面能力的贤才，用来表明贤才应当任用；最后讲各种案件的审理和各种应当慎重处理的事务，用来表明百姓的性命应当体恤。这无非是因为年龄还小的国王容易陷入懈怠荒淫，所以忧惧和勤勉的训导经常要拿来向他们敲警钟罢了。

至于大禹在虞舜的祖庙接受帝位的禅让，举行军队誓师，去讨伐三苗；周康王完全遵守先王法度，而召公用壮大王室直辖部队来做劝导。对此加以评论的人认为在端正本位、聚合天命的起始阶段，却不拿出平和简易、安定镇静的谋划，竟然对武力的施用特别迫切。这种

看法唯独不明白三苗部族对抗背叛，天怒人怨，势必不容许不去讨伐。而周康王处在太平时间很长、虚度岁月和松弛成风的局势后面，压根就应当把威势武力放在首位，去肃正那种衰颓懈惰不振作的习气。这哪里像后代致力于穷兵黩武来让百姓疲劳不堪的君主呢？凭借古代帝王同一种实现大治的方法，同一种谋求大治的心念，他们在慎重对待初始阶段的准则上，理所当然地没有不相同的地方。但事势所赶上的情况不同，就不能不出现轻重缓急的区别，所以表现在筹划部署上，也因而具有先后彼此的差异。总之，都是用来把那天下首先要解决的大事放在前面来解决，都是用来谨慎对待天下的重大转机。到后来尧舜时天下闻风响应的美好局面，大禹那万世永远依赖的恩泽，商汤那诚信的德行能够坚持到底，众多邦国的美善安定，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功业延续长久而不衰落，能说不是明显的效验吗？

臣下我又听说：圣帝明王的治理，施行起来原本就具有次序，而拿出具体步骤必定具有根本。先后缓急获得到合适的安排，这就是次序；身体力行而心有所得并植根在内心的东西，这就是根本。有关次序的讲法很明显，容易了解；有关根本的讲法却很微妙，难以彻底阐清楚。从前大禹当上天子，虞舜用来传授给他的东西，只不过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几句话。商汤灭亡夏朝，传告天下各地，首先把能够实现安定民众的谋划作为自己的重任。周武王向商朝遗臣箕子访求《洪范》，而天子确立行为最高准则、十分恰到好处的治国大道搞得很清楚，这发生在灭商回到国都的最初时刻。由尚父姜子牙向他授付《丹书》，而恭敬与懈怠、义理和人欲的辨别特别严正，这发生在正式登上王位的当天。而且回到王宫，在案几、坐席、酒杯、盛食物的器皿、宝刀、宝剑、门板、窗户这类物品上刻下铭文，作为规正戒惧和警惕训导的东西。这就是前人所说的闻听在接水的铜盘上刻下铭文的风气就振作昂奋啊！这几位大圣人用治心大法递相授付和承接，用大道和适宜的对策彼此讲论阐明。说起来好像很迂腐而不切合实际，但事实上属于圣人学问的渊源；执守起来好像很简单而容易都掌握住，但事实上属于治理和教化的根本。这的确不能够用一般的政事来看待它们啊！

从此以后，讲论大治的人一定要谈汉朝、唐朝和宋朝。只可惜当时的君主，德性与古代帝王相近似的，有的却在学力上存在着不足的缺陷；学力很可观的，却在德性上存在着不纯正的毛病。他们对于古代帝王用来讲论阐明和传授的东西，一律没有什么收获，所以仁政中夹杂着暴力的政治，只是在一个时期内习以为然；肤浅鄙陋的事功，在后世一宗接一宗。他们不能够追踪尧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盛况，还有什么可责怪的呢？至于他们君臣之间一时间的议论，有的却同治国之道的要领相关联，可以作为慎重对待初始阶段的帮助，不能够小看。

拿汉朝来说，从上天那里求取开端的对策，推究天道的阴气和阳气的关系，来宣明仁德和刑罚哪个应在前、哪个应在后，董仲舒已经为汉武帝陈述它们了。但最终对当官就当酷吏的风气和用尽一切武力的害处也没有什么挽救。这难道不是欲望众多成为拖累的君主不能够采纳董仲舒的主张吗？治理要明辨所崇尚的对象的奏疏，旨在标示朝廷的意向来端正风俗教化的本原，匡衡已经为汉元帝做了说明了。但最终对威严政令的失效和国家政务的紊乱也没有什么补益。这难道不是优柔寡断的君主不能够在施行上很果断吗？汉宣帝循名责实太严厉，而对刑法的崇尚太过份，在这时路温舒有崇尚仁德、把刑罚放在第二位的上书。上书中所说的简化法令制度并放宽刑罚，真是救助时世的紧切论断啊！东汉明帝苛刻要求臣下太厉害，而含容的度量不广大，于是陈宠有去除一切烦细苛刻的奏疏。奏疏中所说的扩展最高的仁德又尊奉上天的心愿，真是忧虑国家的美好言论啊！

拿唐朝来说，唐玄宗刚登位执政，姚崇用十件事情并通过约定好保证实行的方式来进说。叫做施政把仁德和宽恕放在第一位，叫做不侥幸取得边境用兵的战果，叫做法度行用从自己身边的人首先做起，叫做请求停止让各地对皇室贡献珍奇物品，叫做皇亲国戚不担任御史台和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的长官，叫做皇帝所宠爱的身边人不参预朝政，叫做按礼节接待臣下，叫做容许无所顾忌地规谏，叫做禁绝道观佛寺的修建，叫做把前代做为鉴戒。结果到最后大治局面在开元年间形成，刑罚几乎搁置起来不动用，这恐怕是确有原由才达到的啊！假使唐玄宗能够一直行用姚崇的建议而不遗忘，那么天宝年间的

大动乱又会从哪里发生呢?在奉天解除了叛乱藩镇对自己的围困,唐德宗下达诏令来自责本人有罪,说是生长在深宫却对国家政务不了解,说是往上给祖宗丢了人,往下辜负了众百姓,说是对上天的谴责闹不明白,对世人的怨恨搞不清楚。最后使强硬的士兵和凶悍的将领听到以后,个个泪流满面,这恐怕是确有原因感动他们啊!假使唐德宗能长久保持住这种心念而不丧失掉,建中年间的治理哪里仅仅就局限在这种地步呢?

拿宋朝来说,哲宗元祐初年,吕公著被宣召入殿对答时政得失,首先陈奏进行治理的十项纲要,这就是所讲的:要敬畏上天,要爱护百姓,要修养好自身,要讲求圣人的学问,要任用贤才,要听取规谏,要减轻赋税,要简化刑法,要去除奢侈,要不贪图安逸。到后来完全废除王安石的新法,恢复最完美的治理状态,这种老成持重的意见,对当时的朝政太有补益了。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担任崇政殿说书这一职务,起草了准备上奏的君主要自我改变精神面貌的十件大事。这就是所讲的:讲求圣人的学问来端正心念,修养好自身来整顿好家族,疏远献媚讨好的人来亲近忠诚正直的人,抑制按自己的喜好对某人的恩赏来扶持公正的准则和做法,明了义理来禁绝神灵之说的干扰,选择少师、少傅来辅导皇太子,精详地选拔任用官员来显示出国家的体统,振作起朝廷纲纪来激励社会的习尚,节省财政支出来巩固国家的根本,修明各种政事来驱逐敌寇。到后来朝廷对所谓结成同党不许再做官正惩罚得十分严厉,而正统的学说遭到排斥,道德义理的讲法不被时俗的喜好所接受,由此也就可以闹明白了。从汉朝经过唐朝,一直到宋朝,上下数千余年,它们的君主和臣僚之间的议论值得称道的东西,也仅仅就限定在这几样上,况且还存在着言说了却未采用,采用了又不彻底的情况,难道不深深可以为他们感到慨叹吗?

又曾观看唐朝魏徵关于十种逐渐演变的奏疏,认为唐太宗行用仁义的心志逐渐不能保持到最后,像其中所讲的:四处搜求珍禽异兽,过度地使用民力,放纵情欲来让百姓劳苦,疏远正人君子来亲近邪恶小人,看重奇异物品而营建一些毫无益处的玩艺,疏远持守正道

的人而容忍进谗言、献媚讨好的人，把跑马打猎当成是快乐的事情，用微小的过失来诘责群臣，往远方用尽一切兵力而不体恤，把民众役使得劳苦凋敝却不知道，这都是不能坚持到底而逐渐演变的表现啊！东汉何休提出的“五始”的大义，是依据《春秋》的主旨。经文中所讲的“元”字，属于元气的起始；经文中所讲的“春”字，属于四季的起始；经文中所讲的“王”字，属于君主接受天命的起始；经文中所讲的“正月”二字，属于政治和教化的起始；经文中所讲的“即位”二字，属于一个国家的起始。战国荀况关于三位卿士按等级顺序进献训导言辞的讲法，是讲上卿进献除去危害来变成福佑的训导言辞，中卿进献事先做筹划来避免后患的训导言辞，下卿进献敬畏戒惧来防止祸乱的训导言辞。这些训导言辞都是在天子刚即位的时候把写好的简册授付给他。综合魏徵、何休、荀况这三个人的言论来做观察，“十渐”这道奏疏，十分恳切地把谋求坚持到最后做为考虑，“五始”和“三策”，都是对谨慎对待起始阶段专门作强调的。总之，谨慎对待起始阶段恰恰是谋求坚持到最后的基础，而谋求坚持到最后实际上正是通过谨慎对待起始阶段所下的功夫。这与汉唐宋三朝君臣之间的议论，尽管在说法上有区别，但主旨又何尝不一样呢？

陛下考察从前的典籍，综合各种说法，来策问众多的读书人，原本上就清楚不光是用记诵古书中的杂说难题来测试他们，只是希望臣下我等人细细进行推究，加以折衷，采择那些可以行用的东西，来作为使国政焕然一新的佐助罢了。臣下我愚昧地认为，君主一个人是各种责任所聚集的地方，而天下的事情，哪里能够全都推行开来？总之在于选择其中应当首先解决的大事来筹划它们罢了。况且国家承接在败坏得十分严重、弊病达到极点的后面，危害应当去除的，不知道有多少种；利益应当兴用的，不知道有多少项。在这个时候不审断灵活处置的轻重，不斟酌具体态势的缓急，只是按照古人的已有做法去全面地施用，将会眼看着朝政刚在上面推行，而诽谤已经在下面产生了。利益在前面还没兴用起来，而弊病已经在后面紧跟上来了。暗中在钻空子的人，得以乘机钻进来；观望仁德和发展态势的人，都将束手隐退了。这哪里是臣下我对陛下所期盼的情形呢？臣下我曾

经探究《诗经》、《尚书》所载述的内容，参照历代的议论，斟酌当今的合适对策，去探求所讲的首先要解决的大事，确实不超出圣上制策中所谈到那几项之外，即敬奉上天，效法祖宗，修明仁德，勤于政务，求取贤才，接受劝谏，讲求学问，穷尽事理，节省财物，爱护民众而已。这几项大事，陛下已经实行并没有遗漏了。臣下我请求再逐项陈述它们。

私下想来，君主至尊无上，所以没有什么畏惧的对象。他所畏惧的对象，只有上天。那些肆意懈怠荒淫的君主却说：这也不值得畏惧罢了。臣下我希望陛下恭敬地尊崇天道而不忽视，虔诚地承奉天命而不违背，察辨奇异的天象来勉励修身反省的诚意，慎重对待政令来切合按季节加以奉从随顺的定律。出来进去和日常起居没有不是依从上天的准绳的，行动静止和说话沉默没有不是符合上天的道理的。这样一来，敬奉上天的做法就达到极点了。祖宗创建基业，用来留给后代。万世子孙应当做比照，当成法则。那些随便按自己的想法进行多方面变更的君主说：这不值得效法罢了。臣下我希望陛下牢记不出差、不遗忘的古训，亲身履行善于继承的孝行，一道命令的发布，必定要遵守已有的法典和事例；一项政事的施行，一定要依据原来的规章。不依仗那聪明就轻率地进行改变，不逞用那不满意的想法就狂妄地加以变动。这样一来，效法祖宗的做法也就达到极点了。

仁德是实现大治的根本。仁德隆盛，治理也就跟着隆盛；仁德昏暗，治理也就跟着昏暗。这是自古以来无法改变的定律。臣下我希望陛下存留省察的功夫，在行动和静止时交相修明；充实和涵养的力气，在显现和隐微时都不中断。端庄正直的人士可以成为我那仁德的依靠的，亲近他们唯恐落在了后面。献媚奸巧的小人能够成为我那仁德的危害的，斥退他们唯恐不严切。像这样而仁德还有不美好的，这是世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勤勉是推行朝政的关键。君主每天要处理繁重的政事，一个人要总领各种化导，确实不容许自我安逸。臣下我希望陛下天还没亮就让人把衣服送上来，不对无事可做的安逸习以为常；太阳偏西才从朝廷上退下来，不对烦细艰难的苦处感到畏缩。每天修明天下的政事，考虑需要推行的该有多少项，需要废止

的该有多少项。每天考核天下的人才，仔细分辨应当任用的是哪个人，应当罢免的是哪个人。像这样而朝政还没有处理好的，这是世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贤才是国家的锐利器具，然而必定要上面具有喜好贤能的诚意，然后下面才有效力供使用的忠心。臣下我希望陛下加重爵位封赏，吸引他们来到；把重要职位交给他们担任，表示对他们的重托。时常在科举考试固定选取之外，让天下各个郡县都要分别荐举他们所了解的人才。同时又广泛咨询访问，一定要实现荐举公正；提升使用，不被类属和品级的束缚而限定住。这样一来，天下的贤才就无不按类别成批地聚集到一起，乐意被朝廷使用了。谏官是朝廷的耳朵和眼睛，然而必定要上面具有接受劝谏的圣明，然后下面才有敢于规谏的勇气。臣下我希望陛下去除掉堵塞和蒙蔽现象，开辟他们启奏的道路；容忍狂妄正直的人，表彰他们的忠诚。同时在御史和谏官的章奏之外，允许天下臣民都有权自做陈奏而把话全都讲出来。意见可以采用的，就采用它来诱导提意见的人乐意提意见的心思；不能采用的，也宽恕他来振作起提意见的人敢于提意见的勇气。这样一来，天下忠诚正直的人们就无不听到风声就起来响应，敢于进献谏言了。

君主不在圣人的学问上花气力，就没有根据能够了解实现大治的原则与方法。然而所说的讲求学问，也并不是只把涉猎到和记忆住、背诵出作为高明。臣下我希望陛下在圣帝明王的治理谋略中运用神思，对圣人贤人的学问特别留意。典籍上所讨论的问题，必定要关注治心大法的精深隐微之处；儒士所启发滋润的东西，必定要探求道德的深奥精妙之处。在骨子里运用心思而不被外部的事物弄得眼花缭乱，追求自己确有收获而不随顺别人。这样就差不多真有补益了。君主不在穷尽事理上花气力，就没有办法闹明白天下的缘故。然而所讲的穷尽事理，也并不是只把荒诞不经、幽秘怪异作为值得夸耀的玩艺。臣下我希望陛下不把聪明耗费在没有用处的事物上，穷尽事物的道理只是特别看重那些大的方面。人伦纲常和一般事物的合适做法，察识它们一定要精详到极点；各地风俗和民间情况的变化，推究它们一定要做到十分明悉。舍弃那些浮华的东西必定要采选出

那些实际的东西，探寻它的根本而又不遗漏掉它的细枝末节。这样就差不多真有收获了。

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然而一动用，经常就对紧接着不够用感到很苦恼，这是没有合适的办法来节省开支罢了。臣下我希望陛下促进朴素的行为，革除浮华奢靡的风气。地方豪强对普通民户蛮横索取而没有满足的时候，一定要制裁他们来禁绝他们的贪婪；多余的官员白领俸禄不干事一天比一天严重，一定要淘汰他们来防止他们造成超编。同时又计算收入和支出来作为节省和抑制的标准，加强帐簿的查验和注销来理清费用花销的规章。这样一来，财政就会一天比一天宽裕，而国家的命脉就不亏缺了。民众是国家的根本，然而安抚他们却经常不能够获取到他们的拥护，这也是没有适当的办法去爱护他们罢了。臣下我希望陛下对黎民百姓深切加以体念，推广恩惠到天涯海角。西北地区的民众被徭役弄得很疲劳，就减轻徭役让他们得到休整；东南地区的民众被赋税弄得很发愁，就减轻赋税让他们感到宽舒。同时又慎重对待好太守、好县令的选任，来施布朝廷的恩泽；罢免贪婪残酷的地方官，来消除他们给朝廷带来的危害。这样就民众获得到各自的适当安置，而国家的根本就一天比一天稳固了。由此而天下首先要解决的大事没有一项不施行开来，而天下的重大转机也没有一处不谨慎对待了。用来凝聚起天命，收拢住人心，使世道转换而形成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的教化，不在这里吗？

尽管如此，陛下用慎重对待初始阶段的做法来往下面询问，臣下我也用慎重对待初始阶段的说法做了对答，然而臣下我还有深深感到忧虑的东西。因为天下的事情，起始阶段做得很好是容易的，但能够坚持到最后却经常是很难的。《诗经》上说：没有谁起初会不好的，可却很少有能够好到最后的。《尚书》中也说：那仁德不保持长久，天下因此就灭亡。所以进行变革而让人感到很惊喜的治理方式，有见识的人正把它作为值得忧虑的事情。而由始至终只是保持那专一仁德的古训，忠臣在事先就进献上去来做告诫。这是认为能够坚持到最后是很难的呀！凡属坚持到最后往往做不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这就是志向不坚决，力量不充沛。志向不坚决就会产生怀疑的想

法，力量不充沛就会产生懈怠的心思。怀疑的想法一产生，就会灰心丧气；一灰心丧气，就会做了却没有成效。懈怠的心思一产生，就会松弛；一松弛，就会取得成效却容易败坏下去。所以用左金吾大厅后石榴树上有甘露来欺骗宦官去那里观看从而一举诛灭宦官的计谋落空后，而唐文宗肃清宦官的志向就丧失了。在符离攻打金军的战役一失败，而宋孝宗恢复中原的志向就松懈下来了。这就是所说的疑心便对事情灰心丧气了呀！烧掉远方献纳的漂亮皮衣来显示节俭的晋武帝，在平定东吴以后就心志变得越来越奢侈了。在好几座屏风上书写箴言的唐宪宗，在平定淮西镇的叛乱以后，功业就毁败了。这就是所说的怠心便对事情松弛了呀！这几位君主，也都是英明的君主。他们在初始阶段也不是不慷慨激昂地对治国怀有志向，但他们到最后所造成的弊害竟然达到了这种地步！怀疑的想法和懈怠的心思构成的危害，不也让人感到非常可怕吗？

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十分信任原来的大臣，纠正并革除弊病很多的朝政。近来又颁布诏令，裁掉多余的官员，清除得到宠爱的身边人，撤销没有名目的赋税征收，把不紧迫的事务往后拖，利益没有一种不兴用的，害处没有一种不消除的。如果不是陛下志向坚决，力量充沛，又怎么能够果断地实行它们而没有什么顾虑呢？然而君臣之间你告诫我、我命令你的诗歌，曾经在没有任何忧虑的尧舜时代彼此应和着创作出来。《诗经·卷阿》诗对求贤任用君子的咏赞，经常向周成王那样具有道德的君主做陈献。自古以来，君臣相互警惕告诫，具体做法本来就像这个样子。何况陛下已经特圣明却又自己不感到特圣明，已经实现治理却又谋求实现进一步的治理。这是臣下我私下竟敢为此而过分忧虑的原因。志向已经很坚决又恐怕怀疑的想法或许会产生出来，力量已经很充沛又恐怕懈怠的心思会萌发出来，因此十分恳切地把唐文宗、晋武帝等几位君主作为陛下的鉴戒，又哪里不也是对大治的时代表示忧虑、致使圣明君主警觉的用意呢？

臣下我曾经反复思索上面的问题，获得到其中的缘故了。君主用来统治天下的东西，只是那整个的心念罢了。假设那心念所保存的东西，能够纯粹是正大光明的天理，而没有所说的私欲掺杂进来，

那么怀疑的想法和懈怠的心思又会从哪里产生出来呢？只因那心念沉溺在私欲中，没能够纯粹得全是天理，所以安享太平的私意，不免在内心里根本就驱散不掉；谗毁和献媚讨好的言论，得以在外面摇动煽惑。即使具有英明果断的天资的君主，也不会自觉地察知那疑心和怠心的萌生，以至于沉沦到荒淫、骄纵、懒惰里面而无法挽救。这是那发展的态势必然造成这个样子的。如今陛下确实打算断绝那疑心和怠心，来保全住始终如一的仁德，给后代垂示长久远大的规则，也只是在端正心念的做法上特别予以留意罢了。

端正心念的做法没有其他方面，也就是圣上的制策中所讲的体察元气的原始状态，坚持正道；所讲的古代这几位圣人关于大道学问的渊源而已。因为体察元气的原始状态，就能够靠仁德保存住心念，而私意在内心没地方萌生。坚持正道就能够端正和养护这一心念，而奸恶邪僻就办法从外面钻进来。同时又在精意一心的古训上特勤勉，用来察辨这心念的危险处和隐微处；体悟安定民众的大谋划的义旨，用来保全这心念的由上天赐给的善良本性。天子给天下定立起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方面去向《尚书·洪范》求取，使它不流于一边倒；恭敬胜过懈怠和义理胜过私欲的说法，这方面来自《丹书》，使自身不沉溺在放肆中。从殿廷一直到深宫，而根据情况就进行察辨；从大庭广众之中一直到独自一个人的时候，而随时就更加谨慎。务必使内外晶莹得十分通透，纯粹都是正大光明的天理；表里透明清彻，绝对没有人欲的私念。这样就会大道在内心非常明了，而志向所要实现的目标更坚决，怀疑的想法就给它化解了。气力在外面十分完备，而力量所要施加的地方更充沛，懈怠的心思就给它消除了。怀疑的想法化解掉，是推行更加果断的原由；懈怠的心思消除掉，是功业永不衰败的原由。由此利益的兴用，必定足够用来垂布永无尽头的恩泽；害处的扫除，必定足够用来防止还没出现的祸患。不存在早晨发布的命令到晚上就改变的现象，不存在前进特锐利而后退也特迅速的情况。大功告成、治理确定下来以后，仍不改变那励精谋求起始阶段特别好的规制。这才叫做保全住始终如一，这才叫做垂示长久和远大的筹划。做到这样以后，就可以祈求天命，一直到永无止境的

程度;连结起民心,一直到永远不变的地步;把太平盛世的美名,一直传扬到千秋万代。美善安定的大好局面,真真会给特将"嘉靖"作为年号的用意增添光彩。和美盛明的大治景象,将会在《诗经》、《尚书》所称述的治绩面前毫无愧色。而小小的汉朝、唐朝和宋朝,全都相形见绌,归入下风了。

臣下我学问不能够广泛了解古代,智慧不能够通晓当今,抬头承奉圣上的策问,姑且陈述一下愚昧的内心看法。开始用慎重对待重大的转机、把首先要解决的大事放在第一位作为建议,又用端正心念的论述来结尾。这确实像是迂腐遥远而不切合实际的东西。然而圣帝明王拿出治理措施的根本,终究也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去。但臣下我太愚昧,平生所得力的学问,又不能放弃掉而不言说,由此去辜负我的君主,辜负所讲习的东西。跪拜只请陛下留神,稍微降恩,予以采纳。臣下我冒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费懋中　殿试对策

费懋中(生卒年不详)　字民受,铅山(今属江西)人。为武英殿大学士费宏从子。正德十六年(1521)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官终湖广提学副使。

臣对:臣闻帝王之为治,固当先天下之急务,尤当正天下之大本。急务不先,则设施无序,非所以语致治之法矣。大本不正,则纲维无主,非所以语为治之道矣。然徒知正大本于临御之初,而务之急者或缓焉而不之图,则利必不兴,害必不除,而天下之治何由而善其始?徒知先急务于更化之日,而本之大者或忽焉而不之讲,则道必不弘,化必不洽,而天下之治曷自而保其终?此古之明君贤相,所以孜孜汲汲,举天下之急务而尽行之,以端正始之谋;而勉勉循循,求天下之大本而修正之,以清出治之源也欤?

恭惟皇帝陛下,英明天纵,睿知夙成。阳德潜藏,固已属人望于

藩邸之时;而天下文明,则又与启于御极之日。搜烦剔蠹,海宇更新,天下之急务无不理矣;端本澄源,朝廷清穆,天下之大本又无不正矣。乃于万几之暇,特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举自古以来人君新政之事,而俯求今日为治之道。大哉王言!盖不自满假、询于刍荛之盛心也。臣虽愚陋,敢不殚厥心思,以奉扬休命于万一乎?

臣闻天下之事,必有其初;人君之治,必慎其初。伊尹之告太甲曰:慎终于始。召公之告成王曰:如今我初服。盖言初之不可以不慎也。然人君之嗣位,承重熙累洽之后者,易为功;袭沉疴积痛之后者,难为力。因仍于承平之日者,无所学;而求治于天下多事之日者,非奋发有为,不足以感人心而成治化也。

臣尝考之,大舜受尧之禅,垂拱无为,故摄位、即位之初,惟拳拳乎观天交神、询岳咨牧之事,而不敢缓。太甲嗣位之初,祇德弗类,故伊尹进戒之语,谆谆乎烈祖成德、肇修人纪之事,而不容已。高宗谅阇,而傅说有典学之言,凡夫逊志时敏,所以学于古训者,无不至也。成王即政,而周公有无逸之训,凡夫畏天爱民,所以监于先王者,无不尽也。《访落》之章,则欲延访群臣,以尽下情,率时昭考,以守家法。其成王念国家之多艰,而述绍夫武王乎!《立政》之告,则欲克知灼见,以尽宅俊之贤,罔兼罔知,以重狱慎之职。其周公以任用之当谨,而上戒夫成王乎!乃若大禹受命于神宗,而即有群后之会。非好兵也,实以三苗之弗顺,固当奉天命以兴问罪之师。召公进戒于康王,而惟欲戎兵之诘。非导武也,实以宴安之可虑,固当奋武威以防陵迟之渐。凡若此者,何莫而非先天下之急务耶?

臣又考之,帝舜授位之时,推帝尧之所以相传者而告大禹,则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言也,乃千圣相传心法之要。成汤受命之始,推上天之所以立君而告万方,则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绥厥猷惟后。是言也,实帝王代立天极之道。武王胜殷,而他务未遑。《洪范》之求,《丹书》之受,皆致谨于彝伦敬义之旨;几席觞豆之铭,刀剑户牖之铭,皆致切于治心修身之义。凡若此者,何莫而非正天下之大本耶?

降及后世,若仲舒告武帝以求端之说,则欲法天道之阴阳,以为

德刑之先后。匡衡告元帝以审尚之说，则欲崇礼让于朝廷，以成教化于天下。温舒尚德缓刑之疏，以宣帝有急苛之风也。陈宠荡涤烦苛之奏，以章帝承严切之后也。玄宗久安生侈，姚崇进十事于同州召见之时，所谓政先仁恕、不幸边功之数语，其大旨固有在矣。德宗流离播迁，陆贽启悔过于奉天罪己之诏，所谓天变不悟、人怒不知之二言，其大体固可知矣。吕公著之告哲宗，则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也。之十事者，皆新政之当务。朱熹之告孝宗，则讲学以正心，修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纪纲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也。之十要者，皆新政之切务。若夫魏徵十渐之虑，所以为太宗不克有终之规。何休五始之说，所以著人君体元居正之义。而上卿授除患为福之策，中卿授先事虑患之策，下卿授儆戒无怠之策，乃荀卿所以极言谨始之道也。夫先圣后圣，其治不同，明君良臣，其语不一，孰非先天下之急务，正天下之大本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用夏变夷。太宗文皇帝肃靖邦家，光前裕后。其于古帝王相传之道，固已身体力行之矣。列圣相承，益隆至治。肆我皇上即位之初，涣号一颁，而老黎有扶杖之感；旧章尽举，而田野兴鼓腹之欢。天下之大利固无不兴，天下之大害固无不去矣。而又宅忧思道，不忘恭默之诫；建号纪元，特取熹靖之语。于臣僚之章疏，辄赐施行；于密勿之旧臣，极隆委任。凡夫奉天法祖、修德勤政、求贤纳谏、讲学穷理、节财爱民之事，推行不倦，纤悉无遗焉。臣知陛下之心，即尧舜、禹汤、文武之心，祖宗列圣之心也。然臣于此，窃有献焉。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陛下今日之治，固将匹帝王而上之矣。然治极而弛，理有固然；志满而骄，势所必至。伏愿思慎终于始之规，鉴渐不克终之辙。勿以急务为已行，而天下之大本不加之意；勿以盛治为已致，而君人之大道不究其极。常存敬畏，不敢荒宁。知天监之在上，而顾谌惟勤；思成宪之当遵，而率由不怠。兢业于万几之重，恪勤乎一德之修。求贤若不及，而毋谓人不己若；纳谏如转圜，

而毋谓人不我从。爱惜财用，而不尽人之财；怀保小民，而不尽人之力。而又日亲便殿，延访儒臣，能自得师，好问不倦，讲明乎精一之训，求尽乎绥猷之责。则自古熙明之治，固于陛下而见之矣。

然究其本，则在于陛下一心耳。夫心者，身之主也。人君一心，攻之者众。苟非涵养之功深，操存之力熟，则声色臭味，游衍驰驱，土木之华，货利之殖，易以投之而本体汩矣。臣愿陛下留神清穆，置虑渊彻，讲学以养之，主敬以存之，亲近君子以维持之。不惑于玩好之末，不迁于视听之私。使至虚之体，足以为万事之主；至灵之用，足以应万务之繁。则清明广大，中正平和，以之明理而物理无不明，以之制事而人事无不当。可以增光祖宗，可以匹休帝王，《诗》、《书》所称，不得专美于前代矣。伏愿留神省鉴，则天下臣民不胜幸甚。臣无任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进行治理，压根就应当把天下最需要解决的大事放在首位，更应当端正天下的根本。最需要解决的大事不放在首位，就会安排部署没有次序，并不是用来讲说实现大治的方法了。根本不端正，就会纲纪没有主宰，并不是用来讲说进行治理的原则了。然而光知道在登上帝位的初始阶段要端正根本，而最需要解决的大事，有的却往后拖而不去筹划，就一定会利益兴用不起来，一定会害处消除不掉，而天下的治理又通过什么能把起始阶段处理得特别好呢?光知道在变更的时候把最需要解决的大事放在首位，而重大的根本，有的却忽略过去而不去讲求，就一定会原则弘扬不起来，一定会教化不普遍，而天下的治理又从哪里能确保它坚持到最后呢?这是古代圣明的君主、贤能的宰相，勤勉不怠，十分殷切，凡属天下最需要解决的大事都全面实行它，来确立端正起始阶段的谋划；又力行不已，很有步骤，求取天下的根本而修正它，来澄清亮出治理措施的本源的原因吧?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英明由上天赋予，智慧早就形成。真龙天子的德性隐伏收藏，原本在藩王府第时就已经是众望所归了。而天下光采焕发，又在登上帝位的日子里得到开启。把烦细的

那一套都搜索上来，剔除掉奸恶弊害，四海之内获得新生，全天下最需要解决的大事没有一项不加以整治了；端正根本，澄清源头，朝廷清明协和，全天下的根本又没有一条不予以端正了。竟然在处理繁重政务的空隙里，特地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赐给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列举自古以来君主使朝政焕然一新的事例，向下访求如今进行治理的原则与方法。真伟大呀！天子的话语！这是不自我满足、来向割草打柴人做询问的深厚用心。臣下我尽管愚昧浅陋，敢不竭尽那心思，来承奉扬布美好诏令的万分之一吗？

臣下我听说，天下的事情，必定存在着它的初始阶段；君主的治理，也必定要谨慎地对待他的起始阶段。商朝重臣伊尹告诫第二代国王太甲说：慎重对待最终阶段就和对待起始阶段一个样。周朝重臣召公告诫周成王说：要明白我今天第一次处理政务。这些诫语大致上是强调起始阶段不能够不慎重对待啊！然而君主继位，承接在好多代都太平兴盛的后面的，容易建成功业；沿袭在弊病长久堆积的后面的，很难下力量搞好。在太平时间很长的年代里按老一套去做的，没有什么要去学习的；但在天下存在着很多变故的年代里要谋求大治的，除去奋发有为，就不足以感化人心，形成治理和教化啊！

臣下我曾经做过考察，大舜接受帝尧的禅让，垂下衣裳，拱起双手，实行无为而治，所以在代行天子职权、登上帝位的起始阶段，只是努力办好观测天象、沟通神灵、询问四方诸候长官、咨询十二州长官这些事情，而不敢往后拖。太甲在继位的起始阶段，恭敬的德行不像他的祖父商汤，所以伊尹进献告诫的话语，再三叮咛他那安定天下的祖父成就大业的德行和开始修明人伦纲常这些事情，而不容许作罢。商高宗为先王守孝，沉默不语，而辅臣傅说献有致力学问的建议。凡属顺从求善的心志，时时勤勉，用来学习古训的方方面面，没有不谈得到了顶的。周成王开始亲自执掌朝政，而辅臣周公献有不要贪图安逸的训条。凡属敬畏上天，爱护民众，把先王做为镜子的方方面面，没有不讲得到了底的。《诗经·访落》这首诗，旨在延请并向群臣求教，来使下面的想法全都反映上

来，追随那德行显扬的父王，来恪守自家的法度。这恐怕是周成王体念国家有很多艰难的地方，从而要继承周武王吧？《尚书·立政》的告诫，用意在能够彻底了解，鲜明地看出来，由此来使确有能力担任执政官、民事官、司法官的贤才都得到任用；同时要明白君主不能包办代替，不能过多地参预，由此来加重各种案件审理和各种事务慎重予以处理的官员们的权力。这恐怕是周公鉴于任用官员应当谨慎，从而往上告诫周成王吧？至于大禹在虞舜的祖庙接受帝位的禅让，马上就举行由天下各地诸侯都参加的誓师大会，这并不是喜好动用武力，实在是因为三苗部族不顺从，本来就应该承奉天命去派遣出讨伐犯罪者的军队。召公向周康王献上告诫，只希望他整治好中央主力部队，这并不是诱导他显耀武力，实在是因为整天安逸太值得忧虑，本来就应该奋扬军事威力来防止衰败的逐渐到来。像以上这些问题，哪一个不属于应放在首位的天下最需要解决的大事呢？

臣下我又进行考察，帝舜把帝位禅让给大禹的时候，推究帝尧用来传授给自己的妙诀，又告诉大禹，说是：人心危险，道心隐微，只有精意一心，确实掌握住那个不偏不倚的尺度。这四句话，正是历代圣人递相传授的治心大法的要领。商汤在灭掉夏朝、创建商朝的起始阶段，推究上天扶立人间君主的缘由，向天下各地传告说：只有那盛明的天帝，给世上的人们赐予了善良的本性。你们具有这种难以改变的本性，而能够实现使你们安定的大谋划的，只有国王。这番话语，实际上是圣帝明王代替上天确立起最高的行为准则。周武王灭掉商朝，其他方面的事务都没功夫顾得上，而对《尚书·洪范》的访求，对《丹书》的承受，全都是在常规大法和恭敬、义理这些要旨上特别留意。刻写在案几、坐席、酒杯、盛食物的器皿上和宝刀、宝剑、门板、窗户上的铭文，全都是在整治心念、修养自身这些义旨上表示关切。像上面这些事情，哪一样不属于端正天下的根本呢？

延续到后世，像西汉董仲舒用求取开端的理论来告知汉武帝，这是打算效法天道的阴气与阳气的关系，来决定仁德和刑罚的先后

地位。西汉匡衡用明辨崇尚对象的主张来告知汉元帝，这是打算在朝廷上倡行依礼相互谦让的风气，来在全天下形成美好的教化。西汉路温舒关于崇尚仁德、把刑罚放在第二位的奏疏，是出自汉宣帝带有急切苛刻的作风啊！东汉陈宠关于扫除一切烦细苛察的奏疏，是鉴于东汉章帝承接在明帝严苛逼人的后面啊！唐玄宗长时间安宁而产生出奢侈的举动，姚崇在同州被召见的时候进献十件事体，他所讲的施政要把仁德和宽恕放在第一位、不侥幸取得边境用兵的战果等一番话，那个最主要的义旨固然是有寄托的了。唐德宗被叛乱的藩镇赶得到处逃亡，陆贽在奉天启发他改悔过错，下达本人有罪的诏书，其中所讲的上天显现奇异天象表示谴告却对此闹不明白、世人怨恨却对此搞不清楚这两句话，那个纲领固然就能够知晓了。北宋吕公著告知宋哲宗，具体是治国的十项要领：敬畏上天，爱护民众，修养好自身，讲求圣人的学问，任用贤才，听取规谏，减轻赋税，简化刑法，去除奢侈，不贪图安逸。这都是使朝政焕然一新所应下大气力解决的。南宋朱熹告知宋孝宗，具体是治国的十项纲要：讲求圣人的学问来端正心念，修养好自身来整顿好家族，疏远献媚讨好的人来亲近忠诚正直的人，抑制按自己的喜好对某人的恩赏来扶持公正的准则与做法，明了义理来禁绝神灵之说的干扰，选择少师、少傅来辅导皇太子，精详地选拔任用官员来显示出国家的体统，振作起朝廷纲纪来激励社会的风尚，节省财政支出来巩固国家的根本，修明各种政事来驱逐敌寇。这都是使朝政焕然一新的紧切事务。至于唐朝魏徵对十种逐渐演变的情况的忧虑，是用来给唐太宗献上不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规谏。东汉何休关于《春秋》经文“元”字是元气的起始，“春”字是四季的起始，“王”字是君主接受天命的起始，“正月”是政治和教化的起始，“即位”是一个国家的起始的解说，是用来显示君主体察元气原始状态、从而坚持正道的宗旨。而上卿向新国君授付写有消除灾患、变为福佑的明文的简册，中卿向新国君授付写有事先做筹划、避免后患的明文的简册，下卿向新国君授付写有敬畏戒惧、不要懈怠的明文的简册，这是战国荀况用来最大限度地讲论谨慎对待起始阶段的办法啊！前朝

的圣人和后代的圣人，他们的治理并不完全相同，圣明的君主和贤良的臣僚，他们的说法并不一样，但有谁不是把天下最需要解决的大事放在首位，去端正天下的根本呢？

只有我朝伟大的太祖高皇帝，承应上天垂爱并赋予的重任，用华夏典章制度取代元朝的统治。太宗文皇帝肃正并安定住国家，发扬光大前代的功业，给后世留下了充分的回旋余地。他们对于古代圣帝明王递相传授的治国大道，本来就已经身体力行了。我朝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接，更加推进了最为完美的治理状态。到我皇上登上帝位的起始阶段，既发出就绝对不收回的诏令一颁布，年老的百姓具有送给他手杖让他拄立的感觉；原有的规章制度全部行用，田野上兴起了拍着肚子当鼓敲的欢乐。天下重大的有利事情压根就没有不兴起的了，天下重大的有害事情压根就没有不去除的了。但又放不下忧虑，思索大道，不忘记殷高宗那样恭敬沉默的诚意。建立年号，作为计算的起点，特意选取《尚书·无逸》中“嘉靖”这个词语。对于臣僚的奏章，动不动就赐恩同意施行；对于身处机密重地的旧臣，极其信任，委以重任。凡是敬奉上天和效法祖宗、修明德行和勤勉执政、求取贤才和接受规谏、讲求学问和穷尽事理、节省财物和爱护民众这些大事，推行不倦，任何细节都没有遗漏的地方。臣下我由此知道陛下的心念，也就是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心念，也就是我朝祖宗和各位圣明先帝的心念啊！然而臣下我在这方面，私下还有要献呈的东西。

《诗经》上说：没有谁起初会不好的，可却很少有能够好到最后的。陛下当今的治理，固然将要同古代圣帝明王相对等并且超过他们了。然而治理达到顶峰就会松弛下来，这是固有的道理；志向全都得到实现就会骄傲起来，这是态势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跪拜希望陛下思索慎重对待最终阶段就同对待起始阶段一个样，把逐渐演变而不能够坚持到底的覆辙作为鉴戒。不要认为最需要解决的大事已经实行了，就对天下的根本不再特别予以注意；不要认为隆盛的治理局面已经实现，就对统治人们的大道不再穷究它的最高深的地方。经常保持恭敬和畏惧，不敢懈怠安逸。很清楚上天的监视就在上

面，只管在回头察看天命方面特勤勉；考虑到已有的法规和事例应当遵用，而在一切都按原来章程办理上不懈怠。对每天处理繁多政务的重任小心翼翼，戒惧谨慎；对纯一的德行的修明，敬慎勤勉。求取贤才就像做得太迟了，而不要认为别人比不上自己；采纳规谏就像圆形器物的转动，而不要认为人们不顺从我。爱惜财物的花销，而不把人们的财物全都征收上来；关怀并保护普通的百姓，而不把人们的力气全都让他们使出来。同时又每天亲临便殿，延请并向儒臣求教，能够自己获取到师长，喜好询问而不倦怠。讲求推明精意一心的古训，力求尽到实现安定民众的大筹划的责任。这样一来，自古协和盛明的大治景象，固然在陛下这里就能看得到了。

然而探究那根本，就全在陛下的整个心念罢了。心念是全身的主宰。君主的那个心念，进攻它的东西特别多。如果不是涵养的功夫特深厚，操执和保持的力量特纯熟，那么歌舞和美女，山珍和海味，游玩和打猎，土木工程的华丽，财货私利的聚积，最容易击中它，而本根和主体就乱套了。臣下我希望陛下留神清正与端庄，把思虑集中在深沉透明上，讲求圣人的学问来培养它，把恭敬作为主要的东西来保持住它，亲近正人君子来维护住它。不被珍奇物品这类不值一提的玩艺所迷惑，不被观看歌舞、欣赏音乐的私下活动转移开。使最为虚静的本体，足以成为各种事情的主宰；使最为灵妙的运用，足以应对各种政务的纷繁状况。这样就清明又广大，中正又平和，拿它来闹清楚事理而事理没有闹不清楚的，拿它来处断事务而人间事务没有处理得不恰当的。既可以给祖宗增添光彩，又可以同古代圣帝明王相媲美。《诗经》、《尚书》所称述的那些情况，就不能够光由前代独享美誉了。跪拜希望陛下留神察照和鉴定，天下臣民就幸运到家了。臣下我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李振国译〕

明世宗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

殿试策问

[嘉靖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 制曰：朕惟人君奉天命，以统亿兆为之主，必先之以咸有乐生，俾遂其安欲，然后庶几尽父母斯民之任为无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首之衣与食。使无衣无食，未免有冻馁死亡、流离困苦之害。夫匪耕则何以取食？弗蚕则何以资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忧者也。今也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杂冗之为害；边有烟尘，内有盗贼，无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类，寡昧所致，上不能参调化机，下不能作兴治理，实忧而且愧焉。然时有今昔，权有通变，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旸时若，灾害不生，百姓足食足衣，力乎农而务乎职，顺乎道而归乎化。子诸士明于理，识夫时，蕴抱于内，而有资我者亦既久矣。当直陈所见所知，备述于篇，朕亲览焉，勿惮勿隐。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尧做为君主真是了不得呀！真高大得很呀！只有天最高最大，只

有尧能够学习天。他的恩惠真是广博呀!老百姓简直不知道怎样称赞他。

切实搞好学校教育，反复地用孝顺父母、敬爱兄长的大道理作训导。

君子的举动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人所效法的典范，言论世世代代都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远离君子，就有仰慕之心；近在身边，就无厌倦之意。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君主奉承上天的命令来统治亿万人民,作为他们的主宰,这就一定得首先考虑人民都拥有产业和乐于谋生,使他们满足于他们所追求的安乐生活,然后可以算是尽了君主作为人民父母的责任而无愧于心。人民所追求的安乐生活,必然是以有衣服穿和有食物吃为最首要。假使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那就免不了要遭受寒冻饥饿死亡、流离失所等等艰难困苦的侵害。不从事耕种,那么靠什么去取得粮食呢?不养蚕,那么用什么材料去做衣服呢?耕种和养蚕这两件事,是当皇帝的人所要考虑和担忧的。现在耕种的人不多而吃粮的人却很多,养蚕的人非常少而穿衣的人却很多,又加上有水灾旱灾虫灾蝗灾,很多游手好闲懒惰不工作的人危害着社会秩序,边境上有外寇入侵,内地里有盗贼作乱,怪不得人民受到的祸殃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了。这祸殃肯定是皇帝我不像君王、知识浅陋、不明事理所导致的。首先是不能够参合各种情况以调整解决关键性问题,其次是不能够开创振兴的局面进行治理,实在感到担忧而且惭愧啊!然而时代有古今的不同,灵活变化就要有变通的对策,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达到风调雨顺,天气正常,灾害不发生,老百姓衣食充足,勤恳地从事耕种和致力于本身的社会职业,顺从着自然的发展而达到天下大治。诸位士人心明道理,懂得时务,可将蕴藏在内心已经很久的见解提供给我作参考,一切所见到的东西及所了解到的情况都要直接陈述,详细周备地写在答卷中。皇帝我要亲自观览你们的

意见,希望不要有畏惧情绪,也不要有什么隐瞒。

林大钦　殿试对策

林大钦(1511～1546?)　字敬夫,海阳(今广东潮州)人。早年失怙,独与母居。幼年颖敏嗜学,虽家贫,但借书阅读不辍,由是旁通子史百家言。嘉靖十一年(1532)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旋以母老辞官。常慷慨周济同族中贫穷者。其母死后,悲哀过度,不久亦病卒。有《东莆集》传世。

臣对:臣知识愚昧,学术疏浅,不足以奉大问。窃惟陛下当亨泰之交,抚盈成之运,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无虞,而乃拳拳于百姓之未得所为忧,是岂非文王视民如伤之心耶?甚大美也。然臣之所惧者,陛下负聪明神智之资,秉刚睿明圣之德,兴天下之事无足以难其为者。而微臣所计议,复不能有所补益于万一,陛下岂能以其言为未可尽弃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临朝策士,凡有几矣。异时莫不光扬其名声,宠绥其禄秩。然未闻天下之人有曰:天子某日降某策,问某事,因某策,济某功者。是岂策士之言皆无可适于用者,抑亦其言或有可适于用而未暇采之耶?是臣之所惧也。臣方欲为根极政要之说,明切时务之论,而不敢饰为迂阔空虚无用之文,以罔陛下。陛下若以其言为可信而不悉去之,试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责其可行,则臣终始之愿毕焉。如或言不适用,则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谴,诚所甘心而不辞也。

臣伏读圣策,有以见陛下拳拳以民生冻馁流离为忧,以足民足食为急,此诚至诚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愿,少须臾无死,以待德化之成者。然臣谓陛下诚怀爱民之心,而未得足民衣食之道;诚见百姓冻馁流离之形,而未知百姓冻馁流离之实也。夫陛下苟诚见夫百姓冻馁流离之实,则心思所以足民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见夫民之冻馁流离,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冻馁流离,而天下卒坐于冻馁流离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行于一家,

千乘之心可行于一国,何者?以一家一国固吾属也。曾谓万乘属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真实恳切之诚,而顾不效于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观陛下临朝,凡十九余年于此矣。异时劝农蠲租之诏一下,天下莫不延颈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绝夫口,而利民之实惠至今犹未见者,臣是以妄论陛下未见斯民冻馁流离之实,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

臣闻之:仁以政行,政以诚举。王者富民,非能家衣而户食也,心政具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无其政,则天下将以我为徒善;有其政而无其心,则天下将以我为徒法。徒法者化滞,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备,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略也。臣观史策,见三代以后之能富其民者,于汉得一人焉,曰文帝。当秦乱干戈之后,当时之民盖日不暇给矣。文帝视当时之坐于困塞者,盖甚于涂炭也。育之以春风,沐之以甘雨,煦煦然与天下为相与休息之政,而涂炭者在衽席矣。故后世称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诚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纯王者,窃王者之似焉,犹足以尊称于后世,而况夫诚于王者,而顾有坐视天下于冻馁流离者哉?臣窃谓今日陛下忧民之心不为不切,爱民之政不为不行,然臣所以敢谓陛下于斯民之冻馁流离而未见其实,于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窃恐陛下有爱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诚怛恳至;有爱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详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论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陛下者,非欲尽变天下之俗也,非欲复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时顺情而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耳。臣请因圣策所及而条对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非耕则何以取食,弗蚕则何以资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忧者也。今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病;边有烟尘,内有盗贼,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复甚一日也。此见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揆困乏之本,而极思所以拯救之也。臣谓民之所以耕蚕稀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杂病之也。若夫水旱虫蝗之灾,则虽数之所不能无,然君人之忧不在焉。何者?恃吾耕蚕之具素修而无所耗,则虽有水旱虫蝗而无所害。臣闻有道之国,天不能灾,地不能厄,夷狄盗贼不能困。以

恒职修而本业固，仓禀实而备御先也。

臣闻立国有三计：有万世不易之计，有终岁应办之计，有因时苟且之计。万世不易之计者，《大学》所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则有一年之积。例之则九年当有三年之豫。其终岁所人，盖足以自给，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待不虞如此者，所谓天不能灾，地不能厄，夷狄盗贼不能困。臣前所谓王者之政，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励行之者。所谓终岁应办之计者，盖生财之道未甚周，节财之道未甚详，一岁之入仅足以充一岁之用。其平居无事犹未见其甚敝，偶有凶荒盗贼之变，则未免厚敛重取，以至于困败而不能自振。若此者，盖素备不修，因时权设，汉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我陛下之所以奉天理而深厚国脉者。其所谓因时苟且之计者，盖平时之用以敛散于民者颇无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用财惟畏其不广。方其无事，百姓已不能自给，迨其有变，则不可复为之计矣。此则制国无纪，溃乱不时，盖昏乱衰世之政焉。

臣前所谓起于游惰，病于冗杂之弊，亦略有不同于是。陛下今所方欲改辙而易海内之观者，臣谓今日游惰之弊有二，冗杂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长坐于困乏，而志士至今愤惋而叹息者也。其所谓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异端。游民众则力本者少，异端盛则务农者稀。夫民所以乐于游惰者，何也？盖起于不均不平之横征，病于豪强之兼并。小民无所利于农也，以为逐艺而食，可以为苟且求生之计。且夫均天下之田，然后可以责天下之耕。今夫里闬之小民，剥于污吏豪强者深矣，散食于四方者众也。大率计今天下之民，其有田者一二，而无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食一二之粟，其势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业，以为八九自耕之养，其势未尝不足。议者病游民之众也，或有逐商之说。然臣以为游民之商，本于不得已也。而又无所变置而徒为之逐，臣惧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窃谓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当端其绪而缓理之。理而无绪，势将驱力农之民而商，而又将驱力商之民而盗也。天下为盗，国不可久。其便莫若颁限田之法，严兼并之禁，而又择循良仁爱、恻怛之吏以抚劳之。法以定其世业，禁以防其奸贪，吏以时其安辑，游民其时归乎！

若夫异端者，盖本无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窃其减额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农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无父无君之教于天下，将使流风之未可已焉。此其为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窃悼俗之方敝也，秃首黄冠，充斥道路，珠宫琼宇，照耀云汉。此风未艾，效慕者众，非所以令众庶见也，非所以端正风纪之要体也。故臣请陛下严异端之禁，斥道佛之说，敕令此辈悉归之农。其有不如令者，许有司罪治不赦。盖非惟崇力本之风，抑且施教化之道，此臣拳拳所望于陛下之至意也。

其所谓冗杂之弊三者：一曰冗员，二曰冗兵，三曰冗费。冗员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费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财裕矣。夫圣人所以制禄以养天下之吏与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则食之也，兵有敌人之勇则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则非耕不得食，非蚕不得衣。何者？无事而禄，亦先王之所俭也。今天下之吏与兵何如也？臣非欲尽天下之吏与兵而不禄之也，臣徒见任州县者固有软罢不胜而坐禄者焉，隶兵籍者固有老弱不胜而滥食者焉。且入资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众，简稽之责不严，练选之道有亏，臣是以欲于此辈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冗滥而宽民赐者不少也。

若夫冗费之弊不能悉举，即其大而著者论之：后宫之燕赐不可不节也，异端之奉不可太过也，土木之役不可不裁也。陛下端身以率物，节己而居俭，其于三者，固未可议焉。然窃见天下之大，民物之众，九州四海之贡，尺帛粒米之赋，山林川泽之税，日夜合萃以输大仓，可谓盛矣。而国之计未甚足，以为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赋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盖道路之耗，漕挽之费，京师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内府之百金，民家之万金也。以百万民家之资，费之于一燕飨、一赐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费在今日，亦有未尽节者。盖臣闻之：以天下所有之财赋，为天下人民之供养，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费之者，则其势将横征极取，天下不至于饥寒冻馁、大败极弊而不已。臣读史记，见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时，地方不过百里，而四方君长交至于其国。其所以燕飨劳来之典不容终无，然而当时百姓各足，饥寒不病。故民诵之诗曰："勉勉我王，

纲纪四方”,盖庆之也。传至于其子孙,以八百国之财赋自养一人,宜其甚裕而无忧,而民反流离困苦,至于《黄鸟》此邦之咏作焉。臣于此见君人节己以利人则易为功,广费以厚敛则难为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费为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类,寡昧所致,上不能参调化机,下不能作兴治理,实忧而且愧焉。此乃陛下忧勤之言,禹汤罪己之辞也。然臣谓陛下非徒为是言也,须欲励是行也。夫君人之言与士庶不同,一或不徵,天下玩之,后虽有美意善政,人且骇疑不信。陛下往年尝有恤农之诏矣,然而天下皆以为陛下之虚言。何者?诚见其言若是焉,而未见其惠也。今陛下复策臣若是焉,臣以为亦致忧勤之实而已。欲致忧勤之实,须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陈者,皆因圣策所及条对。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犹有未尽于此,臣请终之。

夫山泽之利未尽垦,则天下固有无田之忧。今夫京师以东,蔡、邓、齐、鲁之间,古称富庶强国,三代财赋多出于此。汉唐以来名臣贤守,其所以兴田利而裨国用者,沟洫封洫之迹犹存,而今悉为空虚茅苇之地,此古人所谓地利犹有遗者。而陛下所使守此土者,一切苟且应职,而无能为任此忧者。此北人所以长坐仰给于东南,小有凶荒不继,辄转沟壑而不能自给以生者,地利未尽也。臣意陛下莫若严其守令,重选有力量才干、忠诚为国之士,使守其地,而专一以兴田利为事。朝廷宽其禁限,听其便宜,而惟以此为田利课,则海内当有赵过者出焉。不数十年之后,则江北之田,应与江南类,可省江淮数百万之财赋,而舒北人饥寒冻馁之急。一举而利二焉,大惠也。陛下能断而行之,大勇也。

或曰:非不欲行也,如东南异宜何?臣请有以检之。夫今日所谓空虚荒瘠无用之地者,非向时所谓富实而所托赖以兴起之本区乎?昔以富实,今以荒虚,臣诚未喻其说,亦曰存夫人尔。魏人许下之屯,可见矣。方枣祗为屯许之画也,当时亦诚见其落落难合。洎其成也,操终赖之,省粟数万。今天下之大,又安知其无能为枣祗者乎?臣是以愿陛下以此为田利课,则山泽垦。臣又闻之,山泽不征,市梁无禁,王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汉桑弘羊以剥刻之术媚上,而征

榷之法始详。历代因之而不革，大公之制未闻也。然臣终以此为后世衰乱苟且之政。今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榷，山泽有阻，鱼盐有课，自一草木以上之利，莫不悉笼而归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则有势穷。夫兽穷则逐，人穷则诈，今陛下之民将诈矣。司国议者，非不知其势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知其弊而冒之者，诚曰国家利权之所在也。臣以为利不胜义，义苟未安，利之何益？况又有不利者在乎！

臣闻之，王者所以总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张大国体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问财赋之有无。臣观征利之说，不出丰大之国，恒出于衰乱之世。纤纤然与民争利者，匹夫之事也。万乘而下行匹夫之事，则其国辱，非丰大之时所尚也。陛下何不旷然为人所难，思大公之法，去衰乱之政，令天下之士争言曰：惜乎汉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人，至我明天子然后能以天子之大体镇服民心焉。陛下何苦于此焉不为也？臣愿陛下息山林关市之征焉，使大圣人所作为，过于人万万也。若夫悉推富民之术，则平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仓不可不设也，奢侈之禁不可不严也。凡若此者，史册之载可考。陛下可能举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论之也。

由臣前陈而言之，均田也，择吏也，去冗也，省费也。由臣后所陈而言之，辟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奢也。田均而业厚，吏良而俗阜，冗去而蠹除，费省而用裕，土辟而地广，征薄而息宽，利通而财流，奢禁而富矣，八政立而制备矣。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忧于百姓之冻馁流离，又何至于有盗贼之警，又何患夫不顺天道而归乎化哉！通变宜时之道，其或悉备于此。然臣以为此数者，皆不足为陛下之难。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虚寡欲，以为宽民养物之要，则虽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盖崇高富贵之地，固易为骄奢淫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内治也。故古之贤王，遐观远虑，居尊而虑其危，处富而惧其溢，履满而防其倾，诚以定志虑而节逸欲，固寅畏而禁敖邪也。故尧日兢，舜日业，禹日孜，汤日检。臣以为数圣人固得治心之要矣。

臣尝读《汉书》，见汉武帝之为君，方其临轩策士奋志六经也，虽三代之英主不能过焉。洎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胜。公孙弘、桑弘

羊、张骞、卜式、文成、五利之辈，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变纷然，天下坐是大患。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为祸必大。故愿陛下静虚恬虑，以为清心节欲之本。毋以深居无事而好逸豫，毋以海宇平清而事远夷，毋以物力丰实而兴土木，毋以聪明英断而尚刑名，毋以财赋富盛而事奢侈，毋羡邪说而惑神仙。澄心正极，省虑虚涵。心澄则日明，虑省则日精。精明之运，旁烛无疆，举天下功业惟吾所建者，岂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已哉！臣始以治弊治法为陛下告，终以虚心寡欲为陛下勉。盖非有惊世绝俗之论，以警动陛下，然直意以为陛下之所以策臣者，盖欲闻剀切时病之说，故略敢尽其私忧过计之辞。衷情所激，诚不知其言之犹有所惮，亦不知其言之犹有所隐。惟陛下宽其狂易，谅其朴直，而一赐览之，天下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知识愚昧，学术水平疏浅，不够资格回答皇上所问的重大问题。我认为陛下遇上了亨通安泰的时世，据有帝业完满的国运，现在天下到处都已经治理得很好，四海之内都已经太平无事。然而皇上仍然诚恳地担忧老百姓未得其所，这岂不是周文王把老百姓看成是受伤者而不敢加以惊动的那种心情吗？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啊！不过臣下我所感到恐惧的，是陛下拥有聪明、神圣的智慧，具有刚强通达、明察事理的才能，一切要办的事，天下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得了的。而我这个微不足道的臣子所考虑所议论的东西，又不能够有万分之一的补益，陛下岂能够把我的话作为不可以全部抛弃而加以听取的呢？

陛下亲自临朝策问士人已有很多次了。从前是没有不宣扬应试者的名声，给予他们俸禄和官秩，对他们表示宠爱和安抚的。但是并未有听见过天下的人有这样的讲法说："皇帝在某某日颁下某某策来问某某事，于是利用某某策去处理某某事而取得了成功。"这难道是对策士人的话都没有可合用的吗？还是士人的话有的是可以适合于用的，而朝廷没有功夫去采用呢？这是臣下我感到畏惧的啊！臣下我正想讲论一番从根本上治理政务的道理，明确切实地论述当今之务，

不敢撰写那些陈旧不合时宜以及疏阔空虚无用的装饰性文章来欺骗陛下。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可信而不把它全部丢弃的话，那就试把臣下我的对策交给有关的官员，责成他们去实行，那么臣下我自始至终的心愿就实现了。如果我的话不适用，那么臣下我就是瞎子愚人，有欺骗皇上的罪过，跪伏在地等待受谴罚，实在是自己甘心情愿而不会推辞的。

臣下我跪拜阅读圣上的策问，得以见到陛下恳切地为人民的受冻挨饿和流离失所而担忧，和为人民是否有足够的衣服和足够的食物而着急，这实在是陛下诚挚地为考虑施布好处给老百姓所怀有的悲痛和忧伤的心情啊！天下人所希望的是，不要那么快死去，好等待一个有德和有教化的局面能够实现。然而臣下我认为陛下确实怀有爱护人民的心思，但却未得到一种能让人民拥有充裕衣食的方法。实在只是见到老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表面情况，而未能够了解到老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真实程度。陛下如果真了解到老百姓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真实程度，那么就会设法寻找让老百姓能够衣食充足的方法了。未有当君主的人忍心见到人民受冻挨饿流离失所，而不去设法救援的；也未有君主对那些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人民作了救援，而天下人最终还处于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状态而不能得到拯救的。现在一个平民百姓的主意可以在一个家庭里推行，一个封国的统治者的想法可以在一个封国里实施，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封国本来就是属于我自己的嘛。怎可以讲作为拥有天下的万乘之主，有真实恳切诚挚的援救天下的心，却不能取得援救天下的效果的呢？这是臣下我所未能相信的。臣下我观看陛下临朝主政到现在共有十九年了，往时鼓励农耕蠲免租税的诏令一颁布下去，天下人没有不伸长脖子盼望着出现新局面的。然而口中不停地讲施布恩惠给人民，但有利于人民的实际恩惠到现在还未看得见，臣下我因此才敢狂妄地讲论陛下是未见到这些人民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实际程度，未得到可使人民衣食充足的方法呀！

臣下我听说：仁要靠政策来表现，政策要用真诚来把持。君王要使人民富裕，并不是亲自上门，使得人民家家都有衣穿，户户都有食

物吃,而是君王要在心里有个治理计划并且要做到使政策能够实施,这两者都须具备罢了。只在心中有个计划而没有政策的实施,那么天下人将会说我只是空有善心;只在政策上作了实施,而在心中没有这种治理计划,那么天下人将会说我只是空有法律条文。空有法律条文就会使得教化停滞,空有善心就会造成恩惠受阻碍,有善心和有法律条文两者都齐备,这才是先王能够使人民富裕充足的关键呀!臣下我阅读历史记载,看见夏、商、周三代以后能够使人民富裕的皇帝,在汉朝只挑得出一个人,那就是汉文帝。处在秦朝末年战争动乱之后,这时的人民是每天的生计都难解决的,汉文帝把当时人民所处的穷困状况视为比处于极端困苦的状况还要糟糕,于是施行春风甘雨一样的政策,创造一派温暖环境,从而让天下走上休养生息的政治轨道。因而处在极端困苦环境之下的人得到生活保障了。所以后世称赞汉文帝是个能使人民富裕的皇帝,把他跟周武王、周康王相匹配,也实在是有理由这样称赞他的。然而汉文帝其实算不上纯正的王者,只是窃取了相似于王者的架子罢了,但仍能够受到后世的尊重和称赞,更何况对于一个真正是王者的人来说,难道会有坐视天下人处在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状况之下而不加理会的吗?臣下我认为今日陛下为人民担忧的心不是不恳切,爱护人民的政策不是不实行,然而臣下我之所以敢说陛下未能见到这些人民受冻挨饿流离失所的真实情况,未能得到使人民衣食充足的方法,其原因就是恐怕陛下只是有爱护人民的仁慈思想,而未能够如同王者那样真诚恳至地为人民的生活而忧伤;只是有爱护人民的仁慈政策,而未能够如同王者那样心里明亮详细地洞悉一切政策的实施。臣下我由此才敢这样讲论陛下的啊!然而臣下我希望陛下推行仁政,并不是全部改变天下的风俗,也不是想让天下恢复井田制,只是讲要按照和遵循当时的实际情况去制定政策,不要丢失先王的本意罢了。臣下我请按照圣上制策所问到的内容一条条地对答。

陛下策问臣下说:人民不从事耕种,那么依靠什么去取得粮食?不养蚕纺织,那么用什么材料去做衣服?耕种和养蚕这两件事,是当皇帝的人所要考虑和担忧的。现在耕种的人不多而吃粮的人却很

多，养蚕的人稀少而穿衣的人很多，又加上有水灾旱灾虫灾蝗灾，很多游手好闲懒惰不工作的人危害着社会秩序，边境上有外寇入侵，内地里有盗贼作乱，难怪人民遭受祸殃一天比一天严重啊！这就可以看出陛下是心情沉重地想念着人民的痛苦生活的，是深入地考察人民困苦穷乏的根本原因的，是尽力地思考用什么办法去拯救人民的。臣下我认为人民之所以会耕种养蚕人数不多，从而导致了祸殃一天比一天严重，是由于人们游手好闲和懒惰引起的，此种情况之所以严重又是由于闲杂人员冗多、秩序混乱所造成的。至于水灾、旱灾、虫灾、蝗灾之类的灾害，虽然在运数中不能没有，但是，君王所担忧的并不在这些水、旱、虫、蝗等灾害上。为什么呢？因为仗着我们耕种和养蚕的措施向来是料理得很好而没有损耗的，那么虽然有水、旱、虫、蝗等灾发生也是不会造成损害的。臣下我听说：治理得好的国家，上天不能使它受灾，大地不能使它穷困，外族入侵和内地盗贼造反也不能使它陷入困境。这是因为农耕职业搞得好，从而巩固了事业的根本，使得仓廪充实和抵御措施预先准备得周到的缘故呀！

臣下我听说建设国家有三种不同的计策：有一种是万世不改变的计策，有一种是终年应办的计策，有一种是随当时需要而苟且施行的计策。所谓万世不改变的计策，就是《大学》中所讲的“生产粮食的人多，吃粮食的人少，生产要快，消耗要慢”的做法。所以《王制》说：“耕种三年必须要有一年的存粮。”按这个比例，那么耕种九年就应当有三年存粮做预备。每年的收成，够本年用，而三年的积蓄，总可以有富余。对待想不到的事能做到这样的程度，这才可以讲得上是上天不能使它受灾，大地不能使它穷困，外族入侵和内地盗贼造反也不能使它陷入困境。臣下我在前面所讲的王者的政治，正是陛下今日正在急切地追求并且想要励行的了。所谓终年应办的计策，是指生产财富的工作做得不怎么周备，节省财用的方法未做得恰当，一年的收入仅仅能够满足一年的花费。在平常无事发生的情况下尚看不到景况怎么凋敝，倘若偶然遇有年景不好闹饥荒或盗贼作乱之类的情况发生，那么就免不了要向老百姓加重收税，甚至会陷入困顿失败的局面之中，而不能够自我拯救。像这种情况，是平素储备不充分，

只是随着时势而权且设立措施以应付变化而造成的。这是从汉朝到唐朝、宋朝以来治理天下的一般做法，这种做法并不是我皇上遵循自然法则牢固地巩固国家基础的做法。所谓随当时需要而苟且施行的计策，是指平时在开支方面和收取人民赋税方面没有一个很合理的标准，收取人民赋税惟恐收得不够多，花费钱财惟恐花得不够阔绰。在无事的时候，老百姓已经不能够自给，等到有变动出现的时候，就不能够再有应付的办法了。这是治理国家没有纲纪，动乱会不时地出现，纯属昏暗无秩序的衰落末世的政治啊！

臣下我在前面所讲到由于人们游手好闲及懒惰和闲杂人员冗多及秩序混乱所造成的弊端，也略与这里所讲的情况有所不同。陛下现在正要打算改变政策来扭转海内人的看法，臣下我在这方面认为今日游手好闲懒惰不工作的弊端有二种表现，闲杂人员冗多秩序混乱的弊端有三种表现，这些表现正是造成天下之所以长期处于生活困难的缘由，也是致使有志于改革的士人到今天仍然感到愤慨惋惜和嗟叹的。所谓游手好闲不工作的弊端的二种表现是：一是游民，二是异端邪教。游食的人多了就会致使务农的人数减少，信奉异端邪教的人多了就会致使从事农业的人减少。那些人之所以喜欢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原因是什么呢？乃是由于出现了不平均的强横征税，由于受到豪强兼并的严重危害，致使小小老百姓在农业生产方面无利可图啊！因而认为只有改做其它行业的工作才可以得过且过地求得生存。那么要将天下的田地平均，然后才可以责求天下的人去从事耕种。现在那些住在里巷里的小小老百姓，被贪官污吏豪强地主剥削得非常深，所以游散到各地去寻食糊口的人就很多。大略地计算，现在天下的人民，有田地的人只占十分之一、二，而无田地的人却常常是十分之八、九。十分之八、九不从事耕种的人坐在那里食用十分之一、二的人所种的粮食，这就不可能不贫困。然而如果将十分之一、二有田产的人的田产散发出去，致使十分之八、九的人有地耕种以供养自己，这样就不可能会不足用的。议论的人认为游民太多会造成危害，于是有人提出要驱逐商贩的主张。臣下我认为游民从事商贩，本来是不得已的，只是驱赶而没有措施去改变他们的现状和安

置他们工作的话，臣下我很担心这样做会致使那些从事商业的人不安心于经商了。臣下我认为现在弊政的根源已经很深，改革的人应当要从弊政的开端处抓住问题慢慢地着手解决，无头绪地作清理，势必会驱赶了从事农耕的人去经商，而又会驱赶了经商的人去当盗贼。天下人都成为了盗贼，国运就不会长久了。最方便的解决办法还是不如颁布限田的法令，严格禁止兼并，并且又选择循规蹈矩、对人民有仁爱之心和忧伤之情的官吏去安抚慰劳他们。用法律规定人们的产业，用禁令防止奸诈贪婪的行径，有好官吏随时安抚老百姓，相信游民一定会随着时势的改变而回到家乡去的。

至于信奉异端信条的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超越世俗和有利社会的智慧，只是窃取了可获减免税和能逃避刑罚的好处，既不做工不经商，又不耕种不出仕，使自己的身份有不受约束的方便罢了。况且他们向天下的人提倡要信奉无父无君的教条，将会致使这股风气不能制止了。这种信奉异端的危害是很明显的，所以臣下我不必作深入的论辨。然而臣下我对社会习俗正变得衰败而感到很悲伤，现在剃光头的人和戴黄色帽的人又充满了道路，装饰得像珠光般艳丽的庙宇好像把银河都照耀得发亮了。这股信奉异端的风气正在兴盛不衰，仿效羡慕的人很多，其实是不宜让群众看见的，它并不是用来端正风纪的重要体制。所以臣下我请求陛下对异端信仰要严加禁止，排斥道佛两教的学说，颁布命令要这些信邪教异端的人都回家务农去，如果有人不听从命令，准许官府治他们的罪并不予赦免。这样做不但可以使致力务农的风气得到崇尚，而且也是实施教化的必要手段。这是臣下我恳切地希望陛下要这样做的一片心愿啊！

所谓繁多杂乱的弊端有三种表现就是：一是冗员，二是冗兵，三是冗费。对无专职的官员一定要裁减，对多余的士兵一定要淘汰，对繁杂的费用支出一定要节省。除掉三种冗多，财富就会充裕起来的了。圣人制定俸禄用它来供养天下的官员和士兵，是依据什么呢？官吏有治理人民的能力的就养他们，士兵有打仗的能力的就养他们，养他们是因为他们有治人和打仗的能力啊！如果有不懂治理不能打仗的人，那么他们不去耕种就不能获得粮食，不去养蚕就不能获得衣服

穿。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工作本领而给予俸禄,这不是先王节俭的做法。现在天下的官吏与士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臣下我并不是想对天下的官吏与士兵全都不给他们俸禄,臣下我只是见到在州县任职的人中总是有软弱疲倦不胜任工作白白坐在那里领取俸禄的人,当兵的人中总是有年老体弱不胜任打仗而空领兵饷的人,况且出钱买官的途径太多,由任子制而得官的人太众,挑选查考的职责不够严密,选取和提拔的程序有漏洞,臣下我因此想对这些冗员冗兵一概加以裁减淘汰。这样做就可以除掉冗滥的弊端,使人民的负担减轻,收益会是不少的。

至于冗费的弊端就不可能全部举出,只能就大的方面和显著的问题来加以讨论:用于后宫的宴席和赏赐方面上的花费不可以不加节约,用于信奉异教的经费不可以用得太过份,用于兴建土木工程的开支不可以不裁减。陛下如果自身端正从而起带头作用,自己节制开支从事省俭,这对于上述的三个问题来说本来就不必议论的。然而我见到天下那么广大,人民和物产那么众多,九州四海都贡献,所交缴的每一尺布帛每一粒米粮以及山林川泽的税收,日夜不停地聚集起来输送到国家的仓库中,可以讲是很盛多的了。可是国家的费用却未怎么足够支出,我认为这一定是由不正常的消耗所造成的。况且上级向下层人民征收一份赋税,而下层人民交上去的赋税就常常是十倍的,因为还要加上道路上的损耗和水陆运输的费用。所以在京城里面是价值一金的东西,就是在民间田野之中价值为百金的东西了;皇宫府库内价值百金的东西,则是民间家庭里价值为一万金的东西了。用百万民家的资金,花费在一席宴饮、一次赏赐或一件玩物这些方面上,哪里有什么限制住的呢?臣下我所以讲今日冗费的现象,并未有全面地从事节省的。臣下我听说:把天下所有的财赋用来作为为天下人民办事的开支,那是不会有不够用的。只是因为有冗杂的开支,所以势必要进行横征暴敛,看来不把天下挨饥受冻贫困衰败推到了极点,这种横征极取便不会停止。臣下我阅读历史记载,见到周文王在刚刚开始接受天命登上王位的时候,拥有的地盘方圆不超过一百里。当时四方的邦国首领们纵横交

锴地来到他的国家,他得要设宴慰劳来访者,典礼是不容得完全没有的。然而当时老百姓各自充足,不会有人挨饥饿受寒冻。所以人民用诗来歌颂周文王说:"我们勤勉不倦的文王,设立纲纪教化四方"。这是庆幸有文王啊!王位传到了他的子孙,用八百个诸侯国的财赋来供养天子一个人,当然是很富裕而不会有忧虑的了。然而人民反而流离他国,过着困苦的生活,以至有人撰作《黄鸟》的诗篇来表达寄居异国受到冷遇、切望归乡的哀怀。臣下我从这一点上看出一个道理,君主统治人民,如果做节制自己而有利于人民的事,那是很容易有功绩的。如果他大规模地花费挥霍,从而对人民加重税收,那么他想把政治搞好也不会实现。臣下我因此恳切地劝告陛下务必要节省冗费。

陛下策问臣下我说:"上述问题肯定是皇帝我不像君王、知识浅陋、不明事理所造成的。首先是不能够参合各种情况来调整和解决关键性问题,其次是不能够开创振兴局面进行治理,实在感到忧伤而且惭愧哩!"这是反映陛下为天下忧虑而勤于政事的言论,是相当于夏禹商汤罪己的话啊!臣下我认为陛下不仅仅是讲这番话,而且必须要振奋起来去认真实行。君主的讲话与一般民众的讲话是不一样的,说话中如果稍为有一点不诚信,天下人就会因此而对你轻视,往后虽然有好的意见和好的政策,人们也将会持惊骇怀疑的态度而不敢相信的了。陛下往年曾经颁布过体恤农民的诏书了,然而天下人都认为陛下所讲的话是虚假的,这是什么原因呢?实在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些话都只是如此讲讲罢了,却未见到真的有好处给了农民啊!现在陛下又用类似的做法来策问臣下我,臣下我认为这也是陛下想要真实地表示自己忧虑天下勤于政事罢了。想要真实地表示忧虑天下勤于政事,就必须赶快按臣下我的话去做。然而臣下我在前面所陈述的意见,都是按圣上策问的内容而逐条对答的,总体上看,用来拯救弊端使世人得利的方法还没在这些意见中表述完,臣下我请求继续讲完它。

山区和湖泊一带的田地如果未全部开垦,那么天下肯定会有农田不足的忧虑。现在京城以东一带,以及古代蔡国、邓国、齐国、鲁国的所在区域,古代时都被称为富庶的强国,夏商周三代的财赋就多数

是在这里收取的。汉唐以来有名的大臣和贤良的郡守，也都是在这里发展农业生产、充实国库开支的。当年的灌溉沟渠、田地分界的痕迹仍然存在，但是现在都全部成为了空荒不种粮而且长满茅草芦苇的地方了。这就是古人所讲的地有遗利的情况了。而陛下所派去镇守这块土地的人，全都是马马虎虎应付职务的，没有人能够对这些令人忧虑的事情负起责任来。这就造成了北方人长期地要依靠东南方的生产品来维持生活了。稍有年景不好闹灾荒，就粮食不继，人们往往就辗转于沟壑而不能自我供养获得生存，这是地利尚未全部开发所造成的啊！臣下我的意思是：陛下不如对郡县长官要有严格的要求，重新挑选有能力有才干且能忠诚为国家工作的士人，派他们去统辖某一地方并且专心致志地发展农业生产。朝廷要对他们的限制有所放宽，允许他们按实际情况随机应变地处理事务。只考核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绩，那么海内就会有像汉朝赵过式的人物出现的。不出几十年之后，长江以北的农田就会与长江以南的农田一样生产出数量很多的粮食来，于是就可以节省江淮一带几百万的财赋，从而可以舒解了北方人挨饥受冻的危急状况。一举而获得两利，真是大得好处啊！陛下能够决心实行这种做法，那才是有大勇气大魄力的君主啊！

或者有人会说：并非不想推行这种政策，无奈和东南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怎么可以实行得了呢？臣下我请求检验一下实际情况吧。那些今天所谓空虚荒瘠不可以耕种的地方，不正是过去称之为富裕充实的、君王们赖以兴起的地区吗？过去富裕充实，今天却荒废空虚，臣下我实在不明白上述的讲法，只能说是在于人为如何吧！魏国人在许昌进行屯田的事，是可以显现得很清楚的。当枣祗开始策划在许昌屯田时，当时也的确见到这样做是很少得到别人赞同的。到了后来屯田成功了，曹操终于从中得到好处，节省了数万斛粮食。现在天下这么广大，又怎么知道其中会没有人能够成为枣祗呢？臣下我因此希望陛下把屯田作为发展农业生产所必定要考核的工作，那么山泽地区的田地就能开垦了。臣下我又听说，对入山打柴和到湖泊捕鱼都不征税，对市场买卖和进出桥梁都不加禁止，就是君王能够使天下

生产品顺畅流通的原因,这是一种大公大同的制度啊!自从汉代桑弘羊用苛刻剥削的收税方法讨好皇上之后,征榷的手法开始详密了。历代承袭了这种方法而未加改革,就不再听到有大公的制度了。臣下我始终认为这种收税方法是后世衰乱苟且的朝政。现在朝廷向人民收税,茶要征税,酒要征税,在山区湖泊处设有收税的关卡,打鱼煮盐要按规定交税,即使是一草一木以上的财利,没有不全部归入公家的,向人民的收取是应有尽有的。作为统治者应有尽有地向人民收取,那就会致使人民走向绝境的。野兽到了绝境就会跑窜,人到了绝境就会做欺骗的事,现在处在陛下统治下的人民恐怕将要从事于欺骗了。负责国事议论的官员并不是不知道这种危机的形势是不能够长久存在的,然而明明知道这是弊端却仍然要硬干下去,借口实在是强调这属于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权益的问题啊!臣下我认为利是比不上义重要的,假如义未能够占住脚,得到利又有什么益处呢?何况又有不利的因素存在着呢!

臣下我听说:君王之所以能够全面地统治天下,使人民思想端正并服从命令,使国家发展扩张,实在是要看他有没有敦厚的道德,而并不在乎有没有财赋。臣下我观察历史上凡是议论征税取利的,不会是出自富有的大国,只是经常出自衰乱的时代。在微小的事情上与人民争利,这是平凡人所做的事。万乘之国的君主如果降低身份做平凡人所做的事,那么国家就要蒙受耻辱了,这样的事不是富有大国所崇尚的。陛下为什么不明朗地去做人们所难于做到的事,考虑颁行大公的法制,除掉导致政局衰乱的弊政呢?致使天下的士人都争着说:“可惜汉唐宋各朝的统治者都不能够放弃平凡人的求利思想而使人民获得好处,到了我明朝皇帝方能凭着天子的伟大形象去镇服了民心。”陛下为何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劳苦的而不去做呢?臣下我希望陛下停止对山林关口市场征税,致使大圣人所作所为超过别人万万倍。至于要全面地推行富民的政策,那么平籴法不可以不确立,常平仓不可以不设置,禁止奢侈不可以不严厉。所有像这类性质的事,在史册记载中都可以查考。陛下可以实行贯彻,有现成的典制明摆在那里,所以臣下我就没有必要做深入的讨

论了。

由臣下我在前面部分所陈述的内容来讲，就是要平均田地，要选择官吏，要减裁冗员，要节省开支。由臣下我在后面部分所陈述的内容来论，就是要开垦荒田，要从轻征税，要流通财利，要禁绝奢侈。田地平均了农民产业就能丰厚，选好了官吏风俗就能朴厚，减裁了冗员就可以除掉蠹虫式的官员，节省了费用就可以使开支宽裕，开辟了农田就可以扩大耕地，减轻了征税就可以扩宽生息，财利流通了就可以使财富源源不断，禁止了奢侈就可以使人民富裕起来了。这八个政务确立了，制度就周备健全了。陛下果真能够按照臣下我所讲的内容去施行，又何须担忧老百姓会受冻挨饿流离失所，又哪至于会有盗贼出现，又何须担心会不能顺着正常的轨道发展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呢?灵活交通以适应时代发展的方法，恐怕都周详地写在这篇对策里了。然而臣下我认为这几个方面的做法，都不能难倒陛下的。所令人担心的是，人主如果不能心地清虚寡欲，使宽缓民力发展物质生产得到保证，那么虽然有美好政策也是没有工夫去施行的。高大富贵的地方，必定容易成为骄奢淫逸的场所，因此英明的君主是很注重治理内心的。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观察问题和考虑问题都有广度深度，居于尊崇的地位时就考虑到要防备出现倾覆的危险，处在富贵的环境之中就要警惕着不要过份浪费奢侈，踏在完满适意的基地上时就要防止会出现倾覆。能做到这几点，实在是为了能固定心志思虑和节制贪图享受的欲望，固定恭敬畏惧的心境和禁绝弊端邪恶的行为啊!所以尧一天比一天更矜持，舜一天比一天更小心谨慎，禹一天比一天更勤恳，汤一天比一天更检束。臣下我认为这几个圣人当然是得到治理内心的要领了。

臣下我曾阅读《汉书》，见到汉武帝作为君王，在他临高台策试士人、意气旺盛地用儒家经典作统治工具的时候，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英明君主也不能比得上他的英明。但是到了中年他欲望就多了起来，一旦念头产生就不能够自我控制。公孙弘、桑弘羊、张骞、卜式、少翁、栾大这帮人，各自都乘机兜售自己的主张，终于使变更的局面乱纷纷地发生。天下人因此而陷入灾难之中。臣下我

由此而知道君主的那颗心，不能够有嗜好在外面表现出来，稍微沉溺在嗜好里，就会酿成大祸殃。所以希望陛下要追求清静虚无和恬淡无虑，把这作为清静心境和节制欲望的根本。不要因为深居无事而去追求享受，不要因海内平安而去出兵攻打边远的他国，不要因为物质丰富而大兴土木，不要因为聪明善断而崇尚刑名，不要因为财赋富盛而从事奢侈，不要羡慕邪说而迷信神仙。要澄清心绪端正原则，要节省思虑谦虚包涵。心里澄清了就会一天比一天更明察事理，思虑节省了就会一天比一天更加精明。运用了精明善察，智慧的光芒就能够永远放射，整个天下的功业就都是我想怎样建立就怎样建立的了，岂只仅仅是为了人民富裕衣食充足呢?臣下我开始用治理弊端整顿法制来劝谏陛下，最终则用虚心寡欲的道理来鼓励陛下。我并不是有什么惊世绝俗的议论可以用来引起陛下的震惊，只不过是直来直去地认为陛下在给臣下的策问中说到要听切实的针砭时政弊端的话，所以我才敢全无保留地讲出我个人私下的担忧感受。由于出自激动的内心感情，实在不知道讲这番话还有要畏惮的地方，也不知道还有要隐讳的地方。希望陛下宽恕我的狂妄，体谅我朴素质直的用心，览阅这篇策文，那么天下就万幸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皑译〕

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戊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殿试策问

[嘉靖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闻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三才之道,一而已。何又有去义为论乎?于是未免贤者自相私反,必如圣经而后可。且今人尤天非贤者,及人君才一用义,即谓严刻。乃巧作言曰:上任刑以为法,非三代之治也。却一不知反于己。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义临而自恃,惟恐放侈。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欤?将欲利之是贪,欲之是纵,国而罔思,民而罔恤,以至于上下礼度,悉不之慎为之。君人者可不一教一治之是非当否!抑果当乎?朕祗承天位,惟民是保。何官人者比比皆负国虐民之图,奚为用哉?尔多士师孔子之学,必心孔子之心。将此心之平正,陈为篇。例以除弊革私之道,衍为仁育义断之方,以告我。勿讳勿欺,朕览之。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配合适当,这才是个君子。

孟子讲述人性本是善良的道理，开口离不开讲尧舜。

广博深厚，可以承载万物；高大光明，可以覆盖万物；悠远长久，可以成就万物。广博深厚与地相配，高大光明与天相配，悠远长久则像天地一样没有止境。这样，不用表现而即可彰明，不用行动而即可改变，无所作为而获得成功。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听说天道是由阴与阳建立起来的，地道是由柔与刚建立起来的，人道是由仁与义建立起来的。天地人三才的内容都是一个统一体罢了。为何又有去掉义的讲法呢？这样未免是贤者自相矛盾，一定要依圣人经典才对。况且现在埋怨皇天诋毁贤者的人，君主刚一采用义，立即就说这太严厉苛刻了，于是巧妙发论说：皇上用刑法来做指导，这不是夏商周三代的施政方法啊！却不一点儿也不向自己反问一下。三代时的人也都是人，不采用义来制约却能自我管束，唯恐自己放纵。现代的人果真和夏商周三代的人一样吗？有人只想贪利，只想放纵欲望，不顾及国家利益，不怜恤人民，以至于对上下级的礼法制度都不谨慎地执行。君王可以不用是非当否来一面教育一面罚治吗？这样做是否真恰当呢？皇帝我恭敬地继接上天给予的王位，只管去保护人民，为何很多当官的人都存有辜负国家、虐害人民的思想呢？要他们还能有什么用呢？你们众多的士人学习孔子的学说，必定在心中领会了孔子的思想。把这心中的想法平正地陈述出来写成文章，归纳成革除时弊与私欲的办法，扩展为使用仁去养育和使用义去裁断的施政方略，把这些告诉我，不要有隐讳，不要有欺骗。皇帝我要阅览它。

茅瓒 殿试对策

茅瓒（生卒年不详） 字邦宪，号见沧，钱塘（今属浙江杭州市）人。自少年便有气节。嘉靖十七年（1538）状元，时年39岁。累官至吏部

左侍郎。有《见沧文集》十五卷行世。

臣对：臣闻帝王之御临天下也，内必有敬天之心，而外必有宪天之政。夫天者，理之原也。人君代天理物，故其所行必求端於天。天之道虽广博而难终穷，神妙而不可测，而其端不过有二，曰阴与阳而已矣。阳居春夏，以长育为事，有刚道焉。王者继天而为之子，则用仁，而凡为慈爱，为谦屈，无非仁之统体矣。阴居秋冬，以肃杀为事，有柔道焉。王者继天而为之子，则用义，而凡为果断，为裁制，无非义之散殊矣。故天道运而无所积，帝德运而无所私。以此存之于中，是谓敬天纯王之心也。以此发之于事，是谓宪天纯王之政也。合心与政皆纯乎天，夫是之谓格天之治。而尧舜、禹汤、文武，由此其选也，奚独三代之治为然乎？

钦惟皇帝陛下，禀刚健中正之资，备文武圣神之德。自即位以来，信赏必罚，威行如雷霆；发奸摘伏，明照如日月；对时茂育，容保如天地。盖粹乎斯道之中，而建维皇之极者也。臣也窃伏草茅，遥被治化久矣。乃者叨有司之荐，得以与于大廷之对，而清问及焉。永惟圣经之言，而有取于仁义并行之道。既而有慨于庶官之庞，而欲以兼夫治教之法，且冀臣等以除弊革私之道，衍为仁育义断之方，而戒之以勿讳勿欺也。顾臣之愚陋，何足以仰裨休德之万一乎？虽然，有所言而不实，是之谓欺，则上负陛下矣。有所言而不尽，是之谓讳，则下负所学矣。上负天子，下负所学，畴昔之所自许者谓何，朝廷之所作养者谓何，而可如此也？臣敢披历衷悃，就陛下之所问及者而条陈之，陛下试垂听焉。

臣惟天下之道，有经有权。经也者，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权也者，或相兼以适其宜，或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也。人君抚舆图之广，临兆民之众，天下之所恃以立命者也。苟一于义，则威之太震，民畏之而不敢亲；一于仁，则惠之太亵，民狎之而不知敬。是仁之与义，犹天之有阴阳而不容以或偏也。臣故曰：道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然德教以象天之生育，仁矣，而义者未尝不防之于中。刑戮以象天之震撼，义矣，而仁者未始不贯乎其内。是仁义之交相为用，犹阴阳之互为其根。臣

故曰:道之相兼以适其宜者也。然天下之势有强弱,而人君之政有德与刑。乘弱之后者利用威,而乘强之后者利用惠。此其斟酌操纵之间,犹之天道之雨以润而日以晅,雷以动而风以散,既成万物而人莫窥其神。臣故曰:道之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也。是故仁义之为道也,一定而不可易者,以立天下之经。或相兼以适其宜,相济以补其所不及者,以达天下之变。稽之于圣经,验之于往古,何莫不然。彼其去义以为论,专任德而不用刑者,何其失之偏乎!

臣伏读圣制之篇,而有以辨人言之为妄矣。人之言曰:人君才一用义,即谓之严刻任刑,非三代之治。臣愚以为,用义之与严刻任刑不同也。既曰用义,则不可谓之严刻任刑;曰严刻任刑,则不得谓之用义。人君之于天下,何容心哉?视其理之所宜而已矣。苟于义所当用,则虽杀人而不可谓之严,虽致人于死而不得谓之刻,盖以义之为道,当如是也。至谓用义非三代之治,此尤非所谓知理者。臣不暇远引泛取,即以三代之事明之。禹之承舜也,先罚后赏以示威。汤之革夏也,申代誓众以张武。而文、武之继殷也,驱除元恶,歼灭暴国以救民。故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甫刑》。三代之得天下虽曰以仁,而未尝专倚于仁,有义以济其仁之所不及也。

后世事不师古,遂以为三代之治,纯用德而不用刑,何失之远欤?是故不朝者赐之几杖,受赂者馈之金钱。言宽仁者,莫如汉之文帝矣。然姑息成风,乾纲罔断,故不再传,而有指大如股、胫大如腰之患。刑以不杀为威,财以不蓄为富。言仁厚者,亦莫如宋之仁宗矣。然声容盛而武备衰,议论多而成功少,故不再传,而有流言道路、变令推恩之讥。夫二君则汉宋之良也,一于仁而不义,而其弊犹不免有如此者。若是而谓三代之专于任德,后世之专于任刑,可乎?不可乎?由是观之,三代之所以治隆俗美者,以其仁义之并用,内有敬天之心,而外有宪天之政也。后世之所以不古若者,以其仁义之或偏,而不能审时以度势,其于天也,或亵焉而不知敬,或悖焉而不知法也。

我太祖高皇帝承元人积弊之后,故其所以创制立法者,大率以严为本。及天下已定,又戒圣子神孙,不得复用国初之典。是其仁义之并行,刚柔之相济,其所以察乎天人之际,审乎消息之宜,而为万世虑

者深矣。但国家承平日久，重熙累洽，民志日趋于玩惕，事体日废于因循。盖自正德以来，兹弊极矣。肆陛下入继大统，始振起而一新之。故自临驭十有七年以来，革者故，鼎者新，蛰者奋，困者苏，天下欣欣，咸睹太平于有象矣。而陛下犹有慊于官人者负国虐民，若追羡于三代之英而未之逮者。臣愚以为，虽尧舜在上，不能无小人，此在君人者驭之得其道耳。驭之之道，臣前所谓仁义之并用者是也。

盖尝闻之，法禁之不行，自上犯之也。而小民之所以敢为非义者，庶官之贪顽者启之也。今天下之大，其在于朝廷辇毂，岂无有秉义竭忠之臣？然而违上所好，朋家作仇者，未尽无也。其在于百工庶府，岂无有亮采惠畴之臣？然而胁权相灭，诬上行私者，未尽无也。其在于都邑藩省，岂无有旬宣和惠之臣？然而违道干誉、尸禄养望者，未尽无也。其者朘民之膏脂以肥其家，窃君之荣宠以张其势，掠众之美以示其恩，恣己之私以败其度者，未尽无也。陛下尊礼大臣，愈久益亲，体悉群臣，有隆弗替。其于股肱之良，而谟明弼谐者，固尝抚之以恩，而动之以礼矣。而于此不悛之徒，明罚敕法，惩一以警其百，是犹春阳之后，而震之以雷雨之威。天下方将感陛下之仁，而畏陛下之法，奚为而不可行乎！

虽然，处今之时势，而义之所当用者，非独一驭臣为然也。夷狄跳梁而横於西北，则薄伐之师，不可以不整也。庶民僭越而拟于王章，则奢汰之禁，不可以不严也。军旅疲弊而阙于勇敢，则简阅之令，不可以不怒也。凡若此者，要皆以精明之治，而敦夫浑厚之体，以立君道之纪纲，以跻中兴之盛业，道莫有先于此者矣。

抑臣又闻之，仁育而义，王者之政也。所以主是政者，心也。故必有纯王之心，斯有纯王之政，而宪天之政，谓非有敬天之心，不可也。臣尝庄诵陛下《敬一》之箴，而有以知陛下之心，直可以质诸天地而无疑也。有德弗陟，是违天之所喜矣，敢不敬欤？有恶弗惩，是渝天之所怒矣，敢不敬欤？以此常存于心，兢兢业业，罔敢失坠，夫然后以达于政也。仁足以育天下，而天下莫不归于仁；义足以正天下，而天下莫不强于义。宪天之政，由是而会其全。格天之功，至是以要其极矣。虽然，敬亦未易言也。隐微之间，真妄错杂，毫厘之差，千里之缪。苟

辨察之功不悉于几微，持守之力不继于厥服，则人得以胜天，欲得以夺理，又恶知其为仁而在所当体，恶知其为义而在所当用也哉?故曰：勿参以三，勿贰以二，行顾其言，终如其始，静虚无欲，日新不已。然则陛下之言，固可谓能自得师者矣。除弊革私之道，仁育义断之方，岂外此而他求乎哉!

臣始以仁义并行之道为陛下告，终以主敬协一之功为陛下勉。初非有惊世可喜之论，然直意陛下以言求士，而臣之所以献言于陛下者，惟以明诸其心，上不敢负明问，下不敢负所学而已。惟陛下矜其愚，不录其罪，而留神采纳焉。臣不胜拳拳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统治天下，在内心一定要有尊敬天的思想，外在的表现一定要有效法天的政策。天是治理的本原，君王代表天去治理万物，所以他的行为必须要以天为起点。天的范畴虽然很广博难以究寻其边际尽头，虽然非常神妙不可测量，但是它的起点不过有二点，就是阴与阳罢了。阳居于春夏二季，主管生长育化方面的事情，具有刚的属性。君王继承天意成为天的儿子，那就要采用仁的政策，凡是做慈爱的事，做谦虚屈就的事，无非都是属于仁的总体的内容罢了。阴居于秋冬二季，主管收敛方面的事情，具有柔的属性。君王继承天意成为天的儿子，那就要采用义的政策，凡是做果断的事，做裁制的事，无非都是属于义的各种不同的表现罢了。所以天道的运行不会有积聚，皇帝德行的传播施展不会有偏私。把这种精神藏存在心中，这叫做恭敬上天，就是纯正君王的思想。按照这种精神去指导办事，这叫做效法上天，就是纯正君王的政治。把敬天之心和宪天之政结合起来，都与天一样纯洁，这就叫做感通上天的政治。尧、舜、禹、汤、周文王、武王都是用这种方法成为符合天命的人，哪里仅仅是夏、商、周三代的统治是这样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禀受刚健中正的天资，兼有文武神圣的才能。自从登上王位以来，赏罚严明，行使威严如同雷霆一样令人震慑；揭发打击奸邪，如同日月一样明亮光照；配合时序的需要培育人才万物，如同天地一样具有包容保护的能力。正属于投注在这种

统治手法之中、建立起最高法则的君主啊!臣下我伏居在野外草茅之中，遥远地接受君王的政治教化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最近得到主管部门的推荐，有机会参与在大廷上的对答，获得皇上对我作精审详问。详问中始终考虑到圣人经典中的话语，而且对仁义并行的方法有所汲取。接下来便对众官机构庞大的情况有所感慨，因而想推行治理和教化兼用起来的施政方法。况且希望我们臣下等人提出除弊革私的方法,扩展为用仁养育和用义裁断的治理方式,还告诫我们不要讲隐讳和欺骗的话哩!但是以臣下我的愚蠢,哪有什么能力可给予圣上的美德奉上万分之一的裨益呢? 虽然是这样，但如果讲了一番话,却讲得不真实,这就叫做欺骗了,那就向上对不往陛下了;讲了话却不把话讲尽这就叫做隐讳了，那就向下有负自己的学问了。往上对不住天子,往下对不住自己的学问,这对以前自我许下诺言作怎样解释呢?对朝廷的供养作怎样解释呢?我岂可以这样做呢?因此臣下我要冒昧地披露衷心与诚实,就陛下所问及的内容逐条陈述,陛下试请听取我的意见吧!

臣下我认为天下的治理方法，有原则和权变两种。原则是必定而不可改变的。权变呢,或者是相兼地运用,使具体情况得到适当的处理;或者是互相调协,用以补充不足。君王拥有广大的国土,统治众多的人民,是天下赖以安身立命的人。假如一概用义来治理,那么威严就用得太过分，会使社会产生震动，人民就会害怕君王不敢亲近。假如一概用仁来治理,那么施予恩惠就表现得太庸俗,人民就会对君王持轻狎态度而不知道敬重。可见用仁跟用义，就犹如天有阴阳两属性一样,是不允许偏于某一面的。臣下我所以讲:道是一定而不可以改变的。道德教育就象天的生育作用一样,表现仁爱了,但义未曾不在其中起防范作用。刑罚杀戮就像天有雷震动的作用一样,使用义了，但仁从始到终未曾不在其中做贯穿。可见仁和义两者的互相起作用，就犹如阴阳两属性的互相以对方作为依托的情况一样。臣下我所以说:道的相兼运用可以使具体情况得到适当的处理。然而天下的形势有强盛与衰弱的不同，因而君王的政治就有用德与用刑的分别。乘着衰弱局面之后的做法是利用威严，而乘着强盛势

头之后的做法是利用恩惠，这些不同的手法斟酌地使用，就如同天有雨水湿润，但又有阳光照晒；有雷霆震动，但又有风吹散的情况一样，生成了万物，但人们不能窥见其中的神秘作用。臣下我所以讲：道的互相协和是用以弥补不足的。因而仁与义作为治道，是一定而不可改变的，于是建立天下的原则。或者是相互兼用使之适应具体情况，或者是相互调和用以弥补不足，从而达到适应天下的变化。考查圣人经典，检验历史事例，哪一处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呢？那些抛弃义的论点，认为专任德治而不用刑罚的讲法，是多么失于偏颇啊！

臣下我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从而得以辨别出有人讲的话是荒谬的。有人认为君王一旦使用义，就讲这是严厉苛刻任用刑罚的做法，不符合夏、商、周三代时的政治模式。臣下我愚蠢地认为，使用义跟严厉苛刻任用刑罚性质是不一样的。既然说是用义，那么就不能够讲这样做是严厉苛刻任用刑罚；既然讲是严厉苛刻任用刑罚，那么就不能够讲这样做是用义。君王统治天下是怎样留心在意的呢？是看他处理事情是否合理罢了。只要对义来说是应当用的，那么即使是杀人也不可以讲这样做是严厉；虽然致人于死地也不可以讲这样做是苛刻，因为用义去处理事情是要这样做的。至于讲到使用义不符合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模式，持这种讲法的人就更不是所谓明白道理的人了。臣下我无暇广泛地引取远处的事例，就用夏、商、周三代的事例来说明吧。禹继承舜执政是用先惩罚后奖赏的手段来表示威严的。成汤取代夏朝，是表明代表天意并且召集民众誓师来声张武力的。而周文王、武王接替殷朝的政权，是用驱赶除掉最大的恶人和歼灭残暴的国家作为手段以拯救民众的。所以夏朝有《禹刑》，商朝有《汤刑》，周朝有《甫刑》。夏、商、周三代的取得天下虽然说是用仁作为手段，然而未曾专门倚靠仁，是有用义来作配合以弥补用仁所不能收效的地方的。

后世的人办事不效法古代，于是认为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是纯粹用德而不用刑罚，这种看法与事实是偏失得多么远啊！所以对不来朝贡的吴王刘濞赐予矮桌拐杖，对受贿赂的张武等人赠予金钱，讲究宽仁没有人能比得上汉朝的文帝了。然而汉文帝姑息成

风，君主不能断事，所以还没传两代，就有地方权力大于中央的祸患，情况像脚指大如大腿，小腿大如腰身一样。用刑以不杀人显示有威，拥有财富以不蓄贮表示富裕，论仁厚莫如宋朝的仁宗了。然而宋仁宗施政只是礼仪外观盛大而武备却是衰弱的，当时发议论很多但成功的事却很少，所以还没传两代，就有流言道路、变令推恩的指责。这二位君王分别是汉代宋代的好君王了，他们一概用仁而不用义，因而他们犹且免不了有这样的弊端哩。像这样而讲夏、商、周三代专于任德，谓后世专于任刑，可以吗？不可以吧！从这一点来看，夏、商、周三代之所以政治隆盛风俗美好，是因为那时候是仁义并用的。表现在内就是有敬天的心，表现在外就是有效法天的施政手法啊！后世的治理之所以比不上古代，是因为后世的政治是在用仁用义上有所偏失，因而不能够审度时势，那么对于天来说就或者表现为轻亵不恭敬，或者表现为违逆不知效法了。

我们的太祖高皇帝是承接元朝人所积聚的弊病而统治天下的，因此他创建制度订立法规所采用的手法，大体上是以严厉作为根本。到了天下已经安定了，又告诫神圣的子孙们不可以再用开国初年的法典。像这样仁义一齐施行，刚柔互相调合，正是观察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审查了事物产生或灭亡的具体情况，从而为万世利益考虑得很深远啊！但是，因为国家承受平安的时间已经很长久，君主世世圣明，功绩相继，累世升平，人民的心志因而就一天天向往玩乐休息，政事和制度就一天天地在苟且因循中被荒废。自从正德年间以来，这种弊端到达极点了。到了陛下入宫继承皇位时，才开始振作起来，从而使面貌为之一新。所以自从皇上统领天下十七年以来，旧的被破除，新的得以建立，隐藏的人奋起，贫困的人复苏，天下人都高高兴兴，都目睹太平景象了。然而陛下还因为有官吏害国殃民而感到治理有不足，心情像是羡慕并追比夏、商、周三代的英明君主，还没赶上那个时代一样。臣下我愚蠢地认为，虽然尧舜在上面当君主，但是下面不可能没有小人，这在于君王驾驭他们要有方法就是了。驾驭的方法就是臣下我在前面所讲到的仁义交用的方法了。

曾经听到这样的说法：法规禁令不能够贯彻，是由于上面的统治

者违反了法规禁令。而老百姓之所以敢做不合法的事，是由于贪婪凶暴的众官吏启导了他们啊！现在天下这么广大，在朝廷上和在君王身边难道会没有秉义竭忠的大臣？然而违反君王所好，各立朋党互相结仇的人不是完全没有啊！在百官和各机构中难道会没有辅佐政事率领百官遵法办公的大臣？然而借用权力胁迫别人消灭对手，欺骗皇上谋取私利的人不是完全没有啊！在城邑及各藩省中难道没有周遍地宣传王命的温和仁德的大臣？然而违反法规求取名誉，空领俸禄以养名望的人不是完全没有啊！有的人甚至榨取人民的膏脂来养肥自己的家，窃取君王的宠爱来张扬自己的官势，掠取众人的优点用来展示恩德，放纵自己的私心去破坏国家法度，这些人不是完全没有啊！陛下对大臣尊重有礼，时间越长就越加亲爱，对群臣体谅关怀的用心只有增加而无减少。对于股肱重臣及出谋策划同心协力的辅政者，实在常常是用恩德去安抚，用礼去驱动的。不过对于那些不改悔的人就得明加处罚以整顿法制，惩处一个人以警戒其他人。这样做就犹如春暖之后有雷雨的威势来起震动作用一样，使天下人正在感谢陛下的仁德的时候，却又畏惧陛下的法制，那么有什么事不可推行呢？

虽然是这样，处在现在的形势，应当使用义的地方，并不只是一概用来驾驭大臣的。夷狄跋扈，从而在西北方横行，那么出征攻伐的军队是不可以不加整顿的；民众僭越礼制，从而比拟于君王的规格，那么禁止奢侈的措施是不可以不严厉的；军队疲弊，从而作战缺少勇敢，那么检查挑选的规章是不可以不严格的。所有这类的情况，都需要靠精明的治理，促进浑厚的体制。要确立君王政治的纪纲，要走上中兴的道路和建立盛世的功业，讲治道没有比这更为首要的了。

但臣下我又听说，养育仁而有义，这就是君王的政治。主宰这种政治的就是心。所以一定要有纯正的君王心思，这样才会有纯正的君王政治。而要效法上天施政，如果说没有敬天的心是不可以实行的。臣下我曾经庄重地诵读陛下的《敬一》箴言，因而得以明白陛下的心思，简直是可以表白于天地之间而没有什么可疑惑的。有恩德不予以提升，这是违反上天所喜欢的，岂敢不尊敬天呢？有罪恶不作惩罚，这是违背上天所憎恶的，岂敢不尊敬天呢？把这种尊天的思想常常保存

在心里，小心谨慎，不要失误，这样做然后才懂得政治啊！仁完全可以养育天下，因而天下没有人不归于仁；义完全可以端正天下，因而天下没有东西比义更强有力。摹仿上天而施政，由于这样而会合政治的大全；感通上天而建立功劳，到达这境界就是达到了政治的最高成就了。虽然是这样，敬也是不容易说清的，在隐约细微之间，真实与荒谬是错综复杂的，只差误一毫一厘，就会有千里大的错误。假如观察辨别的功夫不全部注意在微细的迹象上，坚持的功夫不继续花在致力工作上，那么人就要凌驾皇天，私欲就要夺占天理，又怎会懂得在应该体现仁的地方要体现仁，又怎会懂得在应该使用义的地方要使用义呢？所以说：不要三心二意变来变去，行事要考虑到所讲的话，结束事情时要如同开始时那样，要清静虚无不要有欲望，一天天不停地有新的进步。如果是这样，那么陛下的话语实在可以讲得上是能够自己获得借鉴了。破除弊端革掉私心的方法和使用仁德去养育万物、使用义法去断定事情的方法，怎么能从这以外去求取呢？

臣下我在此文的开始时用仁义并行的施政方法禀告陛下，结束时就勉励陛下要努力地去求取恪守诚敬符合精一的功效。起初我并非有要引起社会震惊的和值得人们为之喜悦的论说，只不过是直率地认为陛下既然要通过听取言论来选拔士人，因而臣下我就献言给陛下，目的只是为了表明我的思想。对上来说不敢辜负皇上圣明的询问，对自己来说不敢辜负自己的学问罢了。希望陛下怜恕我的愚妄，不治我的罪，从而留心采纳我的意见。臣下我一片诚恳冒犯得罪了圣上，真是罪该万死。臣下我谨慎地对答如上。〔杨能译〕

罗珵　殿试对策

罗珵（1493～1541）字邦珍，号焰斋，泰和(今属江西)人。天性好学，每闻人有奇书，必借来览阅，且做抄录。尤为喜诵当代典章，并将应予施行者特加标列。嘉靖十七年(1538)榜眼，例授翰林院编修，时年46岁。后三年，卒于官。

臣对：臣闻人君法天以为治，有仁以育天下，必有义以裁天下。夫天之于物也，有春生必有秋杀，有长养必有敛藏。非有心于物也，公而已矣。不如是，不足以为天道也。人君宰制天下，向明而治，所以成一统之治、系四海之心者，亦惟法天之公而已矣。是故庆赏爵秩，懋官懋禄，所以奔走天下之豪杰。仁以为治，犹之天之于物，春以生之也。威严以督责，教戒而惩创，所以振起一时之怠惰。义以为治，犹之天之于物，秋以止之也。故一于仁，则流于姑息，其失也则纵。一于义，则流于苛刻，其失也则严。仁义并用，恩威兼举，久安长治，不外是也。然仁义之为施虽殊，而君人之为心则一。是故父母之于子也，抚摩而鞠育之，爱也；劳苦而鞭策之，亦爱也。知天之于万物之心，则知父母于子之心矣。知父母于子之心，则知人君于臣之心矣。故曰父母爱之，喜而勿忘。父母恶之，劳而无怨。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唐虞三代所以成雍熙悠久之治者，仁义无偏举之弊也。汉唐宋所以治不古若者，或一于仁，或一于义，均之各有所失也。

钦惟皇帝陛下，刚健纯粹之资，高明光大之学。仁以育万民，而天下皆覆冒于阳春姁煦之内；义以正万民，而天下皆震竦于风行电刷之余。道洽政治，大法小廉，十七年于兹矣。乃谓承平既久，玩愒或生，慨然欲兴起而振刷之，万几之暇，进臣等于廷，而赐之清问。臣有以知陛下之心，即天地之于物，父母之于子也。臣虽至愚陋，敢不摭拾所闻以对乎？

夫世之称极治者，曰唐虞，曰三代。然稽诸往牒，考之前闻，则其治道班班可见。故称尧曰其仁如天，称舜曰其德好生，固也。然而四凶之诛，三苗之伐，其于义未尝偏废也。称禹曰文命四敷，称汤曰德及禽兽，称文、武曰仁厚立国，固也。然五刑之用，五罚之训，八刑之纠，其于义亦未尝偏废也。虽曰不赏而民劝，不怒而民威，未施信而民信，未施敬而民敬，而威克爱克，刚克柔克，威福予夺，抑扬进退，一张一弛，以抚世酬物者，固未尝得此而失彼，举一而废一也。故天有阴而无阳，则所以覆万物者，或几乎息矣。地有柔而无刚，则所以载万物者，或几乎息矣。君人者仁而不足于义，何以赞天地之化育，以并立而为三哉？

《传》曰：刑罚不可弛于国，征伐不可弛于天下，鞭扑不可弛于家。彼以去义为言，是岂知治体之所尚乎？又有王者尚德缓刑之说，圣人遭时定制之说，是曲儒之偏见，而不知圣人为治大中至正之道也。夫人之情，大抵乐放肆而恶检束，喜便安而严准绳，不知人君所以驭臣下者，仁与义而已矣。仁非姑息之谓也，所以结其心也；义非惨刻之谓也，所以闲其邪也。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以教祗德。穆穆明明，惟德之勤；率乂于民，以棐其彝。古之圣帝明王，岂不欲与天下相安于无事哉！知天下之君子固常多，而小人亦不少；知天下之慕仁者固常多，而不畏义者亦不少。故仁义并用，威惠并举，仁以主之，义以辅之，惠以维之，威以慑之。无偏而不全之敝，固不一于仁而忘乎义也；有兼用并用之美，固不专乎威而弛乎惠也。唐虞尚矣，夏之四百，商之六百，周之八百，且过其历，何莫而不本于此哉？是虽三代之人心，忠信诚悫，而三代之英君谊辟，所以维持天下之具、防范人心之道者，则一言以蔽之曰：仁与义而已矣。

臣尝观之，天下之日趋于变也，犹江河之日趋于下也。然挽而回之，其机端有在也。我皇上励精图治，风励天下，大小臣工，奉承休德，百工既已惟时，庶绩既已惟凝，轶唐虞三代而侔祖宗矣。而恬嬉之念犹不忘焉，圣策之所虑，臣不敢谓其必无也。是故廉耻之道或丧，而利之是趋；刚介之节或渝，而欲之是纵。室家之念系，而国或罔念矣；囊橐之心横，而民或罔恤矣。上下纪纲，愆而不修，国之礼度，其何赖焉。宵旰勤劳，视民如子，而司民牧者，恬不加意。此圣虑所以拳拳而不能已也。

臣惟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臣愿陛下宪天聪明，明示意向，务令天下改弦易辙。奖恬退以励士风，抑奔竞以端习尚，则素丝羔羊之节著，而惟利是贪者无足虑矣。精介自持者必录，贪墨自污者必摈，则琴鹤自随之士见，而惟欲是纵者无足虑矣。公尔而忘私，国尔而忘家，何有于国之罔念乎？恫瘝之在乃身，饥寒之切其体，何有于民之罔恤乎？至于上下礼度，则我祖宗之成宪，异代如见；我皇上之制作，万世不刊。申戒所司，各遵彝则，上下有章而民志定矣，贵贱有等而朝廷尊矣。否则，天冠地屨之分、森不敢犯者，彼将何可逃哉？其

驭民也，令其不以催科先抚字，不以茧丝先保障，而凡负国虐民者，摈而弃之，终身不齿，则龚遂、卓茂之辈，宽恂、黄霸之徒，民受其福，国承其休矣。否则，以私灭公之法、凛不容谊者，彼将何所赎哉？

凡臣所愿于陛下者，固非欲一于义而弃乎仁也，亦非欲一乎治而忘乎教也。皋陶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箕子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陛下之深仁厚泽，至恩美意，固已浃民肌肤，沦民骨髓矣。然所以行乎义者，正所以济乎人也。所以正之者，正所以教之也。仁与义并行而不悖，治与教兼举而无遗。上有道揆而下有法守，臣惟钦若而民惟从乂。唐虞三代之休，复见于今日，功光祖宗，德流后裔矣。而何有于用义严刻、任刑为治之虞乎？惟陛下一转移之间，而天下皆已改观易听，洗心涤虑矣。俄顷功化，神速如此。抑臣学之孔子而有闻焉。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又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张，文、武不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此在今日，除敝革私之道，仁育义断之方，无有出于是焉。

臣不敢漫为臆说，干渎聪听，伏惟陛下采而行之，抑臣于篇终尚有献焉。臣愚，又闻之曰：为治之道，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夫天以春夏成万物，而长用于生育长养之地；以秋冬止万物，而常积于空虚无用之地。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民爱之，善教得民心。故称舜德之罔愆者必曰：宥过无大，罪疑惟轻。又曰：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夫圣人制刑，特以为辅治之具，而期于无刑，则又圣人之初意也。伏愿陛下必如舜之眚灾肆赦，德洽民心；必如汤之开释无辜，亦克用劝；必如文之怀保小民，敬明乃罚。宽而有制，从容以和，立精明之治功，存浑厚之治体，于整齐严肃之中，寓曲成造就之意，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宸严，无任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君主效法上天来进行治理，具有仁德来化育天下，也就必定有正义来裁制天下。上天对于万物，有春季让它

们生长，也就必定有秋季让它们死掉；有夏季对它们加以养护，促使它们茂盛，也就必定有冬季对它们加以收敛，叫它们藏伏。这并不是上天对万物有什么偏心，只是显示公正罢了。不像这样，就不足以形成天道。君主主宰控制天下，面向最盛明的南方进行治理，用来形成全都服从政令的大治局面，拴系住各地的民心，也只是效仿上天的公正罢了。因此福庆封赏，爵位品级，授给官职以示激励，赐给俸禄以示劝勉，都是使天下豪杰贡献出力量的办法。按仁德进行治理，犹如上天对待万物，用春季来化生它们啊！威猛严厉，督察责成，教诲告诫，惩罚严办，是使一时间的怠懈懒惰重新振作起来的方法。按正义进行治理，犹如上天对待万物，用秋季来制止它们啊！所以完全靠仁德去办，就会扩展成过分的宽容，毛病出在放纵。完全按正义去办，就会扩展成太苛刻，毛病出在太严厉。仁德和正义一起使用，恩惠与威势同时施展，长治久安不会在此之外。然而仁德和正义的施行尽管不同，但统治人民的用心却是一样的。所以父母对于儿子，亲切抚摸而养育他们，这是疼爱；让他们辛劳受苦而督促他们，也是疼爱。明白上天对万物的用心，也就明白父母对于儿子的用心了。明白父母对于儿子的用心，也就明白君主对于臣民的用心了。所以说：父母疼爱自己，自己高兴但不忘怀；父母痛恨自己，自己辛劳但不怨恨。又说：只有上天耳聪目明，只有去效法圣人。唐尧虞舜和夏商周形成太平长久的大治局面的原因，就是仁德和道义不存在一边倒的毛病啊！汉朝、唐朝、宋朝的治绩比不上古代的原因，就是有的完全靠仁德去办，有的完全按正义去办，综合起来看，各自都有失误的地方。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天资刚健纯粹，学问高明博大。用仁德去化育万民，而整个天下都覆盖在三月阳春的生养抚育之中。按正义去端正万民，而整个天下都在风雷闪电大作之后万分惊恐。治国原则和政事治理非常协调，职位高的官员遵守法纪，职位低的官员都很廉洁，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但仍以为太平的时间一长久，贪图安逸、荒废岁月的现象就会有可能产生，慨然要重新兴起并对这种现象进行刷新，在政务繁忙的空隙当中，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赐予清晰而详尽的询问。臣下我由此也就确有根据地知道陛下的用

心，正是天地对于万物、父母对于儿子那个样啊！臣下我尽管愚昧浅陋到极点，敢不拾取所曾闻知的东西来做对答吗？

世上号称治理得最好的朝代，得说唐尧虞舜，得说夏商周三代。然而验核从前的经典，考察前人的说法，他们的治国大道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得到。所以称述唐尧，就说他仁德像上天一样广大；称述虞舜，就说他仁德喜好化生。这当然是一点儿都不错的。然而惩办共工、欢兜、三苗、鲧这四凶，讨伐三苗，表明他们在按正义去办方面也未曾根本不用啊！称述夏禹，就说他文德教化普遍施布；称述商汤，就说他仁德施布到飞禽走兽；称述周文王和周武王，就说他们靠仁爱宽厚支撑起国家。这当然是一点儿都不错的。然而刺面、割鼻等五种刑罚的动用，五种出钱赎罪的处罚方法的训示，八种在乡间行用的刑法对万民的纠正，表明他们在按正义去办方面也未曾根本不用啊！尽管说不奖赏而老百姓就自己会勉励自己，不动怒而老百姓就自己感到威严的存在，没施布信义而老百姓就自动对朝廷信服，没施布恭敬而老百姓就自动恭敬，但用威势来征服，用仁爱来征服，用强硬手段来征服，用柔和手段来征服，威势和福禄，赐予与剥夺，抑制与扬布，朝前与往后，紧缩与松弛，这些用来驾驭社会、应付万物的东西，原本上也未曾在这方面做得很正确、在那方面却做得不妥当，运用这一手却废弃了另一手啊！所以上天光有阴气却没有阳气，用来覆盖万物的东西，或许就几乎停止了。大地光有柔顺却没有刚硬，用来托载万物的东西，或许就几乎停止了。统治百姓的君主光讲仁德却在正义方面显得不足，凭什么去辅助天地的化生养育，与天地并立而构成三个层次呢？

有的古书上说：刑罚不能在本国内乱用，征伐不能在全天下乱用，体罚不能在家族内乱用。这种说法实际是用去除掉正义来做宣传，哪里明白治国本体所崇尚的东西呢？还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应当崇尚仁德、把刑罚往后放的主张，以及圣人遇到什么时势就制定什么制度的主张，这全都属于迂腐儒生的偏见，而不明白圣人进行治理所遵用的极为适中公正的总原则。世人的常情，大致上都是喜欢放纵而厌恶受约束，喜爱安逸而对法律感到不自在，根本不了解君主用来驾

驭臣下的东西，不过是仁德与正义罢了。仁德并不是说要过分的宽容，目的是联结起他们的心。正义也不是说要特别的苛刻，目的是防止住他们的邪恶。伯夷、大禹和后稷成就各自的功业，只是使老百姓富足起来。司法人员惩治老百姓，是通过惩治教导他们敬重德行。上面庄重地显示仁德，下面明晰地宣扬仁德，只是要让老百姓在按仁德办事上特别努力；对老百姓进行治理，来使他们服从人伦纲常的教化。古代的圣帝明王，哪里不希望与天下人彼此平安无事呢？但很清楚天下的君子固然为数居多，但小人也为数不少；很清楚天下响往仁德的人固然为数居多，但不畏惧正义的人也为数不少。所以仁德和正义一起使用，威势和恩惠同时施展，仁德作主宰，正义作辅助，用恩惠来维系，用威势来震慑。不存在一边倒而不完整的弊病，固然就不完全靠仁德而忘掉用正义。具有兼顾到而一起运用的完美，固然就不专仗威势而放松掉恩惠。唐尧虞舜很久远了，夏朝统治天下四百年，商朝统治天下六百年，周朝统治天下八百年，而且超过了它们注定的享国年数，又有哪一朝不是依据这一点呢？这表明，尽管夏商周时期的人心忠信诚实，但夏商周三代的英明国王，用来维持天下的工具和防范人心的措施，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仁德与正义罢了。

臣下我曾经做过观察，天下一天比一天往坏处变化，就像江河一天比一天往低处流淌。然而要挽回这种局势，那个契机确实是有固定安排的了。我皇上励精图治，激励天下，大小官员都承奉美德，百官已经全往好处努力，各种功绩已经全都建成，超过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并配得上我朝祖宗了。然而对文臣武将不想国事、习于安逸享乐的顾虑仍然忘不掉，圣上策问中所担忧的问题，臣下我不敢就说一定不存在啊！因而人要懂得廉耻的这种准则有的人却丧失掉了，只是倒向私利；刚直耿介的节操有的人却改变了，只是放纵情欲。心里时刻挂记着自己的家庭，而国事有的根本不去想了。聚敛私财的心思横下来，而百姓有的根本不去体恤了。上下之间的等级关系，逾越而不修明，国家的礼法制度，还能依赖什么呢？皇上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看待百姓如同自己的儿子，可地方官员却一点儿也不费心思。这是圣上的忧虑一直不能够消除的原因啊！

臣下我想来,同样是这些民众,夏商周三代依靠正直的准则驱使他们。臣下我希望陛下效法上天的耳聪目明，明确地指示朝廷要达到的目标,务必让天下彻底改变过来。奖励不追求功名利禄的人,来激励读书人的风气;抑制投机钻营的行为,来端正社会的习尚,这样就会使官员节俭正直的风操大为显著，对那些只是贪求私利的人就值不得忧虑了。精纯耿介自我守持的人一定要录用，贪赃枉法自我玷污的人一定要摒弃,这样就会使离职还乡仅仅有琴、鹤跟随在身后的国士显现出来，对那些只是放纵情欲的人就值不得忧虑了。让你把公家放在心上而忘掉自己本人，让你把国家放在心上而忘掉自己的家庭,还有什么国事根本不去考虑的呢?病痛就如同在你们这些官员身上,饥寒就如同你们这些官员亲自遭受,还有什么对百姓根本不去体恤的呢?至于上下之间的礼法制度,我朝祖宗已有成套规定,在后世如同亲眼看见;我皇上的制定创作,永远也不会改变。命令告诫所有部门,各自遵守常规,这样就上下具有标志而民心也稳定了,贵贱具有等级而朝廷也尊贵了。否则的话,面对就像天是帽子、地是鞋子那样做区分而森严不敢触犯的规定,触犯者又将怎样逃避掉呢?官吏管理民众,命令他们不许把催逼赋税放在安抚养育百姓的前面,不许把征收赋税放在保守护卫百姓的前面,凡是辜负国家、虐待百姓的官员，摒弃他们，一辈子不准再做官，这样就会涌现出汉朝龚遂、卓茂、寇恂、黄霸那样的官员,百姓蒙受他们的福佑,国家承受他们的良好作用了。否则的话，面对因私人灭掉公家必加惩办的法律凛然不容挽回的规定,犯法者又将用什么去赎罪呢?

凡是臣下我希望陛下做的事情，压根就不是想要安全按正义去办而丢掉仁德，也不是想要完全靠治理而忘掉教化。舜的大臣皋陶说:上天要任命具有德行的人,创制了五个等级的服装和五种纹饰标志啊!上天要讨伐犯下罪过的人，施加五种刑罚和五种处置方法啊!商朝大臣箕子说:只有君主才有权赏赐福禄,只有君主才有权施用刑罚。陛下深厚的仁德恩泽和达到极点的恩惠以及美好的用意，原本已经深入到百姓身上和骨髓里去了。但是行用正义，目的正是救济人啊!端正他们,目的正是教化他们啊!仁德与正义一起行用而不相

互违背,治理与教化同时施行而没有遗漏。上面具有原则标准,下面具有法度职守,臣僚只是恭敬顺从,百姓只是服从治理。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美好政治在当今重新出现,功业光大祖宗,仁德流布后代了。这还有什么按正义去办就严厉苛刻、专用刑罚进行残暴治理之类的忧虑呢?只在陛下一转移之间,而天下都已经改变视听,彻底转变思想了。一瞬间就功业和教化形成,神速到这种地步了呀!但臣下我从孔老夫子那里学习学说,又有所闻知。孔子说:施政宽大,老百姓就怠慢,怠慢就用严厉来予以纠正。施政严厉,老百姓就伤残,伤残就施行宽大。宽大与严厉相互补充,施政因此协和。又说:绷得紧紧的而不放松,周文王与武王是做不到的;光放松而不绷紧,周文王与武王是不去做的;既绷紧又放松,这才是周文王与武王的做法。这在当今,有关消除弊端、革除私欲的对策,用仁德化育、按正义裁断的方法,没有超出孔老夫子所讲的那两段话之外的了。

臣下我不敢胡乱编造没有根据的说法,冒犯亵渎圣上的视听,跪拜只请陛下采纳施行,不过臣下我在答卷的末尾还有意见献呈。臣下我很愚昧,又听说过这样的话:进行治理的原则与方法,仁德可以过头,按正义去办却不能过头。上天通过春季和夏季成就万物,而长时间在化生培育、成长养护上面起作用;通过秋季和冬季止息万物,而常常把阴气聚积在空虚无用的处所。孔子说:用政令来训导百姓,用刑罚来整治百姓,百姓只是暂且顺从免受制裁,但却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来诱导他们,用礼教来整顿他们,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归服。孟子也说:美好的治理赶不上美好的教化能获得民众的拥护。美好的教化,民众对它很喜爱;美好的教化,会赢得民心。所以皋陶称述虞舜仁德没有偏差就一定说:宽恕不是故意犯下的过失,过失再大也予以宽恕。罪行确定不下来,就只按从轻的原则处罚。又说:小心啊!小心啊!对动用刑罚一定要特别慎重。圣人制定刑罚,只是把它作为辅助治理的工具,而目的在于没有刑罚再能对人动用,又是圣人最初的意图。跪拜敬请陛下一定要像虞舜那样对无意过失造成危害的,可以赦免,使仁德深入人心;一定要像商汤那样释放无罪的人,能够激励百姓;一定要像周文王那样关心保护百姓,庄重地宣明那套刑

罚。从而宽大又有制度，从容不迫，实现协和，建立起精明的治理功绩，保存浑厚的治国大体，在整治划一、严厉肃正的里面，寄寓着设法成全、培养造就的意向，这样一来，天下就万分幸运，国家就万分幸运了。臣下我是一个民间的卑贱读书人，不懂得忌讳，触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袁炜　殿试对策

袁炜(1508～1565)　字懋中，慈溪(今属浙江)人。嘉靖十七年(1538)探花，授编修，进侍读。其才思敏捷，世宗常中夜出片纸命作青词，举笔立成。遇中外献瑞，辄极词颂美，以此称旨，骤擢礼部尚书。又以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后以疾归，卒谥文荣。有《袁文荣诗略》行世。

臣对：臣闻圣王之弘化于天下也，有孚天之德，而仁义之具也无所偏；有宪天之政，而治教之行也无所悖。夫不偏而后德之本诸身者，见中正之轨；不悖而后政之达诸民者，见皇极之敷。德焉中正，而孚天之妙尽之矣。政焉皇极，而宪天之道尽之矣。夫是以育诸仁，而天下莫不循其教以为劝；断诸义，而天下莫不顺其治以为惩。纪纲理而庶官以贞，人心正而风俗以美，精纯和粹之化，不亦四达而大同乎！治古之君有见于此，其蕴之而为德也，仁义未始不相须；其发之而为政也，治教未始不相济。是故当时之人，咸知夫君之有所爱者，固所以仁天下，而其有所不爱者，亦所以仁天下，罔不洗心涤虑，防贪窒欲。而在位者皆廉吏，在野者皆良民，敏德以从乂，时雍而迓衡。治古之化，迥乎弗可及也已矣。三代以还，是说不明，孚天之德既荒，宪天之政亦敝。偏于仁以敷教者，不免于因循怠弛之病；偏于义以饬治者，或罹夫严刻苛切之愆。此所以惠衰而教衰，刑肃而俗弊，宠赂章于有位，礼义溃于匪彝，而化理之所成者，终不能登之于古也。

钦惟皇帝陛下，天纵之资，既有以涵乎仁义之懿，而日跻之敬，又有以慎乎刑赏之权。惠行而天下欣戴，威发而海内震栗，廉耻达于君

子，信义行于小人。中兴之治，固有咸五登三，而陋汉唐宋于不居矣。然犹虑仁恩之过，或足以长淫纵破义之风，而德教之专，不能无刓敝不振之患。乃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而咨以除敝革私之道，仁育义断之方。是将以明作之功，济惇大之裕，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也。臣濡沃陛下仁义之泽，范围治教之中，盖有年矣。敢不掇拾所闻，以对扬休命于万一乎！

臣窃惟天道运于上，而万物资始者，阴阳之相裨也。地道运于下，而万物资生者，刚柔之相济也。使天地有阳而无阴，有柔而无刚，则化生形色，何自而各正性命也哉？夫天地者，人君之父母也。人君者，天地之子也。人君继天地而为之子，则任德以行吾之仁，而类其生殖长育者；任刑以行吾之义，而类其震曜杀戮者。信乎！可相有而不可相无矣。古今帝王，未之有改。故如天之仁，好生之洽，尧舜之所以仁天下也。而四凶之诛，有苗之北，未尝不裁之以义焉。文命之敷，兆民之殖，咸和之施，三王之所以仁天下也。而升陑之师，密黎之戡，亦未尝不治之以义焉。

司马迁曰：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弛于国，甲兵不可偃于天下。盖言义之所以成乎仁也，刑之所以弼乎教也。彼去义之论，宋儒容或有见，而折诸圣经三才之旨，不亦失于偏乎！是何也？人君之为国也，有元气，有神气。深仁厚泽，优游而浸灌焉者，所以培元气也。明罚敕法，果敢而奋厉焉者，所以作神气也。《传》曰：昭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其是之谓乎！说者徒以汉文之玄默足以措刑，而汉宣之严毅祇以开衅，宋仁之恭伦足以延祚，而神宗之厉精适以滋乱。遂谓义之可去，而刑之不必任也。而岂知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成者乎？是贤者之言，不免于私反，而圣人之经，信百王不易之轨矣。

臣又伏读圣策曰：今之人尤天非贤者，及人君才一用义，即谓严刻。乃作言曰：上任刑以为治，非三代之治也。却一不之反于己。三代之人皆人也，不待义临而自恃，惟恐放侈。今之人果三代之同欤？至哉皇言！真足以破世俗之见，而启复古之机也。盖以三代之君，仁渐义染，礼陶乐淑，而所以化导乎天下者，固不专恃乎刑罚之加。然淫用匪彝、率怠弗协者，未始不绳之以法。故夏有官刑，商有汤刑，周

有祥刑，皆所以赞吾德教之所不及也。谓任刑为三代之治固不可，谓三代之治去乎刑，岂得为通论哉？又况政教章明，人心丕式，不临之以义，而莫非畏义之士；不迫之以刑，而皆切怀刑之心。贵名检而贱放侈，重节行而恶贪叨，三代之人，固不可得訾也已。

然臣窃因是而疑焉。陛下临御以来，十有七年于兹。仁以育之，而被其泽者，广博而深厚；义以断之，而服其明者，迁善而敏德。是宜洒濯其心，明徵其度，在位者励《周官》之六计，而临民者畏杨震之四知。利不贪而纯心以报国，欲不纵而苦节以厚民。《羔羊》之风，上匹乎周，而阖郡不举之耻，下刷乎汉，可也。而何怙天之仁，而不知检之以义？裴宽之鹿，未见其瘗也，而储椒如元载者不能无。羊续之鱼，未见其悬也，而耀幛如王恺者不能免。清介如赵抃不多得也，而罔不酌贪泉以自爽。俭素如杨绾未之有也，而莫非欲竟泽以为渔。上负君国而弗之悟，下瘵民生而弗之恤。吏治如此，乌足以臻三代之化哉？

夫直道无间于古今，而斯民可追乎三代。古以义，今以利贪；古以理，今以欲纵。是岂三代终不可企乎？无亦陛下之所以教之者纯乎仁，而所以治之者，未尽断以义欤？夫吏以赇败，则终身不齿于缙绅；政以贿成，则禄位不甄于清要。古之所以训廉者，如此也。陛下诚能不循姑息，不挠权贵，清操自厉者，擢以不次之位；贪墨不法者，加以不贷之刑。则赏罚以公，功罪以当，吏治不有瘳乎？国之与民，不亦具有赖乎？

臣又伏读圣策曰：朕祇承天位，惟民是保。何官人者皆负国虐民之图，奚为用哉？呜呼！陛下兴言及此，实天下生灵之福也，宗社无疆之休也。在昔皋陶之谟曰：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安民则惠。此论官理民之所必稽也。臣观陛下践祚以来，孜孜保民，精选举以公人仕之途，严考课以杜冗官之弊，而又裁抑侥幸之风，痛惩奔竞之习，科目必得乎真才，铨曹必核其实行。凡所以慎于知人而笃于安民者，无弗详且密也。而吏不廉平，一至于此，陛下何赖于斯人而用之哉？则夫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如丘明之所载者，可行也。辨贤否以别忠邪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如荀悦之所论者，可行也。不然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僖伯之言，

可鉴矣。

夫敕刑以警贪，正义以防欲，固陛下孚天之德，达宪天之政矣。然化裁必本于身，而推行当自于近。何者？后宫有大练之饰，则天下以纨绮为羞；大臣有脱粟之节，则天下以膏粱为愧。陛下惟怀永图，慎乃俭德，自宫阃而达之朝廷，自朝廷而达之天下，则清化行而人皆浴德，大义孚而士皆惇节，孰肯自陷于簠簋不饰之地，以上负吾君，下虐吾民也哉？

然圣策之终，策臣等曰：尔多士师孔子之学，必心孔子之心。将此心之平正，陈为篇，例以除弊革私之道，衍为仁育义正之方，以告我。是陛下圣不自圣，询于刍荛之心也。臣闻孔子之学，在仁育而义断，而帝王之治，贵观变以协中。是故过于仁则政宽民慢，而教焉有所不行。过于义则政猛民残，而治焉有所不继。伏望陛下变通以尽其利，鼓舞以尽其神，惠有所当加，赏不以无功而得，如《书》所谓爵罔及恶德、官不及私昵者，而后可也。威有所当立，罚不以无罪而施，亦如《书》所谓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者，而后可也。仁义交相为用，治教并行不悖。兹非愚臣之拳拳于陛下者乎！不然，汉元非无仁也，而优柔不断，终以基新室之祸。汉明非不义也，而苛察过当，终不足于弘人之度。将以除敝，而敝日滋；将以革私，而私日固。其何以惩庶官之贪，而示帝王之神武哉？

虽然，仁可过而义不可过，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今日之患，正坐于仁之过而义之不足也。何则？纪纲，所由以出治也。而今或上下无别，贵贱无章，不能无陵替之患。振而举之，不有望于凭河之勇乎？守令，所恃以安民也。而今或以利灭义，诬上行私，不能无瘝官之诮。饬而厉之，不有望于黜陟之严乎？将帅，所以握兵而卫国也。而或付诸乳臭之童，甚者晚唐倩帅，复见于今矣。厘而正之，不有望于纠纠之宸断乎？刑罚，所以诘奸而惩慝也。而或委诸吏胥之手，甚者刻木不对，诚可哀痛矣。督而责之，不有望于明明之庙谟乎？凡此皆今日玩弛之敝，而陛下所当武断而不恤者也。虽然，救敝固存乎正义，而精义又在于知几。使几有不知，则理欲混淆，真妄错杂，未有不以义为利，而以利为义者矣。

伏望陛下清心讲学，极深研几，见天下之赜而不乱，通天下之故而不遗。由是以仁惠天下，则天下莫不以为恩；以义威天下、则天下莫不以为武。庶官惟叙，百姓用康，而王道神矣。《易》曰：惟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愿陛下加之意焉。臣草茅不识忌讳，惟陛下矜其愚，不录其罪，则愚臣幸甚，天下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王弘扬教化于天下，要有符合天的品德，于是仁与义都得具备而不能偏用；要有效法天的政治，于是治理与教化推行起来才不会相冲突。因为不偏用所以本于自身的德就表现为中正的轨道；因为没有冲突，所以政治施布到民间就表现为君王法则普遍施行。德表现为中正，于是符合天的微妙作用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政治表现为君王法则，于是效法天的统治手法就完全表现出来了。这样地去培育仁德，天下没有人不遵循这种教导并且用它来作为勉励；这样地去秉公断事，天下没有人不顺从这样的政治并且用它来作为惩戒。纪纲整顿好了于是众官员行为就贞洁，人心端正了于是风俗就纯正美好，精良纯粹和平纯朴的教化不也就可以到处渗透，从而大同社会就可以实现了吗？古代治世的君王看到了这一点，当他们的德在蕴藏起来时，仁与义未必是不相关的；当他们把德表现出来施布政治时，治理教化未必是不互相调剂配合的。所以当时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君王有所爱，必定能够用仁治理天下，即使他们的君王有所不爱，亦能够用仁治理天下。他们没有不洗涤心志思虑，去防止贪心堵塞欲望的。因而在职的人都是廉官，在野的人都是良民，迅速修德顺从治理，和睦地迎来吉福。古代治理取得大成就的事已经遥远得不可追及了，从夏、商、周三代以来，这样的讲法不彰明，符合上天的德已经荒废，效法上天的政治亦衰落。偏于用仁去施布教化的做法，不免有因循守旧怠惰松弛的缺点。偏于用义去整顿政治的做法，或者要遭受严厉苛刻的罪咎。这就造成恩惠不庄重而教化衰落，刑罚太严厉而风俗败坏。有官位的宠臣受贿赂彰明昭著，由于违背常规造成礼义崩溃，因而教化治理所取得的成就，最终是不能够追得上古代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天生聪明，既有用来包涵仁义的内在美德，而且一天天地步入恭敬，又有慎重动用刑罚奖赏的大权。恩惠推行时，获得天下人欣然拥戴。表现出威严时，海内臣民为之震动战栗。使君子能廉洁知耻，使信义能够在小人物中间推行。中兴的政治实在等同于五帝超越了三王，从而把汉唐宋各朝的政治看作是浅陋不可取的了。然而还考虑到施仁恩的过份，也许足以会使放纵淫欲破坏义法的坏风气滋生，因而对专事德教来说，就不可能没有凋敝不振作的忧患。于是宣召我们臣下等人到朝廷，向我们作精审详问，咨询有关革除弊政私心的途径及培育仁德秉公断事的方法。皇上这样做是准备努力地建立功勋，成就宽厚的政治，使天下人回转心意向往治道啊！臣下我在陛下施行仁义的地方里获得浸润灌溉，生活在治理教化的环境之中，有很多年了，岂敢不拾取所听闻的内容，用以对答和颂扬皇上的美德功业，希望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呢！

臣下我认为天道在天上运行，于是万物藉此而开始产生，是由于阴阳两种气体互相交替起作用造成的。地道在下面运行，于是万物得以生长，是由于刚柔两种物性互相配合造成的。设使天地之中只有阳而没有阴，只有柔而没有刚，那么化育生长的各种形体颜色，何以能够各自获得生命的基础呢？天地是君王的父母，君王是天地的儿子。君王继承天地而成为天地的儿子，那么就要任用德治来推行我的仁政，类似天地具有生殖长育万物的功能作用一样；要任用刑罚来推行我的义法，类似天地具有震动照耀杀戮万物的功能作用一样。两者真是只可以互相有而不可以互相无的。古今的帝王没有人能改变这种做法，所以如同天那样有仁德，用爱惜生灵的美德去沾润人民的心，就是尧舜用仁治理天下的做法了。然而诛杀四凶，击败有苗的做法，就未曾不是用义法去裁断的。普施文德教化，养育亿兆人民，使万邦协和，就是禹、汤、周文王和武王用仁治理天下的做法了。然而汤的用兵从陑山取道伐桀，以及西伯的伐密与戡黎的军事行动，亦未曾不是用义法作治理的了。

司马迁说：在家里不可以废弃鞭打教育，在国中不可以松弛使用刑罚，在天下不可以废除武装。这是说使用义法是用来成全仁政的，

使用刑罚是用来辅佐教化的。那些不用义法的论点，宋儒或许有人有这样的见解，然而用圣人经典去作判断，天地人三才的意思不也就有失于偏了吗?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君王治理国家，要有元气，要有神气。仁德深施恩泽厚播，轻松自然地浸灌仁恩，就是培养元气的做法。彰明惩罚整顿法制，果断敢为奋发激励，就是振作神气的做法。《左传》中有句话说:“想起我们君王的风度，样子好像玉，好像金”。这句话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吧！论说者只认为汉文帝的清静无为足可以使刑罚设置不用，而汉宣帝的严厉果毅只会开启了祸端，宋仁宗的恭敬有条理足可以延长国祚，而宋神宗的锐意变法适以造成动乱。于是就讲义法可以抛弃，而且不必任用刑罚。然而这些看法哪里知道所谓独阳不生、独阴不成的道理呢?可见贤者的讲话免不了自相矛盾，而圣人经典中的话才真正是百代君王不可改变的准则啊!

臣下我又跪拜敬读圣上的策问中说：况且现在抱怨皇天诋毁贤者的人，看到君主刚一采用义，立即就讲君主这样做是严厉苛刻，于是发论说，皇上用刑法来进行治理，这不是夏商周三代的施政方法啊!但却一点儿也不向自己反问一下。三代时候的人也都是人，不用义来制约却能自我管教，唯恐自己放纵。现代的人果真同于夏、商、周三代时的人吗?皇上的话真是切中道理啊!真是足以打破世俗的见解，开启复古的关键啊!因为夏、商、周三代的君王们，在仁义的环境中浸染，在礼乐的良好气氛中陶冶，因而所采用的教化引导天下的做法，就必然不会是专靠施加刑罚。然而对于过份违背常规和草率怠惰不和协的人，就未曾不采用法律来惩治。所以夏朝有惩治官员的条例，商朝有《汤刑》，周朝有慎重使用的刑罚，都是用来辅助我使用德教而不见效的地方的。讲任用刑罚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固然不对，讲夏、商、周三代的政治不用刑罚，又哪能成为普遍准确的讲法呢?又何况那个时候政治教化彰明，人心顺从规则，不必施加义法，但是士人们没有一个不是畏惧义法的；不必使用刑罚作为压力，但人们都会深切地怀有怕犯法受刑的心理。看重名誉与礼法而鄙视放任与奢侈，重视节操品行而憎恶贪婪，夏、商、周三代的人实在是不可以非议的。

然而臣下我因此而感到疑惑。陛下统领天下以来，到现在已经十七年了。施展仁德去培育世人，人们蒙受到陛下的恩泽是范围广博而且程度深厚的;使用义法去秉公断事,佩服陛下英明的人都改过向善而且勤勉于德教。这就应该洗涤自己的心灵，明白地证明自己遵循礼法,在位的人勉励于《周官》中所讲的考核官吏的六项内容从而努力工作,治民者畏惧杨震所讲天知地知、我知你知的话从而不敢受贿。不贪图私利和心地纯正地为国家服务，不放纵欲望和坚守节操,使人民得到厚利。《羔羊》诗所歌颂的纯厚节俭,往上就可匹配周朝的政治了，而整个郡不举人才的耻辱，往下就可洗刷汉朝的政治了。但为何仰仗着上天的仁德而不知道用义法检察呢？现在像裴宽那样将别人馈赠的鹿子埋掉的事例虽然未能见到，但像元载那样贪得连胡椒也大加储存的人是不可能没有的；像羊续悬挂鱼以示不受贿的事例虽未可见到，但像王恺那样炫耀铜幛的人却是不可避免会有的；清廉耿介如同赵抃一样的人是不会多得的，于是没有人不在名为贪泉的地方还去饮水而自我失足；节俭朴素如同杨绾一样的人是未见到的，于是没有人不想淘干湖泽来捕鱼。他们对上有负于君王国家而不觉悟,对下有害于民生而不体恤。像这样的吏治,怎么可以达到夏、商、周三代的理想政治呢?

正直的原则是不分隔古今的，当代的人民可以追比夏、商、周三代。古代人们追求义,今天的人追求利,所以造成贪;古代人们追求天理,今天的人追求欲望,所以造成放纵。这样岂不是夏、商、周三代总也不能企及了吗?原因无非是陛下用于教化的内容纯粹是仁的,但治理的手法却未完全采用义去裁断罢了。官吏因为贿赂而名声败坏,那就终身不能列于士大夫的行列;政事因为贿赂才能办成,那就不可选拔为地位显贵职司重要的官员。古代训导官员廉洁的做法是这样的。陛下果真能够不沿袭姑息的做法,不屈于权贵的压力,就应该对自我激励高尚节操的人,加以破格提拔;对贪污不法的人,给予不饶恕的刑罚。那么赏罚就公正,得功或获罪都合情合理,吏治不就有可能好转了吗?国家和人民不也就都有依靠了吗?

臣下我又拜读圣上的策问中说：皇帝我恭敬地承继上天给予的

王位，去保护人民。为何当官治理人民的人都有辜负国家虐害人民的想法呢?要他们还会有什么用呢?哎!陛下告谕这番话,实在是天下人民的福气啊!是国运永久的好事啊!从前的《皋陶谟》说:在于了解臣下,在于安定民心。了解臣下就显得明智,安定民心就受人爱戴。这些话是强调对官制和治理人民是一定要去探研的。臣下我观看陛下自登皇位以来,努力不懈地保护人民利益。精细地选举人才,使人仕的途径符合公道;严格地考课官员,杜绝冗官的弊病。而且还制裁压抑侥幸心理的风气，狠狠惩罚奔走竞争追求名利的坏风习。使各科目的考试一定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来，命令主管选拔官吏的部门必须核察被选拔者的实际功绩。所有谨慎了解大臣和深入安定民心的工作,没有一样不是做得详细慎密的。但是官吏不廉洁公平,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地步,陛下将要怎样依赖这些人和使用他们呢?那么就要制定俸禄官位用来勉励那些服从的人，严厉地使用刑罚用来威慑那些放纵的家伙,如同左丘明在《左传》中所讲到的那样,是可以实行的了。辨别贤良无能以区分是否忠良或奸邪，核实有功或有罪使施行赏罚有其公道，如同荀悦所论述的那样，是可以实行的了。否则的话，官吏的失德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国家的衰败由于官吏奸邪作恶,臧哀伯的讲话也是值得借鉴的了。

整饬刑律来警戒贪污,标榜正义来防止贪欲,这原本是陛下符合上天的大德，明达效法上天的政治了。然而教化裁制必定要以自身为本,推行起来就应当从就近之处着手。为什么呢?因为后宫中如果有人用粗帛做装饰,那么天下人就会认为穿精美丝织品是羞耻的;大臣中如果有人食用糙米粮表现节俭，那么天下人就会认为食用精美食物是有愧的。陛下要心怀和考虑长久之计，谨慎地躬行自己节俭的美德,从后宫内做起从而推广到朝廷,又从朝廷推广到天下。那么清明的教化就得以推行，人民就都受到道德感化了；大义就让人信服，士人就都敦厚有操守了，谁肯自我陷入做官不廉正的耻辱之地，去做那些对上辜负我们君王,对下虐待我们人民的事呢!

然而圣上在策问的结尾处策问臣下我们说：你们众多的士人学习孔子的学说，必定深深地在心中领会孔子的思想。将这份心得平

正地陈述出来写成文章,归纳出革除时弊与私欲的办法,扩展为用仁德去养育用义法去裁断的治世方略，把这些都告诉我。这正是陛下英明神圣却不自我认为是英明神圣，虚心向下层人民询问政治的用心啊!臣下我听说:孔子的学术重在培育仁德及秉公断事,而帝王的政治，贵在观察事物变化从而求取协调适中。所以过于用仁就会造成政治宽大人民怠慢,因而教化就不能推行;过于用义就会造成政治严厉人民受伤害，因而治理就不能继续。希望陛下能用变通的手法来尽量取得有利，灵活运用尽量做到收有神效，给予恩惠应当有理由,赏赐不能让无功者获得。如同《尚书》中所讲的那样:爵位不要赏赐给品德不好的人,官职不要授予给自己偏爱和亲近的人,然后才可以收到效果。树立威尊应当有理由，不要向无罪者施加惩罚，也像《尚书》中所讲的那样:谨慎啊,使用刑罚要十分慎重啊!然后才可以收到效果。仁恩与义法互相去施用,治理和教化并行不相冲突,这不就是愚蠢的臣下我诚恳地期望陛下所要做到的事吗?不是这样做的话,像汉元帝不是没有施仁,但是他优柔不能裁断大事,终于酿下王莽改建新朝的祸患。汉明帝不是不推行义法，但是他过于苛求失于适当，终于不足够成为有宽弘大量风度的人。准备除去弊政然而弊政却一天天增多，准备革除私心然而私心却一天天更牢固。那又怎么可以惩治众官的贪污,从而展示帝王的神圣威武呢?

虽然是这样,施仁恩是可以越过某种标准的,但推行义法就不能够超过一定的限度，以前人们曾有过这样的讲法了。然而今日的祸患,正是由于施仁恩太过份而推行义法却不达到某种限度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制定纪纲是用来表现出治理的,现在有的情况是上下级之间无区别，贵与贱之间无次序，这就不可能没有上下失序的祸患。要振作起来,不就需要那种光脚过河的勇气吗?设置郡守县令是用来安抚人民的,但是现在这些人有的因为贪求私利而破坏义法,欺骗上级行使私权,这就不能没有旷废官职的讥诮。要加以整饬,不就需要在进退人才升降官员方面特严明吗?设置将师是用来掌握军队保卫国家的。但是有些军职却交付给乳臭未干的年轻人去充当，甚至晚唐倩帅的情况又重见于今日了。要纠正这种衰败状况，不就需

要皇上作出果断勇敢的决断吗!刑罚是用来查究狡诈惩处邪恶的,然而有的刑罚却由吏胥去经手办理,甚至有像刀刻木头那样折磨犯人而审案不必对质的情况,这种极其严酷的审理案件,实在令人感到哀痛。对此要作督促责问,不就需要皇上作出明智的谋划吗!所有这些都是今日玩忽松弛了的弊政,都是陛下应当作大刀阔斧的裁断而不必有所忧虑的事情。虽然是这样,拯救弊政一定要靠端正义法,而精通义法又在于懂得隐微。设使不知隐微,那么天理人欲两者就会混淆,真伪就会错杂,就一定会有以义为利,或者是以利为义的错误出现了。

希望陛下要心地恬静地讲论学术,极为深入地研究精微之理,看见天下有幽深玄妙的事情而心不乱,通晓天下的情状而不遗漏。由此施用仁德去使天下人受惠,那么天下没有人不认为这是恩德。施用义法地去向天下人显示尊威,那么天下没有人不认为这是威武。百官有秩序了,百姓因而康宁,于是王道就显得神圣了。《周易》上说:由于研核事机的微妙,所以能够成就天下的事务。希望陛下留意这句话。臣下我是个粗贱人不懂忌讳,希望陛下同情我的愚蠢,不记我的罪过,那么愚蠢的臣下我就感到很幸运了,天下就很幸运了。臣下我谨慎地对答如上。〔杨鲍译〕

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1547)丁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殿试策问

[嘉靖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人君受天之命而主天下,任君师治教之责,惟聪明睿智,足以有临。自古迄今,百王相承,继天立极,经世牧人,功德为大,是故道统属之,有不得而辞焉者。唐韩愈氏乃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传,至孟轲而止。孟子则以尧舜、禹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之为臣,各有闻知、见知之殊。其详略同异,果何义欤?其授受之微,有可指欤?宋儒谓周敦颐、程颢兄弟、朱熹四子为得孔孟不传之绪,而直接夫自古帝王之道统。果若是班欤?其讲求著述之功,果可与行道者并欤?抑门人尊尚师说递相称谓,而忘其僭欤?汉唐宋而下,虽不能比隆唐虞三代之盛,其间英君谊辟抚世宰物,德泽加于四海,功烈著诸天地者,不可概少。果尽不可以当大君道统之传欤?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体尧舜授受之要,而允执厥中,论人心虚灵之机,而操存弗二。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经》之道明,则天地圣人之心可见,至治之功可成。斯言也,直有以上继皇王道统之正,下开万世太平之基。迨我列圣,克笃前业,所以开天常、叙人纪者,历百八十余年于兹。朕缵绍祖宗鸿绪,登践宝祚,惟敬惟一;叙彝伦,惇典礼,祈天命,拯民穷,思弘化理,以成参赞继立之功

者，宵旰孳孳，不遑宁处。兹欲远绍二帝三王大道之统，近法我祖宗列圣心学之传，舍是又何所致力而可？夫自尧舜、禹文之后，孔孟以来，上下数百年间，道统之传归诸臣下，又尽出于宋儒一时之论，此朕所深疑也。子大夫学先王之道，审于名实之归，宜悉心以对，毋隐毋泛。朕将注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本是上天让孔子成为圣人，又使他多才多艺。

仁和智是天赋的美德，综合了成己、成物的内外规律。

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便和那一乡村的优秀人物交朋友，一个诸侯国的优秀人物便和一个诸侯国的优秀人物交朋友，整个天下的优秀人物便和整个天下的优秀人物交朋友。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君主接受上天的命令而统治天下，负有当君王进行治理和当师长从事教育的责任，只有聪明通达的人，才可以驾驭这一切。从古代到今天，历代君王相继地承接上天的命令，建立纲纪，去治理社会，统治人民，功德很大，所以道统归属于帝王，有不能够推辞掉的。唐代韩愈却讲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相继传授着这个道统，传到孟轲就停止了。孟子则认为尧、舜、夏禹、商汤、周文王、武王作为君王，皋陶、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作为臣子，这两者或者是由亲身看到而了解了道统，或者只是由听到而了解了道统，各有区别。两种讲法详细简略和相同、不同之处，究竟有什么含义？授予和接受这种道统的微妙之处，可以指出来吗？宋代的儒者讲周敦颐、程颢兄弟及朱熹这四个人得到了孔子、孟子所不传的统绪，而径直承接上古代以来的帝王的道统。果真是像这样排列下来的吗？他们那些读书人讲论研求并从事著述的功效，果真

是可以跟推行道统的人相提并论吗？抑或是门生们尊崇老师的学说而你传我、我传你地到处来宣传，从而忘记这样做是僭越行为呢？从汉朝、唐朝、宋朝以来，虽然其政治状况比不上唐、虞、夏、商、周时代那样隆盛，但在这时期之内的英明君主和仁义国王，在安抚社会治理万事方面，把恩德施给了四海各地的人民，在天地之中建立了卓著的功绩，这样的人是不可一律小看的。他们果真全部都不能够承受伟大君主的道统传授吗？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体悟尧舜传授道统的要旨，诚实地保持着那中正的原则，讲论人心所秉赋的灵性，而执持心志不三心二意。我们的成祖文皇帝说：帝王的统治，完全以道为本。又说：明白了《六经》的道理，那就可以看出天地圣人的思想，追求美好的政治也就成功奏效了。这种讲法径直可以上继号称“皇”、号称“王”的那些君主道统的纯正地位，下开将来万世太平的基业。到了我们的列朝圣君就能忠诚对待前人开创的事业，用来开示上天规定的次序，理顺人伦纲纪，到现在已经经历了一百八十多年了。皇帝我继承了祖宗的伟大事业，登上皇帝宝座，恭恭敬敬，一心一意，理顺伦理纲常，重视法则礼制；向天祈求佑护，拯救人民困境；考虑更好地从事教化和治理，以成就赞助天地、继天立极的功勋。日夜努力工作，没有空闲时间安静休息。如今更想继承古代二帝三王所传的伟大道统，效法近代我朝祖宗列圣心学的授受。如果丢弃了这些那又向什么地方下功夫才可以有成就呢？自从尧、舜、夏禹、周文王之后，孔子、孟子以来，上下一千几百年间，道统的传授归属于臣下了，又全部是出于宋代儒者一时的讲法，这是皇帝我深深地感到可疑的。你们这些士大夫学习先王的大道，明白名与实的归宿，应该尽心尽意地对答，不要隐讳，也不要泛泛而谈。皇帝我准备认真地阅览。

李春芳 殿试对策

李芳春 (1510~1584)　字子实，号石麓，扬州兴化 (今属江苏) 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状元，时年 38 岁。以擅撰道教青词超擢翰

林学士，后为礼部尚书，对宗室吉凶大礼及岁时给赐提出建议，被赐名《宗藩条例》。44岁入参机务，兼武英殿大学士。性恭慎，不以势凌人。为政持论平恕，不事操切。隆庆初谏阻修造翔凤楼，旋为首辅，后与内阁成员不合而辞职归乡。卒赠太师，谥文定。著有《贻安堂集》十卷行于世。

臣对：臣闻帝王之治本于道，道立而后，化以之弘；帝王之道本于心，心纯而后，道以之会。心也者，统夫道者也。心有弗纯，则存诸中者，无贞纯精一之懿，其于道也为小成。道也者，弘夫治者也。道有弗粹，则发诸外者，无正大光明之业，其于治也为小康。小成不足以语天道，小康不足以语王道。斯岂帝王之所以继天立极者哉！故本之心也，浑乎天理，而有以裕内圣之基。而后敷之治也，若夫天道，而有以熙外王之业。天德王道，其极一也，然其本则系之学焉而已矣。学以纯心，心以会道，道以出治，治以格天。其在当时也，则帝王之治法以立；其在万世也，则帝王之心法以传。斯其道统之所由肇乎！循之而治，唐虞三代是也。得其似而理，汉唐宋是也。至矣，乌可以与帝王并欤？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体天弘道，因心出治，以上继皇王道统之正，下开万世太平之基。而我陛下，则又神圣从于天，光明缉乎学。而治之所溥，四达不悖，薰蒸透彻融遍。二帝三王道统之传，远绍而无间；二祖列圣心学之邃，近述而弥光。粹乎无以尚矣，乃犹于万机之暇，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且曰：宵旰孳孳，不遑宁处。臣有以仰窥陛下望道矣。臣草茅疲贱，何所知识，可以仰裨圣学之万一？虽然，涵濡圣化，盖亦有年。其于我未见之心、祖宗治道之盛及我陛下心学之精，亦尝佩服涵沫，有以少窥其涯涘矣。敢不敬陈以对扬休命乎？

臣尝闻之，天地未判，道在天地，天地既判，道在圣人。是圣人者，道之宗也。又尝闻诸《书》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是元后者，人之主也。然则道在天下，安得不属之圣人，又安得不属之大君也哉！是故三代而上，位称其

德,达而在上者,莫非圣神,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请因圣问而条陈之。

唐虞以往,书契未立,邈哉无以稽矣。故韩愈、孟轲之所称,率自尧舜而始。愈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孔子。是立功、立言虽异,以言乎道统,则均也。轲谓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是见知、闻知虽殊,以言乎道统,则一也。

然观孔子有志三代之英,而自伤其未逮;伊尹乐尧舜之道于畎亩,而必以吾身亲见为幸。则托之空言者,岂若见之行事哉?此二帝二王之道所以为独盛,而道统之传非帝王莫之能当。何也?夫所谓道者,非徒以其蕴之心也,以其本之心而宣之化也。是故以之经天,则阴阳宣节,天道其清乎!以之纬地,则山川静翕,地道其宁乎!以之总民物之纪,则百姓太和,万类咸若,民物其熙乎!道猷章而道妙流焉,实政乂而实心昭焉,体用一源者也。微帝王,其孰能与于此哉?然求其要,则心焉尽之矣;究其功,则学焉尽之矣。何也?非道无以弘天下之治,非心无以会天下之道。而学也者,所以纯心以体道,凝道以出治者也。大哉学乎!斯固帝王之所不可忽者乎!

是故格于上下,尧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为学者,则曰钦明允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重华协帝,舜之道盛矣。然求其所以为学者,则曰浚哲温恭,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三代有道之长,禹汤、文武之道,亦云盛矣 。然求其所以为学者,则曰勤俭,曰执中,曰缉熙执竞,其所以事其心者,何如其至也!则夫治之所成,黎民於变也,四方风动也,文命诞敷也,万邦惟怀也,燕及皇天也,会朝清明也。唐虞三代之化,巍乎其不可及者,谓不本于此哉?德至此而后谓之天德,道至此而后谓之王道。若夫皋陶、伊尹诸臣赞翊之功,固不可泯。而其宅中图大以恢弘化理,建中建极以丕昭道猷者,则岂诸臣所得而专之哉?故《易》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此之谓也。

三代而降，享国长久者，莫如汉唐宋。其间英君谊辟，抚世宰物，德泽加于四海，功烈著诸天地者，亦不可概少，诚有如圣制所云者。是故汉之除秦苛也，深德吊民之理，以至七制嗣兴，风俗淳美矣。唐之靖隋乱也，汎底定之功，以至三宗迭出，海宇乂安矣。宋振五季之衰也，爱养民力，出生灵于涂炭之苦，而好文守成之主，又绳绳相继焉，不可谓其尽畔于道也。向使尽畔于道，则不足以总一四海，整齐万民矣。又安能历数百年而巍然民上，以握神器乎！后之尚论犹不能无憾焉者，以其学之未纯焉耳。学苟未纯，则蕴之心者不足以语帝王精一之传，敷之治者不足以语雍熙太和之盛，斯岂天德王道之极哉？

夫惟道化衰于上，而后讲学倡于下，此宋之四子所由兴也。以周敦颐言之，学以主静为宗，以一为要，而究其极于明通公溥，不由师传、默契道体者也。以程颢兄弟言之，涵养则曰用敬，进学则曰致知，而又欲以大公顺应天地之常，宽和严毅、殊途同归者也。以朱熹言之，以讲学为入门，以践履为实地，博极群书而会通于心，集诸儒之大成者也。此四子之学之大较也。是其学固亦远宗乎周孔，而授之以政，是亦伊、傅之俦耳。

夫即为伊、傅也，犹不可与帝王并，况无伊、傅之业乎！何也？道在天下，惟帝王为能行。故道统在天下，惟帝王为能传，而臣之贤者能者，则效用仰成于下者也。辄欲接续帝王道统之传，不亦僭乎？故四子者，谓之有功于斯道，可也。以之直接帝王之道统，不可也。何也？不观之天乎！方万物之生也，日以暄之，雨以润之，风以鼓之，雷以动之。夫天穆然深尔，确然静尔，然颂生物之功者，必举而归之于天，而日雨风雷不得而有其功。何也？太和之充，盖天实司之，而日雨风雷不可与天道并，则知臣不可与君道并矣。知臣不可与君道并，则知四子者，不可与帝王并矣。

而后之推尊者若黄榦，则叙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而直以周子继孔孟不传之绪。二程得统于周子先师，朱子得统于二程，而撮其要旨于居敬、穷理、致知、克己四者，而谓千圣万贤，所以传道而教人者，不越于此。至于真德秀则曰：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复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吴澄则曰：周子始有以

接孟子之传于千载之下，二程则师于周子而传其学，后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统之传者也。夫德秀以为道至周、程、朱子而大明，则诚有之。若黄榦、吴澄，遂以四子为直接皇王道统之传于千载之下，递相称述，其论蔓衍波流，直至于今。学者尊之而莫敢违，信之而莫或疑，抑孰知其失之过乎？故四子讲明著述之功，不可谓其无裨于道。而直以为远续道统之传，与帝王并论焉，是诚门人推尊之过，恐亦非四子之心也。

是故由唐虞而三代，由三代而汉唐宋，其帝王道统之传端不可诬。若秦之于汉，六朝之于唐，五代之于宋，则皆帝王之驱除，乌足以与斯道哉？至于胡元，则又我国朝之驱除，若汉之秦，唐之六朝，宋之五代也。道统之在天下，不其沦胥以没乎？幸而皇天厌乱，我太祖高皇帝挺生淮甸，廓清海宇。我成祖文皇帝笃生于后，丕绍鸿休，其治化之隆，真有以远追唐虞三代之盛，而超轶汉唐宋之上矣。然其所以致治者，则莫非本于道。其所以体道者，则莫非本于心。其所以存心以体道，体道以出治者，则又孰非学以基之也哉！圣制所谓太祖高皇帝体尧舜授受之要，而允执厥中，论人心虚灵之机，而操存勿二。我成祖文皇帝言帝王之治，一本于道，又言《六经》之道明，则天地之心可见，至治之功可成。帝王相传之要，端在是也。

然臣尝求我二祖圣学之精，则《存心》一录，与夫《圣学心法》，尤其至要者欤！《存心录》凡历代帝王祭祀有感于灾祥者，备载以垂训，而于敬天之怒、无敢戏豫者，尤致意焉。《圣学心法》凡有关于君臣父子之道者，详述以迪后，而于敬天法祖、用人理财者，尤申重焉。则我二祖之所以为学者，具见于二书。而精纯贞一，心即二帝三王之心；太和咸熙，治即二帝三王之治。天德王道，巍然焕然，又奚惑哉？此列圣之所以克笃前业，开天常，叙人纪，历百八十余年而皇图巩固者，信皆有得于是也。

恭惟陛下，以聪明圣智之资，懋精一执中之学。心之所裕者，与天地合其德；治之所成者，与皇王匹其休。肆今大化流衍，百姓太和，德洽于中夏，威行于蛮貊，至治馨香，达于上下，而休征毕集，于古所未有也。臣何幸躬逢其盛哉！臣尝窃窥陛下之所以臻此者，信本于

学;而学之精实典要,则又莫过于《敬一》之一箴,而彝伦之叙、典礼之惇所由出也。臣请得而扬言之。

其曰人有此心,万理咸备,体而行之,惟德是据。盖言道本于心也。其曰匪一弗纯,匪敬弗聚,畏天勤民,弗遑宁处。盖言学以体道也。其曰敬怠纯驳,应验顿殊,征诸天人,如鼓答桴。盖言治以征学也。其曰郊则恭诚,庙严孝趋,肃于明廷,慎于闲居。友躬以实地也。其曰天亲民怀,永延厥庆,光前垂后,绵衍蕃盛。考祥以视履也。语其目,则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究其旨,则合之尽其大而无余。斯其学即二帝三王之学,心即二帝三王之心。而二祖列圣之传远,以跻乎唐虞三代之盛。夫固体信而达顺、合一而不测者也。存之为天德,而日新之盛德以裕;达之为王道,而富有之大业以昌。帝王之道统,谓不在兹乎!

臣欲拟议其盛,而未易以名言矣,复何所称述,以为圣学之裨乎!然臣闻之《书》曰:慎厥终、惟其始。《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我陛下之自箴也,亦曰终如其始,又曰日新不已。故学必缉熙而后底于纯,治必永贞而后底于化。陛下之学亦既纯矣,天下之化亦既洽矣。然端拱穆清之上,一日二日,事有万几,有一之弗得其宜,非纯也。此敕天之命,惟几惟康,尧所为兢兢也。四海九州之远,刚柔异性,轻重异宜,有一之弗得其所,非洽也。此一夫不获,时予之辜,舜所为拳拳也。学之纯者不使其或间,化之洽者不使其或漓,夫然后常敬常一,而道久化成。其在兹矣,非我陛下所当致力者乎!其要则在求之心而已。

太祖高皇帝尝谕辅臣曰:防闲此身,使不妄动,自谓已能。若防闲此心,使不妄动,尚难能也。成祖文皇帝尝谕解缙曰:心能静虚,事来则应,事去如明镜止水,自然纯是天理。是二祖之学,诚不外于心而得之也。臣愿陛下毅然以道自任,上法乎二祖,反求诸一心。养之于念虑未萌之先,以存其寂然不动之体;察之于几务既兴之际,以妙其感而遂通之用。俾其湛而虚也,神而明也,与太虚同其空洞焉,日月同其照临焉,四时同其运行焉,万物同其冲和焉,则一心既正,万化以行。敬不期敬,而自尔其常敬;一不期一,而自尔其常一。天德益以

立,王道益以溥矣。帝王道统之传,不其益光也哉!至于用人必当,而皋、夔、稷、契之在列;行政必允,而礼、乐、刑、政之覃敷。则又此心之妙用,而我陛下之余事也,何敢以渎圣听哉?陛下倘能鉴臣之愚,而于所谓敬一者贞之,贞久而会之于心,则道统之传,亘古今而独盛矣。斯文幸甚,宗社幸甚,臣何任祈吁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的统治是以道作为根本的,确立了道,然后教化就会因道而扩大。帝王的道是以心作为根本的,心地纯正,然后道就可以与心会合起来。心是统领道的,心地如果不纯,那么存在于心中的思想就不会有贞纯精一的美好内涵,这对于道来说只是初步的小成就。道是用来光大政治的,道如果不纯,那么外在的表现就不会有正大光明的事业,这对于政治来说只是属于小康状况。取得初步小成就是不能够讲得上合于天道的,达到小康状况是不能够讲得上合于王道的。这些哪里是帝王继承天命建立法则的做法呢?因而以心作为根本,浑合在天理中,就可以使内心圣明的基础充实起来。然后施展到政治中去,顺从那个天道,就以外在地显耀君王的事业。天德和王道,它们的最高准则是相同的,然而它们的根本却是与学习有关系的。学习可以使心地纯洁,心地纯洁就可以领会道,领会了道就可以表现出治理的能力,表现出治理能力就可以感通上天。这在当时来说,帝王的治法就得以建立,对后代万世来说,帝王的心法就得以流传。道统就是这样开始的吧!遵循着道统而统治,唐虞夏商周就是这样统治的。类似此种情况的统治便是汉唐宋各代的统治,即使达到极点了,怎么可以跟帝王相提并论呢?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和成祖文皇帝,都以天为依据来弘扬大道,按照内心修养的境界而订出治理策略。从而继承了号称"皇"、号称"王"的古代君主的道统正脉,开创了后来万世太平的基业。我们的陛下又是天生的神圣,智慧光明,持续地显现在学习上,因而治理普遍推行到各地,礼乐政刑都畅顺无碍,如同薰陶蒸发一样透彻遍及。二帝三王道统的传授于是得以长远地继续而没有中断。对太祖成祖和列朝圣王心学修养的精深,在近处继承而更加发扬光

大。纯粹得简直不可超越了,但是还要在处理繁忙政事的间隙之中,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谦虚地作精审详问。并且说自己一天到晚操劳,没有闲暇安静休息。臣下我得以仰头窥看到陛下盼望得道的心情了。臣下我是个地位低贱的人,哪有什么知识可以向上奉献给君王,使君王的圣明学识得到万分之一的补益呢?虽然是这样,臣下我沉浸在圣明的教化中也有很多年了,对于望道而未见的心念,祖宗治理方法的隆盛,以及陛下心学的精深,亦曾佩服沉浸,稍能窥看到大海的边际了,哪敢不恭恭敬敬地陈述所见,以回答皇上,宣扬君王美好的教令呢!

臣下我曾听说过:天地未分开时,道存在于天地之中;到了天地分开之后,道掌握在圣人手里。这圣人就是道的宗主。又从《尚书》中得知:天地是万物的父母,人是万物中的灵物。只有聪明的人才可以当最高君主,最高君主乃是人民的父母。这表明,最高君主就是人民的主宰了。既然是这样,那么存在于天下的道,怎可以不归属于圣人,又怎可以不归属于伟大的君王呢?所以夏商周三代之前,身居王位而德行与这王位相适合,通晓一切事情而身在上面的人,没有不是神圣的,因而道统的传授,是有来由的。请允许我按照圣上的策问一条条的做对答吧!

唐虞时代以前,文字未产生,时代很遥远已经不可稽考了。所以韩愈及孟轲所称说的道统,都从尧舜开始。韩愈说尧把这个道传给舜,舜把这个道传给禹,禹把这个道传给汤,汤把这个道传给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这些人或是建立了功业或是树立了名誉,虽然情况各不相同,而讲论道统却都是一样的。孟轲说:从尧舜到汤,经历了五百多年,像禹、皋陶那些人,便是亲身看见尧舜之道而了解道的,像汤,便只是听到尧舜之道而了解道的。从商汤到周文王,又经历了五百多年,像伊尹、莱朱那些人,便是亲身看见而了解道的;像周文王,便只是听到而了解道的。从文王到孔子,又有五百多年,像太公望、散宜生那些人,便是亲身看见而了解道的;像孔子,便只是听到而了解道的。孟子所讲的情况表明,通过亲眼见而了解道和通过听闻而了解道,虽然情况不一样,而讲论道统则是一样的。

然而观看孔子内心向往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在位的时代，而对自己不生活在那个时代感到悲伤。伊尹对处在田亩之中可以感受到尧舜之道而感到快乐，但一定要通过从政而亲自见到才觉得是幸福。可见把理想寄托在讲空话上，哪里比得上去做出实际的事情来更好一些呢！这就是二帝三王的道所以能独盛的原因，但道统的传授，不是帝王就无人能够承受。为何这样讲呢？因为所谓道，不能只把它看作是蕴藏在内心的东西，而应把它看作是出自于内心但要用来传播教化的东西。所以用它来治理天，那么阴阳两气就顺畅配合，天道就清澈了。用它来治理地，那么山川就安静和谐，地道就安宁了。用它来总揽人民和万事万物的纲纪，那么老百姓就和谐，万事万物就都顺畅，老百姓及世间事物就都安乐了。道术彰明了，于是道的微妙作用就流传了；务实的政治理顺了，于是务实的心也就昭著了。这是本体与运用，出自同一个源头的。除去帝王，谁能够进入到这里面来呢？然而要求取它的关键之处，那么心思得要用尽；要探究它的功绩，那么学习就要尽力。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道就不可以光大天下的政治，没有心就不可以领会天下的道术。而从事学习就可以使心地纯正从而得以体现出道来，可以凝聚道术而使用到治理国家方面去。学习的作用真是巨大啊！这学习当然是帝王所不能够忽视的啊！

所以遍及天地，尧的道是很盛大的了。然而探求尧的学习目标，就讲求敬慎明察，诚实恭谨；他用来为心服务所做的努力，达到了多么登峰造极的地步啊！像光华重合那样协助尧，舜的道也是很盛大的了，然而探求舜的学习目标，就讲求深邃的智慧，温和谦逊的美德；他用来为心服务所做的努力，达到了多么登峰造极的地步啊！夏商周三代有道的君长，禹、汤、周文王、武王的道也称得上是盛大的了。然而探求他们的学习目标，就讲求勤恳节俭，执守适中的原则，坚持光明和自强。他们用来为心服务所做的努力，达到了多么登峰造极的地步啊！结果治理取得了成就，民众就随着教化而变化，四方就响应了，文明德治就广泛地施布了，万国都来归附了，安乐充满皇天了，天下诸侯一朝会合，政治就清明了。唐虞夏商周的美好政治教化，崇高伟大得不可追及，能讲不是把这一点作为根本的吗？德达到了这种程

度，然后可以把它称誉为天德；道达到了这种水准，然后可以把它称誉为王道。至于皋陶、伊尹诸臣辅佐君主有功劳，固然是不能够抹煞的。然而居于天下中心，考虑大事业，从而扩大教化治理，建立中正之道和建立最高法则，显扬道术，又哪里是各个臣下所能够独占的呢？所以《周易》上说：大地的原则，就是做妻子的原则，当臣下的原则，大地的原则不能制定法式而能代替上天取得结果。讲的就是这种情况了。

夏商周三代之后，国运长久的朝代没有能像汉朝、唐朝、宋朝那样长的。在这期间英明的国君和仁义的君主，安抚社会统治万物，使德泽施布到全国各地，令功业遍布到天地之间的，也不能一律小看他们，这实在有如制策所讲的那样。所以汉朝废除秦朝的苛政，深深信奉抚慰人民的道理，以至七位有作为的皇帝相继兴起，风俗淳美了。唐朝平定隋朝的动乱，全面地收取平定天下的功效，以至太宗、玄宗和宪宗交替地出现，国家安定了。宋朝整顿唐末五代的衰败局面，爱护保养人民的生产能力，把人民生命从极端困苦中拯救出来，而且喜爱文治和能够保守江山的君主连接地互相继承前人的事业，是不能够讲他们全部都叛离了道的。假使他们全部都叛离了道，那就不可能统治全国，约束广大人民了，又怎能够经历几百年得以形象高大地居处在人民之上，掌握住国家机器呢？后来向上追论的人对此仍然不能不感到遗憾的，是认为他们的学术未能够达到精纯的境界罢了。学术假如未能够达到精纯，那么蕴藏在内心的涵养，就讲不上是帝王精微纯一之学的传授，所施布的政治，就讲不上是和谐兴盛的太平盛世，这种情况哪里是天德王道的最高水平呢？

只有道德教化在上层衰落了，然后讲学才会在下面提倡起来，这就是宋代四名哲学家得以兴起的原因。拿周敦颐来讲，他的学问把主静作为宗旨，把纯一作为关键，探究到极限在于明达贯通，公正广博。他属于不必由老师传授、默契地符合道体的人物。拿程颢兄弟来讲，他们在修养上强调用敬，在增进学问上强调充实知识，而又想用大公之心去顺应天地的常规，他们属于宽大温和、严整坚毅，和周敦颐殊途同归的人物。拿朱熹来说，把讲求圣学作为入门处，把亲身践

行作为实际去处，读尽各种书籍，会通在心性上，他属于集合儒者学问之大成的人物。这是四个哲学家学术思想的大略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学术本来也是承继古代的周公、孔子的。把政事交付给他们，他们也是与伊尹、傅说相同的人啊！

他们即使成为伊尹、傅说了，仍然不能够跟帝王等同起来，况且他们并没有像伊尹、傅说那样的业绩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道存在于天下，只有帝王能够实行。所以天下的道统，只有帝王才能够传授。而大臣中的贤能者，就只是仰承帝王的英明而在下面效力工作的人罢了。擅自就接续帝王道统的传授，不就成了僭越行为了吗？所以这四位哲学家，讲他们有功于这个道，那是可以的。因为这个原因而认为他们可以直接地承接帝王的道统，那就不可以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不看到天的情况吗？当万物生长时，太阳温暖它，雨水滋润它，风吹动它，雷轰震它。那个天是深远严肃和坚固安静的，然而要歌颂生养万物的功劳，就一定要全部都归功于天，日雨风雷等没资格占有功劳。为什么呢？因为天地间的冲和之气，实在是由天执掌的，因而日雨风雷等就不可以跟天道并列。这就知道臣下是不可以跟君道等同起来的了。懂得臣下不可以跟君道等同，就明白四位哲学家不可以跟帝王并列了。

而后来推尊四位哲学家的人，像黄榦便叙述尧舜、大禹、商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传授道，直接讲是周敦颐承接了孔子、孟子所不传的事业，程颢程颐承接了老师周敦颐的事业，朱熹承接了程颢程颐的事业，而且聚合他们学术的要旨在于居敬、穷理、致知、克己这四个方面上。从而讲千千万万个圣人贤人传授道、教育人的内容都不能超越这四个方面。至于真德秀就说：孔孟之道传到了周敦颐又恢复了光明，周敦颐的道传到了程颢程颐而更加光明，程颢程颐的道传到了朱熹就大放光明。吴澄就说：周敦颐开始承接了自孟子以来已有千年的道统的传授，程颢程颐就以周敦颐为老师，传授他的学说；后来又有朱熹，集合了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的主要成就，他们都是得到道统的传授的人啊！真德秀认为：道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的时候就大放光明，那实在是有这种情况的。至

于黄榦、吴澄，竟然把四个哲学家作为是在千年之后直接承继了伟大的君王道统传授的人物。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这样称述，使这种论调像蔓草一样扩延，像流水一样流布，直到今日，学者们还尊奉这种论调而不敢违背，相信它而不敢有所怀疑，可是谁知道这种论点的过失太厉害呢？因此四个哲学家讲明圣学和从事著述的功劳，不可以说他们对道没有补益，但是认为他们是径直传接了古代的道统，跟帝王相提并论起来，这实在是门生们推重而造成的过失，恐怕这也不是四个哲学家自己的想法啊！

因此从唐虞到夏商周三代，又由夏商周三代到汉朝、唐朝、宋朝，这期间帝王道统的传授是确实不可诬蔑的。至于秦朝对于汉朝来说，六朝对于唐朝来说，五代对于宋朝来说，这些朝代都属于给帝王做铺垫的朝代，又怎可以算是进入这个道统中来了呢？至于蒙古统治的元朝，对于我明朝来说又是给帝王做铺垫的朝代，如同汉朝跟秦，唐朝跟六朝，宋朝跟五代的情况一样。这么一来，天下的道统岂不是相率牵连而沦丧了吗？幸而上天讨厌动乱，我们的太祖高皇帝挺拔显现在淮河一带的土地上，澄清了天下。我们的成祖文皇帝得天独厚地生长在后面，于是继承伟大美好的事业。他们在治理和教化上功绩很隆盛，真是确有理由地追上远古尧舜夏商周时代的隆盛局面，从而大大超过了汉朝唐朝宋朝。然而他们之所以治理得好，那无非是把道作为根本；他们之所以躬行正道，那无非是把心作为根本。他们之所以专心专意地躬行正道，躬行正道之后从而做出治理的成绩，那又有哪个方面不是通过学习去打基础的呢？圣上在制策中讲道：太祖高皇帝效法尧舜授受的要旨，从而实实在在地实行中正之道，研究人心的秉赋灵性，执持心志而不三心二意。我们的成祖文皇帝讲：帝王的政治，是一切都以道为根本的。又讲：明白了《六经》的道理，那么就可以看得见天地之心，最好的政治就可以奏效成功了。帝王相传的道统的重要内容，正是在于这一点啊！

臣下我曾经探求我们二位先祖神圣学术的精义，那《存心录》与《圣学心法》两本书就是最为重要的书了吧！《存心录》将所有历代帝王的祭祀活动，引起灾祥感应的事，都周备地加以记载，用来垂示后

代。而对于老天爷发怒时、你敬它不敢当儿戏方面的内容就作了特别的表述。《圣学心法》将所有有关君臣父子之道的内容，详细加以叙述，用以启迪后人。而对于尊敬上天、效法祖宗、任用人才、管理财政等方面的内容，就反复强调，特别重视。那么我们二位先祖研究学问的情况就都表现在这二本书当中了。从而可以见到他们的思想是很精纯、端正和专一的，他们的心就是二帝三王的心；可以见到他们的政治是很太平和睦的，这种政治就是二帝三王的政治。天德与王道于是就显得崇高伟大，气象新鲜，那又有什么可疑惑的呢？这就是列朝圣君所以能够巩固前人的事业，开示上天规定的次序，整顿好人伦纲常，经历了一百八十多年，使皇家江山巩固的原因。实在都是得益于学习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凭着聪明神圣的资质，在学习上勉力于精诚专一和守持中正，心胸宽广，德行能够与天地融合起来；治理有成就，能够与伟大帝王的功绩相比美。所以今日教化广远深入地渗透到社会各处，使老百姓生活在太平和乐的环境之中，德行润泽了中原华夏地带，威严推广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状况美好得使天地各处的神灵都来享用祭祀报功的温馨香气，吉祥的兆应全都集中表现了出来。自古以来未曾有过这样隆盛的景况啊！臣下我亲身遇上这么隆盛的社会是多么有幸啊！臣下我曾私下窥察，陛下之所以治理国家达到了这样美好的局面，实在由于把学习作为根本，而能够使学习达到精细踏实的重要之处，那就又莫过于《敬一》这篇箴言了。叙述人伦道德关系和重视典礼，都是出自这篇箴言的。臣下我要发挥它来谈一谈。

该箴言说：人们有了这一份心思，一切道理就都具备了，去体验去实行，依据的就是道德。这是讲道德是本之于心的。又说：心不专一就不会纯粹，不恭敬就不能团结人民，要敬畏上天，勤恳地为人民办事，没时间过安逸生活。这是讲在学习中去体悟道啊！又说：思想行为或者是恭敬，或者是怠慢，二者混杂在一起，应验就会顿时有所不同，用自然界和人世的事情来验证，结果就会像鼓棰击鼓一样有回应声。这是讲治理政事而用学问来作验证啊！又说：郊祭天地时要心

怀恭敬虔诚，庙祭祖先时要严肃地表现出孝心，在朝廷上态度要严肃，在闲居时行为要谨慎。这是讲用和顺的态度亲自付诸实践啊！又说：上天表示亲爱人民，乐于归服，喜庆国家命运永久延续，弘扬前朝，垂示后世，一代接一代地兴盛发展。这是讲考核祯祥现象来看实践如何啊！讲它的细目时就分开来讲它，达到精细之处而不会混乱；探究它的宗旨时就合起来考察它，扩大到最大的范围而不会有所遗留。这样的学术就是二帝三王的学术，这样的心就是二帝三王的心了。因而二位先祖和列位圣帝所传授的道统就越来越久远，直至步入隆盛的唐虞夏商周时代。这原本就是主体诚信，运用顺畅，合成一体而估测不了的！存积起来就成为天德，而天一样的盛大德行越来越充实；施行起来就成为王道，而富有的盛大事业就越来越昌盛。能讲帝王的道统不在这段箴言上吗？

臣下我本打算议论这种盛况，可是很不容易用什么话语来表达，那还有什么好称述的，能对圣明学术有所裨益呢？然而臣下我从《尚书》上听说："要搞好结局，只有从开始做起。"《易经》上说："太阳月亮依循自然法则，从而能长久普照天下；四季依循自然法则，从而能变化永久，长成万物；圣人永久坚持正道，从而能教化天下，建立秩序。"我们的陛下规戒自己，也说：结束时要如同开始时那样认真。又说：天天有新的进取，永不停止。所以学习一定要持续那光明的积累，然后才可达到纯粹的境界。治理一定要永久纯正，然后才可以达到天下大治。现在陛下的学习也已经纯粹了，天下的教化也已经和谐了，然而端坐拱手在社会清和之上，每天政事极其繁多，稍有一件事情处理得欠妥当，那就不纯粹了。对上天的命令戒慎警觉，考虑到安危，这是尧舜要兢兢业业的原因。四海九州范围很广大，各地人们的情性有刚有柔，轻重不一样，稍有一件事情处理得不合适，那就不协和了。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就是我的罪过。这是舜要念念不忘的原因。要在学习上追求纯粹境界的人不会让他的学习中断，做到教化协和的人不会让他的政教淡薄，然后才能够常常保持慎重专一，才会使道统长久，使教化有成。道统就在这里了，不正是我们的陛下应当致力去做的吗？其关键就在于向内心求取罢了。

太祖高皇帝曾经告谕辅政大臣说:要防备自家的身体,使它不要妄动,自己认为自己还做得到。至于像防备自家的心念,使它不要妄动,那还是很难做得到的。成祖文皇帝曾经告谕解缙说:心能安静虚寂,有事来临就应付得了,事情过后就会如同明亮的镜子照出停止不动的水,这自然就全是天理了。可见二位先祖的学术,实在不外乎都是用心来领悟的。臣下我希望陛下果决地以道统自任,以二位先祖做榜样,向内探求自己的纯一心念,养心在思虑未萌生之前,从而保持自己不发声音和不动弹的身体;去考察已经出现的机要事务,感受出其中顺利畅通的微妙作用。使自己的心沉深而清虚,神圣而光明,与天空一样具有空洞的内涵,与日月一样能照耀大地,与四时一样依次运行,与万物一样彼此交融平和。这样一颗心就端正了,万事万物就得以按规律顺利运行了。心怀敬慎而不必期待敬慎,自然你就会常常表现出敬慎;心情专一而不必期待专一,自然你就会常常表现出专一。这样天赋的德性就越发确立,王道的影响就更加广阔了。帝王道统的传授,不就更加光大了吗?至于讲到使用人才一定要恰当,于是像皋陶、夔、后稷、契之类的贤人都会选入在大臣之列中;讲到推行政教一定要讲信用,于是礼乐刑政就广泛地施布开。这些又都是靠这颗心去起微妙作用的。这正是我陛下绰绰有余对付得了的事啊,臣下我哪里敢乱讲话去玷污陛下的听闻呢?陛下如果能够体察臣下我的愚昧,对所谓恭敬专一确能保持纯正,时间久了就融会在心,那么道统的传授,就会贯穿古今地独盛于当代了。这样天下文教就很幸运了,宗庙社稷就很幸运了。臣下我祈求呼吁,真是罪该万死了。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皑译〕

明世宗嘉靖四十一年(1562)壬戌科

会试试题

第一场

四书义 事君能致其身。

悠久无疆。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

易 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

元吉在上，大成也。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

书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江汉朝宗于海。

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

道洽政治，泽润生民。

诗 于以盛之，维筐及筥。于以湘之，维锜及釜。

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

显显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

以介眉寿，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春秋 春正月，公会宋公、蔡侯、卫侯于曹。夏四月，公会宋公、卫侯、陈侯、蔡侯伐郑。桓公十有六年

夏，单伯会伐宋。庄公十有四年 齐师、宋师、曹师城邢。僖公元年

公会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郑，会于萧鱼。襄公十有一年 甲午，卫侯衎复归于卫。襄公二十有六年

叔孙舍至自晋。昭公二十有四年

礼记　君赐车马，乘以拜；赐衣服，服以拜赐。

清明象天，广大象地。

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诸侯朝，万物服体，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仁者，天下之表也。

第二场

论　人君其尊如天

诏诰表　内科一道

拟汉令百官各贡忠诚诏　永平十八年

拟唐以郭子仪为中书令诰　乾元元年

拟周王得驺虞于神后山以献群臣贺表　永乐二年

判语　五条

举用有过官吏

卑幼私擅用财

监临势要中盐

边境申索军需

织造违禁段匹

第三场

策五道　问：古之帝王建鸿德者，必有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唐虞之际，见于《诗》、《书》可考也。汉以后，文学之臣表德颂功，宣昭主上之令美，若司马相如、班固之于汉，张说、柳宗元之于唐，传记足征焉。宋邵雍之论治，乃曰本朝五事，唐虞而下所未有。雍，一代大儒，论宜有据也，盍究观其指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挺圣神，肇造函夏，德峻功巍，不可殚述。而近代词臣，亦云本朝度越历代亦有五事。得非有感于雍，举其闳巨者言之欤？国初儒臣序《大明日历》，尝以六事揄扬圣祖功业。不识二臣之论，后先相符契否？今仰窥其所条列真驾百王而独盛者，岂宋事可同日语耶？然圣政之详，卓绝古今者不止此。可悉称数之欤？逮成祖文皇帝，靖内定基，以贻宗社

亿万年之安，视圣祖经纶天地之业无间焉。至我皇上，道隆继述，运抚中兴，敷皇极以锡庶民，观会通而行典礼，治化昭登，蟠际宇宙，以觐太祖之耿光，以扬成祖之大烈，高出古帝王之上，汉唐宋莫敢望焉。可得而扬厉之欤？夫圣祖神孙，赫赫明明，以成百代殊绝之治，固必有为之本者，亦可述其概欤？今能言之类，执笔之徒，皆愿竭文思，献歌颂，诸士子其人也，幸为我详著之。

问：博物洽闻，儒者格致之学也。昔人谓大人之胸怀非一，才高志大，故于百家之言无所不包，则游神玄览，信君子所贵也。试举数事，与诸士析之。春秋之世，列国多良大夫，有著《牧民》、《山权》、《乘马》、《轻重》、《九府》之篇，有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可得而陈之欤？有因出使邻国，而识实沈、台骀之祟；有因龙见绛郊，而为畜龙御龙之说。又可得而偻指欤？孔子，大圣人也，党人称之为博学，大宰讶之为多能。夫《六经》所删述，炳如日星，天下诵习而讲辑之无论已，然尝解商羊之舞，剖萍实之徵，悟羡羊之秘，决陈人庭隼之疑，对吴人执骨之问。夫此五者，非耳目所濡染，何以能旁通之若是也？岂天纵聪明之尽者，自无所不知欤？抑亦有所考欤？至汉人虽诵法孔子，其智识之相越何啻百倍，然亦有辨驺牙之出者，有达重常之奇者，有究贰负之诡者，有别豹鼠之异者。汉以后，又有能察剑气者，有能晓角端者。数子之见，亦通朗矣。不识与孔子之多能，可庶几否欤？孔门称好学而传博文之教者，颜子一人而已。今考其遗书，曰潜心，曰如愚，而所博不少概见。岂孔子有所隐，而不尽传之欤？或资虽近道而学不博综，将出春秋数子之下，即汉晋人亦弗若欤？抑其所博者，自有在也？诸生强学待问有年矣，愿以前所询者抒蕴以对。

问：士君子之穷经术，所以经世也。试以今天下所最切而可虑者商之。夫天生五谷，以资生也；其生五金，以待用也。皆本之五行，以运布于天下。五行未尝阙，而说者乃谓金无余气。岂金或有所阙，而世之金遂亦因之欤？然五谷木属也，又何以有不足欤？昔人有言：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又云：天地生财，不在官则在民。是五谷与金玉，贱贵相低昂也。其在官在民，势亦相为盈虚也。顾今之时，岁有丰歉，谷既不常盈，宜金或有余矣，而亦往往告匮，将何所重而后可欤？天下方

多事,府库不充,司国计者至为一切补救之术,亦尚未充也。而闾阎困诎,又辄称曰民力尽矣。岂在官在民之说,不足信欤?顷者皇上轸念农事,加意国储,每春和即下诏劝耕,一遇水旱辄竭虔祈祷,核供亿,慎予费,虽上用之所须,犹数稽裁之,计岁所省不下数十万,所谓丰源节流之道至矣。而奉行德意,则在有司,意者有所未至欤?夫兴一利不若除一害,藏富于国不若藏富于民。兹欲去其害谷与金者,俾上与下两利而俱足,果何施而后可耶?尔诸生明于利害之故,赢缩之情,其必有以画此矣。执事者愿闻其说。

问:功以才立,名以功彰。昔人所以建旗常之勋而垂竹帛之誉,良有由也。然亦有才猷未试、功烈未究而褒然负天下之望者,何耶?试略评之。偃息而樊魏,谈笑而却秦,比量于千顷之陂,寄迹于一丝之钓者,皆甘于俭德,远于荣名,而当世推之,后世以为贤也。岂亦有以自见者耶?奋兴刘之志,成辅晋之功,其所树立固亦俊伟,而始焉勤三顾于南阳,来征书于东山,抑何所自耶?至于仅官省闼,而强宗寝其邪谋;方下相麻,而重臣损其驺从。戡乱正俗,甚易易也。果何道以致之耶?即如志先于忧乐、诚信于华夷者,虽今之仆夫孺子莫不诵德美,想风采。而在当时,方为秀才,为谏议,政府未登,舆情咸属。此又何以也?岂其素所挟持者固自有在,而勋名之超卓,不专待于才耶?彼望系苍生,识者轻之;功成大将,敌人易之。则名与才,似皆不足恃也。君子之欲懋宏业、流芳誉者,宜何所适从耶?将砥砺之节,经纶之具,豫养而兼全,古之人必有可法者矣。诸士博览遗编,景行往哲,所学之大,宜无出于此者。请遂言之,以观尚友之志。

问:古今有学者,必贵用世。尝览载记,苏秦起闾巷,说六国,指其国中隘塞虚实如指掌。贾谊自洛阳见汉文,言诸侯强盛当割,后皆如谊言。韩信自追所还,劝高祖入关,取三秦,弱项羽,卒用信策。夫苏君说客,贾生少年,韩淮阴武夫,固儒者弗道,而其言皆售。岂其于天下大势,有所独见欤?乃诸士固为用世来也,其大势将有可言者欤?今在北边,东有蓟镇,西有宣、大二镇,此三镇最急。昔宣大督臣屡议设垣墙堑堡之险,今可据以拒虏欤?又有欲大城京后者,亦可行欤?经略蓟镇者以为,先拊循三卫内服,而后可外御,然欤?又有谓蓟镇边独长,

而古北诸口最要，备寡则力弱，防弛则势殆，欲多设兵屯，可欤？曩倭夷实首难浙直间，迩岁幸渐休息，而又千里被水患，民无宁居。兹寇转而之闽广，急矣，顷江右尤急，有司日以警闻。此何以乂安之欤？夫武备日弛，而寇患充斥，非练兵不可济。兹可举而行之否欤？上明圣诏旨，尝切责诸臣当事者，宜训练有素矣，而未臻厥效，何欤？或言南北势殊，所为练者不同，然欤？或又言北当责将帅，而南当责守令，果若是异欤？又别有究极根本之论欤？在古圣世，未尝无蛮夷寇贼之患，贵制御有道耳。其陈之毋忽。

殿试策问

[嘉靖四十一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昔帝王，莫圣于尧舜。史称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矣，然当其时，下民犹咨洚水为灾，有苗弗率，则犹有未尽治平者，岂二帝固弗之恤欤？其臣任之于下，而上可以无为。不然，何以垂衣而治也？三代莫盛于成周，宣王中兴，《诗》称召伯平淮夷，方叔征蛮荆，吉甫伐猃狁，惟得其人，以分命之，是以不劳而治。朕尝嘉之甚慕之。

朕抚天下四十有一年于此矣，夙夜敬事上帝，宪法祖宗，选任文武大吏之良，思与除民之害而遂其生。兢业不遑，未尝有懈。间者水旱为灾，黎民阻饥，戎狄时警，边圉弗靖，而南贼尤甚，历时越岁，尚未底宁。岂有司莫体朕心，皆残民以逞，有以致之欤？抑选任者未得其人，或多失职欤？将疆圉之臣未能殚力制御玩寇者欤？夫朕有爱民之心，而泽未究；有遏乱之志，而效未臻。固以今昔不类，未得如古任事之臣耳。兹欲使上下协虑，政事具修，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灾咎可弭，困穷可复，以媲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尔诸士悉心陈列，勿惮勿隐，朕将采而行焉。

会试试题译文

第一场

四书义 事奉君主能够豁出自己的性命去。

长久得像天地那样永无尽头。

周文王动用百姓的力量来修建高台深池，可是百姓却对此感到特别高兴，把那座高台称为“灵台”，把那个深池称为“灵沼”。

易 天象尚且不违背他，又何况人呢！

大吉的结果处在上位，这象征着会有大的成就。

不是天下最善于变化的，谁能达到这样。

天地确立起上下的方位，圣人效法它而使万物各得其所。

书 光明照耀到四方最远的地方，延布到天地。

长江和汉水像诸侯朝拜天子一样共同流入大海。

各种征兆一是下雨，二是晴天，三是炎热，四是寒冷，五是起风。以上这五种现象全都出现，并按规律依次发生。

大道完全贯彻到治理和教化当中去，恩泽就施布给所有的老百姓。

诗 用什么来盛放祭品呢？用那方筐和圆箩。用什么来烹煮祭品呢？用那有脚锅和无脚锅。

继承祖先的大功业，建成宫室上百座，西面南面各开门户。在这里居住又相处，既欢笑又交谈。

拥有显赫美德，安民任贤都适宜，从皇天那里受到福佑。

祈求那长寿，永久把他们保佑，这君王的吉福多得很。

春秋 春季正月，鲁桓公和宋公、蔡侯、卫侯在曹地会面。夏季四月，鲁桓公联合宋公、卫侯、陈侯、蔡侯讨伐郑国。 桓公十六年

夏季，周王室的单伯会同讨伐宋国。 庄公十四年 齐国的军队、宋国的军队和曹国的军队为邢国修筑城邑。 僖公元年

鲁襄公联合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国的太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在萧鱼这个地方盟会。 襄公十一年 二月十日这天，卫侯衎回到了卫国重新当

国君。 襄公二十六年

叔孙舍从晋国回到了鲁国。 昭公二十四年

礼记 国君赐给车马，第二天乘坐这套车马前去拜谢；赐给衣服，第二天穿上这套衣服前去拜谢。

清澄明净如同皇天，广阔宏大如同大地。

因此天下太平，诸侯就都来朝拜，万物都降示吉祥的兆应，而百官就没有谁还敢不承奉服事天子的了。

仁德是天下的典范啊！

第二场

（译文从略）

第三场

策五道 提问：古代建立起盛大德业的帝王，必定会有撰写文章的臣下来加以赞美称述和特作记载，这样盛大的德业才得到显扬。唐尧和虞舜时期的情况，在《诗经》与《尚书》中可以看到并做出考察来啊！自从汉朝以后，富有知识和文采的臣下表彰德业，颂扬功绩，宣明并昭示君主的美好言行，像司马相如、班固对于西汉东汉，张说、柳宗元对于唐朝，从正史他们的本传中都足以得到证明。北宋的邵雍评论治绩，宣称宋朝有五种政事是从唐尧虞舜以后所未曾出现过的。邵雍是一代大儒，他的评论应当说是有根据的。你们这些考生何不探究并考察一番他那主旨呢？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天生就圣明神武得异常突出，首先再造华夏，德业高达天际，功绩十分伟大，简直述说不过来。而近代的文臣也说我朝出现了五种超越历代的政事。这恐怕是对邵雍的说法有所感触，于是就列举那最为突出的方面来这样讲吧？建国初期的儒臣为《大明日历》撰写序文，曾经用六种政事赞扬圣祖的功业。两相联系，不知道近代文臣和国初儒臣的论断是否先后完全一致呢？如今抬头窥探他们所逐项列示的确实超过历代帝王而唯独在我朝才最兴盛的政事，又哪里是北宋那五种政事可以相提并论的呢？然而我朝圣明国政的方方面面，其中在古今位居

第一的并不仅仅限于这些,你们能够全部列举出来和称述一番吗?到了我们成祖文皇帝,平定内部,确立起根基,给宗庙社稷留下了亿万年的安稳状况,同圣祖筹划措置天地的大业比起来,并没有任何的差别。沿续到我们的皇上,使那继承祖宗功业的大道变得更加隆盛,主宰着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时运,推广那行为的最高准则,赐给众百姓;考察那融会贯通,施行礼制规定;治理和教化显赫地报告给天帝,笼罩起宇宙,用来播布太祖的万丈光辉,弘扬成祖的盛大功业,超越并高居在古代帝王的上面,汉朝、唐朝和宋朝根本就不敢看一眼。你们对此能够阐明播扬一番吗?圣明的祖宗和神异的子孙,十分显赫,非常鲜亮,成就一代接一代的独步千古的大治局面,原本上就必定具有那构成根基的东西,你们也能述说一下那梗概吗?如今能言善辩的这类人物,执笔撰文的那批人,都愿意竭尽撰写文章的思绪,献上歌功颂德的作品,而你们这些考生,正是那合适的人选啊!庆幸地为我们主考官详尽地写出来。

提问:对事物了解得特别多,几乎什么都听说过,这属于儒士穷尽事理和充实知识的学问啊! 古人认为高高在上的人胸中怀有的东西并不只是一种,他们本领高,志气大,所以对于各个学派的说法没有不包纳的,这表明在深广玄妙的事物中用心留意,的确是君子所重视的事情啊!试探性地列举出几桩奇事,与你们这些考生来做评析。在春秋时期,各个诸侯国有很多贤良的大夫。其中有人编著了《牧民》、《山权》、《乘马》、《轻重》、《九府》这类篇章,有人读得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类古书。你们能够对此陈述一番吗?还有的人通过出使到邻国,分辨出"实沈"这参宿神和"台骀"这汾水神对该国国君的殃祟。又有人根据绛邑郊外有龙降现出来,就叙述了古代养龙和驯龙的整个来历。你们对此也能够逐项指明吗? 孔子是位大圣人,当时里巷的人就称他是学识渊博的人,而担任太宰的官员又惊奇地把他誉为多才多艺的人。他对《六经》进行删定承述,鲜亮得就像太阳和星斗,整个天下都进行诵读研习和讲论切磋,这就不用再说了,可他曾经解释过商羊这种怪鸟屈起一只脚爪在大雨来临前起舞的预兆,剖析过萍实这种形大如斗的水生植物撞击并停留在楚昭

王船上的意思，体悟出羵羊这种土中怪物的奥秘，决断过陈国人对一群麏鹿身上带有箭头落在庭中而死去的疑虑，回答过吴国人持带着攻下越国会稽后所获得的死人骨节为什么大得装满一整车的询问。以上这五桩奇事，并不是人们经常会看得见和听得到的，可孔老夫子却凭仗什么能做到这样地广泛知晓呢？难道是皇天把一切聪明智慧都赋予给了他的人，自然就无所不知吗？或者是孔子也曾做过考索呢？到了汉朝人，尽管效法孔子并诵读他所编定的经书，但那聪明智慧距离孔子何止上百倍呢！不过也有能够辨认出是驺牙这种瑞兽来到了建章宫的人，还有明了是罕见的名为重常的异鸟的人，又有能够究明石室中发现的是贰负这一山神的人，又有能够区别出是豹文鼠奇异地出现在云台的人。到汉朝以后，也有能够察看出是豫章郡丰城县地下的宝剑剑光映射到天上斗牛之间而产生异气的人，还有能够知晓用角端这种异兽的兽角做成的弓箭的人。以上这些人的见识，也很通达明朗了，但不清楚他们同孔子的多才多艺是否差不多呢？孔子门下号称喜好学习并得到孔子用广博的文化知识来充实自己的教诲的人，只有颜渊一个人罢了。现今考察流传下来的《论语》，上面只是说颜渊专心，像是一个愚呆的人，而他广博的地方却几乎看不到。这难道是孔子对他有所保留而没把知识全部传授给他吗？或者是他的天资尽管与大道很接近，但学问却不广博会综，处在春秋那些贤良大夫的下面，甚至连汉代人和晋朝人都不如呢？或者是他所广博掌握的学问，自行有他固定的东西呢？你们这些考生勉力研习，等待询问，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希望能针对上面所询问的那些事情，抒发自己胸中积累的东西来做对答。

提问：做为知识界的君子穷尽儒家经典的学问，目的是解决当前社会和国家存在的问题。试探性地用现今天下最为急切并让人深感忧虑的事情来与你们做商讨。皇天生长出五谷杂粮，是帮助世人活命的；它又生出金银铜铁锡这五种金属物品，是供世人取用的。这都是来源于木火土金水五行，运作施布到整个天下。五行从来就没有缺少过，可讨论事理的人竟宣称金行并不存在着余下的气流。这难道是金行有时候会短缺，而世上的金属物品也就跟着短缺吗？然而五

谷杂粮属于木行，又为什么也存在着不充足的情况呢?古人说过这样的话：圣明的君主看重粮食而不看重金银珠玉。还说：天地生长出各种财富，不集中在官府手中，就散布在民众那里。这表明粮食和金银珠玉，看重或轻视它们中的哪一种是互有进退的；财富集中在官府手中或散布在民众那里，在势态上也是不免这一方充盈而那一方就空虚的。不过在现今阶段，年景有丰收又有歉收，粮食既然不是常常充裕的了，可金属物品却应当有时出现剩余呀!但也往往报告府库匮乏。这该看重哪方面，然后才可以了呢?如今天下正事端很多，府库不充足，主管国家财政的官员想尽了一切加以补救的办法，可仍旧还不够用啊!民间困乏拮据，一上来就又说民众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已经到了极限了。这难道是财富不集中在官府手中、就散布在民众那里的说法，不足以信从吗?近来我们皇上深切关注农业生产方面的事宜，对国家储备也特别留意。每到春季解冻时节就颁布诏书，鼓励耕作；一旦遇上水灾旱灾，就竭尽虔诚，对天祈祷。验核供应的物品，慎重对待赏赐，尽管属于皇室必要的支出项目，仍然屡次加以查验，进行裁减，每年总共算起来不少于数十万钱，所谓开源节流的做法已经达到极点了，可承奉并推广皇上的恩德用意，还全在政府各个部门。猜想起来，它们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吧?兴一利不如除一害，把财富收藏在国库中不如把财富储存在民众那里。如今打算去除掉给粮食和钱币造成损害的那些东西，使朝廷和民间两方面都获益，都充裕，究竟该采取什么措施，然后就可以了呢?你们这些考生明了利与害的产生根源和充盈节缩的具体情况，必定会有办法对这一问题做出谋划了。我们主考官希望能听到你们的意见。

提问：功业凭借才干来建立，名望通过功业得到显扬。古人之所以要建立起拥有专用车旗的功勋，在史书上留下美誉，确实是有原因的了。然而也存在着这样的人物：才干谋略还没具体施展出来，功勋业绩还没建立起来，可却显赫地赢得了天下人的敬仰。这是为什么呢?你们对此简要地试予评述。古人有的使秦国自动就罢兵，保护了魏国；有的在谈笑之间就击退了秦国；有的被人比拟成

广阔的湖水；有的在江边钓鱼来安排自己的形迹。这些人全都对清俭的德行甘愿持守，对功名利禄离得远远的。可当代人却推崇他们，后世人也认为他们是贤才啊！他们难道确有办法来显现出自己吗？还有的人奋扬起使刘氏重新振兴起来的志向，或者成就了辅佐晋室的功业，他们所建树的东西也确实是高大宏伟了。可在开始时却要对方辛苦地到南阳去三次拜访，或者致使朝廷专程到东山送去召请的诏书。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至于有的人仅仅在中央政府部门供职，可强大的皇室亲属却因他而取消了造反的阴谋。还有的人刚刚被委任为宰相，可朝中地位显赫的大臣却因他而收敛了出行的气派。这些人平定祸乱，端正社会风气，简直显得是太容易了。究竟是什么做法而形成了这种局面呢？再像有的人志向是在天下人忧愁以前就先为他们忧愁，在天下人欢乐以后才感到欢乐；还有的人，他那忠诚扬布到华夏和少数部族地区。即使到今天，奴仆和儿童也没有谁不颂扬他们的美德，不想像他们的风采。可在当时，他们却仅仅是一名读书人，或者是一名谏官，还没进入中央最高权力机关，但社会舆论和人心却都归向了他们。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是他们平素所执持的准则原本上就有他们自己的那些东西，而功勋和名望异乎寻常，并不是光靠才华吗？还有的人名望被众百姓所尊重，但具有眼光的人却瞧不起他。又有人功业建成，变成了大将，可势均力敌的人却很轻视他。这就表明，名望与才华，似乎都不足以仗持啊！君子打算扩展那宏大的功业，传布那美好的名声，究竟应该依从什么才好呢？要是想在节操的磨练上和治国本领的掌握上广泛地来做积聚，使两方面全都具备，古人中必定有那可以效法的楷模了。你们这些考生广博地观阅过留传至今的典籍，在行为上仰慕从前的圣人贤人，所学习的最重要的方面，应该没有能超出这个范围的了。请就此讲论一番，我们用来考察你们往上与古人做朋友的志趣。

提问：古今怀有学识的人，必定很看重被国家所任用。曾经观阅史书，战国的苏秦从普通平民中崛起，到山东六国推行自己的主张，指点所到国家的险隘关塞和各种情况就如同指点自己的手掌那

样清晰。西汉的贾谊从洛阳去拜见孝文帝，建议同姓诸侯王势力太强大，应当进行分割，后来事态的发展同贾谊所说的一模一样。西汉的韩信从萧何追上他的地方返回来，劝说汉高祖开进函谷关，占据三秦地区，消弱西楚霸王项羽，最后就采用了韩信的谋略。苏秦是一名说客，贾谊是个年轻人，淮阴侯韩信是位武夫，固然属于儒士所不讲论的人物，可他们的说法却都得到了证实，这难道是他们对于天下大势具有独到的见识吗?你们这些考生原本上正为得到国家的任用来到了考场，在当今的天下大势上也有能够讲论的东西吗?现今在北方的边防线上，东部设有蓟镇，西部设有宣府镇和大同镇，这三镇环绕京师，形势最紧急。从前宣府、大同的军事长官多次建议构筑起边墙城堡的长城险要防线，现今能够凭借它来阻挡住少数部族的入侵吗?还有人想在京师后部多修城墙，这也可行吗?筹划蓟镇防务的人认为，首先安抚好三卫地区的少数部族，使他们归服，然后就可以抵御外部的少数部族了。这种看法正确吗?还有人强调蓟镇的管辖段最长，而古北口等关隘最紧要，兵力投入少，就力量显得薄弱，防备一松弛，形势就危急，想要大量设布屯驻的军队，这样做行吗?从前倭寇实际上是在浙江境内开始捣乱，近年幸好逐渐收敛了，可又千里地区遭受水灾，老百姓没有安定的住所。现今倭寇又转而到了福建和广东境内，形势变得很紧急了，近日江西更为紧急，主管部门每天都传来警报。这又该通过什么办法去整治和安定住呢?武力防备一天比一天松弛，而贼寇造成的祸患到处都是，除去训练部队就不能够解决问题。现今是否可以全面付诸实施呢?皇上的圣明诏旨，曾经严厉斥责具体负责的各个大臣，本应训练有素了，可却没达到那种效果，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人说南方和北方情势不一样，进行训练的事宜也就不同，这种说法正确吗?还有人说北方应当责成将帅把事情办好，南方应当责成太守县令把事情办好，果真应像这样区别对待吗?另外还有最透彻地探究根本的论断吗?在古代圣明的时代，未曾不存在少数部族和贼寇的祸患，重要的是制服驾驭它们具有好办法罢了。你们对此要陈述一番，不要太简略。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自古以来的帝王没有谁能比唐尧虞舜更圣明的了。史书上称述唐尧虞舜端坐在朝廷上,天下就实现大治了。然而就在那个时期,众百姓也叹息洪水构成大灾难,三苗部落仍不归顺,这表明依然存在着尚未完全大治太平的情况,这难道是唐尧虞舜原本上就不体恤民众吗?帝王的臣僚在下面把政事都担负起来,帝王才可以清静无为。否则的话,凭借什么端坐在朝廷上就实现大治了呢?夏商周三代顶数成周最兴盛了,周宣王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振兴,《诗经》上称述召伯平定了淮水一带的部族,方叔征讨南方的荆蛮,尹吉甫讨伐北方的猃狁。只因获取到了合适的人选,分别任用他们,所以周宣王不用操劳,就实现了大治。皇帝我对此曾经很赞叹又特别仰慕。

皇帝我安抚天下到现在已经四十一年了,从早到晚恭敬地事奉天帝,取法列祖列宗,挑选并任用贤良的文武大臣,思考与他们去除掉百姓的祸害,使百姓正常地生活。兢兢业业,忙得什么都顾不上,未曾有过懈怠的时候。近来水旱构成灾害,黎民百姓还在挨饿受冻,北方少数部族经常入侵,边境地区很不安宁,而南方的倭寇更为严重,经过好几年了,仍未得到平定。这难道是政府各个部门不体会皇帝我的用心,全都光知道残害百姓,确有理由地招来了这些祸患吗?或者是在选取任用方面没有得到合适的人选,大多丧失了自己的职守吗?还是镇守边疆地区的大臣未能竭尽全力加以制服驾驭,而对异族入侵不当一回事呢?皇帝我怀有爱护民众的心念,可恩泽却未普遍施布到;立有遏制住祸乱的志向,可成效却未达到。固然是由于古今不同,没有获取到像古代那样把政事认真担负起来的臣僚罢了。如今想使上下一致忧虑,政事全部得到修明,兵力强盛而异族入侵的祸患得以去除,百姓安定而国家的根基得以巩固,灾殃可以止息住,困穷能够恢复过来,来与虞舜周朝的大治景象相媲美,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就能实现呢?你们这些读书人用尽心思来陈述列举,不要有什么畏

惧,也不要有什么隐瞒,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纳并付诸施行。

申时行　殿试对策

申时行(1535～1614)　字汝默,号瑶泉,晚号休休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时年28岁。至神宗朝,累官吏部尚书,入阁为首辅。施政务从宽大,世称长者。然政事每承神宗之意,不能大有建树。后遭弹劾,求罢归,卒于万历四十二年,享年80岁。"其相业无咎无誉,诗文亦如其为人"(《四库提要》)。有《赐闲堂集》今犹行世。

臣对:臣闻帝王之御极也,体君道以奉天心,而后可以建久安长治之业;肃臣纪以奉天职,而后可以成内修外攘之功。何则?人君者,天之所授,以统一万方而临驭兆民者也。其位尊,其任重,故君道常主乎逸。人臣者,天之所命,以左右一人而分理庶政者也。其分卑,其事赜,故臣道常主乎劳。君能奉天以端拱于上,而以其事责诸臣,则无为而化成,不言而功著,若於穆之运,玄机之宰,不假于推迁之力,而自然造物者矣。是谓能奉天心,而久安长治之业可建也。臣能奉君以奔走于下,而以其身致之君,则同心以共济,协忠以体国,若四时之佐,五行之吏,各效其宣布之能,而罔有违天者矣。是谓能奉天职,而内修外攘之功可成也。不然,则一人之身,万几攸萃,安能一一而理之?而庶官之众,各有司存,能不蹈于瘝旷之咎哉?故君必率臣以图久安长治之业,臣必辅君以树内修外攘之功,则和气溢而宇宙清宁,理道昌而民物康乂。顺治于内,而万方弘一统之规;威严于外,而四夷效咸宾之美。巩国祚于苞桑之固,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唐虞三代之治,不可复睹于今日哉!

钦惟皇帝陛下,禀刚健中正之资,合阴阳动静之德,际熙洽御天之运,膺寿考作人之符,精诚格乎穹昊而瑞应骈臻,妙道契乎玄元而休征毕集,盖媲美唐虞而超越乎三代者。臣窃伏草茅,沾被圣泽久矣。乃者叨有司之荐,得以与对乎大廷,而圣问所及特拳拳焉。首述

唐虞成周之治，继悯水旱盗贼之灾，任事失人之咎，而终究夫足兵安民之术，弭灾救困之方，且戒臣等以勿惮勿隐也。大哉皇言！忧国忧民之心见乎词矣。敢不披沥愚衷，以对扬于万一耶？

臣闻之《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明君在上，而又有良臣以左右之，则庶事可理也。又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惟臣钦若。言君能宪天，而为臣者自敬顺之，罔敢或悖也。是故君为元首而宪天于上，则法天以为聪，而居高听卑，可以不劳而坐听天下；法天以为明，而临下有赫，可以不劳而坐照四方。是君者，法天道以无为者也。臣为股肱而钦若于下，则代君以用其聪，而天下之利病，皆通达而无所壅；代君以用其明，而斯民之休戚，皆洞察而无所遗。是臣者，奉天职以有事者也。是故唐虞之世，万邦咸和矣，四方风动矣，文明之会昌矣。尧舜以聪明极圣之主，默运无为之治，而又有禹、皋、稷、契、伯益之臣，共佐太平之业，故下民之其咨也，洚水之为灾也，有苗之弗率也，尧舜非不之恤也，惟其忠良之佐足以赞皇猷，弼直之邻足以弘帝道，以恤阻饥则有率育之臣，以拯昏垫则有克勤之臣，以格负固则有赞德之臣。诸臣者，其奉君如奉天也，孜孜焉同寅协恭，罔敢怠遑也，故尧舜虽有旰食之忧，而终得以享垂衣之治。至今称中天之盛者，必曰唐虞，此尧舜得臣之明验也。

周宣之世，海内乂安矣，国势浸隆矣，文武之业复矣。宣王以聪明有道之君，嗣守无疆之业，而又有召虎、方叔、吉甫之臣，夹辅中兴之治，故淮夷之猾乱也，荆蛮之不靖也，玁狁之虔刘也，宣王非不之虑也，惟其位元宰者才兼乎文武，总元戎者勋联乎将相，有宣威江汉之臣而淮夷率俾，有壮猷南国之臣而荆蛮来威，有薄伐太原之臣而玁狁于襄。诸臣者，其事君亦如事天也，惴惴焉矢心协力，罔敢戏豫也，故宣王有继述之思，而终以成再造之绩。至今称中兴之盛者，必曰成周，此宣王得臣之明验也。尧舜、宣王之为君，法天道以无为；而唐虞、成周之臣，奉天职以有事，则所以建久安长治之业、成内修外攘之功者，岂偶然哉？

臣伏观陛下临御以来，四十有一年矣。上帝之申眷不为不隆，而诚敬愈笃；祖宗之成业不为不固，而仁孝愈纯。钦天有记，以表昭事

之忱;祖德有诗,以发聿追之念。至于虑切民恫,任专吏职。内责成于守令矣,而巡督之臣,岁不绝遣;外付托于将帅矣,而总制之命,任必加隆。无一念不在于民瘼,无一言不轸乎国虑。臣有以仰窥陛下之心即尧舜之心,而周宣不足侔也。于今诸瑞咸集,四灵毕至,固足以彰陛下之峻德鸿勋,超卓百代矣。然淫潦为灾,则町畦有垫溺之苦;亢旱为虐,则阡陌有枯槁之忧。倭夷窃发于东南,而海波弗靖;丑虏跳梁于西北,而边尘屡惊。甚则辽蓟之势,日就孤危,而江右之贼,岁成延蔓。殊非圣世之所宜有者,正尧舜忧民之时,周宣励精之日也。

臣伏读圣制有曰:间者水旱为灾,黎民阻饥,戎狄时警,边圉弗靖,而南贼尤甚,历时越岁,尚未底宁。岂有司莫体朕心,皆残民以逞,有以致之欤?陛下之言及此,万国万民之福也。臣窃观内外诸臣,凡折圭儛爵、结绶分符者,孰非陛下之宠荣乎?凡拥旄仗钺、制阃握兵者,孰非陛下之威灵乎?谓宜夙夜匪懈,寝处不遑,布宁谧之化于域中,扬振肃之威于阃外,不负天子而勿为圣世之瘝官也。然各私其身者,罔致恤于民依;各利其家者,莫究心于国事。内而守令藩臬,固必有旬宣惠和、忧勤抚字之臣矣。然而肥己瘠民、营私蠹国、以催科聚敛为能、以簿书期会为急者,亦多有之也。外而营屯督府,固必有敌忾鹰扬、严明果毅之臣矣。然而坐失机宜、轻损威重、隐败衄以为捷、幸安静以为福者,亦恒有之也。人臣咸若是,则何以成内修外攘之功,而佐久安长治之业哉?盖陛下爱民之心,容保如天地,而诸臣不能承宣德意,以弘康国之猷。陛下遏乱之志,果决如雷霆,而诸臣不能奉扬威命,以茂肃清之烈。是自负于尧舜成宣之主,而有愧于唐虞成周之臣多矣。

及读圣制终篇有曰:兹欲使上下协虑,政事具修,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灾咎可弭,困穷可复,以媲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臣愚以为,上者,下之表也;政事者,臣之纪也。足兵以除寇,将帅之责任也;安民以固国,守令之职业也。灾咎之有无,困穷之复否,皆由此出者也。为今日计,莫先于任人,尤莫要于择人。夫国家分职命官矣,即列郡专城,遐陬僻壤,莫不置吏,盖未尝不任人也,臣以为任之而未当也。国家举贤敛才旧矣,即铨司法曹,明黜显擢,罔有违

例，盖未尝不择人也，臣以为择之而未精也。任之未当与择之未精，而欲得人以裨圣治，是犹楩梓未充而需栋梁之用，穮蓑弗习而希稼穑之成，臣知其弗能也。故夫欲修内治者，在慎择乎守令而已矣；欲平外患者，在慎择乎将帅而已矣。

董仲舒曰：守令者，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者也。守令而不得其人，虽日布蠲恤之令，时廑惠鲜之思，民犹不被其泽也。今也阖郡无文翁之化，而渔猎民资者接踵；邑里无鲁恭之风，而朘剥民膏者比肩。以牧羊而暴政日闻，以齿焚而败官弗恤，郡县之民几何不流离而攘窃也。必也精选用之法，严举劾之科。其未任也，试以经济之略，必求谙练民情，通达治体，而不拘选用之途，如唐试理人策可也。其既任也，责以久任之功，必使吏安其官，民狎其政，而不拘迁转之格，如汉之为吏长子孙可也。其任而获效也，优以格外之赏，必为之车服，崇之阶御，以彰卓异之勋，如汉之爵至关内侯可也。如是则有民有土之寄不轻，数迁数易之弊可免，而人知淬励，以期不负乎宠渥之恩矣，宁有守令失人之患哉？

孙武曰：将者，三军之命，国之重任，不可不知也。将帅而不得其人，虽决策于九重，定计于千里，犹未可以临敌也。今也操练之律虽严，而士无投石超距之勇；衣粮之给如故，而将无搴旗陷阵之能。论战斗则缩颈而股栗，闻调遣则掩耳而口噤，边圉之寇几何不肆行而窃发也。必也慎武举之选，严比试之条。有洞识兵机、明习边务者，材可任也，则不拘以骑射之习，如任杜预以平吴可也。有摧锋陷敌、决胜先登者，功可录也，则不绳以文法之细，如赦魏尚于云中可也。有保障一方、折冲万里者，权可假也，则不牵以中制之命，如委充国于金城可也。如是则真材不耻于武弁，良将不苦于约束，而人得展布以自效。夫捍御之能矣，安有将帅失人之患哉？

有贤守令以宣德化于域中，则政治毕举，而内有顺治之休。有名将帅以扬威灵于阃外，则纪律章明，而外有威严之烈。由是民生举安，则邦本有磐石之固；由是兵威日振，则寇患无潢池之虞。和气交蒸于海宇，而灾害不兴；颂声流布于黔黎，而困穷以复。尚何不足以成久安长治之业，而绍唐虞成周之盛哉？抑臣又闻之，朝廷者，四方之

极也;纯心者,用人之枢也。惟陛下常存敬一之心,以端拱于上而已。敬则存其心而不放,一则纯乎理而不杂。深宫燕闲之中,而不忘乎知人安民之虑;斋居邃密之际,而日严夫敬天法祖之忱。则心正而朝廷百官皆一于正矣,文武大吏有不奉承而守令将帅有不奋励者哉?臣不识忌讳,干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身在帝位上,体悟为君之道来承奉天心,然后可以建成长治久安的帝业;肃正臣僚的行为准则来承奉天职,然后可以取得修明内政、抵御外敌的功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君主属于皇天所授付的专去统领天下各地和主宰亿万民众的人,他那地位最尊贵,他那责任最重大,因而为君之道总是以轻松为主。臣僚属于皇天所责成的专去辅佐君主并分头料理各种政务的人,他那名分就低一等,他那事务就繁多,因而为臣之道总是以辛苦为主。君主能做到承奉皇天,在朝廷上稳稳坐定,把具体政事交付给众臣僚去办好,也就清静无为而教化告成,不发号施令却功绩显著了。这就如同深远皇天的运行,玄妙时机的主宰,不借助什么推动和周转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就创造出万物来了。这才叫做能承奉天心,而长治久安的帝业就可以建成了呀!臣僚能做到承奉君主,在下面奔波忙碌,把自己的性命都舍得献给君主,也就同心同德,共同渡过难关,一致忠诚地去体念国家的命运,就像春夏秋冬作为皇天的助手,木火土金水作为皇天的神吏,各自施展出本人宣导播布皇恩的才能,而没有违逆皇天的人了。这才叫做能承奉天职,而修明内政、抵御外敌的功绩就可以成就了。否则的话,君主就是自己一个人,而各种政务都堆在面前,怎么能够一宗接一宗地都处理好呢?而文武百官又那么多,各个主管部门空摆在那里,能不陷入荒废掉自身职守的罪过里面去吗?所以君主一定要率领臣僚去追求长治久安的帝业,臣僚一定要辅助君主建成修明内政、抵御外敌的功绩,这样一来,和谐的气氛四处散布,而宇宙变得一片清明宁静;治国之道非常兴盛,而百姓和万物都得到治理,一片安康的景象。在内部顺从治理,各地就扩展天下一统的规模气象;在外部显出威武严厉来,四周的少数部族就全都采取归

服的良好行动。把国家命脉巩固到像系在桑树根上那样牢靠的程度，把天下措置到像泰山那样安稳的境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局面，难道在今天还不能重新让人看到吗？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禀受到刚强矫健与中和公正的天资，融合起阴阳动静的完美德性，正赶上清平安和、驾御天道的时运，应合着寿命长久、培育人才的符命，精诚传达到皇天那里而吉祥的兆应接连降现，灵妙之道同先天元气完全契合而美好的征兆全都来到，大致上已经和唐尧虞舜相媲美并且超过夏商周三代了。臣下我伏身在民间，蒙受到皇上的恩泽已经时间很长了。近来有幸受到主管部门的荐举，得以置身在殿廷回答策问的行列里，而皇上的圣明策问所涉及到的问题，又非常地恳切啊！在起首部分述说唐尧虞舜和成周的治绩，接下来哀悯水旱盗贼造成的灾祸，委托政事却没选准人选的过错，而在最后又探究兵力强盛和安定民众的办法，消除天灾和解救困穷的措施，并且告诫臣下我等人不要有什么畏惧，也不要有什么隐瞒。皇上的这番话语真是太宏大了！忧国忧民的心念在词句上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了。臣下我哪敢不把内心的愚昧想法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以便对答并播扬皇上圣明策问的万分之一呢？

臣下我听说《尚书》中说过这样的话：君主圣明啊，辅政大臣贤良啊，各种政事就顺利通畅啊！这几句话是强调圣明的君主位居在上面，而又有贤良的大臣去辅佐他，各种政事就能得到料理了。《尚书》中还说：只有皇天才看得最清楚，听得最分明，圣王必须去取法皇天，臣僚必须去恭敬地服从圣王的命令。这几句话是强调君主能够取法皇天，而当臣僚的人自行就恭敬地顺从君主，没有谁竟敢违逆啊！因此君主作为最高领袖而在上面取法皇天，一方面效仿皇天形成自己的听断能力，坐在高处听取下面的禀告，就可以不辛苦而坐着不动来了解天下的情况了；另方面效仿皇天形成自己的观察能力，监督下面人的表现而非常明晰，就可以不辛苦而坐在那里察照四面八方了。这表明，君主是取法天道而清静无为的角色啊！臣僚作为得力的助手在下面恭敬地顺从君主的命令，一方面代替君主发挥那听断能力，而天下的益处和弊病，全都反映上来，没有被卡在中间的东西；另方面

代替君主发挥那观察能力，而民众的喜乐与忧愁，全都看得一清二楚，没有被漏掉的地方。这表明，臣僚是承奉天职而把任务揽在身的角色啊！所以在唐尧虞舜时期，各个邦国全都和睦相处了，四面八方全都闻风响应了，文德辉照天下而正逢遇兴盛隆昌了。但唐尧虞舜凭借自身是耳聪目明、神圣至极的君主，默默地筹措那清静无为的大治局面，又有大禹、皋陶、后稷、契、伯益这样的大臣共同辅助太平的功业，因而下面的老百姓在忧叹挨饿，洪水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三苗部落拒不归服，对这些问题，唐尧虞舜并不是不体恤啊！只因他们的忠诚贤良的助手们足够用来辅佐盛明的大筹划，正直的身边大臣们足够用来弘扬称帝天下的大事业。用来去慰抚还在挨饿的众百姓，就有那率领民众去种好庄稼的大臣；用来去拯救被洪水淹没的人们，就有那万分勤劳的大臣；用来去使负隅顽抗的部族前来归服，就有那扩展仁德感化的大臣。这些大臣事奉君主如同事奉皇天，孜孜不倦，同心敬慎，和谐一致，谁也不敢懈怠疏忽啊！所以唐尧虞舜尽管面临着寝食不安的忧虑事，可到最后得以获享到端坐在朝廷上就天下大治的业绩。到现在只要提起如日中天般的治理最兴盛的人，一定就说那当然是唐尧虞舜了。这正是唐尧虞舜获取到合适的大臣的明显证验啊！

在周宣王时期，天下得到治理，变得安宁了，国势逐渐地强盛了，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大业得到恢复了。但周宣王凭借自身是耳聪目明、具有道德的君主，继承并守护永无尽头的王业，又有召虎、方叔、尹吉甫这样的大臣，围在身边来辅助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那种治理，所以淮水一带的部族起来反叛，南方的荆蛮也不老实，北方的猃狁四处劫掠，对这些祸乱，周宣王并不是不深为忧虑啊！只因他那担任最高行政长官的人，在才能上文武双全；统领一切军事事务的人，在勋业上能够出将入相。拥有那在长江汉水播扬威力的大臣，就致使淮水一带的部族重新顺从；拥有那在南方施展雄伟谋略的大臣，就致使荆蛮畏惧得前来归降；拥有那在太原以北征伐的大臣，就致使猃狁被驱逐。这些大臣事奉君主也如同事奉皇天，万分地戒惧，同心协力，谁也不敢草率安逸啊！所以周宣王具有继承先王大业的愿

望，到最后便成就了再造王室的业绩。到现在只要提起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最杰出的人，一定就说那当然是成周了。这正是周宣王获取到合适的大臣的明显证验啊！唐尧虞舜以及周宣王当好君主，取法天道来清静无为；而唐尧虞舜以及成周的大臣们，承奉天职而把任务揽在身。这样一来，他们建成长治久安的帝业，取得修明内政、抵御外敌的功绩，又哪里是出自偶然的原因呢？

臣下我跪拜看到陛下登上帝位以来，已经长达四十一年了。皇天上帝的眷顾不是不深厚，而皇上的虔诚恭敬越来越加深；列祖列宗的已成大业不是不巩固，而皇上的仁爱孝敬越来越纯正。敬奉皇天的举动具有记载，用来表达事奉天帝的真诚；效法祖宗的仁德写有诗篇，用来抒发追配的心念。至于深切地忧虑百姓的痛苦，谁被任用就要履行好当官的职责。搞好内政已经对太守县令做了交待了，而巡察督导的大臣每年都不中止派遣。把边疆事务托付给将帅了，而总督的任命，派出去就必定提高待遇。没有一个念头不投注在百姓的痛苦上，没有一句话不切中在国事的忧虑上。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恭敬看出陛下的用心也就是唐尧虞舜的用心，而周宣王却没有资格来相比啊！在当今，各种吉祥的兆应全都降现了，麒麟、凤凰、灵龟和神龙没有一种不来到了，这原本上就足以显示出陛下那高达天边的仁德和宏大的功绩，已经超过历代帝王而卓然自立了。可是久下不停的大雨形成了水灾，于是人们的家园出现了被淹没的痛苦；长时间的干旱造成祸害，于是田间产生了庄稼干枯的忧愁。倭寇在东南地区突然侵扰，而沿海一带很不安宁；丑陋的蒙古部族在西北捣乱，而边境的战事多次让内地感到震惊。更严重的竟是辽东和蓟镇的局势，一天比一天陷入孤立危急的状态，而窜到江西的倭寇，一年比一年构成蔓延的态势。这都决不是圣明时代所该存在的事情，现今也正属于唐尧虞舜当年忧念百姓的阶段，周宣王当年励精图治的岁月啊！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中有这样的话：近来水旱构成灾害，黎民百姓还在挨饿受冻，北方少数部族经常入侵，边境地区很不安宁，而南方的倭寇更为严重，经过好几年了，仍未得到平定。这

难道是政府各个部门不体会皇帝我的用心,全都光知道残害百姓,确有理由地招来了这些祸患吗?陛下的策问涉及到这个问题,真是全国各地和所有百姓的福份啊!臣下我私下观察朝廷和地方上的众臣僚,凡是持带圭玉获取爵位、佩戴印绶掌握权力的人,哪一个不是陛下赐给的宠信与荣耀呢?凡是竖起大旗手执铜斧、独当一面统领部队的人,哪一个不是陛下赋予的威势和灵光呢?按理说应该从早到晚永不懈怠,根本顾不上休息,把那国家安宁的教化施布到全国去,把那震慑肃清的威力播扬到境外去,不辜负天子的一片心意,不成为圣明时代的荒废职守的官员啊!然而那些各自为本人做打算的人,没有谁能对百姓的痛苦加以体恤;那些各自给自己全家捞好处的人,没有谁能对国家的事体用心考虑。在内地的太守县令和省级官员,原本上一定具有周遍地宣示恩惠宽和、勤恳地安抚并爱护百姓的臣僚了。然而使自己肥得流油却叫百姓穷得要命的人,为本人做谋划却损害国家利益的人,把能催交赋税、聚敛财富当成本事,把准备好上报文书、按期完成指令视为头等大事的人,也有很多啊!在边区的营寨卫所和军镇当中,原本上一定具有同仇敌忾、勇猛善战、威严明智、果断坚毅的臣僚了。然而眼看着丧失掉战机的人,轻易地就使威势受到损害的人,隐瞒战败却谎称获胜来上报和庆幸辖区没有外敌来侵扰并把这当成吉福的人,也经常是有的啊!臣僚全都像这个样子,那还凭仗什么能够建成修明内政、抵御外敌的功绩,辅助那长治久安的帝业呢?陛下爱护民众的心念,容纳和保护他们就像天地一般,可众位臣僚却不能够承奉宣播皇上的仁德用意,以便扩展那使国家安宁的大谋略。陛下遏止住祸乱的志向,果断坚决得就像雷霆一般,可众位臣僚却不能够承奉播扬威严的圣命,以便壮大那肃清天下的威力。这纯属自己对不起唐尧虞舜和周宣王那样的君主,同唐尧虞舜和成周时期的臣僚比起来要惭愧得多了。

臣下我恭敬地读到皇上圣明策问的末尾,上面又有这样的话:如今想使上下一致忧虑,政事全部得到修明,兵力强盛而异族入侵的祸患得以去除,百姓安定而国家的根基得以巩固,灾殃可以止息住,困穷能够恢复过来,来与虞舜周朝的大治景象相媲美,究竟采取什么措

施就能实现呢？臣下我愚昧地认为，上面的人是下面的人的表率，政事是臣僚的主要职守。使兵力强盛来驱除掉异族的入侵，这正属于将帅的责任；安定住民众来巩固住国家，这正属于太守县令的职责。灾殃是否降现，困穷能否恢复，全都取决于这两个方面啊！替目前的局势做谋划，没有比任用人才更占首位的事情了，为此又没有比选择人才更为紧要的了。国家已经划分出职位，任命官员了，即使是各个府县和军事重地，最远的边区和偏僻的地方，没有一处不设置官吏了，这也未尝不任用人才啊！可臣下我认为，任用他们却不恰当啊！国家提拔贤士，延揽人才，已经由来已久了，即使是人事主管部门和监察机构，严明的降职罢官与显赫的提职晋升并没有违反规定的情况，这也未尝不选择人才啊！可臣下我认为，选择他们却不精审啊！任用上不恰当与选择上不精审，却想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来帮助圣明的治理，这就如同上好的木料还不齐备却要做为栋梁来使用，翻地培土还不熟悉却要庄稼全长成，臣下我很清楚这是做不到的呀！因此要想修明内政，根本在于审慎地选择太守县令而已；要想平定外来的入侵，根本在于审慎地选择将帅而已。

西汉的董仲舒曾经说过：郡守县令，这是老百姓的师长和表率，是朝廷让他们承奉旨意去宣播化导的人员。太守县令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即使每天都颁布减免赋税加以赈济的诏令，时刻怀有施恩少不了孤独老人及孤儿的心思，老百姓仍旧蒙受不到朝廷的恩泽啊！如今一郡之内没有像西汉蜀郡太守文翁那样的教化，可搜刮众百姓资财的人却一个接一个。县乡没有像东汉中牟县令鲁恭那样的风范，可榨取众百姓血汗的人却一排接一排。由于年轻见识短而暴政一天比一天厉害，由于年老特糊涂而败坏职守根本就不当一回事，这样各郡县的百姓会有几个人不四处逃亡而偷盗抢劫呢？因此必须要使选用的制度很精详，强化举报弹劾的规定。在任命以前，用经邦济民的才略来测试他们，一定要求取熟悉民情和通晓治理纲要的人，不受选用途径的限制，像唐朝那样让当扬撰写治民策来考试，也就可以了。在任命以后，用长期任职必须取得的政绩来要求他们，一定要让官吏安心本职工作，老百姓习惯于他那套施政办法，不受提升转任的

条文的束缚，像西汉那样使做官的人在当地看到自己的子孙生长起来，也就可以了。谁在任职期间内取得了突出的政绩，就用超出一般规定的封赏来优待他，一定赐给他车马礼服，提高他的官位品级，用来表彰他的异乎寻常的功劳，像汉朝那样爵位高至关内侯，也就可以了。这样来做选任，朝廷把一方百姓交付给他来管理的职务，也就不再受人轻视了，屡次调动和频繁换人的弊病也就可以避免掉了，每名官员都知道锤炼激励自己，渴望不辜负朝廷的深厚恩典了，这哪里还会有太守县令用人不当的忧患呢？

春秋末期的孙武说：将帅是三军的性命所在，是国家的重要委托，对此不能不十分清楚啊！将帅获取不到合适的人选，即使在朝廷上做出了决策，在千里以外定下了计谋，仍旧不能够控制住敌军啊！如今训练的条令尽管很严格，可士兵却不具备踊跃杀敌的勇气。军饷照例准时发放，可将领却没有击败敌军的才能。一提起要战斗了，就个个缩起脖颈，浑身发抖。一听说要被调遣了，就人人捂住耳朵，嘴里说不出话来。这样在边境一带的少数部族，会有几个不肆意行动、突然入侵的呢？因此必须要慎重对待武举考试的选拔事宜，强化测试衡量的规则。涌现出深明用兵奥妙并对边防事务非常熟悉的人，他那才略可以任用，就不受必须会骑马射箭的限制，像西晋那样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去平定东吴，也就可以了。涌现出斩杀敌军、获胜后首先报捷的人，功劳应予排定，就不用细密的条文规定去做衡量，像汉文帝那样宽恕魏尚多报了六名被斩杀的敌军人数的过失，仍然让他担任云中太守，也就可以了。涌现出保卫住一方而使远处敌人不敢轻举妄动的人，临机处断的权力可以交给他，就不用朝廷做出的决定来牵制他，像汉宣帝那样全权让赵充国在金城郡处置羌人事宜，也就可以了。这样来做选任，真正的军事人才就不把当一名武官看成是耻辱，优秀的将帅就不被受到上面的牵制而感到难办了，每个人都得以做出筹划安排，主动来献出力量了。捍卫边疆和抵御外敌各尽其能了，哪里还会有将帅用人不当的忧患呢？

拥有贤良的太守县令在天下各地宣播仁德的教化，政事治理就会全都振兴起来，在国家内部出现顺从治理的美好局面。拥有著名

的将帅在边境沿线扬布威势和灵光,纪律就得到彰明,在国家外部形成威慑四方而绝对不敢违抗的武功。由此而百姓的生活全都一片安宁,国家的根基就像磐石那样地巩固。由此而军队的威力一天比一天振扬起来,异族入侵的祸患就不再有找个巢穴突然掀起来的忧虑了。和谐的气氛在整个天下交融散布,灾害也就不再降现了;颂扬的歌声在黎民百姓中四处传唱,困穷也就得以恢复了。这还有什么不足以建成长治久安的帝业,追比那唐尧虞舜和成周时期的大治景象的呢?不过臣下我又听说:朝廷是天下四方的最高典范,纯正的心念是用人的关键。这完全取决于陛下经常保持住恭敬和专一的心念,在上面稳稳坐定而已。恭敬就会保持住那心念而不胡思乱想,专一就会任何事情都符合道理而不掺杂进其他的东西。在深宫安闲无事的环境下,却不忘掉那知人善任和安定民众的思虑;在斋戒而不接触任何人的时候,每天都加强那敬奉皇天和效法祖宗的诚意。这样一来,心念纯正而朝廷和文武百官就全都归入纯正了,文武大臣还有拒不承奉皇上旨意的人吗?太守县令和将帅还有不奋发有为、激励自己的人吗?臣下我不懂得什么是忌讳,抵触冒犯了皇上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王锡爵　会试卷三道

王锡爵(1534～1610)　字元驭,号荆石,太仓(今属江苏)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榜眼,时年29岁。迄神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直至为首辅。事多切谏,曾请禁谄谀,抑奔竞,戒虚浮,节侈靡,辟横议,简工作。后遭弹劾,改任吏部尚书。卒于万历三十八年,享年77岁。有《王文肃集》及《疏草》今犹行世。

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

圣君之役民,得其心而又得其名也甚矣。文王得民之深也,其趋

事也乐，其称名也美，非至德而能若是乎?孟子明贤者后乐之意，若曰不忍用民之力者，圣人之心也。顾国有不容已之役，虽圣人亦不得以遂其心，盍亦观诸文王乎! 今夫台也者，察符瑞而候礼祥者也，文王尝以民力为台焉；沼也者，时观游而节劳逸者也，文王亦尝以民力为沼焉。夫役民之力，能使民忘其劳亦难矣，安能得其欢乎?文王之民，吾见载色载笑，翕然其交欢也。能使民从其令亦足矣，安能致其乐乎?文王之民，吾见以夷以怿，油然其胥乐也。同心以相欢，自同力以相济；同情以相乐，自同声以相劝。台沼宜成于不日矣! 民曰吾王之德，通于神明素矣，而是台之崇，不疾而速，盖神谋之成能，非百姓之与能也，名以灵台，不可以彰默相之妙耶?又曰吾王之泽，洽于神人和矣，而是沼之浚，勿亟而就，盖神化之感通，非人力之所通也，名以灵沼，不可以表幽赞之功耶? 是知文王不咈民以从欲，故必得其心也；罔违道以干誉，故必得其名也。贤者后乐，不于圣人征之乎! 尝观之传曰：文王厚德而广惠，含良而布恩。当时万物不失其性，天下不失其时，以成万材。乃知周民怙至仁，濡渥泽，真犹父母之孔迩也。故台池之役，民将捐耕凿而趋之；及其成也，喜色相告，而援神以美其名。逮今诵《灵台》之诗，而当时爱戴欢乐之情犹可想见。太和在成周，不信然哉!

圣明的君主役使众百姓，既赢得他们的衷心赞同又获取到美好的名声，这可太不一般了。周文王深深取得民众的爱戴，他们去服役竟心甘情愿，他们完工后给起名称又那样地美好，不是仁德最高的君主，又有谁能达到这种地步呢?孟子宣明只有贤德的人然后才能享受到站在池塘旁边观看鸟兽的那种快乐，好像是在说不忍心动用民众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这才是圣人的心愿啊! 可国家具有客观上不允许作罢的徭役，即使是圣人也没办法实现他那本来的心愿，这就何不去考察一下周文王的做法呢?如今修成的这座高台，是专门察看吉祥的兆应和测定美好的天象的场所，周文王曾经依靠民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修成它了。深池是定期来观赏游历、调节劳逸的处所，周文王也曾经依靠民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修成它了。动用民众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能够使民众忘记掉劳苦本来也就很难了，怎么能使他们干得挺高兴呢？可周文王的那些百姓，我却看见他们眉飞色舞，欢声笑语，不约而同地彼此感到特欢快啊！能够让民众听从自己的调遣，也就足够了，怎么能引来他们的喜乐呢？可周文王的那些百姓，我却看见他们面带笑容，心悦诚服，情不自禁地共同感到特喜乐啊！心里想的一样，彼此感到特欢快，自然就劲儿往一处使而互相来帮助。情感都相同，彼此觉得特喜乐，自然就同声喊加油而相互来鼓劲儿。这就难怪高台和深池很快就修成了。百姓们都说我们国王的仁德，一向就与神灵融通在一起了。而这座高台这么高，不用催促就快速地修成了，这恐怕是周文王能与神灵商量事情而使它适得其所，而不是百姓参预进来的结果啊！把它叫做灵台，不可以显示出神灵暗中佑助的奥妙吗？百姓们又都说我们国王的恩泽，遍及到神灵与世人，早就非常和谐了。而这座深池的挖掘，不用催促就很快完成了，这恐怕是神灵造化的感应使它疏通，而不是人的力量所疏通的呀！把它叫做灵台，不可以表明那神灵在幽冥中协助的功效吗？由此可知，周文王不驱赶百姓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所以就必定会赢得他们的衷心爱戴啊！不违背大道来骗取声誉，所以就必定会获得到那样的命名啊！只有贤德的人然后才能享受到站在池塘旁边观看鸟兽的那种快乐，不该到圣人那里取得证明吗？曾经观阅解释经典的书籍说：文王仁德深厚，恩惠广远，心怀善意，施布恩泽。当时万物不改变它们的习性，天下不发生违背时气节令的现象，成就各种东西。于是就了解到周朝的百姓依靠最仁德的君主，蒙受到最深厚的恩泽，真真就像自己的父亲在身边啊！所以修建高台深池的力役，老百姓都要放下手中的农活而赶去修建；等到修好的时候，又眉飞色舞地彼此传告，并援引神灵来给它们起上美好的名称。到今天诵读《诗经》中的《灵台》这首诗，当时众百姓对周文王爱戴和为他出力而感到特别欢乐的心情，仍然可以想象出来。最为和乐的景象呈现在成周时期，哪里不是最真实可信的呢？

论　人君其尊如天

人君之尊，天所命也；人臣之尊其君，亦天所命也。人君法天以

治天下,故能独成其尊;人臣事君如事天,故其君之尊益至。法天者,端拱于上者也;事君如事天者,尽职于下者也。端拱于上,是以运天下而不劳;尽职于下,是以任劳而不敢懈。运而不劳,以得其臣也,得其臣则治成,治成则君逸,而天下益仰其尊。劳而不敢懈,以体其君也,体其君则政事理,政事理则君无为,而益显其尊于天下。此君之尊所以上与天并,而实君臣之大分,天下之至理,非有所强焉者也。宋儒尹氏,知道者也,曰人君其尊如天。言人臣当知所尊也,明臣道也。而吾本人君之所以为尊者言之,明君道也。斯二者,盖互相发明也。

吾尝观诸天矣。今夫天下之人孰不知天之尊者,古今孰不能言天之尊者?而欲求其所以为尊,则未易见也。将以其巍然峻极者言之欤?斯以形言天矣,未得其所以为尊也。将以其造育天下者言之欤?斯以用言天矣,未尽其所以为尊也。夫五行之序,四时之纪,日月之照,雨露之濡,风雷之鼓震,此五者,天之所以为造育者也。使天而无以运之,则五者或失其统,而天之化机窒矣,何以为尊也?使五者不得其职,而必待于天自为之,则天不胜其劳,而其化机紊矣,又何以为尊也?天惟密运于上,而序之为五行,纪之为四时,照临之以日月,沾濡之以雨露,鼓动震荡之以风雷,周流循环而不可穷,倏忽变化而不可测,万物以生以成而不知其所使。以为非天耶?而主宰之者何也!以为天耶?而天则何为也!孰根柢是?而特不得其故;孰推行是?而特不得其端。於穆深远,而后知为天之尊也。嗟乎!此君道也。

帝王之尽君道者,莫如尧舜。孔子称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君哉舜也,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后世而下,可以想见其尊。而览观载记,尧舜之时亦多故矣。其大者洪水横流,有苗弗率;而当其时,寇贼奸宄未除,礼乐未制,五教未明,天下之州牧尚未得其理,宜二帝之不暇给,而所以能成其尊者,何也?则以君道运于上,而臣职尽于下也。故洪水则禹治之,有苗则禹征之,未尝以劳二帝也。寇贼奸宄则皋陶掌之,未尝以劳二帝也。礼乐则夔、伯夷典之,未尝以劳二帝也。五教则契敷之,未尝以劳二帝也。九州十二牧则四岳统之,未尝以劳二帝也。当时之臣,不以劳遗其君,而皆各任其职,是能尊其君者也,是能

事君如天者也。而二帝于其时，但见其地平天成而已矣，但见其舞干振羽而已矣，而上无劳焉；又但见其四方从欲而已矣，而上无劳焉；又但见其鬼神咸格，凤凰来仪而已矣，而上无劳焉；又但见其五品以逊，百姓以治，万邦咸宁而已矣，而上无劳焉。运而不劳，犹天之运也；不劳而成化，犹天之于造育也。故天下后世，知天之尊，则知二帝之尊；言二帝之尊者，必比于天之尊。历亿千万年而不改者，非有所强也。嗟乎！此君道也。

故人君者履大宝，握中枢，位曰天位，而天下之位莫加焉，天所命也。膺历数，缵帝极，统曰天统，而天下之统莫加焉，天所命也。合天下邦国之俸禄曰天禄，而天下之禄莫加焉，天所命也。人臣者受位与禄于君，而替君以承天之统者也，亦天所命也。天将付人君以抚御四海之权，裁成万物之道，而代其造育之功，则命之不得以不尊。天将使人君以独成其尊，则不得不列百执事之臣，以各任其职。故君者，天所命以尊者也；而臣者，天所命以成其君之尊者也。故君者，所制也，而非有所制者也；所事也，而非有所事者也；所则也，而非有所则者也。其尊也，天之道也。臣者，事君以自显者也，则君以自治者也，行君之制而致之民者也。其尊君也，亦天之道也。是皆天下之大分，而非有所强者也。

故人君总揽天下之纲，宰持天下之柄，独运于在上。而其臣奉君之政，承君之令，勤劳于在下。上下相成，而君所以益尊也。故礼之未备，是天之秩也，不可忽也，而典礼之臣任之矣；乐之未作，是天之和也，不可忽也，而典乐之臣任之矣；教之未敷，是天之叙也，不可忽也，而敷教之臣任之矣；寇贼奸宄之未除，是所以谨天宪也，不可忽也，而明刑之臣任之矣；州牧之未理，是所以治天民也，不可忽也，而方岳之臣任之矣；其或有蛮夷之侮，是所以致天讨也，不可忽也，而将帅之臣任之矣；其又或有水旱之警，是所以若天时也，不可忽也，而捍灾御患之臣任之矣。人臣皆竭精尽思，惟恐遗其君以劳，所以亮天工也；人君坐而受成，运而不劳，所以体天道也。体天道者，君之本尊也；亮天工者，人臣之所以成其尊也。故天下见其礼乐教化之行，而不见其劳，曰是何文治之神也！见其政刑之当，不轨之潜息，强夷巨寇之咸

弭,而不见其劳,曰是何武治之神也!见其方国之乂安,捍灾御患之有道,而不见其劳,曰是何加意于民而拊循之治之神也!若有以治之而亦不得其端,若有以致之而亦不得其故,至此而人君之尊果与天并,不可得而测也。

其明也,日月之照,天之明也;其恩也,雨露之濡,天之恩也;其威也,风雷之鼓震,天之威也;其政事之顺布,五行四时之循环,天之顺也。施之中国而爱戴,施之八荒海外而归服,施之昆虫草木而得所,施之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气而莫不知所尊,故曰人君之尊如天,能与天运者也。

君主的至尊地位,是皇天所授予的。臣僚要尊奉自己的君主,也是皇天所预定下的。君主取法皇天去治理整个天下,所以就能独自构成他那至尊的地位;臣僚事奉君主就如同事奉皇天,所以他们的君主的至尊地位就越发显得至高无上。君主取法皇天,属于在朝廷上稳稳坐定的角色;臣僚事奉君主就如同事奉皇天,属于在下面恪尽职守的角色。在朝廷上稳稳地坐定,因而筹措天下而不劳苦;在下面恪尽职守,因而承担起劳苦而不敢懈怠。筹措天下而不劳苦,是因为获取到了胜任的臣僚啊!获取到了胜任的臣僚,国家治理就大功告成;国家治理大功告成了,君主就一身轻松,而天下更加尊崇他那至尊的地位。劳苦而不敢懈怠,是因为体念自己的君主啊!体念自己的君主,政事就得到妥善的料理;政事得到妥善料理了,君主就清静无为,而越发把那至尊地位显示到整个天下。这正是君主的至尊地位往上与皇天并列的原因,实际上属于君主与臣僚的最大名分和天下的最高真理,并不是硬行地非要这样不可的。宋朝的儒者尹氏,是位懂得大道的人,他说君主的尊贵地位如同皇天,这是在强调臣僚应当明白所要尊奉的对象啊!也是在宣明为臣之道啊!可我要依据君主占据至尊地位的原由来进行论说,宣明那为君之道啊!这两个方面,其实是相互发明的。

我曾经观察那皇天了。如今天下的人们,有谁不知道皇天的尊贵呢?从古至今,又有谁不能够讲论皇天的尊贵呢?可要探究皇天尊

贵的原由，就不是容易看出来的了。打算从广阔高远的角度来做讲论吗?可这却是拿形状来讲论皇天啊!并没有获取到它最尊贵的原由啊!打算从皇天创造化育天底下的一切事物这个角度来做讲论吗?可这却是拿作用来讲论皇天啊!并没有完全揭示出它最尊贵的原由啊!木、火、土、金、水这五行的生克顺序，春夏秋冬的交替到来，太阳和月亮的照耀，雨水露珠的滋润，风和雷霆的吹动震荡，这五方面的表现属于皇天用来创造化育万物的方式。假设皇天没有办法运作起它们，这五个方面有时失去了统领的东西，皇天的化育机制就阻塞了，还凭什么形成它那尊贵呢?假设这五个方面发挥不出各自的作用来，必须需要皇天自己去做一切，皇天也就根本承受不了那万般的劳苦，而化育的机制就紊乱了，又凭什么形成它那尊贵呢?只因皇天在上面周密地运作，把生克顺序规定为木火土金水的流转，把一年四季规定为春夏秋冬，把照耀的物体规定为太阳和月亮，把滋润的东西规定为雨水露珠，把吹动震荡的东西规定为风和雷霆，使它们在全年内运行起来，再度开始新的循环，永远没有止境，飞快地发生变化，根本就预测不到，万物由此而化生，由此而成熟，可却不知道那支配的力量是什么。认为不是那皇天吗?可主宰的东西又到底是什么呢?认为是皇天吗?而皇天又到底做了些什么呢?究竟是谁给这一切奠定下根基了呢?可却唯独找不到那原因;究竟是谁推行了这一切呢?可却唯独找不到那来历。既美好，又深远，然后才了解到作为皇天的那种尊贵地位啊!哎呀呀!这就是为君之道啊!

作为圣帝明王而把为君之道行用到极点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唐尧虞舜的了。孔子说:只有皇天最尊贵，唯独唐尧取法它。虞舜也真够得上是位君主了!自己保持恭敬的态度，坐北朝南端正地坐定也就到此为止了。后世沿续的人们，可以想象出他那尊贵来。但观阅古书的记载，在唐尧虞舜时代也存在着很多的社会问题呀!其中严重的有四处泛滥的洪水和三苗部落拒不归顺，而且在当时，抢劫杀人的现象和内奸外贼尚未消除，礼仪乐舞尚未制定好，有关君臣父子的五种伦理准则的教化尚未明确，全国各地的地方长官尚未把各自的辖区治理好，难怪尧舜二帝忙碌得没有休息的时候啊!然而能够形成他们

那至尊地位的原因，又在哪里呢？这是由于为君之道在上面运作起来，而臣僚的职责在下面得到了完全地履行啊！因而对洪水就由大禹去治理，对三苗部落就由大禹去讨伐，未尝使尧舜二帝亲自来操劳啊！对抢劫杀人的现象和内奸外贼就由皋陶去惩治，未尝使尧舜二帝亲自来操劳啊！对礼仪乐舞就由夔和伯夷去掌管，未尝使尧舜二帝亲自来操劳啊！对君臣父子等五种伦理准则的教化就由契去施布，未尝使尧舜二帝亲自来操劳啊！对九州十二牧这些地方长官就由身在朝廷的各管一方的四位长官去统辖，未尝使尧舜二帝亲自来操劳啊！当时的大臣并不把操劳事留给自己的君主，全都各自履行好本人的职责，这属于能够尊奉自己的君主的人啊！这属于能够事奉君主就像事奉皇天的人啊！而尧舜二帝在当时看到的只是那天地一片安宁的景象罢了，看到的只是在殿阶两侧表演文舞来感化三苗部落的场面罢了，高高在上却没付出劳苦啊！又只是看到天下四方全都服从朝廷的命令罢了，高高在上却没付出劳苦啊！又只是看到鬼神全都享受祭品，凤凰成对地来到罢了，高高在上却没付出劳苦啊！又只是看到君臣父子等五种伦理准则得到遵守和各个宗族得到治理以及各个邦国全都安宁罢了，高高在上却没付出劳苦啊！运作却不付出劳苦，这就和皇天的运作一个样啊！不付出劳苦却实现了教化，这就和皇天对创造化育的做法一个样啊！所以天下后世知道了皇天的尊贵，也就知道了尧舜二帝的尊贵了。讲论尧舜二帝尊贵的人，必定把他们同皇天的尊贵相提并论。这是历经亿万年也改变不了的事情，决不是硬行地非要这样来讲论啊！哎呀呀！这就是为君之道啊！

因而作为君主，登上帝位，掌握最高权力，这尊位就专称为天位，而天下的一切官位都绝对超不过去，这是皇天所授付的呀！承当那注定的时运气数，继承那帝业的鼎盛形态，这统系就专称为天统，而天下的所有统系都绝对超不过去，这也是皇天所授付的呀！把天下邦国的俸禄集中到一起，就专称为天禄，而天下的各种俸禄都绝对超不过去，这还是皇天所授付的呀！臣僚属于从君主那里得到官位与俸禄并替君主去承奉皇天统系的人，这也是皇天所授付的呀！皇天打算把安抚驾驭四海的权力和剪裁成就万物的大道授付给君主，代替它取得

创造化育的功效，这种授付就不能不叫君主最为尊贵。皇天打算叫君主独自构成他那尊贵，就不能不给他排定下各种办事的臣僚，用来各自承担起各自的职责来。因而君主是皇天把那尊贵授付给他的人，而臣僚则是皇天把那卫护自己君主的至尊地位的使命授付给他们的人。因此君主就成为要去进行控制的角色，而决不是有什么要被控制的角色啊！就成为被事奉的角色，而决不是要去事奉什么的角色啊！就成为被效法的角色，而决不是要去效法什么的角色啊！他那尊贵，正属于皇天的准则啊！而臣僚却是事奉君主来显现自己的角色，是效法君主来修养好自己的角色，是奉行君主的命令并贯彻到民众那里去的角色。他们尊奉君主，也属于皇天的准则啊！这全都是天下的最大名分，并不是硬行地非要这样不可的呀！

因此君主总揽天下的纲纪，执掌天下的大权，在上面一个人来运作筹措；而手下的臣僚执行君主的朝政，承奉君主的命令，在下面勤劳地办事情。上下互相促成，而君主由此显得更为尊贵啊！所以礼仪还不完备，这可原本上属于皇天所规定的等级秩序，决不容忽略啊！而负责礼仪的大臣就去制定它了。乐舞还没创制出来，这可原本上属于皇天所要求的和乐，决不容忽略啊！而负责乐舞的大臣就去创制它了。教化还没施布开，这可原本上属于皇天所确定的人伦次序，决不容忽略啊！而负责推行教化的大臣就去推行了。抢劫杀人的现象和内奸外贼还没有清除，这是需要强化皇天的法典，决不容忽略啊！而宣明刑罚的大臣就去宣明了。地方长官还没治理好本辖区，这是需要去治理皇天降生下的民众，决不容忽略啊！而各掌一方的最高地方长官就去监督治理了。或者还存在着少数部族的侵扰，这是需要发出那皇天的讨伐，决不容忽略啊！而担任将帅的大臣就去讨伐了。或者还出现了水灾旱灾的警告，这是需要顺从那皇天的时令，决不容忽略啊！而抵御灾殃的大臣就去抵御了。臣僚全都竭尽精力，用尽心思，只怕将那劳苦事留给自己的君主，目的在于协助皇天的事情啊！君主坐在那里接受成就的功绩，运作筹措而不劳苦，目的在于体察皇天的准则啊！体察皇天的准则，这是君主原本上就尊贵的表现；协助皇天的事情，这是臣僚用来卫护君主尊贵地位的表现。所以天下人

看到他那礼仪乐舞的教化得到推行，但却不见他很劳苦，就会说：这是多么神妙的文治啊！看到他那政事和刑罚的妥当程度，为非作歹的家伙都悄悄停止活动了，强悍的少数部族和势力强大的盗贼全都不再捣乱了，但却不见他很劳苦，就会说：这是多么神妙的武治啊！看到他统辖的各个地区得到治理，变得安宁，抵御灾殃具有恰切的办法，但却不见他很劳苦，就会说：这是多么神妙的对民众特别关心并加以安抚的治理啊！好像是有办法施行治理可却摸不到那来历，好像是有办法实现大治可又找不出那原由来，达到了这种境地，君主的至尊地位就真正地与皇天并列了，根本就无法让人猜测出来了。

他那清明，就如同太阳和月亮的照耀一切，纯属皇天的清明啊！他那恩泽，就如同雨水和露珠的滋润万物，纯属皇天的恩泽啊！他那威势，就如同风和雷霆的吹动与震撼，纯属皇天的威势啊！他那政事的顺利贯彻，就如同木火土金水和春夏秋冬的循环不已，纯属皇天的顺畅啊！施布到华夏境内而人人都爱戴他，推广到最遥远的域外地区而处处都归服他，延布到昆虫草木身上而都各得其所，扩展到船只车辆能到达和人的力量能触及到的地方，只要是有血气的生物，没有不知道该尊奉的对象的。所以君主的至尊地位如同皇天，他是能与皇天共同运作筹措的人啊！

策　第四问

盖闻植高世之节、怀经世之具者，风采著于当时，声实垂于后代，乃志士之远图，达人之宏轨也。此岂可与拘常挛俗、沾沾自效者道哉？所谓高世之节者，何也？超于风气之表，立于波荡之中，其视天下若有所不屑者，即怵之以威，诱之以利，而贞介之操确乎其不易也。有是节也，而众望归之矣。所谓经世之具者，何也？明于天地之故，通于帝王之略，其视天下若无所甚难者，即授之以位，委之以政，而运量之能恢乎其不匮也。有是具也，而众望归之矣。夫节之立也，由于己；而具之施也，存乎时。时而用也，则达诸天下；不者，亦以善其身而传诸后。是故趯然高蹈，匪以钓奇也；划然远播，匪以炫能也。其节诚

修，其具诚在，二者备矣，是谓全德。众望攸归，养盛自致，匪饰行而要名也。愚尝执此以览观往昔，品骘名流。

盖自三五以降，虽淳厚渐漓，而光岳之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者，往往钟瑰伟之材，发寥廓之士，上下数千载间，未易以悉数也。姑举执事所询者言之。有处岩穴之间，负天下之望，如段干木、鲁仲连、严光、黄宪其人焉。诸葛亮、谢安，才猷未试之先，亦四子之伦也。有处廊庙之间，负天下之望，如汲黯、杨绾其人焉。范仲淹、司马光，功烈未究之先，亦二子之伦也。夫干木逾垣厉守，文侯式其闾，而东征之难息焉。仲连轻世肆志，平原屈其辩，而帝秦之议寝焉。蝉蜕轩冕之外，折冲尊俎之余，其远致足称也。严光高步颍阳，寄迹一丝之钓，而节义所激，汉鼎系之。黄宪潜修慎阳，比量千顷之陂，而风旨所感，士类慕之。夺奸雄觊觎之念，消士友鄙吝之萌，其高标可想也。之四子者，耽长往之趣者也。诸葛亮抱膝隆中，长吟《梁父》，隐然有“卧龙”之誉焉。逮感知三顾，遂奠鼎足之业。谢安陶情山水，高谢尘寰，萧然有凌霞之致焉。及出当国柄，竟贻典午之安。管乐长材，东山雅量，民不失望，其在此乎！汲黯诘张汤之刻，斥公孙之诈，直气劲节，天子重之；淮南异谋有所惮而不发，固无假于重权也，其社稷之臣欤？杨绾居家，不问生业，禄廪悉分姻旧，清名俭德，天下高之；京兆驺从闻相命而辄损，固无俟于岁月也，其缙绅之表欤？之二子者，树匡世之绩者也。范仲淹志抱先忧，而以天下为任，进《百官》之图，绥西夏之旅，康济弘略，不待奉天章之对，而才已见矣。司马光学本不欺，而以国家为念，进五札之规，持新法之谏，轸民至意，不待兴元祐之治，而德已孚矣。庶士承风，田夫知姓，永世有辞，其在此乎？

嗟乎！出处异致，心迹歧观，称毁殊情，始终易态。聚庐而居，同闲而处，以某问某，盖有曰吾不知之者矣。况身处岩穴而才猷未试者，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玩物以激其清，而怕不免离群之诮。身居廊庙而功业未究者，或矫众以伸其志，或急节以赴其会，而怕不免徇世之嫌。久矣夫，闻望之难也。乃古之人令誉宣昭，无论遐迩久近，莫不仰休光，钦懿烈。此岂声音笑貌卒尔为之，而侥幸其或得者哉？无亦耿介拔俗，慷慨酬时，其节与具有大过人者耶！

今夫麟游薮而仁气扬,凤巢阿而德辉著,几相为感也。君子高世之节犹是也,不言而天下信之,后世为准焉,即身之显晦弗论已。今夫水怀珠而川媚,石韫玉而山辉,实不容掩也。君子经世之具犹是也,未行而天下信之,后世为准焉,即位之崇卑弗论已。严光诸人所以负天下之望者,节也,而未始无其具。仲淹诸人所以负天下之望者,具也,而未始不修其节。向使砥砺亢矣,而不闲于具,则索之易穷,名奚取焉?若殷浩是已,弱冠驰声,清徽卓越,通人伺其去就,苍生卜其安危,可不谓名乎!而束之高阁之言,足称达识,由其具之不豫也。才略具矣,而不植其节,则迫之易玩,功曷贵焉?若韩信是已,秉钺东麾,三秦底定,卷旆北指,燕赵风靡,可不谓功乎!而易与之侮,切中生平,由其节之不立也。甚哉名与功之不足恃,而高世之节,经世之具,所宜豫养而兼全者也,则干木以下诸君子者是已。虽然,干木、仲连抗节乱世贞矣,要其指归,不合于大道。谢安矫情镇物,谈虚崇侈,君子不由也。若严子陵之逸致,黄叔度之宏宇,汲长孺之切直,杨公权之廉操,诸葛孔明之大略,范希文、司马君实之纯德,殆庶几乎九原可作也。

愚诚愿为执鞭,欣慕之焉,然而非其极也。执事谓古人必有可法者,其惟伊尹乎!躬耒耕而乐尧舜也,而世不以为迂;汤始以币聘之,嚣嚣而不顾也,而世不以为伉;已而就汤,而世不以为徇;翊商受命,缵服有夏,而世不以为异。彼所以取信于天下者,何其豫耶!应龙潜于深渊,灵幻倏烁,人睹其神而莫测也。及腾驰云雾,上下天地,变化风雨,滋育万类,人被其利而莫知也。盖自一介取予,推之千驷万钟,非道义而不屑也,高世之节孰尚焉,然而非有心于洁己也。自匹夫匹妇,耻不被尧舜之泽,而左右厥辟,以式于九围也,经世之具孰周焉,然而非有意于趋时也。是故专美有商,高视千古,迄今莫与争功而较名者,允也其元圣哉!儒者有言:宁学圣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志《伊》之训,愚生夙闻之矣,执事幸勿以为狂。

曾经听说树立起超凡脱俗的节操和怀有筹划国政的本领的人,高风亮节在当时就四处播扬,名声业绩又流传到后世,这正属于志士

的远大理想和明智者的宏大规划呀！他们的所作所为哪里能够向那些被常情限定住、被习惯束缚住却又觉得满不错而自行跟着走的人来做讲述呢？所谓树立起超凡脱俗的节操，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这是说凌驾在社会风气的上面，挺立在躁动的特定环境当中，在他看来天下的有些事情根本就不屑一顾，即使用威势去胁迫他，用功利去引诱他，他那纯正高洁的节操却仍坚定地决不改变啊！持有这种节操，众人的敬仰之情就全都归向他了。所谓筹划国政的本领，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这是说深知天地变化的缘由，通晓称帝天下或称王天下的谋略，在他看来天下的有些事情根本就不是特别难解决的，假如把官位授给他，把国政交给他，他那运作筹措的才能就全面地施展出来而没有枯竭的时候啊！怀有这种本领，众人的敬仰之情就全都归向他了。节操的树立，是由自己来决定的；本领的施展，是和时势的需要结合在一起的。适应时势的需要而被国家所任用，就扩展到整个天下去；否则的话，也凭借修养好自身而流传到后世去。因而显赫地超出一般人的通常举动，这并不是用来骗取到奇异的美称啊！鲜明地把治国措施播布到远方去，这并不是用来炫耀自己的才能啊！他那节操确实得到了修明，他那本领确实明摆在那里，这两方面全都具备，就被称为德才兼备的人。众人的敬仰之情全都归向他，这是他修养自身特充分所带来的自然的结果，并不是装扮自己的行为来骗取名声啊！我曾按照这一标准去观察古代的情况，评品排定那些著名的人物。

从三皇五帝以后，尽管淳正浑厚的风气逐渐变得淡薄了，可三台星与五岳的精气屈折盘旋往上升腾，四处充溢而聚积深厚，往往孕育出奇特的人才，生发出像苍天一样广远空旷的士子，上下数千年间，很不容易把他们一一列举出来啊！姑且拿你们这些主考官在策问中所询问的几类人物做番评议。有一类人身在隐居的处所，可却使天下人把期望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像战国初期的孔子弟子段干木、战国后期的鲁仲连、东汉的严光与黄宪，就是这类人啊！三国时的诸葛亮、东晋的谢安，在他们的才干和谋略还没施展出来以前，也属于和以上四个人同类的人啊！还有一类人身在朝廷之上，可却使天下人把

期望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像西汉的汲黯、唐朝的杨绾，就是这类人啊！北宋的范仲淹和司马光，在他们的功绩还没建立起来以前，也属于和以上两个人同类的人啊！段干木对魏文侯前来拜访却跳墙躲开不与他见面，牢牢恪守自己所奉持的大道，而魏文侯以后只要经过他的住所，就手扶车前横木来敬礼，于是秦国要从西部征伐东方魏国的计划就因此而自动取消了。鲁仲连看不起世上的一切，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致使赵国的平原君在他的雄辩面前表示屈服，而尊奉秦国为西帝的主张就告吹了。这两位人物远远脱离开做官的行列，在酒宴上就击退了敌人的兵车，他们的高远情致是太值得称赞的了。严光高高地跟随在尧时隐士许由的后面，专在江边钓鱼来安排自己的形迹，可那节操道义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东汉的国家命运依赖它才延续下来。黄宪在家乡慎阳县默默地修养好自己的品德，被人们比拟成广阔的湖水，可那风格旨趣所产生的感染力量，使读书人都很仰慕。这两位人物迫使奸雄打消了谋取帝位的念头，消除了友人和读书人贪婪想法的再度萌生，他们的清高风范可以让人追念啊！以上这四个人都是沉浸在避世隐居的意趣中的一类人啊！诸葛亮在隆中山隐遁不出，高声吟诵《梁父吟》，在友人当中已经享有“卧龙”的赞誉了。等到感念并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厚意，于是就奠立起蜀汉与曹魏、东吴并立的大业。谢安把情趣投注在山水美景中，远远脱离尘世的干扰，寂静地怀有登入云霞的志趣。等到出来担任朝廷的重臣，最后给东晋司马氏政权留下了继续存在的基石。诸葛亮具有古代管仲、乐毅那样的杰出才干，谢东山器度宏大，民众对他们不失去希望，原因也就在这上面吧？汲黯诘责廷尉张汤用刑苛酷，指斥丞相公孙宏用心奸诈，这种正直不屈的气节，使汉武帝很尊重他。淮南王刘安阴谋起兵反叛，可就因畏惧汲黯身在朝廷而不敢付诸实施，这表明有些事情原本上就不需要借助那重大的权力啊！汲黯才属于安定住国家的大臣吧？杨绾平常在家中根本就不过问生计方面的事情，把俸禄收入全部分给亲友，这种甘愿清贫的美名和俭约的美德，使天下人一致赞许他。京兆尹黎干出行特别讲求气派，听到了朝廷任命杨绾做宰相的消息，立刻就减少了前呼后拥的随从人员，这表明有些事

情原本上就不需要等多长时间才能解决啊！杨绾才属于众官员的楷模吧？这两个人，正是建立起匡正世道的功绩的一类人啊！范仲淹抱定在世人忧虑以前就先忧虑的志向，把天下作为己任，进呈应该出自公心予以进用的《百官图》，平定了西夏侵扰的用兵活动，他那安定国家和百姓的宏大谋略，没等到被任命为参知政事而在天章阁对答宋仁宗的询问以前，就已经显现出才华来了。司马光的学术是建立在不欺诳的基础上的，他把国家作为体念的核心，进献五道规谏天子的奏札，坚持不行新法的谏诤，他那关爱百姓的最深心意，没等到兴行宋哲宗元祐年间的那一套治国措施，就已经被人们信服他那德业了。一般的读书人承奉他们的风范，耕田的农夫也知道他们的姓名，世世代代都有提起他们的时候，原因也就在这上面吧？

哎呀呀！出来做官和隐居民间的志趣是各有抉择的，思想和行为的表现是存在差距的，得到称赞和受到诋毁的着眼点是因人而异的，开始到最后的情形是发生变化的。在同一片住宅区里居住，在同一条里巷内相处，拿其中的某个人向另一个人来打听他是谁，也有说我不清楚的呀！何况隐居在民间而才华谋略尚未施展出来的人，有的认为世俗太污浊而产生他那气概，有的觉得事情毛病太多而激扬起他那清高，但恐怕仍不免要招来离群索居的嘲讽。身在朝廷供职而功业尚未建立起来的人，有的故意表现出与众不同而施展出自己的抱负，有的把节操放在第一位而去承当起不怕杀身的事情，但恐怕仍不免要招来随顺世俗的嫌疑。名望太难建立起来，这是由来已久的了。可古人竟美誉四处传播，无论距离远近还是时间长短，没有谁不仰望他那美好的风采，敬佩他那优异的业绩。这又哪里是声音笑貌猛然间造成印象而侥幸获得到理想的结果呢？不也就是耿介得超出世俗去，慷慨地适应时势的需要，他那节操和本领确有远远超出一般人的地方吗？

如今像麒麟那样的人物在草泽中游动，仁爱的气质到处扬布；像凤凰那样的人物隐居在山麓下，道德的光辉四处照耀，多少次地构成彼此的感召啊！君子超凡脱俗的节操仍和古人一个样，不说这说那而天下人却都信服他，后世也把他当成典范，至于他做上高官与否人们

是不去理会的。如今水波中藏伏着夜明珠而河流显得特明媚，石块中蕴藏着和氏璧而山峦由此放光辉，实际上是绝对遮掩不住的。君子筹划国政的本领仍和古人一个样，还没施展出来而天下人却都信服他，后世也把他当成典范，至于他官位高低如何人们是不去理会的。严光等人使得天下人把期望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原因是有那节操同时也未曾不具备那本领啊！范仲淹等人使得天下人把期望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原因是有那本领同时又未曾不修明自己的节操啊！假如修养自己已经达到顶点了，可却不熟悉治国那套本领，任用他处理政事就容易变得束手无策。这样一来，他那名声还有什么可取的呢？像东晋的殷浩就是这样。他年轻时就名声远扬，高雅的谈吐超越众人，而庾翼关于像他这类人完全应该抛在一边不任用的评论，足可称得上是深切的看法，这因为殷浩的治国本领根本就不大呀！假如才干谋略已经具备了，可却不树立起自己的节操，一受到胁迫也就会屈服了。这样一来，他那功绩还有什么值得让人看重的呢？像西汉的韩信就是这样。他执掌兵权向东进发，平定了三秦地区，又挥军向北攻击，燕赵地区望风披靡，能不称为大功绩吗？可很容易让他从双腿下爬过去来羞辱他，这正切中了他的为人，这正因为他那节操没有树立起来呀！以上所述，可太说明问题了，名声与功绩并不值得完全仗持，而超凡脱俗的节操和筹划国政的本领，正属于应当绰绰有余地来培养并且二者全都具备的东西啊！像段干木以下各位君子那样去做就对了。尽管如此，段干木和鲁仲连在动乱的年代坚持节操，已经显得很纯正了，但探究他们的主旨，却与大道不相符合。谢安故作姿态来镇抚住人们，讲论虚无那一套，看重奢侈的享受，也是君子不去照着做的。只有严子陵那样的超脱态度，黄叔度那样的伟大胸怀，汲长孺那样的恳切率直，杨公权那样的廉洁操守，诸葛孔明那样的深远谋略，范希文和司马君实那样的纯粹的品德，才差不多会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啊！

我确实乐意跟在这些人的后面前进，非常地仰慕他们，然而却不是那最理想的人选啊！ 您们这些主考官在策问中说古人中一定存在着可以效法的人物，恐怕也只是商朝的那位伊尹吧！他在田间从事耕

作，但却希望当代的君主和民众都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和唐尧虞舜治理下的那样的民众，可世上却不认为他太高傲；不久就投奔了商汤，可世上却不认为他随顺世俗；等到辅佐商朝承受天命，取代了夏朝，可世上却不认为他违反了大道。他用来取信于天下的东西，是多么地绰绰有余啊！恰恰应合了龙在深渊中藏伏，猛然闪跃出来，灵妙地变化，人们看到了它那神异可却预测不出来呀！等到腾云驾雾，在天地之间上来下去，使风雨准时降临，滋润并化育万物，世人蒙受到了那好处但却不清楚其中的缘由啊！这是因为从那一片草叶的取用和给予，推广到千辆车马和万钟谷物的优厚待遇，不符合道义的话，就根本不屑一顾，这种超凡脱俗的节操有谁还能在他之上呢？然而又不是故意地来使自己显得高洁呀！从每名男子到每名妇女，都为他们没有蒙受到唐尧虞舜那样的恩泽而自己感到是自己的耻辱，而在左右辅助君主，使九州全对商王的命令照办不误啊！这种筹划国政的本领又有谁能比他还全面呢？然而又不是有意地来赶潮流呀！因此在商朝独享美名，在历史上位居第一，直至今天也没有谁能和他比试功业和名声，确实是位大圣人啊！儒者说过这样的话：宁可学习圣人还差得很远，也不想凭借自己的一种长处而建立起名声来。牢牢记住《尚书》中的《伊训》，愚昧的考生我早就听说过这种话语了，您们这些主考官多开恩不要认为我狂妄啊！

王锡爵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帝王之御世也，必文武并用，而后天下之治法以行；必仁智相须，而后天下之治人以得。何谓治法？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使远迩胥匡，中外禔福，而顺治威严，永孚于休者，皆法也。何谓治人？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使明良一德，事使同心，而奔走御侮，各称其职者，皆人也。人固缘法而举，法必待人而行。是故欲行治法，则修文以布怀柔之德，经武以彰挞伐之威，而安内攘外之功，兼举之矣。欲得治人，则本仁以弘翕受之公，尽智以昭旌别之典，而辅理承化之绩，恒赖之矣。自古太平之世，君逸于上，臣劳于下，而四方为之

向风,八表为之顺则者,恃有此具也。不然,上虽有仁圣之主,而下无忠良之佐;君虽有愿治之志,而民不得被至治之泽。非惟官失其人,而法亦因之以不举,是岂可无转移之术哉?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文武之资,立仁义中正之极,恭己垂裳而百辟钦承,动容作色而海内震恐。四十余年之间,三辰轨度,九域奠维,以天地则既泰矣;涂歌里诵,岳贡川输,以民物则既阜矣;赍琛交贡,玉帛来同,以戎狄则既宾矣。然犹圣不自圣,进臣等于廷,咨以当世之务。斯心也,视民如伤之心,望道未见之心也。臣诚愚陋,不足以塞大问,应明旨。虽然,敢不掇拾所闻,而对扬万一乎?

臣伏读圣制,首称尧舜无为之治,继之以宣王中兴之烈,且嘉慕当时之诸臣,而叹今之不然。臣有以仰窥圣意,而得其说矣。夫唐虞之世,虽称治安,然洚水警余,犹切其咨之忧;有苗弗率,而不免徂征之师。卒之四隩宅而洚水平,两陛舞而有苗格,何其不劳而成功之若是也?盖当是时,有禹、益诸臣一德一心,以修辅厥后,而二圣人者特垂拱仰成尔已。周宣之世,虽称中兴,然观《云汉》、《鸿雁》诸诗,则民人未必其尽安;观《采薇》、《六月》诸诗,则方内未必其无警。卒之海宇臻富庶之休,夷狄底荡平之绩,又何其不劳而成功之若是也?盖当是时,有吉甫、方叔诸臣矢心戮力,以弘济时艰,而宣王特委任责成尔已。所以然者,岂尧舜、宣王无爱天下之心而专属之臣欤?盖人君所履者天位也,所治者天职也。天何言哉!以一气运于上,而四时五行为之节宣于其间者,分也。君何为哉!以一德宰于上,而百司庶府为之协理于其下者,亦分也。唐虞成周之世,君法天道,而握枢以驭其臣;臣代天工,而勤职以事其君。此所以化灾沴为祯祥,转兵车为玉帛,当时颂圣,后世垂休,良有以也。由是观之,水旱盗贼之灾,固不足以为盛世之累。其所以斡旋气化、保卫生灵者,则在乎奋庸熙载之有人,而折冲御侮之有赖耳。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宇,丕显之谟无以加矣,然军旅之后,旱暵相仍,而湖南辰贵之间,时犹扬尘鸣镝,屡犯王诛,则水旱盗贼之警不尽无也。然而患不及民者,则以内有刘、宋诸臣,为之经理其文事;外有徐、常诸臣,为之振扬其武威,故我太祖不劳而天下治也。成

祖文皇帝中靖家邦，丕承之烈无以加矣，然北方阻饥，江南大水，而日本、安南之寇，时犹觇阙内视，扰我中华，则水旱盗贼之警亦不尽无也。然而民不称病者，则以文有杨、夏之徒，宣力于中朝；武有刘、朱之属，扬威于外徼，故我成祖不劳而天下治也。列圣相承，太平之化日益隆洽。虽其文经武纬，仰于渊衷之独运，而辅理承化之功，亦自有不可诬者。

臣伏睹我皇上即位以来，敬天法祖，无一事之敢忽；修德勤政，无一息之少懈。是故畿甸之雨旸愆候，即先期而躬祷斋坛；郡邑之水旱一闻，不逾时而旋加赈恤。至于大同遣恤，特出睿谟；苏松改折，曲从吏议。重边方之警报，则暮夜必达；忧闽广之阻兵，则咨谋不倦。仁心仁政，诚有媲美唐虞而陋成周于不居者。固宜吏称民安，化隆俗美，邦本内固而灾异不作，国威外振而兵革不试矣。然顷者黎民阻饥，南贼滋炽，至更历时岁而不能纾陛下之忧，臣甚惑之。窃尝深思其故，则以为陛下忧民之心虽切，而承宣德意者或多自私自利之臣；陛下遏乱之志虽勤，而奉扬威灵者或非效忠宣力之士。此膏泽之所以未究，而治效之所以未臻也。

臣闻建安攘之功者，惟文与武；而膺文武之寄者，惟将与吏。古昔圣帝明王久安长治之策，靡不由此。唐虞以前无论已，《周礼》有遗人掌县都之委积，以备凶荒；有廪人掌九谷之数，以记丰凶。有乡师以岁时周民，有司救以王命施惠。而其上者，又有旬宣惠和之臣，日夜拊循其民庶，而报政于朝廷。则安民之责，臣实任之，而君不自为也。诘奸掌之士师，稽杀掌之朝士，搏盗则有司隶，谍盗则有环人。而其上者，又有推毂分阃之臣，日夜整齐其卒伍，而折冲于边鄙。则遏乱之责，臣实任之，而君亦不自为也。君不自为而臣为之，臣代君为而君任之，劳逸各得其所，而文武咸尽其才，欲天下无治，不可得也。

今之结绶分符为陛下之吏者，陛下固亦以安民责之矣，而夷考其人，果能如伏湛之分俸赈民乎？果能如夏侯惇之断水作陂乎？果能如蔡齐之弛禁利民，王望之开仓救殍乎？有之或弗克自效，而竭泽为渔、以富私橐者相望也。甚则水旱不以实闻，增损委之胥吏，而百姓嗷然有思乱之心矣。今之拥旄秉钺为陛下之将者，陛下固亦以遏乱责之

矣，而於稽其人，果能如张耳之马槌下城乎？果能如充国之枕席过师乎？果能如李靖之蹀血虏廷，贺若弼之酹酒江上乎？有之或弗克自奋，而选耎畏懦、以糜廪禄者皆是也。甚则擅夺首功，扣除常给，而盗贼嚣然有轻中国之心矣。

夫民穷固盗起，盗起而民益穷；食缺故兵兴，兵兴而食益缺。官失其人故法弊，法弊而人之救之也益难。此圣天子所以侧席求贤才，拊髀思将帅，而慨想于无为之治，叹息于古今之不相及也。且夫一心所向，百体从令；一人所欲，百辟争趋。以陛下忧民如此之切，而臣工之负陛下乃如此之深，此无他故矣。盖尝论之，误天下之事者，将吏也；误天下之将吏者，选任之失人也。

以择吏言之，安静悃愊者，或病其无文；抚字心劳者，或尤其政拙。擅发仓廪者，蒙专辄之辜；搏击豪强者，多肘腋之患。至于科甲登庸，则论劾不轻及；簿书不失，则罢软可苟容；善事上官，则贪墨无显罚。天下之吏见贤者未必进，而不肖者未必退也，谁复有感恩图报，砥行立名，以求自附于循良之列者哉？天下之所以无贤守令，职此之故也。

以择将言之，沉鸷有谋者，或以木讷而无闻；投石超距者，或以粗才而见斥。不击刁斗者，或谓之疏庸；穿域蹋鞠者，或以为放纵。至于掊克以市恩，则贪残者称为忠良；卑谄以媚上，则畏懦者附于儒雅；虚言以夸众，则诞妄者信其雄略。天下之将见有功者未必上，而无功者未必下也，谁复有抚剑抵掌，出身犯难，以求不负乎干城之寄者哉？天下之所以无贤将帅，职此之故也。

臣闻天生一代之才，必足以供一代之用。上有明明之君，下必有翼翼之臣。顾所以用之何如耳。兹欲选任皆得其人，而文武惟其所用，则臣请以仁智之说，为陛下终言之。孟轲氏有云：智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夫所谓亲贤者，非煦煦焉，昵比以为恩也。以公心选之，以隆礼待之，以诚意委之，而高爵厚禄有所不靳，寸长小善有所不遗。自古帝王所以显忠遂良而天下称至仁者，胥此也。所谓当务者，非察察焉，综核以为明也。辨忠邪之分，稽功罪之实，慎赏罚之施，而一人之毁誉有所不恤，一己之聪明有

所不任。自古帝王所以举直措任而天下称大智者，胥此也。仁而匪智，则爵赏太滥，而奸邪或得以苟容；智而匪仁，则推求太过，而贤才不乐于向用。

是故欲为择吏计，则莫若广选举之途。如古之孝弟贤良与文学并进，可也。严考课之典，如古之大明黜陟，岁终奏举殿最，可也。行久任之法，如古之居官长子孙，有绩则进爵加秩，可也。而又申敕铨曹，使之选任有司务求端良修洁之士，而儇薄好名者无所容焉。将见百司竞劝，庶贤汇征，旬宣者为曾巩之去疾，廉谨者为羊续之悬鱼，虽有水旱之灾，而困穷之民且将还定而安集矣。唐虞风动之休，成周顺治之化，不可以复见乎？

欲为择将计，则莫若略世裔以求真才，如古之起自行阵而拜为大将者，可也。专委任以需实效，如古之便宜行事而不从中制者，可也。信赏罚以励颓靡，如古之谤书盈箧而不问，挥泪斩将而不恤，可也。而又严责本兵，使之选任将帅务求沉毅果敢之士，而庸懦无能者弗得与焉。将见策士效谋，勇夫效力，督抚者皆良、平之器，授钺者皆韩、白之才，虽有窃发之警，而乌集之众且将啄息之不暇矣。唐虞来王之化，周室于襄之威，又不可以复见乎？

要之，广求贤才，以备国家之用者，皆仁也；旌别淑昵，以昭劝惩之典者，皆智也。仁以运乎其智，故内外文武之臣，咸欣欣焉戴陛下之恩，而不忍自负乎知遇之隆。智以济乎其人，故内外文武之臣，咸兢兢焉畏陛下之明，而不敢自蹈于欺罔之咎。由是而民安寇息，由是而灾消祥降，万世治平之业恒必赖之矣。

抑臣又闻之，图事者贵谋之于豫，而敛才者贵养之于初。今朝廷以科贡取士，士固多良矣，然饰文华而鲜为己之功、争进取而乏恬退之节者，亦时时有之，则教化不可以不敦也。请于天下学校申明道术，择操履端纯者为之长，使孝弟忠信之理、廉耻礼让之节知之既明，守之既定，然后取之以科贡，而委之以民社之寄，则幼学壮行不患无术，穷经致用可以旁通。如是而忧天下之无良吏者，未之有也。朝廷以武举择将，将固多良矣，然力足以挽强而适用则疏、辩足以警愚而临事辄乱者，亦时时有之，则训习不可以不慎也。请于天下郡县增设

武学，择谙通韬略者为之师，使坐作进退之方、虚实坚瑕之势耳习所闻，目熟所见，然后试之以武举，而授之以钤钺之任，则筹敌制胜洞如指掌，戡乱锄奸易若转枢。如是而忧将之不良者，未之有也。

将良矣，吏良矣，天下无事，陛下无忧矣。万几闲暇之际，九重深邃之中，其将何所事事乎？臣闻天下国家之本，在人君一心而已。自此心之至公则为仁，自此心之至明则为智。以是至公至明之心而乂安天下，则文德修；以是至公至明之心而肃清天下，则武功振。斯道也，陛下《敬一》之箴固已该括而无余矣。臣愚，芹曝之私惟愿益新圣德，祇慎厥终。盛满弗矜，则为舜之无怠无荒；幽独必谨，则为文之亦临亦保。立纲陈纪，则守之以不愆不忘之训；任贤去邪，则决之以勿疑勿贰之明。察天人、理欲之几，则不迩不殖之戒常惕然于吾之心；考古今得失之鉴，则未危未乱之防常惺然于吾之念。将见百官庶吏莫不精白以承休，而细奸小丑亦且回心而向善。恩从祥风翔，德与和气游，上以答天心之景贶，下以绵国脉于灵长。董子所谓君心正而福祥集，《诗》所谓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且为今日颂之矣。至治之盛，岂特比隆虞周而已哉！疏狂之论，不识忌讳，无任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驾驭社会，必定要文教与武力一起使用，然后天下的施治大法就会推行开；必定要仁德与明智相互补充，然后天下的擅长治理的人就会获取到。什么叫做施治大法呢？兴行起对天下有利的事情，去除掉对天下有害的东西，使远近都归入正道，中外都蒙受吉福，而顺从治理的局面和威震外邦的态势永远符合良好的要求，这都属于施治大法啊！什么叫做擅长治理的人呢？依据天下的人才，分别让他们承担起天下的事务，使明君贤臣都有纯正的德行，对事务都心往一处想，而自觉主动地四处忙碌，抵御外敌的侵扰，各自胜任各自的本职工作，这都属于擅长治理的人的问题啊！这样的人，固然要根据施治大法来选拔任用，而施治大法也必定要依靠这样的人去推行开。因而打算推行开施治大法，就要修明文教来对远方部族施布安抚的仁德，筹措好武力来显示出讨伐进击的威势，而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的功绩，就同时振扬起来了。打算获取到擅

长治理的人,就要从仁德出发,扩展那根据才德而统统予以任用的公正性;明智到极点,昭示那按政绩大小予以表彰的朝廷规定,而辅助治理和承奉天子的意旨进行化导的治绩,就永远依赖他们去建立了。自古以来的太平盛世,都是君主在上面很轻松,臣僚在下面特忙碌,而四方由此闻风响应,八方最远的地区由此归顺服从,就依仗着具有这种治理的策略啊!否则的话,上面尽管有那仁德圣明的君主,下面却没有忠诚贤良的助手;君主尽管有那渴望天下大治的志愿,可老百姓却蒙受不到大治的恩惠。不仅仅官职失去了确能胜任的人,施治大法也随之推行不开。这哪里能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的对策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凭借圣明神妙和有文有武的天资,确立起仁德正义和不偏不倚的最高行为准则。自己保持恭敬的态度,稳稳坐在朝廷上,文武百官全都敬顺地依旨行事;一旦显出不满意或愤怒来,整个天下就感到非常恐惧。在执政的四十多年里,日月星辰按轨道正常地运行,九州边际的拴地大绳纹丝不动,拿天地来说已经是上下很通畅了。道路上和里巷中的称颂歌谣连成一片,山峦与河流都献出了各自的出产,拿民众和万物来说已经是相当富足了。四周部族的赋税与贡品交替着来献上,远方邦国携带玉器绢帛等礼品前来朝拜,拿少数部族来说已经都归服了。然而仍然圣明了却不自认为圣明,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用当代的事务来进行咨询。这种心念正是周文王看待民众就像使他们受了伤的那种心念,也是周文王渴望大道到来可仍像还没见到的那种心念啊!臣下我确实既愚昧又浅陋,不够用来对答重大的询问,切合圣明的诏旨。尽管如此,哪里敢不拾取所曾听到的东西,来对答称扬圣明策问的万分之一呢?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在开始部分称赞唐尧虞舜清静无为的治绩,接下来讲周宣王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功业,并且赞赏向往当时的众位大臣,慨叹现今却不是那样啊!臣下我由此就确有理由地窥见到皇上的用意,找到那结论了。在唐尧虞舜时期,尽管号称政治安定,但洪水引起我做帝王的警惧,仍然加重了对民众在愁叹的忧虑;三苗部族拒不归顺,也免不掉派出征讨的军队。可到

最后达到了四方土地都能安居，洪水退去；在殿廷台阶下表演文舞，三苗部族前来归服。为什么尧舜并不劳苦可却取得了这样的巨大成功呢？这是因为在当时有大禹、伯益等大臣同心同德来修明职守，辅助自己的君主，而尧舜这两位圣人只是稳稳坐定，接受他们成就的结果罢了。在周宣王执政期间，尽管号称国家再度兴盛，然而观阅《诗经》中的《云汉》、《鸿雁》等诗篇，表明民众还不一定就全都安宁；再观阅《采薇》、《六月》等诗篇，表明辖境以内还不一定就没有少数部族捣乱的警报。可到最后实现了全天下步入富足状态的美好景象，建立了少数部族归入被驱逐平定的命运的业绩。为什么周宣王也不劳苦可却取得了这样的巨大成功呢？这是因为在当时有尹吉甫、方叔等大臣下定决心，竭尽全力来弘扬大业，挽救艰难的国势，而周宣王只是委任并要求他们取得成效罢了。这样来做的原因，难道是唐尧虞舜和周宣王并没有爱护天下百姓的心念而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大臣的身上吗？其实是由于君主所占据的宝座属于天位，君主所管理的事情属于天职啊！皇天在什么时候发过话呢？可它在上面运作起那元气，春夏秋冬和木火土金水这五行就替它在全年内按顺序来做宣导，这是天然就既定的呀！君主又去具体做什么呢？他只在上面用纯正的德行主宰一切，而朝廷各个部门在下面就替他协调地料理好，这也是天然就既定的呀！在唐尧虞舜以及成周时期，君主效仿皇天的法则，执掌住大权去驾驭手下的臣僚；而臣僚代替皇天的事务，履行好岗位职责来事奉自己的君主。这是把灾异现象转化成吉祥的兆应，把出兵讨伐变成四方归服的缘由所在。当时的人们都颂扬天子圣明，又给后世留下典范，确实是有道理的了。由此来看，水灾旱灾和盗贼这类祸害，原本上就不足以构成太平盛世的污点。用来操纵住元气化布和保卫民众与万物的关键因素，在于勤奋供职、振兴起帝王事业上确有合适的人选，在击败敌军和抵御入侵上确有值得信赖的人才罢了。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首先打下江山，宏大的谋略根本就没有能超越过去的了。然而在战争过后，旱灾接连出现，而在湖南辰州到贵州之间，仍然经常发生武装反叛的事件，多次触犯朝廷的法

律,这表明水灾旱灾和盗贼捣乱的警报也不是一桩也没有啊!然而祸患危害不到老百姓的身上,是因为在朝廷上有刘基、宋濂这些大臣,专替太祖皇帝筹划料理文教方面的事务;在外面有徐达、常遇春这些大臣,专替太祖皇帝振扬那武力的威势,所以我们太祖皇帝不劳苦却天下实现了大治啊!成祖文皇帝在中途稳定住国家,继承大业的功绩根本就没有能超越过去的了,然而北方仍闹饥荒,江南发生大水,而日本、安南国的贼寇,仍然经常凶猛地吼叫,野心勃勃地盯向内地,侵扰我中华,这表明水灾旱灾和盗贼捣乱的警报也不是一桩也没有啊!然而众百姓不喊叫遭殃受罪,是因为在文教方面有杨士奇、夏原吉这批人在朝廷上贡献力量,在武力方面有刘荣、朱荣这批人在边境上播扬威势,所以我们成祖皇帝不劳苦却天下实现了大治啊!我朝各位圣帝递相承接,太平的化导日益兴盛普及。尽管文教和武力的筹划部署仰仗皇上们内心的独自运作,而大臣们辅助治理、承奉朝廷旨意进行化导的功绩,也自然具有不可否定的地方。

臣下我跪拜看到皇上您登上帝位以来,敬奉皇天,效法祖宗,没有一桩事情敢忽略过去;修明德业,操劳国政,没有片刻时间稍微懈怠过。因而京师地区雨水和炎热天气违背了正常规律,就提前在斋戒处所和祭坛上亲自祈祷。郡县发生水灾旱灾的消息一听到,没过多长时间就紧跟着进行救济和抚恤。至于向大同镇发放军饷,完全出自圣上的英明决断;对苏州府和松江府一带的徭役改为征银代替,就多方听从官员的意见。重视边境地区发生战事的报告,在一个晚上必定派人传去亲自批示的命令;忧念福建广东的倭寇骚扰,向臣僚孜孜不倦地征询对策。仁德的用心和仁德的国政,确实有与唐尧虞舜相媲美而看不上周朝并把它抛在一边的地方,原本上应该是官吏称职,民众安定,教化隆盛,风气美好,国家根基在内部得到巩固而灾异现象不出现,国家威势在外部得到振扬而武力不再动用了。可是近来黎民百姓仍在挨饿受冻,南方的倭寇越来越猖獗,发展到历经好几年仍然不能消除陛下忧虑的地步。臣下我对以上的局势特别感到疑惑不解。曾经私下深深思索其中的缘故,就直接认为陛下为百姓忧虑的那种心念虽然很深切,可承奉并宣播皇上仁德用意的人却大

多是自私自利的臣僚;陛下遏止住祸乱的志向虽然很坚定,可承奉并扬布皇上威灵的人却有的不是那献出忠心并使出全力的勇士。这正是恩泽并没有普遍施布到百姓那里而治理的成效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原因所在啊!

臣下我听说,建立起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的功绩的途径,只有文教和武力这两条;而承当起朝廷把文教和武力交付给他们料理的人,只是将帅与官吏。古代圣帝明王实现长治久安的国策,没有不出自这两个方面的。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就不必再讲论了,《周礼》就设有遗人这一官员,专门掌管各地的粮食储备,用来防备饥荒;又设有廪人这一官员,专门掌管各种农作物的数量,用来统计出丰收年和灾荒年的情况;还设有乡师这一官员,负责每年根据受灾程度周济百姓;还设有司救这一官员,负责承奉天子命令去施布恩惠。在这些官员的上面,又有周遍地宣示朝廷恩惠宽和的臣僚,终日安抚下面的百姓,特向朝廷禀报政绩。这表明,安定民众的责任,实际上要由臣僚承担起来,君主并不亲自去处理啊!另一方面,纠察奸恶歹徒由士师这一官员去负责,追查杀人罪犯由朝士这一官员去负责,捉拿逮捕盗贼有司隶这一官员去办,察访盗贼奸细有环人这一官员去办。在这些官员的上面,又有负责守卫一方的臣僚,终日整顿好手下的部队,专在边境地区击退敌军的入侵。这表明,遏止住祸乱的责任,实际上要由臣僚承担起来,君主也不亲自去处理啊!君主不亲自去处理而由臣僚来操办,臣僚代替君主去操办而君主任命使用他们,劳逸各得其所,而文臣武将全都施展出各自的全部才能,想让天下得不到治理,那也是不可能的呀!

现今佩戴印绶、握有凭证而身为陛下官吏的人,陛下固然将那安定住民众的任务交付给他们去完成了。但考察这些人,果真能像东汉平原太守伏湛那样把自己的官俸拿出来去救济百姓吗?果真能像三国曹魏陈留兼济阴太守夏侯惇那样亲身背土来率领将士截住太寿水筑成湖堤抗旱灭蝗吗?果真能像北宋颍州知州蔡齐那样放宽禁令而使民众获利吗?果真能像东汉青州刺史王望那样不向朝廷请示就决定打开粮仓营救那些快饿死的人吗?即使确有这样的官员,也不能

够自觉地献出那份力量来,而把百姓的财物搜刮得一干二净、用来中饱私囊的人却一个接一个。更严重的是,发生水灾旱灾不向朝廷如实禀报,灾轻灾重全都让手下的办事人员去编造,而老百姓饿得嗷嗷叫,就不禁产生造反的念头了。如今竖起大旗、手执铜斧而身为陛下将帅的人,陛下固然将那遏止住祸乱的任务交给他们去完成了。但考察这些人,果真能像陈胜部将张耳那样挥动马鞭劝说当地豪杰就取得赵国数十座城邑吗?果真能像西汉后将军赵充国那样彻夜不眠而使一万骑兵安全渡过黄河吗?果真能像唐朝定襄道行军总管李靖那样率领三千骑兵在突厥大本营杀得敌军死伤无数吗?果真能像隋朝行军总管贺若弼那样在长江边上洒酒发誓,愿以自己葬身江中换取全军安全渡江吗?即使确有这样的官员,也不能够自觉地显现出来,而胆怯不前、畏惧懦弱、用来白白耗费国家俸禄的人却到处都是。更严重的是,擅自就骗取第一等功劳,克扣国家拨付的固定军饷,而盗贼由此就狂妄地产生可以攻取中原皇朝的野心了。

老百姓走投无路,盗贼就自然冒出来了;而盗贼冒出来,老百姓就更走投无路了。粮食不够吃,因而就发生战争;而战争一发生,粮食就更不够吃了。官职由不胜任的人来担任,因而法度就出现弊病;而法度出现了弊病,再靠人去补救就越发困难了。这正是圣明的天子在正席旁边再设席位来求取贤才,手拍大腿、思得将帅,而对古代清静无为的大治局面慨然向往又对古今相差这样远发出叹息的原因啊!况且一颗心所投向的地方,身体各部位就都会跟着走;天子一个人所要做到的事情,文武百官就都应争着去办成。凭借陛下忧念百姓是这样地深切,可臣僚辜负陛下竟是这样地严重,其中并没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臣下我曾经对此做过论证了,耽误天下大事的人是将帅和官吏,而毁掉天下的将帅和官吏的缘由,是在选拔任用上没得到合适的人选啊!

拿择用官吏来说,对安稳沉静但却非常忠诚的人,有人就嫌他没有文采;对用尽心思安抚养育百姓的人,有人就嫌他施政太笨拙。不经请示就打开粮仓进行救济的人,随后蒙受到擅自行事的罪名;严厉打击地方豪强的人,大多被视为自己胳膊肘底下的隐患。至于经过

科举考试而被进用的人,在弹劾举奏方面就不轻易地涉及到他们;只要上报的文书没有什么差错和误期的情况,他即使很疲软,也可以大致随他去。把自己上面的官员侍候得舒舒服服,他即使贪赃枉法,也不予以严厉的惩罚。全天下的官吏看到贤能的人不一定就得到提升,而不称职的人也不一定就遭到罢免,还会有谁感念朝廷的恩典想尽力报答,磨砺自己的品行,树立起名声,以求自己能站在奉公守法的贤良官吏的行列当中呢?如今天下没有贤良的太守县令,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呀!

拿择用将帅来说,深沉稳重而怀有谋略的人,有的因为不擅长言谈而被埋没了;敢于踊跃杀敌的人,有的因为被视为大老粗而被斥退了。像西汉李广那样安营扎寨而不按常规布置巡逻的人,有人就把他说成是疏略平庸;像西汉霍去病那样在远方作战仍在军中举行戏耍活动的人,有人就认为是放纵。至于克扣军饷来献给上司换取信任,于是贪婪残暴的人反而被称为忠良的人;阿谀逢迎来讨好上司,于是畏惧怯懦的人反而依附在儒将的行列中;编造大话来迷惑众人,于是狂妄虚诞的人反而相信他具有广远的谋略。全天下的将帅看到建立功劳的人不一定就得到进用,而没有功劳的人也不一定就遭到贬抑,还会有谁手抚利剑,磨拳擦掌,挺身而出,奔赴国难,以求不辜负朝廷把捍卫边疆的重任交给自己的厚恩呢?如今天下没有贤良的将帅,就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呀!

臣下我听说,皇天降生下一个时代的人才,必定足以供一个时代来任用。上面有那了解谁贤明的君主,下面必定有那众多的臣僚。只不过是任用他们的方法究竟怎么样罢了。如今打算选择任命全都获取到合适的人选,而文臣武将只管怎样使用就怎样使用都不会误事,臣下我就请求用仁爱与明智相结合的主张,为陛下在答卷最后讲述一番。孟轲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明智的人没有任何不知道的事情,但应当把该做的事情放在第一位;仁德的人没有任何不爱惜的东西,但务必要把亲近贤士放在第一位。这里所说的亲近贤士,并不是说摆出仁惠的样子,把亲昵抱团作为恩惠,而是要用公正的心念去选取他们,用隆重的礼节去对待他们,用诚挚的心意去委任他们,而显要的

官爵和丰厚的俸禄也舍得授予，对小长处和小优点不遗漏一项。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显扬忠臣和使良臣实现一切才能而天下称颂他最仁德的做法，全都是这样啊！孟子所说的该做的事情，并不是说摆出连最细微的事情都看得特清楚的样子，把汇总验核当成明智，而是辨别出忠正与奸邪的类属，稽察功劳与罪过的实情，谨慎地对待封赏与惩罚的施用，而对某个人的诋毁或赞誉并不去做考虑，对天子自己的看法也不坚持。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提拔正直的人而把他们置于邪恶人的上面从而天下称颂他最明智的做法，全都是这样啊！仁德却不明智，就会官爵封授太冗滥，而奸邪的人就得以混在里面；明智却不仁德，就会推究责求得太过份，而贤才不乐意听从命令被使用。

因此想为择用官吏做考虑，那就没有能比得上扩展选拔任用的途径的了。像古代的孝悌贤良与文学这两类人共同进用，也就可以了。也没有能比得上强化考核的制度规定的了。像古代十分鲜明地显示官员的升职与罢免决定，每年年终奏明谁第一又谁最差，也就可以了。也没有能比得上实行让官员长久在一地任职的办法的了。像古代担任某一官职会在任内看到自己的子孙生长起来，取得政绩就提升爵位，增加俸禄，也就可以了。同时严格命令中央掌管官员任用的部门，叫他们选任各机构的官员务必要求取正派贤良、品德高尚纯洁的人士，而轻薄又喜好名声的家伙绝对不能任用。这就眼看着各个部门都竞相激励，众多的贤才汇集到一起，周遍地宣示朝廷恩惠的官员就采取北宋曾巩去除掉百姓疾苦的那样的行动了，廉洁谨慎的官员就做出了东汉羊续把下属献给的生鱼悬挂在庭堂上表示拒不收礼的那样的举动了，即使出现了水灾旱灾，而困穷的百姓也将回到故乡稳定下来并且安宁地聚集起来了。唐尧虞舜时期那种闻风响应的美好局面，成周时期那种顺从治理的教化结果，难道还不可以在今天重新看到吗？

想为择用将帅做考虑，那就没有能比得上不理会世代承袭者而去求真才的了。像古代从行伍战阵中起用他而封拜为大将，也就可以了。也没有能比得上把一切军务都交给他料理来等待实际功效的了。像古代允许根据战机做出决定而不按朝廷的指令去办，也就可

以了。也没有能比得上该赏必赏、该罚必罚来振作起颓靡风气的了。像古代魏文侯对诽谤前去讨伐中山国的将领乐羊的书信在三年内积攒了一满箱可仍不责问，诸葛亮挥泪斩杀违反军令的马谡，也就可以了。同时又严格命令五军都督府和兵部，叫他们选任将帅务必求取深沉坚毅、果断勇敢的人士，而平庸怯懦、软弱无能的家伙绝对不许混进来。这就眼看着怀有谋略的人献上自己的谋略，勇猛的人献出自己的力量，担任总督或巡抚的人全都是西汉张良、陈平那样的人才，被授予兵权的人全都是西汉韩信、秦代白起那样的良将，即使出现了异族突然入侵的警报，而这些乌合之众也将喘口气都来不及了。唐尧虞舜时期那种各个方国都前来归顺的感召力量，周王室将异族驱逐赶走的那种威势，难道还不可以在今天重新看到吗？

总而言之，广泛地求取贤才，用来供国家随时使用，都属于仁德方面的做法啊！表彰良善并区分出谁是被亲昵的人来，昭明那激励与惩戒的制度规定，都属于明智方面的做法啊！靠仁德来运用好明智，因而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全都万分喜悦地感念陛下的恩德，而不忍心自己对不起这深厚的知遇之恩。靠明智来决定那个人的命运，所以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全都非常戒惧地害怕陛下的圣明，而不敢自己陷入欺骗君主的罪过当中。由此而民众安定又外患止息，由此而天灾消除又吉兆降现，千秋万代一直大治太平的帝业，必定会永远依赖它了。

不过臣下我又听说，要办成大事的人最重视在事先就谋划好，聚集起贤才的人最重视在起始阶段就培养好他们。如今朝廷通过科举考试来选取士子，士子原本上大多都很优秀了，可是在文采上追求华美而在修养好自身上却很少下功夫的人，围绕升官晋爵来争斗但却缺少淡泊名利的风节的人，也经常存在。这就表明教育化导不能不加强啊！请求在天下各级学校中宣明道德原则与规范，选择品德操行纯正的人担任师长，使孝敬友爱、忠诚信实的道理和廉耻礼让的行为规范既已透彻地了解到，持守它们既已坚定，然后通过科举考试选取他们，把管理一方百姓的重任交付给他们。这样一来，从小学习的东西到了成年以后加以实行，也就不担心没有办法了；穷尽儒家经典，

落到实际运用上，也就能够触类旁通了。像这样还忧虑天下没有贤良的官吏,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朝廷通过武科考试择取将才,将才原本上大多都很优秀了，然而力气足以拉开硬弓可到战场上却动作不灵的人，论辩足以使愚昧者眼界大开可面临战斗时就慌乱无对策的人,也经常存在。这就表明训导练习不能够不谨慎对待啊!请求在天下各个郡县增设军事学校,选择精通用兵谋略的人担任师长,使坐定起立、前进后退的方法和虚虚实实、阵式完整及存在漏洞的形势听得很多,看得很习惯,然后通过武科考试来测验他们,把统领军队的权力交付给他们。这样一来，分析敌情和稳操胜券就明晰得如同指点手掌，平定祸乱和铲除奸恶就容易得如同转动门轴。像这样还忧虑将帅不贤良,这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将帅已经贤良了,官吏已经贤良了,天下太平无事,陛下也没有任何忧虑了。但在处理繁忙政务得空儿休息的时候，身在外面人根本看不到的皇宫中,还要做些什么事情呢?臣下我听说,天下和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主的那颗心罢了。从这颗心达到最为公正的境界,就构成了仁德;从这颗心达到了最为圣明的地步,就构成了明智。用最为公正又最为圣明的这颗心去治理和安定天下，文教的德化就得到了修明;用最为公正又最为圣明的这颗心去肃清天下,武力的功绩就得到了振扬。这种大道,陛下亲自撰写的《敬一箴》本来已经把它全部概括进来而没有任何遗漏了。臣下我很愚昧，自己微不足道的献呈也只是祝愿陛下把那圣明的仁德加以扩展和提高，恭敬谨慎地保持到最后。达到鼎盛状态却不骄傲，也就构成了虞舜当年的既不懈怠又不荒废;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必定仍很恭谨,也就构成了周文王那样的光辉万丈来照耀，永不厌倦保民众。确立起法度，张布开规制,用那不出过失又不遗忘的古训来守持住它;任用贤才,斥退奸邪,用那既不疑虑又不左右摇摆的判断力来做出决定。察辨皇天与人事、天理和人欲的隐微之处,把那不接近声色、不聚集财宝的戒语时刻在我心中警觉地牢记;考察古代和当今、成功处与失误处的经验教训，把那危难和祸乱出现以前就制定好防备对策的古语时刻在我心中清醒地闪现。这就眼看着朝廷百官和各地官吏没有谁不一心一意

地来承奉皇上的美好指令，而微不足道的奸贼和跳出来捣乱的各个部族也就回转心意，归向良善了。恩泽跟随着吉祥的和风到处播扬，仁德与协和的气流普遍施布，往上来报答天心赐给的盛大吉福，往下来延续威灵长久的国家命脉。西汉董仲舒所讲的君主心念纯正而吉兆福庆就汇集，《诗经》中所说的皇天保定你，王位特牢固，马上也就会成为对今天的颂歌了。最为兴盛的治理状态，哪里仅仅是和虞舜成周比试隆盛就算到头了呢？臣下我发出这番不切实际而又狂妄的议论，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忌讳，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余有丁　会试卷一道

余有丁(1527～1584)　字丙仲，号同麓，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探花，时年36岁。迄神宗朝累官至礼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卒于万历十二年，享年58岁。有《余文敏公集》今犹行世。

易　元吉在上，大成也

圣人举《井》上爻之占，而赞其为王道之极焉。夫王道，以天下各得其养为极至也，上爻之"元吉"以之，宜圣人深致其赞欤！《象传》之意若曰：人君之养天下也，固贵乎尽其道，而尤贵乎得其时。道有未善，则治有所阻，不可以言成也；时有未值，则化有所限，不可以言大成也。今谓之"元吉"，是其于道也，既以得井养之义矣；"元吉"而"在上"，是其于时也，又复当井养之终矣。吾见出于朝廷者，德意充周，既无不被之泽；施于海宇者，仁恩浹洽，自无不获之民。由庶而富也，由富而教也，法制品节之详已至而极其至；由动而变也，由变而化也，鼓舞作兴之术已深而极其深。是盖上之养民，如天之无不覆，如地之无不载，荡荡乎各适其愿，曾靡有于或遗；民之见养于上，如育于天之覆，如育于地之载，皞皞乎各遂其生，又何有于不足！信乎尽善尽美，

而不可以复加矣，非养道之大成而何？然则取法于《井》者，亦以是而考其成焉可也。虽然，周公于上爻之“元吉”，而必先之以“有孚”，何哉？盖王道本于诚意，而《中庸》论参赞化育，必归于至诚。至诚者，孚之极也。故尧以允恭而成万邦协和之治，舜以允塞而致四方风动之休。二帝为王道之成，皆诚为之本也，此又不可不知。

圣人列举《井卦》倒数第六阴爻的占断词句，称赞这是称王天下的大道的最高表现。称王天下的大道，把天下人各自获得到各自的养护作为最高的表现啊！倒数第六阴爻用“最吉利”来证实它，难怪圣人深深地表达那种赞誉啊！《象传》的意思好像是在说：君主养护天下人，原本上就该重视完全贯彻好那大道，更应重视获取到那时机。大道出现不完善的地方，治理就会有所阻隔，根本就没资格讲什么成就。时机出现错过的情况，化导就会有所局限，根本就没资格讲什么大成就。如今《象传》说是“最吉利”，这表明君王在大道上已经获取到井水养人的主旨了。既说“最吉利”而又接着说“正在上位”，这表明君王在时机上又恰恰处于井水养人的至高点上了。我看到从朝廷发布出来的命令，仁德的用意充沛又周全，已经没有不延及的泽惠了。在整个天下推行的措施，仁爱的恩情普遍施布，自然就没有蒙受不到的百姓。由众多发展到富足，由富足而施行教化，法度和各种行为规范的具体规定已经很完备了，还要完备到极点。由动员发展到改变，由改变而实现化导，鼓舞振作的方法已经很深切了，还要深切到极点。这大致上是因为君王养护民众，就像苍天没有不覆盖的处所，就像大地没有不托载的东西，非常广大地让事物各自实现各自的愿望，竟没有被遗漏的任何个体。民众被君王所养护，就像在苍天的覆盖下得到化育，就像在大地的托载下得到化育，非常欢乐地使人们各自形成各自的生活，又哪里存在着什么不充足呢！的确是尽善尽美了，简直不能够再有什么补充的了。这不是养护之道的最大成就又是什么呢？既然如此，那么取法《井卦》的人，依据这一条来考察他的成就也就可以了。尽管是这样，可周公在倒数第六阴爻的“最吉利”的这一爻辞的前面，一定还要加上“取得人们信服”的字样，这又是为

什么呢?因为称王天下的大道是建立在使意念真诚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庸》论述协助天地化育万物而与天地并立为三,必定归结到最为真诚。最为真诚是使人信服的极致啊!所以唐尧凭借信实恭敬而造成了各个邦国团结和睦的大治局面,虞舜凭借信实充满上下而实现了四面八方闻风响应的美好景象。这两位圣帝取得了称王天下的大道的最大成就,全都是把真诚作为根本啊!这又是不能不了解的地方。

余有丁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人君代天以理物,常秉天下之大权,以成无为之治;人臣代君以协理,当明天下之大分,以建匪懈之功。何也?君之尊,犹天也,操乾纲以独断于上,一乾元之统天焉,而凝神端拱,于以享其逸而不劳。臣之事君,犹事天也,守坤贞以疏附于下,一坤顺之承天焉,而竭力图惟,于以任其劳而不避。君享其逸,匪自豫也,无心而成化,天道本如是也。人君奉若天道,嵬然临御于九重,而委任以责之臣焉,斯有以得大君之宜。臣任其劳,匪自瘁也,无成而代终,地道本如是也。人臣效法地道,矱然恪共乎庶职,而尽忠以效之君焉,斯有以得纯臣之义。惟君以天自处,是能以天之心为心也,故其治足以则乎天,而圣帝明王不能外是以迓恭默之衡。惟臣以天事君,是能以君之心为心也,故其忠足以孚乎君,而贤相忠臣不能外是以奏协恭之绩。君臣得而万化行,所以亮采惠畴者有全功;上下交而庶务理,所以谟明弼谐者有伟烈。浑噩纯庞之风,可以坐致;雍熙悠久之业,自兹有成矣。

钦惟皇帝陛下,禀神圣之资,抚熙明之运,敬一绍帝王之道统,伦制立古今之治极。恭默通于上载,声教布于遐陬。礼乐明备,而大车书一统之盛;华夷率俾,而洽于羽两阶之休。嘉靖万邦,迄今四十有一年如一日矣。臣窃伏草茅,幸际陛下久道成化,寿考作文,叨与有司之选,亲承大廷之对。而清问下及,首焉嘉慕帝王致治之盛,既而轸念灾寇荐至之警,深有慨于文武庶职之难其人焉。将求弭变以安

民，遏乱以固本，且责臣等悉心陈列，勿惮勿欺也。顾臣愚陋猥谫，何所知识，得以少裨陛下庥德之万一乎？然恭承温旨，仰体渊衷，敢不披沥诚悃以对！

臣闻之《书》曰：天佑下民，作之君师，以对上帝。是天之所以宠绥乎君，而君之所以受命于天者，意有在也。故履大宝，握中枢，位曰天位焉；膺历数，缵帝极，统曰天统焉。以至心代天意，口代天言，身代天事，莫非天也，则当以天自处矣。《礼》曰：惟王建国，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是君之所以委任乎臣，而臣之所以承命于君者，责有归也。故论定而爵，以驭其贵，惟君所诏焉；位定而禄，以驭其富，惟君所予焉。以至治君之民，理君之事，分君之忧，莫非君也，则当以天事君矣。夫以一人而钦承昊天之明命，一日万几，不能独理，后克艰，厥后矣。使日孜孜焉政事是亲，以下同于臣，则耳目不逮，志虑未周，而欲帝载之咸熙也，其可得乎？以一身而奉若天子之明威，百僚庶府，各有专成，臣克艰，厥臣矣。使徒泄泄然尸素是安，以上负其君，则职业不修，机务不理，而欲臣纪之罔亏也，其可得乎？

粤稽古昔语帝之盛者，莫过于尧舜。固尝隆垂衣之化矣，而其始焉洚水滔天，思以治之，下民艰食，思以康之，有苗弗率，思以格之，而尧舜未尝自劳也。读《书》而得《典》、《谟》诸篇，若治洪水，则有禹以底平成；若教稼穑，则有稷以粒烝民；若明刑罚，则有皋陶以敦教化。曰翼为，曰明听，各效其职于中天之际。而凡政有未修，德有未正，用有未利，当时诸臣皆有以代其终，是以尧舜得享无为之逸而协和，而风动。古今称极治者，唐虞为莫及焉。

语王之贤者，莫过于周宣。固尝建中兴之业矣，而其始焉淮夷是叛，思以讨之，荆蛮为仇，思以征之，猃狁匪茹，思以伐之，而宣王亦未尝自劳也。诵《诗》而得《采薇》诸篇，若平淮夷，则有旬宣之召伯；若征荆蛮，则有元老之方叔；若伐猃狁，则有文武之吉甫。曰奔奏，曰御侮，各展其能于多事之日。而凡王赋之未进，车徒之未实，综理之未周，当时诸臣皆有以共其职，是以宣王得享不劳之治而顺治，而威严。古今称中兴者，成周为难继焉。嗣是而降，无翼为明听之臣，安望治之比隆于二帝？无奔奏御侮之臣，安望治之驾美于周王耶？是宜陛

下嘉之慕之,而陋三代以降于不足言也。

惟我陛下,笃明禋之敬而心孚穹昊,茂熙洽之化而光绍祖宗。以言其安内也,内苑耕藉,重稼穑之艰难;殿工拟竣,竭各省之征派。忧民之易虐,则申严考察之令;虑犯法之无知,则时重恤刑之典。发仓廪以赈民乏,施药饵以疗民疴。其恩泽之溥及于遐迩者,不啻如云雨之行施,沛乎沾濡,而无物之弗被矣。以言其攘外也,内立三营,开戎府,以固京师之本;外重九边,慎将帅,以严疆埸之防。丑虏内侵,则神谟密运,即以驱逐于塞漠;岛夷外寇,则天威奋迅,既以剿截于海滨。意出而鬼神率从,令行而奸宄慑伏。其威武之震叠于边陲者,不啻如雷霆之鼓舞,肃乎昭耀,而无远之不服矣。身居九重,而虑周四海之外;尊临五位,而威制八荒之遐。天下臣民方仰协和风动、顺治威严之治,轶唐虞而越有周矣。夫何迩年以来,旱潦频仍,而仓箱无卒岁之储;公私俱困,而杼柚有其空之患。北虏乘飙举之势,而不时扰我边鄙;南贼鼓乌集之群,而连岁犯我海壖。诚如圣制所谓水旱为灾,黎民阻饥,戎狄时警,南贼尤甚,有以廑宵旰之怀矣。

臣以为天地之大也,不能必寒暑灾祥之正。尧舜之圣也,犹且病博施济众之难。今日水旱之灾,是即二帝儆予其咨之叹也;南北之寇,是即周时夷蛮猾狄之侵也。然二帝有儆予其咨之忧而卒不忧者,以翼为明听之各得其人耳。周王有夷蛮猾狄之患而卒不患者,以奔奏御侮之各尽其职耳。今陛下以天之心为心,而臣之陈力就列者未必能仰体是心,以亮天之工。陛下以民之心为心,而臣之专城长邑者未必能各存是心,以分民之牧。台阁之臣有诚尽翊赞者矣,而承宣之臣果皆诚尽疏附乎?近侍之臣有诚尽论思者矣,而折冲之臣果皆诚尽捍御乎?

持节剖符膺民社之托者,非不多也。然而性近鹰鹯者,每歉乎鸾凤之仪;才优骥足者,恒鲜乎羔羊之节。称催科之善者,未必得抚字之勤;语刑罚之中者,未必知教化之道。号狷介者或勉强以干誉,而不能不渝于其终;号慈君者或煦妪以市恩,而不能不昧于其大。又其甚者,厉民以自殖,戕民以自逞,民惟恐其不去已矣。安望其能拯民之困,苏民之瘼,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耶?推毂授钺有兵旅之寄者,非无

将也。然而职厕虎贲者，未必豫鹰扬之具；名托干城者，未必优尊俎之谋。负海内之重望者，不免饰虚名以邀功；膺阃外之大权者，不免恣酷烈以毒众。鼓刀抱关者气雄三军，未闻亲冒矢石而克八日之捷；绮纨襦绔者貂珰累叶，不免徒读父书而掩奕世之勋。又其甚者，元帅畏偏裨，偏裨畏士卒，将无所不至矣。安望其能禁国之暴，除国之乱，而壮君威于万里也耶？是诚有如圣制所谓有司莫体朕心，疆圉之臣未能殚力。此所以陛下有爱民之心而泽未究，有遏乱之志而效未臻也。

然臣伏读圣制终篇有曰：兹欲使上下协虑，政事具修，兵足而寇患以除，民安而邦本以固，灾眚可弭，困穷可复，以媲美虞周之治，其何道而可？臣愚以为史有之：今之郡守，民之师帅也，所当重也。是必严考核之典，申久任之规。循良悃愊者，增秩以示荣，久之若卓茂之封，而不以为骤。阘茸贪墨者，重罚以示辱，甚则若阿大夫之烹，而不以为苛。然后甄别殿最之典明，吏将砥砺以自勉，而抚字之阳城，宽和之黄霸，自辈出矣。而以是牧民，民困其少苏乎！志有之：将者，国之辅也，所当重也。是必专委任之柄，隆驾驭之权。有功必赏，不间于群言，如任乐羊而无有于二志。有罪必惩，不牵于私故，如戮马谡而罔萌夫贷心。然后鼓舞振作之用行，将皆激昂以求试，而良、平之督抚，韩、白之统率，自群起矣。而以是除盗，盗患其稍息乎！如是则得文臣以宣惠，惠无不浹，而国家之元气自固，足以安内而纾鸿雁之忧。得武将以扬威，威无不奋，而国家之神气自振，足以攘外而免墉隼之害。陛下可端冕服而伸丕显之德，可宁黼扆而成颙若之孚，正犹天道默运于上，而四时之官，五行之吏各效其职，以生万物，而万物群然其乐生焉，怡然其并育焉。二帝无为之治，于此复睹；而周宣中兴之业，可以驾而上之矣。

然所谓任吏择将，又岂无其要哉？今之吏治不得其人，非吏之果无良也，亦曰学校之教不明耳。学校者，守令自出之地也。今之学校，臣惑焉。涉经传以组词章者，曰足以取青紫；裂章句以饰文艺者，曰足以致显荣。而于身心道德之懿，漫不之知。及出而从政，则仗逢迎为捷径，视职署为置邮，无异乎文职之不修也。为今之计，当思所以重其教。若三物之规，九经之训，仿古而行之，以端其趋向，则菁莪乐

育之教兴，而济济之多士为王国之桢矣。今之将领不得其人，非将之真不才也，亦曰武举之科不严耳。武举者，将才发轫之地也。今之武举，臣惑焉。由弓矢得者，皆挽强之粗才；以策论进者，惟蹈袭之陈语。而于韬略奇正之实，漫不之究。及出而行师，则铅刀不足以为割，朽壤不足以为障，无怪乎武功之不竞也。为今之计，当思所以慎其科。若大射之礼，大阅之法，仿古而行之，以新其志意，则兔置好仇之化成，而纠纠之武夫为公侯之腹心矣。由是文武将吏各得其人，又何患惠泽不宣而旱潦之为灾，威强不振而虏寇之足虞哉？

虽然，运操纵之大机，用磨砺之大法，则尤有大本焉。宋儒程颐曰：朝廷者，监司之本；监司者，守令之纲也。欲使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朱熹曰：圣王所以制御蛮夷之道，其本不在威强，而在德业；其具不在兵食，而在纪纲；其备不在边境，而在朝廷。而朝廷之要，则汉儒董仲舒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而已。盖人君一心，取人立政之本也。今陛下《敬一》持心，《无逸》示训，而凡取人立政者，取诸一心而有余矣。而臣今日欲效忠于陛下者，非外此而有加也，惟在常存敬一无逸之心而涵泳之耳。

伏愿陛下法天行之健，继《离》照之明，缉之为不息之诚，衍之为无疆之业。端养于清穆之表，则防未萌之欲，而于好恶无所偏；矫易溺之情，而于爱憎无所徇也。独断于临莅之际，则兼天下之聪明以为智，而于视听无所壅；顺天下之心志以施令，而于取舍无所私也。由是心不待检而自存，可以游神于至道之域，而德日益纯；志不假持而自固，可以澄心于湛一之天，而业日益弘。如日月之久照，而不改其明；如四时之久成，而不愆其纪；如天地之久运，而不息其机。以此取人，人无不得，以此立政，政无不举，而中外臣工罔不惕厉以共厥职，文恬武熙之绩以奏，内安外攘之效以臻，王道成和平之美，国祚衍灵长之庆。诚可远追二帝雍熙之化，近轶周王嘉靖之休，即轩皇之道，华胥之治，不外是矣。臣愚幸甚。臣无任战悚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君主代替皇天来治理世人和万物，总是执掌住天下的大权，用来形成清静无为的大治局面。臣僚代替君主来协调地料理好具体政务，应当明了天下的重大名分，用来建成永不懈怠的功绩。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主的至尊地位就和皇天一个样，持定皇天的纲纪而在上面来独自做出决断，完全依照那元气来统领皇天啊!凝聚起神明，在朝廷上稳稳坐定，用来享受那轻松而不劳苦。臣僚事奉君主就和事奉皇天一个样，守持大地的正道而在下面依附并分布在君主的周围，完全依照那大地顺从的本性来承奉皇天啊!献出全部的力量，只管去细心筹划，用来承担起那劳苦而不躲避开。君主享受那轻松，并不是自己去享乐啊!不经意可却形成了那化育，皇天的准则本来就是这个样啊!君主承奉并顺从皇天的准则，在皇宫里高高地驾驭整个天下，而委任并要求臣僚履行好各自的职责，这就确有根据地获取到圣明君主该妥善处理的东西了。臣僚承担起那劳苦，并不是自己去折磨自己。看上去不管万物的成熟可却代替皇天使万物实现了生命的过程，大地的准则本来就是这个样啊!臣僚效法大地的准则，戒惧敬慎地恪尽各自的职守，竭尽忠诚来献给自己的君主，这就确有根据地获取到纯正臣僚的义旨了。君主只有把自己当成皇天来看待，这才能把皇天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所以他那治理就足以效法皇天，而圣帝明王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去迎来清静无为的太平国政。臣僚只有把君主当成皇天来事奉，这才能把君主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所以他那忠诚就足以符合君主的要求，而贤相忠臣不可能超出这个范围以外去取得和谐一致的功绩。君主与臣僚密切配合而各种教化推行开，因而在辅助政务和理顺职事上构成全面的功绩；上面与下面融为一体而各种事务得到料理，因而在谋划英明和辅臣团结上建立起伟大的事业。浑厚纯朴的社会风气，可以坐着不动就让它普遍形成；欢乐太平又悠长久远的大业，由此就建立起来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禀受神武圣明的天资，主宰兴盛太平的时运，在恭敬纯一上继承圣帝明王的大道统系，在人伦纲常上

确立起由古至今的施治最高准则。清静无为和皇天上帝相感通，声威教化延布到最远的边际。礼仪乐舞既明确又齐备，扩展了那车轨宽度相同和文字统一的盛况；华夏地区和异族部落全都归服顺从，普遍造成了在殿廷台阶下表演文舞来感召的美好景象。通过美好的化导使各个邦国都安定下来，到现在已经四十一年如一日了。臣下我伏身在民间，万分幸运地赶上陛下长久施用大道，形成了教化，寿龄绵长，兴行起文治，有幸进入了主管部门的选取行列，亲身承奉到殿廷上要做出的对答。而清晰详明的策问颁布到下面，在起首部分赞叹并仰慕古代圣帝明王实现大治的隆盛局面，接下来深切地关注天灾和外敌入侵接连出现的警报，对文武百官难以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深为慨叹，打算谋求消弭天灾来安定民众，遏止住祸乱来巩固住根基，而且要求臣下我等人用尽心思陈述列举，不要有什么畏惧，也不要有什么隐瞒啊!然而臣下我既愚昧粗陋，又低劣浅薄，可了解懂得个什么?能够稍微对陛下的美德有万分之一的补益呢?但是恭敬地承接到温和的圣旨，往上体会皇上的深心，哪敢不献出那一片忠诚来做对答呢?

臣下我听说《尚书》里讲过这样的话：皇天佑护天底下的百姓，给他们定立起君主和师长，用来向皇天上帝做出交代。这表明皇天爱护并使君主安宁，而君主又从皇天那里承受到统治天下的权力，是有既定的用意啊!因而登上帝位，掌握最高权力，那尊位就专称为天位；承当那注定的时运气数，继承那帝业的鼎盛形态，那统系就专称为天统。直至内心代替皇天要宣达的意旨，口中代替皇天要说的话语，行动代替皇天要办的事情，没有一种不归于皇天啊!这就应当把自己当成皇天来对待了。《周礼》上说：只有天子才建立都城，设置官位，划定职责，作为民众的最高行为准则。这表明君主委任臣僚而臣僚从君主那里承奉命令，是有归属的责任啊!所以考察合格以后才授给爵位，用来驾驭臣僚的贵盛等级，只凭君主来下令呀!爵位确定以后才发给俸禄，用来驾驭臣僚的富足程度，只凭君主来给予啊!直至治理君主统领的百姓，办理君主要办的事务，分担君主存在的忧虑，没有一种不归于君主啊!这就应

当把君主当成皇天来事奉了。凭仗自身一个人恭敬地承奉皇天把天下交给本人来统治的明确命令，一天之内面临着众多的政事，根本就无法独自处理完，君主就要重视当好君主的艰难之处了。假设每天都孜孜不倦地亲自处理每一项政事，把自己降低到和臣僚同等的地位，就会听闻和观察得不全面，思考得不周到，这样还想使帝王的事业一片兴盛，哪里能做到呢?凭仗自身一个人承奉并服从天子的明确指令，文武百官和各个部门各自具有各自该做好的本职工作，臣僚就要重视当好臣僚的艰难之处了。假设光是懈怠松弛地只管去白拿国家的俸禄，往上辜负自己的君主，本职工作就得不到修明，重要的政务就得不到料理，这样还想使做臣僚的准则不存在违背的地方，哪里能做到呢?

考察自古以来说起治绩最突出的称帝天下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唐尧虞舜的了。他们固然曾经兴起那无为而治的教化了，但在起始阶段洪水滔天，就考虑治理它；民众在挨饿，就考虑使他们能吃饱；三苗部落不顺从，就考虑使它归服，但唐尧虞舜未曾亲自去操劳啊!观阅《尚书》而看到《尧典》、《舜典》和《皋陶谟》、《大禹谟》这些篇章，像治理洪水，就有大禹使天地归于安宁；像指导人们种庄稼，就有后稷使百姓吃上了粮食；像宣明刑罚，就有皋陶促进了教化。既强调辅助治民和宣力四方，又强调辨明礼制等级和听取各种言论，各自在尧舜二帝的周围履行好本人的岗位职责，而凡是朝政出现尚未修明的事项，德行产生尚未纯正的表现，对万物的取用存在着尚未发挥出本身效益的地方，当时的各位大臣都有办法代替尧舜二帝最终处理好，因此尧舜二帝能够获享到无为而治的轻松又万国和睦相处，天下闻风响应。古今号称达到治理最佳状态的人，唐尧虞舜就属于谁都赶不上的了。

说起历史上最贤明的称王天下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周宣王的了。他固然曾经建立起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大业了，但在起始阶段淮水一带的部族起来反叛，就考虑讨伐它；南方方国也与周王室闹对立，就考虑征服它；北方的猃狁不自量力总捣乱，就考虑进击它，但周宣王也未曾亲自去操劳啊!观阅《诗经》而看到

《采薇》等诗篇，像平定淮水一带的部族，就有周遍地进行宣示的召伯；像征服南方方国，就有身为功勋卓著的老臣的方叔；像进击北方的猃狁，就有文武全才的尹吉甫。既强调奔赴和报捷，又强调抵御住外敌，各自在动乱的岁月里施展出本人的才能。而凡是按规定向王室交纳的赋税还有没交的情况，战车和士兵还有没验核统计好的问题，全面施行治理还有不周密的地方，当时的各位大臣都有办法履行好本人的岗位职责，因此周宣王能够获享到安坐在朝廷上的治绩而内部都顺从治理又威震天下各国。古今号称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时代，成周就属于很难再出现的了。自此以下各个朝代，没有那辅助治民和宣力四方、辨明礼制等级和听取各种言论的大臣，哪里还能指望治绩来同尧舜二帝比试谁隆盛呢?没有那奔赴与报捷、抵御住外敌的大臣，哪里还能指望治绩来同周宣王相媲美呢?这也就难怪陛下赞赏并仰慕它们，同时把夏商周以下的各个朝代贬到根本不值一提的行列里去了。

只有我们的陛下您，加深那祭祀天地群神的虔敬程度而心念同皇天的意愿相符合，扩展那太平欢乐的教化而功业承接起列祖列宗。拿安定住内部来说，在皇宫的御苑里举行亲自带头耕作的大礼，看重农业生产的艰难不易；修筑宫殿的工程拟定停工，免除各省的材料供应。担心众百姓容易受到官吏的残害，就申明并强化考核督察的命令；考虑到犯法的人往往出于无知，就经常强调从宽处置的法典。打开粮仓来救济民众的困乏，送去药物来治疗百姓的疾病。那些广泛施布到远近各地的恩泽，就和云雨的到处施布没有什么差别，充沛地予以滋润，没有一种物品尚未蒙受到的了。拿抵御外敌来说，在内部设立五军、神枢和神机三大营，改置戎政府，用来巩固住京师的根基；在外部重视北方由九处军事重镇构成的边防线，谨慎地对待将帅的选派，用来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卫。北方蒙古部落向内地做侵扰，就秘密地运作起神妙的谋略，马上就把它们驱逐到沙漠老窝去；日本的倭寇在南方进犯，就迅速地奋扬起皇天般的威势，马上就把它们拦截剿灭在海边。想法一产生出来，鬼神全都依从；命令一下达，内奸外贼全都吓得不敢再动弹。那番在边境

地区震慑一切的威猛武力，就和雷霆的鼓动震荡没有什么差别，严肃地显耀闪照，没有一处远方的部族不来归服的了。置身在皇宫，而思虑遍及到四海以外；尊贵得耸立在天下正中的位置上，而威势挟制住八方最远的地方。全天下的臣僚和百姓正和睦相处又闻风响应、内部顺从治理又威震域外各国的那种大治景象，已经超过唐尧虞舜和周朝了。但为什么近年以来，水灾旱灾接连不断，而仓库竟没有足够一年用的储备；公家和私人都感到困乏，布帛存在着一干二净的忧患。北方蒙古部落利用来去快速的优势，动不动就侵扰我们的边境地区；南方的倭寇指挥那乌合之众，连年进犯我们的海疆一带。这确实就像皇上的圣明策问所讲的那样：水旱构成灾害，黎民百姓还在挨饿受冻，北方少数部族经常入侵，南方的倭寇更为严重了。这也确有理由致使皇上从早到晚忧虑不止了。

臣下我认为，天地这样广大，不可能寒暑交替到来、灾害祥瑞轮番降现都保持正常的状态。唐尧虞舜那样圣明，仍然把广泛施恩救济众人视为特难办的事情。现今的水旱灾害，也就是尧舜二帝当年把民众仍在叹息作为应该引起自己警惕的事情啊！现今南方和北方的异族捣乱，也就是周宣王时淮夷、荆蛮和猃狁的入侵啊！然而尧舜二帝虽有民众仍在叹息必须引起自己警惕的忧虑，可到最后却消除了忧虑，原因就出在辅助治民和宣力四方，辨明礼制等级和听取各种言论，分别获取到合适的人选罢了。周宣王虽有淮夷荆蛮和猃狁入侵的忧患，可到最后却解除了忧患，原因就出在奔赴和报捷，抵御住外敌，大臣们各自尽到了各自的职守罢了。如今陛下把皇天的心愿当成自己的心愿，可身在百官行列、应当献出力量的臣僚，不一定就能体会您的这种心愿，去辅助完成皇天的事情。陛下把民众的心愿当成自己的心愿，可镇守一方、管理一地的臣僚，不一定就能各自持有您的这种心愿，去承担起治理百姓的责任。中央首脑机关的大臣确实有那竭尽辅佐义务的人了，可承奉并宣示朝廷旨意的臣僚果真全都围绕朝廷转了吗？在皇上身边的大臣确实有那讲论治国大道和思考重大政务的人了，可负责击退敌军的臣僚果真全都去捍卫边境、抗击外侮了吗？

我朝领有为官凭证而承受朝廷把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交付给他来完成的人，并不是不多啊!然而性情同老鹰相接近的人，每每缺少凤凰那样的仁德；才能比骏马还高超的人，经常缺少《诗经》上所讲的身穿羔羊皮袄那类官员的节俭正直的操守。说是擅长催交赋税的人，不一定就符合辛勤地安抚养育百姓的要求；说是刑罚使用很适当的人，不一定就懂得教育化导民众的方法。号称耿介而不随波逐流的人，有的故作姿态来骗取名声，不能不到最后发生根本的变化；号称仁慈长官的人，有的靠小恩小惠来换取民众的拥戴，不能不对那重大事项稀里糊涂。更严重的是，敲榨百姓来自己聚敛财富，残害民众来自图一时的痛快，手下的百姓只恐怕他不赶紧被调走才好了呢!这哪里还能指望他们会拯救民众的困穷，缓解民众的痛苦，执行君主的命令并且落实到民众的身上去呢?我朝深受礼遇而被授予兵权并把军队交付给他直接部署的人，并不是没有将帅啊!然而职务列居在猛将行列的人，不一定就大有阵前英姿勃发的本领；名义上是国家捍卫者的人，不一定就想得出在酒宴上便克敌制胜的奇谋。天下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的人，免不掉制造虚假的名声来骗取功劳；执掌边境用兵大权的人，免不掉任意施用残酷的手段来祸害部众。挥舞战刀守卫边关的人，在气势上压倒三军，可却没听说有谁像南宋岳飞那样亲自冲锋陷阵，取得了八天连胜的战绩；公子哥式的家伙们，世代承袭军职，免不掉像战国赵括那样白白诵读父亲的兵书，玷污了世代建立的功勋。更严重的是，元帅害怕副将，副将害怕士兵，眼看着什么坏事都会产生出来了。这哪里还能指望他们会禁遏住国家中的凶暴，消除掉国家的祸乱，在那万里边防线上使君主的威势更雄壮呢?这的确就像皇上圣明策问中所讲的：政府各个部门不体会皇帝我的用心，镇守边疆的大臣未能竭尽全力啊!这也正是陛下怀有爱护民众的心念，可恩泽却未普遍施布到；立有遏制住祸乱的志向，可成效却未达到的原因所在啊!

不过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在最后部分说出了这样的话语：如今想使上下一致忧虑，政事全部得到修明，兵力强盛而异族入侵的祸患得以去除，百姓安定而国家的根基得以巩固，灾殃

可以止息住，困穷能够恢复过来，来与虞舜周朝的大治景象相媲美，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就能实现呢?臣下我很愚昧，认为史书上已经谈到了具体的对策，这就是：当今的太守，属于百姓的师长和表率，应当是对他们高度予以重视的。这就必须要强化考核的制度规定，申明长久供职的条例。对遵纪守法又贤良忠诚的人，提高他们的品级来显示殊荣，时间长了就像东汉光武帝把密县县令卓茂封为褒德侯，也不认为是提升得太快了。对庸碌低劣又贪赃枉法的人，加重处罚来显示羞辱，甚至像战国齐威王把买通左右说他好话而治理却一塌糊涂的阿邑大夫下油锅活活炸死，也不认为是处罚得太严厉了。这样做以后，区别判定谁属第一或最末的制度规定得到宣明，官吏们就会加强修养来自我勉励，而像擅长安抚养育百姓的唐朝道州刺史阳城和以宽厚平和著称的西汉颍川太守黄霸那样的人物，自然就成批地涌现出来了。而依靠这样的太守县令去管理百姓，百姓的困穷状况就逐渐恢复过来了吧!兵书上也谈到了另一个方面的具体对策，这就是：将帅属于国家的辅臣，应当是对他们高度予以重视的。这就必须要牢牢执定委任谁当的关键一环，强化驾驭控制的权力。立有功劳，必定就予以封赏，而不被各种意见阻隔住，就像战国魏文侯三年内收到一大箱诋毁乐羊的书信，但仍任用他讨伐中山国，而没有其他的任何想法。犯下罪过，必定就予以惩罚，而不被个人的感情牵制住，就像三国时诸葛亮斩杀马谡，而不萌生任何饶恕的念头。这样做以后，鼓舞振作的作用就充分发挥出来了，将帅们全都会慷慨激昂地来要求试用自己，而像西汉张良、陈平那样的总督和巡抚以及像西汉韩信、秦朝白起那样的统帅，自然就成群地涌现出来了。而依靠这样的将帅去平定盗贼，盗贼造成的祸患就逐渐止息了吧!像这样就会获取到文臣，用来去宣导朝廷的恩惠，恩惠就普遍施布开，而国家的元气自然也会牢固了，足以安定住内部，化解掉百姓四处逃亡的忧虑了。像这样就会获取到武将，用来去扬布国威，国威就到处奋扬，而国家的神气自然也会振作起来，足以抵御外敌，消除掉异族窥伺内地的祸害了。陛下也就能戴好皇冠，穿好龙袍稳稳坐在皇帝的宝座上，扩展那光辉普照的

仁德，也就能使御坐后的屏风一片安宁，形成内外诚信地来敬仰的局面。正像天道在上面默默地运作，而春夏秋冬这些天官和木火土金水这些神吏各自履行好本身的职责，去化生万物，而万物不约而同地高兴得到化生，非常欢悦地一起得到养育。尧舜二帝清静无为的大治景象，在今天会重新让人们看到，而周宣王使国家由衰落再度走向兴盛的功业，更可以同它并驾齐驱并且超过它去了。

然而所谓任命官吏和选用将帅，又哪里没有那关键所在呢?如今官吏行使职权施行治理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并不是官吏中确实就不存在贤良的人啊!也只是说学校的教育不明确罢了。学校是太守县令从里面产生出来的基地，如今的学校教育，臣下我对它存有大惑不解的地方。有人涉猎一下儒家经典和解释经典的书籍，用其中的某些字句组织成文章，就宣称足够用来博取到一官半职了；还有人摘录一些解释经典的说法，用来给文章装潢一下门面，就宣称足够用来登上高官显位了。可对身心道德应达到的美好境界，却一点儿都不了解。等到从学校里毕业进入仕途，就依仗阿谀奉承来作为升官的捷径，把供职的机关当成客店，这也就不要对文臣的职守得不到修明感到奇怪了。替当今的状况做考虑，应当思求加强教育的好办法。像六德、六行、六艺这三方面的要求，修身、尊贤等九种治理国家的法则的训条，仿照古代来施行化导，端正他们的追求目标，就会使如同山岗水岸到处生出茂盛罗蒿的那样的培养人才的教育兴行起来，而众多的读书人就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了。如今将领获取不到合适的人选，并不是将领果真就都没有那种本事啊!也只是说武科考试不严密罢了。武科考试是将才涌现出来的基地，如今的武科考试，臣下我对它存有大惑不解的地方。由骑马射箭而被录取的人，都是能拉开硬弓的大老粗；通过策论而被录取的人，只会沿用重复古代兵家的一些论断。可对常规战法和灵活战术与各种谋略的实际运用，却一点儿都不去探究。等到被任用真去指挥打仗，就像铅制的钝刀不足以形成宰割，就像烂泥不足以构成障护，这也就不要对武功不强盛感到奇怪了。替当今的状况做考虑，应当思求慎重对待武科考试的好办法。像天子举行射箭比赛的礼仪，进

行全面检阅的制度，仿照古代来加以实行，使他们的志向提高一大步，就会使设下兔网来比试高低而化解两国交战的那种化导形成了，威武雄壮的勇士们都成为执政者的亲信了。由此而文官武将分别获取到合适的人选，还去担心什么恩泽贯彻不下去而水旱构成灾害呢?威力振扬不起来而异族入侵太让人忧愁呢?

尽管是这样，但运筹那主宰的最高机宜，行用那锻练培养的重大措施，就更具有那最根本的东西了。北宋儒士程颐说：朝廷是省级各机构的根本，省级各机构是太守县令的纲绳。要想让百姓各得其所，作为本原的地方也只是在于朝廷罢了。南宋朱熹又说：圣明帝王用来挟制住四方部族的做法，根本的东西不在于威武强大，而在于德业；具体的对策不在于军队和物资，而在于纲纪法度；防备的处所不在于边境，而在于朝廷。但朝廷的主导方面，西汉大儒董仲舒早就指出：君主端正自己的心念去端正朝廷，朝廷端正了，再去端正文武百官，文武百官端正了，再去端正黎民百姓罢了。这是因为君主的纯一心念是选取官员和定立起国政的根本啊!如今陛下用亲自撰写的《敬一箴》来执持那心念，又对《尚书·无逸》亲自做出了解说，而凡属选取官员和定立起国政的事情，从那纯一的心念做出决定来，已经绰绰有余了。臣下我在今日想向陛下献上一片忠诚的东西，并不是在这个范围之外而有什么补充啊!只在于时刻保持住那虔敬纯一、不求安乐享受的心念并体悟它罢了。

跪拜祝愿陛下效法皇天运行的刚健，相继升起《离卦》所代表的日月普照的光明，聚合起它们形成永不止息的虔诚，扩展它们形成永无止境的大业。在皇宫帝室纯正地来养护那心念，预防尚未萌生的欲望，对喜好什么与厌恶什么没有偏向一边的问题；矫正容易沉溺在里面的情志，对喜爱什么与憎恨什么没有任从己意的情况。在临朝听政的时候独自做出决断来，汇聚起天下的良好意见形成那明智，在观察和听取上不存在被蒙蔽的地方；顺应天下人的心愿去发布命令，在取用和舍弃上不存在按个人意志来办的情况。由此而那心念不需要检束就自行保持住了，可以把神志驱遣到最高的治国大道的畛域，而德性一天比一天更纯粹；志意不需要执定就自行稳

定住了，可以把心性澄净到一片清明的皇天般的地步，而大业一天比一天得到扩展。就像太阳和月亮永远照耀，但却不改变它们的光辉；就像春夏秋冬永远使万物化生成熟，但却不违背它们交替到来的规律；就像皇天和大地永远转动，但却不停止它们的机能。靠这来选取官员，官员就个个胜任；靠这来定立起国政，国政就全面推行开。而朝廷和地方上的大小臣僚无不戒惧勉励地来履行好本人的岗位职责，文臣和谐一致与武将大展雄风的功绩就禀报上来了，内部安定和外部抵御住异族侵扰的效验就实现了。称王天下的大道造成了和乐太平的美好景象，国家的命运展布出长久又威灵的福庆。真真可以往远处追比尧舜二帝那种和美升平的化导治绩，在近处超过周宣王通过美好的感化来使各地都安宁归服的吉祥局面，即使是黄帝轩辕氏的大道，远古华胥氏的治绩，也超不过这个范围去了。臣下我虽然很愚昧，但对此却感到万分地幸运。同时臣下我又简直恐惧到极点，真是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姜慧颖译〕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戊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殿试策问

[隆庆二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君天下者,兴化致理,政固多端,然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乃其大者。《书》言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又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夫成王初亲大政,而周公即惓惓以此告之,其意深矣。

朕仰荷天眷,获嗣丕基,自惟寡昧,未烛于理。尝恭诵我太祖高皇帝《藉田谕》,成祖文皇帝《务本训》,乃知王业所由兴,民生之不易。及观《祖训》所载居安忘备之戒,又日兢兢焉。兹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又屡敕边吏慎固疆圉,博求制虏长策。亦欲庶几乎知艰诘戎,以覿扬我二祖之光烈。顾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督策虽勤而武备犹弛。四方浮惰者众,未尽归农也。何以使人皆力本而不失业欤?自屯盐之法坏,而商农俱困,边储告乏。今欲举之,其遗法尚可复欤?丑虏诓茹,警报岁闻,何以创之,使不敢复窥欤?议者或言宜战,或言宜守,或欲罢调兵,或欲练士卒,计将安所决欤?朕日夜图虑,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抑其机要所在,未克振举,故人罕实用,功难责成欤?尔诸士习于当世之务久矣,其仰绎我皇祖垂训贻谋之

意,有可以便民益国者,明以告朕,将采而行之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孔子说:仲由啊!告诉你对待了解事物的正确态度吧!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智慧呢!

孔子说:虞舜恐怕是最明智的人吧?虞舜喜好询问,又喜好察辨浅近的言论,把其中不好的地方给隐瞒住,把其中美好的地方给宣扬出去,执持住两种极端的意见,对众百姓施用那最为适中的东西,这也正是他之所以成为虞舜吧!

我何不如让当今的君主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呢?我何不如让当今的民众成为唐尧虞舜时代的那样的民众呢?我何不使这一切在我这时候亲身看到呢?皇天化生出这些民众,就是让先晓知的人来使后晓知的人也晓知,让先觉悟的人来使后觉悟的人也觉悟啊!我正是众百姓中先觉悟的人,我要用这个尧舜之道去使当今的民众都觉悟。不是我去使他们觉悟,可又是谁呢?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统领整个天下的人要去兴行教化,实现大治,政事固然有很多方面,可是致力于根本,重视农业生产,整顿好军队,修明武力防备,这属于其中最重要的事情。《尚书》中讲:首先要了解种田耕作的艰难,才会安逸松快。又说:你要做到过问军队事务,把军队整顿好,沿着大禹治水经过的地方全踏遍。周成王开始亲自执掌朝廷大政,周公就非常恳切地用以上两方面的事情来告诫他,用意是很深长的了。

皇帝我往上蒙受皇天的佑护,得以继承我朝的宏大基业,但自己感到懂得的东西很少,认识又很肤浅,对治理国家还没看得特别明晰。曾经恭敬地诵读我们太祖高皇帝的《藉田谕》和成祖文皇帝的

《务本训》，于是知道了帝王大业兴盛的缘由和民众生存的不容易的地方。等到再观阅《祖训》所载录的处于安宁状态却忘记武力防备的戒饬，又每天都戒惧不止啊！如今亲自率领臣僚和民众在京师南郊举行耕作的大礼，又多次命令边区官吏谨慎地守护好疆土，广泛地求取制服少数部族的长远对策。这也都是想做到确实懂得种田耕作的艰难，整顿好军队，用来播布并弘扬我们太祖、成祖的光辉与业绩。然而国家确定下的法典尽管加以推行，可实际政务却还没有对上号。督促鞭策尽管很频繁，可武力防备仍旧很松弛。天下各地游逛懒惰的人太多，还没有全部归向农业生产啊！究竟通过什么办法能使人们全都致力于根本而不失去本业呢？自从盐商在边区召募农民垦田耕种、用所得粮草换取食盐行销证的制度被废止，商人和农民都陷入了困境，边区的物资储备也禀报匮乏。现今打算重新实行它，它那留存下来的制度还可以再行用吗？北方少数部族不自量力，入侵的警报年年都传来，究竟该采取什么对策击垮它们，使它们不敢再窥视内地呢？议论政事的人有的主张应该主动进击，有的主张应该加强守卫，有的倾向于停止从内地调兵到边境，有的倾向于训练当地的士兵。这些对策应该怎样做出决定来呢？皇帝我日夜思考谋虑，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的大计没有比这更为紧切的了，可实行起来却收不到成效，其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或许是那机宜和关键所在没能振扬施行开来，因而官员们很少能发挥出实际作用，功绩难以命令谁必须建成吗？你们这些读书人熟悉当今的事务已经时间很长了，要探寻我朝太祖、成祖皇帝留下训条和重大谋略的深意，发现能使百姓感到便利又对国家很有益处的地方，明晰地告诉给皇帝我，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纳并付诸施行。

罗万化　殿试对策

罗万化(1536～1594)　字一甫，号康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隆庆二年(1568)状元，时年33岁。后官至礼部尚书。卒于万历二十二年，享年59岁。撰有《世泽编》。

臣对：臣闻人君之治天下也，必安攘兼举，而后可以成天下之至治；必明断并行，而后可以收天下之实功。何也？君犹天也，凡内而中国外而四夷，皆覆冒于天，而为君所统驭者也。惟天好生，而覆帱之用，并育而不害；惟君法天，而安攘之绩，兼举而不遗。故务本重农，以厚民之生，而于以成顺治之休；治兵修备，以固国之防，而于以达威严之化。是二者，诚有国之先务，而不可以偏废，不可以缓图者也。然非明以烛之于先，而断以行之于后，则虽外慕乎安内之名，而实效罔臻；虽从事于攘外之文，而成功罔奏。其何以合内外之治，而用舒夫宵旰之忧也哉？故必君以实心主之，而委任以责成者，恒出之以英明果断之勇；臣以实心效之，而分猷以宣力者，每竭之以左右替相之诚。然后君臣道合而百度贞，上下志同而万化广，中国可安，四夷可攘，内可顺治，外可威严，而久安长治之功，将致之而无难矣。

钦惟皇帝陛下，以圣神之德，膺历数之归，至诚飨帝，恭己临民。天下臣庶孰不翘首而观，拭目而望，以冀沾维新之化？而陛下方且望道未见，求治愈殷，乃特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拳拳乎安内攘外之策。顾臣愚陋，曷足以知当世之务？虽然，陛下此举盖将采而行之，非虚循故事已也。苏轼有言：君以名求之，臣以实应之。矧今陛下以实求之，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万一耶？

臣窃闻之《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则知天之生民，所以左右而曲成之者，其责恒寄之君；而君之主民，所以生养而安全之者，其道实法乎天。此人君所以与昊天同一道也。夫惟人君有同天之道，则凡历象日月以经天之时，体国经野以相地之宜，立纲陈纪以定民之极，爱养樽节以尽物之利，皆所以兴化而致理也，皆人君所以法天之政也。然语其政之大者，则惟曰务本以重农，治兵以修备二者而已。何也？盖国以民为本，而农者民之命也，兵者又民之卫者。农有不重，则衣食无所自生，而啼饥号寒之民，且将有转死于沟壑者矣。君固代天以任养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无以为生，可乎？兵有不治，则备御无所由固，而寇贼奸宄之发，且将有骈首于锋镝者矣。君固代天以当安民之责者也，而乃使民失其所卫，

可乎?

是故成王初亲大政,正天心陟降之际,人心观仰之时也。而周公所以拳拳于告戒者,一则曰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一则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是岂无深意而漫为是言者哉?盖以知稼穑之艰难,则农事修而民食有资,人君养民之责尽于此矣。知戎兵之当诘,则武备饬而民生有卫,人君安民之责尽于此矣。夫人君而诚使民之得养也,民之获安也,尚何化之不可兴而理之不可致哉?故穑人成功,而永清之治于前而有光;守在四夷,而重译之朝愈远而不替。此古今之称善治者,必曰成周而诵周公之功者,亦至今不衰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谕》,曰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其必由农乎!大哉王言,谆谆乎重农之意也。成祖文皇帝务本有《训》,首举太祖创业之难,次及往古圣贤之君、昏乱之王,以昭鉴戒。讵哉圣谟,切切乎垂裕之心也。而又作《祖训》一书,兢兢乎选将练兵之图,居安忘备之忧。则当时所以重民之命、严民之卫者,盖周至而曲尽矣。故民皆乐业,而太和之治允洽;夷皆贡琛,而来王之化益昭。内固无不顺治,而外亦无不威严。所以上追成周之盛,而启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者,端不在于此哉!

惟我皇上临御以来,躬率臣民耕藉于南郊,则一念重农之意,已切至而不虚;而又屡敕边吏慎固封圉,博求制虏之长策,则一念防患之心,又诚笃而匪懈。其于二祖之所以垂训,已身体而实践之矣,宜农事修而民无不遂之养,武功振而国无不安之民也。乃今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啼饥号寒之民,不惟见于穷陬僻壤之所,而通都大郡亦或有不免焉。督责虽勤而武备犹弛,寇贼奸宄之发,不惟见于穷边荒服之外,而弄兵赤丸亦尚有未靖焉。则所以廑我皇上宵旰之忧而不遑豫逸者,良有以哉!

臣尝反覆思之,而得其故矣。试以农言之,方今四方之民游惰者多,归农者鲜,此生之所以不众而用之所以不舒也。今皇上诚欲驱天下之民而皆力于本,其道无他,惟贵谷粟而已矣。盖谷者,民之所资以为生也。民终日不食,则饥馁随之。乃今挟末技而轻去其田里者,岂民之皆不乐生哉?谷贱故耳。我国家于常赋之外,罪有折赎,盐有

飞挽，初非不贵谷也。嗣以国用不轻而见小以忘大，于是有折色之兑，有解银之额，而穑人之功日渐轻矣，又何怪其逐末而忘本也。故臣愿贵五谷，贱金玉，而晓然使知百谷之重，如晁错之所奏焉，则激劝化导之下，岂无力本之农矣乎？如是而谓民之有失业者，未之有也。

若夫屯政之修，盐法之理，又厚农通商之最大者，独不可讲而行之乎？臣以为法久而弊者，势也；遇变而通者，权也。故屯种之田于没于豪右，而番休之卒服役于权门，屯政之废久矣。然不曰湖山斥卤之可垦辟乎？奸豪欺隐之可没入乎？游手游食之民之可驱率乎？昔韩重华之田振武，郭子仪之耕河中，彼岂夺诸其民者欤？不过假不耕之地，而收无穷之税耳。今宜早为之制：田之见存者，履亩而正界；兵之服农者，间岁而代耕。而又时申召募之令，各与以可耕之田。则经界定而侵并之奸不肆，屯聚众而树艺之功可成。昔人谓其宽民力之最大者，正谓此也。工本之钞既难于补给，而守支之商又困于折兑，盐法之坏久矣。然不曰钱钞之用有当均者乎？输纳之粟有当复者乎？私挟私贩之令有当严者乎？昔管仲之煮山海，刘晏之斡淮盐，彼岂掊诸其民者欤？不过总其权于上，而布其利于下耳。今宜定为之制：重钞法以收买余盐，而使灶有所偿；轻中纳以广招商人，而俾盐无所滞。则灶得实利而法禁可施，商有余资而正课自溢。昔人谓其助飞挽之最速者，正谓此也。不然则清查愈密，而屯政愈不修；法禁愈严，而盐法愈不理。譬之医者，不治其本而唯治其标，亦终必死而已矣。欲农商之两利也，胡可得哉？

以兵言之，方今边疆之地，丑虏匪茹，警报岁闻，此备之所以不严，而武力之所以未振也。今皇上诚欲奋天下之武而克壮其猷，其道无他，唯重将帅而已矣。盖将者，兵之所恃以为主也。兵一日无将，则丧乱从之。今乃食廪饩而轻离其卒伍者，岂兵之皆不卫主哉？将轻故耳。我国家于沿边之地，分据以参将，专制以总兵，初非不重将也。后以承平日久而重文以轻武，于是有巡抚以辖之，有总督以统之，而文法之拘日加密矣，果安责其应敌而致胜也？故臣愿重其权，专其任，而屹然使当一面之寄，如赵充国之所行焉，则委任责成之际，岂无敌忾之勇矣乎？如是而谓虏之有窃发者，未之有也。

若夫战守之策，调练之宜，又安边保邦之最急者，独不可议而行之乎？臣以为一劳者，永逸之基也；暂费者，久宁之道也。夫今之虏，非昔之虏矣。飙举鸟集，众寡之势既殊，而狼奔豕突，险阻之地难凭。此当事者所以苦于战守之难也。然臣窃计之，举匈奴之众，曾未足以当中国之半，而卒未有能一创惩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先发之谋未定，而积弱之气有未振乎！兵法曰：宁我制人，毋人制我。此劳逸主客之几也。故昔高宗之伐鬼方也，不惮于三年之久；而孔明之保全蜀也，不辞夫六出之频。彼岂好为是穷兵哉？诚以不创之于前，则后之凭陵者当未艾；而不制之于我，则彼之窥伺者日未息耳。今丑虏之猖炽既如此，而犹因循委靡，不思所以振作奋励之术，则何以成中兴之治而保边境于无虞也哉？故臣即今之势，以权战守之策，必也其先决战乎！盖必以战为守，庶可以折方张之虏，而奠不拔之基也。

今之兵，又非昔之兵矣。锐气消沮，怯懦既已成风；而劳费不赀，司农又复告匮。此当事者所以病于调练之难也。然臣窃思之，即燕赵之士，固素称多慷慨之材，而卒未有能一饬练之者，其故何欤？无乃屯盐之政不举，而给饷之期有不时乎！兵法曰：千里馈粮，士有饥色。此饱馁勇怯之势也。故昔孔明之讨汉贼，莫急于五丈之屯；而唐宗之夷大难，悉仰于江淮之赋。彼岂徒为是扰民哉？诚以未战而不足其食，则不可以得其心；将战而不得其心，则不可以用其命耳。今边兵之柔脆既如此，而犹苟且支吾，不思所以长虑却顾之道，则何以振维扬之武而致殷邦之嘉靖也哉？故臣即今之时以究调练之宜，必也其先理财乎！盖必财以为养，庶可以作有勇之气，而底于襄之绩也已。不然则闻敌而破胆者，既不能战也，而何足与言守？枵腹以待哺者，既不能养也，而何可以加练？譬之养身者有七年之病，而不畜三年之艾，亦终无得而已矣。欲中外之宁谧也，胡可得哉？

虽然，天下之事非知之难，而行之难；人君之道非求言之贵，而用言之贵。故知而弗行，犹弗知也；求而弗用，犹弗求也。臣伏读圣制有曰：朕日夜图虑，安攘之策莫急于斯，而行之靡效，其故何欤？臣以为陛下特未实行之，而臣下亦未能实奉承之耳。果曰行之而靡效，则彼成王所以致四十年之太平，我二祖所以垂二百年之善治者，果虚语

也，而抑别有要机之执以为振举之术也哉？臣以为听言贵广也，而察之尤不可以不明；察言贵明也，而行之尤不可以不断。伏观皇祖之《训》有曰：内外大小官员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是言也，其兼明与断而出之者矣。

故臣愿陛下，奋精明之气，大明作之功。谷所当贵也，则断然以贵之，而不狃于近利之私。将所当重也，则断然以重之，而不惑于一偏之见。屯田盐法以次而举，战守调练相机而行。其始也，简众贤以使之，而不贤者弗庸；其既也，分众职以任之，而不职者必黜。贤否欲辨以明，昭然如日月之行于天，而光不可掩也。赏罚欲必以信，轰然如雷霆之鼓于天，而威不可测也。然后君宰其权，臣能其事，上作其气，下效其能。守令司民牧者，诚知重农而劳心于抚字，则国无不辟之野而野无不耕之民者，可几也，而何游民不归农之患哉？将帅司兵柄者，诚知奋武而尽力于封疆，则士无不振之气而国无不伸之威者，可几也，而何夷狄不率服之患哉？盖惟明克允、惟断有成者，既并用而不偏，故内安中国、外攘四夷者，斯兼举而不遗。周成王之治国不得专美于前，而我祖宗之业之盛又将廓大而增光之矣。此非要机之所在而所当振举者哉？

抑臣又有献焉。心也者，万化之原，而明与断所从出者也。使其心纯乎天理之公，而绝无人欲之私，明断固浑然而在。苟一以私蔽之，则明有时而昏；一以欲累之，则断有时而失。其何以主宰化机而役使群动哉？宋儒范氏曰：君心唯在所养。故臣愿陛下，存养省察以体其心，精知力行以强其心，广询博采以大其心，亲贤远佞以纯其心。一念之萌则曰：我其忘稼穑之艰矣乎？一虑之兴则曰：我其忘戎兵之诘矣乎？然后心无不存，而可以全明断之德，可以保安攘之功。此臣之愚忠拳拳而不已也，伏惟陛下少垂察焉，则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君主治理天下，一定要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同时推行开，然后可以形成天下的最为美好的治理状态；一定要明察和独断结合来运用，然后可以收到天下的实际功效。这是为什

么呢?因为君主就如同皇天,无论从内部到整个华夏地区,还是从外部到四周各个部族,全都被皇天所覆盖,都是受君主统领和驱使的对象。只因皇天喜好化生,而覆盖到一切的那种功能的施用,就对万物都进行化育而不伤害其中的任何一种。只因君主效法皇天,而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的治绩,就同时推行开而不遗漏其中的哪个方面。因此致力根本,重视农耕,去使民众的生活富裕,用来形成顺从治理的大好局面;整顿好军队,修明武备,去巩固住国家的边防,用来播扬开威震天下的化导。这两个方面,确实属于执政者的头等大事,决不可以废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也不可以把它们放到次要地位来做谋划啊!然而不是明察早在前面就一清二楚,决断紧跟着就已经做出,尽管在表面上仰慕安定住内部的美名,可实际的功效却根本达不到;尽管在抵御外敌上设法推行感召的举措,可成功却根本看不到。这样还凭仗什么能融合起内部与外部的治理,用来消除那从早到晚的忧虑呢?所以君主一定要出自诚实的心愿来做掌领,而对委任官员并向他们提出要求的事体,经常用英明果断的勇气做出决定来。臣僚一定要出自诚实的心愿来贯彻执行,而对分担朝廷大计某一部分并且向四方落实好的事体,经常用辅佐并代替君主去料理的忠诚尽力去办好。这样做之后,君主和臣僚在治国大道上就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各种事务就都端正了;上面和下面在思想上完全一致,而各种化导就非常广远了。华夏地区可以得安宁,四周部族可以抵御住,内部可以顺从治理,外部可以威震天下,而长治久安的功业,将会使它建成而不存在难处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凭借圣明神武的德性,承当起既定时运的归属,极其虔诚地祭奉皇天上帝,保持恭敬的态度来统治百姓。全天下的臣僚和平民有哪一个不挺起头来在观看,擦亮眼睛来仰望,希望蒙受到国运焕然一新的化导呢?但陛下正像周文王渴望治国大道到来而尚未见到那样,谋求大治更为迫切,于是特意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从上面颁赐下明晰精详的询问,对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的计策十分关注。不过臣下我既愚昧又浅陋,哪里足以通晓当今的事务呢?尽管如此,陛下这番举动是要采纳并付诸施行,并不是依照

惯例走走过场就算完事了呀!北宋苏轼说过这样的话:君主即使用名义上的那一套来求取言论，臣下也该用真实的想法来做出回答。何况现在陛下是用真切的愿望来求取言论，臣下我哪里敢不披肝沥胆来对答并播扬陛下策问的万分之一呢?

臣下我私下听说《尚书》中讲过:皇天降生下天底下的民众,就给民众定立起君主,定立起师长,只靠他去能够辅助皇天上帝,安抚稳定住天下各地。由此就明白皇天降生下民众，用来辅佐它而设法使民众生息繁衍的责任，就经常寄托在君主的身上;而君主统领民众,用来化生养育他们并使他们不受侵害的做法，实际上是效法皇天。这是君主与皇天之间做法正是同一个的原因啊! 只因君主有和皇天完全一致的做法，也就观测日月的运行规律，去确定皇天的时令节气;定立起国都,划定好田野,去察看大地的合理利用;确立起纲领,张布开规定,去给民众树立起行为的最高准则;爱护养育,注意节省,去使万物给人带来的好处都发挥出来。所有这一切，都是兴行起教化和实现大治的措施,都是君主用来效法皇天的政务啊!然而讲论起政务最重要的方面，也就只能强调致力根本、重视农耕和整顿好军队、修明武备这两大方面而已。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国家正把民众作为根本,而农耕正是民众的生命线,军队又是民众的卫护力量啊!对农耕出现不重视的情况，穿的和吃的东西就没有地方能自动生出来,而为挨饿受冻哭泣号叫的百姓,眼看着就有四处逃亡而死在山沟路旁的人了。君主本来是代替皇天来承当起养护民众的责任的人,可竟然使民众没办法生存下去，这能行吗? 军队出现没整顿好的现象,防备抵御外敌就没有途径达到坚固,而抢掠杀人现象和内奸外贼突然冒出来，眼看着就有在刀口箭尖下双双丧命的百姓了。君主本来是代替皇天来承当起安定住百姓的责任的人，可竟然使百姓失去了得到保卫的凭仗,这能行吗?

所以周成王首次开始亲自处理国家的政务，正是天心默默佑助的时候和人心观看仰望的节骨眼上,而周公用来诚恳告诫的事项,一方面强调要了解种田耕作的艰难,才会安逸松快;另方面又强调你要做到过问军队事务，把军队整顿好，沿着大禹治水经过的地方全踏

遍。这种告诫哪里是没有深长的用意而随便就讲出那两方面的事项来呢?因为了解了种田耕作的艰难,农业生产就会得到发展而百姓的吃穿就有了保证,君主养育民众的责任就在这上面完全尽到了。懂得军队应当整顿好,武力防备就得到强化而民众的生存就有了凭仗,君主安定百姓的责任就在这上面完全尽到了。君主确实使百姓得到了养育,使民众获享到安宁,这还会有什么教化兴行不起来,又有什么大治局面实现不了呢?所以种田人取得了功效,永远清平的治绩对列祖列宗就予以弘扬了;四方部族都变成了天子的守卫力量,经过好几道语言翻译来朝拜归服的部族就越来越远而不中断了。这正是古往今来提起善于治理的朝代,必定要说当然是成周并且颂扬周公功绩的原因所在,直到今天也没不被提起来的呀!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在天子带头耕作上有那《藉田谕》,强调要想财政支出不枯竭,国家总是很富足,鬼神永远能祭享,恐怕必定要从农业生产做起吧!这番帝王的言论简直太重大了呀!对重视农耕的意旨在做反复叮咛啊!成祖文皇帝在致力根本上有那《务本训》,首先列举太祖创建帝业的艰难,接下来讲到古代的圣明贤能的君王和昏暴败乱的国主,用来昭示那正反两方面的鉴戒。这种圣明的谋略简直太宏大了呀!在给后世留下吉福的用心上真是深切啊!太祖又编撰《祖训》这部书,对选任将帅和训练军队的筹划以及身在太平时期却忘记战备的忧虑,都格外注意加小心。当时用来看重百姓的生命和加强对民众卫护的措施,大致上已经非常周全又十分细密了。所以众百姓全都安居乐业,而最为和谐的治理万分得当;四方部族全都献上礼品,而前来归服的化导更加光明。在内部固然没有谁不顺从治理,在外部也没有哪个地方不受到震慑。而用来往上追比成周的大治景象并开启我们国家亿万年永无尽头的美好国运的东西,恰恰不在这里吗?

想我皇上登上帝位以来,亲自率领臣僚和百姓在京师南郊举行带头耕作的大礼,这表明把意念全都投注在重视农耕上的意向,已经殷切到极点而不抛在一边。同时又多次命令边疆地区的官吏谨慎对待并守护好国土,广泛求取挟制住异族部落的高明计策,这表明把意

念全都投注在防止祸患上的心愿，又真诚深厚而毫不懈怠。对于太祖皇帝和成祖皇帝用来垂示训戒的东西，已经身体力行并实际去施用了，本应农业生产得到发展而百姓没有实现不了的养育了，武功也该振扬起来而国家没有不安全的民众了。可当前竟然是固定的法典虽然加以推行，但实际政务却还没有对上号。为挨饿受冻而哭泣号叫的百姓，不单单在最远最偏僻的地区可以看到，连四通八达的大城市和重要的州郡也有的避免不了。督促鞭策尽管很频繁，可武力防备仍旧很松弛。劫掠杀人的现象和内奸外贼突然冒出来，不单单在最遥远的边境和属国的外端可以看到，连起来造反的歹徒恶棍也还有尚未平定下去的。这表明使我皇上从早到晚都忧虑不止而根本就顾不上休息的局势，确实是有缘由的了。

臣下我曾经反复思索这种局势，寻找到其中的原因所在了。试用农耕来说，现今各地的百姓，游荡懒惰的人有很多，归向农耕的人却很少，这是生产出的东西不丰富而享用起来不宽裕的原因造成的。如今皇上确实打算驱使天下的百姓都在本业上花气力，并没有其他的具体办法，只是使粮食变得贵重罢了。因为粮食属于百姓赖以生存的东西呀！百姓一整天不吃饭，饥饿也就跟着出现了。可现今依仗做买卖、耍手艺而轻易就离开自己故乡和土地的人，哪里是表明众百姓全都不乐意种田为生呢？只因粮食太不值钱罢了。我们国家在法定的赋税之外，犯罪有交纳赎金来做抵偿的规定，贩盐又有代替军粮输送的制度，在当初并不是不使粮食贵重啊！到后来由于国家用度太多，就只看到暂时的利益却忘掉了长远的利益，于是出现了把应交的粮食折合成银两来交纳，规定了向朝廷送交的银两数额，而种田人的功效就一天比一天不值钱了，这对人们追逐末业而放弃本业又有什么感到奇怪的呢？因此臣下我希望陛下看重粮食，轻视金银珠玉，非常明晰地让世人知道各种粮食的贵重，像西汉晁错所奏请的那个样，在这种刺激鼓励和化导之下，哪里就没有大力从事本业的农民了呢？像这样去做，仍然说什么百姓中存在着放弃本业的人，这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

至于屯田政务的修明和盐法的整顿，又属于强化农耕和使商人

活跃起来的最重要的事项，偏偏就不能讲求并施行开来吗？臣下我认为，制度历经的时间一长久，就会产生弊端，这是客观的态势；而遇到变化的情况能对它做出调整，就属于灵活的处置方式了。因而屯种的田地白白被地方豪强所占有，而定期轮流戍边的士兵被有权势的人家用来供使唤，屯田的政务已经废坏很久了。然而就不强调湖泽山峦的荒地可以开垦了吗？奸诈的土豪少报或不报田地的亩数就能让他们据为己有了吗？游手好闲、到处糊口的百姓是可以驱使引导的吧？从前唐朝韩重华在振武镇实行垦田，唐朝郭子仪在河中镇募民耕种，他们哪里是从那些百姓身上榨取财物呢？只不过利用荒芜的土地，收取那没有尽头的租税罢了。如今应当对屯田政务早早做出规定来：田地现在仍保留下来的，要丈量亩数，确定好归属；士兵从事农耕的，每隔一年轮流去耕种。同时经常申明各地要召募人手的命令，各自拨给可以耕种的田地。这样一来，田地归谁掌握确定下来了，而侵占吞并的奸诈行径就不能再任意胡来了。屯田聚居的地点很多，种植栽培的功效就能形成了。古人讲论的使民力得到缓解的最重大的举措，正是指此而言啊！对产盐户的收购款已经很难支付，而等待官方发盐的商人又被交纳粮草折合成交纳银两所困扰，盐法的废坏也已经很久了。然而就不强调钱钞的拨付有应调剂的地方吗？盐商向边塞地区交纳粮草换取提盐销盐的凭证有该恢复的地方吗？私带和私贩食盐的禁令有该强化的地方吗？从前春秋齐国的管仲实行盐铁官营，唐朝刘晏对两淮地区盐专卖进行巧妙变通，他们哪里是对那些百姓剥取财利呢？只不过在上面掌握住支配权，而把财利散布到下面去罢了。如今应当给食盐产销定立起制度来：强化钱币制度，去收购积压的食盐，而使产盐户得到合理的报酬。减轻交纳粮草换取提盐销盐凭证的税率，去广泛地招引商人，而使食盐没有流通不起来的现象。这样一来，产盐户得到了实际的利益，各种禁令就能施行开来；商人获取到利润，法定的税收自然就能多起来。古人讲论的辅助军用物资运送的最快速的举措，正是指此而言啊！否则的话，清查逃走的人越严密，而屯田的政务就越得不到修明。禁止私卖私贩的法令越严厉，而盐法就越得不到整顿。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医师对患者

不治疗病根,却光去治疗表面的病症,也只是到最后必定死掉算完事了。像这样却想农耕和商业两方面都有利,怎么能够做到呢?

拿军队来说,如今在边疆地区,丑恶的少数部族不自量力,警报每年都奏禀到朝廷来,这是防备不威严而武力没得到振扬所造成的呀!如今皇上确实打算使天下的武备奋扬起来又能使谋略得到扩展,并没有其他的具体办法,只是重视将帅罢了。因为将帅属于士兵所依仗而有指挥的人,士兵要是在一日之内没有将帅,丧亡散乱就跟在后面了。可现今领取军饷却轻易就从所在部队逃离的人,哪里是表明士兵全都不卫护君主呢?只因将帅没有威信罢了。我们国家在边境一带地区,用参将来驻守各个据点,用总兵官来镇守一方重镇,在当初并不是不重视将帅啊!到后来由于太平的时间太长了,变得重视文臣而轻视武将,于是派有巡抚去管辖他们,派有总督去统领他们,而各种具体规定的约束一天比一天变得细密了,这从哪里真能指派他们去应对敌军并取得胜利呢?因此臣下我希望陛下加重将帅的权力,把军务完全交付给他们去料理,突出地使他们承担起独挡一面的重任来,就像西汉赵充国平定羌族的所作所为一个样。这在委任将帅并对他们提出要求的时候,哪里会没有同仇敌忾的奋勇劲儿了呢?像这样去做,仍然说什么少数部族中存在着突然找机会捣乱的家伙,这是从来就没有过的事。

至于进击和防守的对策,调遣与训练的合适做法,又是安定边疆、保卫国家的最为紧迫的事项,偏偏就不能讲求并施行开来吗?臣下我认为,费一次大力量,是永远安逸的基石;花一次大本钱,是长久宁静的有效办法。如今的少数部族并不是以前的少数部族了。它们快速地行动,临时聚集起来,敌我双方的人数多少的形势已经是我不如敌,而四处乱窜,任意攻击,又使我方的险要防线难以凭仗。这是负责边防的人对进击还是防守感到很难办的原因所在啊!然而臣下我私下做过筹划,把匈奴的部众全都加起来,也终竟够不上华夏总人口的一半,可到最后竟没有一次能打击并教训它们的军事行动。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恐怕正是采取主动的谋略没有定立起来而长久软弱的习气还没得到振刷吧?兵法上讲:宁可我去挟制住对

方，也决不能让对方挟制住我。这正是费一次大力量而永远获取到安逸和主动进击与被动挨打的微妙之处啊！因此殷高宗讨伐鬼方这一部族，对战争持续了三年也不感到畏惧；三国时诸葛亮为了保卫住整个蜀汉辖区，对六次从祁山出兵征讨曹魏也在所不辞。他们哪里是喜好这类用兵不止的举动呢？实在是因为不在前面打击对方，往后欺凌我方的人，就会消停不了。不被我方所挟制，对方找机会入侵的行径就会每天都不止息啊！如今丑恶的少数部族猖狂凶猛到这般地步，可却仍旧一切照老样子办，意志消沉，不思考用来振作、奋扬、激励的具体办法，凭什么成就那种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治绩呢？保卫边境而不存在任何忧虑呢？所以臣下我根据目前的形势来权衡进击与防守的对策，一定要把决计进击放在首位吧！因为务必把进击作为防守来对待，差不多就可以挫败势力正在扩张的少数部族，奠定下永不动摇的国家根基啊！

如今的士兵也不是以前的士兵了。他们锐气消失，胆怯懦弱已经形成了风气，而军饷又供应不上，朝廷主管财政的部门也禀告府库空虚。这正是负责边防的人对调遣和训练感到很难办的原因所在啊！然而臣下我私下做过考虑，即使是生长在燕国、赵国地区的兵士，原本上一向号称多数人都有慷慨就义的天性，可到最后竟没有一个能整顿并训练好的人。这里面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恐怕正是屯田和盐专卖的政务推行不开而发放军饷的日期存在着拖延的问题吧？兵法上讲：千里运送粮草，士兵就会有挨饿的情况。这正是吃得饱与不够吃影响到作战勇猛或胆怯的必然结果啊！因此从前三国时的诸葛亮讨伐篡夺汉室江山的曹魏，没有比在五丈原搞好屯田更为紧切的了；唐肃宗平定安禄山与史思明发动的叛乱给国家带来的严重灾难，完全依赖长江和淮水地区的赋税收入。他们哪里光是采取这类搅扰百姓的措施呢？实在是因为在没作战的时候却使士兵吃不饱，就不能赢得他们的拥护；在开战之前不能赢得他们的拥护，也就不能使他们拼死作战啊！如今守卫边境的士兵已经脆弱到这般地步，可却仍旧瞎糊弄，乱搪塞，不思考用来做出长远部署而去除掉后顾之忧的对策，凭什么能振扬起那远播四方的武力呢？实现各个邦国都在美好的

化导下前来归顺而变得安定下来呢？所以臣下我根据目前的时势来探究调遣和训练的合适做法，一定要把处理好国家财政放在首位吧！因为务必用财力来供养好军队，差不多就可以激发出英勇杀敌的士气，达到外敌被驱逐的成效了。否则的话，听说敌军来到就吓破胆的人，已经根本不能去交战了，又怎么会足以同他们讲明防守呢？空着肚子在等待喂食的人，已经不能去养育了，又怎么可以再去训练他们呢？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保养身体的人，患有七年的疾病了，却没积蓄下足够三年使用的艾草，也只是到最后收不到任何成效算完事了。像这样却想国内和边区一片安宁，怎么能够做到呢？

尽管是这样，但天下的事务并不是闹清它们很困难，而是实行它们很困难；为君之道并不是求取言论特可贵，而是采用言论特可贵。所以闹清了却不去实行，等于没闹清啊！求取却不采用，等于没求取啊！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中有这样的话：皇帝我日夜思考谋虑，安定内部和抵御外敌的大计没有比这些更为紧切的了，可实行起来却收不到成效，其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臣下我认为，陛下只是没有实行它们而臣僚也没能真心地贯彻落实罢了。要是说实行起来却收不到成效能够站住脚，那么周成王形成四十年太平局面的举措，我朝太祖和成祖皇帝给后世二百年江山留下的治理好国家的措施，就纯属毫无用处的废话了吗？此外还另有切要的机宜可以拿来作为振兴推广的办法吗？臣下我认为，听取意见要注重广泛，而审辨它们更不能不圣明；审辨意见要注重圣明，而行用它们更不能不果断。跪拜观阅我朝太祖的《祖训》中有这样的话：内外大小官员的建议符合事理，马上就交付给主管部门施行，各个衙门不准阻碍，拖着不办。这番话，把圣明和果断结合成一体的意思完全表达出来了。

所以臣下我祝愿陛下奋扬那精明的气质，扩展那百官各尽职守的功业。粮食应当使它变贵重的，就果断地来使它变贵重，而不被眼前利益的那点儿短浅想法所左右。将帅应当重用的人选，就果断地来重用他们，而不被偏执一端的看法所迷惑。屯田和盐法按顺序推行开来，进击防守和调遣训练察看时机实行起来。在开始的阶段，选取众多的贤才来使用他们，而庸劣的人根本就不选用。步入正轨以

后，划分出各个职务来派人担任，而不胜任的人必定予以罢免。贤臣与废物打算区辨开就靠那圣明，圣明得如同太阳和月亮在天上显赫地运行，光辉根本就遮掩不住啊！封赏和惩罚打算彻底行用就靠那信实，信实得就如同雷霆在空中响亮地滚动，威力根本就让人猜测不到啊！达到这种程度以后，君主决定那灵活处置的策略，匡像办理好具体的事项，上面的人振扬起本身的气概，下面的人献出各自的才能。太守县令这些负责治理百姓的官员，确实懂得重视农耕而在安抚养育民众上费尽心思，那类国家没有不得到开垦的原野而原野上也没有不耕种的百姓的景象，也就差不多能实现了，还会有什么游荡的百姓不归向农耕的忧患呢？将帅这些统领部队的官员，确实懂得奋扬武力而在巩固边防上竭尽力量，那种士兵没有不振作的士气而国家也没有不播扬的威势的局面，也就差不多能形成了，还会有什么少数部族不归服的忧患呢？因为只有圣明又能做到诚信，只有果断又能做出决定，已经结合到一起来施用，而不废弃其中的哪个方面，所以在内部安定住华夏地区，在外部抵御住各个少数部族，这也就同时推行开来，而不会遗漏掉其中的哪个方面了。周成王的美好治绩于是就没资格在前面独享盛誉，而我朝列祖列宗的盛大功业又会得到扩展并给它增添光彩了。这还不是切要机宜的所在之处并且应当加以振兴推行的东西吗？

不过臣下我还有献呈的意见。心念是各种化导的本原，也是圣明与决断涌生出来的地方。使那心念纯粹得全是公正的天理，而丝毫没有偏私的人欲，圣明和决断固然就浑然一体地摆在那里了。如果有一处被个人的偏私遮蔽住，圣明就会有时候变得昏昧；倘若有一处被自己的欲望拖累住，决断就会有时候出现偏差。这还凭什么去主宰那化导的机宜和役使那一切会活动的人和万物呢？宋朝的儒士范氏说过：君主的心念只在于养护的办法。所以臣下我祝愿陛下，通过保持养护和反省察辨来体悟那心念，通过精细了解和大力践行来强化那心念，通过广泛询问和多方采用来扩充那心念，通过亲近贤臣和疏远献媚者来净化那心念。有一种想法萌生出来，就要对自己说：我是忘掉了种田耕作的艰难了吗？有一种思虑涌生出来，就要对自己

说:我是忘掉了整顿好军队了吗?这样做以后,心念就无处不在,可以形成那圣明与决断都具备的德性了,可以保持住安定内部与抵御外敌的功绩了。这是臣下我那片愚昧的忠心恳切得无法抑制住的地方啊!跪拜只请陛下稍微予以明察,臣下我尽管愚昧,可却感到万分幸运了,天下也感到万分幸运了。臣下我是一名生活在民间的卑贱的读书人,不懂得忌讳,触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黄凤翔　殿试对策

黄凤翔(1545~?)　字鸣周,号仪庭,晋江(今福建泉州)人。隆庆二年(1568)榜眼,时年24岁。后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有《田亭草》今犹行世。

臣对:臣闻帝王之驭天下,有治法之立焉,兴化之大务也;有治人之用焉,运化之大机也。夫天下之政,莫大乎兵农。农以力本,而斯民有所取给,则国家之元气赖之以益培。兵以奋武,而斯民有所防卫,则国家之神气赖之以益张。此其所系固甚大也。然法之不立,则纪纲废弛,求治虽切,而无以享其成功。用匪其人,则举动乖方,置法虽烦,而无以收其实效。帝王有见于此,故稽古之制,酌今之宜,而张弛惟时,师其意不泥其迹焉。天下之治法立矣,稽之于众,断之于独,而简核惟当,委之任而责其成焉。天下之治人得矣,治法治人,合二者以相济,则由是而足食,可以成内修之绩,由是而足兵,可以弘外攘之烈,尚何化理之不可兴哉?

钦惟皇帝陛下,禀聪明睿智之资,具圣神文武之德。自御极以来,下优恤之诏,恩同雨露矣;录敢言之臣,量同覆载矣。虑臣工之不职,而振剔之法申重于铨曹,明并日月矣;惩丑虏之不恭,而武备之防严督于将帅,威如雷霆矣。日视外朝,未央之懿范也;躬耕藉田,康功之遗意也。治法治人,一时兼振,海隅苍生,引领翘望,思见德化之成久矣。兹万几之暇,进臣等于廷,垂之清问,拳拳然兴化致理是图,谓

非望道未见之诚、居安思危之虑乎？臣幸际明时，敢不抒一得之愚以对？

窃惟帝王位天地之中，承君师之统，握民物之纪，系华夷之望，所以运量于九重而宰制乎六合者，其为道诚多端，而不可以胜穷矣。然天下之大命，莫重乎农，而小民之依，深宫之所当念也。天下之大防，莫重乎兵，而武备之修，盛世之所不讳也。当务之急，孰有先焉者乎？考之《周礼》，有大司徒掌都鄙之职，而以稼穑登万民；有小司徒会卒伍之数，而以四时教战法。是周公所以体国经野、思患豫防而辅相太平之业者也。故其告成王也，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又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夫亲政之始，天下之务纷然赜矣，矧文、武培植之余，熙洽之风犹在也，奕世承平之后，窥伺之隙未开也，而遽教之以稼穑，导之以诘戎，自常情观之，其说若近于迂缓者。不知忠臣忧君必防其渐，忧治世而危明主，亦人臣无已之心也。不念天下之至劳，何以享天下之至逸？不思天下之至危，何以保天下之至安？周公告君之意固如此。盖至千亩不籍而周道浸微，武备懈弛而戎狄交侵，然后知周公之言，其虑患诚深而贻谋诚豫也。於戏！以天下之广，望治于一人之身；以万世之图，取决于一时之近，而劳逸安危之端，则始于一念而已。识其端，则人与法兼举焉，而天下之治以成；昧其端，则人与法俱废焉，而天下之治以塞。为人君者，盍亦加之意哉！

洪惟太祖高皇帝藉田有《谕》，举后稷树艺之教，述有周播谷有颂，先天下以劝农也。成祖文皇帝务本有《训》，纪高皇创业之艰，究历代兴替之原，教太子以重本也。至于《祖训》所载，虑胡戎之密迩，而豫乎选将练兵之防者，谆谆然燕翼之必周焉。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其真无逸之深意，诘兵之洪猷乎！然创业之君备尝民情，故其为虑甚远；守成之主坐享安乐，故其保治常疏。自古以来，孰有知艰诘戎如我皇上者哉！犹且深忧过计，虚怀下问，谓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督责虽勤而武备犹弛，欲求足食足兵之道，以追圣祖之训。臣愚，何足以知之？而窃有所闻矣，敢不掇拾以献！

夫民之所以日困者，食之不足也；食之所以不足者，游惰之日众也。田野小民，终岁勤动，上困征输之繁，下乏俯仰之供，其为情亦甚

可悯矣。乃黄冠异流，游谈而坐索厚利；行伍羸卒，拱手而虚费廪禄。为百姓者，孰无好逸恶劳之心，而肯自劳以养此无用之辈哉？边警之所以屡闻者，丑虏之孔炽也；丑虏之所以孔炽者，中国之无备也。戎狄之性，伺隙而发，进虽蓄蛊毒之心，退犹怀狼顾之虑，其初岂敢以遽逞者？乃啸聚而入，无险阻藩篱之隔；卤掠而去，无亡失遗镞之虞。为北虏者，狃于屡入屡获之利，亦何惮而不萌觊觎之思哉？比年以来，竭民之膏脂以养兵，而兵未尝饱；涂兵之肝脑以卫民，而民未尝安。是宜其仰麾圣衷而宵旰不遑矣。

为今日内修之计，必也使游惰之民尽归南亩，而其为道也，岂必以势驱之耶？方今天下之田定额犹故，而东南之地多沃壤，西北之地多瘠卤者，固可酌其宜而通之也。仿限田之例，薄税敛之征，董仲舒之策不有可用乎？去五谷之蠹，省征发之期，贤良之言不有可追乎？贵谷粟而贱金玉，补不足而劝农功，晁错之谋不有可举乎？斟酌损益，循而行之，则国无不供之赋，民亦无不厚之生。彼见夫为农之有其利，而偷惰之无所容也，安得不群然相率以自归于农哉？然此其足民之本也，而屯田、盐法又所以济其不及者也。臣请以屯盐之旧言之。

国初之制，分屯蚁聚而更番迭休，输粟中盐而自为耕种。是兵固农也，商亦农也。务农重本之意，其详且密如此。厥后兼并之弊起，而旧额仅存，复鞠为榛莽之区。折色之议兴，而储蓄既竭，复敛以工本之利。商农俱困，边需告匮，其害职此之由耳。是故豪右并吞之田，所当稽也，而污莱不治者修之，岁人之多寡勿峻求焉，汉人之所谓便宜，或可以图其八九也。上纳本色之例，所当复也，而种田待输者听之，谷粟之贵贱非所论焉，宋人之所谓三害，或可以省其一二也。稽核明而世业定，弊端塞而利源开，由是辟开垦之规，重正引之途，而私役戍卒、夹带私盐者，申之令甲昭如也。则民乐于农，而保伍之聚皆营田之卒；民乐于商，而逐末之众皆务本之资。欲使民力本而不失业者，此实不为无助矣，边计之乏奚忧哉？

为今日外攘之计，必也使南侵之虏不返只轮，而其为道也，岂徒以幸胜之耶？虏之至也，必有先声，而亦有匿形以诡我，易向以疑我者，其情皆可预觇而觉也。先居其隘，盈以待敌，法不云地形可击乎？

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法不云难知如阴乎？避其锋锐，邀其惰归，法不云先治其气乎？因时出奇，伏而制之，则我有必胜之算，敌有必败之形。彼见夫主客之势既殊，而胜负之数亦异也，亦安敢肆然跳梁以凭陵我中国哉？然此其应敌之权也，而训练士兵，则尤所以图之于豫者也。臣请以兵制之旧言之。

国初之制，卫所错峙而九边联络，骑步相参而五兵互用。地各为守也，人各为战也。折冲御侮之略，其详且悉如此。今也列障分圻而寇至莫御，曷尝见其有守之实？登垣对垒而敌去不蹑，曷尝闻其有战之名？士兵之不训，征调之是恃，其弊实使之然耳。是故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韩愈氏所谓大弊也。今日调客兵之议，不可以莫之罢也？籍民校阅，而精兵为诸道，昔李抱真之所已试也。今日练土兵之议，不可以莫之行也？客兵不调而刍饷省，土兵既练而士气倍，由是勤蒐阅之法，倡勇敢之风，而委靡自废、贾勇欲前者，一之刑赏较如也。则进可以战，而破锐摧坚，立于不败之地；退可以守，而投石超距，蓄乎不用之勇。欲一举而大创之，使虏不敢窥者，此实有以为之本矣，征调之兵奚赖哉？虽然，边饷之告乏久矣，北虏之匪茹非一日矣。司国计者握算而筹，志封疆者请缨而奋。清查之使持斧四出，分阃之臣仗钺相望。顾今日建议，明日报罢，今日画战，明日画守，而竟不能兴民利，宣德威，以裨庙谟之万一。岂利之终不可兴，兵之果不可用哉？殆必有其故矣。

伏读圣制有曰：机要所在，未克振举，故人罕实用，功难责成。斯言也，恳恻图治之怀，明见万里之哲也。臣试以今日之机，为陛下陈之。盖天下无不弊之法，而善救弊者存乎人；天下有可用之人，而善用人者存乎君。方立法之初，岂有不善？而所以日趋于弊者，非始于纷更之为害，则始于玩惕而不振，岁月因循，积弊愈深。其间沿革损益之宜，张弛阖辟之用，殆有未易辨者；况地形异而事体殊，锋镝交而机会变；成败之相为倚伏，利害之相为轻重。苟非善用人以图之，未有能济者也。故夫今天下之势，譬之富室子孙资财尽耗，付之善理家者为之补缉而生殖之，犹可以复其父祖之旧。譬之尪羸之夫精神风采枵然消剥，委之善医者以培其命脉而壮其荣卫，始能兴衰起仆，以

不蹈于危亡之忧。

用人之道,其所系于天下者甚大也。乃今之用人,则有可慨者。内外偏重,而登仙之想复见于今矣;小大递迁,而贯鱼之诮复蹈于昔矣。贤能著绩者,以简伉而被构,是悃愊之刘方不获上考也;才力可用者,以细故而永黜,是罪累之李靖不获见庸也。官不久任,而或再岁一调,或一岁再更,纵有七年而足民、三年而知方者,何以究其用也?事从中制,而一动必经奏请,一请辄延岁月,纵有老成如充国、善兵如颇牧者,何所展其技也?运司藩臬,以屯盐为名者何限,而复置总理之职以统之,必诸司多瘝旷之官也,而可以不核其实乎?兵备提督,以防边为寄者何限,而复遣巡边之臣以察之,是庙堂无督察之术也,而可以不究其原乎?夫张官置吏,以为民也。一官之出,百家供具;一将之遣,百夫呵拥。其所糜费而劳竭者,尽斯民之膏脂,国家之物力也。顾用之而不得其人,与夫用之而未得其道,则于兵食之大计焉攸赖?而奚纷纷焉以此辈为也?

臣愿陛下参舆论之公,持独断之明,择于诸臣,中而用之。上自监司,下至守令,必其能体陛下重本之心者也;内自本兵,外至督抚,必其能体陛下诘戎之心者也。均内外之势,使疏远者乐于自效;破资序之格,使下位者知所自奋。稽政绩于化列之外,采名不如采实也;录才能于罪废之中,使功不如使过也。功之济也,增秩以示赏;功之未济也,加意以责成,使得安其职业,而勿以岁月计焉可也。暂费而永宁者,不谓之糜财;一劳而永逸者,不谓之厉民,使得便宜从事,而勿以文法拘焉可也。某也廉吏,必考其所以廉者何如;某也能吏,必考其所以能者何如。是参验之法所当详也,而旷官其有所惧乎?有功必赏,而冒滥者之罚不宥焉;有罪必惩,而规避者之责尤重焉。是振饬之规所当举也,而督察其有不周乎?明断运于宸衷,而精神通于宙宇;黜陟公于廊庙,而劝惩昭于域中,使文武百职大小臣工,咸洗心涤虑、效忠宣力之恐后。此之谓以天下之治人,立天下之治法;以天下之大机,图天下之大事。而陛下之所以躬耕藉田,博求长策,有不徒为饰治之弥文者。由是国赋可充,不加税而用自足矣;国威可振,兵革不试而四夷宾服矣。所以弘二祖之烈而追有周之盛者,宁有外于

是哉!

虽然,此辅弼诸臣之责也,不足以烦陛下之虑也。臣犹有根极本原之说,敢冒昧为陛下言之。窃尝反复《无逸》大旨,皆在"敬德"之一言;而《立政》之陈,虽缀衣虎贲,亦戒以知恤焉。即此敬慎忧恤之心,乃知艰诘戎之本,图之不可以不豫者也。况人君一心之微,众欲攻之,一念不谨,则谗谄面谀之人得以投其间,豫大丰享之说得以售其欺,而声色货利,逸游淫乐,将并起而乘之矣,又恶知稼穑之艰难,戎兵之当诘也?臣愿陛下常存此心,日新其德,主敬以检束之,讲学以涵养之,亲贤人君子以维持之。知微之显,有宵密缉熙之诚;慎终如始,有惟怀永图之念。民虽安矣,如伤之视犹故也;外虽宁矣,内扰之虑不忘也。见《祖训》于羹墙,监成宪以无愆。则内外无患之休,社稷无疆之庆,端有赖于是矣。草茅之臣,不识忌讳,干冒天威,无任陨越悚惧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驾驭天下,有那施治大法的确立,这属于兴行起教化的头等大事啊!有那施治人才的任用,这属于筹措好教化的重大机宜啊!天下的政务,没有比军队和农耕更为紧要的了。农耕用来在巩固根本上下力气,而当今的百姓具有充分取用的东西,国家的元气就依赖它而越发得到培植。军队用来奋扬武力,而当今的百姓具有防护保卫的凭仗,国家的神气就依赖它而越发得到张布。这两方面所关系到的国家政务,固然是特别重大呀!然而施治大法不确立起来,朝廷的纲纪就会废弛,谋求大治尽管很迫切,但却没办法获享到那成功。任用的不是合适的人选,贯彻执行中就违背正道,设置施治大法尽管很严密,但却没办法收到那实效。圣帝明王对这种关系看得很清楚,所以就考察古代的制度,斟酌当前的合适做法,只根据时势的需要来做出调整,取法那用意而不被表面的那一套束缚住。天下的施治大法确立起来了,从众人那里多做询问,在自己这里做出决断,选用验核只求妥当,就能把官职授付给他并对他提出具体要求了。天下确能胜任的人才获取到了,施治大法与施治人才这两个方面结合到一起,相互补充,由此而使粮食充足,就可以形

成内部得到治理的功绩;由此而使军队强大,就可以弘扬外部抵御住侵扰的事业,这还有什么教化与治理不能够兴行起来的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禀受耳聪目明和颖悟机智的天资,具备圣明神奇和文武双全的德性。自从登上帝位以来,下发体恤百姓的诏令,恩惠已经和雨水露珠一个样了;任用敢于指出弊病的臣僚,度量已经和天地一个样了。担心百官不称职,而振作朝政和罢免平庸官员的规定又反复对主管官员的部门予以申饬,圣明得已经和太阳月亮一个样了;鉴于丑恶的少数部族不恭敬顺从,而武备上的防卫又严厉地对将帅们予以督责,威势已经和雷霆一个样了。每天都临朝听政,真是接受百官朝见的典范啊!亲自举行带头从事农耕的大礼,纯属使民众安居乐业的古代所遗留下来的宗旨啊。施治大法和施治人才,一时间同时振扬起来,远至天涯海角的所有百姓,全都伸长脖子在仰望,渴求看到仁德教化的形成已经时间很长了。如今在处理繁忙政务得空儿的时候,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颁发下明晰详审的询问,非常勤勉地只管谋求兴行起教化和实现大治的办法,这能不说是周文王那种盼望大道到来可仍像还没见到的诚意和居安思危的考虑吗?臣下我万幸地赶在了圣明的时代,哪里敢不抒发那仅有一得的愚昧看法来做对答呢?

私下想来,圣帝明王位居在天地的正中,承接君主和师长这双重角色的统系,执定民众和万物的纲纪,拴系着华夏和各个部族的希望,用来在皇宫里运筹并主宰天地四方的东西,所构成的具体措施确实有很多方面,简直无法一项项列举出来。然而全天下的最重要的生存措施,没有能比农耕更为重要的了,而普通百姓的苦衷,是居住在深宫中的天子应当体念的呀!全天下的最重要的防卫措施,没有能比军队建设更为重要的了,而武力防备的修明,是鼎盛时代也不隐讳的呀!应当尽力做好的大事,还有哪一项比这两项更占首位的呢?考察《周礼》,其中有大司徒掌管各地该让民众做好的十二种份内之事,通过农耕来使众百姓步入正轨;又有小司徒统计基层军事编制单位的数目,按照春夏秋冬来教给作战的方法。这正是周公用来确定下国都,划分好田野,考虑到祸患,充分做好防备,辅佐太平大业的举措

啊!因而他嘱告周成王,一方面强调:首先要了解种田耕作的艰难,才会安逸松快;另方面又强调:你要做到过问军队事务,把军队整顿好,沿着大禹治水经过的地方全踏遍。在周成王亲自处理国政的起始阶段,天下的事务纷繁复杂,况且又处在周文王和周武王打下牢固的基础之后,欢乐和美的风气仍然存在;又处在接连好几代都太平兴盛的局面之后,异族找机会入侵的空当尚未出现。可周公一上来却用农耕事务来教诲他,用过问军队事务来训导他,这从一般的心理来看,周公的说法好像跟迂腐迟钝的人差不多。但却恰恰不明白忠臣忧念君主必定要让他防止住向坏的方面发展的苗头,担心大治时代反而给英明的君主造成不利的影响,这也正是臣僚永远辅助君主的用心啊!不想到天下最辛苦的人们,凭什么会享受到天下最安逸的幸福呢?不思考天下最危险的事情,凭什么会保障天下最安宁的状态呢?周公嘱告君主的用意,本来就是这样的。到了周宣王即位时,却不举行天子带头从事农耕的大礼,周朝的治国大道逐渐衰落,武力防备也懈怠松弛,四方部族便交相入侵。这种局势出现后,就更知道周公的话语,确实把祸患考虑得特别深,留下的谋略也确实足够施用啊!哎呀呀!凭借天下的广大,把大治的希望都寄托在君主一个人的身上;凭借永远统治下去的谋划,从眼前看得见的事情做出择取决定来,而辛劳与安逸、平安与危险的起点,是从那一颗心念开始罢了。察识到那起点,官员和法度就同时施展开了,而天下的治理得以形成;看不出那起点,官员和法度就一起发挥不了作用,而天下的治理陷入阻塞的状态。身为君主的人,为什么不对这一点格外留意呢?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在亲自带头从事农耕上有那《藉田谕》,其中列举周朝始祖后稷教百姓种植栽培的化导,叙述周朝播种百谷产生了颂扬的诗篇,这是拿鼓励农耕来给天下做出榜样啊!成祖文皇帝在致力根本上有那《务本训》,其中载述太祖皇帝创建基业的艰难,探究历代兴盛与衰亡的根源,这是用重视根本来教导皇太子啊!至于《祖训》所载录的内容中,忧虑北方少数部族距离边境很近,要在选用将领和训练士兵上来充分做好防备,对妥善地留给后世子孙的谋略反复做叮咛,必定要十分周密啊!这番帝王的话语简直太重

大了,这种帝王的心念简直太专注了!真真是不要贪图享乐的深切意旨和整顿好军队的宏大谋略吧?然而创建基业的君主对民间的想法都完全体会过,所以他们做谋划都特别长远;而守护已有成就的君主不费任何力气就享受到安乐,所以他们保有治绩就常常很疏略。自古以来,有谁能像我们的皇上您那样了解耕作的艰难,懂得整顿好军队呢?可仍然深切地忧虑,超常地核计,虚心地向下面来作询问,强调既定的法典尽管加以推行,可实际政务却还没有对上号;督促鞭策尽管很频繁,可武力防备仍旧很松弛。由此打算谋求粮食充足和军队强大的好办法,用来赶上圣明祖宗的训导。臣下我很愚昧,哪里足以明了这些问题呢?但私下也听到过一些东西,敢不拾取一下来献上吗?

众百姓一天比一天贫困,原因是粮食不够吃啊!而粮食不够吃,原因又是游荡懒惰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多啊!在田野生活的普通百姓,一年到头辛勤耕作,往上对频繁的赋税征收感到交不起,往下对父母儿女的供养感到特吃力,他们由此形成的心情也太值得去怜悯了。可道士、和尚这帮家伙,却到处说这说那,毫不费力地索取丰厚的财利。部队中根本打不了仗的士兵,什么都不干,白白地耗费国家的军饷。身为普通百姓的人,有谁没有那喜好安逸、厌恶劳苦的心思呢?甘愿自己去挨累来供养这群没用的家伙呢?边境上的警报屡屡传到朝廷,原因是丑恶的少数部族十分猖獗啊!而丑恶的少数部族十分猖獗,原因又是华夏地区没有防备的力量啊!少数部族的习性,往往找机会突然起来捣乱,入侵时尽管存有蜂蝎那样歹毒的抢掠用心,可撤退时仍然怀有野狼总往后看的怕遭袭击的忧虑,在当初哪里就敢一下子便逞凶狂呢?可是他们传口哨聚成团攻入时,我们却没有险要的防线阻止住他们;他们抢夺一番离去时,却没有丧失掉一根箭头的忧虑。属于北方的少数部族,对多次入侵又多次得手的甜头很习惯了,还畏惧个什么而不萌生那夺为己有的念头呢?连年以来,用尽百姓的血汗去供养军队,可军队却未曾粮草充足过;牺牲众多士兵的生命,可老百姓却未曾安宁过。这也就难怪使得皇上心中忧虑不止,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了。

替当前内部得到治理做考虑，一定要让游荡懒惰的百姓全部回到农业生产中去，可那实施的办法又哪里必须是用威逼手段去驱赶他们呢？如今全天下的田地，固定数额还和从前一个样，可东南的土地大多是肥田沃土，西北的土地大多是薄田盐碱地，固然可以酌定那合适的做法，来互作补充啊！仿照限定占有田地最高数额的规定，减轻赋税的征收，西汉董仲舒在当年提出的这两条对策就没有可以采用的吗？铲除掉危害粮食生产的因素，延缓收租征税的期限，西汉贤良在当年提出的这两项主张就没有可以照办的吗？看重粮食，轻视金银珠玉，补助耕牛和种子不够用的人家，鼓励农业生产，西汉晁错在当年提出的这两条谋划就没有可以推行的吗？对这些意见细加斟酌，进行调整，照着去做，国家就没有收不上来的赋税了，老百姓也没有不富裕的生计了。那帮人看到从事农耕确有好处，而懒惰混日子没有容身的地方，怎么会不成群结队地自动就回到农业生产上来呢？然而这正属于使百姓富裕的根本所在，屯田与盐法又是弥补它不足之处的措施。臣下我请求用屯田、盐法的原来情况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朝建立初期所定的制度是：设立各个屯田地点，像蚂蚁那样聚集，轮流戍守边境，交替从事耕作；向边塞交纳粮草，换取提盐销盐的凭证，由盐商自己组织人力耕种。这表明士兵原本上也就是农民，商人其实也是农民啊！致力农耕和重视根本的用意，竟详尽细密到这种地步了。到后来，兼并田地的弊病产生了，而原有的屯田亩数仅仅保留下来，又都变成荒芜的地带了。把盐商交纳粮草折合成交纳银两的提议出现了，而储蓄的粮草已经用光了，可又对食盐的预购款项增收税银。于是商人和农民全都困顿，边境的军需物资报告匮乏。这种危害都是由以上原因造成的罢了。因而对地方豪强吞并的田地，应当进行稽察追缴，对荒芜没人种的土地再找人耕种，每年的赋税收入是多是少而不去苛求。这样做，汉朝人所讲的对国家对百姓都有利，或许能够收到十分之八九的效果。盐商在边塞交纳粮草的规定，应当予以恢复，对雇工种田再补交盐税的人也随他们去，粮食的价高价低不去理会。这样做，宋朝人所讲的三种害处，或许能够去除掉其中的一两种了。察验田地归属很详明，世代继承的家业就确定下来；弊

端堵塞住，财利的来源得到拓展，由此设立开荒垦田的制度，加强由政府发放提盐销盐的凭证的管理，同时对私自役使戍边士兵和走私食盐的违法行径，在法令上非常明确地予以重申。这样一来，老百姓就对农耕特感兴趣，而按照保甲制度组建起来的居民点，就都成为屯田的人手了。老百姓就对商屯特感兴趣，而追逐末业的人们就都成为致力根本的力量了。想使老百姓在根本上下气力而不丧失掉本业，这种对策实际上不是没有那促进作用了，还对边境物资的缺乏忧虑个啥劲儿呢？

替当前从外部抵御住敌军做考虑，一定要让入侵内地的少数部族没有一辆车马能够返回去，可那实施的办法又哪里只是侥幸战胜它们呢？少数部族扑向前来，必定会有行动前的动静，也有隐藏起形迹来诈骗我军或改变路线来迷惑敌军的手法，这些动向都是可以预先估计到并觉察出来的呀！首先占据险要的地带，主动地来等待敌军到来，兵法上不是说过地形可以利用它来出击吗？在夜间交战大量地设布烽火与锣鼓，在白天交战大量地张设旌旗，兵法上不是说过像阴物那样使对方难以了解情况吗？避开它们的进攻势头，截击它们懈怠返回的人马，兵法上不是说过首先要针对敌人的气势来痛击吗？根据战机亮出超出常规的打法，准备得特充分来挟制住对方，我军就有必定取胜的谋划，敌军就有必定失败的证象。它们看到迎战一方和入侵一方的形势既然不一样，而胜负的结局也完全不同，又怎能肆无忌惮地跳出来捣乱，欺凌我们华夏地区呢？然而这还只是应对敌人的灵活策略，而训练当地土生土长的部队，更属于充分地做好安排部署的事项啊！臣下我请求用原来的兵制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朝建立初期所定的制度是：各个卫所犬牙交错地屹立在各地，由九处军事重镇在北方构成的边防线连结成一体；骑兵与步兵彼此补充，前、后、中、左、右五军相互起作用。每一地分别构成守卫，每个人各自进行战斗。击退敌军和抵御入侵的战略布署，竟周详精细到这种程度了。如今设布要塞，划定防区，可敌军来到后却不抵抗，什么时候曾经看到他们真有那守卫的实效呢？登上城墙，两军对垒，可敌人撤走却不去追击，什么时候曾经听说他们真有出战的美誉呢？当

地土生土长的部队不训练,只依仗从别处调遣军队来驻守,这种弊病实际上恰恰造成了以上的情形啊!因此征发士兵上万人,比不上召募当地士兵几千人,这正属于唐朝韩愈所说的征兵的严重弊病啊!如今调遣外地部队的主张,就不能不把它废弃吗?将百姓编入军队组织,进行训练检阅,在本辖区内练成精兵,这是从前唐朝的李抱真已经施行过的了,如今训练当地土生土长的部队的建议,就不能不把它付诸实施吗?外地军队不调遣,军饷就大大节省下来了;当地土生土长的部队得到训练,士气就倍增了。由此多次按训练检阅的制度搞下去,提倡勇猛果敢的风气,而斗志消沉自行怯战和卖出死力真想冲杀的,完全按照斩首和封赏的规定严明地予以处置。这样一来,进击就可以战斗,而攻破精锐的敌军,摧毁坚固的阵地,挺立在不败的位置上。撤退就可以防守,而投掷石块,练习跳跃,积蓄好战前施展的勇力。要想采取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彻底击垮对方,使少数部族不敢再趁机捣乱,这种对策实际上确有根据地可以作为根本了,还对征调的部队依赖个啥劲儿呢?尽管如此,边境的军饷报告匮乏已经时间很长了,北方少数部族自不量力也不是一天半天了。负责国家财政的官员抱着算盘在精打细算,发誓要安定边疆的人自动请战而昂奋不止,清查逃兵的使者执持国法来到各地,独挡一面的臣僚手握军权连成一片,可是今天提出的建议,明天就批复不予采用;今天筹划进击,明天又谋求防守,而最终却不能使百姓的财利兴旺起来,不能宣播仁德和威势,用来辅助朝廷大计的万分之一。这难道是财利怎么办也兴旺不了,军队确实不能使用吗?恐怕一定有那原因了。

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中有这样的话:机宜和关键所在,还没能振扬施行开来,所以就官员们很少能发挥出实际作用,功绩难以命令谁必须建成。这几句话真是恳切凄恻地谋求大治的心怀和透彻地看到万里以外的眼光啊!臣下我试用当前的机宜所在,为陛下陈述一番。大致上说来,天下没有永远都不产生弊端的制度,但善于补救弊端的决定因素寄寓在人那里;天下拥有可以任用的人才,但善于任用人才的决定因素寄寓在君主那里。正在制度刚定立起来的时候,哪里有不完善的呢?可日益滑向弊端丛生的原因,不是从频繁变动造成

危害来开始,就是从贪图安逸荒废时日而陷入委靡不振来开始,成年累月地延续下去,积弊就越来越深重。在此过程中,需要沿袭变革和减损增益的恰切做法,需要蹦紧放松和收缩放开的具体运作,恐怕存在着不容易分辨清的地方。况且地形不同,事情的筹划处置就不一样;短兵相接时,战机就会发生变化。成功与失败互相包含,有利与有害彼此浮动。如果不是善于任用人才来解决它,就没有能够渡过难关去的呀!因而目前的天下局势,打个比方来说,就像富裕人家的子孙把资财耗光了,交付给善于掌理家政的人替他修补,再滋生增殖,还能够恢复他父辈祖父辈的原状。再打个比方来说,又像瘦弱的病人,精神气儿和漂亮劲儿已经彻底消失了,听凭高明的医师来培植他的命脉,增强他的脉内气和脉外气的运行能力,这才会使衰颓变成兴旺,倒在地上再让他重新站起来,不陷入危重死亡的忧虑中。

任用人才的原则与方法,关系到天下命运如何的地方简直太紧要了。可当今任用人才,却有令人感慨的情况。看重在朝廷做官却轻视到地方任职,而晋代人尽快升为高官的念头在当今就重新冒出来了;论资排辈依次升迁,而像成串的鱼儿紧相游入的讥诮又陷入古代那种状况了。贤能而建立起卓著功绩的人,却因高傲不合群而受到陷害,这纯属十分忠诚的隋朝刘方那样的人却得不到考核优秀的结果啊!才干和勇力足可任用的人,却因微小的过失而终身被斥退,这纯属犯有罪过的唐朝李靖那样的人物得不到重用啊!地方官职不长久地让一个人充任,有的两年就调离,有的一年内换两个地方,即使真有七年以内能使百姓富足或三年以内能让民众懂得道义的人,通过什么会收到任用他们的最大成效呢?军情要按朝廷的诏书办,而一采取什么行动必定要经过奏请,一奏请就拖延很长的时间,即使真有老练稳重像西汉的赵充国、善于用兵像战国的廉颇和李牧那样的人,从哪里会施展出他们的战术呢?负责运送物资的部门和省级各个机构,拿屯田和盐政做理由来设置的哪有个什么限制,可又设立总理的职务来统辖它们,必定造成各个机构有很多荒废政务的官员,可以不验核那实际吗?兵备道和提督官,朝廷把防守边境的任务交付给他的人哪有个什么限制,可又派遣巡视边境的大臣去督察他们,这正表明

朝廷没有平时做好督察工作的办法，可以不究明那根源吗？增置官吏，本来是为民众着想的。可一名官员派出去，却有百户人家来提供各种享用物品；一名将领派出去，却有百名役夫前呼后拥。他们所白白耗费和搅得人们精疲力竭的东西，全都是当今百姓的血汗和国家的物力啊！然而任用却没获取到合适的人选，以及任用却没获取到恰切的方法，那在军队建设和百姓吃穿的重大问题的筹措上还有什么值得依赖的呢？又为什么乱糟糟地让这帮家伙去掌权呢？

[illegible]下我希望陛下参取社会舆论的一致评价，执持独自做出决断的洞[illegible]，从众臣僚中做选择，恰如其分地任用他们。上自省级要员，下[illegible]太守县令，必定是那确能体会陛下重视农耕的心意的人。从朝内兵部和五军都督府，到边区总督和巡抚，必定是那确能体会陛下整顿好军队的心意的人。均衡在京师做官和在地方任职的权位，使在偏远地区的官员很高兴自觉效力；打破论资排辈的常规，使地位低下的官员知道自勉自励。在教化的通常做法之外去考核政绩，看重名声不如看重实效；在有罪被罢免的官员中提拔具有才能的人，使用立有功劳的人不如使用犯过罪过的人。功绩建立起来了，就提高他的品级和待遇；功绩尚未建立起来，就进一步对他提出要求，使他安心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拿具体期限来验核，这也就可以了。一时间花去了大笔的官银，可却取得了长久安宁的效果，就不把这说成是耗费朝廷资财；一次动用了大量的民力，可却长久地不再动用民力了，就不把这说成是残暴对待百姓。使他有权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做出处理，不拿各种成文的规定来约束他，这也就可以了。某人被称为廉洁的官吏，一定要考查他廉洁的做法到底怎么样；某人被称为能干的官吏，一定要考查他能干的情形到底怎么样。这表明对照验核的办法是应当留意的，而荒废政务的人该有所畏惧了吧？立有功劳，一定进行封赏，而对虚报功劳的人予以惩罚，决不宽恕；犯有罪过，一定进行惩办，而对遇事设法躲避的人予以责罚，更为厉害。这表明振作整饬的法规是应当推行开的，而督察还会有不全面的吗？圣明的决断从皇上的内心中做出，而精神贯通到整个宇宙；罢免和提升官员在朝廷上做得十分公正，而激励和惩戒显示到全国以内。使文武百官和大小

臣僚全都彻底改变想法，唯恐在献上忠诚和拿出力量上落在后面。这就叫做凭借天下的施治人才，去确立起天下的施治大法；依据天下的重要时机，去筹划天下的重大事宜。而陛下用来亲自带头从事耕作，广泛求取抵御外敌的深远谋略，就有不只是粉饰一下治理而越发显得走形式的东西了。由此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可以充足，不向百姓增加赋税而用项自然就够了。国家的威势也可以振扬起来，不经过战争而四方部族就归服了。用来弘扬太祖皇帝和成祖皇帝的功业并追比周朝大治景象的举措，哪里会有超出这个范围以外的呢？

尽管如此，这还是辅政大臣们的职责所在，不足以引起陛下的思虑呀！可臣下我仍然怀有植根本原又极尽本原的说法，敢为陛下冒昧地讲述一下。私下曾对《无逸》的主要义旨反复进行体悟，全在"更加恭谨地修明德行"这句话上；而《立政》所作的陈述，即使对掌管王室服装的缀衣和负责卫护的虎贲这类官员，也是用懂得忧虑来做告诫。从这种恭敬谨慎又戒惧忧虑的心念出发，才是知道种田的艰难和整顿好军队的根本所在，对此用力气就不能不特充沛啊！况且君主那一心念的隐微之处，各种欲望都扑向它，有一个念头不恭谨，说人坏话和当面献媚的人就得以介入到里面，北宋奸相蔡京那类利用《豫卦》、《丰卦》而鼓吹大肆挥霍的说法就得以实现他们的欺哄本事，而歌舞美色和金玉财利，四处游玩和沉溺享乐，就会同时扑上来而冲击那纯正的心念了，又哪里能懂得种田耕作的艰难和军队应去整顿好呢？臣下我祝愿陛下经常保持住这一心念，使自己的德行每天都有提高，执定恭敬的态度来检查约束住它，讲论学问来涵养培植好它，亲近贤人君子来维护并持守住它。深知由隐微扩展到明显的道理，具有施行宽仁安宁的国政而达到光明的那种诚意；慎重对待坚持到最后就和起初时一个样，具有只想谋求使国家长久存在下去的意念。百姓尽管安定了，仍旧像他们受到伤害那样来看待他们；外部尽管平静了，仍旧不忘掉异族入侵的忧虑。在长长的墙壁上常看《祖训》，把已有的制度和事例作为借鉴而不出现过失。这样一来，国内国外没有祸患的美好景象和国家永远存在下去的福庆，恰恰依赖这一条了。臣下我作为来自民间的一名臣子，不懂得什么是忌讳，简直恐惧

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赵志皋　殿试对策

赵志皋(1524～1601)　字汝迈，号濒阳，兰溪(今属浙江)人。隆庆二年(1568)探花，时年45岁。迄神宗朝累官礼部尚书，入参机务。极力疏请罢废矿税等大政，归乡后四年内仍上奏章八十余道。万历二十九年卒，享年78岁。撰有《灵洞山房集》、《四游稿》、《内阁奏题稿》等。

臣对：臣闻帝王之继天以御极也，固必有经天下之宏规，尤必有宰天下之要务。夫人君以一身任天下之重，则内而民生之当厚，外而民患之当防，皆为天下之宏规，而所以持之于上也，不可不定其志。然不能以一身理天下之烦，则选贤以治内，因能以捍外，皆为天下之要务，而所以理之于下也，不可不得其人。定其志以扩宏规，则内无不安，外无不攘，有并包兼覆之度，而天下之政体以立。得其人以急要务，则德无不被，威无不振，有旬宣屏翰之治，而天下之治功以成。然则上承天命，而使天下各得其所者，固人君图治之心；上体君心，而使天下各就于理者，乃人臣分治之责。得其道，则天下之治可不劳而成；失其道，则天下之治日见其弊矣。此自古为治之要道，而于今日之务尤所当慎者也。

钦惟皇帝陛下，聪明天纵，仁孝夙成，推诚爱民，励精图治。中外人民莫不翘首企足，以思见德化之成矣。值今临御之二年，首举策士之大典，恭己临轩，虚心赐问，拳拳于务本重农、治兵修备之术，此有以仰窥陛下求治汲汲之心矣。臣窃思之，陛下今日之问，是陛下策士之始也；微臣今日之对，是人臣告君之始也。于告君之始，而不能披沥罄竭以尽其诚，则于他日立朝之际，而凡可以自便其身者，将无所不至矣。臣不敢也，谨请因明问而敬陈之。

臣闻治天下之道，有天下之大本，有天下之大防。何谓本？农事是也。何谓防？兵戎是也。盖自民生，不可一日失其养也，是故重之

农,以裕民之养焉。有井牧之制,有树艺之教,有劝相之恩,有补助之政,凡可以使民尽力南亩而不妨力穑之勤者,无不为也。自民生,不可一日不安其居也,是故治之兵,以固民之防焉。有卒伍之陈,有车骑之列,有简阅之规,有练习之法,凡可以使民日闲武事而豫其备御之术者,无不为也。盖农事不重,则内无以成顺治之功;武备不修,则外无以振威严之绩。是以圣王慎之,至于周而益加详焉。成王承文、武之后,家裕人足,而乐利之深仁正洽;文恬武熙,而永清之遗化犹存。周公相之,于其初亲大政也,《无逸》一篇告以稼穑艰难之道,《立政》一书陈以克诘戎兵之谟,是非过虑也。盖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而足食足兵,固王政之首务尔。周治之隆,有由然哉!三代而下,无暇论矣。

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念天子藉田千亩,所以供粢盛为天下先也,于洪武初年诏示来春举行耕藉之礼,特宣谕廷臣引后稷树艺之咏,及成王之所以颂播百谷者,以致劝教之意。其虑急民依者,何重也!成祖文皇帝恢拓洪基,念皇太孙生长深宫,不知稼穑之艰难也,于巡幸北京使周行村落,历观农桑劳苦之事,特训以《务本》,引太祖创业之艰,及往古得失可为鉴戒者,以致饬励之意。其志笃民生者,何切也!及观《祖训》,以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不可无故兴兵。又以西北边境密迩胡戎,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其所以为居安忘备之戒者,又何其计深而虑远也!夫重农以安内,而使国本之日固;治兵以攘外,而使国势之日尊。此其所以先后一心,创守一道,远迈乎文、武之盛,而为万世圣子神孙之所当法守矣。

恭惟陛下御极,首发德音,与民更始,屡布善政,与民化裁。如节用而爱人,遇灾而省己。临朝遵昧爽之规,纳谏存包荒之量。开经筵以求治理,幸太学以隆师儒。蠲逋负之租,罢冗费之征,而厚下之恩著;申赦宥之条,辨冤抑之狱,而钦恤之仁孚。宗社无疆之休,太平有象之征,端有在矣。迩者躬藉南郊,重大本以示天下;屡敕边吏,求长策以固疆圉。盖心二祖之心,而觐扬其光烈,固不啻庶几乎知艰诘戎已也。乃圣问以彝典虽举而实政未孚,督策虽勤而武备犹弛,日图安攘之策,以求机要之所在,且令臣等具便民益国者以闻。臣草茅下

贱，何足以明当世之务？然亦目击时弊，不敢不抒情素。

窃闻国初计亩定赋，民皆力耕；而又广屯田，开盐额，使众商慕加倍之利，于沿边腴地，募人垦种，图上本色，以便支盐。故国用饶而边储裕，以人皆务实惠也。今浮惰益众，田皆污莱，岂农事终不可举耶？由奉行陛下之德意者，不得其人耳。夫畎亩小民，沾体涂足，竭终岁之力，获升合之需，不足以供国赋，充私养，已嗷然丧其乐生之心，而贪吏又肆为侵牟，征派百出，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使鸡犬不得宁焉，奈之何诓民乐而为农也？若夫屯盐，本相为表里，自折色例行，商人不得以种田上本色为己业，而各屯亦因之以抛荒，于是圣祖良法尽坏，而边储往往告乏者，非一日矣。

故欲务本重农，莫若先守令，使布列庶位者皆龚、黄其人焉，而又限久任之法，严劝惩之典。巡行阡陌者必劳来之有加，荒弃田土者必谴责之不贷。彼将思曰：天子与我以是任者，冀我能安民也，视小民之失所若疾痛之在身，不思所以兴其利而去其害乎？不然，虽日下劝农之诏，亦以为虚文而已，民之不耕不知也，民之不获不知也。间有勉而行之者，亦所谓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者，于民事有何补焉？甚矣，守令之为要也。守令得人，而又选大臣以抚绥之，使守令得以行其志，则天下无不耕之民，可以使之力本而不失其业矣。

至于屯田之制，中盐之利，久废成法而为商农之困者，安可不复耶？盖田不屯，则用农以饷兵者，终不得宁轨；盐不中，则输粟以馈边者，未可以息肩。故必于屯政之当修者修之，见存之田履亩正界，而不使干没于豪右；失耕之业督军力作，而不使委弃于屯营。则卤莽之地，皆为膏腴，而可以省转输之劳矣。于盐课之当举者举之，复开中之规，而势家揽中者，置之以法而不贷；申常股之制，而私贩横行者，严之以禁而不容。则山泽之利，不致弃遗，而可以为飞挽之助矣。此培国家之元气者，所以在得人也。苟非其人，则上下狃于因循，而公私遂为之困诎，欲安内其可得乎？

国初设卫立营，兵皆习战，而又时教阅，严节制，使尺籍怀素养之思，于沿边墩台，乘时哨探，谨传声息，以便戍守。故兵威振而烽火息，以人皆务实绩也。今丑虏匪茹，警报岁闻，岂虏终不可创耶？以布

陛下之天威者，不得其人耳。夫镇边戍守，披霜触雾，竭七尺之躯，枕干戈之役，不足以养父母，畜妻子，已悄然夺其敌忾之心，而倩帅又恣为掊克，役占相望，使耳不闻乎金鼓，目不见乎旌旗，故烽堠沦于湮废焉，奈之何制虏之不南窥也？若夫战守，本相为依倚，自本镇势弱，当事者不得不远调客兵为策应，而他镇亦因之以空虚，于是圣祖洪算尽废，而虏患在在滋蔓者，非一方矣。

故欲治兵修备，莫若先将帅，使分司阃外者皆颇、牧其人焉，而又假便宜之权，信赏罚之令。有罪必诛也，毋挠以中制之私；有功必录也，毋拘以文法之细。彼将思曰：天子畀我以是寄者，冀我能御狄也，视边鄙之不宁真若门庭之失守，不思所以备其患而峻其防乎？不然，虽日廑防边之虑，要亦以为故事而已。将之玩兵者如故也，兵之畏寇者如故也。间有勇而为之者，亦所谓随时补塞，而取办于文具焉者，于边事有何补耶？甚矣，将帅之为要也。将帅得人，而又选大臣以镇辑之，使将帅得以效其力，则天下无不练之兵，可以使之御虏而作其气矣。

至于战守之策，主客之兵，各持异议而为道旁之计者，安可不决耶？盖战阵无勇，则固守愈疏；主兵不练，则客兵难撤。故必取行伍而鼓舞之，足其衣粮，精其器械，习其骑射，使有投石超距之勇，而力可以攻，及遇敌之至也，据险阻以邀击之，则战守在我，而自不制于人矣。募土兵而稽阅之，厚其犒劳，比其纪律，恤其身家，使有利害迫切之情，而志求自捍，每遇寇之人也，塞要害以共拒之，则主兵强盛，而客兵自可罢矣。此张国家之神气者，所以在得人也。苟非其人，则大小安于文饰，而边境遂为之败坏，欲攘外其可得乎？

是知重农桑，兴屯盐，明战守，练土著，安攘贵于兼举，诚天下之宏规，不可不图者也。然安内由于慎守令，攘外由于择将帅，明断贵于并行，此又天下之要务，不可不讲者也。克振举之，以天下之治人，行天下之治法；运天下之大机，弘天下之大业，则陛下所谓人罕实用、功难责成者，皆不足虑。而我皇祖垂训贻谋之深意，庶可以体之矣。

虽然，是道也又岂可责之人哉？在陛下一心而已。昔孟轲论定国，以为人不足适，政不足间，而惟在于君心之正。董仲舒推四方远

近之莫敢不正，而本之曰：正君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是君心者，万化之原也。故古昔隆盛，吏非皆良，将非皆贤也，由人君忧勤惕励于其上，内即田功，外严武备，措天下于安富缉宁之地，则虽不期将吏之得人，而人自感发兴起矣。爰及后世，吏非皆不肖，将非皆庸懦也，由人君宴安怠惰于其上，罔恤民艰，罔虞外患，置田里边鄙于不闻，则虽欲将吏之得人，而人亦不能振作以有为矣。

转移之机，在上不在下；责成之本，在君不在臣。陛下诚以安内为心而宵旰忧勤，不能以自已；以攘外为念而昼夜图惟，不容以自释。一日之民务未登，一日之隐忧未忘也，孜孜焉必求循吏，如古召见亲问，玺书增秩，期于安民而后已，则凡为守令者，孰敢不上体是心而勉图职业也哉？一日之边防未固，一日之远忧未舒也，汲汲焉必择贤将，如古推毂分阃，拊髀忧思，期至克敌而后已，则凡为将帅者，孰敢不仰承是意而砥砺功能也哉？不然，居九重之上而忘情于民事之微，处深宫之中而肆志于外宁之后，乃欲责守令将帅以实用，以成功，臣未见其能易从矣。

伏愿陛下以是心为主而常惕焉，毋忽于治，毋忘于久，讲学以明之，主敬以存之，亲近君子以维持之。凡声色之私，货利之诱，游畋之乐，玩好之供，足以荡其心者，皆禁止而不为动焉，则君心一而天下之治成矣。昔宋儒张栻以《诗》之《七月》、《书》之《无逸》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而周公之告成王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是心也，又安内攘外之本也。臣不佞，敢以为今日献。干冒天威，无任战兢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承接皇天来登上最高宝座，原本上就必定有那治理天下的宏大筹划，更必定有那主宰天下的切要事宜。君主凭借一个人承担起天下的重托，于是在内部应当使百姓的生活很富裕，在外部应当对百姓的祸患有防备，这都属于天下的宏大筹划，而用来在上面把它操持住的东西，就不能不定立起那心志。然而又根本做不到凭借自己一个人就料理好天下的众多事项，于是选取贤才来治理内部，借助能人来捍卫外部，这都属于天下的切要事

宜,而用来在下面付诸实施的东西,就不能不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定立起心志,去扩展那宏大的筹划,就会在内部没有不安定的现象,在外部没有不把它驱逐的情况,拥有天地包容和覆盖一切的那样的器度,天下的政治格局就确立起来了。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去把切要事宜首先处理好,仁德就没有延布不到的地方,威势也没有播扬不到的区域,构成普遍宣导和严密防卫的施治状态,天下的大治功业就建立起来了。既然如此,那么往上承奉皇天的命令,使天下人各得其所,固然在于君主那种谋求大治的心念;而往上体会君主的心念,使天下事务各自步入治理的轨道,正是臣僚分担大治的责任。获取了这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天下的治理就能够不操劳便形成;丧失掉这种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天下的治理就会日益显现出那衰败来了。这正是自古以来施行治理的切要原则与方法,更是在当今要下力量解决的事务中尤应慎重对待的东西呀!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耳聪目明的禀性被皇天所赋予,仁德孝敬从一生下来就完全具备,宣明诚意,爱护民众,振奋精神,谋求大治。境内境外的百姓没有谁不高高抬头、踮起脚尖来盼望看到仁德化导的形成了。到目前登上帝位的第二个年头,首次举行策问读书人的重大活动,自身保持恭敬态度,莅临考场,虚心地颁赐下策问,对致力根本、重视农耕和整顿军队、修明武备的具体对策深为关注,从这里完全确有根据地可以看出陛下十分迫切地谋求大治的那种心念了。臣下我私下做考虑,感到陛下今日的策问,正属于陛下策问读书人的头一回,而卑贱的臣下我在今日的对答,正是做为臣子的人劝告君主的起始时刻啊!在劝告君主的起始时刻,却不能披肝沥胆又毫无保留地竭尽他那忠诚,就会日后在朝廷供职的时候,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就什么都能干出来了。臣下我决不敢这样做,恭谨地请求按照圣明策问的内容来虔敬地陈述它们。

臣下我听说,治理天下的对策,既有属于天下最为根本的方面,又有属于天下极应防备的方面。根本是指什么说的呢?这就是农业生产啊!防备是指什么说的呢?这就是军队建设啊!因为百姓从一生下来,决不能有一天失去对他们的养育啊!因此重视农耕,致使对百

姓的养育非常宽裕，就有平地划分成井田、低洼地划分成牧田的土地分配制度，就有种植栽培技术的传授，就有鼓励和帮助的恩惠，就有补给救助的政事，凡是可以使民众在农业生产上使出全部力量而不妨害辛勤耕作的办法，没有不实行的呀！百姓从一生下来，决不能有一天生活居住不安定啊！因此整顿好军队，致使对民众的防护很稳固，就有按基层军事编制单位摆设开来的阵式，就有战车骑兵的队列，就有挑选和检阅的制度，就有训练演习的方法，凡是可以使民众平常熟悉作战事项而预先就练好防备技巧的措施，没有不实行的呀！这是因为农业生产如果不重视，在内部就没办法形成人们都顺从治理的功业；武力防备如果得不到修明，在外部就没办法振扬起威慑天下的治绩。因此圣明的帝王对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特加小心，到了周朝就更为留意了。周成王承接在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后面，当时家家宽裕，人人富足，而随顺百姓感到高兴、觉得有利的事情所施布的深厚仁惠正深入人心，文臣安静又武将振奋，而所遗留下来的天下永久清平的化导依然存在。周公辅佐他，在他开始亲自执掌朝廷大政的时候，《无逸》这篇文章专用种田耕作特艰难的道理来告诫他，《立政》这篇文章又拿整顿好军队的谋略来献给他。这决不是担心得太过分了呀！因为忠臣爱护自己的君主，必定要防止君主逐渐滑向衰落的东西，而使百姓吃穿富足和军队强盛，原本就是称王天下的国政首先要办好的事情。周朝治理所达到的隆盛状态，确实是有原由才变成那样的了！夏商周以后的各个朝代，也就没时间去论述它们了。

恭敬地想来，我朝太祖高皇帝首先再造华夏，考虑到天子在千亩王田上带头从事耕作，属于献上丰盛精洁的祭祀物品而给天下做出榜样来的大事，就在洪武初年下达诏令，谕示到第二年春季举行天子带头从事耕作的大礼，特意命令大臣们援引周朝始祖后稷传授种植栽培技术的诗篇，以及周成王用来搞好粮食生产的颂歌，借以表达那鼓励并指导农耕的用意。太祖忧念并为百姓的疾苦感到着急的心情，那是多么地深重啊！成祖文皇帝扩展宏大的基业，考虑到皇太孙生长在深宫中，不知道种田耕作的艰难，在视察北京时就让他走遍各个村落，一桩桩观看种田植桑的劳苦活计，特地写成《务本训》来训导

他，其中援引太祖皇帝创建基业的艰难以及古代得失可以引为鉴戒的事例，借以表达那严戒和激励的用意。成祖从内心里关注民众生计的意念，又是多么地深切啊！等到再观阅《祖训》，其中鉴于四方部族全都被高山大海所阻隔，强调决不能无故就对它们用兵。又鉴于西北边境同蒙古部族距离最近，强调一定要选任将帅，训练军队，经常小心地防备它们。太祖用来给处在太平环境中却忘记武备做出的训戒，又是多么地计虑深远啊！重视农耕来安定住内部，使国家的根基一天比一天巩固；整顿好军队来驱逐外敌，使国家的威势一天比一天加重。这正是太祖和成祖先后在心念上完全相同，创业与守成又在大道上完全相同，远远超过周文王与周武王的盛大治绩，而被世世代代的圣明子孙应当效法和守持的地方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陛下登上帝位，第一件事就是颁发仁德的圣旨，与百姓共同从头做起，多次施布美好的政事，与百姓一起替天地进行化育和裁制。例如节省宫庭开支来爱护民众，遇到天灾就反省自己。临朝听政，遵守天不亮就来到的常规；采纳规谏的言论，具有包容一切的度量。安排经史讲授来探求治国的道理，驾临国家最高学府来尊崇师长和儒士。免除各地长久拖欠的赋税，取消各种不必要的费用的征收，而优厚地对待下面百姓的恩情已经非常显著了。申明赦免和宽恕的法律条款，审清蒙受冤枉的案件，而慎重对待刑罚并体恤罪犯处境的仁德已经特别符合民心了。国家永远存在下去的福庆和太平显出征兆的景象，确实是有既定的运数了。近来又在京师南郊举行亲自带头从事耕作的大礼，把重视根本的意向亮给天下看；多次告诫边疆地区的官吏，求取抵御外敌的长远谋略，用来巩固住国境的守护。这是把太祖皇帝和成祖皇帝的心念作为自己的心念，发扬光大他们的丰功伟绩，大致上已经和周成王懂得种田的艰难、注意整顿好军队没有什么两样了。可皇上的圣明策问却鉴于既定的法典尽管加以推行，可实际政务还没有对上号；督促鞭策尽管很频繁，可武力防备仍旧很松弛，每天都在谋求安定住内部和抵御住外敌的对策，用来求取机宜和关键所在，而且命令臣下我等人详尽陈述能使百姓感到便利又对国家很有益处的建议，奏报上

来。臣下我是一名来自民间的地位低下的读书人，哪里足以通晓当今的事务呢?然而也亲眼看到了目前存在的弊病，不敢不把内心的长久想法抒发出来。

臣下我私下听说，我朝在建立初期，按照土地亩数确定赋税税额，老百姓全都大力从事农耕；同时又大范围屯田，发放提盐销盐的凭证，使盐商们贪图成倍的财利，就在边境一带土质肥沃的地方雇工开垦耕种，乐意交纳粮草，以便提盐销盐。因此国家用度很充足，边境储备也很宽裕，这是由人们全都追求实惠所造成的呀!如今游荡懒惰的人越来越多，田地全都荒芜了，这难道真是农业生产终竟也发展不起来吗?其实全因为贯彻落实陛下仁德用意的官员，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罢了。在土地上耕作的普通百姓，全身流汗又一脚泥巴，用尽整年的力量，获取到百八十斤的粮食，不够用来交纳法定的赋税和养活一家人，已经拿起碗筷就失去了很高兴再活下去的心思了。而贪婪凶残的官吏又大肆进行侵吞，征收摊派一桩接一桩，既在东面和西面狂呼乱叫快交税，又在南面和北面窜来窜去催逼款，使鸡犬都得不到安生，这可怎么能欺哄百姓而使他们乐意从事农业生产呢?至于屯田和盐政，原本是彼此补充的，自从把交纳粮草折合成交纳银两的规定实行起来，盐商没办法将耕种田地交纳粮草作为自己的本业，而各个屯田点也随后抛荒了，于是圣明祖宗的美好制度全部遭到破坏，而边境储备经常禀告匮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因此要想致力根本，重视农耕，没有比选好太守县令更占首位的了。使在各处供职的地方官全都是西汉龚遂、黄霸那样的人选，同时又执行好长期在一地任职的制度，强化奖励和惩罚的法令。对在田间视察的太守县令必定异乎寻常地予以慰劳和鼓励，对荒废土地的太守县令必定谴告责罚，决不宽恕。他们就会思索说：天子把这一官职授付给我，是希望我能够安定住百姓啊!应当把百姓流离失所看成是疾病的折磨就落在我身上，能不考虑兴行起他们的财利又去除掉他们的祸害的办法吗?朝廷不这样去做，即使每天都下达鼓励农耕的诏书，下面也把它当成一纸空文罢了，恶化到根本不知

道民众是否种地，根本不了解百姓是否打下了粮食。偶尔闪出个勉力落实诏书要求的人，也属于所谓喜好做出多种规定，看上去像是特别怜悯百姓可最终却给他们带来祸害的人，这对百姓的事情又有什么补益呢?太守县令的选任占据首位，简直是太突出了!太守县令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同时又选派大臣去安抚各地，使太守县令得以实行自己的筹划，天下就没有不从事农耕的百姓了，可以使他们在根本上下气力而不失去自己的本业了。

至于屯田的制度和交纳粮草换取提盐销盐凭证带来的好处，已经长期废止原有的做法却给盐商和农民造成困乏的东西，怎么能不恢复过来呢?田地不派人屯种，拿农业收入来供养士兵的费用，始终就没办法步入正轨；提盐销盐的权利不用交纳粮草来换取，运送军用物资来满足边防需要的行动，就不能够消停下来。所以要对屯田政务应该整顿好的事项一定整顿好它。现仍留存的田地，要丈量亩数，确定归属，不让这些田地被地方豪强白白地据为己有。已经没人去耕种的原归个人世代占有的田地，要督促军士大力去耕作，不让这些田地被驻军白白地丢弃。这样一来，盐碱荒芜的土地，就都变成良田，可以免除掉转运粮草的劳苦了。对盐税应当推行开的事宜一定要把它推行开，恢复交纳粮草来换取提盐销盐凭证的制度，而有权势的人家把持折算率的人，就按国法予以惩办，决不宽恕。重申按法定数额销盐的规定，而到处走私贩运的人，就按禁令予以严惩，决不宽容。这样一来，山峦湖泽的出产，不致被遗弃，可以成为长途运送军需物资的帮助了。这是培植国家元气的主要方面，用来做好它们的决定因素在于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啊!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上下就会习惯于照老样子办事，公家和私人于是由此而困乏拮据，想要安定住内部，这能做得到吗?

我朝在建立初期，设置各地卫所，组建京师三大营，士兵全都熟悉战斗，同时又经常进行训练检阅，强化上下级的关系，使编入军籍的人怀有一向得到国家供养的意念。在边境一带的军事据点上，利用时机放哨刺探，准确地传达敌方的动静，以便卫戍守护。因此军队的威势得到振扬，战争得到止息，这是由人们全都致力于

实际的功绩所造成的呀!如今丑恶的少数部族不自量力，入侵的警报年年都传来，这难道真是少数部族终竟也击垮不了它们吗?其实全因为播扬陛下的巨大威势的官员，没有获取到合适的人选罢了。在边境上镇守卫戍的士兵，冒着寒霜，顶着大雾，献出七尺高的身躯，枕着兵器去迎敌，还不够用来赡养父母，养活妻子儿女，已经在无形中丧失了同仇敌忾的斗志，而通过重金行贿取得将帅职位的人，又任意克扣军饷，役使士兵替自己打杂一排又一排，使他们耳朵听不到战鼓声，眼睛看不到旌旗飘，因而座座烽火台沦入到废弃的地步，这可怎么能挟制住少数部族而不使它们窥视内地呢?至于进击和防守，原本是相互依存的。自从本镇威势减弱，负责镇守的人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调集别处的军队作为策应，而其他镇也随后变得兵力空虚，于是圣明祖宗的长远谋划全部落空，而少数部族造成的祸患处处在蔓延，并不只是一个地方了。

因此要想整顿好军队，修明武备，没有比选好将帅更占首位的了。使分别独挡一面的人全都是战国廉颇、李牧那样的人选，同时又赋予给根据情况灵活处置的权力，严格执行封赏和惩罚的条例。犯下罪过，必定予以斩杀，不用偏袒的朝廷诏书来进行干预；立有功劳，必定予以提升，不用繁细的条文来进行限制。他们就会思索说：天子把这一重任交付给我，是希望我能够抵御住少数部族啊!应当把边境不安宁看成是真像自家门庭失去了守护，能不考虑防备祸患和加强防卫的措施吗?朝廷不这样去做，即使每天都为边防忧虑不止，总之下面也把它作为例行公事罢了，将帅还像从前一样不把军队当回事儿，士兵还像从前一样畏惧入侵者。偶尔闪出个奋勇去部署的人，也属于所谓随时弥补堵塞一下、从表面形式上做做样子的人，这对边防事务又有什么补益呢?将帅的选任占据首位，简直是太突出了!将帅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同时又选派大臣去镇抚边区，使将帅得以献出自己的力量，天下就没有不得到训练的士兵了，可以使他们抗击少数部族而振奋起士气了。

至于进击和防守的计策，当地原有的部队和别处调入的部队哪个更好，各自执持不同的主张而做道旁筑室、三年不成的这类筹划

的人，怎么可以不赶快决定下来呢?对阵交锋却没有勇气，死死防守也就越发疏忽；当地原有的部队不训练好，别处调来的部队就很难撤走。因此一定要选取行伍出身的人而鼓舞他们，使他们的军衣军粮很充足，使他们的武器装备很精良，使他们熟练掌握骑马射箭的本领，使他们具有奋勇杀敌的勇气，在力量上可以进攻，等到遇上敌军到来的时候，占据险要地形去截击它们。这样一来，进击或防守的主动权都在我方这里，自然就不被对方所挟制了。召募当地的士兵而稽核检阅他们，给他们优厚的犒奖和慰劳，检查他们的纪律，体恤他们的性命和家里人，使他们涌生出利害就在自己身边的想法，而立志谋求自卫，每当遇到敌军入侵的时候，堵塞住要害地带去共同抗击它们。这样一来，当地的部队就会很强盛，而外地调来的部队自然就可以不用调动了。这是张布国家神气的主要方面，用来做好它们的决定因素在于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啊!如果不是合适的人选，大小官员就会只做表面文章，边境于是由此而破败毁坏，想要抵御住外敌，这能做得到吗?

由此可知，重视农耕桑蚕，兴行起屯田和盐政，闹清楚进击与防守，训练好生活在当地的士兵，安定内部与抵御外敌贵在同时施行开来，这的确是天下的宏大筹划而决不能不去考虑的问题啊!然而安定住内部，源于对太守县令的慎重选派；抵御住外敌、源于对将帅的择取委任。明察与独断贵在结合起来施用，这又是天下的切要事宜而决不能不去讲求的东西啊!能够两方面都振兴起来，凭借天下的施治人才去贯彻执行天下的施治大法，运筹天下的重大机宜去扩展天下的宏大功业，陛下在策问中所讲的官员们很少能发挥出实际作用，功绩难以命令谁必须建成，也就全都不值得再忧虑了。而我朝祖宗垂示训条和留下大谋略的深意，差不多也可以体悟到了。

尽管是这样，但这一治国大道又哪里可以让别人去运作呢?只在于陛下那一心念而已。从前孟轲论说安定住国家的关键，认为那些卑劣的小人不值得去指责，他们处理的政事也不值得去责怪，而只在于君主的心念特纯正罢了。西汉董仲舒推论四方远近没有谁敢

不端正，就依据孟子的观点发挥说：端正君主的心念去端正朝廷，端正朝廷去端正文武百官。这表明君主的心念是各种化导的本原啊！所以在古代隆盛的时期，官吏并不是个个都很优秀，将领也不是人人都很贤能，但由君主在上面忧虑忙碌，戒惧激励，在内部实现农业生产获得成效，在外部强化武力防备，把整个天下带入到安乐富庶、和睦宁静的境地，即使不渴求将领和官吏都获取到合适的人选，但每个人却自动涌发出激情，站出来效力了。到了后世，官吏并不是个个都不称职，将领也不是人人都庸劣怯懦，但由君主在上面安逸享乐，懈怠懒惰，不体恤百姓的艰难，不考虑外部的祸患，把农耕和边防事宜放在不闻不问的位置上，即使希望将领和官吏都获取到合适的人选，但每个人也根本振作不起来而有所作为了。

扭转被动局面的机宜，在上面而不在下面；要求取得政绩的根本，在君主那里而不在臣僚那里。陛下果真把安定住内部作为心愿而从早到晚忧虑忙碌，简直不能够自己让它停下来；又把抵御住外敌作为心念而白天黑夜只是去谋求对策，简直不能够自己让它放下来。只要有一天民众该致力的事情还没步入正轨，就一天也不忘记那内心的忧虑，非常勤勉地务必求取那贤良的地方官吏，像古代那样亲自召见进行询问，特下诏书增加俸禄，达到安定民众的目的以后才算罢休。这样一来，凡是充任太守县令的人，有谁还敢往上不体会陛下的这种心念而努力去履行好自身的职责呢？只要有一天边防还没得到巩固，就一天也放不下那长远的忧虑，十分迫切地务必择取到贤能的将帅，像古代那样隆重加以礼遇，让他独挡一面，拍着大腿思求良将，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以后才算罢休。这样一来，凡是担任将帅的人，有谁还敢抬头不承奉陛下的这种心意而奋力去建功立业呢？陛下不这样去做，位居在殿廷最高处却忘掉民众事务的难言之处，置身在深宫里面却在外部安宁还没实现时想怎样就怎样，如此竟要用发挥实际作用和建成功绩去要求太守县令与将帅，臣下我还看不出他们很容易地就跟在后面去做了。

跪拜祝愿陛下把这种心念作为主导并经常保持戒惧，不要对治

理产生忽略的现象，不要对坚持长久有所忘怀，讲求学问来闹清它，执定恭敬的态度来存留住它，亲近正人君子来维护并持守住它。凡是歌舞美色的迷恋，金玉财利的诱惑，打猎游玩的享受，珍奇物品的献呈，这类足以使那心念四处游荡的玩艺，全都予以禁止而不被它们所打动，这也就君主的心念特专一，而天下的治理也形成了。从前南宋名儒张栻把《诗经》中的《七月》、《尚书》中的《无逸》看成是圣帝明王传授道心的紧要法则，而周公告诫周成王又说：不要懈怠，不要荒废，四方的少数部族就前来归服。这表明心念又是安定住内部和抵御住外敌的根本啊！臣下我很不成样，敢拿这一点来作为今天献呈的意见。触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姜慧颖译〕

明神宗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溥渊泉,而实出之。

殿试策问

[万历二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昔哲后膺乾,良弼纳诲,未有不以典学勤政为务者。乃嗣服之始,尤斤斤焉。若《伊训》、《说命》、《访落》、《无逸》诸篇,详哉其言之矣。三代以远,强学励精之主,代有作者,然考德论治,犹未可匹埒于姬姒,矧曰唐虞?又有可疑者:夜分讲经,岁周《太平御览》,只日不废讲读,学非不笃矣。而兴造洪业,顾出于马上得之、不事《诗》、《书》者,何欤?衡石程书,卫士传餐,汗透御服,日旰忘倦,政非不勤矣。而政理之效,顾独称躬修玄默、清静无为者,何欤?

朕以冲年践祚,未烛于理,惟仰遵我皇考遗命,讲学亲贤,日勤劝览,细大之务,悉咨辅臣,以求厥中,夙夜孜孜,罔敢暇逸,亦欲庶几乎《诗》、《书》所称,无坠我二祖八宗之丕绪。然论者谓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盖不在章句间也。不知舍章句之外,又何学欤?又或谓主好要则百事详。所谓要者,果安在欤?往代陈谟,有裨正始,如贤良三策,神爵言变俗,永光言审尚及治性六戒,劝学四仪,初元节俭,建初荡涤烦苛,先天、元祐十事,治平三札,熙宁稽古正学定志论,总之不

越此二端矣。可得而悉数之欤?亦有可行于今者欤?尔多士习先圣之术,明当世之务,其为朕折衷众论,究其指归。典学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异宜,创守殊轨,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笃初之意。毋泛毋隐。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学习起来就好像总也赶不上似的,还怕丢掉了所学过的东西。

依据自己是地位低下的人,自觉地去尊敬上面的人,这就叫做把尊贵的人看成是真尊贵的人。凭借自己是地位高贵的人,主动地去敬重下面的人,这就叫做尊敬贤能的人。把尊贵的人看成是真尊贵的人和尊敬贤能的人,其中的道理是相同的。

只有天下最圣明的人,才会做到看得准又听得清,颖悟又机智,足以能居高临下;宽厚又温和,足以能包容一切;涌生强制的力量,刚健坚毅,足以能做出决断来;严整庄重又适度并端正,足以能显出虔敬来;文采富有条理,详密又明晰,足以能做出区分来。就像广远地流遍各处的深水山泉,根据时势的需要表现出来。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圣明的帝王承奉天命登上宝[illegible],贤良的辅政大臣献纳训导的意见,没有不把致力学问和操劳政务作为该下气力做好的事情的。正当刚刚继承帝位的时候,更一点儿也不能放过去。像《伊训》、《说命》、《访落》、《无逸》这些文章和诗歌,已经讲得非常详明了。夏商周三代以来,奋力学习和励精图治的君主,每个朝代都有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可是考察他们的德业,评论他们的治绩,依然没有能同周朝和商朝并驾齐驱的,更何况再谈什么唐尧虞舜呢?不过也有令人闹不清楚的情况,这就是:有的君主到深夜还在讲论儒家经典,全年内把《太平御览》通读一遍,每天都不停止御前讲授经史,这在学习上并不是不十分专注了。可是创建起宏大

的基业，却出自在战马上取得天下而不理会《诗经》、《尚书》的人，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君主每天按一百二十斤的重量批阅奏章，让卫士唤人送饭来继续办公，汗水湿透了龙袍还在讨论国事，太阳偏西了仍然不感到疲倦，这在政务上并不是不特别勤勉了，可是政务得到治理的显著成效，却偏偏要数亲身修明沉默不语的天道而清静无为的人，这又是为什么呢？

皇帝我凭借幼小的年龄登上了帝位，对治国还不特清楚，只是恭敬地遵循我那逝世不久的先帝遗留下的命令，讲求学问，亲近贤臣，每天都在接受劝导和阅览典籍上下功夫，大小政务，全都向辅政大臣做咨询，以便求取到那最为适中的做法，从早到晚孜孜不倦，不敢安逸享乐，也只想接近《诗经》和《尚书》所称述的情形，不坠失我朝太祖成祖和八位前代皇帝一脉相传的统系。然而发表议论的人认为圣帝明王的学问，与普通读书人完全不同，大致上说来，并不是陷在划分经书章节、弄清字句涵义里面啊！可皇帝我却不明白除去划分经书章节、弄清字句涵义以外，又该学习什么呢？有的人还说：君主喜好抓住纲要，各种政事就全都理清了。可所谓纲要，究竟表现在哪里呢？从前各个朝代的大臣陈奏谋略，都是对端正起始阶段的国政有所补益。像贤良对策的三篇答卷，神爵年间的强调改变社会风尚，永光年间的强调慎重对待天子所喜好的事物以及修养德性的六条告诫和激励学习的四种容仪，初元年间的倡导节俭，建初年间的建议废除烦琐苛刻的做法，先天年间和元祐年间提出的十项事体，治平年间的三道奏札，熙宁年间的考察古代、端正学术、确定志向的论断，总之是不超出致力学问和操劳政务这两方面去罢了。能够一一列举论述它们吗？也有在当今仍然可以行用的吗？你们这些读书人熟悉古代圣人的治国方法，通晓当代的事务，要为皇帝我找出这些论调中的最恰切的部分，究明它们的主旨所在。致力学问要数什么最为紧要，定立起国政要数什么最占首位，古代和当代的适宜做法有的并不一样，创建基业和守护好已有成就所走的道路并不相同，对这些问题全都大力地阐明它们，以便符合皇帝我慎重对待起始阶段和努力做好登基政务的心愿。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瞒。

孙继皋　殿试对策

孙继皋(1550～1610)　字以德,号柏潭,无锡(今属江苏)人。万历二年(1574)状元,时年25岁。后官至礼部侍郎、吏部侍郎。曾论救被谴谪的谏官,对神宗不为生母送葬亦上疏极谏,由此辞官归乡,卒于万历三十八年,享年61岁。其诗文雍容恬雅,带有承平台阁遗风,与当时雕章琢句或矜奇炫异的文风迥然不同。有《宗伯集》今犹行世。

臣对:臣闻帝王之继天以立极也,端其本以为学,而后可以立天下之治原;审其要以出政,而后可以弘天下之治化。何者?人君之学,非徒以资诵说也。凝神于宥密,涵养于穆清,固羲皇以来之道统所赖以继之于无穷者也。本之弗端,则其学也为儒生口耳之学,而何以造于天德之精?人君之政,非徒以饰文为也。任君师之责,为治教之宗,固羲皇以来之道统所赖以衍之于不替者也。要之弗审,则其政也为后世粉饰之政,而何以臻于王道之极?惟求端于本,而不徒事于口耳之粗,则愈涵泳而愈充周,时敏之余,皆实学也。圣德所以同天而至治之原,于此乎端矣。惟致审于要,而不徒事乎粉饰之具,则愈敷施而愈恢廓,推行之际,皆实政也。而至治之化,于此乎成矣。学以基政,政以显学,道合一而不偏;学务其本,政举其要,事不劳而可举。自古帝王不出邃密之中,而道积厥躬,万世称至学;不烦措置之力,而事得其理,万世称至治者,此道行也。况出震维新,正道岸诞登之始;继离方早,正人心望治之初。可不取其所当急者,以为典学之本;择其所当先者,以为立政之要也哉?

钦惟皇帝陛下,弱龄含元,岐嶷神授,十龄出阁,温文日新。正位宸极而玄德愈光,委政耆硕而王猷益扩。嘉纳《帝鉴图说》而披览不倦,一《舜典》、《尧谟》之式;命书《四箴》、《六箴》而顾谌不忘,一汤盘、武几之铭。近又渥经筵之赐,严觐吏之饬。盖学已至矣,政已弘矣,轶于唐虞三代之盛矣。乃犹不自满假,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首举商

周之训，次及汉唐宋君臣之事，而终策臣等以典学立政之要，慎始笃初之规。岂意臣等集先圣之术，明当世之务，有足以裨万分之一者乎？而臣非其人也。虽然，臣愚，学惭稽古，志切抒忠，敢不披沥罄竭以对！

臣闻之，君者，天之子也，民之主也。为往圣继绝学者，其道也；为万世开太平者，其责也。故美玉不琢，则射斗之光不生；宝鉴不拭，则映日之晖不发；圣人不学，则光天之德不耀。甚矣哉！学之弗可已也。然不曰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嗣服之始，学其不尤要乎？家而无政，则大夫无以著浚明之勋；国而无政，则诸侯无以树亮采之绩；天下而无政，则天子无以布清宁之化。甚矣哉！政之不可忽也。然不曰慎厥初惟厥终，终以不困，不惟厥终，终以困穷，嗣服之始，政其不尤要乎？是故临朝愿学，临政愿治，凡为哲后者皆然，而始尤重也。论学以辅德，论政以辅治，凡为良弼者皆然，而始尤切也。

粤稽诸商，太甲、高宗，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则有伊尹、傅说之诲矣。人纪之修，风愆之戒，非伊之所为训王者乎！逊志之益，聪明之宪，非说之所为诏王者乎！臣言焉，君行焉，此所以终允德而靖殷邦也。故终商之世而曰中兴之令主者，必推太甲、高宗也。载稽诸周，成王亦善守成者也。臣考其初，则有周公之诲矣。绍庭上下，陟降厥家，非《访落》之诗所为作乎！稼穑艰难，政事劳瘁，非《无逸》之书所为戒乎！臣言焉，君听焉，此所以觐耿光而扬大烈也。故终周之世而曰继述之贤君者，必推成王也。

然学勤矣，而所以典其学者有本；政勤矣，而所以立其政者有要。三代以后，此义不明。强学之王诚代有之，而记诵之习兴矣。光武夜分讲经，而昧三公之体；太宗岁周《御览》，而失兄弟之义；英宗不废讲读，而暗祸阶之萌。顾洪业之建，乃出于不事《诗》、《书》之汉高，此其故何也？天授之资，固足以创大业，而惟其弃焉不学，学焉无本，此高之所以止于高也。励精之主诚代有之，而粉饰之风盛矣。始皇衡石程书，何补于秦之乱？文帝卫士传餐，何益于隋之亡？宣宗汗服而不倦，何裨于唐之衰？顾致理之效，乃出于清静无为之汉文，此其故何

也?玄默之修,固足以致治平,而惟其政之不更,立之无要,此文之所以止于文也。天启休明,生我皇上。日亲讲幄,而进学之志寒暑不忘;日咨辅臣,而求治之思细大不废。盖法天行以励学,独超于章句之外;宪天道以出政,深探夫理道之原。即商周之主不能过之,即《诗》、《书》所称何以加焉。我二祖八宗之丕绪,真足以扬于不坠矣。

顾臣伏读圣制有曰:论者谓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盖不在章句间也。不知舍章句之外,又何学欤?又或谓主好要则百事详。所谓要者,果安在欤?臣有以见陛下之心,望道未见之心也,视民如伤之心也。夫帝王之学,与韦布不同。此程子之言也,所谓知学之本者也。主好要则百事详。此荀卿之言也,所谓知政之要者也。是故往代之臣,各执其见,以陈正始之谟;而往代之君,亦各因其谟,以裨正始之治。如汉自仲舒《天人三策》之后,有王吉变俗之论,匡衡审尚之疏与夫六戒四仪之陈,贡禹节俭之劝,陈宠荡涤烦苛之议,皆为当时学与政设也。然而诸君之最著者,不过表章《六经》,临雍拜老,吏多循良,治多聪察无他,本与要不在也。宋自先天元祐之间,吕公著陈十事以助新政,司马光献三札以隆治平,与夫熙宁间程颢有稽古正学定志之说,皆为当时学与政设也。然而诸君之最著者,不过雅好儒术,崇尚文学,绍述有声,乂安数载无他,本与要不在也。然则本何在乎?闻之上学以心,下学以耳。欲得其本,纯心之道不可不讲也。要何在乎?闻之用人者,用天下而有余;自用者,为天下用而不足。欲得其要,任人之道不可不讲也。请因圣问之所及而极论之。

陛下终篇策臣曰:尔多士习先圣之术,明当世之务,其为朕折衷众论,究其旨归。典学何急,立政何先,或古今异宜,创守殊轨,悉茂明之,以副朕慎始笃初之意。臣愚以为,人之一心,操存舍亡,其几至可畏也。况人君之心,百欲攻之,一念弗纯,欲且乘之人焉。其系于学之进退,非浅小也。必也戒惧于不睹不闻之时,慎独于莫见莫显之顷,至善为的,主善为师,不息不移,允迪可期。帝王为学之本,或者其在是欤?譬则水焉,清之终日,可见眉睫,不过一挠,莫辨方圆,诚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日月久照,不改其明;星辰久旋,不改其度;圣人久于其道,不辍其功。学至此,天下之至学也,非装缀为能、品藻为工、

矻矻终年者比也。

人之一身,一日二日,其事尚难兼也。况人君之一身,百责萃之,一有弗任,则事且因之以隳也。其系于政之得失,非浅小也。必也精其择于任用之初,专其任于简畀之后,不信谗间,不责细事,惟和惟一,政事乃乂。帝王为政之要,或者其在是欤?譬之御焉,辖轨不具,其何以行?有其辅之,一日百里,诚不可以不审也。故曰酒非曲蘖,则无与成;羹非盐梅,则无与和;君非贤臣,则无与治。政至此,天下之大政也,非出纳必躬、案牍必亲、廑廑守法者比也。此所谓典学之大本也,立政之大要也。

然臣又有献焉。纯心以为学,而任人之本即存。传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此之谓也。任人以立政,而辅学之资有赖。经曰朝夕纳诲,以辅台德,此之谓也。顾臣不患陛下弗纯心以为学,而虑聪明之太过,或以为商周之主不足法,而求于学之外焉。不患陛下弗任人以立政,而虑英敏之太过,或以为商周之君不足法,而求于政之外焉。求于学之外,则索之愈高而失之愈远,将有谈正道而尚曲学,如公孙宏之惑武帝矣。求于政之外,则更之愈急而行之愈弊,将有口尧舜而心桑孔,如王安石之惑神宗矣。此臣愚之过计固然,而亦岂可以弗早戒哉?

伏愿我陛下,上畏天地,近法祖宗,无以学至矣而骛于高远,无以政成矣而事于纷更,无以深居而好逸游,无以物力丰盛而事土木,无以海宇升平而事远夷,无以安处深宫而狎近习,则道德高厚,治化洋溢,内恬外熙,瑞应祥集,虞夏商周不足侔矣,况汉唐宋乎哉!臣不识忌讳,干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承接皇天来确立起最高准则,就要端正那根本来从事学习,然后才可以定立住天下的治理本原;辨明那纲要来安排好政务,然后才可以扩展天下的治理教化。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君主的学习活动,并不光是借助一些诵读讲说啊!把神志凝聚在安定民众上,把品德修养投注在天下太平上,原本就是从伏羲氏以来的大道统系所赖以永久传续的东西啊!根本要是得不到

端正,他那学问也就成了儒生那种口授耳闻的学问,凭什么能探求到皇天大德的精髓呢?君主的政务活动，并不光是做些表面文章啊!承担起身为民众君主和师长的责任，构成治理与教化的主导方面，原本就是从伏羲氏以来的大道统系所赖以持续推衍的东西啊!纲要如果闹不清，他那政务也就成了后世那种粉饰太平的政务，凭什么能达到称王天下的大道的极点呢?只从根本上来谋求端正，而不光在粗浅的口授耳闻上花气力，就会越体悟回味而越充实周详，敏捷地去求取以后，没有一样不是那实际的学问啊!圣明的德性和皇天一样，而最美好的治理的本原，就在这上面端正了。只对纲要极力去辨明，而不光在粉饰太平的花样上下气力，就会越施布而越恢宏，在推行的过程中，就没有一项不是那实际的政事啊!而最美好的治理的教化成效，就在这上面形成了。学习是用来给政务奠定基础，政务是用来显示学习的水平，大道融合成一体而不偏向一头。学习掌握那根本，政务突出那纲要，国事不费力就可以推行开来。自古圣帝明王不从皇宫中出来而大道却聚积在他的身上，永远被称为学习得最好的人；不花费安排部署的力量而国事就得到治理，永远被称为治理得最好的人，原因就在于这种大道实行开了呀!更何况雷霆使万物在东方生出，国运焕然一新，正属于登上大道彼岸的起始阶段；日月前后相继放出光辉，刚刚起步，正属于人心盼望大治的最初时刻。能不求取那应当视为最紧要的内容作为致力学问的根本吗?能不择定那应当放在首位的事项作为确立起国政的纲要吗?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小小的年纪就蕴含着真命天子的气质，懂得知识又能明辨事物就好像由神灵授付一般，十岁就从太子宫中挺立出来，温柔文雅一天胜过一天。正式登上皇帝宝座而潜藏不露的德性越来越放出光明，把朝政交付给德高望重的老臣去处理而称王天下的大谋略更加得到扩展。高兴地接受张居正和吕调阳合撰进呈的《帝鉴图说》，披阅观览而不感到疲倦，完全依照《舜典》、《尧谟》的法式去做。又命令书写北宋程颐的《视听言动四箴》和唐朝李德裕的《丹扆六箴》，时常回过头来观看而不忘怀，完全像商汤在铜盘上和周武王在桌凳上刻下铭文那样去做。近来又

对御前讲经述史的侍读官员予以优厚的赏赐，强化朝臣进见述职的规定。学问已经达到极点了，政务已经全面推行开了，超过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景象了，但仍然不自我骄傲，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从上面颁赐下清晰详明的询问，首先列举商朝和周朝的训导文辞，接下来谈到汉朝、唐朝、宋朝君臣方面的事例，到最后又用致力学问和定立起国政的纲要，慎重对待起始阶段和努力做好登基政务的法则，来策问臣下我等人。这恐怕是觉得臣下我等人积累了古代圣人的治国方法，又通晓当今的事务，确有足以对朝政能够补益万分之一的地方吧?然而臣下我却不是这种人才啊!尽管如此，臣下我相当愚昧，在学问上对考察古代感到太贫乏而惭愧极了，但从思想上却对抒发忠心非常殷切，哪里敢不披肝沥胆，竭尽一切来做对答呢?

臣下我听说，君主是皇天的嫡子和百姓的主宰。替古代圣人恢复起断绝的学问，是他那道统啊!为千秋万代开辟出太平的局面，是他的责任啊!因而质地优良的玉石不经过雕琢，射向星斗的光芒就闪烁不出来；宝贵的镜子不擦拭，映照太阳的光辉就迸发不出来；圣人不学习，辉映皇天的仁德就闪耀不出来。学习决不可以停止，这简直太重要了!然而古人不是强调到壮年仍喜好学习就像太阳在天空正中发出的光芒，从少年就喜好学习便如同太阳升起时的阳光吗?而在刚刚登上帝位的时候，学习不就显得更重要吗?作为一个采邑封区，却没有该处理好的政务，大夫就没办法显示出恭敬勉力地当好大夫的功勋；作为一个封国，却没有该处理好的政务，诸侯就没办法建立起辅助王室办事而当好诸侯的业绩；整个天下却没有该处理好的政务，天子就没办法施布开清平安宁的教化。政务决不可以忽略，这简直太重要了!然而古人不是强调慎重对待起始阶段，只管保持到最后，而最后也就不陷入困顿状态；不去只管保持到最后，而最后也就陷入困穷的境地吗?正当刚刚登上帝位的时候，政务不就显得更紧要吗?所以主宰朝廷就愿意学习，决定政事就希望大治，只要是身为圣明帝王的人全都是这样的，而起始阶段更为重要啊!讲论学问来辅助君主的德业，议论政事来协助君主的

治理，只要是身为贤良大臣的人也都是这样的，而起始阶段更为紧切啊！

考察商朝，太甲和商高宗属于善于守护住已有成就的君主啊！臣下我考察他们在即位之初，就有伊尹、傅说的教诲了。人伦纲常的修明，三类歪风和十种过错的告诫，还不是伊尹拿来训导太甲的事情吗？通过学习顺从善良心志的扩展，对皇天明察一切要效法，还不是傅说拿来告知高宗的事情吗？大臣提出了建议，君主就去实行，这是把诚实的美德保持到最后又通过美好的化导而使各个邦国都安宁归服的原因所在啊！因此在整个商代，提起能使国家由衰落重新走向兴盛的贤明君主，必定要说顶数那太甲和高宗了。再考察周朝，周成王也属于善于守护住已有成就的君主啊！臣下我考察他刚刚亲自执掌朝政时，就有周公的教诲了。继承先王对皇天和百姓都正直的大道，群臣上下都各尽其职，还不是《访落》这首诗的创作主旨吗？要懂得种田耕作的艰难，对政事要辛勤地操劳，还不是《无逸》这篇文章的训戒内容吗？大臣提出了建议，君主就去实行，这是播布先王的光辉和弘扬他们的盛大功业的原因所在啊！因此在整个周代，提起最能继承前代丰功伟绩的贤明君主，必定要说顶数那周成王了。

然而学习已经很勤勉了，但用来致力学问的东西有那根本；政务已经很费心操劳了，但用来确立起国政的东西有那纲要。夏商周三代以后，对这一大义都闹不清楚了。奋力学习的君主的确每个朝代都有，可记忆背诵的习气却兴行起来了。东汉光武帝到深夜还在讲论儒家经典，可对三公的主要职责却不明了；宋太宗在全年内把卷帙浩繁的《太平御览》通读过来，可却丧失了兄弟关系的固有道义；宋英宗每天都不停止御前讲授经史，可对祸乱起因的萌生却一点儿也看不到。然而宏大基业的创建，竟出自不理会《诗经》、《尚书》的汉高祖，这里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皇天授给他天资，固然足够用来创建大业，可只因他抛弃经典不去学习，去学习了又没有根本做支撑，这也就是汉高祖只是他汉高祖的缘由所在啊！励精图治的君主也确实每个朝代都有，可粉饰太平的风气却盛

行起来了。秦始皇每天按一百二十斤的重量批阅奏章，可对秦朝的败乱又有什么补救呢?隋文帝命令卫士唤人送饭来继续办公，可对隋朝的灭亡又有什么补益呢?唐宣宗被汗水湿透了龙袍仍不感到疲倦，可对唐朝的衰败又有什么帮助呢?然而实现治理的成效，竟出自清静无为的汉文帝，这里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修明沉默不语的天道，固然足够用来实现太平，可只因他那政务不改进，定立起来却没有纲要做统率，这也就是汉文帝只是他汉文帝的缘由所在啊!皇天开启那美好的时代，降生下我们的皇上。每天都亲临经史讲席，而增进学问的想法无论冬季还是夏季都不忘怀。每天都向辅政大臣做咨询，而谋求大治的考虑无论大事还是小事都不放过。效法皇天的运行来激励学习，偏偏超出那划分经书章节、弄清字句涵义的范围以外；效仿皇天的法则来部署政事，深深探明治国大道的本原。即便是商朝和周朝的杰出君主也无法赶得上，即便是《诗经》、《尚书》所称述的情形又凭借什么能凌驾在上面呢?我朝太祖成祖和八位前代皇帝一脉相传的统系，真真足以扬布到永不坠失的境地了。

不过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圣明策问中有这样的话：发表议论的人认为圣帝明王的学问，与普通读书人完全不同，大致上说来，并不是陷在划分经书章节、弄清字句涵义里面啊!可皇帝我却不明白除去划分经书章节、弄清字句涵义以外，又该学习什么呢?有的人还说：君主喜好抓住纲要，各种政事就全都理清了。可所谓纲要，究竟表现在哪里呢?臣下我由此确有理由地看出陛下的心念也就是周文王那种渴望大道到来却好像还没有见到的心念，把百姓看得就像在受伤害的心念啊!圣帝明王的学问与普通读书人完全不同，这是北宋程颐说过的话，属于人们所讲的懂得学问的根本的论断啊!君主喜好抓住纲要，各种政事就全都理清了。这是战国荀卿说过的话，属于人们所讲的懂得政务的纲要的论断啊!因而前代的大臣各自执持自己的见解，陈奏那端正起始阶段的国政的谋略；而前代的君主也分别依据他们的谋略，促进那端正起始阶段的国政的施行。如两汉从董仲舒献上《天人三策》以后，又有王吉关于改变

社会风尚的论述，匡衡关于慎重对待天子所喜好的事物的奏疏以及修养德性的六条告诫和四种容仪的陈请，贡禹关于天子要节俭的劝告，陈宠关于废除烦琐苛刻的做法的议论，这都是为当时的学习活动和政务来拟设的呀！然而这一时期的所有君主中最突出的人，也不过是提高《六经》的地位，到国家最高学府去视察并尊崇德高望重的老年儒士，官吏大多很贤良，治理大多能看得明又听得清罢了，并没有其他方面的突出表现，这是因为根本和纲要并没抓住啊！宋朝从先天到元祐年间，吕公著陈奏十项事体来辅助新施行的朝政，司马光献呈三道奏札来使太平局面变兴盛，以及熙宁年间程颢提出了考察古代、端正学术、确定志向的主张。这都是为当时的学习活动和政务来拟设的呀！然而这一时期的所有君主中最突出的人，也不过是一向喜好儒家的学说，崇尚文章学问，继承先帝遗志赢得美名，得到几年的治理和安宁罢了，并没有其他方面的突出表现，这是因为根本和纲要并没抓住啊！既然如此，那么根本究竟在哪里呢？臣下我听说高明的学习活动是靠那颗心，低劣的学习活动是靠那两只耳朵。要想抓住那根本，使心念纯正的大道就不能不去讲求啊！纲要究竟在哪里呢？臣下我听说懂得使用别人的人，把他们使用到整个天下去都绰绰有余；光知道自己干的人，给天下去使用也力不从心。要想抓住那纲要，任用人才的原则与方法就不能不去讲求啊！请求按照皇上圣明策问所提到的事情来透彻地论述它们。

陛下在篇末策问臣下我说：你们这些读书人熟悉古代圣人的治国方法，通晓当今的事务，要为皇帝我找出这些论调中的最恰切的部分，究明它们的主旨所在。致力学问要数什么最为紧要，定立起国政要数什么最占首位，古代和当代的适宜做法有的并不一样，创建基业和守护好已有成就所走的道路并不相同，对这些问题全都大力地阐明它们，以便符合皇帝我慎重对待起始阶段和努力做好登基政务的心愿。臣下我愚昧地认为，人的那一心念，操持住就能生存下去，丧失掉就会死亡，那种萌生状态简直是最可怕的了。何况君主的心念，各种欲望都向它扑来，有一个念头不纯正，欲望眼看着就乘机侵入进来了。它关系到学习的提高与倒退，决非浅显和微小

啊!必定要在没人看得见和听得到的时候保持警戒畏惧，在暗处没表现出来和细事没显露出来的刹那间谨慎对待自身，把最为良善作为目标，把执定良善作为师长，不止息又不转移，认真践行就有希望做到了。圣帝明王从事学习的根本，或者就在这里吧?打个比方来说，就像一汪水，整天都很清澈，可以照出眉睫来，只是一拨弄，就分辨不出是方形还是圆形的了，确实不可以不谨慎对待啊!因而说太阳和月亮永远照耀，可却不改变那光亮；星辰永远运转，可却不改变那天体位置；圣人长期坚持那大道，也就不废辍那功业。学习达到了这种地步，就是全天下学习得最好的呀!决不是那类把装潢门面作为本事，把品评高低作为专精而整年抱住不放的人可以比拟的呀!

人的整副身躯，对需要一天两天做好的事情，尚且难以同时做完啊!何况君主的整副身躯，各种责任都集中在它的上面，有一种责任承担不起来，事情眼看着就随之毁败了。它关系到政务的得与失，决非浅显和微小啊!必定要在任用前精详地对待选取事宜，在选中授官以后只管让他去履行好职责，不相信挑拨离间的谗言，不责怪细小的事情，只是同心协力，只是目标一致，政事这才会得到治理。圣帝明王执掌政务的纲要，或者就在这里吧?打个比方来说，就像驾驶车辆，连接车辕和横木的活销却没安上，凭借什么能让车辆动起来呢?可有它们做辅助，一天就能行进百里，确实不可以不审慎对待啊!因而说美酒离开了发酵品，就没有东西能和它酿造成；羹汤离开了盐和酸梅，就没有调料能与它调配成；君主离开了贤臣，就没有人能同他施行治理。政务达到了上面所说的那种状态，就是全天下的最重大的政务啊!决不是那类下达命令和听取反映必定要亲自去过问、公文报表必定要亲自来审阅、一味抱持法度的人可以比拟的呀!这也就是人们所讲的致力学问的根本啊!定立起国政的纲要啊!

然而臣下我还有要献呈的东西。使心念纯正，靠这去从事学习，而任用官员的根本也就存立在里面了。解释经典的书籍说：施布政务在于获取到合适的人选，而获取到合适的人选全靠君主自

身。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任用官员去确立起国政，而辅助学习的外力就有了依靠。经典上讲：从早到晚要进献忠直的教诲，用来辅助我的德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过臣下我并不担心陛下会不靠心念纯正去从事学习，而是忧虑陛下太聪明，或许会认为商朝和周朝的君主不值得效法，却到学问以外去索求什么。不担心陛下会不任用官员去确立起国政，而是忧虑陛下太英敏，或许会认为商朝和周朝的君主不值得效法，却到政务以外去索求什么。真到学问以外去索求什么，就会索求得越高妙而偏失得就越远，将会出现表面上谈论正道可实际上却推崇邪僻的学说，像公孙宏迷惑汉武帝那一套了。真到政务以外去索求什么，就会变动得越急速而施行中就越出毛病，将会出现口头上高喊尧舜之道可心里却向往西汉桑弘羊和孔仅的敛财伎俩，像王安石迷惑宋神宗那一套了。这固然是臣下我很愚昧而太过头的计虑，但却哪里又可以不及早引起警戒呢?

跪拜祝愿我陛下，往上畏惧天地，在近处效法列祖列宗，不因为学问已到顶点了就去追求高远的东西，不因为政务已经成功了就大力进行各种变更，不因为居住在皇宫里就喜好安逸游乐，不因为物力丰盛就大兴土木，不因为天下太平就对远方的少数部族采取军事行动，不因为安稳地处在深宫中就与身边献媚的人特亲近。这样一来，就道德高尚深厚，治理与化导一派兴盛，内部安宁，外部和乐，吉祥的兆应全部来到，虞舜和夏商周不足以跟陛下相提并论了，更何况汉朝唐朝宋朝呢!臣下我不懂得什么是忌讳，触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真是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神宗万历八年(1580)庚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殿试策问

[万历八年三月二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治,古帝王大经大法具在《周书·洪范》。其所以宰持万化,统摄九畴,则建用皇极,备矣。而论者谓乂用三德,实为权衡。又为皇极以体常,以立本;三德以尽变,以趋时。则正直刚柔,固与建极殊路欤,抑亦异用而同体也?三季以还,英辟代有,若躬修玄默,庶几刑措,力行仁义,身致太平,与刑名绳下而表用循良,柔道理物而总揽乾纲者,于三德亦有合欤?又有可疑者:政务严切,事从宽厚,异施也,胡以各适于治?优柔好儒术,威强则宣武,异尚也,胡以同归于衰?含容姑息,见谓养乱,而仁柔有余、刚武不足者,胡以称庆历之隆?猜忌刻薄,遂致播迁,而精于听断、无复仁恩者,胡以媲贞观之美?至今唐虞夏殷之盛,所谓平康之世也。乃弼教以象刑,格苗以干羽,戮后会,泣罪人。敷政优优,秉钺烈烈,其治亦兼用刚柔。何欤?

朕绍休鸿业,精求上理,思建皇极,为天下先。尝深诏执事黜朋比,期荡平,去伪划浮,敦本责实,八载于兹矣。然而教化未洽,风俗未同,吏治未尽还淳,人心未尽归厚。岂朕之不敏不明,无能端好恶以示之极欤?抑三德之用,犹有未当欤?昔人论治,以水火喻宽猛,以

阴阳配刑德，以琴瑟证缓急，与夫芒刃斧斤之说，粱肉药石之譬，是可采而行欤?夫舍刚柔而求正直，不善用三德而猥云极建，朕不知其解也。故进尔多士于廷，爰咨爰度。其尚阐析经训，标揭化原，若何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俾斯世会归皇极，用追古帝王之治，悉心敷对，称朕意焉。毋有所讳。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需要三十年才能使仁政大行。

智好比技巧，圣好比气力。犹如在百步以外射箭，射到，是你的力量；射中，却不是你的力量。

探求隐僻的道理，做怪异的事情，虽然后世有遵循这种做法的，但我是不做这种事的。君子遵循大道行事，如果半途而废，但我是决不能停止的。君子遵循中庸之道行事，即使隐遁山林，不为人所知也不后悔，只有圣人才能做到这样。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在治国方面，有关古代帝王的常规法则，在《周书·洪范》篇中有详尽的记载。篇中讲要主宰把持万种变化，要统理九类治国大法，那就得建立君主的法则，是讲得很完备的。议论的人认为治政要运用刚、柔、正直三种德行，这实在是灵活运用的手段。又认为君主的法则是用来体察规律的，是用来建立根本的。刚、柔、正直三种德行是用来极尽变化的，是用来适应时代需要的。那么正直、刚、柔就必定跟建立法则有分歧了吗?或许是属于同一个本体而作用有所不同呢?从夏、商、周三代末期以来，代代都有英明的君主。像有的君王就亲自实行清静无为，几乎设置刑法而不用。有的君王则用力去推行仁义，亲身实现太平盛世。以及用刑名法律约束下级，表彰使用循良官吏，用柔的手段

处理事物但又总揽权力。这些做法也有同刚、柔、正直三种德行相吻合的吗?此外还有可疑的地方：有的君主治理政务执法严厉，有的君主处理事情则倾向宽大仁厚，施政不同，为什么各自又适合各自的治理呢?有的君主性情软弱喜好儒术，有的君主威猛刚强效法汉武帝和汉宣帝，崇尚不同，为什么全都会走向衰落呢?容忍姑息，被认为是养乱，然而有的君主仁厚柔弱有余而刚强勇武不足，为什么能赢得庆历时代是隆盛时代的赞誉呢?有的君主猜忌刻薄，导致流亡，然而有的君主精于政事处置，不再施布仁恩，为什么可以跟贞观之治相媲美呢?至今讲到唐、虞、夏、殷的隆盛，可称为是太平安乐的社会了，可当时却用让犯人穿不同的服饰以象征惩罚的办法来辅助教化，用执干执羽的舞蹈宣扬文德来使有苗部落臣服，杀戮迟到的诸侯，看到犯罪的人就哭泣。施政施得很宽和，用武用得很猛烈，那时的政治也是兼用刚柔两手的。这是为什么呢?

皇帝我继承美好伟大的事业，精心地追求上等的治理，考虑建立君王法则，亲自给天下做出榜样。曾经下诏深深告诫办事大臣，要斥退党派，希望王道坦荡平直，铲除虚伪浮夸，注重根本和讲求实际，到现在已经八年了。然而教化未至广博，风俗未能同一，吏治未全部归于淳正，人心未全部归于仁厚，难道是皇帝我不敏锐不聪明，没能端正自己的好恶来显示法则吗?还是运用刚、柔、正直三种德行的做法，仍有不当之处呢?过去人们讨论治国，分别用水和火来比喻施政的宽大或严猛，分别用阴和阳来比配用刑罚或行仁德，分别用弹琴弹瑟来比喻施政舒缓或燥急，以及那些利刃斧斤的讲法，粱肉药石的譬喻，可以采用而实行吗?那些放弃刚、柔而求正直，不善于使用三种德行而装样子说是建立了君王的法则，皇帝我对此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请你们众多士人到朝廷来，既咨询又考虑问题，希望你们阐析经典训条，标榜揭示教化的本源，以及怎样可以彰明教化，端正风俗，驾驭官吏，领导人民，使这社会全都汇合在君王的法则之下，来追比古代帝王的治理业绩。你们要尽心尽意陈述对答，符合皇帝我的期望，不要有所隐讳。

张懋修　殿试对策

张懋修(生卒年不详)　字子枢,江陵(今属湖北)人。宰辅张居正第二子。其以辅臣子弟高中万历八年(1580)状元,为时论所讥讪。后于其父被削夺官秩时曾自杀,未遂。迄天启二年(1622)熹宗下旨为张居正昭雪,此时懋修已年八十。著有《墨卿谈乘》十四卷行于世。

臣对:臣闻帝王之道,天道也。故必有合天之心法,以端化理之原:亦必有宪天之治法,以妙化裁之用。何谓心法?全体天德,以为敷锡庶民之本,无偏无陂,大公而顺应者是已。何谓治法?奉若天道,以为变通宜民之政,知柔知刚,鼓舞以尽神者是已。心法立,而纯粹之精与於穆而并运,斯圣人之所以合天也。治法行,而神应之妙与大造而同流,斯圣人之所以宪天也。合天者以立本,而建极之体主持乎三德之用;宪天者以趋时,而刚柔之用流行于正直之中。体用合一,显微无间,古之帝王所以不降阶序而化行若神,纳天下于皇极,措斯世于平康者,率由此道也。

钦惟皇帝陛下,躬不世之资,抚蓁隆之运,天下喁喁然称圣主矣。临驭以来,孜孜讲学,寒暑不替,而表正之极端;事事访求,细大不遗,而平康之化普。任贤图治,敛福锡民,八柄驭臣,九德咸事。德之所及,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加,与风霆而并迅。治化之隆,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犹不自满假,于万几之暇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谓帝王之大经大法具在《洪范》,故首以皇极三德同体而异用者为言,继以古昔君人异用而同体者为证,复询臣等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之策,期使斯世会归于皇极,以媲美古帝王之盛。斯虞帝清问下民、周王望道未见之心也。臣敢不披沥以对扬休命乎?

臣闻《书》曰:天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则《洪范》之书,乃天道也。人君奉天以子民,则必法天以运治。臣请言天道。夫太虚无形,秉握化权,溟茫漠泯,浡濛鸿洞,是天道之所以立体也。嘘之以阳,吸之以阴,鼓之以雷霆,晅之以日月,润之以雨露,肃之以雪霜,是天道之

所以致用也。生者杀之机，翕者张之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风霆日月，霜雪雨露日流行于亭毒之中，而太虚之体漠然不见其迹，斯天道之所以尽神也。

人君法天以治，故皇极之畴曰：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无党无偏，王道荡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是圣人之心法与太虚而同体也。夫使天下而尽由于荡平，则圣人固可不赏不怒，垂衣拱手而默顺于理。乃人之才性殊科，而世之情伪多变。将默然而任之乎？不容以无为也。将一法而治之乎？不能以尽变也。于是以其皇极之体敷之为三德之用，抚平康以正直，驭强弱以刚柔。有正治之者焉，以刚克刚，以柔克柔是已。有反治之者焉，以刚克柔，以柔克刚是已。其情为喜怒，其发为好恶，其事为生杀予夺，其权为威福命讨，其具为礼乐法制、爵禄铁钺，是圣人之治法与日月风霆、雨露霜雪并运者也。

然其为用妙矣，或纯用乎刚而天下不见以为毒，或纯用乎柔而天下不见以为懦，或刚而行之以柔，或柔而行之以刚，或先刚而后柔，或先柔而后刚，鼓之舞之，使天下日迁善远罪，而莫测其所以然者，是圣人之所以法天而尽神也。蕴之于内则浑涵精粹，贯彻于几微而化原以正；运之于外则交发互施，错综于万变而化理以弘。其相须之妙用如此。朱熹所谓乂用三德，实为权衡。陈卿所谓皇极以体常，以立本，三德以尽变，以趋时。盖得其旨哉！

三五之隆，至德渊闳，运用之妙，六籍所不能模焉。略观其迹，弼教明刑，疑于刚矣；格苗舞羽，又何柔也！下车泣罪，疑於柔矣；后至又诛，又何刚也！秉钺烈烈，疑於刚矣；敷政优优，又何柔也！凄然似秋，而人不以为私怨；煦然似春，而人不以为私德。要之归于平康正直而已，斯舜禹、成汤之所以善法天也。

自时厥后，世道浸衰，天亦不畀以《洪范》九畴。世主暗于大道，好恶反侧，既无以建皇极之体，至其治理，则亦就其才性之近者而成之。汉文躬修玄默，几致刑措，似矣，而强宗悍虏，莫能制也。汉宣刑名绳下，表用循良，似矣，而无辜被戮，不尽无也。光武总揽权纲，盖亦兼用柔道，而信谶失刑，有遗议焉。唐太宗力行仁义，固已身致太平，而推刃同气，有余愧焉。明帝政务严切，章帝事从宽厚，唐宣精于

听断，无复仁恩，宋仁仁柔有余，刚武不足，则又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所谓东壁而望、不见西墙者也。彼所谓英君哲王也，而犹如是，况乎优柔好儒术而倒持国柄，威强则武宣而见制外戚，含忍姑息而凌逼于方镇，猜忌刻薄而播迁于奉天，如元、哀、代、德者，又乌足道哉！

我太祖高皇帝崛起淮甸，肇造区夏，体备玄德，治兼往圣。观其和抚四夷，不勤远略，则舞干不足以为文；蹙吴灭汉，拯民水火，则秉钺不足以为武。定律令，锄强梗，则象刑戮逆不足以为威；赦灾眚，蠲田租，则泣罪解网不足以为德。臣尝伏读御注《洪范》，以"阴骘下民"属之天，以"相协厥居"属之君，盖仰而颂曰：斯天再锡我圣祖以《洪范》九畴也。

斯世斯民，归极会极二百年矣。我陛下绍休圣绪，精求上理。虚己悬衡，因物顺应，则好恶之私不作；祛伪划浮，敦本责实，则偏陂之习已消。蠲逋税，谨谳狱，奖贤能，行久任，至恩也，柔道也；振材官，饬学校，诛侠少，申禁令，至威也，刚道也。臣尝伏读圣谕曰：朕方嘉与臣民会归皇极之路；曰：用臻师师济济之风，归于荡荡平平之域。盖又仰而颂曰：斯天三锡我皇上以《洪范》九畴也。

纪纲振举，黎庶乐业，四夷向风，百嘉畅遂。建极之本，三德之用，陛下盖允蹈之，而平康会归之化，盖已同符烈祖，追配哲王矣。乃圣问犹以为教化未洽，风俗未同，吏治未尽还淳，人心未尽归厚，自引以为好恶未端，三用未当，而求所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之化。臣愚，何足以知之？虽然，臣闻古语：君行意，臣行事。故明其义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今朝廷所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布之诏令，著之章程者，固已至精至备，第令有司能其事而奉其职，陛下端拱受成事耳，奚必更求他术哉！惟是意之所在，则臣敢以两言献焉。

其一曰明刚柔之实，其二曰坚持久之志。斯两者，臣之所谓治天下之意也。夫圣人之所谓刚，非曰严刑峻法以立威也。法立而使民不敢犯，令一而使民知所守，赏当而信，罚行而必，兴事考成，实事求是，而偷惰浮窳者不得以病吾治，是刚之实也。圣人之所谓柔，非曰姑息委靡以市恩也。矜不能，赦小过，不侮鳏寡，不虐无告，恤困穷使闾阎无愁叹之声，理冤抑使犴狴无沉滞之狱，是柔之实也。寓惇大于明

作，行正直于忠厚，以义为威而不以怒为威，以德为惠而不以私为惠，则圣问所谓善用三德者也。世之论治者，不达于此，苟见朝廷才一用法，则以为过刚，而与严刑峻法者并讥。徒见姑息萎苶则以为用柔，而与子惠保爱者齐誉：非知变达化之士也。故刚柔之实，臣愿陛下辨焉。

夫天道运而不已，故能成悠久之化。帝道运而不已，乃能深沦洽之仁。故事美成在久，而人之情始乎勤，常卒乎怠，是以圣人治天下兢兢业业，慎终如始。譬之日月递照，阴阳代谢，无日不运于太虚之中，而不见其止息，故气化无壅而岁功成。世之务近小者，苟见人之不率于教，与世之不登于理，不忿顽而求备，即苦难而中止，斯治之所以小康也。故恒久之道，臣愿陛下体焉。

允若兹，以之明教而何患乎教化之未洽？以之正俗而何患乎风俗之未同？以之驭吏而何患乎吏治之不淳？以之率民而何患乎民心之不厚哉？若夫子产以水火喻宽猛，贾谊以芒刃斧斤拟德法，崔寔以粱肉药石譬宽严，其意则一，主于用刚者也。董仲舒以阴阳配刑德，陈宠以琴瑟证缓急，其意则一，主于用柔者也。斯愤世之孤谈，非致理之通议也。夫天不能以羁阳独阴育成万物，而人主之治独可以偏用刚柔也欤哉？欲矫世主之偏，而不知己自蹈于一偏，不足为陛下诵也。

虽然，有本焉。三德之用，原于一心，心不可以一有蔽也。蔽于爱憎，则喜怒用而好恶作矣；蔽于私邪，则用舍谬而偏党成矣；蔽于逸乐，则志意昏而颇僻彰矣。化原不端，而欲三德之用，不亦难乎？臣愿陛下建皇极必求之于心，恭以作肃，从以作乂，明以作哲，聪以作谋，睿以作圣。敬止之德必务于缉熙，刚健之精必期于纯粹，则一念之慈爱即为仁，一念之裁制即为义。斯之谓合天之心法，而行之为宪天之治法。民归皇极，世底平康，而康强逢吉之庆，端有在于今日矣。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草茅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之道是天道，所以一定要有符合天的心法，用来端正教化治理的本原；也一定要有效法天的治理方法，

来起到随着事物变化而相裁制的微妙作用。什么叫做心法呢？保全体察天的品德作为施布恩惠给民众的根本，不偏不倚和大公无私地去顺应的，这就叫做心法。什么叫做治法呢？尊奉顺从天的法则，用来制定适宜于人民利益的国政，懂得用柔，懂得用刚，全力运作而穷尽神奇功效，这就叫做治法。心法确立，于是纯粹的精神就与美好深远的皇天一起运作，这就是圣人能够符合天意的原因。治法推行，于是神奇功效的回应就与大自然一起流布，这就是圣人能够效法皇天的原因。符合天意就得以确立根本，因而建立法则的本体就起着支配刚、柔、正直三种德行的施用。效法皇天就得以适应着时代形势，因而刚与柔的施用就在正直中流行。本体和施用两者结合为一，显著和微细之间就不会有隔碍。古代的帝王所以能够做到不下殿堂，就可以神妙地将教化推行开，把天下纳入到天子的法则之中，把这个社会带入到中正平和的环境里，一律都是遵从着这种做法的。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具有非凡的资质，拥有非常隆盛的时运，天下人都景仰归向，称之为圣明君主了。自从临朝治事以来，勤恳不倦地讲论学术，寒暑不废，给天下做出最高表率十分端正。事事都亲自去访求，细大都不遗漏，使中正平和的政教普及遍布。任用贤才设法治理好国家，聚集福禄赐给人民，用八种政治权柄驾驭大臣，具有九种德行的人都担任官职，恩德的延布如同海河一样深广，威严的推行如同疾风雷霆一样迅速。治理教化很隆盛，实在已经同古代的五帝和三王并列了。但是仍然不感到满足，借助在政事繁忙的余暇，宣召臣下我等人进入朝廷，向我们作精审详问。认为帝王的常规法则全部记载在《洪范》篇中，所以首先讲到君王的法则和刚、柔、正直三种德行是同一个主体而有不同的运用的道理，继而论证古代君王虽有不同的运用但又同归一个主体的情况。又向臣下我等人询问彰明教化、端正风俗、驾驭官吏、领导人民的策略，期望使这个社会的秩序会集在君王的法则之下，以与古代帝王的盛况相媲美。这是帝舜向下层人民作精审询问和周文王访求大道如同还没见到的用心啊！臣下我岂敢不竭诚效忠地来对答称扬美好的皇命呢？

臣下我得知《尚书》上说："天帝把九种大法赐给了大禹，治国的

常理因此定了下来。”那么《洪范》这部书就是上天的大道了。君主奉承上天之命把人民作为儿子，就一定要按照天的法规来进行治理。臣下我就讲讲天道吧！天是空虚无形的，掌握住化育万物的权力，构成一片茫茫无边的广大空间。这就是天道建立本体的内容。用阳呼气，用阴吸气，用雷霆震动，用日月照晒，用雨露湿润，用霜雪收敛，这就是天道致用的表现。生是杀的契机，收敛是张开的基础，万物各自得到交融和协而获得生存，各自得到供养而获得成熟，风雷日月、霜雪雨露，天天流行在化育养成之中，然而太虚的形体一点儿不表现出这种化育养成的痕迹，这就是天道之所以穷尽神妙的原由。

君主效法天来进行统治，所以《洪范》中关于君王法则的那一条说：不要有私心偏好，不要为非作歹；不要结党，不要营私，王道是平坦的；不要违反王道，不要违反法度，王道是正直的。这说明圣人的心法跟太虚的功能是融合为一体的啊！使天下的事物全部都顺从着平坦轨道发展，那么圣人理政本来就可以不必采用奖赏也不必使用责罚，只是默默地顺从着天理无为而治便可以了。但是人的才能性格各不相同，而且世事的真伪也变化多端，对此打算默默地任从它们随便去吗？这就不允许无为而治了；对此打算一概依据法律而治理吗？这就不能极尽变化了。于是把君王法则的本体施布为三种德行各自起作用，用正直来安抚中正和平，驾驭强者和弱者分别使用刚或柔的手法。有用正面手法治理的，那就是用刚的手法去制服刚者，或用柔的手法制服柔者。有用反面手法治理的，那就是用刚的手法去制服柔者，或用柔的手法去制服刚者。在感情上形成喜悦或愤怒，在发作方式上表现为喜欢或憎恨，在行事上构成给予生路或判处死刑、加官表扬或削职降级等不同的处理，在权力运用上给予威尊福禄或下令讨伐，在具体措施上组成礼乐法制和爵禄刑罚。可见圣人的治理方法，是与日月风雷、雨露霜雪对等运用的。

然而它的运用，是很神妙的。或者纯粹是用刚的手法，但天下人不认为这是惨毒的做法。或者纯粹是用柔的手法，但天下人看不出来，不认为这是懦弱的表现。或者是使用刚的一套而配合柔的手法，或者是使用柔的一套而配合刚的手法。或者是先使用刚然后使用

柔,或者是先使用柔然后使用刚。鼓舞运作起来,使天下的人一天天地向往做善事远离犯罪,然而不能够窥测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就是圣人效法天而尽显神圣的做法了。蕴藏在内心,就浑厚深邃,精妙纯粹,贯彻到隐微的事情上而使教化的源头得到端正。在心以外运用起来就交相发作,彼此施用,错综在万种变化之中而使教化治理得到光大。它们相配合的功用是这样的神妙,朱熹所以讲治民必须要用刚、柔、正直三种德行,实际是灵活运用的手法。陈卿所以说:君王的法则是用来体察规律,用来建立根本的。三种德行是用来极尽变化的,是用来适应时代需要的。这些话是得到那要旨的啊!

五帝三王时代的政治很隆盛,高水平的道德显得深远广大,运用治理的妙处,六种经典都不能够具体地反映它。大略地观看那时候的事迹就可以见到:帝舜辅助教化彰明刑罚,让人怀疑是用刚了,可用舞羽的礼仪去感化三苗部落,又是多么柔和啊!大禹下车对罪人哭泣,让人怀疑是用柔了,可对迟到的诸侯防风氏加以诛戮,又是多么刚硬啊!商汤威武地执着大斧,让人怀疑是用刚了,可宽和地施政,又是多么柔和啊!用刚时像秋天那样严肃不讲情面,但是人们不会把这做法认为是个人间的仇怨,用柔时像春天那样温润宜物,但是人们不会把这做法认为是个人间的恩德。总之归于和平、安康、正直就是了。这就是舜禹、成汤善于效法天的做法啊!

从此之后,世道逐渐衰落,上天也不赐予九种治国大法,当世的君主不明白大道,喜爱或憎恨反复无常,既不能建立君王法则的本体,至于他们治理社会,也是使用与他们才能性格相近的做法去达到目的。汉文帝亲自修心清静无为,几乎达到不用刑罚,似乎是善于治理天下了,然而对强大的宗室和凶悍的匈奴就不能够制服了。汉宣帝用刑名法术约束臣民,表彰并任用循良官吏,似乎是善于治理天下了,然而无辜被杀的人不是完全没有的。东汉光武帝总揽权力政纲,大致上也兼用柔道,然而他迷信谶纬,用刑有失,从而被后世非议。唐太宗用力施行仁义固然已经亲身创造太平局面,然而用刀剑杀害了兄弟,就有遗憾的地方了。汉明帝推行政务严厉急切,汉章帝处理事务讲求宽厚,唐宣宗听事判断很精明但没有仁义恩德,宋仁宗仁厚

柔弱而刚武不足,那又是只知用某一方面而不知用另一方面的表现,正是人们所讲的只向东壁望去而看不见西墙的表现啊!这些是被称为英明君主、智慧君王的人了,仍然这个样子,又何况是优柔寡断喜爱儒术而倒持国柄的汉元帝,威猛刚强效法武帝和宣帝而被外戚控制的汉哀帝,含忍姑息而受方镇压逼的唐代宗,个性猜忌刻薄而流亡于奉天的唐德宗,像这些人,又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

我们的太祖高皇帝崛起于淮河流域的土地上,创建了我们的国家,在主体上完全具备了不外露的德性,治理方面包纳了往日的圣帝明王。观看他和合安抚四方少数民族,不必设法远征,那么就连舜帝用舞羽作为感化手段的做法也不足以称为文;打败张士诚吴政权,消灭陈友谅汉势力,把人民从水火中拯救出来,那么就连商汤秉钺征伐的做法也不足以称为武。制定律令,铲除强硬违抗的人,那么就连帝舜使用象征性刑罚诛杀反逆的做法也不足以称为威;赦免无意过失及其所造成的危害,蠲免田租,那么就连大禹对罪人哭泣,商汤把鸟网张开三面的做法也不足以称为德。臣下我常常伏身阅读太祖对《洪范》的注解,把原文中默默地安定臣民的那些话归于天,把原文中让他们和睦地居住的那些话归属于君王。仰头而称颂说:这是皇天第二次把九种治国大法赐给我们圣祖啊!

这个社会的人民归属于君王法则和会集在君王法则之下已经二百年了,我们的陛下继承美好神圣的事业,精心追求上等的治理,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处理事情有标准法度,遵从着事物的特点去顺应形势发展,偏好或憎恨的私心就不曾产生;铲除浮华虚伪,加固根本,求取实际,偏颇的陋习就得以消除。蠲免拖欠的赋税,谨慎地处理案件,奖赏贤能的人,实行官职久任制度,这是最有恩的表现啊!是用柔的治理手法啊!振作地方部队,整治学校,打击游侠,宣布禁令,这是最有威严的表现啊!是用刚的治理手法啊!臣下我常常伏身阅读圣上的教导,圣上说朕正在高兴地与臣民共同会归到君王法则的道路上。又说,使政治归于广博平坦的领域。我又仰头称颂说:这是上天第三次把九种大法赐给我皇上啊!

振作纪纲,平民安居乐业,四方部族归附,各种吉庆之事都畅顺

实现，建立君主法则的根本和三种德行的运用，陛下都的确实践了，因而中正和平共同依归君王法则的化导，已经等同于列祖列宗，可追配于智慧君王了。可是圣上在询问中还认为教化尚未广博，风俗尚未同一，吏治尚未全部归于淳正，人心尚未完全归于厚朴，自己引罪认为自己未能够端正好恶对象，未能够运用好三种德行，从而询求并得到彰明教化、端正风俗、驾驭官吏、率领人民走向治理的方法。臣下我很愚蠢，哪里足以知道这些事情呢？虽然是这样，臣下我听古语说过：君主出主意而臣下做实际事务。因此宣明义理的人是君主，擅长办事的人是臣下啊！现在朝廷把彰明教化、端正风俗、驾驭官吏、统率人民的意图与办法，在诏令中颁布，又在章程中明文规定，实在已经做得很精细很周备了。只管命令有关的官员们做好他们的工作和履行好他们的职责，陛下端坐拱手接受现成的结果就行了，何必另外寻求其他方法呢？只把心意集中在这一点上，臣下我就冒昧地献上两句话吧！

其一是要表明用刚用柔二种手法的实际作用，其二是坚定地立下持久实行的心志。这两方面，臣下我认为是治理天下的主旨啊！圣人所讲的使用刚的手法理政，这并不是说要用严刑峻法去建立威严。订立法规从而使人民不敢违犯，统一命令从而使人民知道要好好地遵守。讲行赏就要该赏必赏，讲过罚就要该罚必罚，兴办事情，考核成就，实事求是，因而苟且浮荡、懒惰败坏的人就不能够在我的治理中造成损害，这就是用刚的实际做法啊！圣人的所谓用柔，并不是说姑息纵容，把恩德故意赐给对方。怜悯才能有限的人，赦免小过失，不侮辱孤苦的人，不虐待没有地方说理的人，救济穷困者致使民间没有人发出生活穷苦的愁叹声，审理冤案致使监狱中没有沉积滞留的案犯，这就是用柔的实际做法啊！将淳厚宽大寓于勉立功勋之中，在忠厚中行用正直，把正义作为威严而不是把发怒作为威严，用德表示恩惠而不是用私情表示恩惠，这就是圣上在询问中所讲的善于运用三种德行的做法了。世上讨论治理的人不明白这一点，草率地一见到朝廷行使法制，就认为这样做太刚硬，从而把行用法制跟用严刑峻法等同起来，加以讥刺。只见到政府有姑息萎靡的表现，就认

为这样做是使用柔的手法，从而把使用柔跟施恩保爱人民的做法等同起来加以称誉。这些士人都是不懂得权衡变化的。所以对于刚柔手法的实际运用，臣下我希望陛下能加以辨别。

天道运行不停，所以能够长久地化育万物。帝道运用不停，才能够深入地表现出教化遍及一切的仁德。所以事情美满成功在于能够持久，然而人的情志常常是开始勤恳但最后却怠惰起来了，所以圣人治理天下就要兢兢业业，慎终如始。这就如同太阳月亮的轮流照耀和阴阳二气的交互消长，是没有一天不在太虚中间运动的，根本看不到它们停止运动，所以阴阳二气化生万物就没有壅塞，一年的化育生成就形成。世上那些专门只看眼前利益的人，只要一见到人们不遵从教化，见到社会没达到治理，不是愤恨顽固不化而求全责备，就是感到困难又中途废止，这是治理只能达到小康局面的原因。所以用长久之道很重要，臣下我希望陛下体察这一点。

如果真像上面所说的那样去做，用来彰明教化，哪里还用担心教化未能广博呢？用来端正风俗，哪里还用担心风俗未能一致呢？用来驾驭官吏，哪里还用担心吏治不纯正呢？用来领导人民，哪里还用担心民心不厚道呢？至于子产用水与火来比喻施政的宽大与严猛，贾谊用利刃与用斧斤来比拟施德与施法，崔寔用精美肉食与药物石针来说明施政的用宽与用严，他们的用意都相同，都是主张用刚硬手法的。董仲舒用阴与阳来配比施政的用刑与用德，陈宠用弹琴与鼓瑟来论证施政的用缓与用急，他们的用意都相同，都是主张用柔和手法的。这些论调只是一种憎恨社会不合理的一家之谈，并不是一种达到治理的通行理论。天是不能够锁住阳气而单用阴气来养育生成万物的，那么君主的统治难道可以一边倒地使用刚或使用柔的手法吗？他们那些人想矫正当世君主的偏颇，却不知道自己已经陷入偏颇了。这就不足以再为陛下讲论他们如何了。

虽然是这样，仍旧是有根本性的东西的。三种德行的运用本来是出自一颗心，这颗心就不可以稍受蒙蔽。如果心被爱或被憎蒙蔽了，那么欢喜或发怒就会表现出来，个人的好恶也跟着产生了；心被自私或邪念蒙蔽了，那么对人才的是否使用就会有差错，偏袒与朋党

就会形成了；心被享乐思想蒙蔽住，那么意志就会昏暗，偏颇怪僻的行为也就显现出来了。教化的本原不端正而希望运用三种德行，岂不是有困难吗？臣下我希望陛下要建立君王法则就得一定从内心求取。态度恭敬，天下就会严肃；言语合乎道理，天下就会大治；观察事物清楚明白，就不会受到蒙蔽；听取意见聪敏，就不会打错主意；考虑问题明智，就可以成为圣人。恭敬的品德一定要坚持为学光明，刚健的精神一定要达到纯粹，那么一个慈爱的念头就是仁，一个裁制的想法就是义，这样才讲得上是合乎上天的心法，而推行起来就是效法上天的治法。人民都会归于君王法则之下，社会步入正直和平的状态，而安康强大、繁盛吉祥的欢庆景象就确实出现在当代了。臣下我虽然愚蠢，但感到很幸运，天下也感到很幸运。臣下我出身低贱，知识短少，不懂忌讳，冒犯皇上尊严，感到罪该万死，简直恐惧到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萧良有　殿试对策

萧良有(1550～1602)　字以占，号汉冲，汉阳(今湖北武汉市)人。自幼有神童之称。万历八年(1580)榜眼，时年31岁。后领国子祭酒，在史局十五年，颇负公辅之望。在政府供职期间，朝廷各部门遇有国家大计，均向其咨询。因遭人劾奏侵权，遂辞归。著有《玉堂遗稿》。

臣对：臣闻帝王之继天以凝命也，必全君德，以端天下之大本，而后可以弘建极之功；必酌时宜，以运天下之大权，而后可以臻归极之化。何谓本？涵之渊微，敛之密勿，宽裕温柔，蔼然而为仁，发强刚毅，截然而为义是已。一有弗全，则乖君德，而心法之蕴也，且偏驳而不纯。何谓权？布之经纶，宣之法制，出其仁以为柔，而和平之惠普，出其义以为刚，而震叠之威行是已。一有弗酌，则拂时宜，而治法之施也，将壅阏而不畅。故必以仁义全君德，而措之乎刚柔。天下谓其沈潜，而刚克者固在也；天下谓其高明，而柔克者固在也，则皇极之体

立,而建极之功可肇修于上矣。又必以刚柔酌时宜,而基之乎仁义。虑天下之以委靡兆敝端,而义以振之也;虑天下之以操切伤国脉,而仁以绥之也,则皇极之用彰,而归极之化可丕应于下矣。古帝王一人握纪而百辟承风,五位凝精而九围式命,遵此道耳。晚近世柔焉而遂废乎刚,刚焉而遂忘乎柔,则大本之所蕴既乖。宜刚也而柔隳之,宜柔也而刚激之,则大权之所施又拂。奚怪乎功业之鲜蓁隆,而治化之难周洽也哉?

钦惟皇帝陛下,秉聪明睿智之资,备文武圣神之德。孝养纯至,俨乎一视膳之规;问学精勤,宛乎一访落之矩。贤俊登于寮采,威德覆于华夷,四海安澜,五辰顺轨,固已臻上理、底宁平矣。乃犹圣不自圣,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拳拳于皇极三德之说,追三代之淳风,鹭后王之已事,而咨度臣等以明教正俗、驭吏率人之道也。岂以臣等中亦有能阐经术、揭化原、以仰助我皇上建极之万一者乎?顾臣非其人也。虽然,臣愚力惭稽古,志切输忠有日矣,其敢不披沥以对!

窃惟《周书·洪范》,非古帝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乎!兹试考之:建用皇极,是君人者之心法也。精一不杂,以宰乎刚柔,即三德之隐而未见者也。乂用三德,是君人者之治法也。刚柔相济,以成乎正直,即皇极之显而大行者也。有皇极为之统摄,故曰以体常,以立本;有三德为之权衡,故曰以尽变,以趋时。舍刚柔而求正直,与不善用三德而猥云极之建者,均非矣。信哉!二者之异用而同体也。

胡不引虞夏殷之事观之?格苗以干羽,而好生之德洽乎民心。人皆曰舜之用柔矣,乃象刑弼教,又何章章然放流必严也!肆会以统众,而防风之戮不少假借。人皆曰禹之用刚矣,乃罪人遇途,又何劬劬然下车而泣也!优优以敷政,而子惠之恩遍于困穷。人皆曰汤之用柔矣,乃秉钺宣威,又何烈烈然为乱流殄也!夫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以为天下方林林总总,待我以约束,而为之弛法制,隳禁令,则马脱于辔衔,兕脱于牢槛,治体日亵于上,而纪法日玩于下,天下几何而理也?是不明于刚之德者也,非正直也。又以为天下方喁喁嗷嗷,待我以安养,而为之持苛细,尚综核,则鱼乱於网罟,鸟乱於毕弋,四海莫必其命,而万民莫若其生,天下又几何而理也?是不明于柔之德者也,

非正直也。彼帝王诚辨之矣，以刚柔时措为正直，以正直懋建为皇极。故三代之隆，不袭法而奏功，不易民而成化，岂非君德全而时宜不拂之效哉！

溯汉以来，号英谊之君而享熙平之治者，大抵皆繇于此。文帝躬修玄默，专尚德化，而风移俗易，基炎祚之长。宣帝刑章绳下，综核名实，而吏称民安，阐中兴之烈。太宗力行仁义，身致太平，而贞观之理，于唐为盛。世祖柔道理物，总揽权纲，而建武之业，于汉有光。之四君，皆能审势度时，补偏救弊，庶几乎善用三德者。顾人徒知其治之美，而不知其时之宜也。藉令任综核于高惠继体之时，则刻矣。守仁柔于博陆擅权之日，则隳矣。峻刑威于亡隋苛察之后，则暴矣。忽总揽于汉家再造之初，则弛矣。何以明其然也？政务严切，事从宽厚，明章异尚也，然而各适于治也。因时而措，无害其与治同道焉耳。优柔好儒术，威强则武宣，元哀异趋也，然而均底于乱也。拂时而施，均之为与乱同事焉耳。宋仁宗时当休养，因而仁柔，庆历之盛所由建也。苟以含容养乱如代宗者律之，而谓太柔之必废，可乎哉？唐宣宗时当振奋，因而精断，贞观之美所由媲也。苟以猜刻播迁如德宗者律之，而谓太刚之必折，可乎哉？繇斯以谈皇极，刚柔之德固非有所低昂也，贵乎兼济。亦非有所先后也，要在相时。往迹班班，可考镜已。

仰惟皇上临御以来，泰道一新，休风四讫。所为明诏天下，黜朋比，期荡平，祛伪划浮，敦本责实，盖八载于兹矣。而宸衷益孜孜，不能无疑于教化未洽，风俗未同，吏治未尽还淳，人心未尽归厚，焰然若以为三德之用，尚有所未尽当也。大哉皇言，是何其望治之殷而自责之重也，一至此哉！臣窃以为，上之化下，犹风之偃草也；下之从上，若泥之在陶也。以陛下之建极绥猷如此其至，薄海内外宜何如以应之！乃今天下有少谬不然者：教化宜洽也，而渐仁摩义之效稀闻，每廑程颢之叹。风俗宜同也，而葭礼败度之愆弥炽，恒切荀卿之忧。吏治之还淳，岂尽无之？然武健儇巧而希最课者，往往政阙于凤鸾。人心之归厚，岂尽无之？然嵬琐奇邪而取世资者，往往弊流于鬼蜮。如是而欲仰追治古，陋晚近世于不居，难矣。是宜宵旰咨询而深致审于皇极刚柔之说也。

臣愚以为,刚柔非异用也,乃仁义之时出而襄其政者也。譬之水寒而火热也,可相有而不可相无也。譬之水润而火燥也,可相济而不可相病也。贵在因时而措云耳。今陛下独秉全德,兼听穆清,仁煦如春,义肃如秋,大本业已端矣。斟酌其大权之运而时措之,则今政之所宜先者,不可得而筹乎!盖承平既极,则人情之偷惰渐生;泰阶既宁,则天下之疵颣从起。化之所以壅,谓非因循之过,不可也。臣愿陛下察理道之原,谨时几之敕,究循袭之弊,大振刷之规。教化未洽,司教者之责也。得一胡瑗其人亟奖之。苟视立教兴化为故事,则惩戒之典不可以弗严。风俗未同,维风者之咎也。得一韩延寿其人亟擢之。苟忽移风易俗为弥文,则激扬之章不可以弗饬。理人而有黄霸、召信臣之绩,优以玺书可也,迁其爵禄亦可也。不然,虽烹阿如齐威,而不以为忍。敦行而有徐积、王彦方之风,表其阀阅可也,迎以蒲轮亦可也。不然,虽诛正卯如尼父,而不以为刻。庶天下晓然见德教而曰:大圣人之迪我如此也;又凛然畏明威而曰:大圣人之不轻于贳我如此也。孰有不回心向道,而涤志以承休者哉?

嗟乎!子产之告太叔也,以水火论宽猛,而戒水柔之易狎。陈宠之告章帝也,以琴瑟喻缓急,而谓惩黩之宜威。芒刃斧斤,则贾谊感诸侯之髋髀,而欲消七国之衅。粱肉药石,则崔寔痛外戚之暴横,而欲折两大之萌。彼四说者,良吉人经世之远图,亦今日济时之宏轫也。毋论四子,即使董相生于斯世,不复以任德不任刑之说进矣。虽然,炮烙剔刻,骥诚苦之,顾所以调骥之性,使无败乘者,则炮烙剔刻之功也。青黄雕镂,木诚患之,顾所以成木之用,使无弃材者,则青黄雕镂之力也。今陛下诚奋明威于孔赫,措德教于丕昭,则虽严也,亦宽之用也,虽义也,而独非所以善成其仁也欤?端大本以弘建极之功,而皇极三德之用豫;运大权以臻归极之化,而皇极三德之体成。陟五三之登闳,而视汉唐宋为朴樕无足数者,端有望于今日也已。

抑臣于终篇犹有献焉。朝廷者,四方之极也;正心者,平情之原也。故以遵道敏德望天下,则本原之地当始诸朝廷;以刚柔正直约吾情,则涵养之功当严于方寸。唐虞所谓精一,三代所谓中,而近代之所以戾焉而靡当,与夫杂焉而未醇者,皆是物也。盖其本不可诬,而

其机不可忽者也。臣愿陛下握化枢于宥密，慎理欲于初分。自大廷以及深宫，无地非敬，即幽独而严时保之忱；自常伯以及虎贲，无人弗敬，即匹妇而切胜予之儆。经费可节，用从其省，无以物力方富而兴土木；驰骋可娱，几严诸独，无以春秋鼎盛而事盘游。则由是而出焉，一念之果毅，即刚之正直也，天下所以肃然而恐也；一念之惻怛，即柔之正直也，天下所以蔼然而孚也。有心极而建极之用，妙于一身；有身极而归极之化，横乎四海。如是而犹患于教化未治，风俗未同，吏治未尽淳，人心未尽厚，天下无是理矣。於乎！君譬则盂也，天下譬则水也，水之方员，未有不随盂者，故正己所以率物也。心譬则帅也，刚柔之情譬则卒也，卒之振靡，未有不随帅者，故养心所以平情也。其效甚弘，而其机特在陛下之方寸间耳，惟圣明留意焉。臣草茅之士，不识忌讳，干冒宸严，无任战悚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跟随在天命的后面，牢牢保住皇天授予的统治权，就必定要使君主的德行非常完美，用来端正天下的根本，然后可以扩展那番建立起最高准则的功业。必定要斟酌当前该妥善解决的事情，用来运用起统领天下的重大策略，然后可以进入那种全民都归向最高准则的教化境地。什么叫做根本呢？也就是在深沉精微的内心里加强涵养，在十分机密的处所予以集中，宽厚大度，温和柔惠，非常慈祥地施布仁德；显出强盛，刚硬坚毅，非常果断地执行正义。如果出现一处不完美的地方，君主的德行也就有所违背了，而心治大法的蕴积，就会偏执驳杂而不纯正了。什么叫做策略呢？也就是施布在治理国家上，宣示在法令制度上，显出那仁德来，构成柔和的一手，而温和平正的恩惠扩及到所有民众；显出那正义来，构成刚强的一手，而那致使天下震惊恐惧的威势延布到四面八方。如果出现一处没做斟酌的地方，当前该妥善解决的事情也就有所违逆了，而施治大法的施用，就会受到阻碍而不顺畅了。所以一定要凭借仁德和正义来使君主的德行达到完美的程度，并对刚强与柔和的两手策略做出安排来。天下都说他性情柔和，而我用刚强去征服他的策略就等待在那里。天下都说他性情刚强，而我用柔和去征服他的策

略就等待在那里。这样一来，最高准则的主体就得以确立起来，而确立起最高准则的功业就能够在上面开始进行了。同时一定要凭借刚强与柔和的两手策略去斟酌当前该妥善解决的事情，并且把它建立在仁德与正义的基础之上。忧虑天下因它萎靡不振而萌生出弊端来，就依靠正义把它振作起来。忧虑天下由于办事过急而伤害国家的命脉，就依靠仁德把它稳定住。这样一来，最高准则的具体运用就得以彰明，而全国都归向最高准则的教化就能够在下面普遍响应了。古代的帝王由一个人掌握着纲纪而文武百官全都照着去办，身居帝位凝聚起精思而九州全都唯命是从，正是遵用这种治国的大道啊！近代以来，一讲求柔和，就把刚强抛在一边；一讲求刚强，就把柔和忘在脑后。这样一来，在根本所要蕴积的方面，就已经形成违逆的情况了。而应当讲求刚强时，即用柔和去破坏它；应当讲求柔和时，却用刚强去冲击它。这样一来，在重大策略所要施用的方面，又造成违逆的情况了。这还责怪什么功业很少特隆盛而治理化导难以遍及各个角落呢？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秉承聪明智慧的天资，具备文韬武略、圣明神妙的品德。孝敬和奉养母后达到极点，俨然和当年周武王察看周文王用饭的做法一个样。探求帝王的学问精细勤勉，宛然和《诗经》中《访落》诗所描述的情景一个样。贤才英杰都进入了百官的行列，威势与恩德覆盖了整个华夏和少数部族居住区，四海风平浪静，五大行星正常运行，原本上就已经步入最美好的治理状态，达到太平了。可仍然已经圣明却不自以为圣明，特地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从上面赐下清晰详审的询问，对古代确立最高准则和三种德性的说法尤为关注，要追比夏商周三代的淳厚风气，超过后代帝王已经做过的事情，用宣明教化、端正社会风气、驾驭官吏、引导百姓的办法来向臣下我等人做征询。这恐怕是因为臣下我等人当中，也有人能够阐明经术，揭示教化的本原，往上略微协助我皇上确立起最高准则吧？但臣下我却不是那样的人选呀！尽管如此，臣下我虽很愚昧，在能力上对考察古代深感惭愧，但内心只想献上忠诚却有很长时间了，哪敢不披肝沥胆来做对答呢？

私下想来,《尚书》中《周书·洪范》这篇经文,难道不是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典和总原则吗?如今试作考论:经中所说的确立起最高准则,这正属于君主的心治大法啊!内心精微专一而不驳杂,用来支配刚强与柔和两手策略,也就是对具有三种德行的人进行治理而隐藏在心中、尚未显露出来的东西啊!经中所说的,对具有三种德行的人进行治理,这正属于君主的施治大法啊!刚强与柔和互相补充,用来使人们都变得中正平和,也就是最高准则公布在世上而得到普遍贯彻执行的东西啊!拥有最高准则来进行统领,所以就说它是用来体悟那个总原则的,是用来定立起那个根本的。拥有对三种德行的人进行治理的方法来做灵活运用,所以就说它是用来对付一切变化的,是用来适应时势的需要的。舍弃刚强与柔和的两手策略而去求得人们都变得中正平和,这与不擅长运用对具有三种德行的人进行治理的方法,但却装样子说什么最高准则已经建立起来了,统统都是错误的了。刚强与柔和用处不同但却主体相同,这是千真万确的!

为什么不引用虞舜和夏朝、商朝的事例来考察一番呢?通过演出持盾执羽的文德乐舞,致使三苗部落顺服,而爱惜生命的仁德深入民心,由此人们都说虞舜是在施用柔和的策略了,可竟用象征性的刑罚来辅助教化,又是多么明显地必定要把共工、欢兜这类大罪人严厉地流放到幽州和崇山哪!举行盟会来统领各个部落,而对迟到的防风氏予以斩杀,一点儿也不宽恕,由此人们都说大禹是在施用刚强的策略了,可竟在路上碰到被惩处的罪犯,又是多么怜悯地从车上下来而对他哭泣啊!宽和地去推行政令,就像对待儿子一样施布的恩惠遍及到所有穷困的人,由此人们都说商汤是施用柔和的策略了,可竟手持大斧,宣明威势,又是多么凶猛地把作乱的人流放斩杀啊!圣人的用意,从这些事例中也大致可以看出来了。认为天下正事端太多,等待我去整治,可却向人们放松法度规制,废弃禁令,结果就像马匹挣脱开马笼头,形状如牛的野兽挣脱开牢笼,施治的纲要在上面一天比一天被玷污,法度纲纪在下面一天比一天受轻视,天下可什么时候会得到治理呢?这纯属对刚强的德性一点儿都不明白的表现,决不是中正平和啊!又认为天下正挨饿受冻,等待我去安抚养育,可却向人们施行

苛酷繁琐的政务，看重那汇总验核的办法，结果就像鱼儿在鱼网中乱蹦，鸟儿在鸟网中乱窜，全国各地没有谁能够生命确有保障，万民没有谁能够生活顺心，天下可什么时候会得到治理呢？这纯属对柔和的德性一点儿都不明白的表现，决不是中正平和啊！那些古代的帝王确实都辨别过以上两种倾向了，于是把根据时势的需要施用刚强与柔和的两手策略作为中正平和的体现，把中正平和的广泛形成作为最高的准则，因而夏商周政治隆盛，不沿用前代的法度却大见功效，没改换原有的民众却教化成功。这难道还不是君主德行完美而当前应当妥善解决的事情并不存在违逆的极好证明吗？

从汉朝延续下来，号称英明而取得太平盛治的君主，基本上都是出自上述的原因。西汉文帝亲自实行无为而治，专门重视仁德教化，致使社会风俗得到改变，给西汉的长久国运打下了基础。西汉宣帝又用法律章程来制约下面的人，在名位和实效上进行汇总验核，官吏都称职，百姓全安定，以至创立了使国家由衰弱转为强盛的功业。唐太宗大力推行仁义，亲身实现了太平，而贞观之治在整个唐代最为兴盛。东汉世祖采用柔和的办法处理事物，总揽大权和治国的纲领，而建武时期成就的功业对汉朝大有弘扬。这四位君主，都能够审时度势，弥补偏失，救正弊病，差不多够得上是擅长对三种德行的人进行治理的君主了。但人们只知道他们的美好治绩，却不知道他们适合那特定时势的需要啊！假设在西汉惠帝继承高祖帝位的时候却只管采用汇总验核的办法，那就变成苛酷了。在博陆侯霍光专权的西汉昭帝时期却持守仁爱柔和的策略，那就变成毁败了。在苛刻细察的隋朝灭亡以后却加重刑罚威慑，那就变成残暴了。在汉朝重新建立政权的初期却不重视总揽大权，那就变成废弛了。根据什么能够证明是以上的情况呢？一个政务严厉苛刻，另一个政事按宽厚处置，构成了东汉明帝与章帝所看重的不同的施政方法，然而各自适合各自的治理。根据时势的需要采取适宜的施政方法，并不妨害他们在大治的同一条道路上奔啊！一个优柔寡断，喜好儒家经术，另一个威猛刚强，效法武帝和宣帝，构成了西汉元帝与哀帝的不同倾向，然而最后全都归于败乱。与时势相违背而实行不恰当的施政方法，全都属

于和败乱是一码事啊!宋仁宋正处于应该休养生息的时候,因而采用仁德柔和的施政方法,这是庆历年间隆盛治绩得以建立的原由啊!如果拿纵容姑息、酿造祸乱的唐代宗来同宋仁宗对照,就说太柔和必定会废弛,这能讲得通吗?唐宣宗正处于应该振扬奋发的时候,因而精明果断,这是能和太宗贞观之治相媲美的原由啊!如果拿猜忌刻薄、逃出京师的唐德宗来同唐宣宗对照,就说太刚强必定会受挫折,这能讲得通吗?从上述情况来谈论确立起最高准则,那么,刚强与柔和的两手策略原本上就不存在着主要与次要的区别,可贵的是彼此补充;也不存在着居前与居后的区别,关键在于认清时势的需要。历史上的迹象明摆在那里,是可以考察得相当清楚的。

仰望想来,皇上自从登上帝位以来,太平和顺的治国之道焕然一新,吉祥美好的风气遍及四面八方。向天下明确地颁布诏令,斥除结党营私的现象,期望达到王道坦荡平正,摒弃虚伪,革除浮华,促进根本,讲求实效。所做的这一切,到现在已经历时八年了。但皇上的用心更加孜孜不倦,对教化还没普及,社会风气尚未相同,吏治还没有完全返回到纯正的状态,人心尚未全都归向淳厚,不能不产生疑虑,非常明显地像是感到对具有三种德性的人进行治理的方法,还存在着不十分恰当的情况。皇上的这番话语说得多么重要啊!渴望实现大治又是何等地殷切啊!自己责备自己又是何等地深重啊!竟然达到了这般地步!臣下我私自认为,上面的人化导下面的人,就像风一吹过而草就倒伏;下面的人服从上面的人,就像泥土装在模子里来铸造。凭借陛下确立起最高准则并有效地施行这方面的教化已经达到了这般地步,那么一直到全国各地的人们,应该怎样来做出回应呢?可如今天下中却存在着做得稍微不对的人们。教化本来应是普遍的,可在仁德与正义方面逐步磨炼的效果上,却很少能听到,常常让人发出当年程颢那样的慨叹。社会风气本来应是相同的,可蔑视礼法、败坏制度的过失却越来越厉害,常常让人感受到当年荀况那样的忧虑。吏治返回到纯正的状态,哪里是一点儿也没有呢?然而武断地审理案件、狡诈习巧而希图在考核中名列第一的官员,往往在中央最高决策机关那里受到赏识。人心归向淳厚,哪里是一点儿也没有呢?

然而低贱渺小、专搞歪门邪道而获取到世代作为职业的人，往往在动乱的地区煽动祸乱。像这样却想追比大治的上古时代，看不起近代而把它们甩在一旁，也就太难了。这就难怪皇上从早到晚要做咨询并深切延揽，对最高准则和刚强与柔和的两手策略尤为关注了。

臣下我愚昧地认为，刚强与柔和并不是用途不一样啊！它们都是仁德与正义根据时势推行起来、辅助那国政的东西啊！这就如同水性寒而火性热，可以两者并存而不能缺少其中的一种啊！这就如同水往低处流而火往高处窜，可以彼此补充而不能相互妨害啊！贵在根据时势的需要做出安排罢了。如今陛下独自具有完美的德行，同时顺从皇天，仁德像春天一般的温暖，正义像秋天一般的肃杀，根本已经端正了。那么斟酌那重大策略的运用，按照时势的需要做出安排，如今应当放在首位来处置的国政，难道还不能够筹划吗？大致上说来，太平盛世已经达到极点，人们苟且懈怠的观念就逐渐会滋生出来；天上象征太平的三阶星长期安定，天底下的各种弊端就随之出现。教化受到阻遏的原因，说是并非按照老样子去做的过错，这是讲不通的。

臣下我希望陛下明察治国之道的本原，谨慎地对待那时刻警惕、注意苗头、永保天命的诫语，查明按老样子去做的弊害，加强振作与刷新的法规。教化还没遍及到各个角落，这属于掌管教化的官员的责任。得到一个像北宋胡瑗那样的人物，就马上奖励他。如果有谁把兴行教化当成例行公事来看待，那么，国家关于惩办警戒的规定，就不能不严厉地执行。社会风气尚未相同，这属于维系社会风气的官员的罪责。得到一个像西汉韩延寿那样的人物，就马上提升他。如果有谁把移风易俗当成一纸空文来轻视，那么，朝廷关于激励弘扬民风的规章，就不能不加以申饬。治理民众取得了像西汉黄霸、召信臣那样的政绩，效仿汉宣帝颁发诏书特予褒奖也是可以的，效仿汉元帝提升他的官职俸禄也是可以的。与此相反的话，即使像战国齐威王把阿邑的长官下油锅炸死，也不认为是残忍。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而有北宋徐积、王彦方那样的风范，旌表他的家世门第也是可以的，派专车去迎接也是可以的。与此相反的话，即使像孔子诛杀少正卯，也不认为是苛酷。这样做，致使天下人看到仁德方面的教化就非常明白地

说:大圣人启迪我就像这个样子啊!又害怕严明的惩罚而十分畏惧地说:大圣人不轻易饶恕我就像这个样子啊!还会有谁不回转心意,归向大道,洗涤心志,来承奉那美好的结局呢?

哎呀呀!春秋时郑国的子产嘱告太叔,借用水和火来讲论施政的宽大与威猛,特别告诫水性太柔和,人们就容易不当一回事。陈宠嘱告东汉章帝,借用琴和瑟来比喻施政的缓和与急切,强调惩治奸邪应当严厉。仁义是刀锋而法度是斧子的比喻,出于西汉贾谊有感同姓诸侯王势力强硬,希望消除吴王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反叛行为。德教是精米肥肉和刑罚是药物石针的比喻,又出于东汉崔寔痛恨当时外戚凶暴蛮横,希望杜绝住和天子分庭抗礼的苗头。以上这四个人的说法,确实是吉善的人治理国政的长远谋划,也是当今救助时势的宏大规则啊!不用说子产等四个人,即使是西汉董仲舒生活在当今这个社会,也不再用崇尚仁德而不崇尚刑罚的主张来进献了。尽管如此,打上烙印和刻上标记,确实是骏马感到痛苦的事情,但驯好骏马的情性、使车辆没有被拉坏的情况,恰恰是给骏马打上烙印和刻上标记带来的功效啊!涂上颜色和进行雕刻,确实是木头感到痛苦的事情,但发挥出木头的用处,使人们没有把木头扔掉的现象,恰恰是对木头涂上颜色和进行雕刻所造成的力量啊!如今陛下确实万分显赫地奋扬起严明的威势,非常鲜亮地安排好仁德的教化,即使严厉,也恰恰是宽和的施用;即使正义不可侵犯,偏偏就不是善于培养成人们的仁德了吗?端正根本去扩展那建立最高准则的功业,而最高准则和治理具有三种德性的人,其具体施用也就绰绰有余了。运用重大的策略去达到那使人全都归向最高准则的教化境界,而最高准则和治理具有三种德性的人,其主体也就得以形成了。赶上五帝三王的隆盛治绩,把汉朝、唐朝、宋朝看成是树林中的小丛木,根本不值一提,确实还指望在今天能实现啊!

不过臣下我在答卷的末尾还有建议要献上。朝廷是天下四方的中心,端正心念是使情性归于平正的本原。因而用遵循大道和德行勤敏来向天下提出要求,本原所在就应当从朝廷做起。用刚强、柔和变成中正平和来约束我的情性,涵养的功夫就应当在内心强化。唐尧

虞舜所讲的精粹纯一，夏商周三代所讲的不偏不倚，而近代之所以违逆而不恰当的表现，以及驳杂而不纯粹的表现，都是由这个东西所决定的。属于那个根本决不可以欺骗和那个机缘决不可以忽略的事情啊！臣下我希望陛下在宽和宁静的心态下把握住教化的枢纽，在天理和人欲开始冲撞的时候保持谨慎的态度。从议论国政的殿廷直到后宫，没有一处地方不保持恭敬，即使就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要恪守保有天命的诚心。从文官一直到武将，要让他们没有一个人不保持恭敬，即使是一名妇女，也叫她牢记注意我的妆扮的诚语。经费可以节省的，在使用上就依从节省来办，不要因为物力正雄厚而大兴土木。骑马打猎可以娱乐，但在一个人的时候要严格注意，不要因为年富力强就沉溺在游玩享乐当中。做到这样，那么再拿出治国的措施来，一个果断坚毅的念头就会使性情刚强的人变得中正平和，一个哀怜悯惜的念头就会使性情柔弱的人变得中正平和全天下由此就慈爱地心服了。拥有内心的极高境界，而确立起最高准则的具体施用也就在自身神妙无比；拥有自家行动上的最高表现，而人们全都归向最高准则的教化结果，也就散布到全国各地。像这样还忧虑教化尚未普及，社会风气尚未相同，吏治尚未完全纯正，人心尚未全都淳厚，世上是从来没有这个道理的。哎呀呀！君主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杯子呀，整个天下打个比方来说就是水呀，水成方形还是成为圆形，没有不依从杯子来决定的呀！因此端正好自身，目的是统领万物啊！人心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元帅呀，刚强与柔和的性情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士兵呀，士兵斗志昂扬还是斗志消沉，没有不依从元帅来决定的呀！因此修养好那颗心，目的是使性情归于平正啊！它那功效非常广泛，而那机缘就只在陛下的内心里运作罢了。只请圣明的皇上对此予以高度注意。臣下我属于民间的一个读书人，不懂得忌讳，触犯了皇上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皑译〕

明神宗万历十七年(1589)己丑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殿试策问

[万历十七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立纲陈纪，移风易俗，一禀于礼法，使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然后体统正于朝廷，教化行于邦国。所以长久安宁，有此具也。当周之隆，天子总六官，六官总百执事，分职率属而万国理。朕甚嘉之，甚慕之。是操何术而臻此?迨其叔季，先王之遗泽固在也，何以陵夷若是?其兴衰得失之故，可指而言欤?至汉文时，有以弃礼义、捐廉耻长太息者。神爵中，有以述旧礼、明王制为本务者。宋嘉祐间，有论审势、称殷之先罚者。有疏谨习、比唐之季世者。或谓西汉贵刑名而阙于礼文，宋盛声容而疏于法制。然则诸臣之言，果皆应古谊、合时宜者欤?

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敷政立教，尝谕侍臣曰：礼法明则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乃集为《礼制》,著为定式,颁《律令》、《大诰》于天下。洋洋圣谟，布在方策，可得而扬厉欤?朕以冲昧，嗣守鸿业，十有七年，夙夜兢兢，惟成宪旧章是监是率。间者深诏儒臣，进讲《礼经》，重辑《会典》，使

诸司有所遵守，庶几绍休圣绪，以兴太平。乃世教浸衰，物情滋玩，习尚亦少敝焉。其甚者士伍辱将帅，豪右凌有司，宗庶讦亲藩，属吏傲官长。陵替若此，何以消其悖慢，使就约束欤?贪黩败节，奢侈逾制，谗说殄行，虚声贸实，诡异坏心术，倾危乱国是。浇漓若此，何以救其颓靡，使还雅道哉?今诏书数下，中令既严，而帘陛之间，辇毂之下，犹有壅阏不行者。无乃礼教不修，法度不饬欤?抑风会日流而不返，积习已成而难变欤?将朕暗于大道，无能率作省成而示之极也?兹欲礼达而分定，法举而令行，纲维振肃，习俗淳美，以觐扬圣祖之光烈，而远追成周之隆，何施而可?尔多士其悉抒所蕴，详著于篇，称朕意焉，毋有所讳。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孟献子说：刚刚当上大夫的士人对鸡和猪这类家产不用心去积聚，卿大夫以上的人家对牛羊这类家产不去积聚，享有封地的人家对擅长聚敛的臣属不加以豢养。与其养有擅长聚敛的臣属，宁可养有盗取自己封地内的财产的臣属。孟献子这番话强调的是，国家不把夺取百姓的财利当作利益，而是把道义当作利益啊!

圣人的行为并不一样呀!有的疏远国君，有的靠近国君，有的离开朝廷，有的留恋朝廷。归根结底都是使自身保持高洁罢了。我听说伊尹是用唐尧虞舜的治国之道去接近商汤，没听说他通过切肉做菜去接近商汤啊!

出门做事就像接待外宾一样谨慎，役使民众就像承当盛大的祭典一样小心。自己所不愿承受的事物，就不要强加给别人。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确立和张布开朝廷纲纪，移风易俗，完全根据那礼制和法度，致使尊卑具有等级次序，一级

服从一级，然后体统才在朝廷上得到端正，教化才在各个邦国中得到施行。长治久安的原因，正在于定有这一整套礼制和法度啊！适值周代的鼎盛阶段，天子统领天、地、春、夏、秋、冬这六大部门的长官，六大部门的长官又统领所有的朝廷官员。划分出职责，管理起下属，而各个邦国得到了治理。皇帝我对此十分赞赏又非常仰慕。当时究竟是采用什么办法才形成这种局面的呢？到了周朝的末期，先王给天下遗留下来的恩泽依然存在，但为什么竟衰败到那种地步了呢？其中的兴衰得失的缘故，你们能够直接指出来并论证一番吗？到了西汉文帝时，有的人拿当时废弃礼义，抛掉廉耻，视为令人长长叹息的现象。在宣帝神爵年间，有的人把继承古代的礼法，宣明先王的制度，作为现今施政的根本大事。在宋仁宗嘉祐年间，有的人申论要揣度时势，赞同商朝把惩罚放在封赏的前面的做法。有的人上奏章，主张整顿社会风气，并将当时的社会风气比拟成唐朝末叶那个样。还有的人认为，西汉看重刑名法术，但在礼法规定上却很不完备；宋朝在礼仪外观上很讲究，但在刑法制约上却很忽略。既然如此，那么这些臣僚的主张，果真全都既与古代的义旨相应合又同当前的需要相符合吗？

我们太祖高皇帝用华夏政权取代了元朝的统治，施布国政、确立教化，曾经对身边的大臣说：礼仪制度一清二楚，人心就稳定，上下就安宁。又说：制订礼制和定立刑律并不难，使人们遵行礼制和遵守刑律就难了。于是汇辑成《礼制集要》，明确下令，把它作为不可改变的行为规范。又向全天下颁布《大明律》和《御制大诰》。宏大长远的圣明谋划，都显现在书籍上，如今能够加以弘扬强化吗？皇帝我凭借年幼无知，继承并守护祖宗的大业，已经十七年了。每天从早到晚兢兢业业，只管对已有的事例和往日的规章加以借鉴，予以遵行。近来深切地命令儒臣，到宫中讲述《礼经》，重新编辑《大明会典》，使朝廷各个部门具有遵行守执的依据，希望由此继承并发扬祖宗和各位先帝一脉相传的统系，用来兴行太平。可是社会上的教化逐渐衰落，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刁顽，社会风尚也渐渐变坏了。其中特别严重的是，士兵竟然污辱将帅，地方豪强竟然侵凌官府衙门，旁系的宗室成员竟然瞧不起正式册封的藩王。已经衰落到这种地步，该用什么办法来消除那

些背逆轻慢的行径，使人们都接受约束呢？贪污受贿，损坏名节。生活奢侈，超越制度规定。到处说那诽谤的话语，灭绝君子的行为。骗取名声，换取实惠。怪异的举动搞坏了心术，互相倾轧的做法搅乱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已经败坏到这种地步，该用什么办法来挽救那衰颓淫靡的风气，使人们返回到正道上来呢？如今朝廷的诏书多次下达，皇帝的命令已经很严厉了，可是就在宫廷和殿阶之间，京师天子脚下，仍然存在着横遭阻遏、贯彻不下去的情况。这恐怕是礼教没得到修明，法度没得到整顿吧？或者是风气日益蔓延而无法扭转，积习已经形成而难以改变吧？也许是皇帝我对治国大道闹不明白，没做到给臣民树立榜样、考求已有事例而显示出那最高标准来吧？如今打算礼制贯彻下去，名分定立起来；法度推行开来，政令执行下去，朝廷纲纪得到振作和肃正，社会风尚变得淳厚美好，来弘扬圣明祖宗的盛大功业，往远处追比周朝的大治景象，究竟怎样做才可以达到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要把胸中所积累的东西全都讲出来，详尽地写在答卷上，要符合皇帝我的愿望，不要有什么隐瞒。

焦竑　殿试对策

焦竑(1541～1620)　字弱侯，号澹园等，江宁(治今南京市)人。万历十七年(1589)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二十二年奉敕撰《国史经籍志》。晋升东宫侍讲。二十五年主顺天乡试，因举子文中多险诞之语，被劾，贬福宁州同知。岁余大计，削职归。师从耿定向、罗汝芳，与李贽为友。学问极博，尤谙典章制度，长于考据，卓然古文名家。著述宏富，有《焦氏笔乘》、《俗字刊误》、《国朝献征录》、《澹园集》等。

臣对：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治之实政，然后其具彰，而有以成整齐天下之化；必有宰治之实心，然后其本立，而有以妙转移天下之机。何谓实政？饬制度，明宪典，使天下分定而心安，威行而志慑，日范于精明严密之规，而清和咸理者是已。何谓实心？惩玩愒，谨几微，使天下不约束而严，不刑名而肃，独运于

渊微宥宥密之妙，而鼓舞莫测者是已。实政厝于上，则相维相制，能创之必能行之，能倡之必能遂之，是明示天下以轨也，而我之治具，既绸缪于礼与法之著。实心孚于下，则相渐相摩，身奉之又心安之，始从之又终守之，是潜喻天下以神也，而我之治本，又绾结于礼与法之先。

古帝王所以陶范一时，舄奕千载，端居黼扆而朝廷之上下巍然体统之常尊；高拱堂皇，而裨海之远近荡然教化之四达者，此道行焉耳!藉令有治天下之心而其具不备，则虽有宵衣旰食之勤，而卒病于经画之无术；有治天下之具而其本不豫，则虽欲国纪世风之振，而卒病于斡旋之无机。此自古而下，化瑟罕调，王纲绝纽，而一代之隆理，不能不有待于今日也。

钦惟皇帝陛下，挺圣哲之英姿，纂祖宗之庥烈。经筵临御，亲贤讲礼，而匪事乎文为；齐阁箴铭，养性收心，而豫端乎轨则。百寮奉法，四海向风，盖已收太阿于掌上，鼓大冶于域中，而成周之治，行且轶而驾之矣。乃犹不自满假，进臣等而策之于廷，诹以立纲陈纪、移风易俗之道，鹭前王之得失，慨当世之陵夷，且欲挽悖慢浇漓之习，而明乎率作省成之术也。臣愚，何足以及此?虽然，发愤毕诚，图策安危，臣之愿也，敢不披沥以对!

臣观人君之于国，必有所兴立。上之率乎下也为纪纲，则君之所以提挈振举之谓也；下之化于上也为风俗，则世之所以渐摩成就之谓也。乃纪纲之所繇立，风俗之所由美，必有具焉。有礼则上下辨，民志定，而收天下清静宁一之功；有法则寇贼息，奸宄宁，而杜天下倍畔侵凌之习。有率作屡省为礼法之本，则礼严于无体，法威于不怒，而神天下潜移默化之机。此其尊卑有等，上下相承，纪法立而风化行，繇此出也。

尝稽成周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故以三百六十属而统之六卿，以六卿而统之天子。其和邦国者曰五礼，以吉礼祀邦国之鬼神 ，以凶礼哀邦国之忧，以军礼同邦国，以宾礼亲邦国，以嘉礼亲万民，无非肃然示天下以不可易之分也。其禁邦国者曰五刑，野刑上功纠力，军刑上命纠守，乡刑上德纠孝，官刑上能纠职，国刑上

愿纠暴，无非凛然示天下以不可犯之威也。然其董正治官也，必曰祇勤于德；师听五辞也，必曰敬逆天威。而又日成考日，月要考月，岁终则命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会，听其致事而诏王废置，三岁则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然则兴事省成之说，虽肇于有虞，而惟周为备矣，故教化厘绵，法度毖敕。当其时，《兔罝》备干城之材，《游女》励贞一之操。下之化也，方沛如建瓴，则在上可知也，而何风俗有弗醇？周礼可以寒省难之大夫，明德可以折问鼎之楚子。世之衰也，犹惮于委裘，则盛时可知也，而何纪纲有弗饬？昔人论太和在成周，宇宙间以此具、此本修也。

迨及后世，即维持世道，不能备举，而况其本乎？故汉、宋诸臣因时立论有不能概同者：贾谊以弃礼义、捐廉耻而太息，王吉以述旧礼、明王制为本务，彼非不知法制不可疏，而顾拳拳于礼也。苏洵论审势则称殷之先罚，司马光疏谨习以比唐之季世，彼非不知礼文不可阙，而顾拳拳于法也。炎汉尚刑名而礼教多乖，赵宗盛声容而威刑或弛，故诸臣各就其所不足勉之，乃矫世之孤谈，非适治之通理也。何也？汉当列国离析之余，危疑震撼，而非振刷之以法，其势终衡决而难行。宋承五季陵夷之后，寡廉鲜耻，而非驯扰之以礼，其心终顽顿而难格。然而治偏则补，敝则救，极重则反。以彼创业之主审于时，继体之世暗于变，即诸臣陈见悃诚，补苴罅漏，亦托之空言而已。欲其厚风俗，正纪纲，而复睹成周之盛也，必无冀矣。

我太祖高皇帝驱除元孽，用夏变夷，乾坤辟而载正，日月涤而重朗，其功高千古，不待言者。乃其修明正纪，与钧石而俱垂；经纬礼文，媲典则而俱茂，又何其醇且备也！尝谕侍臣曰：礼法明，则人志定，上下安。又曰：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故集为《礼制》，颁为定式，与夫《律令》、《大诰》诸书，其所以示十一朝之型范，开亿万载之太平者，至矣！

暨我皇上起而承之，夙夜兢兢，唯成宪旧章是遵是式。故宫闱有贯鱼之序，藩辅绝剪桐之嬉，忧旱灾则躬步祷之仪，敬大臣则隆召对之典。其修礼也，即天泽之辨，不秩于此也。凌肆虽贵近必斥，权横虽身后必诛。马湖蛮莫之核，不以功掩；夙沙竖貂之黜，不以昵释。其修

法也，即雷霆之威，不赫于此也。固宜治化，绍休祖烈，跂美《周南》，易易耳。何世教浸衰，物情滋玩，于习尚不无少敝焉者！故《春秋》之法，贵理贱，尊统卑，所以肃纪纲也。乃令长分符，而豪右得以扼其吭；阃帅建牙，而悍卒得以哗于伍。以宗庶而讦亲藩，以属吏而傲官长，则凌替甚矣，而何以成运臂使指之势？有周之罚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所以正风俗也。今贪黩与汰侈齐彰，谗说与虚声并肆，尚权谲者以危言摇国是，标奇诡者以左道坏人心，则浇漓甚矣，而何以弘风行草偃之化？故德虽覆六合，而帘陛之间或壅而不尽究；威虽慑四裔，而辇毂之下或亢而不尽行，诚有如圣制所言者。

兹欲消其悖慢而使就约束，挽其颓靡而还之雅道，非有他也，臣愿陛下于实政加之意而已。何则？礼教之不修，非可易复也，臣以为行之莫要于倡，无贪婪邪侈至亡行也。彼乃甘心无悔者，诚见夫鸱张之得志，而悃愊者之无以自完也。故机巧者珪组立升，谲诡者黼缘自免，至恬淡拙讷之人且退而不敢胁息，则何行之能修？虽然，不尽尔也。其特立独行者，必有一二人焉。廉其实，即一举而风厉之。世方轻恬淡也，我则必重；世方贱拙讷也，我则必贵。如李牧之立标命射，人无不赴者，则孰不回心向道以象上指乎？此所谓修礼教之实政也。

法度之不饬，非可易振也，臣以为行之莫先于断，无犯分冒上至亡等也。彼乃肆行无忌者，诚见夫怒睚之幸免，而检柙者之无以自异也。故辱监司则解监司之组，凌将领则夺将领之符，至瞋目语难之人且任而不敢谁何，则奚惮而不为？虽然，不尽尔也。其裂眦首乱者，不过十数人焉。廉其实，即一举而大创之。攘臂干行，则渠魁在所必戮；讹言动众，则两观在所必诛。如董阏于之论高山深堑马牛不人者，则孰不搏心揖志以奉上令乎？此所谓饬法度之实政也。

夫严母之育贞女也，人有重关，出有鸣佩，寝有练丝，而后修洁之行成焉。造父之驭马也，齐辑于辔衔，正度于胸臆，执节于掌握，而后调良焉。礼教者，士人之丝结；而法度者，稗民之辔衔也。是可不行之以实也哉？虽然，臣犹有进焉。语有之：君行意，臣行事。盖礼教之不修，则修之而已；法度之不饬，则饬之而已，此有司事也。至若深惟表正之原，规恢综核之务，率于修礼明法之先，而省于教成法行之后，则

臣所谓实心而治天下之意也，臣愿陛下一加勉焉。盖讲《戴记》，修《会典》，此礼之文也。诚因此而务实以兴之，玩好可以悦心，曰得无为礼之妨乎？美丽可以适志，曰得无为礼之蠹乎？法行威畹，而沁水之田园必裁；威始貂珰，而斜封之恩泽必节。虽礼法未备，而虚己竦神，悦而承流者禽如矣。回风会，挽积习，此下之事也。诚因此而务实以省之，昼接不可倦矣，而章疏之出入必稽；日讲不可旷矣，而典制之废兴必核。诛奸欺，则不使有漏网之疏；释冤抑，则不使遗覆盆之照。将礼法具举，而奔走服从、闻命恐后者廉廉矣。盖礼法之维天下也，是耳目形体之相摄属也，而率作省成，则精神以纽载之、沦浃之者也。瞽首有所向，足不烦论而行；心有所之，口不待言而喻。实之感人，何以异此？故臣始终以实之一言为陛下告，盖非能为新奇可喜之论，而自效其区区之芹曝如此。伏望陛下矜其愚，不录其罪，而垂神采纳焉，臣愚幸甚，天下幸甚！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须有进行治理的实在政务，然后治理的措施方可显现，从而实现对天下教化的统一；必须有治理的实在意愿，然后治理的根基方可确立，从而灵活地完成对天下时机的转移。什么叫做治理的实在政务？就是整饬制度，明确规章，使天下名分确定而人心安宁，威权畅行而臣民慑服，时刻遵守精明严密的规范，清平协和都得到梳理。什么叫做治理的实在意愿？就是惩戒安逸，谨慎对待细微苗头，使天下不靠约束而严肃，不靠刑罚而恭敬，帝王一人深入细致、宽厚宁静地加以运筹，使得臣民所受鼓舞不知将会达到何等地步！治理的实在政务部署在上面，那么其效果将是互相关联又互相制约的，能够创设就必定能够推行开，能够提出目标就必定能够实现它，这等于是向天下明示其应该遵循的轨道，于是帝王的治理措施已在礼制和刑罚方面防患于未然了。治理的实在意愿取信于天下，那么其效果将是臣民互相影响又互相鼓励的，身体力行又思想安定，起初服从又恪守至终，这等于向天下暗示那神妙运筹，于是帝王治理的根基又在礼制和刑罚之前挽结起来了。

古代帝王之所以造就一个时代，连绵千载，正襟危坐在绣有斧纹

的屏风之前，而朝廷上下巍然屹立的体制总是那么尊严；高拱双手安坐在宽敞的宝殿之中，而天涯海角坦荡的教化无不遍及，都是因为这种治国之道得到施行罢了。假使仅有治理天下的意愿而措施不完善，那么即使有终日忙碌的勤奋，最终的问题还会出在经略谋划没有办法上；假使具有治理天下的措施而没有治理的根基，那么即使想振兴国纪世风，最终的问题还会出在没有抓住扭转乾坤的时机上。这就是自古以来教化的手段很少被调整好，王纲因纽断绝而丧失作用的缘故，而一代之兴盛，不能不有待于今日啊！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独具超凡德才的英俊风姿，继承祖宗的美好事业，驾临经史讲席，亲近贤人，尊奉礼制，而不只作粉饰太平的表面文章；在斋宫写下箴铭，养性收心，而预先就端正好准则，于是百官奉法，四海响应。这已是收太阿宝剑于掌中，转动冶炉于域内，眼看就超过周朝的大治景象了。可是皇上您仍不自满，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进行策试，询问治国纲纪、移风易俗的方略，审定以前帝王的得失，感慨当代的衰败，将要挽救叛逆轻慢浮薄的风气，而深明统率臣民于事业、经常省察于成就的方法。可是臣下我愚昧，怎么能够胜任这种垂询！尽管如此，发愤竭尽忠诚，考虑国家安危的大计，是臣下我的愿望，所以臣下我怎么敢不披肝沥胆地回答呢？

据臣下我观察，君主对于国家必定要有所建树。社会上层对下层进行统辖，就成为法度，这就是人们所称君主是提纲挈领的人的缘故；社会下层被上层所教化，就成为风俗，这就是人们所称世风是被仁义感化教育而造成的缘故。然而法度确立的途径，风俗净化的途径，都必定具有措施。有礼制，则上下等级分明，民心安定，从而取得天下清静安宁的成效；有刑罚，则寇贼平息，奸宄不乱，从而杜绝天下背叛侵凌的风气。有《尚书·益稷》所说的统率臣民于事业，经常省察于成就，作为礼制和刑罚的根本，礼制就可以在没有该怎么做的状态下得到严格行用，刑罚就可以在帝王不动怒的情况下发挥威力，从而使天下潜移默化的时机掌握得特神妙。这就是造成尊卑有等级，下面服从上面，纪纲法令确立而良好风气盛行的源头。

臣下我曾经考察周朝，辨别方向，确定位置，划分政区疆域，设官

分职，使百姓具有行为的准则，因此把三百六十个属官归六卿统辖，六卿归天子统辖。周朝调和地方邦国的礼制被称为“五礼”，也就是用吉礼祭祀邦国信奉的鬼神，用凶礼慰问邦国的灾患，用军礼威慑不肯协调或图谋僭越的邦国，用宾礼使邦国相亲近，用嘉礼使万民相亲近，这五礼无非都是严肃地向天下表示名分是不可改变的。周朝惩戒邦国的刑罚被称为“五刑”，其中野刑是卿大夫奖励农事，督察勤劳的刑罚，军刑是既授权将领在外专命，又督察其不失部伍的刑罚，乡刑是在乡里以智、仁、圣、忠等六德教育万民，督察他们孝顺父母的刑罚，官刑是鼓励官吏发挥才能，督察他们尽职尽责的刑罚，国刑是鼓励谨慎，督察恭敬的刑罚，这五刑无非都是凛然地向天下显示威权是不可侵犯的。然而如《尚书·周官》所说，周朝督正治事的百官，必定要求恭敬勤奋于道德修养；又如《尚书·吕刑》所说，法官审理五刑的案情，必定要敬迎上天的威命。此外，还像《周礼·宰夫》所说，每旬之末考核每日的政绩，每月之末考核本月的政绩，以及《周礼·大宰》所说，每年之末，则命百官考核自己的政绩，太宰接受他们的书面报告，倾听判断他们的汇报，然后呈报给天子，由天子决定对他们的升降，三年则大规模考核群吏的政绩，从而对他们进行惩罚或奖赏。既然如此，那么《尚书·益稷》所说统率臣民于事业，经常省察于成就的说法，虽然源于虞舜时代，但是只有周朝才体现得最完全，所以它对臣民的教育感化情义深厚，所用刑罚起着诫示的作用。因此当时《兔罝》诗歌颂捍御防卫的军事人材，《游女》诗勉励女子持守贞操。社会下层接受教化，正迅猛如高屋建瓴之势，则社会上层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在这种形势下，什么风气不可以被净化？周朝的礼制可以使前来慰问周天子遭祸难的晋国大夫感到畏惧，《尚书·君陈》关于“明德惟馨”的道理可以帮助周定王大夫王孙满折服问鼎周室的楚庄王。王朝衰败之际，尚且敬畏先帝而天子坐朝之前先朝拜先帝的遗衣，于是其盛世守礼的状况也可想而知了。在这种状况下，什么纲纪不可以被整饰？前人曾经论说太平盛世表现在周朝，宇宙之间正因为这种治理措施和根基得到了修明啊！

到了后来，就只是维持世道，不能周到地治理，更何况那根基呢？

所以西汉和北宋诸臣针对时势立论，存在着并不完全一致的地方。西汉文帝时贾谊因礼义廉耻被人们抛弃而叹息，西汉宣帝神爵年间王吉以整理阐发古代礼制为当务之本，他们并不是不知道刑罚不能够疏忽，而是用心于礼制罢了。北宋仁宗嘉祐年间苏洵论说审时度势，则说殷朝把惩罚放在封赏的前边；司马光上奏章把当时社会风气等同唐朝末年，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礼仪不可缺少，而是用心于刑罚罢了。以“火德”自居的汉朝，崇尚刑罚，可是礼教大多错乱；赵氏坐天下的宋朝，兴盛礼仪，可是刑罚却有所松弛。所以它们的朝臣各就本朝的不足之处加以劝勉，但是这些主张只不过是纠正世风的一种个人的言论，并不是适合全面施治的通行道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汉初是处在秦末战乱之后，面临凶险怪异震动摇撼的局面，所以如果不用刑法来振刷，其势终将失去节制而政令难行。北宋承接五代衰败之后，世人寡廉鲜耻，所以如果不用礼制来逐渐渗透，民心终将顽顿而难以纠正。然而治理或重刑或重礼，只能是补其偏颇，治理出现衰败，只能是加以挽救，治理完全一边倒，只能是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各朝创业的君主能审察时势，而继承君位的后代却不了解变通，即使诸臣在陈述方略时非常诚恳，力图补救时弊，但只能托付于一纸空文而已，想要因此而使世风淳厚，使法度端正，重新看到周朝的兴盛局面，那肯定是没有希望的。

我太祖高皇帝驱除元朝的统治者，用中原文明改变周边少数民族的习俗，开天辟地而天地始正，涤荡日月而日月重放光明，其功高千古是不用说的。太祖修明法度，与大禹创制度量衡制度一起永垂后世；厘订礼仪，可与夏朝的典章媲美而一样优秀，这是多么地醇美而且完备！太祖曾经谕示侍臣说：礼仪制度明确，则人心定，上下安。又说：修订礼制，确立法度并不困难，遵守礼制和法度却是困难的。所以太祖命儒臣汇集成《礼制集要》，颁布成为定式，与太祖所颁《大明律》、《御制大诰》诸书，用来树立后世十一朝的典型规范，开启我朝大明江山亿万年太平局面的东西，真是达到极点了。

到我皇上继位，日夜谨慎，只以祖宗制度作为遵守和效法的对象，所以在宫廷中有着鱼贯那样的秩序，与藩王之间没有像周成王与

唐叔虞之间的“桐叶分封”的游戏；忧虑旱灾则亲自举行步行到南郊祷告上天的仪式，敬重大臣则更重视召对的典礼。我皇上厘订礼制，则《易经·履卦》上天下泽的卦象区辨，也比不上这种厘订有次序啊！肆意侵凌者即使地位尊贵也必被废弃，依仗权势横行者即使已经死亡也必遭讨伐。对征讨各个部族的验核，不因有功就掩盖将帅的过失。对宦官的处治，不因其亲近就予以宽恕。我皇上修订刑罚，即使是雷霆之威，也比不上这种修订更显赫啊！因而治理教化压根就能继承完善列祖列宗的事业，接上去同《诗经·周南》中描述的周初盛世相媲美，是极其容易的。哪里还有正统思想渐渐衰败，人情事理变得轻慢，对于风气不是没有一些逐渐败坏的现象呢？所以《春秋》笔法所昭示的法则是：高贵者统治低贱者，地位高的统辖地位低的，这是用来整肃法纪的。可是地方长官虽然握有权力而豪强能够扼其咽喉，将领受权带兵而悍卒能够哗变于军中，在宗族中属于旁支却揭发攻击本支藩王，身为属吏却傲对官长，这些都表明世风的衰败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凭什么会形成像挥动手臂指使五指的势头呢？周朝惩罚那些肢解法律条文、扰乱名分、改变制度的行为，这是用来端正风气的。现在贪赃渎职与奢侈荒淫一样公行，恶言邪说与虚伪造假一样放肆，崇尚权术诡计者用危言动摇国家大政方针，标榜奇异思想者用左道败坏人心，这些表明世风的浮薄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而凭什么才能扩大风吹过来使草倒伏那样的教化呢？由此看来，道德虽然覆盖着天地四方，可是政令在皇上身旁有时也受阻而不能下达；威权虽然远慑边疆，可是政令在皇上身旁有时也被违抗而不能畅行。这些情况的确都像皇上这次殿试策问中所说的那样啊！

现在想要消弭叛逆轻慢的行为而使之受到约束，挽救颓靡的世风而使之返于正道，没有其他方法，臣下我只希望陛下在实在的政务方面加以留意而已。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礼教的败坏，不是轻易可以恢复的，臣下我认为要恢复礼教没有比倡导更为重要的，不再有贪婪邪僻、奢侈甚至毫无品行可言。那些心甘情愿而不后悔的人，的确是因为看见猖狂者得志，而至诚者不能保全自己的缘故。所以投机取巧者高官厚禄马上就可以得到，渎职贪污的人靠钻营攀附就可以

免祸,以致于恬淡自持或不善巧言之人将要退让而不敢敛缩其气息,在这种状态之下,有何品行能得到修养?虽然如此,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的,那种与众不同而独立自持的人必有一些,一旦考察属实,就一举奖赏以鼓励风气。世人正轻视恬淡,我们就一定要奖励恬淡;世人正鄙视不善巧言,我们就一定要奖励不善巧言。就像战国末年赵国将领李牧设箭靶命人去射而人们没有不响应那样,有谁还不回心转意,归向正道,以符合皇上的旨意呢?这就是臣下我所说的施行礼教的实在政务。

法度没有得到整饬,是不容易振兴的,臣下我认为要振兴法度没有比果断更占首位的,不再有侵犯名分,抵触上司甚至丧失等级可言。那些肆行无忌的人,的确是由于见到怒目相向者幸免受罚,而循规蹈矩者无法与他们区别开的缘故。所以侮辱官员就解下官员的绶带,侵凌将领就夺过将领的印件,以至于怒目以对或出言不逊之人要任意胡作非为而谁也不敢把他怎样。如此人们还有什么必须担心而不敢去做的事呢?虽然如此,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的。那些怒目倡乱者只不过十多人而已,只要考察如实,就一举而重重惩办他们。谁要捋衣出臂违犯禁令,对他们的首领就在所必戮;谁要造谣惑众,就像孔子对少正卯那样在所必诛,如同董阏于论说高山深壑马牛不入那样,那么谁还敢不专心一意来承奉皇上的命令呢?这就是臣下我所说的整饬法度的实在政务。

严格的母亲教育贞洁女儿的方法是,在家有多重的门户,在外身上佩有鸣玉,睡眠时有设防,然后贞洁的品行得以形成。善于驾车的造父在驭马时,使马的缰绳和嚼子互相协调,心中有所分寸,手中控制着缰绳的松紧,然后就可以把马车驾驭得最好。礼教,是士人所牵挂的事;而法度,是小民身上的缰绳和嚼子,因此能不用实在的措施来推行吗?虽然如此,臣下我还有些想法要进呈给皇上您:有句话叫做"君主出主意,臣子做具体事情"。因为如果礼教失修,就只需修治而已;法度没整饬,则只需整饬而已,这些只是官员的事。至于说深入思考给天下做出表率的根本,端正并扩大循名责实的工作,在修订礼制、确立刑罚之前树立榜样,在教化成功 刑罚畅行之后进行省察,

这就是臣下我所说的以实在意愿治理天下，希望陛下在这方面要努力去实施的。讲解西汉戴圣、戴德整理的《礼记》，重修《大明会典》，这些都是关于礼节仪式的。真正借此而务实地来振兴它，那么珍奇的东西可以使人愉快，但是必须自问：恐怕会成为礼制的障碍吧？美丽的女子可以使人满意，但是必须自问：恐怕会成为礼制的害虫吧？刑罚要施行于外戚亲贵，就像东汉沁水公主的田园必予剥夺那样；威权要先加于宦官，就像唐朝韦后及公主越权"斜封"官职的非法行为必予节制那样。虽然一时礼制、刑罚尚未完备，但是能虚心肃敬，愉快地接受教育感化的人就会多起来的。挽回风气，拯救积习，这是下面人要做的事情。真正由此而务实地反省它们，那么像周武王一天三次接见康叔那样勤政而不厌倦，而对奉章的进呈和批复一定要查核；聆听儒臣进讲经典不可荒废，而对制度的订立和废止一定要核实。惩治奸佞欺罔之人，则不可有漏网的疏忽；解除冤屈，则不留下无处申诉的冤案。那就礼制、刑罚完全振作起来，而竞相服从，闻命而动，唯恐落后的人都会呈现出戒惧的样子。这是因为礼制、刑罚的维系天下，就像耳朵眼睛与身体的互相牵连关系，而统率臣民于事业，经常省察于成就，就属于精神来主宰并渗透的东西了。譬如头部有所指向，脚就无二话随之行走；心有所往，口中不用再说什么就很明白了。实心和实政能感动人们，跟这种情况有何区别呢？所以臣下我始终拿实心和实政这一话题向陛下禀告，这不是能够制造出新奇可喜的议论，而是自动向皇上献出微不足道的建议而已，伏望陛下怜悯臣下我的愚蠢，不追究臣下我的罪过，而劳神采纳。如果这样，便是臣下我的万幸了，便是天下人的万幸！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侯真平译〕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戊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且夫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殿试策问

[万历二十六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昔帝王理人群,凝庶绩,率以综核名实为先务。唐虞之时,明良相信,称无为矣,而询事考言,敷奏明试,三载九载,屡省乃成,为法亦何备欤?世降而法愈详,人愈伪,名实溷淆,治亦刓敝。或乃曰:诚感则孚,第宜一切用君子长者之道。但不知诚在中,何由而达?昔之考询云者,岂其诚未至欤?后世之综核者,毋若汉宣帝。当时吏称民安,可谓效矣。乃尚有伪增受赏者,意检察之犹未密欤?若文帝躬修玄默,简节疏目,镇天下以无名之朴,而人顾谓孝宣不如,又何指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勇智天锡,超越千古,立纲陈纪,法度森严。旌廉能,摧奸暴,用夏变夷,重辟鸿荒。列圣遵承,有加无坠。至我皇祖世宗肃皇帝,英断如神,振怠起衰,制礼作乐,品式具备。泽雨露,威雷霆,赫然中兴,光绍前烈。於铄哉!范垂当年而流万祀矣。

朕嗣守祖宗丕业,任人图政,惟名实为兢兢。夫何与我共理者,不明朕心,诞谩成习,旷官不惭而越局以逞,浮靡相尚而利口惟贤。求其循理奉法、忧国如家者,曾几何人?嗟乎!文盛则质衰,言华则行

薄，自古记之矣！故上下以空文相加遘，而苟且塞责，敷同罔功。巡行遒矣，而吏习尚偷；教化宣矣，而士风尚诡；赈恤颁矣，而民困未苏；戎兵诘矣，而挞伐未张；虑谟详矣，而冤滞犹多；工费厘矣，而虚冒犹故。束旧章而不守，悬新诏而不遵。求治弥劳，求效弥远，诚不足恃，法不能维。意者朕不敏不明，无能风之欤？兹欲循名责实，黜无稽，旌有功，俾治理远驾汉宣，以溯唐虞雍熙之盛，何施而可？尔诸士方当始进，心志精白，俯仰世变，必有慨于中矣。宜各抒所怀备言之，朕将采而行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诗经》上说：万古流芳的周文王，给我们留下了虔敬地追求至善的光辉形象。作为人君，应该以仁爱为追求目标；作为人臣，应该以恭敬为追求目标；作为人子，应该以孝顺为追求目标；作为人父，应该以慈爱为追求目标；与国人交往时，应该以诚信为追求目标。

况且弯一尺而得以伸直八尺，这是就有利可图而言的。如果唯利是图的话，那么弯八尺而得以伸直一尺也将有利可图时，你是否也愿意呢？

子贡说：我不希望别人强加给我什么事，也不愿意把什么事强加给别人。孔子说：赐啊，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治理人群，办成各种事情，都把全面考核名与实放在第一位。尧舜时代，君臣互相信任，可以称作无为之治，但是《尚书·尧典》和《皋陶谟》所说咨询事务，考察言论；诸侯述职，天子验核功绩；三年一考核，九年考核三次；反复思索已有成规。这些作为法度，为什么如此完备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法度越来越详密，可是人们却变得越来越虚伪，名与实相混淆，治理

也凋敝。于是有的人就说:以诚感人就可以使人们信服,应该只是一律推行君子、长者之道。但不清楚诚实本来在人们的心中,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使人们都明白呢?尧舜时代所讲的询事考言,难道是表明诚实在当时还没有深入人心吗?后代实行全面考核官吏政绩的君主,都不如汉宣帝。当时官吏称职,人民安宁,可以说是有成效的,可是仍有虚报政绩而多受其赏的人,想来是当时的考核仍然有欠周密的地方吧?像汉文帝那样清静无为,简化律令,用难以言传的朴实来镇抚天下,人们据此而说汉宣帝比不上汉文帝,这又指的是什么呢?

只有我们太祖高皇帝凭借天赐的智勇,超越千古;建立纲纪,法度森严;旌表廉洁能干者,摧折奸佞凶暴者;继承中原文明传统,改变元朝蒙古的风习,重新开辟宇宙。后代列祖列宗遵循继承,只有发扬光大而没有衰落。到了我那皇祖世宗肃皇帝时代,他的英明裁断像神一样,振作怠惰而扭转衰势;修订礼制,创作乐舞,仪式齐全;恩泽如雨露,威权似雷霆;赫然中兴,继承并弘扬祖业。真是光芒四射,垂范于当年,而流芳于万载啊!

皇帝我继承守护祖宗大业,任用官吏,谋划政事,都十分重视官吏政绩的名符其实。为什么那些跟我一起治理天下的人不明了我的这种用心,欺瞒成习,失职却不惭愧,越轨以逞其志,竟相虚浮奢靡而只以巧辩为贤?寻求那些能够循理奉法、忧国如家的人,究竟会有几个?可叹啊!文采昌盛就会质朴衰落,言语浮华就会行为浅薄,自古以来就有这种记载!所以朝廷上下以空洞的文件相互往来,而苟且塞责,政绩平平而无所建树。已经派遣使者去各地巡查了,而官吏的习气仍然苟且;教化已经广施了,而士人的风气仍然有欠诚实;赈恤已经颁行了,而百姓的困苦仍然未能缓解;军队已经整治了,而征讨没能取得辉煌的战果;审讯判案已经周详了,而含冤在狱者仍然很多;工程费用已经审定了,而虚报冒领仍然如故。把旧有的制度束之高阁而不遵守,又把新的命令搁置起来而不服从。求得治理越下气力,而希望取得的成效却相去更远。人们的诚实并不足以依赖,法度并不能起到维持作用。想来这或许是因为皇帝我无能与昏暗,没有能够教化好的缘故吧?现在想要循名责实,废黜虚伪,旌表有功,使治理

远远超过汉宣帝时期，追上尧舜太平和乐的鼎盛局面，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才行得通呢？你们各位士子正当步入仕途的时候，思想纯洁，观察世风变化，一定有感慨在心中，应该各自抒发心中的想法，把它全部谈出来，皇帝我将采纳而实行。

赵秉忠　殿试对策

赵秉忠(1570～?)　字季卿，号岘阳，益都(今属山东)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三十二年，分主会试，得孙承宗等。典江南乡试，得张玮、姚希孟、周顺昌等，俱为一代名臣。累迁至礼部尚书。天启二年，被黄尊素以"顽钝"弹劾去官。著有《江西舆地图说》等。

臣对：臣闻帝王之临驭宇内也，必有经理之实政，而后可以维束人群，错综万几，有以致雍熙之治；必有倡率之实心，而后可以淬励百工，振刷庶务，有以臻郅隆之理。何谓实政？立纪纲，饬法度，悬诸象魏之表，著乎令申之中，首于岩廊庙宇，散于诸司百府，暨及于郡国海隅，经之纬之，鸿巨纤悉莫不备具，充周严密毫无渗漏者是也。何谓实心？振怠惰，励精明，发乎渊微之内，起于宥密之间，始于宫闱穆清，风于辇毂邦畿，灌注于边鄙遐陬，沦之洽之，精神意虑无不畅达，肌肤形骸毫无壅阏者是也。实政陈，则臣下有所禀受，黎氓有所法程，耳目以一，视听不乱，无散漫飘离之忧，而治具彰。实心立，则职司有所默契，苍赤有所潜孚，意气以承，轨度不逾，无从脞惰窳之患，而治本固。有此治具，则不徒驭天下以势，而且示天下以守，相维相制，而雍熙以渐而臻。有此治要，不徒操天下以文，而且喻天下以神，相率相勖，而郅隆不劳而至。自古帝王所为，不下堂阶而化行风驰，不出庙廊而令应于桴答，用此道耳。

恭惟皇帝陛下，毓聪明睿智之资，备文武神圣之德，握於穆之玄符，承国家之鸿业，八柄以驭臣民而百僚整肃，三重以定谟猷而九围式命，盖已操太阿于掌上，鼓大冶于域中，固可以六五帝，四三王，陋

汉以下矣。乃犹进臣于廷，图循名责实之术，欲以绍唐虞雍熙之化，甚盛心也！臣草茅贱士，何敢妄言？然亦目击世变矣，顾身托江湖，有闻焉而不可言，言焉而不得尽者。今幸处咫尺之地，得以对扬而无忌，敢不披沥以献！

臣闻人君，一天也。天有覆育之恩，而不能自理天下，故所寄其责者，付之人君。君有统理之权，而实有所承受，故所经其事者，法之昊天。用是所居之位则曰天位，所司之职则曰天职，所治之民则曰天民，所都之邑则曰天邑，故兴理致治，要必求端于天。今夫天幽深玄远，穆然不可测也；渺茫轻清，瞢然莫可窥也。而四时五行各效其官，山岳河海共宣其职，人人沾浩荡普济之泽，在在蒙含弘广大之休，无欠缺以亏其化，无阻滞以塞其功者，盖不贰之真默，酝酿于大虚，不已之精潜，流衍于无极，故实有是化工耳。然则人君法天之治，宁可专于无为，托以深密静摄哉？是必有六府三事之职司为实政者。人君宪天之心，宁可专于外务，强以法令把持哉？是必有不贰不已之真精为实心者。

粤稽唐虞之世：君也垂裳而治，贻协和风动之休；民也画象而理，成击壤从欲之俗。君臣相洽，两无猜嫌，良明相信，两无顾忌，万古称无为之治，尚矣！而询事考言，敷奏明试，三载九载，屡省乃成，法制又详备无遗焉。盖其浚哲温恭，日以精神流注于堂皇；钦明兢业，日以志虑摄持于方寸。故不必综核，而庶府修明；无事约束，底成古今所未有之功。

厥后崇清净者，深居而九官效职，固以实心行实政也。后世语精明者，首推汉宣，彼其吏称民安，可为效矣。而专意于检察，则检察之所不及者必遗漏焉，故伪增受赏，所从来也。语玄默者，首推汉文，彼其简节疏目，可谓阔矣。而注精于修持，则修持之所默化者必洋溢焉，故四海平安，所由然也。盖治具虽设而实心不流，则我欲责之臣，臣已窥我之怠而仿效之；我欲求之民，民已窥我之疏而私议之。即纪纲法度灿然明备，而上以文，下以名，上下相蒙，得聪察之利，亦得聪察之害。实心常流而治具少疏，则意动而速于令，臣且孚我之志而靖共焉；神驰而慑于威，民且囿吾之天而顺从焉。凡注厝规画悬焉不

设，而上以神，下以实，上下交儆，无综核之名，而有廉察之利。彼汉宣不如汉文者，正谓此耳。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睿智原于天授，刚毅本于性生。草创之初即创制设谋，定万世之至计；底定之后益立纲陈纪，贻百代之宏章。考盘之高蹈，颍川之治理，必旌奖之，以风有位；浚民之鹰鹯，虐众之枭虎，必摧折之，以惕庶僚。用能复帝王所自立之称朕之理政、务尚综核者。欺蒙虚冒，总事空文，人日以伪，治日以敝，亦何以继帝王之上理，后隆古之休风，而统称理民物、仰承天地之责哉？乾坤开而再辟，日月涤而重朗。盖以实心行实政，因此实政致弘勋。其载在《祖训》有曰：诸臣民所言有理者，即付所司施行，各衙门勿得沮滞。而敬勤屡致意焉。列圣相承，守其成法，接其意绪，固有加无坠者。至世宗肃皇帝，返委靡者，振之以英断；察废弃者，作之以精明。制礼作乐，议法考文，德之所被，与河海而同深；威之所及，与雷霆而共迅，一时吏治修明，庶绩咸理，赫然中兴，诚有以远绍先烈，垂范后世也。

今我皇上任人图治，日以实政望臣工矣。而诞谩成习，诚有如睿虑所及者。故张官置吏，各有司存，而越职以逞者，贻代庖之讥。有所越于职之外，必不精于职之内矣，则按职而责之事，随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参冬署，兵司不得分刑曹，此今日所当亟图者也。耻言过行，古昔有训，而竞靡以炫者，招利口之羞。有所逞于外之靡，必不深于中之抱矣，则因言而核之实，考实而责之效，使捷巧不得与浑朴齐声，慆慢不至与轻浮共誉，又今日所当速返者也。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激浊扬清也，而吏习尚偷，既使者分遣，无以易其习。为今之计，惟是广咨诹，严殿最，必如张咏之在益州，黄霸之在颍川，斯上荐剡焉，而吏可劝矣。教化者，齐士民之心术，以维风振俗也，而士风尚诡，即申令宣化，无以尽变其风。为今之计，惟是广历学官，独重经术，必如阳城之在国学，胡瑗之在乡学，斯畀重寄焉，而士可风矣。

四海之穷民，十室九空，非不颁赈恤也，而颠连无告者，则德意未宣，而侵牟者有以壅之；幽隐未达，而渔猎者有以阻之。上费其十，下仅得其一，何不重私侵之罚，清出支之籍乎？四夷之内讧，西支东吾，非不诘戎兵也，而挞伐未张者，则守圭纵绎之胄子，无折冲御侮之略；

召募挽强之粗才，暗弛张奇正之机。兵费其养，国不得其用，何不严遴选之条，广任用之途乎？民氓之积冤，有以干天地之和，而抑郁不伸，何以召祥？则刑罚不可不重也。故起死人、肉白骨、谳问详明者，待以不次之赏，而刻如秋荼者，置不原焉，而冤无所积矣。天地之生财，本以供国家之用，而虚冒不经，何以恒足？则妄费不可不禁也。故藏竹头、惜木屑、收支有节者，旌以裕国之忠，而犹然冒费者，罪无赦焉，而财无所乏矣。盖无稽者黜则百工惕，有功者赏则庶职劝，劝惩既明则政治咸理，又何唐虞之不可并轨哉！而实心为之本矣。实心以任人，而人不敢苟且以应我；实心以图政，而政不致惰窳而弗举。不然，精神不贯，法制虽详，无益也。

而臣更有献焉：盖难成而易毁者，此实政也；难操而易舍者，此实心也。是必慎于几微，戒于宥密。不必明堂听政也，而定其志虑，俨如上帝之对；不必宣室致斋也，而约其心神，凛如师保之临。使本原澄彻，如明镜止水，照之而无不见；使方寸轩豁，如空谷虚室，约之而无不容。一念萌，知其出于天理而充之，以期于行；一意动，知其出于人欲而绝之，必期于尽。爱憎也，则察所爱而欲近之，与所憎而欲远之者何人；喜惧也，则察所喜而欲为，与所惧而不欲为者何事。勿曰屋漏，人不得知，而天下之视听注焉；勿曰非违，人不得禁，而神明之降监存焉。一法之置立，曰吾为天寄制，而不私议兴革；一钱之出纳，曰吾为天守财，而不私为盈缩。一官之设，曰吾为天命有德；一奸之锄，曰吾为天讨有罪。盖实心先立，实政继举，雍熙之化不难致矣，何言汉宣哉！臣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有治理的实在政务，然后才可以约束人们，统理大小事情，因此导致和乐的大治局面。必定要有倡导和做出表率的实在意愿，然后才可以激励百官，振刷各种政务，因此达到鼎盛的治理状态。什么叫做实在政务？就是建立纲纪，整顿制度，公布在朝廷门外，显示在各种诏令之中，先行于朝廷，遍施于政府各部门，推行到全国各地去，加以安排部署，事无巨细皆受约束，周到严密毫无渗漏。什么叫做实在意愿？就是振奋精神，

励精图治，意愿发自内心深处，起于宽仁宁静的胸怀，始行于后宫，风行于首都，灌注于边远地区，深入人心而被广泛接受，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无不畅行，在行为举止中得到充分体现。实在的政务施行了，那么臣子们就有所奉行，黎民们就有章可循；观念得以统一，不再自行其是，扫却无所适从的迷惘，于是这治理措施便家喻户晓了。实在的意愿确立了，那么各种职能部门就有所默契，众百姓就有所暗暗信服，思想相承，不逾规矩，消除拘泥琐碎、消极怠工的弊病，于是治理的根基就巩固了。有了这种治理措施，就不仅以权势统治天下，而且可以向天下表明守持目标，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从而使和乐的大治局面逐渐实现。有了这种治理的纲领，就不仅以文教统治天下，而且可以向天下表明一种神妙运作，相互督促又相互鼓励，从而使鼎盛的局面轻易形成。自古帝王所做的事情，他们不必走下殿堂就可以使教化风行，不必迈出宫廷就可以使政令像敲鼓马上有回声那样得到响应，就是由于采用了以上准则的缘故。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身怀聪明睿智的天资，具备文韬武略、神奇圣明的品德，掌握着朝廷的大权，继承着国家的鸿业，以爵、禄、予、置、生、夺、废、诛这八种手段驾驭臣民而百官整肃，用天子议礼、制度、考文来制定治国谋略而九州效命，已经握太阿宝剑于掌上，转动冶炉于域中，本来就可以同五帝三王并列，使汉朝以后的君主相形见绌了，然而仍把臣下我等宣召到殿廷，希望得到对官吏循名责实的方法，想继承尧舜时期的和乐教化，这是多么热切的愿望啊！臣下我只不过是一个荒野中地位低下的读书人，哪里敢随便发表意见！然而也目击了这种世风之变，不过由于托身江湖，有所听闻却不可言讲，即使言讲也不能讲个痛快，如今有幸处在与皇上相距咫尺的地方得以对答称扬而无所顾忌，哪里敢不披肝沥胆奉献鄙见呢？

臣下我听说，君主就跟天一样。天对地上万物有覆盖养育之恩，但不能自己治理天下，所以把它的希望寄托给君主。君主有统辖治理天下的权力，实际上是禀承天命，所以治理天下之事都效法皇天，于是所处的君主之位则称为“天位”，所行使的职务则称为“天职”，所统治的民众则称为“天民”，所建的首都则称为“天邑”，因此进行管

理,实现天下大治,重要的是必须向天求取入手之处。现在天幽深玄远,广大而不可测度,渺茫轻灵清虚,茫然不可窥视,而四季五行各尽其能,山岳河海各尽其责,人人浸润着上天浩荡普渡的恩泽,处处蒙受着包涵广大的美德,无所缺损而使化育出现漏洞,无所阻碍而使事功受到堵塞,这是因为统一的玄真宁静在太虚酝酿,无止境的精气在太极流布,所以上天确实才有这种化育的功效。然而君王以上天为效法榜样的治理,岂可只采用清静无为,寄托在深居静养上呢?这就必须有《尚书·大禹谟》所说的办好九种重大政事的官吏实施具体政务。君主效法上天的意愿,岂可只专注于外面的事务,勉强以法令控制天下呢?这就必须有统一的无止境的真心诚意作为治理的实在意愿。

考察尧舜时代:君主无为而治,给天下带来了协调和睦、闻风响应的大好景象;百姓靠用不同服饰表示受到处罚而得到治理,形成击壤而歌、随心所欲的世风。君臣相通,两无猜疑;君臣互信,两无顾忌,万古称赞其"无为之治",是有来由的了!而《尚书·尧典》和《皋陶谟》所说咨询事务,考察言论;诸侯述职,天子予以验核;三年一考核,九年考核三次;反复思考已有成就,这表明当时的法度也是完备而无所遗漏的。这是因为尧、舜极其睿智温和恭谨,时刻把他们的精神流注于堂皇的朝廷之中;恭敬聪明,兢兢业业,时刻把思虑保持在心中。所以不必全面考核,而各部门都整饬清明;不加约束,就完成古今所未有的功业。

此后崇尚清静无为的帝王,虽然深居宫中,但是九卿这些大臣恪尽职守,原本是因为那些帝王以实在的意愿推行实在政务的缘故。后世谈论起精明的帝王,首推汉宣帝,当时官吏称职,民众安宁,可以算是有成效的,但是只注意使用核察的办法,那么核察不到的问题必定成为遗漏,所以这就是虚报政绩而多受封赏的由来。谈论起无为而治的帝王,首推汉文帝,他简化律令,可以称得上宽政,只注意使用修身养性的办法,那么由自觉修养而潜移默化的人必然多起来,所以这就是当时四海平安的由来。治理措施虽设而实在愿望缺乏,那么皇上想要求臣下执行那些措施,而臣下已经看出皇上没有什么实在

愿望，所以也就加以效仿了；皇上想要求民众服从这些措施，而民众也已经看出皇上的决心不大，所以就私下非议了。因此即使法规灿然完备，但是上级仅仅作出表面华丽的文章，下级也徒有虚名地来响应应付，上下互相蒙骗，如此虽然得到了明察的益处，但是也得到了明察的害处。如果实在愿望长久保持，而治理措施虽然稍有疏漏，但会思想快于法令，所以臣下将信服皇上的意愿而恭谨地履行职责。神思飞扬而去发挥威权的威慑力量，所以百姓将被约束于皇上的既定范围以内而加以顺从。凡是安排、谋划、公布而不必刻意去施行，那么上级靠思想去驾驭，下级也用实际行动来回应，上下互相督促，如此虽然不必全面考核，却可以收到明察的效果。所谓汉宣帝精明之治不如汉文帝无为之治，正是属于这种情况。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聪明睿智源于天授，刚强果毅出自天性，创业之初就创建制度，进行谋划，确定了万世适用的完善大计；平定天下之后更建立法度，给百代后世留下了宏伟的典章。凡是隐士的高尚举动，像西汉颍川太守黄霸那样的政绩，必定予以旌奖，以此鼓励官员；榨取百姓的凶残之人，肆虐民众的凶狠之人，必定予以摧折，以此警告众吏，于是能恢复帝王卓然自立并宣称本皇帝执政崇尚循名责实的本来面貌。而欺骗蒙蔽，虚报冒领，以空洞的表面形式管理政事，人心一天比一天虚假，治理一天比一天衰败，还怎么能继承古代帝王的杰出治理，发扬光大远古的良好风气，全面处理好民众万物，不负天地之命呢？天地再次开辟，日月重新洗涤而明朗，这是因为依靠实在的愿望推行实在的政务，随顺实在的政务建成了伟大的勋业。太祖在《祖训》中有这样一条训示：各个臣民的意见确实具有道理的，马上就交付主管部门施行，各个衙门不得扣压。而太祖高皇帝对于恭敬和勤政，多次有所指示。此后的列祖列宗相继嗣位，谨守太祖成法，禀承太祖思想，已是有所发扬而没有削弱的了。到世宗肃皇帝继位，扭转萎靡不振的风气，以英明决断振刷它；审察被废弃的可行制度，以精细明察复兴它。制礼作乐，议论法规，稽考文明，恩德覆盖与河海一样深厚，威力所及与雷霆一样迅速，一时间吏治整饬清明，各种政事治理都有成绩，赫然中兴，的确有理由远继先祖事业，垂

范后世了。

如今我皇上任用贤能图谋天下大治，时刻以实在的政务寄希望于臣子们。可是蒙骗成习，的确像皇上您所忧虑的那样。所以设置官吏，各部门都有各自的职责，但越职以逞其意者，招来了“越俎代庖”的批评。凡是超越本职的，必然不精于本职内的工作，于是应该按职守去要求各自如何工作，根据其工作来考核其成绩，使礼部不得越职于工部，兵部不得越职于刑部，这就是今日所应当极力谋求的。人应当为错误的言论感到羞耻，视错误的行为为过失，这在古代已有明训，可是那些追逐奢侈以此作炫耀的人，招来了巧辩的羞耻。凡是有所逞意于身外奢靡的人，必定不能深造于内心，于是根据官吏所言而考核其实际情况，考核其实际情况而求得其成绩，这样便使走捷径的乖巧官吏不能与浑厚朴实的官吏获得同样的声誉，非常诚实的官吏不能与轻浮的官吏获得同样的称赞，这也是今日所应当尽快恢复的。派监察人员巡视各地，是把他们作为朝廷耳目来使用的，目的是激浊扬清。可是现在官吏的风气是崇尚苟且，虽然已经派遣使者四处巡视，但是没能够改变这种恶习。为今日大政考虑，只有广泛询察，严格考核等级，一定要像北宋张咏任益州知州，西汉黄霸任颍川太守那样，让这类官员列入荐举的名单上，官吏就会勉力工作。教化是统一士人与民众的思想心计，来维护振刷良好风气的，可是现在士人的风气是崇尚欺诈，即使遍施教化，也无以全面改变这种风气。为今日的大政考虑，只有广泛鞭策各级督学，独尊经学，一定要像唐代阳城在国子监，宋初胡瑗在湖州、苏州州学那样致力儒学教育，对这类督学寄予重望，委以重任，士人就可以被教化。

天下的穷苦民众，十家就有九家是极其贫困的，这不是皇上不颁发赈济，对于那些颠沛流离而求告无门的穷人，是由于皇上的恩德未被广泛宣传，而中饱私囊者从中作梗的缘故；是由于民众的痛苦没能反映上来，而渔肉百姓者从中阻碍的缘故。皇上每赈济十份，下面穷人仅获其一份，为什么不加重对中饱私囊者的惩罚，清理整顿收支帐目呢？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起事，总是忙于东、西应付，并非皇上不整顿军队，其征讨未能获得辉煌战绩的原因，在于那些领兵的纨绔子弟

不具备退敌御侮的韬略，招募来的强悍武夫又不明白战术技巧，军队耗费着国库，而对国家不能起作用，为什么不严格遴选军官的条律，拓宽任用人材的途径呢？老百姓的沉冤积案，将因此而影响天地的协和，如果压抑而不得伸冤，怎么能招致祥和的政局呢？这样看来，刑罚不可不重视。所以对于那些能够使沉冤者起死回生、审讯断案细致明白的官吏，应该用超越级别的奖赏来对待，而对那些苛酷得像秋天里的苦菜一样的酷吏，应该废黜不予原谅，那么冤案就无所积压了。天地生产财物，本来是供应国家用度的，可是虚报冒领违犯法规，怎么能够保持足够的数额呢？因此乱耗费国家财物的行为不可不予以禁止。所以对于收藏竹头、爱惜木片之类物品，收支合理的官吏，应该对他们使国家富裕的忠诚进行旌表，而对仍然冒领经费的贪官污吏进行惩罚而不予赦免，那么国家财用就无所匮乏了。大致说来，空发议论的人被废黜，就可以使百官心存戒慎；奖励与惩罚分明之后，就可以使政事全都得到治理，如果这样做了，又怎么不能达到尧舜那样的大治局面呢？治理的实在意愿是治理的根基。怀着实在意愿去任用官吏，官吏就不敢苟且以应付皇上；怀着实在意愿去谋求施政，政事就不致于因怠惰而什么也干不成。否则，皇上的治理精神不贯注进去，法规即使很详细，也没有什么效益。

此外臣下我另有进言：由于难于成功而易于失败的，是实在的政务；难于保持而易于放弃的，是实在的意愿，所以这就一定要对萌芽状态特别慎重，对宽厚宁静时刻警惕。不一定只采取在殿上听政这一种形式，而稳定住自己的思想，俨然就像在跟皇天对话一样。不一定要像汉朝皇帝那样在宣室里斋戒，而约束自己的心神，严肃得就像面对太师、太保一样。使思想根源得到净化，就像用明亮的镜子或静止的水面察照而无不毕现；使内心豁达，就像空谷虚室，约束它也还是什么都能包容下。一种念头萌发，就知道它是出自于天理，便加以扩充，以至于要付诸行动；一种想法产生，就知道它是出自人欲，便立刻断绝，以至于要完全消除。对于爱与憎，则必须洞察所爱而想要亲近的，以及所憎而想要远避的人应该是些什么样的人；对于喜好与畏惧，则必须洞察所喜好而想做的，以及所畏惧而不想做的事应该是些

什么事。不能说“我在墙角而别人决不会知道”，实际上天下的视听都在密切关注着；不能说“没有违背原则而别人就无权禁止”，实际上神明的监督是存在的。一项法规的设立，只能解释作：这是我受上天的委托而制订的，而不可按自己的意愿讨论兴革；一文钱的出纳，只能解释作：这是我为上天守财，而不可为个人用度加以增减。一个官职的设置，应该解释作：我在为上天任命有道德的官吏。一个奸臣的被铲除，应该解释作：我在为上天讨伐有罪的人。这是因为实在意愿先确立，实在政务相继推行开，那么和乐的教化就不难实现了，还用得着谈什么汉宣帝之治吗？臣下我不懂得什么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威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顾起元　殿试对策

顾起元（1565～1628）　字太初，号邻初，江宁（今江苏南京市）人。浙江副使顾辅国之子。万历二十六年(1598)探花，时年34岁。后官至吏部左侍郎。撰有《尔雅堂家藏诗说》、《金陵古金石考》、《客座赘语》、《说略》、《蜇庵日记》、《嬾真草堂集》等。

臣对：臣闻帝王之理人群而凝庶绩也，必有经天下之实政，而后可以茂亮工熙载之猷；必有宰天下之实心，而后可以握辨贤序事之理。何谓实政？功与用相得，议与任相俦。严画一之条，而法无骫骳；精考课之典，而政无浮夸。肃然与天下相绾结，而不徒粉饰乎治具者是已。何谓实心？纯固贞其体，渊塞直其基。巨细必贯，而奋明作于精神；始终永肩，而绌惰窳于志虑。肫然与天下相枢纽，而不徒矜厉于治术者是已。修政而不核之以实，则浮淫之蠹，或反加功实，而纪纲法度之间，必有所旷废而不举。责实而不本之以心，则纠紧之过，或化为苛扰，而总率先劳之治，必有所倦怠而罔终。夫惟存为实心，播为实政，阴握其窾系，阳引其规绳，无形之枢转而不停，有领之裘挈而不乱，故能使实中其声，功孚于事，象魏无窳敝之法，圭组无瘝旷之官。自昔大猷之治，端不越此。向使借口无名之朴，而委精辨之功；袭

迹有为之劳，而持矫伪之志。此则以虚御虚，用诞息诞，官方之淆所以汰之而弥浊，王纲之解所以张之而益弛也。兹不能不有望于圣世矣。

钦惟皇帝陛下，奉三御正，得一为贞。建斗精于太紫之位，而抚五辰；斡元气于重玄之居，而调四序。披天镜以烛山川之险，人罔遁情；执河魁以壹威权之门，柄无倒授。华士尽黜，秕政允厘。固宜冠带之伦，禀精白以承庥德；关石之重，悬日月而著风烈矣。乃圣心惆然忧治纪之未张，进臣等于廷，俯赐清问。严名实之辨，求综核之规，黜无稽之言，旌有功之实，于以超炎汉而驾唐虞，甚盛心也。臣竖儒耳，身伏嵁岩之下，言存区盖之间，何足以奉明诏，佐末议？虽然，请对以臆。

臣盖尝披览古今之际，上下治乱之原，窃见夫古之执大象而御宇者，其于名实之用，何鳃鳃然不少释也！标枝野鹿之世，名实两忘；雨粟垂穗之时，则实多而名寡。歌《雔雔》咏《勺》之日，名实两副；濛淳散朴之季，则名盛而实衰。盖文质之损益，言行之厚薄，所关于世运有如此者。夫苟当其多寡盛衰之际，不操总揽之权以拯救之，坐视其溷淆剥敝而不可理，则何以为天下哉？自古称帝道之隆，无尚于唐虞矣。然考《舜典》所记，询事考言，敷奏明试，所以致严于功能者，何其详且慎也！《皋陶谟》所陈，三载九载，屡省乃成，所以致虞于丛脞者，何其周且密也！盖虽四门既穆，九德咸事，而方命圮族之殛，必历试而始穷其奸。虽百揆既宅，六府毕修，而时雍风动之庥，必积年而始丰其泽。安得以玄默之治，嗤提挈检校为灰尘；以恭己之朝，鄙钩稽绳墨为桎梏哉？

代而降也，世所称综核名实者，毋若汉宣帝。彼身历崎岖迫隘之会，而民间之疾苦，罔不周知；目击郡国县邑之风，而吏治之良楛，靡弗躬察。故于名实，欲互收之。上计簿具文有责，欺谩避课有责，二千石不举贤有责，御史三公不严下按事有责。其枢机之密，可谓无遗法矣。慎守相刺史之官，严二千石之选；锄权臣贵宗之势，节后宫绮靡之物。其品式之具，可谓无匿端矣。以故黄霸之宽和，龚遂之安辑，朱邑之廉平，吏称其职，而整颓纲于废弛之际。潢池无弄兵之众，畎亩

无夜吠之警，边疆无鸣镝之忧，民安其业，而流岂弟于虚耗之余。即论者算计见效，以为不得与文帝之简节疏目者埒。要之文帝，当圆朴未解之日，天下方共葆其质。故斧斤之说，稍抑于贾生；首虏之差，微申于魏尚。名实不患其不符。宣帝当浮夸既穷之日，天下方争鹜于名。故群吏已计，而王成受赏于伪增；纵释有条，而赵韩蒙诛于非罪。名实不必其尽合。是知论名实于文帝易，论名实于宣帝难。故文帝疏于综核而收效多，宣帝密于综核而收效浅。概未可以申韩之刻核，而遂绌名实之论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天锡之智勇，首辟鸿荒，立纲纪至森严矣。故廉能旌，奸暴抑，而革天下羯狲之风。世宗肃皇帝，以如神之英断，光绍前烈，制礼作乐至具备矣。故泽雨露，威雷霆，而开天下文明之治。今观《训》、《录》所载，用人行政，斑斑可纪。於铄哉？范垂当年，功流万祀，诚足以辗唐轹虞，陋汉制为狭小矣。肆我陛下，嗣守丕业，益觐扬而光大之，二十六年于兹。庙堂所规画，臣下所建白，其于名实之际，可不谓廉廉敦慎哉！乃或有诞谩成习，苟且塞责，旷官不惭而越局以逞，浮靡相尚而利口惟贤，如圣制之所咨者，何也？毋亦奉宪之吏，不明上心，而澄汰之化，或至下格欤？抑亦立法之始，徒侈虚文，而总揽之道，犹未深究欤？臣尝伏而思其故矣。十年之前，上与下皆有苛密锲急之心，故时损无用之官，数困难行之令，猛于立法，坚于行法，而名实之用犹未离。十年以后，上与下皆有恬愉嗫缓之心，故纲解而俗渐偷，令纾而人益懈，轻于议法，宽于守法，而名实之用多不合综核之道。诚有不可不亟讲者。臣请即圣问所及者，胪列陈之。

夫巡行遣矣，而吏治何以犹隳也？胡不举殿最之典稽之！诚先悃愊，斥浮华，非栈车牝马不以廉名，非雉驯螟散不以循举，而龚、黄之化，何难冀也！教化宣矣，而士习何以弥诡也？胡不引广厉之条格之！诚奖孝廉，尊经术，佻达之士不得滥青衿，奇邪之学不许列学校，而《菁莪》之咏，何难继也！赈恤颁而民之三釜不登者，腹犹枵然。试罢非时之役，减额外之征，而依椓犹永号，采蓄犹太息乎？戎兵诘而虏之陆梁思逞者，烽犹棘也。诚汰纨绮之帅，复屯牧之政，而马邑不可诛，狼胥不可封乎？冤滞之多，非谳狱者数挢虔也。上不以喜怒操法吏之

耳目，而虑奏自平，将野无梧丘之冤，犴绝鹘亭之怨矣。虚冒之多，非监工者不信度也。上不以淫巧穷工匠之雕镂，而工费自厘，将少府无蹊壑之奸，中涓杜雀鼠之耗矣。旧章严于法守，若宫府，若邦国，靡不按故典而行也，而谁复游意于绳之外，为惠于绳之内？新诏觀若画一、若留令，若议令，靡不视大府为率也，而谁敢出人以舞其智，观望以害其成？凡此皆名实之大防而综核之先务，为今日所亟图者也。

然臣犹有所大患于名实之不协者，则以世之任人者弊有二：一在好恶之过徇，一在议论之过察。循者寄是非于众多之口，察者置雌黄于冥漠之中。使贤者惮于有其名，莫敢自坚其所守；而不贤者怵于有其实，竞欲自覆其所攻。而人品之辨，日溷淆矣。世之行政者弊亦有二：一在上下之相蒙，一在前后之相委。蒙者猎得其名而遂损其实，委者已弃其实而并越其名。始犹以下蒙上耳，既则上且明知下之蒙也，而显听之；始姑以前委后耳，既则后亦阴法前之委也，而复待之。而政事之施，日刓敝矣。今欲综核名实，而不先祛此四弊者，徒以责吏治诸事之必实，是犹摘纲之众目而不知提其纲，循衣之四缘而不知振其领也。欲以兴励天下，何由哉？

虽然，所谓祛四弊者，非穷察渊之智，矜发席之明也；又非持亿逆以豫折之，或时用不测之威，使人爽然震慑而莫敢必也。非操束湿之用，结凝脂之网也；又非恃诏诰以风厉之，或数更既往之法，使事骚然爬梳而莫可静也。实心之说，臣愿陛下重图之而已。盖人主一心，人才之贤否潜树之标，政令之美恶阴司其契。若盂之于水，其方圆靡不肖焉；若陶之于埴，其坚瑕靡不属焉。志溺晏安而欲倡精勤之化，躬沉积习而思起衰怠之风，必无冀矣。矧端拱紫垣之内，优游玄极之中。柔曼之倾意，角抵之娱目，欲神无淫裔，不可得也。投珠抵璧之议不闻，绝蘗去媒之言不人，欲志无挠滑，不可得也。日月之明掩于丰蔀，雷霆之威震于枯朽，欲气无踔厉，不可得也。于是有坐视名实之淆，而恬以身安之不知核者；于是有深恫名实之弊，而惮以身先之不肯核者。于是有阴伺名实之失，而不得夫核之道，乃以猜疑勇断急攀下者；于是有阳伸名实之议，而不坚于核之用，徒使纠举申饬为故事者。

伏惟陛下，玄览至理，莹精太平，纯一之志彻于肌肤，渊塞之衷贯于金石。畏天命则出王，游衍有警而不徒饰坛墝之文；法祖德则羹墙，陟降有程而不徒袭形迹之信。官贤俊则大臣腹心，小臣手足，不开疑贰之门；恤黎庶则轻徭薄赋，布德缓刑，不滋侵牟之路。我不以名求于下，谁敢不以实应之？我以实求之下，谁得复以名饰之？不屑屑然以人责事，以事责功，而无稽者自退，有功者自进。《虞典》、《皋谟》之所称，直旦暮遇之耳。二祖之徽烈，虽万世无极可也。区区神爵、五凤之治，何足烦一日之间而为陛下道哉！臣愚戇，不识忌讳，干冒宸严，臣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治理众人和成就各种功绩，一定要有措置天下的实际朝政，然后可以大力施展开辅助上天要做的事情、振兴起帝王事业的鸿图。一定要有主宰天下的实际心念，然后可以掌握住辨别贤才、妥善安排政事的道理。什么叫做实际的朝政？功效与施用彼此合拍，议论与具体去完成相互一致。强化都按统一规定去办的条令，而法度没有被扭曲弄歪的情况；认真实行考核督察的制度，而政务没有浮夸的现象，严肃整齐地与天下连结贯通起来，而不光是在治理措施上摆摆花架子而已。什么叫做实际的心念？由专一和坚定来端正那个主体，用深沉或诚实来确立起那个根基。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必定要坚持一致，在精神上把观察敏锐奋扬起来；由始至终永远一心不变，在思想上把懒惰懈怠排除掉，淳厚一致地同天下沟通贯穿起来，而不光是在治理手段上依仗严厉而已。整治好朝政却不凭借实际去验核，浮泛和过度的弊害反而有的超越过实际的功效，而朝廷纲纪和法令制度之间，必定会产生荒废的地方，不能推行开。要求拿出实际成效却不依据那个心念，纠察处罚太严厉的过失有时会演变成苛刻搅扰，而统领百官、操劳在前的政治，必定会出现厌倦松懈的情况，不能坚持到底。只有存留而成为实际的心念，散布开来成为实际的朝政，暗地里握持住那要害所在，表面上牵动那规则准绳，让人看不到的枢纽转动起来不停止，缝有衣领的皮衣提起来不混乱，所以能够使实效切中那声名，功绩吻合那事项，朝廷上不

存在毁败衰落的法度，百官中不存在荒废职守的官员。自古以来施行远大谋划的治理，恰恰不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去。假设把无法能用语言准确表达出来的道家所说的那种质朴当成理由，放弃掉精详察辨的功夫；沿着人为地制造事端的辛劳做法干下去，持守故意违反常情而虚假造作的态度。那么这就纯属用虚妄去控制虚妄，用荒诞去制止荒诞。做官应当遵循的准则出现混乱要去澄清但却因此更加污浊，天下的纲纪已经解开纽绳仍去张布但却因此更加松弛。如今不能不对圣明的时代抱有期望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承奉天、地、人登上帝位，获得到大道构成纯正。在最尊贵的帝位上控制住北斗七星的精光，而顺应天象变化；在最深邃的皇宫住地抖动元气，而使四季交替特协调。运用监视天下的权力去察照山河的险要，人们没有能隐藏得住的私情；执持住决定一切的权力来使各个部门和官员都听从天子的命令，大权从未旁落。浮华的官吏一个不留地都斥退，各种弊政确实都革除。这就压根难怪文武百官献上满心的一片纯洁来承奉圣上的美好恩德，建章立制等举措像太阳和月亮悬挂在天空中，显扬那丰功伟绩了。但圣上的心念仍不安宁，忧虑治理的纲要还没张布开，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赐给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强化名义与实效的察辨，求取全面验核的规则，排斥没有根据的言论，表彰确有功效的实绩，用来超过汉朝，与唐尧虞舜相并列，这是十分深切的用心啊！臣下我只是一个最无能的儒士罢了，身体藏伏在高峻的山岩下面，言语寄存在具有限度不乱讲的范围以内，哪里足以承奉圣明的诏令，对最没价值的议论有点帮助呢？尽管如此，请求用自己凭空想象的意见做个对答。

臣下我曾经由上到下观察过古今交替、历代大治和乱亡的本原，私下发现古代执持大道来统治天下的帝王，他们对于名义和实效的施用，是多么地戒惧而不稍微放下它们来啊！在君主恬淡无为、民众放任自得的远古时代，名义和实效哪个方面都根本不去理会。在仓颉创制文字、上天降下谷米和地上长出谷穗的黄帝时代，就讲求实效多而讲求名义少。在歌唱《雝》诗、咏唱那与武舞《勺》舞相配合的《酌》颂的西周时代，讲求名义和讲求实效彼此合拍。在濠水之上讲

论淳真、散播质朴主张的老子和庄子时代，就讲求名义盛行而讲求实效却衰落了。因为文采和质朴的减少与增加，言论和行为的厚道与浇薄，存在着与时代气运相关连的这样的情形，如果正处在名义与实效的关系讲求这方面多却讲求那方面少、这方面兴盛而那方面却衰落的时候，不运用总领统揽的大权去拯救，眼看着二者混淆在一起，相互磨擦损害而无法整治，那还依仗什么去统治天下呢？自古以来称述能用一套原则与方法称帝天下而最为隆盛的人，没有谁会超过唐尧虞舜的了。然而考察《尚书·舜典》的记载，询问政事，考察言论，各地诸侯通过述职来全面报告自己的政绩，依据政绩来进行认真公正的验核，用来在功劳和才能上达到严格审查的措施，是多么地详明又慎重啊！《尚书·皋陶谟》的陈述，每隔三年对官员考核一次，九年考核三次，反复思索已经取得成功的事例，用来使虞舜在琐碎事情上花气力的办法，是多么地周全又细密啊！这是因为在明堂四门接纳诸侯尽管已经都团结和睦，具有宽宏大量又严肃恭谨的等九种品德的人全都担任了官职，但违抗命令、危害同族的像鲧那样的人，把他流放到羽山，必定要经过多次考察才能彻底搞清他的奸恶。统领各种事务尽管已经井井有条，水、火、木、金、土和粮食等物资的储备全都得到了整治，但天下民众和睦相处、闻风响应的美好局面，必定要经过多年才能使恩泽变得深厚广泛。这怎么可以拿君主沉默、无为而治的治绩去把提纲挈领、查核验证嗤笑为灰尘呢？又拿君主自己特恭敬的朝代去把按照各项规定严密对照判定的朝代贬斥成桎梏呢？

朝代往下延续，世上所谈论的全面验核名义与实效是否一致的君主，谁也比不上汉宣帝。他亲身经历了曲折而又磨难很多的厄运，而民间疾苦没有不了解得很清楚的。亲眼看到了各郡、诸侯王国、各县和封邑的风气，而地方官吏施政方法和成绩的好坏，没有不亲自进行察辨的。所以在名义与实效上，打算两方面都掌握住。每年年终向朝廷报送施政情况的文书存在名实不符的地方，要给予惩罚；欺诈诳骗，逃避考核，要给予惩罚；郡守不向中央荐举当地贤良的人，要给予惩罚；朝廷内外负责监察的御史和御史大夫、丞相、太尉不严格管理下属和查问政事，要给予惩罚。他那关键措施的严密，可以称得上是

没有遗漏的法度了。慎重对待郡守、诸侯王国国相、大监察区长官部刺史的委任,严格对待郡守的选用,铲除掌权大臣和显贵诸侯王的势力,节省后宫贵重奢侈的用品。他那各项规则的完备,可以称得上是没有顾不到的方面了。因此颍川太守黄霸的宽厚平和,渤海太守龚遂的安抚聚集,大司农朱邑的廉洁公正,官吏都与自己担任的职务相称,而在政务荒废松弛的时候整顿了衰落的朝廷纲纪。湖泽没有造反的团伙,田野没有夜间闹事捣乱的紧急情况,边疆没有战事发生的忧虑,老百姓安居乐业,而在国力虚弱耗尽的后面播扬简易平和的施政恩泽。根据议论史事的人来看,他们统计查验当时所取得的成效,认为汉宣帝没资格同大纲细目都做简略处置的汉文帝相并列。其实认真考察汉文帝,他正当无为而治的道家学说还没被排斥的时候,天下正共同保有那质朴的状态。所以权势法制的主张,稍略被贾谊所抑制;上报斩获匈奴首级多出六颗被严厉处罚又取消处罚,略稍在云中太守魏尚身上予以申明。名义和实效不担心它们不相互一致。汉宣帝正当浮夸已到极点的时候,天下正对名义竞相归赴。所以对各地官员已经考核完毕,但胶东王国国相王成却因虚报政绩而受到奖赏;放跑罪犯具有惩罚条例,但京兆尹赵文汉、左冯翊韩延寿却因无罪而被处死。名义与实效不一定要完全符合。由此可知,在汉文帝身上讨论名义与实效很容易,在汉宣帝身上讨论名义与实际却很困难。所以汉文帝对全面查验名实很粗略但收到的成效却比较多,汉宣帝对全面查验名实特细密但收到的成效却比较少。不能一律用战国法家申不害、韩非的苛刻验查,于是就废除掉名义与实效关系的主张啊!

只有我朝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凭借上天赐给的明智的勇武,首先开辟前所未有的大业,定立起朝廷纲纪,森严到极点了。所以能够使廉洁贤能的人得到表彰,使奸邪凶暴的人得到抑制,革除天下被元朝统治所形成的落后风气。世宗肃皇帝,凭借神灵般的英明与果断,继承并发扬光大前代的功业,制定礼仪,创作乐舞,完备详尽到极点了。所以扬布恩泽,强化威势,开创出天下文采鲜明的大治局面。现今观看《宝训》和《祖训录》的记载,任用官员,施行朝政,非常清晰鲜

明地可以逐项列出来。真盛明啊!典范在当年垂示,功德流布到千秋万代。确实可以碾压过唐尧虞舜,把汉朝规制鄙视得纯属狭小了。到我陛下,继承并守护宏大的帝业,进一步显示播扬和光大它,到现在已经二十六年了。朝廷上所筹划的东西,臣僚们所提出的建议,在名义与实际两个方面,能不说是危惧地加小心吗!但却偶或存在着圣上制策所咨询的情况:夸诞诳骗形成习气,遇事随便敷衍一通,荒废职守却不惭愧,超越职权来逞能耐,在浮华奢靡上比试高低,只有能言善辩才算得上贤能。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恐怕也是承奉朝廷法度的官吏,不明白圣上的心意,而澄清和淘汰的化导,有的到了下面就碰上阻碍了吧?或者是在定立法度的当初,只是罗列了许多写在纸上的条文,而总领统揽的办法,还没深入探究吧?臣下我曾经跪拜思索那缘故了。十年以前,上面与下面都有苛刻严密、加紧对号入座的想法,所以经常裁减没有用处的官员,多次用难以施行的政令给人们出难题。在定立法度上威猛,在行用法度上坚定,而名义与实效的运用还没有分离开。十年以后,上面与下面都有安逸享乐、宽松舒缓的想法,所以朝廷纲纪松弛而社会风气越来越苟且,政令不紧要而人们越来越懈怠。在议论法度上不重视,在遵守法度上不介意,而名义与实效的运用大多不符合全面验核的准则。这确实存在着不能不再迅速讲求的地方了。臣下我请求根据圣上策问所谈到的问题,逐项排列来陈述它们。

到各地去监察的官员已经派遣了,但官吏施政的方法和治绩因为什么原因仍然败坏呢?为什么不全面实行谁属第一、谁属最末的考核制度去评定他们!果真是把诚实放在首位,排斥掉浮华。不像战国时楚国国相孙叔敖那样使用破车劣马,就不把他作为廉洁的典型来上报;不像东汉中牟县令鲁恭那样施行仁政致使野鸡自动站在人身上、成群蝗虫都自动离去,就不把他作为遵用国家法度的好官员来推荐。而像西汉龚遂、黄霸那样的地方教化,还有什么难以希望达到的呢?教化已经宣明了,但读书人的风气因为什么原因却越来越诡诈呢?为什么不援用多方面自我激励的训条来约束他们!果真是奖励忠孝廉正的人,尊崇儒家的学说,轻浮浪荡的公子哥不准混杂在读书人

的行列，宣扬歪门邪道的理论不准在学校里出现，而《诗经·菁菁者莪》对喜好培育人才的咏赞，还有什么难以接续上的呢？赈济灾荒、体恤百姓的圣旨已经颁布了，可百姓每个月一般应有十九斗两升口粮却达不到，肚子里仍然饿得很。尝试着取消临时征发的徭役，减少法定赋税之外的征收，百姓还会背靠臭椿树长声地哭叫，在原野上采集根部可以蒸食的蒿菜依旧长长地叹息吗？对军队已经进行整顿了，而边区部族猖狂地还准备骚扰侵犯，战争的警报仍然很多。确实撤掉富贵人家出身的将帅，恢复屯田和饲养马匹的军政，而像汉高祖把匈奴单于骗到马邑却不能斩杀吗？不能像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在匈奴腹地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大礼吗？冤枉和久拖不决的案件太多了，这并不是负责审理的官员多次对罪犯敲诈勒索造成的。上面不凭仗个人的喜悦恼怒去左右法官的动向，而审查犯罪记录和奏请判决自然就会公平，将会原野上不存在当路的高丘有鬼魂夜晚来喊冤的错杀案件，监牢里断绝在鹊奔亭有女鬼深夜来叫屈的怨恨了。虚报冒领钱币和物品的数量太多了，这并不是负责监督土木工程的官员不如实验核造成的。上面不用精巧奇异的器具让工匠把雕刻的手艺全都耍出来，而工程费用自然就会得到核实，将会使主管皇室财务的少府不存在让钱物流入无底洞的奸巧，宦官们也杜绝住麻雀老鼠偷食那样的消耗了。已有的规章在遵守上特严格，像宫廷和官署，像各地藩王，无不依照旧有的法典行事，而谁还在准绳以外会有什么想法，在准绳以内还拉拢关系呢？新下达的诏令公正严明如同一律，像留在朝中任职的诏令，像讨论政事的诏令，无不准照丞相府作为标准，而谁敢再作手脚来耍弄他的小聪明，不采取行动来损害它的成功呢？所有这一切，都是名义和实效的重要界限，又是全面验核的头等大事，属于当今所要急切筹划的东西。

然而臣下我仍然对名义与实效统一不起来存在着特别值得忧虑的看法，就是认为世上任用人才有两大弊病：一是表现在喜欢与厌恶上太依从个人的看法，一是表现在议论上太好挑剔。依从个人看法往往把是非寄存在众多人的嘴巴上，太好挑剔往往把说好说坏放置在不可捉摸之中。造成贤能的人对享有名声感到很畏惧，没有谁敢

自我坚定本人的操守。而不贤能的人对做出实效感到很害怕，争相打算自行泯灭掉可能会遭到攻击的把柄。这样一来，人品的区别，就一天比一天混淆了。世上施行朝政也有两大弊端：一是表现在上面和下面相互蒙骗，一是表现在前面与后面相互推卸。蒙骗的人猎取到名声，于是就损害了实效；推卸的人已经丢弃了实效，并且超过了名声。开始时还只是下面来蒙骗上面罢了，到后来上面明明知道这是下面蒙骗自己，可却公开任从他去。开始时还只是姑且用前面的来推卸后面的罢了，到后来连后面的也暗中效仿前面所推卸的，又来等待了。这样一来，政事的施行，就一天比一天相互磨擦受损害了。如今打算全面验核名义与实效，却不首先去除掉这四大弊病，光是拿官吏施政的方法和治绩等事项必须要有实效去督责，这就如同摘列出渔网的众多网眼却不懂得去牵动起纲绳，顺着衣服的四边摸来摸去却不懂得提起衣领来。想用这种做法振兴激励起天下，哪里会达到呢？

尽管这样，所说的去除掉四大弊病，并不是要用尽一眼就看到最深处的智慧，依仗知道席子底下藏有什么东西的圣明；也不是运用揣测去预先挫败他们，或者经常动用让人想不到的威势，使人们茫然感到震动害怕又谁都不敢再固执了。并不是执持苛酷急切的手段，结成十分严密的法网；也不是凭仗诏书去暗示和激励他们，或者屡屡改变过去的法度，使政事乱纷纷地找出头绪做梳理又没有一样能够安静下来。有关实际心念的说法，臣下我希望陛下对它重新加以谋求罢了。因为君主的那个心念，能对人才的贤能与拙劣暗中确立起尺度，对政令的妥善与恶劣暗中掌握住诀窍。这就如同盂缸对于水，水成方形还是成圆形没有不特别像的；如同打制陶器对于粘土，粘土让它坚固还是让它带斑点没有不随顺的。心志沉溺在安逸享乐中却想倡行精明勤勉的化导，自身就陷在积习中却想振扬起衰败懈怠的歪风，那是必定没有任何希望的。何况拱手端坐在宫城里面，悠闲自得在密殿中间，温柔妙曼的女子让人心里喜欢，摔跤打把式看起来挺让人高兴，还想心神不往前靠，这是做不到的。珍珠玉璧都不开采的主张听不到，断绝去除祸苗的说法听不进去，还想志向不受阻下滑，这

是做不到的。像太阳和月亮那样的圣明被扩大的乌云遮掩住，像惊雷那样的威力震动在干枯朽烂的东西上，还想志气再奋发，这是做不到的。于是就出现了眼看着名义与实效相混淆，却习惯拿自身让它就这样发展而不去验核的君主；于是就出现了特别畏惧名义与实效存在的弊病，却害怕拿自身首先去革除而不去验核的君主；于是就出现了暗中察探名义与实效的失误却找不到去验核的有效办法，竟然用猜疑和勇于决断而急切惩办臣僚的君主；于是就出现了表面上伸张名义与实效的议论却对验核的运用不坚定，光是让纠察举报和申戒命令成为按照惯例走走过场的君主。

跪拜敬请陛下，深入地观察最为高妙的道理，使太平景象透明发光，纯粹专一的心志浸透在全身，深沉诚实的心念穿透金石。敬畏天命就外出视察，从容自如又引起警觉，而不光是摆摆平地筑坛、用矮墙围起来的表面形式。效法祖宗的仁德就追念先辈帝王升降具有规则，而不光是袭用外表动作的诚信。任用贤人英才担当官职，就把大臣当成是自己的腹心，把低级臣僚当成是自己的手足，不打开怀疑又想罢免的大门。体恤众百姓就减轻徭役，少收赋税，施布仁德，把刑罚往后放，不滋生侵占剥夺的门径。我不用收名义向下面求取，谁敢不用实效来做出回应？我用实效向下面求取，谁又能拿名义来做掩饰？不鸡毛蒜皮似地通过什么人来要求他去做什么事，或通过什么事来要求他做出什么成绩来，于是那些没有什么能够拿出来又经得起验核的人，自动就会退下；而建有功劳的人，自动就会升上来。这样，《尚书》中《虞典》和《皋陶谟》所称述的情形，只是在早晨和傍晚之间就能重新看到罢了。我朝太祖和世宗肃皇帝的美好功业，即使千秋万代永无尽头也是办得到的。小小的汉宣帝在神爵、五凤年间的治绩，哪里值得浪费一整天考试的时间来为陛下做讲说呢？臣下我愚昧戇直，不懂得忌讳，抵触并冒犯了皇帝的威严。臣下我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侯真平译〕

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甲辰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极高明而道中庸。

如果不知道自己的使命，就不可能成为君子；如果不知道礼制，就不可能立足于社会；如果不知道别人话语的含义，就不可能认识其人。

应该尊奉自己的长辈，并且将心比心地尊奉别人的长辈；爱护自己的子弟，并且将心比心地爱护别人的子弟。

把上天那样的高远光明发挥到极点，通晓不偏不倚的道理。

孙承宗　殿试对策

孙承宗(1563～1638)　字稚绳，高阳(今属河北)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天启初充日讲。二年，拜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直，献军政数策，皆为所纳。主守关外，自请督师，整饬军务，修城练兵屯田，晋升中极殿大学士。五年，因拒交魏忠贤而遭谗被斥去。崇祯二年，清军兵临北京，复职守通州，移镇山海关，收复永平等四城。四年，以长山之败罢归。在职数建策，被采纳。十一年，清军攻高阳，率家人抗拒，城破自杀。有《高阳集》等。

臣对：臣闻帝王之恢鸿业而经远猷也，必有不自逸之心以勤天下，而后可以握天下之治本。必有不自用之心以公天下，而后可以收

天下之治功。何谓勤？涵诸渊微之中，达诸经纶之际，内与外不贰其衷，始与终不携其念，操精明严恪之虑，以风厉人群而无敢戏豫者是已。何谓公？矢诸宥密之微，通诸任用之显，上与下联为一心，远与近合为一体，执含宏光大之德，以天覆埏垓而无敢昵私者是已。有勤以为之运，则精日与天下相流通，而上不为隙，下不为乘，天下日以精饬，而运治之本以端。有公以为之主，则神日与天下相浹洽，而上不为侵，下不为旷，天下日以神孚，而图治之功以举。古帝王所以足不下阶序，而忧勤四达于寰区；道不出庭帷，而覆沾远施于海宇，用此道也。不然，勤之不继，而徒以其督责之术为把持，则精有所不通，即规恢日课于外，而止为法制之粗，何以布一人之志意于天下？公之不举，而徒以其总揽之权为伸缩，则神有所不浹，即威福日归于中，而仅为粉饰之文，何以收天下之功用于一身？此近世之陋术，后王之浅效也，其上以希纲纪法度之调，而下以责辑宁安攘之治也，其道无由矣。

钦惟皇帝陛下，抚盈成之运，当鼎盛之年，有聪明睿智之资，有孝爱温恭之德，宽仁博厚之泽与河海同深，神武不杀之威与风霆并迅，盖已收太阿于掌上，臂使指而必从；鼓大冶于域中，网在纲而不紊。天下喁喁然颂唐虞，仰尧舜矣。乃犹不自满假，进臣等于廷，俯垂清问，拳拳乎询无为之治，而有共念分猷之思也，此其心真不自逸、不自用之心乎！臣伏处蓬藋，暗于治体，然不敢默默也。臣窃念人君之于臣，任使久或厌薄其言，而独于其始进，则导之言，而犹恐不尽；人臣之于君，阅历深或顾忌不言，而独当其始进，则言之尽，而可幸以无罪。故臣且愿罄生平而尽言焉。

臣闻人君之理万民也，犹天之育万物也。天以其於穆之精，不息之健，握于冲漠之表以昭帝载，而扬翊之功日著于群生；即以其四时之佐，五行之吏，赞于亭毒之时以畅玄功，而行生之宰日流于万品。故人君所居之位曰天位，所抱之德曰天德。如果一念自逸，则顷刻忘君天下之心，何以法乾行而厉臣下，以蒙精太平？如其一念自用，则独运非尽天下之谋，何以代天工而成君德，以无教逸豫？故勤以运天下之大化，而宵衣旰食，不先其身而后天下者，人主所以有为也；公以寄天下之大权，而任贤使能，不矜其长而忽天下者，人君所以无为也。

盖惟君所其无逸，而猜忌嫌疑毫无所加于臣，故其臣得以毕力于人主，而不驰其神于法之外。亦惟臣代其所劳，而心腹肾肠毫无所匿于君，故其君得以坐治于穆清，而不役其神于法之中。是以古之明君不以兢业而废群策，亦不以群策备举而辍兢业；古之良臣不以艰难而委平治，亦不以平治无虞而忘艰难。如尧以钦明为登庸，舜以温恭为辟询，启万古之文明而不自功，开百王之治绪而不自有。故当其时，禹、稷、夷、皋忘身家而殚心思，四岳、九官、十二牧启耳目而绥远迩，日以庶事万几，经理中外，而尧舜于省成率作之外，不为侵以示之隙。盖其求贤劳而不自逸，故其得人逸而不自用。然则唐虞之治，固臣之力，而实君之力欤？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宇，饬励臣工。其谕廷臣曰：朕观《书》，以"元首"喻君，"股肱"喻臣，自古君臣本同一体。君独用则臣职废，臣不任则君事劳。谕外臣曰：贤臣之事君也，视君如亲，视国如家，视民如子。凡可以安国家、利民人者，知无不为。若避难而惮劳，则事不立矣。夫以太祖神圣，而所求乎臣者如此，故其时法天泽之履以肃堂帘，而忻合之气日联于一德；效天地之泰以通上下，而咸熙之化日普于两间。则业侔勋、华而世跻唐、虞，固其率作之勤，亦其任用之公，盖得臣之力也，而微独臣之力也。十一朝仰同心之谊，亿万载宏保治之谟，岂无自哉？至皇上绍述而光大之，祇述先猷，精思上理。比年以来，洽天下以敦厚之福，肃天下以震叠之威。虽深居而几务常亲，虽静摄而章奏毕览，兢业远同于尧舜，惕厉近符于高皇。固宜袭圭组者畅仁风，安桑麻者乐世业。青矜有《棫朴》之休，比屋有弦诵之化。兵食足而奸宄消，祯祥呈而灾祲退，于以表独断之治，可也。

夫何心勤而事左，志切而效疏？吏治非不日饬也，而贪婪屡见于弹章；民生非不日厚也，而浇离益多于图奏。广励学宫矣，而诡谲公行于逢掖；表别井闾矣，而浇薄日甚于枌榆。甚之司农仰屋于持筹，军中作好于纨绔，奸宄徂伏于辇毂，沴异迭见于天章。诚有如圣训所谓事左而效疏者，则以浮虚之习胜，玩愒之弊滋，避难惮劳者多，而殚忠竭勤者寡也。盖圣祖固尝言之矣。何也？上以实责下，而下以名应上，则虚浮之过也；上不以法谩下，而下敢以法逃上，则玩愒之过也。

浮虚则实亡,玩愒则法坏。是惟有忠信诚悫之臣,而后有清和咸理之治;有精明强毅之士,而后有整齐严肃之功。故得人以饬吏,则必褒酌泉于簠簋,将苞苴绝而暮夜无投金之吏矣;得人以安民,则必昭逃亡于绮罗,将案牍清而蒂屋无悬磬之忧矣。得人以正士习,同风俗,则必重行谊于提衡,严等威于奢溢,奇邪之行移郊遂,仁厚之德泽溢闾左矣。得人以司帑藏,实行伍,则蝥食不假公以实私囊,债帅不行私以弱公卒,将冒滥之费清于根源,占役之苦均于疏通矣。得人以上格神而下固吾宇,则消萌于未然以伐其奸,修救于将至以预其备,将要荒濯休,甸内匝洽,而地天效祯,山川呈瑞矣。盖不自逸,故不自用;惟不自用,乃不自逸。然未有人主之精神与大臣之合而百事得人者,亦未有大臣之精神不自相合以合天下而万几得理者。何也?天下,一身也。腹心与手足不贯,则手足失持行之职。天下,一家也。主伯与亚旅不接,则亚旅无左右之能。

臣伏读圣制曰:朕见人臣自为谋鲜不臧者,谋国则否。臣以为欲臣之身视国也,则愿陛下勿自逸于身,而身视国也。臣又伏读圣制曰:人臣自拮据其家,无爱力而让能者,于国则怠。臣以为欲臣之家视国也,则愿陛下勿自逸于家,而家视国也。盖上行之,则下必效之;君好之,民必从之。然以臣观于天下之人心,虚浮诚有,而约结更甚于虚浮;玩愒诚多,而掣肘更甚于玩愒。频年以来,不以为不可行而坚意行之,行之而卒无害也;不以为不可格而坚意格之,格之而又似无害也。故圣神之名,独归于上;愚陋之名,遍归于下。自予以神圣之名,则矜与狎相生,而俯视天下无可与共功;予天下以愚陋之名,则猜与鄙相待,而自顾一身无能与并智。是始以逸成其私,终以私成其逸也。独不思士气之难炽而易糜也,若爝火也,倾江河以沃之,而孰厉其气?士节之难植而易仆也,若秋蓬也,振迅飚以撼之,而孰立其节?假令举朝咸化为挠指之柔,而一人独成其刚愎之用,无乃自逸之心愈遂,自用之心愈坚,而身视事、家视国者,愈不可得乎!

盖臣窃愿有献焉。臣闻人主之精神,日为天下所系命;天下之命脉,日为人主所注神。顾人主无所注,则必有所炀;有所在,则必无所窃。故欲无遗埏维之遐,必不耽几席之近;欲无狎龙德之臣,必不溺

燕尾之宠;欲无拂补牍折槛之直,必不任谗谄面谀之口。然其销铄刚心而蔽塞正念者,莫如利欲。此唐虞诸臣所请格其君于勋、华,而辨其道于危微者也。伏愿陛下法乾之健以去其自逸,宪天之时以去其自用,洗濯其利念以与天下更始,而夜分读法,鸡鸣御朝,使勤与公合也。天下幸甚!臣愚幸甚!臣草茅贱士,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发扬大业,筹划远谋,必定要有不自享安逸的心念,来为天下勤奋操劳,然后可以把握住治理天下的根本。必定要有不刚愎自用的心念,来使天下群策群力,然后可以获得天下大治的功绩。什么叫做勤奋?就是蕴含在深沉灵妙的内心中,运用到国家大事的各个方面,表里一致,始终不改变想法,以精明、严肃、信实的思想,去教育砥砺人们,使人们不敢视工作为儿戏。什么叫做群策群力?就是牢牢把握住宽厚宁静的微妙之处,贯彻到任用人才上去,上下联为一心,远近合为一体,保持容纳一切、光明博大的品德,像苍天笼盖着无边无垠的大地那样,而不敢对自己所喜爱的人有所偏爱。如果能把勤奋贯穿在日常政务中,君主的精神就可以日益与天下交流沟通,而使上级不至于出现漏洞,下级不至于有可乘之机,天下日益被这种精神整饬,而施治的基础便可以得到端正了。如果把群策群力作为指导,君主的精神就可以日益与天下融汇和洽,而上级不去强行干涉,下级不荒废职守,天下日益被这种精神所折服,而谋求治理的功业便可以实现。古代帝王之所以脚不下台阶,而使他的忧虑和勤奋遍及四方;行不出户,而使他的恩泽远施到整个天下,原因就在于他们勤奋和群策群力。否则,如果勤奋不能持久,而仅以督责之术作为执政的唯一手段,就会精神不能沟通,即使在朝廷内外时刻督促实施,而只不过是一纸粗浅的法规罢了,怎么能够把帝王一人的思想传播到天下呢?如果群策群力不能张扬,而只仅靠大权独揽去施政,就会精神不能润洽天下,即使威福日益归于帝王手中,只不过是粉饰表面的条文罢了,怎么能够把天下功用收到帝王一个人那里呢?这是近代的粗陋办法,是后代帝王的微小成效,可是上级

充满着调和纲纪法度的希望，责成下级做出安定内外的治绩，这就没有途径能实现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顺应守成的国运，正值年富力强的时候，具有聪明睿智的天资与孝敬仁爱温和恭敬的品德，宽仁博厚的恩泽与河海同样深，神圣英武却不杀戮的威势与风雷一样疾迅，已经收取太阿宝剑似的权力于掌中，治理天下就像臂运而五指顺从一样容易；已经转动普遍教化的冶炉于域内，大小政事如网在纲上而有条不紊，天下如同鱼群全都口朝上那样景仰颂扬尧舜再世了。然而皇上仍不自满，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垂询治理良策，恳切地征求实现无为而治的方略，体现了君臣同心共图良策的愿望，这种心念真是不自享安乐，不刚愎自用的心念啊！臣下我伏处蓬蒿灰藁之中，不明治国方略，然而不敢沉默。臣下我私下考虑，君主对于众臣，往往由于任用已久而厌烦轻视他们的建议，而偏偏在他们步入仕途时引导他们提出建议，还惟恐他们言之不尽；众臣对于君主，往往由于阅历日深或有所顾忌而不再进言，而偏偏在他们步入仕途时才畅所欲言，希望幸免于罪。所以臣下我愿意竭尽平生所思而全都讲出来。

臣下我听说，君主治理民众，就像上天养育万物一样。上天以它尽善尽美的精气，运行不息的刚健，把万物掌握在怡静虚寂的表像之内，以此昭示帝王的事业，于是弘扬辅助的功绩日益显示给众生；以它那作为佐吏的春、夏、秋、冬四季和金、木、水、火、土五行，协助它在养育万物的过程中畅行玄妙的事功，于是运行化生的主宰作用日益播布给万物，所以君主所处之位称为“天位”，所怀之德称为“天德”。如果君主有一个念头想到自享安乐就会立即忘记君临天下的责任，怎么能够效法上天的自强不息精神，砥砺众臣接受这种精神，达到天下太平呢？如果君主有一个念头想到必须要按我说的办，就会独断专行，而不能尽用天下的谋略，怎么能够替天行政，促成君主的美德，而不使自己安乐闲逸呢？所以勤奋促成天下移风易俗，而宵衣旰食，不只是把自己放在前面却把天下放在后面，便是君主有所作为的缘故；群策群力共担天下大权，而任贤使能，不矜持自己的长处而忽视天下的智慧，便是君主实现无为而治的缘故。因为只有君主不图安逸，才

可以使猜忌嫌疑丝毫不会强加给众臣,因而众臣能够尽心竭力,而不使他们的思想与法规背道而驰。也只有众臣能够代替君主工作,才可以使他们的一切想法丝毫不向君主做隐瞒,因而君主能够安坐在朝廷上施治,而不致使思想被法规所役使。所以古代贤明的君主不因自己兢兢业业而抛弃群策群力,也不因群策群力作用的全面发挥而废止自己的兢兢业业。古代的良臣不因困难而放弃治国平天下的努力,也不因治理的容易而忘记困难的可能出现。譬如尧凭借敬慎英明使用贤臣,舜凭借温和恭敬征求天下意见,开启万古文明而不把功劳归于自己,开启百代君王的治绩而不据为己有。所以当时大禹、后稷、伯夷、皋陶都能忘记自我而殚精竭虑地效力,四方部落首领、朝廷九大官员、十二州长官都能大张耳目而安抚远近,日理万机,经营中外,而尧舜只处理省察成就和统率臣民于事业这二件大事,不去强行干涉下面而显出漏洞,这是因为尧舜求得贤臣很辛劳而不自享安逸,所以他们获得到合适人选后自己变得很轻闲又不刚愎自用。既然如此,那么尧舜之治固然是众臣的力量,但更是君主的力量吧?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创建我大明皇朝,整饬勉励百官,曾经诫谕廷臣说:我观看《尚书》,拿"元首"比喻君主,拿"股肱"比喻臣子,这表明自古君臣本是同属一体的。如果君主独断专行,臣子的职责就会被废弃;臣子不能胜任职责,君主要做的事就够辛劳的。又曾诫谕地方官吏说:贤臣为君主服务时,应该视君主为父母,视国为家,视民为子,凡是可以安定国家、利于民众的事,只要知道的,就没有不去做的。如果躲避困难而害怕辛劳的话,事情就办不成了。像太祖那样圣明的皇帝,竟然也如此要求众臣!所以当时效法《易·履》"上天下泽"的卦象去整肃朝廷,使愉快团结的气氛日益与纯一的仁德联系起来;效法《易·泰》的卦象,去沟通君臣上下,使祥和的感化日益遍及君臣之间。这样看来,太祖的业绩与尧舜相等,而当时的盛世与尧舜时代并列,固然是由于太祖统率勤奋,但也由于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得到众臣的效力,而并非完全是臣子的力量啊!后来的十一朝都仰赖太祖时的君臣同心的精神,今后亿万年间仍将弘扬保有江山的大谋略,哪里是没有来由的呢?到我皇上,继承光大这一传统,

恭敬地继承祖先的谋略，精思最完美的治理状态。近年来，以深厚的福祉普施天下，以令人震慑的威力整肃天下，虽然居处深宫却经常亲自处理政事，虽然静心摄领国务却批阅全部奏章，跟尧舜一样兢兢业业，跟太祖一样谨慎警戒，所以难怪官宦之家宣导仁爱的风尚，安心桑麻的农人乐其世业，读书人有《诗经·械朴》所讲的那种优遇，家家户户有弹琴读书的教化，军饷充足而奸宄匿迹，吉祥瑞应呈现而灾异妖氛消退，所以就此而表明独断之治是可行的。

但是为什么有勤政精神而事功却与之相左，励精图治愿望恳切而成效却不免粗疏呢？吏治不是没有天天整饬，然而对贪官污吏的揭发屡见于弹劾的奏章之中；民众的生活不是不日益宽裕，然而关于民众流离失所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绘图之中。已经广泛教育学生必须砥砺品德了，可是诡诈行为公然流行在儒生之间；已经对居民进行旌表了，可是浇薄的风气在乡里却日益严重。更严重的是，负责农业生产的部门竟对着房顶打空算盘，军中纨绔子弟任意胡来，奸恶的人隐藏在皇上身旁，灾异连续出现在宫廷之内。这些情况的确像皇上所说的那样：事功却与勤奋的用心相左，成效却不免粗疏。这是由于浮华虚假的习气盛行，玩忽怠惰的弊端滋生；躲避困难、害怕辛劳的人众多，而尽忠竭勤的人稀少。对这种现象，太祖原本就曾经说过了。这又原因何在呢？上级要求下级真抓实干，而下级只用虚名响应，这便是虚假浮华习气造成的。上级不用法规慢待下级，下级竟敢利用法规不理上级，这便是玩忽怠惰的习气造成的。浮华虚假则不能求实，玩忽怠惰则法规虚设。这表明只有任用忠信诚实的臣僚，才有清明和洽、全面治理的政局；只有任用精明强毅的朝士，才有整齐严肃的事功。因此如果任用得人而使吏治得到整饬的话，则一定要针对那些贪官污吏而表扬那些清官廉吏，将会使贿赂绝迹而不再出现半夜送钱的官吏。如果任用得人而使民心安定的话，则一定要针对那些为非作歹的豪强之家而昭示对造成逃亡所施加的严惩，将会狱案清平而贫家不再有匮乏的忧虑了。如果任用得人而使士气端正、风气统一的话，则一定要在地位相等的人中看重道义品行，针对僭越行为而严格等级制度，把具有邪怪行为的人移送到地方管教场

所中去,使仁爱淳厚的恩德洋溢在居民之间。如果任用得人,让他们掌管国库、查验部队的话,就一定要让侵吞国库者不能假借公用的名义中饱私囊,借用巨资贿赂宦官的将帅不能私役士兵而削弱军力,将会使冒领虚耗的费用从根本上得到清理,贵族官绅逾制占用公务人员当差的现象从正常运作中得到纠正。如果任用得人而使神明感通、疆宇巩固的话,就一定会使奸恶消弭在萌芽状态,修补挽救在事发之前,将会边远地区沐浴着皇上的恩泽,近畿地区一片融洽,天地显示出吉兆,山川呈现出祥瑞。由于不自享安逸,所以就不会刚愎自用;只有不刚愎自用,才能不自享安逸。但是未曾有过君主的思想与大臣不一致从而使百事都任用得人的先例,也未曾有过大臣们的思想互不一致却以此去统一天下思想从而使大小事物都得到治理的先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天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如果大脑与手足不相贯通,手足就会丧失执行大脑命令的功能;天下犹如一个家庭,如果家长、长子与其他庶子、子侄不相接近,庶子、子侄就会丧失辅助作用。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的制策,其中说:我见一些臣子在为自己谋划时很少有不完善的,然而为国谋划时却很粗陋了。臣下我认为,皇上想要众臣把国家视如自身,就应该带头不自享安逸,把自身视同国家。臣下我又跪拜敬读皇上的制策,其中说:有些臣子为自家操劳,不遗余力而且能够让贤能者为自己干,可是对于国家却消极怠工。臣下我认为皇上想要众臣把国家视如自家,就应该带头不在自家自享安逸,把自家视如国家。因为上有所行,下面就必定会效仿,君主有所喜好,民众就必定会跟随。然而根据臣下我对天下人心的观察,虚假浮华确实存在,可是拉帮结伙比虚假浮华更严重;玩忽怠惰的现象确实很多,可是官吏间的相互掣肘比玩忽怠惰更严重。近年以来,对于不认为不可以实行的事坚决实行,实行的结果并没有害处;对于不认为不可以反对的事坚决反对,反对的结果也似乎没有害处,所以神异圣明的字眼单独归于皇上,愚昧浅陋的字眼都归于下级。如果神异圣明的字眼自己给自己挂上,就会随之产生骄傲与轻侮的心理,于是便俯视天下,觉得无人可以与他共成功业;如果把愚昧浅陋的字

眼加在天下人的头上，就会随之产生猜疑与鄙视的心理，于是便自我欣赏，认为无人能够与他共同施展智慧。这就是开始因为自享安逸而成为孤家寡人，最后又因孤家寡人而促成自享安逸。可偏偏却不考虑士人的斗志难于炽热而易于衰落，就像火炬那样，如果倾尽江河水去浇泼它，还有谁会激励自己的斗志呢；士人的节操难于培植而易于颓败，就像秋天的蓬蒿，如果猛刮疾风去摇撼它，还有谁会树立自己的节操呢？假如满朝文武都变得像屈挠手指那样柔软，而皇帝一人独成刚愎之用，恐怕就自享安逸的心念越来越想实现，刚愎自用的念头越来越会坚定，而视王事如自身、视国如家的精神就更加无法实现了吧？

臣下我私下还愿意进献看法：臣下我听说，君主的精神时刻拴系着天下的命脉，天下的命脉时刻贯注着君主的精神。然而君主精神无所贯注，必定就有所烘燃，君主精神有所寄存，就必定不会被其它东西所夺占。因此想不丧失远方的边地，就必定不能沉湎在近傍的几案坐席之间；想不污辱德行高洁的大臣，就必定不能溺爱近臣；想不摧折犯颜直谏的诤臣，就必定不能使谗毁奉承的佞臣得志。然而能融化刚直之心、蔽塞纯正之念的玩艺儿，没有比利益和欲望更为主要的了。这就是尧舜的臣子们为什么还要对君主尧舜加以规谏，在危险、隐蔽的地方辨明治国之道的原因。臣下我希望陛下效法《易·乾》的刚健，去除掉自享安逸；以上天还有四季辅佐作为法式，去除掉刚愎自用，洗濯利欲之心，来与天下一起重新开始，深夜研读法规，鸡鸣临朝听政，使勤奋与群策群力相辅相成，那就天下大幸，愚蠢的臣下我也大幸了！臣下我只不过是一个山野间卑贱的读书人，不懂得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尊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侯真平译〕

明神宗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殿试策问

[万历三十八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帝王制治，要在知人，权在出令。然知人之法，不过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言固可不辨欤?至于出令，则或拟之丝纶，或喻之涣汗，或谓当坚如金石，信如四时。令固若是重欤?唐虞三代之威，言必底绩，令出惟行，邈乎尚已。即汉唐以下之主，犹有能综核名实，用致中兴，诏书一下，而骄将悍卒莫不用命者。是岂无所操持而能然欤?

我太祖高皇帝再造寰区，明并日月，威如雷霆，臣下每有陈奏，情伪立决。薄海内外，凛凛奉功令惟谨。圣烈神谟，炳耀万世，二百余年之治安，恒必由之。可得而扬厉其盛欤?

朕御极初年，纪纲振肃，德意旁流，浮漓之说稀闻，奉宣之吏多有，亦仰凭皇祖之余烈焉。迩来人心噪竞，譸訛成风，一人而此是彼非，一事而此可彼否。甲乙互争，薰莸莫辨，公车奏牍，不可胜览。盖议论混淆之弊，至今日而极。至于吏治、边防、士风、文体诸关系治化者，朕皆三令五申，期于振刷，而守令之贪残，封疆

之破坏，逢掖之嚣陵，文章之怪诞，皆日甚一日。虽有明纶，裒如充耳。盖诏令废格之弊，亦至今日而极。兹其故，果安在欤?

汉人言四患当屏，曰伪曰私，曰奢曰放；宋人言国家宣敕条贯，繁而无信，轻而勿禀，上失其威，下受其弊。以今日之事质之，同欤?否欤?《传》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成。今上欲省而下愈烦，上欲行而下愈格，安所得同?深惟厥咎，岂朕之烛断未精，而率作省成者非其道欤?抑臣下矜忮党伐，虑不在公，偷玩习成，有难遽挽，将无所谓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上下之间固自有潜孚嘿喻，而不在于科条文告之末者欤?尔多士挟策而来，目击时弊，诸所为省议论，定权衡，重令尊君，必有画矣。其明著于篇，朕将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所谓使意念真诚，就是不自己欺骗自己。憎恨丑恶就像厌恶难闻的气味，喜好良善就像喜欢好看的女子，这就叫做让自己痛快满足。所以君子一定要谨慎地对待只有自己一个人时的行为。

世间存在着官员的职业，平民的职业。况且一个人的生活用品，全部可由各行各业的人们提供，如果坚持只有自己生产的东西才去享用它，这是要把天下人都引上为生计而疲于奔命的邪路。

如果有块美玉在这里，我们是应该把它装在木匣中珍藏起来呢?还是应该寻求一个识货的商人卖掉它呢?孔子回答说：卖掉，卖掉!我正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呢!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帝王施治，重要的是知人善任，灵活应对则在于发布命令。然而知人善任的方法，无非就是像《尚书·尧典》所说的那样：众臣普遍汇报自己的政绩，然后君主正确

地考核他们。那么对于汇报，原本上可以不加以辨识吗?至于发布命令，有的把它比喻成：起初细微如丝，施行于外则渐大如纶；还有的把它比喻成：像汗液一样，发出后就不可能收回；或者认为君主的命令应当坚实如金石，信誉像四季。这样看来，命令原本上真是如此重要吗?唐尧虞舜和夏商周的威势，也就是让众臣的汇报必定有政绩，命令一旦发出就只有执行，这已是从很早时代起就有来由的了。即使汉代、唐代以后的君主，也还有能够全面考核官吏政绩的虚实，从而导致中兴局面出现，以及诏书一下而骄将悍卒没有不服从的。这难道是没有什么控制措施就能够取得这种效果的吗?

我太祖高皇帝重建天下，圣明与日月同辉，威武如同雷霆，臣下每有陈奏，虚报者立即被判断出来，四海内外只能敬畏地奉行法令，神圣的事业与谋略彪炳万世，二百多年来的平安治理，总是必定由此而实现。现在能够阐扬一番太祖时的盛世大治吗?

皇帝我即位初年，法纪振肃，仁德广施，虚假的说法很少见，遵旨执行的官吏有很多，这也是由于仰仗了列祖列宗功业的缘故。近来人心浮躁好争斗，互相诋毁成为风气，对于某人的评价或是或非，对于某事的看法或可或否。甲乙双方相互争斗，谁对谁错难予辨别。应召士子的奏章，多得看不过来。这些都表明，议论纷纷，是非不辨的积弊现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至于吏治、边防、士风、文章体式等关系到天下治理与教化的重大问题，皇帝我已经三令五申，期望能够得到振刷，然而太守县令的贪婪残暴，边疆国土的破损，读书人的喧闹争竞，文章的怪异荒诞，都一天比一天严重。虽然已有诏令，诏令放到一块，却充耳不闻。这表明，诏令被搁置不理睬的弊端现也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了。造成这些弊端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

汉朝有人说四种祸患应当摒弃，这就是虚伪、自私、奢侈、放纵。宋朝有人评说朝廷宣布诏令，各成系统，过于复杂而失去信用，语气轻松而使臣民不予奉行，上面丧失掉自己的威信，下面也受到了弊害。拿今日的情况做对照，相同还是不同呢?古书上不是讲过君臣同心，治理教化就形成吗?现在上面想使命令简化而下面

却使它更加复杂，上面想使命令畅行而下面却使它愈被搁置，这样怎么能够做到君臣同心呢?深思其中的责任，难道是由于皇帝我不能明断，从而在统率臣民于事业、省察成绩这方面未得其法吗?或者是由于臣下自负互嫉、党同伐异，心思不在公家，怠惰苟且的恶习已经形成，难于很快地挽回，根本不重视同心的言论要诚信，诚信在言论的前面，统一的号令要执行，诚信在号令的外面，上下级之同本来就存在着内心相互信服和理解，而不表现在法令条文和告示表面的呢?你们这些读书人带着所想好的对策来到朝廷，又目击到时弊，对于诸如减少议论，确定人事的衡量评价标准，看重诏令，尊敬君主等问题，一定有所谋划了。希望你们都能明确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将阅读它们。

钱谦益　会试卷七道

钱谦益(1582～1664)　字受之，号牧斋等，江苏常熟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探花，授翰林院编修。天启间，以名列《东林同志录》而罢归。崇祯元年复官，晋升礼部侍郎，因十一月名列会推阁员中，为尚书温体仁等所嫉，被讦以天启二年主考浙江乡试时钱千秋案而遭斥。明亡，主张拥立潞王不果，遂依附马士英等，得用为弘光朝礼部尚书。次年五月清军抵临南京，率百官投降，出任礼部侍郎兼管秘书院事，充《明史》副总裁。不久乞假返乡。后参加反清复明运动。其诗文负盛名于一时。有《牧斋集》等传世。

论　圣王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

论曰：王道必本于无欲，非无欲也，以天下之欲为欲也。夫天下大矣，民生其间，知梦而不可规表测也，力横而不可约束绳也。人主安能一一均调之，剂量之?而曰必以天下之欲为欲，岂其舍广厦细旃之奉而贬损其躬，以为穷檐蔀屋计哉?圣王之道，执大象而天下往。不先平天下之心而亟治一己之欲，则先儒所称圣王必以其

欲从天下之心者，盖尽性之旨也。请推言之：

人各以性盛心，以心盛欲。欲也者，感于性而穷于心，其微无形，而其危不可图，圣王与天下之所总也。欲之初萌也，如燔火之始传，欲明欲灭，而不可扑也。其渐渍而来，乘间伺隙，如积火之消膏，不自觉也。其内引而外射也，如火之燎于原，流金泐石，而莫可控揣也。纩矿塞耳，则不闻钟鼓；一尘眯目，则不见丘山；片欲翳心，则不辨白黑。欲之为我有，而累我亦大矣。而况人主之身，立于四累之上而隔于九阍之内，威福为之辔御，好恶为之毛羽，一切声色货利娱心极虑之事为之钓饵而射的。吾欲念一萌，而天下已有市吾欲而进者。人主厌纵其欲，以乱百度，而天下与人主日隔。宵人射声，忠贤匿影，人主重袭而不自知，天下吞声而无所诉，而天下事乃不可为矣。

圣王乃伏而思曰：天下之人，五方异宜，四海异俗，广川大谷异居，刚柔燥湿异气。有好必有憎，有愉必有拂。天下人各有欲也，岂独人主！且人主以一身司牧亿兆人，哀乐虑叹无不寄命于人主。善御者之于驾也，马体调于车，人心适于马。御者之心不自用，而为马用。而人主独能外天下以成其欲乎？然则人主以天下之欲为欲者也，人主安得有欲？惟人主不以天下为欲，而自以其欲为欲：吾目欲选色，而天下憔悴转死者吾不见；吾耳欲流声，而天下呼吁道旁者吾不闻；吾口欲爽味，体欲重裘，而天下木食鹑衣者吾不恤。天下瘁瘁焉，人苦其生，而又何赖于人主为？

夫数者之欲，非庸主有之而圣王独无也。圣王之欲即庸主之欲，又即天下人之欲，而特其见有公私，量有广狭，争于一念之转关而已。是故天下有覆盆向隅、不敢望天者，则天下之目，苦不得视，而吾之欲色者诎矣。天下有呻吟叹息、危涕相告者，则天下之耳，苦不得听，而吾之欲声者塞矣。天下有结墙底滞、无生人之乐者，则天下之痿痹，苦不得伸，而吾之欲甘美者却矣。深宫曲房，嘲号笑舞，进斯民于应门九重之内，而撤一心于闾阎畎亩之下，斯所谓以天下之欲为欲，与封己一膜者迥异乎？而要之圣王，非无欲也，盖善用其欲者也。向令己不欲色，则天下之憔悴者谁见之？向令己不欲声，则天下之呼

吁者谁闻之?向令己不欲口体之适,则天下之鹑衣木食者谁悯之而谁恤之?

节啬其形,劳苦其神,自以为能绳约吾,以就天下,而其与天下之心隔于腠理,则已久矣。然则圣王之所为有欲者,乃其无欲之至;而其所为以欲从天下之心者,不过自从其心而已。当其时,人主之欲回环旋复于一世,如斗柄之所指,四时寒燠各顺其令,而天下寄命于人主,如中衢而致尊,过者斟酌焉,各得其欲而莫知其所以然,一以为家人父子,一以为心膂手足。人主无欲,以天下之欲为欲;而天下亦无心,以人主之心为心。故曰不先平天下之心而亟治一己之欲,此圣王尽性之术也。

虽然,治欲亦难言矣。大抵庸主之欲,依附于情习之内;而英主之欲,飘忽于理气之间。夫欲至飘忽于理气间者,规矩不及,攻治不至,急之则遁,缓之则伏。其与天下之心相拒最微而相隔最锢,则惟有圣贤尽性之学足以破之。故英主必不可使不知学,而引君格心,其权又属之大人。人主治其欲,而后可以通天下之心;大人能自治其欲,而后可以通人主之心。其始也,以欲从天下,而究且天下从欲以治。此又尽性之本,不可不亟讲者也。

论述说:称王天下的大道必定要把没有欲望作为根基。其实并不是没有欲望,而是要把天下的欲望作为欲望啊!天下太广大了,老百姓生活在里面,思想错综复杂,根本就没法用圆规圭表这类器具去测量;力气随便使用,根本就没法用绳索绑带这类东西来束缚住。君主怎么能够逐个人去均衡调整他们的力气,仔细酌定他们的思想呢?可却强调一定要把天下的欲望作为欲望,这又哪里是让君主舍弃高大宫室和精细毡蓬的供奉而减少自身的享用,来作破漏房屋里居住的考虑呢?圣明帝王的治国原则与方法,在于执定大道而使天下人都来归从。不是首先使天下人心平和下来而是把整治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一位,那么前代名儒所讲的圣明帝王一定要把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的人心,也就是那穷尽天赋善良本性的主旨了。请求深入论述这一主旨。

世人各自依凭本性来使心念扩展开来，又依凭心念而使欲望膨胀起来。欲望这玩艺儿，从本性那里感发出来又在心念上涌生出来，它那隐微的苗头根本看不见，可它那危险性却控制不住，这是圣明的帝王和天下人所完全相同的地方。欲望在开始萌生时，就像洁白的火苗开始燃起，既要亮起来又要熄灭似地，但却不能用手去捂它呀！欲望逐渐积聚而扑向前来，钻空子，找缝隙，就像旺盛的火焰融化那蜡烛，根本让人觉察不出来。它从内部引动又向外面喷射出去，就像大火在原野上熊熊燃烧，融化金属，烧焦石头，简直没办法控制住又不知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啊！用一小团丝绵絮堵住耳朵，就听不到敲钟击鼓的声音；有一粒沙尘眯住了眼睛，就看不到高山丘陵；被一丁点儿欲望遮住了心念，就辨别不出黑白是非来。欲望被我所怀有，而拖累我也特厉害了。况且君主的一副身躯挺立在伪、私、放、奢这四种拖累的上面又被阻隔在深宫里面，惩罚与封赏构成了驾驭群臣的手段，喜好什么与厌恶什么又构成了辅助的力量，一切歌舞美色、金玉财利这类使内心快活又要设法搞到的事情构成了引诱君主上钩和实现自己目的的玩艺。我那欲念一萌生，而天下早就有迎合我那欲念而献呈上来的人了。君主满足又放纵他那欲念，搅乱各种政务，天下人就与君主一天比一天疏远了。卑劣的小人骗取到名声，忠正贤良的人藏匿起自己的形迹，君主却隔着好多层而自己压根不知道，天下人忍气吞声却没有地方来诉说，于是天下的事情就没法办了。

圣明的帝王却低头沉思说：生活在天下的人们，东西南北和中央区域的出产并不相同，四海各地的习俗也不一样；大河深山的居住方式并不相同，刚强柔和的性格与干燥潮湿的气候也不一样。有喜好的东西就必定有憎恶的东西，有感到愉快的事情就必定有感到恼怒的事情。天下人各自有各自的欲望，哪里仅仅是君主呢？况且君主凭借自身一个人来统领亿万人，亿万人的悲哀与欢乐，忧虑和叹息，没有一样不把命运寄托在君主的身上的。擅长驾车的对于车辆，要让马匹的动作和车辆相一致，使自己的心念同马匹相适应。驾车人的心念不是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而是跟着马匹走。由此可见，君主就唯独能够脱离开天下来形成自己的欲望吗？既然如此，那么君主把天

下人的欲望作为自己的欲望,君主又怎么能有欲望呢?只因君主不把天下作为欲望所在,却把自己的欲望作为欲望,即:我那眼睛中想要选取美女,而天下憔悴死在异乡的人们我却不看它;我那耳朵里想要听到淫靡的音乐,而天下在道路两旁呼天喊地的人们我却不听它;我那嘴里想吃到爽口的山珍海味,我那身上想穿上柔软温暖的皮衣,而天下吃草根啃树皮和衣衫破烂的人们我却不体恤。天下陷入一片痛苦之中了,人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困苦,那还依赖你君主干什么呢?

以上这几个方面的欲望,并不光是平庸的君主怀有它们而圣明的帝王就偏偏不存在啊!圣明帝王的欲望其实也是平庸君主那样的欲望,同时又是天下人的欲望,只是他那见地有公私的区别,他那度量又有广大与狭窄的差异,在一念的急转弯上能做出谁占上风的抉择罢了。因此天下出现头扣瓦盆、面向墙角而不敢仰望天空的人,就表明天下人的眼睛正为没办法亮出来而在痛苦,我那想选美女的欲念也就收回去了。天下出现呻吟叹息、痛哭流涕而相互诉说的人,就表明天下人的耳朵正为听不到喜庆事而在痛苦,我那想听音乐的欲念也就封堵住了。天下出现了把墙帘连起来、在下面躺着不动、没有一点儿活人欢乐劲儿的人,就表明天下人的麻木瘫痪,正为得不到伸展而在痛苦,我那想吃山珍海味的欲念也就消除了。在深宫和转来拐去的房室内接连欢叫,笑闹蹦跳,也把当今的百姓带入到宫门殿阁里的那般幸福的生活境地,将那一心念撇到民间状况的下面,这正是所说的把天下人的欲望作为欲望而与那种封住自己视线的人迥然不同的地方吧?验核那圣明的帝王,他们也并不是没有欲望啊!但却属于善于驱遣自己欲望的人。假设自己不想选取美女,天下憔悴的人又有谁能看得到呢?假设自己不想欣赏音乐,天下呼天喊地的人又有谁能听得到呢?假设自己不想吃的穿的都挺舒服,天下衣衫破烂又在吃草根啃树皮的人又需要谁去怜悯他们呢,又需要谁去体恤他们呢?

吝惜并减少那副躯体的活动,在神智上辛勤艰苦地运作,自以为这样就能约束住自身,去归就天下,但这同天下的人心隔着一道薄膜,已经时间很长了。既然如此,那么圣明帝王用来对付怀有欲望的办法,正是他没有任何欲望啊!而用来处理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人心

的办法,也不过是自己顺从自己的善良心念罢了。在这个时候,君主的欲望对全社会普遍巡视又反复琢磨,就像北斗星斗柄所运转指向的方位,春夏秋冬寒冷温暖各自都顺从它的命令,而天下人把命运都寄托在君主身上,就像在中心大道上向尊贵的人表示尊敬,来往的人都会想一想自己该怎样做,结果各自实现了本人的想法却闹不清这样做的原由是什么,完全觉得是一家中的父亲与儿子,完全觉得是同一副身躯上的心脏后背和双手两脚。君主没有个人的欲望,却把天下人的欲望作为欲望;而天下人也没有自己的心念,却把君主的心念作为心念。所以说不是首先使天下人心平和下来而是把整治自己的欲望放在第一位,这正是圣明帝王穷尽天赋善良本性的方法啊!

尽管如此,整治自己的欲望也太难说清了。大致上看,平庸君主的欲望依附在情欲和习性的范围内,而英明君主的欲望却飘忽在天理和气质之间。欲望达到了飘忽在天理和气质之间的状态,规劝和针砭都不起作用,攻击和整治也毫无效果。太急迫的话,它就逃遁了;太舒缓的话,它就潜伏起来了。它与天下人心相抗衡最为隐微,相隔离又最为顽固,这就只有圣贤穷尽天赋善良本性的学说足以破除它了。因此英明的君主绝对不能使他不懂得学习,而引导君主并纠正他的心念,具体的灵活做法又落在了大臣的手中。君主整治好自己的欲望,然后才可以融通天下的人心;大臣能够自行整治好本人的欲望,然后才可以融通君主的心念。在起始阶段,是把自己的欲望顺从天下的人心,可到最后,还是使天下的人心顺从君主的欲望而实现大治。这又是穷尽天赋善良本性的根基所在,不能不急速地讲明的东西啊!

拟上留北直隶诸处本年应解内帑
税银以二分充军饷一分赈饥民廷臣谢表　万历二十七年

伏以皇心忽转,聿修实政以祈天;帝德旁敷,暂撤空储而济国。春温天语,顿舒数载之屯膏;雨涣王居,大畅一时之解泽。军民禔福,中外倾心。臣等诚惶诚恐,稽首顿首。

窃惟民为国之根本，而兵乃王之爪牙，八政攸关，六官并重。国家建都三辅，借右扶、左翊，以实神京；而屯戍九边，设内营、外卫，以雄重镇。兵农棋置，锁钥固于北门；粮饷灌输，转运资于南极。充都奉邑，生聚何止于十年；投石超乘，训练不忘于千日。盖培养系累朝之德，而干城实一代之基也。

自矿税相仍于迩年，致绎骚日甚于内地。告缗迭起，榷利无方。金石穷搜，奚止贡珊瑚之树；貂珰横出，不须劳獬豸之冠。赤地萧条，尽是含冤于中使；黄封络绎，何曾介喜于天颜！徒以群小之纷纭，遂致帝心之震恐。自南徂北，非旱即霖。焦土铄金，谁禳四目之魅；怀山拔木，频舞一足之羊。飞蝗蔽天，捐瘠盖地。东南负剜肉之苦，嗟彼奥区；西北起剥肤之忧，念兹上国。闾左之灾荒如此，卒伍之流离可知。野无青草之储，牂羊谁托；边有黄花之戍，牧马不肥。釜甑生尘，犹惧怒捉人之吏；兜鍪如洗，岂堪逢宿饱之胡。千里污莱，计已穷于露肘；三边精锐，智徒出于脱巾。弄赤丸而纵横，半作潢池之盗；卧绿沉而怨诅，谁当紫塞之雄。仰屋计臣，叹一筹之莫展；筹边司马，补万牍以何裨！虽际运泰宁，朝廷方抚虞渊之日；而灾当阳九，草野或忧杞国之天。

兹盖伏遇皇帝陛下，治法无私，贞同得一。璇台八袭垂裳，想像于六宫；绨几九阇削牍，震惊于万里。念公私告匮之日，借箸良难；且军民交瘁之时，燃眉何继。遂以一年之税额，肆为万姓之恩膏。盖谓本非惟正之供，取无艺以充内帑，不若即寓蠲租之意，留有余以散民间。二分给军，知水火之尤迫；一分议赈，谅升斗之非虚。德意风行，颂声云起。疏观郊野，顿息鸿雁之哀鸣；逖听边陲，已见熊罴之踊跃。父老扶杖观风，相庆于沟中；壮士挽弓贯月，竞传于塞外。雉驯四境，太平可冀。桑麻马立千门，警急无虞烽火。此皆由我皇上克备大君之德，乃知小民之依。初缘国计空虚，误开利孔于探取；今以天变警戒，遽腾明诏于捐除。始悟攫金剖璧之徒病国，已延于数载，从此投珠抵璞之令崇朝，且遍于四方。盖非徒皇上不世之仁，抑亦高庙万年之赐也。

臣等目击时艰，心怀国恤。流民可绘，叩阍无当于严君；窃禄何

能，恤纬自惭于嫠妇。思汲黯之矫诏，空负须眉；念韩滉之饷边，莫伸指掌。惊逢旷典，仰悉宸谟，下臣无待伏蒲之劳，高天已沛润朽之泽。向来否塞，皆臣子自失于格心；此日恩施，知君父不难于启牖。喜极涕零，欢并愧集。伏愿益虚咸炤，恒继离明。足食足兵，节五材之用；厚生利用，修六府之功。念辇毂之反裘，劬劳甫息；轸遐荒之竭泽，疢痛宜瘳。弓挂扶桑，继民不见兵之盛事；粟陈红朽，致天不爱道之休征。咸五登三，快睹巍巍之治；袭六为七，行看永永之传。臣等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奉表称谢以闻。

跪拜想来，由于皇上的心念忽然转变，修明实际的政务来向皇天做祈祷，于是帝王的仁德广泛施布，暂且撤销白白堆积在那里的储备来接济国事的需用。春天都对皇上的话语感到特温暖，顿时就解开了积聚好几年的春雨；春雨普降在京师地区，严重得谷物不生的田地一时间就被雨水化解开了。军队和民众都安宁幸福，朝廷与各地都内心顺服。臣下我等人惊惶恐惧到极点，跪地叩拜再叩拜。

私下想来，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而军队又是天子的得力助手，《尚书·洪范》所讲的八项政事都涉及到它们，《周礼》所定的六大职官系统也都重视它们。我们国家把首都建立在三辅地区，借助右扶风和左凭翊来充实京师北京。而在北方由九座军事重镇构成的边防线上屯兵戍守，设置京师的三大营和各地的卫所，用来增强军事重镇的威势。部队和农民星罗棋布，防护力量在北部入口处得到了巩固；粮草军饷像流水一样输送，辗转运送依赖那南方的极远地带。提供赋税的大小城镇，人口繁殖和财力积聚哪里仅像春秋越王勾践那样只经过十年；而部队投掷重石，驰动兵车，训练在千日之内也不忘记。这是出自培植养育百姓正属于我朝各位皇帝的德业，而捍卫边境的将士实际上构成了我朝的基石啊！

自从矿税在近几年内接连征收，致使各种骚动在内地一天比一天厉害。告发漏税的举动频繁出现，征敛财利却没有固定的制度。金属矿石没有一样不搜刮，何止是贡上珊瑚树？宫中的太监窜到各地，根本不需要烦劳负责司法的官员。寸草不生的土地满目萧条，全都

是从宫中派出的太监那里蒙受到冤屈;皇室的封条贴了一道又一道,人们什么时候从天子那里乞求到高兴的事情?只因一大群小丑胡作非为,致使皇帝的心中感到震惊和恐惧。从南方到北方,不是大旱就是大涝。晒焦的土地能够融化那金属,有谁去驱除长着四只眼睛的旱魔呢?大水包围了高山,冲倒了树木,由龙化成的独角羊频繁地舞动。飞动的蝗虫遮蔽住天空,饿死的尸体盖满了大地。东南方承受着剜却心头肉的痛苦,感叹所在的富庶地区竟成这样;西北方涌生出被剥皮的忧虑,想到这泱泱大国竟然如此。民间的灾荒达到了这种程度,士兵的流离可想而知。原野上没有青草的再生,羊只可托付给哪里呢?边境上有秋季的戍守,可放牧的马匹却不强壮。做饭锅都蒙上了尘土,可百姓仍害怕惹怒那些捉人的官吏;头盔一副都没有,怎么能经受住同一向饱食的异族部队相遭遇呢?千里土地一片荒芜,生计已经捉襟见肘都做不到了。东方、西方和北方边境的精锐部队,智谋只是出自投降这一条。耍弄探取弹丸杀官吏的把戏而到处为非作歹,有半数人变成了盘踞在山寨水寨的盗贼;枕在浓绿色的弓箭上而怨恨诅咒,谁会担负起边塞的威镇重任?对着屋顶在发愣的中央财政官员,哀叹一筹莫展;负责筹划边防事务的武将,补奏成千上万的告急文书又有什么益处?尽管正赶上太平安宁的时运,朝廷正主宰着落入虞渊的太阳;可灾厄正遇上水旱发作的时期,民间有人在忧虑杞国的苍天会塌下来。

如今恭敬地遇到皇帝陛下在治国大法上不掺杂个人的意志,验定疑难事顺从众人而获取到天意。在饰有美玉的八层高台上稳稳坐定,从六宫想象到天下;在铺有绨锦的九道门防护的御案上大笔一挥,使万里以外都感到震惊。考虑到现今公家和私人都声明匮乏,拆借起来的确很难,况且目前军队和民户交相困顿,燃眉之急接下来可怎样解决?于是拿出全年的税额,全部作为对世人的恩泽。这大致上是认为这笔款项原本上就不属于法定的赋税收入,永无尽头地进行征收,用来充实皇室的银两储备,还不如就寄寓着免除赋税的用意,把多余的部分留出来,散布到民间去。其中三分之二拨付给军队,这是明了处在战斗状态中的士兵更显得紧迫;三分之一用来议定对哪

处受灾的百姓进行赈济，想来每户人家获取到一升半斗的粮食并不是空头支票。仁德的用意像春风一样播扬，赞颂的声音像云彩一样涌起。大略上看一眼郊外的田野，立刻就停止了逃亡人们的悲鸣；往远处听一下边疆地带，已经看到了勇猛将士们的奋勇杀敌声。老年人扶着拐杖观望祥风，在逃亡所到的山沟中互相庆幸；壮士们拉开硬弓能射向月亮，在塞外竞相传告这一喜讯。像野山鸡乱窜的少数部族在四周边境上都服服贴贴，太平景象很有希望到来。桑麻茂盛，千家万户的门前都拴立着自己的马匹。入侵的警报虽很紧急，但不用担心边境的烽火。这全都因为我们的皇上能够具备圣明帝王的德性，于是就了解普通百姓的疾苦啊！当初由于国家的财政很空荡，错误地开启财利的渠道去探求敛取；如今鉴于皇天降示灾异来警告，猛然就把废除的决定突出地显示在明晰的诏书上。开始醒悟到那帮攫取金银、搜括珠玉的家伙只会给国家带来危害，已经延续好几年了；从此以后，一切恢复正常的命令，极为迅速地定立起来，并且传遍四方各地。这并不仅仅是出自皇上还不到三十年就形成的仁政，也是太祖皇帝给千秋万代子孙留下的恩赐啊！

臣下我等人亲眼看到时局的艰难，内心惦记着国家的忧患。逃亡的民众就像北宋当年可以绘成图画，可扣击宫门来奏请却不符合严明君主的心意；白白领取着朝廷的俸禄，可又有什么本事呢？忧虑国家的危亡，在西周织布的寡妇面前都自愧不如。想到西汉的汲黯假借圣旨赈济灾民的举动，自己真是白白占据着男子汉的称呼；又想到唐朝韩滉为边境筹措军饷的情况，自己竟连一点儿力量也没使出来。惊喜地逢遇到前所未有的恩典，往上全靠皇上的谋略，在下面供职的臣僚不需要在犯颜直谏上费力气，如同高远皇天的陛下已经充沛地施布了滋润朽木的恩泽。从前的阻隔堵塞，全属于臣僚在纠正君主心念上自身做得很不够；今日的恩德施布，就懂得了君主并不是很难诱导的。高兴到了极点，禁不住泪流满面，欢乐与惭愧又集结在一起。跪拜祝愿陛下使那普照天下的光辉更加清澈，经常保持太阳和月亮相继升起的那种光明。使百姓衣食富足，使军队强盛，节省木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资的用项；使民众生计宽裕，为他们兴利除害，取

得五种物资和谷物储藏的功效。体念运送粮草要反穿皮衣的艰辛，那种劳苦劲儿刚刚得到缓解；关注边境一带什么都已耗尽的情况，各种创伤应该予以救治。把弓箭悬挂在太阳升起的地方，承接上民众根本看不到战争的盛大政事；库存的粮食呈现出多得发红变霉烂的情景，招来皇天不吝惜大道的各种吉祥的兆应。既与五帝相同又超过夏商周三代，使人们欢快地目睹到盛大的治绩；承袭《六经》又推衍出第七部经典，使人们眼看着千秋万代传下去。臣下我等人不知道究竟该怎样去观望皇天和仰视圣君，简直激切惶恐到了极点。恭谨地持奉这篇表文，连称谢恩来奏上。

策　第一问

今之扼腕而计国者，宫府釜鬵，边陲伏戎，敝舌缀牍不下数十万言。人主亦愁置之耳，恬不动色。而明问独以安危大势总挈之人心，则愚尝深惟标本之计，而重有慨矣。愚睹二百年来，莫棁杌如二正之季而祚卒晏如泰山者。二正之季，内孽于权奸，外孽于强虏逆藩，天下骎骎动矣，而二季之主仅以狗马蹴踘、轻裘挟瑟之好，生祸患于眉睫，未尝有深知独力，隔绝天下之腠理而壅废祖宗之法度。故天下之心有厌乱而无喜乱，轻于发乱而亦易于收乱。乃今日则异是。主上神明独运，妖孽削平，自谓已安已治矣，而上自三辅，下自百粤，民心若摇摇然无所维系者。

有乱形而无乱征者，二正之季是也；无乱形而有乱征者，今日是也。乃今之忧乱者动则曰：主上不亲大臣，不信群臣。奏请不行，帑藏不发，即拊心碎首，计画无复之耳。愚以为不然。千金之子，驾巨舟而游于江湖，冲风破浪，樯倾楫摧，舟子长年为之号呼涕泣，虑无不立返者。今诿主上以操舟，而下不任舟子长年之责，有是理乎？愚以为今之民所以不治者，上不以实政课下，而下不以实心应上。大臣过于自疑，而小臣耑于自为。有职掌而无操柄，有体统而无精神。名为刻励，实则丛脞耳。上御极初，有以管商之术秉国成者。其人虽任智力，劫持天下，然一时尊主权，核吏治，循名实，省议论，画然可观。后之绍

述者，变操切而涂泽，反综核而模棱，使天下事不蕲废，亦不劝行。能者无所见长，不能者无所见末。积颓积废，以有今日。则救弊之方，亦大略可见矣。

惟是公卿辅弼之臣，尽洗其惜身顾名、畏首余尾之念，为天子振刷纪纲，图维命脉。令出惟行，毋以挂壁借口；名期责实，毋以涂饭贻讥。而后内之台省部寺，尽戢旷林之戈；外之监司守令，各去朴满之智。一德一心，以民生国计为事。则上心不难转移，而瓦解之势可无作也。不然，讳言振饬而猥以调养为事，譬之放舟于瞿塘，不回旋避险而捧土以实其漏，为之舟子长年者，不亦太短智乎？即欲如明问所称为主上引过者，又何涂之从也？

虽然，愚又有感于二正之事也。己巳之变，于、郭诸能臣戮力内外，北辕始归。当武庙南巡，天下岌岌矣。王守仁拥强兵，据上游，逆瑾憎伏莫敢动。今天下不幸不为二正之季耳，脱一旦有事，即有诸臣者出，谁能假以事权，宽以文法乎哉？愚之鼠忧过计，盖有不能释然者，执事亦笑其为虚言否也。

如今激愤地为国事做筹划的人，针对中央和地方库存钱粮不充足和边境地区异族部落伺机入侵的局势，费尽唇舌又连上奏章不低于几十万言，可皇帝陛下也只是把它们搁置在耳旁，一点儿也不表态。而您们这些主考官的明晰策问，偏偏拿国家安危的总趋势在于统摄住人心来出题目。这样一来，考生我曾经深深思索过治标与治本的对策，就再度涌生出感慨了。考生我观察我朝建立二百年以来，没有哪个时期能比英宗正统末年和武宗正德末年更不安宁然而国运却最后仍旧稳如泰山的了。在正统和正德末年，朝廷上有奸诈的权臣在制造祸端，地方上有强盛的少数部族和阴谋夺取帝位的藩王在制造祸端，整个天下眼看着就动乱起来了。可处于这两个末年阶段的英宗与武宗，也只因喜好斗狗跑马，游戏作乐，衣食舒适，歌舞不休，才在眼皮底下酿生出祸患来，但却未曾出现凭借自己智慧出众、独自就能处理一切事务而同天下的联系隔绝开来并废弃祖宗法度的事情。因此天下的人心只有厌恶动乱的倾向，却没有喜好动乱的倾

向;很容易就制造出动乱来,但朝廷也容易把动乱平息下去。但今天就与这种局势不同了。皇帝陛下独自运作神明,削平了危害国家的势力,自以为天下已经安宁、已经大治了,可往上到京师周围地区,往下到各个部族的聚居处所,民心就像摇来晃去而没有维系物啊!

存在着动乱的迹象但却没有动乱的征兆,这是正统、正德末年的情形啊!没有动乱的迹象却存在着动乱的征兆,这是当今的情形啊!可当今担心国家动乱的人却一上来就说:皇帝陛下不亲近大臣,不信任文武百官。奏请得不到批准或所需官银拒不拨付,就拍动心窝敲脑门,不再进行谋划了。考生我认为这样做很不对。富家子弟乘坐大船在江中或湖水上游玩,冲破风浪驶向前去,可桅杆却被刮断了,船桨也划折了,船工中掌舵的人为这种险情而痛哭流涕,想的只是能立刻返回到岸上去。如今把指挥船只的责任推在皇帝陛下的身上,可下面的人却不把船工中掌舵人的责任承担起来,天下有这种道理吗?考生我认为当今百姓得不到治理的原因,在于上面的人不拿实际的政务来督促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又不拿真诚的心意来回报上面的人。大臣对自己做得是否妥当,疑虑得太过份了;而一般的官员又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设有百官职掌可却没有操持住关键部位的人,立有准则规范可却没有内在的精神。说起来挺勤勉尽力,实际上是杂乱无章罢了。在皇上刚刚登上帝位的时候,有用管仲和商鞅那套法家理论来执掌朝政的人。这个人尽管一味施展智诈与强力,让天下都按他说的办,可是一时间尊崇君主的权力,验核官吏施治的情况,按照名位来责求实际,去掉各种争议,也明晰得令人可观。后来继掌朝政的人,把急于求成变成了涂抹粉饰和稀泥,把汇综验核变成了模棱两可,使天下的政事既不罢废,也不激励人们去办好。贤能的官员没有地方显示出他的才干来,庸劣的官员也没有地方暴露出他的低能来。衰颓和荒废积聚来又积聚去,以致形成了目前的状况。这样一来,补救弊端的方法也就大致上可以看出来了。

只有这些辅佐朝政的公卿大臣,全都去除掉爱惜身家性命、贪恋名声而畏首畏尾的意念,特为天子振扬并刷新朝廷的纪纲法度,只去想国家命脉怎样延长。诏令一下达,就只管去贯彻执行,不要拿北齐

的樊逊把它挂在墙壁上的举动来做借口;名位要做到和实绩相一致,不要因为白领国家俸禄而给人留下嘲笑的话柄。然后中央的各个机构与部门就全都放下了彼此争斗的武器,地方的省级官员和太守县令就各自收起了亮出朴实招牌混到任职期满的鬼点子。同心同德,把国计民生作为唯一的任务。这样一来,皇上的心念就不难转变过来,而土崩瓦解的形势也可以不出现了。否则的话,忌讳讲论振作整顿却凑合着把调停维持作为唯一的任务,这就如同把船只放进瞿塘峡,不左摆右摆避开那险礁并随时用土堵住被碰漏的地方,身为船工中掌舵的人,不也显得见识太短浅了吗?即便就像这道明晰策问中所说的要为皇上揽过一切过失来,又从哪条途径做起呢?

尽管是这样,考生我对正统、正德末年的事件又深有感触啊!己巳这一年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也先部俘虏,于谦和郭登等贤能的大臣在内部和外部同心协力,英宗才从北方也先部那里回到了京师。正当武宗去南方巡幸时,天下已经相当危险了。可王守仁掌握着强大的军队,占据在长江的上游,谋反的刘瑾畏惧收缩而不敢采取行动。现今的天下很不幸地不是正统、正德末年的情形了,万一要是突然间发生变故,即使有众位大臣被派出去,可谁又能够把处理事件的权力全部交给他而又不用细密的条文规定来责罚他呢?考生我的短浅忧念和过分的计虑,大致上还真有无法放下心来的地方,你们这些主考官是否也讥笑它全是一派虚妄不足信的话呢?

策 第二问

性不可以言也。言性者如以勺取水,以指得月,必破其所执而后可。无执则随言皆性,言性固性也。结而为习,动而为情,作用而为才,种种皆性也。有执则随言皆执,鸡鸣夜气非性也。舍习而才,舍才而情,舍情而言性,善亦非性也。请因是而发,言性之旨。

大抵圣贤之悟性,必彻于无而证性,必根于有性可悟不可言,言者为未悟者指迷也,非为已悟者标悟也。今之论性者,皆宗孔子性相近之言。夫性,浑然太极也。太极本于无极,阴阳未分,淑慝未判,何

相近之有？盖亦就天命之参于气质者，微指其端。虽不落感物而动者，而亦未及未生，而静以前相近，亦非性初也。

子思直指天命，似稍露本原，而归根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则亦借感物而动者，以指点不容言之机耳。至孟子而性学乃大著矣，发源孔氏，引绳百家，而断之曰性善，然不能直指性之何者为善也。曰情亦可为善云耳，曰才亦未始不善云耳。即言夜气，言鸡鸣，取证愈广，标旨极员，卒未尝执善而即为之性也。何也?性，太极也。太极浑无善恶，是为至善。动生阳，静生阴，则善恶之几伏焉。善与恶偶均，不可执为性，犹阳与阴偶均，不可执为太极也。然太极虽分阴阳，必以纯阳为根；性虽分善恶，必以至善为根。习相远而性必不相远，以此耳。

自孟子之宗旨不明，言性者执善为性而不究其所从来，于是义袭之学起矣。不知天下有见性之善，善即性也；有执性之善，执即非性也。忠，一也，比干为自靖自献，而令尹子文弗与。廉，一也，伯夷为求仁得仁，而陈仲子弗与。事功，一也，伊尹、周公格于皇天，而管仲弗与。岂非见性、不见性之别乎?为善而不归于见性，将一切揣合名行，摹仿圣贤，以似混真，以真藪伪，俗学起而本性隐矣。是故因善而悟性则可，执善而忘性则不可。悟此善于性而还归太极则可，歧此善于性而堕落阴阳五行则不可。程伯子有言：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言，可言者皆感物而动者也。通于此言者，孔子之相近，子思之未发，孟子之性善，与宋诸君子天命气质之辨，脉络合，蹊径融，无精粗，无分别。总之破其所执，而性可得而言矣。

夫执善非性，则善不足为乎?曰：非也。于有善中求善，于有恶中去恶，此缘阴阳五行以还太极者也。无善可为，而善始纯；无恶可去，而恶始尽。此即阴阳五行以还太极者也。倘其借口于无善无不善，谓圣狂、仁暴总在性中，以破善不善之堤防，而混性之物则，则小人之无忌惮而已。嗟乎!自姚江以无善无恶为心体，后之君子争以为射的。愚固墨守传注者，何敢影响其说，以射执事之策!盖有感于性学不明而为善者日趋于伪，且借言性恶者以攻端

也。倘自以为能知性乎，则又所谓认勺为水而认指为月者，其为执也，已甚矣。愚则何敢!

人的本性是没办法讲论清楚的。讲论人的本性的人就像用杯勺舀满水，用手指指明月亮在那里，一定要破除掉他那死死抱定的东西，然后才行得通了。没有死死抱定的东西，随便讲起什么，就都属于人的本性的表现，专门去讲人的本性，也确实真是人的本性啊!长期积累就构成那习染性的行为定势，各种举动一做出就构成那情志，运作施用就构成那才干，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的本性的表现啊!持有死死抱定的东西，随便讲起什么，都不免先入为主，连鸡叫就起身而虞舜去行善、盗跖却去求利以及人在夜间会从心里发出善念，就都不属于人的本性的表现了。舍弃习染性的行为定势来讲论才干，舍弃才干来讲论情志，舍弃情志来讲论人的本性，那连良善也不是人的本性了。请求根据这一点来做阐发，讲明人的本性的要旨。

通常的情况是，圣贤体悟人的本性，必定要在一片空明清净的状态下去证实人的本性，必定要建立在人有天赋本性能去体悟却无法讲清的基础之上。讲论它的人，也只是为那还没体悟出的人指点一下迷津，并不是为那已有体悟的人再标揭出体悟到的地方啊!现今讲论人的本性的人，全都宗奉孔老夫子人的本性从一生下来就很接近的说法。人的本性其实是混沌一片的宇宙本原的组成部分啊!宇宙本原从没有边际的最原始的状态分化出来，当时天地阴阳尚未划分出来，美好与邪恶尚未区辨开来，人的本性可有什么彼此很接近的呢?孔老夫子大致上也只是特就天所赋予给人的东西而与气质相混杂的地方，稍微指点一下那端倪。虽然还没摆脱出对事物有所感触就去做的通常看法，可也没谈到尚未降生时的情况，这表明人的本性在没有活动能力以前尽管彼此相接近，但也不是那天赋本性的原始形态啊!

子思把人的本性直接指明为天所赋予给人的东西，似乎稍略显露出本原所在了，但仍归根到喜怒哀乐尚未发作时的那种不偏不倚

的状态，这也是借助有所感触就去做的通常看法，去指点那根本没办法讲清它的玄妙之处罢了。到了孟子，关于人的本性的学说就非常鲜明了。他从孔老夫子那里取得来源，引述并框定住各种说法，得出结论，强调人的本性天生就是良善的。然而却不能径直指明人的本性究竟在哪些方面就属于良善的。既说情志也可以表现出良善，又说才干未曾也就不良善。就连讲论人在夜间会从心里发出善念，讲论鸡叫就起身而虞舜去行善，盗跖却去求利，选取证据越广泛，标揭主旨极为圆通，到最后也未曾执定住这良善而就构成了人的本性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属于宇宙本原的组成部分啊！宇宙本原混沌一片，没有良善与邪恶，这才是最良善了。皇天运行就生出阳来，大地宁静就生出阴来，于是良善与邪恶的苗头就隐伏在里面了。良善与邪恶对等并立，但不能就把这确定成是人的本性，这也就同皇天与大地对等并立而不能把它们确定成是宇宙本原一个样啊！然而宇宙的本原尽管分化成皇天与大地，但必定要把纯阳作为根本；人的本性尽管分化成良善与邪恶两个方面，但必定要把最良善作为根本。习染性的行为定势彼此的差别越来越大，可人的本性必定还不是相互越距越远，原因就出在这上面啊！

自从孟子的宗旨并不明确，讲论人性的人就抱定良善是人的本性而不去探究它的由来，于是袭用成说的学风就兴行起来了。根本不懂得天下存在着显现出本性的良善行为，而这些良善行为就是人的本性啊！同时也存在着抱定本性就那样的良善行为，可一抱定就那样，也就不是人的本性了。说起忠诚，都是同一种行为表现，可商朝的比干却出自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就主动向先王献上道义，但楚国的令尹子文就不赞同这种做法。说起高洁，也是同一种行为表现，可殷末周初的伯夷为追求仁德而获取到仁德，但陈仲子就不赞同这种做法。说起事业功绩，也是同一种行为表现，可商朝的伊尹和周朝的周公都是遍及到皇天，但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就不赞同这种做法。这难道还不是察见到人的本性和没有察见到人的本性的区别所在吗？做出良善的行为却不归结到察见出人的本性了，将会一切都琢磨要使名声和实际行为保持一致，摹仿古代圣贤的做法，把表

面类似的那一套混杂进真实中去，用真实的东西包藏起虚伪的玩艺，庸俗的学问也就兴行起来而人的天赋本性也就被掩盖住了。因而依据良善来体悟人的本性，这是完全可以的；光是抱定良善却忘记了人的本性，这是绝对不行的。从人的本性来体悟这些良善的行为，回归到宇宙本原去，这是完全可以的；把这些良善的行为从人的本性中分离出去，陷入阴阳和木火土金水这五行里面去，这是绝对不行的。北宋程颢说过这样的话：人在出生而不具备活动能力以前的情形，是根本没办法讲清的；能够讲论一番的，全是那有所感触就去做的东西啊！闹懂了这几句话的意思，孔子关于人性原本彼此相接近的说法，子思关于喜怒哀乐尚未发作的说法，孟子关于人的本性生下来就都良善的说法，以及宋朝各位君子关于天所赋予给人的东西同人的气质的区辨，也就脉络一致，途径融通，不存在什么精微与粗略，没有什么区分与差别。总之要破除掉自己所死死抱定的东西，这样人的本性才能够加以讲论了。

抱定良善却不属于人的本性，良善也就不值得去用力了吗？答案是：绝不是这样的。在人怀有良善的一面中去求取良善，在人怀有邪恶的一面中去消除邪恶，这是依从阴阳和木火土金水这五行而返回到宇宙本原状态的途径啊！没有什么良善的行为再要去做的了，良善这才达到纯粹的境地了；没有什么邪恶的玩艺还要再去消除的了，邪恶这才完全不存在了。这也就是依从阴阳和木火土金水这五行而返回到宇宙本原状态的功夫啊！如果有谁把人不具备什么良善也不具备什么不良善作为借口，认为圣明与狂简、仁德与凶暴一起混合在人的本性里面，用来毁掉良善与不良善的防范准则，而把人的本性同事物的标准搅合成一团，那结果就只能是小人肆无忌惮罢了。哎呀呀！自从王守仁先生把既不良善又无邪恶认定是人心的本体，后来的君子竞相把这作为猎取功名的目标。考生我却原本上属于坚定执守古代解说的人，哪敢套用他那说法来应合您们这些主考官的策问呢？大致上是对人的本性的学说不明晰而做出良善行为的人却一天比一天陷入虚伪之中深有感慨，并且借用人的本性从一生下来就都邪恶的这类人的看法来究明那端绪啊！如果有谁自以

为确能懂得人的本性，那他又是所谓将杯勺当成水又把手指当成月亮的人了，这类人死死抱定自己认为该抱定的东西，也就显得太顽固了。考生我哪敢这样做呢？

策　第三问

执事有味乎兴《诗》立《礼》之教，而下询于群瞽。其将求古之登高能赋可为大夫，与夫禹行舜趋有君子之容者乎？则非执事者之指也。虽然，言《诗》而及楚之屈子，言《礼》而推汉之董子，愚为之俯而深惟，而重有感于世道也。

夫《诗》之为教也，温柔而笃厚，其丽情婉，其抒意异。故古之忠臣孝子，有所苞塞而欲引喻，必发乎诗。《礼》之为教也，斋庄而中正，其范物方，其标矩严。故古之端人硕士，有所刻励而欲自闲，必本诸礼。《诗》与《礼》，异途而同辙者也。屈子者，得《诗》之真者也。当怀王之时，井渫不食，不知其主之不悟，而忧思彷徨，睠顾宗国。盖至于蛾眉谣诼，终不容于众女；党人猖披，愿下从夫彭咸。而屈子之拳拳者，不少变也。彼盖曰：吾纵志洁行芳，岂可以泥滓君父而自为高？吾宁悲忧饮泣，使世谓我为愚为诞而已。故宁君弃我、无我弃君者，屈子之《诗》教也。董子者，得《礼》之正者也。当孝武之世，方凿不入，不惜其道之终不庸，下帷著书，足不窥园。盖至于三仁之问，抗严词于伐国；两电之对，引事应于《春秋》。而董子之斤斤者，不少假也。彼盖曰：吾纵身隐道晦，岂可以弁髦名简而自为通？吾宁被服礼义，使世谓我为拙为迂而已。故宁世弃我、无我徇世者，董子之《礼》教也。

嗟夫！今之士大夫，则可慨矣。戈矛伏于胸臆，名利深于钓饵。其谋国也，瞋目裂眦，挟愤思逞，而无同舟共济之心。其自为谋也，望尘逐臭，盛饰自媒，而无怀褐善藏之意。试还而思：夫《诗》之为教，戒同官，念我友，岂无盛气不敢介于颜面者，何也？试还而思：夫《礼》之为教，三日而后见，三揖而即退，岂无羶念不敢错其寸趾者，何也？士君子之相与也，如兄弟之协，比埙

篾相和，而急难相呼应也。其自守也，如处子之未嫁而妇人之不离傅姆也。奈何叫嚣凌谇，朴遬无耻，有城府而无廉隅，有鳞甲而无绳墨，伤国脉而薄士气，以招号于天下为哉?则莫如敦《诗》说《礼》之教，可以潜消而明荡之。虽有醒喜醉怒者，进之以清庙明堂一倡三叹之音，则诎然而止。虽有冥趋倒植者，语之以和鸾节奏进规退矩之度，则肃然而恐。此《诗》与《礼》之为教也，取古人之糟粕而箴举世之膏肓，异途而同辙者也。

执事言《诗》而及屈子，言《礼》而及董子，岂以是乎哉?不然，将使愚举申公、毛苌之短长，辨王肃、大小戴之同异，悉举其谗闻，以复于执事。此扬子云所诮说铃书肆，而庄生以为已陈之刍狗，不可再荐者也。执事之唾而弃之，亦已久矣。

您们这些主考官对兴用《诗经》和确立《礼经》这方面的教化很有兴趣，往下询问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考生们。是想求取古代登上高处就能写出辞赋而可以任命为大夫以及模仿大禹和虞舜那类圣人的举止而具有君子行为规范的人吗?显然这并不是您们这些主考官的意图所在啊!尽管如此，策问中讲到《诗经》却连带到楚国的屈原，讲到《礼经》又推重西汉的董仲舒。考生我由此低下头来深深做思索，再度对当今的世道有所感慨呀!

《诗经》所形成的教化，既温和柔弱又真诚深厚，它寄寓感情就特委婉，它抒发思想就特动人。所以古代的忠臣孝子，遇到君主或父母不开窍，就想诱导喻示，必定要写成诗歌。《礼经》所形成的教化，端庄严肃又平和纯正，它限定起器物就有各种规格，它树立起人们的行为标尺就特严格。所以古代正直博学的人士，遇到该勤勉尽力的事情，就想自行做好防范，必定要按礼制去做。《诗经》与《礼经》所走的途径不一样但奉行的准则却是相同的呀!屈原属于获取到《诗经》真谛的人物。正当楚怀王在位时期，就像井水清澈却不喝那样得不到信用，但仍不认为自己的国君不会醒悟，而忧思彷徨，眷念并关注自己的祖国，差不多恶化到姣美的容颜受到造谣诋毁，终竟不被众女子容许存在；结党营私的家伙们猖狂攻

击，宁愿投江跟在古人彭咸的后面。可屈原的忠诚恳切，丝毫也不改变。他像是在说：我即使志向高洁又行为美好，怎么能够拿烂泥去玷污我的国君而自己却显出高尚来呢?我宁可悲伤忧郁，吞下泪水，使世上认我纯粹是傻瓜、纯粹是疯子也就完事了。因此宁可让国君抛弃我，我也决不背弃国君，这正是屈原的《诗经》教化啊!

董仲舒属于获取到《礼经》纯正义旨的人物。正当孝武帝执政的时期，君臣之间的看法格格不入，而不痛惜自己的主张最终也得不到采用，于是拉下帐帘专心著书，一步都不到花园里去。差不多演化到对江都易王刘非关于春秋越国也有三位仁人的询问，特在讨伐别国的问题上，运用严厉的话语加以反驳；而在辽东高祖庙和长陵高祖园的殿堂遭雷击而起火，特对朝廷所作的回答中，又从《春秋经》里引证皇天对人事做出的回应来做解释。董仲舒所丝毫不放过去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向对方做让步。他像是在说：我即使不再当官，学说不被人推崇，怎么能够凭借刚成年和姓名刚被列入百官簿就自己显出多通达来呢?我宁可归从礼制道义，让世上认为我纯粹是蠢笨人、是迂腐人也就完事了。因此宁可让世上抛弃我，我也决不随顺世俗，这正是董仲舒的《礼经》教化啊!

哎呀呀!如今的士大夫真是太令人感慨了。在内心里隐藏着攻击对方的武器，在名利上富有猎取的手段。他们谋划国政，你瞪我，我瞪你，挟带私愤，只求一逞，根本没有同舟共济的心思。他们替个人做打算，极尽卑恭去趋炎附势，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来自己推荐自己，根本没有身怀本领而善于敛藏的意念。试着掉转头来想一想：《诗经》构成它那教化，是身在同列的官员要互相告诫，顾念自己的友人，哪里就没有发发脾气而不敢在神情脸色上显露出来的人呢?可这又是为什么呢?再试着掉转头来想一想：《礼经》构成它那教化，三天过后再相见，行完三次拜见礼就退下，又哪里没有内心向往却不敢迈错一寸脚步的人呢?可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读书圈内的君子在一起共事，就像兄长和弟弟那样和协，又像埙和篪这两种乐器那样密切配合，遇有急难事而此呼彼应啊!他们自己要求自己，就像未出嫁的处女而身为女子就决不离开师长和保姆啊!

为什么偏偏去大肆叫嚣，凌辱怒骂，粗野而不感到羞耻，深有密谋暗算却没有道德修养，富有攻击和自卫的武器却没有行为的准则，损伤国家的命脉又使读书人的风气变得浅薄，在天下招摇过市呢？对此就最好是那种看重《诗经》又喜好《礼经》的教化，可以无形中消灭又公开扫除以上的现象。即使有清醒时狂喜而酒醉后暴怒的人，把在清静祖庙和施政明堂中演唱的令人一唱三叹的乐歌推到他的面前，他就会服服帖帖地停止自己那番举动了。即使有用手杖点地如同在夜间寻路行走的盲人，把天子车驾铃鸣声协调响动和前进后退的规则告诉给他，他就会严肃起来，感到惊惧。这正是《诗经》与《礼经》构成的教化啊！取用古人早已不用的东西来整治全社会根深蒂固的弊病，二者途径不一样但所奉行的准则却相同啊！

您们这些主考官在策问中讲到《诗经》却连带到屈原，讲到《礼经》又连带到董仲舒，恐怕就是出于这个原因吧？否则的话，便是想让考生我列举西汉经师申公与毛苌在解说《诗经》上的优劣短长，辨明三国时王肃和西汉礼学家戴德、戴圣叔侄二人的相同之处与不同之处，详尽列举出那听到的一点儿肤浅的东西，来向您们这些主考官做出对答。可这正是西汉扬雄所耻笑的琐屑言论和只知卖书的店铺，战国庄子认为是已经陈列的用草扎制的祭祀用狗，不能够再献上的玩艺啊！您们这些主考官鄙视并抛弃它们，也已经时间很长的了。

策　第四问

愚闻之：谥者，纪行之迹也。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谥之有法也，自周公昉也。晋唐以来，谥典綦重。如贾充、何曾、许敬宗者，皆借人主之威命，以乞灵一字，而卒不能杜驳议者之笔舌，盖劝惩系焉。我高祖皇帝，以风教鼓舞一世，尤慎惜谥典，至以爱子重之，为"荒"为"愍"，不少曲笔，而一时大臣，亦罕得赐谥。乃晚近则稍稍变矣，大抵爵位之崇卑，子孙之贵贱，与公论之轩轾互相低昂，谥者未必贤，贤者未必谥，人得以觊觎出入，而易名之典稍轻。日者皇上特俞礼臣请，

应补谥暨予谥者若干人。典刑不亡,九京可作,愚何能赞一辞哉!

虽然,礼失而求之野,愚亦尝谋于野矣。曰开国之功宜录也。李韩公之居守馈运,比功萧相;陶主敬之帷幄谋议,接迹留侯。其他武臣如耿炳文等,文臣如叶琛、孙炎等,皆戎马汗青,表仪一时。而犹未得谥,恐亦国初之缺典也。

曰革除之节宜录也。逊国诸臣,开衅丧师,捐躯死事,功罪往往参半。至大臣如铁铉,词臣如方孝孺,台省如景清、黄钺,守臣如姚善,皆有功无罪,不惜以九族百口,争顽民之名。文皇帝固有子宁若在之叹矣。当箕裘奕叶之后,而旌别赐谥,所以述文皇帝之隐志而杜后世之议端者,非浅鲜也。

曰抗节之贤当录也。二百年来,死事效忠之臣,后先接踵。如逆瑾之变,有三疏死杖下者,有坐草疏被逮、几死诏狱者,其事炳人耳目。至邹智、沈炼、杨慎之徒,犯难投荒,百折不悔。不可廉其遗忠而差等赐谥乎?

曰理学之贤当录也。廊庑之列祀首,无论已。他如吴聘君、罗明德诸君子,造诣卓绝者固不乏人,且有继绝学、回倒澜而位不登三事者,其可泯泯无闻乎?

凡此者,宜及时讨论扬 扢,广天子风厉之至意,而章一代华衮之盛事者也。然愚又以为,谥之未定,由史之不立也。我二祖列宗之德业,如日中天,而金匮之藏,寥寥未有闻也。《实录》所载,不过删削邸报,而国史又多上下其手、乞哀叩头之诬。故老多能道之,恐难以信后也。国史未立,而野史盛。汲之冢,齐东之野,至有以委巷不经之说诬高皇为嗜杀者。非裁正之,其流必不止。

愚以为亟宜网罗放失旧闻,考订得失,以国为经,以野史家乘为纬,州萃部居,条分缕析,而后使鸿笔之士润色其辞。国史既定衮钺,随之宜谥者谥,宜去者去,宜更定者更定,以史裁谥,以谥实史,庶无虚美隐恶之恨乎哉!是举也,创议易而卒业难,卒业易而尽善难。然而不可缓也,执事者其亟图之!生愿握管以从焉。

考生我听说:谥号是专来显示一个人生前所作所为的轨迹的。

所作所为很突出，就蒙受到美好的谥号；所作所为不突出，就蒙受到一般的谥号。赐给什么谥号具有规定，是从周公开始的。从晋朝唐朝以来，赐给谥号的制度极受重视。像西晋的贾充与何曾，唐朝的许敬宗，都是借助君主的强制命令，死后去求得一个美好的字眼做谥号，但最终也不能杜绝住反对赐给他们“武”、“孝”、“恭”这类谥号的官员们的抗争意见。这是因为关系到对人们的激励与惩戒啊！我朝高祖皇帝，通过风尚化导去鼓舞整个社会，更对赐给谥号的制度慎重对待，直至用心爱的儿子来表示重视它，赠给“荒”、“愍”这类恶谥，一点儿也不袒护。而当时的大臣，也很少能在死后得到赐给谥号的殊遇的。可到了晚近时期，就逐渐发生变化了。通常情况是，爵位高低与子孙贵贱，往往与众人做出的优劣评价彼此冲突，得到美谥的人不一定就贤良，贤良的人也不一定就得到美谥。人们由此得以心存非分的想法而由小到大或由坏变好，朝廷给定谥号的制度就逐渐被人看轻了。最近皇上特意批准礼部大臣的奏请，应该给若干人追赠谥号或赐予谥号。这样一来，供人学习的榜样不消失，已经死去的人物可以复活，考生我哪能再多说一个字呢？

尽管如此，礼制出现缺陷就到民间去求取弥补的办法，考生我也曾在民间对此做过考虑了。第一是说，创建国家的功臣应当在赐谥的名单以内啊！韩国公李善长在太祖皇帝亲征时负责留守南京并供应军需物资，功劳和西汉的丞相萧何一个样；陶安在营帐中出谋划策，和西汉留侯张良差不多。其余的武将如耿炳文等人，文臣如叶琛、孙炎等人，全都战功显赫，留在了史书上，在当时也起到了突出的表率作用。可他们仍旧没有获得到谥号，这恐怕也是我朝建立初期的制度上有漏洞啊！

第二是说永远被取消做官资格的极有节操的臣僚应当在赠谥的名单以内啊！在建文帝退位事件中的各位臣僚，挑起战争，丧失军队，献出身躯，为自己的职守而死去，往往功劳与罪过各占一半。至于朝中大臣如铁铉，文臣如方孝孺，都察院和尚书省官员如景清、黄钺，地方知府如姚善，全都立有功劳，没有罪过，不惜拿全家族上百口人的性命，去争得与成祖相对抗的顽劣百姓的专称。成祖文皇帝在当时

也原本上就有练子宁如果还在的感叹了。到了这些人的家族传了好多代以后，予以区别，赐给谥号，用来继承成祖文皇帝藏在内心的遗志并堵住后世再生议论的源头，决不是肤浅微小的事情啊！

第三是说坚持节义而同权奸对着干的贤臣应当在赠谥的名单以内啊！我朝建立二百年以来，为自己的职守而死去并献上忠诚的臣僚，前后一个接着一个。像谋反的刘瑾要发动政变，就有连上三道奏疏而被活活打死的人，又有因为起草奏疏而被逮捕并关到皇室监狱中几乎给折磨死的人。他们的事迹在世人的眼中闪亮发光。至于邹智、沈炼、杨慎这些人，触犯皇帝的威严也仍进谏，被发配到穷乡僻壤去，受到多种磨难依旧不感到悔恨。能不明察他们所留下的那份忠贞而区定级别赠给谥号吗？

第四是说理学领域的优秀人物应当在赐谥的名单以内啊！那些已经在孔庙中配祀的人就不用说了，其他像吴聘君、罗明德等众位君子那样造诣极深的学者，原本上就有很多，而且还有承接起古代断绝了的学问并且扭转颓靡学风可竟连一般大夫都没当上的人物。能让他们长期被隐没而不被世上所知晓吗？

像以上这四类人，都应当及时讨核论定，播扬表彰，扩展天子激励鼓舞的深切用意，显示一代褒奖的盛大政事啊！然而考生我又认为，谥号定不下来，是由于信史确立不起来啊！我朝太祖成祖和各位先帝的德业，如同太阳悬照在天空的正中，而皇室档案的收藏，数量很少，并没有特别著称的东西啊！《实录》所载述的内容，不过节录摘抄朝廷的报纸，而官修的我朝正史又大多存在着经过执笔者的歪曲窜改而臣僚们乞求哀怜和叩头认罪的不真实的记录。阅历丰富的老年长者大多能够叙述本来的情况，恐怕难以把真情实况传给后世啊！官修的我朝正史没能确立起来，而民间私撰的史书便大为盛行。像西晋说是汲郡人在魏襄王墓中盗得的古书之类的伪造品，像孟子所说的齐国从太阳一出来就去耕作的老农讲述的事情，竟然发展到有拿民间胡乱散布的说法来诬蔑太祖皇帝非常喜好杀人的内容。如果对这类内容不去裁定纠正，它们必定会继续扩散的。

考生我认为应当赶快去搜集失传散乱的前代史事，考订每个人

的功过得失,把官修正史作为统领的东西,把民间私撰的史书和记述家族业绩的图籍作为辅助的材料,按地区汇集到一起,按类别做出排列,区分并辨析得非常明晰又有条理,然后责成写作水平特别高的人进行文字加工。官修的我朝正史既然确定下褒奖和贬抑的基调,随后对应当赐给谥号的人就赐给谥号,对应当取消谥号的人就取消谥号,对应当重新定立谥号的人就重新定立谥号。凭仗官修正史来裁定谥号,通过谥号来使官修正史显出内容真实来,这样就差不多没有胡乱吹捧或掩盖恶迹的遗憾了吧?这一做法,首先提出方案来很容易,但最后完成它却很困难;最后完成它很容易,但做得非常恰如其分却很困难。然而却不能放到后面去考虑啊!希望您们这些主考官赶快筹划它。考生我愿意执笔跟在后面干。

策　第五问

自皇上静摄以来,朝著困于空署,台省穷于 俌牍。卿贰之乞骸者以听,不听为羁;草野之待环者以行,不行为饵。议者纷呶,谓皇上深宫重袭,运其独智,有轻天下士之心。而贤士大夫亦有愿为冥鸿,不愿为笼鸟,思旦夕飚去者。上与下有否隔不通之势,十年于此矣。而一旦欲挽回天听,耸动其尊贤敬士之心,岂不难哉!

愚窃思皇上之慢士久矣,骤而望以虚怀折节,为社稷爱士,即伏辕如车右,碎首如禽息,且以为狂瞽无当,益坚其外距耳。夫为皇上计,则当思所以积贤;为士大夫计,则当思所以自积。所谓自积者,何也?士之积威望以动主者,士气也。皇上以一官羁绁天下士,去不成去,留不成留,置之如积薪,而玩之如股掌。士又不自振拔,口称挂冠,身难脱屣,如小儿之嗜饴,啼哭不自胜,则人得而侮弄之矣。此士之积轻一也。

士之积悃诚以悟主者,士论也。上恶立名,而下喜于借名;上恶树党,而下恶不立党。口腹之间,有蜜有剑;笔舌之上,一矛一盾。即有披鳞请剑之士,主上亦以规瑱置之矣。此士之积轻二也。

士之积清白以格主者,士节也。一捷径而争为营,一利孔而互为

市。不救积泽之火，而能取丽水之金；不辨一车之豕，而能制两敝之虎。愈巧愈阴，愈亢愈靡。此士之积轻三也。

士既以上之轻士者自轻，而上并以士之自轻者轻自重之士。士之自视也，以为股肱手足，而上之视士也，无以异于赘养妇寺。士安得不积轻，而主上安得不积重哉？

吾愿今之士大夫，反是三者而图所以积重。决去就而尊国体，息竞争以定国是，淡营求以养国干，则主上轻士之心，可徐反也。夫燔柴可以祀天，其精通也；积灰可以止水，其力厚也。以皇上之神圣，岂难于天回牖启？而以士之不自重者，成主上轻士之名。为臣子者，其忍自菲薄乎哉？不然，士业已不自轻，而上终不重士，有接履而去耳。不受骄君之饵，亦安往不得贫贱？此亦士之尝也，然而非君子所忍言也。

愚所愿于今日者，士无漫受上之轻，上亦无遂听士之自重，而天下事乃可为矣。至愚所以为皇上献，则有虎会之对赵简子，与麦丘邑人之祝齐桓公者在。主上亦既厌听之，故敢以自积之一言，发执事者之微旨焉。

自从皇上不临朝听政以来，朝廷的辅政大臣被签发命令没有实际效力所困扰，都察院和尚书省的官员没办法献呈辅助政事的奏章。七卿及其副职要求告老还乡的人就一律都批准，不批准被看成是硬留人家。民间等待被授职的人只管快离去，不离去被看成是用官位在笼络人家。议论政务的人由此而吵吵嚷嚷，认为皇上在层层深宫中运作他个人的智慧，产生了看不起天下读书人的心思。而贤能的朝士和官员也有人乐意成为飞越大海的鸿雁，不乐意成为笼中鸟，考虑迅速随风飞走。上面与下面形成了闭塞阻隔的态势，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但一下子就想把皇上的注意力引回来，打动他那尊崇贤才、敬重读书人的心念，恐怕很困难吧？

考生我私下想来，皇上慢待读书人已经时间很长了。猛可地就用虚心放下架子和为了国家爱惜读书人来期待他，即使就像当年位于车厢右部的武士因使齐王受惊而伏在车辕上自杀效忠，就像禽息

为使秦穆公重用自己所推荐的百里奚而碎裂头颅，也会被皇上认为是疯子或瞎子而不切实际，反而越发使皇上对外人的疏远变得坚定罢了。替皇上做考虑，就应当思求聚积起贤才建议的方法；替士大夫做考虑，就应当思求聚积起自身美好言行的具体表现。所谓聚积起自身的美好言行，究竟是指什么说的呢？读书人聚积起威望来打动君主的东西，是那读书人的风气啊！皇上利用某一官位来羁绊并锁住天下的读书人，让你想离去也离去不了，想留下也留不下来，摆布读书人就像堆起柴草，耍弄读书人就像在大腿上和手掌上耍弄物品一样。可读书人又不自己从世俗中超脱出来，嘴里喊着要把官帽挂在庭堂上离职，可身上却难脱下朝靴，就像小孩子特别爱吃蜜糖，得不到就哭叫个没完没了。这样一来，别人就能够欺辱并耍弄他们了。这是读书人日益使自己显得很轻贱的第一个方面的表现了。

读书人聚积起忠诚来感悟君主的东西，是那读书人的言论啊！皇上厌恶有谁通过谏诤树立起本人的名声，可下面的人却偏偏喜好借助劝皇上来赢得名声。皇上痛恨有谁结成党派，可下面的人却偏偏痛恨不结成党派。口头上和内心之间，既有甜言蜜语，又有暗害的利剑。在写奏章和论争上，一方面是攻击别人的戈矛，另一方面又是保护自身的盾牌。即使真有触击天子的威严而请求赐死的国士，天子也把他那规谏当成塞住耳朵的东西来对待罢了。这是读书人日益使自己显得很轻贱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了。

读书人聚积起清正纯洁来纠正君主的东西，是那读书人的节操啊！有一种能够快升官的门径，就争着去钻营；有一个能获得财利的空子，就彼此做交易。不去扑救那燃遍整个湖泽的大火而能抢救出浮在水面上的贵重物品来，不去察辨一车的公猪能够制服两只已经咬斗得精疲力尽的老虎。越奸巧就越显得阴险，越高亢就越显得颓靡。这是读书人日益使自己显得很轻贱的第三个方面的表现了。

读书人既然用皇上看不起读书人的那些表现来使自己显得很轻贱，而皇上同时又用读书人使自己显得很轻贱的东西看不起那些懂得自我尊重的读书人。读书人自己看待自己，认为是天子的得力助手，可皇上看待读书人，就和打杂的奴仆以及妇女和宦官没有什么两

样。由此读书人怎么能够不越来越显得轻贱呢?天子又怎么能够不越来越显得威严呢?

我希望当今的士大夫,彻底改变以上三个方面的表现,谋求使自身显得威严的做法。决定离职还是供职,用来尊崇国家的体统;停止互相争斗,用来确定下国家的大政方针;看轻名位财利的猎取,用来养护国家的命脉。这样一来,天子看不起读书人的心思,就可以慢慢地扭转过来啊!焚烧柴草可以祭祀皇天,是因为那精诚会感通啊!堆起芦灰可以堵住流水,是因为那力量厚重啊!凭借皇上的神异圣明,哪里就很难做到回转心意耳开窍呢?但通过读书人中不自我尊重的人,造成天子看不起读书人的坏名声。身为人家臣子的人,有谁还甘愿自己就看轻自己呢?否则的话,读书人的学问修养已经不是使自己显得很轻贱了,可皇上终竟还是不看重读书人,那就只有脚跟脚地离职而去罢了。不接受骄横君主的官位引诱,又到了哪里而不清贫卑贱呢?这也属于读书人曾经采取过的举动了,然而毕竟不是君子所忍心来这样讲的事情啊!

考生我对当今所抱的希望是:读书人不要随便就接受皇上的轻视态度,皇上也不要只管让读书人自我尊重去,天下的事体这才可以做出妥善的处理了。至于考生我特向皇上做献呈,原因是当年晋国虎会回答赵简子责问他为什么不帮助推车的那一连串话语,以及麦丘邑一老者对齐桓公的三种祝愿辞,至今都还明摆在那里。天子既然已经厌烦再听这类劝谏了,所以就敢拿聚积起自己的美好言行这句话,来阐发您们这些主考官的策问的隐微义旨了。〔杨寄林译〕

殿试对策

臣对:臣闻帝王之治天下也,必有画一天下之大法,而后上下之纪纲肃;必有贯彻天下之真心,而后上下之命脉通。何谓大法?名实相稽,威德相御,下不得有烦嚣之国是,而上不至有壅遏之国成。此宇内之大同也,不可以假借者也。何谓真心?堂阶一德,官府一体,上不以积疑为揽权,而下不以积威为奉职。此君心之真同也,不可以假

裘者也。有法以运用其心，则人主之心源，晓然分布于宇宙。言之上宣也，如吾喉舌；令之下流也，如吾臂指，而天下帖服于风行草偃之化。有心以宰制其法，则天下之治理，井然受象于君心。言之有是非也，君心不受其两岐；令之有通塞也，君心不开其旁窦，而人主坐制其绳联丝制之机。

古之帝王，不综核而言路自清，不振励而庙谟自定。以君心之真同，成宇内之大同。君之惠泽流，而臣之悃诚达。浓仁厚化，蔚为太和，其道端不外此。藉令法不求其大同，则言有异指，令有异门，人主置天下于有同有异之城，而天下不得同。藉令心不求其真同，则君与相异心，君相与天下异向，人主先置其心于互同互异之域，而天下且不得不异。是故天下之治者，天下同也；天下之所以治者，君心同而天下无弗同也。

钦惟我皇帝陛下，负不世出之资，天德独纯于乾健；具大有为之略，景运方抚于日中。应门深拱而天灾谴告，小心时凛于握冰；玉几遥临而朝事纷纭，独断常洞于观火。悯直北之大祲，则仁先四民，不惜留税以赈畿辅；怒滇南之失律，则威行万里，行将传首以慰昆明。春秋鼎盛，氛孽削平，千载一治也；老成在位，宵小屏迹，又千载一时也。猗与盛哉！以此登三咸五，流唐漂虞，可计日待矣。乃犹不自满假，进臣等而策之于廷。上嘉唐虞三代之盛，言底绩，令从风，而以晚近之混淆废阁者，穆然引咎责躬，愿与二三元老，共襄同德一心之治。臣草茅贱士，新从远方来，望日就云，梦寐不敢忘，其敢无说而处于此？

臣窃惟天下有大防二：议论与诏令是也。议论之播腾也在下，而所以司其气机、决其关窍者，则属之于上。故有形在下而下不得衡操者，议论也。诏令之传宣也在上，而所以导其血脉、应其条理者，则属之于下。故有权在上而上不得臆逞者，诏令也。议论之先，有神焉以主之，忽而澄清，忽而横溃，其故不可以口耳揣也。故古之畏言者，必取喻于防川。川之决也，乘于一隙而奔于莫御，则主议论者重。诏令之表，有几焉以制之，不胫而驰，无端而遏，其故不可以耳目求也。故古之重令者，必取象于涣汗。汗之涣也，出之则顺而反之则逆，则制

诏令者重。诏令无关于议论也，而议论之一起一伏，有因诏令而息，亦有因诏令而滋者。诏令为端，而议论为之委也。议论无关于诏令也，而诏令之一纯一驳，有得而为议论坊，亦有失而为议论丛者。议论为矢。而诏令为之的也。斯二者省则俱省，烦则俱烦，行则俱行，格则俱格。在上在下，皆若有使之然者，而莫知其所以然，盖自古以来固然矣。以唐虞极治之会，七政齐，庶尹谐，六府修，三事治。当此之时，言不听于无稽，治必期乎从欲，何惑乎群言，何忧乎梗令哉？而谗说殄行，至震惊于朕师；苗民逆命，犹待化于干羽。盖议论之难清，而诏令之易格如此！又况汉唐以来，类多杂伯杂夷之治，虽综核可以息群言，削牍可以惊万里，亦恶足以为今日献哉？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崛起田间，廓清宇宙。其于政务之几微，民情之委悉，与夫人材国运之盛衰隆污，莫不蚤见而灼计之。朝廷之上，有职掌，无议论；有议论，无是非。每一诏下，薄海内外为之心战而股栗。盖郏鄏之鼎，卜年者既二百余，而高皇帝神武式凭犹一日也。肆我皇上，又以笃生之圣，嗣服承休。主势尊，国势强，东征西讨，威灵赫然，八袭九重，神明旁烛。固宜垂裳端拱之化，远继唐虞，近符高庙矣。而人心浮薄，国论纷呶，议论未必屏息，诏令未必奉行，诚有如圣制所虑者。

臣尝观今日之议论矣：怀顾忌，则事事类于寒蝉；瞰机关，则人人托于鸣凤。彼蜀我洛，朝繇暮跖，皂囊白简，尽如捉风，何议论之为也？臣尝观今日之诏令矣：宫禁未必行之于部院，部院未必行之于郡邑，温纶让德于夏雨，严旨逊威于秋霜，连章累诏，尽如挂壁，何诏令之为也？臣以为以寡言省议论，议论之似省而实烦者，此也。如欲省之，莫若先使议论之明。彼所攻击者为事也，必剖白其事之根株；彼所党伐者为人也，必严核其人之俦党。彼为引绳批根之言，以劫众而行其私，吾以公论裁之。彼为函端匿迹之言，以疑上而倾其敌，吾以明断决之。有疏必答，有复必行，下有部院大臣之职掌，而上有圣明之批发，何嫌何怨？何仇何党？议论之途明，而议论之曹破矣！臣以为以空言行诏命，诏命之似行而实格者，此也。如欲行之，莫若先使诏命之信。守令之贪残，当先厉苞苴之禁，而贪风可惩；封疆之破坏，当

先正失事之诛,而边臣可警。逢掖之嚣陵无已也,台省之寻戈旷林者,无乃导其先路;文章之怪诞日甚也,章奏之射覆窭数者,无乃树之前茅。严为章程,勤为批发,令前必无不明不昧之言,而令后必无可贷可轻之罚,何盖何藏?何趋何避?诏令之源约,而诏令之流顺矣!

臣窃以为,清言路,正国体,莫先于此,而又非其本也。圣制不云乎?君臣同心,治化乃成。求治之本,一言蔽之矣!臣姑无远引先朝盛事,如左刘右戴从容夜分,为千秋美谭者,即皇上御极,初亦尝以优崇召对,倚毗重臣,而其人亦能以强力把持天下。盖《六事疏》中所称省议论、重诏令者,一时纲举目张,班班可考,则君臣同心之效,可见如此矣。自兹以后,诸庸辅之绍述者,但用其余威绪谋,搏击言路,牢笼私人,而未闻稍为社稷计。诸臣之伎俩才品,与夫倾危萎靡之状,皆积为皇上所窥,于是视群臣太轻,视天下事太易,用舍举错,务为一切不可测以胜之,而天下事几不可为。臣以为,宜亟自今日返之矣。

平台暖阁,昼日延见,无徒以中旨慰留也;训储卜相,旦夕举行,无徒以留中羁系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以庆赏刑威归之主上,而臣作股肱耳目,汝翼汝为,汝听汝明,上又以其股肱耳目共之于臣下。君心下济而臣心上行,议论自省,诏令自行,岂事更张治具乎哉?臣尝伏读《大诰》,首《君臣同游》曰:历代君臣,同德一心,立纲陈纪,昭示天下,为民造福。大哉王言!真所谓以君心之真同,成天下之大同,蓁隆盛治,度越千古,而我皇上所宜羹墙祖述者乎!

抑臣又有献焉。臣尝诵唐陆贽之言曰:人主智出万物,有轻待人臣之心;思周万机,有独驭区宇之意。谋吞众略,有过慎之防;明炤群情,有先事之察。此数言者,英主哲辟多受其病,而皇上固万无是也。然以臣愚管窥,今之纲纪未肃,命脉未通,天下未尽大同者,则以皇上聪明神断,无时不用,而未必尽用之任人行政、吃紧当用之处耳。贽之言傥,亦非无当乎?《书》称尧德,则曰稽于众,舍己从人;数舜之功,则曰明四目,达四聪;序禹、汤之所由兴,则曰禹拜昌言,用人惟己。故能无我者始能同人,而独智自贤之主,虽欲同德一心,其道无繇也。伏惟我皇上,虚心以谘访耆硕,大心以茹纳臣工,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不用威而人畏之如雷霆。天地交而岁功成,上下交而理道立,此可还

至而立有效者也。不然，今天下亦多故矣。所恃者惟上下同心，庶可无栋挠轴折之祸。而皇上又以独智绝之，患岂止于议论烦、诏令格而已哉？臣不识忌讳，干冒宸威，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有整齐划一天下的根本原则，然后上下级关系的制度方能整肃；必定有贯通天下的诚意，然后上下级之间的命脉方能畅通。什么叫做根本原则？就是使政务的名与实交相验证，威权与恩德交相运用，下级不能够有吵闹干扰国家大计的情况，而上级不至于出现被梗塞的国家权柄，这是对天下的全面划一，是不能让给任何人的。什么叫做诚意？就是上下级同心同德，朝廷与各个机构合为一体，上级不以多年形成的猜疑作为执政的依据，下级不以强大的威势作为供职的筹码，这是君主思想对天下的真正划一，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有了这种根本原则去运用诚意，君主的内心本源就会明晰地分布到天下。臣民意见的上达，起着君主喉舌的作用；诏令的通畅，起着君主手臂指挥五指的作用，从而使天下帖服于令行禁止的治理教化。有了诚意去主宰控制那根本原则，天下治理就井然有序地随顺君主的思想。臣民的议论或是或非，但是君主的心念不会受其左右；诏令或畅通或受阻，但是君主的心念不另外转向别处，从而使君主轻易地控制着治理天下的契机。

古代帝王毋需考核就可以使臣民进言的渠道自然畅通，毋需奋勉就可以对国家大计自然确定，这是出自君主思想对臣民的真正划一，形成对天下的全面划一。君主的恩泽广施，臣子们也就竭诚尽忠；浓厚的仁爱与深厚的教化，蔚然形成太平盛世。古代帝王的治理方法不外乎这一点。假使根本原则不谋求对天下的全面划一，那么臣民的言论就会背道而驰，诏令就会受阻而政出多门。君主如果把天下置于言论与诏令既统一又背离的境地，那么天下就不能全面划一；假使思想不谋求真正统一，那么君主与辅臣就会异心，君臣与天下百姓就会异向。君主如果先把自己的思想置于既一致又矛盾的境地，那么天下臣民将不得不背道而驰。所以天下大治，就是天下划一；天下之所以大治，就是由于君主思想一贯而使天下臣民思想无不统一的缘故。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身负罕见的天资,品德唯独对天上的刚健特别纯正;具备大有作为的韬略,好时运正高悬在中天。在宫门之内深居静摄而天灾示警之际,小心地处理政务往往谨慎如手握冰块;在玉桌旁边遥控天下而朝廷事务纷纭之时,独自裁断总是洞若观火。去年怜悯北直隶遭受的蝗灾,仁爱先施予给士农工商,不惜拿出税银赈济京畿饥民;前年恼恨云南巡抚陈用宾、总兵沐叡在抵抗安南武德成进犯时失败,于是威权施布万里之外,眼看要把陈、沐两人的首级驰传示众,以告慰昆明。凭借年富力强,使寇乱削平,不愧为千载一治;让老成人执政,使小人绝迹,又不愧为君臣千载一时。多么兴盛啊!所以功德超越三王而等同五帝,盖过唐尧虞舜,将是指日可待的。但是仍不自满,把臣下等人宣召到殿廷进行策试。回顾赞美唐尧虞舜、夏商周三代盛世,言论统一,政令风行,而又鉴于当前思想混乱、诏令受阻的弊病,恭敬地引咎自责,希望与元老们一起助成同心同德之治。臣下我不过是一个荒野贱士,刚从远方来,望日就云似地仰慕皇上,梦寐不敢忘记,岂敢无所建言而枉处殿上?

臣下我私下思考,天下有两个需要着重防范的方面:就是议论与诏令。议论传扬播布在臣民中间,而左右臣民思想的契机则操在君主手中。因此流行于臣民中间而臣民不能左右的是议论;诏令的发布是君主的权力,而传达的渠道,对诏令的贯彻执行则是臣民的事,因此权力在于君主而君主不能任意使用的是诏令。议论出现时,似乎有个神明在主宰着,忽而被澄清,忽而又泛滥,其原委不可以仅用简单的办法去揣摩,所以古代忧虑臣民议政的人,必定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为比喻。川流决堤,起初不过是从缝隙中出来,但是随后便奔腾而不可遏止,所以掌握臣民议政是非常重要的事。诏令的传达,似乎有个微妙的东西在控制着,有时不胫而走,有时无故而止,其原委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去揣摩,所以古代重视诏令通行的人,必定主张政令发布就像流汗一样,汗液流出身体之外是正常的,而汗液流回身体之内则是不可能的,。所以拟定诏令是很重要的事。如果诏令与议论没有关系,议论时起时伏,有时因诏令而平息,有时也因诏令而蔓延。这样诏令就成为议论的起源,而议论成为诏令的结果;如果议论与诏令

没有关系，诏令或纯粹或驳杂，真正确就可以防止议论，有失误就将使议论繁杂化。这样，议论就是箭，诏令就是它的箭靶。此二者，简化则都将简化，复杂则都将复杂，畅行则都将畅行，受阻则都将受阻。对于君主或臣民来说，都好像有促成这种局面的东西在里面，可是却不知道促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自古以来，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凭借尧舜太平盛世的时运，当时祭祀、朝觐、会同、宾客、军旅、田役、丧葬等七件重大政事都治理得很好，众臣和谐，水、火、金、木、土、谷物这"六府"都充分发挥其效用，端正自身德行、物尽其用、使人民生计充裕这三件要事都做得很好。在这时，不听无稽之谈，必求治理随顺纯正的心意，哪里会被众议所迷惑，哪里需要为诏令受阻而忧虑呢？可当时也有谗说暴行，到了震动众百姓的地步；三苗违抗命令，尚待文德去教化。这表明议论难以消除，诏令容易被阻碍，竟是如此严重！更何况汉唐以来，多半夹杂着霸道与落后部族的统治术，即使用全面考核的办法可以平息众议，精心修订的文章可以震惊万里，但是哪能足以作为今日的进献意见呢？

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崛起于田间，廓清天下。他对于政务的隐微之处，民情的由来与详尽之处，以及人材、国运的兴盛衰落，没有一样不预见到又灼然谋划。朝廷之上，只有履行职责，没有争论；即使有争论，也没有辨别不明的是非。每当一道诏令颁下时，四海内外都对它感到非常畏惧。这是因为西周成王定鼎于东都洛阳之时，占卜得知可以保有数百年的太平，而我太祖高皇帝依靠英明威武创建的基业，万古如同一日。到了我皇上，又凭借为民谋福的圣明，继承皇位，承接大业，皇帝势尊，国势强大，东征西讨，威灵显赫；八重宫门与九层璇台之间，神明普照，这些本来就属于施行无为而治，远继尧舜，近合太祖的。然而人心浮薄，议政纷哗，议论未必屏息，诏令未必奉行，确实存在着皇上在策问中感到忧虑的情况。

臣下我曾经观察现在的议论：由于都心怀顾忌所以凡事都噤若寒蝉，由于都在探察升官窍门所以每人都把自己看成是鸣叫的凤凰。纷纷结成像北宋苏轼，程颐为代表的"蜀党"、"洛党"那样的派别，有时早晨刚刚赞扬某人像舜时法官皋陶，而傍晚又指责此人像古代盗

跖,那些秘密的奏章或公开的弹劾,都像在捕风捉影,这还要议论做什么呢?臣下我曾经观察现在诏令的状况:由宫内发出未必畅行于六部与都察院,由六部与都察院未必畅行于府州县。措词温和的诏令,恩德比不上夏天的雨水,严厉的圣旨,威力逊色于秋天的霜露。一道道的诏令,都像挂在墙壁似地被搁置,这还要诏令做什么呢?臣下我以为,用不让臣民多发言的办法来减少议论,结果议论表面看来似乎是减少了而实际上更趋复杂,缘故就在于此。如果真想减少议论,不如先使议论公开化。那一方所攻击的是具体的事,必须闹清楚其事的背景;那一方联手攻击的对象是具体的人,必须严格核实这些人的同党。那些发表影射言论的人,企图胁迫众人而得行其私,我们就要以公论裁断;那些表示暗示言论的人,目的在于使皇上生疑从而压倒政敌,我们就要以明断来裁决。凡有奏章必须给予批复,有批复的文件就必须执行,下有六部与都察院大臣的职责,上有皇上圣明的批复,臣民们还有什么理由互嫌互怨的?还有什么理由互相仇视互相结党的?臣民议政的途径明确,那些热衷党争的团伙就不攻自破了。臣下我认为,颁行泛泛而谈的诏令,诏令表面畅通而实际受阻,缘故也在于此。如果真想使诏令畅行,不如先使诏令具有信用。对于地方官吏的贪婪残暴,应当首先严厉禁止贿赂行为,那么贪污受贿的风气才可以遏止;对于边疆国土的丧失,应当首先依法惩治失职之罪,那么边疆臣僚才会警觉。对于儒生嚣张气盛没有止境,中央机构的暗中扯皮不办事,办法无非是先加以引导。对于文章离经叛道日益严重,奏章不严肃、漏洞很多的现象,办法无非是先树立样板。制度应当严格,皇上的批示应当勤快,诏令的起草必须没有含糊不清的措辞,而诏令颁布以后必须没有可以宽恕、可以从轻的处罚,如此则臣民们还有什么需要掩盖隐藏的呢?还有什么需要趋避的呢?诏令的源头把住了,那么诏令的执行渠道也就畅通了。

臣下我私下认为,疏通进言之路,端正国体,没有什么事比这两件更占首位的了,但这两件事还不是治理教化的根本。皇上在这次的策问中不是也说君臣同心,治理教化就能成功吗?这句话真把寻求治理教化的根本,全都包括进来了!臣下我姑且不远引前朝的盛世,诸

如孝宗弘治皇帝经常与大臣刘大夏、戴珊从容谈到深夜这种千古美谈来做说明，就拿皇上登位之初来说，不也曾经以优容崇敬的态度召请大臣对答，倚靠并亲近重臣张居正，而张居正本人也能够以强力控制天下吗？在《六事疏》中所称减少议论，尊重诏令，一时间纲举目张，明显可考。君臣同心的效果，就像这样可以看出来了！从此以后，各位平庸的辅臣在继承我朝大业上，只用张氏的余威和传续的谋略，打击进言者，笼络自己人，而从未听说他们稍为社稷考虑过 。诸臣的手段、才学、品德，以及国家危机、世风萎靡的状况，都不断地被皇上发现，于是把群臣看得太轻，把天下的事情看得太容易，任用谁都只管临时决定，让人不可测见，一定要超过他们，致使天下事务几乎都办不妥当。臣下我以为，应该马上从现在起把这种状况纠正过来。

皇上应该在平台或暖阁中经常召见众臣，不可光用颁发圣旨的形式表示慰留；应该把定立太子和选拔阁臣的大事尽快举行，不可光用奏章留在宫中不交办而拖延不决。只有君主才有权对人进行赏赐，只有君主才有权对人施加刑罚。臣子们应该把奖赏施刑的权力归于君主，像《尚书·皋陶谟》所讲的那样，做君主的股肱耳目，你要辅佐，你要具体做事，你要负责辨明等级，你要注意听取意见。君主信任臣子而臣子顺从君主，议论自然会减少，诏令自然会畅行，哪里还需要再改变治理的措施呢？臣下我曾经恭读太祖的《大诰》，首篇《君臣同游》说：历代君臣同心同德，建立法度，昭示天下，为民造福。这是何等英明的王者之言！真所谓以君主诚恳的意愿实现天下的全面划一，极其兴盛的治理景象超越千古，而这又是我皇上应该追慕继承的啊！

此外臣下我又有所献言：臣下我曾经读过唐朝陆贽的话：君主在各方面都很聪明，就可能有轻待人臣之心；对众多事务都思考周全，就可能有独掌天下之意。谋略超过众臣，就对众臣可能有过份谨慎的防备；明察群情，就可能有事先的觉察。这几句话，历代英明的君主多半有此弊病，然而我皇上本来就绝对没有这种情况。不过根据臣下我愚蠢的管见，现在的法度没有得到整肃，诏令运行渠道未能通畅，天下还没有全面划一，原因在于我皇上虽然聪明神断无时不用，但是未必全部用在任人行政和吃紧该用的地方。陆贽的言论很正直，或许也

并非不正确吧?《尚书·大禹谟》称颂唐尧的美德,就说他能够向众人搜集意见,抛弃自己的错误看法,而采纳别人的正确见解。《尚书·舜典》列举虞舜的功劳,就说他大开明堂四门,广览兼听。《尚书·大禹谟》与《尚书·仲虺之诰》记叙禹、汤成为君主的原因,就说大禹能恭敬地采纳美言,用人就像任用自己一样放心。所以凡是能把我排除在外的人,才能使别人跟自己同一条心,而唯我独智独贤的君主,即使希望臣民跟自己同德同心,也是无路可通的。臣下我恭谨地希望我皇上虚怀若谷,咨询耆旧硕儒,拓宽胸襟,容纳众臣的建议;无须显示圣明而人仰望却犹如日月,无须使用威权而人们畏惧却犹如雷霆。天地之气沟通而万物生成,皇上与臣民沟通而天下大治,这是可以恢复并立即见效的东西。否则,现在天下也就会有许多麻烦了。我们所依靠的只是上下同心,这样才差不多能免除国家衰亡的祸患,然而现在皇上又以个人的智慧断绝君臣同心,那么祸患哪里只是停留在议论纷繁、诏令受阻就算完事了呢?臣下我不懂得该如何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尊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

〔侯真平译〕

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壬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殿试策问

[天启二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所为搏挽乾坤、匡扶世运者，靡不于文武二秉为兢兢。《书》赞帝尧乃武乃文，盖全德兼焉；而舜曰文明，禹曰文命，汤曰圣武，周之文谟武烈，各标其一。之数圣人，岂于持世导民，有偏指邪?毋其于中，有交相为用者欤?夫阴阳柔刚仁义，自有天地而来，至今不可废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首辟函夏，成祖文皇帝载奠邦家，并提一剑驭军而文治光昭于云汉，揭《六经》训俗而灵爽震叠于雷霆。文由武张，武因文靖。於都哉!洵追踪帝尧而与虞夏殷周媲烈矣。奕叶相承，绍天阐绎，虽疆隅小警不无震惊，然金瓯卒以不摇，万世永赖，则列圣之威灵实式宁之，芳躅具在，亦可得扬厉其概欤?

朕以冲龄，嗣大历服，托于天下臣民之上，日夜思所为觐扬光烈，惟是讲学勤政、亲贤爱民、简将治兵为大务。盖于羽舞阶，鼓鼙思士，实并图维轨事焉。而蠢兹丑裔，逆我颜行，二年于兹，竟

未有能制其命者，何也?岂政教隳而文德阙，抑声容盛而武功弛欤?夫禁旅之环萃自若也，卫屯之棋置自若也，班操之更番自若也，盟带砺者列第而居，绾组符者专阃而控，乃动云无将，动云乏兵。不获已议调发，而列镇若虚伍矣；又不获已议雇募，而乌合驱市人矣。客兵散如搏沙，土著聚亦儿戏。总帅藉之勋胄，既繇礼之惟艰；训练寄之威臣，又典兵之有戒。嗟嗟厝吻，迄无成功。说者以为承平日久，左武右文，故其弊至此。然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古六军之帅，即天子六卿，用以内修外攘，非歧途也。即如先朝殪阿台，驯也先，羁顺义，芟逆藩，创倭奴，以及迩年东征西讨之役，咏《车攻》而歌《杕杜》者，讵异人任，毋亦惟是择人而专责之，可欤?夫武之德七，文之德十，有一季世犹能道之，矧在帝王!兹欲省繁言以核实，审操柄以图机，赫然收顺治威严之效，用恢弘祖宗鸿业，何施而可?尔多士学古通今，怀并用之术旧矣，尚根极体要，明著于篇，毋泛毋略。朕将采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鲁定公问道：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起来，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讲话不可以像这样地简单机械啊!世上的人们都说当君主很难办，做臣子不容易。如果懂得做君主的艰难，不就很接近一句话就能使国家兴盛起来了吗?鲁定公又问：一句话就能使国家丧亡，有这种事吗?孔子回答说：讲话不可以像这样地简单机械啊!世上的人们都说我对做君主并不感到有什么快乐，只希望我说的一切话都没有人违抗我。如果说的话很正确而没有人违抗，这不是挺好吗?如果说的话很荒谬可却没有人违抗，这不就很接近一句话就能使国家丧亡吗?

古代的圣人贤人远远超过普通人，原因并没有别的什么，只是善于推广他们的所作所为罢了。

想到要知人善任，就不可以不了解天理。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执定并扭转乾坤，匡正并扶持时运所致力的地方，没有不在文治和武功这两大关键问题上兢兢业业的。《尚书》称赞帝尧既神武又文德，这属于德行完备，两方面兼具呀！而对虞舜，就说他文德辉耀天下；对大禹，就说他施布文德教令；对商汤，就说他圣明神武；对周文王和周武王，就说一个是有谋略，一个是有功业。分别标揭出他们最突出的那个方面。照此看来，这几位圣人难道是在主宰时世和化导民众上，存在着偏向一个方面的情况吗？或许是在那最为适中的准则上，具有交相为用的地方吧？阴气与阳气，柔和与刚强，仁慈与正义，自从天地产生以来，到现在也没办法去除掉啊！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首次再造华夏，成祖文皇帝稳定住国家，全都是手提一把太阿宝剑来统率部队，而文治又如同浩莽的银河，光辉普照；全都是推崇儒家《六经》来化导民俗，而威力又如同雷霆，使人震慑。文德通过武力得到张布，武力凭借文德不再使用。哎呀呀！确实是追踪到帝尧而与虞舜和夏商周比试功业了。此后历代递相承接，继承天命，发展延续，尽管边疆一角的异族入侵的警报不是没有使人感到震惊的时候，然而整座江山到最后也不动摇，千秋万代永远仰赖，这实际上是我朝各位圣明皇帝的威灵在使国家获得安宁。他们的美好足迹就明摆在那里，你们也能够阐发播扬一番那大略的情形吗？

皇帝我凭借幼小的年龄，继承了帝位，位居在天下臣僚和民众的上面，日夜思索那播布弘扬列祖列宗的光辉与功绩的做法，只是把讲求学问，操劳国政，亲近贤才，爱护百姓，选任将帅，整顿军队作为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在两阶表演文舞来进行感化，战鼓响起思求那勇士，实际上是应该同时加以考虑，并列进行部署的。可这愚蠢丑陋的少数部族却违抗我大明皇朝的命令，到现在皇帝我已经执政两年了，竟然没有能够挟制住它们命脉的东西，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政治教化废弛而文德有缺陷，或者是礼乐太兴盛而

武功却衰颓吗?中央主力部队还像从前那样环卫聚集在京师，卫所屯驻还像从前那样星罗棋布在各地，军队训练还像从前那样轮番交替地进行，受到国家世代优厚待遇的人，宅第四布而居住在里面；佩戴朝廷大印的人独挡一面而遇事说了算，可却动不动就声称没有可派遣的将领，动不动就说缺少军队。实在不得已，于是商议从别处调发，可九座军事重镇仍然像没有军队守卫一样。又实在不得已，于是商议雇用召募，可又胡乱凑合在一起，驱赶集市上的人去当兵了。从别处调来的军队涣散得如同扬起的沙粒，当地的士兵聚集在一处又如同小孩子做游戏。统领军务的重任交给建有功勋的贵族去处理，无论怎样困难，也要按军礼行事；训练的任务交给威猛的大臣去完成，对掌领部队又下达了戒令。千嘱咐，万叮咛，可却一直没有成就的功绩。议论国政的人认为天下太平的时间延续得太长了，轻视武功，看重文治，因此那弊病就达到了这般地步。可皇帝我却又听说，具有文教业绩的人，必定也具有武力防备的本领。古代中央六军的将帅，也就是天子的六位分掌朝政的公卿。任用他们去修明内政，抵御外侮，并不属于两条线啊!就像我们列位先帝时期歼灭阿台，驯服也先，羁縻住顺义王俺答，铲除反叛的藩王，沉重打击倭寇，以及近年以来东征西讨的重大战役，使人们像周宣王时那样咏唱《车攻》和《杕杜》之类的诗歌，哪里又是除去任用人才而另搞一套呢?恐怕也只是择用合适的人选并专门责成他们完成具体的使命，也就行得通了吧?采取军事行动的德业具有七种表现，施行文治的德业具有十种表现，具备了其中的一种表现，即使在衰落时期也能够引导众人，何况在称帝天下或称王天下的时代呢!如今打算抛掉纷繁的议论，验核那实际；在执持住关键上审慎地来对待，谋划那事机，显著地收到各地顺从治理和威震天下的功效，用来弘扬列祖列宗的宏大基业，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就能够实现呢?你们这些读书人研习古代的学问，通晓当今的事务，心怀文武并用的办法已经时间很长了，还须紧紧围绕主体纲要来极尽奥妙，明晰地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也不要太简略。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用。

陈仁锡　殿试对策

陈仁锡(?~1634)　字明卿，号芝台，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天启二年(1622)探花。授翰林院编修，掌诰敕，因不肯撰写魏忠贤铁券文落职。崇祯时官至南京国子祭酒。一生锐意讲求经邦济民之学，喜著书，有《易经颂》、《重订古周礼》、《四书考》、《文品芾涵》、《古文奇赏》、《续古文奇赏》等。

臣对：臣闻帝王内顺治而外威严也，惟勤以课实，无事励有事之张皇，有事享无事之镇定，其道简而严。惟敏以赴机，疆埸之柄在胜负，庙堂之柄在赏诛，其道断而速。以勤敏提蓄朋贪欺之习，则敢于退不肖，决于殛大憝，而壁垒作同仇之朝气。以勤敏转溃逃邪诐之轴，则天无不肃杀之阳春，世无捐廉耻之爵禄，而枢阃钦率作之扬言。故丕冒海隅，成不怠于若彝抚事；而益国百里，课大猷于土宇昄章。百志惟熙，未逾绝险而虑切顾仆输载；小民难保，甫闻烽燧而忧先斩木揭竿。是以乘六龙于一乾，妙阴阳乎不测。上固文武惟后，下亦干城腹心。除千古凶残，保万年家室，必由之矣。

钦惟皇帝陛下，精一执中，缉熙无逸。日腾辉而清四海，秉白旄，仗黄钺，嗣服光昭；雷出震而省厥躬，仰榱桷，俯几筵，绍庭陟降。执竞无竞，褒忠烈而封椿，扬耆定之折冲；恭先孚先，别贪廉而位事，跻灼知之宅俊。凭翼孝德，经筵琢云汉之天章；翕受敷施，谏草含龙光之霁色。学古训其有获，冒闻迪见，畏天显而顾民岩；受成命不敢康，震叠怀柔，揆文教以奋武卫。固已神勇敷奏，鞞革合六师，浚哲发祥，本支百世，盖声灵赫濯而黎献尽臣矣。乃犹进臣等于廷，俯询文武全德指归，择人专责之术，以恢弘祖宗宏业。陛下必为尧舜之主，臣在草茅，矢非尧舜不人告；即禹汤、文武，不敢与陛下比德。尚敢掇拾旧闻、不抒一得以副明问？

臣闻益曰：都！帝德广远，乃圣乃神，乃武乃文。惟乃圣乃神，此文武之出于一也。以圣神文武之君，歉于知人安民，示万世为君之无

尽也。文明如舜,必殄谗说,惟功出于明试,言底于可绩,惧游谈乱之耳。禹敬敷文命,而六府孔修,万世永赖。汤布昭圣武,而聿求元圣,代虐以宽。文之谟,武之烈,而誉髦斯士,怀保惠鲜。既获仁人,永清大正,总以安民为本。自兵农判然,文武亦判然。要之兵农二,而以德振纲纪必一;文武二,而以政息议论必一。

大哉圣问! 省繁言以核实,审操柄以图机。而臣持勤与敏之说进,非是则繁言不可省,操柄无可审也。恭惟太祖高皇帝清函夏而置馆礼贤,成祖文皇帝犁虏庭而创典垂世,列圣率由成法,殪阿台,驯也先,羁顺义,芟逆藩,创倭奴。迩者东征西讨,大抵专任成功。而约诸讲学勤政,亲贤爱民,简将治兵,上接尧舜之治统,即上接尧舜之道统矣。

臣观今日有不可不进取之形胜,有可以进取之局势,有密于进取之谋算,而要在破虏情,振懦习,然后商进取之人,定进取之议。今之燕,岂特汉唐迫渭桥、逼甘泉哉?彼通西域,六诏断匈奴、吐蕃右臂,而可弃辽阴广宁,为东西虏续一臂耶? 昔宣府八城,弃之也先,彼亦不守,于谦募民屯田遂复之。此谓进取之形胜。奴未至而溃,宁远一带非虏取之而捐以与虏,非捐以与东虏,而捐以与西虏,又非捐以与东西虏,虏遂幕之,而犹鞠为荒草,荡为墟烟。我日退,西虏日进;西虏日进,则东虏亦日进。西平之馘歼,锦义之格拒,镇江之俘献,岂异人任哉?此谓进取之局势。

收四卫取海,盖奴犯山海则尾击之,退屯近岛,得鹭鸟于累百,兵不可不速应也。意者由关外一二百里,集鸿雁,招熊罴,而遥呼登津乎?倘亦韩范据大顺,而后城环庆,断萧关、鸣沙,卒反灵夏横山之地乎?夫王骥抵上江,韩雍薄藤峡,王守仁捣安庆,顾其时物力饶而雷击电掣,非摧残烈焰无坚城可收保。又意者近辽数百里,各宿重兵冲地,则合交互分功罪乎?倘亦洹水定盟,虎狼秦不出函谷乎?夫谭纶将戚继光筑蓟台,立车营,肃皇帝遣右司马大阅十六万之师,顾其时缮甲增戍所在腾饱,非宿将去其家丁、连年调发甚苦暴露比。而转怯为勇,转诈为诚,转恢弘为精密,仿汉上留屯田及当罢者人马,数计失辽所省,量减所派,厚其蓄力而耐烦综理,责之敢勇深入、凝忍负重之

将。此谓进取之图算。

然其要在破虏情。傅介子斩楼兰龟兹，持黄金锦绣，擒之樽俎，以神暇而胆厉也。冯奉世发鄯善诸国，以克莎车；裴行俭连突厥四镇，以斩都支，能善用其豪杰也。郭元振冻乌质勒雨雪中，其子反献马驼牛羊，梨面泣送，以宿望运急智也。元成之呼韩，嘉靖之俺答，逢虏之衰又有抱孙之痛也。借无一于此，挟赏人犯，能如寇准叱曹利用，以三十二万成约？力能制西虏，而后东虏可制；能制东虏，而后西虏之款可恃。此谓破虏情。

又其要在振懦习。圣问曰：政教隳而文德阙，声容盛而武功衰。陛下圣神文武之一怒也，问京营禁卫，何以永乐之较试，正统之团营，嘉靖之正兵守，奇兵战，则断行；选天下壮士宿卫，革腾骧诡粮，罢监枪权蠹，则断行；而窟穴厮养无赖，概置不诘？问班军何代替不稽，番上不时？军卫所何不勤蒐训集？有塞下易粟之盐政不举，有田不屯，何勇于坏成宪而怯于破俗例？问盟砺者祖制武有降职，停龙革职，其时亦左武右文欤？法重则易恩，教严则易使，非仡仡之射御，效截截之谝言。典兵有戒，为法爱恶，勋胄威臣皆咋舌矣。问绾组符者不战奚守，无兵奚战，不练奚兵？田畴率宗族入徐无山，登白狼，辞封邑，兹卖卢龙之塞何其多，而来乌桓、鲜卑之驿贡何其少？问募兵何以罪帅弃弁，攫金敛怨？试以多募远募之费，厚见卒庳履糗粮，调发召募士兵，客著尽精劲矣。此谓振懦习。

臣然后商进取之人。刘陶请捕张角，赏以国土；李泌议光弼、子仪，三地蔡其四将；裴度请行营并诸将心力，顾其言用不用耳。虞允文犒师江上，焚舟歼亮，抑岂知预决败盟，忧先淮海哉？虞诩令朝歌，守武都，抑岂知力诤凉州之弃，邓骘等忌摈之哉？臣观人才粗而不精，布局阔而少密，其识短也。故求奇识之人，寇恂伐百万之矢，以马二千、粟四百万给军卒，降心于贾复。子仪解光弼瞠眙，克平安史。李晟假诏徙诸将屯，趋东渭桥，断贼首尾。韩游瑰决策入卫，以锐士火战棚。张齐贤列帜燃刍，败贼土磴砦，反归功卢汉赟。张惟孝力解鼎澧五洲，不就招于制使。

臣观大吏逗留于危疆，简书委顿于草莽，其气馁也。故求忠勇之

人,颜真卿增陴浚隍,料简丁壮,河朔陷而平原守。马隆知凉州,立标简试,诣武库选仗,给三年军资。高崇文卯受命,巳即就道成都。种世衡银的教射,计去天都野利,以孤元昊。臣观角雌雄于门户,工铅椠为韬钤,其卫弛也。故求储备之人,陇西羌反,冯奉世请倍用六万。李靖赍二十日粮,擒颉利于反掌。王童之谋旦起事,段秀实延司漏吏曙,执斩之。张万福立马江淮,发进奉船,淄青将士睥睨不敢动。臣观封事饮贺兰之血,当局高赌墅之容,其救懈也。故求扑变之人,得若人,而擢一文臣,右文即右武矣;擢一将帅,右武即右文矣。倘圣问一剑驭军,《六经》训俗,文由武张,武因文靖之大指欤?

臣然后定进取之议。高拱疏添枢贰,以剔历边方充司属,特高其选。故内之职方久任外之材官,得自试于抚臣,绝咨送之弊陋。边圉得自试于经略,能守一关外要害,即以其地官之。有良将何患无兵?善将将何患无将?而尤无使阃外决机,盈廷分谤,则议在专责成。嘉靖给事杨允绳疏铨除,剂量边腹,痛抑规避。故沿边守令破资格,录异能,捷其升转,良急务也。孔门治赋之才,必不使治兵。裴度荐李德裕堪宰相,竟平泽潞。宋太祖喜得张齐贤,手畀太宗。各举所知,并坐举主,无采贤不贤之声,而课能不能之实,则议在精选举。

兀术东下,非知府陈规有米数万,刘锜不守。今赋车征马,杼柚半空,弃甲曳兵,米粟一炬。以京营推之,一家鬻一兵,十人侵十饷矣。近京暂纳本色,津运广求接济缓急、便宜通粮,则议在核积饷。狄青宁失智高,无欺朝廷。魏无忌不去,思归二万必不逊八万人之锐。边卒逃以道将奔也,道将奔以哨马惊也。厚悬赏格,辽之义民与汉蕃杂用,则议在募哨探。李抱真不蠲租给弓矢;德裕不请甲人于安定,弓人于河中,弩人于浙西,奚推昭义雄边?苏轼不别储余钱,资军士部送,奚冠诸道技劲?则议在勤练恤。以觉华为积聚,凭山踞海,或偏箱转斗,或蒙冲直抵,遥指三岔,俾重垒雄壁间有方骑千里、纵舫陈疑之势,则议在习舟车。

宋法兵败必诛,赃吏必刑。清抚不逮失开、铁,开、铁不逮掷广宁,已事之鉴也。夫小戎以义兴师,妇人勇赴勍敌。汉将恨虏未灭,去病耻不问家。今司寇之斧钺不严,贪绅之肺肠日烂。以廉耻生天下之

命，以禁令威天下之心，则议在必刑罚。诏中外亟修屯盐钱法、京东江南之利。无以祖宗允文允武之实政，为簿书期会之虚文。于是特免加派一二年，臣非不顾国家之急也。臣闻疆土与民守之，非与兵守之。使民不敢不守，不若不忍不守。故将士战而守令守。汉以弃利与匈奴逐，唐宪宗籍李锜代江西田赋，宋诸路被兵必有优恤。一辽民也，忽而可兵可屯，遂欲食翳桑之报；忽而为奸为黠，反不及旃裘之伦，亦大可念惜矣。章皇帝诘问夏原吉，山西饥民流入河南，为军吏捕逐，至引富弼活饥民五十万、选为兵者十万以愧之，则议在恤民氓。

武以安人利众，为七德之二。斯全德兼焉，其勤与敏之效欤？省游言，无使不可行之言，至于必行而行已无及；节冗费，无使不获已之费，至于必费而费已不支。夫论治莫高于孔孟，王者必世后仁，而明其政刑，尊贤使能，七年可以为政，则形势异也。故外按其形势，内定其规模，而力惩三方四路纳降信虏之辙，择一人专任之。若刘大夏自试为兵部，王敞举杨一清，王崇古以抚为战，李承勋修铁岭、松山城堡百八十所，项忠单骑过贼营悉却援兵，庶有济乎！

无所不备而后备，无所不练而后精。备京边所以备山海，备关外所以备关内，备登津所以备关外，备南国所以备登津，备天下所以备南国，备忠臣之士之肝胆所以备甲兵，备穷檐蓽屋之艰难所以备勍敌。有备无患，今日之《六经》也；令出唯行，今日之一剑也。若夫夙夜敬止，知人安民，与尧之乃武乃文者同。陛下握治统、道统之极，而何忧丑虏哉？伏愿思皇祖以文武不和，十羊九牧，预悬师武臣之炯鉴；皇考以尧舜必法，期月万年，伫集同心德之大勋。惟断乃成，威克厥爱，仁义交相为用，而景运如日方升矣。臣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圣帝明王在内部使人们都顺从治理，在外部又威震各个区域，只是凭仗勤勉去查验实绩，太平无事时要激励真像发生事变的全军出动，发生事变后要保持太平无事时的镇定态度，这种做法既简要又严明。只是运用敏捷去抓住时机，边疆一带的

关键问题在于获胜或战败,朝廷上的关键问题在于封赏或严惩,这种做法既果断又迅速。依靠勤勉和敏捷去控制住国库日益亏损而贪婪欺诈盛行的风气,就敢于罢免不合格的官员,做出斩杀大奸臣的决定,而边防将士就振作起同仇敌忾的旺盛斗志了。依靠勤勉和敏捷去扭转溃散奔逃与邪僻奸诈的症结所在,就皇天没有不夹带着肃杀气的温暖春天,世上没有不顾廉耻而得到的官爵俸禄,而朝廷大臣与边区将帅就全谨慎对待那遵从告诫、恪尽职守的天子所公布的命令。因此仁德教化广泛覆盖到四海的边际,戍守边境的人对顺从常规和履行职责决不懈怠;而扩展国境上百里,在疆域版图上验证那宏大的谋划。各种想法只是拓宽,还没翻越过最险要的地带时而计虑最关注那后退倒地与军粮运送。普通百姓很难保护住,刚刚听到战火燃起的消息而忧念就首先想到百姓会造反。因而在那皇天的元气基点上驾乘六条龙拉的车子,把阴阳施用到妙不可测的地步。在上面固然是文教与武功只归君主来掌握,在下面也都是国家的捍卫者和朝廷的得力助手。铲除掉有史以来的凶残势力,保有千秋万代的皇家帝室,必定要按勤勉和敏捷去做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精粹纯一,把握住不偏不倚的尺度,学习达到了大放光明的境界,决不贪图安逸享乐。就像太阳放射出光辉而肃清四海,秉持白色令旗,握定黄色大斧,继登帝位就普照天下。又像雷霆在东方轰鸣而省察自身,仰望祖庙的屋椽,俯视摆放祭品的桌案,继承对皇天和民众都正直又使群臣职责分明的先帝的治国大道。执守强盛的准则而强盛无比,褒奖忠臣烈士,实行世代封赠,表扬那终成武功的前线将帅。自身恭谨和取信于民都放在首位,区别出贪官廉吏,授给官位和职事,达到了任用贤才非常明晰的境地。依凭并扩展孝敬的美德,在经史讲席上深入钻研像银河高照那样的上天降赐的经书;多方采纳又综合施行,规谏的奏章蕴含着天子恩泽施布的雨过天晴的光色。学习古代的训条确有收获,闻知一切又明了一切,畏惧皇天的谴告又顾念民众的动向。承受既定的天命,不敢安逸,对四周部族进行震慑又加以安抚,部署文德教化,奋扬武力防卫。原本上已经神明勇武,大功告成,军队得到整顿,祖先智谋

深广，永久呈现吉祥，嫡系和旁系子孙代代繁衍，差不多声威显赫，各处百姓全都归服了。可仍然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从上面询问文治与武功同时具备的宗旨所在，择用人材、责成他们完成具体使命的方法，用来弘扬我朝列祖列宗的宏大功业。陛下一定会是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而臣下我身在民间，发誓对那不是唐尧虞舜般的君主决不进前禀告，然而就连夏禹商汤以及周文王与周武王都不敢与陛下比试德业，臣下我还敢不拾取从前听到的东西，抒发一点儿心得来切合圣明的询问吗？

臣下我听说伯益曾讲过这样的话：哎呀！尧帝的仁德覆盖到一切，遍及每个角落，既圣明又神妙，既有武功又有文治。只因既圣明又神妙，这就表明文治与武功都是出自同一个来源啊！凭借本人是圣明神妙又有文有武的君主，却在了解人才和安定民众上感到还有欠缺，这正昭示千秋万代身为君主就没有能做完的事情啊！像虞舜那样措置天地，照临四方，可还一定要灭除花言巧语，只讲求功绩由明晰的验核来决定，言论要能取得实效，这是担心空泛的讲说会搅乱政务啊！大禹恭敬地施布文德教化，而粮食等六种物资的储藏事宜得到修明，长久治理下去也永远依赖这一条啊！商汤施布并显示圣明神武，而求取伊尹那样的大圣人，用宽厚来取代夏桀的暴虐。周文王的深远谋略和周武王的盛大功业，都是选拔杰出的人才，安抚保护百姓，恩惠没有不延及到孤寡老人和孤儿的。已经获取到了仁德的官员，永远就停止武力征讨了，终归把安定民众作为根本。自从军队和农民鲜明地划分开来，文治和武功也鲜明地划分开来了。但总之军队和农民虽然分为两个方面，凭借仁德去振作起朝廷纲纪，必定会融为一体；文治和武功虽然分成两个系施，凭借政事去止息住各种议论，也必定会融为一体。

皇上的圣明策问真是太高明了！要求抛弃纷繁的议论，验核那实际；在执持住关键上审慎地来对待，谋划那事机。臣下我用勤勉与敏捷的主张来进呈，不这样做就会纷繁的议论抛弃不掉，在执持住关键上就没办法审慎地来对待。万分恭敬地想来，我朝太祖高皇帝肃清华夏地区，设置宏文馆来礼遇贤士，成祖文皇帝又踏平蒙古部族的大

本营,创立法典来垂示后世。各位圣明的先帝全都遵循已有的法度,歼灭阿台,驯服也先,羁縻住顺义王俺答,铲除反叛的藩王,沉重打击倭寇,以及近年以来东征西讨的重大战役,通常都是专力任用某一个大臣而成就功绩。把这一切归结为讲论学问,操劳国政,亲近贤才,爱护百姓,选任将帅,整顿军队,往上承接起唐尧虞舜的施治统系,也就往上承接起唐尧虞舜的大道统系了。

臣下我观察,目前具有不可不进击攻取的险要地带,具有可以进击攻取的局势,具有周密地进击攻取的谋划,而关键又都在于破除异族部落的野心,振刷我方怯懦的风气,然后探讨那进击攻取的合适人选,酌定进击攻取的动议。如今的京师周围地区,哪里就仅仅是汉唐时期匈奴或吐蕃的部队曾迫近长安渭水桥,威逼甘泉宫呢?汉唐打通西域,曾六次下达诏令,要求务必割断匈奴或吐蕃的如同右臂的辅助力量,而当今能够放弃辽河南部的广宁卫,给东部和西部的异族部落再接上一条胳膊吗?从前宣府镇的八处城堡,丢弃给瓦剌也先部,它也占据不住,我朝于谦招募百姓屯田,于是就收复了它们。这就叫做进击攻取的险要地带。满洲奴还没开到,可我军就溃逃了,宁远卫一带就不属于异族部落夺取了它们,而是我军白白送给了对方;也并非是白白送给了东部的异族部落,同时又等于白白送给了西部的异族部落;更不是白白送给了东部与西部的异族部落,而是异族部族随后就扎帐蓬盘踞在那里,但仍会完全变成一片荒草地,沦落成空无人烟的废墟。我方一天天往后退,西部的异族部落就一天天向前进逼;西部的异族部落一天天向前进逼,东部的异族部落也就一天天向前进逼。西平堡的斩杀和歼灭敌军,锦州和义州卫的抵御抗拒,镇江城的献上俘虏,又哪里是除去任用人才而另搞一套呢?这就叫做进击攻取的局势。

收复广宁前屯、左屯、右屯和宁远等四卫,占据沿海地区,满洲奴进犯山海关就跟在后面追击它们,我军撤退就屯驻在临近的岛屿上,要想俘获到几百名像苍鹰那样前来捣乱的敌兵,军队就不能不迅速策应啊!想来有人会反问:由山海关以外一二百里,聚集起流民,招募到勇士,就与登州府、天津卫遥相呼应了吗?可这恐怕也该像北宋时

韩琦、范仲淹那样占据大顺城，然后在环州、庆州一线修筑城堡，切断通往萧关、鸣沙的道路，最后收复灵州、夏州、横山的地盘吧？我朝王骥在平定麓川宣慰使思任发的叛乱中直扑云南上江，韩雍在平息广西瑶民劫掠广东的动乱中直逼大藤峡，王守仁在讨伐上高王朱宸濠的反叛中直捣安庆，可那时国家正物力雄厚而采取大规模的快速军事行动，除去摧毁残朽物的烈火就没有坚固的城池可以收复并保住的。想来还有人会反问：靠近辽东镇数百里的地方，分别在要冲险隘屯驻重兵，就要协同作战而互相承担功劳与罪过吗？可这恐怕也该像战国时山东六国的将相在洹水定立起盟约，如虎似狼的秦国也就不跨出函谷关了吧？我朝谭纶率领戚继光修筑蓟州镇的墩台，设置战车营，世宗肃皇帝派遣右司马大规模检阅十六万人的部队，可那时修缮武器装备，增强卫戍力量，处处都人强马壮，并不是老将离开他的家口而连年调发并对长期风餐露宿感到很痛苦的现状所能比拟的。要把胆怯转变为勇敢，把欺诈转变为诚实，把设防太宽泛转变成精细严密，仿照汉朝在前线一带留驻屯田以及该撤走的人马，计算失去辽东部分地区所能省下的军队数目，根据情况减少派驻的士兵，加强他们准备迎敌的战斗力，耐得住各方面的细心治理，把任务交付给敢于勇猛深入并能专力忍受、承担重托的将领来完成。这就叫做进击攻取的谋划。

然而其中的关键在于破除掉异族部落的野心。像西汉傅介子斩杀楼兰王和龟兹王，持带黄金和高级丝织品，在酒宴上擒杀他们，靠的是神态安详又胆气特壮啊！西汉冯奉世调发鄯善等国军队，攻克莎车国；唐朝裴行俭联合起突厥四镇，斩杀十姓可汗都支，都是能够善于使用当地的豪杰啊！唐朝郭元振在风雪中与西突厥首领乌质勒商议军情而使他受冻死去，可他的儿子娑葛反而献上马匹骆驼和牛羊，用刀划脸，流泪送郭元振回营，凭的是华夏素有威望的人运用紧急情势下的机智啊！西汉元帝和成帝时的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归服，我朝嘉靖以后的蒙古首领俺答受封顺从，是因为正赶上异族部落衰弱又有孙儿被内地所掌握的哀痛啊！假设不具备以上的任何一种条件，对方用入犯来要挟恩赏，能像北宋寇准喝叱曹利用，只拿三十二万岁

币与辽国结成盟约吗?力量能够制服西部的异族部落,然后东部的异族部落才可以制服;能够制服东部的异族部落,然后西部的异族部落的归顺才可以确有保证。这就叫做破除掉异族部落的野心。

其中的关键又在于振刷我方怯懦的习气。皇上的圣明策问中说:政治教化废弛而文德有缺陷,礼乐太兴盛而武功却衰颓。陛下圣明神妙有文有武这样一震怒,在诘问中央主力部队为什么成祖永乐年间的比武检阅,英宗正统年间的团营会操,世宗嘉靖年间的常规部队负责守卫而机动部队负责进击,就能坚决地实行开呢?挑选天下的壮士卫护皇宫,革除腾骧四卫营虚报人数领取的军饷,罢免监造兵器而侵吞公款的贪官污吏,就能坚决地实行开呢?对盘踞在造反大本营中的打杂人和无赖汉一律不予以处罚呢? 又在诘问轮班入京执勤的军队为什么前后替代不予稽核,依次到京屯驻却不按规定的时间办?五军都督府和各地卫所为什么不勤加训练检阅? 设有在边境地区交纳粮草换取领盐销盐凭证的盐政,可却施行不起来;拥有边区上的大片田地,可却不屯种,为什么在破坏已有制度上就特胆大而在破除例行的规矩上就特胆小呢?又在诘问蒙受国家重恩的官员,祖宗创立的制度就规定:武将有降职,扣压诏书就革职,当时也轻视武功而重视文治吗?法典威重就容易使人感恩,教戒严厉就容易驱使百官,决不是仅仅就满意勇猛的武士会骑马射箭,让文臣献上动听的花言巧语。掌领军队具有训戒,通过动用军法来表明喜爱和憎恶的对象。立有大功的武将和威猛的帅臣全都吓得吐舌头了。又在诘问佩带朝廷大印的将帅,不主动进击又怎能够防守,没有雄兵又怎能够主动进击,不进行训练又怎能够组成雄兵?像三国时的田畴,率领本家族的人众引领魏太祖的兵马进入徐无山,登上白狼堆,大破乌桓部族,可却拒不接受亭侯和五百户食邑的封授,但在今天故意把卢龙口这样的要塞丢给对方再反过来向朝廷邀赏的人,为什么那样地众多?而招徕当年乌桓、鲜卑这类部族络绎不绝地入朝进贡的情况又为什么那样地稀少呢? 又在诘问召募士兵中为什么会出现罪恶将帅丢弃下属和夺占军饷而引起士兵怨恨的现象呢? 试用多召募和在远处召募的费用,提高在编兵卒的营帐、军装、粮饷的待遇,无论调发还是召募士

兵，而外地调入的部队和当地人组成的部队也就全都精良强劲了。这就叫做振刷我方的怯懦习气。

然后臣下我再探讨进击攻取的人选问题。东汉刘陶奏请捕杀黄巾军的首领张角，要朝廷拿侯爵食邑来封赏有功的人。唐朝李泌建议由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陉，由郭子仪夺取左冯翊，入河东，就在三地牵制住了安史叛军的四个将领。裴度请求自己去行营督战，使各路将领同心合力。只在于对他们的建议采用不采用罢了。南宋虞允文到长江边上去慰劳军队，焚烧敌军战船，歼灭了金国国主完颜亮，又哪里只是他早就知道金国肯定会背弃盟约并把扬州做为首先该忧虑的地方呢？东汉虞诩出任朝歌县长擒杀盗贼，转任武都太守击破西羌，又哪里只是他早就知道极力谏阻放弃凉州的主张而提出这一主张的邓骘等人忌恨他并把他赶出朝廷呢？臣下我观察当今的人才粗疏而不精明，在军事布局上太疏阔而不严密，这是由于他们器识短浅造成的呀！因此必须求取到具有超常器识的人。像东汉寇恂砍伐竹木造成一百多万只箭，养马两千匹，收取税粮四百万斛，向部队提供军需物资，而对执金吾贾复却甘居下风。唐朝郭子仪消除李光弼的怨恨情绪，平定了安史之乱。唐朝李晟假借诏书名义转移众将领的驻地，直奔长安东渭桥，切断了叛军的首尾联系。唐朝韩游瓌决定下对策，要入卫天子，就派遣精锐的士兵烧毁了叛军的战棚。北宋张齐贤设布旗帜，燃放柴草，在土磴砦击败了辽军，反而把功劳归于畏惧自保的卢汉赟。南宋张惟孝奋力解救鼎、澧五州的危难，但不归从制置使吕文德的招用啊！

臣下我观察当今的地方最高长官在边疆前线上逗留不前，各种公文都弃置在荒野上，这是由于他们勇气丧失造成的呀！因此必须求取到忠诚英勇的人。像唐朝颜真卿增高城墙，挖宽挖深护城河，统计并挑选壮劳力，河北与山西整个地区都落在了安史叛军的手中，可他所在的平原郡城却独自守护住了。西晋马隆自动请求去辖领凉州，行前设立标竿选募勇士，到朝廷武器库去挑选兵器，还预支了三年的军需物资。唐朝高崇文在卯时接到平定川蜀叛乱的命令，到巳时就率军踏上了开赴成都的征程。北宋种世衡把银杯作为靶子教导人们

射箭,运用计策去除掉天都野利兄弟二人,用来孤立西夏国主李元昊啊!臣下我观察当今在边境险要地带决出胜负,可却把熟读兵书当成作战的谋略,这表明防卫很松弛啊!因此必须求取到擅长筹办军需的人。像西汉时陇山西部的羌族部落兴兵反叛,冯奉世请求出动超过敌军一倍的六万人马。唐朝李靖携带二十天的粮草,擒获突厥可汗颉利就像把手掌翻过来那样地容易。唐朝邠宁镇刀斧将王童之阴谋在天亮时反叛作乱,段秀实命令负责报时的官吏拖延击鼓报晓,逮捕斩杀了他。唐朝张万福在江淮涡口岸边骑马站定,命令向天子贡献物资的船只起航,淄青镇的将士瞧来看去就是不敢拦截啊!臣下我观察当今的奏章纷纷表示斩杀北方部族,可朝廷主管机关却仰慕东晋谢安在前秦大兵压境时还拿别墅做下棋赌注的举动,这表明救助太懈怠了啊!所以必须求取到迅速能控制住事变的人。获得的如果是合适的人选,升任一名文臣,重视文治也同时就重视武功了;升任一位将帅,重视武功也同时就重视文治了。这恐怕是皇上圣明策问中用一把太阿宝剑来统率部队,用儒家《六经》来化导民俗,文德通过武力得到张布,武力凭借文德不再使用的主要义旨所在吧?

然后臣下我再酌定进击攻取的动议。我朝高拱疏请增置兵部侍郎,选用在边区阅历丰富的人充任兵部各司的属员,特意提高他们的选用标准。因此兵部职方司的属员长期担任边区的武官,有权向督抚提出自己升任什么职务而加以试用的请求,由此杜绝了呈递公文来保送的弊端和粗陋之处。边境前线人员有权向经略提出自己升任什么职务而加以试用的请求,确能守卫关外某一要害处所,就把那一处所交他掌管。拥有优秀的将领还担心什么没有士兵呢?善于驾驭将领还担心什么没有将领呢?但更不要致使独挡一面的将帅根据战机做出了决定,可满朝廷上又各自说三道四,这就证明动议在于全权交给将帅处理而取得成功。我朝嘉靖时兵科给事中杨允绳奏请铨叙授官,应均衡考虑边区和内地,严厉斥退设法不去边区的人。因此对边境一线的太守县令要破除资历品级,选录有突出才能的人,越级提升他们,确实属于头等大事啊!出自儒生而去治理百姓收取赋税的此类人才,一定不能让他们去掌管部队。唐朝裴度推荐李德裕可以担

任宰相,到最后就平定了泽潞镇的叛乱。宋太祖高兴得到了张齐贤,亲手把他留给宋太宗来使用。让官员各自荐举自己所了解的人才,荐举不当,连同荐举人一并问罪,不理会贤良或不贤良的名声,只验核能干不能干的实绩。这就证明动议在于精详地做好选拔举用的事宜。

金国统帅兀术率兵向东南入侵,要不是顺昌知府陈规储有米麦数万石,刘锜就守卫不住这座府城。如今征收车辆马匹,而民间布帛已经半数空无所有了;军队扔下武器逃跑,粮食被敌方一把火全烧光了。拿京师三大营来做推算,一家百姓供养一名士兵,十名士兵就白白占去十份军饷了。靠近京师的地区暂时改成交纳粮食等实物,由水道向天津卫运送物资要多方面探求供得上紧急需要、灵活便利地使军粮运到的办法。这就证明动议在于核定军饷的积蓄。北宋狄青宁可怀疑有诈,认为反叛的侬智高已经逃掉,也不把身穿金龙衣的尸体当成是侬智高来欺骗朝廷。战国信陵君魏无忌要是不离开魏国,魏国当年在救赵战争中事先愿意回国的两万名士兵必定不比愿意留下来的八万名勇士差。守边的士兵奔逃是因为镇守一方的将领先奔逃啊!镇守一方的将领先奔逃是因为被刺探消息的人吓坏了。公布优厚的封赏条文,对辽东地区的忠义百姓和汉人、番邦人交互使用。这就证明动议在于召募得力的刺探军情的人。唐朝李抱真如果不免除强壮男子的租税,发给他们弓箭做演练;李德裕如果不请求从安定郡调来制造盔甲的工匠,从河中镇调来制造弓箭的工匠,从浙西调来制造弩箭的工匠,凭什么世上会推崇昭义军是雄盛的边镇?北宋苏轼如果不在定州任内另外积储下剩余的钱物,拿来供军士去参加大检阅使用,凭什么能在各路比武中数第一?这就证明动仪在于勤加训练和体恤士兵。把觉华岛做为根据地,依凭燕山,雄踞海湾,有时候是战车辗转搏斗,有时候是舰只迳直抵临,直接指向三岔儿堡一带,使威武严密的边防线上形成骑兵阵列长达千里和成队战船出动不定的态势。这就证明动议在于训练好车战与水战。

宋朝法律规定,军队战败必定要斩杀领兵的将帅,贪污的官吏必定受到刑罚。我朝清查安抚士兵做得不够,就丧失了开原和铁岭,开

原和铁岭守不住，就又丢弃了广宁各卫，这是往事的鉴戒啊！古代普通的战士激于正义而出征作战，妇女勇敢地冲向强悍的敌军。西汉的将帅痛恨匈奴还没有剿灭，霍去病为此感到羞耻，根本就不考虑家事。如今司法部门惩罚不严厉，贪婪官吏的心肠一天比一天溃烂。凭借官有廉耻之心来使天下人的性命得以保存住，依仗禁遏的法令来威慑住天下人的邪心。这就证明动议在于刑罚一定要施用。颁布诏书命令朝廷内外迅速整顿好屯田、盐政、钱币制度以及京师东部和江南地区的财利。不要拿我朝列祖列宗既讲文治又讲武功的实际政务，变为报送簿册、按期交差的一纸空文式的玩艺。在这时特意免除一两年法定税项以外增收的赋税，臣下我提出这种建议并不是不顾念国家的急需啊！臣下我听说，国土要与老百姓守护住它，并不是与军队守护住它。让老百姓不敢不守护，比不上叫他们不忍心不守护。所以将士们去作战而太守与县令要维持好各地。汉朝通过舍弃国家收入来与匈奴角逐，唐宪宗没收李锜的全部家产来代替江西的田赋，宋朝各路遭受到异族部落入侵的蹂躏必定施布免税等恩惠。同是辽东的一个百姓，忽而就可以成为士兵进行驻守，于是就想做出当年晋国灵辄在翳桑这个地方得到赵盾饭食而日后卫护他的那种报答来。忽而又成为内奸，成为狡诈者，反而比不上异族部落那帮人。这也太让人顾念痛惜了。我朝宣宗章皇帝曾诘问夏原吉，山西饥饿的百姓逃亡到河南，被军士官吏逮捕驱逐，竟激切到援引北宋富弼使饥饿的流民存活了五十万、挑选出其中的十万人当士兵，来叫夏原吉感到羞愧。这就证明动议在于抚恤百姓。

武功用来安定住百姓并对民众有利，这属于武功七种美德中的两种。做到这样，文治和武功两方面的美德就都具备了，恐怕也是勤勉和敏捷的效验吧？抛弃空泛的言论，不要使本来行不通的主张，竟发展到必须行用而行用后已经无法补救了。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不要使永远填不满的费用，竟发展到必须耗费而费用已经拨付不出来了。讲论治国，没有谁能超过孔子和孟子去的。孔子强调称王天下的君主，必须是三十年以后才会达到天下人都仁德，而孟子强调修明本国的政事和刑罚，尊重贤才，任用能士，七年就可以推行开治理了。

这表明两位圣人所处的时势存在差异啊！所以当今在外部要察辨那客观的形势，在内部要定立下总体的规划，极力把三方四路轻信异族部落而接受诈降的覆辙作为经验教训，择用一个人来让他全权处理。像我朝刘大夏自己请求担任兵部官属来予以试用，王敞推荐杨一清，王崇古把安抚封赏俺答作为对蒙古部落的出战，李承勋修筑铁岭、松山一带的城堡一百八十处，项忠单枪匹马到石城敌营与其头目见面而完全不再需要援军再开到，这就差不多渡过难关了吧？

没有任何地方不做防备，然后才真正防备起来了；没有任何方面不进行训练，然后才军队真正变得精锐了。在京师边缘一线做防备，是用来防备好山海关；在山海关外围做防备，是用来防备好山海关以内的区域；在登州和天津卫做防备，是用来防备好山海关外围地带；在南方做防备，是用来防备好登州和天津卫；在天下各地做防备，是用来防备好南方；在忠臣义士的思想和胆量上做好准备，是用来准备好军队；在穷苦百姓的生活艰难上事先处理好，是用来防备住强悍的敌人。有防备就没祸患，正是当今的《六经》啊！命令下达只管执行，正是当今的一把太阿宝剑啊！至于从早到晚保持恭敬的态度，知人善任，安定住民众，就与唐尧既有武功又有文德一个样了。陛下掌握着施治统系和大道统系的最高准则，还对丑恶的异族部落忧虑个啥劲儿呢？跪拜祝愿陛下思索您祖父神宗皇帝鉴于文臣武将不和协，各行其是，预先就亮出的出兵打仗全让武将去指挥的鲜明的鉴戒，思索您父亲光宗皇帝出自必定要效法唐尧虞舜，从每年每月到千秋万代，都要树立汇集起同心同德所取得的大功业的训导。只有做出决断才会成功，威武又能慈爱，仁德与正义交相来运用，国家的美好命运就像旭日初升了。臣下我触犯了皇帝的威严，简直恐惧到了极点。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杨寄林译〕

明思宗崇祯四年(1631)辛未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

服事君子是很容易的，但是想讨君子喜欢却是很难的。如果不用正当的方法讨君子喜欢，君子是不会喜欢的。等到君子要任用人时,总是量才使用的。

心的功能是思考,思考就能得到人的天生善性,不思考就不能得到它们。

舜的品德堪称圣人,尊贵地位能当上天子,拥有整个天下。

吴伟业　殿试对策

吴伟业(1609～1671)　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崇祯四年(1631)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后兼东宫讲读官,历左庶子等。南明弘光时,任少詹事。明亡家居。康熙时,任国子监祭酒。请假归里,遂隐居不仕。工诗词书画,诗文华丽,称"娄东派"。诗称清初一大家,以《圆圆曲》、《楚两生行》名于世。著述甚丰,有《梅村家藏稿》等。

臣对:臣闻帝王之临御天下也,必有克缵前猷之大典,而后觐光扬烈,可以立四方之纲;必有聿修厥德之精意,而后嗣服作求,可以受万年之祐。何谓大典?令绪之所昭,典常之所系,咸收于若彝抚事之内,而无不修明者是已。何谓精意?夙夜之罔懈,冀墙之罔间,毕挈于一心宥密之中,而无不临保者是已。故总一统类而整齐万民者,法

也。命职而辨官，修德而布政，猷为无有不备，而明作敦大，刚柔尤有时措之宜。经理宇内而垂训百世者，法也。攘外以安内，劝善而禁非，治效无有不张，而穷变通久，节爱尤有恰符之窾。古帝王所以祇遹前休，率百职以勤事，而致民生于康阜；丕承笃叙，命群工以效力，而跻斯世于雍熙，用此道也。是以奉制而定一尊，上之所建立者秩然其不易，而庶明励翼，用成其纪纲燕及之休；法古而建长策，前之所懋建者焕焉其重新，而众绩咸修，以享其正直平康之化。其道端有在于今日矣。

钦惟皇帝陛下，刚健中正以时乘，文武圣神而广运。建五有极，四方遵彝训之荡平；得一为贞，百度归纪纲之肃穆。宝册衍青镂之庆，歌重晖重润于无疆；灵坛展苍璧之虔，凛日旦日明于有赫。逊志务时敏，慎修罔懈，而缉熙之心法允符；俭德怀永图，甘节以通，而素朴之淳规久布。金华昼接，为明谐，为董正，宛然总章、衢室之休风；玉案时亲，乃启沃，乃论思，信矣辟雍、明堂之盛事。征弗庭以靖众，运筹无烦十札，白旄黄钺，敉宁已奏乎肤功；沛大赉以安民，蓄积爰备九年，赤县神州，怀保遍施其膏泽。固已四三王，六五帝，而超出于寻常万万矣。乃犹不自满假，进臣等于廷，俯垂清问。首谕以治法，兼举夫治人；次及于建官理财，惇典庸礼，诘戎禁暴，通工柔远之道，而凡奖恬旌廉之典，民赋屯盐之政，终至于兵饷抚赏，与综稽明罚之条，无不备陈。虽唐虞谟诰、成周咨访，何以过焉！臣图事揆策，虽无见事之明，而毕智竭能，可效一长之策。敢悉其所知，以为陛下献焉。

臣闻之：人主之立法也，知明意美，道高德厚，设诚于内而制行之，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然非选温良上德之士，以因能而责治，经常何自而修焉？故必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使上有以持其统，下有以知所守，则法度可明，统纪可一，皆从此始也。人主之立法也，事为之制，曲为之防，随俗之宜而通变之，政事文章皆其效也。然非举通道进善之人，以分职而效官，典章何自而备焉？故必因物以识物，因人以知人，使教化自内以达外，道法自略以及详，则智者献明，能者效力，皆从此始也。故唐虞稽古，建官惟百，而凡邦土、邦教之职，司农、司寇之官，无不掌其赋人，修其典礼，诘其兵戎，于以食足货通而远方来服，此三代治人治法之明验也。汉唐设职，浸失初制，而凡钱谷之任

有掌，德刑之教有司，无不制其出纳，修其彝常，戢其兵革，于以重本抑末而遐迩率俾，此后世治法治人之明征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定一代之所尚，而创制显庸，上追虞夏之模；收庶绩于咸熙，而立纲陈纪，远迈汉唐之制。陛下修举而率行之，此真建久安之势，而道德隆于百王；成长治之体，而淑问扬于疆外者也。

乃伏读圣制有曰：时远则玩惕易生，玩久则初意浸失。而于下之风习，邦之赋用，养兵修备，厘弊惩奸之事，犹兢兢焉。臣窃思之：夫君之所以制下者，格也。极之积渐，以课其功，则幸心不作，所以养奖恬之化者至矣。而世习未变，其何以劝焉？惟以实试贤能为务，而有一材者居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退让所自生也。君之所以养士者，禄也。厚其爵予，以彰有德，则冀念不生，所以成养廉之德者至矣。而风气未更，其何以劝焉？惟以贵谊贱利为先，而见贤不居其上，受禄不过其量，廉法所自见也。

若夫赋税之数，强人以从己难，抑己以从人易。故汉人之法：司农掌田赋之人，少府掌山泽之税。邦之大事，费出司农，而共养劳赐，咸属少府。盖不以本藏减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费，别公私，示正路也。则民与赋交利之术，存乎节用而已矣。农商之政，贵本以抑末难，缘末以通本易。故国初之制：商人耕塞下之田，盐吏给关中之引。边之积贮，有赖商人，而因山煮海，大开盐利。盖不以屯耕苦吏卒，不以赋税困内邦，贵五谷，治盐铁也。则屯与盐相济之计，存乎重农而已矣。

乃兵饷果无良策乎？夫汉起田中为吏卒，唐以屯种为府兵，其时漕法之省何如也！自变为羽林、旷骑之选，而其后遂有养兵之费。故惟汰其老弱而选取民壮，使无事自为耕耘，有事自为调度，则军政备乎里，卒伍成乎郊，而兵饷可无虑也。抚赏果无胜算乎？夫汉人绝匈奴之约，唐人废渭桥之盟，其时中国之盛何如也！自参以请好和亲之说，而其国遂有无备之虞。故惟弃其甘言而急为防御，使攻之不为招寇，约之不为见欺，则暂费者久宁，一劳者永逸，而抚赏可无患也。

所谓综稽者，君操其名以责实，臣治其职以赴功。其为能吏者，必有事以知其能；其为廉吏者，必有事以知其廉。夫然后职任修而庶事康焉。所谓明罚者，制赏夺以劝其从，严刑法以威其淫，使从上化

者既可治而不可乱，其不率上教者亦自重而畏犯法。夫然后上下顺而风俗成焉。故有体统以肃之于上，而翼明佐治，诸臣复有励相之劳，则四夷向风，海内致附，所谓求王道之端而正其本也。有宪典以振之于先，而大法小廉，群工皆有课勤之职，则教化大行，民生有济，所谓因风俗之变而用其权也。

抑臣更有进焉：夫朝廷者，天下之率也；道德者，政治之端也，愿陛下加之意而已。昭前之光明而效其成制，则有以祗承于厥休，然至时势所趋，则不法其政，不循其俗，尤有善制之宜。观下之情性而治其大纲，则有以加惠于庶类，而至规条所系，则莅之以强，断之以刚，尤有救时之术。斯极治矣。臣愚不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统治天下，必须具有能够继承前人谋略的根本大法，然后重现其光明、发扬其大业，才可以建立统治四方的纲领；必须具有修养好自身品德的诚意，然后继承帝位，振作求治，才可以得到万年大福。什么叫做大法？就是可以昭明伟大事业的，可以维系常法的，全都收纳在顺从常理、适应事物的范围之内，无不得到修明。什么叫做诚意？就是起早贪黑地工作毫不懈怠，仰慕圣贤从不间断，把这些全都统括在仁厚宁静的心中，无不加以运用和保持。所以统一各类事务而整齐万民行为的是法度，这法度便于任命职务而辨识官吏，修养品德而施行政事，谋略和行为没有不完备的，而努力建功立业，达成宽厚的政治，在用刚强手段和柔和手段上更具有适合时势的恰切办法。治理天下而垂训百世的是法度，这法度便于驱逐外敌，安定内部，鼓励良善，禁止为非作歹，治理效果无不扩大，而走到尽头就加以变通，变通就能保持长久，而节约费用，爱护人民更具有非常符合实际的条款。古代帝王之所以恭敬地继承前人美德，率领百官勤于政事，而导致民生安乐富庶；很好地继承厚待诸侯大夫的传统，命令众臣去效力，而使当代进入和乐升平的盛世，正因为采用了以上准则的缘故。所以奉行诏令而确定皇上最尊贵的地位，皇上所建立的制度将被有序地遵守而不被改易，各位贤明大臣勉

力辅佐，从而形成纲纪端正、安邦慰天的美政；效法古人而确立长治久安的方略，使前人努力建立的事业重放异彩，各种政绩都很显著，从而获得正直、平和、安康的教化，这一准则确实要依赖今日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刚健中正，驾驭天下，文武兼备又圣明神妙，广加施用。仿效夏禹治国大法中的第五种大法而建立君主的法则，使四方臣民遵守作为常训的王道；获取到纯一的心念作为榜样，使各种事务都纳入肃穆的法规之中。诏册中推广着妙笔的福庆，歌颂着永无止境的光采重合、雨露再降的恩泽；祭坛上展示着祈祷的虔诚，表达着对明亮的仁德普照的警戒。谦逊而时刻努力，谨慎修养好自身而不懈怠，符合光明的圣学心治大法；俭朴而谋求长治久安，乐于节俭而关于禁戒奢侈的法规早已颁布。在内廷频繁接见臣下，形成明智的谋略和大臣的团结，形成监督纠正错误的规则，宛然古代天子在总章、衢室这些特设场所听取意见的风范。经常到经史讲席来，于是受到启发开导，于是讨论思考，确实像古代天子在辟雍、明堂讲学议政的盛事。征讨不归顺的部族，来安定天下，运筹帷幄不需要翻来覆去讲明利害，执持天子专用的威权象征物品，平定叛乱已经大告成功。大施赏赐以安定民众，物资储备九年中可有三年的富裕用品，赤县神州，都得到皇上安抚保护的恩泽。这已经同三王五帝相并列，超出平常的帝王无数倍了。但是仍然不自满，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降赐清晰而又详尽的询问。首先征求治国的原则，兼及治国的人才；其次涉及到建立官职、治理财政，宣明人伦纲常，施用礼仪，用兵平叛，对外交往的方略，以及所有的奖励恬静、表彰廉洁的法规，民赋屯田盐务方面的政事；最后求问兵饷、招抚以及考核官员与正确惩罚的条律，无所不问。即使唐尧、虞舜的求取谋略、周代的咨询，哪里能超过我皇上的虚心求问呢？臣下我针对政事谋划计策，虽无预见之明，但是竭尽智慧和才能，可以献上某种好计策，不敢不把所知道的东西都讲出来，作为向陛下的进献。

臣下我听说：君主确立法度，想得清楚，用意很好，大道高明和仁德深厚，怀诚意于内心而坚决施行，仁义礼乐都是具体的治国措施。但是如果不选用温和良善、道德数第一的人士，根据他的才能责成他

去施治，那么国家的大法从哪里会得到修明呢？所以必须量材而授官，衡量品德而决定爵位，使皇帝有办法掌握住统领的东西，臣下知晓自己的职守，那么法度就可以昭明，体统纲纪就可以统一，这些都是来源于此的。君主确立法度，各种事项都做出明确规定，多方面进行防范，适应社会变迁的需要加以变通，政事、文章都是它的实际效果的反映。但是如果不选用通晓道理、不断自我完善的人，去分别担任官职，履行职责，那么典章制度从哪里会完备起来呢？所以必须根据事物去识别事物，根据人去了解人，使教化由近及远，道理从简略趋向详明，那么聪明人就会献上通达的见解，有才能的人就会使出他的才能，这些都是来源于此的。因此唐尧虞舜考察古代，建立官职只有一百个，而凡是邦士、邦教这些专职人员，司农、司寇这些官员，无不掌管各自范围的赋税，修订各自的制度，过问各自的军事，致使粮食充足、财货畅通而远方部族表示归服，这是夏、商、周三代在管理官吏、修订法规方面的成功验证。汉朝、唐朝在职官制度方面，渐渐地失去了上古的传统，而所有的钱粮工作都有专职负责，品德、刑罚的教化工作也都有专职负责，专职人员无不控制着财政收支，修明着礼制，约束着军队，所以发展了农业生产，抑制了工商活动，远近都表示顺从，这是夏、商、周以后的历代修订法规、管理官吏方面的明确验证。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确定了我朝的风尚，而创立法度、任用人才上追唐尧虞舜的楷模，取得了诸多光辉的成绩，而建立制度远远超过汉朝、唐朝。陛下弘扬优良传统而全面实施，这真是建立长治久安的态势，道德都高过许多君主；建成长治久安的政体，而美名播扬于海外。

臣下我跪拜敬读皇上制策中说：年代长久了，玩忽懈怠就容易产生；懈怠久了，初衷就会逐渐丧失掉。但对于臣下的风气、国家的赋用、养兵备战、革弊惩奸这些政事，仍然保持着警觉戒惧。臣下我私下考虑：君主能驾驭臣民，是有法规的作用。把标准定得很高，逐渐积累才能达到，用它来考核督察官员的政绩，侥幸的思想就不会萌生，因而培植起奖励恬淡的教化就特别完美了。但是世风未见好转，靠什么去勉励呢？只管把实事求是地考核贤能作为要务，具有一种才

干的人就得到一个相应的职位，具有一种能力的人就从事一种相应的工作，相互退让就自动产生出来了。君主赖以养士的，是俸禄。颁给丰厚的俸禄，以此表彰品德高尚的官吏，非份之想就不会产生，因而形成养廉的道德风尚就特完善了。但是士风未见好转，靠什么去勉励呢？只有把贵义贱利放在第一位，从而看见贤能却不居其上，受禄不超过应有的份额，大官守法、小官廉洁就自动显现出来了。

至于赋税的数额，由于勉强民众服从自己是很难做到的，而抑制自己服从臣民却是容易做到的，所以汉朝的制度规定：大司农掌管全国的田赋收入，少府掌管山泽的税款；国家用兵、祭祀，费用由大司农从田赋中开支，而供养国君、赏赐臣民的费用，都由少府从山泽税款中开支。这是不因国库储藏而减少宫廷的用度，不以民力去供应浮奢的费用，既使国库与皇帝私库公私分明，又体现正常的治理途径，这就表明欲使民众与赋税互相得利的唯一有效措施在于节约政府开支而已。至于农业、商业的政策，由于提倡农业而压制商业是难于做到的，借商业促进农业却是易于做到的，所以我朝初年的制度是：商人耕种边疆田地，由管理盐务的官吏向他们颁发在关中销盐的许可证；边疆的物资储藏，有赖于这些商人，从而利用山海开矿煮盐，把盐业的利益极大地开发出来了。这是因为不必由于屯田而使吏卒受苦，不必由于赋税而困扰内地，既提倡了农业，又治理了盐铁事务，这就表明欲使屯田与盐政相辅相成的有效策略在于重视农业而已。

然而筹集兵饷方面真的没有办法了吗？汉朝实行农民定期轮流服兵役的制度，唐朝实行兵农合一式的府兵制度，所以当时很少通过水道运送粮饷，那是一种什么情形啊！自从变为羽林军、旷骑的选充，于是到后来就有养兵的开支。所以只有淘汰我们军队中的老弱兵卒，选取农民中的强壮者入伍，让他们在无战事期间自耕自食，战争期间自行解决粮草器械，如此则寓兵于乡间，集结于城下，兵饷筹集问题就可以不必忧虑了。现在招抚封赏果真没有良策了吗？汉武帝断绝与匈奴的和亲关系，唐太宗废弃与东突厥的渭桥盟约，当时中国的强盛，又是一种什么情形啊！自从夹杂进请求结好，联为姻亲的主张，于是国家就出现了不作防备的忧患。所以必须摒弃对方的甜

言蜜语，紧急加以防御，做到攻打对方不会引起对方的大举侵扰，通过盟约约束对方但又不被对方所欺骗。这样虽然一时费事，但是将获得长期安宁，一劳而永逸。可见实行招抚封赏是不足为虑的。

所谓全面考核官吏，是指君主根据官吏的职责考核他的成绩，臣子们恪尽职守去完成自己的任务。那些有才能的官吏，必须具有政绩才确认他具有才能；那些廉洁的官吏，必须具有事迹才确认他廉洁。然后就可以实现官吏尽职尽责而诸事办理妥贴的局面。所谓正确地施行处罚，是指控制好奖赏与惩罚来勉励臣民顺从，严格执行刑罚来震慑臣民不安份的举动。从而使遵从皇上教化的臣民既可以得到治理又不可以作乱，使那些不服从皇上教化的臣民也会自重而害怕触犯法规。然后就可以上下和顺，形成良好的风气。所以在皇上那里具有体统加以整肃，而励精辅政，各个臣僚又有相互勉励的行动，就可以使四方少数民族归服，天下顺从，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求得帝王之道的开端而扶正那根本啊！具有规章制度，先在前面加以振刷，而大臣守法，小臣廉洁，文武百官都有勤勉督促的职守，就会教化普遍推行开，百姓的生计得到解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顺应风气的改变而运用灵活的施政方法啊！

除了回答这次诏令指定的问题之外，臣下我还另有一个想法要献给皇上：朝廷，是天下的统帅；道德，是政治的端绪，希望陛下对此格外重视。昭明前人的光辉业绩而仿效他们的制度，就有办法恭敬地承受他们的福佑。然而鉴于时势所趋，就不必照搬他们的法规，不必保守他们的习惯，尤其应该具有妥善治理的对策。观察臣民的性情而实行相应的治国大纲，就有办法给天下万物施布恩泽，然而对于关系到条规的事情，就应该用强硬的手段来处置，用刚健的态度来决断，尤其应该具有挽救时弊的措施，这就实现最完善的治理状态了。臣下我愚昧而不知该如何忌讳，冒犯了皇上的尊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侯真平译〕

明思宗崇祯七年(1634)甲戌科

会试试题

四书义

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

国有道,其言足以兴。

殿试策问

[崇祯七年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所与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今士习不端,欲速见小。兹欲正士习以复道,何术而可?东虏本我属夷,地窄人寡,一旦称兵犯顺而三韩不守,其故何与?目今三协以及登津等处,各有重兵防东也。敌不灭,兵不可撤,饷不可减。今欲灭敌恢疆,何策而效?且流寇久蔓,钱粮阙额,言者不体国计,每欲蠲减。民为邦本,朝廷岂不知之,岂不恤之?但欲恤民,又欲赡军,何道可能两济?即屯田盐法,诚生财之原,屡经条议申饬,不见实效,其故何与?至于漕粮为三军续命,马匹为战阵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额,其道何复?今虽东虏猖獗,河套有可复之机,边外尽可作之事。但难于东虏窥伺,朝野匮乏,近降夷继至,作何安插?插套连合,作何间破?流贼渐逸鄜广,海寇时扰浙闽,剿灭不速,民难未已,兼之水旱频仍,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为中书令、枢密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高皇帝曾以直厅为布政,典史为佥都,今奈何牢不可破?尔多士留心世务久矣,其逐款对答毋讳。朕将亲览焉。

会试试题译文

四书义

他对待自己时是谦虚的，服事君主时是谨慎恪守职责的，教养民众时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役使民众时是以适宜为根据的。

把民众从水深火热的暴政中解救出来，只是杀掉那残害民众的暴君罢了。

如果国家政治清明，君子的言论就足以唤起在位的君主与众臣。

殿试策问译文

皇帝的制策说：朝廷所要和他们共同治理天下的人，正是那些读书人啊！但目前读书人的风气却不端正，私欲很强烈又见识很短浅。如今打算端正读书人的风气，用来恢复古代的行为准则，通过什么方法就会达到这一目的呢？东部满洲部族本来是隶属我朝的部族，地盘窄小，人口稀少，可一旦组织起军队，进攻自己原本归顺的皇朝，朝鲜一带就守护不住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目前广宁相互策应的三卫以及登州和天津卫等处，分别驻有重兵来防备东部啊！敌方不消灭，军队就没办法撤下来，军饷也没办法减少。如今打算消灭敌方，拓展疆域，采用什么计策就能生效呢？况且四处流窜的贼寇长期蔓延，朝廷钱粮不够用，而议政的人却不体谅国家的财政需要，常常主张免除或减轻赋税征收。老百姓是国家的根基，朝廷怎么不了解这一点，又哪里不体恤他们呢？只是既想体恤民众，又想供应军队，采用什么措施就能在这两方面都处理得很妥当呢？就像屯田和盐法，确实属于增长财富的本原，可多次经过逐条议定又反复加以申明戒饬，却看不到实际效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至于从水道运到京师的粮食属于三军性命得以延续的东西，马匹属于布阵交战紧迫需要的东西，可三扣两扣，上账拖欠，于是就不足原定的数额了，采用什么办法就能把它们弥补上呢？如今尽管东部满洲部族很猖獗，但辽河河套地带存在着可以收复的机会，边境外部到处都有可以振兴的事情。只是在东部满洲部族找到机会就入侵而朝廷与民间又财物都很困乏上造成难办的地方，近

来归降的部族一个接一个来到,又该怎样做出安顿呢?交错分布在辽河河套地带的各个部族又抱成一团,该对它们怎样离间破除呢?四处流窜的贼寇渐渐奔到了郧阳一带,海上倭寇又经常骚扰浙江福建地区,围剿歼灭要是不迅速,百姓的祸难就停不下来,再加上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各个直接归中央辖领的省区突发的事变也很多。究竟该怎样予以挽回和消弭呢?再者,唐朝和宋朝曾经任命武将充任掌管全国政务的中书令或统辖全国军队的枢密使,看来文臣与武将似乎不是区分得特明显。我们的太祖高皇帝也曾任命守厅的军将充当辖领一省的布政使,任命掌管一县治安的典史充当负责监察的朝廷佥都御史。如今为什么文武之分就牢不可破呢?你们这些读书人留心社会上的事务已经时间很长了,要逐条逐项地做出对答,不要有什么忌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刘理顺　殿试对策

刘理顺(1581～1644)　字复礼,河南杞县人。万历间中举,参加过十次会试,至崇祯七年(1634)始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南京国子监司业、左中允、右谕德,入侍经筵兼东宫讲官。对座师首辅温体仁不徇私情,也不依附其他权臣,十一年六、七月间因反对杨嗣昌入阁而罢官。十二年春,见清兵陷畿内、山东七十余城,上疏建议鼓士气、恤贫民、选良吏、确定军期、赏罚守信用、招抚胁从等。十六年,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自缢而死。

臣对:臣闻帝王之弘先绪而隆大业也,必其君以实事课其臣,而后分猷佐理,有百度维新之象;必其臣以实心效于君,而后政修事举,成一人垂拱之休。何谓实事?因职以察其能是也。人不必问崇卑,局不必分内外,而惟以职察其能。贤者有以见长,庸者无以覆短,殿最迥若苍素,而国家因以有纪纲。何谓实心?尽忠以致其身是也。事不必问难易,时不必问顺逆,而惟以忠致其身。智者无不竭之才,勇者无不殚之力,忠贞笃于堂陛,而人心乃以有分谊。盖有实心,方能措

实事；而课实事，正以求实心。唐虞三代之所以熙庶绩而联一德者，此其道也。第国家当平治之日，法令未弛，而振举之极易，然防微杜渐，圣人犹有忧焉。盖以为易而狃之者，治之所自隳也。国家承熙洽之后，情俗日偷，而整顿之颇难，然拯溺济否，圣人必且劳焉。盖不以为难而诿之者，治之所日茂也。慨然以用贤图治为己任者，真大有为之君，而尧舜亲见，政在今矣。

钦惟皇帝陛下，刚健中正之咸备，聪明睿知以有临。念念敬天出王，游衍罔怠；事事率祖上下，陟降惟勤。重农事而躬行耕藉，轻徭薄赋，不必陈《七月》之风；勤问学而身亲讲幄，日就月将，非徒穷二酉之秘。建中和之极，兼总条贯，五百年金声玉振从而弥光；一后先之揆，远溯渊源，十六字帝典王谟掺之有要。允矣，太平天子！卓哉，至道圣人！固已六五帝而四三王矣。乃圣不自圣，谦而又谦，进臣等于廷，悉以咨之。首推唐虞知人安民之谟，仰追二祖因才器使之方，以及九边之若何靖安，群寇之若何扑灭，兵饷之若何通融，军民之交相利赖，屯盐之欲复其旧，漕马之必循其原，而归于破格用人，以臻康乂。大哉王言！真所谓讦谟定命，远犹辰告也。草茅之士郁积久矣，敢不倾沥对扬，摅其葵藿，以副明问也乎！

臣闻国家之与治者，人也。有人则天下治，无人则天下忧。人材之效用于国家者，非一途也。任得其人则无不治，用违其人则无不扰。尧舜之如天好生，浚哲文明，称极仁极智矣。而陈谟矢训，拳拳于知人以安民者，则转移天下之要枢，固不出于明明扬侧陋之外矣。

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成祖文皇帝载靖邦家，孜孜访求贤才，以图治理。令内外诸司各举所知，责成吏部甄别贤否，因材授职。都察院考察核实。六部勿轻调，藩臬选贤能，守牧须久任。何其用之殷，责之专，而虑之远也！创业垂统，绥奠斯民，与勋、华无异轨矣！列圣丕承，奕叶重熙。盖二祖以尧舜之心为心，故都俞赓于堂帘；列圣又以二祖之心为心，故拊髀兴于梦寐。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者，非偶然之故也。

我皇上求贤若渴，用人不次，谓宜麟游于郊，凤翔于邑。协和风动之域，乃数年满洲窥伺于东，俺答挟要于西，盗寇之蔓延无已，氓庶

之征调未息。金瓯全盛之天下,而有捉襟露肘之形,固宜有以烦圣虑也。噫嘻!此孰非士大夫事?而不肯抒忠宣力为国家戡定之绩,此殊不可解也。夫四民之中,士为首;磨砺之术,士为先。离经叛道者黜而经术重,巧躐速化者摈而德行出,士心定而后天下之治可次第而言也。

关东夷狄之人,羁縻无术,遂致披猖。一坏于四路之轻人而开铁陷,再坏于经抚之易局而辽沈危,三坏于战守之争执而广宁弃,辽东胡人视我为可乘耳。诚以守为战,反客为主,夜郎之疆不及汉大,未见长缨之不可请也。流寇本我穷民,积渐不已,遂至蹂躏。一穷于倚山之为固而窟未易清,再穷于各省观望而权不归一,三穷于移徙之无常而突不可御。非寇不可除,我无以除之耳。诚师出以律,有进无退,鼠窥狗偷假息旬余,未见一鼓之不可散也。

兵诚不可撤矣,今日定营制,明日更营制,而兵终无一定之数,则老弱之不汰可乎?训练则鹅鹳成行,鼓舞则风鹤助劲,请以精之说易其撤,可矣。饷诚不可减矣,今日请额例,明日请压欠,而饷终无报足之期,则虚冒之不核可乎?守则四知之常严,侵则一钱之罔贷,请以核之说易其减,可矣。

阡陌未常不垦也,咸龉未常不煮也。自抽屯补伍而耕种无人,自贵戚乞讨而耕种无地,自商不输银而开中之法坏,自盐壅于公复壅于私而度支之用窘,则修屯政以复盐法者,不可以条议为塞责也。舟楫非不时往来也,验烙非不时申饬也。自雨旸失序而漂滞可虞,自包揽公行而弁蠹莫问,自食之不必尽其力而云锦之色以减,自策之不能过其材而驰驱之则罔闲,则通漕粮而修马政者,不可以奉行为尽职也。

果韩、白之登坛,何受降之城不可筑?果刘、陈之持筹,何东南之赋不可蠲?果郭、李之在边,何豢饵者不可成臂指之用?果龚、虞之治郡,何窃发者不可成绥定之功?故天下不患多事,而患人之莫肩其任也;不患无人,而患用之莫究其施也。如必门第以取士,停年以用人,虽无双之国士,终受抑于胯下矣。官人惟贤之义,不如是也。豪杰特出之资,其可拘滞欤?如必一眚为大德之掩,寸朽有合抱之弃,虽三败之孟明,无收功于焚舟矣。使人以器之义,不如是也。铅刀一割之有,

其可不珍惜欤？常诵高皇帝谕群臣用人之道曰：材大者当重任之，材小者当轻任之。又曰：凡事勤则治，怠则废。贤人君子尽心如此，岂有废事？盖所谓用人而又以课人，用者抒其约结欲伸之气，而课者作其寅亮笃棐之忠也。

抑臣更有进焉：《书》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君臣固交任之者也，则提纲挈领，合群策群力，而乂安一世，是在皇上之一奖率间耳。臣草茅新进，干渎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臣下我对答：臣下我听说，帝王弘扬祖先的端绪而兴盛大业，必定是要君主用实际政事去督促自己的臣子，然后臣子分别谋划，协助治理，出现百事更新的局面；必定是要臣子用实在心念为自己的君主效力，然后朝政得到修明，众事得以落实，形成帝王无为而治的美好政局。什么叫做实际政事？就是根据臣子的职务而审察他们的能力。对于臣子不必问地位高低，所在部门不必分内外，而只根据职务审察其能力。贤者因此显现优点，庸庸碌碌者没办法掩盖其缺点，谁属第一，谁属最末，迥然分明如黑白，而国家因此具有法度。什么叫做实在的心念？就是为君主尽忠而到了愿意献身的地步。臣子对于政务不必问难易，对于时运不必问顺逆，而只凭忠诚奉献自身。智者无不竭尽其才，勇者无不倾尽其力，忠贞全都扑在朝廷上，而人们才会具有做好本职工作的责任感。由于具有实在的心念，才会去处理实际的政事，而督察实际政事，正是去求取到实在的心念。尧、舜和夏商周三代之所以众多功业都能完成而君臣同心同德，就是因为实行了这种方法。但是国家太平时期，法令尚未松弛，而振作推行开是极其容易的，不过基于防微杜渐的需要，圣人仍有忧虑。因为振作容易就可能习以为常，这是治理会自行毁败的因素。国家承接清明和乐之后，世情风俗日益浇薄，而整顿是颇为困难的，不过对于拯救沉溺，渡过难关，圣人必将会操劳。因为不视为难事而不推诿，这是治理日益兴盛的因素。慨然把用贤图治作为自己的责任，真是大有作为的君主，而孟子所讲的大禹、皋陶

所亲眼看见的尧舜治绩，正在今天重现了。

万分恭敬地想来，皇帝陛下刚健中正全都具备，聪明睿智足以君临天下，一心一意敬奉天命，拿出王道措施，夙夜工作不怠惰；事事遵循祖训处理，视察各地很勤快。重视农业生产而亲自主持藉田耕作的仪式，轻徭薄赋，民间不必再发出《诗经·七月》的哀怨；勤于学问而聆听经筵讲官讲解经书，日积月累，不只是穷尽秘藏的图书。树立中庸之道的准则，汇总梳理，从而使孔子在周文王五百年以后集大成的学说更加光明。继承先圣后圣阐发的道理，远溯渊源，对《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帝王心治大法掌握要领。多么令臣民们信服啊，真是使天下太平的天子！多么卓绝啊，真是具备最高道德的圣人！本来已经和五帝三王相并列了，可是不以圣人自居，谦逊又谦逊，把臣下我等人宣召到殿廷，全面征求治国方略。首先表达对尧舜知人安民遗训的推崇，追慕太祖、成祖因才能而用人的方法，以及边疆如何平安，农民军如何扑灭，兵饷如何筹集，军民的互利互赖，屯田、盐政的恢复旧制，漕运、马政的必定遵循本原，又归结到破格用人，以实现安康。这是说得多么好的君主之言啊！真真就像《诗经·大雅·抑》所吟诵的那样：大计确定国运，远谋按时宣告。臣下我作为民间士子，心中的话语已经郁积很久了，岂敢不倾吐对答，表达我那葵花向阳的忠心，以符合皇上询问的意旨呢！

臣下我听说，参政治理国家的是人，有人就天下大治，无人就天下可忧；人才为国家效力并非只有一个途径，只要任用得人就没有得不到治理的，用非其人就没有不扰乱朝政的。尧舜像上天一样爱惜生灵，深谋大智，文雅光明，被人视为极仁极智，可是陈奏谋略，宣布训令，都关注着知人安民问题，这表明凡是想要掌握天下关键所在的，本来就不外于举荐贤明，选拔被埋没的人才。

太祖高皇帝创立我朝，成祖文皇帝再次安定国家，孜孜访求贤才，谋求治理，命令中央、地方官府各自举荐所知的人才，责成吏部甄别贤能与庸劣，因材授职。都察院考察核实，六部不可随意调离，布政使、按察使之类官员必须选用贤能来担任，府州县长官的

任期必须长久。太祖、成祖选用的贤才何其众多，职责何其分明，考虑又是何其深远啊！太祖、成祖创立基业，给后代留下皇统，安定民众，都与尧舜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啊！我朝后来的列祖列宗继承大业，世代都加以发扬光大。这是因为太祖、成祖把尧舜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所以君臣和洽的局面在朝廷上重现；后来的列祖列宗又把太祖，成祖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所以在梦寐中都拍大腿想获得贤才。我朝二百六十年治安如一日，并非出自偶然的缘故。

我皇上求贤若渴，用人不论资排辈，可以说是麒麟游于近郊，凤凰翔于都城上空了。然而在协和而又闻风响应的寰宇内，近几年满洲人在东方窥伺，鞑靼人俺答在西方要挟，农民军蔓延无已，民众的征调未能停止。原先巩固而又兴盛的天下，却有捉襟见肘的迹象，这当然会加重皇上的心事。哎！这些事哪一桩不是士大夫们份内的事呢？可是士大夫们却不肯竭忠尽力促成国家平定叛乱的功业，令人非常不可理解。士、农、工、商之中，士占首位；修养心志，士为榜样。如果离经叛道者受贬斥，那么儒术就会受到尊重；如果投机取巧者被唾弃，那么道德高尚者就会出现。读书人的志向稳定下来以后，天下之治才有可能依次讲论。

山海关以东的满洲人，由于我们羁縻无术，所以发展到猖獗的地步。我们一败于万历四十七年兵分四路轻率深入而开原、铁岭失陷，再败于泰昌元年十月以袁应泰取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而导致天启元年三月沈阳、辽阳失守，三败于广宁巡抚王化贞反对再任的辽东经略熊廷弼集中兵力防守的主张而导致广宁、义州等山海关以东土地于天启二年初全部丧失，从而使辽东满洲人视我朝廷为有机可乘。如果真的采纳以守为攻、反客为主的战略，夜郎国的疆域不如汉朝广大，所以不见得我们不能平定辽东。造反的农民军原是朝廷的贫民，逐渐形成，发展壮大，于是到了蹂躏万里的地步。朝廷首先是对他们倚山顽抗而大本营难于扫清没有办法，其次是对各省官吏相互观望而兵权不能统一没有办法，第三是对农民军流动无常而往往突然出现难于防御没有办法。并非起义军不能够扫除，而是我

们没有良策扫除他们。如果我们真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出征的军队，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那么对于这些鼠窃狗盗一样的农民军，即使让他们喘息十几天，也不见得不可以一鼓作气击溃他们。

军队确实不可以后撤了，但是今日定编制，明日又改编制，致使部队始终没有固定的数额，那么老弱残卒不淘汰能行吗!练兵时军阵严整，击鼓进军时就会相互助威。所以臣下我请求以精兵方针代替撤军主张，是可行的了。兵饷确实不可削减了，但是今日申请发放应发的兵饷，明日又申请发放扣压拖欠的兵饷，而兵饷就始终没有报告充足的日期，那么对于虚报冒领行为不进行查核能行吗?守护兵饷总是严格要求在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情况下也廉洁自持，侵盗一个铜板也不饶恕。臣下我请求以查核兵饷使用情况的办法代替削减兵饷的主张，是可行的了。

田地实际上未尝没有得到垦辟，食盐未尝没有生产，自从抽调军屯士兵补充战斗队伍而耕种乏人，自从贵戚乞请赐田催索债务而百姓耕种无地，自从商人不向官府交纳税银而商人运粮至边塞以换取食盐运销权制度遭到破坏，自从国家与私商的盐利相继受损而户部的财政支出就很窘迫，那么整顿屯田制度与恢复盐法，不可以用几道奏疏来敷衍塞责。漕运的船只并不是不按时往来，验收马匹的制度也不是不经常整顿，自从水旱无常而船只被冲走或开动不起来便令人担忧，自从包揽漕运的行为公然盛行而对官吏的贪污行为不予惩治，自从享用漕粮不必为朝廷尽力，而漕运的规模气象大为逊色；自从赶马做验核不能达到标准，而训养马匹的规定都不熟悉了。那么整顿漕运、马政不可仅把照例行事看成是尽职。

如果真的让汉朝韩信、战国白起这样的将领登坛当统帅，那么什么样的受降城不可以筑成?如果真的让唐朝刘晏、北宋陈知微这样的理财家主持财政，那么什么样的东南地区的赋税不可以蠲免?如果真的让唐朝郭子仪、李光弼这样的良将戍守边防，那么什么样的部族不可服从指挥?如果真的让汉朝龚遂、宋朝虞宾这样的循吏治理地方，那么什么样的动乱不可变成安定一方的功绩?所以不用忧虑天下多事，只应忧虑臣子胜任不了职务；不用忧虑没有人才，

只应忧虑用人时不能完全施展他的才干。如果坚持按门第选官，凭资历用人，即使是天下无双的人才，到最后也像韩信当初蒙受胯下之辱那样被压制。选拔官吏只任用贤才的义旨，原本并不是这样的。对于具有突出资质的人才，哪能够让他们受压制呢?如果一定因有小过失而掩盖其人的高尚德行，因有小面积腐烂而抛弃大树，那么春秋时期接连打败仗的秦国将领孟明视，就无法最终取得战胜晋国的辉煌战果。任用人才按照他的特长来办的义旨，原本也不是这样的。虽然愚钝而仍有一点长处的人，哪能不予珍惜呢?臣下我曾经读过太祖高皇帝诫谕群臣关于用人之道时说过的话：材大者应当重用他，材小者应当轻任他。又说：凡事勤奋就会得到治理，懈怠就会荒废。贤人君子像这样来竭尽心力，哪里还有荒废的政事呢?太祖的这两则诫谕其实是在讲既用人又督促人去做好工作，用人就要让人抒发出郁闷欲伸的心气，督促人就是要培养他们信奉天地、辅助君主的忠心。

此外臣下我另有所献：《尚书·大禹谟》说：君主能够付出艰辛，他才够得上君主；臣子能够付出艰辛，他才够得上臣子。这表明君主和臣子本来就是相互联在一起的，那么要提纲挈领，就应当群策群力，保住一代平安，这完全取决于皇上的奖诱和做出表率罢了。臣下我刚从民间步入仕途，冒犯了皇上的尊严，简直恐惧到极点，死罪死罪!臣下我恭谨地对答如上。〔侯真平译〕

明代进士科殿试策题辑存

(已入前编者不录)

1. 明太祖洪武二十一年(1388)戊辰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事神之道,志人之心,莫不同焉。虽然,始古至今凡所祀事,必因所以而乃祀焉。然圣贤之制礼有等杀,自天子至于臣民,祭礼之名,分限之定,其来远矣。其主祭者,又非一人。然而笃于敬者甚多有,且信且疑者亦广甚,于不信而但应故事者无限。所以昔人有云: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朕未知其必然,尔诸文士陈其所以,朕将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事奉神灵的原则与方法,用来虔诚地表达出世人的心愿,这是任何时代都相同的。尽管如此,由古代到当今所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必定根据既定的目的才进行祭祀呢!然而圣人贤人制定礼仪具有等级规格的递次缩减,从天子一直到臣僚与平民,祭礼的名称和规模级别的确定,由来是非常久远的了。具体主持祭祀的人,也不光是一种人。然而在虔敬上特用心的人相当多,半信半疑的人也多得很,根本就不信而只是照惯例装装样子走过场的人更不计其数。所以古人就说过这样的话:真能保持礼仪动作规范的人就召来吉福,不能保持而毁败礼仪动作规范的人就自取祸殃。皇帝我还不清楚结果必定会不会如此,你们这些文士陈述一番那理由,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 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辛未科

〔三月十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昔列圣之相继,大一统而驭宇,立纲陈纪,礼乐昭明,当垂衣以治,何自弗宁,少壮尽行,内骚华夏,外戍八荒,牝马胎驹于行伍,旌旗连岁于边陲!此果好杀而有此欤,抑蛮貊欲窥而若是欤?观之往事,亦甚艰矣。今欲罢乘机,绝远戍,垂衣以治,又恐蛮貊生齿之繁,不数十年后为中国患。当此之际,

似乎失今可乘之机,岂不为限?今兴止未判,其于乘机绝戍,孰可孰不可?尔诸文士论之,以妥内外。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从前各位圣明帝王一个接一个兴起,统一整个天下而驾驭寰宇,确立并张布开国家的法度纲纪,礼仪和乐舞明显得到昭示,应当稳稳坐在那里去施行治理,为什么不自行安宁,偏要年轻人和壮年人都去打仗,在内部搅得华夏动荡不安,在外部戍守八方边际,使母马在军队中怀胎产驹,让旌旗在边疆沿线连年飘扬呢?这果真是喜好残杀才有这番举动吗?还是由于少数部族想伺机内侵才必须这样做呢?观看古代的事例,也真太艰难了。如今打算放弃乘胜追击的时机,撤销远方的防卫,稳稳坐在那里去施行治理,可又担心少数部族人口繁衍,在不到数十年以后便成为中原地区的祸患。在目前这个时候,似乎丧失掉现今可以乘胜追击的时机,还不构成自己束缚住自己吗?如今兴兵进击和停止用兵还没做出最后的决定来,在乘胜追击和撤销防卫上,哪种做法可行又哪种做法不可行呢?你们这些文士论说这个问题,以便安定住国家内部和外部。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 明太祖洪武二十七年(1394)甲戌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昔列圣之驭宇也,其立纲陈纪皆精思远虑,至当无疵,著为典章,垂法万世。夫何历代创业之君于革命之际,必有损益?果前代立法有未善欤,抑时君乐于更张而有损益欤?尔诸文士,当立志之秋,正宜讲此。其悉陈之,朕将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从前各位圣明的帝王驾驭天下,在确立和张布开国家的法度纲纪上全都精详思索又做长远的考虑,极为恰切而没有毛病,明晰地勒定成重大典制,给千秋万代留下法式。可为什么各个朝代创建基业的君主在取代前朝以后,必定要有减损和增益呢?果真是前朝在定立法度上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吗?还是当时的君主喜欢

进行变更而有减损和增益呢?你们这些文士正值确立志向的时候,正应当讲论这一问题。要详尽地陈述它,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 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朕闻古之造理之士,务欲助君,志在行道,受君之赐而民供之。所以操此心,固此志,以待时机之来,张君之德,布君之仁,补其不足而节有余,妥苍生于市野。于斯之士,古至于今,历代有之,载之方册,昭如日月,流名千万世不磨。朕自为王为帝三十四年,尚昧于政事,岂不思古而然欤,抑志士之难见欤?诸生敷陈其道,朕亲览焉。

〔六月初一日,策试下第举人〕制策曰:天生烝民有欲,必命君以主之。君奉天命,必明教化以导民。然生齿之烦,人情不一,于是古先哲王设五刑以弼五教,善者旌之,恶者绳之。善恶有所劝惩,治道由斯而兴,历代相因,未尝改也。朕承天命,君主生民,宵衣旰食三十余年,储思积虑,惟欲妥安生民。其不循教者亦有,由是不得已施之五刑。今欲民自不犯,抑别有其术欤?尔诸文士,陈其所以,朕将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古代深明事理的士子,只想协助君主,志向在于践行大道,禀受君主的恩赐而百姓供养他们。所以就持定这种心愿,坚定这种志向,用来等待时机的降临,弘扬君主的德业,播布君主的仁恩,弥补那不足又节制那多余的部分,把黎民百姓安定在集市和田野上。在这上面用力的士子,从古到今,每个朝代全都涌现过,被记载在史册上,明亮得就如同太阳和月亮,美名流布而永远磨灭不了。皇帝我自从成为吴王又成为大明朝的皇帝,已经三十四年了,可仍对政事闹不清楚,这难道是不去追思古代才造成这样的吗?还是怀有志向的士子很难遇见呢?你们这些考生要广泛地陈述那具体的做法,皇帝我要亲自加以观阅。

皇帝的策问说:皇天降生下众百姓,个个都有欲望,必定要命令君主去统领他们。君主承奉皇天的命令,必定要宣明教化来引导民众。然而人口是那样地众多,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于是古代的圣

明帝王就设立割鼻、刺面等五种刑罚用来辅助人伦纲常的五种教化，良善的人就表彰他，邪恶的人就惩治他。良善与邪恶有该进行鼓励和让人引为教训的东西，治国大道由此而兴起，各个朝代都递相这样做，未尝改变过呀！皇帝我承奉到皇天的命令，作为众百姓的君主，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已经三十多年了。思索一层又一层，考虑翻过来又掉过去，只想安定住众百姓。但拒不服从教化的人也存在，由此不得已对他们施用五种刑罚。如今希望百姓自动就不触犯法律，恐怕还有别的治理方法吧？你们这些文士要陈述那理由，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5. 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甲申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朕闻圣人之治天下，明于天之经，察于地之义，周于万物之务，其道贯古今而不易也。是故黄帝尧舜，统承先圣，垂衣而治，神化宜民，朕惟欲探其精微之蕴。历象、《禹贡》、《洪范》载于《书》，大衍、《河图》、《洛书》著于《易》，古今异说，朕惟欲致其合一之归。兴学有法，立贤无方，而古今异制，朕惟欲通其所以教育，参其所以明扬。古者礼乐皆有书，今《仪礼》、《曲礼》、《周礼》仅存而乐书阙焉，朕惟欲考《三礼》之文，补乐书之缺，定黄锺之律，极制作之盛。皆圣人治道，所当论也。咨尔多士，承朕皇考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作新余四十年，必知务明体适用之学，敷纳于编，朕亲考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圣人治理天下，明了那皇天的准则，察识那大地的规范，遍及那万物该下力量的地方，这种大道贯穿古今而固定不变啊！所以黄帝和唐尧虞舜，在统系上承接以前的圣人，稳稳坐定，施行治理，神妙化导，切合民众，皇帝我只想探究他们那精粹微妙的底蕴。观测天象推算岁时和《禹贡》、《洪范》都载录在《尚书》中，演算天地的数目与《河图》、《洛书》都显现在《易经》上，古今对它们的解说并不相同，皇帝我只想找出那完全一致的主旨来。兴办学校具有一定的方法，而选拔贤才却没有固定的框框，但古今在制度上

并不一样，皇帝我只想贯通那教育的法式，会综那举用贤才和识拔受压抑者的规则。古代礼仪乐舞都有专书，迄今仅仅流传下《仪礼》、《礼记》和《周礼》，乐舞方面的书籍已经失传了。皇帝我只想考校《三礼》的原文，填补乐舞书籍的空白，确定下黄钟等阴阳十二律的标准，把制定礼仪和创作乐舞的盛举推到顶峰。以上都属于圣人的治国大道的组成部分，是应当加以讲论的呀！你们这些众多的读书人，承受到皇帝我的父亲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的培养教育将近四十年了，一定懂得在深明主体又切合施用的学问上狠下气力，要把它们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要亲自考定优劣。

6. 明成祖永乐四年(1406)丙戌科

〔三月十二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朕承皇考太祖高皇帝洪业，舆图之广，生齿之繁，从古莫比。故穷发之地，咸为编户；雕题椎髻，悉化冠裳。来虽如归，而治虑未浹，朕夙夜惟念，期在雍熙。然十室之邑，人人教之且有弗及，矧天下之大，兆民之众！夫存神过化，不见其迹，欲臻其极，谅必有要，不明诸心，曷由远效？唐虞三代之治，其来尚矣。而汉唐宋之治，犹可指而言之。自夔典乐教胄子，而学校兴，而汉唐宋之学校有因革，其教化可得而闻？自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科目举，而汉唐宋之科目有异同，其名实可得而议？自小司徒经土地，而田制定，而汉唐宋之田制有屯营，其计画可得而言？自校人掌王马之政，而马政立，而汉唐宋之畜牧有耗息，其详悉可得而数？之数者，有宜于古而合于今，若何施而可以几治？夫政不稽古，则不足以验今；事不究迹，则无以见实。诸生博古以知今，明体以适用，陈其当否，以著于篇，毋从毋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先帝太祖高皇帝的盛大基业，疆域的广大和人口的众多，从古以来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的。所以生活在最北部的少数部族，全都成了国家户籍上登录的民众；聚居在最南端的少数部族，全都接受华夏文明的化导。前来归顺尽管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可治理还忧虑没有遍及到各个角落，皇帝我从早到晚在做

思考，期望能实现全天下一片和睦欢乐的局面。然而由十户人家组成的居民点，一个挨一个地教导他们也会存在没都教导好的情况，何况天下是那样地广大，民众是那样地众多呢！投注那神思，闪过就已化导好，根本不露出任何迹象来，渴望步入这种化导的最高境界，想来一定有那要领吧？不在内心特明彻，从哪里能在远方大见成效呢？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治理，那是由来已久的了。而汉朝、唐朝、宋朝的治理，仍然能够具体指明并加以评论。自从后夔在虞舜时掌管乐舞来教导贵族子弟，学校由此而兴起，但汉朝、唐朝、宋朝的学校存在着沿承与变革的地方，它们教育化导的情形可以让人听一听吗？自从西周的大司徒用六德、六行、六艺这三事来教化平民百姓，分科取士由此而兴行，但汉朝、唐朝、宋朝的分科取士存在着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对它们的科名与实际内容能够议论一番吗？自从西周的小司徒测量并划分土地，土地制度由此而定立起来，但汉朝、唐朝、宋朝的土地制度存在着屯田或营田的方式，它们所做的筹划安排能够讲述一番吗？自从西周的校人掌管王室马匹放牧的政事，养马政事由此而确立起来，但汉朝、唐朝、宋朝的放牧畜养存在着死亡与繁殖的区分，它们的详情能够列举一番吗？以上这几宗事体，有在古代很适宜又对当今很切合的，该怎样去施用就可以达到大治呢？政事不从古代那里做考察，就不足以在今天取得效验；事体不究明已往的迹象，就没办法看出实际来。你们这些考生通晓古代又了解当代，深明主体又切合施用，陈述以上问题的妥当与否之处，明晰地写在答卷上，不要夸夸其谈，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7. 明成祖永乐九年(1411)辛卯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永乐七年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朕承广大之业，抚鸿熙之运，临御以来，夙夜惕厉，博求至道，以弘治化。而谈者类曰：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又曰：礼乐为国之根本，刑政为国之辅助。稽之于古，伯夷典礼，后夔典乐，见于《书》者尚矣。至于三代损益，缘人情而制礼，谐五音以成乐，至周大备。浩乎其有本，粲乎其有文，可以睹其功德之盛。若夫汉兴，承秦之弊，叔孙习于绵

蘷，贾谊草具其仪，因循迁就，止于如此而已。唐因于隋，祖孝孙、房玄龄之流增益定制，太宗慨慕古典，拳拳于乙夜之读。虽河汾之派，而礼乐之问汗浃无对，使一代之典遂为阙文。宋初聂崇义、和峴之徒所定礼乐，大抵沿袭增损数世相承者。求者非一，然犹恨残缺，制作之方可谓难矣。汉唐宋之礼乐，大概若此，而其刑政犹可得而议。伊欲循古先王之法，以洽和天下，使刑罚清而奸慝革，政事昭而百姓宁，其道何由而可？先儒谓庠序为礼乐之原，其曰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今之教化，盖亦若是其备矣。然而士鲜大道之归，国靡实材之用，其故何欤？子诸生明先圣之道，博古以知今，具体以适用，于三代汉唐宋礼乐刑政之序，讲闻久矣。疏其得失，别其治否，有可裨益治道者，其详陈之，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继承广远宏大的帝业，顺应兴盛的时运，自从登上帝位以来，从早到晚保持警惕，广泛求取最高的治国大道，用来弘扬治理与教化。可谈论治国大道的人全都讲：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令这四个方面都顺利而不彼此违逆，称王天下的大道也就都包括在里面了。又说：礼仪乐舞属于国家的根本所在，刑罚政令属于国家的辅助手段。但从古代那里去做考察，虞舜时由伯夷掌管礼仪，由后夔负责乐舞，这在《尚书》中可以看到，已经时间特长了。至于夏商周三代递相做减损或增益，都是根据世人的情志来制定礼仪，调节好五种音阶来形成乐舞，到周朝时变得相当完备了。浩大具有那根本，鲜亮具有那细节规定，可以从中看出它那盛大的功德来。至于汉朝兴起，承接秦朝的衰落状态，叔孙通只对在野地里摆放礼仪用品很熟悉，贾谊粗略地拟定了具体的仪节，依照老样子效仿又凑合将就，也就达到这种程度罢了。唐朝承袭隋朝，由祖孝孙、房玄龄这批人增益旧有的规制，可唐太宗慨然仰慕古代的法式，对深夜还在读书一直特用心。即使是大儒士王通及其弟子们，对朝廷有关礼仪乐舞的询问也汗流浃背对答不出来，致使一代大典成为没有文字载述的东西。北宋初期由聂崇义、和峴那帮人制定的礼仪乐舞，基本上还是对好几个朝代递相沿用的那一套加以承袭，再做些减损与增益。搜求的对

象不是一两个，但仍使人对残缺不全感到遗憾，由此可以说制定创作成的方式方法也确实太难了。汉朝、唐朝、宋朝的礼仪乐舞大概也就这个样，然而它们的刑罚政令也仍有可以指出其不足的地方。如今打算循用古代圣帝明王的法度，来使天下和谐融洽，致使刑罚不使用而奸恶被铲除，政事特突出而百姓一片安宁，通过什么办法就能实现呢？古代的儒士认为各级学校是礼仪乐舞教化的本原，他们强调办好国家最高学府，用来在京师施行教育，设立地方学校，用来在城镇进行化导。现今的教育化导大致上也像这样地完备了。然而读书人对治国大道的宗旨还了解得很少，国家收不到真正人才的效用，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你们这些考生深明前代圣人的道法，通晓古代又了解当代，掌握了主体又切合施用，对夏商周三代和汉朝、唐朝、宋朝的礼仪乐舞与刑罚政令的序列已经闻知并讲论很长时间了。逐项列出它们的得失所在，辨明它们能否在今天取得治效，有对治国大道能起补益作用的东西，要详尽做陈述，不要隐讳而不讲出来，也不要讲出来却不恰切。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8. 明成祖永乐十三年(1415)乙未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朕惟帝王之治，本之于道德，而见之于事功。道德为致治之本，事功著致治之效。不推其本，何以为治？不臻其极，何以为效？是故民俗之厚在于明教化，吏治之举在于严课试，士风之振在于兴学校，人才之得在于慎选举，刑狱之平在于谨法律。是数者，皆为治之先务。唐虞三代之盛，率由于此。而其道德之所施，事功之所成，亦必有其要者矣。三代而下，论治之盛者曰汉曰唐曰宋。举其概而论之，渊默清净，则躬履俭朴矣；约己治人，则力于为善矣；恭俭仁恕，则修己无为矣。其所以为教化者何如？举殿最而察以六条，考善最而差以九等，著能否而辨以三科，其所以为课试者何如？表章《六经》而劝学兴礼，锐情经术而文治勃兴，讲学多闻而崇儒重道，其所以为兴学校者何如？四科四行之辟，六科四事之选，三经十科之制，其所以为选举者何如？作三章、九章以明其禁，为律、令、格、式以准其法，定《刑统》、编敕以新其制，其所以为法

律者何如?夫循名而实可见,究迹而治可推,即道德以较夫事功,其高下优劣,盖亦有可辨者矣。朕祇奉天命,统承太祖高皇帝鸿业,临阼以来夙夜孜孜,以图至治,亦惟取法于唐虞三代,舍汉唐宋而不为矣。然于是数者,犹未臻其效。子诸生抱经济之学,博古以知今,明体而适用。其敷陈当否,疏其所以化成于天下者若何,而可以臻夫唐虞三代之盛。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帝王的治理依据那道德,而在事业和功绩上显现出来。道德属于实现大治的根本,事业和功绩显示出实现大治的成效。不推究那根本,凭什么去施行治理呢?不达到那极点,凭什么构成那成效呢?所以社会风气的淳厚在于宣明教化,官吏供职施政的兴盛局面在于强化考核验定,读书人风尚的振作在于兴办学校,人才的获得在于慎重对待选拔举用事宜,案件的公正审断在于谨慎使用法律。这几个方面都是施行治理的头等大事。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兴盛景象,都是由此而形成的。它们在道德上所施布的东西,在事业和功绩上所成就的事体,也一定有那要领的了。从夏商周三代以后,论起治理雄盛的朝代,该说那汉朝、唐朝和宋朝。列举它们的主要情况来做评论,有的崇尚深深沉默和清净无为,君主就亲自带头节俭朴素了;有的强调约束自己去治理世人,君主就在做善事上下大力气了;有的注重恭敬节俭和仁慈宽恕,君主就修养好自身,清静无为了。它们用来施行教化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呢?确定政绩属上等还是属下等,有的就拿六个方面的标准进行察辨;考核政绩谁第一,有的就区定成九个等级;表明能干与否,有的就用三个类别加以辨识。它们用来进行考核验定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呢?有的标揭显扬儒家《六经》,激励学习和兴起礼仪;有的锐意于儒家的治国方略,文治就蓬勃兴起;有的既讲论学问,扩大见闻,又崇尚儒士,重视大道。它们用来兴办学校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呢?有的按四种科目和四种品行进行征聘,有的按六种例行的科目和外貌等四个方面的情况进行选用,有的倡行三经科或按十种科目取士的制度。它们用来选取人才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呢?有的约法三章又扩充为九章,去宣明

本朝禁遏的罪恶行径;有的制定出律、令、格、式,去统一起本朝的法度;有的勒定成《刑统》以及各种敕令的汇编,去更新本朝的制度。它们用来施行法律的东西到底怎么样呢?按照名称,那实际就可以从中看出来;究明迹象,那治绩就可以从中推断出来,依据道德去验核事业与功绩,各自的高低优劣也差不多可以辨别出来了。皇帝我恭敬地承奉到皇天的命令,承接起太祖高皇帝的盛大基业,从登上帝位以来一直从早到晚勤勉不懈,谋求最美好的治理状态,也只是取法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舍弃汉朝、唐朝和宋朝而不去理睬它们的那套举措了。然而在以上几个方面,还没收到那成效。你们这些考生怀有经邦济民的学问,通晓古代又了解当代,深明主体又切合施用。要全面陈述那恰当与否的地方,逐项列出它们用来在天下形成教化的具体做法,确能步入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兴盛境地。把这一切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9. 明成祖永乐十六年(1418)戊戌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帝王之治天下,必有要道。昔之圣人,垂衣裳而天下治。唐虞之世,治道彰明,其命官咨牧,载之于《书》,有可见已。成周之官,倍蓰唐虞,备存《周礼》,其详得而数之。《周礼》,周公所作也,何若是之烦欤?较之唐虞之无为,盖有径庭,然其法度纪纲至为精密,可行于天下后世。何至秦而遂废?汉承秦弊,去周未远,可以复古,何故因仍其旧而不能变欤?唐因于隋,宋因五季,亦皆若是有可议者。人之恒言为治之道,在于一道德而同风俗。今天下之广,生齿之繁,彼疆此域之限隔,服食趋向之异宜,道德何由而一,风俗何由而同?子诸生于经史时务,讲之熟矣。凡有裨于治道,其详陈之,毋隐而不言,毋言而不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有切要的办法。从前的圣人稳稳坐在那里而天下却实现了大治。在唐尧虞舜时代,治国大道非常明晰,任命朝廷大臣,向地方长官做询问,这都载录在《尚书》中,确有能够看得出来的地方。成周的官吏,比唐尧虞舜时期多出好几

倍,这也完整地保存在《周礼》中,具体的数目能够数出来。《周礼》是周公制作的经典,为什么竟像这样地人多呢?同唐尧虞舜的无为而治比较起来,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然而他那法度纲纪却极其精详周密,可以在天下后世来行用。但为什么到了秦朝时就被废弃了呢?汉朝承接秦朝的衰败状态,距离周朝还不遥远,能够恢复古代的制度,可却为什么竟沿袭秦朝的那一套而不能予以变更呢?唐朝承袭隋朝,北宋承袭五代,也都像汉朝那样存在着可以非议的东西。人们经常说治国大道在于使道德一致,让社会风尚相同。如今天下是这样地广大,人口是这样地众多,那一疆土和这一区域被高山大河隔离开,穿用和饮食的习惯也目标不同,道德通过什么途径就能一致起来呢?社会风尚通过什么途径就能相同了呢?你们这些考生对经典、史籍以及当前的政事已经讲求得烂熟了。只要对治国大道具有补益作用的东西,就详尽地陈述它们,不要有什么隐讳而不讲出来,也不要讲出来却不恰切。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0. 明成祖永乐十九年(1421)辛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帝王之治天下,必有要道。粤自尧舜,至于文武,圣圣相传,曰执中,曰建中,曰建极。千万世帝王莫不守此,以为天下治。朕自莅祚以来,夙夜祗承,亦唯取法于唐虞三代。然而治效未臻其极者,何欤?意所谓中极之外,抑别有其说欤?且古今论治之盛者,于舜则曰无为,于武王则曰垂拱。稽之于《书》,舜命九官十二牧,敬天勤民,制礼作乐,敷教明刑,皆有事焉,安在其无为?武王大告《武成》之后,列爵分土,简贤任能,修五教,举三事,立信义,行宫赏,亦有为矣,安在其垂拱?朕今欲无为垂拱而治,舍舜、武将何所取法欤?诸生讲习先圣之道,所以考之于古而宜之于今者,必有其说。朕诚以为非尧舜无以为道,非文武无以为法,非无为垂拱不足以为治。然所以求尽其道、求底其法、求臻其治者,亦尚有可得而言欤?其备陈之,无泛无略。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帝王治理天下,必定要有切要的办法。从唐尧虞

舜一直到周文王与周武王,各个圣人递相传授,强调要持守最为适中的准则,强调要建立起最为适中的准则,强调要确立起最高的行为规范。后来任何朝代的帝王没有谁不遵守以上那三条的,靠它们去实现天下大治。皇帝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从早到晚恭敬承顺,也只是取法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然而治理的效果还没达到那极限,这是什么原因呢?猜测起来,在所讲论的适中原则和最高行为规范以外,或许还另外存在着其他的说法吧?况且古今论起治理的兴盛,对虞舜就说他清静无为,对周武王就说他稳稳坐定去治理。可查验《尚书》,虞舜任命中央九大部门的大臣和十二州的地方长官,敬奉皇天,为百姓操劳,制定礼仪,创作乐舞,广泛施布教化,宣明刑罚,都有致力做好的政事,哪里在于他清静无为呢?周武王在向天下宣布《武成》的训辞以后,授予爵位,划分封国,选取贤才,任用能人,修明人伦纲常的五种教化,兴行六德、六行和六艺这三事的引导,确立起信义,施行王室的赏赐,也是大有作为的了,哪里在于他稳稳坐定去治理呢?皇帝我如今想清静无为,稳稳坐定便实现大治,舍弃虞舜和周武王的举措,又该去取法什么呢?你们这些考生讲论研习古代圣人的治国大道,用来考察古代又适合当今的需要,一定有那具体的主张。皇帝我确实认为除去唐尧虞舜就没根据形成那大道,除去周文王与周武王就没根据形成那法度,除去清静无为稳稳坐定就不足以施行治理。然而用来谋求穷尽那大道,谋求彻底包纳起那大法,谋求达到那种治理状态,在这方面还有能够言说的吗?要完整详尽地陈述它们,不要太空泛,也不要太简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1. 明成祖永乐二十二年(1424)甲辰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策曰:朕惟圣帝明王之治天下,其大者在祀与戎。稽之方册,冬至祭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又云合祀天地于南郊。分祭合祭,果有其说欤?《书》称禋于六宗,《祭法》乃云七祀,而《曲礼》又称五祀。其言之不同,何欤?古者天子推其祖之所自出而祭之,谓之禘。夫既有禘,而又有所谓祫祭。禘祫之外,复有所谓祰、祠、烝、尝者,果何欤?郊社宗庙之礼,备著于经,其

仪物制度，尚可得而详辨欤？兵始于黄帝，然周设六军，因井田而制军赋，其法可得而闻欤？管子作内政以寓军令，抑有合于古否欤？汉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唐置府兵矿骑，宋置养兵，又有所谓厢兵禁兵。其制可得而论欤？粤自三代以及汉唐宋之用兵，有谲有正，有逆有顺，皆可指实而言欤？古之善用兵者，莫如孙子。其言曰兵者国之大事，必经之以五事；又曰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之五利，不能得人之用。此其言果何所本欤？曰五事，曰九变，曰五利，抑可得而悉数欤？朕自即位以来，于祀、戎二者未尝不致其谨，然其言论之异同，制度之沿革，不可以不考。诸士子博古通今，将有资于世用。其详陈之，无泛无略。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圣帝明王治理天下，最重大的政事在于祭祀和用兵了。考察典籍，到冬至那天要在圜丘坛祭祀皇天，到夏至那天要在方泽坛祭祀大地。又说在京师的南郊一起祭祀皇天和大地。单独祭祀与一起祭祀，果真有那说法吗？《尚书》上讲对日月星等六神进行祭祀，《礼记·祭法》中又说祭祀司命等七神，而《礼记·曲礼》中又说祭祀灶神等五神。这些经典的说法并不相同，原因又在哪里呢？古代天子推寻自己祖先的由来而每隔五年就共同祭祀他们，这被称为禘祭。既有禘祭了，又有所谓三年一举行的祫祭。在禘祭祫祭以外，还有所谓的春季礿祭，夏季祠祭，秋季烝祭，冬季尝祭。这究竟都是些什么祭祀呢？在京师南郊祭天，在土地庙祭地神，在宗庙祭祖先的礼仪，完整地载录在经典中，那些礼仪用品和具体规定，还能详加辨明吗？军队从黄帝时开始建立，然而周朝设置由王室直接统辖的六军，根据井田制度来分派官员和军用物资，它那法度还能让人听一听吗？唐朝设置以折冲府为单位的部队和名为矿骑的召募而成的部队，宋朝设置由国家供养的军队，还有所谓的厢兵和禁军。这些兵制能够论述一番吗？从夏商周三代一直到汉朝、唐朝和宋朝，在用兵上有谲诈的战法和通常的战法，有违背常规的打法和一般的打法，都能列举例证加以述说吗？古代最会用兵的人，没有能比得上孙武的。孙武说用兵是国家的大事，一定要用五种决定胜负的事项

来做筹划。又说统率军队却不懂得九种机变的法则，尽管懂得五种灵活处置的方式，也不能充分发挥出士兵的战斗作用。这几句话究竟是依据谁的主张来加以引申的呢?强调五种决定胜负的事项,强调九种机变的法则,强调五种灵活处置的方式,又能列举出各自的具体内容吗?皇帝我自从登上帝位以来,对用兵和祭祀这两宗大事未曾不拿出那最谨慎的态度来,然而围绕它们在说法上的相同和不同之处,在制度上的沿用和变更之处，不能不去做考索。你们这些考生通晓古代又了解当代，将会对得到世上使用而有所补益。要详尽地陈述它们,不要太空泛,也不要太简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2. 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丁未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礼乐之道,原于天地,具于人心,所以治天下国家之大器也。盖以和神人,以辨上下,以厚俗化,皆由于斯,故圣帝明王咸所重焉。我国家自太祖皇帝暨我皇祖、皇考,圣圣相承,功成治定,法古立制,极于盛矣。爰及朕躬,获承鸿绪,永惟海宇之广,生齿之繁,化理之方,躬行为要,肆夙夜饬励,恭己思道,罔敢怠宁。诸生学古有年,究于治理。夫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而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此盛治之至也。爰始行之,其事何先?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近世大儒又谓其本皆出于一。夫欲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不考其本,何以施之?知礼乐之情能作,识礼乐之文能述,稽诸往古,畴其当之?昔者圣人制作之盛,极于虞周,况以伯夷、后夔、周公为之辅,仲尼定万世之制,何独取其《韶》、冕欤?夫礼乐之效,致人心之感,则道德一而风俗同;致和气之应,则膏露降而醴泉出,器车马图、凤凰麒麟之物毕至,亦理之所必臻欤?朕虚己图治,冀闻至理,其悉陈之,将亲择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礼仪和乐舞的法式规格,来源于天地,扎根在人心中,是用来治理天下和国家的重要措施啊!去使神灵和世人融为一体,去分辨出上下等级,去使民俗化导变淳厚,全都由这来达到啊! 所以圣帝明王全都重视它们。我们国家从太祖高皇帝

一直到成祖皇帝和仁宗皇帝，各位圣帝递相承续。功业告成，治理奠定，效法古代，定立制度，已经达到兴盛的极点了。沿续到皇帝我本人，得以承接盛大的帝室统系，总考虑疆域是这样地广大，人口是这样地众多，教化和治理的方法顶数亲自做出表率来最为关键了。于是从早到晚告诫并激励自己，使自己保持恭敬的态度，思求那治国大道，不敢懈怠和安逸。你们这些考生研习古事已经时间很长了，对治国的道理搞得特透彻。使父子的亲情密切无间，都懂得长辈和晚辈的上下次序，全天下都恪守恭敬，而武器不再擦拭，割鼻等五种刑罚不再动用，百姓没有任何的祸患，这才是盛大治理的最佳状态呢！开始朝这样去做，什么事体要占第一位呢？乐舞从内心涌发出来，礼仪从外部表现出来，近代的大儒士又说它们的根基都是出自同一个东西。打算使上面安宁，治理民众，转变社会风尚，不去考索那根基所在，又凭什么去施布呢？深知礼仪乐舞的内在思想能把它激扬起来，断定礼仪乐舞的细节规范能把它继承并发扬光大，考察古代的情形，要数哪些方面该重视呢？从前圣人制定礼仪又创作乐舞的盛况，在虞舜时代和周朝达到了顶点，何况又用伯夷、后夔、周公作为助手呢！但孔老夫子定立永远无法改变的规制，为什么偏偏择取那虞舜的《韶舞》和周朝的礼帽呢？礼仪乐舞的功效，真能招来人心的感通，也就道德归于一致又社会风气都相同了；真能招来和谐时气的回应，也就甘露降下又醴泉涌出，沉在山川中的前代宝器和龙马携带的神图以及凤凰麒麟等吉祥物全都来到了。这也是治理必定会形成的结果吗？皇帝我虚心谋求大治，希望听到最高的道理，你们要详尽地陈述它，皇帝我准备亲自决定录取谁。

13. 明宣宗宣德八年(1433)癸丑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天启文治之祥，伏羲之王也，河出马图而八卦作；夏禹之兴也，洛出龟书而九畴叙。其理一原于天，而会于圣人之心。故以前民用，以建皇极，万世允赖焉。夫一原于天也，而图与书何以不同？具于圣人之心矣，何必卦因图而作，畴因书而叙？说者又谓《洛书》可以为《易》，《河图》亦可以为《范》。

《易》、《范》之兴，果何所则？《易》至文王、周公、孔子，《范》至箕子，而后益明且备。夫伏羲与禹之圣作之，何以犹未及备？宋周子作《太极图》、《通书》，所以发《大易》之蕴也，其要义安在？邵子推先天后天，以明羲、文之《易》也，其异旨何适？大抵言天者莫深于《易》，而必征于人；言治者莫详于《范》，而一本于天。朕潜心往圣，究惟至道，诚志乎文治之兴也。诸生讲明有素，其敷陈于篇，将亲择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天启示文治的吉祥景象，就在伏羲氏称王天下时，从黄河中降示由龙马携带的神图，八卦效仿它便创制出来了；在夏禹兴起时，从洛水中降示由灵龟背负的秘文，九种治国大法依据它便排定了。那番治理完全来自皇天又被圣人在心中予以领会，所以就用来使民众的日常需用不断得到满足，用来建立起最高的行为准则，千秋万代确确实实地仰赖它呀！但完全来自皇天，又为什么有神图和秘文的区分呢？扎根在圣人的心中了，为什么八卦又必定依据神图来创制呢？九种治国大法必定依据秘文来排定呢？讲论经典的人又认为《洛书》可以构成《易经》的内容，《河图》也可以构成《尚书·洪范》的内容。既然如此，《易经》和《尚书·洪范》的出现，究竟是取法了什么呢？《易经》到了周文王、周公和孔子的手中，《洪范》到了殷末箕子的手中，然后才更加明晰又详备了。可伏羲氏和夏禹那样的圣人创制它们，为什么还没达到详备的程度呢？北宋的周敦颐编著《太极图说》和《通书》，目的是阐发《易经》的深刻内涵啊！它那切要的义旨表现在哪里呢？北宋的邵雍又推阐先天图和后天图，用来阐明伏羲氏和周文王的《易经》，它那不同的义旨又适合哪些方面呢？大致上说来，讲论皇天法则的经典，没有能比《易经》更精深的了，但一定要从人事那里做验证。讲论治国大道的经典没有能比《尚书·洪范》更详明的了，但完全要依据那皇天的法则。皇帝我对古代的圣人专心地用心揣摩，探究的只是那最高的治国大道，确实把文治的兴盛作为志向啊！你们这些考生讲论究明经典的奥义具有深厚的基础，要在答卷上做出全面的阐述，皇帝我准备亲自决定录取谁。

14. 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丙辰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自古帝王肇建国家，图惟宁永，必有典则，以贻子孙。考之禹汤文武，概可见矣。继统之君，率由典常。今闻长世若夏之启，商之中宗、高宗、祖甲，周之成康，盖表表者也。其所以保盈成之运、隆太平之续者，尚可征欤？汉高帝有天下，次律令，制礼仪，定章程，修军法，史称其规摹弘远矣。传至文景，海内富庶，黎民醇厚，几致刑措，三代而下所仅有也。董仲舒对武帝，乃谓更化则可善治，何欤？当时用其言，果能比隆于古欤？朕钦承大统，仰惟祖宗成宪，即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肆夙夜祗率，期与斯民同跻雍熙，顾行之必有其序。诸生学宗孔孟，明于王道，其详著于篇，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自古以来，帝王创建国家，谋求天下永远安宁，必定有那经典和法则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考察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约略可以看出这一点来了。继承统系的新君主，全都按照原有的常规去施政。迄今闻知在位长久的君主，像那夏朝的帝启，商朝的中宗、高宗和祖甲，周朝的成王与康王，大致上正是杰出的代表啊！他们用来保住兴盛成功的时运和继续扩展太平景象的做法，还能验核出来吗？汉高帝拥有天下以后，修订好法律，制定礼仪乐舞，确定历法和度量衡等事宜，修明军法，史书上称赞他治国的规划宏大又长远。传到汉文帝和汉景帝时，天下富庶，黎民百姓淳朴厚道，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的境地，属于夏商周三代以后所仅有的历史景象啊！然而董仲舒对答汉武帝的策问，却说改变化导方式就能治理变美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当时要是采用了他的主张，果真就能与古代比试谁隆盛吗？皇帝我恭敬地承接起盛大的帝室统系，只管按照列祖列宗的既定制度和事例去施行治理，步入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治国大道的范围以内，于是从早到晚恭恭敬敬，做出表率，期望与天下的臣民一起进入兴盛欢悦的境地中，然而实行起来必定有那先后的次序。你们这些考生在学问上宗奉孔子和孟子，对称王天下的大道很通晓，要在答卷上详明地写出来，皇帝我

准备亲自观阅。

15.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己未科

〔三月初二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帝王之道,具载诸经。孔子纂而成之,肇自唐虞,讫于周,以为万世楷范,皆可举而行。爰暨汉唐以来,贤智之君景仰徽猷,祗遵彝典,用图治宁,咸有称述。当时贤人君子出膺世用者,亦莫不献忠效谋,以匡乃辟。考其致治成功,比之《诗》、《书》所称,则有所不及,其故何欤?洪惟我国家列圣相承,敦崇古道,以隆至治,巍巍乎其盛矣。朕嗣大历服,允怀继述,夙夜匪遑,期与臣民咸跻熙皞。深惟谨始图成,必有其要;推行之序,必有其宜。子大夫以明经登进,其于致君泽民之方,讲之有素,必有实见。明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帝王的治国大道完整详尽地载录在经典中,孔老夫子汇集并勒定它们,从唐尧虞舜开始,到周朝结束,作为任何朝代都遵奉的法式和典范,都能全面推行开。从汉朝、唐朝以来,贤明的君主景仰那美好的谋划,恭敬地遵用那固定的常规,用来谋求治理的安宁局面,都有值得称述的地方。当时的贤人君子涌现出来,承担起世上对自己的使用,也没有谁不献上忠诚和提出对策的,用来匡扶那君主。考察他们实现大治,成就功业,比起《诗经》、《尚书》所称述的东西,就有赶不上的地方,其中的原因又在哪里呢?只有我们伟大的国家,各位圣帝递相承续,促进并推崇古代的治国大道,用来使那最高的治理变得更隆盛,已经隆盛得非常突出了。皇帝我继承帝位,确实满怀着承续大业的志向,从早到晚忙个不停,期望与臣民一起进入太平兴盛的境地。深切想来,谨慎地处理好起始阶段的政事,谋求日后的成功,必定有那要领所在;推行的先后次序,也必定有那恰切的部署安排。你们这些士大夫凭借通晓经典被朝廷进用,对使君主成为唐尧虞舜那样的君主和给百姓带来好处的方式方法,讲论它们都有深厚的基础了,一定怀有切合实际的看法,把它明晰地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6. 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壬戌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国家建官，共理天事，以安生民，必求真才实德，用图成绩。论者咸谓培养贵有素，选举贵有方，考课贵严明。今兹三者，亦尝修举，而百官有司未能尽得人，何欤？三代以上，稽诸经可见。若汉唐宋愿治之君，皆知以求贤为务，而得人之盛独称虞周，何欤？期于济济多士，秉文之德，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用臻雍熙泰和之治，果何道以致之欤？朕祗承祖宗大统，以安民为心，惓惓于兹久矣。诸生讲明治道，出膺时用，必有定论。其直述以对，无骋夸辞，无摭陈言。朕将采而行之。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国家设立官职，是与君主共同处理好皇天交给的事务，用来安定住黎民百姓，这也必定要求取具有真才实德的人，用来谋求成就功绩。议论政事的人全都强调培养贵在具有深厚的基础，选拔举用贵在具有恰切的方法，考核督促贵在严明。如今这三个方面也曾予以修明兴行，可百官及各个政府部门没能全都获取到合适的人选，这又是为什么呢？夏商周三代以上，考察经典仍能看出那大概的情形来。至于汉朝、唐朝、宋朝希望实现大治的那些君主，全都清楚要把求取贤才作为该下大力去做的事情，可获取到贤才的隆盛景象偏偏就数虞舜和周朝时期，这又是为什么呢？期望众多的贤才济济一堂，承受到周文王当年那样深加信用的恩德，在九种德行以内的人都担任职务，英才贤士都在百官的行列中，用来实现兴盛欢悦、天下太平的大治景象，究竟采用什么办法就能达到这样呢？皇帝我恭敬地承接起列祖列宗的盛大统系，把安定民众作为心念，对此十分恳切，已经时间很长了。你们这些考生讲求并深明治国大道，涌现出来，承担起世上对自己的使用，一定怀有确切无疑的论断。把它直截了当地讲出来做对答，不要卖弄夸夸其谈的文辞，也不要拾取前人早就讲烂了的话语。皇帝我准备予以采用并施行它。

17. 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辛未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自古王天下之要有三：曰道，曰德，曰功。然道莫如伏羲、神农、黄帝，德莫如尧舜，功莫如禹汤、文武。此数圣人者，万世仰之，不能易也。伏羲、神农、黄帝之事著于《易》，尧舜、禹汤、文武之迹存乎《书》。其所以为道、为德、为功者，朕欲究其心术之精微。其推以治、教、养天下所尚虽殊，然不出乎耕桑贡赋、学校礼乐、征伐刑辟之外，朕欲参其制作之会通。夫无所酌于古，将何以准于今？朕承祖宗大位，夙夜惓惓于心，亦惟以古圣人之道、德、功自期，以今天下之治、教、养自励。兹欲尽驱天下游谈之惰，以事耕桑，使各衣食其力。尽约天下浮冗之征，以归贡赋，使各膏肥其体，而无或失所养。尽导天下狼戾之顽，以从学校，使各复还其善。尽陶天下粗鄙之陋，以由礼乐，使各移易其俗，而无或违于教。尽作天下懦怯之兵，以奋征伐，使各销沮其凶。尽化天下争斗之讼，以远刑辟，使各崇尚其耻，而无或外于治。皆何施而可也？施之有效，民得治、教、养矣。于古圣人之道、德、功，有可以庶几乎！伏羲、神农、黄帝曰皇，尧舜曰帝，禹汤、文武曰王。其称号之所以异者，果道、德、功之所致乎？抑治、教、养有隆替而然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一而已矣，何皇降而帝，帝降而王乎？兹欲措天下于隆古之世，使皇、帝、王之称惟一，而无隆杀之别，亦必有其道乎？子大夫习之于师而得之于己，宜无不悉其说者矣。既承有司宾兴而来，其具为陈之。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称王天下的关键事体有三项：叫做大道，叫做仁德，叫做功业。然而论起大道，谁也比不上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论起仁德，谁也比不上唐尧虞舜；论起功业，谁也比不上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这几位圣人，千秋万代都仰慕他们，根本没办法取代啊！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的事迹，显现在《易经》上；唐尧虞舜和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的事迹，载录在《尚书》中。他们构成大道、形成仁德、建成功业的举措，皇帝我特想究明他们那心术的精粹微妙之处。他们把那心术推广开，用来治理、教化、养育天下所看重的方法尽管不一样，然而也超不出农耕蚕桑、贡品赋税、学校和礼仪乐舞、征伐和刑罚的范围以外去，皇帝我特想参取他们的制

度措施而融会贯通起来。对古代没有什么参酌，将根据什么去衡量当今呢？皇帝我继承列祖列宗的帝位，从早到晚在心中念念不忘，也只是拿古代圣人的大道、仁德、功业来期待自己也达到这个样，拿当今天下的治理、教化、养育来自我鼓励。现在想驱使所有的四处游荡耍嘴皮的懒惰人去从事耕田植桑，使他们各自凭借本人的劳动解决穿衣吃饭问题。减免天下一切虚浮繁多的苛捐杂税，去返归到法定的赋税征收上，使世人各自把亲属供养得肥肥胖胖，而没人丧失掉养护。引导天下所有的凶狠暴戾的顽固家伙去接受学校的教育，使他们各自恢复善良的本性。陶冶天下一切粗野低劣的陋习，去按礼仪乐舞行事，使他们各自改变各自的风尚，而没人违逆教化。振作起天下所有的怯懦士兵，去奋力征伐，使他们各自收敛去除对百姓的凶暴行径。化解天下一切彼此争斗的乱打的官司，去远远离开刑罚，使他们各自看重那羞耻，而没人在治理以外去干坏事。以上这些目标，都该采取什么措施就能达到呢？推行措施确有成效，众百姓就得到治理、教化和养育了。在古代圣人的大道、仁德、功业面前，就有能够大体接近的了吧？伏羲氏、神农氏和黄帝被称为“皇”，唐尧虞舜被称为“帝”，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被称为“王”。他们的称号并不相同，这确实是由各自的大道、仁德、功业造成的吗？还是在治理、教化、养育上存在着兴隆与衰落的差别才形成的呢？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地位该是对等的罢了，为什么偏由“皇”降格到“帝”，又由“帝”降格到“王”呢？现今想把天下带入到隆盛的远古时代的那种社会去，使“皇”、“帝”、“王”的称号只变成一个，没有那级别的区分，也一定有那途径吧？你们这些士大夫跟从师长研习又在自己这里有心得，应该没有那类不完全讲出个人看法的人了。既然承受主管部门的礼遇和荐举来到了殿廷上，就要详尽地陈述它们。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18. 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甲申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临轩策士，乃我祖宗法古求治之盛典也。兹朕茕茕在疚，事虽不敢妨废，而情有不能安然行之者。顾尔多士，游心经史，于治国平天下之道，讲之熟矣。朕虽

不临轩详问，尔多士其各敷陈所蕴以献，务切时宜，毋泛毋略。朕将采而行之。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亲临殿廷策问读书人，正是我朝列祖列宗效法古代、谋求大治的隆盛典礼啊！现今皇帝我孤零零地处在先帝刚刚驾崩的自我痛责中，政事虽然不敢妨害废弃，可情理上却有不能安稳地去实行的地方啊！不过你们这些读书人在经典和史书中用心来又用心去，对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方法与原则已经讲求得相当精熟了。皇帝我虽然不亲临殿廷详明询问，你们这些读书人要各自广泛陈述平常所积累的东西献呈上来，务必要切合当前时势的需要，不要空泛，也不要太简略。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用并施行它。

19. 明宪宗成化十四年(1478)戊戌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闻昔者三代圣王之化成天下，各有所尚，夏忠商质而周文也。享国已久，其迹可指言乎？生民以来，称至治必曰唐虞三代。今止言三代而不及唐虞者，然则唐虞独无所尚乎？史谓三代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岂时然乎？质法天，文法地，果然否乎？汉损周之文，用夏之忠，有所据乎？唐宋二代，历年亦久，有定尚乎？我太祖高皇帝肇造鸿业，变夷为夏，重修人纪，载整衣冠，有功于天地大矣。太宗文皇帝纂绍大统，中靖家邦。列圣相承，益隆治教，百余年来，海内渐涵仁义之泽厚矣。其所尚可名乎？若名曰忠，民情犹变诈而多讼，非忠也。若名曰质，民用犹奢靡而逾分，非质也。若名曰文，民俗犹粗鄙而鲜礼，非文也。名既不可，然则今之世其如唐虞之无所尚乎？朕欲移风易俗，去其所谓忠敬文之弊，悉囿斯人于皇极之中，行之自何始？子诸生明经待问久矣，兹咸造于廷，详著以献，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往昔夏商周三代圣明的君主教化好天下，各自定有所崇尚的主体思想，即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采啊！它们享有国家都时间特长，具体的足迹能够指明并

论述一番吗?从人类出现以来,讲起治理最美好的朝代,必定都会说,要数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了。可当今却只提夏商周三代竟不提唐尧虞舜,既然如此,那么唐尧虞舜唯独就没有崇尚的主体思想吗?史书上讲,夏商周三代的统治方式就像沿着圆形的轨道在旋转,周而复始。《春秋经》意在改变周朝的崇尚文采,归入商朝的崇尚质朴,这难道是由那特定的时势所决定的吗?崇尚质朴属于效法皇天,崇尚文采属于效法大地,是否真是这样呢?汉朝抛弃周朝的崇尚文采,采用夏朝的崇尚忠厚,这样做确有什么依据吗?唐朝和宋朝这两个朝代,存在的时间也很长,它们有那固定的所崇尚的主体思想吗?我朝太祖高皇帝创建宏大的基业,把元朝蒙古人的统治变成中原汉人的统治,重新修明人伦纲常,整顿华夏的文物典章,对天地立下功勋真是太盛大了。太宗文皇帝又继承一脉相传的帝室统系,在中途稳定住国家。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续,发扬光大国家的治理和教化,一百多年以来,海内逐步蒙受到仁德正义的恩泽的滋润,也相当深厚了。我朝所崇尚的主体思想可以用一个字眼概括出来吗?如果把它叫做崇尚忠厚,可百姓的心理仍旧机变诡诈而乱打官司,这够不上讲求忠厚啊!如果把它叫做崇尚质朴,可百姓的日常用度仍旧奢侈淫靡而超越等级规定,这够不上讲求质朴啊!如果把它叫做崇尚文采,可百姓的习俗仍旧粗野鄙陋而缺少礼仪,这够不上讲求文采啊!用一个字眼来做概括既然做不到,那么当今就像唐尧虞舜时期没有所崇尚的主体思想吗?皇帝我渴望移风易俗,去除掉所谓崇尚忠厚或虔敬、文采的弊端,把现今的世人全都限定在最高的行为准则当中,这样去做的话,应当从哪里入手呢?你们这些考生通晓经典,等待朝廷询问已经时间很长了,现今全部来到了殿廷上,要详明地写出自己的意见,献呈上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0.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辛丑科

〔三月十四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祗奉丕图,究惟化理,欲追三代,以底雍熙,不可不求定论焉。夫三代之王天下,必有纪纲法度,然后可以言治。而议者乃谓三代之治,在道不在法。岂法无所

用乎？圣王立法，必有名以表实，然后可以传远。而议者乃谓三代之法，贵实不贵名。岂名非所先乎？治不在法，则继以仁政之说似戾；法不贵名，则必也正名之说似迂。二者将何所从也？嗣是称治者，莫过于汉唐宋。汉大纲正，于父子君臣之道盖得矣，而其治何以不能继夫周？七制之君，知重道者孰优乎？唐万目举，如田赋兵刑之法近实矣，而其治何以不相远于汉？三宗之内，能守法者孰贤乎？至宋则大纲正，万目未尽举，似于唐不及，然又谓其家法有远过汉唐、足以致太平者八事，而并指其君之贤。其说又何所据也？夫法不徒行，名不苟立，古之人必有处乎此者，而后世获效之不同如彼，何也？兹朕于道，必欲探其精微之蕴；于法，必欲参其制作之详；于所谓名与实者，必欲考求三代之所以相须而治，汉唐宋之所以不相须而治不古若者。庶几取舍明而跻世雍熙可期也。诸生学古通今，出膺时用，必审知之矣。其各殚心以对，毋略毋泛。朕将采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恭敬地奉守祖宗留下的宏大谋划，只管去究明教化和治理的情形，希望追比夏商周三代，最后进入兴盛欢悦的大治状态，这就不能不索求确切无疑的论断啊！夏商周三代称王天下，必定建有法度纲纪，然后才可以讲论大治。然而议论政事的人却说夏商周三代的治理，在那最高原则，并不在那法度。这样讲，难道法度就没有施用的地方了吗？圣明的帝王定立起法度，必定要有名目来显现那实际内涵，然后才可以流传到千秋万代。可议论政事的人却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度，看重实际内涵，并不看重名目。这样讲，难道名目并不属于首先要定立的东西吗？治理不在于法度，接下来再强调仁政的学说，看上去也就显得乖逆了。法度不看重名目，而必定要端正名分的说法看上去也就显得迂腐了。这样一来，以上两方面究竟该依从哪一方面呢？此后号称大治的朝代，没有能超过汉朝、唐朝和宋朝的了。汉朝大纲端正，对父子君臣的关系准则差不多是获取到了，然而它那治绩又为什么不能承接周朝呢？从汉高祖到汉宣帝这七位君主，他们中懂得重视治国的最高准则的人，要数谁最突出呢？唐朝各种细目都张布开来了，像田赋、军队、刑罚等方面的法度接近

切实有效了，而它那治绩又为什么没有远远超过汉朝去呢？在唐太宗、唐玄宗、唐宪宗这三位皇帝当中，确能守持法度的人又数谁最优秀呢?到了北宋，大纲得到端正，各种细目并没完全张布开来，似乎比不上唐朝，然而又有人认为它那赵氏独创的自家法度有八项远远超过汉唐两朝并足以实现天下太平，同时指明具体君主的贤明之处。这种说法又是根据什么做出的呢?法度并非孤立地行用，名目并非随意地定立起来，古人必定有那妥善处置二者关系的做法，可后世获取到的成效却又是那样地不同，其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如今皇帝我对治国的最高原则一定要探明那精粹微妙的底蕴，对法度一定要参取酌定那创建的方方面面，对人们所讲的名目与实际内涵一定要考求夏商周三代使二者相互依存实现大治而汉朝、唐朝、宋朝使二者彼此分离，结果治绩不如古代的奥秘所在，希望能在取用和舍弃上非常明确，从而把当今社会带入到兴盛欢悦的境地中去啊!你们这些考生研究古代又了解当代，现今涌现出来，承担起世上对自己的使用，必定精详地懂得这一切了。要分别竭尽心力来做对答，不要太简略，也不要空泛。皇帝我准备亲自决定录取谁。

21. 明宪宗成化二十年(1484)甲辰科

〔三月初一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闻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责任、求贤。古帝王心法相传，理欲明辨，建官分职，贤俊毕登，于斯三者无不至矣。其君臣之间所以交相儆畏，与其事功之详，治化之盛，可历言欤?后世愿治之君，孰不以唐虞三代为法!然究其实，不能无疑。石渠讲经，连屏书事，崇儒有论，鉴古有记，立志笃矣。何躬修玄默、质任自然者，治效独优欤?公卿省寺，两府台谏，兼摄有宜，总察有方，责任当矣。何日不暇给、役己利物者，功业独盛欤?郡国公府，皆得荐士，四科九品，随材甄擢，举贤博矣。何杖策相从、躬驾枉顾者，得人独异欤?之数君者，其所建立施为，果皆本于儆畏所致，抑亦随其才力所就而然欤?迹其事功治化，视唐虞三代可能企及否欤?朕嗣守祖宗鸿业，夙夜祗勤，惟恐制治保邦未尽其道，期于大小庶官咸称厥任，穷陬蓽屋罔有遗逸，如古帝王熙皞之世，果何修而致是欤?

诸生博通古今之学，明习济时之务。其参酌内外本末，悉心以对，毋徒胶于见闻而为故常之论。朕将资以裨治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治国大道的要领有三条：叫做确立起天子的志向，验核百官的政绩，求取贤才。古代的帝王在心治大法上递相传授，天理和人欲区分得非常明晰，设立官位又划分职守，贤士英才全都来到朝廷上，对以上那三条没有做得不特别完善的了。他们君臣之间互相敲警钟和提醒忧惧事的举动以及事业与功效的详情，治理与教化的盛况，能够逐项讲述一番吗？后世渴望大治的君主，有谁不把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作为效法的典范呢？然而验核那实际，不能没有让人感到疑惑的地方。或者在石渠阁讲论经典的异同，或者把屏风连起来写上前代的君臣事迹，或者崇尚儒学亲自撰有《崇儒术论》，或者借鉴古事亲自撰有《观文鉴古图记》，这表明他们确立起志向也是相当深切的了。可为什么带头清静无为、质朴而任从自然状态的君主却偏偏治效最突出呢？三公九卿和三省九寺，中书省与枢密院以及御史台和谏院，在官员兼任或代理上定有恰切的制度，总领和督察也有一整套办法，这表明在验核百官的政绩上也是很妥当的了。可为什么每日忙得不可开交、督促自己干这干那而使万物有利的君主却偏偏功业最盛大呢？州郡和各个诸侯王国以及三公府都有义务向朝廷荐举贤士，按照四种科目和九等品级结合本人的才干加以甄别选拔，这表明在举用贤才上也是途径很广泛的了。可为什么做出手持马鞭跟在后面、亲身到住处去迎请的这类举动的君主却偏偏获取到了奇才呢？以上这些君主，他们建立的业绩和采取的措施，果真都是从警戒和忧惧出发才形成的吗？或者也只是依从他们的才智与力量所能做到的事情便造成了那种情况呢？究寻他们的事业与功效，治理与教化，跟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相比照，是否就能追得上了呢？皇帝我继承并守护列祖列宗的盛大帝业，从早到晚保持恭敬和勤勉，唯恐在动乱出现以前就要制定好各项措施，在危亡出现以前就要保定国家的这一重大举措上，还没把各种对策都包纳进来，期待着大小官员全都胜任本人的工作，从遥远地带到贫穷人家都没有

被遗漏下的贤才，形成古代圣帝明王那种兴盛的大治局面，究竟该修明什么就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你们这些考生通晓古今的学问，深知并熟悉救助时世该下大力去做的事情。要参取并斟酌内外本末，竭尽心力做出对答，不要光被自己的见闻限定住而讲些老掉牙的说法。皇帝我准备加以参考，用来补益政治呀！

22. 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癸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三代而下，论守成之君必以汉文帝为首。史称其时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朕尝慕之，不知文帝何修而能得此？考之当时，或赐民田租之半，或尽除之。殷富之效，盖出于此。然贡、助、彻之法，虽三代亦所常行，而况于汉乎！使除田租，则当时宗庙之祭祀，百官之俸给，四夷之征伐，皆不可已者，将何以给用度乎？仰惟皇祖肇造区夏，罔不臣服。百二十余年以来，生齿益繁，疆域益广，非前代所及。今岁郡县上版籍于户部，其数具存，可谓庶矣。休养生息之余，宜其富而可教也。然闻闾巷田野之间，不免冻馁无聊之叹。且顷因水旱河决之患，尤多流移失业之人。安在其为富也？是以劝谕虽切，而循理者尚少；赦宥虽频，而犯法者愈甚。又安在其为可教也？夫衣食不足，则礼义不兴，而民轻犯乎刑辟，亦势之所必至者。其将何以处之善？古之御天下者，既庶必有富之之术，既富必有教之之方，特患不能举行之耳。朕承祖宗鸿业，图惟治道，每有志于隆古帝王之盛，不但文帝而已。尔诸生抱道而来，将见于用。其于庶、富、教三者先后本末，凡古人之成效，今日之急务，悉心以陈。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从夏商周三代以后，讲论起确能守护前代功业的君主，必定要把汉文帝列为第一名了。史书上称述当时全天下殷实富足，兴行起礼仪正义，每年审理案件才几百桩，几乎达到了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的地步。皇帝我经常仰慕他，不知道汉文帝修明了哪些政事而能取得这种治绩呢？考察当时的情况，或者把一半田租赐给百姓不再缴纳，或者全部不予征收了。殷实富足的成

效，大概是由此而带来的。然而按收获总量的十分之一来征收的名为贡、助、彻的赋税制度，即使在夏商周三代也是经常实行的，何况在汉朝呢！假使免除了田租，那么当时宗庙的祭祀用品，百官的俸禄，对四周少数部族的征伐行动，都是没办法作罢的事情，将去靠什么保证足够的财政支出呢？恭敬地想来，我朝太祖皇帝重新铸造华夏，没有不归服的地方。一百二十多年来，人口日益增多，疆域日益扩大，决不是前代所能比得上的。如今各个郡县把户口簿册上报到户部，数目详细地摆在那里，可以称得上众多了。在得到休养生息之后，就该生活富裕而能加以教诲了。然而仍听说里巷田野之间，还没免却挨饿受冻实在没有生活依靠的叹息声。况且近来由于水灾旱灾和黄河决口的祸患，更有许多四处流亡、失去本业的人。人们已经变得富裕可又表现在哪里呢？因而劝导晓喻尽管深切，但按道理办事的人却仍很少；赦免宽恕尽管不停，但触犯法律的人却越来越猖狂。人们已经能够教诲可又表现在哪里呢？不够吃又不够穿，礼仪正义就兴行不起来，而百姓轻易就触犯刑律，也是势所必至的事情。对此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妥善加以解决呢？古代统领天下的帝王，在人口众多以后必定有使他们富裕起来的办法；在富裕以后又必定有教化好他们的对策，只是弊病出在不能全面行用它们罢了。皇帝我继承列祖列宗的盛大帝业，只去谋求治国的原则与方法，常常怀有达到古代帝王那样隆盛的志向，不仅仅像汉文帝就算到头了。你们这些考生身怀治国大道来到殿廷上，将被国家所任用。要在人口众多、百姓富裕、施行教化这三件大事的先后次序和来龙去脉上，凡属古人的成效和当今该下大力去做的事情，都竭尽心力做出陈述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3. 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己未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自古圣帝明王之致治，其法非止一端。而孔子答颜渊问为邦，但以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为言，说者谓之四代礼乐。然则帝王致治之法，礼乐二者足以尽之乎？宋儒欧阳氏有言：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

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当时道学大儒，称为古今不易之至论。今以其言考之，上下数千余年致治之迹具在，可举而论之乎？夫三代而上，无容议矣。汉高帝尝命叔孙通定礼乐，负鲁两生不至，谓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兴。厥后三国分裂，其臣有诸葛亮者，而世儒乃或以礼乐有兴，或以庶几礼乐许之。盖通与亮之为人，固不能无优劣。要之于礼乐能兴与否，亦尚有可议者乎？我国家自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创业，圣圣相承，百有余年。礼乐之制作，以时以人，宜无不备矣。然而治效之隆，未尽复古。岂世道之升降，不能无异耶？抑合一之实，犹有所未至耶？朕祗承丕绪，夙夜惓惓，欲弘礼乐之化，益隆先烈，而未悉其道。子诸生其援据经史，参酌古今，具陈之。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圣帝明王实现天下大治，具体方法并不仅限于一种。可孔子回答颜渊提出的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只强调行用夏朝的历法，乘坐商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乐舞采用虞舜的《韶舞》。解说经典的人把这称为四代礼乐。既然如此，那么帝王实现大治的方法，仅有礼仪乐舞这两方面就足以全包括了吗？北宋儒士欧阳修说过这样的话：从夏商周三代以前，治理出自同一个本体，而礼仪乐舞就推行到全天下去了。从夏商周三代以后，治理出自两个本体，而礼仪乐舞就变成徒有其名的东西了。当时的道学代表人物，把这称为古今无法更改的最恰切的论断。现今拿这一论断来做考察，上下数千余年实现天下大治的史迹都明摆在那里，能够全面论述一番吗？夏商周三代以前，没有能让人指出什么毛病来的了。汉高帝曾经命令叔孙通制定礼仪乐舞，可身在鲁国的两位儒生却不到朝廷上来，他们认为礼仪乐舞只有积累德业达到一百年以后才会兴行。此后三国各占一方，蜀汉的臣僚显现出诸葛亮来，而世上的儒者有的用礼仪乐舞会兴行，有的用礼仪乐舞这下子会差不多了来期待诸葛亮。叔孙通与诸葛亮的为人，固然不能没有优劣的区别。但验核礼仪乐舞能否兴行，还有可以对他们进行议论的吗？我们国家自从太祖高皇帝凭仗神明勇武创建基业，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续，已经长

达一百多年了。礼仪乐舞的制定与创作，根据时势又根据人情来进行，应该没有不完备的了。然而治理功效的隆盛程度，还没完全像远古那样。这难道是因为世道存在着上升与下滑的阶段就不可能没有差异吗？还是因为把礼仪和乐舞聚合成一个本体的实效仍然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呢？皇帝我恭敬地承接起盛大的帝室统系，从早到晚勤勉不懈，只想弘扬那礼仪乐舞的教化，发扬光大前代的丰功伟绩，但尚未完全弄清具体的做法。你们这些考生要援引经典和史事，参酌古代和当今，详尽地陈述它们。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4.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戊辰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闻人君所当取法者，惟天惟祖宗。唐虞三代之君，皆法天法祖，以成盛治，载诸经可考也。其有曰代天，曰宪天，曰格天，有曰率祖，曰视祖，曰念祖。同乎，异乎？抑所谓法祖为守成而言也？彼创业垂统者，又将何所法乎？汉唐宋以降，法天之道殆有未易言者，何以能成其治乎？抑亦有自法其祖者矣，何治之终不古若乎？朕自嗣位以来，兢兢焉惟天命是度，祖训是式，顾犹有不易尽者。天之道广矣大矣，不知今日所当法何者为切？《传》有谓刑罚以类天震曜，慈惠以效天生育者。果可用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创业，太宗文皇帝之垂统，列圣之所当法以为治者，布在典册，播之天下，不可悉举。不知今日所当法何者为先且急？史有谓正身励己，尊道德，进忠直，以与祖宗合德者。果可行乎？兹欲弘道行政，以仰承眷佑，延亿万载隆长之祚。子大夫应期向用，宜有以佐朕者，其敬陈之，毋忽。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君主应当取法的对象，只在于皇天，只在于祖宗。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君主，全都取法皇天又取法祖宗，去形成盛大的治绩。这被载录在经典上，是能考察出来的呀！其中有讲代替皇天的，有讲效仿皇天的，有讲感动皇天的，也有讲一切按祖宗的规定办理的，有讲察视祖宗怎么办的，有讲顾念到祖宗的。这些讲法意思相同呢？还是不同呢？或者是所谓取法祖宗是专为

守护已有功业来讲的呢？那些创建基业、垂示统系的君主，又该去取法什么呢？从汉朝、唐朝、宋朝以后，取法皇天的方式差不多存在着不容易讲清的地方，但又凭什么却能形成它们的治理呢？也有自觉取法本朝祖宗的君主，可为什么治绩到最后怎么也比不上古代呢？皇帝我自从继承帝位以来，兢兢业业，只管去揣摩皇天的命令，只管去奉守祖宗的训导，但仍有不容易全部掌握的东西。皇天的法则太广远宏大了，不知道今日应当效法的方面有哪些是最为切要的？解释经典的书籍中说，刑罚应类似皇天的震撼与照耀，仁慈恩惠应效仿皇天的化生与养育。这种说法确实可以采用吗？我朝太祖高皇帝创建基业，太宗文皇帝垂示统系，各位圣明先帝的所应加以效法用来施行治理的东西，布列在典册上，播扬在整个天下，简直没办法全部列举出来。不知道今日应当效法的方面有哪些是占据首位又特紧迫的？史书上有讲论端正自身，激励自己，尊崇道德，进用忠诚正直的人，用来同祖宗的德业融为一体的。这种说法果真可以行用吗？现今打算弘扬大道，推行开政务，用来恭敬地承奉皇天及祖宗的关怀与佑护，延续亿万年隆盛绵长的国运。你们这些士大夫应合时运，归向任用，应当有那辅佐皇帝我的东西，要恭敬地陈述它们，不要忽略。

25. 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大学》一书有体有用，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宋儒真德秀尝推衍其义，以献于朝。我太祖高皇帝特命左右大书揭之殿壁，朝夕观览，每与侍臣形之论说。列圣相承，罔不崇信。朕初嗣位，经筵儒臣首以进讲其书，大纲有二：先之以帝王为治之序，次之以帝王为学之本。又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之要，分为四目，序列于后，以示学者用力之地。夫学，体也；治，用也。由体达用，则先学而后治可也。顾以治先于学，于义何居？其为治之序，盖前圣之规模，后贤之议论，皆在焉。比而论之，无弗同者。而帝王之所以为学，则有不同。尧舜、禹汤、文武，纯乎无以议为也。高宗成王，其庶几乎！下此虽汉唐贤君，亦或不能无少悖戾。又下则其谬愈甚，不过从事于技艺文辞之间耳，无惑乎其治之

不古若也。凡此皆后世之鉴，可能历举而言之乎？抑《衍义》所载，不及宋事，不知宋之诸君为治为学，其亦有进于是者乎？朕万几之暇，留意此书，盖欲庶几乎古帝王之学，以增光我祖宗之治。励志虽勤，绩用未著，家国仁让之风，用人理财之效，视古犹歉，岂所以为治者未循其序，为学者未得其本乎？夫为人臣而不知《大学》，无以尽正君之法。子诸生讲明是道久矣，行且有臣之责，其为朕悉心以对，毋泛毋略。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大学》这部经书既有主体方面的论说，又有施用方面的阐述，属于圣人学说的渊源和治国大道的根基啊！南宋的名儒真德秀曾经推衍它那要义，写成专书献给朝廷。我朝太祖高皇帝特地命令左右把它书写下来挂在殿廷的墙壁上，朝夕观览，常与身边的大臣进行论说。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续，无不崇尚又信从。皇帝我刚刚继承帝位时，在经史讲席供职的儒臣就最先拿这部经典来献上讲说，大纲有两条：首先是帝王施行治理的次序，其次是帝王研求学问的根基。又用穷尽事物，充实知识，使意念真诚，端正心性，修养好自身，整顿好家族的要领，分为四个类目，依次排列在两条大纲的后面，用来揭示学习的人该下力气的地方。学习，这属于主体方面的事情啊！治理，这属于施用方面的事情啊！由主体扩展到施用，首先学习好，随后去治理，也就可以了。但大纲却把治理放在学习的前面，这在义旨上又占的是哪一条呢？施行治理的次序，大致上古代圣帝明王的整体规划以及后世贤人的议论都明摆在那里，加以排比论证，没有不相同的地方。但帝王研求学问的方式便有不同了。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与周武王显得特纯正，没必要再去议论了。殷高宗与周成王也基本上可以呀！自此以下，即使是汉朝、唐朝的贤明君主，也有的不能没有稍略悖谬违逆的地方。更在此之下，那就悖谬得越来越厉害了，只不过在技艺和文辞之间花点儿力气罢了，他那治理根本比不上古代也就让人感到没有什么奇怪的了。以上这些都是后世的鉴戒，能够依次列举出来并论述一番吗？不过《大学衍义》所载述的内容，没涉及到宋朝的史事，不知道宋朝的各

位君主施行治理，研求学问也存在着比上面那类情况更严重的表现吗？皇帝我在处理繁忙政务的空当里，留意这部经典，目的是想差不多能接近古代帝王的那种学习水准，用来发扬光大我朝祖宗的治绩。激励自己的志向尽管很勤勉，可功绩效用却未显著地表现出来，家族和国家仁德谦让的风尚，任用官员和料理财政的成效，比照起古代仍然差得很远。这难道是因为施行治理的举措还没遵循那次序，研求学问的方式还没获取到那根本吗？作为人家的臣子却不懂得《大学》，就没办法将规正君主的准则贯彻到底。你们这些考生讲论阐明这一准则已经时间很长了，眼看着就担负起做臣子的责任了，要为皇帝我用尽心力做出对答，不要空泛，也不要太简略。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26. 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

〔三月十四日，策试会试中式举人〕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必顺时揆事，创制立法，以尽天下之务。顾世有升降，而政之因革随之。唐虞三代所以致雍熙泰和之盛，卓然可为万世法程者，具载诸经。姑举其大者论之，如定礼乐，明律历，疆理宇内，设立庶官，分田制赋，兴学养士，与夫选举考课之法，兵戎刑罚之制。其建立有本，推行有序，可历指其实而言之欤？后之称善治者，曰汉曰唐曰宋。其创业守成，亦多英君谊辟，而考其治功所就，终不及于古，何欤？岂治理之道固不专恃于法制欤？尝观先儒之论，有曰善为治者，必先有纲纪以持之于上，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信斯言也，则君臣之间转移振举，宜莫急于此者。三代而上，无容议也。自汉以来，纲纪之张弛，风俗之醇杂，亦有可言者欤？抑斯二者相因而成，又岂无所自欤？仰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创建宏规。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统。列圣相承，监于成宪，益隆不替。百五十余年，道洽政治，盖庶几古帝王之盛。朕嗣守祖宗鸿业，抚临亿兆，夙夜祗畏，图新治理。而绩效未臻，和气未应，其故果安在欤？夫事必稽诸古，而后有以验夫因革之宜；治必端其本，而后可以不紊失先后之序。此君天下者所当知也。兹朕欲励精有为，期于化行俗美，绍复我祖宗之旧，以上追隆古

之治，如之何而可？子诸生皆学古通今，明于王道，宜有以佐朕之不逮者。其各殚力以对，毋泛毋略。朕将采而行之。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打算形成天下的大治局面，必定要顺应时势，揣摩事体，创建制度，定立法式，用来做好天下的一切事务。但时世存在着上升与下滑的阶段，而政事的沿承与变革就跟在后面。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用来造成和睦欢悦、天下太平的盛况，显赫地可以成为任何朝代的法式的那些举措，详尽地载录在经典上。姑且列举其中的重要方面来论说，像创制礼仪乐舞，定准音律和历法，划分好天下的政区，设立文武百官，分配好田地，制定赋税，兴办学校，培养士子，以及选拔举用和考核督察的制度，军队与刑罚的规制。这一切全都在建立上具有根本，在推行上具有次序，能够逐项指出那实际而论述一番吗？后世被称为治理美好的朝代，要数汉朝、唐朝和宋朝了。它们在创建基业和守护已有成就上，也涌现出许多英明的君主和杰出的天子，但考察他们治理的功绩所达到的程度，最终也比不上古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是治理的原则与方法原本上就不在于专靠那法度吗？曾经观察前代名儒的论说，有人讲：善于施行治理的人，一定要先有国家纲纪来在上面执持住，然后又有既定的社会风尚来在下面推行开。信从这一论断，君臣之间扭转局面，振兴国政就应没有比这更急切地去办的。夏商周三代以前，不必再去议论了。从汉朝以后，国家纲纪的张布与废弛，社会风尚的纯正与驳杂，也有可以言说的吗？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才促成，又哪里没有它们的来由呢？恭敬地想来，我朝太祖高皇帝重新铸造华夏，创立下宏大的规制。太宗文皇帝又在中途稳定住国家，继承盛大的帝室统系。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续，效法成规和旧有的事例，加重隆盛的程度而不衰落。一百五十多年来，大道切合政治，差不多和古代帝王时的盛况一个样了。皇帝我承接并守护列祖列宗的大业，统领慰抚亿万百姓，从早到晚恭敬忧惧，谋求治理焕然一新。然而成绩功效还没达到，阴阳和谐的时气还没做出回应来，其中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政事必须从古代那里做考察，然后才会确有根据地去验核那沿袭与变

革的恰切做法。治理必须端正那根本，然后才可以不搅乱那推行的先后次序。这是统领天下的君主应当明白的问题啊！如今皇帝我振奋精神，要大有作为，期望教化兴行，社会风尚美好，恢复我朝列祖列宗的原来的盛况，往上追比隆盛古代的治绩，怎么办就能达到目的了呢？你们这些考生全都研究古代又了解当代，深明称王天下的原则与方法，应当有那协助皇帝我还没涉及到的东西。各自要竭尽心力做出对答，不要空泛，也不要太简略。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纳并施行它。

27. 明世宗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昔言治道者有二：曰王曰伯。三代而上，纯王之治也，卓乎不可尚已。论者乃谓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五伯以力。又谓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果若是殊乎？其所谓道、德、功、力，亦有可指言者乎？自是而后，惟汉唐宋历世最久，号称至治。其间英君谊辟，固有专务以德化民而致刑措之效，力行仁义而成贞观之盛，至诚恭俭而收庆历之治。盖于王道，皆若有庶几焉者。由今观之，其施之当时而见诸政事者果何？道欤，德欤？抑功力欤，亦有可述者欤？议者有言汉王而未足，唐犹夫汉也。然则宋固可知矣。岂世道愈降而先王之道卒不可复欤？朕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太宗文皇帝安内攘外，列圣相承，益隆继述。莫不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百五十余年以来，亦既成纯王之化矣。朕嗣承大统，夙夜孳孳，亦惟帝王之道、祖宗之法是遵是守。夫何承平日久，人心宴安？固尝劝农桑矣，而闾阎之间衣食益困；饬武备矣，而辇毂之下营伍不充。士病其诡遇也，而流风相高，顾伤于太激；俗恶其奢靡也，而守礼之家，不免于僭侈。储蓄之政何岁不讲，一遇水旱，至坐视赤子之流离；备御之策无时或忘，一有边警，辄告称兵粮之虚耗。夫体统纪纲，人才风俗，皆王政之大，而足食足兵，又今日之急务也。信如兴滞补敝之不暇，有克举之，又何择乎王伯哉？夫上有愿治之君，则下有辅治之臣，是故道易交而志易行也。昔之人臣所以事其君，固有以法天立道为对，以饥渴教化为喻，以诚心公道为佐治之具者。夫岂不知尊王而抑伯哉？何卒混为一途而莫之能正也？后之论治

者，有言尽天道则可以行王道，又谓有内圣之德则有外王之业，又谓必有父母天下之心乃为王道。当以何者为不易之论欤？朕闻王者之民，劳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迁善敏德而不知其功，相安相养而莫识其力。士让于朝，民和于野，万物并育，各得其所。朕甚乐之，甚慕之。何施何为而可以臻此？子大夫明于王道有素矣，其详著于篇，朕将择而行之。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讲论治国大道主要有两条：叫做称王天下，叫做称霸天下。夏商周三代以前，属于称王天下的纯正治理，盛明得简直没办法超过去了。可议论政事的人竟说伏羲等三皇凭借大道才成为三皇，黄帝等五帝凭借德业才成为五帝，夏禹等三王凭借功业才成为三王，齐桓公等五霸凭借武力才成为五霸。还说由“皇”降格为“帝”，由“帝”降格为“王”，由“王”降格为“霸”。果真像这样来做区分吗？他们所讲的大道、德业、功绩、武力，也有可以指出具体是什么的吗？从春秋五霸以后，只有汉朝、唐朝、宋朝帝位相传的时间最长，号称治理最为美好。在此过程中，英明的君主和杰出的天子固然有人专门在用仁德感化民众上狠下力气，收到了刑罚搁置起来不使用的成效；有人大力推行仁德正义，形成了贞观时期的盛况；有人极其真诚又恭谨节俭，取得了庆历时期的治绩。他们对于称王天下的原则与方法，都有看上去差不多的了。从今天来看，他们在当时所施布而在政事上又显现出来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大道呢？还是德业呢？或者是功绩或武力呢？也有可以称述的吗？议论政事的人还有说汉朝属于称王天下但做得还不够，唐朝正和汉朝一个样。既然如此，那么宋朝到底怎么样，原本上也就能够推断出来了。这难道是因为世道越衰落而古代圣帝明王的大道到最后就根本没办法恢复了吗？皇帝我的太祖高皇帝创建基业，垂示统系，太宗文皇帝安定内部，驱逐外敌，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续，在继承前代大业上加以发扬光大。没有谁不用最纯正的称王天下的心念去施布最纯正的称王天下的国政。一百五十多年以来，也已经形成那最纯正的称王天下的教化了。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帝室统系，从早到晚勤勉不懈，也只是

遵守古代帝王的大道和列祖列宗的法度。但为什么太平的年月一长久，人心就变得安逸享乐了呢？原本上已经激励农耕植桑了，可平民百姓那里吃饭穿衣却越来越困乏。已经申饬武备了，可天子脚下却军队不足。对读书人诡诈处世的行径感到是大毛病，可沿袭而成的风气却彼此比试谁最高，但弊病正出在过分地激切。对社会风尚痛恨那奢侈淫靡的作派，可执守礼法的人家也不免超越等级规定。储备钱粮的政事有哪年不讲求呢？可一旦遇上水灾旱灾，直至眼看着百姓流亡离散而毫无办法。防备抵御的计策没有片刻忘记过，可一旦边境发生战事，就禀告并声明士兵和粮草已经空虚耗光。国家体统和朝廷纲纪，人才与社会风尚，这都是称王天下的国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粮食充足和军队充足，又是今日的急切事务。确确实实在振兴滞政和补救弊端上忙得不得了，有能兴起它的做法，又何必去择定什么称王天下或称霸天下呢？上面有渴望实现大治的君主，下面就有辅助大治的臣僚，所以在治国大道上就容易交合而志向又容易践行啊！从前臣僚事奉自己的君主，固然有拿效法皇天、确立大道来做对答的，拿教化应如饥似渴来对待做喻示的，拿诚心和公道作为辅助治理的工具的。这哪里是不懂得推尊称王天下而抑制称霸天下呢？但为什么到最后却混淆成一个路数而不能矫正呢？后世论述治理的人，有人强调把那皇天的法则搞透彻就可以施行称王天下的大道，又有人说拥有内心圣明的德性就有外部称王天下的功业，还有人说必须具有作为天下父母的心念才会构成称王天下的大道。应当把以上哪一种说法视为不可改变的定论呢？皇帝我听说处在称王天下的君主手下的百姓，让他们服徭役却不感到怨恨，使他们有利却不把功劳归在君主的头上，自己归向良善又在品德修养上下功夫可却不知道这是怎么形成的，相安无事又彼此养护可却不晓得这是怎么来的。读书人在朝廷上相互谦让，老百姓在田野上彼此和睦相处，万物同时得到化育，各自获得到各自的生长位置。皇帝我对此特别感到可喜可贺，也特别羡慕。采取什么措施和行动就能够达到这种状态呢？你们这些士大夫深明称王天下的大道已经具有很深的功底了，要把它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纳并施行它。

28. 明世宗嘉靖八年(1529)己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概举。持大者论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则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则惠，必使匹夫匹妇各得其所。虽然，尧舜尚于此犹难，夫岂后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天命，入奉祖宗大统，朝夕战兢，不遑宁处。何自即位以来，灾变频仍，旱潦相继，岁复一岁，无处无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惧。此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欤，或贤愚不肖进退倒置欤？或劝惩之典而失其宜欤，抑为我选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欤？夫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非民不聊生而天垂深戒如此，何欤？至于内有盗贼之扰，外有夷狄之患，此亦以为民之害者。民为邦本，而使饥寒困苦，流离凶亡至于如此，邦欲安而得乎？朕虽存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实无一得。朕欲俾灾沴潜消，民安堵，盗贼息，边方靖，财充而食足，不知如之何可以臻此。特进尔多士于廷，尔多士明于王道有日矣。目睹时艰，岂无真识的见以匡我者！当悉心吐露，推衍所以于篇，朕当勉为亲览焉。勿谄勿悖，勿泛勿略，庶副朕意。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它那头绪不可能全都列举出来。抓住最主要的方面来论说，在于了解人和安定住百姓这两条而已。了解人就显出明智来了，必定会用适合他的官职任命他。安定住百姓就显出恩惠来了，必定会使每个男子和每个妇女各自获取到既定的位置。尽管如此，可唐尧虞舜仍然对这两方面的事情感到难办好，又哪里是后世君主能轻易就办好的呢？皇帝我本来是藩王，往上承受天命，入朝奉持列祖列宗的盛大帝室统系，从早到晚忧惧万分，根本顾不上安逸片刻。但为什么从登上帝位以来却灾异接连降现，旱灾水灾不断发生，年复一年，没有一个地方不闹灾而百姓被迫四处流亡呢？皇帝我对此感到特别恐惧。这莫非是皇帝我任命的官员不属于合适的人选而他们就去残害百姓吗？或者是对贤能人和庸劣人的进用与斥退闹颠倒了吗？或者是奖励与惩罚的法规并不恰当吗？或者是为我选取任用官员的人丧失了公平的原

则呢?皇天依从我那民众的舆论来做出听断,皇天依从我那民众的行动来做出观察。还没达到百姓无法生存下去的地步,而皇天降示深切的告诫竟是这个样子了,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至于在内部存在着盗贼的扰乱,在外部存在着少数部族的祸患,这也是对民众构成危害的事情。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可竟然使他们饥寒困苦、流亡离散、凶祸死去达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国家却想安宁,这能做得到吗?皇帝我尽管存有保住国家和安定民众的心念,但求索那实现的办法,实际上却没有任何收获。皇帝我想使反常的灾象在无形中消亡,百姓们非常安宁,盗贼止息下去,边境地带不发生战事,财力充盈,粮食充足,不清楚怎样办就能达到以上的目的。因而特意把你们这些读书人宣召到殿廷,你们这些读书人深明称王天下的大道已经时间很长了,亲眼看到了目前局势的艰难,哪里没有真知灼见来匡扶皇帝我的呢?要用尽心力倾吐出来、在答卷上推导引申那用来施治的东西,皇帝我会勉力地亲自进行观阅。既不要阿谀奉承,也不要怕这怕那;既不要空泛,也不要太简略,差不多能切合皇帝我的心意。

29. 明世宗嘉靖十四年(1535)乙未科

〔四月初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来,迄于宋终,中间虽历世有久近,而其君之历年亦有长短。要之皆自其为君者何如耳。但《传》云惟周之历世最多,国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之积累,亦后之继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泽洽于民心,亦继之以嗣王能尽持盈满之道者也。洪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复世,重肇中华,建振古无比之功德。朕太宗继述于草创之初,列圣导承于太定之后,百有六十余载,传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兹来思祖宗创造万艰,惕然悚悚。朕欲长保洪业于无穷,有隆弗替,永宗社万祀之固,保家国千世之传,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适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进尔多士于堂,尔等蕴持既久,王政素闲于怀,可罄所知以告朕,朕将亲择而勉之,钦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从夏商周三代以后一直到宋朝灭亡，在这过程中尽管帝位相传存在着长久与短促的区别，每个君主在位的时间也有长久与短促的差异。总之都是由他们当君主当得怎么样所决定的呀！可是解释经典的书籍上却说，只有周朝王位相传最多，国家命运保持长久。然而周朝享有国运最长久的原因在于周文王与周武王的前后积累，也在于后来继位的天子能够保有并持守住它们罢了。往上截止到夏朝与商朝，往下沿续到唐朝和宋朝，也都情况跟这一个样啊！都是根基奠定在开国君主的仁德恩泽深入人心上，接下来继位的天子又能完全持守住鼎盛阶段的恰切做法啊！只有我那伟大的太祖高皇帝代替皇天恢复人间的正常状态，重新铸造中华，建立起有史以来不可比拟的功德。我那太宗文皇帝在国家规模初具时继承大业，各位圣明的先帝又在国家彻底安定以后续加承接，历经一百六十多年，传到当今。皇帝我凭借皇室的分支又正值年轻不懂事的年龄，入朝承接起祖父宪宗的帝位。年幼脆弱很不成器，给众百姓招来了很多的灾害。如今深思祖宗创建帝业的各种艰难，非常警惕忧惧。皇帝我打算长久保住大业，直至永无尽头，只有那进一步隆盛，没有那衰颓，使宗庙社稷的永久供奉总很牢固，保住国家的代代传续，民众得以满足生存的美好愿望，万物得以处在各自的既定的生长位置上。实现以上目标的美好对策和切要做法，皇帝我在内心向往它们又思求它们，不清楚通过什么途径就能获取到它们。所以把你们这些读书人宣召到殿堂上，你们积蕴挟持既已时间很长了，心中对称王天下的政务一向特熟悉了，可以把了解掌握的东西全部讲出来，告知给皇帝我，皇帝我准备亲自进行择取并予以奖励，要努力对答好呀！

30.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辛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为《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自昔唐虞三代之治，莫不由斯。夫《六经》所陈，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也，而本之则在礼乐。然则政刑未务，果不足以为治

欤,抑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欤?议者谓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后世则否。然欤?朕缵承皇祖大统,列圣鸿绪,践祚以来,不遑他务,首以人伦典礼是究是图。盖勤心宵旰者,十余年于兹。而郊社禘尝之义,始克协于成,其在邦国乡党之制,不暇悉指。乃若天子之事,固不越此。不知今日国家之礼,亦有合于三代而上者欤?我太祖高皇帝开天肇纪之初,即以礼乐为急。盖尝征贤分局,以讲究切劘,今载诸《大明集礼》者可考也。不知当时诸臣折衷损益,果足以会其成而克副我皇祖制作之意否欤,抑犹有待于后欤?夫复古礼乐,以建中和之极,朕之意也。何二十年间,教化未尽孚,风俗未尽美,灾害未尽殄,生养未尽遂,其故何欤?孔子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力此二者,南面而立,是以天下太平。然则斯言也,将不足征耶?兹欲使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比隆于先王之盛,将何修而可?尔诸士学道有闻久矣,宜详著于篇以对,朕亲览焉,钦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鉴于儒家《六经》的道法在宗旨上都一样,而礼仪乐舞的施用却占紧要地位。从前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大治,没有谁不是通过这条途径的。儒家《六经》所陈述的东西,固然是治理天下的常规大法啊!而根本却在那礼仪乐舞上。既然如此,那么政令与刑罚不去抓,果真就不够用来实现大治吗?还是各自适应各自的作用而不能彼此贯通呢?议论政事的人认为夏商周三代以前,治理出自同一个本体,而礼仪乐舞就会推行到全天下去,后世却不是这样了。这种看法正确吗?皇帝我继承祖父宪宗皇帝的盛大统系和各位先帝的宏大基业,从登上帝位以来,顾不上其他政务,最先拿人伦纲常的典则礼法进行究寻做筹划,差不多从早到晚一直耗尽心机,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而祭祀天地和祭祀祖宗的大义,这才顺理成章地构成,那些关涉到天下各地和民间的礼仪制度,还来不及详尽地指明。像那天子的事务,原本上就超不出这个范围去。不清楚当今的国家礼仪,也有符合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地方吗?我朝太祖高皇帝在建立国家、定立制度的当初,就把礼仪乐舞作为紧要的方面来对待。曾经征聘贤士,划分各个专一部门,来进行讲论研求和切磋酌定,迄今载

录在《大明集礼》中的东西是可以考见出来的。不清楚当时的各位臣僚加以折衷,进行减损与增益,果真足以集其大成而能切合我太祖皇帝制定创作的意图与否呢?或者还有需要后世加以补充修订的地方呢?恢复古代的礼仪乐舞,用来建立起中正平和的最高准则,这是皇帝我的心愿呀!但为什么二十多年当中,教化却没完全让人信服呢?社会风气却没一律美好呢?天灾人祸还没彻底消除呢?化生养育还没完全满足百姓的愿望呢?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孔老夫子说过:讲论并真去实行,这才是礼仪呢!实行而感到欢乐,这才是乐舞呢!在这两方面下大力量去抓的人,就面朝南方昂然挺立,施行统治,所以天下便太平。既然如此,那么孔子的那段话就不足以得到验证了吗?如今想使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令推行到全天下而彼此不发生违逆,和古代圣帝明王的大治景象比试谁隆盛,修明什么就能做到这一点呢?你们这些考生研求大道又见闻丰富已经时间很长了,应当详尽地写在答卷上做出对答来,皇帝我要亲自观阅,要努力对答好呀!

31. 明世宗嘉靖二十三年(1544)甲辰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文武二道,并用而不可缺与偏者也。《传》曰张皇六师,又曰其克诘尔戎兵。此非好于用兵耶?朕皇祖高皇帝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始,思欲偃武修文,以德化天下。至于列圣相承,懋修文德,海宇乂安,国家无事。朕以支末,上承天命,入缵宝位,兹越二旬载矣。夫何连岁以来北虏寇疆,入我中国,若蹈无人之境,残我天民,前所未有?本之以朕罔德基之立于中,是以教化莫克行于外者也。然朕又闻之曰:帝王之政,守在四夷。今朕欲求长治久安之术,无出于守之一端。欲得其守之道,当何施用,以尽其长且久焉?尔多士抱经世之略,亦有日矣。宜各著于篇,朕将采而行之,毋忌毋隐。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文治和武功这两项治国大道,必须共同施用而决不能缺少或偏重其中的一个方面啊!解说经典的书籍上强调振扬起中央的六支主力部队,又强调你要能够整顿好自己的

军队。这是不是喜好用兵呢？皇帝我的太祖高皇帝凭仗武功平定天下，在登上帝位不久，就想停用武力，修明文治，用仁德化导天下。直至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续，大力修明文德教化，全天下得到治理，一片安宁，国家太平无事。皇帝我凭借皇室的分支，往上承受到天命，入朝承接起帝位，到现在已经超过二十年了。但却为什么连年以来北方的少数部族侵犯边疆，进入我中原地区，好像进入没有人防卫的地带，残害我那上天降生下的百姓，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了呢？这恐怕是出自皇帝我没在内部奠立起仁德的基石，所以教化就在外部推行不起来呀！然而皇帝我又听说过这样的话：帝王的国政，守卫在于四方少数部族。如今皇帝我打算谋求长治久安的对策，没有能比守卫这一条更高明的了。希望获取到守卫的办法，应当采取什么举措来彻底实现长治久安呢？你们这些读书人怀揣处置时世的谋略也有很长时间了，应当各自把它详明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纳并施行它，不要有什么忌讳，也不要有什么隐瞒。

32.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恭承天命，君主兆民，二十九年于兹矣。顾论治者，往往以敬天勤民为务。古先帝王之所以兴道致治，与我祖宗之所以立极垂宪，要不外此二者。其为治之迹，可举而言之欤？朕寅承上玄，钦若天道，凡以惠恤计安乎斯民者，未尝须臾少懈其念。比岁以来，嘉祥屡臻，方内乂宁，天人交应之固不可诬也。然水旱馑荒，苗狄不靖，民生未遂，治化未孚。岂朕诚有未尽者，亦或任事之臣、亲民之吏，果能皆体朕勤恤之心也欤？无乃玩愒贪残，弗念于民者欤？朕欲俾休征时若，边警不闻，百工克厘，庶绩咸熙，不令一夫失其所，朕志也。当何道而可以臻此？尔多士蕴蓄有日，岂无我助者？宜明著于篇，毋泛毋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恭敬地承奉天命，成为亿万民众的君主，到现在已经二十九年了。但议论治国大道的人，往往把敬奉皇天，为民众操劳作为该下大力去做的事情。古代帝王兴行大道、实现大治

的举措和我朝列祖列宗确立最高准则、垂示典章制度的事体，总之也不超过这两个方面去。他们施行治理的史迹，能够列举出来并论述一番吗？皇帝我恭敬地承奉皇天上帝，虔诚地顺从皇天的法则，凡是从体恤和施惠做考虑而能使当今百姓获得安宁的政事，未曾有片刻稍微松懈那忧念啊！近年以来，美好吉祥的兆应接连降现，辖区内得到治理，一片安宁，这表明皇天与人间交互感应是绝对否定不了的。然而水灾旱灾造成饥荒，边区少数部族很不老实，百姓的生存愿望还没实现，治理和教化还没深入人心。这难道是皇帝我那虔诚还有做得不够的地方吗？或者是承当政事的臣僚与直接管辖百姓的官吏果真都能体察皇帝我勤勉忧念的那番心意了呢？恐怕是荒废岁月又贪婪残暴，根本对百姓就不顾念吧？皇帝我想使美好的兆应保持常态，边境的警报不传来，文武百官恪尽职守，各种政务都取得成效，不让一个农夫失去他的既定位置，这正是皇帝我的志向啊！应当采取什么办法就能实现这一志向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蕴积谋略已经时间很长了，哪里没有协助皇帝我的东西呢？应当把它详明地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33. 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癸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闻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者，是上下之职均，有甚不易之理。昏才之主，亦多此之上者，曷自不勉诸耶？朕承皇考皇妣近泽所钟，丕荷上天明命，简畀后职，勉法祖宗，敬天爱民，由胞及与，未尝敢忽。何为臣者无克艰之思，每怀欺于谤甚，至勾沙漠，以为骨肉，但逞劫主之逆，不顾胞与之害。此其至大者，他皆可例焉。君逸臣劳，都能言诸口，心身力行甚少。先行其言之圣训，视作空言矣。尔多士身未居于位，而心志正在明白地，闻见久矣。必有不易之论，直直列于篇以对。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君主确能付出艰辛，他才够得上是那君主；臣僚确能付出艰辛，他才够得上是那臣僚。这表明上面和下面的职责是对等的，蕴含着永远无法改变的道理。昏庸的君主，也赞

许在这方面做得最突出的人，为什么不自我勉励呢？皇帝我承受到皇父皇母的亲近恩泽的孕育，盛大地肩负起皇天的显赫命令，选列并担当起君主的职责，勉力效法列祖列宗，敬奉皇天，爱护民众，由世人都是我的同胞扩展到万物与我共享，未曾敢忽略过。但为什么身为臣僚的人却没有付出艰辛的心思，竟然总在激烈的诽谤中隐藏着欺诈，直至与异族相勾结，当成骨肉，只去肆意干出那胁迫君主的叛逆勾当，不考虑世人和万物受到的祸害呢？这是最严重的邪恶表现，其他都可以照此类推了。君主应安逸，臣僚该辛劳，这句话谁都会在嘴上讲，可由内心到身躯都去大力实行却非常少见。圣人关于首先要把说的东西在行为上表现出来的训条，简直被看成是一句空话了。你们这些读书人还没担任官职，但心志却正处在最光明正大的境地上，闻知和观察已经时间很长了，一定怀有不可改变的论断，要把它直截了当地写在答卷上，做出对答来。

34. 明世宗嘉靖三十五年(1556)丙辰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天命立君，以宰于率土，必有分理协助之臣，所谓邻哉也。吁！尧舜之克圣，不有高贤大良之助，岂二圣独劳耶？夫以古之元首股肱，真是一体，上下相资，不若兹时之大不同者。朕以心腹置人心腹中，何乃视我仇雠焉，安望为国恤民也？朕固无知人之哲，能官之智，我欲闻是知能之方。尔多士目睹既真，当有益我知能之道。悉著以对，勿讳勿欺。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皇天命令人间要树立起君主，去主宰整个天下，必定要有分担治理的任务而对君主加以协助的大臣，这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大臣是我的最亲近的助手啊！哎呀呀！唐尧虞舜能够成为圣人，要是没有高明贤士和杰出英才的协助，哪里只会是这两位圣人独自去忙碌呢？拿古代元首和股肱大臣真真形成一体而上下彼此依赖来看，就跟现今的情况大不相同了。皇帝我把自己的心腹放到别人的心腹里去，可为什么竟把我看成是仇人一样呢？这还怎么能指望他们为国效劳和体恤民众呢？皇帝我确实不具备了解人的眼

光和恰切任命官员的智慧，但我希望能听到这方面的办法。你们这些读书人亲眼看到的事情已经很真切了，就该怀有扩展皇帝我了解人和恰切任命官员的智慧的办法。把它详尽地写在答卷上，来做对答，不要隐讳，也不要欺瞒。

35. 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1559)己未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恭承上天明命，君此华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恃敬，不敢怠恣，一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与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见以我心而是体，百务惟欺君以欺天，害民亦害物？彼尝言之者，后尽背而弃之？夫《大学》之道，专以用人理财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财理得宜，用自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责岂独我能耶？兹欲闻人得用，财得理，以至治美刑平，华尊夷遁，久安之计，何道可臻。尔多士其言之，必尽所怀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恭敬地承受皇天的显赫命令，统领这华夏，也已经有年头了。从早到晚保持虔敬，不敢懈怠和放纵，心念完全投注在百姓上，希望每个人都获取到自己的既定位置。但为什么与我共同进行治理的人，他们各怀各的心思，都没看到只管去体会皇帝我的心愿，各种事情却只想欺骗君主来欺骗皇天，祸害百姓也祸害万物呢？那些曾当面做出过保证的人，退下后就全部背弃诺言了。《大学》的道法，专门把任用官员和料理财政作为紧要的事体。任用官员获取到合适的人选，政务自然就得到治理；财政料理恰切适当，国家用项自然就充足。哎呀呀！人不被我所任用，而代替皇天去料理人间的责任又哪里是唯独我都能担当起来的呢？如今希望听到人才得到任用，财政得到料理，直至治理美好，刑罚停用，华夏极具权威，异族远远离去，长治久安的计策，通过什么途径便能实现。你们这些读书人要讲论一番，一定要把胸中所蕴藏的东西全部讲出来。

36. 明世宗嘉靖四十四年(1565)乙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闻治天下者，审所尚。夏

尚忠,殷尚质,周尚文,皆圣人所以救弊之政也。周之末文,日以盛。当汉盛时,论治者已谓宜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况今去古益远,文之弊其可弗救哉!然人情之趋于伪也,犹水之趋于下也。今欲使损文而用忠,其道何由?士大夫者,民之表也。朕于百司屡诏以实为,谓庶几有副朕意者。徐而察之,则修政者或徒美观听,而未能建保邦之业;献议者或徒工词说,而未能效济时之猷。称爱民者或饰甘言,而乏一体之心;名任者或张虚声,而罕持上之节。致身之义非不知也,而鲜克尽瘁于蹇蹇;慎独之训非不闻也,而率多惰行于冥冥。然则欲望民之还于忠也,不亦难乎?夫古之民,不赏而劝,不怒而威于铁钺。乃今士大夫且不能然,其故何也?尔诸士上下古今,必有慨于兹矣。其为朕根极弊源与所以救之之术,详著于篇。朕将择而行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治理天下的人要审慎地对待所崇尚的主体思想。夏朝崇尚忠厚,商朝崇尚质朴,周朝崇尚文采,都是圣人用来补救弊端的国政啊!周朝还没崇尚文采时,一天比一天强盛。正当汉朝强盛时,议论治理的人已经认为应该减损周朝的文采繁缛,施用夏朝的忠厚。何况当今距离古代越发遥远了,崇尚文采的弊病哪能可以不进行补救呢?然而世人的思想趋向虚伪,就像水往低处流呀!如今想让人们减损文采而施用忠厚,该通过什么途径去做呢?士大夫是百姓的榜样,皇帝我对各个政府部门多次下达诏旨,要求真抓实干,强调差不多确有符合皇帝我心愿的事情。慢慢地细做观察,结果修明朝政的人有的只是在视听上装潢门面,却未能建立起保住国家的业绩。献呈意见的人有的只在文辞述说上很精妙,却未能提出救助时世的谋略。号称爱护百姓的人有的耍弄好听话,却缺乏官民一体的心念。号称勇挑重担的人有的张布虚浮的名声,却很少有护持天子的节操。豁出性命劝君主的大义不是不知道,但很少有人能够在忠直规谏上用尽心力。独自一人时更要保持谨慎的训条不是没听说过,但多数人都在别人看不见时行为懈怠。既然如此,那么还想指望众百姓返回到忠厚上,不也太困难了吗?古代的百姓不予以赏赐却主动勉励自己,不动用惩罚却比死刑加身还惧怕威权。可现今士

大夫都做不到这样,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贯通古今，必定对这种情况产生慨叹了。你们要为皇帝我彻底究明弊病的来源和用来补救的具体办法，详尽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加以采择并施行它。

37. 明穆宗隆庆五年(1571)辛未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昭承天命,缵御丕基,五年于兹。夙夜皇皇,图维治理,每思与天下共享和平之福,而未臻厥效,朕甚惑之。唐虞尚矣,三代以成周为盛,说者谓太和在其宇宙。果何道以致之?或谓《周礼》九职八则,五礼六乐,三物六容,使民勤事而不暇,习于上下等仪之中,消其尊崇富侈之心,是以化行俗美,天下和平。然欤,否欤?汉治号为近古,当其时,献议之臣犹有欲定经制者,欲建万世之业者,欲不严而成化者。之三臣者,皆病徒法不足以兴治。然则如何而可以致太平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开天建极,六合同风。以政防民,若《职掌》所载,同符六典。以礼教民,若《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集礼》所载,制度精详,达于上下,可万世行之而寡过矣。乃今治绩罔效,风教未孚,长厚之意薄,虚伪之习滋,民或侈泰以相炫,士或睢恣以陵上。庶几所谓卿大夫和于朝、士庶人和于野者,而不可得。岂政之文徒具,而礼之实未至欤?今欲兴教化,厚风俗,使天下志虑不易,视听统一,相安于荡荡平平之治,礼让之风媲美成周,必何施而后可?诸士子综古度今,试究其说。朕将采而行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显赫地承受到天命,继承并守护盛大的帝业，到现在已经五年了。从早到晚忙个不停，只管谋求治理，总在思考与全天下共同享受太平的吉福,可却没达到那效果,皇帝我对此感到特别疑惑。唐尧虞舜那是太久远了,夏商周三代顶数周朝最兴盛，讲论的人认为那时高度和谐的景象在于宇宙。究竟是采取什么措施来实现的呢?还有人认为《周礼》中规定的平民九种社会职业和治理王室直辖区域的八种方法,祭祀等五种礼仪和《云门》等六种乐舞,六德、六行、六艺这三宗事和祭祀等六种规范动作,致使民众频繁地从

事而没闲功夫，在上下等级仪式当中变得很习惯，消除他们看重富贵和崇尚奢侈的念头，所以就教化兴行，社会风尚美好，天下一片太平。这种说法正确还是错误呢？汉朝的治理号称接近古代，在当时献呈建议的臣僚中仍然有主张定立起常规大法的，有主张建成千秋万代的基业的，有主张不用严刑而形成化导的。这三位臣僚都是把光有法律不足以兴起治理作为弊病来讲的。既然如此，那么究竟该怎样办就能实现太平呢？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创建国家，确立起最高行为准则，上下四方风尚相同。用政令来防范百姓，就像《职掌》一书所载列的，和周朝的六典完全符合。用礼仪来教化民众，就像《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和《大明集礼》所载列的，制度精详，遍及上下，可以永远实行它们而很少再有过失了。如今治绩显不出来，教化得不到信服，和蔼宽厚的意念太淡薄，虚伪的习气在滋长，百姓中有的人用奢侈来彼此炫耀，读书人有的任意胡来侵凌上级。接近古人所讲的公卿大夫在朝廷上和睦相处，读书人与众百姓在民间和睦相处，根本做不到。这难道是政令的规定光摆在那里，而礼法的实效还没达到吗？现今打算兴行起教化，使社会风尚变淳厚，让全天下心志不改变，视听完全一致，在坦荡平直的帝王治理下相安无事，行礼谦让的风气能与成周相媲美，必定要采取什么措施然后就能实现呢？你们这些考生要综括古代，揣摩当今，试对那说法予以究明。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纳并施行它。

38. 明神宗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抚运握图，轨一寰宇，所以综辑庶务，调剂群品，其道盖多端矣。至语其治效，自《诗》、《书》所述，章灼较著，则莫盛于虞周。夫其七政齐，庶户谐，六府修，三事治，与夫谟烈佑启，礼乐刑政焕然也。朕甚嘉之慕之，未审果由何道而致然欤？或谓舜兢业万几，文王自朝至日中昃不遑食也。惟其精勤，故化理若是。然《书》称庶狱庶慎，文王罔兼，而孔子复谓舜无为而治。何欤？我太祖神圣秉乾，再造函夏，建立法制，博大详密，用以跻世平康，与虞周媲美矣。御历三十余年，早朝晏罢，未尝时

刻少怠。其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视舜、文其道同欤?朕以冲昧，获缵丕基，栗栗夙夜，图所以顺帝则，建皇极，以庶几帝王之治者，今且五年。经费节矣，而帑廪未充；赋敛宽矣，而民生寡遂。守宰久任矣，而吏治罔宣；伍籍加核矣，而武备靡振。岂因循之积习难骤变欤，久弛之旧章难遽举欤?兹欲革文冒，破拘挛，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将何如而后可?盖盛帝显王，人称之必曰大有为，乃复有谓王者中心无为，以守至正。此其说安是?将各有主，谓不相蒙欤?抑或其道相须也?子大夫习先圣之术，其于古今治理之原讲之预矣，尚各抒所蕴，明著于篇。朕将览而择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顺从时运，握定天赐的神图，统一天下，用来综括和部署各种政务，调节和措置万物，它那方法是多方面的了。至于讲论他们的治理效果，从《诗经》、《尚书》所载述的情况来看，最突出最鲜明的，也就没有能比虞舜与周代更兴盛的了。它们在四季和天地人这七政上协调统一，众百姓都和谐，木火土金水和谷物六种物资的储存得到落实，端正品德、物尽其用和使民众生活宽裕这三事得到修明，以及帝王的谋略功业和大臣的辅助启迪，礼仪乐舞和刑罚政令都光采夺目啊！皇帝我对此万分赞许又特别仰慕，同时也不清楚到底是采用什么办法才造成这种景象的呢?有人认为虞舜兢兢业业地处理好每日的繁多政务，周文王从早晨到太阳偏西都忙得顾不上吃饭。只因他们精心勤勉，所以化导和治理就达到这般地步。然而《尚书》中又讲审理各种案件和慎重处理各种事务，周文王并不全都包揽起来，而孔子又说虞舜无为而治。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朝太祖皇帝神异圣明，秉持天纲，重新铸造华夏，建立典章制度，广泛宏大又精详周密，用来把时世带入到太平安宁的境地，正与虞舜及周代相媲美了。在位三十多年，早早就上朝，很晚才退朝，未曾有片刻稍略懈怠过。他老人家畏惧皇天与人间交互感应和延续昌盛国运的东西，同虞舜、周文王比照起来，在做法上相同吗?皇帝我凭借幼小不懂事的年龄，得以继承帝位，从早到晚戒惧警惕，谋求顺从天帝的准则和建立最高行为准则，以便接近古代帝王治绩的方式

方法，到现在快五年了。经费注意节省了，但国库和粮仓还储备不充足；赋税已经减轻了，但百姓的生活还很少有人实现了愿望；地方长官已经长期任用了，但官吏施政的准则还没得到宣明；军队的人数已经仔细验核了，但武力防备还没振作起来。这难道是因为一切照老样子办理的积习难以一下子就改变过来吗？还是因为长期废弛的既定制度难以猛然间就振兴起来呢？如今打算革除文饰泛滥的现象，破除因循守旧的习气，使每个人得以形成正确的想法，每件事遵循那道理办好，应该怎样做而后就达到目的了呢？雄盛显赫的帝王，人们称述他必定会说他真是大有作为，可又有人讲，帝王在内心清静无为，用来守持最纯正的原则。这两种说法到底哪个对呢？它们是说各自有各自的主导方面，彼此并不遮盖吗？还是说两种做法相互补充呢？你们这些士大夫研习古代圣人的治国方法，对古今治理的本原讲求得已经绰绰有余了，还应各自抒发出本人所蕴积的东西，明晰地写在答卷上。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并加以择用。

39. 明神宗万历十一年(1583)癸未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闻治本于道，道本于德。古今论治者必折衷于孔子，孔子教鲁君为政在九经，而归本于三达德。至宋臣司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果与孔子合欤？光历事三朝，三以其言献，自谓至精至要矣。然朕观古记，可异焉。曰其人如天，其智如神；曰明物察伦，由仁义行；曰其仁可亲，其言可信。皆未及武也。独自商以下，有天锡勇智、执竞维烈之称。岂至后王，始尚武欤？近世伟略隆基之主，或宽仁爱人，知人善任；或明明庙谟，赳赳推断；或迹比汤武，治几成康；或仁孝友爱，聪明豁达，则洵美矣。而三德未纯，然亦足以肇造洪绪，何也？其守成缵业者，似又弗如。或以仁称，如汉文帝、宋仁宗；以明称，如汉明帝、唐明皇；以武称，如汉武帝、唐武宗。独具一德而亦增光宗祐，何也？彼所谓兼三者则治，阙一则衰，二则危，毋亦责人太备欤？又有疏六戒者，曰戒太察，戒无断。陈九弊者，曰眩聪明，励威强。上六事者，曰不喜兵刑，不用智数。其于三德，果有当否欤？朕秉乾御极十有一年于兹，夕惕晨兴，

永怀至理。然纪纲饬而吏滋玩，田野垦而民滋困，学校肃而士滋偷，边鄙宁而兵滋哗，督捕严而盗滋起。厥咎安在？岂朕仁未溥欤，明或蔽欤，当机而少断欤？夫一切绳天下以三尺则害仁，然专务尚德缓刑，恐非仁而流于姑息。一切纳污藏疾则害明，然专务发奸摘伏，恐非明而伤于烦苛。一切宽柔因任则害武，然专务用威克爱，恐非武而病于亢暴。是用诏所司进多士，详延于廷，诹以此道，诸士得不勉思而茂明之？其为朕阐《典》、《谟》之旨，推帝王之宪，稽当世之务。悉陈勿讳，朕眷兹洽闻，将裁览而采行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治理依据那大道，大道依据那德性。古今讨论治理的人必定要依照孔老夫子的说法做出衡量裁定来。孔老夫子教导鲁哀公，推行国政在于九种根本大法，而归结到智、仁、勇这三种普遍具有的德性。到北宋大臣司马光那里，声明君主的重大德性有三方面，叫做仁慈，叫做英明，叫做威武。这种说法确实与孔子的论断相吻合吗？司马光先后事奉三位北宋天子，三次拿自己的主张做献呈，自己认为这是最精粹又最紧要的了。然而皇帝我观看古代的记述，感到有不同的地方。古代强调天子那个人如同皇天，他的智慧如同神灵；又强调辨明万物，察识类属，由仁德正义做起；还强调他那仁德令人感到可以亲近，他那话语令人感到值得信从。但都没有涉及到威武的问题啊！唯独从商朝以后，才有皇天赐给他勇力和智慧、执持强盛只管建立丰功伟绩的说法。这难道是到了后代天子的手中才开始崇尚威武吗？近代扩展谋略和使基业更隆盛的君主，有的宽厚仁慈，爱护民众，了解人才，善于任用；有的在朝廷大政方针上非常英明，在推测和决断上特别果断；有的足迹追比商汤和周武王，治绩接近周成王与周康王；有的仁慈孝敬，尊敬兄长又爱护弟弟。确实都很美好了。但像司马光所讲的三种德性有的君主并未达到纯粹的程度，可却足以创建国家，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那些守护已有成就和继承帝业的君主，似乎又比不上这些开国的君主。有的继位君主凭借仁慈而著称，如汉文帝、宋仁宗；有的凭借英明而著称，如汉明帝、唐明皇；有的凭借威武而著称，如汉武帝、唐武宗。他

们都是具备司马光所讲的三种德性中的一种德性，可也给宗庙增添了光彩，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司马光所讲的三种德性都具备就会大治，缺少其中的一种就会衰败，缺少其中的两种就会危亡，这恐怕也太对人求全责备了吧?还有上疏陈奏君主应引以为戒的六种事项的，其中强调要警戒过于明察，警戒没有独断等。还有陈奏君主容易犯的九种毛病的，其中强调不要太显示自己听得明来看得清，要激励自己威武强盛等。还有进奏六种事体的，其中强调不喜好武力刑罚，不施展小聪明和小权术。这些说法对于司马光所讲的三种德性来说，是否真有一致的地方呢？皇帝我执持天纲登上帝位到现在已经十一年了，晚上还在警惕着，清晨早早就起身，总想达到最美好的治理状态。然而朝廷纲纪加以整顿了，可官吏们却越发漫不经心；田野得到垦辟了，可民众却越发困乏；学校加以肃正了，可学生们却越发不用功；边境上实现安宁了，可士兵们却越发起哄闹事；督察追捕变得严厉了，可盗贼却越发冒出来。其中的罪责究竟在谁那里呢?难道是皇帝我仁德还没广泛施布吗?英明还有被蒙蔽的地方吗?在节骨眼上还缺少决断吗？一切都用刑法律条去约束天下，就会损害仁德，然而一味在崇尚仁德、减缓刑罚上下力气，恐怕也不属于仁德却滑向纵容姑息。一切都藏污纳垢，就会损害英明，然而一味在揭发检举坏人坏事上下力气，恐怕也不属于英明却出现烦琐苛刻的毛病。一切都宽厚柔和随它去，就会损害威武，然而一味在用威武去克制慈爱上下力气，恐怕也不属于威武却造成强硬凶暴的弊端。所以就命令主管部门推荐众多的读书人，全部延揽到殿廷上，特用解决仁慈、英明、威武的恰切方法来做询问。你们这些考生能不勉力思索而大力阐明它们吗？要为皇帝我阐发《尧典》、《皋陶谟》等经文的义旨，推究帝王的法度，察验当今的事务。详尽地做出陈述，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一心在这方面想扩大见闻，准备亲自观阅裁定并采择施行。

40. 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丙戌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盖闻上古无为而治，不赏而民劝，不怒而威于铁钺，何甚盛也！而儒者之论治曰，有功不赏，有罪

不罚，虽唐虞不能化天下。又谓夏后氏先赏而后罚，殷人先罚而后赏，周人修而兼用之。则二帝三王所由，固与上古殊路欤，何同归于治也？又有言赏宜从予、罚宜从去者，有言宁僭无滥者，有言仁可过、义不可过者，以为古昔帝王皆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然则先罚后赏者非欤？抑赏罚者帝王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欤？我圣祖继天立极，垂宪万世，恩威莫测，其用赏罚，务协于中。其揭诸《祖训·首章》，及载诸《圣政记》者，同符治古。可得而陈其概欤？朕以寡昧，托于臣民之上，十有四年矣。夙夜兢兢，惟古训是式，成宪是遵。不爱爵禄赐予，以待功能之士；而不法者以三尺重绳之，明示好恶，以与天下更始。然德泽壅而不究，法令阙而不行。任老成，奖恬退，以教让也，奔竞之风益甚；革苞苴，罪贪墨，以训廉也，而澄清之效罕闻。习俗奢侈，示之以俭，而人心尤溺于纷华；刑狱冤滥，示之以宽，而吏议多工于锻炼。蠲租赈穷，诏常数下矣，胡闾阎之困未苏？振旅诘戎，令亦屡申矣，胡牖户之防未密？无乃劝惩之法阙而未备欤？抑所谓修职任事者漏赏，而欺谩避课者佚罚欤？殆朕之不敏不明，所以风励之者非其本，而督率之者非其实也？兹欲赏信罚必，以昭明圣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何修而可？尔多士居则称先王，谈当世之务。其尚究晰古今，根极体要，详著于篇，勿泛勿隐。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听说远古时代无为而治，不进行赏赐而民众就主动勉励自己，不动用刑罚而民众却比死刑加身还惧怕威权，这是多么地隆盛啊！可儒士讨论治理却强调说：立有功劳却不进行赏赐，犯下罪过却不予以惩罚，即使是唐尧虞舜也没办法教化好天下。又说夏朝把赏赐放在前面，将刑罚放在后面；商朝把刑罚放在前面，将赏赐放在后面；周朝加以修正而混合使用它们。这就表明，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主所择定的途径，原本上就与远古时期路数不同吧？但为什么又共同归结到天下大治了呢？还有人强调赏赐应当施布给顺从我那法度的人，刑罚应当使用到违背我那法度的人的头上。又有人强调宁可超越规定施行重赏也不能滥赏一气，还有人强调在仁德上可以责罚，但在正义上绝对不能责罚，认为古代的帝王都用君

子长者的做法去对待天下。既然如此，那么把刑罚放在前面而将赏赐放在后面就不对了吗？还是表明赏赐与刑罚只是帝王实现大治的手段而不是施行治理的根由呢？我那圣明的太祖皇帝承接皇天，确立起最高准则，把法度垂示给千秋万代，恩德与威势让人揣摩不出来，施用赏赐与刑罚，务必符合最为适中的标准。揭示在《祖训·首章》和载录在《圣政记》的东西，与天下大治的远古时代完全合拍。能够陈述一番那梗概吗？皇帝我凭借孤陋寡闻和识见昏暗却托身在臣僚和百姓的上面，已经有十四年了。从早到晚兢兢业业，只管去奉守古代的训条并遵用原有的法度。不吝惜官爵俸禄，用来等待建有功勋办好政事的贤士；对不遵守法律的家伙就用刑法重重地惩办他们，明晰地显示出所喜好和所憎恶的人和事来，用来与天下人一切都重新做起。然而仁德的恩泽却在中间被堵住，不能遍及到每个人那里；法令受阻隔，得不到贯彻执行。任用老练稳重的人，奖励淡泊名利的人，用来教导人们要谦让，可投机钻营往上爬的风气却越来越严重。革除进献礼物那一套，惩治贪官污吏，用来训导人们要廉洁，可澄清吏治的功效却很少听得到。社会风气奢侈，就用节俭来加以引导，可人心还沉溺在各种奢华的事情中。断案判罪受冤枉的人多，就用宽大来予以宣示，可官吏的定罪文书却大都在罗织罪名上做得很巧妙。减免赋税，救济穷人，诏书曾经下达好多次了，可为什么民间的困乏情况还没得到缓解呢？训练好部队，整顿好军务，命令也多次做出申戒了，可为什么边疆要地的防卫还没严密呢？这恐怕是鼓励与惩戒的方法还存在着漏洞，尚未完备吧？或者是人们所讲的修明职守、处理好政事的官员却被漏掉了赏赐，而欺诈诳骗、逃避督察的官员却被躲过了惩罚呢？也许是皇帝我不机敏又不英明，用来激励的措施没抓到根本，进行督察引导的东西没触及到实际呢？如今打算该赏赐的一定赏赐，该惩罚的一定惩罚，用来彰明圣明太祖皇帝的法度并追比远古帝王的治绩，修明什么就能达到目的呢？你们这些读书人平素一说就是先王如何，一谈就是当今事务该怎样。还要究明古今，从根本到极点上阐明那最关键的方面，详尽地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1. 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乙未科

〔三月二十二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文武并用，长久之术。每慎操二柄，以驭寰宇，庶几内顺外威，臻至治焉。然观昔之开基英主，以投戈讲艺、选士弘文为美谈，而周公训克诘，召公诫张皇，顾谆切于成康郅隆之际。岂世乱则宁济以文，世平则戒备以武，道又各有攸重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函夏，成祖文皇帝驱荡胡氛。於铄哉！既以神武之略为万民请命，乃礼贤置馆即当缔造之初，延儒直阁亦在御临之始。以武戡定，用文持之，盖规摹宏远矣。列圣祗绍，谟烈显承，迨于朕躬，嗣膺丕绪，光抚太平之业，且二百三十祀，余威憺于四裔，方内安于覆盂。而谈者乃谓今文具太盛，武备浸弛。试举其概，如京师禁旅，春秋教练严矣，而冒蠹犹未清，何以壮居重之势？诸边戍卒，主客供亿烦矣，而行伍犹未实，何以张挞伐之威？至于中外府卫，纲维秩然。绾符袭组，材官非乏也，而阃钺偶虚，动称无将。列屯坐食，尺籍具存也，而荏苒窃发，辄苦无兵。其弊安在？意者人情狃于宴安，而法制隳于积习，非大为振饬不可欤？考之前史，有上言兵之要四、中国之长技五者，有因府兵之坏、作原十六卫者，有请与大臣论武于朝、举忠谋之士委之边任者，有以选勇果、习战斗为治兵之实者。此皆承熙洽之后，鳃鳃于经武保邦，筹虑甚远。又或谓安边捍盗必先治内，谓无兵无将由朝廷三弊者。岂根极之务，更有在欤？抑谋之廊庙，修之纪纲，自可以精神折冲而无烦师旅欤？今天下虽称泰宁，而方隅多警，斯亦居安虑危之时也。朕既未能舞干而来，橐弓而理，将欲经文纬武，图修攘之实政，以为长治久安计，则何施而可？尔诸士其悉忠抒画，明著于篇，毋有所隐。朕且采择而行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文治与武功同时施用，这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所以就总是谨慎地执持住这两大关键事，去驾驭整个天下，希望内部都顺从，外部都受到震慑，达到最美好的治理状态。然而观察从前创建国家的英明君主，常把放下武器讲求经学和选任士子弘扬文教作为佳话，但周公训导要整顿好军队，召公告诫要振扬

起中央主力军，却都是在周成王与周康王最强盛的时候反复做出的。这难道正表明在动乱年代宁可用文治去救助而在太平时期就用武力去戒备，具体做法各有侧重吗?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统一华夏，成祖文皇帝驱逐扫荡蒙古族的妖氛。想来真真大放光辉呀!既已凭借神明勇武的谋略为亿万百姓到皇天那里把性命从元朝统治下拯救出来，又在刚一建国时就设置馆阁礼遇贤士，在登上帝位以后就延聘儒士供职内阁。靠武功来平定，用文治来守持，总体规划差不多太宏大太长远了。各位圣明的先帝恭敬地进行承接，谋略和功业显赫地予以沿续，到了皇帝我身上，继承并担负起盛大的帝室统系，抚定并发扬光大太平的基业，眼看快二百三十年了。余下的威势散布到四周少数部族，整个辖区比倒放过来的方盆还安稳。可议论政事的人竟认为现今文采修饰那一套太盛行，武力防备却在逐渐废弛。试举主要方面，像京师的主力部队，在春季秋季教阅演练是加强了，可虚报人数和白领军饷的现象仍未肃清，这能凭什么去壮大那京师威重控制各地的威势呢?各个边防重镇的戍卫士兵，由当地人组成的部队和从外地调来的部队的各种供应已经相当繁多了，可基层编制仍不充实，这能凭什么去张布讨伐的威力呢?至于京师和外地的五军都督府和各个卫所，纲纪废弛。佩带印件又世袭袍带，武官并不缺乏啊!可独当一面的统帅偶然空缺，动辄就说没有能委派的将领。各处的驻军白吃军粮，花名册都登记得一清二楚，可山林湖泽的盗贼突然冒出来捣乱，总是苦于没兵去镇压。这些弊病到底出在哪里呢?猜想起来，人们的情志习惯于安逸享乐，而法规制度被积习所毁败，非大力进行整顿振作不可吧?考察前代的史书，有人献呈那用兵有四大关键，中原占上风的技艺有五点的主张。有人根据府兵制度被破坏的情况，提出恢复原来十六卫的建议。有人请求天子与大臣在朝廷上讲论武事，选拔忠诚又有谋略的人士，把边防事务交给他料理。有人把挑选勇猛果敢的士兵和熟习战斗作为整治军队的实务。这些意见都是在太平局面延续好多代以后，对筹划武备、保住国家感到十分忧惧，筹谋计虑得特长远啊!还有人认为安定边疆，遏制盗贼一定要首先治理好内部，认为无兵无将是由朝廷存在的三种弊政造成的。这

难道是从根本到极点的事务还有那另外的东西吗？或者是在朝廷上做好谋划，在国家纲纪上做好整顿，自然就可以从精神面貌上击退敌军而不用出动部队呢？如今天下虽然号称太平安宁，可边区角落却警报很多，这也正是居安思危的时候啊！皇帝我既已未能通过文德感召而使少数部族前来归服，让中原收起兵器，施行治理，但随即便想筹划文治武功，谋求修明内政和驱逐外敌的实政，作为长治久安的计策，而采取什么措施就可以达到目的呢？你们这些考生要竭尽忠诚，抒发筹划的东西，明晰地写在答卷上，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采择并施行它。

42. 明神宗万历二十九年(1601)辛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闻隆古帝王，罔不念祈天永命者，而惟久道化成得之。《易》称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诗》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传》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谓所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礼义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之以福。斯笃论矣。洪惟我皇祖世宗肃皇帝尝轩策士，亲制问有曰：朕思首自三代以来，迄于宋终，中间虽历世有久近，而其君之历年亦有长短。要之皆自其为君者何如。又曰：皆基于先王德泽洽于民心，亦继之于嗣王能持盈满之道者也。煌煌圣训，朕时恭绎焉。我国家太祖开基，功德与天地并。成祖再造，贻我后人。列圣缵承，暨于朕躬，天命自度，夙宵惴栗。常思远造所闻，不宜近忽所见。朕生之初，犹及皇祖。皇祖恒以敬天法祖、亲贤恤民为要务，以经术为本，以法律为辅，以明作修内治，以安静饬边圉。宫府之间，肃然奉法；华夷远近，穆如和风。至于稽古考文，尤为谨备。而皆发之于孝思，本之于敬一。殿亭榜字，皆取《洪范》、《无逸》名之。渊衷所存，廪廪三五之盛有如一日，贤亲乐利，至今思慕不忘。尔多士虽晚，尚有能扬励之者欤？我国家景运，由皇祖益绵，而皇祖享国，亦自长永。庄诵此制，乃在嘉靖十四年。仰窥圣心，以持盈满为兢兢，自昔然矣。朕不揆寡昧，景行惟勤诚不，何所修为而可几此？故不复更端，即举皇祖之所清问者清问尔多士。其悉心陈对，朕将择善而从，用祇承天休。钦哉！毋略。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隆盛古代的帝王,无不顾念到祈求皇天永久赐给统领天下的命令,可只有长久行用大道而教化形成才会获取到它。《易经》中说:察视走过的地方,考察吉祥的征兆,返回来时就非常吉利。《诗经》上说:永远配上皇天的命令,自己去谋求多种的福佑。《春秋左氏传》上说:世人禀受到天地的交合之气降生下来,这是讲人所获得的本命啊!所以就有动作的规范和礼仪正义的准则,用来固定那本命,能遵守规范和准则的人就得到那吉福。以上都是确切的论断啊! 只有我那伟大的皇祖父世宗肃皇帝曾经亲临殿廷策问读书人,亲自撰写的策问中有这样的话:皇帝我想来,从夏商周三代以后一直到宋朝灭亡,在这过程中尽管帝位相传存在着长久与短促的区别,每个君主在位的时间也有长久与短促的差异。总之都是由他们当君主当得怎么样所决定的呀!又说:都是根基奠定在开国君主的仁德恩泽深入人心上,接下来继位的天子又能完全持守住鼎盛阶段的恰切做法啊! 这番闪光的圣明训导,皇帝我总去恭敬地做探寻。我们国家由太祖皇帝开创基业,功德与天地对等。成祖皇帝重新营造国家,留给我们后代人。各位圣明的先帝递相承续,到了皇帝我这里,自觉去揣测天命,从早到晚忧惧不安。经常思考要往远处究寻所闻知的东西,不应在近处忽略所看到的事情。皇帝我刚生下来的时候,仍然亲眼看到了皇祖父世宗皇帝。皇祖父世宗皇帝总把敬奉皇天、取法祖宗和亲近贤士、体恤百姓作为最紧要的事务,把儒家的治国方法作为根本,把法律作为辅助的手段,依仗勉力振作来修明内部的治理,通过安稳沉静去整顿边境防务。宫内宦官和朝廷政府之间,都严肃地奉守法度;华夏和少数部族的远近各地,都和美得如同和风化育万物。至于稽核古代考察制度,尤为严谨完备。这一切都发自孝敬祖宗的心念,依据那虔敬和专一。宫殿和亭台的匾额,全都选取《尚书》中《洪范》和《无逸》的字句做名称。深沉圣心所留意的东西,凛然是五帝三王的盛况,多年保持得像同一天那样。亲近贤士,使百姓们感到欢乐和有利。对此皇帝我至今仍思慕不忘。你们这些读书人虽然生在后世,还有能对世宗皇帝的所作所为加以扬布的吗?

我们国家的美好国运,由世宗皇帝进一步变得绵长了,而世宗皇帝在位时间也最长久。庄重地诵读这篇策问,正在嘉靖十四年。往上窥测圣明的用心,把持守鼎盛阶段的恰切做法作为戒惧的对象,自古以来就是如此的了。皇帝我不估量自己的孤陋寡闻和识见昏暗,仰慕世宗皇帝的所作所为而只管在是否勤勉虔诚上下力气,究竟修明和推行什么就能接近它呢?所以不再另作变动,就列举世宗皇帝的清晰详审的询问来对你们这些读书人进行清晰详审的询问。你们要用尽心力做出陈说和对答,皇帝我准备择取正确的地方来依从,以便恭敬地承顺皇天的美好佑助。要努力对答好呀!不要忽略。

43. 明神宗万历三十五年(1607)丁未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帝王执枢立极,必使天下由惟一道,心惟一心。《书》称皇建其有极,用敷锡厥庶民。极者,圣人所定天下之趋而一其心也。然有猷有为有守,皇则念之矣。不协于极、不罹于咎者,亦受而锡之福。何欤?岂王道荡平,由之则是,苟羞其行,皆可近天子之光欤?后世极之不遵,斯有歧路;有歧路,斯有二心。人务自全,官不任事,而国受其敝。然则皇极可弗行欤?稽之载籍,有言君臣同体、岂可徒事形迹者,有言百官得其职、则万事得其序者,有言中人以上处置得宜、皆与全材无异者。与皇极之旨,亦有发明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创业垂统,立教万世。尝谕廷臣曰:天下若无难治,第君臣同心,一德一虑,则庶民万事,鲜有不康。又曰:居官者大小不同,各尽其职而已。昔范文正凡日所为,必求与食相称,有不及必补之。贤人于国家尽心若此,朝廷岂有废事。煌煌哉!真建极锡极之谟矣。朕夙夜祗绎,罔敢怠宁,亦冀尔有位同心戮力,急公忘私,以匡朕之不逮。而迩者人怀疑二,事多因循,纪纲日坠,风俗日偷,职业日废,议论日繁。岂自全之意多,好于尔邦者少欤?不然,毋乃锡极者未至欤?自今欲与公卿百执共矢乃心,有俞咈,无嫌猜;有异同,无甸域;有好恶,无偏陂;有实政,无虚谈。究使上锡福,下保极,以庶几于荡平正直之道。其何修而可?多士尚扬榷之,毋讳毋饰,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帝王执持住关键，确立起最高的行为准则，一定要使全天下所遵从的只是同一条大道，所用心的只是同一个心念。《尚书》中讲，君主确立起那一最高的行为准则，拿来赐给自己的众百姓。所谓最高的行为准则，正是圣人所定下的天下都归向它而统一起人们的心念的东西啊！然而众百姓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君主就要记住他们了。但有些人的行为不符合最高准则可还没有陷入罪恶当中，也要宽恕他们并赐给他们幸福。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帝王确定的道路坦荡平直，顺着走就正确，如果使那些人进一步提高德行，就都接近天子的光采了吗？后世对最高的行为准则不遵从，这就产生了岔路；一产生岔路，这就出现了其他的心念。每个人只求自我保全，官员们不做好份内的事情，而国家蒙受到危害。既然如此，那么君主所确立的最高行为准则可以不去贯彻执行吗？考察古书，有人讲论君主和臣僚是结成同一副身躯的关系，哪能只在形迹上装样子给人看呢？有人讲论百官都恪尽自己的职守，任何政事就全获取到那次序了。有人讲中等以上的人处置得当，就都和才能全面的没有什么差别。这些说法对君主确立起最高行为准则的宗旨也有发挥阐明的地方吗？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创建基业，垂示统系，给千秋万代树立起教化的楷模。他老人家曾向朝廷大臣说：天下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难治理的，只要君臣同心，德性和想法完全一致，黎民百姓的任何事情就很少有解决不妥善的。还说：身在官位的人，官大官小并不一样，只在于各尽其职罢了。从前北宋的范仲淹凡属每天所做的事情，必定谋求能和自己领取的官俸相符合，发现做得不够的地方，一定要弥补上。贤人对国家尽心到这种程度，朝廷哪里还有废弛的政事呢？这番话语太光芒四射了！真是确立起和施布开最高行为准则的筹谋啊！皇帝我从早到晚恭敬地揣摩这些训导，不敢懈怠安逸，同时也希望你们这些在位的官员与我同心协力，把公事放在第一位，忘记个人如何，用来匡正皇帝我还没顾及到的地方。但近来人们怀有二心，政事大多按老样子将就着办理，朝廷纲纪一天比一天衰落，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败坏，本职工作一天比一天废弛，

议论一天比一天繁杂。这难道是因为自我保全的考虑太多，而喜好为国家出力的人却太少吗?否则的话,恐怕是施布开最高行为准则的做法还有不够的地方吧?从现在起,皇帝我想与公卿大臣和文武百官共同发誓立下志向,只有君臣间的相互讨论,没有嫌疑和猜忌;只有看法上的相同处和不同处,没有固执己见的东西;只有共同喜好与憎恶的对象，没有偏向一边的倾向；只有实际的政务，没有虚泛的谈论。最终使上面赐给五种幸福,下面恪守最高行为准则,差不多步入那坦荡平直的大道。究竟该修明什么就能达到目的呢？你们这些读书人还要阐发究明它,不要有什么忌讳,也不要夸夸其谈,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4. 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1616)丙辰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闻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兵非圣人所讳言也。《书》称克诘尔戎兵,又曰张皇六师。夫当成康莅政之初,而其臣即惓惓以此告之。岂文事武备,经国者宜并重,而振旅之威,舞干之化,二者固相须欤?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寰区,以武功定天下。即位之后,释甲弢弓,开一代之文明。然而固本之训,居安忘备之戒,每谆谆焉。其为万世虑至深远也,可得而扬厉其盛欤?朕嗣缵洪基,莹精上理,四十四载于兹尔。虽深居静摄,而安攘大计无日不惕于衷。尝明诏执事,整饬营务,慎固边防,简将练兵,博求制御长策。而承平日久,法弛弊滋,申令徒勤,惰窳如故。京营号称禁旅,居重驭轻之意寓焉。而尺籍空存,士卒疲羸,至不胜甲胄。猝有缓急,将何所恃欤?辽左、延绥,劲兵所自出。顷岁大虏阑入,肆行蹂躏,而防御之术未闻。此岂兵之不足欤？抑教养无素，虽有兵而不得其用欤?夫兵以食为命,无食是无兵也。司农告匮,给饷不时,荷戈乘障之夫动称枵腹。识者方凛凛脱巾是虞，望其出死力以捍疆圉，胡可得也?议者欲修屯田以省转输,练土著以资战守,似矣。而行之终鲜实效,何欤?无亦右文之世难以讲武,而克诘张皇之治,卒不可致欤?兹欲振积衰之势,操长胜之权,俾国家神气日张,足以威四夷,制六合,其何施而可?诸士志切匡时,抱先忧之略久矣。尚详著于篇,勿泛勿

隐,朕将采而行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听说天下尽管安宁,可忘记战备必定就会危险,用兵并不是圣人隐讳而不愿提起的事情啊!《尚书》上讲,要能整顿好你的军队;又说振扬起王室的主力军。正当周成王、周康王刚一登上王位、主持朝政的时候,他们的大臣就用这两条来恳切地告诫他们。这难道正表明文治事务和武力防备是筹划治国的君主应当并重的大事,而凯旋入城的威势和用文舞进行的感召化导原本上正是相互补充的吗?只有我们伟大的太祖高皇帝重新铸造华夏区域,凭借武功平定天下。在登上帝位以后,收藏起盔甲兵器,开创整个一代的文德教化大放光明的新局面。然而巩固国家根基的训示,处在太平环境中忘记战备就危险的诫语,常常反复地叮嘱。他老人家为千秋万代做考虑真是极其深远了,能够扬布一番那盛况吗?皇帝我继承宏大的基业,精心谋求最美好的治理状态,到现在已经四十四年了。虽然在宫中一直不出去,安静地修养,但安定内部和驱逐外敌的大计没有一天不在心中引起高度的注意。曾经明确地向主管部门下达诏书,命令整顿京师三大营的军务,慎重对待并巩固住边防,挑选将领,训练士兵,广泛搜求控制并驾驭对方的高明计策。可是太平的年月太长了,法度废弛,弊病滋生出来,申饬督令一个劲儿地进行,可懈惰败坏还跟以前一个样。京师三大营号称中央主力军,寄寓着重兵在手控制天下各地的深长用意,但却花名册白白放置在那里,士兵疲软又脆弱,甚至盔甲都披挂不起来。突然间发生事变,将会依仗什么去应对呢?辽东镇和延绥镇,这是专出勇猛士兵的地方。近年势力强大的少数部族侵入这两地,肆意进行烧杀抢掠,可防卫抵御的对策却没听说有过什么。这难道是兵力不充足吗?或者是教阅训练没有平日的深厚基础,尽管有兵却发挥不出战斗的作用来呢?军队把军粮作为生命线,没有军粮这就等于军队不存在。可主管粮食生产的司农寺却禀报匮乏,军饷供应超过时限,手持武器守卫边墙的士兵动不动就喊肚子饿极了。具有见识的人正恐慌地把士兵逃跑作为令人担忧的事情,这还去指望士兵们献出死力来捍卫疆土,怎么能够办得到呢?

议论政事的人希望整顿好屯田制度，以便减省军用物资的辗转输送；训练好当地的士兵，以便有助于进击和防守。这种建议像是很对了，可实行起来，到最后却很少收到实效，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或许是因为在崇尚文治的时代难以讲求武备，而整顿好军队、振扬起中央主力军的治绩怎么也实现不了吗？如今打算振作起长期衰颓的态势，掌握住长久获胜的主动权，使国家的精神气一天比一天充盈起来，足以威慑四周少数部族，挟制住上下四方，究竟采取什么措施就能达到目的呢？你们这些考生在志向上特关注救助时世，怀有在天下人忧虑以前就先忧虑的谋略已经时间很长了。要把它详尽地写在答卷上，不要空泛，也不要有什么隐讳，皇帝我准备加以采纳并施行它。

45. 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1619)己未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帝王兴化致理，政固多端，而振肃人心，维持世道，则必以纪纲为首务。《诗》云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先儒之论亦曰：善为治者，先有纪纲以持之于上，而后有风俗以驱之于下。然则御世宰物，术莫要于此欤？三季以还，惟汉唐宋历年最久。英君谊辟，代不乏人。当其时所为立经陈纪，以成一代之治者，亦可指而言欤？我太祖高皇帝肇造区夏，成祖文皇帝再靖家邦，制度典章，超越千古，固可传之万世无弊者。朕缵承鸿业，绍述罔愆，御极之初，政教修明，化行俗美，犹庶几祖宗之遗烈。夫何迩年以来，法守渐隳，人惟滋玩，德意壅而不究，诏令格而不行，申饬虽勤，陵夷日甚。在位者以恣睢为豪举，而职业则亏；在下者以干犯为故常，而堤防尽溃。甚至偏裨侵大帅，僚属抗长官，奸胥诬奏以倾有司，乱民煽祸以攘富室，冠履倒置，名分荡然。其他骄淫僭逾之风，躁竞嚣陵之习，不可悉数。盖纲纪之紊，至今日极矣。其故果安在欤？汉人谓天下所以不理，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敝而不悟，政渐衰而不改。而宋人又谓纪纲隳坏，皆由上下因循。此其说孰为当欤？抑君臣当交任其责，有不容他诿者欤？夫更化善治，贵识因革之宜；起敝维风，在妙转移之术。兹欲当积弛之余，返极重之势，使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纲纪正，风俗纯，以复我祖宗之旧，如之何而可？尔多士学

古通今，习当时之务深矣。尚各抒所蕴，明著于篇，以佐朕之不逮。朕将亲览焉。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帝王兴行教化，实现大治，政务固然有许多方面，但振作并肃正人心，维持世道，就必定要把国家纲纪作为头等大事来抓。《诗经》上说：勤勉不懈的我们的国王啊，用国家纲纪去统领天下四方。前代的名儒也说：善于施行治理的君主，首先有那国家纲纪在上面执持住，而后又有统一的社会风尚在下面推行开。既然如此，那么驾驭社会，主宰万物，就没有比这更为切要的办法了吧？夏商周三代衰落以后，只有汉朝、唐朝、宋朝存在的时间最长。英明的君主和杰出的天子，每代都有。在当时他们确立并张布开国家纲纪，构成一代大治景象的措施，能够指出来并论述一番吗？我朝太祖高皇帝重新铸造华夏，成祖文皇帝再度稳定住国家，典章制度胜过以往的任何朝代，固然可以传续到千秋万代也不存在弊端。皇帝我继承盛大的帝业，在承续上并没出现过差错。在刚登上帝位时，政治与教化得到修明，化导兴行，社会风尚美好，还与列祖列宗留下的丰功伟绩相接近。为什么近年以来，法度和职守逐渐败坏，人们只知道荒废时日，天子仁德的用意被堵住而传不到下面所有百姓那里去，诏令被中间扣压住而得不到贯彻执行，申戒督令尽管接连不断，可衰败却一天比一天更严重了。身居官位的人把暴戾恣睢作为豪壮的举动，而自身的职责却亏缺了。身在下面的人把抵触冒犯当成平常事，而防范的堤坝全给冲垮了。甚至副将侵凌主帅，僚属抗拒长官，奸猾的办事人员进行诬告来陷害主管部门，作乱的刁民煽动造反去抢劫有钱的人家。冠帽和鞋子完全倒放过来了，名分都不存在了。其他骄纵淫靡、超越等级规定的风气，设法钻营、嚣张犯上的恶习，更多得数不过来。国家纲纪的紊乱，到今日差不多已经达到极点了。其中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汉朝人认为天下得不到治理的根由，常常出在君主处于太平的年月时间太长了，社会风气逐渐败坏却感觉不出来，朝政逐渐衰落却不去加以改进。而宋朝人认为国家纲纪被毁坏，完全由于上下只按老样子办事。这两种说法要数哪个正确呢？或者

是君主与臣僚应当互相担负起各自的责任，确有推不到别人头上去的吧?对朝政进行更改，搞好治理，贵在辨清沿用与变革的恰切事体；振刷衰败局面，维持好风尚，在于扭转改变的方法很精妙。如今打算在长久废弛之后，扳回那极其深重的态势，致使法度既已定立就不去违犯，命令一下达就不违背，国家纲纪端正，社会风尚淳厚，用来恢复我朝列祖列宗的原来盛况，究竟怎么办就能达到目的呢?你们这些读书人研习古代又通晓当代，熟悉目前的事务已经很深透了。还要各自抒发所蕴积的东西，明晰地写在答卷上，用来协助皇帝我还没顾及到的地方。皇帝我准备亲自观阅。

46. 明熹宗天启五年(1625)乙丑科

〔三月十五日，策试天下贡士〕制曰：朕惟自古顺治威严之世，其君臣未有不同心一德、交儆无逸者。若虞廷之都俞吁咈，殷宗之严恭寅畏，周文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盖其盛矣。故《书》称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言图治必励精而化远先孚近也。我太祖高皇帝谕群臣有曰：凡事勤则成，怠则废。贤人君子尽心如此，朝廷岂有废事!成祖文皇帝谕群臣有曰：朕每外朝，毕则取经史览阅，未尝敢自暇逸。卿等宜体朕此心，相与勤励，无厌教也。煌煌圣训，直追踪虞帝，媲美殷周矣，则夫廓清靖难之烈，固本于一念之忧勤欤?朕以冲龄践祚，抚有鸿图，蚤暮亲贤，春秋典学，亦惟是广询治道，思缵述光扬之为，兢兢而已。迄于今日，业及五年。凝精罔敢少懈，勤政尝如不及。乃凤仪麟育，河清玺出，似天为降鉴矣。而水旱频仍，灾祲不已，则儆予之天何凛凛也!请缨志壮，露布功高，似众咸用命矣。而覆军旋报，鸷伏叵测，则衡命之众何纷纷也!将朕之轸志徒殷，德意尚未沛欤?抑有司习为窳惰，奉行之未力欤?将朕之宵旰徒廑，推毂犹未当欤?抑边吏安于寝堂，实政之不修欤?夫竭百姓之指膏，以填三军之谿壑，则内病；撤貔貅之保障，以培闾阎之命脉，则外病。兹欲内外兼利，聿臻至理，遵何道而可?尔多士学古通今，目击时艰，尚筹所以振起积玩之人心，鼓舞积颓之士气，果有裨于安攘，其尽言而无讳。

皇帝的策问说：皇帝我想来，自古顺从治理和威慑四方的时代，当时的君主和臣僚没有不同心一德，特用决不能安逸享乐来相互告诫的。像虞舜殿廷上那种君臣彼此议政的和谐场面，殷高宗的庄严恭谨和虔敬忧惧，周文王从早晨一直到太阳偏西还顾不上吃饭，都属于很兴盛的了。所以《尚书》上讲，不懈怠不享乐，四方少数部族就前来归服。这是在强调谋求大治必须要振奋精神，感化远方首先要让近处都信服啊！我朝太祖高皇帝训示群臣也说过这样的话：任何政事只要勤奋就会成功，一懈怠也就废弛了。贤人君子能像这样来竭尽心力，朝廷哪里还会有废弛的政事呢？成祖文皇帝训示群臣还说过这样的话：皇帝我每次临朝听政，回宫后就拿经典史书来观阅，未曾敢自行安逸享乐过。你们这些大臣应当体会皇帝我的这种用心，互相用勤勉来做激励，不要感到厌恶不乐呀！这两条熠熠闪光的圣明训示，径直追踪那舜帝，和商朝周朝相媲美了！这正表明两位祖宗扫清天下或平定国难的功业，原本上就出自念念不忘那忧惧勤勉吧？皇帝我凭借幼小的年龄登上帝位，握有祖宗宏大的谋划，从早到晚亲近贤士，在春季和秋季做好学习方面的事情，也只管由此而广泛地询问治国的大道，思索继承并发扬光大帝业的举措，兢兢业业而已。直到今日，已经有五年了。集中精力，决不敢稍略懈怠，为政务操劳总像做得还远远不够一样。于是凤凰成双成对地飞来，麒麟也降现了，黄河水变得清澈，古代的玉玺也呈现出来，似乎皇天为我大明朝降示鉴戒了，然而水灾旱灾接连不断，反常的气象不止息，这正表明警告皇帝我的苍天是多么地威严而让人敬畏呀！主动请求上阵退敌，志气确实很豪壮，报捷的公告把功劳讲得特别高，似乎部众全都服从命令了，可全军覆没的消息紧跟着就奏报到朝廷，声称狡诈的异族部队太难让人揣测，这正表明违逆命令的部众是多么地糟乱啊！以上情况恐怕是因为皇帝我关注百姓的心念光是殷切而仁德的恩惠还没播布到每个人的头上吧？或者是主管部门还在习惯地干那懈惰败坏的烂差事，奉从执行不用力呢？恐怕是因为皇帝我早起晚睡白忙碌，对将帅给予隆重的礼遇还不恰当吧？或者是边区的官吏只管在居室内安安逸逸，实际政务却不去修明呢？竭

尽百姓的血汗去填充各支部队的军饷无底洞，内地就困乏；撤除勇猛士兵的边防守卫去培植民间百姓的命脉，外部就遭侵扰。如今打算内地和边区两方面都有利，步入最美好的治理状态，遵用什么原则与方法就能达到目的呢?你们这些读书人研究古代又通晓当代，亲眼看到了时局的艰难，还要去筹划那振作起长久荒废时日的人心和鼓舞起长久衰颓了的士气的谋略，确实对安定内部、驱逐外敌有帮助，就要全部写出来，不要有什么隐讳。

〔姜慧杰　辑译〕